

奥斯卡·王尔德

一部传记



OSCAR

A Life

1854-1888

入围 2019 年沃尔夫森历史奖 (Wolfson History Prize)

[英] 马修·斯特吉斯 著

马娟娟 译

他用戏剧性的一生诠释那句名言：

“做你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人做了。”

Matthew Sturgis

THE AIM OF ART
IS TO BE ART

艺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奥斯卡·王尔德

一部传记



OSCAR

A Life

1854-1888

入围 2019 年沃尔夫森历史奖 (Wolfson History Prize)

[英] 马修·斯特吉斯 著

马娟娟 译

他用戏剧性的一生诠释那句名言：

“做你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人做了。”

Matthew Sturgis

THE AIM OF ART
IS TO BE ART

艺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版权信息

书名：奥斯卡·王尔德：一部传记（全2册）

作者：[英]马修·斯特吉斯

译者：马娟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04-01

ISBN：9787522804767

品牌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前言及致谢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我离开纽约的短租房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查看一封之前被忽略的王尔德信件，路过一间爱尔兰酒吧时，看见门外的黑板上潦草地写着那句名言：“酒酿之辈，工作是累。”地铁上，我对面坐着个女孩，她的手机壳上有句话：“绝少有人生活，大多只是存在。”于是，为了让这个清晨更加完美，一个身穿T恤的学生出现在学校门口，他的衣服上写着：“天才是生出来的，不是钱堆出来的。”这三句话当然都得——而且准确无误地（并非总是如此）——归功于“奥斯卡·王尔德”。

这样的邂逅绝非特例。的确，近几年我一直在通过王尔德这个棱镜观察世界，发现哪份报纸或杂志都免不了偶尔提及王尔德或他的作品。推特时代，人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变得越来越短，然而王尔德得以留存的却不仅仅是他的警句。他的戏剧至今仍在上演。他的书至今仍有读者。他的形象被广泛复制，能够被人一眼熟识。他经常作为一个角色出现在舞台和银幕上。盖尔斯·布兰德雷思(Gyles Brandreth) ^①甚至让他摇身一变成了侦探。

他的地位非同寻常；他跨越高雅和流行文化，架起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桥梁。他在英国作家中与莎士比亚、简·奥斯汀比肩。在美国，也许只有马克·吐温具备这种魅力。法国人可能看重的是波德莱尔和普鲁

斯特。然而，王尔德似乎有可能超越所有这些人。他的声望逐年提高。他那目中无人的个人主义、他对社会约束的拒绝态度、他的性异端、他的政治激进主义、他对时尚的执着以及他对如今所谓“明星文化”的谨慎参与，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他变得更加平易近人、愈发精彩，别具“意义”。

所有一切都令人刮目，非同寻常，难道这即意味着我们需要另一部王尔德传记？

本书动笔后不久，我去朋友家吃饭。主人从自己的藏书中挑选了几本关于王尔德的书，把它们堆放在我的椅子上。其中有赫斯基思·皮尔逊(Hesketh Pearson)1946年的《奥斯卡·王尔德的一生》(Life of Oscar Wilde)，蒙哥马利·海德(Montgomery Hyde)1976年出版的“权威传记”，当然还有取代此前作品的：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1987年问世的不朽巨著——《奥斯卡·王尔德传》(Oscar Wilde)。

而且，他的收藏也许根本谈不上完整，那只是一名普通读者的藏书而已。这个乱叠的书堆上也许还可以添加几十本文风别类的书——传记性不太强的记述、同时代人的回忆录、文学研究作品等。毫无疑问，王尔德的故事早已被人讲述过（而且一再复述），诸多细节早有定论（经过一再修正）。人们对他的经历耳熟能详。

但正如奥斯卡所知，外表可能具有欺骗性。对于任何一个对王尔德抱有超常兴趣的人来说，一段时间以来，出版一部全新完整传记的

呼声一直存在。其中有三层原因：艾尔曼的著作出版30多年来，大量新材料得以公开，众多令人感兴趣的研究随之展开，艾尔曼版本传记中的诸多缺陷日益明显。

提起新材料，可谓有了些惊人的发现。王尔德对昆斯伯里侯爵提起诽谤诉讼的完整文字记录，连同诸多涉案人员的详细“证人陈述”已经重见天日。费城自由图书馆的马克·塞缪尔斯·拉斯纳(Mark Samuels Lasner)与玛格丽特·斯特茨(Margaret Stetz)发现了王尔德早期的笔记本（藏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带注释的《莎乐美》打字稿，以及一封关于他的《雷丁监狱之歌》的长信。2000年，鲁珀特·哈特-戴维斯(Rupert Hart-Davis)与王尔德的嫡孙默林·霍兰德(Merlin Holland)共同推出绝佳的新版王尔德书信集，其中增添了不少内容，收录了大量从前不为人知的信件。

学术界也不甘寂寞。牛津大学出版社已经着手在其“牛津英语读本”学术系列中推出《奥斯卡·王尔德全集》，目前共有七卷，包括两卷王尔德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所有内容都配有关键性的介绍和详尽注释。专业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包括文章、小册子、图书和网站——内容涉及王尔德生活中特定的方方面面：他的工作方式、病史、性生活、家庭背景、他身上的爱尔兰特质、他的学生时代、他接受的传统教育、他的阅读、他的美国之行、他的自由主义政治、他在英国的讲座、他的编辑生涯、他的童话故事、他的女性朋友、他对巴黎的热爱、他在那不勒斯的短暂逗留，以及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王尔德生命中出现过的许多重要人物也拥有各自的传记：他的母亲、

他的妻子、昆斯伯里侯爵、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以及查尔斯·里基茨、比埃尔·路易斯和奥布里·比尔兹利等合作者，还有卡洛斯·布莱克、摩尔·阿迪、弗兰克·迈尔斯和莉莉·兰特里等朋友。奥斯卡·王尔德协会在过去的25年中发展壮大，源源不断地出版了大量作品。Oscholars网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另一个实用的论坛。将所有这些分散的、迥然不同的新信息汇集起来——进行评估并将其整合成王尔德的生平记录——这个需求年复一年变得日益紧迫。

当然，学问贵在借鉴。学术研究为王尔德生平增添的诸多内容，激发出了新的研究途径。它们促使我重新查阅关于王尔德的浩瀚档案材料，爬梳剔抉，顺着被遗忘的线索继续追踪，去利用报纸档案数字化这一突破性进展所带来的机会。（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千里迢迢跑到科林代尔的大英图书馆报纸档案馆，双眼疲惫地翻看一卷卷闪烁不定的缩微胶片，从中搜寻稀见的评论或段落的人来说，数字化的新体验是如此轻松高效，简直不可思议——要不然则难免捉襟见肘。）

随着人们对王尔德生平事迹了解得越来越多，有一点愈发明确——尽管艾尔曼的传记具备种种优点，但它并不尽如人意。学者们在埋头研究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发现，该书作为王尔德的生平记录，其不足之处已经暴露无遗。德国学者霍斯特·施罗德(Horst Schroeder)博士在该书出版后不久，着手编撰了《对理查德·艾尔曼〈奥斯卡·王尔德传〉的补充和修正》。该册子于1989年出版。之后，施罗德博士继续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查研究，于2002年推出篇幅超过300页的增订版。虽然该书的内容远远谈不上详尽，但几乎所有在过去30年间围绕王尔

德进行著述的人，都不得不因此纠正或修改艾尔曼之前为他们设定的框架。这确实是我在写作奥布里·比尔兹利和瓦尔特·西克特传记过程中的经历，他们俩都对王尔德相当熟悉。

这情有可原。艾尔曼在写作传记的过程中，突然患上一种衰弱症。他争分夺秒地要赶在去世之前完成这本书。这部作品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除此之外，他在写作过程中采用的并非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文学评论的手法，大多数情况下是透过作品看生平。当然，在审视作家的一生时，这种方法有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这似乎确实使艾尔曼对王尔德的生平事迹和年表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或去检验、评估他的资料来源。这些错误大多极其细小，但数量很多，其不可避免地使某些论述失真。

艾尔曼断然采用的文学手法中还有一种微妙的变形效应。他之前别人的做法一样，构建了自己的故事。以希腊悲剧的方式而论，即从一开始便为“叙事弧线” (narrative arc)埋下伏笔，暗示情节发展的必然性。艾尔曼通过引用王尔德的作品，对其一生中发生的诸多事件展开持续不断的评论，却往往使得现实与小说、早期的希望与后来的成就、实际经历与对经历的反思、真相与传说变得模糊不清、混乱难懂。艾尔曼似乎仅凭谢弗利夫人（王尔德1894年戏剧作品《理想丈夫》中的人物）说她已经忘记了自己上学的时代，就可以安心地用几乎不到两三页的篇幅匆匆掠过奥斯卡在波托拉皇家学校度过的六年时光。当然，王尔德创造了自己的神话，摆出各种姿态，然而在这些面具及其背后的真相之间，总有一种丰富多彩的力量有待探索。但在艾

尔曼的书中，我们的主人公有时候似乎正作为后来传说中的“奥斯卡·王尔德”走过他的一生。

这是许多有关王尔德的作品的一个特点。事实上，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一直是个难题。“奥斯卡·王尔德”的既定形象——冷静而精辟的唯美主义者——魅力十足，让人很难不受其诱惑。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它还可能导致令人愉悦的曲解，比如赫斯基斯·皮尔逊声称王尔德年轻时“以某种近乎狂热的方式”射击、钓鱼和打网球，“违背了他的天性”。但它也可能只是在较小程度上造成失真。王尔德去世后，围绕着他所产生的许多神话——虚构的轶事、造假的警句、不准确的报纸报道、记错的事件——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传记作家有时更愿意让这些故事流传下去，而不是去质疑它们。

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力图让王尔德回到他的时代，回归现实。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他，赋予其一种偶然之感，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描绘他的生平。

在这项事业中，我衷心感谢所有在过去30年里致力于王尔德研究的学者的付出。他们中的有些人，我迄今为止只在其作品中打过交道，包括：卡尔·贝克森、伊恩·斯莫尔、约瑟芬·M.盖伊、约翰·斯托克斯、鲍比·方、约瑟夫·多诺休、马克·特纳、J.罗伯特·马奎尔、斯特凡诺·埃万杰利斯塔、克里·鲍威尔、乔尔·卡普兰等。

我有幸结识了其他一些学者。他们慷慨地分享了研究成果，我个人要特别感谢梅林·霍兰德、约瑟夫·布里斯托、托马斯·赖特、约翰·库

珀、迈克尔·西尼、杰夫·迪布、唐·米德、伊恩·罗斯、弗兰尼·莫伊尔、霍斯特·施罗德、玛格丽特·斯特兹、马克·塞缪尔·拉斯纳、朱莉娅·罗森塔尔、尼尔·麦肯纳和阿什利·罗宾斯。

我要感谢以下机构的工作人员：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哈利·兰塞姆中心、大英图书馆、伦敦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都柏林三一学院图书馆、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公共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法尔斯图书馆（纽约大学）、摩根图书馆与博物馆（纽约）、霍顿图书馆（哈佛大学）、贝内克图书馆（耶鲁大学）、史密森学会美国艺术档案馆（华盛顿）、特拉华大学马克·塞缪尔斯·拉斯纳收藏馆、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图书馆（波士顿）、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布劳瑟顿图书馆（利兹）、牛津大学学院图书馆、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档案馆、那不勒斯国家历史学会图书馆、那不勒斯大学图书馆、法兰西学院图书馆（巴黎）、巴特洪堡公共图书馆、科罗拉多州莱德维尔公共图书馆。

我还要感谢以其他方式分享资料或提供协助的众多人士：阿米莉亚·戈斯托尼、迈克尔·克莱登、克莱夫·费舍尔、史蒂文·哈利维尔、约翰·尼科尔、罗伯特·惠兰、罗伊·福斯特、鲁珀特·史密斯、大卫·麦克米伦、爱德华·法雷利、格雷格·盖滕比、基蒂和泰德·德里耶、托尼和简·伍斯特、大卫·怀特（《萨默塞特先驱报》）、奥利弗·福奇、雷格·加德内、帕特里克·吉布斯、盖尔斯·布兰德雷思、丽贝卡·朱厄尔、菲尔·肖、迈克尔·塔夫利、彼得·海兰德、戈登·库克、雨果·查普曼、奥黛丽·

柯蒂斯、苏菲·霍普金斯、彭妮·富塞尔、约翰·南丁格尔、罗宾·达沃尔-史密斯、大卫·沃勒、茜尔·奥谢、梅根·邓默、艾伦·奥弗莱厄蒂、路易斯·特纳、斯科特·莫里森、约翰·梅克斯伯勒、奥利弗·帕克、保罗·文森特、唐娜·克拉克、德斯蒙德·希拉里、艾伦·布莱克、德文·考克斯、吉尔·汉密尔顿、A.N.威尔逊、蒂姆和吉恩·斯特吉斯、亚历山大·费吉斯-沃克、查尔斯·马丁、琳达·凯利。

我特别感谢我的经纪人乔治娜·卡佩尔，她的远见卓识和奉献精神让这个项目结出了硕果；还有宙斯之首出版社(Head of Zeus)的乔治娜·布莱克威尔及其同事们，感谢他们以如此的洞察力和热情迎接本书问世。

最重要的是，我的妻子丽贝卡·霍萨克，感谢她在过去六年里如此乐观地容忍奥斯卡·王尔德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序

人人都想挤进门里去。法庭上坐满头戴假发、身穿长袍的大律师。旁听席和过道里挤满了民众和媒体。过去的20多年里还没有哪起诽谤案能让这个小镇如此兴奋。上流社会闹得沸沸扬扬。报纸头版头条用最大的字号报道这件事情。王尔德的名字本来就已经足够惹人注目，而开庭日披露的那些耸人听闻的证据更是把人们的胃口吊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大家都在期待更多的爆料。名人、性和丑闻的恰当组合将会带来沸腾的效果。律师对晨报上的偏见性报道提出抗议，但首席法官对所有的反对意见一概置之不理。 注

这是1864年12月17日都柏林民事诉讼法庭上的一幕。这桩引发轩然大波的“诽谤大案”由一位颇有魅力、自命不凡的年轻女子玛丽·特拉弗斯提起，她要控告都柏林著名的眼耳科医生威廉·王尔德爵士那位声名在外的妻子王尔德夫人。奥斯卡·王尔德那年10岁，这起事件标志着14个月以来针对他父母的诽谤、恼怒和恶意在此时达到了高潮。

玛丽·特拉弗斯的父亲是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法医学教授，他脾气古怪，做事谨慎。她从十七八岁开始成为王尔德医生的病人，也是一家人的朋友。医生对她的身心健康、成长发展怀有浓厚的兴趣，兴许这其中还有些别的成分。他陪她参观展览，给她买衣服，借（或者给）她钱，鼓励她的文学抱负，给她提供读书建议，邀请她到家里吃饭，和家人一起出游。如果说这一切中包含有迷恋的成分的话，那么

王尔德医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曾试图断绝这种关系，这可能是因为特拉弗斯小姐流露出性情越来越不稳定的迹象，让他感到不安。他两次给她钱，好让她和她的兄弟们一同前往澳大利亚。她每次都拿了钱，却没有登船。

相反，她越发强烈地要求王尔德医生关注自己，对王尔德夫人拒绝的做法日益不满。她感觉自己受到了轻视，认为王尔德夫妇存心要欺侮和羞辱她。根据她自己的陈述，最严重的一次凌辱发生在1862年10月。在王尔德医生的诊疗室，就在他检查她脖子上的烧伤痕迹时，她失去了知觉——可能是被自己的帽带卡住了。她苏醒过来后，发现王尔德医生心烦意乱，面露愧色。她还发现——因此她声称——自己在昏迷期间遭到了“侵犯”。

然而，她并没有因此终止与王尔德一家的联系。她继续去看医生，写信给他的妻子，却也愈发放任自己，敌意越来越深。作为计划中的一系列“威胁”之一，她把大蒜放在梅里恩广场的手术肥皂盘里。她继续向王尔德医生索要钱财，并在一封信中写道：“如果你不像往常一样及时寄钱，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她写了一篇讽刺王尔德夫人最新著作的书评，对该书取得的成功表示愤怒。她威胁要自杀，并寄去一份宣布自己死亡的假剪报。

1863年10月，她印刷了一本名叫《弗洛伦丝·博伊尔·普赖斯：抑或一种警告》(Florence Boyle Price: or A Warning)的小册子——以几乎写实的手法记录了她的各种怨气，王尔德夫妇被塑造成自负的“奎尔珀医生和奎尔珀太太”——他“嘴边明显挂着一种野兽般阴

险的表情”，她则是个“古怪的，不会持家的女人”，喜欢将“大把时间花在床上”。她用耸人听闻的廉价惊险小说的手法，讲述了医生如何把氯仿藏在一个“漂亮的香水瓶”里，制服了年轻的普赖斯小姐，好让他对她为所欲为。小册子共制作了一千份。

这些小册子在都柏林广为流传。王尔德夫妇竭力不去理睬外界的攻击，他们一度看上去经受住了这次风暴。但1864年初，王尔德医生被授予爵位，激起了特拉弗斯小姐的愤恨。同年4月，威廉·王尔德爵士要在大都会大厅就“爱尔兰的过去和现在”发表公开演讲，特拉弗斯小姐安排了一群报童在会场外分发这本小册子（连同威廉爵士写给她的一些信件的摘录）。其中一个报童摇着从当地拍卖商那儿租借来的手摇铃；所有人都举着写有威廉爵士夫妇名字的牌子。特拉弗斯小姐躲在一辆停在附近的出租马车里指挥一切。

从那时起，斗争就变得无休无止。《桑德斯通讯》(Saunders' s News-Letter)上刊登了一封由特拉弗斯小姐执笔，但署名“问询者”(Inquirer)的信件——她在信中装作天真地关心起当天晚上的事件，并提出一种合法的解决方案：“很多男孩都在卖一种小册子，我出于好奇买了一本，威廉爵士在其中被描写得极为不堪。这其中所涉及的事情难道是真的吗？如果不属实，爵士应该采取行动惩罚罪犯。这本小册子已经发行了六个月，其准确性没有受到质疑。”^⑩

《都柏林周报》的广告栏里开始出现一些粗鄙的顺口溜，暗指威廉爵士的不正当性行为，以及他的几个私生子；类似的邮件则寄到了梅里恩广场1号的信箱里。王尔德夫人逃到布雷(Bray)，特拉弗斯小姐

跟踪到那里。她让当地的报童沿路列队行进，直接从王尔德家屋外经过，仍然举着标语出售小册子。王尔德夫人忍无可忍，给特拉弗斯小姐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阁下：

您也许不了解您的女儿在布雷的不光彩行为，她在那里与下流小报的报童们厮混在一起，雇用他们散发写有我名字的攻击性标语和小册子，并在其中暗示她和威廉·王尔德爵士之间存在私通的关系。如果她想丢人现眼，那不关我的事；但她侮辱我的目的是敲诈钱财。她曾经多次勒索威廉·王尔德爵士，并威胁如果得不到钱，就会变本加厉地为难他。我认为有必要告诉您，她不可能通过威胁和侮辱从我们手中敲诈金钱。她的做法和要求如此卑鄙，她永远得不到耻辱赔偿。

简·F.王尔德

特拉弗斯教授虽然回了信，但他没有销毁原信；而他的女儿从文件堆里发现这封信之后，便立刻打算拿它大做文章。她一心一意要把威廉爵士送上法庭，这似乎是个好机会。她把这封信拿到都柏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指示他们对王尔德夫人提起诽谤诉讼——声称信中诸如“不光彩行为”、“与下流小报的报童们厮混在一起”、“私通”和“耻辱赔偿”等字眼诋毁了她的人格和贞操。尽管写下这些诽谤词句的人是王尔德夫人，但威廉爵士在诉讼中被称为共同被告——因为在当时，丈夫对妻子的民事不端行为负有法律责任。特拉弗斯小姐要求赔偿2000英镑。❶王尔德夫妇似乎想寻求庭外和解，但特拉

弗斯小姐毫不妥协。他们被迫出庭，要求律师为自己的正当性和权利进行辩护。●注

双方都排出了强大的法律人才阵容。特拉弗斯小姐的代理人是高级律师阿姆斯特朗，他是爱尔兰出庭律师中的佼佼者，其背后是王室法律顾问赫伦先生和才华横溢的御用大律师艾萨克·巴特（王尔德夫妇的老朋友），以及两名初级出庭律师。王尔德夫人的代理人是高级律师沙利文（未来的爱尔兰大法官），同时还有两名王室法律顾问及另外两名初级出庭律师。案件审理从12月12日星期一开始，持续了6天。

特拉弗斯小姐获得了在法庭上公开表达怨恨的机会。她用引人入胜的细节描述威廉爵士对她的殷勤，他的信件（有时是甜言蜜语的哄骗勾引，有时是抱怨责骂），他要她称呼自己“威廉”，他企图拥抱她，以及他遭到拒绝之后的悔过之心。在律师的引导下，她描述了1862年10月的事件，当时她在王尔德医生的外科诊所失去了知觉。她声称自己苏醒后，王尔德发疯一般地恳求她：“请理智一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在你的掌握之中……饶了我吧，哦，请饶了我吧……如果你愿意，就打我吧。我真希望能恨你，但我恨不起来。我发誓再也不碰你的手。请听我说，照我的话去做。你要相信我，要对我有信心，过去的事情可以得到弥补，你可以去澳大利亚。想想这件事可能引发的议论。为了你自己，也要装得像没事人一样。”法庭上鸦雀无声，她声称——是的——她在昏迷期间遭到了“侵犯”；或

者，如阿姆斯特朗律师所言，她“走进房间时是个少女，但出去时却成了妇人”。^②

这些都是报界和公众津津乐道的细节。但特拉弗斯小姐的证词中有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她的行为也有许多古怪之处。沙利文律师尽其所能指出了这些矛盾点：她没在所谓强奸发生的当时提出指控，她想不起事情发生的确切日期，此事发生之后她继续与威廉爵士保持着往来，她无法确定之后是否还有任何进一步的类似“交往”。但是，威廉爵士无法直接做出否认，因为他——尽管名义上是共同被告——被建议不要出庭作证。

然而，这倒使得一身黑衣的王尔德夫人（为了悼念她新近在美国去世的哥哥）得以陈述特拉弗斯小姐的骚扰行为。艾萨克·巴特经反复询问后，证明确有其事。也许太自信了。王尔德夫人对特拉弗斯小姐及其主张，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她拒绝承认威廉爵士与原告之间存在“私通”或“不正当的恋爱关系”。当被问及特拉弗斯小姐寄给她的假死亡通知时，她话锋一转幽默地说：“我想，我在1863年8月，她死亡之后再次见到了她。”这句话引得旁听席上哄堂大笑，但令陪审团大为震惊。尽管巴特试图诱导她，就她最近翻译的德国小说中所谓的不道德问题展开探讨，但法官阻止了探讨这个问题。

至少对一些旁观者来说，这场法庭决斗含有一些戏剧性的讽刺意味。已婚的艾萨克·巴特尽管在道德上摆出义愤填膺的架势，但谁都知道他（像威廉·王尔德爵士一样）有好几个非婚生子女。而且，尽管他试图把王尔德夫人描绘得冷酷无情，但有传言说，他曾在她婚前的几

年间与其调情——如果不是外遇的话。但在四法院(Four Courts)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

人们“普遍期望”这桩案子的处理会有利于王尔德夫妇。⑨法官在对陪审团的讲话中强调了特拉弗斯小姐的古怪行为与所谓强奸之间的关系，他提议，既然她和威廉爵士继续保持着友谊，那或许可以合理地认为“如果确实存在性行为，那也是获得了她的同意，或者肯定没有违背她的意愿……整起事件根本就是捏造的”。

但这与星期五下午艾萨克·巴特的雄辩总结形成了鲜明对比——巴特的陈词被新闻描述为“都柏林陪审团有史以来听到的最强有力的上诉之一”。⑩他把特拉弗斯小姐描绘成一个遭受高傲强大的王尔德夫妇冷酷无情对待的孤立而脆弱的年轻女子。威廉爵士拒绝作证，没有扮演“一个男人的角色”——巴特“为一个爱尔兰绅士的此种行径感到遗憾”。王尔德夫人试图摆脱特拉弗斯小姐布下的诱饵（和艾萨克·巴特的质问），被认为是冷酷无情——不配当母亲、妻子、女人和基督徒。她本应该对特拉弗斯小姐讲述的那次自杀企图做出简短回应，但“王尔德夫人对此完全没有兴趣”，说到这里，他假装非常气愤地道：“哦！可耻的天才！哦！无耻的女人心；羞耻——最重要的是，令爱尔兰女人蒙羞。”

这番感情用事的上诉——尽管有明显的戏剧夸张成分——产生了效果。陪审团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议，做出了有利于特拉弗斯小姐的裁决——尽管为了削弱裁决的效力，他们只判她获得了1法寻的赔偿，

而不是她要求的2000英镑。王尔德夫妇被责成负担案件费用——“预计负担相当沉重”。^⑨

长达一周的好戏终于落幕。淫荡的案情细节加上慷慨激昂的法庭辩护，使之——在爱尔兰之外——成为一桩爱尔兰特有的奇观。“爱尔兰人冲动鲁莽，感情外露，”伦敦《泰晤士报》称，“他们种族的一个特点就是能言善辩，相信在这桩案子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英国人也许会纳闷，它怎么会激起如此大的兴趣，耗费这么多的专门力量。”^⑩

奥斯卡·王尔德

一部传记



OSCAR

A Life

1854-1888

入围 2019 年沃尔夫森历史奖 (Wolfson History Prize)

[英] 马修·斯特吉斯 著

马娟娟 译

他用戏剧性的一生诠释那句名言：

“做你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人做了。”

Matthew Sturgis

THE AIM OF ART
IS TO BE ART

艺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版权信息

书名：奥斯卡·王尔德：一部传记（上册）

作者：[英]马修·斯特吉斯(Matthew Sturgis)

译者：马娟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品牌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微信读书进行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马修·斯特吉斯 (Matthew Sturgis)

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专注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文化界的研究。他所著的奥布里·比尔兹利和瓦尔特·西克特传记，以及作品《激情年代——19世纪末颓废的英国人》(*Passionate Attitudes – The English Decadence of the 1890s*) 深受好评。他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写书评，是《时尚芭莎》杂志的艺术评论作者，还为《星期日独立报》撰写足球报道。他是奥斯卡·王尔德学会期刊《王尔德》(*The Wildean*) 的编委会成员。

马娟娟

浙江人，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曾长期从事国际新闻工作，译有《软实力》《战略：一部历史》《以色列总理私人史》。





1.王尔德夫人，奥斯卡的母亲，43岁。都柏林画家伯纳德·穆雷宁(Bernard Mulrenin)1864年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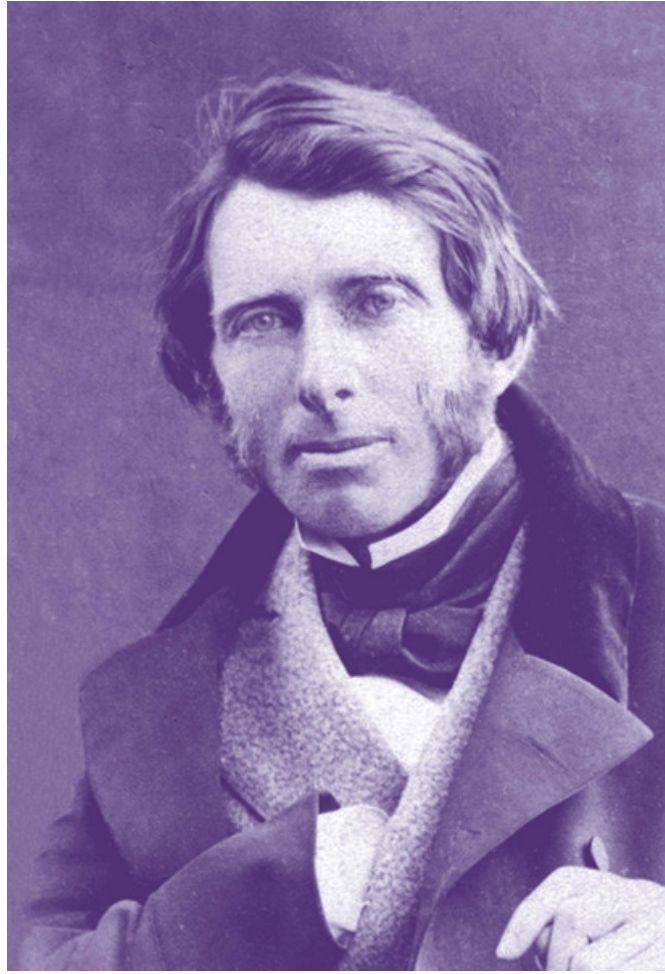
2.奥斯卡大约2岁时，身着蓝色天鹅绒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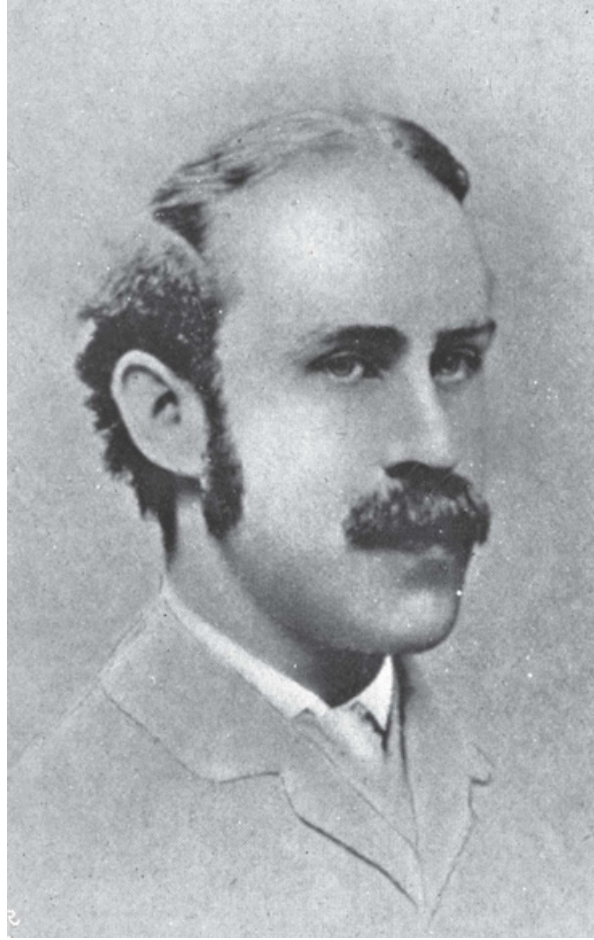
3.威廉·王尔德爵士临终前不久，胸前佩戴着瑞典北极星勋章。



4.约翰·彭特兰·马哈菲，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古代史教授；他引领奥斯卡“如何去热爱希腊事物”。



5.约翰·罗斯金，19世纪80年代牛津大学史莱德美术讲座教授。



6. 沃尔特·佩特，颇具争议的牛津大学教师，《文艺复兴史研究》作者，该书是奥斯卡的“金书”。



7. 弗兰克·迈尔斯，人脉广泛的年轻艺术家兼业余园艺家，他将奥斯卡引入伦敦社交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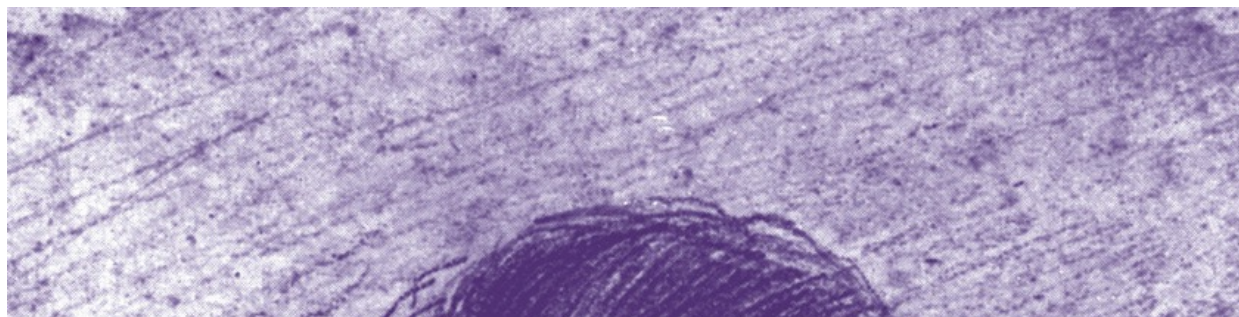
8.莉莉·兰特里，知名名媛，她是奥斯卡诗歌里的“新海伦”。



9. 埃伦·泰利，欧文的学园剧院的头号女主角，奥斯卡数篇十四行诗中的主题。



10.戴高礼帽的王尔德，惠斯勒绘。





11. “漂亮非凡的女孩” 弗洛伦丝·巴尔科姆，奥斯卡绘，约1876年。



12. 莎拉·伯恩哈特，约1880年由拿破仑·沙勒尼摄于纽约。奥斯卡评价这位女演员时说“绝对没有像她这样的人”。



13. 海伦娜·莫杰斯卡，波兰籍女演员；奥斯卡是她在英国的拥护者。





14.1883年左右的康斯坦斯·劳埃德，之后不久她与奥斯卡订婚。



15.7岁的西里尔，1892年在克罗默附近菲尔布里格村的花园里。



16.身着海军衫的维维安，虽然康斯坦斯考虑让他加入海军，但王尔德夫人坚持认为他是个“天生的作家”。



17.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奥斯卡心目中的“英雄”，他的朋友、师长和敌人。



18.1880年的沃尔特·惠特曼，奥斯卡认为“他是我们现代生活中最接近希腊人的人”。



19.玛丽·普雷斯科特，她在命运多舛的《维拉》的纽约首场演出中扮演女主角。



20.克拉拉·莫里斯扮演的《茶花女》，由沙勒尼拍摄。虽然这位美国女演员很“固执”，但她是王尔德为《维拉》挑选女主角时的第一人选。

第一部分 星之子

1854～1874年

1～20岁



学生时代的王尔德

1 不守规矩的小男孩

他很少谈及童年，只说他曾经非常非常幸福。

——罗伯特·谢拉德(Robert Sherard)

1855年5月——审理特拉弗斯案件的九年前——爱尔兰皇家天文学家威廉·罗恩·汉密尔顿爵士(Sir William Rowan Hamilton)写信给一位朋友，讲述他在都柏林繁忙的社交生活：“一位非常古怪而有独到见地的女士……不久前还刚生了孩子：这类事情至少在爱尔兰是这样的；她请我领她入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她，她向我说起那个‘小异教徒’(young pagan)，她是这么称呼他的，请我当孩子的教父，也许因为我是诗人华兹华斯的孙子……她是华兹华斯的崇拜者。然而，我拒绝了。”

这次拒绝似乎并未招来怨恨。不久，这位“古怪而有独到见地的女士”拜访了威廉爵士，当时他正在自办的天文台举行开放日。“我们为她孩子的健康干杯，”他写道，“我的女客人告诉我，孩子已经在前一天受洗，起了一个长长的教名，或者说是一串名字，头两个是‘奥斯卡’和‘芬格’！第三个和第四个（欧弗雷泰和威尔斯）在我听来像是一个了不起的血统，但我猜想那是她自己杜撰的。”^①

信中提到的“小异教徒”奥斯卡·芬格·欧弗雷泰·威尔斯·王尔德(Oscar Fingal O' Flahertie Wills Wilde)1854年10月16日出生于都柏林韦斯特兰街21号一栋整洁的乔治王朝风格的连排房屋里，那里靠

近韦斯特兰街火车站，背向圣三一学院公园的空地。他在附近圣马克教堂举行的仪式上，由他伯伯主持获得了这串长长的教名。❶

“奥斯卡”和“芬格”都是富有诗意和浪漫色彩的名字；正如他的母亲所言，它们“崇高、朦胧，有奥西恩的风格”。在古代吟游诗人奥西恩写下的凯尔特史诗中（但实际上它由詹姆斯·麦克弗森作于1760年），“奥斯卡”是爱尔兰传说中伟大的悲剧英雄，“芬格”是他同样英勇的祖父，是传说中费奥纳勇士军团的首领。“欧弗雷泰”虽然不那么富有诗意，但也同样充满传奇色彩。欧弗雷泰是爱尔兰西部的一个大家族：他们曾经是康尼马拉的领主和康诺特的国王。小奥斯卡·王尔德可以通过曾祖母与他们搭上亲属关系。“威尔斯”也是一个类似的姓氏——虽然听起来更容易让人联想起“英格兰人”而非“爱尔兰人”。奥斯卡的父亲、祖父都用了这个名字，事实上，两年前的奥斯卡的哥哥威廉出生时也用了这个名字。自18世纪初以来，威尔斯家族一直是卡斯尔雷一带颇有影响力的地主；王尔德家族之所以接连采用这个名字，似乎并非出于血缘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渴望与上流社会建立联系。这些名字排列在一起着实引人瞩目。它们想必给威廉·罗恩·汉密尔顿爵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名字承载着希望和期待。同时它们也透露出孩子父母此举的动机——实际上是装模作样的自命不凡。❷

奥斯卡·王尔德的父亲和母亲是都柏林的重要人物。尽管奥斯卡出生时他们都只有30多岁，却已经被标记为真正的“名人”：“外科医生王尔德”和他的妻子“斯佩兰萨”（Speranza）。夫妇俩不仅在都柏

林颇有名望，而且两人的名气还令人难以置信地散布开来。他们的名字传遍了爱尔兰、英格兰、欧洲大陆，甚至美国。

威廉·王尔德不仅是都柏林首屈一指的耳眼科医生，医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而且还是旅游和历史类畅销书作者，爱尔兰考古、地形、人种和民俗领域公认的专家，是不列颠科学协会和爱尔兰皇家科学院(Royal Irish Academy, RIA)的重要人物。他的妻子简是个诗人——在大部分爱尔兰人眼里——她是一位民族女英雄。她也许“古怪而有独到见地”，但正如威廉·罗恩·汉密尔顿爵士所言，她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天才，而且她自己非常清楚这一点”。她为都柏林的期刊撰写博学文章，闲时读读希腊语书籍，并且翻译了广受欢迎的法国和德国作品。

王尔德夫妇在任何环境下都是耀眼的一对。她非常漂亮（事实上有旁观者描述她“简直漂亮极了”）^①：身高接近六英尺，身形笔挺，气势威严，她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但面容洁净，一双细眉，深色眼睛，一头黑发，喜欢穿鼓胀的带裙撑的白裙，配上飘逸的披肩。她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罗马女神、罗马贵妇，或者奥西恩笔下的女英雄杜加拉(Deugala)。^②威廉·王尔德中等身材，和他高大的妻子相比略显矮小。此外，由于长时间的工作，他还稍微有点驼背。尽管她看上去仪态高贵、慢条斯理，然而他却——“像一条斯凯狗^③”——肌肉发达、精力充沛，一副忙得团团转的样子。他走起路来怪模怪样，胳膊随着脚步上下甩动。他双眼炯炯有神，相貌有点像类人猿，尤其是他的连鬓胡子更加突出了这一点。他的深色头发已经斑斑

驳驳地露出狼灰色，浓密而不羈。他的面色特别黄，以至于有人认为他看上去很“脏”。在男人眼里，他很丑；女人倒觉得他很有魅力。

⑩

即便身处一个人人善言的城市，王尔德夫妇依然是才华横溢的突出典范：他极为健谈，善于讲故事；她“大胆无畏得有趣，而且见地独到”，喜欢制造“轰动”。他们在韦斯特兰街共同营造的家庭以善于交际、热情好客、富有智慧、令人兴奋和标新立异而闻名。有些人认为王尔德家的人过于亢奋，过于出格，但几乎没人否认，这一切都建立于真正的事实基础和成就之上。他们是自己这座奥林匹斯山上的“天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和天后密涅瓦” ⑪。 ⑫

威廉·罗伯特·威尔斯·王尔德生于1815年，在爱尔兰西部的罗斯康芒郡长大。他在家中排行第三，父亲是当地一位医生，出身于英格兰-爱尔兰新教的富裕家庭。他的母亲阿梅莉亚·菲恩(Amelia née Fynn)具有古老的爱尔兰血统（梅奥郡巴利马克吉本的菲恩家族以其广阔的庄园、古老的名字、与欧弗雷泰家族的关系，以及精神状态不稳定而闻名）。 ⑬在爱尔兰，本土的天主教凯尔特人和外来的英格兰新教徒移民之间有一条既定的界线，威廉·王尔德欣然接受了自己传承上的连接性和模糊性。他看到了种族“融合”的巨大好处，认为没有“比撒克逊人和凯尔特人更好的”融合了。 ⑭

威廉的两个哥哥是爱尔兰圣公会的牧师（他的两个姐妹中有一人嫁给了牧师），他则子承父业。他17岁时被送到都柏林学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外科。他在都柏林顶尖的医学院学习，与同窗友好相处

了5年，之后获得了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Ireland)颁发的执业资格。

这些成绩来之不易。他的哮喘病反复发作。期末考试前夜，他染上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热病，靠他的导师兼老朋友格雷夫斯医生开的一份浓啤酒（每小时一杯）才扛过来。除了这些健康方面的担忧，这个22岁的未婚男人还得知自己马上要当爸爸了。在诸多因素（或者全部）的作用下，他接受了一份私人医生的工作，为一位患有肺病的苏格兰富商服务，后者准备乘坐自己的汽艇前往巴勒斯坦的圣地，度过为期9个月的康复期。这份工作并不繁重，他时常在中途停靠的时候为自己的第一本书搜集资料。他回到都柏林后出版了一套两卷本游记，作品广受赞誉。

从《马德拉、特纳利夫及地中海沿岸之旅叙事》（通常称为王尔德的《马德拉游记》）一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个精力充沛、博学无畏的年轻人。他的文风活泼动人。他的兴趣范围无限：涉及鸟类生活、植物标本、古代遗迹、气候对健康的影响、流浪狗的习性、死刑的方式、女装的式样、拿破仑战争遗址、皇家陵墓、伯利恒年轻女性漂亮的眼睛、科伦纳烟草工厂里年轻女性那优美的手指等。他探访了阿尔及利亚的奴隶市场，冒着生命危险登上金字塔，解剖了一只海豚（为了发现海洋哺乳动物如何在不淹死幼崽的情况下哺乳），并在提尔对“第勒尼安紫”染料的真正起源进行了一番彻底的调查。

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他发现“阿特鲁斯宝库”中巨大的石墙并非用灰浆涂抹而成，而且与爱尔兰米斯郡纽格兰奇的新石

器时代大型古墓极为相似，这令他感到极为震撼。这促使他想到，前古典时期希腊的雅利安人和史前爱尔兰的早期凯尔特人之间一定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①威廉·王尔德对爱尔兰的早期历史特别感兴趣。他童年时在罗斯康芒乡下时，经常跟着父亲在当地农民中巡诊。这些旅行经历令他爱上了地形学、考古学、历史和民间习俗。这是一个充满神秘的世界：到处可见无法解释的古代石头和泥土遗迹，可闻与逝去的英雄时代大人物遥相呼应的地名，当地人丰富多彩的迷信习俗似乎保留了爱尔兰人在基督教诞生之前的世界观。

作为都柏林的一名医科学生，威廉·王尔德很高兴能找到其他像他一样对文物感兴趣的人。他们共同的热情反映了一种新的文化民族主义精神，它虽然不像同时代有些人所拥护的民族主义那样具有那么强的政治和革命色彩，但对现有的等级制度也同样具有挑战性。颂扬爱尔兰前基督教凯尔特时代的历史，似乎压倒了后来所有源于信仰、国籍和政治忠诚的分歧，并且提供了一幅爱尔兰独立统一并脱离英格兰的愿景。爱尔兰皇家科学院是一个致力于搜集、调查和分析爱尔兰文物的机构，它为这些狂热者提供了关注焦点。年纪轻轻的威廉·王尔德23岁被选为其中的一员。②

然而，他对爱尔兰的热爱从来没有局限性，也不狭隘。他用出书赚来的钱（非常有分量的250英镑）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学术中心完成了医学教育。他在埃及旅行时看见许多人饱受眼疾之苦，这段经历成为他决定专攻眼科疾病的原因之一。他在伦敦皇家眼科医院（莫菲尔德）待了三个月；然后前往维也纳，在当地最大的维也纳总医院

(Allgemeine Krankenhaus)学习，那里仍然用拉丁语授课；他拜访了布拉格、德累斯顿、海德堡和柏林的各家机构，于1841年回到都柏林，在韦斯特兰街开了自己的诊所（最初在15号，后来搬到21号）。

王尔德精力充沛。作为一名眼科和耳科医生，他很快就在上流社会站住了脚。作为一项公益慈善之举，他把房子旁边的马厩改建成穷人诊疗所，并于1844年在马克街将其改造成了圣马克眼耳疾病医院。他在专业和慈善领域如此活跃，恐怕要归功于他是个积极的共济会成员。^⑩他定期向都柏林著名的《医学科学杂志》投稿，在30岁之前成为该杂志的编辑，并将其改造成更具权威性的季刊。他对医学统计学极富兴趣，成为1841年爱尔兰人口普查医学专员（以及随后1851年、1861年和1871年的人口普查助理专员）。

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一本介绍奥地利知识分子生活的书（《奥地利：文学、科学和医疗机构》）；参加了不列颠科学协会的博物学和民族学会议。他继续研究爱尔兰古文物，定期向爱尔兰皇家科学院报告最新情况。他修改了《马德拉游记》并将其再版。他为《都柏林大学杂志》（艾萨克·巴特是该杂志的共同创办人，并且短暂地担任过编辑）撰写了多篇题材各异的文章。他出版了《迪安·斯威夫特的最后岁月》，这是第一部提出《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晚年并未发疯的作品。他根据自己在爱尔兰西部写下的随笔（他曾经在麦考莱勋爵研究撰写《英国历史》期间，带其考察博因河战场），出版了散文集《博因河与黑水河美景》（1849年）。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委员会会议、俱乐部欢宴、不定期讲座和繁忙的社交生活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完成的。他似乎还参与了学生时代末期留下的私生子的教育。这个孩子被隐晦地起名为亨利·威尔逊，是王尔德家身份不明的“堂兄”，王尔德医生将其抚养成人，准备让他子承父业。威廉·王尔德至少还有两个非婚生子女，是两个女孩——艾米莉（生于1847年）和玛丽（生于1849年）——由他的大哥拉尔夫·王尔德牧师收养并作为监护人，拉尔夫曾在都柏林郊外的基尔萨拉罕(Kilsallaghan)担任教区牧师。她们的母亲据说是城里一家“黑橡树商店”的店主。❶然而，将王尔德医生说成是个积习难改的“追女仔”，在“家家户户”留下私生子，恐怕是都柏林八卦圈的夸张捏造。❷19世纪50年代初，他似乎有意找个妻子。他向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演员海伦娜·福西特求爱——或者至少是调情，但没有任何结果，于是他移情别处。

简·弗朗西斯卡·埃尔吉(Jane Francesca Elgee)是个值得信赖的伴侣。1851年，时年29岁的她已经名声大噪。她在过去五年间揭露饥荒的惨状，对英国政府无法解决饥荒表达了民族主义的愤慨，作为爱尔兰众多发声英雄之一而广受赞誉。她虽然出身都柏林一个彻头彻尾的传统中产阶级新教家庭，自小在教会和英国军队高层的呵护下长大，却被当时的激进民族主义精神所吸引。不久前去世的托马斯·戴维斯是“青年爱尔兰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诗歌“点燃了她心中的爱国主义”。❸这把火很快就蔓延开来。

简是家中四个孩子中的老小，由寡居的母亲抚养成人，她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和文学气质。她为自己与哥特式小说家查尔斯·马图林(Charles Maturin)的关系感到自豪，后者创作了一部怪诞的浮士德式故事《流浪者梅尔莫斯》(Melmoth the Wanderer)，深受歌德、巴尔扎克和年轻浪漫主义者的推崇。马图林娶了她的姨妈，尽管他已于1824年去世，但一直是简充满想象力的生活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她努力为自身的艺术天性寻找更多支持，深信自己名字中的“埃尔吉”源自意大利语“阿尔吉耶蒂”(Algiati)——这种（虚构的）联系使她很高兴与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攀上了亲戚（事实上，“埃尔吉”是达勒姆劳工的后裔）。^⑨ 她的童年是在看书和读诗中度过的。丁尼生和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是她的最爱，“当然，伟大的华兹华斯依然稳坐在他的宝座上。”^⑩ 作为一名出色的语言学家，她不仅熟悉英国作家，而且谙熟欧洲所有的古典和现代文学。然而，正是在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事业中，她找到了一个激发自身创造力的主题，以及自我的崇高使命感。

面对饥荒中的不公正现象和悲剧及其后果，她开始饱含激情地写信、作诗，以响亮的节奏控诉她自身所属的地主阶级——“我们土地的破坏者”。这些信被寄到爱尔兰激进主义的主要周报、“青年爱尔兰运动”的喉舌《民族报》。由于害怕家人生气，她不敢署自己的名字，在信中落款“约翰·范肖·埃利斯”，她的诗歌则署名“斯佩兰萨”，意大利语意为“希望”。《民族报》的编辑加万·达菲对此印象深刻，斯佩兰萨的诗歌借助他的报纸走进了成千上万个贫穷的爱尔兰

家庭。人们围在火堆旁读着，民谣歌者慷慨激昂地朗诵着她的作品：
《穷人的声音》《受灾的土地》《土豆的哀歌》。

她在1847年的诗歌《兄弟》中，纪念了年轻的约翰·希尔斯和亨利·希尔斯，他们因参与1798年被镇压的爱尔兰起义而被绞死。她的诗句想象着他们正号召下一代为“祖国”而战：

哦！他们在劝诫我们，那些静静的、黯淡的身影——

他们在坟墓里，那苍白的嘴唇在殷切地叮咛，

作为上帝的造物去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奋斗，

如果我们只能像奴隶一样活着，还不如不生。

当简的化名不可避免地暴露之后，家人发现了她所做的一切，他们感到极为震惊，但她丝毫不后悔。她的新角色充满了刺激和戏剧性。她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我想要轰轰烈烈地度过一生，”她宣布，“这种正统的循规蹈矩对我来说太过于平淡——啊，我这野性、叛逆、雄心勃勃的天性啊。我希望可以用数个帝国来满足它，尽管圣赫勒拿岛就是尽头。”^①一场爱尔兰起义似乎真的有可能发动起来——至少在都柏林的激进文学圈里是切实可行的。1848年7月，达菲和其他运动领袖遭到监禁，简响应号召加入了武装起义的行列。她在《民族报》上发表匿名文章，强烈呼吁“十万杆在天堂的光芒中闪耀的滑膛枪”。然而，结果是灾难性的。人民因为贫困而疲惫不堪，并没有起来参加战斗。政府暂时中止了人身保护令。蒂珀雷里发生了一

场小规模的反乱（“寡妇麦考马克的白菜地之战”），两名“反乱分子”被击毙。在随后对加万·达菲的审讯中（由艾萨克·巴特为他辩护），简发表的煽动性言论成为控方在案件中的关键依据之一。简鼓足勇气找到副检察长，承认自己是这些文章的作者。这一勇敢之举为她的名声增添了一抹新的光彩：它很快就被编成了神乎其神的故事，她在公开法庭上站起身，打断公诉人的陈述，声音洪亮地宣布：“如果有人犯罪，我就是罪犯。”^①

审讯过程中，艾萨克·巴特给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35岁的律师，虽然最近才成为民族主义者，却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支持者（他为达菲提供了无罪担保）。简将他浪漫地描述为“青年爱尔兰运动中的米拉波(Mirabeau)，他满头乱蓬蓬的黑发，眼睛闪闪发亮，演讲起来抑扬顿挫，滔滔不绝。”^②有传言说他们是相互吸引。几年后，约翰·巴特勒·叶芝在给儿子威廉的信中写道：“当她还是埃尔吉小姐时，巴特太太就发现（简）和她的丈夫在一起，当时的情境不容置疑，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母亲。”^③然而，这桩事情似乎和1848年的起义一样只是昙花一现。

随着“青年爱尔兰运动”失败，简退出政治前线，转而专注于性别政治和文学作品。她成为妇女权利的热心支持者，一名才华横溢的译者。1849年，她翻译出版了威廉·迈因霍尔德(Wilhelm Meinhold)怪异的哥特式浪漫小说《女巫西多妮亚》(Sidonia the Sorceress)的英文版。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她翻译出版了拉马丁的《第一次法国大革命》（1850年）及《流浪者和他的家》（1851年）。这些高尚的

事业并没有夺去她对生活俗事的兴趣：她的一位女作家朋友曾经回忆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简“谈了不少诗歌问题……但谈得更多的是时尚”。^②

简为都柏林的报纸杂志撰写了诸多文章，其中有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发表在《民族报》上）是专门为威廉·王尔德的《博因河与黑水河美景》而写的。尚不清楚这种赞美是开启了一段新的友谊，还是反映了一种现存的友情，但简在1851年11月嫁给了该书的作者。这段婚姻来得正是时候。年初，母亲去世，她在家里形单影只。19世纪中期，未婚女子的生活仍然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亲戚们见她安顿下来，自然松了一口气。

斯佩兰萨曾经开玩笑说：“天才不应该结婚。”她自己和丈夫可能都受到这样的制约。尽管如此，他们都努力让自己适应新的情境。他们都喜欢社交和娱乐，都没有放弃出版文学作品。威廉在分析1851年人口普查结果的同时，出版了《爱尔兰的大众迷信》（“献给斯佩兰萨”）和一本重要的耳外科教科书，该书为建立“耳科学”专业（中耳和乳突疾病的医学分支）贡献了一己之力。简继续翻译大仲马的《冰川之地》，之后是新版的史威登堡的《未来生活》。

不过，做出些许调整当然也是必要的。威廉·王尔德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简向朋友吐露：“他在家的时候性情古怪、紧张、忧郁，外界从来看不见这些——只有我能看见，这经常让我痛苦，虽然我能够振作起来勇敢地抵挡一场真正的灾难，却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不可思议的负能量……我的丈夫在外界看来如此杰出耀眼，却将自己包裹

在.....一块黑布中，他像坟墓一样黯淡、严肃、哀伤、沉默.....但过一会儿，如果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兴奋起来的话，他就会投身到忙忙碌碌的生活中去，好像又充满了活力。他生命的全部就是永不停歇的脑力劳动。” ⑨但他的才华可以为他开脱，并且带来诸多回报。1853年，他被任命为“爱尔兰女王常任眼外科医师”，除了自己事业兴旺之外，他还在维多利亚保险公司兼任收入颇丰的医疗顾问。 ⑩

王尔德夫妇的第一个孩子是儿子，出生于1852年9月26日。虽然大家从一开始就叫他威利(Willie)，但他受洗时被命名为威廉·查尔斯·金斯伯里（威尔斯）·王尔德（查尔斯是简的父亲的名字；金斯伯里是她母亲的娘家姓）。仅仅13个月后，他们的另一个儿子出生了：“小异教徒”奥斯卡，他的一连串名字与哥哥的英格兰式名字形成了相互匹配的爱尔兰式平衡。

简以自嘲式的讽刺和热情接受了身为母亲需要付出的关怀照料。威利出生后不久，她对一位朋友述说：“哦，爱国主义、光荣、自由、征服、奔忙、冲突、战斗和王冠，我青春的精灵们，你们在哪里？难道那时的我比现在更高尚？也许如此，但现在的生活更真实。一个普通的女人，仅此而已。我现在就是这样.....人的一生能经历多少种生活啊！.....有人看见我在育儿室里用小炖锅做饭，就说：‘哎呀！命运多么残酷，看哪，斯佩兰萨在煮粥！’.....好吧，我要把他培养成一个英雄，也许是未来爱尔兰共和国的总统。谁知道呢？

（Chi sa？，意大利语）我还没有完成我的使命。煮粥和育儿室都不能打垮我。” ⑪

奥斯卡年仅1岁时，王尔德一家从韦斯特兰街搬到距离不远的梅里恩广场1号。虽然从表面上看只是过了个拐角，但新住址显然标志着这个家庭在地位和规模上都获得了提升。梅里恩广场建于18世纪60年代，宽敞有序地分布着房屋和巨大的中心花园，是爱尔兰最富有的地主家庭在都柏林的一块时髦领地。但是，1800年《联合法案》(Act of Union)的颁布标志着旧的爱尔兰议会消亡，许多英格兰-爱尔兰贵族更希望在伦敦市内拥有宅第，以便靠近真正的政治权力中心。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梅里恩广场的大房子成了都柏林成功专业人士的领地——就才能与智慧而言，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贵族。威廉的事业越做越大，简的自我价值感愈发清晰，梅里恩广场似乎为王尔德一家徐徐开启的生活大戏提供了最适合的舞台。简激动极了。“我很喜欢这次搬家，”她得意地说，“我们有精美的房间，住在都柏林环境最好的地方。”

梅里恩广场1号理所当然非常醒目。它位于广场西北角，沿着梅里恩街一侧加盖的二层扩建使其显得比其他房子更加宽敞。侧楼包括前门和石头铺成的一层走廊，楼上是光线充足的阳光房，以及王尔德医生看病的诊室。大楼后面有一扇门和楼梯单独通向这个诊室，一层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房间可以供威廉进行手术。屋里的正房确实十分精美——天花板很高，点缀着精致的花饰和大理石壁炉，可以从正面望见广场对面的景色。王尔德家到处陈列着书籍和绘画。宽大的爱尔兰橡木地板上铺着土耳其地毯。一楼书房里摆放着作为装饰的查尔斯·马图林的半身像。六名住家仆人负责打理这个新家，他们的住处在地地下室。育儿室位于房子的顶层。

两个男孩被安置在这里。简希望他们能在宽敞的新环境中茁壮成长，他们做到了。用他们母亲的话说，威利变得“白皙、高挑、精神，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会说话”，而1岁的奥斯卡“生得非常敦实，只顾着一个劲儿地长胖”。^①简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母亲。她对“祖国”的热情和崇高理想，大部分转化为对孩子们的爱和昂扬的愿景。威廉·王尔德虽然既要行医，又要参与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编制收藏目录的大项目，但他仍然积极参与育儿工作。^②1857年4月，简又生下一个孩子，一股全新的兴奋劲令整个家庭活跃起来：这是一个盼望已久的女孩，教名为伊索拉·弗朗西斯卡·艾米莉。她立刻成为家里的宠儿。

有人见过婴儿时期的奥斯卡。他似乎很早就有了自我意识和戏剧化的自我表现。一位访客曾经回忆，这个2岁的小男孩在梅里恩广场的客厅里招待一群客人，他反反复复念着自己好听的名字：“奥斯卡、芬格、欧弗雷泰、王尔德……奥斯卡、芬格、欧弗雷泰、王尔德。”^③奥斯卡当时的一张照片保存了下来，结实、自信，打扮得引人注目——按照当时的风俗，身着蓝丝绒连衣裙。^④然而，他的举止中丝毫没有女孩子气。1857年8月，瑞典年轻作家洛滕·冯·克雷默(Lotten von Kraemer)在她的父亲——乌普萨拉省省长的陪同下做客梅里恩广场，在她眼里，奥斯卡是一只“棕色眼睛的小野猫”。她回忆威廉·王尔德走进屋子，手里牵着“金发”威利，胳膊上抱着“不守规矩的小男孩”奥斯卡。这对小兄弟已经成为这所房子里热闹非凡的生活的一部分。那个星期天，克雷默父女参加了一场非正式晚宴，他

们惊奇地发现孩子们竟然没睡，还在四处走动。他们和父亲吻别道晚安后，又被派去图书室取书。⑨

第二年，在母亲偏爱的眼光里，奥斯卡和威利已经长得“又高又聪明”了。简在同一封信中提到了10个月大的女儿伊索拉，“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将来必定非常聪明——这两件礼物对任何女人来说都足够了”。⑩夸张、浪漫、想象的世界都是梅里恩广场氛围的一部分。文学也是如此。简从一开始就读书给孩子们听，尤其是诗歌。当他们把小脑袋靠在她身上时，她翻开丁尼生的“克莱尔夫人”和朗费罗的《海华沙》。⑪爱伦·坡的《乌鸦》是她最喜爱的作品。⑫她还给儿子们启蒙了丰富的爱尔兰诗歌遗产，从宏伟莫测的“奥西恩”、汤姆·摩尔忧郁的抒情诗，到托马斯·戴维斯、丹尼斯·弗洛伦斯·麦卡锡激动人心的民谣，甚至还有她自己的作品（母亲的诗作中，奥斯卡最喜欢希尔斯兄弟的那首）。⑬正是从母亲的读书声中，奥斯卡开始领悟到文字的乐感和魔力。

家庭生活充满亲情、鼓励和爱抚。洛滕·冯·克雷默注意到威廉·王尔德的眼神落在孩子们身上，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轻轻抚摸着奥斯卡的头发，打发他去玩。⑭简在伦敦旅行时，念念不忘孩子们“临别时的亲吻和温暖的拥抱”。⑮然而，她此行到英国首都的目的是给孩子们找一位训练有素的家庭女教师。随着新助手的到来（一连串人选中的第一个），并且威廉·王尔德的私生子亨利·威尔逊获得了医师资质，王尔德夫妇又能外出旅行了。夫妇俩和克雷默父女的友谊

与日俱增，随后几年里，他们定期前往瑞典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其他地区，把孩子们留在家里由仆人照看。⑨

不过也有全家度假的时候，他们会去都柏林附近的村庄和度假村，或者去西部遥远的康尼马拉欣赏“壮丽的原野风光”，威廉在那里盖了座垂钓小屋——用简的话说——它坐落在“大西洋的边缘”。

⑩ ⑪ 王尔德医生对建筑的热情与日俱增。1861年，他在都柏林附近最受欢迎的海滨度假胜地布雷(Bray)，设计并建造了一排由四栋“非常漂亮”的屋子组成的房产，其中三栋出租，一栋供家人使用。⑫

有一个假期，在格伦克里山脚下美丽的恩尼斯凯里村(Enniskerry)（可能是1860年或1861年，布雷的房屋完工前），简和出身圣母无玷献主会且掌管着附近新成立的圣凯文感化院的劳伦斯·普里多·福克斯神父成了朋友。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妙趣横生的人，对文学和艺术都很感兴趣：他认识查尔斯·狄更斯和红衣主教纽曼，并以“在室内装潢方面的才能”而享有盛誉——他在自己所属的都柏林郊区因齐科尔(Inchicore)的献主会创立了著名的“圣婴摇篮”。⑬ 在格伦克里度假时，他和斯佩兰萨在谈话间“享受了许多愉快的时光”。

宗教在她的思想中占很大比重。她当时正在翻译备受争议的德国浪漫小说《尔等即如神》(Eritis Sicut Deus)。该书——1854年匿名初版——通过罗伯特和他美丽的妻子伊丽莎白的故事，戏剧性地描写了信仰危机以及德意志哲学对此的反应。前者背弃了上帝，转而信奉自创的美学艺术信条——崇拜感官享受，结果陷入绝望；后者短暂地

追随他走上这条道路，但是当临近疯狂边缘时，她恢复了信仰——随之唤回了理智和幸福。❶虽然简本人（正如她儿子后来所描述的）“对我们称为圣灵的上帝抱有非常坚定的信仰”，但她无法忍受所有的宗教教条，尤其是“任何阻挡在她和上帝之间的牧师和圣礼”。❷不过，她对天主教崇拜的诸多方面持有一种审美情趣。她在1850年为《都柏林大学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赞扬了当代爱尔兰天主教会艺术的大力支持，指出“只有天主教才理解艺术是宗教最高贵的语言之一这条真理”。❸

在格伦克里度假期间，她带着孩子们去感化院旁边的一座哥特式小教堂参加礼拜。教堂里有个圣坛，访客在那里不会接触到被收容者。福克斯神父回忆，没过多久，她就请他负责教导奥斯卡和他的哥哥：“数周之后，我为这两个孩子施行了洗礼，王尔德夫人自己也在场。”神父随后拜访了威廉·王尔德，向他通报事情的经过。医生“强烈反对将感化院”作为一种手段，来处理大饥荒之后犯下轻罪的众多男孩。他与福克斯神父从未相处得特别融洽，但当时他仅仅表示，自己不在乎儿子“将来变成什么样，只要他们和母亲一样优秀就行”。

❹奥斯卡仍然记得第二次受洗，但这与他童年时期接触到的天主教教育无关。❺

相比之下，其他精神力量给他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他清楚地记得，一天夜里被一阵刺耳的尖叫声惊醒。他以为那是一只受伤的狗。然而，第二天传来一个亲戚去世的消息。有人告诉他，前一天晚上的哭声一定是报丧女妖的声音。❻爱尔兰传说一直是这个家庭共有的想

象世界的一部分。1862年，威廉·王尔德在遥远的西部梅奥郡康镇(Cong)附近的科里布湖(Lough Corrib)岸边买下170英亩土地，这个想象世界因而变得更加真实。这块土地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曾经属于他母亲的菲恩家族，而且——他相信——也是传说中莫伊图拉之战(Magh-Tura)的发生地，爱尔兰两个古老的凯尔特族群——丹南人和菲尔堡人曾在这里争夺霸权。他着手在此地建造一座漂亮的住宅，取名为“莫伊图拉”。这座两层建筑四周“风景如画”，俯瞰科里布湖，山墙雪白陡峭，它将成为王尔德一家的第二居所。它配备数间宽敞的娱乐室，一个带日晷的玫瑰园，还有一处四周带墙、种满果树的菜园。⑩

奥斯卡和哥哥在一起玩耍的日子里建立了一种快乐的“男孩间的友谊”——这种关系因为奥斯卡脾气随和而显得轻轻松松，波澜不惊。⑪一次，他甚至把最喜欢的泰迪熊送给威利：“之后每当我生他的气时，”他后来解释说，“我总是威胁他说，‘把熊还给我，威利。’”这句话直到童年结束之后，一直是两兄弟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⑫尽管奥斯卡愿意去适应别人，但他的个性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一次在康尼马拉度假时，他离家出走躲进一个山洞里。⑬还有一次，在梅里恩广场，晚上他和威利在育儿室的壁炉前洗澡，他们的小睡衣挂在壁炉围栏上烘烤着。保姆暂时离开房间时，两个孩子注意到一件衬衫上出现了一个棕色斑点。它慢慢地颜色越来越深，之后突然燃烧起来。威利大声呼喊保姆救命，奥斯卡却兴奋地拍起手来。保姆冲进屋里，从围栏上扯下着火的衣服扔进火堆，奥斯卡“眼看这么好看的

场面被毁，没了乐趣，大发脾气哭起来”。他后来说，这表明了他和威利之间的某些差别。⑩

奥斯卡和哥哥开始在家里接受教育。接二连三的家庭女教师——通常是外国人——至少教给了他们法语和德语。⑪梅里恩广场的住所里经常充满了有趣的人和有趣的谈话；而且——正如克雷默父女所见——王尔德家的孩子们很少被排除在外。

王尔德家的社交聚会因为男女主人的活力和魅力而光彩照人，洋溢着知性的欢乐和智慧。简描述称，星期六固定的晚餐宴会是为“十到十二个聪明人”举办的：他们6点半吃饭，11点散伙。⑫有时，餐后会有诗歌朗诵或音乐演奏。这些人中不仅有“爱尔兰的天才”（都柏林首屈一指的文学、科学和古文物收藏人士），还包括“欧洲和美国的名人”。⑬奥斯卡童年“最初的英雄”是“高大而威严的”史密斯·奥布莱恩——曾经的“青年爱尔兰运动”领袖，他结束塔斯马尼亚岛的流亡生活，返回都柏林之后，成了王尔德家的常客。⑭1861年夏天，都柏林召开各国协会年度会议期间，王尔德家对瑞典代表团敞开大门，举办了一系列非正式宴会，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代表可以“愉快、自由、轻松”地聚会聊天。⑮

对于许多国外到访者来说，在梅里恩广场的谈话是一种启示。洛滕·冯·克雷默回忆，她在宴会上第一次坐在王尔德医生旁边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英式‘席间闲谈’。他那轻松幽默的待客方式很能够打动人”。⑯“英式”这个形容词可能选用得并不恰当。梅里恩广场的那些轻松和幽默明显是爱尔兰式的。即便在场的都是科学家，其对

客观事实的交流也要让位于消遣。威廉·王尔德的好朋友及导师威廉·斯托克斯博士（他住在梅里恩广场5号）曾说：“交谈的黄金法则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准确的。”^① 尽管许多事物都只是假定不准确而已。他们的谈话内容涵盖“当今所有的热门话题、文学和科学”。^② 他们采纳、赏玩、抛弃各种想法。没有什么神圣的：在王尔德家的餐桌上，“每一项信条”都是“既可以得到捍卫，也可以遭遇推翻”。奥斯卡从孩提时代就听说了这一切。他开始思考，“他童年所受的最好的教育，是从与父母及他们杰出的朋友的交往中获得的”。^③

如果说奥斯卡意识到了父母的才华，那么他也同样感知到了他们日益上升的社会声望。他的父亲买下莫伊图拉的地产之后，成了地主。1864年初，威廉·王尔德获得爵士头衔，地位进一步提升。从嘉奖令可以看出，此举与其说是考虑到他在欧洲的医学声誉，不如说是为了表彰他在“与爱尔兰人口普查相关的统计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如果说王尔德医生很高兴能成为“威廉爵士”，那么他的妻子更是因为摇身一变成为“王尔德夫人”而雀跃。她毫不费力地调整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情绪，适应了因获得王室认可而带来的荣耀。然而，奥斯卡却隔了一段时间才感受到这份喜悦。他当时正离家在外。

2 风华正茂的奖学金得主

我从快乐中获得知识。

——奥斯卡·王尔德

1864年1月末，奥斯卡和哥哥被送去上学，6岁的伊索拉留在这里。^①他们由此走出育儿室，逃脱了家庭教师的管制。波托拉皇家学校(Portora Royal School)位于都柏林以北100英里弗马纳郡的恩尼斯基林，它历史悠久，1608年由詹姆斯一世建立，旨在为当地新近迁入的苏格兰长老会信徒提供教育。19世纪，这所学校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公共机构。在威廉·斯蒂尔牧师开明的管理下（始于1857年），它成了一所规模虽小但欣欣向荣的——在学术上享有声望——“公学”(public school)。恩尼斯基林位于不断扩张的爱尔兰铁路网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便利。寄宿学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多为殖民地官员、爱尔兰上流人士、知名神职人员和专业人士的孩子。

①

王尔德夫妇在波托拉皇家学校有熟人（他们的朋友威廉·韦科曼在该校任教，他曾经为威廉爵士有关博因河的书画过插图），但就学术和社会声望而言——有人称之为“爱尔兰的伊顿公学”——学校本身就非常值得推荐。学校位于城外小山上一座漂亮的乔治王时代风格的建筑里，下厄恩湖的美景尽收眼底。王尔德兄弟入学时，学校有175名学生：112名寄宿生和63名走读生。男孩们的年龄从10岁（根据招生简章）到17岁不等，被分成初级部和高级部。^②

校长斯蒂尔博士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智力出众、思想开明、为人坦率，而且举止高贵（他鼓励天主教徒入学该校，但来的人很少）。1864年，时年44岁的他依然保持着“轻盈而充满活力的体格”，走路步伐轻快，一双眼睛“闪烁着活力和智慧的光芒”。^①他是学校生活的核心。他主持晨祷和点名，^②“几乎总是出现在孩子们的用餐时刻，那是他自己定下的规矩”。^③他想方设法——据奥斯卡的同辈人记录——在“与孩子们的频繁接触中，通过许多不知不觉的方式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表露兴趣并予以警觉”，践行了一种介于距离感和亲密感之间的“中庸之道”。^④当他四处巡视时，通常人尚未到，就先“伸出胳膊，用力摇晃手上的一大串钥匙”，以便所有人都能及时获知他马上要到了。^⑤他“像对待绅士一样”和孩子们（实际上还有老师们）打交道——并希望他们也能这样做。总的来说，他们做到了。^⑥

斯蒂尔认为古典文学和数学可以为年轻人的教育提供最坚实的基础。其他科目当然也应该教——英语、法语、历史和地理——但相比之下，它们在课程中没那么重要。他认为，要学好法语，真的有必要“去法国”，而“男孩在上学的年龄，还没有能力接受历史或地理方面的哲学知识”。^⑦斯蒂尔本人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对经典怀有满腔挚爱。为了让孩子们“在基础知识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他主要给初级部讲授拉丁语和希腊语。^⑧他坚信考试和奖励的好处——设立了一个广受欢迎的年度仲夏授奖暨体育日，庆贺每年上半学期结束。每学年有两个学期，第一个学期从1月底至6月中旬，第二个学期从8月下旬至12月底。^⑨

然而，斯蒂尔注入学校的不仅是活力和想象力，他还自己花钱改善学校的环境。学校需要为越来越多的寄宿生提供住所，他对校董事会的官僚作风感到不耐烦，于是他便充分利用原来的房子及其独立的侧翼（建起所谓的“石厅”和“教师大厅”）。他建了一间治疗室，并对学校的管道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1864年，他萌生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新计划：建一个宽敞的大厅容纳整个初级部，并下设三个专用教室。①

斯蒂尔十分喜爱学校美丽的风景，悉心致力于“美化环境”。②下厄恩湖从恩尼斯基林绵延至贝利克大约25英里的大片水域，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为娱乐和运动、游泳和划船提供了一处主要场所。男孩们可以乘船去岛上探险。划船比赛成为学校运动日的一项特色。斯蒂尔采纳了全新的后阿诺德时代公学理念，学校还组织其他比赛——足球、田径、网球、板球（在一块新建的板球场上）。

这种风气，无论它有什么普遍的好处，都不是新生奥斯卡·王尔德立即就能发现的。他那年9岁，比指定的入学年龄几乎整整小一岁。他那脆弱敏感、富于想象、不受约束、酷爱幻想的性格不适合杂乱打闹的寄宿学校生活：于是他渐渐地走向了边缘化。他没有什么知心朋友。他对游戏——学童生存的最大动力——毫无兴趣（称“我从来都不喜欢踢人或被人踢”）。③起初，学习也没法使他精神起来。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数学一窍不通。④

相比之下，威利在学校如鱼得水。他善于学习，喜欢游戏，擅长交际，活泼好动，心地善良，立刻在同学和老师当中树立了地位和声

誉。第一个学期结束时，他获得了一个初级部的学校奖项——那一年，两名学生在湖上的划船事故中不幸溺水身亡，校方随即取消了颁奖日。这是奥斯卡和威利上学期间遭遇的一系列令人痛苦的戏剧性事件中的第一个。

圣诞假期前的最后几周，第二个打击接踵而来：耸人听闻的玛丽·特拉弗斯案。兄弟俩即使在波托拉学校，也能感受到案件的反响。都柏林的报纸在恩尼斯基林随处可见，该镇的三份地方报纸也刊登了法庭审理过程的全部细节以及许多毁谤性评论。❶这个案例为学生和教职工提供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讨论话题。然而，由于王尔德家的男孩年龄较小（奥斯卡只有10岁，威利还不到12岁），再加上圣诞节假期即将来临，使得他们躲过了周围人的许多色情玩笑。

那个圣诞节，他们在家得到了父母的支持——那是一桩“令人不快”的事件，好在它现在已经过去了。王尔德夫人写信给她的瑞典朋友罗莎莉·乌利韦克罗纳：

这桩事件的简单解决方案是——特拉弗斯小姐是半个疯子——她的家人也都疯了……这件事很烦人，但当然没有人相信她的故事——都柏林所有的人现在都在向我们表示同情，这里和伦敦的所有医学界人士都写信表示，他们完全不相信这一事实上根本不可能的指控。威廉爵士不会因此受到伤害，而最好的证明就是他的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忙碌。我们更担心的是我们亲爱的外国朋友，他们只能通过对爱尔兰事物抱有偏见的英国报纸获知消息——但令人高兴的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蓄意伤害我们的敌人明显被击败了。❷

这些新闻——既有大众报纸，也有医学刊物——在痛惜整个“令人伤感的事件”的同时，确实提供了广泛的支持。❶他们谴责“恶魔般的”特拉弗斯小姐做出如此“可耻、不守妇道、粗俗、不体面”的行为，同时向威廉爵士的职业声望和他妻子受损的尊严致敬。公众的极少数异议（以都柏林医学出版社的眼科医生阿瑟·雅各布为首）可以归咎为职业竞争。❷个人的反应则多种多样，并不是所有的都柏林人都站在王尔德夫妇一边。有很多人因为这对惹眼的夫妇落难而感到大快人心。枪打出头鸟，对于没有同情心的旁观者而言，这起案件证实了“威廉·王尔德爵士是个像猿猴一样的人，好色淫荡、懦弱胆小（害怕出庭作证），而且他的妻子是个夸张傲慢、自命不凡的人，她的骄傲就像她二流诗人的名声一样放肆”。❸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场灾难只是提供了一个幽默和玩笑的机会。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学生对此案的细节津津乐道；一首流传于大学生中间的小调开头唱道：

广场上住着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

他的才华世上罕见，他的医术最是最高明，

如果你要是愿意，我就说来给你听，

他是怎样让特拉弗斯小姐睁开了那双大眼睛。❹

但是，任何尴尬的情绪都要直面。都柏林的社会规模还不够大，不可能逃之夭夭（王尔德一家继续与艾萨克·巴特交往，似乎是出于友谊，抑或至少是出于礼貌）。❺这个家庭仍然有许多朋友和崇拜者。大家都非常同情斯佩兰萨。❻至于威廉爵士——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

——他的社交圈里有许多人不愿意为这种小过失而责备他。都柏林保留着18世纪那种宽容的氛围，人们不愿意进行道德谴责。幸好威廉爵士的事业仍然兴旺发达，因为他还要面对棘手的法律成本。

对于整个家庭来说，这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但奥斯卡和威利1865年初重返学校时至少是踏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仍然可以安心地享受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特权。❶波托拉学校分散了他们对家庭事务的注意力。男孩们以不同的方式享受学校生活。威利热心参与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弟弟似乎正好可以因此置身事外。奥斯卡对课程不感兴趣，躲进了自己的书本和想法中。据说他“比任何一个孩子都能更快地投入书本中”。❷文学给了他一个可以支配的领域：他回忆道，从童年早期起，“我总是让自己与我读到的每一个杰出人物产生共鸣”。❸无论如何，奥斯卡的聪明才智还是被人发现了。1866年夏天，他获得了初级部的古典文学奖（威利和前两年一样，也获得了这个奖项——这次，他获得了罗宾逊先生的特别“古典文学奖”和一个绘画奖）。

离开学校后，他们漫长的暑假主要在莫伊图拉度过。一家人远离了都柏林的生活——以及都柏林的流言蜚语。那座宅子成了威廉爵士最喜欢的地方。正是在那里，奥斯卡在父亲的教导下，不仅学会了做一个爱尔兰人，而且学会了做一个乡下人和凯尔特人。❹他被爱尔兰西部光秃秃的山丘和变幻莫测的天空散发出来的“狂野壮丽之美”所感染。“大自然的强大力量”规模如此之大，令他深受感动。❺他们在科里布湖上划船。奥斯卡学会了捕捉“忧郁的大鲤鱼”，这种鱼只

有听了盖尔人的歌曲才能被魔法引诱出来，否则绝不会离开湖底。奥斯卡——尽管在古爱尔兰语方面貌似没有多大进步——却一直对其中一首歌记忆犹新，歌曲开头忧伤地唱道：“Athá mé in mu codladh, agus ná dúishe mé”（我睡着了，不要叫醒我）。^①他学会了射击。他结识了附近一些拥有土地的家庭，以及和他同龄的孩子：罗斯家族的马丁夫妇和摩尔庄园的摩尔夫妇。奥斯卡和威利十几岁的时候，有时会划船到卡拉湖的摩尔庄园去玩一天。老摩尔先生非常喜欢他们，相比之下，他把自己的四个儿子称作“笨蛋”。^②

奥斯卡探索了当地古老的凯尔特遗迹，他不断发展的想象力也被激发出来。他和威利帮助父亲为写一本有关该地区历史和文物的书准备资料——对考古遗址进行“拓片和测量”——还听很久以前的神话故事。^③威廉爵士“对历史的热爱”使其具有独特的天赋，这一天赋“能把一块石头变成一段炽热浪漫的文字”。他带着奥斯卡和威利漫步乡间，流连于一些“古董器物，脑海里展现出往日的图景及其逝去的荣耀，心中充满实实在在的喜悦”。^④环顾四周，古代英雄曾在那里挥洒豪情，达纳神族(Dananns)国王努阿达(Nuada)率领胜利之师战胜了菲尔博格人(Firbolgs)。小小的奥斯卡欣然接纳了这个世界——既有历史意义，也有民族学意义——将其作为自己身份的一部分。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把自己视为“大胆、可敬、英勇”并且“智力超群”的达纳神族凯尔特人的后代。这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因为威廉·王尔德相信这些凯尔特人和古希腊人属于同一血统，共同拥有许多高尚的品质（他周围的许多古文物研究者也持有同样观点）。王尔德夫人乐于设想，凯尔特人和希腊人一样热爱“荣耀、美丽和不同凡

响”，他们像希腊人一样厌恶“辛苦劳作”，鄙视“商贾贸易”：因为这两个民族都“把最高的荣誉献给了学问和诗歌”。^①

莫伊图拉还有许多爱尔兰中世纪遗迹，它们同样激发出独特的想象力。1866年夏天，奥斯卡和父亲在马斯克湖附近的伊尼什曼附近发现一座奇怪的石砌废墟。威廉爵士认定，这曾是附近修道院的“宗教裁判所”。他在书中附了一张图片——由韦克曼爵士绘画——并附上了一段令人满意的说明，指出该建筑是“作者和他的儿子奥斯卡”发现的。^②

然而，不管历史有多么让人兴奋，现实的忧虑总是处于随时爆发的状态：1866年，斯蒂尔博士的大儿子弗雷德里克不幸溺水而亡，成为又一名冰冷的厄恩湖受害者。他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古典学者，刚刚从波托拉获得了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奖学金。他的去世给学校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对奥斯卡来说，这桩事情很快就被另一个更大的悲剧取代了。1867年2月23日，他的妹妹伊索拉突然去世。她之前曾有一阵子发烧，被送到都柏林以西约65英里的厄齐沃斯镇进行医治，她的姑父威廉·诺布尔牧师（他娶了威廉爵士的妹妹）在那里担任教区牧师。然而，她的病情恶化了，紧接着因“突发脑部积液”去世。她只有9岁。

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伊索拉是个不同寻常的小女孩。厄齐沃斯镇的教区医生说，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有天赋、最可爱的孩子”。

^③她的逝去让威廉爵士“悲痛欲绝”。她曾经是他的偶像。^④“伊索拉是我们家光芒四射的天使，”王尔德夫人对洛滕·冯·克雷默悲叹

道，“她那么聪明、健康、充满欢乐。我们做梦也想不到，死亡这个词会用在她身上。”^⑨她在短暂的一生中，成为众多家庭成员的快乐轴心。然而，活力被摧毁了。

12岁的奥斯卡和他的妹妹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特殊的纽带。^⑩也许和平淡乏味的威利相比，他们俩更合得来。他说她是“阳光的化身”，一个“奇妙的人儿，如此快乐，意气风发”。当然，她的离去让他“伤心极了”。他被带到厄齐沃斯镇（也许是参加葬礼），“频繁地定期探访”公墓里伊索拉的墓地，以此发泄孤独的悲伤。他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绺“我的伊索拉的头发”，信封上装饰着象征着爱、希望和救赎的精致形象：相连的首字母、闪闪发光的十字架、印有字母的卷轴、月桂花环和一顶宝石王冠。绘画艺术并不是他努力表达情感的唯一方式。他还从诗歌中找到了慰藉，创作了几首“动人的，尽管有些孩子气的，带着诗意的作品”。奥斯卡第一次显露出“缪斯女神忠实信徒”的气质。^⑪

奥斯卡强烈的真情打动了厄齐沃斯镇的医生。这个男孩的聪明才智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称，在“与他叔叔的谈话中，把奥斯卡和他的哥哥威利做了番比较，威利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我们认为‘奥西’（Ossie，奥斯卡昵称）在思想深度上更胜一筹”。这一观察相当敏锐，因为威利一直在传统的学校生活中处于优势。1867年的颁奖日上，他再次获得一系列奖项，而奥斯卡只得到一个“高度赞扬”（highly commended）。^⑫斯蒂尔博士经常拿威利作为他弟弟的榜样。^⑬然而，奥斯卡对自己的心智发展越来越有信心。

他的母亲也总是追求卓越，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这种特殊力量。据记载，当一位朋友问起她的两个儿子时，她说：“哦，威利一切顺利，至于奥斯卡，他将会成为一个卓越的人。” ⑩

1867年暑假，她带着两个孩子去法国待了三个星期（威廉爵士留在莫伊图拉），有机会近距离地对他们进行评估。大家得以从生活的哀伤中解脱出来。对奥斯卡来说，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对新国家和新文化的认识过程。他后来说，从第一次相遇起，他就“强烈地喜欢上了法国人的性格”——他愿意相信，这种性格“与爱尔兰民族特有的性格存在某种亲缘关系”。 ⑪他们一行参观了巴黎——这个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城市。当时战神广场上临时搭建的巨大“宫殿”里正在举行万国博览会，四周环绕着游乐场和花园。在科学发明、机械创新和文化多样性的展示中，有瑞典村舍、二胡演奏者、施坦威钢琴推广活动，以及一场启发性的日本艺术展览。回家后，一家人对这段经历感到眼前一亮，他们明显感觉到，和光彩照人的巴黎相比，都柏林可能只是一个“地方小镇”。 ⑫

几乎从他们回国的那一刻起，奥斯卡的进步节奏就加快了。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次访问对他的法语产生了有益影响，但他对拉丁语和希腊语基础知识掌握得非常扎实。这一点在初级部学习阶段结束时得到了证实，他在1868年的颁奖日那天拿到了三个古典文学奖项。 ⑬他还获得了绘画奖。

奥斯卡13岁进入高级部，看上去非常小。在一名同学眼里——与奥斯卡同时入学——“他当时天性极其孩子气，以后的几年里一直如

此，非常好动，一走出教室就不得安宁。”然而，关于少年奥斯卡的一切都暗示，他的自我意识、时尚感和幽默感正在不断增强。1868年9月5日，从他写给母亲的那封绘有插图的信中（这是他留存下来的第一封信，也是他学生时代的唯一信件）——在男孩子关注的种种事情以及古怪的标点符号之下——所有这三种品质都清晰可辨：

亲爱的妈妈，

今天收到了大篮子(hamper)，我从来没有这么惊喜过，太感谢了，它简直出人意料。葡萄和梨都很好吃，而且很凉，但是我猜想因为一路摇晃，牛奶冻有点酸了，不过剩下的都没事。

别忘了给我寄《国家评论》，它今天没出版吗？

你送来的篮子里的两件法兰绒衬衫都是威利的，我的衬衫一件是深红的(scarlet)，另一件是淡紫色的(lilac)，但现在还用不着穿它们，天气太热了。

上星期四我们去看了可怕的(horrid)赛船会。非常开心(jolly)。那里面有帆船比赛。

你一直都没跟我提起格拉斯哥的出版商。他是怎么说的，你有没有用绿色的信笺纸给沃伦姨妈写信？

几天前，我们和驻扎在恩尼斯基林的第27团的军官们打了一场比赛，赢了他们70分。

你想象一下，今天早上当我收到爸爸的信，说他送来一个篮子时，我有多高兴。

现在，亲爱的妈妈，我必须跟你说再见了，因为邮差马上就要走了。

非常感谢你让我画画。捎去对爸爸的爱。

永远爱你的儿子
奥斯卡·王尔德

他将自己的“深红色”和淡紫色衬衫进行区别对待，透露出一股花花公子的着装品位；他关切自己能否获准继续学习绘画，表现出对艺术的兴趣。“可怕的”赛船会和“非常开心”二者明显自相矛盾；至于“沃伦姨妈”（她母亲极端保守的姐姐艾米莉·托马恩，嫁给了一名英国军官）可能收到一封写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绿色信笺纸上的信，那可是一个颠覆性的恶作剧；在他这样“无法无天的男孩子”看来，那是一出好玩的闹剧。

奥斯卡与他“亲爱的妈妈”志趣相投，既表现在文学方面，也表现在爱国方面。他希望收到的《国家评论》是一本都柏林的新杂志，上一期杂志上刊登了她的诗歌《给爱尔兰》；这首诗将作为她新诗集的“献词”，由格拉斯哥的出版商卡梅隆和弗格森出版。^⑩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接受了母亲对世界的整体看法：大气、奢华、乐观、充满可能性。他接受（并始终保留着）她对自己的看法，认为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她对奥斯卡的看法则是“卓越的人”。

①他在学校给她写的所有信件，似乎都反映出这种共同理解。当然，王尔德夫人很喜欢这些信件所预示的前途——她回忆起它们时，称其为“美妙的，而且往往是真正的文学”。②然而，那不过是一种私人呈现。

威利一直是公众人物。他比奥斯卡高两个年级，已经形成了“几分性格”——“聪明、古怪、充满活力”③。他沉浸在学校生活中。他虽然在各种比赛中表现平平，但对足球和板球了如指掌。④他也许算不上是个系统的学习者，但他仍是个优秀的学习者。他受到老师们的赞许和同学们的喜爱。他很注意要“友善对待年纪小的孩子”。他弹钢琴的时候感情真挚——而且相当准确，他会用即兴独奏取悦低年级的孩子。他是个讲故事的好手。他身上有一种令人愉快的、福斯塔夫式的荒谬气质：他爱吹牛，容易因此而被人取笑。⑤他绰号“蓝血人” (Blue Blood) ⑥，和奥斯卡一样继承了父亲的黝黑和毛孔粗大；正因为如此，他像父亲一样经常被认为看起来很“脏”。有一次，他为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看上去脏兮兮的，那是因为——作为一名欧弗雷泰家族成员，也就是康诺特国王的后裔——他的血液是蓝色的，而不是红色的。⑦

兄弟俩保持着友善的距离。学校生活并没有让他们走到一起。威利“总是……像对待弟弟一样”和奥斯卡打交道。⑧但是，奥斯卡——私下里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拒绝受人保护。⑨尽管校长可能经常把威利作为奥斯卡的榜样，但他不为所动，只是笑笑。他曾

回忆道：“我从未有一刻认为（威利）在智力上与我有任何平等之处……在我看来，他总是‘戴着王冠’。” ①

奥斯卡开始培养一种优雅的与众不同之处。他说：“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一切都与众不同。” ② 他的样子——显然是邋里邋遢的——明显时髦起来。 ③ 他“比其他任何孩子都更在意自己的着装”。 ④ 淡紫色衬衫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他整个星期都戴着星期天戴的帽子。 ⑤ 他的头发——“又长，又直，颜色金黄”，从前额向后梳——显示出铁了心要不同凡响。 ⑥ 事实上在同龄人的记忆中，相比任何其他，头发长度才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他离校大约30年后，恩尼斯基林的人们仍然在说“他长着一头秀发”。 ⑦ 不过，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为这种精心策划的个人特点提供了发展空间。他不再使用传统的教科书，而是喜欢上了“精装版的经典著作”。 ⑧ 他努力练字，希望写出一部“清晰、优美、独一无二”的手稿。 ⑨

奥斯卡的大部分时间——如果不是在胡思乱想的话——仍以读书为乐。用他的话说，自己如饥似渴地读了“太多的英文小说，太多的诗歌”。 ⑩ 他以惊人的速度阅读，练就了一种罕见的吸收（和保留）信息的能力，近乎一目十行。

他阅读英国古典文学，走进了沃尔特·司各特、简·奥斯汀、萨克雷和史蒂文森的世界。 ⑪ 他读了狄更斯和迪斯雷利的作品。狄更斯是当时伟大而多愁善感的喜剧道德家，迪斯雷利则是不太受人尊重的“银叉文学” ⑫ 写手和政治花花公子。而且，为了与他在所有事情上“一鸣惊人”的愿望保持一致，奥斯卡宣称自己更偏爱后者。 ⑬ 和其他许

多事情一样，他在这件标新立异的事情上也得到了母亲的鼓励。她借给他迪斯雷利的书，和他分享书中的“警句式风格”和贵族背景给人带来的愉悦。① 奥斯卡沉迷于威廉·迈因霍尔德的哥特式浪漫故事，读他母亲翻译的《女巫西多妮亚》，以及达夫·戈登女士翻译的《琥珀女巫》。② 他热爱“浪漫之王”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崇拜“姨父”马图林惊人的怪诞之作《流浪者梅尔莫斯》。③

他通过阅读莎士比亚和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以及他母亲最喜爱的丁尼生和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作品，养成了对诗歌的热爱。毕业后不久，他在《纪念巴雷特·勃朗宁及其诗歌〈奥罗拉·利〉》一文中郑重宣布《哈姆雷特》是“我们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④ 也许是受母亲的影响，他过早地对沃尔特·惠特曼激情澎湃的自由诗产生了兴趣。

⑤

尽管奥斯卡在别人眼里“举止有些矜持、冷漠”，既不爱交际，也不受欢迎，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并没有令他与同时代的人隔绝开来。⑥ 他也许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朋友”，但他受人喜欢，有时还令人钦佩。⑦ 对那些最了解他的人来说，他“慷慨、善良，（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脾气很好”。⑧ 他虽然是个蹩脚的桨手，但偶尔也会到厄恩湖去玩玩。⑨ 有时他会被引诱加入同学们的玩乐游戏，甚至骑在高年级同学背上玩“骑马冲锋”游戏时折断了胳膊。⑩ 这次事件即他所谓的“第一次了解对痛苦的恐惧，以及生活中潜在的悲剧”。他讨厌这样。他一直坚持认为，身体上的痛苦“比精神上的痛苦还要糟糕一千倍”。⑪

在奥斯卡的学生时代，性似乎没有什么存在感。他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后来他提到“16岁是性开始的年龄”。“当然，”他解释说，“我和其他男孩子一样，是感性的、好奇的，有着男孩子通常的胡思乱想；但我并没有过分沉溺其中。”^①与英国许多规模较大的公学相比，在波托拉，学生之间对有关性方面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男孩子们十之八九脑子里只有足球、板球或划船。几乎每个人都参加体育运动——跑步、跳跃，等等；似乎没有人关心性。我们都是健康年轻的野蛮人，仅此而已。”^②奥斯卡后来曾经回忆起一个初级部男孩——“比我小两岁”——感人的忠诚，那个孩子显然对他怀有一种小學生的迷恋，而奥斯卡——沉浸在自己令人兴奋的想法和计划中——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奥斯卡很喜欢这个男孩的陪伴，因为对方是个听众：“我的朋友，”他解释道，“具有倾听的天赋。”^③对奥斯卡而言，听众变得越来越重要。

奥斯卡在学校不断成长，他即便算不得是班上的小丑，也是个多才多艺的表演者。1869年秋，威利去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之后，他有了更大的活动余地。冬日的下午，孩子们聚集在“石厅”的火炉旁，奥斯卡“状态极好”。他会表演“教堂彩色玻璃的样子”逗其他孩子开心——模仿圣徒和其他“圣人”将四肢扭曲成“不可思议的姿势”（显然，这也是他父亲的一个聚会把戏）。^④他的快速阅读也是一种娱乐手段。大家通常“打赌”，他能够“在半小时内读完一部三卷本小说，可以准确地描述故事情节的梗概”；如果给他整整一个多小时的话，他还能描述次要的情景和直接相关的对话。^⑤

但最重要的是，他说得——很流利，很好笑，很有趣，相当好。

①他在“石厅”给大家带去快乐。他逗乐了朋友们，转移了老师们的注意力。他的“描述能力”“远远超过平均水平”，但他真正的天赋是喜剧。他有一种夸张的手法，可以把最平凡的事情转化成幽默的浪漫场面。②他当时的一名同学曾经津津乐道地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他和奥斯卡及另外两个男孩，在恩尼斯基林和一个街头演说家开玩笑，用棍子弄掉了演讲者的帽子。这个玩笑引发了人们的些许不满，孩子们不得不撒腿往山上的波托拉学校跑去。奥斯卡在匆忙逃跑时撞倒了一个上了年纪的瘸子。然而，在他的生动——并且严肃而幽默的——描述中，上了年纪的瘸子变成了“一个愤怒的巨人”挡住道路，奥斯卡不得不“一个又一个回合地与他作战，最终在他的勇力之下，巨人被打死了”。③

除此之外，他还养成了对深奥事物的兴趣，以及对奢侈品的嗜好。1869年的报纸上充斥着有关异端人士W.J.E.班尼特牧师的诉讼案，波托拉学校的孩子们也在热烈讨论这桩案件。奥斯卡迷上了“充满神秘色彩的拱门法院”——位于伦敦圣玛丽勒波的古教会法庭，即案件的审讯地点。班尼特精通英国国教仪礼，他在一本册子中宣称，基督真实而完美的身体在圣餐礼中不但存在而且可见，因此触怒了新教神学。奥斯卡兴致勃勃地关注案件诉讼过程。特拉弗斯一案的影响并没有让他放弃法律。他向聚集在“石厅”火炉旁的同学们宣布：“成为这类案件的主犯，作为‘女王诉王尔德’案件的被告名扬后世，没有什么比这种事情更让他感到开心了！”④

奥斯卡“辛辣的机智”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他喜欢颠覆权威，取笑他最不喜欢的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从来没有说过数学或科学老师一句好话”，瞧不起步兵部队教官和军事训练官^①——尽管他一直承认，“他那些针对他们的话语中，没有丝毫憎恨或恶意”。^②只有一次，奥斯卡做得太过分，他对校长“非常大胆无礼”，双方“吵得不可开交”。^③

他还有“给人起绰号的神奇天赋”。但是，尽管这些绰号“让受害者摆脱不掉……它们并不会招来怨恨，因为它们总是让人快乐，丝毫没有恶意”。^④这显然是一种令人钦佩的本事。他自己的绰号叫“灰乌鸦”(Grey-crow)——至今不清楚它的来历和相关性。它显然在某种意义上与厄恩湖上的一个小岛有关，或许还与一位同学的评论有关，他记得奥斯卡——在16岁生日之后突然变得“比同龄人更高”，身形更大——“笨拙地四处走动”。^⑤然而，他对这个称呼相当反感，别人只有在打算激怒他的时候才会用这个绰号。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叫他“奥斯卡”——这也是奥斯卡与众不同的地方，同龄人之间过去习惯用姓氏称呼对方。^⑥1870年他因希腊文圣经课程赢得久负盛名的卡彭特奖(Carpenter Prize)，校长宣读他的全名“奥斯卡·芬格·欧弗雷泰·威尔斯·王尔德”后，这个名字招来了“男学生们的取笑”。^⑦然而，为了这个光荣的奖项，哪怕被取笑也是值得的。

从学业角度看，奥斯卡进入高年级是一个很大的飞跃。按照惯例，那年有一小部分新生入学，他们一方面是被波托拉学校与日俱增的卓越声誉所吸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该校设有通向都柏林圣三一学

院的“皇家奖学金”(royal scholarship)。1868年的入学新生中包括爱德华·沙利文(他的父亲是特拉弗斯案中王尔德夫妇的律师)和相比之下更具天赋的路易斯·克劳德·珀泽。①珀泽来自科克郡的米德尔顿学院,对波托拉学校的教学质量大为惊奇——主要是古希腊经典和数学,也包括英语和“更高级的”法语。不仅如此,他还发现这里在“文化跨度和思想传播”方面,都比他以前的学校要宽广得多。事实上,他认为波托拉学校高级部“更像是一所大学的学院,而不是一所中学”。②

奥斯卡很适应这种氛围,尽管是以他自己的方式。珀泽回忆称,他“对知识怀着满腔挚爱,特别是那些含有诗意的,他经常借助提出一些无知的问题——如果他愿意,他会表现得很讨人喜欢——诱导某些老师(我认为,那都是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把‘给我们上课的时间’用来就某一个经他巧妙暗示的话题进行探讨”。有一次,他抛出“什么是现实主义者?”的问题,引发了一场“有关现实主义、唯名论和概念论的专题讨论,我们都在其中提出了问题,这样的探讨非常具有启发性”。③

尽管奥斯卡的数学成绩一直“远远低于平均水平”(每次学校考试前都要疯狂地死记硬背),但在其他学校科目(school subject)上——在那个“几乎没有‘科学’(science)的旧时代”——他都学得相当好。正如珀泽所言,如果说他“在同学中算不上特别优秀……那就没有人可以比他更胜一筹了”。他全面而持久地掌握了《圣经》(包括英王《钦定版圣经》和《希腊语新约圣经》),甚至在1869年获得

了圣典奖。①不过，那时候写作还不是他的特长：他的“英语随笔”和“古典创作”都算不上“出类拔萃”。②他的文学天赋——以及对诗意的热爱——似乎并不在课堂内，而是通过打油诗和装腔作势的字句来表达的。③

然而，更令他着迷的是阅读。一个新的想象世界向他敞开了大门。他后来回忆说：“我快16岁时（1870年），开始逐渐领悟古希腊生活的奇妙和美丽。突然之间，我仿佛看见白色的身影在暴晒的体育场上投下紫色的阴影；‘一群群裸体的青年男女……像帕特农神庙的浮雕一样穿过深蓝色的图景。’我出于热爱，开始迫切地阅读希腊文经典，读得越多越着迷。”④他一如既往地倾向于认同书中的杰出人物，发现自己——“带着一丝惊奇”——最认可“亚西比德和索福克勒斯”那样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而不是“亚历山大或恺撒”等有军事作为的人。⑤

他们是很有意思的范例。波托拉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是威廉·史密斯的《希腊小史》，其中对亚西比德的描述无疑勾起了天才们对犯罪的颠覆性想象：“亚西比德从年少时就有暴力、鲁莽和虚荣的特点。他喜欢用任性、放纵的行为让清醒、稳重的公民们大吃一惊。他完全没有道德，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但他的一些优秀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的恶行。他既有大胆的计划，又有积极的行动。”⑥

这种对古希腊世界的极大热情——他感觉凯尔特文化与希腊文化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也许是在这个因素的促使之下——似乎毫不费力地推进了奥斯卡的学习。他一定很努力，但是——正如他后来所言

——“我从快乐中获得知识，我想它一直是这样。”^①他那罕见的天赋终于有了一个可供施展的领域。他的进步让同辈和老师们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连斯蒂尔博士也深感了不起。^②奥斯卡本人一直认为，正是在1870年至1871年期间，他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古典学知识”“打下了基础”。^③

奥斯卡独特的才华在“文学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在“学业”上鹤立鸡群。珀泽回忆称，“他不厌其烦地研究那些强烈吸引着他的作家，欣赏他们的文学价值，他在这些方面的评论和批评总是引人瞩目”；但他对“语法、考证、历史、‘文物’等等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④他也喜欢教学大纲要求的其他科目。在爱德华·沙利文看来，“他在课堂上流畅优美的口译”“让人难以忘怀”。^⑤

学习占据了奥斯卡的全部精力。他对书中的生活远比对现实生活更感兴趣。^⑥暑假在莫伊图拉，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位访客（当地医生的儿子）发现奥斯卡“相当沉闷”，疏远、冷漠、不苟言笑，他的思绪毫无疑问都集中在“希腊诗歌”上——与快乐、热情的大学生威利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后者喜欢喝酒，自弹自唱。^⑦

自从进入高级部，奥斯卡就与珀泽、麦克道尔兄弟、E.加尔布雷斯一起被当作“真正的奖学金获得者” (fair scholar)——然而在波托拉学校的最后一年，他却成了六年级最能干的领导人物之一。他们似乎是一个紧密团结、互相支持的团体，沉浸在游刃有余的学习中，互相挑战提升学业。他们在一封致助教本杰明·莫菲特牧师的联名信上签字，抱怨他设置的一些测试是不可能完成的。珀泽回忆，大家对奥斯

卡在古典文学金质奖章考试中的出色表现极为惊讶，对此印象深刻——“在希腊戏剧《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口试中，他轻而易举地胜过其他所有学生。”^①他的分数比第二名高出25%。^②这部伟大作品的文学品质吸引了他，他“领悟到了其中的真谛”——但是“他可能忽略了漫长的考试中的其他（对他来说不那么有意思）部分”。

①

结果——当“漫长的考试”中所有部分的成绩都计算出来后——最终胜出的是珀泽。珀泽还在1871年的颁奖典礼上获得了弗雷德里克·斯蒂尔纪念奖，也是第一个同时得到数学和圣经奖项的获奖人。奥斯卡和其他人尾随其后。这倒不是说他落后很多：他是三名获得古典文学奖的优等生之一（与加尔布雷斯和J.麦克道尔一起）；并且与加尔布雷斯共同获得了助教颁发的古代史奖项，另外还因为一幅极富表现力的厄恩湖水彩画作品获得了绘画奖。^③总之，这是他学业生涯的一个非常出色，令人满意的结果。暑假后他将前往圣三一学院。

斯蒂尔博士在向奥斯卡告别时多说了一句——也许是习惯使然——如果他继续努力学习，可能会“像威利一样为学校争光”。奥斯卡觉得这话非常好笑。^④然而，威利在圣三一学院表现非常出色：他大学第一年获得了古典文学奖；他重返波托拉时——可能是为了参加奥斯卡的授奖典礼——给人留下了相当迷人的印象。^⑤

奥斯卡的心思已经转向都柏林和大学生活。那里有许多令人兴奋的机会——学术、艺术和社交。他想象自己可以在梅里恩广场的家里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他希望和圣三一学院的老师们友好相处，并且

希望他们都是诗人。他简直等不及了。他沉浸在全新的热情中，甚至人尚未离开，波托拉——尽管在过去七年里教给他许多——便开始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了。他差点忘了他的小朋友——那个迷恋他的低年级男孩——对方坚持要到车站送别。当火车缓缓驶出车站，向着都柏林和未来出发时，男孩在他的嘴唇上留下了一个含泪的告别之吻，他大吃一惊。 ②

3 基础奖学金

他似乎能征服他所应对的一切。

——贺拉斯·威尔金斯

1871年10月10日，王尔德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注册入学，六天以后就是他的17岁生日。紧随其后是三天入学考试，他在44名考生中名列第二，在希腊语和历史科目上表现优异，勉强通过了数学必修课（珀泽名列总分第一）。^①王尔德在随后的“皇家学校奖学金考试”中延续了优异的成绩，与珀泽、罗伯特·麦克道尔一起获得了波托拉学校的“皇家奖学金”。三个人的名字都被刻在波托拉学校的荣誉公告牌上。^②

尽管进入圣三一学院标志着王尔德迈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从很多方面来说，他是回归了自己熟悉的领域。他几乎就出生在圣三一学院那一带，可以说是挨着它的大门长大成人的。学院的知名学者是他家的常客。他的父亲虽然不是校友，却获得了该校的荣誉学位，而且对学院生活很感兴趣。^③他的哥哥已经上大学三年级，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然而，新生在开启大学生活的时候，最需要的也许并不是这种熟悉感。

王尔德在圣三一学院的远大理想遭受到一连串打击。他那梅里恩广场的家中摆满了艺术品、书籍，时常有成年人之间的谈话会，而大学本科生活却粗俗不堪，不讨人喜欢。他原以为能找到志趣相投的

人，但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中学六年级时那种小规模的传统友谊一去不复返。他称，当时盛行着一种“野蛮”的氛围：虽然像学校，但“超级粗俗”。^①圣三一学院的一千多名本科生中，绝大多数看起来“简直糟透了”，“比波托拉的男生还要糟”：他们脑子里“只有板球和足球，跑跑和跳跳；他们将智力训练与打架喝酒结合起来”。奥斯卡发现，这种糟糕的情况中还有一个新元素，那就是性。那些“有灵魂的学生.....会在酒吧女招待和站街女人身上发泄他们粗鄙的恋情”。^②威利似乎满怀热情地投入了大学生活的这一面；他甚至在一次大学辩论集会上发表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讲，为卖淫辩护。^③
^④奥斯卡对此不感兴趣。一种天生的挑剔——“天性特殊的优雅”——开始显现出来。周围的人发现，他厌恶“暗示性的故事”，事实上，他反感所有粗鄙的表达方式。他很快就在同学中获得了“世上最纯洁的人之一”的美誉。^⑤他终究会和性打交道，但和其他事情一样，首先是通过文学。

在他的大学新同学看来，奥斯卡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身材和笨拙之态。他在波托拉临近毕业时，身体突飞猛进地生长起来，这种趋势还在继续，他只好努力地去适应新的自我。在人们的记忆中，他是一个“笨手笨脚、发育过度、郁郁寡欢、手足无措的小伙子”，“不断地碰翻东西.....大家都嘲笑他”。^⑥

面对这一切，学习是一种逃避，也提供了成名的机会。继在入学考试中大放异彩之后，不久他又获得了其他奖项。^⑦王尔德在波托拉受到的训练令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益颇多，但他也发现，新的学术

环境带来了挑战。他选择的时机很走运。圣三一学院的经典著作课程正在经历一场复兴——甚至可以与该校作为卓越的数学中心的声誉相媲美。罗伯特·耶尔弗顿·蒂勒尔和约翰·彭特兰·马哈菲是站在复兴前沿的两位年轻教师，他们具有无可否认的活力和才华。王尔德被推入了他们的轨道。他们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开阔了他的视野，让他逐渐喜欢上了大学生活。正如王尔德所言，“对我来说”这两个人“即圣三一学院”。^①

蒂勒尔和马哈菲——都是爱尔兰人，且毕业于圣三一学院——性格迥异，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古典主义学者。王尔德入学那年，27岁的蒂勒尔刚刚担任拉丁文教授。他虽然是个一丝不苟的学者——“完全”了解自己掌握的知识，但他的知识都集中在有限的范围内。^②他“不会假装了解或关心”考古学、人类学、历史或哲学：他真正喜欢的是文学——尽管他是拉丁语教授，却热衷希腊文学。^③

他能轻松驾驭自己的学识。他的讲座启发人的灵感：一门科目要进行“激励性的联考”，而不是权威性的说教。^④有时，他可能会拿着一本显而易见的毛边书走进讲堂，然后引导听众由此进入意想不到的“诗歌和想象的王国”。^⑤他把评论家的建议“轻轻抛在脑后”，凭借卓越的记忆力引用古代和现代作家进行恰如其分的类比。^⑥《泰晤士报》的略传记者对他“闪耀的智慧”大加赞赏，并且暗示“没有哪位老师比他更缺乏系统性；也没人能像他那样，用自己对古典诗歌的热爱成功激励学生”。^⑦他尤其喜爱形式之美。事实上，他在所有方面都是个有格调的人：不仅在写作上，而且在谈吐和着装上，都堪

称“自律优雅的典范”。^①然而，他身上还有一些相当亲切友善和“波希米亚”的东西。^②王尔德就读圣三一学院时，他还是个单身汉，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与学生们“不那么正式的交往”让他“特别开心”。^③

新近担任古代史教授的约翰·彭特兰·马哈菲牧师是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他也是年轻人，只比蒂勒尔大五岁，但是——他身高6英尺多，“强健壮实”，留着连鬓胡子，戴着硬白领——有一种威严的气派。^④这是他自己营造出来的一种气质。虽然他对自己非凡的造诣心知肚明，但他间或傲慢的态度也会因为一丝清新的幽默，以及不会发字母“R”的音，而被冲淡。

马哈菲在1864年获得职位后不久接受了圣职，不过他表示——正如他喜欢说的那样——“说句冒犯的话”自己并不是个牧师。确实有人怀疑他甚至不是信徒。他热爱这个世界，热爱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乡间别墅聚会，欢乐的晚宴，正式的宴会，这些都是他喜欢的场合。“假如他周围的男男女女有什么事迹，或者是他感兴趣的人物，那么和他们在一起，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尽管诋毁他的人可能会说，他最感兴趣的不是王室成员，就是头衔，但事实上，他和什么人都能意气相投。他当然结交了许多贵族和几位王子，不过他也声称，每次乘火车旅行时，他都会对其他乘客产生兴趣。

作为一名古典主义学者，马哈菲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据说，蒂勒尔对希腊语和拉丁语感兴趣，而马哈菲的兴趣点在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或者，用他发音就是“Gweeks和Wo-mans”）。他专门研究希腊

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王尔德说，他“沉浸在希腊思想和希腊情感中”。然而，与那些紧紧守着图书馆资源的同事不一样的是，他准备把眼光投向文学之外的民族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领域的新发现。他逐步形成并且传递了引发争议的修正派观点：例如，主张欧里庇得斯在艺术上优于（时间更早，且后来受到普遍的赞誉的）索福克勒斯，以及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时期的雅典在文化上优于前一个世纪著名的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他（像马修·阿诺德等人一样）对希腊人的“现代性”抱有深刻的认识，并且相信19世纪可以从希腊历史中学到很多东西。⑨

他的讲座——与蒂勒尔不同——也许一直属于“高高在上地对着一群安安静静学生”的授课方式，但同样能起到激励人的作用。他拥有“真正的老师身上所具有的特质——沟通的能力和热情的力量”。⑩大多数学生都尊敬他，有些人怕他——还有极少数人讽刺他。他始终牢记自己的话：“综合考虑起来，我是圣三一学院最棒的人。”不过，即使他很自负，大家也承认他确实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

王尔德被这两个人深深吸引，他热切的兴趣和活力也得到了这两人的回应。王尔德认为蒂勒尔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极其善解人意”；他总是回忆起这位年轻导师在大学生活初期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的恩惠。⑪对于马哈菲，王尔德并不像他的同学那样敬畏。马哈菲是梅里恩广场1号的常客，他早已认识这位“将军”。毫无疑问，正是这层关系促使奥斯卡——像他的哥哥威利一样——在入学时选择了马

哈菲作为大学“导师”。^①马哈菲对这个年轻学生的成绩印象深刻：他后来说，奥斯卡“对希腊研究的天分和强烈爱好勾起了我对他的兴趣。据我所知，几乎没有哪个学生能够写出一篇真正出色的希腊文作文。用希腊文写作，必须先判断出你所要转换的英语表达形式之下的实质。而且王尔德属于能够掌握希腊语中中动态(Middle Voice)不同措辞的细微差别，以及变幻莫测的条件从句的极少数几个学生之一”。^②

马哈菲和蒂勒尔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激发了王尔德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蒂勒尔让王尔德更加“精通（希腊）语言”，马哈菲使他更深地“热爱希腊思想和情感”。^③他采纳了马哈菲的诸多重要立场（比如，将欧里庇得斯置于索福克勒斯之上）——并恭维他是“我的第一位老师，也是我最好的老师……让我学会该怎样热爱希腊事物的学者”。^④

两位导师都鼓励王尔德讲话，而且要讲得好。和都柏林的情况一样，圣三一学院高度重视说话的能力。人们认为它不仅是关键的社交才能，而且是一项衡量人的标准。^⑤蒂勒尔有一副独特的“高音”，是个健谈的人：他赞扬别人的时候诙谐、自谦、机智、慷慨。尽管被认为妙趣横生，但他总是控制着自己，专注于自己熟悉的话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想象力”。^⑥然而，马哈菲是个非同凡响的人。他喜欢交谈，并进行深入研究，打算就此写一部专著。他自己在谈话方面有鲜明的特点，不仅内容丰富、流畅、涉猎面广、想象力丰富，而且容易夸大其词。相比文风，他往往对思想更感兴趣，他“自负、煽情、

多才多艺，敢于涉足自己不擅长的领域”。^①从许多方面说，他的讲话就是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一位听众认为，“听过马哈菲讲话，你才会意识到语言原来是可以用来迷惑和催眠的”。^②

马哈菲最著名的妙语之一是“在爱尔兰，不可避免的事情从不光顾，意想不到的事情经常发生”，以及“不要出于真实性去讲故事，而要看它是不是一个好故事”。^③相比之下，蒂勒尔的智慧名言就难找多了，有人问他——恰好是在某位大主教的宴会上——是否真的“在大主教的餐桌上喝醉了”，据说他答道：“哦，不，我显然是喝醉了才来的。”^④对于勃朗宁翻译的埃斯库罗斯著作《阿伽门农》，他声称“要理解它，还是希腊文最管用”，同时他批评马修·阿诺德“过分宣扬了‘避免过度’的信条”。^⑤

王尔德被两人的示范深深折服。他注意到他们都善于运用悖论，颠覆预期。他喜欢蒂勒尔诙谐地用《圣经》作为影射（蒂勒尔曾抱怨一位满腹牢骚的古典文学教师说，“如果他去迦南参加婚宴，他会让酒变味儿——进而动摇我们的信仰”）。他发现马哈菲很有说服力：“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位真正伟大的演说家——一位语言生动、张弛有度的艺术家。”^⑥钦佩之余，他开始模仿。王尔德总说，在圣三一学院，他“除了说话……什么也没做”。^⑦由于找不到意气相投的同学，他的大部分谈话都是与蒂勒尔和马哈菲进行的。^⑧事实证明他是个天资聪颖的学生，而且在波托拉学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蒂勒尔的记忆中，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健谈的人”，但发现他偶尔会“试图模仿马哈菲”假装“傲慢”。^⑨马哈菲认为这样的模仿理

所当然，王尔德在他眼里是个“讨人喜欢”的健谈者，尤其在“学术问题上”：他的观点“总是那么新鲜和非传统”，^①他的方法“充满活力和生活乐趣”。^②

王尔德在圣三一学院的这两位导师都认为学术不应聚焦在狭隘的事物上，他们以自身为榜样鼓励学生将目光放远，超越既定的课程。王尔德在第一学期定期参加哲学和英国文学讲座。^③然而，哲学的世界（哲学协会，即初级辩论社）却没有接纳他。虽然他在第一个学期就被推举加入（非常惹眼）并参加了几次会议，但“几乎从未参与过他们的讨论”。他似乎对“社会、宗教或政治问题没有任何明确的看法”。^④此外，威利是哲学协会的领袖人物——奥斯卡无疑是通过他的影响才得以提前加入的，也许他在那里太突出了，不鼓励兄弟参与竞争。^⑤

蒂勒尔和马哈菲都坚信体育运动的好处，他们推崇的古典思想是：健康的身体孕育健康的头脑。蒂勒尔打网球和曲棍球；马哈菲——一个出色的射手兼专业的垂钓者，狂热崇拜拥有大量土地的阶级——认为乡村户外运动属于“基本美德”，并引用古代马其顿人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观点。^⑥他的另一项运动爱好——和蒂勒尔一样——是板球。马哈菲大学期间曾经是圣三一学院板球队队长，担任教职以后还在继续打球。王尔德绝不会参加网球比赛，充其量也只是个观众而已，但他确实真心实意地打起了新近流行的“草地网球”。^⑦他还非常喜欢射击和钓鱼，但这些都只是在伊劳恩罗和莫伊图拉等遥远的西部时当作消遣而已。

他像中学时期一样，在都柏林埋头苦读。除学校功课之外，他一心扑在“最优秀的英语作家”身上。他继续阅读爱伦·坡和惠特曼的作品，而且还有了一个重大的新发现：斯温伯恩。⑨19世纪70年代初，30岁出头的阿尔加依·斯温伯恩是个大胆而有争议的人物：极少获得赞许，受到众人的严厉指责。大约五年前，他发表古典希腊戏剧《阿塔兰忒在卡吕冬》(Atalanta in Calydon)，取得了第一次小小的成功。之后，他出版了令人振奋的第一部作品集《诗歌与民谣》(Poems and Ballads, 1866年)。其中的《多洛雷斯》(Dolores, “我们的痛苦女神”)、《赫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itus)、《福斯廷》(Faustine)、《安纳克托利亚》(Anactoria, 以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名义提及)、《礼赞维纳斯》(Laus Veneris, 即唐豪瑟的挽歌，他被永远地困在了维纳斯的地下宫殿里)、《伊提洛斯》(Itylus, 即埃顿之歌，传说底比斯女王埃顿不小心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变成了一只夜莺)和《普罗塞皮娜赞歌》(Hymn to Proserpine) (用令人浮想联翩的诗句，为基督教战胜异教诸神而感到惋惜，如：“苍白的加利利人哪，你已经得胜；你的呼吸让世界变得灰暗；/我们饮着忘河之水，以圆满的死亡果腹”)呈现出几个生动的世界——古希腊和中世纪——其中充斥着蛇蝎美人和被诅咒的情夫，挫败的爱情和罪恶的欲望碰撞出燃烧的色彩。书中的每一页内容都抛弃了传统，忽视了禁忌，破坏了必然。异教徒和共和主义者比基督教徒和王室成员更为尊贵，性的快乐与感官的痛苦密不可分。

而且，这一切都是在令人陶醉的诗句中实现的，与其说它是描述，不如说是暗示。斯温伯恩是一位韵律大师，节奏和韵律方面的艺术家。赞美诗《阿塔兰忒在卡吕冬》那辉煌的旋律，伴随着谐音和头韵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回响着：

当春日的猎犬追踪冬日的足迹，

月份的母亲便君临平原和牧场，

让树叶的沙沙声响和雨的涟漪

充满了那些阴影和多风的地方。

诗歌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力量，必然会把读者从上一行带入下一行。在《多洛雷斯》中，诗人问道：

亲爱的嘴唇，我伤害了你，你会伤害我吗？

一旦有人触碰它们，

美德的脆弱和消沉，

转瞬间变成罪恶的狂喜和欲望。

虽然有些人说“感觉”往往跑不过“声音”，但没有人能否认斯温伯恩诗歌中的音乐之美。他的诗歌需要被朗诵，甚至是演唱。王尔德被卷入这股潮流之中。他成了“狂热的崇拜者”，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斯温伯恩的诗歌。●注 关于它们的一切都能吸引他年轻的

心。诗中有他喜欢的场景：一个是他熟悉的古典世界，一个是他乐于发现的中世纪世界。诗中还有吸引他的观点：大胆地违抗所有公认的准则和既定的价值观。古典韵律被巧妙地改编成英语诗句，那是一种对文字的狂热的爱。王尔德评价斯温伯恩是“现存最伟大的英语语言大师”：语言对他来说，“就像音乐家的美妙乐器——是可以随心所欲奏出曲调的小提琴”。^①至于情色方面的谴责：对王尔德来说，斯温伯恩是第一个“庄严地唱响肉体之歌”的英国诗人。^②这是一种令人陶醉的氛围，与圣三一学院一般学生的粗鄙小调及更为粗陋的经历体验完全不同，它脱离了肮脏的现实，在越界与绝望相互交织的感觉中得到了升华。

王尔德沉浸在斯温伯恩的诗歌中。他喜欢《阿塔兰忒在卡吕冬》。^③他对《日出前之歌》(Poems Before Sunrise)印象深刻，这是斯温伯恩1871年出版的一部轰动一时的诗集，讲述了为争取意大利统一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该书问世前一年刚刚实现统一。^④但他最爱的还是《诗歌与民谣》。他把其中的诗描述为“非常完美，非常有毒”——他如饥似渴地饮下了这剂毒药。^⑤这本书成了他的“黄金之书”——也是第一本——可以不断参照，获取慰藉和灵感的源泉。他后来称，自己宁愿写这样的一本书，也不愿创作“其他任何文学作品”。^⑥

对斯温伯恩作品的迷恋，将王尔德带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文化世界：拉斐尔前派的王国。斯温伯恩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中包括画家但丁·加百利·罗塞蒂（拉斐尔前派兄弟会的创始人之一），以及罗塞蒂

的两个年轻弟子威廉·莫里斯和爱德华·伯恩-琼斯。这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圈子：罗塞蒂和莫里斯除了从事绘画（和设计）之外，也是诗人，他们的诗虽然在某些方面与斯温伯恩有所不同——相互之间也各有不同——但仍具有许多共同点：迷恋旧时代、怀有一种疲惫而细腻的情感，乐于享受性感的细节。当然，对于持反对态度的批评家来说，他们似乎同属于罗伯特·布坎南明确定义的“肉欲诗派”。人们谴责这种流派“亚丁尼生”“色情”“歇斯底里”“唯美”。^⑩在一位保守派批评家看来，其实践者在艺术和道德上的共同缺陷，可以追溯至效忠自由主义，以及济慈的艺术影响。^⑪

当然，对于大学本科生王尔德来说，类似的批判性的恶语相向只能激励他去探索。他爱上了威廉·莫里斯创作的乔叟风格的宏伟史诗《人间乐园》(The Earthly Paradise)，其中讲述了希腊和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故事。^⑫他从罗塞蒂“难得的旋律”中，又发现了一位既能“用语言表达音乐的精髓”，又具备“优势性格”，能散发“力量和辉煌”的作家。^⑬他遵循着批评家和罗塞蒂本人绘制出的艺术谱系，找到了拉斐尔前派的“精神领袖”济慈：半世纪前命中注定，蒙受诽谤，近乎被遗忘的，不到25岁便殒命的浪漫主义作家。^⑭济慈，这个“上帝一般的男孩”，成为王尔德检验杰出诗歌的永恒试金石。

⑩

对于罗塞蒂和他周围的人来说，绘画与诗歌密不可分，两种艺术相互滋养、相互支持。王尔德沉浸在济慈和罗塞蒂、莫里斯和斯温伯恩的诗歌中，很快就注意到了拉斐尔前派的艺术成就——伯恩-琼

斯、西蒙·所罗门、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以及罗塞蒂本人的绘画作品。他们都采用同样的中世纪和古典主题，同样充斥着感官细节；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他们都具有同样的色彩天赋，而且都缺乏透视感。❶

但如果说王尔德被拉斐尔前派艺术深深吸引，那么他一定经历了不少挫折。都柏林缺乏有关这些作品的第一手材料，人们没有机会做到眼见为实。新近成立的爱尔兰国家美术馆只有为数不多的早期绘画大师和古典艺术家的作品，没有相关藏品。❷即使在伦敦，罗塞蒂多年来一直拒绝公开展示他的绘画作品。尽管如此，高仿的复制品还是存在的。斯温伯恩曾经热情洋溢地写文章介绍朋友们的作品。他在《1868年皇家艺术学院展览笔记》中对许多没有参展的作品做了精彩的描述。他对罗塞蒂的几幅画作赞不绝口——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书中还对美国“天才”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❸（另一位朋友兼邻居）大胆的印象派作品“交响曲”进行了一番精彩的描述。王尔德的艺术视野开始得到拓展。“对美的认识是个人的，”他说，“只能靠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获得。”❹在圣三一学院，王尔德始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努力捕捉着新的景象和声音。

王尔德在拉斐尔前派诗人的诗歌和绘画中所经历的强烈审美体验，在另一位年轻作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鸣。后者在1873年出版的《希腊诗人研究》一书中对希腊文学做了简洁的概述；那也是王尔德“永久”的长项。❺王尔德被其散文的音律吸引，受到其大胆的思想激励。其中有两样尤其击中要害。在“希腊艺术的天才”一章中，美——“希腊人真正的领域，他们不可剥夺的领

地”——被西蒙兹认为不仅是他们世界观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是他们道德的基础和约束。“对希腊人来说，美是宇宙综合的一个方面，与一切举止得体、道德高尚的东西相匹配。它是人与自然在一种平衡而完整的人性中达成的和谐，是一个健康的、有意识的人得到了满足，好比鲜花、野兽和星星都满足于暂时存在的条件一样。”^①

“个人主义”也备受推崇。西蒙兹断言，古希腊人生活的理想“不是把一成不变的标准强加于个人身上，而是鼓励每个人尽其所能去完成并实现自我”。^②

王尔德还注意到，西蒙兹习惯于将现代作家比拟成古典作家。济慈被拿来与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做比较，因为他的表达方式有种“纯朴安逸的感官魅力”（在此过程中，忒奥克里托斯和济慈一样，成为王尔德最喜爱的诗人之一）。^③沃尔特·惠特曼被称赞为“比当代任何人都更像真正的希腊人……充满希望，无所畏惧，接受现状，承认每一种人类冲动的价值，不逃避任何义务，采用完美健康的法则进行自我调节”。^④

尽管马哈菲对西蒙兹“很有才气但并不准确的书”中的某些细节持不同意见，然而他自己的总体观点与之大同小异。^⑤他喜欢把过去和现在相提并论。他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希腊生活的美学元素上。事实上，王尔德开始意识到，他的导师和西蒙兹一样，“对每件事都刻意采取艺术的立场”。这是一种与他自己正在迅速养成的情感相吻合的态度。在马哈菲的日常影响下，它“愈发”成为王尔德自己的成熟“立场”。^⑥这种“艺术的”观点鼓励并指引了王尔德的创造力。

他继续利用自己的时间绘画。④他还写诗。在他的一本大学笔记中，有一段强劲有力的60行斯温伯恩式演讲词，标题是“你们将成为众神”：

午夜来临之前

春曲夏歌尚未响起

上帝从尘埃中养育了

一件灿烂美好的事物：

人啊——来自大地之母，

人啊——来自贫瘠的泥土

被一只可怕的手撕扯着

做成了神的样子。

但人生是一种悲哀

死亡是对痛苦的解脱，

因为爱只能维持到明天

没有爱的生活是空虚的。

它借用《阿塔兰忒在卡吕冬》的韵律，从《诗歌与民谣》中借来冷酷的维纳斯形象。为进一步向斯温伯恩坚定的希腊主义致敬，诗文开头像古希腊合唱一样采用了交替诗句，以及“诗节” (strophe) 和“呼告” (apostrophe)。这个笔记本中还有另一段写给某个冷酷美女的充满渴望的诗，以及几行关于“罗莎蒙德” (Rosamund) 和“维奥莱塔” (Violetta) 的仿中世纪诗剧 [斯温伯恩1860年出版的第一部诗剧名为《罗莎蒙德》 (Rosamond)] 。^① 王尔德满脑子都是斯温伯恩式的文学构思。

然而，他感觉无处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热情。这并非因为他的新偶像们在圣三一学院完全不为人知。威利的朋友布拉姆·斯托克在王尔德入学前的哲学协会会议上读过一篇关于罗塞蒂诗歌的论文。王尔德很可能听过都柏林亚历山大学院年轻的英国文学教授约翰·托德亨特在协会做的关于济慈的演讲。^②

蒂勒尔教授创办了一本名为《科塔博斯》 (Kottabos, 名字源于古希腊的一种饮酒游戏) 的大学文学杂志，但内容几乎只专注于翻译，通常是翻译希腊语或拉丁语作品，或将英语作品翻译成这两种语言。它们是教师和有才华的学生们编写的学究式滑稽作品，是日常考试练习的一种有趣的变体：把丁尼生的作品翻译成贺拉斯风格，或者把贺拉斯的作品翻译成丁尼生风格。蒂勒尔在这些表演也可以当作竞赛中表现出色，他会用希罗多德的方式描述都柏林的生活，用色诺芬的风格向他的板球队发表队长演讲。王尔德欣赏他的技巧，但也意识到这种纯粹的模仿作品中存在隐患。他后来谈到蒂勒尔时说：“如果

他知道得少一点，他会成为一名诗人。学问是一道可悲的障碍。”^①另外让奥斯卡感到受挫的是，他想要在《科塔博斯》上发表文章崭露头角，可是威利却捷足先登了。1872年春期刊上登载了威利笔法娴熟的翻译作品，维克多·雨果的《寂静的月光》(Amica Silentia Luna)，随后出版的几期杂志又陆续刊登了几篇他的作品。^②

志同道合的朋友似乎很少。王尔德在圣三一学院几乎完全没有参与过同学之间轻松友好的交流，马哈菲认为那是大学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③在他眼里，大多数同学都是粗鲁讨厌的人。他回忆说，“当我想说话时”，“他们会用愚蠢的嘲讽和笑话打断我的思路。他们认为最高级的幽默就是讲一个下流故事”。^④大多数人对艺术不感兴趣。当王尔德在一次半正式的“班级讨论会”上朗读他的一首诗时，一个笨蛋——“班级里的恶霸”——嘲笑他的诗。对于一向和蔼可亲的王尔德来说，这是无法容忍的。一位同学写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满脸怒气……他大步穿过房间，站在那人面前，质问他有什么权利嘲笑他的诗。那人又笑了，王尔德打了他一耳光。全班一片混乱，不到一个小时，一堆人就到了学校后面，准备打架……没有人认为王尔德会赢，但他却像打桩机一样重重地挥起了拳头。他追着那个横行霸道的人又打了几拳，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这件事给他的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对王尔德的评价很高”。^⑤但这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真正的朋友，文学上的同好就更少了。

他只是偶尔在考试的时候会看见珀泽。爱德华·卡森是王尔德小时候的玩伴，曾经在同一个保姆的看护下在海边度假，抛开学业成绩，他的勤奋给王尔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卡森的长项是“哲学”，而不是学校的考试科目）。^①两人相处了一阵子，但是——如马哈菲记载——“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友情”。他们两人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卡森勤奋而安静，他的才智要到后来才会大放异彩，而王尔德既有才华，又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情趣。^②两人的交往注定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当王尔德指着卡森对一位女性朋友说“这个年轻人注定要到达事业的顶峰”时，他的同伴却回答说，“是的。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会毫不犹豫地践踏朋友的人”。^③1872年夏季学期，爱德华·沙利文从波托拉来到圣三一学院，他应该是王尔德眼中“圣三一学院里尚能接受的两三个人”之一。^④

王尔德发现自己的社交生活主要在大学以外。梅里恩广场仍然是一个热闹的聚会中心。奥斯卡进入圣三一学院前不久，他的母亲开始定期在星期六下午举行招待会。她说，这是她满足诸多想和她见面的朋友们的唯一办法，因为——自从伊索拉死后——她再也没有参加过宴席、社交聚会，再也没有去过剧院、音乐会和其他晚会。^⑤这些“谈话会”——从3点持续到6点——为人所喜爱，甚至成了重要活动。“通常我们有大约100人参加，”她告诉朋友洛滕·冯·克雷默，“我发现许多聪明人在这里玩得很开心，晚上他们是不会来的。我们听着美妙的音乐，经常朗诵。走廊里有一张放咖啡和葡萄酒的桌子，我再也没什么烦恼了……样样都让人无拘无束。”^⑥

尽管经常有一大群人站在楼梯上，但梅里恩广场宽敞高大的会客厅是个合适的聚会场所。王尔德夫人穿着华丽的披肩和带衬里的裙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高声道，‘我怎样才能款待这么多人呢？’”客人们都大有来头：政治领袖、演员、诗人、记者、医生和科学家。一家报纸报道说：“这简直就像都柏林的巴黎沙龙。”^①这些场合“没有势利，那是爱尔兰社交聚会上常见的致命缺陷”。^②才能是受邀的唯一依据：“希利神父的幽默面孔经常出现在那里。为小说家查尔斯·利弗立传、透着忧郁而高贵气质的威廉·约翰·菲茨帕特里克，还有善于观察、愤世嫉俗的马哈菲教授，他们都是这里的常客。蒂斯道尔博士有时候会自娱自乐地朗诵。”^③

不过，聚会主要还是聊天，它们“刺激而精彩”^④；完全契合巴黎的沙龙精神，没有人会对茶点感兴趣。王尔德夫人当然非常健谈；“见解相当独到，时而大胆，总是很有趣。”^⑤但更重要的是，她善于鼓励别人。她能把害羞的人拉出来，把无聊的人引开。在她的聚会上，“每个人都能说会道”。^⑥对于奥斯卡来说，这些星期六下午的招待会就是个令人兴奋的剧场——练习他的谈话技巧，尝试各种想法，分享热情，体验成年人的世界。他的天赋受到了挑战 and 磨炼。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讨论会，包括从副总督招待会到各种私人晚宴。爱德华·沙利文回忆，奥斯卡“在都柏林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中……如鱼得水，总是那么活泼有生气，他只要愿意，去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客人”。^⑦

然而，这样的消遣从未削弱王尔德的学习能力。尽管他声称自己的阅读是在“偶尔空闲时间完成的”，但这一点肯定值得怀疑。⑩他在学术上不断取得巨大的成就。他从未在一轮接一轮的考试中低于“一流”。⑪新生学年（1872年）末的古典文学期末荣誉考试中，他是全班第一名：“一流中的第一。”⑫他在波托拉学校打下的扎实基础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是强有力的武器，他的语言天赋也同样非常强大。在圣三一学院，考官们仍然特别重视“优雅流畅的口译”，将其作为“才智测试”。⑬

第二年，王尔德申请了一项令人垂涎的“基础奖学金”，它面向所有大学生“一直到硕士毕业”——这是一个令人精疲力竭的过程，要用拉丁文、希腊文和英文撰写文章。最终只有10人获奖，王尔德获得了成功，落后于他的老校友珀泽，在50名候选人中名列第六，排在他后面的是威廉·里奇韦。里奇韦后来成为剑桥大学考古学教授。奥斯卡的英语作文和希腊语翻译都得了最高分。⑭奖学金带来了荣誉，以及每年20英镑、免学费、在大学里获得一套宿舍的权利。⑮

奥斯卡在学校北边的“博塔尼湾”找到了住处。⑯尽管他从未在那里招待过客人，却有同学记得，房间里“极其阴森，打理不善”，但这确实使他更多地融入了学院的生活。⑰1873年12月威利毕业后，他的自我表现空间更大了。威利获得“伦理学与逻辑学”金质奖章（或一等），收获了荣誉，也是他最后一段荣耀。他在历史和哲学协会展现了出色的辩论才能，促使他考虑从事法律工作——或许可以作为政治生涯的前奏。他在本科生阶段就已经被都柏林金斯因斯法学

院录取——圣三一学院有意从事法律的学生通常都会走这条途径。他继续“保持荣誉”，后来去了伦敦中殿律师学院也是如此。①

奥斯卡住在博塔尼湾，开始参加一些大学活动。1873年11月他加入历史协会（由威利提名），甚至还发表了演讲。1874年1月21日的会议上，他表示支持“贸易联盟主义的原则是合理的”。②然而，这样的尝试并不多。他偶尔和朋友们一起玩玩纸牌。尽管人们认为他是一个“极其节制的饮酒者”——至少以爱尔兰大学的标准来看，但他似乎并没有回避所有的欢宴。③虽然他不是同学眼里的“超常人物”，但知道他的人确实越来越多。④他对艺术的热爱得到了承认（继他战胜了班上的恶霸之后），也受到了尊重。⑤如果偶尔有人因为他的热情而打趣，那也只是开个玩笑。⑥大家都开始喜欢他。⑦在朋友和熟人眼里，他不仅“善良”“脾气好”，而且非常有趣。他享受大学生活的乐趣，自己也很风趣。⑧

他很善于发现滑稽的细节。他和学院导师——邋遢的年轻教师汤森·米尔斯，当时正在辅导他参加考试——之间的一个插曲，把他乐得够呛。米尔斯进屋的时候戴着一顶高帽子，上面蒙着葬礼用的黑绸纱。王尔德见了连忙表示哀悼，但米尔斯笑着解释说，没有人去世——“只是帽子太破了，他才想了个办法遮盖一下。”⑨奥斯卡和他的母亲一样，拥有夸张的戏剧天赋，喜欢从骇人听闻的世俗情感中汲取快乐。他邀请一位大学朋友参加梅里恩广场的招待会时，用了一句明显属于斯温伯恩式的台词，让对方大吃一惊：“我要把你介绍给我的母亲，我们成立了一个抑制美德协会。”⑩虽然他热衷于制造惊人

效果，但他招惹别人的时候始终带有一丝嬉闹的意味。他享受自己的荒唐。是的，如此“心地纯良”的王尔德竟然参与了一场“抑制美德”运动，其中肯定有它滑稽可笑的一面。

他在圣三一学院养成了一种在琐碎小事上故作正经或夸张渲染的行事风格。一天晚上，他的房间里传出一阵巨响，隔壁的同学冲进屋里帮忙时，惊奇地发现他“正半裸着在地板上跳来跳去”：“‘我屋里进了一只大苍蝇，一只嗡嗡叫的苍蝇，’他解释说，‘我得把它赶出去才能睡着。’”他不愿意简单粗暴地把虫子拍扁，这在大家看来简直优雅得荒谬可笑。⑩他经常发表宏大的言论，然后轻车熟路地推翻它们。去博塔尼湾拜访他的客人，一进门就会发现——惹人眼目地支在画架上——一幅尚未完成的风景油画，王尔德会说，他刚在画中添上了“蝴蝶”。不过，王尔德对惠斯勒（惠斯勒喜欢用一只具有艺术效果的蝴蝶作为自己的作品签名）这种漫不经心的亲近感，却被他自己“幽默却不能令人信服的方式”推翻了。⑪

虽然王尔德的美学热情中含有斯温伯恩式的“肉欲”，但它受到了另一种相反力量的平衡制约：对天主教會的迷恋。具体细节虽不清楚，但他似乎受到了当地一群耶稣会士的影响，与其中一些人交了朋友，偶尔参加一些礼拜仪式。⑫毫无疑问，即使在这个新的兴趣爱好中也包含着一种审美因素。天主教仪式典礼的“艺术性”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如王尔德所称，其“芬芳的教义”亦是如此。⑬他发现，爱尔兰教會不具备这些素质。⑭也许斯温伯恩诗句中美妙的“罪恶”感也有赖罗马天主教會提供合适的环境与动力。只有在宽恕与诅

咒之间，罪恶才有意义。《礼赞维纳斯》中的悲剧主人公唐豪舍，在返回维纳斯堡之前，曾前往罗马寻求宽恕，却以失败告终。

王尔德考虑改变信仰。然而，父亲禁止他这样做。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奥斯卡小时候，当威廉爵士得知福克斯神父给儿子施洗后心里很镇定，而现在却强烈反对改宗。他的兄弟和姐夫都是英国国教教士，但他本人似乎并不是一个持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也许他的反对更深程度上是出于社交和实用性考虑。虽然罗马天主教徒早已获得解放，但英国-爱尔兰统治阶级的旧偏见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威廉爵士本人从不隐瞒他的观点：他的餐桌是所有人的聚会场所。❷但是，他也许认为改变信仰会使奥斯卡在事业初期处于不利地位。大学里仍然存在着强烈的反天主教偏见。虽然天主教徒自1793年起就可以在圣三一学院学习，但直到1873年，他们才可以获得职位，甚至奖学金。威廉爵士的反对意见得到了马哈菲的支持——很可能——也获得了蒂勒尔的赞成。蒂勒尔虽然自称是不可知论者，但他在“罗马天主教对爱尔兰人的影响”上持悲观看法。马哈菲对罗马教会的看法只能比前者更具批判性。❸

也许是为避免奥斯卡受到耶稣会影响，马哈菲建议他去牛津大学完成学业。这个重大计划的另一半动机可能出自于学术。虽然马哈菲从不承认老牌英国大学的优越性，但他认可这些学校具有促进作用——一个获得专业提升的机会。❹奥斯卡的父亲最初似乎对这个计划持怀疑态度。撇开其他不说，他得为此增加额外开支，而当时他刚刚在莫伊图拉雄心勃勃地盖完房子（1872年2月，他在梅里恩广场的房

子上抵押了1000英镑)。然而,马哈菲和牛津大学的一位熟人亨利·阿克兰爵士(Sir Henry Acland)打消了他的疑虑。阿克兰爵士是英国皇家医学院教授、英国医学会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威廉·斯托克斯博士的老朋友。②

奥斯卡本人肯定对这个想法感到很兴奋。牛津大学是斯温伯恩、伯恩-琼斯和莫里斯的母校;罗塞蒂就是在那里装饰牛津联盟辩论厅时请他们帮忙。牛津大学可以让人摆脱圣三一学院的粗鄙和都柏林的乡土气息。它也许能使人迈入一个辉煌的新阶段。

1874年2月,奥斯卡超越他早期在学术上的成就,在希腊语考试中赢得著名的伯克利金质奖章——针对当年必读书目,回答了一系列试卷,包括奥古斯特·迈内克不朽的七卷本纲要《希腊喜剧诗人作品片段》。③这是一个明显差别,马哈菲和蒂勒尔从未获得过这个奖项——奥斯卡的考试指导老师汤森·米尔斯曾在1862年获奖,更早前奥斯卡的曾伯父拉尔夫·王尔德也曾获得此奖项。威廉爵士对儿子的成就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他在给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长约翰·吉尔伯特爵士的信中写道:“我们邀请老朋友星期四到莫伊图拉小聚(即品尝威士忌),同时也是为了庆贺亲爱的奥斯卡上周获得伯克利金质奖章。你一直是他最仰慕的人,他盼望你大驾光临。”④奖章本身非常漂亮(也很具价值),由18世纪著名“唯心论”(Immaterialism)哲学家伯克利主教送给圣三一学院的铸模用纯金锻造而成。这是王尔德在圣三一学院时期一个持久的、重要的纪念品。

尽管从外表看，牛津大学似乎是个单一机构，但它其实（现在仍然）是一个自治学院集群。王尔德必须决定申请哪个学院。马哈菲在牛津最亲密的朋友是女王学院才华横溢的古亚述文化学家A.H.塞斯。但奥斯卡选择了莫德林。它没有贝利奥尔学院那样的学术声誉，没有基督教会学院那样的社会威望，也没有默顿学院或新学院那样的历史渊源，但它以美丽著称。他在都柏林的邻居路易斯·佩林新近被该院录取^①，约翰·阿丁顿·西蒙兹曾经短暂地在那里求学。《牛津大学公报》（1874年3月17日）公布，学院将在当年颁发至少两项古典文学奖学金，为期5年，每年95英镑。

那年夏天，6月22日星期一，王尔德带着出生证明（证明他不满20岁）和一份“品行良好”的证明，去牛津面见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布利牧师。第二天，他和其他18名考生一起参加了奖学金考试。有一名考生记得，他用掉了“一大堆纸”，令其他人感到不安。这个年轻人有所不知，那是因为王尔德的连笔字体——比波托拉时代更具个性和特色——一行只能写四五个字。^②

王尔德随后在伦敦与母亲和哥哥见了面（威廉爵士当时正在爱尔兰忙着筹备那年夏天早些时候在贝尔法斯特举行的不列颠科学协会会议）。奥斯卡获得奖学金的消息随即传到伦敦。他的第一次首都——或者如他母亲所说，那个真正的“伟大而强大的城市——世界之都”——之行，因而增添了一抹令人愉快的色彩。国际知名大人物取代了以往的都柏林名人。他们拜访了一圈文学界名流，去切恩罗拜访了上了年纪之后脾气暴躁的“切尔西圣人”托马斯·卡莱尔。^③ 19世

纪40年代，王尔德夫人在卡莱尔访问爱尔兰期间曾与他有过书信往来；他们探讨了共同喜爱的丁尼生，她还收到过他的一本书，上面写着一段他自己翻译的歌德诗句：

谁不曾和着悲哀咽下面包，

谁不曾在深夜时分，

啜泣着，哀叹着明日，

伟大的神明啊，他不认识你！

尽管她每逢患难便要求助于这些诗句，但年轻的奥斯卡却觉得它们令人压抑。❶他更喜欢卡莱尔叙述法国大革命时的那种抑扬顿挫感，他可以整段地背诵下来。“他是多么伟大啊！”王尔德后来这样评价作者，“他第一次用我们的语言把历史写成了一首歌。他是我们英国人的塔西佗。”❷

在伦敦待了将近一个月后，母子三人踏上欧洲大陆，来到日内瓦，回程经过巴黎，住在左岸的伏尔泰酒店。19世纪50年代中期，这家旅馆曾是斯温伯恩心目中的伟大英雄波德莱尔的家。诗人波德莱尔在《恶之花》中生动地描绘了丑恶、腐败和罪恶之美。正是在这两位指引下（再加上爱伦·坡和罗塞蒂的注释），奥斯卡开始创作自己精心押韵的诗歌，华丽而性感地描述了可怕的埃及妖妇斯芬克斯，其怪异的形象就在附近的卢浮宫。❸

那年夏末回到都柏林，马哈菲邀请奥斯卡修订他最新著作《希腊社会生活》手稿。书中关于希腊风俗的众多深奥知识大都源自迈内克的《希腊喜剧诗人作品片段》，王尔德对这部作品非常熟悉，对马哈菲来说肯定是非常有用的资源（马哈菲在前言中感谢他的门生“自始至终”为该书所做的“诸多润色和修订”）。❶ 共同的事业使王尔德对马哈菲的公开“艺术立场”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例如，在一段文章中，马哈菲描述了后来的希腊评论家如何将荷马（伟大的人类性格和人类激情描绘者）“贬低”“成为一个道德说教者”，认为他“有一套关于生活和责任的明确理论”。马哈菲认为，“如果我们夸大雪莱和济慈的道德目的，坚持把他们归为塔珀先生和瓦特先生的学派，那么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❷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认为在艺术中，审美的考虑不仅独立，而且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这样的观点不但新颖而且非常惹眼。

更令人瞩目的是马哈菲对通常被压制的“少年之爱”话题的处理。“少年之爱”即paiderastia——指的是一个年长的男性“爱人”和一个年轻的男性“被爱者”之间充满情欲的、通常与性相关的关系，是古希腊生活的一个特征。这个话题世代是个禁忌，即便在学者中也一直如此。然而，德国学者倡导的客观严谨精神日益高涨，渐渐将这个话题推到台前。K.O.穆勒1830年对古代“多利安人”和斯巴达人的研究，也许是第一次以近乎坦率的态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好战的斯巴达，“少年之爱”起源于军事和教育，但在希腊的其他地方，它另有侧重。

正如柏拉图所描述的那样，在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的雅典人中，“少年之爱”是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他一部分对话的基础，在他的《会饮篇》中处于中心位置——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们在其中辩论它的确切性质和正确表达。苏格拉底在辩论中描述了女祭司狄奥提玛如何为他设计出这个问题，并解释爱总会被美丽、善良和不朽所吸引。使人类最接近这些目标的活动是创造——要么是身体上的（孕育孩子），要么是精神上的（创造思想和艺术品）。为了实现前者，男人会找到一个美丽的女人去爱；为了实现后者——一个更高的目标——他要寻找一个美丽的青年，一个年轻的男性，其外表之美和好学上进将激发他的思想，并通过谈话帮助它们获得形式和表达。❶

马哈菲认为这个话题太重要了，不容忽视，他用了6页篇幅描述了“希腊人与英俊青年交往时所感受到的特殊的快乐和兴奋”。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涉足禁地，于是便试图模糊其中的性因素，将这些依恋表达为“浪漫和骑士精神”，其本质上是纯洁的——与现代男女之间的“浪漫友谊”没有太大区别。然而，他也承认，偶尔可能会有“激情”掺入其中，有时会发生“过分”的行为——而且，在底比斯和伊利斯这样的地方，“即便和身体有关，也没有人反对这种关系”。他强调这是一种公民美德，并提出如果19世纪的人认为它反常，“希腊人可能会回答说，所有的文明都是反常的”。❷ 王尔德第一次接触到这么有趣的话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一直是古典文学界和知识分子生活中一个精彩但有争议的话题。只不过，他会以其他方式对其展开探索。

夏末，他准备动身去牛津。马哈菲祝福这个聪明的学生，并且可能第一次在他诙谐的话语中透露出一丝竞争的意味。“到牛津去吧，”他说，“对我们这些在都柏林的人来说，你还不够聪明。” 注

第二部分 夜莺与玫瑰

1874～1878年

20～24岁



1876年，王尔德在牛津

1 年轻的牛津人

他非常活泼，喜气洋洋。

——布尔默德·萨莱斯·拉泰里耶(Bulmer De Sales La Terrière)

19世纪70年代牛津大学的魅力令人瞩目。这所古老的大学主宰着整个小城：学院和四方院、穹顶和塔楼、建筑上蜜色的石雕、教堂的“梦幻尖塔”仍旧弥漫着中世纪的气息。宽街和“高街”铺着鹅卵石。小城周边并非郊区，而是一幅与牛津郡宁静的乡村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景画”，难怪有人后来回忆称：“其魅力何止吸引眼球，简直是深入灵魂。” ①

王尔德善于感知美，洋溢着浪漫精神，对这份魅力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我的灵魂似乎在我内心得到平静和喜悦，”他记得，“牛津是我的天堂。”在这个天堂里，莫德林学院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它也许是所有学院中最美的一个，位置稍远一些，坐落在蜿蜒的“溪流一般”高街的尽头，一边是小鹿公园的雉堞状围墙，另一边是查韦尔河。韦恩弗莱特优雅的哥特式高塔矗立在“庄严而别致”的建筑之上，下面是点缀着贝壳星星的步道、灰色的回廊和拱形的礼拜堂——5月的清晨日出时分，身着白袍的唱诗班歌手在塔顶迎接春天的到来。王尔德到来的第一个学期，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①

他被安排住在“教士院”三楼的两居，靠近小教堂袖廊的彩色玻璃窗。❶他发现本科同学再不是举止粗鲁闹哄哄的爱尔兰人，而是一群颇具人脉的年轻人，其中有些人和他一样是奔着荣誉学位来的，大多数人只求学习负担不要太重，能获得普通学士学位，但几乎所有人都在充满魅力、自由自在的牛津校园里保持着英国公学令人愉快的行为规范和同学情谊。离开圣三一学院后，这种氛围的变化——社会 and 物质两方面的——简直“令人震惊”。❷

尽管王尔德比同年入学的其他大一新生年龄稍大一些（1874年10月17日入学，就在他20岁生日的第二天），但他那孩子气的脸庞掩盖了这一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起眼。他身高6英尺多，个子比大多数同学高，身材魁梧，显得“手脚过长”，举止笨拙。他浓密的棕色头发“长得过分”，简直难以捉摸，“有时中分，有时侧分”。❸❹那个年代，人们讲究蓄优雅的小胡子，修剪整齐的连鬓胡子，王尔德苍白的脸上刮得光光的，特别扎眼；❺在一些旁观者看来，这种“毛发欠缺”似乎是一种“天然属性”，而不是剃刀的缘故。❻他带来的衣服被看作既正式又不时髦：“虽然那无疑是都柏林市中心大街上的普通穿着”，但在他的同学们眼里，它们看起来“古怪得像要去‘高街散步’一样（星期日晚祷后沿牛津高街的例行散步）”。他很快就被莫德林学院的本科生们亲切地称为“我们那个怪模怪样的新生”。❼

然而，王尔德似乎一直无忧无虑，并没有意识到他和别人有什么差别。新环境带来的兴奋感、有限的社交知识以及他的自负，可能导

致他陷入某些尴尬境地——但也能让他愉快地摆脱这些困境。初来乍到的头几个星期，他被认为犯了“冒昧殷勤”的“过错”。他不懂牛津大学的既定规矩，给新认识的人递上自己的名片（新印的，上面写着“奥斯卡·欧弗雷泰·王尔德，莫德林学院”），根本没有考虑到对方的年龄和地位。他第一次在大厅就餐时，碰巧身边坐着来自另一所学院的客人（一名三年级的“运动健将”），两人聊得不错，然而他的做法让对方“惊愕不已”。他还不等“学长们先行招呼”便迅速地给他通过家庭关系认识或听说过的其他学院同学散发了名片。❶

尽管有些小毛病，但他的友好姿态并没有遭到断然拒绝。他与J.E.C.博德利（贝利奥尔学院二年级学生，去年夏天在都柏林见过他）重新取得联系，并被拉进了一个活跃的朋友圈——主要是贝利奥尔学院和奥里尔学院的学生。他们乐于接受他，称他是“一个性格温和，而又不谙世故的爱尔兰年轻人”。显然，王尔德正是通过这种“学院外”关系，让莫德林学院的同学们逐渐地对他有所了解。❷

当时，莫德林是一所规模相对较小的学院，本科生不到一百人。❸其中，王尔德和其他几个“莫德林人”成了一个与众不同、引人瞩目的小群体，他们的特点是飘逸的长袍和成捆的书籍。他们在餐厅里自己的桌上一同用餐。这并非出于莫德林学院著名的学术氛围（贝利奥尔才是一所学术性学院），而是因为王尔德是那一年仅有的三名获得古典文学专业奖学金的本科生之一。❹据说，在莫德林，“人们更重视社交能力”，而不是学业成绩抑或“运动能力”。❺王尔德很能

适应环境。他的“和蔼可亲、幽默风趣，以及非同寻常讨人喜欢的谈吐能力”逐渐为他赢得了学术圈以外的名气。❶

王尔德没有逃避大学同学对他的期望。他和同在莫德林学习古典文学的阿特金森一起参加了学院赛艇队。但总的来说，这次参与并不成功。他们被一个庸俗蛮横的划船教练“拖下水”，王尔德是“尾桨手”，阿特金森“负责船头”。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两人都行进非常缓慢。王尔德果断勇敢地面对同学们善意的嘲讽。然而，尽管他受到了耐心的鼓励，但事实上却连一项基本的技巧都无法掌握。他总是心不在焉。有一次，大学代表队顺流而下朝他们驶来，要求他们赶紧尽力将赛艇靠边，但王尔德毫不理会。他不顾两名舵手的斥责，一边对阿特金森说，“划桨时没有理由要求人挺直腰板”，并且也不信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是靠这个战胜波斯人的。这件事终结了他的赛艇生涯。❷用他的话说就是，看不出每天晚上倒退着划向伊夫利河水闸有什么意义可言。❸

大学生活的其他一些方面也同样不尽如人意。莫德林学院的整个教师团队都比较平庸，没法与蒂勒尔和马哈菲相提并论。他们以“学院讲座”——即小组辅导的形式进行教学，很是枯燥乏味。年轻的古代历史导师W.D.艾伦有时会透过半敞开的卧室门，向聚集在一起的学生口述“课堂笔记”，这时他的“大獒犬趴在壁炉边的地毯上”。天气寒冷的时候，如果要去溜冰，他就闭门谢客，并在门上别一张卡片写个什么理由。拉丁语导师约翰·杨·萨金特会在晚上围着火炉开一些昏

昏欲睡的辅修课，他似乎往往不怎么在乎讲课内容，而是“更在意炉子边大银杯里温着的啤酒”。^①

王尔德在圣三一学院苦学过三年，他觉得眼下的功课不足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尽管有些同学对他之前在都柏林的学业情况略知一二，但他不想宣扬其中的细节，喜欢将表面上毫不费力取得的成绩归功于天赋。^②他那流利的希腊语翻译让人眼花缭乱，而且——他声称从未做过诸如此类的练习——他的拉丁语诗歌作品获得萨金特高度赞扬。不过，他经常逃课。^③

牛津广阔的学术生活对他更具吸引力。当时人们有一种急切的求知欲，寻求一种新的思维和理解方式。对许多评论家而言，科学和考古学的进步似乎不仅损害了《圣经》的字面真理，而且破坏了支撑生活和规范行为的宗教和道德确定性。信仰在达尔文和德国语言学面前不断后退。当时正值英国的物质财富迅速增长，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个国家逐渐显露出被商业化、自鸣得意和文化停滞战胜的危险。

牛津人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马修·阿诺德（曾在奥利尔学院任职，1857年至1867年担任诗歌教授）以“文化”取代宗教，提出将欧洲经典著作作为福音书所支持的传统道德体系的基础。贝利奥尔学院院长本杰明·乔伊特希望柏拉图的哲学能够成为基督教神学的一种卓越替代。^④ T.H.格林（1877年成为牛津大学伦理学教授）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以及一种对社会责任的奉献精神，或许可以满足这种需求。万灵学院的比较语言学教授

弗雷德里希·马克斯·穆勒出生于德国，他通过研究古印度梵文文献寻找信仰的共同根源，开辟了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等新的学科。还有史莱德美术讲座教授罗斯金，他在美——自然和艺术两个视觉世界中找到了精神保证。

王尔德被这些潮流深深吸引。他购买了阿诺德的散文和乔伊特的柏拉图译本；他读了格林的书，并且和充满活力、热爱音乐的马克斯·穆勒交上了朋友。①但在牛津大学诸多出类拔萃的名家中，罗斯金的吸引力最大。他身上有一种魅力和活力：评论家、辩论家、梦想家、改革家、艺术家和诗人——特纳的拥护者和拉斐尔前派的捍卫者。母亲教导王尔德要尊敬这位伟大的人物，如今他兴奋地发现自己竟然离他如此之近。②罗斯金50多岁，是小镇上的怪人，既令人生畏，又平易近人。他一眼望去相貌英俊，长着鹰钩鼻子，留着络腮胡子，有时候他把手搭在年轻的利奥波德王子（维多利亚女王最小的儿子，当时在基督教堂学院读本科）肩上穿过街道，“他的编织长袍从肩上滑落，拖在水坑里”。③④王尔德就读的第一个学期，罗斯金就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举办了一系列公开讲座——其中八场的题目是“佛罗伦萨的美学和数学艺术流派”，从契马布埃和乔托开始，以弗拉·安杰利科和波提切利收尾。王尔德孜孜不倦地参与其中。

这些讲座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由此结识了那些曾经鼓舞拉斐尔前派的艺术家，激发了他一窥意大利及其大师杰作的渴望。不仅如此，他们还为他打开了一片新视野。罗斯金“极大地”吸引了王尔德。他的热情及其“优美的辞令”，“节奏、色彩……以及文字的美妙乐

感”——无论在讲台上还是印刷品上——令人陶醉。⑩王尔德认为，他是“一种精致浪漫的花朵；就像紫罗兰，让空气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信仰的芬芳”。⑪这一信念的核心是“美”的重要性——它以自然的形式出现，在视觉艺术中得到升华，它的道德力量及重要性与生命相连。

王尔德认为罗斯金是“英国的柏拉图——一个真善美的先知，他像柏拉图一样将三者比作一朵完美的花”。⑫王尔德准备接受这一远见卓识。他心中装满了牛津的美景和艺术的奇妙，发现罗斯金的“美的联想效应理论”特别具有启发性。⑬他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也曾接触过这一思想——孩子们在“一切事物都很公平的简单氛围中被抚养长大，美作为艺术的灵魂，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进眼睛和耳朵，从纯净的高地带来健康，并不知不觉地渐渐引导孩子们的灵魂与一切知识和智慧和谐相处，这样他们早在明白道理之前，就会喜欢美丽和善良，憎恶邪恶和丑陋（因为二者往往同流合污）”。⑭王尔德决心成为罗斯金的门徒。⑮

他并不是唯一有此热情的人。罗斯金的讲座每周中午在大学博物馆剧场举办两次，吸引了600多名兴致盎然的本科生和热情的“访客”（主要是女性）。⑯艺术和美显然是两个具有广泛吸引力的主题。

罗斯金在前一年发起一个项目，打算修筑一条穿越沼泽地的乡间道路，把附近的上欣克西村和下欣克西村连接起来，从而将牛津大学本科生的精力从无用的运动转移到有用的劳动上。尽管大多数身强体

健的人都没有理会他的号召，但一小群高尚的追随者——主要是贝利奥尔学院学生——已经开始了这项任务，并在罗斯金的偶尔指导下一直坚持着。王尔德（他承认自己天生“奢侈”）很不愿意投身于一项既需要早起，又很艰苦的体力劳动；尽管如此，那年冬天他似乎确实参与了“挖掘”，并向他的新偶像作了自我介绍，建立了一种他希望“日后”也许能进一步“利用”的联系。⑨

罗斯金的教学为王尔德开拓了广阔的视野，让他感到兴奋，但忽视了当下的学业。他忘了要好好准备学位初试（也称“Little Go”），这是牛津大学所有大一新生在第一学期末参加的一项简单考试。尽管其中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考试不会对他构成任何挑战，但还有一门数学必修课。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这个因素导致了他未能通过考试。失败既是挫折，也是一种尴尬。校方对此并不买账。在“期末检查”中，莫德林学院院长布利博士把王尔德归入了“暂停学业”的类别，表示学校非常不满意。⑩下一学期开始时校方进一步强调了不满的态度，王尔德正式受到院长“警告”。他很有可能被告知，如果通不过第二次学位初试，就会失去莫德林学院奖学金。他后来在那个学期早些时候重新参加并通过了考试。⑪

然而，这一小小的胜利似乎并不是通过努力学习取得的。相反，分散精力的事情越来越多。1875年初，王尔德彻底变了样，让朋友们觉得非常有趣。他剪短了头发，换了装束。他竖起高高的新立领，身穿花呢格子短上衣，扎着湛蓝色的领带，头戴“卷边帽”（俏皮地搁

在一只耳朵上)，努力“超越”那些热爱运动的“年轻的牛津人”。

⑩

这完全是一种消遣的姿态。在接下来的几个学期，王尔德似乎把自己献给了无忧无虑的牛津大学本科生活。他的一位同伴回忆，那是一轮接一轮愉快的“打牌、唱歌、串门（和）喝酒”。王尔德“兴高采烈地”沉浸其中。⑪他在高街的施皮尔斯百货公司开了个账户，一年当中在房间里添置了两个瓷壶、一些烛台饰品、一个装红葡萄酒的玻璃酒瓶、八个水杯、六个葡萄酒杯和两副扑克牌。⑫

他发现“赊账”虽有风险，却让人愉悦。他周围都是出身不俗、家境富裕的年轻人，他想象自己也和他们一样。“似乎没有人对钱有任何了解，”他回忆，“或者根本不关心钱。处处都有贵族的感觉；一个人必须有钱，而且不用为钱烦恼。”王尔德就毫不在意。尽管他有奖学金，父亲也给他钱，但他在镇上商人那里的欠债越来越多，而且学会了无视催债。在牛津——正如王尔德所经历的那样——“肮脏的生活现实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⑬

博德利1875年的日记生动地刻画了这个无忧无虑的世界。他们欢聚在米特雷餐厅，偷偷在校外聚餐，享用丰盛的早餐——鲑鱼和蘸酱腰子。他们举行小型午餐派对，长时间地打惠斯特牌。他们沿河散步“健身”，并在河上划船旅行。骑马或乘马车到乡间做短途旅行：星期日下午驾着轻型小马车飞奔去伍德斯托克（王尔德想象自己驾驭着一辆希腊战车）；或者坐着双人马车安安静静地短途游逛，王尔德喜欢坐在后座“练习吹邮车上的号角，但效果相当一般”，他间或跳

下车去开门，“特别缺乏灵活性”。他还特别得意拥有一件“浅灰色风衣”，穿着它坐在“慢吞吞的”四轮大马车顶上显得特别拉风。①
有一次博德利回到贝利奥尔，发现王尔德和巴顿在他的房间里打拳击，然而王尔德的这帮朋友几乎不参加任何有组织的比赛。不过他们还是愿意看比赛的，去河边看赛艇，或者去跑道边看比赛。王尔德经常“被人撞见在板球场上”，然而他只是个旁观者。他甚至还有一张被莫德林板球队簇拥着的照片。②

根据牛津大学的古老传统，学期中禁止在校园里进行戏剧表演，但乔治街的维多利亚剧院可以举办“音乐会”和“音乐厅演出”。这些都是很受大学生欢迎的活动，很容易造成混乱。博德利记录了一个喧闹的夜晚（1875年1月29日）在剧院看提洛尔歌手演出的经历：

两个包厢连在一起。吵闹个没完，帽子和雨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演出期间，莫德林的王尔德爬进我们的包厢告诉我，他哥哥来了，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出来的，就在那里（威利去了英国，当时正值中殿学院的春季学期）。音乐会结束时，我们和提洛尔歌手打趣着跳上了舞台。大王尔德（即威利）先被介绍认识了我，然后便在钢琴上胡乱弹奏着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舞台工作人员慌忙冲过来拉上幕布。我们和三个提洛尔歌手一起去了米特雷餐厅。他们用约德尔唱法真假嗓轮替着唱，我和韦尔什也在那儿唱。我、菲茨、奇尔德斯、威廉姆森和夏普都因此受了罚。在和王尔德拜访克拉伦登饭店之后，我们就踉踉跄跄地回到住处。③

深夜外出，出入特许烟酒场所，这些都是违反校规的行为，导致学生经常和校监（大学里的纪律检查人员）发生冲突，并经常被罚款——尤其是王尔德。事实上，他还因为这些问题获得了一个大大的名声——“本年度最不幸大学生”。^①不过，这也是乐趣之一。

朋友们之间爱开“玩笑”，喜欢“逗趣”。博德利和奇尔德斯取笑王尔德“天真”，王尔德则以博德利只知道八个掌故作为回击，并称他不停地将它们“仔细编号，轮流讲述”。^②他们玩恶作剧，发恶搞电报。博德利写道：“王尔德不喜欢寄给他的鳕鱼头和‘伦敦期刊’。他说，他把鱼头偷偷扔进查韦尔河，自我感觉很像温赖特（那位凶手）。”^③去布伦海姆公园游玩时，王尔德——这群人中最壮的一个——会被同伴抓住，推着滚下宫殿前长满青草的斜坡，“这是他喜欢的一种娱乐”。^④

除了这些即兴消遣，大学社交活动中最大的焦点是共济会。当时，在利奥波德王子的热情支持下，这一神秘而又古老的运动成了牛津的一种特殊时尚，它在一系列象征仪式背后增进了兄弟情谊，促成了各种善举。博德利是牛津大学共济会分会“阿波罗”的热心成员，王尔德的许多大学同学也是其中一分子（莫德林学院尤其以共济会式的志同道合而闻名）。^⑤不久，王尔德也加入其中。1875年2月23日，由弗兰克兰·胡德（莫德林学院公共休息室负责人）提议，博德利附议，并经投票通过，王尔德和大学划船俱乐部的新星威廉·格伦费尔一起被邀请加入阿波罗分会。^⑥王尔德“不失时机地成为新入会者中最热心的人”，“级别”迅速晋升；他于4月24日被升到“第二

级”，5月25日成为共济会三级会员。❶他对象征性的仪式很感兴趣，喜欢“华丽”的服装和优雅的装束。❷阿波罗分会保留着穿戴黑色及膝马裤、燕尾服、白色领带、丝袜和轻便帆布鞋的传统。❸

虽然共济会涵盖了道德和哲学两个方面，而且发起捐款是为了支持“一些非常值得做的慈善事业”，但在19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牛津本科生看来，共济会是“在‘纪念堂’举办更多宴会和大型舞会的一个借口！”。❹会议之后，通常会有一顿大餐，还有很多让人欢乐的活动：大家唱着歌（王尔德将“他那善意但不稳定的单调嗓音”融入了合唱），玩着一些小把戏。❺在王尔德入会后的“节日宴会”上——入夜后，王尔德变得“非常开心”——博德利鼓励王尔德为共济会的基石“J和B”祝酒。王尔德不知道这两个大写字母代表——根据共济会的传统——所罗门圣殿支撑门廊的两根铜柱“雅斤”（Jakin）和“波阿斯”（Boaz），于是便提议为“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的健康干杯，引发“一片大笑”。他并且说，“我听说，（他）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接着他又说：“我希望我们能仿效他的生活，但不是他的死亡。所以说，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❻

王尔德在艺术上的投入丝毫没有因为繁忙的学生活动而减少。这仍然是他的重要课程和极大的兴趣所在。1875年赛船周期间，博德利一家来到牛津大学，王尔德和他的姐妹阿格尼丝沿着查韦尔河步行回来，两人一路上“谈论艺术”（与此同时，王尔德在奥里尔学院的朋友菲茨杰拉德则一直在给博德利的另一个姐妹贝塔“讲奇奇怪怪的故事”）。

事”逗乐)。❶他坚持写诗，斯温伯恩仍然是他“唯一的诗人”，当然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❷

王尔德就读牛津第一年翻译了阿里斯托芬的《云》，这篇出色的译诗名为《云女的合唱》，斯温伯恩独特的节奏始终贯穿其中。王尔德也许认为出版译本的机会比原创诗歌更大。

让我们寻找无畏的瞭望塔楼，

那里有雨水滋润的谷田万顷；

女神们常去的河流喁语不休，

汨汨声中回响着海浪的歌声。❸

1875年夏天，罗斯金离开一个学期后回到牛津，王尔德再次找到他。他似乎在欣克西路上花了很多时间搞“挖掘”——打石头、铺路面；他甚至自称，“有幸为罗斯金先生本人的独轮手推车铲土”，并在这位伟人的教导下学习如何在木板上推动手推车（“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❹修路的那段日子，他很享受被邀请到基督圣体学院罗斯金的房间里用早餐的特权。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机会，可以听到罗斯金无与伦比的演讲，并与这位伟人建立起一种真正而持久的联系。这些场合也让王尔德和贝利奥尔学院既有的“挖掘者”小圈子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他们都是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比如阿尔弗雷德·米尔纳、阿诺德·汤因比、伦纳德·蒙蒂菲奥里和查尔斯·斯图亚特-沃特利。

王尔德也许正是在此期间通过罗斯金，结识了一位颇有前途的年轻艺术家弗兰克·迈尔斯。❶ 这是一段重要友谊的开始。迈尔斯只比王尔德大两岁，是一位独立、富有的圣公会高级牧师的小儿子。由于体质虚弱，他一直在家接受教育，对艺术、建筑、植物学和园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20岁出头就已经（和他的母亲一起）担负起一项卡农迈尔斯教堂（位于诺丁汉郡附近的宾厄姆的诸圣堂）奢华的装饰计划，以及为邻近的教区长官邸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花园。❷ 尽管他是色盲，却放弃了刚刚起步的建筑生涯，转而专注于绘画。1874年，他在皇家艺术学院夏季画展上首次亮相（展出作品名为《沉思》），因为对“美丽的女性头部”的着色及其“最完美、最迷人的表现力”而赢得声誉。❸ 1875年，他的绘画复制品出版并陈列在商店橱窗里，“大受欢迎”。❹

虽然迈尔斯一家在宾厄姆的教堂从事的工作可能在艺术构思上对罗斯金这样的史莱德教授很有吸引力（罗斯金在牛津的画室里陈列着迈尔斯夫人的作品，这说明母子俩可能去过那里），但是关于弗兰克·迈尔斯如何结识罗斯金，没有留下任何记录。❶ 毫无疑问，1875年，弗兰克已经赢得了这位史莱德教授浓厚的兴趣，并且与王尔德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博德利在5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王尔德和迈尔斯打来电话，这让我有点振奋”（博德利和王尔德随后与“菲茨”在奥里尔学院共进午餐）。“迈尔斯来了。他刚去过罗斯金那里，后者被他的几幅画迷住了。”罗斯金一直鼓励迈尔斯，给他写了好几封信，称赞他是“下一个特纳”，并表示“有了他对母亲的爱，以及他描绘云的能力，他必须继续前行”。❷

王尔德十分欣赏迈尔斯身上的某种都市魅力。他人脉广泛，温文尔雅，已经踏上了成名之路。那年夏天，他第二次在皇家艺术学院办展。他的名字登上了报纸。他认识伦敦的名人，会传出一些他们的内幕故事（博德利对亨利·欧文早年在金融城当职员的故事印象尤为深刻）。^①对于王尔德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兴奋地看到，在与世隔绝的大学世界之外，年轻人的才华和抱负可能会成就什么。

王尔德自己的视野也在扩大。暑假伊始，受罗斯金文艺复兴艺术讲座的启发，他第一次前往意大利。他很善于自我戏剧化，为这次行程准备了一条“非常引人注目的裤子”。他在圣三一学院的老朋友爱德华·沙利文（他临行前给沙利文打过电话）对这条裤子说了一些“嘲笑的话”，王尔德“用自己最拿手的故作严肃状，恳求他不要拿它开玩笑。‘这是我的特拉西美诺裤，我打算在当地穿这条裤子’。”^②

像牛津大学一样，意大利从一开始就吸引了王尔德。这个国家的一切化为一股合力让人的感官和想象力为之倾倒：美丽的风景、日常生活的色彩、跌宕起伏的历史和辉煌的艺术。他认识到，意大利是“我一生向往的地方”。^③王尔德在给父母的信中，孜孜不倦地详细记录了他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各个城市的游历经过——还经常配上插图——为父亲重点介绍考古学详情，为母亲着重描述人类戏剧。遗憾的是，关于他穿着“引人注目”的裤子去特拉西梅诺湖旅行的描述已经无据可考。现存的第一封信记录了他参观佛罗伦萨考古博物馆的情况，他敏锐地感觉到父亲会对伊特鲁里亚人的金器（甚至比爱尔兰的金器还要出色）产生兴趣。作为罗斯金的崇拜者，他赞赏地指

出，“每样东西，即使最普通的盘子或罐子，都出自极其精致和美丽的设计”。^②然而，正是在佛罗伦萨的教堂和画廊里——如他所言——他目睹了“意大利艺术的全部辉煌”。^③

王尔德在佛罗伦萨和马哈菲不期而遇，后者正同一个名叫威廉·古尔丁的年轻学生结伴旅行。他们三人一起去了博洛尼亚、威尼斯（“难以形容”）、帕多瓦（“古雅”）、维罗纳和米兰（“第二个巴黎”）。一路上既有美味佳肴（在米兰的Biffi餐厅），又有平庸的戏剧（维罗纳的露天圆形剧场上演了一出非常“冷漠”的《哈姆雷特》，斯卡拉歌剧院在上演一部“毫无价值”的新歌剧），还有文学朝圣（参观拜伦曾经住过的威尼斯潟湖上的亚美尼亚修道院，还去了据说但丁和乔托曾经共同住过的帕多瓦宅子）。而且，最重要的是，还要考察艺术和建筑。^④

王尔德在艺术上热衷的事物反映出他对罗斯金的景仰：威尼斯的哥特式建筑、乔托（尤其是斯克罗维尼教堂里“天堂和地狱的名画”，据说画家的灵感来自一位著名的客人）、弗拉·安杰利科、贝利尼和提香。然而，王尔德经常在判断中打上个人印记：他形容在米兰看到的画家伯纳迪诺·卢伊尼（另一位罗斯金喜欢的画家）作品《可爱的麦当娜》周围环绕着“莫里斯和罗塞蒂喜欢的缠绕在架子上的玫瑰”。在威尼斯，他最喜欢的画作是提香的《圣母升天》——“意大利最好的绘画”——和委罗内塞的《财主和拉撒路》，画中有他在旅途中看到的“唯一一张可爱的女性面孔”。^⑤他认为这座城市的巴洛

克式教堂“缺乏艺术性”，尽管比米兰林立的哥特式教堂要好——后者简直“糟糕透了”。^⑨

意大利的美需要诗意的回应。王尔德记录了（有可能真实，也可能出于想象）一段黎明前爬上佛罗伦萨城后面长着桃金娘的山头，去往文艺复兴早期的圣米尼亚托小教堂的经历。王尔德提炼出记忆中夜莺的歌声，将其嵌入一首感性的抒情诗，表达了对逝去的时间、爱，以及夜莺的遗憾：

圣米尼亚托

(6月15日)

—

看，我已从山边

攀登到神圣的上帝之所，

天使般的僧侣曾从这里走过

看到广为开放的上天。

城墙上的夹竹桃

在晨曦中变成深红，

夜晚的银色阴影

像枢衣覆盖着佛罗伦萨城。

桃金娘的叶子轻轻晃动，

那是微风忧伤地拂过

在杏仁香味的山谷里，

传来孤独夜莺的鸣声。

二

白天很快将使你沉寂

啊，夜莺继续为爱情歌唱。

然而在幽暗的树丛上

似箭的月光洒落下来。

穿过寂寂的草场

月光悄悄地在金色的薄雾中呈现

它向厌倦爱情的双眼隐瞒了

拂晓纤长的手指是怎样

攀上东方的天空

抓住并扼杀战栗的黑夜，

全然无视我内心的愉悦，

抑或夜莺就应该死去。 ①

虽然包括圣米尼亚托教堂在内，这首诗的背景似乎纯属偶然，而且“天使般的僧侣”弗拉·安杰利科也从未在这个“神圣的上帝之所”供职过，但二者的结合的确说明，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让王尔德获得了对“艺术精神”的一种全新鉴赏：一种意大利天主教传统的艺术丰富性与艺术和谐感。他满怀激动地邂逅了“通过色彩和光线传播的宗教光辉”。 ②

然而，享受“光辉”只能到此为止。6月底，王尔德因为旅费不足，不得不和同伴们分道扬镳。马哈菲一行从米兰南下去罗马，他怀揣“意大利及其灿烂的艺术”还有些许遗憾返回家乡。他在阿罗纳的马焦雷湖稍作停留，开始写诗，抱憾“未访”罗马——至少是在当时。 ③

他在爱尔兰度过了夏天剩余的时间。那里有各种触手可及的娱乐消遣。王尔德收到一位怒气冲冲的母亲寄来的责骂信，因为她走进客厅时发现17岁的女儿费迪莉亚正坐在奥斯卡的腿上。弗兰克·迈尔斯来到都柏林，送给他一幅铅笔素描巩固了两人的友谊：肖像上的王尔德眼神含情脉脉，光滑的脸颊上好像有两撇轻微的八字胡。 ④ 这幅画与那年夏天早些时候亨利·巴克斯顿·劳伦斯在西部为王尔德所作的肖像极大不同，后者将其描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农夫。王尔德去莫伊图拉

是为了寻求“和平、美德和宁静”——然而可能三者都被威利搅乱了，他也在那里，急于逃离自己在都柏林惹下的各种浪漫纠葛。他没有忘记诗歌。他的母亲正在为纪念丹尼尔·奥康奈尔百年诞辰创作一首爱国主义颂歌，奥斯卡推荐了其中几句。“你会得到丰厚的报酬，”他母亲开玩笑说，并把这首诗寄给了美国首屈一指的天主教报纸《波士顿先驱报》，“你还可以为我写几行优美的台词，加上热情洋溢的词和古代典故来赚点钱。”^⑩10月底，王尔德回到牛津（没留起胡子），他在前往霍利黑德的船上创作了一首中世纪民谣。《国王女儿的哀愁》讲述了一个关于致命的爱情和早逝的故事，其中洋溢着斯温伯恩、罗塞蒂和莫里斯的拉斐尔前派气息，开头写道：

七颗星在平静的水中央，

七颗星在天上；

国王的女儿有罪七项，

深刻在她的灵魂上。^⑪

回到莫德林，他分到一套位于回廊一层更好的新房间。窗外风景如画，墙壁上装饰着护墙板，可以远眺查韦尔河、水草地与河滨艾迪生步道。有些人认为这是“学院里最欢乐的房间”。^⑫王尔德要动手让它们变得更加欢乐。他虽然没有在装修计划中追求“奢华的异国情调”，但也确实展现出比普通大学生更丰富的品味——和更大胆的勇气。^⑬当他的大多数同学满足于在莱曼斯租画（“渡湖的牡鹿”、瑞士山脉，或“庸俗伤感”却又无伤大雅的“少女”画像）时，他挂起

了弗兰克·迈尔斯赠他的“一些非常漂亮的镶框画”，“大多是裸体画”。^①凡是平坦的地方都摆上了越来越多的小摆设，两个“巨大”的塞夫勒蓝色花瓶出尽风头。^②

这个环境优雅、陈设讲究的新环境显然提供了寻欢作乐的机会。王尔德不失时机地从施皮尔斯百货公司购买了六个葡萄酒杯、四个素色玻璃杯和四个苏打水杯。^③他开始为学院的朋友们定期张罗星期日晚上的聚会。这都是些“快乐和逗趣”的场合，但“并不喧闹”。桌上摆放着一杯杯潘趣酒，“长柄的烟斗里填满了上等的烟草”。王尔德那“爱尔兰人的好客”天性，从一开始就显露出“超出他的微薄收入”的趋势。屋里有一架钢琴，年轻而才华横溢的学院唱诗班指挥沃尔特·帕拉特——他也是共济会成员——常常受邀弹奏乐曲。唱歌是少不了的，王尔德的朋友乔姆利·琼斯后来成为著名的歌剧演员。“有时候，”一名客人回忆道，“大家的欢乐变成了扭打和嬉闹，主人的那些小玩意儿摇摇欲坠危险得很。”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恪守礼仪的。^④

那个学期，王尔德有很多事情要庆祝。1875年11月，《都柏林大学杂志》刊登了他的译作——阿里斯托芬的诗歌《云女的合唱》。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他的作品第一次印刷出版。诗下面署名为“奥斯卡·欧弗雷泰·威尔斯·王尔德”，还额外附加了说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⑤这首诗本身既是一项成就，也是对兄弟力量的一种肯定。过去三年里，威利一直定期在蒂勒尔教授的《科塔博斯》杂志上发表诗歌。^⑥然而，《都柏林大学杂志》相比之下更有分量。包

括王尔德的父母在内，许多爱尔兰最著名的诗人都曾经为其撰稿。尽管名为《都柏林大学杂志》，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份“大学”出版物，也不局限于都柏林。该杂志1833年创刊，副标题为“一份文学与政治杂志”，同时在伦敦和都柏林发行，90%的发行量在爱尔兰首都以外。①

不过，威利在其他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蓄着胡须，正如他母亲自豪地宣称的那样，他注定要“在社会和生活中大放异彩”。那年4月，他获得爱尔兰律师资格，王尔德夫人对她的朋友洛滕·冯·克雷默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像另一个珀修斯那样，冲出去跟邪恶作斗争。”不过，她接着说，他的野心是“进入议会——我想他的这个希望可能会实现，那里有一个合适的舞台来施展才华、口才，以及源自高雅文化和非凡的心理训练的力量”。②然而，王尔德夫人对另一个朋友的话语中却几乎不为觉察地流露出一丝微弱的担忧，“如果他愿意努力的话”，“想做什么都不成问题”。而这一点恰恰相当重要。③

威利已经表现出一种要把学生时代的放纵延续到新生活中的倾向。娱乐休闲比工作更吸引人。他“惯常”参加各种宴会和舞会，不是醉酒就是闹到深夜。他成了都柏林新建溜冰场的常客。他持续不断地调情和玩弄女性。王尔德夫人希望他能结婚，而且越快越好，但没有任何如愿以偿的迹象；那件导致他整个夏天远离都柏林的丑事，只是众多尴尬事件中的一桩而已。④连奥斯卡的牛津同学都知道有这么个“有失体面的熟人”——尽管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物。⑤

至于奥斯卡，他似乎准备至少要在某些“滑稽”的方面与他哥哥一争高下。1875年11月1日晚上10点左右，一名学监——名叫兰斯洛特·沙德韦尔的奥里尔学院年轻教师——被派往克拉伦登旅馆。他向学监同事J.R.瑟斯菲尔德（耶稣学院学监）讲述，自己发现有四个本科生“在咖啡馆吃晚饭”：奥里尔学院的菲茨杰拉德和哈特、基督教堂学院的贝利·佩顿·沃德，还有莫德林学院的王尔德。

我记下他们的名字，命令他们立刻或尽快吃完晚饭回到学院。……有人告诉我，他们整晚在街上游荡。他们对我的态度非常无礼，他们随便开玩笑，其主要方式似乎就是逼我提到他们要去的学院（即耶稣学院）的名字。他们不断地问我，“去哪儿？”，“去哪儿？”我告诉他们，菲茨杰拉德先生会通知他们的。[菲茨杰拉德（曾经）去过我的房间，是为了缴纳在米特雷餐厅用餐而受罚的1英镑。]

一刻钟后，沙德韦尔回来时，发现狂欢的人还是老样子。他命令他们立刻离开。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礼。“王尔德戴着帽子在餐厅里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直到我告诉他，合乎体统的做法应该是把帽子摘下来。”一名奥里尔学院的学生还点起了一支雪茄。即使按照本科生违纪的一般标准来看，这种行为也非常出格。沙德韦尔决定把这些犯事者交给瑟斯菲尔德去训斥，因为他发现这些人同样也在后者的名单上（也许是因为他们傍晚早些时候的荒唐行为）；他只是建议“这件事应该受到严厉处罚，他们应该在5日（烟火节）那天受罚不允许离开学校外出”^②。

这件事似乎标志着王尔德本科生涯的低谷和转折点。紧接着是一场“特别痛苦”的学监问话，而且——可以预见——还有一大笔罚款。然而，瑟斯菲尔德也许并非完全没有同情心。他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古典主义学者，当时只有30岁出头，他提醒王尔德“眼下就要评分审核”，让王尔德深刻意识到有必要全身心投入这些考试中去。⑨对于王尔德来说，这是一个及时的警告，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对成功的渴望。

2 心灵的渴望

你知道一切——我徒然探寻

用来耕种或播种的土地。

——奥斯卡·王尔德，《真正的知识》

莫德林学院有几个人在鼓励王尔德投入新的学习任务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威廉·沃德学习古典文学，比王尔德高一个年级，他的房间几乎就在王尔德的正上方，两人很快建立了友谊。沃德毕业于拉德利公学，家族前辈都是布里斯托尔的律师，在上一年的人文学科学位初试(Mods)中获得第一名。他的兴趣是哲学和共济会，但他喜欢用自谦的幽默来看待这些成绩。据另一名当时的莫德林在校生说，他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小家伙”。^①沃德有个绰号叫“巨人”，取自19世纪50年代描写牛津生活的伟大喜剧小说《青葱先生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Mr Verdant Green)中的一个矮小但活泼的人物角色。沃德不仅是王尔德的学术榜样，而且对王尔德的才智起到了衬托和激励作用。在“穿越绿林”的愉快旅程中，他“激发（王尔德）说话或思考”——甚至引导他嘲笑自己。^②让沃德感到好笑的是，事实证明王尔德是个“最令人震惊的骑手”——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论点，几乎每次出门都会从马上摔下来。^③

“巨人”沃德把王尔德拉进了他的莫德林朋友圈。这些人中包括哈丁兄弟、詹姆斯（与沃德同年的另一名古典主义学者）和10月刚刚

入学的雷金纳德。在这个大学朋友圈子里，年纪稍小的哈丁很快就获得了“小猫”的绰号，这个名字或许是王尔德起的，它来自一首歌曲《哈丁太太，我的小猫在你的花园里吗？》。他的哥哥被顺势叫成了“猫咪”。王尔德的外号是“霍斯基”(Hosky)。秋季学期结束时，“猫咪”哈丁和“巨人”沃德把“霍斯基”拉进了大学里另一个名叫“丘吉尔”的集会，加深了他对共济会的兴趣。⑩沃德还介绍他认识了一个性格和蔼的莫德林学生戴维·亨特-布莱尔，大家叫他“邓斯奇”，因为他在苏格兰有一处几乎与他绰号同名的家族地产。⑪

亨特-布莱尔立刻被王尔德迷人的个性吸引——“他那硕大的脸庞上闪烁着智慧，有一双闪亮的眼睛，洋溢着开朗的笑容”——被他“非凡的谈话能力”所打动。他们三个人——沃德、亨特-布莱尔和王尔德——经常在星期日晚上聚会的其他客人离开后，一直聊到深夜。据亨特-布莱尔回忆，他们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地谈论着“所有的事情”。王尔德“往往是这些午夜谈话的主角，抛出一大波……站不住脚的命题，对人和事情做出古怪有趣的评论，有时候……‘掺进几句诗’，滔滔不绝地加入大段的韵文，要么是他自己写的，要么是他喜爱的其他诗人的作品……我们一边听，一边鼓掌，争辩他提出的一些荒谬可笑的论点”。⑫

他们经常回归到一个话题：宗教。亨特-布莱尔是伊顿公学的老校友，也是男爵爵位的继承人。那年4月，他在访问罗马期间改宗皈依了罗马天主教。此时王尔德仍沉浸在佛罗伦萨艺术的精神之美中，对这位新朋友的举动“非常感兴趣”。他问了许多问题，并坦诚相告自

己早年曾经有过改宗天主教的想法——遗憾的是父亲曾经（而且仍然会）予以反对。“你真幸运，我亲爱的邓斯奇，你能独立于你的父亲，自由地做你喜欢做的事。我的情况完全不同。”^⑩ 尽管王尔德的态度像往常一样，“半开玩笑半认真”，但亨特-布莱尔确信他是真正地对天主教信仰感兴趣——并且表示赞同。

事实上，王尔德偶尔会和亨特-布莱尔一起去马斯顿路上的圣克莱门特小教堂做礼拜，那里有美妙的音乐和一名讨人喜欢的牧师。王尔德还陪同他的朋友参加了牛津新建的圣阿洛伊修斯天主教堂的落成典礼。教堂位于伍德斯托克路尽头，红衣主教曼宁在布道中引用了牛津校训“上帝即吾光”（Dominus Illuminatio Mea）。尽管曼宁的讲话——“对牛津的气氛和教学进行了一番猛烈谴责”——令王尔德相当沮丧，实际上亨特-布莱尔也深有同感，但这样的场合以及红衣主教都有一种无法阻挡的魅力。^⑪ 王尔德凌乱的房间里添加了一张曼宁的照片，还有一张廉价的教宗画像（庇护九世）和一尊圣母玛利亚石膏像。^⑫

“浪漫主义”也为王尔德提供了一种自我戏剧化的新载体。他“厌倦了装模作样的运动”，认为改变信仰——或者至少假定改变信仰——这件事情大有文章可做。最重要的是，这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一个全新而至关重要的主题。信仰和怀疑之间的斗争是一个极具价值的主旋律——在19世纪末可能引起广泛的兴趣。除了仿拉斐尔前派作品、希腊翻译和传统抒情诗之外，他开始创作“充满罗马天主教感觉的……个人诗歌”。^⑬ 他把他的诗《圣米尼亚托》改写成一首献给圣

母玛利亚的赞美诗（“只要我能瞻仰圣颜/就算立刻死去也心甘”）。他那首《未访的罗马》表达了他未能见到教宗的满腔遗憾（“掌管着可怕的钥匙的人……羊圈里温柔的牧人……上帝指定的唯一君王”）。

⑨

亨特-布莱尔受到这些迹象鼓舞。然而，圣克莱门特教堂的牧师虽然对王尔德本人印象深刻，却没那么乐观，他认为尽管王尔德“感受到了天主教信仰和实践真正的吸引力”，但时机并不合适——“上帝的手指还没有触及他”；当时，王尔德“除了在学校里取得成功的雄心壮志之外，对什么都不认真”，牧师指出，即便是学业，“他也一直摆在次要的位置”。⑩

王尔德虽然有自己的学业目标，但他并没有完全专注于课程。那个学期仍然有罗斯金的讲座，内容是“关于约书亚·雷诺兹的艺术谈话”。⑪这些讲座没有从前那么正式。罗斯金“涉猎的领域五花八门”——从恐怖的工业城市风貌到门德尔松无聊而优美的《鸽之翼》，雷诺兹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个由头”而已。尽管有些听众觉得讲座效果令人困惑，甚至有时候“荒唐怪诞”，但对王尔德而言，他又一次有机会沐浴在罗斯金雄辩的光耀之下。⑫

然而罗斯金传达的道德信息，现在遭遇到另一股截然不同的思潮。王尔德新近发现了沃尔特·佩特的作品。1873年，34岁的布雷齐诺斯学院古典文学教授佩特，出版了一本《文艺复兴史研究》。书中共分八篇，最重要的是“前言”和“结语”，将罗斯金的论述主题带入了新的领域——由法国作家泰奥菲尔·戈蒂耶最近开辟的新领域。佩

特在戈蒂耶的引领下，不顾罗斯金标榜的艺术与美的道德和社会要求，转而提出了一种纯粹感知的、实际上着重感官享受的接触世界的方式。面对现代科学所展现的持续变迁，他放弃了对确定性和绝对性的追求，放弃了对压倒一切的信仰体系的追求，退回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他信奉相对主义精神，认为人应该只关心自己转瞬即逝的感觉和印象。而且，由于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目标，他应该以最高程度的鉴别力，去全身心地体验最多的、最美妙的感觉：

经验本身，而非经验的成果，才是目的所在。纵使生活色彩斑斓、富于戏剧性，我们所获得的也只是有限的脉动。我们怎样用最细腻的感觉来领会其中所有应该被领会的东西呢？我们怎样以最快的速度穿梭于各处，总是出现在最强大的力量以最纯粹的活力结合的焦点呢？能永远和这强烈的、宝石一样的火焰一起燃烧，能保持这种极度的喜悦，是人生的成功。 ⑨

不断变化的生活中处处可以找到这种印象和感觉——“人的手或面庞呈现完美的形态，山峰或海洋出现格外迷人的色调，热情、洞察力或智慧的亢奋”。而最确定、最强烈的激情，不在于自然，在于“对诗歌的热情、对美的渴望和对艺术本身的热爱”——正如佩特所言，“当艺术降临时，它会坦言，除了在那稍纵即逝的瞬间，它会带给你美的极致的享受之外，不会再有什么”。 ⑩ 它是一种纯粹的美学信条，认为在追求经验的过程中，“抽象的道德”没有边界。如果说罗斯金是从道德的角度看待艺术，提出了为生活而艺术的观点；那

么佩特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待道德（以及其他一切），不仅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了为艺术而生活的观点。

这本书一面世，即便没有引发恐慌，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焦虑。人们认为它对年轻人尤其危险。牛津的主教甚至专门布道反对它。然而，这些非难不太可能吓退对其感兴趣的人。王尔德在牛津很早就发现了这本书，尽管他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揭开它的秘密。它及时地成为他的另一本神圣的教科书——“灵魂与理智的金书，美的圣经”。^①他喜欢书里庄重优雅的语言。他认为其中有一两页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散文”——他可以从中学到“艺术的最高形式：美之朴素”。^②尽管他认为佩特的思想部分源自罗斯金对艺术与生活之间重要联系的认识，但他也认识到，两人引领的方向截然不同。^③

佩特的审美偏好也别有特色。罗斯金在《威尼斯之石》中宣称，哥特式建筑在道德和精神上优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他在关于佛罗伦萨艺术的演讲中赞扬乔托和14世纪意大利早期画家胜过后来的诸多大师，然而佩特的观点大不相同。相比“早期”，他更喜欢“晚期”作品。19世纪的历史学家倾向于根据朴素发展、平衡完善和精细衰落的循环模式，标记出以往的文化发展轨迹，佩特则想在每个周期的后一阶段发现其价值和美。^④他在描绘文艺复兴历程的同时，赞许地聚焦于后期一些微妙地传达了反常和腐朽气氛的作品：如后期普罗旺斯诗歌“优雅、合宜的颓废”，或列奥纳多·达·芬奇艺术作为“美丽和可怖两个极端的混合”，其“腐朽之魔力”及其描述的“古怪的想法、奇异的幻想和强烈的热情”。^⑤对于王尔德这样的斯温伯恩崇拜

者来说，他不但充分理解对痛苦、陌生和腐朽之美的认可，而且认为它令人陶醉。

佩特在拓展审美潜力的同时，也暗示了另一种行为方式。他在关于18世纪艺术史学家约翰·温克尔曼的章节中总结了柏拉图的著作，但他没有像乔伊特可能赞同的那样描绘出一幅类似基督教精神生活的景象，而是间接地叙述了希腊人的“少年之爱”及其优点。^①这个话题仍然有争议。就在那一年，也就是1875年，马哈菲觉得有必要听从各种反对意见，从他的《希腊社会生活》第二版中删除所有涉及“少年之爱”的内容。与此同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也因在《希腊诗人研究》第二系列作品中不慎提及这一主题，招致了类似的批评。大多数古典主义者仍然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偏离。乔伊特自认为回避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声称柏拉图的“少年之爱”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对现代读者来说，很容易将其转化为对女性的爱：“如果（柏拉图）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自己就会做出这种转换。”^②

虽然在众人眼里，佩特的书很危险，但佩特本人却没那么危险。他沉浸在柏拉图描述的苏格拉底传统中，试图挑选一些聪明的年轻人到他和两个姊妹在北牛津合住的房子里参加茶会，从中寻求某种苏格拉底传统的味道。这种气氛微妙地模糊了教学法和“少年之爱”之间的界限。这是一场冒险游戏。早在1874年王尔德进入牛津大学之前，佩特就曾经卷入一桩被压制的丑闻，涉及他与贝利奥尔学院本科生威廉·莫尼·哈丁的关系。^③^④王尔德（或者其他非涉事者）是否了解该事件的细节，至今已经无从考证。蒙蒂菲奥里、米尔纳、汤因比以及

哈丁的其他朋友一致决定对这个问题保持“绝对的沉默”。尽管如此，佩特的名字中仍然残留着一丝危险的气息——而且很可能（对王尔德而言）因此增添了他的吸引力。

佩特和罗斯金、古希腊、共济会和罗马天主教：王尔德不断地积累各种宗教信仰和观点。但在百家争鸣的观点中，他似乎既不愿做出选择，也不愿寻求综合；他喜欢和它们轮流戏耍。虽然他可能在去圣克莱门特教堂改宗一事上犹豫不决，但宗教仍然吸引着他。12月初，他向博德利吐露，自己“在天主教（曼宁学说）和无神论之间摇摆不定”。^⑨从本质上说，他在牛津大学余下的时光里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他的表现引起了朋友们的兴趣、嘲笑和恼怒。

1875年圣诞节，奥斯卡回到爱尔兰。梅里恩广场的气氛并不愉快。威廉爵士的健康似乎每况愈下。他们甚至商量了要不要把房子租出去，全家人搬到莫伊图拉常住。^⑩奥斯卡逃离了这片阴郁，住到克朗芬的都柏林旧友理查德·特伦奇那里。这座房子位于朗福镇，属于特伦奇的叔叔和婶婶。“他们有马、狗、枪、好多食物和大量的威士忌”，想方设法“让日子过得相当愉快”。^⑪诗歌也有了一席之地。假期里，王尔德“摇摆不定”地从“天主教教义”中走出来，开始了另一项难以捉摸的拉斐尔前派实践，用甜得发腻的细节对他心爱的人进行了一番细节剖析：

红唇轻含洁白的碎玉

仿佛一劈为二的石榴，

她的两颊泛起淡红，

如同向南红透的鲜桃。

他返回牛津后完成了这首诗，题为《爱情的玫瑰，带刺的玫瑰》。蒂勒尔打算将其发表在即将出版的《科塔博斯》杂志上。❶当年王尔德共发表八首诗歌：四首在《都柏林大学杂志》上，两首发表于《科塔博斯》，一篇刊于《爱尔兰月报》（耶稣会杂志），另一篇刊登在《波士顿先驱报》上（这是他第一篇发表在美国的作品）。对于一个大学本科生来说，这是一个傲人的成绩。他的母亲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为这个家族“创作灵感尚在”而激动不已。她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显而易见的诗人天性”。她并非持不加批判的态度。在读了奥斯卡重写的《圣米尼亚托》第一节以及新的结尾部分之后，她发表意见说：“我会省略‘羞耻’这个词——罪恶和忏悔极具诗意，而‘羞耻’不是——任何其他单音节词都能表达道德上的软弱。”❷

啊，上帝用爱和火焰来加冕！

啊，神圣的基督来加冕！

啊，在遍照的太阳向世人

暴露我的罪恶与羞耻之前，谛听吧。

在爱尔兰读者看来，发表一系列作品证实了奥斯卡是斯佩兰萨的杰出后代。王尔德夫人在她的一次“午后”招待会上欣喜地赞美了王尔德的诗作。❸虽然这些作品只是发表在爱尔兰期刊上，却使王尔德

在同时代的牛津诗人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为了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又留起了长发。❶

他发表的诗歌中既有充满斯温伯恩情调的《爱的玫瑰》，也有优雅的抒情诗《从春日到冬天》——以最具诗意的鸟类，即画眉鸟(throstle)为特色的一首诗。（王尔德夫人曾经发问，“什么是‘throstle’？”）❷他还翻译发表了欧里庇得斯的《赫库芭》。但最经常反复出现的内容是对天主教的灵魂向往。它贯穿两篇“简短的丁尼生风格”作品（王尔德这样称呼它们），《咏愁，咏愁，但请让善长久》和《真正的知识》；它出现在他重新修改的《圣米尼亚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出现在他的诗歌《未访的罗马》中。❸

这些和宗教信仰有关的作品在都柏林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诗人奥布里·德·维尔（他皈依了天主教，是王尔德夫人的朋友）对这些诗歌很感兴趣，建议做些修改，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确保让它们发表。❹它们一出版就引发了谣言，而且越传越玄，称奥斯卡实际上已经改变信仰“皈依了真正而古老的教派”。❺这些作品的吸引力不仅限于爱尔兰首都。《未访的罗马》获得了红衣主教纽曼的“高度赞扬”，《新西兰简报》上甚至还刊登了一首匿名的赞美诗。❻不出所料，马哈菲对天主教就没那么热情了——“（他）说，‘这个没用，’”王尔德夫人写道，“第25行之前一切都好，之后就是胡说八道了。”❼

王尔德在诗歌方面的成就有效地分散了人们对他学业的注意力。虽然他很想考试中取得成功，但又不希望自己表现得太好。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业余诗歌爱好者”——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❽

然而，他的一些亲密朋友知道他在“偷偷地”努力。他常常躲在后面的小卧室里，在一堆看似“乱得令人绝望的”书籍包围下，一直学到下半夜。①复活节假期，他和莫德林学院的同学阿特金森一起熬夜阅读。学院里只剩下两个本科生，他们在彼此的房间里吃饭（非常糟糕），最后终于意识到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然后便各吃各的饭了。一天晚上，王尔德在大厅里逗乐地对阿特金森说，即使独自一人在荒岛上，他也要穿戴得体地用晚餐；也许就孤独地用餐而言，他说话是算数的。②

梅里恩广场传来的消息打断了他的学习进程：威廉爵士病得很重。奥斯卡回到家，发现父亲卧病在床，身体明显日渐衰弱。他只有61岁。王尔德夫人在记录中写道：“没有痛苦——感谢上帝，没有遭受折磨”；只有“安静和宁静，力量日渐衰退”。③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破坏了病人房间里肃穆的景象，每天早晨都会来一位“身穿黑衣，蒙着面纱”的女人。包括王尔德夫人在内，没有任何人阻拦她，她走进房间，静静地坐在床头。她是威廉爵士的情妇之一（可能是他死去的两个女儿的母亲），然而王尔德夫人已经超越了“庸俗的嫉妒”，丝毫没有表示反对。奥斯卡赞赏地说，这并不是因为她不爱她的丈夫，而是“因为她非常爱他”，并认识到有这个女人在场对他来说是一种“安慰”。④虽然有恶意的谣言说奥斯卡和威利来晚了，并且上楼时拖沓嘈杂，吵得他们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都很难过，但是1876年4月19日下午，大家都守在病榻边，王尔德夫人握着威廉爵士的手，看着他静静地离开了人世。⑤

现实的需求暂时掩盖了当下的悲痛：都柏林举行大型公开葬礼，市长及医学和古物学方面的显要人物纷纷出席；有许多慰问信需要回复，还有报纸要阅读；尽管一家新创刊的英国社会周刊《世界》杂志称，“伦敦的报纸一般很少关注”这位“最善良、最和蔼的爱尔兰人”去世的消息，但爱尔兰媒体纷纷刊登充满赞美之词的讣告。❶然而无法否认，威廉爵士之死真是令人痛苦而且可怕。王尔德夫人痛失亲人，她向一位朋友吐露道，感觉自己“就像一艘失事的船”，“泪水模糊了”双眼，脑海里充满了忧伤困惑的焦虑和担心，她的生活“支离破碎（而且）凄凉”。❷奥斯卡也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尊敬和爱戴父亲，珍惜他的认可和建议。❸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试图把这种失落感转化为诗歌，希望——除了其他方面之外——威廉爵士头顶的“荣耀”能掩盖儿子的诸多不足：“在你认为我不坚强的地方，我是软弱的/你装作愚蠢，却让我变聪明。”❹

除了情感上的痛苦，其他问题也接踵而至。查验威廉爵士的遗嘱时，人们发现他几乎身无分文。❶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威胁到王尔德一家稳定的家庭生活基础。人们一直以为威廉爵士是个有钱人，事实上，在他事业的巅峰时期，他每年能挣3000英镑左右。但他向来不节俭，在都柏林大肆招待客人，并将大笔资金投入雄心勃勃的建筑计划和慈善项目上。过去几年里，他专心于研究工作，经营莫伊图拉庄园，忽视了自己的医疗事业，把大部分工作留给了他的私生子亨利·威尔逊。正如王尔德夫人感叹的那样，他没有赚到钱，而是一直靠吃老本生活，“直到一切都消失殆尽”。❷他在去世前不到一年，申请了两笔1000英镑的大额贷款，一笔用梅里恩广场的房子作抵押，另一

笔用布雷的房产作抵押。❷这些钱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至今仍然是个谜，但它确实已经不存在了。❸他没有给家庭留下一笔可靠的遗产，而是留下了“大笔债务”，几乎没有钱可以用来偿还。❹

1862年威廉爵士从他和妻子的婚姻财产契约中得来的2500英镑已经完全“埋没”在莫伊图拉。❶威利作为长子，继承了莫伊图拉的房产和梅里恩广场的房子。王尔德夫人可以在有生之年，一直享受莫伊图拉庄园的租金。然而，这些钱每年仅150英镑，远远低于威廉爵士向他的遗赠人承诺的每年200英镑。即便这个数额也还得取决于实际支付的租金——在那个爱尔兰农业萧条、租户反抗的时代，几乎难以收到租金。

奥斯卡继承了布雷的四栋房子和一半的伊劳恩罗垂钓小屋（与亨利·威尔逊共同继承），他还得到了克朗费克尔（位于阿马郡）的一部分房产，那是通过马图林家族得来的财产。❶成为业主固然让人兴奋，但事实上布雷的房产（和梅里恩广场一号一样）已经被大量抵押。利息（可能还有本金偿还）虽在下降，却没有钱可用来支付。❷

威利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律师，收入还不及偶尔的一笔支出高。王尔德夫人的写作几乎挣不到什么收入（《都柏林大学杂志》曾经刊登过几首她哀悼威廉爵士的诗，但后来便不再向撰稿人支付稿费）。❶她因悲伤、忧虑和疲惫而感到全身无力。她希望政府能够给她一笔退休金，要么以她自己的名义，要么以表彰威廉爵士对爱尔兰公共生活所作贡献的名义。然而，曾经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显然对她不利。当得知英国首相迪斯雷利要求获奖者“忠诚、正统、有道德，并且要

赞美英国人！”时，她说：“永远不可能——让我堕落到这个地步。想想吧！我曾经在自由的祭坛前当过女祭司！”^①

“这一切就是场可怕的梦，”她对奥斯卡说，“如果我像你一样年轻，我会带个学生一起读书。年轻人可以挣到钱，上了年纪就赚不到了。”^②然而奥斯卡忙于准备考试，无暇顾及招收学生。尽管布雷的房子可以提供一些租金（一旦出租，每年的租金高达120英镑），但他现在需要钱来支付他在牛津的生活费用。家里没有人了解或愿意处理这种情况。债务还在持续累积，支出仍在继续增加。商人们被拖欠了费用。当法警赶到梅里恩广场时，王尔德夫人揣着她的《埃斯库罗斯》离开了客厅。^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奥斯卡逃回牛津，准备参加人文学科学位初试——以及必须参加的（通常是令人生厌的）“神学”口试。古典文学考试从6月2日开始，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包括即席翻译、考据学、历史随笔以及散文和诗歌写作。^④王尔德曾经师从马哈菲、蒂勒尔和J.A.西蒙兹，习惯于把古代和现代世界融入一段对话中，他欣喜地发现牛津的考官们也鼓励从同样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样他就可以将自己的古典文学学识与他对当代诗歌的热爱结合在一起。不过，他对自己在逻辑试卷上的表现没有自信，甚至担心可能没有希望拿第一名。^⑤

学校方面则对他比较有信心。考试结果要过一个多月才公布，但王尔德的勤奋备考得到了认可。他在6月16日的期末考试中获得“特别表彰”（自从第一个学期的失败后，他一直位居“被表彰”之

列)。带着这份认可，再加上折磨人的考试已经烟消云散，王尔德全身心地投入了牛津的缤纷夏日。

“纪念周”即将到来。到时候会有早餐、野餐、郊游、晚餐和舞会，还可以招待女性同伴。沃德的母亲和姐妹（格特鲁德和弗洛伦丝）、哈丁的母亲和妹妹（“小孩子艾米”）及一名德国朋友一起来参加“纪念周”活动。王尔德花了很多时间和他们在一起。他带着沃德家人参观了各个学院（王尔德对“小猫”哈丁说，“伍斯特教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让我心醉”）。他们参观了威廉·沃德的母校拉德里，在那里打草地网球。王尔德“非常喜欢”沃德太太，同时发现姐姐格特鲁德“确实很迷人”。在一次前往布伦海姆（当时，刚刚19个月的温斯顿·丘吉尔正躺在摇篮里）的集体郊游中，他明显地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招来旁人的议论。❶在阿尔弗雷德共济会举办的一次舞会上，他的深情让弗洛伦丝·沃德印象深刻——或者是逗乐了她。“我觉得王尔德认为我很幼稚，”她在日记中写道，“他试图通过问一些问题来让我感到困惑，比如‘我是否觉得这个世界很空虚？’”❷

沃德在房间里举办了一场小型晚宴，他和“小猫”哈丁因为要参加莫德林的音乐会而提前离开后，王尔德“成了主人”。他不得不想方设法对付艾米·哈丁，后者因为喝多了——“状态非常好”。两天后，他设宴回请大家。❸王尔德是个一丝不苟的主人，他坚持让“伙计”（他在大学里的仆人）穿上毛毡拖鞋，并把后面的卧室用作食品间，这样就听不到软木塞从酒瓶里拔出来时那种不雅声音。❹

尽管王尔德为世界的空虚感到焦虑，但一种具有感染力的欢乐精神占据着主导地位。牛津大学摄影师古根海姆费了好大劲在莫德林修道院拍摄了一张大型集体照——其中包括沃德家人、王尔德和其他许多学生——因为人群不停地发出“爆笑”。一位参加布伦海姆郊游的年长者对莫德林人津津乐道的善意玩笑感到惊讶不已——并且予以了容忍。这样的玩笑有很多：用软管喷苏打水，按邮政喇叭，男扮女装。那一周，在王尔德举办的另一场午餐派对上，他的一名大学同学(Bulmer de Sales la Terrière)早早到达后，发现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于是他偷偷地用手里的“几张邮票”给装饰在墙上的弗兰克·迈尔斯的裸体画像“穿上了衣服”。午餐开始后，人们注意到了这张画。席间有几位女士。这位恶作剧者回忆道：“第一个人抬起头，咯咯地笑着，脸涨得通红，然后是另一个人，直到整个派对都笑翻了。”王尔德也笑了。①

王尔德在考试结束后的那段悠闲时光里，又见到了弗兰克·迈尔斯。6月初，他带着一位新朋友罗纳德·高尔勋爵（他们是在米莱举办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到牛津待了几天。高尔30岁，是萨瑟兰公爵的小儿子；他新近放弃了自由主义政治道路，转而在雕塑和写作上挥洒激情。迈尔斯把他带到莫德林；高尔在日记中写道：“我在那里结识了年轻的奥斯卡·王尔德……他是个令人愉快，活泼开朗的家伙，但是他那留着长发的脑袋里充斥着有关罗马教会的胡言乱语。”②

王尔德对这次邂逅印象更为深刻。高尔是个极富魅力的人物：温文尔雅，打扮时髦，人脉广泛，“英俊潇洒，出身高贵，家境富

裕”。他是一个真正有艺术造诣的人。❶ 他的文化情趣兼收并蓄，引人入胜。他新近出版了一本荷兰和比利时艺术画廊指南，一套16世纪法国宫廷艺术家克鲁埃自制的石版画肖像作品，并为了一本关于放荡不羁的诗人罗彻斯特伯爵生平的书撰写了序言。❷ 他很有趣，尽管他——起初的时候——曾经试图用嘲笑和讽刺的天赋，扳回王尔德的“天主教倾向”。❸

如果说弗兰克·迈尔斯的友谊让王尔德得以初涉令人兴奋的伦敦“社交界”和文化圈，那么罗纳德·高尔勋爵让他加深了这层联系。尽管它似乎离得越来越近，却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领域。不久之后，王尔德经过伦敦时拜访了迈尔斯，发现他正在为“伦敦最可爱也最危险的女人”德萨特夫人画像，王尔德非常激动。❹ 这暗示了一种罕见的危险刺激。学院口试之前，王尔德大部分时间都是去林肯郡的霍恩卡斯尔附近，拜访在西阿什比担任教区牧师的伯父约翰。他在牧师家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夏日，全身心投到乡村教区的生活中，“考察了地理和历史方面的学校，唱着歌，吃着草莓”，使自己成为“茶话会的‘中心人物’”，还打了好多草地网球。❺

“我伯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温和，”王尔德对沃德说，“他一天要说六次，‘天哪，难道你不觉得发平信比电报更方便吗？’”尽管如此，侄子公开表达了对天主教的兴趣后，他感到很愤怒。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之后“作为报复，他星期日早上布道讲罗马，晚上布道劝人要谦卑”。❻

7月3日王尔德回到牛津，他给自己留出几天的时间——如他所愿——为口试做准备。但第二天早晨，他躺在床上读着“（一本）斯温伯恩的书”时，学校的办事员把他叫醒了，问他为什么没去参加口试。大约1点钟时，他到了学校，“神学很快就考砸了”。这次失败也算是种荣誉；显然，“如果有人第一次就通过‘神学口试’，那才是不正常”。^①

古典文学的口试部分进展得相当不错：关于《奥德赛》，双方讨论了“一般的史诗，狗和女人”；关于《埃斯库罗斯》，他们谈到了“莎士比亚、沃尔特·惠特曼和诗学”；接着是一场“令人愉快”的讨论，内容是他写的一篇关于“亚里士多德论文中的诗歌”的文章。

^②当博德利得知主考人问王尔德“亚里士多德会对沃尔特·惠特曼说些什么”时，他立即打赌说“奥斯卡要么被淘汰，要么得一等”。^③博德利很走运，幸亏王尔德没有下赌注。他早就从口试提问中判断出，自己已经稳稳地名列一等，并且——他对沃德说——自己在面试中“昂首阔步”。他的论文确实鹤立鸡群，是那年最出色的论文。^④

两天后，《泰晤士报》证实了这一消息。这是一份真实的、令人满意的成绩。王尔德被“淹没”在电报和贺信中。他的母亲“非常开心”。王尔德却不断地想起父亲“要是知道这消息该多高兴啊”。他夸大了这种真实的情感，并对沃德说，“我认为上帝对我们有点太严厉了。它剥夺了我第一次真正的快乐。”^⑤

事实上，快乐从未走远。王尔德在伦敦逗留了几天，看望了牛津大学的朋友们，参观了动物园，还去“代主教座堂”（Pro-Cathedral）

聆听红衣主教曼宁布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吸引人”）。王尔德意识到自己还在继续“摇摆”，于是宣布：“我必须做出决定。”但是他什么也决定不了。❶

然后，他带着一个崭新华丽的“上等摩洛哥皮”旅行包，和迈尔斯一家在“宾厄姆教区这个魔法岛”住了一个星期。❷王尔德被那里一切美丽的东西所吸引：花园里有白色的百合花和长长的玫瑰小径（“只要没有蛇和苹果，这里就是伊甸园”）；装饰华丽的教堂（“简直漂亮极了”）；还有弗兰克的四个姐妹（“的确都很漂亮……她们个个让我满怀钦慕，我的心都碎了”）。❸他让自己变得“魅力十足”，草地网球打得更勤了（“我打得非常好”），还参加了更多的露天招待会，多吃了好几篮子草莓。❹事实证明，弗兰克的父亲卡农·迈尔斯是一位趣味盎然、见闻广博的同伴，作为一个“高级圣公会教徒”，他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就认识曼宁和纽曼了。❺

红衣主教纽曼与曼宁魅力不相上下。王尔德认为他是天主教會的“伟人”之一——“就像圣奥古斯丁一样，既是一位优秀的哲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基督徒”。❶王尔德的幻想之一是，有一天去拜访纽曼，由于无法抗拒“那个神圣的人”，最终“我的灵魂就会获得安详和平静”。王尔德虽然相信一次面谈也许会导致他真的采取行动，但这也让他怀疑这样的面谈是否真的会发生；他没有勇气。❷离开牛津大学之前，王尔德购买了纽曼的几部作品，计划在暑假期间阅读。❸但这段神学研究中，似乎一直存在着许多矫揉造作之处。关于

阅读纽曼的作品，他保留下来的只有一段关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窗下金鱼草”的记忆。⑨

回到都柏林，其他方面的需求和兴趣很快引开了他对天主教的虔诚。他和“亲爱的马哈菲”在霍斯待了一段时间，帮他修正新书《希腊漫谈与研究》的校稿。他还另外做着其他文字工作，编辑他父亲未完成的作品——一部关于爱尔兰地形画家加布里埃尔·贝朗格的“回忆录”，着手撰写一篇有关J.A.西蒙兹的《希腊诗人研究》（第二系列）的评论。他花费更多的时间打网球，定期泡海水浴；他承认，“泡在海水里的时候，总是有点觉得自己要成为不朽人物”。有时在傍晚时分，他会骑马外出兜风。⑩

王尔德在布雷的房产也是个问题。他错过了6月的销售旺季，但咨询过律师之后，他决定在9月初分四批拍卖出售这些房产。不过与此同时，他还得花钱在报纸上登广告。⑪8月的第二个星期，弗兰克·迈尔斯到访，使他得以摆脱这些现实的烦恼，两人一起去西部享受了两周的体育和娱乐活动。

王尔德陶醉于美景，感觉自己立刻“年轻了好几岁”。他们在莫伊图拉的湖上划船、绘画。迈尔斯画了一些“极美的日落”，王尔德在他的鼓励下，模仿创作了一幅极有悟性的科里布湖黄昏水彩画，紫色的群山环抱下，湖上点缀着几座岛屿。⑫两人继续前往伊劳恩罗，王尔德希望迈尔斯——后者这辈子从未开过一枪——“钓到一条鲑鱼，杀死一对松鸡”。结果，他们收获了海鲱鱼和野兔。这其中也许并没有多少是迈尔斯的功劳；他把精力用在了一幅壁画上，在这幅颇

具传奇的《绳儿变紧》中，他把自己和奥斯卡描绘成两个垂钓的天使小渔夫。王尔德夫人曾建议他们在日常饮食中添加“荨麻碎”，用它“做一杯好酒”或“像吃菠菜一样”食用。❶

每逢天气“过于晴朗不适合钓鱼”时，王尔德会不情愿地放下“鱼竿和枪”，拿起他的“羽毛笔”。他开始写关于西蒙兹的评论——但始终没有写完（贝朗格的回忆录一直没有动笔，后来由王尔德夫人接手）。王尔德对西蒙兹作品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有关荷马史诗中的女人那一章。当然，王尔德当时心里也想着女人。那是一个浪漫的夏天。宾厄姆曾经有过可爱的迈尔斯姐妹。伦敦最吸引人之处是一个被牛津学生描述为“你那面带微笑的小朋友”的女孩。❷也许她就是那位“伊娃”，王尔德从她的堂兄那里收到一封冗长、杂乱、充满诡计的信，打听他的“意图”，并提出要进一步提起诉讼。❸去往莫伊图拉前不久，他在都柏林遇到了“一个漂亮非凡的女孩”——弗洛伦丝·巴尔科姆，一名退休陆军中校的18岁女儿。王尔德告诉“小猫”哈丁，她长着一张“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脸，而且一分钱也没有”。这注定是一段没有结局的罗曼史。❹

王尔德送给她一幅自己在莫伊图拉画的水彩，为她画了一幅迷人的小肖像画，并且——在那一年的早些时候——送给她一个刻有他名字的银质十字架（他们最初的约会之一是在都柏林圣公会大教堂参加下午的礼拜仪式）。❺然而，奇怪的是，王尔德似乎并没有急于为他的新欢写诗。他写过一首未发表的“情歌”，以及一些未完成的性感幻想作品，但是很难将它们与哪个人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这位精致漂

亮的巴尔科姆小姐。①或许，王尔德潦草的牛津笔记本上那些日后的警句格言中还留存着一丝她的印记：“爱——是一种庄严的毒药。神赐给我们酒，叫我们在路上遇见他”；“爱在一定程度上一直是种误解”；以及——那句更不靠谱的——“爱情本身就是最糟糕的误解”。②

不过，他可能真的看上去像个坠入爱河的诗人。9月初，他送威利坐船去英国时，“倚着舷墙眺望大海”，显得非常浪漫的样子。威利把他介绍给一个女孩，试图给对方留下“我的诗人弟弟”的印象。

③④ 奥斯卡也许希望自己也去旅行。他计划与弗兰克·迈尔斯和罗纳德·高尔勋爵（“我们本该组成一个特别棒的三位一体”）一起去罗马，但高尔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行程。奥斯卡被迫待在都柏林——安慰自己，也许“弗洛丽”也在场——然后北上去克朗芬，进行假期结束前的最后一轮“运动”。⑤

王尔德在饱受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开始了在牛津大学的第三年学业。四套布雷的房产在拍卖会上未能达到3500英镑的底价，因此仍未售出。它们非但没带来钱，反而还加大了开支。也许是在代理人的建议下，一项修理计划就此展开。王尔德从当地承包商那里收到了一份令人望而生畏、长达六页的估价，其中包括“油漆、墙纸、修复和增白天花板等等”。作为一名当地的业主，他觉得有义务在“去年布雷遭难之后”⑥为“怀特的遗孀和孤儿”基金捐款1英镑。奥斯卡写信给母亲惋惜地说，自己必须放弃获得学院研究员职位的想法，因为即便获得了这个职位，他也负担不起。

王尔德夫人当时正被更为严重的经济问题所困扰，对此并不以为然。她的回信写得有些生硬：

如果你不得不寻求一份卑贱的职业，放弃获得研究员职位的机会，我将会感到遗憾。但是迄今为止，我觉得你的处境还没有到需要怜悯或同情的地步——从5月以来（才五个月），你在私人零花钱上就拿到了145英镑现金，还有布雷湖别墅的租金，卖家具的钱也许可以让你一直生活到明年春天。然后，你还可以把房子卖掉，获得3000英镑。其中的2000英镑（在偿还抵押贷款后）足以让你在今后十年内每年获得200镑。在我看来，这简直相当充足……手上有2000镑可是一大笔钱——外加你在学校的收入，我觉得你没必要去打工挣钱，或是为了面包求人——事实上，我非常高兴你能如此富裕。⑩

作为财物建议，这封信展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缺乏远见：王尔德夫人的财产规划似乎就是以固定的速度花钱，并希望在金钱完全耗尽之前出现转机。然而，奥斯卡和威利都准备从原则上接受这种方法。值得怀疑的是，奥斯卡是否认为每年200英镑的收入算是“足够”——甚或只是“够用”。他挥霍的项目中，包括一套进入共济会阿波罗玫瑰十字分会(Apollo Rose Croix Chapter)所需的精美行头，他当时已经“完美地晋身到了第十八级”。他花费13英镑多购置了一套特殊的“围裙和领子”、“珠宝”、剑、腰带和剑带，还买了一个饰有浮雕图案的盒子。⑪

经济上的拮据促使王尔德放眼学术以外寻求未来，但这并非唯一的因素。虽然他也知道获得牛津研究员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极

大的荣誉”，但他在文学上的最初成就、他与迈尔斯和罗纳德·高尔勋爵的接触，以及他对伦敦与日俱增的了解，都使他渴望登上一个更大的舞台。一天晚上，沃德和亨特-布莱尔——两人都已到了最后一个学期，并且一直都在考虑自己注定要从事的职业，分别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律师”和“一个苏格兰地主”——询问王尔德未来的抱负时，他突然严肃地回答说：“上帝知道，我无论如何不会成为一个干瘪的牛津教师。我要成为诗人、作家或剧作家。不管怎样，我会流芳百世，如果不能流芳百世的话，就遗臭万年。”接着，他又回到现实，自我肯定地说：“也许我会在某段时间里过着愉悦的生活，然后——谁知道呢——就整天休息，无所事事。柏拉图说过，在人间，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坐下来想想美好的事物。那或许也是我的目标。” ⑨

沃德的期末考试（那年11月他参加了考试）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尽管他的哲学论文写得很好，却没有如愿拿到第一名。王尔德安慰他说：“做好值得做的事情就是伟业。”他仍然希望沃德能回来读书，获得研究员职位。然而，沃德已经决定离开牛津前往意大利。王尔德和“小猫”哈丁送给他一枚金戒指作为离别赠物——“纪念友谊”。

⑨ “巨人”离去，对王尔德的莫德林生活来说是一种损失。

3 希腊！

上帝的灵魂仍然存在于大理石中。

——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利用一切机会继续探索牛津以外的世界。秋季学期结束后，他在返回都柏林过圣诞节之前，投身伦敦的文化圈。他参观展览，听音乐会；最要紧的是去剧院。绘画艺术和音乐尽管很吸引人，但戏剧和演员在他的言谈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亨利·欧文。欧文在兰心剧院扮演的麦克白令他印象极为深刻。据爱德华·沙利文回忆，“他被它迷住了”；尽管他担心一般公众“可能也会受到类似的感动——他称，这会破坏他从一场非凡的表演中所获得的享受”。^⑨

王尔德带着新朋友阿瑟·梅去温莎拜访罗纳德·高尔勋爵，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他各方面都很迷人，是个出色的艺术家，”王尔德告诉哈丁，“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⑩高尔的新“窝”配备齐全，坐落于温莎公园旁边，里面摆满各种漂亮而奇特的玩意儿：精致的法国家具、古老的大师画作、18世纪的肖像画，还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一把扇子。^⑪室内装饰不仅是罗斯金，也是拉斐尔前派一直从事的主题，王尔德正逐步在这个领域形成自己的想法。他们渴望摆脱设计蹩脚、批量生产的丑陋家具，以及机器制造的装饰物和奢华招摇的炫富风格，因此莫里斯、罗塞蒂和伯恩-琼斯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合力对莫里斯位于贝克斯利希思市的“红房子”进行了一番类似中世

纪风格的装饰，设计了彩绘坐垫、装饰性壁画、雕花桌和刺绣壁饰。三个朋友都参与了莫里斯此后成立的公司，生产家具、配件、织物、彩色玻璃和墙纸，这些物件反映出他们对旧时代强烈的共同爱好，以及对传统手工技艺的尊重。

莫里斯公司从小众品味起步，在少数富有的老顾客支持下，装饰业务渐渐铺开，开始受到关注。公司最初接到的委托业务之一是为全新的南肯辛顿博物馆（现在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做餐厅设计。19世纪7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中等收入但品味较高的人士开始使用莫里斯公司设计的织物、纸张和家具，以及精心挑选的古董、现代和东方摆件——以一种所谓的“审美”风格来装饰他们的房间。

及至1877年，有关这种装饰风格的各种独特元素已经有了充分的定义，足以拿出来陈列展示——并且接受嘲讽。那年9月，《笨拙》杂志的室内装饰专家“费尔南多·F.埃米内特先生”出版了一本有关审美时尚的装潢指南。他解释说：“这是一个宽泛的术语，但我可以说，唯美主义的结果就是把年代久远的古怪玩意儿、暗淡褪色的颜料、各种稀奇古怪与令人不适混在一起。”他还详细列举：“灰绿”和“暗黄”的配色方案；在裸露的地板或席子上铺陈“最沉闷的灰色调地毯”；“奇形怪状的”窗帘；“阴暗或病态的背景”墙纸加“蜘蛛网一般的”设计；角落里放着“代尔夫特蓝陶器”；至于绘画作品嘛，“E.伯恩·琼斯，或者惠斯勒的夜景画，随便哪个都行”。

如果说与这种先进的装饰风格关系最密切的是伦敦西郊新开发的布朗普顿，那么它在北牛津也相当流行，许多教师的新婚妻子——“急于跟上时代的步伐”——给房子配上了“莫里斯墙纸、旧箱子、旧橱柜和蓝色的瓶瓶罐罐”。^①这种风格并不局限于家居装饰的细节。有一种理解是，用暗色调和莫里斯墙纸装饰客厅的所谓审美观，是追随了一种新的信仰，那是一种对文化和艺术（中世纪、东方或希腊）价值的“狂热”信念。它还体现在“怪异的穿着打扮”上——女性穿着飘逸的长袍；男士穿天鹅绒夹克或披风——男男女女“头发蓬乱”；操着深奥难懂的术语（喜欢用“激烈的”形容词）；“普遍表现出一种疲惫的激情”。^②

王尔德沉浸在拉斐尔前派的想象中，本能地紧跟时代潮流，成为它的虔诚信徒：一位新近结交的朋友描述他“极度地具有审美趣味”。尽管他的热情溢于言表，看不出有什么“疲惫的激情”，但说起装饰，他现在“疯狂地爱上了合成色、灰色调，以及莫里斯墙纸”。^③沃德离开后，王尔德在1877年初搬进了他那套位于二楼的精美三居室，开始忙活如何把它们布置得更美。他在污迹斑斑的地板上铺了一块刚好合适的“中性”灰地毯。虽然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在壁板之上贴了莫里斯壁纸，但他确实在套间“内室”放满了瓷器、照片、成套的绘画（没有镶框的作品）和一架钢琴。他买了一些“威尼斯酒杯”、六个“深红色香槟酒杯”和一对绿色的“罗马尼亚红酒醒酒器”。他向沃德坦言，整体装饰很受欢迎，但到了星期日晚上会受到一点点嘲笑。王尔德一直保持着星期日晚上招待客人的习惯——为了充分展现房间的富丽堂皇，他还经常安排“早餐、午餐等”。^④

然而，他发现自己在大学里缺少一个令人振奋的同伴。他向沃德抱怨，“小猫”哈丁虽然很有魅力，但“从来没有对我的才智或大脑施以任何影响”。王尔德曾经对“花枝招展的”克雷斯韦尔以及莫德林学院的某些新生抱有希望，前者和沃德一样毕业于拉德利公学，而且擅长“心理学”，但大多数年轻人虽是“极好的同伴”，却多半说的都是“废话或下流话”。^①

面对这番天真幼稚，艺术——凭借其沉思和创造——成为一种赏心悦目的逃避方式。王尔德隐居在他“魅力十足”的新房间里，享受着“阳光、鸟鸣，树影婆娑和窗边的微风”，“除了写写十四行诗，胡乱作几首诗之外，什么也没干”。他必须在前一年取得的文学成就之上有所作为。事实的确如此。1877年，王尔德又发表了十二首诗，其中两首是十四行诗。他认为，对于像他这样的年轻诗人来说，十四行诗的形式和固定的押韵模式既是一种极好的练习，也是“实力的考验”。^②

然而，对美的热爱并不仅仅局限于书本、画布、音乐厅以及装饰房间的细节；它可以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西蒙兹曾经在他的《希腊诗人研究》(1873)中敦促读者寻访“清晨男孩们沐浴的田野，夏日的公立学校操场，或者到伊希斯河岸上观看往来穿梭的划船队”，从中“寻找”它们与希腊雕塑之美“活生生的共鸣”。^③王尔德完全接受这一理念，于是他到田径场上观看运动员训练，并称某一位运动员的“左腿是一首诗”。^④3月的大学体育运动会上，他特别提到F.布洛克·韦伯斯特在3英里赛跑中的表现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事情”。

❶这种自觉的希腊式崇拜并不局限于田径场上；不久，王尔德又赞美了一名莫德林新生的“希腊面孔”——“希腊”在他的美学词汇中成为一个表达认可的关键术语。❷

持有类似观点并不止他一人。在牛津，颂扬男性之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1880年，布雷齐诺斯学院学生查尔斯·爱德华·哈奇森撰写了一本关于“男孩崇拜”的匿名小册子——声称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自觉的“唯美主义者”，而且在运动员中间也有许多“热心的追随者”（“男孩”这个词似乎很宽泛，既包括大学运动代表队的划桨手，也包括学院小教堂的唱诗班歌手）。尽管有人也许会说这份狂热是一种审美思考，但它有可能逐渐演变为性渴望，甚至性接触。毕竟，许多大学生都来自大型公学，在那里男孩子之间的性关系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王尔德当然了解这种可能性，但他并不赞同。当他发现莫德林学院的查尔斯·托德和一个唱诗班的男孩坐在剧院的私人包厢里，便写信告诉沃德：“在我们的朋友托德的道德晴雨表中，他的道德标准到底在哪个高度？我个人认为托德是极为道德的，他只不过从精神层面上爱着那个男孩（一个13岁孩子），但是我觉得带这个男孩出去是件蠢事，如果他一直这么厮混的话……乖乖地别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这对我们和托德都不会有什么好处。”❸对于王尔德，男性美不仅提供了欣赏的空间，也提供了创作的空间：他开始动笔为一名“唱诗班男孩”创作一首略带伤感的诗，后来他受到“花枝招展的”克雷斯韦

尔的表弟维奥莱·特鲁布里奇画在瓷砖上的一个“瘦高白皙的男孩”启发，写成了一首更为成功的《虚掷的年华》。^①

但如果说一块装饰瓷砖、一名唱诗班成员或一名长跑运动员能激发审美反应，那么艺术展览也许能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反应。王尔德一如既往地徘徊在天主教的边缘，“深陷在巴比伦淫妇的诡计之中”。

^②他带“小猫”哈丁去伦敦在皇家艺术学会欣赏“绘画大师”的作品，欣喜地发现它们竟然激发了朋友的“天主教倾向”。那一年，除了往常集中展出的英国肖像画和荷兰风景画之外，其间还点缀着众多意大利宗教题材作品。^③也许就在那次参观期间，王尔德拜访了迈尔斯的画室，通过介绍认识了罗纳德·高尔的妹妹、威斯敏斯特公爵的妻子康斯坦丝。这是他结识的第一位公爵夫人，令他印象极为深刻，是他见过的“最迷人、喀耳刻女神般聪慧的女人”，“简直太迷人了”。^④

在类似的种种干扰下——社会、文化和精神——王尔德的学业成绩飘忽不定。他申请了“爱尔兰奖学金”——大学里有关古典文学的高级奖项——但没有如愿以偿（“我被语言学难倒了”）。他讨厌失败的滋味，后悔自己之前不够用功。^⑤然而，尽管他下定决心要改过自新，为期末学科大考而努力读书，但一切还得取决于他自己。^⑥那年3月的学期末，全体学生聚集在学院大厅，老师们坐在高桌旁，王尔德被布利博士叫去参加“期末考试”。布利博士问讲授罗马史的导师艾伦：“你觉得王尔德先生的功课怎么样？”艾伦回答：“王尔德先生旷了课也不道歉，他的功课简直一塌糊涂。”院长听了十分威严

地道：“王尔德先生，那可不是对待一位绅士的方式。”然而，王尔德太想一鸣惊人了，他回答道：“但是，院长先生。艾伦先生并不是一位绅士。”全场一片愕然。对于一名本科生来说，竟然在如此正式和半公开的场合对导师做出这样的断言，简直太刺激了。事实证明，这么做确实没有任何好处。王尔德被命令离开了大厅。❶

王尔德在学院里落下了颠覆权威的名声。他经常和学监们发生冲突；或者在学院小教堂搞点事情——一次正逢利奥波德王子和利德尔夫人（基督教堂学院院长的妻子）参加教堂集会，按照计划应由王尔德朗读第一段。他走上讲台翻了翻《圣经》，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念道：“所罗门之歌……”这是一首关于女性的赞美诗，还没等他继续下去，院长便从前排座位上起身冲了过去，“脸上的胡子直戳到王尔德脸上，低声道，‘你念错了，王尔德先生。应该是申命记第十六章’”。无论如何，这段插曲连同其他事件导致了一种新现象，教师们坚决地站到了这个学院“坏男孩”的对立面。❷

王尔德并不在乎。他相信，与令人心动的伦敦生活和机遇相比，莫德林学院的公共休息室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的一潭死水。就在艾伦事件发生的同一个月，王尔德在伦敦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联系。他被吸纳进入威斯敏斯特圣斯蒂芬俱乐部，那是由戴维·普伦基特——爱尔兰副检察长、都柏林大学议员、朋友巴顿的叔叔——极力推荐的。尽管这家俱乐部是迪斯雷利等人于1870年创建的，但它是个保守党机构，而且可以让人获得艺术共鸣：惠斯勒也是其成员。亨特-布莱尔也是。

王尔德意识到这是一份荣誉，但又有点恼火它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因为入会费高达42英镑。 ⑩

这笔开销让他不堪重负，并且——再一次——“彻底破产”，他觉得自己无法在复活节假日去罗马与沃德和亨特-布莱尔见面。他为失去这个机会难过不已。亨特-布莱尔也很失望；他仍然对王尔德改宗皈依天主教抱有希望，认为去罗马“天主教的大本营看看”可能会发挥决定性作用。他告诉王尔德，既然不是圣彼得，不如就把这件事交给“幸运女神”——他当时正在法国南部旅行——打算在蒙特卡洛赌上“两英镑”；“如果你命中注定要来罗马，我一定会赢钱的。”王尔德随后收到一封电报，带来了非比寻常的消息：他的朋友赚了近60英镑。他激动不已，几乎立刻就动身出发了。“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他告诉哈丁，“我真希望自己能够洞察时间播下的种子，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真是那样，他也许会惊诧不已。

⑪

王尔德一到伦敦便发现，马哈菲教授正准备前往欧洲大陆，途中要去希腊旅行。陪同他的两个学生，一个是古尔丁（一年前他和王尔德的同伴），另一个是年轻的乔治·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刚从伊顿公学毕业，直接进入了自己家族的出版公司。王尔德决定和他们一起去热那亚。这次旅行在物质和精神上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从他们离开查令十字火车站的那一刻起，马哈菲就开始“尽其所能地运用一切论据”试图劝说王尔德放弃罗马和罗马天主教。麦克米伦向他父亲汇报称：“起初，他竭力劝说他和我们一起去希腊，顺便列举了天主教所

有最糟糕的错误。然而他发现，这虽有分量，却并不完全有效，于是他改变策略，[他们到达热那亚时]当王尔德开始说，他也许会去时，马哈菲说，‘我不带你一起走了。我不会带上这样一个人跟我在一起。’当然，王尔德有点任性，这使他下定决心要去，我很期待他会去，也希望他会去。” ⑩

王尔德还在盘算着自己的最终决定，他和麦克米伦、古尔丁在热那亚逗留了几天，马哈菲去镇上看望他的妹妹和生病的母亲。王尔德和同伴们惊叹于文艺复兴时期宏伟的宫殿、众多白色大理石门廊、波光粼粼的地中海、色彩艳丽的房屋（“蓝色、橙色、深红色”），以及长满“山茶花、柑橙、柠檬、橄榄和茂密灌木丛”的花园。他们参观了红宫(Palazzo Rosso)，见到了圭多·雷尼那幅阴郁的圣塞巴斯蒂安殉难像。麦克米伦认为，那是他见过的“最美的绘画”。 ⑪做出这种判断的人不止他一个。尽管罗斯金摒弃圭多的作品，认为它们多愁善感且虚情假意，但王尔德也受到了画面上遥不可及的性感形象的诱惑，“一个可爱的棕发男孩，长着蜷曲的发簇，双唇鲜红，被他的邪恶敌人捆绑在一棵树上，虽然被箭头戳穿，但他扬起的目光中充满神圣和热情，……向着敞开的天国”。 ⑫圭多的“塞巴斯蒂安”就此与柏拉图笔下的希腊年轻人和帕特农神庙的装饰画一起，成为王尔德心目中青春男性之美的典范，充满了活力和光彩。 ⑬

临近复活节，全城沉浸在欢乐中。王尔德将此情此景写进了《复活节前一周作于热那亚的十四行诗》，暗示在斯科格利亚托花园中度过了“甜蜜时光”，而当他听到路过的“一个小孩”唱着复活节赞歌

时，便从异教的感官享受中被召回至耶稣受难的“苦难记忆”中。❶
但是，在发表了这番富有诗意的宣言，并且将天主教置于希腊之上后，他决定暂时搁置基督教的罗马，前往异教的希腊。马哈菲很高兴能让自己从前的学生改变主意，使得他摆脱“耶稣会”，“把他从魔鬼手上抢了回来”。❷

一行人在耶稣受难日那天乘火车离开热那亚，穿过意大利到达拉文纳（王尔德对那里的6世纪镶嵌画感到惊奇），然后前往布林迪西寻找船只。正如麦克米伦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是一支多元而快乐的乐队：马哈菲——“将军”——“幽默而有趣”；古尔丁“精神饱满——虽然对我们所称的文化知之甚少，但全程欣然参与我们所观察的一切——无论是风景、绘画、宫殿等等。事实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诚实荒蛮的爱尔兰人，让人感到乐趣无穷，也不会伤害别人”；还有“颇具审美眼光”的王尔德，穿着一件崭新华丽的棕黄色外套。❸
王尔德可能在美学话题上“说了很多废话”，尽管如此，他仍被视为“一个非常明智、见多识广和极富魅力的人”。❹

复活节（1877年4月1日）晚上，他们从布林迪西起航，黎明时苏醒来看到了伊庇鲁斯（Epirus，王尔德称其为“塞萨利”，虽然地理位置不够精确，但更富有诗意）“丘陵绵延的海岸”。❺他们把船停靠在科孚岛，王尔德在那里用轻描淡写的语气给莫德林学院教务长布拉姆利先生写了一封信。两天后就要开学了；他无法赶到。“这个机会”，关于迈锡尼和雅典之行，他解释道，有马哈菲博士等人同行“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了”。跟着这样一位向导去参观希腊无疑“和

听讲座一样，也是相当不错的”。19世纪70年代，前往希腊的游客非常少。他希望布拉姆利先生不会介意他迟到“十天”。虽然他没有提到自己计划返回途中在罗马停留，但他说明预计将在4月17日左右抵达雅典，显然他缺席的时间将比十天更长。❶莫德林的灰色四方院无疑看上去远在天边。

热那亚的生活色彩十分明艳，而当他们甫一接触到希腊的最边缘时，这种艳丽就更加强烈了。马哈菲认为科孚岛的赶集日是“欧洲最美丽的风景”之一。对于几位年轻的古典主义学者来说，听见人们说希腊语，看到商店招牌上的希腊字母就已经令人兴奋不已。街道上挤满了人：“穿着羊皮、长相高贵的农民小伙子”，“红色的小帽”和他们浓密的卷发之下的“棕色的脖颈和四肢”。❷这些年轻人美得惊人。麦克米伦认为他们“很可能都给菲狄亚斯（Phidias，古希腊雕刻家）当过模特”。对王尔德来说，他们似乎活生生是柏拉图笔下的查米德斯，或者圭多作品中圣塞巴斯蒂安的化身。❸

那一年，希腊的东正教复活节比西方晚一周，所以他们又度过了一个复活节前的圣周。王尔德继续创作他的十四行诗，在科孚岛写下了另一首平衡异教和基督教势力的诗歌。这一次，他颠倒了互动的方式，想象虽然诸神已死，“玛利亚的儿子成了国王”，但也许在“海水恍惚的小岛上”，“某个天神躲藏在日光中”，等待着春天的到来。❹虽然这首诗建议“我们且等一下”，希望能见到这个潜伏的神灵，但一行人还是继续出发了。第二天是4月3日，他们乘船经过赞特

岛（仍然像荷马所描述的那样“树林茂密”），前往伯罗奔尼撒西北海岸的卡塔科洛。❶

这是王尔德自从进入波托拉学校以来，一直在阅读、梦想、思考的地方，这里是孕育亚西比德、柏拉图、荷马、欧里庇得斯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摇篮。“希腊！希腊！”王尔德在十四行诗中描述，当红日沉入大海时，他“终于站立在希腊的土地上！”

卡塔科洛并不漂亮，是一个小港口，周围的风光平庸得不值一提。王尔德（和他的同伴们一样）不仅踏上了实实在在的海岸，而且还回归到一片想象之地。除此之外，他们在其他方面也需要适应。古典派学者心目中充盈着希腊的威严，他们对眼前这个“袖珍”的国度感到震惊（站在赞特岛就可以望见帕纳索斯山）。在跨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第一站——奥林匹亚，他们见到考古学家们丑陋的挖掘现场和横冲直撞的独轮手推车，被迫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神庙并不是用闪闪发光的帕罗斯岛白色大理石建造而成，而是用粗糙不平的石头盖起来的。就这一点而言，麦克米伦最初的失望在几个小时内就转变成为对这部“粗犷宏伟”作品的赞赏。❷然而，还有许多其他事情也使他们惊诧不已。奥林匹亚考古发掘队队长古斯塔夫·希施菲尔德博士向他们展示了一个刚刚出土，“异常巨大的”阿波罗头颅。马哈菲认为它是“最高和最纯粹的希腊艺术中最伟大的遗迹”之一。❸也许它留给王尔德的第一感觉是——在最精美的希腊雕塑中——“上帝的灵魂仍然存在于大理石中”。❹

这一趟伯罗奔尼撒之旅历时八天。他们参观了巴塞著名的阿波罗神庙，漫步在阿尔戈斯的大剧院（另一首十四行诗的主题），见到了古代迈锡尼及其巨石遗迹。王尔德虽然沉浸在希腊及其古典和异教的联想之中，却仍然惦记着基督教的罗马。他甚至在阿尔戈斯的大剧院里，想起了——在废墟中——教宗在梵蒂冈被囚禁，“因为金钱丢失了半个宝座！”^①他“登上奥林匹亚附近一座小山顶”，被一个年轻的农家男孩深深打动，他“脖子上挂着一只小羊羔”——就像“好牧人”中的耶稣形象。^②

除此之外，还另有乐趣和消遣。这一周，他们徜徉在田园牧歌般的美景中，欣赏着烂漫的春花——鲜嫩的玉米、红色的银莲花、紫色的岩蔷薇——以及当地人优美的身姿和浓密的头发。圣周斋戒期间，他们只吃一点点酸乳酪、树脂酒（“我们只能把这种酒比作家具上光剂”）、复活节彩蛋（“粉红色！！”），呼吸着“希腊空气中令人振奋的力量”。他们享受马背上的生活。古尔丁曾希望，等王尔德骑上马之后，就要打消他的“狂妄自大”，但奥斯卡似乎一直掌控得很好。他很幸运，这也许是因为希腊的马匹主人不喜欢让马快跑。在去往迈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的路上，步行陪同的马匹主人发现他的想法遭到了忽视，于是拔出一把刀试图强迫游客们接受他的想法。然而，他很快就被一名成员——几乎可以肯定此人不是王尔德——击败了，因为对方掏出了一把左轮手枪。^③

希腊北部地区盗贼猖獗，但这一行人并没有遇到太多麻烦。他们遇到的极少数盗贼都“还算友好”。^④其间发生过一桩令人焦虑的事

情，三个年轻成员骑行在前面时，发现马哈菲不见了。他没赶上队伍，大家便开始担心出现最坏的情况。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他就重新出现了。他在穿越一条“近路”的时候，厚外套和小地毯从马鞍上掉了下去，为此他花了一个小时寻找却一无所获，令他大为恼火。⑩

4月13日，这群旅行者从埃皮达鲁斯渡海（经埃伊纳岛）抵达雅典。⑪乔治·麦克米伦立刻宣布自己“开心地飞上了天”，王尔德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任何熟悉古希腊历史和文学的人来说，站在雅典卫城上，伫立于帕特农神庙、伊瑞克特翁神庙和雅典娜胜利神庙前，漫步在——麦克米伦所说的——“被如此众多的巨人踩踏过的路面上”，是件激动人心的事情。⑫无论文字，还是形象，这里都堪称这次旅行的制高点。王尔德的一位女性朋友捕捉到了他的几分惊诧（尽管是以虚构的形式）：

他给她讲希腊，讲雅典——黎明之城——在拂晓时分的寒冷、灰白和平稳的晨光中渐渐呈现，一位崭新的阿弗洛狄忒现身于一圈圈不断拍击的波浪中。他给她讲帕特农神庙，那是一座庙宇——而不是一座建筑——一座像雕像一样完善而有个性的神殿。第一眼看到雅典卫城，看到它精致裸露的圆形石柱在晨曦中拔地而起，让人感觉就像遇见了一个纯洁的希腊女神。⑬

参观雅典卫城后，他们又见识了其他奇观。他们游览马拉松平原，参观各种纪念碑和博物馆，非常喜欢“塔纳格拉”赤陶小雕像，“它们的外观非常现代”。⑭王尔德从希腊学园的橄榄林中砍下

一根“白色手杖”。这并不是他唯一获得的纪念品：他还为自己拍了张照片——颇有点拜伦风格——穿着希腊民族服装。马哈菲的大名为他们敞开了所有的大门，让他们在非公开场合亲眼见到了施利曼从迈锡尼发掘出来的非凡的黄金宝藏。这个爱尔兰旅行团认为，它们“与各种古老的爱尔兰物件非常相似”——让人联想到希腊人和凯尔特人可能拥有共同的祖先。①而在雅典邮政局的邮件待领处，还有另一件宝贝等待着王尔德：弗洛伦丝·巴尔科姆寄来的复活节卡片。②

4月21日星期六，牛津大学开学17天后，王尔德一行离开雅典。③他们乘船赴那不勒斯。“虔诚的”麦克米伦在隔壁的船舱里向折磨他的大堆蚊子和跳蚤发出一连串“咒骂和秽言”，王尔德被逗乐了。④然而麦克米伦的悲哀和王尔德的欢乐并没有就此结束。他们经过爱琴海时，一场“可怕的风暴”袭击了这艘船，年轻的出版商被“掀翻后，撞坏了小酒吧里钢琴的琴键”。⑤

王尔德从那不勒斯独自匆匆赶赴罗马，沃德和亨特-布莱尔正在罗马英格兰酒店等着他。这是一次快乐的团聚。他们在亨特-布莱尔的朋友、格拉斯哥大学人文学教授乔治·吉尔伯特·穆雷的专业指导下，一起参观古代遗迹。但是，从希腊回来后，王尔德也许看了太多的废墟。亨特-布莱尔回忆说，“罗马、基督教和天主教”占据了他的主要精力，“唤起了他的热情”。他热切地探究起早期基督教殉道者和文艺复兴时期教宗们留下的“无穷无尽的宝藏”。

当然他们也没有忽略罗马的基督教。亨特-布莱尔一直为王尔德的灵魂倍感焦虑，他希望这次访问能“引导他走上正轨”。几个朋友经

常在当地的餐馆吃饭，一起用餐的还有两位和亨特-布莱尔一样的改宗皈依者——年轻的牛津大学学生格里塞尔和奥格尔维-费尔利，两人都是“教宗的侍从”。梵蒂冈的另一位联络人埃德蒙·斯通纳为王尔德和亨特-布莱尔安排了与教宗的私下觐见。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年迈的教宗将双手放在王尔德的头上向他赐福，“希望他能尽快追随他的（朋友）进入上帝之城”。返回英格兰酒店的路上，王尔德静静地坐在马车里。但他并没有做任何决断，而是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了一首十四行诗。⑨

那天晚上，三个朋友坐车去圣保罗大教堂。王尔德坚持要他们在塞斯提乌斯金字塔旁，城墙背风处景色优美的非天主教墓地稍事停留。这里是济慈（也是雪莱）的葬身之地。王尔德希望向《恩底弥翁》的作者致敬，后者因为肺结核死于西班牙台阶附近的一间公寓里。他墓碑上有一段简简单单的墓志铭：“这里埋葬的尸骨，属于一位英年早逝的英国诗人。临终病榻之上，他满心愁苦，不堪敌人的恶语中伤，希望墓碑上刻下这句话……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济慈的痛苦应该是针对他的批评者。据说他们的尖刻批评加速了他的死亡。王尔德站在春花遍地的墓地旁，突然想到济慈也是一位殉道者，“值得躺在殉道者之城……他是一位美的祭司，在盛年到来之前就被夺去了生命”。他认为他“俊若塞巴斯蒂安”，不幸被“谎言和不公正的言语之箭”杀死。⑩

靠近墓地墙的地方新近竖起一块大理石碑，王尔德认为它破坏了气质的力量。石碑上刻着一些赞美济慈的“平庸诗句”，还有一

个“瘦削脸”、厚嘴唇，令诗人显得“丑陋难看”的圆形浮雕像——而在王尔德的个人想象中，济慈是一个理想的希腊式美男子，与阿波罗、查米德斯或圭多·雷尼描绘的圣塞巴斯蒂安不相上下。王尔德不想让这块“充满诽谤的大理石”毁掉这一刻。于是他拜倒在神圣的草坪上，此举令亨特-布莱尔非常恼怒。①

如果说王尔德能够领悟到美学中的灵性，那么罗马也能助他欣赏宗教中的世俗一面。教宗的显赫荣耀令他眼花缭乱。尽管他可能还在犹豫是否要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但他确信自己想成为一名红衣主教。这成了他的公开抱负——或者其中之一。如果他在文艺复兴时期成为教会里的大人物，那么就可以模糊罗马天主教和异教信仰之间的界限。对王尔德来说，他在罗马逗留期间的主要乐趣之一就是发现“希腊诸神和希腊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们，都登上了梵蒂冈的宝座”。在尤利乌斯二世及其继任者们所收集的古代杰作中，有一尊王尔德特别喜爱的大理石雕像，那是一名四肢修长、正在擦汗的运动员（利西普斯雕刻的“刮汗污的运动员”，利西普斯曾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宫廷雕刻家）。②

罗马丰富多样的艺术珍品令王尔德惊叹不已；他后来开玩笑说，这座城市是“艺术的百货商店”。各种各样的艺术陈列扩大并或许也败坏了他的审美情趣。他在欣赏圭多·雷尼时就已经偏离了罗斯金的原则，转而对同样“感性”和“不纯洁”的柯勒乔也产生了热情。后者的“达娜厄”是鲍格才家族珍贵的藏品之一。③然而，如果王尔德曾希望借旅行结束他灵魂上的摇摆不定，“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

刻”，那么他会很失望：这次经历只是加深了他对异教信仰和罗马天主教的认识，赋予了它们更明亮的色彩，更迅速地碰撞出了火花。

王尔德向他的新伙伴畅谈了这份崭新的热情。他通过沃德和亨特-布莱尔认识了一位名叫朱莉娅·康斯坦斯·弗莱彻的年轻美国姑娘；并且和她一起去坎帕尼亚骑马。她与母亲和继父——出生于美国的画家尤金·本森一起住在罗马。弗莱彻虽然还不到20岁，已经写了一本小说（笔名“乔治·弗莱明”，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当时正在写另一本。弗莱彻聪明、有趣、游历广泛、博览群书，王尔德发现自己“在各个方面都被她吸引住了”。^②她对他的看法可以从她那年春天写的浪漫小说中窥见一斑。《海市蜃楼》（Mirage，一部三卷本小说，讲述了一群前往叙利亚的旅行者的故事）中有个角色叫“克劳德·戴夫南特”，是一位刚从希腊归来的牛津大学诗人。

他长着一张几乎有点不合时宜的脸，就像是一幅霍尔拜因的肖像画，脸色苍白，五官硕大；那是一张独特而有趣的脸庞，表情异乎寻常地温和但热烈。戴夫南特先生非常年轻——也许不会超过二十一二岁；但是他看起来还要更年轻。他的头发留得相当长，被拨弄到后面，围绕着他的脖子攒聚着，像一位中世纪圣徒的发型。他说话速度很快，嗓音很低，发言特别清晰；他说起话来就像是一个曾对表达方式做过研究的人。他倾听的时候则像一个习惯发言的人。

弗莱彻显然注意到，并且似乎也很喜欢王尔德表现出的一些典型姿态：比如，思考高深的问题（戴夫南特因为走神，好几次从马上摔下来）；僧侣般不可思议的气质（当被问及他的一首诗“是什么意思

思”时，他用“最懒散的语气”回答，“哦，可我从不作解释”）；“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两颗明星——希腊的维纳斯和意大利的圣母”之间分裂的忠诚；以及——最显著的——采用美学观点看待每一个问题。戴夫南特倾其所有买下一块旧纺织品（“我应该称其为灵感，一首彩色的诗”），以防止其他游客买下它，然后用“一件新东西”重新包装它。他坚持把一个年轻的送信男孩带到一间空荡荡的等候室，因为“他有一张漂亮的脸……非常值得一看”。他承认，自从妹妹出嫁，妹夫用镀金的路易十五时期家具装饰了他的伊丽莎白时代庄园后，他就很少去看望她（“对不起，我非常喜欢我妹妹”）。

弗莱彻不但欣赏王尔德的幽默，而且和他一样有求知欲。沃尔特·佩特是她心目中的英雄之一。她打算把《海市蜃楼》献给“文艺复兴的作者”。王尔德答应送她一些佩特未被收录的文章——以及J.A.西蒙兹的几本书作为对比（弗莱彻发现，西蒙兹“在风格上有些拖沓——不像一个艺术家——不如佩特大胆。我可以想象西蒙兹先生快结婚了，他妻子的亲戚们正在读他的书”）。❶

王尔德终于在4月底回到英国和牛津。他满怀欣喜从希腊和罗马回来，却震惊地发现学院管理层——终于失去了耐心——已经通过一项决议，令他暂时停学直至学年结束（10月），并且扣除他一半的莫德林奖学金（45英镑）。他要在停学期间按要求完成一定数量的作业，否则将失去莫德林学院的奖学金资格。❷王尔德称，自己作为“第一个访问奥林匹亚的本科生”，竟然要因此被牛津勒令退学，

这证实缺乏绅士风度的艾伦先生和“那个穿衬裙的老太太”教务长确实符合他之前有关他们所有的最坏想法。他对这个决定表示不满，仔细研究了“这份决议”，还向学校职员求援，但都无济于事。❶莫德林学院管理层毫不动摇。他只获得了一个小小的让步：如果他在10月准时返校，同时令人满意地完成规定的作业量，可以考虑免除一半罚款。❷

王尔德满怀厌恶地做了让步。他在伦敦“与弗兰克·迈尔斯和许多朋友”度过了“愉快的”几周。❸和艺术家们一起待在城里，而且当时正值“艺术季”开始，一切都很令人兴奋。城里有许多音乐会可以参加：瓦格纳在阿尔伯特音乐厅指挥，安东·鲁宾斯坦在圣詹姆斯剧院演奏。❹皇家艺术学会夏季展览于5月5日开幕：罗纳德·高尔勋爵展出了两尊雕像，弗兰克·迈尔斯展出了一幅风景画《康尼马拉的穆克湖》。然而那一年，皇家艺术学会遇到了一个竞争对手。

那年夏天最大的文化盛事是邦德街新开了一家格罗夫纳画廊。它采用全新的布展空间：布置豪华、设备齐全，而且很新式。库茨·林赛爵士家境富裕且很有艺术修养，在他富有且风雅的年轻妻子的支持下，倾注精力、品味和各种资源，打造出一座现代“艺术殿堂”。它同时也是一座符合新美学风格的殿堂。其每一个华丽的装饰细节都宣告着诚意：悬挂在画廊墙壁上符合审美色调的“灰绿色”和“猩红色”的缎布；“深绿色和金色”的护壁板；帕拉第奥式的出入口；昂贵的“土耳其地毯”和巧妙放置的“日本瓷器”。❺

林赛精心挑选的开幕展证实了这种审美联系。一幅幅绘画作品被“挂成一排”，而不是像皇家艺术学会那样满满地挤在墙上。展品中包括许多拉斐尔前派传统继承人的作品：霍尔曼·亨特、米莱（包括一幅罗纳德·高尔勋爵的肖像）、沃尔特·克兰，以及林赛本人。但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伯恩-琼斯和惠斯勒的作品。前者创作了三幅精细的大型油画——《梅林的诱惑》《创造的日子》和《维纳斯之镜》——后者则提供了完全不同的作品。惠斯勒在一系列低色调的印象主义“交响乐”（通常是风景画）、“和声”和“改编乐曲”（通常是肖像画）中回避了细节和叙事。

4月30日的私人展是一个名流云集的时刻。正如报纸上兴奋地写道，“每个人”都“在那里”：贵族、政客（格拉德斯通也在其中）、艺术家、作家、演员、尊贵的教士，以及“梦中的美人”。^①多亏各路熟人，王尔德也得以到场，欣喜地出入于伦敦的名流中。这是一个结识文学人物的好机会，如马哈菲的朋友霍顿勋爵（济慈的传记作家），还能结识惠斯勒。^②但如果王尔德希望引起别人注意，那他就会发现自己并不是当季首次亮相的人物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

伦敦社交圈中出现了一位新的美人：一个举止庄重而慵懒的年轻女子，皮肤白皙，灰色眼睛，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她的五官像雕塑一样有型：弯弯的眉毛，饱满的下颌，轮廓分明而高贵的嘴巴，“庄严笔直的”脖颈。美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自己的时尚。在当时的眼光看来，她似乎是女性美的典范：像一座苏醒过来的希腊雕像。^③弗兰克·迈尔斯是某一天晚上在剧院第一个注意到她的人，也是在西布赖特

夫人于朗兹广场的家中举行宴会时，第一个与她相识的人。她就是兰特里夫人，23岁，是海峡群岛一位牧师的女儿，最近嫁给一个身材肥胖、平庸乏味的游艇爱好者。她最大的抱负是在社交圈出人头地。她并不富有：刚到伦敦时只穿了一件黑色连衣裙，除了结婚戒指外没有其他珠宝首饰。她也没有很好的人脉。但她发现，西布赖特夫人（一位朋友的朋友）是个能干的引路人。❶

朗兹广场的第一次“家宴”快结束时，莉莉·兰特里获得了无数贵族崇拜者，还有两位渴望赞美她的艺术家——希望从她身上获取些许荣耀。除了弗兰克·迈尔斯，那天晚上米莱也在场。同为海峡群岛人（同时也是皇家艺术学会成员），他不仅赢得了邀请她共进晚餐的荣耀，还获得了为她绘制一幅坐姿肖像的承诺。

迈尔斯也不甘示弱，趁她站着的时候，当场为她绘制了一幅素描。他计划复制这幅肖像，并以此打响她成名的第一炮。在此过程中，他希望能得到王尔德的帮助。❷王尔德在撰写的介绍中，称她是“欧洲最可爱的女人”。❸不久，罗纳德·高尔勋爵拜访迈尔斯，发现后者“深深迷上了”兰特里夫人，自称“他和自己手里的画笔再加上他的朋友奥斯卡·王尔德的笔，将使她成为本世纪的乔孔达（蒙娜丽莎）和劳拉！”❹令人惊讶的是，王尔德写了整整一年的诗，却没有当即为兰特里夫人写一首十四行诗。❺相反，他回到了都柏林。

4 特别嘉奖

提问者：“最甜蜜的话是什么？”

奥斯卡·王尔德：“干得好！”

王尔德夫人和马哈菲都对莫德林学院管理层的做法非常恼火。马哈菲认为这简直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威利一如既往地认为，这一切的背后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于是他从莫伊图拉写信给奥斯卡，询问他停学的“真正”原因。❶王尔德被逐出牛津后，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和思想领域。他答应为都柏林亚历山大学院年轻女性举办一系列关于古典文学话题的讲座。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马哈菲本人在1869年也举办过类似的课程讲座。❷王尔德继续写诗——他意识到自己亟须提高地位，于是便投入同样多的精力去营造他的文学关系网。他在愿意出版自己作品的期刊名单中，加入了一本都柏林的天主教杂志《告诫画报》(Illustrated Monitor)。❸他参加天主教大学文学学会的一次公开会议，都柏林的文化名流们在会上讨论了“爱尔兰民族文学的基础”。❹他经常出去吃饭，非常乐意让大家都知晓他是莫德林学院的人，并且聆听他讲话。❺

不过，眼下他的视野已经超越爱尔兰。他过早地把握了人际交往的力量，开始与更广泛的文学界建立联系。诗歌是他的名片。他写了一首关于“近期保加利亚基督徒遭屠杀”的十四行诗，把它寄给格拉德斯通；当时这位身为反对派的前自由党总理正在为反对土耳其在巴

尔干地区的暴行而四处奔走。“我只不过比小男孩略大一点点，”王尔德缺乏诚意地在信中写道，“在伦敦没什么文学关系，但如果您从我寄去的诗歌中发现了什么好东西，某个编辑（《十九世纪》或是《旁观者》）也许会把它们发表出来。”^①格拉德斯通“友善”的赞美不仅促使王尔德给这位政治家寄去另一首诗（“对于您的恩惠无以回报”），而且还把它们寄给了《十九世纪》和《旁观者》杂志，并附上一张便条说，格拉德斯通“在这些诗中看到了前途”。^②然而，这样的承诺并不足以确保它们可以刊登发表。

王尔德给霍顿勋爵、巴克斯顿·福曼（Buxton Forman，济慈和雪莱的编辑）以及另一名济慈的狂热爱好者——但丁·加布里埃尔的兄弟威廉·迈克尔·罗塞蒂寄去了他的十四行诗《济慈墓》，并在信中呼吁为纪念诗人修建一座更好的纪念碑。然而他只得到了礼节性的回复，而非热情的响应。霍顿勋爵指出——他的传记中明确写道——济慈本人并不像王尔德诗中所写的那样是个郁郁寡欢的人，至于被王尔德贬低的那个位于罗马的圆形浮雕像，它实际上和诗人“极为相像”，是“由满腔热忱的朋友们建起来的”，试图取代它是不可能的事情。

①

相比之下，王尔德为《都柏林大学杂志》撰写的一篇有关格罗夫纳画廊展览的文章倒是获得了更好的反响。这一次他很有把握。尽管得到了罗斯金和斯温伯恩的支持，但对他而言，“艺术批评家”是一个崭新的角色；他很乐意与心目中的偶像们平起平坐。《都柏林大学杂志》的编辑建议他修改文中对阿尔玛·塔德玛绘画技巧的批评，王尔

德毫不让步地回答：“罗纳德·高尔勋爵、罗斯金先生和我，以及我认识的所有艺术家，都认为阿尔玛·塔德玛画的男人和女人很不像样。我不能在一篇署名为我的文章里说，他是个举足轻重的画家。”^⑨

1877年7月发表的这篇评论糅合了华丽的描述、独具慧眼的赞扬和高高在上的姿态。几乎每一句话都在微妙地宣告作者的人脉关系、艺术造诣和忠贞：米莱的几幅威斯敏斯特公爵之女的肖像被赞赏地认为“非常相像”，而他的罗纳德·高尔勋爵肖像“让人一眼就能认出”，虽然它们和罗斯金收藏“在牛津”（不公开展示，而是藏于亨利·阿克兰爵士的老家）的艺术家作品不在同一个档次。威廉·布莱克·里士满的画作《阿伽门农墓前的伊莱克特拉》捕捉到了“希腊天空中那种独特的宝石蓝”——然而其描绘的女性服装显然表明，里士满并没有仔细研究过埃斯库罗斯《奠酒人》中对场景“详尽而哀伤”的描述。文章的一条注脚则无缘无故地记录了惠斯勒——著名的“孔雀屋”的创造者——还不如评论作者，竟然不知道拉文纳早已有了一件类似的作品。^⑩

如若王尔德称惠斯勒为“伟大的黑暗大师”，那多半是他把惠斯勒色调幽暗的作品当作了挥洒幽默的背景。他在关于《黑色和金色的夜曲》（《降落的烟火》）及其姊妹作品《蓝与金的夜曲》的评论中，玩笑开得过火到近乎嘲笑的地步：“这些绘画作品当然值得一看，但大约只需要看一个真正的烟火的时间，也就是说不到15秒。”他对伯恩-琼斯的作品则给予了最慷慨的赞扬。

这篇文章让王尔德在当时的艺术界有了一个小小的立足点。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赶忙把这篇评论寄给其中提到的诸多艺术家。令人欣慰的是，他收到了几封“令人愉快的回信”。^②然而，正当他抬脚踏足这个领域时，艺术界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对于这次格罗夫纳画廊展览，罗斯金在《劳工书简》(Fors Clavigera)中对其的评论却没有王尔德那样温和。他有关惠斯勒《黑色和金色的夜曲》的评论引发了一场诽谤诉讼。惠斯勒赢了官司，但只得到一法新^③的赔偿金，而且必须自己支付诉讼费用。这次失败令画家倾家荡产，并且在英国艺术界的核心造成了裂痕。大家都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伯恩-琼斯违背自己的意愿，作为罗斯金的证人出庭作证，结果却站到了故友惠斯勒的对立面。这是一个王尔德不得不应付的尴尬局面。

然而，王尔德在写格罗夫纳的展览时，关注的不仅仅是艺术界。他的评论也可以被解读为一封精心设计的给沃尔特·佩特的介绍信。王尔德已经在牛津大学待了三年，显然从来没有想过要结识佩特；也许他现在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想跟上朱莉娅·康斯坦斯·弗莱彻的热情。他在文中引用了佩特的一句话，如果不是因为编辑删减，其中还会有更多引语。他将佩特和斯温伯恩、西蒙兹、莫里斯放在一起，称其为“文化的复兴和对美的热爱做出了贡献，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斯金先生”。文中多次提及赫拉克利特，佩特在著名的《结论》中提到了这位哲学家的碑文；文中还提到了柯勒乔，佩特将他的作品装饰在布雷齐诺斯学院的书房里；他还提到了画家西蒙·所罗门，那是佩特的朋友。1873年，佩特因在牛津街附近的公共厕所试图鸡奸而被定罪，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展出过作品。

王尔德把评论寄给身在牛津的佩特，收到一封亲切和蔼、表示认可的回信：

亲爱的王尔德先生：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和杂志。我怀着极大的愉悦拜读了你有关格罗夫纳画廊的杰出文章；看了文章之后，我很想和你结识，希望你一回到牛津就来我这里做客。

我很想就几个问题跟你探讨一下，整体而言，我觉得你的评论非常公正，而且其表达方式显然也非常令人愉快。这篇文章表明，你具有一些美妙的品味，在你这个年龄，能培养出这样的品味的确非同寻常，你对很多美好事物具有相当多的知识。我希望将来你能写出更多的作品。

佩特 谨启^①

这是一份珍贵到不能割舍的战利品。王尔德激动地将信件内容抄给沃德和哈丁。^②

王尔德在文学方面的努力也在成家之路上发挥了作用，为他向弗洛伦丝·巴尔科姆求爱，发挥了一臂之力。弗洛伦丝收到刊登有《神圣又永恒的城市》(Urbs Sacra Aeterna)的《旁观者》杂志后，回信祝贺王尔德写出如此“卓越的”十四行诗：“我完全能理解牧师们对它欣喜若狂……我们想听你自己读给我们听。如果可以的话，明天晚上一定来。”她还开玩笑地加了一句附言：“你觉得往我们这样一个信

奉新教的家庭寄送《旁观者》杂志，合适吗？”^①唯一——一个对源源不断的十四行诗感到不以为然的人是亨特-布莱尔。王尔德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有献身天主教，让他失去了耐心，他宣布：“不要再给我寄来你的十四行诗。我不想看到它们。”不过，他们仍然是朋友。^②

他的家庭生活也出现了改善的迹象。奥斯卡同父异母的兄弟亨利·威尔逊因为自己在圣马克的地位而受到鼓舞，同意买下梅里恩广场的房子，并同意让王尔德夫人和她的儿子们继续住在那里，至少目前是这样。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似乎提供了在都柏林维系家庭生活的可能性。然而，这番景象刚一出现就消失了。1877年6月9日，威尔逊病倒。三天后他离开了人世。^③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王尔德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非常依恋”他们所谓的“表亲”。他做事踏实，又有赚钱的能力，帮助这个家庭度过了威廉爵士去世后的动荡时期。但是，现在他也走了，而且更糟的还在后头。正如奥斯卡所言，他的遗嘱“就像大多数遗嘱一样，是一份令人不快的意外”。^④奥斯卡和威利一直知道自己是他的继承人，但他却将8000英镑财产中的一大部分留给了圣马克医院。威利拿到2000英镑。然而威尔逊“固执己见地容不下天主教徒”，他感觉奥斯卡“即将”改宗，因此几乎剥夺了他的继承权。奥斯卡只得到100英镑，外加威尔逊在伊劳恩罗的一半股份，而且条件是他依然保持“新教徒”身份。这实在“太令人失望了”。奥斯卡声称自己已经慢慢适应了“天主教倾向”带来的“心灵”煎熬，并把这些痛苦变成了诗歌。然而现在，他的“口袋”却在受苦。它可不适合拿来作诗。^⑤

就眼前来说，威利的2000英镑意外之财意味着梅里恩广场的生活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尽管威利各种享乐不断，但他还是在法律生涯上取得了一点小小的进步（至少他受邀与都柏林著名律师拉金先生共进晚餐），而且他还在继续盘算自己的政治前途。让王尔德夫人十分欣慰的是，一位人脉甚广的朋友告诉她：“仅仅凭着人们对斯佩兰萨这个名字的热爱，威利就能在爱尔兰的许多地方当选议员。”他建议威利“本着自由的原则开启下一次选举”。^①

奥斯卡的雄心壮志与哥哥不相上下。除了诗歌和艺术批评，他还希望发表一篇关于古希腊的论文，内容可能来自他在亚历山大学院的一次演讲。^②然而，他很清楚，所有这些计划中都没有莫德林学院导师们规定的任务。他打算夏天在爱尔兰西部宁静——娱乐消遣——的日子里改变这一现状。他甚至希望最近刚从君士坦丁堡归来的沃德能加入他的行列，鼓励他学习。但结果，他却只能从爱尔兰老朋友迪克·特伦奇和杰克·巴罗处寻求慰藉。

他几乎没怎么读书。当他没有带着棍棒和枪外出，或者沉迷于“游泳池、咖啡壶和潘趣酒”的时候，一份启事引起他的注意。6月初，《牛津大学公报》发布了第二年纽迪盖特诗歌奖主题：“拉文纳”——极其幸运的是，王尔德当年早些时候曾经去过那里。这个奖项（价值21英镑）将颁发给一首“用英雄双行体”写成的诗歌，是牛津大学的文学最高荣誉。马修·阿诺德和罗斯金（以及许多完全被遗忘的年轻人）都赢得过该奖项。王尔德渴望将自己的名字加入这个荣誉榜。^③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使出浑身解数，争取最大的获胜机会。他在诗的开头几句便宣告自己确实去过拉文纳。而后他呼唤着拉文纳的灵魂，将这一优势推向极致——他首先“越过菖蒲和沼泽”看见一座“圣城赫然出现，头戴着她那群塔织就的冠冕”。他从自己创作的诗歌中搜罗出他认为最好的诗句和最优美的形象（再次出现了“画眉鸟”）。他考虑到评审们可能持有政治同情，于是便称赞起统一意大利的新国王，而不是梵蒂冈那位目中无人被废黜的教宗：“因为终于，意大利的战士威风凛凛地走入，罗马高大的城门，在这不落之城的神庙里，他头上皇冠巍峨！”^⑨

8月，王尔德再次来到克朗芬打松鸡。他参加了一次欢乐的家庭聚会，其中包括福克斯家女主人来自美国芝加哥的几位亲戚。福克斯家的女儿赛琳娜·蒂妮·福克斯带来一本“心理相册”，邀请客人们在里面写下自己的“品味、习惯和信念”。王尔德泰然自若地填写了问卷：“你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猎鸟和草地网球。”

他列出自己最不喜欢他人性格特点中的“虚荣、自大和自负”，然后愉快地写上了自己最“与众不同的性格”——“过分自大”。他对于其他许多条目的回答也印证了这一点。最喜爱的诗人：“欧里庇得斯、济慈、忒俄克里托斯和我自己”；幸福观念：“对人的思想掌握绝对的控制权，即使伴有慢性牙疼也在所不惜”；关于痛苦：“在偏僻的乡村过着贫穷而体面的生活”；梦想：“修剪我的头发”；理想的配偶特征：“对丈夫忠诚”。他把“写十四行诗”作为他“最喜

爱的消遣”之一，把“读我自己的十四行诗”作为他“最喜爱的职业”之一。

这是一场充满活力的表演，主角是一个渴望检验和炫耀自己能力的年轻人。对他来说，“世界上最甜蜜的话”就是“干得好！”，而“最悲哀的”莫过于——“失败！”。他认为“人性中最崇高的激情”是“野心”和（相比之下不那么明显的）“禁欲主义”。他向沃德和亨特-布莱尔重申了自己的看法——他的“人生目标”是“成功；名声，甚至恶名”^⑩。

尽管夏初时，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设法出租了布雷的一幢房子（减去佣金后能拿到75英镑），王尔德还是急于卖掉房子。9月的最后一周，他回到都柏林，家人的一个朋友约翰·奎恩直接找到他，提出以2800英镑的价格买下全部四幢房子。王尔德很想答应。几乎在同一时间，又有一方通过他的经纪人巴特斯比提出了报价（2700英镑）。王尔德得知这一消息后，来到巴特斯比的办公室，解释说他已经有了一个出价更高的主顾；于是巴特斯比便问王尔德，是否愿意以2900英镑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他们的客户。王尔德回答，如果下星期一上午（10月1日上午11点）收到正式发函，他就接受这一方案。然而到了星期一，王尔德没有收到报价，于是他同意以2800英镑的价格把房子卖给奎恩。

这本应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或者至少是办成了一桩事情，但交易被叫停了。房子的另一名潜在买家沃森皮姆公司（布雷房产的承租人柯尼汉先生的代理方）坚称，巴特斯比作为王尔德指定的代理人，在

星期一上午的最后期限之前代表王尔德接受了他们开出的2900英镑的报价。而且，即使王尔德本人对此一无所知，这笔交易也应该属于他们。为支持这一主张，巴特斯比正式提交了一份他们将房产“出售”给沃森皮姆公司的注册“备忘录”。由于双方都不肯让步，王尔德只得走法律程序，巴特斯比和沃森皮姆双方声称的协议暂时搁置。这是一笔缓慢、昂贵且没有把握的生意。 注

这还不是他在经济方面遭受的唯一挫折。10月，他回到牛津大学开始第四年学业时获知，学校将维持决定“停发他的半研究员奖学金，直至1877年秋季学期结束”。然而，情况还可能更糟。由于他返校时没有完成导师布置的作业，于是只得极力说服“当官的”不要再对他施加任何的“进一步惩罚”。 注商人们开始催缴一笔笔欠账。他两度被副校长法庭传唤，被要求结清账目（与他的裁缝约瑟夫·缪尔，以及“珠宝商”G.H.奥蒙德，他从后者手里购买了共济会会员徽章）——并支付相关费用。 注

抛开这些烦恼，王尔德还是很高兴回到牛津，回到他漂亮的房间里。那里适合接待沃尔特·佩特；王尔德立即跟进佩特的信，拜访了《文艺复兴》的作者，并邀请他回访。然而，这个机会差点就被博德利破坏了。博德利碰巧上门，发现王尔德正在小心翼翼地摆桌子，便说他打算留下来。王尔德立即反对道：“不，不成！绝不能有你这样俗气的人。沃尔特·佩特要来跟我共进午餐。” 注

之后他们又见了几次面。他们参加茶会，一起散步，共进午餐，交换书籍和照片。佩特借给王尔德一本福楼拜的《三故事》，里面对

希罗底和莎乐美进行了美轮美奂的描述。❶ 艺术是他们的共同立场。博德利偶尔看到他们在一起，发现“很难理解两人之间微妙的语汇”。❷ 然而他始终认为，佩特对“清白”而“易受人影响的”王尔德产生了腐化作用，并且理所当然地委婉提出，他的陪伴是令人倒胃口的同性恋。林肯学院院长马克·帕蒂森在1878年5月5日写下的日记中透露了当时的一些端倪：“去佩特家里喝茶，奥斯卡·布朗宁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像苏格拉底。他在一个角落里跟四个长得像女人一样的年轻人交谈着，共有五个那样的人正在相互搔首弄姿地逗着玩，我和佩特家的几位小姐坐在另一个角落里看着——不久，佩特出现了，身边陪伴着两个同样女里女气的青年，而刚才有人说他在‘楼上’。”虽然考试前夕王尔德不太可能出现在那个场合，但正是大约在那段时间，他通过佩特认识了苏格拉底式的剑桥大学教授奥斯卡·布朗宁。❸

佩特虽然生性内向，却向王尔德提出挑战，并激励了他。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问：“你为什么总是写诗？干吗不写点散文呢？散文的难度要大得多。”为此，王尔德颇费了些工夫去理解并回应这个想法。❹ 在这一点上，佩特的想法和他的许多其他观点一样。《文艺复兴》中大胆的论点为未来开辟了有待探索的前景。与此同时，王尔德渐渐发现他的新导师是“那种沉默而招人喜欢的大哥”。他说，佩特的沉默鼓励他开口说话：“他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听众，我和他谈了好几个小时。我从他那里学会了说话的技巧，因为每当我说出些不寻常的话语时，就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他不会赞美我，但会令人惊讶

地让我活跃起来，迫使我做得前所未有的好——这是一种强烈的生机勃勃的影响，是希腊艺术在鼎盛时期的那种影响。”^⑨

然而，对他施加影响的并非只有佩特一人。除了和佩特散步聊天之外，他也同罗斯金一起散步聊天。^⑩ 1877年秋季学期，这位史莱德教授回到牛津，以他的著作《当代画家》为名举办了一系列讲座。讲座令人难忘——每次“与其说是一场讲座，不如说它是一场谈话”，内容涉及许多题外话和其他话题；他也许“对特纳的一幅作品进行一番情意绵绵的阐述”，或者“描述一些他自己的精致的建筑绘画”，抑或长篇大论地抨击“摩登时代”，接着“戛然而止，转而呼吁他的听众尽早抓住机会坠入爱河”。^⑪ 王尔德在拥挤的大厅里显得与众不同，他总是倚着大厅一侧的门，“相当惹眼”——据一位同学说——“因为他的着装不同寻常。更出挑的是他那出色的脑袋。”^⑫

他喜欢罗斯金为现场带来的“激情之火和音乐的奇迹”。他欣赏罗斯金有关恐怖的现代工业时代的种种观点，并对其做了进一步发挥。一天晚上，王尔德在讲堂引导同伴们设想“所有的工厂烟囱和粗俗的作坊都被聚集在某个偏僻的小岛上”，这样就可以把曼彻斯特还给牧羊人，将利兹归还给牧场主，“英格兰又变得美丽起来”。^⑬

美，是罗斯金（和佩特）话语中伟大的主题，它在王尔德的思想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不断地寻求理解它的范围和阐明它的力量。他的摘录本中有一页——从柏拉图、斯温伯恩的《随笔与研究》，以及支持斯温伯恩观点的诸多法国作家那里搜集得来——这样写道：

只有美才是真实的。

美可以是奇怪的、古怪的、可怕的，她可以和痛苦、欢乐一同嬉戏，她可以驾驭恐惧，直到把它变成一种快乐。

艺术是唯一的，虽然艺术的作用千姿百态——美也可以体现在无数种不同的形式中，但对美的崇拜是简单而绝对的。

它是生命的皇冠和奖赏——永不凋谢的花朵，永不令人失望的快乐——也是早期教育的目标。

从小就把柏拉图挂在嘴上的孩子发现美的事物能带来一种快乐.....换一个地方，他会说，音乐的终点是对美的热爱.....这才是最高尚的教育计划。

美是完美的

美是万能的

美是世界上唯一不会刺激欲望的事物。 ⑨

为了表达自己对美的狂热崇拜，王尔德打扮得越发花哨华丽。他逐渐形成了明显与众不同的个人形象。他房间里的装饰变得更加考究惹眼。屋子里原本就摆满五花八门的“零碎物件”，现在又添加了沃德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希腊地毯”，以及他自己从伯罗奔尼撒带回来的纪念品“塔纳格拉小雕像”。 ⑩ 他似乎到梅里恩广场搜罗了圭多·雷尼的一幅印刷作品、教宗的大理石头像，以及一些精选的“小瓷

器”。^①他甚至还打算给天花板镀金。虽然有财务上的烦恼，奢侈仍是他的首选。他集合新美学风格的关键性标志，订购了几幅伯恩-琼斯画作的复制品，其中有三幅在格罗夫纳画廊展览上大出风头的作品。他还收藏“蓝白瓷器”——尽管他的热情远远超过了鉴赏力。他承认，在购买某件瓷器时，被人狠狠地“骗了一把”。^②

他房间里的定期聚会呈现出越加丰富的审美情趣：举行较多的是志趣相投的爱好者集会，而不是舒适惬意的大学生聚会。王尔德周围聚集起一个被他称为“美学小圈子”的人群，那些大学同学和他一样对艺术、文学和家居装饰充满热情。^③这个团体也接纳女性。他开始举办所谓的“美容派对”；教师的女儿们——在适当的陪同下——会受邀参加这类茶话会。玛格丽特·布拉德利（大学学院院长的女儿）认为，自己获得邀请主要是因为她与“年轻的雪莱画像”长相相似。玛丽安·维莱是牛津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的继女，她也是一名常客；她在一次聚会上遇见了她未来的丈夫，王尔德赠给她一幅伯恩-琼斯画作的复制品。王尔德作为主人，在这些场合占据主导地位。梅·哈珀（耶稣学院新任院长的女儿）注意到，人们“开始拜倒在他的脚下”。^④

尽管王尔德仍然“穿得像其他人一样”，但他还是设法让自己看起来“与众不同”。当然，他的身材、他的头发、有时还有一顶“宽边软帽”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⑤与此同时，他的举止也越来越自信。初次见面后不久，梅·哈珀在街上见到他，她的姑母说：“瞧，这不是你那位古怪的朋友吗？”王尔德摘下帽子向他们致敬，并“深深地鞠了一躬”。梅评论说，他“走到哪里都会引人注目”。^⑥王尔德

作为一个出版过作品的诗人，声望越来越高，但他不满足于此，他坚持认为自己是画家。他重新支起在圣三一学院用过的画架，上面很可能是同一幅未完成的风光画。他让人以为他曾在巴黎学习绘画，甚至声称——如果其他手段不管用时——要放弃文学“住到阁楼里，绘制漂亮的画作”。他解释说，有些艺术家“觉得自己的激情太过强烈，无法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他们发现深红色和金色是更适宜的语言模式，因为它们不是那么直白易懂”。^①

他培养起对花卉的热爱，那是威廉·莫里斯的设计、伯恩-琼斯画作，以及罗塞蒂的诗句所认可的另一个重要的美学标志。鲜花在他的生活和诗歌中占据了突出位置。他创作的诗歌中充满报春花、雪莲花、紫罗兰、番红花、玫瑰花、风信子、绣线菊、银莲花和“星星点点的水仙花”——尽管有时语言的韵律压倒了理智和观察。一位牛津的朋友称，他发现王尔德写诗的同时正在钻研一本植物学指南，他要挑选出“最好听的花名”，而根本不考虑它们何时何地开放。^②

然而，他也在很大程度上真正地热爱着鲜花。他认为举办一次完美的晚宴的秘诀是“不要很多吃的，不要很亮，但要有很多鲜花”。

^③他生病闷在房间里时，对“小猫”哈丁说，唯一能带来安慰的就是鲜花。“你能帮我从新大楼外面那棵可爱的开着红花的树上偷一枝花吗？我心里很难受，因为生活中缺少一些新鲜和美丽。”^④美丽的鲜花有治愈能力，这成为王尔德奢侈的美学观念之一。他在房间里摆满百合花。即便他没有像“早期佛罗伦萨人”那样，一次花几个小时站在那里凝视一朵花，他也要让别人以为他确实这么做过。^⑤他对水仙

花（“最完美的花”）抱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并且告诉梅·哈珀说，自己曾经“依赖水仙花活了两个星期”。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盘托出自己的荒唐行为，于是便“狐疑地环顾四周”，想知道她对这句新台词有何反应。发现她在笑，他急忙补充说：“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吃它们。” ⑩

王尔德不断提炼和发展他的才智，但他身上仍然留存着大学本科生无聊而天真的想法。他写给沃德的信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当然，我和贾普现在连泛泛之交都谈不上，但我曾经狠狠地让他出了次丑；那个怪物满脸放光地踏进餐厅，窃笑着说：“我很高兴他们把15英镑的奖学金给了琼斯。”……于是我故意说，“那个老醉鬼（爱德华·乔姆利·琼斯，一名莫德林音乐学者）竟然拿到了奖学金！确实是昏头了。”他病得不轻，于是说：“不对，我说的是万斯伯勒·琼斯（另一名获得半研究员奖学金的同学）。”我听了回答他：“我从没听说过这里有这么个人。”这件事搞得贾普在他那脏兮兮的床上待了一天，两天没去大厅里吃饭。 ⑪

但现在，与这种笨拙的玩笑相匹配的是更加巧妙的奇思怪想。

从王尔德在牛津时期的笔记可以看出，他当时正在尝试使用警句套路，浓缩他的知识，让他的思想能够被人记住：“形而上学的危险之处在于，人们往往以讹传讹地把名字转变为神祇”；“历史上，我们寻求的并非革命，而是进化”；“积累事实最容易，运用事实最困难”。 ⑫ 他开始在谈话中玩弄悖论，把“平平常常的讲话搅得天翻地

覆”。玛格丽特·布拉德利记得他曾对一个倒霉蛋说：“我记得你的名字，但我忘记了你的相貌。” ①

谈及美学狂热时，他逐渐形成了一种“奢侈”的表达方式（他用这个词称呼），使他的话语充满浪漫色彩。②但是，对于王尔德来说，乐趣从未远离：铺张的话语总是敌不过幽默，浪漫的想象在荒谬戏谑和微妙的讽刺面前落荒而逃。这成为王尔德独特的话语模式。如果他拿自己开玩笑，那并非因为他不相信自己的远见卓识，而只是想让别人喜欢并记住他的话。一次星期日晚间的聚会上，他对参加聚会的人说：“我发现要想配得上我的蓝瓷器是一天比一天更难了。” ③这句话机智地提炼了罗斯金的观点，认为艺术和美具有道德力量，可谓击中要害。这句话很快就在大学里传开了，将王尔德的恶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了欢声笑语、欣赏称赞和愤慨。④牛津大学的教堂甚至发表了一篇布道以示反对，它的开头写道（王尔德声称）：“当一个年轻人也许不是以优雅的逗乐口气，而是以清醒的认真态度说，他认为要想配得上他的蓝瓷器是件难事，此时，一种异教崇拜已经蔓延到了这片与世隔绝的阴影中，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之作战，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将其扑灭。” ⑤

与王尔德同时代的一些牛津人对他的姿态感到恼火，但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好脾气和才智为他赢得了认可，甚至是钦佩。⑥他的房间从来没被大学同学们“祸害”过。⑦事实上，1878年春天，他受邀参加了莫德林划船俱乐部的晚宴，并在席间举杯祝酒。⑧

然而，他的导师们对此并不以为然：王尔德从乡下回来后，他的作业就少之又少。他们确信他即将迎来第三次处罚。王尔德没有向他们做出解释，而是展开了一场密集的——但偷偷摸摸的——阅读和复习。他在教科书的空白处写满评语。他编了详细的笔记。假期里，他和朋友米尔纳熬夜读书。❶

他并没有排除一切干扰。划船比赛在学期的最后一天（4月13日）举行。王尔德前往伦敦。第二天是圣枝主日❷，他去了——如他间或所为——布朗普顿圣堂(Brompton Oratory)。尽管亨特-布莱尔可能已经对王尔德的精神漫游失去了兴趣，但这种漫游仍在继续。王尔德在牛津的社交成就似乎引发了一种反应，一种突发的、做作的、不真实的存在感。他寻求和布朗普顿圣堂的塞巴斯蒂安·鲍登神父进行一次面谈（他是一名老伊顿公学学生，当过兵，以在富人圈子里劝人改宗而闻名）。王尔德对他说：“我是一名幻想家和怀疑论者，不相信任何事情，生活没有目标。”他还讲述了自己在经济上的挫折——他被排除在亨利·威尔逊的遗嘱之外，以及出售布雷房产遭遇的法律僵局。鲍登神父敦促他回答“良心的刺痛”并改变信仰，接受“失去财富”是上帝在证明“俗世的空虚”。第二天，他写了一封信重申这些话，敦促王尔德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带着喜悦的心情尽快做出选择吧，困难将会消失，随着你的皈依，你将开启真正的幸福。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你会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新人，既符合自然法则，也遵循神的恩典。我的意思是，你将会抛开一切做作的、不真实的事物，因为它们配不上你内心的那个更好

的自我，过一种充满最深刻的兴趣的生活。像一个觉得自己有灵魂需要拯救，但拯救的时间转瞬即逝。因此我相信，星期四你还会来这里进行另一次谈话；请放心，我不会敦促你做任何事情，你只需顺从自己的良心。在此期间，请多祈祷，少说话。 ⑨

星期四到了。王尔德没有回到圣堂。他送去一盒百合花代替自己——百合花是纯洁和圣母玛利亚的象征，也是唯美主义运动的花卉象征。 ⑩ 他在最后的紧急关头做出决定：自己不愿意改宗。博德利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因为王尔德觉得自己改宗这件事还不够惊天动地。他并不是某个古老的新教家族的希望，不需要背叛贵族祖先的悠久传统，他只是都柏林一名医生的儿子。改宗之后，他只是“又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而已。 ⑪ 然而，对亨特-布莱尔来说，这件事情要更为蹊跷。他仍然相信王尔德是真的被天主教吸引，无法理解他怎么能明明看见了正确的答案却不去选择它。 ⑫

王尔德当然被天主教所吸引——从美学上，从精神上，从情感上——可是，吸引他的事物太多了。优柔寡断令他的学生时代充满刺激，为他的诗歌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但它们只能维持这么久。虽然鲍登神父可能把改宗视为一个新的开始，王尔德却只把它看作一个结果——而且不是他想要的结局。他正在逐步走向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他心中的“两位大神”是“金钱和雄心”。他可能会写信给沃德，说他渴望“真挚而纯粹”的生活，但这很难让人相信。 ⑬ 他的行为表明，他自己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点。他认识到，对他来说，正式接受任何排他性的教义（如他后来所说）必定是一种“错误”，会抑制

他的智性发展，是用“生命理论”代替“生命本身”。^① 他想要丰富教义，而不是从中做选择。从此以后，当别人问起他的宗教信仰时，他总是回答：“我觉得我没有任何信仰。我是一个爱尔兰新教徒。”

①

在决定不“投奔罗马”之后，王尔德到伯恩茅斯享受了几天新鲜空气，获取灵感并放松休息。

回到牛津后，他精神焕发，参加了赫伯特·莫雷尔夫妇在黑丁顿山礼堂举办的化装舞会。王尔德穿着紧身上衣和马裤长袜，光芒四射，被称为“鲁珀特王子”，在大约300名宾客中脱颖而出。他和梅·哈珀跳舞，告诉她“那天晚上他非常开心，因为他的鞋上有扣子”。他还向她透露，“深色头发”是“他一生的悲哀”。^② 然而，对于没有金发（或者，也许是红头发）的失望并没有破坏那个夜晚。王尔德总是回忆起那个特别的胜利之夜——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他获得了“特殊的地位”。^③ “我扮成鲁珀特王子，按照他的方式讲话，但实际上更成功，因为我把所有的敌人都变成了朋友。我度过了最美妙的夜晚。”他回忆说，每个人都围着他，让他说话。他几乎没跳舞。^④ 为了凝固并延长这一时刻，他不但穿着这身装束给自己拍了照，还买下这套衣服，这样他就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穿了。^⑤

王尔德的兴致一直持续到月底，甚至没有因为被迫参加必修的“信仰和宗教基础”补考而受到影响。登记考试后，当监考官问他打算选择“国教徒考试还是非国教徒考试”时，他的回答让对方大吃一惊：“哦，我选的是《四十九条信纲》。”“王尔德先生，你的意

思是，《三十九条信纲》？”考官纠正道。“哦，”王尔德做出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道，“真的吗？”考试那天，他迟到了，因为他的名字是以“W”开头的，所以他确信在开头的那一段时间内不会叫到他。当其中一位主考官斯普纳博士谴责他时，他轻描淡写地回答道：“您得原谅我；我没有参加及格考试的习惯。”作为惩罚，他被要求抄写希腊文版圣经《使徒行传》中冗长的第二十七章，描述圣保罗横跨地中海到罗马的航程。过了一会儿，有人告诉他可以停笔了，可他没理会，约莫半个小时后，他还在继续抄写。斯普纳说：“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王尔德先生，你不必再抄写下去了。”他回答，“哦，是的。我听到了。但是我对我抄写的内容很感兴趣，简直没法停笔。它讲述的是一个名叫保罗的人，他出门旅行，遇上了可怕的暴风雨，我担心他会被淹死，可是您知道吗，斯普纳先生，他得救了，我一得知他获救的消息，就想着要告诉您。”毫无疑问，他又一次考砸了。❶

第二天，1878年6月1日，王尔德开始“古典文学”笔试。尽管他不相信会考得很好——但还是和以往一样——设法摆出一副高高在上、信心十足的样子，“才过一个小时，便大踏步地走到监考桌前要求拿空白纸；接着又提前半小时交卷”，使得其他考生非常紧张。许多人都接受了王尔德所谓的自己几乎没怎么看书复习的说法，并且越发普遍地认为他一定是个“天才”。❷

王尔德考试结束一周后，这种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6月10日，他的诗获得纽迪盖特奖。这是一个美妙的胜利时刻。他的母亲欣

喜若狂：

哦，荣耀啊荣耀！万分感谢你发来的电报。这是今年以来我遇到的第一桩开心事——我是多么渴望能读到这首诗——噢，我们家终于出了天才。这太了不起了。这是律师抢不走的东西。哦，我希望你心里也感到开心——你已经获得了荣耀和认可——在年仅22岁（奥斯卡其实已经将近24岁）的时候，这可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我为你感到骄傲——我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它能确保你将来获得成功。你如今可以相信自己的才智了，了解它能实现什么——我真想看到现在你脸上的笑容。永远，永远为你开心和骄傲。

爱你的妈妈^①

威利在“都柏林所有的报馆”之间奔走，好让他们知晓这位同乡取得的成就。各种报道纷纷现身，并被地方报纸转载。^②贺信纷至沓来。^③奥古斯都·M.摩尔（乔治·摩尔的兄弟）甚至写了一首颂歌《致〈拉文纳〉的作者奥斯卡·王尔德》发表在《爱尔兰月刊》上。^④虽然亨特-布莱尔认为王尔德所谓的骑马抵达拉文纳（而不是乘火车）很可笑，而且反感他抛弃教宗转而追捧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的做法，但这首作品获得了广泛的赞许；《爱尔兰月刊》的评论员认为王尔德对拜伦的道德声誉评价太过慷慨。^⑤

王尔德希望麦克米伦公司能出版这首诗，但乔治遗憾地表示它不适合。王尔德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寻求传统的权宜之计，让布罗德街的书商施林普顿印刷成册。按照惯例，牛津大学的诗歌教授——当时是约翰·坎贝尔·沙伊尔普——在诗歌发表之前通读全文，提出了修改

意见。王尔德彬彬有礼地听取他的建议，甚至还做了笔记，但随后还是将诗原封不动地印了出来。这本书可能只是一本装订的小册子，但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标题页上，他还是兴奋不已。在施林普顿印刷的“几百本”小册子中，王尔德自己买下了“不少于175本”。^①

他把这本书献给了朱莉娅·康斯坦丝·弗莱彻——或者用他的话说，献给“《尼罗河小说》和《海市蜃楼》的作者，我的朋友乔治·弗莱明”。弗莱彻小姐和她的继父从意大利出发，当她到达牛津时，王尔德就能拿着一本印有自己名字的书（或者至少是一本小册子）以作家的身份同她见面。他在房间里为她举办晚宴，并介绍了她的文学英雄佩特。^②

在6月的“期末考试”中，王尔德不仅得到“特别嘉奖”；而且还收到一尊名为“青年奥古斯都”的大理石胸像。它是莫德林学院前毕业生的遗赠，专门留给下一位获得纽迪盖特奖的莫德林本科生。王尔德和几个朋友在莫德林修道院和胸像一起合影留念。威利是这个小组的一员。他是来参加“庆祝”周的。兄弟俩一起参加了大学学院舞会和共济会会员舞会（6月24日和25日）。奥斯卡凭借纽迪盖特奖，妥妥地成为牛津的名人。其间，甚至还可能出版过他的一幅肖像画。^③他理所当然地在后脑勺上戴了一顶“高大的白色帽子”，让自己显得非常“惹眼”。^④共济会舞会的第二天，他在谢尔登剧院朗诵《拉文纳》作为牛津校庆活动的一部分内容。

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通常都是闹哄哄的，经常被本科生观众各种打断。许多获奖者都害怕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但王尔德不怕。观众们听完冗长乏味的获奖论文——《论种族衰落的症状》之后，他获得了“专注的聆听”（《牛津暨剑桥本科学刊》报道）。人们已经对他抱有“极大的好奇心”，而他的朗读更使之有增无减。他把台词说得“相当好”。这首诗不但没有被打断，反而“不时得到掌声”，他在大家热烈的鼓掌声中落座。后来，人们“纷纷围拢来称赞”他，那些“非常杰出”的人（其中包括马哈菲）则对他“大加赞赏”。对于一个喜欢听“干得好！”的年轻人来说，这个下午非同小可。❶

因出售布雷房产而提起的法律诉讼让人备受压力和烦恼，诗歌获奖无疑在此期间给他带来了可喜的安慰。1878年7月8日、11日和12日，王尔德诉沃森皮姆公司案在都柏林副大法官法庭进行为期三天的审理。王尔德之前已经在一份宣誓书中提交证据，没有亲自到场；事实上，他似乎是到伦敦散心去了。❷三名律师代表他出庭，其中两名是王室法律顾问。他担心，判决结果胜负难分。因此便以他特有的夸张口吻对沃德说，他“完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无法承受”。❸事实上，7月17日副大法官做出了对王尔德有利的判决，允许他将房产出售给奎恩先生。他还判定王尔德获得赔偿。这笔资金相当多。不过，还不确定他何时——或者是否——能够拿到这笔钱。

❹

除去这些现实的问题，王尔德接到通知回牛津大学参加口试。他对笔试成绩的担心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他的论文再一次成为当年最

佳。❶主考人非但没有测试他，反而向他表示祝贺。他已经稳拿第一。❷

如果说纽迪盖特奖向世人宣布他是一位诗人，那么“双重一级荣誉”(Double First)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他的才华和智慧。虽然王尔德自己可能会贬低他的大多数同僚为“迟钝呆滞、三段论式的苏格兰人”，但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❸这让他在任何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团体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受认可的地位。这为他——至少在他自己的头脑里——所有夸张的姿态和精心策划的荒唐行为提供了根据。这还为他提供了一道屏障，使他不会轻易受到批评：无论他沉湎于何种愚蠢的行为之中，批评人士也很难将其斥为傻瓜。

别有乐趣的是，他获奖的事情引发了一片惊诧。他告诉沃德，莫德林的导师们“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坏小子最终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我跟所有人的关系都处于最佳状态，包括（糙汉）艾伦！我想，对于之前他对我的所作所为，他很后悔”❹。学院要求王尔德再待几天，参加7月22日的校友年度庆典，新近加入这一行列的赫伯特·沃伦发表了演讲，说了些“溢美之词”。❺王尔德在古典文学上取得的成功并不代表他的大学生涯就此结束。他的莫德林半研究员奖学金为期五年，他还得通过神学考试才能拿到学位。而且他也没有完全放弃寻求奖学金的念头。下个学期他还要返校。

然而，夏天是用来享受的。他和弗兰克·迈尔斯一起从牛津划着“桦树皮独木舟”到庞伯恩，“穿过激流，处处都有惊人之举”。

❻之后他回到了都柏林。不列颠科学协会正在城里召开年会，威利继

承父亲的衣钵，积极参与各项安排。奥斯卡发现自己也被吸引住了。他帮忙陪同一群人——其中有“大量女士”——去霍斯一日游。威利当时已经开始在《世界》周刊上发表文章，他为当天下午安排的一个活动高潮是，由“今年的纽迪盖特奖获得者”在古代环形石阵前“发表开场演讲”，其间他指出，和奥斯卡同名的传奇人物——奥西恩的儿子，就葬在此地。获奖诗人描述了为什么“古代爱尔兰人认为，吟游诗人可以通过诗歌一般的咒骂，给他讽刺的对象带来暂时的不幸”。至少在爱尔兰，人们认为诗人真的拥有威力。❷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位自信的年轻获奖者印象颇佳。当时正在牛津的奥索·劳埃德在不列颠科学协会的一次招待会上，惊讶地撞见奥斯卡正阴沉着脸打量T.H.赫胥黎漂亮而颇具艺术气质的女儿，“我们当时都在散步，还有些流言蜚语”；赫胥黎博士来了，“一句抱歉的话没说，拉起女儿就走”。❸

年会结束后，奥斯卡和威利去伊劳恩罗。他们在西部一直逗留到10月，参加了阿瑟·爱德华·吉尼斯夫妇在整修一新的阿什福德城堡举办的家庭聚会。无论是谈智慧、论思想、作诗歌，还是打草地网球，奥斯卡似乎始终是个中心人物，至少从威利写给《世界》周刊的一段话中判断是如此：

在遥远的西部能见到各种各样迷人的新兴团体。我特别要祝贺奥利弗·吉尼斯夫人在阿什福德新居举行的第一次盛大宴会。有关游园会和舞会的精彩叙述不绝于耳，附近郡县的人们纷纷随着斯拉波夫斯基的音乐起舞；有了湖泊、群山、蒸汽艇、优秀的同伴，以及一位真正

的诗人（更不用说草地网球了），西部的新教徒们理所当然乐享其中。❶

除了运动和社交，这个夏天还给奥斯卡和威利提供了一个制订计划的契机。他们决定，自己的未来——还有他们母亲的未来——应该在英国。奥斯卡在牛津的岁月，以及他在伦敦不断扩大的关系网，已经使他的兴趣和抱负的焦点离开了爱尔兰。他渴望有一个比都柏林更大的舞台和更广阔的场景。威利虽然仍旧野心勃勃想成为议员（而且受到鼓动并相信，他的名字和人脉关系也许会有助于搞到一个爱尔兰席位），但他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吸引力。他渐渐对从事法律工作不再抱有幻想。他明白，你需要有一个“当律师的亲戚来帮你”——光有“辉煌的成绩”是不够的。❷从他有限的经验来看，新闻行业似乎更容易入门，而且更能立竿见影地获得回报。报纸和期刊数量激增，读者群体不断扩大。这个世界的中心是伦敦。有一种见解令威利深受鼓舞，即许多出版物已经“厌倦了老头子”，正在寻找“年轻人”。

❸他已经获得《世界》杂志编辑埃德蒙·耶茨的认可，并引起了《雅典娜神殿》杂志编辑的注意，后者对威利在不列颠科学协会的表现印象深刻。议员戴维·普伦基特（奥斯卡在圣斯蒂芬俱乐部的赞助人）对此表示支持，另一位熟人表示，“他要是在伦敦从事媒体工作，一年就能轻松赚到1200英镑”。❹

对王尔德夫人而言，她觉得都柏林没有什么能够挽留住她。❺她已经与儿子们结成联盟，相信她的未来就在他们所选择的地方。尽管她遭受过重重打击，但精神依然没有消沉。奥斯卡的确从她那永不衰

竭的乐观精神中汲取了力量。❶首先，他们要出售梅里恩广场及其内部的陈设。尽管奥斯卡之前和布雷房产打交道的经历表明，这件事也许要拖很长时间，但它还是被提上了日程。❷

奥斯卡返回牛津途中经过都柏林时，得知弗洛伦丝·巴尔科姆订婚了，这更加深了他对都柏林生活的疏离感。她的未婚夫是威利在圣三一学院的老朋友布莱姆·斯托克，是都柏林的公务员和兼职戏剧评论家。奥斯卡就算曾经求过婚，也算不上是个热烈的求婚者。尽管这个夏天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爱尔兰，但他并不在都柏林，也没和弗洛伦丝在一起。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让自己享受了一次略微心碎的感觉。他表现出克制的样子写信祝她快乐，询问她是否可以归还自己送给她的那个刻有他名字的小十字架，以“纪念过去两年的甜蜜时光——我年轻时代最甜蜜的时光”。因为即将离开爱尔兰，因此他想象，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他并不知道弗洛伦丝也正打算移居伦敦，斯托克已经接受亨利·欧文的建议，同意担任兰心剧院经理。❸

被人抛弃并且失恋的诗人是一个有用的角色。王尔德前不久刚刚放下摇摆不定的天主教皈依者角色，这次心碎的经历便为他提供了新的诗意声音，以及新的诗歌主题。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似乎在一连串的诗歌中探寻出——或者，也许是逐渐生成了——他的情感，为爱情的短暂无常而懊悔，品味悔恨的痛苦和回忆的快乐：

那当然是一件美事，做一个

最受爱戴的人，哪怕只是一时间，

手牵手与爱神并肩走，看着

他紫色的翅膀掠过你的笑颜。

啊！纵然那惹人憎恶的欲望之蛇

以吞噬我这少年心为生，我毕竟

冲破篱藩，面对面与美神站在一起，

认识了那移动太阳和星辰的爱神！^②

回到牛津，王尔德不得不放弃他在大学里漂亮的房间，在高街（71号，一家药店楼上）找了个住处。他开始为奖学金而读书。这是最近的一项创新，由一个当时设在大学里的政府委员会设立。奖学金每年约200英镑，有效期7年，必须通过公开考试竞争获得。然而，各个学院正在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系统，能够获得奖学金的学生凤毛麟角。据一位与王尔德同时代的人回忆，这导致“大量且越来越多的一流人才只能苦苦等待，去竞争他们所能得到的任何东西”。^③第二年，只有三一学院和默顿学院宣布将提供古典文学方面的奖学金。竞争变得十分激烈。

为了赋予他接下来的研究一个特定的重点，王尔德还决定参与校长论文奖。该奖项1879年的主题是“历史批判的兴起”。从他的笔记来看——实际上还有一份手稿草稿——他很用功，描绘出古典史学从希罗多德到波利比乌斯的发展。也许他认为这是一条更容易吸引考官的思路（抑或仅仅为了挑战自己的知识水平），他一改以往将诗意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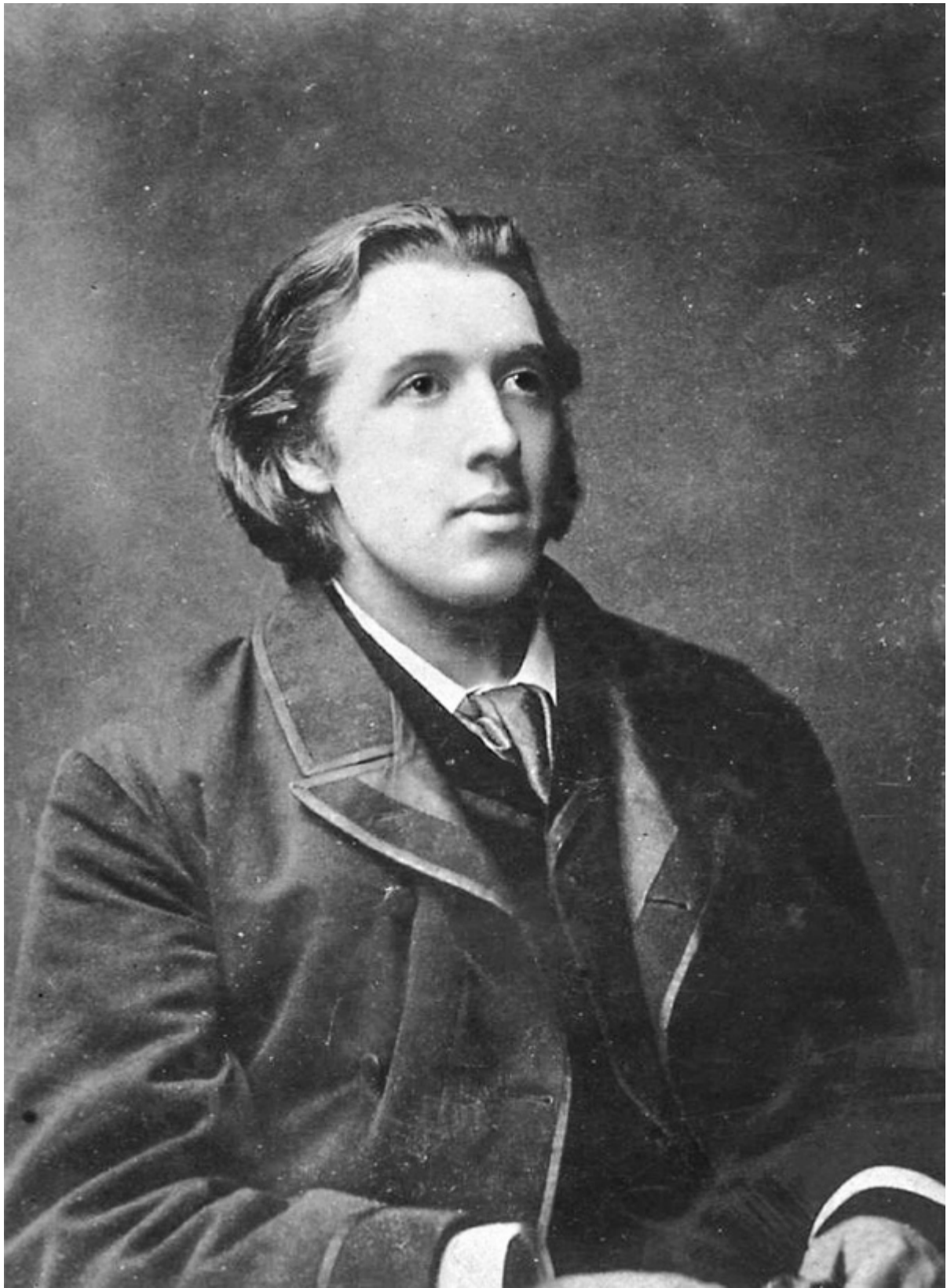
驾于科学之上的偏好，将“历史批判法”的发展描绘成一种进步，即从希腊神话的“致命遗产”——它将自然的理性秩序隐藏在奇迹的混乱之中——发展至后古典时期更加科学、基于事实的方法。❶

王尔德还扮演了一回认真谨慎的英国国教徒考生。1878年11月22日，他重新参加“信仰与宗教基础”考试，并获得通过。结果，接下来的一周，他取得了学位。❷期末聚会上，莫德林学院不仅同意免除1877年对他的罚款，而且还授予他一份价值10英镑❸的可自由支配的大学奖金。这张支票可能是王尔德学生时代的最后一笔金钱奖励，但牛津大学会一直以其他无形的方式充实着他的生活。

第三部分 快乐王子

1879～1881年

24～27岁



1881年，奥斯卡·王尔德

1 梦中的美人

对美的激情只不过是生活的强烈渴望。

——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获得学位后，将注意力转向伦敦与未来。他依然抱持着那个有点模糊的雄心壮志：“成功、名声，甚至恶名。”^①通向成功的方式也同样含糊不清。他只知道自己不会踏足任何传统职业。他对沃德说（后者踏实本分地开启了法律生涯），单调沉闷的商业“让人丧失自我，人们戴着面具，自然的模仿使他们的脸变得呆板无趣，死气沉沉”。王尔德手中的生活则将是“一件艺术品”——需要深思熟虑，塑造改良。^②他要戴上一副全然不同的面具。文学为此提供了各种可能性。他曾告诉牛津的朋友，自己可能成为“诗人、作家、剧作家”。^③然而除此之外，他似乎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他是一个牛津人，有才智，有一首获奖诗歌，他自命不凡，雄心勃勃，通达乐观，强烈渴望“尝遍世界花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实”，这就足够了。^④他还有一些钱，除了出售布雷的房产所得之外，他还凭借克朗费克尔的财产筹到了额外的250英镑。^⑤

做好这些安排后，他便在索尔兹伯里街13号，一栋凌乱的狄更斯式公寓租下几间房。房子离斯特兰德街不远，二楼是弗兰克·迈尔斯的住所和工作室。在访客们的记忆中，那是一座阴暗的老式宅第，里面住着一些古怪的租户，老处女一般的房东太太掌管着“古老的楼梯、曲折的过道、破旧的家具和昏暗的角落”，她和年迈体弱的父母共同

住在一楼。❶王尔德认为这个地方“凌乱且浪漫”。❷他住在迈尔斯楼下，把起居室——一间和房子同宽、镶满壁板的大房间——改造成了充满审美情趣的空间。壁板被漆成白色，为他在牛津大学期间置办下的各种艺术品提供了相得益彰的背景：蓝白相间的瓷器、摩尔风格的瓷砖、地毯和幔帐。为了给房间增色，屋里还有摆成扇形的孔雀羽毛，以及与之形成对照的大把向日葵和百合花。❸

同住在一幢房子里，王尔德有机会进入迈尔斯丰富多彩的社交圈子，艺术、时髦的波希米亚风格以及各种更先进的时尚社会元素在此融为一体。迈尔斯的工作室吸引了一众人物：作家、画家、演员、“名媛”、上流社会女性、花花公子（比如，罗纳德·高尔勋爵）。即使皇室成员也不例外：迈尔斯把他早期的一幅莉莉·兰特里肖像画卖给利奥波德王子，后者在议院开会期间经常来访；王子的姐姐路易丝公主热爱艺术，也是常客。年轻的王尔德刚到伦敦，便凭借迈尔斯的友谊接触到了一个无法轻易企及的尊贵圈子。他将这个领域想象得很浪漫，渴望去征服它。

他自己在伦敦有一些相当不错的人脉关系，其中包括牛津的同学以及家族友人，有些人也能帮上点忙。汤姆·泰勒是《笨拙》杂志的资深编辑（也是王尔德的熟人），对王尔德很感兴趣，他甚至写信给一位风雅的女主人，询问是否可以邀请王尔德参加她的舞会。❹坦南特夫人（一位牛津同学的母亲）在里士满露台举办过几次让人大开眼界的招待会。不列颠科学协会主席斯波蒂斯伍德教授和他好客的妻子，

在伦敦和肯特郡的库姆银行庄园热情款待了王尔德。教授还给王尔德签名，帮他申请了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出入证。❶

如果说王尔德以牛津人的身份来到伦敦，那么与此同时他还是个爱尔兰人——他和母亲一样，是个心怀民族主义自信和政治自由理想的爱尔兰人。在别人眼里，他的确如此。这样的定位标志着他是个外来者，也让他坚定地站在贯穿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社会的政治鸿沟——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的爱尔兰一方。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在协会中发现支持者。王尔德“找到了”侨居伦敦的“爱尔兰帮”，这是一个以文学界和政界人士为主组成的非正式团体，由小说家、下院议员兼“讨人喜欢的谈话高手”贾斯汀·麦卡锡主导。❷这个圈子甚至延伸到爱尔兰贵族的外围边缘。王尔德在伦敦社交场初期亮相时，最值得书写一笔的是，他参加了奥利维娅·吉尼斯夫人在卡尔顿府举办的舞会。那场面蔚为壮观——而且撩人。❸

5月初，王尔德的母亲从都柏林到伦敦，强化并扩大了王尔德与爱尔兰人之间的联系，此时威利终于卖掉了梅里恩广场的房子及里面的大部分东西。王尔德夫人和威利住在骑士桥区奥温顿广场一幢白色灰泥装饰的小房子里。王尔德夫人很快就开始在星期六下午小规模地为“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人士”张罗招待会，客人都是她在伦敦的爱尔兰熟人，也包括她的孩子们。威利和奥斯卡在伦敦同时出现的场合很少，她的聚会就是其中之一。一名客人记录了王尔德夫人端坐在两个忠实可靠的孩子之间的样子。如若不然，奥斯卡会在公众场合设法与

他的兄长保持一定距离。他想显示自己的独特之处。于是很快就有人说，他花钱请威利留起胡子，以免别人将他们彼此搞混。❶

显然从一开始，奥斯卡在社交和文学上的抱负就比哥哥更高。他一头扎进各种时髦的私人画廊，欣赏戏剧首演。他渴望大开眼界，备受瞩目。同时他对文化界的财富也兴趣盎然。他凭借与斯托克夫妇的关系，获得了兰心剧院的入场资格，亨利·欧文在那里创办了伦敦最激动人心、最具创新精神的剧团，埃伦·特丽是女主角。王尔德是剧院常客，甚至可能还——间或以化名的形式——向貌似独立的《剧院》杂志（实际上由善于宣传的欧文创办）投稿，该杂志对兰心剧院上演的剧目做了大量报道。❷对于醉心舞台的王尔德来说，如此接近艺术的中心实在令人激动不已。欧文成为他在伦敦的第一个“英雄”。❸

兰心剧院同时也成为有才华、有抱负的年轻人聚集地。其中就包括21岁的演员诺曼·福布斯-罗伯逊。❹他身材修长，举止优雅，面带微笑，神采飞扬，渐渐得了个“喜洋洋”的绰号。他是一个快乐的伙伴，对诗歌感兴趣，对绘画很在行。❺王尔德初到伦敦便结识了他，称其为朋友兼知己。❻福布斯-罗伯逊家有十个相貌堂堂的兄弟姊妹（兄长约翰斯顿在短时间内就成长为新生代的头牌演员之一），诺曼是其中之一，他们的父亲是艺术评论家约翰·福布斯-罗伯逊。星期五晚上，他们在贝德福德广场附近的家中举行热闹的聚会，那是将艺术世界和舞台融为一体的波希米亚式场合。王尔德成了常客，他为置身于如此刺激的群体之中而兴奋不已。❼也有许多人因他而感到兴奋。

王尔德在社交场上给人一种新鲜和出乎意料之感。他的外表和行为与大多数同时代人不同，甚至异于那些被公认具有审美情趣的人士；从当时的漫画来看，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留着胡须，耷拉着肩膀，身披斜纹软呢披风，头戴宽边帽。王尔德则另辟蹊径。他的体格在牛津大学本科生中鹤立鸡群——身材高大、没有胡子、头发稍长——而这些到了伦敦便似乎更加惹眼了。

他的“惯常装束”虽不古怪，但风格很不自然：浅色的裤子、黑色礼服外套，只系下面的几颗纽扣，让人一眼就能看见里面花色鲜艳的马甲；白色的丝质领结上夹着一枚镶嵌着紫水晶的老式别针。❶他下巴光光的，再加上脸色苍白，使得面容显得格外突出。这副长相既衬托出那双“热切的大眼睛”，同时也凸显出几个浅色的大雀斑，更让他那口“微微泛绿”的牙齿暴露无遗。❷有些人觉得他的模样——至少在第一次见面时——“怪诞”，甚至“令人作呕”。❸一个刚认识他的人干脆叫他“大饼脸”。❹然而，其他人整体来说都评价他是“一个外表英俊的年轻人……与其说是个普通人，倒不如说他更像阿波罗的化身”。❺他拒绝采用传统的男性化比喻，这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儿子朱利安·霍桑从王尔德身上嗅出“一种可憎的女人味儿”，他并非唯一对此反感的人。然而这种令人不安的“娇柔”似乎一直以来被认为干扰了社会规范，而不是性规范。❻

霍桑的不安很快就被王尔德言谈话语所引发的赞叹消除了。当然，从一开始，王尔德就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健谈者”——说话流利、生动、自信，并且拥有“出色的舞台表现力”。❷从牛津搬到伦

敦丝毫没有削弱他的自信心和高高在上的感觉。他会在举手投足间安排些引人注目的细节——“它们花样繁多”——比如手拿一双“淡紫色”手套。而且，如一位朋友所说，他的声音“圆润而柔和，是我听过的最迷人的嗓音之一，富于变化和表现力”。^①他说话时带着“精妙的”“音色和节奏”，其标志就是“牛津人说话时那种特殊的抑扬顿挫”，以及更富于个人色彩的“加强语气技巧”，比如“轻微的耳语声……呼吸时吸气的声音——比发出的嘘声轻得多”，它表示王尔德的故事讲完了。^②他的爱尔兰口音已经消失殆尽——如果不算上他那轻松安逸的凯尔特式做派的话。^③此外，他说的每句话都带着一种非凡的积极能量。他说起话来“兴致勃勃，显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想象和言谈之中”。他把快乐传递给别人。他“很有幽默感（不同于机智），极富感染力”；他的笑声也是如此——“非常饱满，充满热情”，而且笑得很频繁，让人猝不及防。^④

王尔德满怀热忱来到伦敦，热情油然而生，极富感染力。^⑤他在人生的这一阶段，活得“着实率真”。^⑥见过他的人都记得，他“总是面带微笑，充满热情，生机勃勃，满怀生活的喜悦，尤其是，对于任何他喜欢的东西和人，他都会予以无尽的赞美”。这种“热情赞美的天赋”，在当时的社会是一种“出人意料、令人愉快”的特质。这为他赢得了许多朋友，尤其在演艺界为他打开了许多大门。如果王尔德无意赞美，他会“耸耸肩，保持沉默”——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⑦私下里，他可能会非常尖刻，“一视同仁地拿朋友和敌人”开玩笑。他将一名性格乖戾的老太太形容为“那个用铁钉把假玫瑰花固定在秃头上的老女人”。^⑧

不过，他在谈到艺术时，确实保留了当年在牛津时养成的“夸夸其谈”之态。这让有些人觉得有趣，也让另一些人感到恼火。相当一部分人大概是依照演员兼经纪人斯夸尔·班克罗夫特的说法，将这种表现过火的行为视为“年轻人的做作”。然而，缺乏想象力的人往往意识不到其中那种自我讽刺的幽默成分，往往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忍不住斥责王尔德只不过是个“装腔作势的人”。^⑩朱利安·霍桑为此心绪不宁，觉得有必要出手干预。“王尔德，”一天晚上，他离开派对后说，“你为什么要让自己荒废在这些荒诞的虚构想象中呢？你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馈赠；你迟早会被发现的，你就不能表现得真诚一点儿吗，哪怕是几分钟？”王尔德的回答让霍桑更加不安：“我永远是绝对真诚的！”^⑪他已经明白，面具是用来表现的，而不是遮盖。很快，他开始有了名气——至少在伦敦的画室里——是一个“热爱艺术”的年轻人。这种热爱横跨了从文学到舞台，音乐到服装，绘画到家庭装饰等各个领域。^⑫

他很幸运，几乎从抵达伦敦的第一天起，就结识了一批美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与杰出的美学建筑师、前卫的“英日”家具设计师E.W.戈德温建立起友谊。戈德温不仅是福布斯-罗伯逊家族的朋友，也是埃伦·特丽的前任情人，并且正在切尔西新近时兴的泰特街上为弗兰克·迈尔斯设计一间工作室。王尔德认识了同为库姆银行庄园常客的艺术兼插画家沃尔特·克兰，王尔德“对美的真正热爱”令后者印象深刻。他还再次见到了惠斯勒。然而，时机不巧。惠斯勒前不久因与罗斯金的官司陷入破产，正打算前往威尼斯，他希望为那里的美术协会

制作一系列蚀刻版画来弥补自己的财产损失。戈德温在泰特街为他设计建造的白厅也挂出了待售的牌子。①

更直接的成果是王尔德与肯辛顿的新潮家庭西克特一家建立起交往。②西克特夫人将他置于保护之下。她是一位剑桥数学家和一个爱尔兰舞蹈演员的私生女，对外人有种天然的同情心；她的丈夫奥斯瓦尔德生于丹麦，曾在巴黎学画。他们有六个孩子，19岁的老大沃尔特是个雄辩机智的年轻人，尽管其抱负是当画家，却试图去舞台上闯荡一番，他在兰心剧院登台，是“欧文先生麾下的年轻人”之一。

王尔德一到伦敦，就希望结交“文学朋友”。③然而，他在这方面进展十分缓慢。尽管他似乎与好客的霍顿勋爵略有相识，而且曾经给格拉德斯通、迈克尔·罗塞蒂等人寄过富有诗意的名片，但如果他借此登门，结果必然是扫兴而归。④他想方设法见到了马修·阿诺德，也许还有乔治·艾略特。1880年12月，他带着一个很大的百合花花环去海格特公墓参加艾略特的葬礼。当马车拉着棺木经过他身边时，他试图把花环挂在棺木上，但未能如愿。⑤他在稍微年轻一些的人当中，倒是取得了些许进展。他被介绍给亨利·詹姆斯，表达了对其小说作品的钦佩之情。⑥他的所作所为让文学评论家埃德蒙·戈斯感到困惑不安。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戈斯对慷慨热情的王尔德谦虚地回应道：“恐怕你会感到失望的。”王尔德回答：“哦，不，我对文人从不感到失望，我觉得他们极有魅力。让人失望的是他们的作品。”⑦他与美丽时尚的辛格尔顿夫人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辛格尔顿夫人以“维奥莱特·费恩”为笔名，写了一首被认为坦率直白的诗。⑧他还

和查尔斯·G.利兰交上了朋友。利兰是一位中年美国喜剧作家兼民俗学研究者，当时住在伦敦，除了手头的几个项目之外，他还对工业设计感兴趣。利兰希望王尔德能入选成为萨维尔俱乐部的会员，那是伦敦最有文学气息的俱乐部，然而这个想法最后毫无结果。❶

不过，王尔德在伦敦早期最重要的友情既非来自文学圈也非艺术界。它属于莉莉·兰特里。王尔德在迈尔斯的画室再次见到了她。她在伦敦亮相两年以来收获颇丰，已经成为资深名人；是公认的首席“名媛”，威尔士亲王私下的情妇。人们争相一睹芳容，艺术家们抢着为她绘制肖像。“成功、名声，甚至恶名”纷至沓来——而她正值25岁。王尔德被她深深折服。当迈尔斯向一位朋友吹嘘说他“发现了……兰特里夫人”时，王尔德严肃地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比美洲更重大的发现。”❷ 兰特里本人也对王尔德很感兴趣；被他“熠熠生辉”的眼睛所吸引，发现他沸腾的青春热情之下闪耀着真正的智慧，以及“相当迷人、让人无法抗拒的个性”魅力。❸

他们很快就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王尔德仰慕兰特里的美貌，羡慕她的名望，后者则被他的活力和才智所吸引。这两样东西对她都很有用。她虽然高高在上，却深知自己的地位并不牢靠。在即将踏入第三个“社交季”的当口，她的运势出现了一丝难以察觉的转变。她和威尔士亲王的关系已经难以为继。她遭遇了诸多方面的困扰——经济、婚姻，以及感情。值此关头，她很需要一个聪明、有趣、乐观的新伙伴。❹

王尔德很快就将成名的渴望集中在写作上。他认为自己在文学上最大的抱负是成为公认的诗人。继大学本科期间撰写十四行诗之后，他一直在创作一些更长的作品：《伊底斯的副歌》(The Burden of Itys)描绘了希腊诸神在牛津郡乡间嬉戏的情景；《厄洛斯的花园》(The Garden of Eros)记录了他在诗歌方面对济慈、斯温伯恩、莫里斯和罗塞蒂的感激之情；还有一首《查米德斯》(Charmides)则是极度感性的济慈式经典幻想作品。它们虽然不适合在期刊上发表，但可以做成大量薄薄的小册子引起人们的兴趣。这就是王尔德的目标。一开始，他小心翼翼地尝试让出版商产生兴趣，但结果令人失望。许多编辑甚至拒绝读他的作品。王尔德不得不承认，在伦敦图书业的评价体系中，他仍然是个无名小卒。❶他第一次意识到，成名的进展可能比他预期的更缓慢。他得考虑其他选项。

当同时代的许多诗歌创作者试图将写小说（对出版商来说，这永远是一个更具商业吸引力的命题）作为迈入更广阔的文学世界的第一步时，王尔德转入了不同的方向。❷他开始写剧本。毕竟，看戏是他最大的爱好之一。在他看来，戏剧是“艺术与生活的交汇点”，其涉及的“不仅仅是人，而且还有社会人，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说得更现实一点，它很受欢迎——是当时的“民主艺术”：舞台上的成功会让人真正名利双收。❸

王尔德饶有兴味地发现很多演员及一些作家，同时从事着视觉艺术。约翰斯顿·福布斯-罗伯逊曾在皇家艺术学院学习绘画，继而办展；剧作家W.G.威尔斯——爱尔兰威尔斯家族成员，王尔德一直感觉

彼此间存在一条纽带——一直以来都是成功的肖像画家。❶他受此鼓舞也想延续大学本科时的想法，有朝一日遵循相同的路径。❷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为实现这个梦想真正做过点什么。

他努力抵御大众媒体的诱惑。为报纸撰稿虽然报酬优厚，但几乎没什么“成名”的机会，几乎所有文章都是不署名的。更何况，他的兄长威利已经踏足新闻业，并且在职场上崭露头角。威利在移居英国前，就开始源源不断地为《世界》杂志撰写一些“小块文章”，一到伦敦便从报社接手了更重要的任务。除此之外，他还为时尚周刊《名利场》撰稿，为《爱尔兰每日新闻》写戏剧评论。❸而对于奥斯卡来说，像阿诺德、佩特、斯温伯恩和罗斯金那样的文化评论家，才是更具魅力的角色。但是他们的论坛——那些高高在上的月刊，是他无法企及的。为了有朝一日能在《布莱克伍德杂志》《十九世纪》或《双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此刻的他只能姑且为《爱尔兰每日新闻》写一篇有关1879年格罗夫纳画廊夏季画展的综述。可见，无论从哪种意义上，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这篇综述（署名“O.F.W.”）的确给王尔德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借此赞美从伯恩-琼斯、G.F.沃茨（“我们所有在世的英国艺术家中最有影响力的”）到威廉·布莱克·里士满、惠斯勒（那位“奇妙而古怪的天才”）等人，他们是整个美学运动中他仰慕崇拜的众多大人物，渴望结交的伙伴。他借助这篇文章炫耀自己和一些人物的交情和关系，比如尤金·本森（朱莉娅·康斯坦斯·弗莱彻的继父）、约翰斯顿·福布斯-罗伯逊（他画了一幅“非常逼真”的演员赫尔曼·维津的肖

像）、“瓦伦丁·布罗姆利夫人”（艾达·福布斯-罗伯逊，罗伯逊家族天才的兄弟姊妹中的另一位）、玛丽·斯图尔特-沃特利（一个牛津朋友的妹妹）和W.G.威尔斯。虽然《爱尔兰每日新闻》几乎不在都柏林以外的地方发行，王尔德还是细心地将他的文章寄给了其中提到的每一位艺术家——并为其“糟糕透顶”的印刷质量致以歉意。❶

一开始，王尔德在伦敦确实获得了非常幸运的突破性进展。他强烈地引起了威利所在的《世界》杂志老板埃德蒙·耶茨的兴趣。耶茨计划推出一个名为《时代》的新文学月刊，与《世界》周刊同时发行，正在寻找撰稿人。他写信给威利，要求他与奥斯卡“默契配合”——“他获得过纽迪盖特奖，我听说过许多关于他的事情，人们都在夸他”。❷（其中一个不断向耶茨讲述奥斯卡的人很可能是维奥莱特·费恩，她自己也经常为《世界》周刊撰稿。）耶茨——他本人被称作“才华横溢的谈话高手”——很高兴能遇到另一个富有灵感的健谈者。❸他适时地邀请王尔德为创刊号写一首诗。

王尔德创作了一首60行诗，命名为《时间的征服者》——讲述大英博物馆石棺中的一颗种子长成了“白色的花朵”，它是“永恒之子”。❹《时代》月刊和王尔德的诗于1879年4月面世——《世界》杂志以及其他报纸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跟踪报道：它是王尔德在英语（而不是爱尔兰语）期刊上的初次亮相，标志着他在伦敦文坛正式登场。

耶茨擅长为他的明星作者打造声誉。6月4日，《世界》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关于道格拉斯-默里夫人在波特兰广场举办“化装舞会”的报

道，其中提到一些“看上去非常特别的人物”：维奥莱特·费恩扮成“印度公主”，“惠斯勒身穿‘夜曲’般的黑色天鹅绒，打扮成一个中世纪西班牙人”，以及“打扮成威尼斯贵族的奥斯卡·王尔德”。

① 这是一群尊贵的宾客，王尔德身在其中自然也尊贵起来。这篇报道很可能出自威利之手。威利的记者身份理所当然地让他在伦敦的各个圈子里“做了很多有助于奥斯卡出名的事情”。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持续地报道——既在媒体上，也在朋友和同事中间——“奥斯卡说过的，或者可能提及的每一句妙语”。在他的推波助澜之下，“关于王尔德的某种神话”开始形成。②

尽管王尔德在伦敦迈出了乐观的第一步，但他心里仍记挂着开辟第二个专业领域：学术界。他继续参加各种征文大赛（虽然至今无法确定他是否曾经提交过文章）。③ 他与乔治·麦克米伦通信，谈到可以为对方的公司做一些翻译工作——希罗多德选集，或者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戏剧。他参与了麦克米伦和A.H.塞斯的计划，为研究古希腊考古学建立一个希腊学会。④ 他打听到新近在雅典设立的考古学奖学金的情况。⑤ 之后，他决定申请牛津大学提供的下一个开放奖学金。⑥

牛津仍然是王尔德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似乎仍然在那里拥有自己的房间。他与佩特保持着联系，继续把他当成自己的参谋。一次（据王尔德自述），他们并肩坐在一条长凳上“看着学生们在河里洗澡”，谈起“浪漫的迷人芬芳可能与古典形式的质朴之美相结合”获得一种新的“艺术合成”，佩特——被王尔德卓越的口才征服——从座位上滑下来，跪倒在地，亲吻了他的手。⑦ 王尔德不但没有

忘记老朋友，还结交了新朋友。他发现了一个志趣相投、仰慕他的信徒，伦内尔·罗德是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本科生，具有诗歌鉴赏力和唯美倾向。罗德发起创办了一本小型诗歌杂志《流浪儿》，王尔德答应为其撰稿。❶和以往结交新朋友之后的情形一样，王尔德带着他去温莎拜访了罗纳德·高尔勋爵。❷剑桥也是王尔德的结交范围。他“令人心醉地”数次去国王学院拜访热情洋溢的奥斯卡·布朗宁，尽管他向雷吉·哈丁坦承，“我希望他不叫奥斯卡”（王尔德让布朗宁误以为，自己和他一样是“以瑞典国王的名字命名的”）。❸

在伦敦，王尔德和迈尔斯开始共同款待客人。他们显然恢复了王尔德在牛津的惯例，举办“茶叶与美人”派对，只不过宾客不再是牛津教员的女儿们，而是迈尔斯周围大名鼎鼎且通常很有贵族气派的“名媛”。这些“单身派对”在王尔德那间极具审美情趣的房间里举行——据一位年轻的宾客描述——“它们堪称全伦敦最有趣的事情”。❹房间内部的装饰风格别有情趣：有花朵，有羽毛，参加派对的许多戏剧界和文学界名人都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白色镶板上。并非所有的客人都是名人。21岁的劳拉·特鲁布里奇是跟随表兄查理·奥德来的，奥德是王尔德在牛津的朋友，她在日记中写道：“很有趣，有许多‘热情’的年轻人，这些笨蛋，逗死我们了。”❺

但对大多数客人来说，能见到兰特里夫人才是这些派对最吸引人的地方。王尔德发请帖时经常提到她可能到场，并持续不断地为她造声势。他把她比作一尊古典雕像，并告诉每个人，她是“希腊历来最可爱的尤物”。❻他无意中听见有宾客打听，在场的女士中哪个是那

位著名的美人，于是便夸张地道：“多荒谬的问题啊！如果太阳发出光芒，我当然知道那就是太阳。”^①无论如何，房间里挂满了兰特里的照片，客人应该看得出来。^②

有时，派对上会设置一个艺术焦点：迈尔斯的画作《海浪》在皇家艺术院获得特纳奖后，这幅油画就成了下一次聚会上令人骄傲的重点展品。^③爱德华·波因特绘制的莉莉·兰特里雍容华贵的肖像画也受到了同样的追捧，画家将其赠予了画中人。^④王尔德意识到，艺术与女性美是一种强有力的结合，既引人注目，又令人仰慕。他决定利用这种力量。当他第二次在《时代》月刊上发表作品时，便抛弃了抽象的东西，为莉莉·兰特里创作了一首纵情的赞美诗。诗句中虽然没有提到她的名字，但很明显，诗歌的题目“新海伦”暗指的就是她——“爱情的百合花，纯洁而不可亵渎的花儿啊！象牙的塔楼啊！火一般灼灼燃亮的红玫瑰！”^⑤王尔德后来说：“的确，特洛伊就是为了这种女士（像兰特里这样的）而被摧毁的，很可能为了这样一个女人，特洛伊会被摧毁。”这样的说法进一步强化了兰特里和特洛伊的海伦之间的联系。而且他还在送给她的一本书上题词：“致海伦，旧居特洛伊，现居伦敦”。^⑥

然而，兰特里并非王尔德歌颂的唯一一个美人。5月底，莎拉·伯恩哈特率法兰西喜剧院抵达英国，准备在伦敦的欢乐剧院打响第一炮。34岁的伯恩哈特是当时最耀眼的戏剧明星——巴黎人成熟与性感的化身。王尔德与诺曼·福布斯-罗伯逊一起去福克斯通迎接她——以及剧院其他成员——的船只。

人群聚集起来。福布斯-罗伯逊冲到前面，给伯恩哈特献上一朵梔子花。人群中有人（用法语）对女明星说：“他们很快会用花朵铺成地毯来迎接你。”王尔德领会了这个暗示，于是喊道：“瞧这儿！”说着，便把满怀的百合花撒在她脚下。当伯恩哈特小心翼翼地
从鲜花上踩过时，他叫起来：“嘿，嘿，万岁！莎拉·伯恩哈特加油！”——引来周围人群的热烈响应。这位年轻的啦啦队长“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留一头长发”，给伯恩哈特留下了深刻印象。❶

6月2日王尔德观看了剧团首演，伯恩哈特因为在拉辛的作品《费德尔》(Phèdre)中的精彩演出而获得满堂喝彩。他认为这是自己历来目睹的“最辉煌的创作”。❷在舆论的一片叫好声中，王尔德添上了一首充满诗情画意的赞歌。他在十四行诗的开头写道：“对于你这样一个人来说，我们这个俗世一定显得多么乏味而空虚啊！”一周之后，这首诗没有刊登在《时代》月刊，而是发表在它的姊妹期刊《世界》杂志上，这样便能获得更大的关注度。威利满怀热情地写信给一位女性朋友，询问她是否看见“奥斯卡”在“报纸上匍匐在伯恩哈特的脚边，倾诉他的灵魂”。❸❹

把自己的名字和创作灵感与两位明星人物——兰特里和伯恩哈特——牢牢拴在一起之后，奥斯卡立即将注意力转向第三位：美丽的埃伦·特丽。他写了两首十四行诗，一首赞美她在W.G.威尔斯的《查理一世》中的表演，另一首则夸赞她在《威尼斯商人》中扮演的鲍西娅。两首诗都刊登在《世界》杂志上。❺王尔德凭借这些赞歌树立起自己

的地位，他是颂扬女性美的桂冠诗人，拥有了固定的读者群，并从他笔下的魅力人物身上获得了回报。

他努力强化这些人际关系，并且收获了女主角们的友谊。他将第一首十四行诗献给埃伦·特丽时，向她保证“从来没有哪位女演员像你一样对我产生过影响”。^⑨王尔德是伯恩哈特逗留伦敦期间的“忠实随从”；他非常开心能有机会炫耀自己的法语。^⑩伯恩哈特去过索尔兹伯里街几次，一天晚宴尽兴之后，她在刷白的镶板上潦草地添上了自己的名字。^⑪^⑫王尔德在与伯恩哈特相处的过程中意识到，她不仅是个“了不起的天才”，而且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伯恩哈特很欣赏这名随从的机智和精明。“那些对待女演员彬彬有礼、大献殷勤的男人，大多数都别有用心，”她后来回忆道，“奥斯卡·王尔德不这样。他……为了让我在伦敦过得舒心安逸，做了很多事情，但他似乎从来都没有追求过我。”^⑬这句恭维话虽然听起来似乎有点拐弯抹角，但看得出来，在漂亮女人眼里，王尔德很讨人喜欢；他把她们当成普通人，当作朋友对待。

毫无疑问，这样他就仍然是弗洛伦丝·斯托克心碎的旧情人：他必须远远避开（正如他在诗歌《人性》中所写）爱情那“高尚的疯狂”，“必须离开这甜蜜的毁灭而逃亡出奔”，虽然他永远无法忘记那位美人，“曾经在一小段时期内，使我的青春缠绵钟情于精美的懒惰”。^⑭回忆驱使他在“弗洛莉”初次登台时——通过埃伦·特丽，以匿名的方式——送去一顶花冠，想要“让她戴上属于我的物件……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可以触碰到她”。他在信的结尾夸张地泪泣

道：“她以为我从来没有爱过她，以为我忘了她。我的天哪，这怎么可能！” ②

莉莉·兰特里或许曾经引诱他忘记旧日的恋人，虽然她自己并没有怂恿他这样做。她想要的是一个随从，而不是再多一个情人。王尔德为她做了很多事情。他成了她的非正式秘书，替她写信，帮她处理各种杂事。③ 他为她的穿着打扮出主意，鼓励她铺张奢侈。她偶尔会提出异议；一次，王尔德抱怨说：“莉莉太烦人了。她不愿意听我的劝告……我向她保证，不论是为了她自己还是为了我们，她都应该每天穿着一身黑，坐在黑马拉着的黑色维多利亚式马车里，黑色的软帽上用暗蓝宝石衬饰着‘耶稣纪元后的维纳斯’ (Venus Annodomini)。可是她不肯听。” ④ 他培养了她的思想独立意识。莉莉·兰特里成长在一个全是男孩子的家庭里，掌握些粗浅的古典文学知识。王尔德鼓励她继续学习。他给她上拉丁语课，定期带她去大英博物馆，陪她去伦敦大学学院倾听查尔斯·牛顿关于希腊艺术的讲座，兴奋异常的学生们会在那里夹道欢迎他们的到来。⑤ 他带着他的思想导师罗斯金去看她。她注意到，王尔德在“大师”谈论“希腊艺术”时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极端崇敬和谦卑”，并且猛烈地抨击日本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拙劣可笑版本。王尔德注意到，当罗斯金说到“像你这样的美丽女人掌握了世界的命运，既能创造也能毁灭”时，“（兰特里）哭着跑出了屋子”。⑥

王尔德作为秘书助理兼导师，确实带着一点骑士之爱的意味。兰特里夫人既是他的缪斯女神，也是他不可企及的崇拜对象。他用诗歌

和鲜花表达爱慕之意。二者都很受欢迎。有一次，他去考文特花园给她买了一大束“泽西百合”，等候出租马车时，一个街头小子被这些橘黄色的鲜花惊呆了，大声叫道：“你真有钱啊！”（这段轶事——显然集美丽和财富于一身——让罗斯金听了很开心。）^⑨当然，就财务状况而言，王尔德一点儿也不富有，他常常不得不为了给兰特里买一枝孤挺花而放弃坐车。^⑩

但是，就所有这些优雅俗套的做派而言，王尔德看上去确实已经沉迷其中。他甚至敢于接近不可企及的人。创作《新海伦》的时候，他经常出没于兰特里家附近的街道上。一天晚上，兰特里先生很晚才回家，发现他竟然蜷缩在门前的台阶上睡着了。^⑪王尔德的一些未发表的诗歌暗示，他可能经历过一段挫败的罗曼史。《玫瑰与芸香》——其手稿的标题是“致L.L.”——叙述诗人深深地爱上了一个说话声音发颤、神态像小鸟一样的美人，她虽然允许他俯身亲吻，却认为他根本不配：“你只能怪怨自己，”她对他说，“你没有名声。”对此，诗人回答道：“的确，我是挥霍了我的青春，但那是为了你，你的书架上摆满了诗人，我也把自己献给你！”不过，与其说这些诗句是对事实的回忆，倒不如说它是种美好的想象。^⑫

当王尔德的热情变得“过于执着”时，兰特里不耐烦了。这并不是她所需要的。正如王尔德的一位朋友后来所说，“他根本不是她追寻的猎物。”^⑬她与威尔士亲王的婚外情渐渐冷淡下来后，为了弥补这段空缺，不仅与他的堂兄、风度翩翩的巴滕贝格亲王路易斯交往，而且还和年轻的施鲁斯伯里勋爵有来往。她在和这两个大名鼎鼎的人

物展开暧昧关系的同时，还与她童年时的朋友阿瑟·琼斯保持着一段秘密关系。❶所有这些男人也许有时候会对王尔德心怀不满，因为他有接近“新海伦”的种种特权，而且她显然很享受他的陪伴。但值得存疑的是，他们是否真正地将王尔德当成过赢得芳心的对手。❷

她让王尔德恪守本分。“我担心自己为了摆脱他，说过不少伤害他感情的话。”她后来如此回忆道。有一回，他因为一番评论惹恼了她：“男人总是不忠的，女人却因为天生轻浮让他们相形见绌。”那次，王尔德给她唱小夜曲乞求宽恕。还有一次，兰特里“坦率地”抛弃了王尔德之后，坐在自己的剧院包厢里发现，“正厅前排一阵骚动——那是奥斯卡，他突然发现了我们，流着眼泪被他的朋友弗兰克·迈尔斯带了出去”。❸不过，她心里很有把握，自己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将他召回身边。一次，她怠慢了王尔德之后，在给他的信中娇媚地写道：“我无法原谅我自己，所以只能恳求你原谅我。”❹❺

王尔德一直处于兰特里的支配之下。不管他有什么特权，有多少学识，他仍然是个奴隶，而且他毫无怨言。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得他既令人羡慕，又惹人眼目，这就足够了。《新海伦》发表后，他确凿无疑地成为公认的“她的吟游诗人”。❻当上流社会诗人弗雷德里克·兰普森为兰特里夫人创作诗歌时，他在其中一节诗的开头遗憾地写道，“我无法像奥斯卡·怀尔德(Oscar Wilde)那样押韵。”❼

1879年夏天，王尔德带着罗纳德·高尔勋爵的美术馆指南，到比利时进行一次短暂的文化之旅。❽他的旅伴是新朋友伦内尔·罗德。他们一起参观图尔奈，对那里的一座哥特式墓葬产生了兴趣。墓葬上描

绘的是一个穿着盔甲的骑士，上面刻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Une heure viendra qui tout paiera)。罗德将它充满诗意地翻译成“一个弥补一切的时刻，终将会到来”。对王尔德来说，这个“奇怪的传说”，“不禁让人觉得，也许人死之后，激情仍在延续”。^①在布鲁塞尔的博物馆里，鲁本斯的“杰作”《背负十字架的基督》以其闪闪发光的色彩和敏捷而富于动感的人物动作给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那是”，王尔德抛开其忧郁的主题认为，“艺术的乐趣”。^②

王尔德与罗德一家在比利时阿登地区的河畔旅游胜地拉罗什小住了一阵。除了罗德普普通通的父母和妹妹之外，那年7月的莫尼耶旅馆简直就是在举办文学聚会。同时入住的宾客中有酷爱济慈和雪莱的20岁荷兰诗人雅克·佩尔克，丧妻的比利时地质学家、小说家、诗人兼艺术史学家格扎维埃·德勒尔，后者当时正带着两个孩子及21岁的亲戚马蒂尔德·托马斯小姐在那里度假。即便在这样的一群人中间，王尔德也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德勒尔8岁的儿子保罗清楚地记得王尔德“高个子，脸色苍白，刮光了胡子，留着长长的黑色直发，他身穿白色的衣服，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从他那高高的宽边毡帽到他的手杖，那是一根象牙色的权杖，顶部是圆的，我经常拿着它玩。我们叫他‘皮埃罗’”。^③他已经看起来是“一副艺术家的做派”。^④

在热烈向上的氛围中，王尔德会走到青铜谷，坐在一块扁平的墓碑一样的岩石上朗诵几首自己的诗歌。虽然保罗年纪尚小，觉得他嗓音拖沓，节奏单调，样子很有趣，但其他人似乎都很受感动。雅克·佩尔克——暂时把献给马蒂尔德的十四行诗搁在一边——写了一首热情

洋溢的小诗描述王尔德：“这位英国青年浑身散发出青春的气息，充满才智，还有欢乐和愉悦，他在内心是个诗人，讨厌一切恶的事物。” ① ②

那年夏末，王尔德在迪耶普拜访了之前在那里租下房子的西克特一家。西克特夫人邀请了他，他似乎很享受无拘无束的家庭海滨度假方式。那是一段充满欢笑的时光。王尔德与西克特的独生女海伦娜成了特别要好的朋友。海伦娜15岁，立志上剑桥大学；王尔德和她讨论诗歌和思想。王尔德讲的奇幻故事也让海伦娜的两个小弟弟奥斯瓦德和里奥十分开心。每当海伦娜假装怀疑故事的真实性时，他就会假装忧伤地请求她：“你不相信我，内莉小姐。我向你保证……唔，这故事千真万确。” ③ 一天下午，大家坐在果园的苹果树下，说服他朗诵获奖诗歌《拉文纳》；西克特夫人的老师斯利小姐不时打断他，纠正他发音中的小错误，然而王尔德始终心情愉快。 ④

然而，无忧无虑的夏日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9月，王尔德回到伦敦听到一个噩耗，他的朋友莱昂纳德·蒙蒂菲奥里在美国突然去世。他只有26岁，只比王尔德大一岁。 ⑤ 然而，生命固然无常，生存却非常现实：王尔德此时已经负债累累。 ⑥ 他的收入很少，却支出频繁，品位奢侈。他有两条自己的经济原则：“把奢侈品都拿给我，这样你们都能获得必需品了”，以及“过度带来的尽兴无可比拟”。 ⑦ 尽管 he 可以用所谓爱尔兰的房租尚未到账之类的说辞来搪塞债主，但负债却丝毫没有减轻。 ⑧ 偶尔发表在报纸上的几首诗，只能带来微薄的收

入。他开始借钱，一开始向他母亲借（他母亲也负担不起），后来又向一个名叫埃德温·利维的放债人借钱。❶

王尔德在这样心事重重的情况下，参加了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开放奖学金考试。❷ 他为考试做了准备，但也许数个月的伦敦生活难免让人在学术上分心。一名考生描述他第一天下午出现在考场时，温文尔雅中带着窘迫：

试卷考的是形而上学，题目出得很烂，主要包括几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比如，“形而上学和道德伦理之间有什么关系？”“形而上学和宗教之间有什么关系？”“形而上学和艺术之间有什么关系？”等等。试卷发下来没多久，王尔德站起身，在大厅的炉火前舒展了一下肢体，然后傲慢而愉悦地对我们说——“绅士们，出这份试卷的人简直不学无术。我注意到，每个问题中都有‘形而上学’这个词❸，上流社会从没有这么说话的。”❹

他没有拿到奖学金。虽然他一直渴望找个“收入稳定”的位置，却没有申请下一个可能得到的奖学金（12月在默顿学院）。❺ 相反，他申请了雅典的“考古学奖学金”，并请求塞斯支持他的申请，因为他听说还有许多其他的“竞争者”。❻ 结果证明，申请的人确实太多了。那次挫败之后，他考虑追随马修·阿诺德的脚步，申请学校督学的职位，并且请求奥斯卡·布朗宁支持自己。❼ 然而，他又一次失败了。

他考虑当老师。给莉莉·兰特里讲授拉丁语课程唤醒了他的教书本能——而他与哈里·莫里利尔的友谊又进一步激发了这种本能。莫里利

尔是基督医学院学生，有时候住在索尔兹伯里街13号一楼他叔叔那里。王尔德鼓励这个穿着蓝色长袍的14岁聪慧少年学习古典文学，利用半天假期和他一起读欧里庇得斯的作品。莫里利尔给王尔德端咖啡，作为对这些课程以及聊天的回报。如果莫里利尔来的时候恰逢王尔德有事，他会给这个男孩半克朗，让他去剧院。❷ 为了把自己的教学技能——以及他在希腊和意大利的经历——变成钱，王尔德把自己包装成一名“旅行导师”，要价是每月30英镑。不过，他不确定是否能找到主顾。❸

尽管遭遇了诸多挫折，而且财务危机不断，但王尔德对他人的困境表现出深切的关注。他参与筹款活动，写信给罗纳德·高尔的妹妹康斯坦丝·威斯敏斯特，请求她为一件“最值得也最令人难过的案子”提供资助（公爵及时寄来10英镑）。❹ 另一次，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兰贝斯发生洪水，王尔德——和伦内尔·罗德一起——前往被洪水洗劫一空的贫困家庭，看看能否为他们做些什么。罗德回忆王尔德在一名卧床不起的爱尔兰老妇人“破败的出租房”里的情形：他用“他的快乐幽默”为她打气，资助她“买一点点生活必需品，他说，她为他祈祷‘愿上帝在天国给您一个安身之地’就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应得的报偿”。❺

这些小插曲无疑源自王尔德在牛津大学时从T.H.格林那里受到的有关慈善传统的教导。这些做法很可能也获得了罗斯金的认可，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穷人利益捍卫者。1879年下半年，王尔德经常去看望这位年迈且日渐虚弱的导师。他仍然对罗斯金投身社会以及社会问题的

做法深怀敬畏，认为“他像基督一样，承受了整个世界的罪孽”（王尔德总感觉自己“像彼拉多一样，逃避所有的责任”）。^①他带罗斯金到兰心剧院观看欧文的夏洛克。^②之后，王尔德参加了米莱夫妇举办的大型舞会，庆祝他们女儿的婚礼。“真奇怪，”他对雷吉·哈丁说，因为他意识到，埃菲·米莱曾经在19世纪50年代嫁给罗斯金，但后来和画家私奔了。^③

王尔德邀请罗斯金到王尔德夫人的奥温顿广场“做客”。^④他还把这位伟大的批评家带去里士满区的坦南特家，去看多莉·坦南特创作的儿童画。罗斯金觉得画作非常不错，很喜欢这个24岁的艺术家。他取消了下午拜访莉莉·兰特里的计划，告诉坦南特夫人他已经爱上了多莉和她的妹妹埃维，“那两个可爱的姑娘”。^⑤他后来向王尔德透露：“我确实认为多萝西和我在某种程度上‘相处得还不错’，我认为我们应当再进一步——你最好留神点——我总是很招这类女孩子喜欢（这倒不是说，她和我以前见过的女孩子一样）。”^⑥他觉得她很有潜力，如果她努力的话，会成为大人物。^⑦

王尔德自己的成名计划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展开。1879年11月底，他写了一篇感伤的文章，叙述和朋友希克斯比奇全家一起“消磨时光，打野鸡，无聊到巴不得放火把整个世界点着”。^⑧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士记录下一段生动的对话，当时王尔德的朋友兼支持者斯波蒂斯伍德夫人刚刚赶到一次茶话会便宣布，她只能待一分钟，“因为我要去奥斯卡·王尔德家，要去见兰特里夫人和其他几位名媛”。一位著名教授听到“奥斯卡·王尔德”这个名字前居然没有“先

生”二字，感到很惊讶，便问道：“谁是奥斯卡·王尔德？”斯波蒂斯伍德夫人听了之后，比他更诧异，于是答道：“奥斯卡·王尔德是个诗人。”然而，当被问及他写过什么作品时，她答不上来了，直到她身边年轻人出面帮她解围：“嗯——哈——奥斯卡·王尔德还没写过多少……但他在大学期间的获奖诗歌很了不起。”教授听了这番话之后，露出一副讥讽的神态”。对此，女主人承认“昨天我发现自己真的是被冷落了，因为我对奥斯卡·王尔德一无所知。但如果他的作品尚未出版，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那样盯着我看”。^⑨

2 小丑和笑话

他比他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查尔斯·里德

显然，奥斯卡·王尔德尚未获得成功。事实上，伦敦生活的第一年临近结束时，尽管他和莉莉·兰特里的关系已经名声在外，但他的纽迪盖特奖诗歌已经渐渐失去光彩，而令他最出名的或许在于，他的名气并没有朋友们和支持者们所吹捧的那么高。

然而，潮流开始转向了。王尔德一直很下功夫——在培育人际关系，跟进各种邀请方面。他没有固定工作，如一位毫不客气的观察家所说，除了“绕着伦敦小跑，跟别人打嘴仗”之外，无所事事。他努力让自己显得和蔼可亲，结果很有成效。⑩他受益于这样一个现实：曾经封闭的贵族化、党派化的传统社会正开始渐渐扩大和开放。虽然在所谓“上流社会”中存在着微妙的等级划分，许多老牌地主家庭仍然置身事外，但旧的分歧正在逐渐消失，暴发户找到了立足之地。各种招待会和宴会上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信条。专业人士获得了进入时髦客厅的权利。艺术家就是其中之一。有时候甚至连戏台都可以登堂入室。有几位新潮的女主人（她们富有，但并非贵族）一马当先，向“每一个有趣并卓越的人士”敞开自家大门。⑪王尔德从这种崭新的气氛中获益良多：他即便算不上“卓越的”，也确凿无疑是“有趣的”。

更何况，女人们喜欢他，女人统治着社交界。宴会的宾客名单是她们列的，请柬是她们发的。男人们也许认为王尔德“娘娘腔”“做作”，他们可能厌恶名媛们把他当作宠儿的样子，他们也许会在吸烟室里拿他开玩笑，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在不由自主地邀请他登门。他们的妻子喜欢王尔德滔滔不绝的谈话、他的文化底蕴、他的聪明才智，以及他对室内装饰和穿着打扮的看法；她们乐于听取他的奉承，喜欢他的幽默风趣。❶他将她们的聚会提升了一个档次。宴会桌上坐在王尔德旁边被视为一桩乐事。他离开牛津后不久，一位贵族夫人在“赫胥黎晚宴”上遇到了他，她认为自己“从未见过这么神奇、聪明的人”。❷❸

王尔德喜欢孩子，这一点也对女人们特别有吸引力。很多小女孩都像茜茜·马克西夫人的7岁女儿维奥莱特·马克西一样，被他的故事和笑话迷住了。❹年纪稍大一点的女孩也觉得他很招人喜欢。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柔弱”不但不让人讨厌，反而使他在异性面前很有吸引力。劳拉·特鲁布里奇和她的一个妹妹“都深深地爱上了他”，劳拉在日记中写道，她们认为他“非常讨人喜欢”。❺王尔德当然喜欢这种赞美。他说服古西·格雷斯韦尔带着特鲁布里奇家的姑娘们参加他在索尔兹伯里街举行的茶会，作为交换，他把古西介绍给莎拉·伯恩哈特。

❻

但是，即便王尔德很享受女性的关注，他也很少花费心思去跟进。弗洛伦丝·巴尔科姆依然是他挥之不去的记忆。他曾经那么仰慕的朱莉娅·康斯坦斯·弗莱彻在经历了爱情挫折之后，似乎已经变得遥不可

及。他和弗朗西丝卡（弗朗姬）·福布斯-罗伯逊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融洽关系，但这是一种牢固的友谊，并非爱情。伦纳德·蒙蒂菲奥里的不幸离世确实让王尔德与伦纳德的妹妹夏洛特走得很近。而且，根据家族传统，他甚至向她提出了求婚。不过，尽管她真心喜欢他，但还是一口回绝了，并且得到了一个潦草的回复：“对于你的决定，我觉得很遗憾。以你的金钱和我的头脑，我们本可以鹏程万里。”^⑩

王尔德在极大程度上喜欢那些散发着魅力，更加遥不可及的大人物。当出身波兰的著名女演员海伦娜·莫杰斯卡1880年2月初从美国抵达伦敦时，他自封为她的追随者。^⑪ 他把她介绍给重要人物，写诗称颂她的美貌，热烈讨论她的作品，安排她利用弗兰克·迈尔斯的画室请人画像。他在慈善义卖会上当她的“追随者”，自告奋勇为她改编剧本，把她的波兰语诗歌《艺术家的梦想》(Sen Artysty) “翻译”成英语，发表在《劳特利奇》一年一度的圣诞特刊上。他逗她笑；她很乐意听他描述自己的成就，当她用难懂的波兰语为英国观众朗诵诗歌时，大家都哭了，因为她的声音“撩拨了人们神经系统的最末梢”。

^⑫ 莫杰斯卡尽管被他的热情所感染，但还是对这位年轻的追随者感到有些迷惑不解：“这个年轻人究竟做过些什么，怎么到处都能见到他？”她问，“哦，是的，他很会说话，但是他做过什么呢？他什么都没有写过，也不会唱歌、画画或演戏——他除了夸夸其谈之外什么都不做。我没法理解。”^⑬

在王尔德谈论的所有话题中，艺术是最重要的，也最有助于提升他的名气。他没能成为报纸艺术评论家、终身教授、成功的作家，也

没能成为旅行导师，他成为某种文化伴侣、一个自封的品味仲裁者，在艺术画廊和展览会上随侍各种时尚女性。❶ 女人对艺术感兴趣，或者认为她们应该对艺术感兴趣。1880年，她们对美学艺术特别有兴趣。长期以来，唯美主义只是一小群人的品味，最终却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王尔德既是这种时尚的促成者，也是其受益者。任何去过他在索尔兹伯里街寓所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唯美主义信徒。很快，他就成为格罗夫纳画廊和皇家艺术院引人瞩目的人物，他不仅自己欣赏画作，还把它们介绍给“一群”热切的女性“崇拜者”，“把他的理论解释给愿意接受的人听”。❷

王尔德的学识和品味广受赞誉。有些人认为王尔德装腔作势，但小说家查尔斯·里德警告说：“他比他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他很懂艺术，几乎对绘画无所不知。”里德讲述某天早上在皇家艺术学院偶遇这位“轻浮的年轻绅士”——并目睹他“准确无误地发现了每一幅值得一看的作品。这样的作品确实不多；但是都被他发现了”。❸ 王尔德的幽默也让人感到非常愉快。一次他说，皇家艺术院收藏的那些传统画作“除了它们不是画，也根本算不上艺术品之外”，“真的没什么可指摘的”。❹

与此同时，王尔德一直试图通过接近拉斐尔前派的圈子来增强自己的美学权威性——拉斐尔前派是这场美学运动的先驱者和缔造者。他先被画家兼诗人威廉·贝尔·斯科特吸引，后者既是罗塞蒂和斯温伯恩的好朋友，也是“拉斐尔前派所谓的鼻祖之一”。斯科特的妻子提携过许多“有前途的年轻人”，她发现王尔德——“这个刚从牛津毕业

的迷人的爱尔兰年轻人”——就是个新手。在她的安排下，“某个下午”——在切尔西区的切恩步道的斯科特家——王尔德遇见了阿尔弗雷德·亨特夫妇和他们17岁的女儿维奥莱特。

他崇拜的亨特先生是一位精致的水彩画家，是拉斐尔前派的边缘人物，亨特夫人（一位通俗小说家）也一样，但他最仰慕的人是维奥莱特；她长着一头浓密的赤褐色头发，大大的眼睛和富于表现力的嘴巴——用埃伦·特丽的话说，她是“伯恩-琼斯笔下波提切利的翻版”。^①王尔德成了这家人的朋友，邀请他们去索尔兹伯里街参加茶会，去切尔西登门拜访，并与维奥莱特（“英格兰最甜美的紫罗兰”）调情。^②他鼓励她写作，即便并没有真正向她求婚，他也会用这句（几乎屡试不爽的）话奉承她：“我们将统治世界——你和我——你以你的容貌，我以我的才智。”^③

王尔德还结识了另一位拉斐尔前派画家阿瑟·休斯。他在位于伦敦南郊旺德河岸边的休斯家中度过了愉快的星期六。那里有画室舞会，有欢乐的晚餐，还有穿过草地去到小河边的长时间散步。休斯家的常客中包括汤姆·泰勒一家、西克特一家，以及演员柯尼·格兰。^④休斯家的三个女儿中，18岁的阿格尼丝虽“不善交际”，但认为他是所有到访的朋友中“最有趣、最善解人意，和蔼可亲的一个”。他给她们讲鬼故事，用夸张的言行逗乐她们。他常常坐一辆体面的出租马车从伦敦一路过来：“多么俗气的东西，亲爱的阿格尼丝，还这么有用！”有时他还会带来几个朋友：其中一个被他称作“极具天赋的孩子——他把煤斗漆成了白色，看上去真可爱！”王尔德则对阿格尼丝

自己做的“柔和、飘逸”的连衣裙大加赞赏，它们“色彩明快，裁剪得恰到好处”。^①

也许是通过休斯家族，王尔德在这段时期结识了爱德华·伯恩-琼斯。^②1880年6月，莎拉·伯恩哈特回到伦敦时，王尔德理所当然地安排这位追星画家与她见了面。然后，他开始编织关系网，寻求在伯恩-琼斯的帮助下一睹威廉·格雷厄姆收藏的拉斐尔前派绘画作品；此举并非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法国艺术家朱尔斯·巴斯蒂昂·勒帕热，那年夏天巴斯蒂昂·勒帕热也在当地，正在为亨利·欧文绘制肖像。^③

然而，王尔德新结识的最重要人物来自文化圈之外。47岁的乔治·刘易斯是一名罪犯和离婚律师：他是个老谋深算、言行谨慎的犹太人，正在富人圈中混得风生水起，他替富人阶层打官司，处理那些“有可能让他们丢丑或陷入不幸的罪孽蠢事”——确保他们能够毫发无伤地离开法庭。威尔士亲王雇他来处理自己与诸多情妇之间的纠葛。于是，刘易斯认识了莉莉·兰特里，王尔德也许正是通过她认识了律师。^④刘易斯不只善于解决问题，他还喜欢把人聚在一起，建立有用的联系，发起有趣的活动。他和做起事来张弛有度的第二任妻子在波特兰广场的豪宅里，为画家、政治家、作家和律师们建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聚会场所。对于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来说，这就是他应该去的地方。^⑤

王尔德仍然坚信自己未来可期。1880年，他的公众形象开始发生变化。除了在《世界》杂志上偶尔露面之外，他的名声——直到那时——主要靠人们口口相传。现在，一个新的元素加入进来：《笨拙》

杂志。过去五年中，这份充满中产阶级的幽默与偏见的漫画周刊一直在以小品、模仿等形式讽刺“美学狂热”，尤其是杰拉尔德·杜穆里埃的漫画。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正是杜穆里埃笔下虚构的“热情洋溢的布朗普顿居民”阐明了这场运动的定义，比如“温和纤弱的年轻吟游诗人”、尊贵的菲茨-拉文德·贝拉尔斯一家、矫揉造作的艺术评论家普雷斯比，以及穿着长袍、满头乱发、有点像伯恩-琼斯的契马布埃·布朗夫人。随着唯美主义变得日趋流行和时尚，杜穆里埃加强了攻击。1880年初，他又给这组漫画增加了两个人物。

2月14日《笨拙》杂志刊登杜穆里埃的漫画《彼此仰慕的社会》，其中描绘“诗人杰拉比·波斯尔思韦特”在“画家莫德尔”陪同下去参加契马布埃·布朗夫人的宴会，受到女主人的热情夸赞：“哦，看他的大脑袋和诗意的面孔，那鲜花一般的眼睛，还有那高雅而伤感的微笑！看他那瘦高匀称的身材，柔弱得像个女人。”她把他称为“伟大的诗人”——不过附注中补充说，他其实“默默无闻”。

杜穆里埃并不打算把王尔德作为这幅画的具体讽刺对象。他笔下的“美学”人物都属于凡人“类型”（尽管有人说契马布埃·布朗夫人的形象部分是根据格罗夫纳画廊经理乔的妻子爱丽丝·科明斯·凯尔创作的）。当时，自我陶醉的拙劣诗人并不少见。尽管波斯尔思韦特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有点长，但他那瘦削、佝偻的身躯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王尔德。●然而王尔德作为诗人兼唯美主义者的名声日渐在外——被热情洋溢的朋友们大加赞赏，但基本上属于“默默无闻”——这意味着有些人确实会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接下来的几周里，这种联

系非但没有打破，“热情”而懒散的波斯尔思韦特还成了杜穆里埃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美学界名流人物。⑨

王尔德认为这是个机会。他不仅鼓动人们相信，而且还一口咬定存在这种联系。他忽略了外形上的差异，声称自己确实就是波斯尔思韦特的原型。王尔德接受了杜穆里埃的漫画嘲讽，并把它作为一种个人展示，试图借此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笨拙》杂志发行量很大，影响深远。如果王尔德能够在公众的心目中等同于具有审美情趣的“波斯尔思韦特”，他会把波斯尔思韦特假设成唯美主义的典范诗人——甚至典范形象。

毕竟，这个位置当时还空着。到1880年，美学运动公认的领军人物仍然只是之前拉斐尔前派小圈子里的几个人：罗塞蒂、斯温伯恩、莫里斯、伯恩-琼斯，还有戈德温以及他们曾经的朋友惠斯勒。对于一家渴望以个性化方式叙述问题的媒体来说，这是不利的一面。几乎所有这些人物要么已经退出公众视野，要么已经变得十分受人尊敬。除了惠斯勒，目前他们谁都没有任何明显的“古怪装扮或举止”。⑩罗塞蒂事实上是一个隐居者。斯温伯恩已经退休到帕特尼去了。莫里斯迷上了商业和政治。尽管伯恩-琼斯的作品经常被人讽刺，但他早就屏蔽了任何个人宣传。戈德温则忙得什么都顾不上。媒体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新人物——一个活生生的唯美主义的化身。王尔德——打算把自己塑造成“波斯尔思韦特”的原型——也许正好需要这个角色。

这是一个很有独创性的想法，也是一个年轻人在事业刚刚起步时采用的大胆策略。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认真追求崇高艺术的人来

说，笑对并接纳冷嘲热讽简直不可想象。然而，王尔德另有想法。同时代的人评价他“对自己的年龄有敏锐的洞察力”，他明白“一个人所能引发的好奇心是他成名的要素之一”。^⑩这种好奇心因何而起并不重要。他从学生时代起，就随时用幽默来颠覆自己的自命不凡。如果他经常拿自己开玩笑，那只不过是一时间允许别人使用这种特权罢了。他理所应当地坚称自己是这场游戏的同谋。他特意去找杜穆里埃，对他很客气，甚至主动提出（他是这么说的）做他的模特儿，以便使他能画得更像。他拒绝别人拿他开玩笑，只是对漫画的艺术性表现出一种美学上的关注。他要让人以为，他确实为杜穆里埃的漫画提供了素材。^⑪

杜穆里埃发现自己的思路被王尔德带跑了。他确实开始从王尔德身上借鉴素材。6月17日，波斯尔思韦特（这是他第四次出现在《笨拙》杂志上）被描绘成独自坐在一张茶几前，桌上的花瓶里插着一枝百合花。侍者问：“先生，您还需要点别的吗？”他回答：“谢谢，不用了！我要的东西都有了，马上就好。”一个唯美主义诗人长时间地对着一朵花冥思苦想，这番场景正好呼应了王尔德之前对梅·哈帕所说，他曾经“依赖水仙花活了两个星期”。杜穆里埃似乎是在重新利用某种版本的王尔德式言论。^⑫几个月后，杜穆里埃描绘了一个“唯美主义新郎”（看上去有点像王尔德）和他“热情的新娘”凝视着他们的“六马克”中国茶壶，并配文道：“哦，阿尔杰农，我们别辜负了它。”很多人都看出来——并且议论纷纷——这是回炉了王尔德在牛津时的著名段子。^⑬

年底，惠斯勒从威尼斯回到伦敦，他在一次展览上遇到王尔德和杜穆里埃，问道：“我说，你们两个人到底是哪一个发现了另一个，嗯？”这句话起初被认为是对杜穆里埃（他一度曾是惠斯勒的朋友）的侮辱，但它也确实反映了在大众的想象中，唯美主义的“波斯尔思韦特”与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之间日益显现的一致性。❶整个1880年，“波斯尔思韦特”变得越来越像王尔德，王尔德也变得越来越像“波斯尔思韦特”。❷他怀着极其“明确的目标”去表现“这个人物”。❸他放大了人物角色。他的言谈举止变得更加矫揉造作，他的姿势更加无精打采，他的谈吐更加刻意做作。他甚至还可能使用了美学术语（如《笨拙》中所写）——“完美”“绝对”“至高无上”“简直太……”。当然，他有一种打破常规的天赋，既能举重若轻，也会兴师动众。但他所做的远不止这些。王尔德已经远远超越了波斯尔思韦特的“诗人”角色（毕竟他自己还几乎算不上是个诗人），试图成为唯美主义的精髓——如一位朋友所说：“在同胞们的眼中，体现出一种建立在对美的崇拜之上的人生观。”他宣称自己的生活就是“一件艺术品”。❹他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种想法。

他的语录——它们将审美标准强加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快成为伦敦的一种社交货币(social currency)。他将自己在牛津时写下的格言警句改头换面，逗乐了所有伦敦人：亨利·欧文的“两条腿都非常宝贵，但他的左腿是一首诗”。❶人们传说，他看见伦敦一座房子的前院花园里有一树杏花，便喊道：“我真想被邀请进去，看看那棵杏树；我喜欢它甚于男高音。”坊间还流传着一则王尔德拒绝服药的轶

事，原因是它那“暗棕”的颜色。药剂师很快用一瓶漂亮的“玫瑰红”液体和一些“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的药丸取代了它，王尔德便高高兴兴地吞了下去。他的病痊愈了，尽管他之前曾经表示自己真不愿意身强体健。①有媒体报道，当王尔德在街头遭遇一群顽童取笑时，他不动声色地说：“我很乐意为下层阶级提供消遣。”②

其他广为流传的轶事还包括，他住在一幢乡间别墅里，一天下楼用早餐时脸色苍白；当被问及是不是生病了，他回答说：“不，我没病，只是累了。事实上，我昨天在树林里摘了一朵报春花，它病得很重，我照看了它一晚上。”③他因为喜爱报春花，走进杰明街的一家花店；他要求店家从窗户上取下几束花。当被问及想要多少时，他回答说：“哦，我不想要，谢谢。我只是想让你把它们从窗户上拿下来，因为它们看起来累得很。”④当然，这其中很多都是杜撰的。有关他手里拿着一朵百合花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招摇过市的故事——尽管可能让人联想起他给莉莉·兰特里送花的事情——根本就是虚构的。但是，正如他带着倨傲的口气所说：“任何人都有可能做那些事情。”而他让全世界相信，“（是他）干了这些事情”，由此他完成了一件“伟大而又极具难度的事”。⑤全世界——在《笨拙》杂志和“波斯尔思韦特”的推波助澜下——越来越愿意相信这些事情就是他干的。然而，虽然这些故事为王尔德扬了名，但其中始终令人捉摸不透的是，读者们开怀大笑到底是因为他的机智，还是在嘲笑他的愚蠢。

不过，王尔德并不关心这些。他看到的是这些矛盾差异中 useful 的一面。他刻意夸张的公众形象与私下里显而易见的个人才智之间明显存在差距，这种现象进一步让人感到茫然而困惑。一位记者不得不承认说：“如果你偶然发现波斯尔思韦特（即王尔德）正巧独处，并且让他对你放松警惕，与他讨论任何与艺术无关话题，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是一个多么精明世故、通情达理、脚踏实地的人。”^①有时候，王尔德可能会突如其来地放下做作姿态，猛然间换上一种让人放心踏实的亲近态度。一次，他受邀与瑞典歌剧女演员克里斯汀·尼尔森共同步入宴会厅，刚说了几句精致优雅的恭维话便遭到了尖刻的反驳：“听着，王尔德先生，克里斯汀·尼尔森太太可不吃这一套。这都是装腔作势，全是废话。”对此，王尔德敏捷地答道：“谢谢您。您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明智的女人兼真正的朋友。”据尼尔森说，从那以后，他们相处得极好。^②

在王尔德的波斯尔思韦特式姿态中，还存在着其他矛盾。在大众的想象和《笨拙》杂志中，“唯美主义者”应该是苍白、孱弱、被生存的绝望吞噬的样子。但王尔德身高六英尺多，体格健壮，对食物、生活，甚至对草地网球都保持着明显的嗜好；^③他的说话方式幽默风趣，夹杂着“天生聪明的谈笑”，尽管他可能会在诗歌里感叹绝望，但他对生活的总体看法充满了富有感染力的乐观主义。然而除了少数欣赏的人之外，大多数人忽略了这种差异。^④只有认真和蔼的美国作家查尔斯·G.利兰将王尔德偶尔摆出来的诗意做派误当作真正的“悲观主义”，并发誓要把他从“所有病态的废话”中拯救出来，把他变成“一个头脑清醒、充满活力、健康而有男子气概的作家”。^⑤

王尔德——以其鲜明的波斯尔思韦特式形象——逐渐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公众人物，无论时尚聚会、艺术展览、戏剧演出都“无法忽略”他的存在。❶那年6月，他去贝利奥尔学院为全部由男生出演的埃斯库罗斯戏剧《阿伽门农》（用希腊语演出）捧场；这出戏由他的朋友沃尔特·帕拉特作曲，伦内尔·罗德是合唱队成员。❷当年晚些时候，这出剧在伦敦举办了三场颇受关注的演出，王尔德为演员们举办了一次茶话会，邀请朋友们来见见“克吕泰涅斯特拉”（F.R.本森）、“卡桑德拉”（乔治·劳伦斯）以及希腊的长老们。❸

茶会安排在新居举行。1880年夏天，王尔德和弗兰克·迈尔斯搬入泰特街1号，这是戈德温为迈尔斯设计的一幢“低调的”三层红砖“工作室”。它集各种最新美学元素于一身——室内光线柔和，陈设稀疏，有裸露的木板，以及“阳台等用来满足花卉爱好者（迈尔斯）的其他配件”——坐落在伦敦极具波希米亚风格的郊区一条最具艺术特色的街道上。❹戈德温已经在泰特街设计了四幢房子。惠斯勒的“白厅”就坐落在大道的另一边——虽然它现在已经不再属于惠斯勒。

王尔德很喜欢他的新住所。他告诉亨特太太，尽管地址“让人讨厌”，但这房子“非常漂亮”。为了弥补这一点，他把这幢房子重新命名为“济慈屋”。❺索尔兹伯里街的娱乐传统还能在此延续下去。迈尔斯的新模特莎莉·希格斯是个“罗塞蒂式”小巧玲珑的美少女，她身穿和服，一手端着茶壶，另一只手擎着百合花，成了优雅的“工作室茶会”上令人陶醉的人物。❻王尔德依然坚持铺张的信条，毫不吝

惜地装饰自己的房间。他花好多钱购置了一张新桌子，并且向诺曼·福布斯-罗伯逊解释道：“除了齐本德尔式的桌子和椴木家具，我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我都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是怎么写字的。”^①

王尔德正忙于他的文学计划。他期待在学术上也同样有所建树，然而却几乎毫无进展，希望似乎已经日渐渺茫。为麦克米伦公司做翻译没有了下文。尽管他确实宣布打算“写出……一些关于希腊艺术的文章”，但最终只是在《雅典娜神殿》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大英百科全书》中杰布教授撰写的希腊历史和文学条目的未署名评论。^② 诗歌仍然是王尔德的主要关注点，尽管有时候它们不像预期的那样具有明显的审美情趣。他以斯温伯恩为榜样，不仅抒发感情，还谈论政治。他刊登在《世界》杂志上的《万福，女王》是一首篇幅很长，饱含爱国主义，但同时充满质疑的“关于英国的诗歌”，引起了广泛关注。

^③ 这部作品写于英国在阿富汗战争^④中受挫之际，诗中概述了大英帝国的辉煌成就，却没有将其叙述成军事上的胜利，而是称其为基督式的牺牲；它抛开当下的痛苦，期待英国能作为一个共和国实现民族复兴。王尔德认为这首诗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占有特殊地位；他对一个朋友说：“我从未接触过任何无形的、看不见的事物，只有一次是例外，那是在我写《万福，女王》之前。”^⑤ 他理所当然地为自己的作品感到自豪，于是邮寄了一本给画家G.F.沃茨。^⑥ 在收到的各种各样的赞美中，有一首刊登在《真相》杂志上的戏仿作品，还有一封是一群身在阿富汗的英国军官写来的信，他们被诗中的“真实与美”深深感动。^⑦ 为了在成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王尔德在另一首为《世界》创作的十四行诗《神圣的自由渴望》中重申了他对“共和的国家”的

政治偏好（前提是不能通过暴力的“无政府主义的亲吻”获得实现）。^①

讽刺周刊《PAN》果断地进行了一次美学冒险，它们将王尔德“定位成诗人”。王尔德在这份“胆汁一般的”青绿色报纸上发表的头篇作品是一首维拉内拉诗^②，开头这样写道：“噢，牧神的阿卡迪亚！……这个北方的小岛现在需要你！”这首诗招来了《白厅评论》(Whitehall Review)上一篇讽刺性的回应文章，其开头写道：“精神失常专员……奥斯卡·王尔德需要你。”^③

《传记与评论》8月号刊登了一篇关于王尔德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这些并不显著的文学成就。《传记与评论》是一本颇受欢迎的月刊，专门介绍政治、宗教和艺术领域的人物。这些有关“奥斯卡·王尔德先生”的内容——出自他的一位朋友之手——热情洋溢地介绍了他的家庭背景、大学生涯和文学前景，引用了他的几首十四行诗，却搞错了他的出生日期（也许是出于工作疏忽，也可能是王尔德本人给出了错误的信息，杂志上标明他出生于1856年，而非1854年）。^④另一份大众报纸——《事实》(Fact)——刊登了一篇长文回应《传记与评论》上的文章，其中指出王尔德尽管才华横溢、潜力无限，但他配不上这样的待遇。^⑤在19世纪80年代以自我为参照的新闻界，有关王尔德毫无价值的宣传，很可能成为他扬名的另一种方式。

3 一切妥当

一个最热情的年轻人，

一个脉脉含情的年轻人，

一个超级浪漫、极具审美情趣、

奇特非凡的年轻人！

——W.S.吉尔伯特，《佩辛丝》

《传记与评论》的文章中写道，王尔德当时正在创作一部“四幕无韵体诗悲剧”。这一点——就像这篇文章中的许多具体细节一样——并不十分准确。王尔德的确一直在努力创作一部戏剧，但它不是无韵体诗悲剧。那是一部以当代俄罗斯为背景的散文情节剧，名为《民意党人维拉》。他欣然承认，这出剧的“文学价值”“微乎其微”。^②王尔德笔下的女主人公维拉·萨布罗夫是一个年轻的民意党人，决心推翻令人憎恨的“沙皇伊凡”政权。她爱上了战友亚历克斯，却不知道对方是沙皇的长子兼继承人，隐姓埋名加入了反抗父亲暴政的密谋。在这出剧的后半部分，沙皇被民意党人暗杀，亚历克斯继任皇位，计划建立一个共和制的俄罗斯。但是，民意党人确信他已经抛弃了他们和他们的事业，密谋要暗杀他。经抽签决定，维拉被选中去执行这项任务。她偷偷溜进皇室寝宫准备实施行动，却惊醒了亚历克斯。亚历克斯发誓永远爱她，她热烈地回应了他。但接着，为了救亚历克斯，她将刀尖刺向自己，然后把血迹斑斑的匕首扔出窗外，

向等候在楼下的民意党人报告暗杀已经完成。“你都干了些什么？”亚历克斯哭着问。“我拯救了俄罗斯！”维拉说完就离开了人世。

剧本主题与美学无关，却是个热门话题：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独裁统治和虚无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在新闻中频频出现。1878年，一个名叫维拉·苏萨里奇(Vera Sussalich)的年轻民意党人因企图暗杀圣彼得堡市长在当地受审。她的无罪释放被英国媒体视为自由反抗压迫的胜利，但引发了接二连三的阴谋、暗杀和独裁。伦敦戏剧界颇有地位的杂志《时代》(the Era)评论说：“俄国舞台上……正在上演本世纪最重大、最激动人心的戏剧。”这份报纸还刊登了一篇题为《现代史与悲剧》的文章，呼吁将现代历史作为戏剧的主题。我们无从得知，这篇文章是促成了，还是仅仅反映了王尔德接触民意党人题材。尽管王尔德在俄国没有私人关系，但作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斯温伯恩派，他一直将自由和共和主义两大主题铭记在心。❷

在王尔德这出戏的情节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主要人物——维拉和沙皇长子——浪漫的理想主义。但在第二幕中，王尔德引入了另一个人物——“保罗亲王”，沙皇身边可爱而愤世嫉俗的总理大臣，一个贵族、专横之徒和花花公子——据他的对手说——他“可以刺死他最好的朋友，为了在他的墓碑上写一段碑文”。他与另一名同僚的开场对话，为自己定下了基调：

保罗亲王：至少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些内阁会议特别累人。

彼德罗维奇亲王：那是自然的，您一直讲个不停嘛。

保罗亲王：不，我认为这一定是因为我有时候不得不听别人发言。 ⑨

他那些笨拙的同僚——或者慷慨激昂的沙皇长子——的每一番话都会招来一句警句、悖论或谬论。听到皇太子说想要“换换空气”，他回答道：“这真是一种最革命的情绪！您的父皇对俄国的任何改革都极为反感，甚至温度表也不能有丝毫变化。”当被提及他在某些领域缺乏“经验”时，他耸耸肩说：“经验，那是人们用来称呼他们的错误的。” ⑩

他乐于被民意党人憎恨，因为“冷漠是对庸才的报复”（其意并非指读那些讨伐他的“暴力宣言”是浪费时间，而是因为“他们的拼写实在太糟糕”）。他唯一渴望留下不朽名声的是，发明一种新的调味汁：“我一直没有时间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感觉到我有这个能力。”他希望，政治可能为他应对这样的美食挑战做好了准备。他的一个观点是：“要做出一盘美味的沙拉，必须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这两件事情面临的是完全相同的问题，都需要知道该在醋里添多少油。”一位内阁同僚抱怨说：“好像生活中的任何事情您都要拿来嘲笑一通。”保罗亲王回答：“是啊！我亲爱的伯爵，生活太重要了，无法正正经经拿来讨论。” ⑪

保罗亲王（他被新沙皇驱逐后，加入了民意党人的行列，并以刻薄的言辞对待他们）给王尔德提供了一个尽情发挥自身才智的机会。

他对成果非常满意。❶剧中许多人物所说的隽语也许就是他曾经说过的话；当然他以后还会反复使用它们。❷他明显感觉到，幽默确实能达到目的：它能够强化，而非削弱悲剧的中心主题。❸尽管王尔德非常同情“民主”的力量，但他还是假借保罗亲王，对民意党人的暴力煽动发出了警告。剧中人物感叹“在一个良好的民主制度下，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贵族”，这句话也许是重复了王尔德过去的观点。

四幕戏剧于夏天创作完成。王尔德对这个巨大的成就抱有很大希望。他把手稿读给朋友们听，并且花钱印刷了若干份，将它们发送给他过去18个月里经营起来的各路戏剧界人脉——亨利·欧文、埃伦·特丽、赫尔曼·维津、吉纳维芙·沃德、诺曼·福布斯-罗伯逊、迪翁·鲍西考尔特，甚至还有为宫务大臣审查戏剧的E.F.S.皮戈特——希望他们能给予支持并提出建议。❹他邀请海伦娜·莫杰斯卡喝茶，希望她能对剧本感兴趣。❺

然而，剧本的反响平平。女演员吉纳维芙·沃德回信提议见个面，以便告诉他“我对此事的所有想法”。但没有人主动提出想要排演这部剧，甚至没有人建议应该排演这部剧。迪翁·鲍西考尔特是个非常成功的剧作家，也是王尔德家的老朋友，他在回信中提出了诚恳而务实的建议。他认为剧本的“脊柱”——维拉和沙皇儿子的关系——“很精彩，富有戏剧性”，但同时指出，“它的肋骨和四肢与脊柱脱节。你的其他人物角色，你的对话主题——占整部戏的五分之六——不是情节活动，而是讨论……你的情节因为对话而停止，而对话应该是情节活动对角色施加影响之后的必然结果”。❻

王尔德已经在《世界》杂志和其他地方逐渐树立起诗人形象，与他早期寻找诗歌出版商时屡屡碰壁的失败经历相比，这个剧本是他遭遇的又一个打击。然而，王尔德没有灰心丧气。他的处境并不能完全用“失败”这个令人憎恶的词来形容。剧本已经完成；它已经存在，而且他相信，它会在适当的时候找到一个出品人——即使其过程比预想或期望的要长得多。与此同时，剧本还有改善的余地。王尔德非常乐意“接受（他）获得的每一个演员的建议”。事实上，他在印刷剧本时就早已在其中夹进空白页，以便人们对其做出修改和补充。

然而，他面对集体冷漠的第一反应是逃跑。夏末，他再次和“年轻的信徒”伦内尔·罗德去法国度假——后者刚刚获得纽迪盖特奖，正在准备当年12月的期末考试。❶“因为我们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誰”，王尔德装出一本正经的口吻对乔治·刘易斯12岁的儿子解释说，罗德“在旅行中使用的假名是史密斯爵士，而我是鲁宾逊勋爵”。他们游览了沙特尔，沿着卢瓦尔河——“世界上最美的河流之一顺流而下，从头到尾倒映出上百个城市和五百座塔楼的情影”。❷他们在昂布瓦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个小村落有着灰色石板屋顶和陡峭的街道”——在那里写生、闲逛，“计划着辉煌的事情，还有怎样去骚扰俗人”。❸随后，王尔德独自前往巴黎，他在那里过得“非常愉快”。❹❺

1880年10月底，王尔德回到伦敦，他发现尽管自己在剧本创作方面遭遇挫折，但作为典型的唯美主义者，他的形象却在节节上升——而且速度很快。《笨拙》杂志上，杜穆里埃一直在漫画中保留着他的

形象，而且未来还打算发表更多。11月20日，伦敦标准剧院上演了一出名为《猫在哪儿？》的新喜剧。这是一部荒唐的滑稽剧，剧中主要人物里有一个名叫斯科特·拉姆齐的美学诗人，由赫伯特·比尔博姆·特里扮演，这个角色显然是在讽刺王尔德。他戴着五颜六色的领带，“举手投足间一副古典做派”，他“为一朵向日葵花叹息”，所有这些都认为“滑稽至极”。^⑨ 比尔博姆·特里声称，他复制展现的“不是某个个体，而是一种类型的人”，但几乎没有人接受这一说法。众所周知，比尔博姆·特里与王尔德相识，并且曾经“非常接近地”“研究过王尔德独特的”着装和行为特点。《时代》杂志的一位评论员认为，剧中模仿的是“社交界诗人”王尔德，这一点“不可能有错”。^⑩ 更何况，这位27岁的演员与王尔德有着同样的身高和体格。王尔德的朋友朗斯代尔夫人观看演出的那天晚上，“比尔博姆仿照诗人的样子，一条裤腿下面翻着边……他一踏上舞台，观众们嘴里便接二连三地说出了‘奥斯卡·王尔德’这个名字”。^⑪

王尔德观看了这出戏。^⑫ 尽管他没有发表公开评论，但《生活》杂志却专门写了一段文字报道这件事情，“有个唯美派人物竟然荒唐到写信给比尔博姆先生，要求他为模仿王尔德而道歉”，而“我听说，另一个唯美派人物则明智地写信祝贺比尔博姆先生的表演恰到好处”。^⑬ 鉴于王尔德对杜穆里埃的积极态度，以及他“乐于恭维的天性”，人们很难否认他即是文章中的后一个唯美派人物。^⑭ 毫无疑问，比尔博姆·特里的精彩表演，以及这出戏的成功上演（它上演至第二年，并在各地巡回演出），将王尔德的名气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时光荏苒，事物交相辉映地往前发展着。新年之后，又有两部新剧获得巨大成功，它们都在讽刺铺张过度的美学“狂热”：《上校》（《笨拙》杂志新任编辑F.C.伯南德编写的滑稽剧）于1881年2月2日在威尔士亲王剧院上演，吉尔伯特和沙利文联手创作的喜歌剧《佩辛丝》由理查德·多伊利·卡特出品，于4月23日在喜剧歌剧院首演。❶王尔德去看了这两部作品的首演，坐在正厅前排的座位上，十分引人注目。他坐在喜剧歌剧院的座位上，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几乎立刻就被“画廊的常客们”“认出来”了，由此他“不得不忍受着没完没了的打趣”。一家报纸描述，他以“非凡的冷静”和“极好的脾气”忍受了这一切。❷他确信自己是演出的一部分。好几份报纸都注意到他喜欢这部歌剧，并进行了报道。❸《上校》相比之下没那么轰动，它是一出仓促拼凑而成的作品。不过，尽管王尔德私下里觉得它“枯燥乏味”，却从来没有公开对该剧表达过反对意见。❹

这两出戏都没有直接讽刺王尔德。《上校》中的喜剧反派人物——唯美主义“教授”、“格调诗人”、“美学高雅艺术公司”创始人兰伯特·斯特雷克——是个上了年纪的江湖骗子，他利用一时的流行时尚欺骗富裕家庭里容易轻信上当的女子，由此骗取大量钱财，满足他那相当缺乏美感的品味。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塑造的两位“美学”诗人，雷金纳德·伯恩桑和阿奇博尔德·格罗夫纳，也都是“骗子”——假扮成美学家，希望赢得美丽的佩辛丝。然而，兰伯特·斯特雷克人生信条中的诸多细节——剽窃自杜穆里埃发表在《笨拙》杂志上的漫画——明显带有波斯尔思韦特，也即王尔德式特征。例如，斯特雷克声称，他“能够靠水杯中的百合花活下去”，并指示他的一个信徒“不

要辜负” 她的茶壶（世故的布莱斯夫人因此回应道，“我理解不辜负我的收入，但无法理解什么是不辜负我的茶壶”）。^⑨

许多评论家称赞吉尔伯特避开了对“各种审美趣味的特定代表人物”的人身攻击。相反，人们认为他呈现了一幅唯美主义者矫揉造作和故作姿态的全景讽刺画：故作懒散忧郁的做作气氛，自我专注，天鹅绒夹克，对瓷器的狂热爱好，对日本风格或中世纪物件的喜爱，喜欢故作低调，崇拜格罗夫纳画廊，对鲜花充满感性的强烈爱好（这种情感甚至可能发展至“像柏拉图一样从精神上喜欢一颗小土豆”）。然而，许多观众都非常乐意脑补剧作家机智的疏漏——即便他们相互之间对讽刺对象和方式存在争议。

《泰晤士报》的评论家认为，身材矮小的乔治·格罗史密斯扮演的伯恩桑模仿了斯温伯恩。也有人发现，这位演员戴着眼镜，留着一绺与众不同的白发，打扮得像惠斯勒。然而，大多数评论者认为他们身上都有王尔德的影子。伯恩桑宣称，“如果你走在皮卡迪利大街，手上拿着一朵罂粟或一朵百合”，那就获得了进入“高级美学群体”的资格，这句话似乎在暗指王尔德的行为；伯恩桑描绘自己的诗歌是“一篇狂热的、怪诞的、耽于肉欲的作品”，这句话简直就等于公开提到了王尔德的名字。尽管有人谨慎地表示，其实“温和的”利己主义者阿奇博尔德·格罗夫纳才是源于王尔德的人物形象，但很快人们就普遍认同了伯恩桑身上的王尔德身影。^⑩事实上，这出戏开演后不久，格罗史密斯在一场聚会上表演了一段伯恩桑的挽歌，正好说到“这就是他”一句时，王尔德进来了。^⑪

这三部重头戏——《猫在哪儿？》《上校》《佩辛丝》——之后，伦敦的舞台上开始大肆讽刺唯美主义。1881年年中，《伦敦新闻画报》报道说，剧场里“充斥着百合花和向日葵……每一部滑稽剧和喜歌剧中都有唯美主义者”。许多舞台上的唯美主义者形象还刻意指向王尔德：“甚至连图尔先生——著名喜剧演员、愚蠢剧院老板——也要在一部滑稽短剧中与向日葵花一起出现，他从马尔盖特的更衣车上走出来时说道“这让我变得如此像王尔德。” ⑩

名声似乎可以自我滋养扩张。伦敦报纸上的内容在各个地方和都市媒体上重复出现。它们在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被反复报道。威利和奥斯卡更是为之煽风点火。他们俩已经完全学会了“广告的把戏”（威利是这么说的），为雨后春笋般增加的“社交界”报纸提供各种花边新闻和个人消息。一份短命的期刊《伦敦布谷鸟》甚至还采访了威利，谈他如何帮自己的兄弟扬名立万。 ⑪

1881年5月，杜穆里埃打算去掉波斯尔思韦特这个人物，于是创作了一幅告别漫画《受挫的社会抱负》，描绘心烦意乱的诗人正与莫德尔和契马布埃·布朗夫人一起哭泣。“他们从一本广为流传的当代期刊上读到，自己其实只存在于笨拙先生生动的想象中。他们天真而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名扬天下了。” ⑫ 王尔德失去了他的另一个自我，但他挺过来了。事实上，他的名声很快就变得“家喻户晓”。其他杂志的漫画家和写生画家们很乐意填补杜穆里埃留下的空白。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尔德在《笨拙》杂志上继续被滑稽地模仿着，他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比如“奥斯库罗·王尔德古斯”、“德

拉维特·迈尔德”和“大眼诗人”。^①该杂志的另一位主要画家林利·萨姆伯恩给他画了一幅“《笨拙》第37号精选肖像”，画面上他的脑袋从向日葵中探出来。^②王尔德被四处标榜为“‘诗人’，一个自封的执掌美丽和高雅艺术的大祭司”。^③

在那一年的皇家艺术学院夏季展览开幕式上，他在众多女性崇拜者的簇拥下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以至于W.P.弗里斯觉得必须将他——与米莱、勃朗宁等名人一起——收入自己正在为预展创作的大型油画中。王尔德当然很乐意为画家当模特。^④他的面孔无处不在。他的照片开始陆续出现在“所有商店的橱窗里”——“长头发，脸上刮得很干净，宽松的领带，天鹅绒的外套，紧握双手放在一侧脸颊下，眼神空洞地凝视着某处”。^⑤一位评论人士认为，王尔德现在“被议论和书写的程度，超过了除杀人犯和政治家以外的任何一个男性”。^{⑥⑦}

如果说王尔德取得了相当卓越的地位，那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大量的模仿、讽刺和漫画虽然传播了他的名字，但也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荒谬而滑稽的人物。一天晚上，他去剧院看演出，无意中听到一个戏迷说：“那边就是王尔德，那个大傻瓜。”听到这番话，他兴致勃勃地对同伴说：“一个人在伦敦这么快就出名了，真是不可思议。”^⑧王尔德觉得自己能够做到这份平和。他自知不是傻瓜。他知道，在私人的社交圈子里，他总是能够通过谈话中展现的魅力和智慧纠正外界的印象。而且他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艺术，在更广泛的公众当中实现同样的转变。

然而，他可能低估了其中的困难。《维拉》遭受的冷遇使他第一次意识到，名声可能不会直接转化为艺术上的进步。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事实上会成为一种障碍。王尔德的鼎鼎大名——以及他成名的方式——引起了巨大的不满。文学圈里也许几乎没人把他看成傻瓜，却有不少人认为他是个小丑。他们认为，他的自我宣传庸俗不堪，他装腔作势的样子荒唐可笑。同样让他们不屑的是，他如此引人注目，而实际上却并没有创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作品。像佩特这样挑剔的人认为，王尔德初出茅庐的“整个样子”“令人非常反感”。^①

一些媒体也对王尔德赢得的社会地位感到不齿。王尔德喜欢把热切参与社会活动作为他从事美学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试图“扫除所有障碍，让艺术家与赞助人直接交流”。^②但许多人怀疑其动机并没有那么高尚。有人说，他和兰伯特·斯特雷克、伯恩桑一样，注定是个“美学骗子”，是个暴发户，他摆出“可笑”的姿势，留着“令人反感的”长发，只是为了讨好时髦的女主人们以便进入“上流社会”——而实际上他一直“躲在暗地里发笑”。王尔德过于尊重社会，渴望社会地位，因此并不怨恨这种指责。他只是难得有一次向一名编辑抱怨——尽管是私下里——《世界》杂志上有篇文章指责他表里不一。耶茨为此表示道歉，声称文章发表之前自己没看，并且表示——他说——已经“明确指示”，今后不得在文章中出现任何令王尔德“感到不快”的内容。^③

还有部分怨恨（来自男性）则源于王尔德的魅力。他已经很受女人们的仰慕，而他的名声只会使他更具魅力。他渐渐成为一个声名鹊

起的“女性杀手”。有人注意到，“在伦敦的许多客厅里”，热爱艺术的年轻女性“围在他身边，眼神中充满仰慕，那情景让人联想起格罗夫纳画廊里的作品”。^⑩威利天真地想象，弟弟将来会娶一个女继承人。^⑪然而，奥斯卡的所作所为并不支持这种想法。虽然他在一次非正式舞会上独占了“极其漂亮”的莉莲·梅杰，称她是“一块抚慰人心的宝石”，甚至还拜访了她的家乡希恩，并且因此引发了人们的议论，但两人之间并没有进一步的联系。^⑫他继续不温不火地同维奥莱特·亨特调情，几乎每周都去看望她的父母。然而，她并不是女继承人。她似乎也不愿意追随王尔德去天涯海角。有一次谈到老地图的时候，王尔德说，非洲广袤无垠，图上除了“hic sunt leones”的图例之外^⑬，常常是一片空白。他激动地补充道：“维奥莱特小姐，你和我，咱们去那儿吧？”她回答：“让狮子吃掉？”^⑭

也许更有希望的是那年夏天他遇到的一个女孩。康斯坦斯·劳埃德是王尔德家一个都柏林旧友的孙女，也是王尔德在牛津认识的奥索·劳埃德的妹妹。她和祖父及一个未婚的姑妈住在伦敦兰开斯特街，她寡居的母亲（当时已经改嫁斯温伯恩·金）住在附近的德文郡。在康斯坦斯母亲举办的茶会上，两人一经介绍认识，王尔德便被这个长着一双美丽的蓝绿色眼睛的22岁姑娘吸引了。依照家族中的传说，离开茶会时，他对自己的母亲说：“顺便说一句，妈妈，我打算娶那个女孩。”他们很快就有了再次见面的机会：康斯坦斯的姑妈在兰开斯特街给他们安排了一次“在家”的机会；还有王尔德夫人的星期六“沙龙”——其间王尔德“几乎一直”独自霸占着康斯坦斯；他还邀请康斯坦斯去兰心剧院看了亨利·欧文的《奥赛罗》。康斯坦斯也许一度很

害羞。她承认第一次见到王尔德时“害怕得浑身发抖”。但她很有魅力，对文学感兴趣，爱好艺术，而且思维敏捷。她的哥哥注意到，她“能够以出奇快的速度从任何推理中发现缺陷或弱点”。他还说，她“能够在任何争论中顺畅地表达观点，总是有勇气发表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还表现出“一种心平气和的幽默感和一丝滑稽的感觉”。^⑨

王尔德也许早就获知康斯坦斯有钱，或者将来会有钱。她的祖父霍雷肖·劳埃德实际上就是她的监护人，他凭借起草“铁路证券投资者所熟知的劳氏协议”而挣下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在被一桩不幸的丑闻临时取消律师资格之前（过度劳累导致他疲惫不堪，竟在圣殿花园裸奔，吓坏了一群带孩子的保姆）。康斯坦斯作为霍雷肖·劳埃德的孙辈之一，确实有可能成为女继承人。^⑩这不是什么浪漫的想法，但算得上锦上添花。

王尔德竭尽全力去吸引她——大大方方地摒弃了他那些过分的矫揉造作之举。“当他单独跟我说话时，”康斯坦斯说，“一点也不故作，他谈吐自然，只是他的语言比大多数人更胜一筹。”^⑪他还在她的祖父身上下了很多功夫，陪同他和康斯坦斯参观蓓尔美尔的艺术画廊。这个策略很成功。“我觉得爷爷喜欢奥斯卡，”康斯坦斯告诉哥哥，尽管她不得不承认劳埃德家的其他亲戚都喜欢嘲笑他，“因为除了他的长发，而且看起来很漂亮之外，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她补充道：“我非常喜欢他，但我猜想这是非常糟糕的品味。”^⑫人们至今不清楚，两人之间始于6月的亲密关系在何种程度上维持到了1881年

底。但毫无疑问，康斯坦斯至少对这位长发美学家保持着一种罗曼蒂克的兴趣，甚至希望这种兴趣能发展成为一种更持久的东西。 ⑩

如果说王尔德正在成长为一名社交场合的名流，那么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周围还有许多比他年龄更大、资格更老的名人。他利用自己新近获得的名气去接近美学运动中的大人物。为了尽快加深与惠斯勒的交情，他找到画家，并且成了惠斯勒著名的“早餐聚会”上的常客。尽管惠斯勒声称自己被强行结下友谊，但王尔德有理有据的奉承、显而易见的才智和不断增长的名气，及其与莉莉·兰特里和埃伦·特丽的密切关系——画家认识并崇拜她们，都让他深为佩服。

⑪夏天过去，惠斯勒搬进泰特街的新画室，两人之间的友谊迅速发展成为同志般的友情。惠斯勒工作的时候喜欢有人陪伴，一小群追随者会定期聚集在他的新家。这些人当中除了王尔德和弗兰克·迈尔斯之外，还有刚从牛津回来的伦内尔·罗德，画家乔普林夫人，美国艺术家哈珀·彭宁顿和沃尔多·斯托里，漂亮的画室模特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夫人，以及一个年老体弱的退休陶器画工马修·埃尔登。 ⑫

在王尔德看来，他的新朋友身上附着有真正的魅力。47岁的惠斯勒尽管近年屡遭挫折，但他的活力和自信丝毫未减。他完全保留了以往的无畏个性和风格，传说中的机智敏锐和穿衣品味。回到伦敦以后，他仍然坚信自己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尽管诸多证据表明事与愿违，但他举手投足间就好像别人也都认同他的看法。在其故意为之的荒谬行径衬托下，他专业上的唯我独尊越发引人侧目。一位崇拜者恭维他道：“世界上只有两位伟大的画家——你和委拉兹开斯。”他

回答说：“哦，为什么把委拉兹开斯也算上？”王尔德接受这样的评判：无论多么自鸣得意，他“推断自己……是个小人物”，围在“大师”身旁的那种。❶他虽然没有抛弃心目中已有的拉斐尔前派偶像，但他现在同样相信惠斯勒的天才。这位画家成了他心目中的新“偶像”——一个可以和亨利·欧文相提并论的人。❷王尔德早期在格罗夫纳画廊评论中那些有所保留的认可被抛在脑后，取而代之的是溢美之词。惠斯勒的《白色交响曲》成了王尔德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图画”。❸

然而，绘画只是惠斯勒成就的一部分而已。他对艺术充满令人振奋的想法和惊人的见解。他倡导日本文化和法国印象派的作品。他“痛骂”特纳（“那个老外行”），并贬低拉斐尔前派。他摆出高人一等的派头，并且称，老朋友罗塞蒂“并不是一个画家，而是一位绅士和诗人”；而伯恩-琼斯（通常被称为“琼斯”）则被斥为“对绘画一窍不通”。❹❺惠斯勒在巴黎时，认识了那里的许多知名煽动家、诗人和画家。他与德加和马拉梅关系很好，通晓泰奥菲尔·戈蒂耶和波德莱尔的思想。他展现出一种见多识广且聪慧理智的老练风度，令王尔德向往不已。他的作品——王尔德逐渐认识到——反映了当代思想中最大胆、最新颖（并且最法国的）的一切。惠斯勒模糊、低调的“和谐”背后，是戈蒂耶“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强调艺术可免于任何政治、社会和道德考量，只关乎其自身的形式完美。戈蒂耶的想法是，既然所有的主题都呈现在艺术家面前，那么选择那些未被尝试过的，被人贬低的，就不失为一种美德，惠斯勒于是受其鼓舞去描绘对现代大都市的短暂印象。

虽然王尔德在佩特的作品中已经领略过戈蒂耶“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但在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里，在现实中与之相遇则是另一码事情。这种效果非常令人刺激。王尔德赶忙向他的新朋友致以诗人的敬意，在《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首明显带有惠斯勒风格的诗，名为《清晨的印象》——如果不计较语法的话，极具法国风情。①这首小诗开头写道，“夜里的泰晤士蓝中泛金/已变成和谐的灰色一片”，试图将惠斯勒的印象派艺术转化为诗歌。它专注于形式的完美，抛弃了诗歌应该“或知性，或感性”的观念。②

但如果说王尔德从惠斯勒那里学到了一些艺术知识，那么他获益更多的是关于如何自我宣传。有人发现，“惠斯勒教导他，天才与众不同，而且自行其是，我行我素；并向他展示，独特的外表、机智甚至粗鲁在一个民主国家尤其重要”。③这些经验极为重要，在王尔德不断培养才能，形成自我风格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尽管王尔德秉性温厚，对“粗鲁”持谨慎态度，难以全盘接受。两人虽然乐于相互做伴，但性情迥异。王尔德不会像惠斯勒那样极度蔑视他人，“享受矛盾冲突”。事实上，他经常试图阻止自己的偶像做出那些“过于残酷”的举动。④与惠斯勒尖刻、暴躁、伤人的方式相比，王尔德的才智属于另一种类型：有智慧、有创意、有雅量，“总是兴致盎然的样子”。⑤

两人交友之初，王尔德自知其位，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惠斯勒就有关媒体批评的限度斥责《泰晤士报》的艺术评论家时，王尔德跃跃欲试很羡慕，便在一旁低声道：“我真希望那是我说的。”惠斯勒回

答他道：“你会的，奥斯卡，你会的。”^①然而，尽管惠斯勒爱嘲讽人，但他终究能给王尔德提供帮助。他需要王尔德的陪伴，提议两人去巴黎和海峡群岛旅行。（“现在，奥斯卡，你只需再次乔装改扮起来，明天跟我一起去泽西。”）^②他让王尔德参与各种计划。两人和弗兰克·迈尔斯一起，打算让戈德温在泰特街为莉莉·兰特里造一座房子。兰特里回忆说，她的“三人顾问团”沉浸在各种想法和建议中，当建筑师来察看他们的“草图”时，竟然“发现根本无法安楼梯”。这个项目随后便被放弃了。^③惠斯勒和王尔德一起探望了临终卧榻的中世纪风格建筑师威廉·伯吉斯，观看了《佩辛丝》首演；对于乔治·格罗史密斯扮演伯恩桑丑化他的样子，惠斯勒给这位演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赞扬信——这是王尔德从中受益的另一事例。^④

然而，王尔德并非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他与惠斯勒的情谊。他选择性地忽略了罗斯金-惠斯勒官司之后美学圈子内部已经公开化的裂痕。他进一步加深自己和拉斐尔前派运动中各个大人物之间的关系，与伯恩-琼斯日渐亲密。他能够成功地玩转这种双面游戏，这既表明了他社交上的自信，也体现出他的机智圆滑。在伯恩-琼斯位于西肯辛顿的庄园，王尔德是座上宾。伯恩-琼斯十几岁的外甥女爱丽丝·吉卜林（拉迪亚德的妹妹）在一次家庭晚宴上见到王尔德时，怀疑她的叔叔面对王尔德的崇拜感到有点尴尬——“我觉得，奥斯卡称他为‘大师’时，他畏缩了”。^⑤伯恩-琼斯的儿子菲尔当时在牛津大学念本科——她注意到，相比之下——他对王尔德有一种明显的“崇拜”。但事实上，中年画家和他年轻的崇拜者很快就建立起愉快的亲密关系。令一些人惊讶的是，他们成了真正的“好朋友”。^⑥他们在艺术

和文学上有很多共同爱好^①，王尔德让和蔼、忧郁的伯恩-琼斯感到很开心。画家甚至认为“奥斯卡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逗趣的一个”——他有一种罕见的能力“可以让人释放出欢乐”。^②王尔德说服他享受生活：伯恩-琼斯担心，在闹哄哄的牛津大学校庆典礼上接受荣誉博士学位会让自己“出丑”，最终王尔德说服他去坦然面对，“（他）对我非常好，前几天碰到他时，他说自己很欣慰，他看起来真的很开心，我很喜欢他”。^③伯恩-琼斯也许赠给王尔德好几幅画，回报他的善意。^④他们的友谊也是乔治·刘易斯夫妇鼓励促进的结果，作为两人共同的朋友，刘易斯夫妇经常把他们聚到一起，或者在波特兰广场，或者在他们泰晤士河边沃尔顿附近的周末度假地。^⑤

或许是伯恩-琼斯的认可鼓舞威廉·莫里斯抛开了对王尔德的偏见。1881年春天两人初次见面时，莫里斯坦白道：“我必须承认，魔鬼并不像人们描画的那么黑，奥斯卡·王尔德也一样。他非但不是一头蠢驴，而且他还确实挺聪明。”^⑥在其他场合，王尔德也证明了自己既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叙述者”，又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好伙伴”。^⑦毕竟，他对莫里斯的诗歌和设计怀有一种略带奉承的热情，对他的政治观点也持开放态度。王尔德已经信奉“社会主义”——尽管部分原因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他初次见到维奥莱特·亨特时宣称，“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不是有人告诉你，这些人很可怕？”）^⑧莫里斯也适时地发现了王尔德与众不同的“天生好脾气”。两人之间形成了某种友谊。^⑨

王尔德与年老的福特·马多克斯·布朗之间则是一种更加舒适惬意的关系。王尔德发现和老画家在一起非常悠闲，声称他家是“伦敦唯一一处他去了用不着倒立的房子”。他经常在星期六下午过去喝茶。马多克斯·布朗的孙子（未来的小说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回忆当时到访的王尔德是“一个文静的人”，他“坐在高背扶手椅上，朝着壁炉里燃烧的木柴微微伸出一只手，谈论着也许是最无趣的话题……《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或者‘合并债务的转换’”，而福特·马多克斯·布朗则“坐在壁炉另一边的一张高背椅上，把一只手伸向炉火的方向”，他通常不同意客人的观点。⑨

然而事实证明，王尔德想要和拉斐尔前派中两位最伟大的偶像建立如此随意的亲密关系就困难多了。斯温伯恩对过分热情，热衷自我推销的信徒相当警惕。事实上，王尔德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这位诗人的对头。两人的确一起参加了霍顿勋爵家的招待会。王尔德抓住机会说服“相当尴尬”的沃茨·邓顿（斯温伯恩的朋友兼同伴）从中作了介绍。斯温伯恩同意意见一面：“很好，把我们介绍一下。但我和他说不上三句话。”他说到做到。这次邂逅勉强持续了三分钟。这也是他们唯一的一次会面。然而，王尔德拒绝承认自己受到了冷落。他为了搭上关系，甚至建立友谊，已经竭尽所能；他给斯温伯恩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无伤大雅的无名小卒”。⑩

罗塞蒂虽然住在离泰特街不远街角处的切恩步道，却完全高攀不上。他容易情绪低落，“对奥斯卡的名字与他及他的圈子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深恶痛绝”，拒绝与这个暴发户有任何联系。他甚至斥责他的

老朋友伯恩-琼斯，说他“居然和假扮成新美学运动领袖的人搭讪”（伯恩-琼斯坚决捍卫王尔德的才华）。❶被拒之门外的王尔德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建立某种代理关系，热衷于从罗塞蒂的老朋友那里收集他的各种轶事。❷

事实证明，更广阔的艺术界比较友好，对他们与王尔德的所谓关系没有那么焦虑。牛津大学新上任的史莱德教授威廉·布莱克·里士满成了他的朋友。❸王尔德是位于圣约翰伍德的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夫妇美学之家的常客。❹他参加他们每星期二的例行活动，并出席了他们为50名精挑细选的好友举办的“绝妙”化妆舞会。只有王尔德一个人拒绝戴假面参加舞会。“塔德玛夫妇觉得他太自负了，”埃德蒙·高斯说，“请求大家尽可能地戏弄他。”❺王尔德还为画家绘制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及其朋友，提供了有关早期希腊拼字法的建议。❻

王尔德新结交的所有人当中，最显赫的是威尔士亲王。王尔德与莉莉·兰特里和弗兰克·迈尔斯的友谊一直让他有一种接近王室的感觉，但直到现在，这种感觉才真正转化为一次会面。王尔德日益上升的人气引起了亲王的兴趣，于是他请朋友克里斯托弗·赛克斯设宴让他们见了个面，他还为此编了一个警句：“我不认识王尔德先生，不认识王尔德先生，也就没人认识你。”❽宴会本身并不尽如人意：有一位名叫伯纳尔·奥斯本（亲王的御用“小丑”）的客人不停地说着粗俗的俏皮话，导致王尔德离席而去。不过，多少令人欣慰的是，奥斯本从恼怒的亲王那里得到了“应受的责备”，更让王尔德满意的是，宴会的

消息传开了。埃德蒙·耶茨写了一首诗以示祝贺——发表在《世界》杂志上——题为“Ego up to Snuffibus Poeta”。^①

王尔德在威利的热情配合下，适时地宣传了自己与其他皇室成员的邂逅。^② 社会声望压倒共和情绪。王尔德万分激动地把亲王请到济慈屋，到那里参加了W.欧文的读心术演示。客人中包括惠斯勒、欧文、刘易斯夫妇、阿齐博尔德·坎贝尔和莉莉·兰特里。^③ 在格罗夫纳画廊的招待会上，亲王穿过拥挤的长廊，“离开随行的人”，“伸出手”，亲切地问候他的新朋友。^④ 王尔德还参加了马尔伯勒宫的一个游园会。^⑤ ^⑥ 那些对他在社交界功成名就感到愤愤不平的人，如今更是怒不可遏。

4 一位英国诗人

我承认，无所作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但是别做过火。

——奥斯卡·王尔德，引自安托万·代·里瓦罗尔

王尔德决定把自己的名气用到实处，出版一本诗集，确立自己作为新美学诗人的地位。经历了之前的挫折后，现在似乎时机已经成熟。然而，尽管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却仍然找不到一家甘冒风险的经营性出版商。他无法忍受一等再等，决意亲自着手处理这件事。那年（1881年）5月，他写信给出版商大卫·鲍格——出版过《拜伦的生日书》《肯辛顿奇史》和《板球队员笔记》——询问他是否能够“立刻”出版一本诗集。❶王尔德愿意承担全部出版费用——这种做法在当时并非罕见。但从鲍格的做法看，他似乎确实对这本诗集有点信心，不仅修改了他的标准“协议”使之对王尔德有利，而且降低了费用以作为对王尔德出资的回报。❷

王尔德把这本书当成一件精美的美学作品，以此展示他的品味。他在诗集上投入了很多资源，这个项目势必让他进一步陷入债务危机。诗集收录的42首诗——其中包括他在期刊上发表过的所有诗歌——将被印在“手工荷兰纸”上，页边空白很大，书页顶部镀金，整个装帧采用“白色羊皮纸”，上面镶嵌着印有日本风格樱花图案的金色纸板。❸该书的建议零售价——10先令6便士（相当于半个畿尼）——意味着，它是为特定读者设计的精品。

虽然王尔德希望尽快出版这本书，但丝毫没有忽略编辑方面的问题。他将自己的诗歌分成几组，每一组都有各自的页眉标题。为避免浮华的效果，他决定将其命名为《诗集》。他将那首自我标榜的十四行诗《唉！》——用斜体字印刷——作为开篇，也就是《序文》。王尔德在这首诗中，把自己塑造成出于宗教或学术原因，“不再挽留”“旧时的聪明和苦行般的自制”，为的是获得佩特式的感官上的瞬间印象和不断变幻的激情——他的“灵魂随每一缕激情飘逸”，“.....化作弦琴任八面来风吹奏”。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想知道——在触摸了“浪漫的蜜糖”之后——是否真的“灵魂的遗产就须从此丢个精光”。他似乎暗示，自己还有可能进一步改变想法。

他仔细研究印刷厂的校样。据说，吃饭的时候，有人问他这一天过得如何，他回答，一直在埋头苦读：“整个上午我都在校对我的一首诗，去掉了一个逗号。”当被问到下午时，他说：“下午——嗯，我又把它放回去了。”^①到6月中旬，这本书总共印刷了750本。然而，其中只有250本是“第一版”。这是精明出版商们的另一种常见做法：这样做可以减少他们的初始投入，而且还能通过将已经印刷好的书页装订成“新版本”来刺激市场。

王尔德既有雄心壮志，又有敏锐的商业头脑，把目光投向了美国，他在那里正日益受到关注。当然，他的诗已经在《波士顿先驱报》上发表过，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美学艺术的最高权威”和“波斯尔思韦特的原型”正在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②他与波

士顿的罗伯茨兄弟公司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同时出版该书的美国版；书中文字内容完全相同，只是没有装饰的布面，准备将售价定成较为便宜的1.25美元，相当于5先令。❶

及至6月底，一切就绪：广告开始出现在报纸上，甚至“伦敦城”的墙上。❷《世界》杂志宣称：“有些人一听到奥斯卡·王尔德先生的名字，就要问他是谁，他做过什么，现在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了，因为王尔德先生的诗集即将出版。”❸这本书——以其显著的题目和精美的形式——证实了王尔德长久以来作为“诗人”的地位。他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并将签名题字的书本寄给众多朋友和名人，其中包括格拉德斯通和莉莉·兰特里、威廉·布莱克·里士满和埃伦·特丽。维奥莱特·费恩和玛格丽特·伯恩-琼斯等人还收到了充满诗意的献辞。❹现在他觉得，自己可以和文学界的大人物建立紧密联系了，于是还把书——连同辞藻华丽的附信——寄给了斯温伯恩、罗塞蒂、威廉·莫里斯、马修·阿诺德、罗伯特·布朗宁和约翰·阿丁顿·西蒙兹。反响令人欣慰。

西蒙兹——虽然私下里认为王尔德的附信几乎“像极了《笨拙》中的讽刺形象”，但他——很欣赏这本书。❺他回复了一封深思熟虑的赞美信，指出了诗歌中的不均衡、政治矛盾和过度的“济慈式”感官投入——但也“从中感受到了诗人真正的天赋”。❻马修·阿诺德在回信中恭维王尔德是一位“同行”，并感谢他发来“简直过于友善”的短笺：“我只是刚翻阅了一下，不过，我觉得这些诗歌确实把握住了韵律，要想写出好诗，这是最基本的要素；事实上，就写诗而

言，作为一切努力的根本，这种把握并不是虚假和徒劳无益的。”^①斯温伯恩即便谨慎，也对诗集表示了欢迎；并且特别提到被其中的一首《剪影》(Les Silhouettes)深深打动。勃朗宁和威廉·莫里斯寄来了“表示赞赏的信”。^②似乎只有罗塞蒂没有回信。^③

《诗集》在新闻界制造了很大的轰动。王尔德糟糕的名声使得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都受到了广泛的点评。可以确信——尤其在英国——这本书不会得到完全公正的待遇。王尔德请求包括奥斯卡·布朗宁和威廉·沃德在内的朋友们为这本书撰写评论，尽其所能地对抗预料之中的敌意。^④他受到了评论家、记者和其他作家的大量攻击，他们憎恨他的名声、他“庸俗的”自我推销，以及他在社交界获得的成功。

《笨拙》杂志是这一波攻击的带头者。他们把这本书编进一首小调，“唯美主义者中的美学家！名字有什么蹊跷？诗人名叫王尔德，但他的诗却那么乏味”，他们在一篇评论中证实了这一结论，谴责这部作品是诗歌界的“剽窃品”，是“兑了水的斯温伯恩”。^⑤

王尔德丰富的文学素养成了他的不利因素。评论家们普遍认为他的诗歌是仿作，而且不仅仅模仿了斯温伯恩一个人。批评家们列举出他模仿的对象有弥尔顿、罗塞蒂、莫里斯、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济慈、华兹华斯、丁尼生和阿诺德，借此炫耀他的学识。他们认为王尔德唯一没有模仿的“当代诗人”是罗伯特·布朗宁——尽管，一位作家很不厚道地指出：“他‘模仿的布朗宁’大概在另一本书里。”^⑥

他们也许愿意承认王尔德“聪明”，但其他方面却未必。^⑦除了模仿，最引人注目的指责是“不真诚”和“品味差”。他们认为，王

尔德的感情装腔作势。他在得意忘形之际暴露了对大自然的无知：“他以为绣线菊和银莲花会同时开放……在海上能常常见到猫头鹰。”^①从罗马天主教到异教，从君主制到共和制，从革命到共产主义，王尔德显然能够“平等地”看到“一切事物的好坏”——但这在别人看来是一种混淆。^②还有人 对作品中大量“淫荡而低俗的语气”做出了严厉抨击。^③《查米德斯》——讲述一个西西里年轻人与雅典娜雕像的激情邂逅——被认为是其中最败坏的一首。诗歌中的“冰清玉洁的肋腹”和“丰满滑腻的大腿”，被认定“远远超越了从前异教徒诗人所允许的程度”。^④

除此之外，漫画杂志的记者们还嘲笑了王尔德的诗句——出自《爱的沉默》——“荒芜的记忆/未吻之吻”，他们想知道“未吻之吻”到底是什么，并且提出王尔德的大多数诗歌似乎都出自“未想之想”，也许会招来“无咒之咒”。^⑤

不过，也有一些更为宽容的评价。王尔德确实拥有支持者。一位评论家恭维称，“济慈的一小块斗篷”掉落在他身上。^⑥《伊底斯的副歌》被反反复复称赞为诗集中最好的诗歌。^⑦《世界》杂志（或许是意料之中）发现，这本书的外观（“一件美丽的东西”）和内容（“构思巧妙，表达得当”）都有许多值得赞赏之处。^⑧奥斯卡·勃朗宁响应王尔德的请求，在《学园》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赞赏性质的评论——虽然并非不加任何批判——文章结束时下结论道：“我们合上这本书时可以确信，英格兰又多了一位新诗人。”美国人的反应往往与这种积极的情绪相呼应。在大西洋彼岸，《万福，女王》特别受人赞

赏；《纽约时报》称它是“丁尼生没有写过，也写不出来的一首关于英国的颂歌”。^①

尽管王尔德乐于听到这样的赞美之词，但他仍为英国普遍存在的批评和敌意感到沮丧。^②日趋明朗的是，他来之不易的名声不仅对他的艺术理想帮助有限，而且事实上也许已经成为一种明确的障碍。他精心设计的姿态，虽然可能会吸引一些人，却激起了怨愤，招来许多人的嘲笑。它触怒了许多艺术家，也惹恼了庸俗的媒体和“普通大众”。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仍有回旋的余地。公众的关注确保了这本书的知名度。它找到了自己的读者。“第一版”很快就卖光了，“第二版”的另外250本也立刻装订成册。10月初，有消息称“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击败了批评家们的嘲笑。这本书在他们的嘲讽中出了第三版”。^③因此除去原来的750套之外，计划再新印500套；美国也采纳了类似的做法，这本书很快就在那里推出了两个版本。^④

在伦敦小小的文学圈子里，这本书可谓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事实的确如此。王尔德夫人在一次她张罗举办的招待会上沾沾自喜地告诉客人们：“知道吗，他们说自从拜伦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如此这般的轰动……每个人都在谈论（奥斯卡的诗歌）。”^⑤这些话当然是王尔德的朋友们传出来的。埃伦·特丽对它“爱不释手”。^⑥伦内尔·罗德建议他的一个熟人“应该去读一读王尔德的新书，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文字”。^⑦惠斯勒希望来访的美国赞助人和她的旅伴们“人人购买一册王尔德的诗集——要不然你们休想离开！”^⑧王尔德自己

对整个结果非常满意。如果不是完胜，这本书就不会有人讨论、点评和购买。虽然高昂的成本意味着他只能从中挣点“零花钱”，但才出版了一本诗集就能获利，仍不失为一次成功。❶

这本书在牛津引发了激烈辩论。王尔德当时仍然是学校里的一个人物。他一如既往地定期去学校——发现除了朋友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模仿者。现在似乎每个学院都出现了一小撮美学“极端分子”：“他们普遍留长发，”一名在校本科生说，“戴着火红色的运动围巾，房间里挂着蓝色瓷器和波提切利的画作，除了斯温伯恩和罗塞蒂的书，其他一概不读。”❷王尔德的“追随者们”变得越来越扎眼，渐渐遭到了抵制。其中有人（一个莫德林学院的人）曾经提议，牛津大学辩论社图书室应取消订阅《笨拙》，因为该杂志一直在嘲笑唯美主义，但遭到了断然拒绝。当他们得知王尔德将在夏季学期期末到牛津（到大学学院参加舞会，与莫德林学院的信徒见面），莫德林划艇俱乐部里便有人计划到时候抓住王尔德和他的追随者——把他们按倒在“学院的抽水泵”下面。幸好有人提前把消息透露给王尔德，使他绕过了莫德林学院。他的追随者虽然身体躲过一劫，但房间遭到了洗劫。这次攻击事件——对方扬言还要发动进一步袭击——着实削弱了大学校园里的唯美主义热情。❸

正是在这种敌意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王尔德应牛津学联图书室的要求，寄去了一本带有题赠的诗集。7月11日会议结束时，当图书管理员宣称已经收到这本书，提议接受并对作者表示感谢时，奥利弗·艾尔顿——公认的牛津大学“知识分子”领袖——出人意料地提出反

对。他精心准备（在未来大诗人亨利·纽博尔特的协助下）并发表了一番“假装严肃”的滑稽演讲来谴责这本书：

并不是说这些诗歌内容空洞——虽然它们是空洞的；并不是说它们有违道德——虽然它们是有违道德的；并不是说它们有这个或那个毛病——虽然所有这些毛病它们都有；问题就在于，它们的大部分内容根本不是这个所谓作者撰写的。

他宣称发现作者直接抄袭了60多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莎士比亚、菲利普·西德尼、约翰·多恩和威廉·莫里斯——他建议拒不接受这本书，因为“牛津学联已经拥有所有这些诗人的更好也更全面的著作”。他的建议招来各式各样的喝彩声和嘘声。接着是一场即兴辩论，意见双方各自有几位发言人，在艾尔顿的要求下最后以140票对128票，做出了拒绝接受此书的决定。图书管理员试图挽回局面，他要求进行会员投票表决。但此举以188票对180票进一步坐实了先前的决定。这本书必须原路退回，学联秘书长为此表达了歉意。❶王尔德以一种贵族式的优雅回应了这一拒绝——他“主要遗憾的是……在牛津，竟然还有这么多年轻人愿意以自己的无知为标识，自己的武断为准绳来衡量富有想象力的美好作品”。❷

这件事虽然令人懊恼，但也产生了一个有用的结果。它引起了“社会杂志”《真相》创始人亨利·拉布谢尔的注意，并使他抱有兴趣（拉布谢尔同时也是自由党议员、剧院老板、机智风趣的反犹主义者、W.S.吉尔伯特的敌人，以及乔治·刘易斯的委托人）。在此之前，《真相》杂志曾经冷落他，讽刺挖苦他，现在却要站出来支持他。❸

“拉布”是个得力的朋友，也是个有趣的同伴。事实上，王尔德认为他是“英国最有才华的健谈者兼最杰出的记者之一”。^⑨“聪明的对手”变成了同样聪明的盟友，这是件好事。他很快便进入了王尔德自己精挑细选的“英雄榜”。^⑩

不过，《诗集》在为他赢得新的支持者的同时，也令他失去了一位老朋友。弗兰克的父亲卡农·迈尔斯长期以来不仅对王尔德的作品抱有兴趣，而且一直关注着他的精神生活。他仔细阅读这本书，但越看越沮丧。尽管他发现了很多“纯洁而美丽”的片段，但他还是被几首诗中的“反基督教”情绪深深困扰。其中尤为明显的也许是《查米德斯》，他的妻子看了之后心烦意乱，马上将它裁掉，并确信它“对青年男女极其危险”。^⑪卡农写了（两封）信给弗兰克，敦促他向王尔德提出告诫。虽然弗兰克确实向王尔德笼统地提到了这件事，但他并没有真正地把父亲的信给他看，而是让父亲直接写信给他，摆明种种忧虑，要求日后这本书再版时删掉那些令人不快的诗句，“以免玷污……当代最富有诗意的作品之一”。

王尔德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其中可能提到艺术与道德不可相提并论，就像“事物主体”与“处理方法”必须分开一样。这是他当时隐约产生的一个想法：有人暗示他的诗歌“不纯洁、不道德”，对此他对另一个提出疑问的人说：

一首诗写得好或写得差，在艺术中不应该存在评判善恶的参照标准。如此一个参照物的存在意味着视觉上的不完整。希腊人懂得这一原则，他们极其平静地享受艺术作品，我想，我的一些批评者是绝不

会允许他们的家人看那些作品的。诗歌带来的享受并非出自主题，而是来自语言和韵律。诗歌应该因其本身而受人喜爱，不该受到道德标准的批判。②

然而卡农丝毫不为所动。他回信写道：

至于道德，我禁不住想说，弗兰克应该是清楚的——我相信，他经常与你争论。如果我很遗憾地建议你们分开一段时间，那并非出于，我们不相信你的人格与你诗歌中所表达的其实非常不同，而是因为你不像我们这样觉察到了已经发表的诗歌之危险性，它会让所有读者自忖，“这已经超出了诗歌的范畴”，这简直是放荡，任何人读了它都会深受其害。③

因担心王尔德在道德上对弗兰克·迈尔斯产生影响而要将其逐出济慈屋，这个想法本身颇具苦涩的讽刺意味。在两人合住期间，王尔德倒是日渐意识到他这位朋友真实存在的道德缺陷——他喜欢跟女孩子混在一起，偏离了专业精神转而将她们当作猎物捕食。④有一个说法是（有点添油加醋），有一次王尔德在泰特街发现迈尔斯处于“极度痛苦和惊恐的状态下，正在匆匆忙忙地准备逃走”。他承认自己和“一个年轻的女孩”作下了孽，并且说：“我确定，她的父母已经告发了我，我随时有可能被抓走。我要在警察赶到之前逃走。”王尔德担心为时已晚，因为他已经注意到外面街上有两个身影，很可能就是警探。迈尔斯语无伦次地嚷嚷着要“出于耻辱去自杀，跳楼自杀”，王尔德断然阻止，并且提出他也许可以从房顶逃跑。迈尔斯从画室窗户逃走时，王尔德顶住不断敲门的警察。当他最终开门让警察

进来时，假装以为警察们死缠烂打要他开门是“画室搞的什么恶作剧”。他告诉警察，迈尔斯已经去了欧洲大陆。②

迈尔斯肯定也意识到，是父亲一手造成了这样不公的境地，然而他在经济上依赖父母，他觉得无法违背他们的意愿。王尔德非常愤怒。他很少这样发脾气，但这是其中一次。根据当时在场的萨莉·希格斯描述，他怒火中烧，要求知道迈尔斯是否真的打算“如此粗暴地破坏他们长期结下的友谊”，“仅仅因为你父亲是个傻瓜就要在相处这么多年之后分开？”迈尔斯心烦意乱地反驳说，自己“绝对没有别的选择”。

“那么，很好，”王尔德说，“那我就离开你。我现在就走，我这辈子也不会跟你说一句话。”

他冲上楼，把自己的东西胡乱塞进一个大箱子，不等仆人帮他拿下楼就从扶栏上把箱子扔下楼去。箱子砸在下面厅里一张贵重的古董桌子上，将其砸成了碎片。王尔德冲出屋子，重重地关上门。他再也没有回去。③

这个裂痕让王尔德第一次领教了英国人的伪善。尽管他在诗歌中提到要亲吻“罪恶之口”，但他自己的行为却一直相当检点。他的身上没有丝毫性变态的痕迹，对性的方面兴趣也不大。伦内尔·罗德回忆，他对“危险的不良交往”很敏感——他提到曾经在工作室展览上遇到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令人钦佩的绅士，对方虽然“非常和蔼……但我们绝不能与像他这样的人为伴”。④

王尔德被赶出泰特街，也被逐出了迈尔斯身边尊贵的社交圈。他搬到梅菲尔，在离格罗夫纳广场不远的查尔斯街9号（现卡洛斯广场）租下两间带家具的房子。房间很小但地址却“暗示着奢华”，而且房子由一个退休的仆役长和他的妻子打理，能够提供很好的服务。房间的装饰毫无审美情趣可言：墙上镶嵌着橡木壁板，以及用厚重的黑框装饰的旧版画。 ⑨

自己租房是一种挑衅式的奢侈，但它确实使王尔德对金钱的迫切需求显得更加突出。一个人生活意味着，他现在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1881年的成功令他心满意足：《笨拙》杂志和《佩辛丝》以滑稽的方式模仿了他，出版了《诗集》并将其呈给了威尔士亲王；他自以为拥有了“名声”“恶名”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成功”。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带来他所谓的“维持生活的手段”。王尔德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尚且犹豫，他的朋友们却比他更实际。乔治·刘易斯和他的妻子对他抱有积极的兴趣——就像他们对待莉莉·兰特里一样，后者也同样需要一份事业。于是，他们在波特兰广场就“奥斯卡的未来规划”展开了几次讨论。 ⑩

王尔德仍然期待《维拉》能够被搬上舞台。他的期许或许源自当年3月在阿德尔菲剧院上演的另一部以俄国为背景的情节剧《米歇尔·斯特罗戈夫》。就在同一个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彼得堡遭到虚无主义者暗杀，他的剧本似乎因此获得了更强的时事性。然而眼下没有人提出要排演这部戏，他得另谋出路——一些更加异想天开的事情。于是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内容，“奥斯卡·王尔德先生打算在下一个演

出季走到公众面前，以莎士比亚剧演员的身份亮相”。^①阿齐博尔德·福布斯——《每日新闻》勇猛的战地记者兼刘易斯的好友——提出了一个纯属无用的建议，作为“在唯美主义和破产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他认为王尔德应该“应征一个骑兵团，试着当一年的私人龙骑兵”（这个想法让贫穷的唯美主义者“不寒而栗”）。^②甚至还有报道称，王尔德可能会开始打理苗圃，种植“数英亩的水仙花”。^{③④}

然而，刘易斯支持王尔德去美国演讲。^⑤巡回演讲可以赚很多钱。事实上，阿奇博尔德·福布斯走的的就是这条路，而且非常成功。同年早些时候，迪翁·鲍西考尔特曾经提出过这个想法——甚至有可能是莎拉·伯恩哈特之前提出的——但王尔德一直很谨慎，对自己在讲台上发言的能力表示怀疑。^⑥眼下的时机似乎更为有利。他变得越来越自信。大西洋彼岸的人们对他本人及他的作品日益感兴趣，《诗集》受到的热烈欢迎就证实了这一点，这表明他可能会有听众。^⑦这项计划得到他的朋友们和支持者的热烈赞同。^⑧

他必须找到一个推广人，于是刘易斯向才华横溢的年轻剧院老板理查德·多伊利·卡特“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一步棋走得很巧，时机也刚刚好。卡特作为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歌剧的制作人已经确立了声誉：他刚刚建成豪华的萨沃伊剧院正好可以展示他们的作品。卡特具有国际视野，他还负责美国和各殖民地的戏剧制作和巡回演讲；当时正在帮阿齐博尔德·福布斯运作。他理所当然地对王尔德印象深刻，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有很多话要说”。^⑨但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王尔德提供了一个机会。1881年9月，美国版《佩辛丝》在纽

约上演，反响非常好；其他作品也计划在美国各地上演。虽然这部讽刺唯美主义的作品很受欢迎，但在美国，人们对这一主题的直接认知非常有限。不过，王尔德的名字倒是经常在有关歌剧的报道中被提及，他不仅是一本备受争议的美学诗集的作者，而且还是“美学思想的创造者”。卡特意识到，如果把王尔德带去美国，“以一种公开的方式阐明他的审美理念……公众会愿意倾听他说话”。^②王尔德在伦敦取得的社会成功也许会助力他融入美国社交界，为这次冒险之旅提供威望支撑并扩大宣传范围。更重要的是，正如《佩辛丝》激发了美国人对王尔德的兴趣，王尔德也可能进一步提升美国人对《佩辛丝》的兴趣。

卡特的直觉得到了他的商业伙伴（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海伦·勒诺瓦的肯定，她当时正在纽约。一位人脉广泛的女记者向她和W.F.莫尔斯上校（卡特的纽约办事处经理）保证，只要王尔德打扮妥当，在纽扣孔里插一朵向日葵，手持一朵百合花，美国人肯定愿意去听他的唯美主义演讲。^③卡特放心了，果断采取了行动。一封电报自纽约发出送到王尔德手上：“可靠的经纪人委托我咨询你，是否愿意考虑他在信中提出的50场活动，从11月1日起。保密。请回复。”王尔德第二天发出回电（10月1日）：“只要条件优厚即可。”^④这是双方开始协商条件的基础。^⑤

对王尔德来说，这样的需求令人兴奋。他最初的想法是做三个演讲：第一个是《致力于对日常生活中的“美”的思考》；第二个是《莎士比亚诗学方法的例证》；第三个是《一首抒情诗》，也许就是

他最喜欢的《查米德斯》。然而，莫尔斯邀请的美国订票代理商劝他重新考虑。美国人想要他们的唯美主义者谈的是唯美主义——或者，用卡特和莫尔斯的话说就是，“时髦疯病的最新形式”。^⑨50天的行程也起了变化。首次演讲决定在纽约展开，然后——根据那里的情况——去东部几个大城市。与此同时，美国之行的日子被推迟到新年。大西洋两岸的新闻界都报道了有关这些安排的消息。

王尔德作为《佩辛丝》主题精神的化身而受到推崇，其程度和用意愈发明显。卡特对海伦·勒诺瓦说，王尔德对此“有点敏感”，“但我觉得这没什么”。《体育时代》刊出“几段愚蠢至极的话”后，出现了“些许尴尬”，其中一段话说，王尔德是作为“为《佩辛丝》打招牌做广告的人”被发送到美国的，另一段话则称，巡回演讲已经取消了，因为多伊利·卡特发现完全可以用一半的价钱从美国找一个头发更长的，真正的“招牌广告男”。但卡特有能力摆平这些事情，继续推进他的诸多计划。^⑩

他向王尔德建议，最好一到纽约就去看歌剧——要在“私人包厢”里——“我们得事先让人知道”，他“很可能被认出来”。王尔德“相当喜欢”这个想法，乔治·刘易斯也一样，他一如既往地陪伴在王尔德左右。落实了这桩事情后，卡特告诉王尔德：“千万不要介意我借用一个小小的谎言在美国造势。”^⑪王尔德很容易被说服：毕竟，为了在伦敦给自己造势，他已经使用过不止一个小小的“谎言”。卡特明确要求王尔德在演讲中至少要提到《佩辛丝》一次，而且他在讲台上的穿着也要像伯恩桑一样，一身“唯美”的黑色天鹅绒

外套加齐膝马裤^①（王尔德有一条旧的共济会马裤，除此之外还有他的那套“鲁珀特王子”化妆舞会行头）。

双方一直在谈条件。在乔治·刘易斯的指导下，王尔德最终与卡特达成协议，在扣除费用后，得到净收入的一半。^②王尔德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除了准备演讲稿之外，还要考虑穿着。除了伯恩桑套装，他还购买了“饰有盘花纽扣的制作精美的绿色毛皮大衣”和一顶波兰式帽子——惹得惠斯勒既好笑又生气：“奥斯卡，——你竟敢如此！穿成这样到底是什么意思？把这些东西还给内森（戏剧服饰供应商），再也不要让我看见你在切尔西的大街上打扮成那个样子，一身科苏特加曼塔里尼先生。”^{③④}王尔德还联系了许多熟人和朋友，请他们帮忙写引荐信。他对驻伦敦的美国大使詹姆斯·罗素·洛厄尔——毫无疑问还有霍顿勋爵等几十个人说：“我知道，对于所有的美国杰出人物和才智人士来说，您的名字简直就如同一张通行证。”^⑤

在准备美国巡回演讲的过程中，将《维拉》搬上舞台的计划终于实现了。这不是一场完整的演出，而是在阿德尔菲剧院的一次促销活动——只有一个下午（晚间上演的是风头正劲的查尔斯·里德作品《改变永远不会太晚》）。这次活动的幕后推手似乎是女演员伯纳德·比尔夫人，她是威利喜欢的人。她入行之后一直追随莫杰斯卡，渐渐地也认识了奥斯卡。她也许从《维拉》这出戏中发现了一个证明自己也能演女主角的机会。这出戏的题目中，角色名字引人瞩目；这出戏——出自“奥斯卡·王尔德”之手——肯定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多特”·鲍西考尔特（迪翁·鲍西考尔特22岁的儿子）也答应在其中出演“重要

角色”。^①尚不清楚的是，谁会为这次演出提供资金。即便一场一次性的日场演出，所需费用也相当可观：要租剧院；要给演职人员发工资。王尔德估计花费在100英镑左右。^②无论如何，媒体上很快出现了有关这出戏的文章——将于“12月17日”上演。^③

然而几天之内，媒体就掉转了风向。11月30日《世界》杂志宣布：“考虑到当前英国的政治情绪，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已经决定将他的戏剧作品《维拉》推迟一段时间上演。”媒体暗示——在随后的几篇详细报道中——这出戏里的共和情绪，以及其中“一个非常暴力的革命人物所发表的几次演讲”使得这场演出将给“‘忠实的英国戏剧界’带来太大风险”。^④事实上，媒体甚至称，自从维多利亚女王观看了《上校》（她接见了扮演男主角的演员）之后，戏剧界对王室的忠诚情绪如此高涨，以至于王尔德发现“无论出于热爱，还是出于金钱，他都根本不可能为这出戏找到愿意扮演共和派的演员”。^⑤王尔德本人暗示，他被拒绝“允许”上演这部作品——可能是戏剧审查人员——因为它高调地“公然宣扬共和思想”。^⑥与此同时，在最近沙皇遭遇暗杀之后，某些领域收到了来自外交层面的建议：至少有一份报纸报道说，外交大臣收到了俄国大使关于这个问题的沟通来信。^⑦这些理由虽然丰富多彩，且并非不可置信，但似乎都是牵强附会。它们转移了公众的视线。演出延期更可能是由于缺乏资金。^⑧王尔德宽慰自己，他可能会在共和制的美国找到人来接手这部戏——他以鲍西考尔特之名，把剧本寄给纽约的诸多制作人，以及美国女演员克拉拉·莫里斯。^⑨

那年冬天，王尔德在戏剧舞台上见证的唯一一次闪亮登场是莉莉·兰特里的作品。兰特里被拉布谢尔的演员妻子亨丽埃特所倾倒（很可能是受王尔德的影响），于是很快就以业余演员的身份，出现在特维克纳姆市政厅上演的汤姆·泰勒的开场喜剧《公平交战》(Fair Encounter)中。❶ 王尔德坐在拉布谢尔先生旁边，在观众中非常显眼，“（他）那雪白的领结、前胸衬领和马甲……衬托着一块向日葵色的手帕，它被巧妙而不经意地插在衣服上”。❷ 几周后，他再次参加了兰特里的伦敦舞台秀——还是作为业余演员——在干草市场剧院参演一部慈善剧《委曲求全》(She Stoops to Conquer)。威尔士亲王夫妇坐在皇家包厢里观看了演出，然而坐在正厅前排，幕间休息时同朗斯代尔夫人对话交谈的王尔德依然十分引人注目。❸

演出可以说是成功的。尽管兰特里作为一个演员才能有限，但她有明星的光环。媒体是善良的，公众是热情的。王尔德赞美了她那“美妙的音乐般和谐的嗓音”，她那“令人快乐”的举止，以及她无穷的潜力。❹ 斯奎尔·班克罗夫特和妻子玛丽是干草市场剧院的经理，他们被她打动了：立即与她签约——以令人愉快的“高薪”——请她加盟来年上演的第一部作品。她似乎在舞台上找到了“救赎”。❺ 对于即将踏上全新冒险旅程的王尔德来说，她的成功既让人欢欣鼓舞，又让人感到任务艰巨。

随着出发的时间日益临近，他受到各种激励，振作起来。1881年的《世界》杂志“圣诞专刊”将他誉为“伦敦之光”年度杰出人物（其他年度人物中还包括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斯温伯恩、拉布谢尔、

迪翁·鲍西考尔特、罗伯特·布朗宁和乔治·刘易斯)。①拉布谢尔的《真相》中有一大段关于他未来旅程的报道，预言他的“共和剧本”和他关于“浪漫现代生活”的演讲将获得成功；②一本名叫《我们的大陆》的美国画报周刊给他发来一封电报，请他“写一首诗，二十行，每行稿费一基尼；主题是——向日葵或百合花，一到美国就发给他们”。这既是对他作品价值的赞许和肯定，也是他第一次领教大西洋对岸的人在商业和诗歌上同时表现出来的直率态度。③

为给他送行，惠斯勒、罗德以及其他几个泰特街住户在“一家波希米亚酒馆”请他吃了一顿饭。王尔德说：“我希望横渡大西洋的时候不要晕船。”惠斯勒回答：“好吧，奥斯卡，如果你晕船，就把伯恩-琼斯吐出来。”1881年12月24日，王尔德带着这些忠告在利物浦登上了开往纽约的“亚利桑那”号。④

第四部分 声名鹊起

1882年

27~28岁





1882年的王尔德（拿破仑·沙勒尼摄）

1 最美好的地方

我被社会撕成了碎片。

——奥斯卡·王尔德

1882年1月2日晚上“亚利桑那”号抵达斯塔滕岛。这艘船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通过检疫，在纽约港外抛锚。王尔德心里充满希望、期待和焦虑，忍受着时间的拖延。不管他有多么焦虑，纽约的媒体都比他更胜一筹。

莫尔斯上校和海伦·勒诺瓦投入了巨大的精力，颇有成效地为王尔德的美国之行造势。他们乐于营造一种困惑，即王尔德来到美国是作为滑稽可笑“矫揉造作”的伯恩桑和波斯尔思韦特的化身，还是作为一个才华横溢，肩负着严肃使命，准备向感兴趣的公众解释“审美崇拜”的诗人兼学者。他们在两方面都下了功夫。在相较“严肃”的一系列行动中，他们制作了一本小册子，简要介绍这位“年轻的英国诗人”——他杰出卓越的父母，他在圣三一学院和牛津大学辉煌的学术生涯（他在波托拉学校的时间被减少到一年），他的文化影响（罗斯金、意大利和古希腊），他的文学成就（他的《诗集》和他的少量评论文章），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对唯美主义的深刻认识。但这幅光彩照人的肖像在某些地方被巧妙地修饰了一下。小册子中没有提及《佩辛丝》和《笨拙》杂志，只是承认王尔德对美学思想的“夸张表达”——“年轻人热情而鲁莽的言论”情有可原——招来了某些英国媒体的嘲笑。❶大部分的揶揄嘲笑都收录在一本名为《奥斯卡·王尔德

生活中的灵魂苦闷》的匿名插图小册子中，它从另一个角度介绍了这位了不起的唯美主义者，从婴儿时期“握着粉嫩的小拳头伸向向日葵”，一直到他和埃伦·特丽、莎拉·伯恩哈特、威尔士亲王变得“形影不离”。

纽约的报纸都急于在王尔德的肖像上添加自己的一笔；他们是如此急切，事实上有几个记者甚至雇一艘划艇登上了停泊着的“亚利桑那”号。王尔德的同船旅客非常兴奋，在他们的指引下，记者们追踪这位“英国唯美主义的伟大代表”来到船长的船舱。王尔德出来迎接他们，觉得很有趣，但也被眼前晃动的笔记本和一连串问题弄得有点仓皇失措，比如：喜欢美国吗？一路横渡大西洋感觉怎么样？来这儿做什么？有什么计划？会在纽约制作戏剧吗？会出让版权吗？马上要去演讲吗？如果是，多久讲一次？会在美国待多久？唯美主义是哲学吗？能给它一个定义吗？

这种纠缠不休的“采访”在英国新闻界闻所未闻，王尔德被吓了一跳。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着令人钦佩的镇定。记者们纷纷发现他从容优雅，语速稍慢，每逢第四个音节都要重读一下。同样令记者们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强健的体格（与广为流传、萎靡不振的唯美主义者形象大相径庭），领口袖口镶着毛皮装饰的阿尔斯特大衣，他的超级“拜伦式”衬衫领子；他们甚至还赞叹了他的牙齿。他们还喜欢他在谈话中随时迸发出的洪亮笑声（一连串大笑“嚯，嚯，嚯嚯”）。

⑨

整场提问只持续了不到十分钟；第二天出版的截稿时间不允许他们继续逗留下去。王尔德的回答是空洞、含糊和简短的。但是，当记者们回到船上时，其他乘客向他们提供了一些王尔德在船上的小插曲。其中有人提到，在海上航行五天之后，王尔德曾对一位在甲板上散步的绅士说：“我对大西洋不是很满意。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雄伟壮观。咆哮的大海根本不咆哮。我渴望遇到一场暴风雨，把驾驶台从船上卷走。”这才更像是王尔德说的话。

第二天一早，纽约几家报纸刊登了这则轶事，一下子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奥斯卡·王尔德对大西洋感到失望”很快成为大西洋两岸的头条新闻，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招来了无数的讽刺诗句和挖苦评论。很多报纸都想知道“大西洋对奥斯卡·王尔德有什么看法？”^①这件事给王尔德上了第一堂课，让他认识到美国媒体的运作方式，而且媒体需要引用评论。他刚一踏上美国，媒体便将他描绘成一个幽默的叛逆者，而不是一个冷静的学者，他是个可以根据听众的品味，或取悦，或激怒他们的人。

第二天早上，“亚利桑那”号停靠在北河码头，码头上已经有更多的记者，以及莫尔斯上校和一群兴趣盎然的“崇拜者”在等着他。王尔德一边和拿错行李的脚夫理论，一边兴致勃勃地应付记者们的问题，他们想让他“定义”并阐释唯美主义。一名记者问：“河对岸那座扎眼的谷物升降机是新泽西州景观中的主要物件，它美在哪里？”王尔德只得说自己近视得太厉害，看不清。^②

莫尔斯把他从这一切中解救了出来，带着他穿过曼哈顿拥挤的街道，去安静的酒店套房吃早餐。❷❸对王尔德来说，纽约在规模和外观上都是全新的，它有宽阔的网格状街道、高耸的建筑物（有些超过十层楼高），以及喧嚣和热闹。王尔德后来回忆道：“每个人似乎都在急着赶火车。”纽约看起来很富裕，人们穿着光鲜，有一种“舒适的气氛”。❹

从王尔德抵达的那一刻起，他就被视为名流对待。这是一次全新而愉快的经历——与他在伦敦的日常大不相同。他的纽约演讲要到下一周，即1月9日才开始；与此同时，莫尔斯小心翼翼地管理着各项开支，保持他在媒体上的形象，维护他在公众面前的神秘感。王尔德被告知不要“大摇大摆上街”。如果他需要购物，可以坐专供他使用的马车出门。

“他不应该让自己显得太平庸。”❺莫尔斯授意王尔德打出去的第一通电话中，有一个是打给弗兰克·莱斯利夫人。她是一个貌美的寡妇，拥有好几家美国报纸。她表示自己旗下的各种出版物都愿意提供支持。当王尔德向她抱怨说，自己还没下船就被“可怕的记者”包围了，因此不得不“转身背对”他们时，她责备道：“王尔德先生，你犯了一个错误。如果你到了美国，就必须认识到记者是很有影响力的。在他们眼里，你代表着一大笔钱。他们的职责是采访，正如你的职责是演讲一样。如果你不跟他们说话，他就得自己想办法挣钱，到那时候他们写出来的就不太可能是恭维话了。”❻

这是一条中肯的建议，王尔德努力照着去做。但是，应该如何展现自己呢？他完全同意，为了提高自己在美国的知名度，并且赢得受众，一定程度上的“废话瞎话”可能是必要的。他并不反对卡特、莫尔斯等人玩双重角色的把戏。毕竟，他正是靠这种手段在伦敦建立起声望的，而且他很享受其中的种种。然而，他决定严肃地对待这次美国之行的“使命”，并且希望其他人也一样。他刚到美国时接受的采访中充满了对艺术本质的真挚见解，而且这样的内容非常多。

王尔德开玩笑说，他到纽约的第一周，每天都会收到大约一百个“采访请求”。^⑩为了减轻王尔德的负担，莫尔斯让他从酒店搬到28街一处僻静的“私人公寓”。地址本应保密，但《纽约星报》的一名记者在收到王尔德的一封介绍信后，竟然在报纸上极不体面地刊登了相关消息。事情虽然引发了“极大的烦恼”（采访者很快就出现在门口），但这个地方还算平静，足以让王尔德对演讲稿进行最后的润色。^⑪他努力进行着各种文字工作。然而，作为唯美主义的活化身是一回事，试图去定义它又是另一回事。他完成了《我们的大陆》的约稿任务，用他最出色的新惠斯勒风格写了两首十二行的《印象》：一首（《公园》）根据要求描述了“环状的百合花”和“狮子一般的向阳花”，另一首（《大海》）描绘了夜晚的大海。^⑫

王尔德要来美国的消息一经宣布，当地的摄影师们就一直在争夺他的照片拍摄权——以及销售权。莫尔斯把这项使命交给了拿破仑·沙勒尼。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位身材矮小的艺术家——身高只有五英尺，长着大大的鼻子，留着与众不同的胡子，惯常戴一顶土耳其毡

帽——有一种罕见的能力，他能创造出引人瞩目的名人形象。所有的舞台明星都来他的工作室。两年前，他为莎拉·伯恩哈特的美国巡演拍摄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宣传照。

拍摄安排在1月5日。矮小的摄影师很喜欢他的大号模特，以及他那飘动的头发、毛皮镶边的外套和白色手杖。“嘿，”他大声说，“的确是一幅别致的画面。”

王尔德有过一些拍照经验，之前他一直摆高贵的姿势，但他发现沙勒尼是一个鼓励他达到新高度的艺术家。两人合作拍摄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照片，将王尔德定位成了非传统的、自信的、富有诗意的天才典型——他的长发不羁地从中间分开，他的双眼深情地凝视着远方，朝观众瞥去，扫过远方的地平线。王尔德换了几套服装，但除了少数几张照片外，他都穿着那条优雅而独特的黑色齐膝马裤。

第一次大约拍摄了24张，沙勒尼在摆姿势这件事上“费了很大的劲”：他蹦来跳去，嘴里不停地小声聊着，与此同时忙着“翻出（王尔德的）阿尔斯特大衣边缘，这里折进一个角，那里抹平一行褶，把王尔德的手左放右放，让他或侧面，或正脸朝前，或略微侧身站着，或坐或站，把他的腿摆过来放过去”，努力达到最好的效果。⑨

沙勒尼当初付给伯恩哈特1500美元，获得了她的肖像拍摄权，他有信心从销售中赚回这笔钱。随着媒体不断高涨的热情——他“很乐意为王尔德出同样多的钱”。⑩莫尔斯保证沙勒尼的独家性：他拍摄的将是王尔德访问美国期间的唯一照片。他们要为美国公众塑造一个

华丽、精致、与众不同的王尔德形象。沙勒尼认为“他以前从来没有拍过这么好的摄影作品”。^①

拍摄和采访并不是王尔德唯一的宣传任务。除此之外，还有一场精心安排的观看一场《佩辛丝》。活动安排在1月5日晚上。第一幕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王尔德一行时髦人物走进私人包厢，引发场内一阵骚动。他身穿毛皮镶边的阿尔斯特大衣，里面是晚礼服。莫尔斯事先在人群中安插了一名《纽约论坛报》记者，以便他能够记录下，当伯恩桑踏上舞台时，“所有观众都转过头来看着王尔德先生”。王尔德——似乎对这种审视毫不在意——已经早有准备，他要借用演讲中的一段警句。只见他斜靠身子，用足够让论坛报记者听见的大嗓门，笑着对一位女性朋友说：“这是庸才对那些不凡之辈的恭维方式之一。”^②幕间休息时，王尔德走到后台亲切地祝贺演职人员，吸引了更多的注意。^③演出结束后，当他离开剧院时，大量观众久久不散，想目睹他的样子，以至于他不得不“从后门溜走”。^④

在一连串的自我推销活动中，还有许多社交活动。纽约社交界向来对来访的名人慷慨大方、充满好奇。莫尔斯的宣传活动确保了王尔德以名人的身份登陆美国。更何况，他还带来了大量推荐信，甚至还有一些颇有地位的美国人脉。他一到美国便接到一大堆邀请：参加奥古斯都·海斯夫人（一位业余旅行作家的妻子）的下午茶会；与约翰·毕格罗夫人（前美国驻伦敦大使的妻子）共进晚餐；去第五大道富有的帕兰·史蒂文斯太太的公寓参加晚会；参加社会记者D.G.克罗利夫人

（又名“珍妮·琼”）专门为路易莎·梅·奥尔科特——以及“奥斯卡·王尔德”举行的文学招待会。

即使如此，莫尔斯也没有忽略宣传的作用。他知道，王尔德的社会声望将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来更多公众：于是媒体将王尔德在曼哈顿的沙龙和客厅里的表现——认真地记录了下来：

在（海斯夫人举办的）招待会上，王尔德先生站在客厅中央，他的身后是一把巨大的日本伞，伞上用色彩艳丽的纸装饰着怪诞的图案。又长又粗的竹制伞柄放在王尔德左边一张桌子下的地板上，从侧面保护着他。他的另一边是分隔两个客厅的隔板，王尔德先生从下午3点到6点，大多数时候就像个异教的偶像一样，被围在中间……他的姿势相当优雅，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笨拙》杂志中的图画，当然是去除了其中的讽刺意味之后……在一个令人愉悦的瞬间，王尔德先生一走出由日本伞和隔板围城的圈，便立刻被女士们围起来，她们站成一个马蹄形，两边是约翰·毕格罗夫人和兰扎侯爵夫人。②

据说，王尔德的经纪人“仔细审查”了宾客名单，确保只有“纽约社交界的顶级精英”才能受邀见到他。这种说法有点夸张：纽约最显赫的阿斯特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等名门望族并没有参加这些活动。③虽则如此，盛情欢迎王尔德到纽约的都是聪明时髦的人物。他在伦敦社交界赢得了一席之地，却只是一个古怪而无足轻重的存在——一个稀奇之物。在这里，虽然他仍被视为一个奇人，但同时还是明星和贵宾。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也是一次美妙的经历。他在给乔治·刘易斯妻子的信中兴高采烈地写道：“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皇家男

孩（威尔士亲王）总那么春风得意：当个小王子(petit roi)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注

然而，焦虑仍然挥之不去。他迄今还没有发表演讲。许多事情要取决于他的表现。莫尔斯已经在其他几个城市暂时预订了讲座，但要等他在纽约打响第一炮之后，才会宣布确切的计划。正如王尔德向刘易斯夫人吐露的那样：“如果星期一没有获得成功的话，我就完蛋了。” 注

首场演讲定于8点在第五大道和西十八街交叉口的奇克林礼堂举行。从广告上看，这次演讲的标题相当严肃，是“英国的文艺复兴”，避开了“唯美主义”这个词。然而，莫尔斯的营销策略非常奏效。礼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张单价1美元的门票全部售罄。大多数人是被一种“好玩的好奇心”所驱使，想亲眼看一看这个经常被谈论的年轻人。但正如《纽约论坛报》所写的那样，其中也有一些他的崇拜者：“具有审美情趣、面色苍白、留着刘海的年轻人……以中世纪的姿态倚靠在”座位的侧面。讲台布置得十分简单：一个铁制的讲坛，两侧是两把椅子，底下垫一块东方地毯，一块棕色的屏布从天花板上垂下来，作为朴素的背景。

在后台等待观众入场的时候，莫尔斯上校发现王尔德相当冷静（与许多经验丰富的演员大不相同）。8点10分左右，礼堂的煤气灯开到最亮，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王尔德和莫尔斯上校大步走上讲台。王尔德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身材高大，头发飘逸，身穿黑色天鹅绒“燕尾服”，最特别的是他那条伯恩桑式齐膝马裤。他看

上去像个艺术的另类。他和莫尔斯在那两把椅子上坐下来。掌声响起——其间夹杂着一丝“窃笑”——随后便安静下来。王尔德看起来有些微微地脸红。然后是一阵尴尬的沉默，人们在等待迟到的观众落座。王尔德成为“一大群歌剧望远镜”的焦点，大家都在仔细研究他那“独特”的装束细节。最引人瞩目的是他的齐膝马裤。除此之外，还有他的白色大领带、白马甲（从马甲口袋里垂下一枚沉甸甸的金印）、巨大钻石模样的衬衫扣饰、黑色长筒袜、镶着“蝴蝶结”的无筒鞋。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的衣服上竟然没有扣眼。“坦率的好奇心”很快变成了“小声议论”，甚至还夹杂着一些“含蓄的讽刺”，继而又是尴尬的沉默。“有人轻轻笑出声来，接着，后排传出一阵大笑。”莫尔斯怀着沮丧，表现出一种“几乎充满反感的”态度。

窃笑声越来越大，眼看着就要变成“哄堂大笑”，这时莫尔斯上校站起身向前走几步，他乍一开口，礼堂便安静下来。“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英国诗人奥斯卡·王尔德，他将以英国的文艺复兴为题发表演讲。”他鞠了个躬，走下讲台。王尔德继续“平静地坐着”，打量着观众，延续着这一戏剧性的时刻。他认出下面坐着一位熟识的女士，向她点了点头。然后他起身走向讲台，与他的身材相比，讲台真是太矮了。他把讲稿放在讲台上，抓住讲台两侧，抬眼朝向天花板，开始说起来：“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受惠于歌德非凡的美学天赋，比如是他第一个教导我们要尽可能具体地界定美，也就是说，总是在独特的表述中显现美……”

有一家报纸形容，他的声音“可能来自坟墓”。王尔德站在讲台上朗读时，他的措辞——在客厅里如此魅力四射，富有音乐色彩——变得出奇地平直且单调。“在这次有幸向你们奉献的讲演中，”他继续道，“我不想提供任何抽象的美的定义……而是要给你们指出本世纪伟大的英国文艺复兴的总的思想观念，尽可能深地探索其来源，也尽可能远地估量其未来。”他刻意地称之为“我们英国的文艺复兴”，因为它“的确是人的精神的一次新生，同15世纪伟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一样，它渴慕更为美好、更为通情达理的生活方式，追求肉体的魅力，专注于形式，探寻新的诗歌主题、新的艺术形式、新的智力和想象的愉悦”。

这绝不是“伯恩桑现身”。这次演讲的主旨是严肃的，思想是抽象的，论点是复杂的。他开始追溯新艺术精神的起源，以及新的“美的表达”，从它们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发酵起源，到拉斐尔前派及其继承者。他寻求将这一运动的特征解释为两种伟大的“人类精神形式”的结合：希腊精神和浪漫精神，一个“静穆优美”，另一个“个性张扬”。他提到了众多权威人物，除歌德之外还有马志尼、柯勒律治、华兹华斯、罗斯金、卢梭、雪莱、斯温伯恩、布莱克、米开朗基罗、丢勒、荷马、但丁、济慈、威廉·莫里斯、乔叟、忒奥克里托斯、红衣主教纽曼、爱默生、安德烈·谢尼埃、拜伦、拿破仑和菲迪亚斯。

演讲的效果“很快就变得令人难受起来”。人群中笼罩着一种“肃静”的气氛。但是，当接下来谈到深受济慈诗歌启发的艺术家时，王尔德停顿了一下笑着说：“拉斐尔前派是些什么人呢？如果你

问英国公众‘美学’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他们中十分之九的人将会告诉你，这个词在法语中的意思是装模作样，在德语中的意思是护墙板。”听到这里，全场哄堂大笑。那是一种如释重负，饶有兴味的笑声，演讲者也放下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他因为大家接受了自己的笑话而感到“心满意足”。礼堂里的气氛变了。莫尔斯说，王尔德从这一刻开始，“找到了感觉”。沉重的空气被驱散了。随着演讲逐步展开，王尔德式“新奇而生动”的口才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他展开了一幅为艺术而艺术的愿景，在其中，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作品不会受政治争论或道德责任的影响。

第一句妙语产生作用之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起来。王尔德声称早期的拉斐尔前派“有三种东西是英国公众所不能容忍的：年轻、能力与热情”，这个评判引发了热烈的掌声。人们又一次对他的隽语“讽刺是庸人对天才怀有的敬意”（曾经在标准剧院的包厢里发表过）大加赞赏。他的论断也同样大受追捧：“能与四分之三的英国公众在所有问题上持不同意见，正是心智健全的首要条件，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精神彷徨的慰藉。”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据说其中要数爱尔兰裔观众最为兴奋。接着他说，“英国的商业精神”已经摧毁了这个国家“美好崇高的国民生活”，扼杀了伟大的戏剧，戏剧才是“艺术和生活的交汇之处”。

他大胆的言论勾起了观众的兴趣，“诗歌无所谓道德不道德：诗歌只有写得好和不好的，仅此而已”；他的想法激发了人们的思考（此处借用了佩特的观点，虽然他没有承认），他认为“音乐”是一

种形式和内容密不可分艺术，它是“最完整地体现了艺术理想的艺术，是其他艺术所力求达到的艺术境界”。他脸上挂着“一种奇特的微笑，仿佛是让观众要对他有信心”，说出来的话让“听众们震撼不已”。他问观众，既然他们“已经花了上百个晚上听我的朋友阿瑟·沙利文的迷人歌剧《佩辛丝》”，那么是否也能听听“我一个晚上的讲演”。他呼吁他们不要“根据吉尔伯特先生的讽刺来做审美判断”——“就像不会根据光柱中舞动的尘土来判断太阳的威力和光耀，不会根据波浪上破碎的泡沫来判断大海的力量和壮观一样”——这番话引起一片“如雷般的掌声”。

观众们“由衷地喜欢”听他讲话：“我想你们中的少数人大概听说过与英国唯美运动有联系的两种花，据说（我深以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还是一伙青年唯美主义者的粮食。好吧，我就告诉你们，我们热爱百合花和向日葵的原因，不管吉尔伯特先生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它们是不适合拿来作为任何种类的蔬菜的。”演讲者乐在其中，和观众们一起笑起来。当他解释说，这两种花在唯美主义者中大受青睐的原因是它们天生适合装饰艺术时，严肃的气氛又倏忽回来了，“一种是绚丽雄壮的美，另一种是优雅可爱的美，都给艺术家以最充分最完美的愉悦”。他号召他的美国听众们，从本国独特的动植物中寻找灵感，让简朴的装饰品变得“更为雅致”，从而获得“前所未见的美的宝藏”。然后，他概括了几个主题（相当突如其来）并最后宣告：“我们的岁月都消逝在对生命的奥秘的追求中，而生命的奥秘就在艺术中啊。”

演讲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全场雷动的声音证实了王尔德的胜利。他开始退场，但在一片掌声中，他又转过身鞠了一躬。最后离开讲坛时，“他的脸红得像个女学生”。^①莫尔斯上校被深深折服。他后来回忆，在他与演讲者长期打交道的经验中，他想不出“有哪一次……经受过如此严峻的考验”，王尔德面对的是一群可能存在敌意的听众，同样也没有“哪一次演讲比这更彻底、更令人信服地获得了成功”。^②王尔德离开礼堂，沿着第五大道被带到约翰·麦克夫人主持的盛大热烈、花团锦簇的招待会上，乐队演奏了爱国歌曲《天佑女王》欢迎他到来。《纽约先驱报》报道称：“许多衣着优雅的漂亮女士挤在一起和他握手。”^③

王尔德取得了真正的成功，第二天的新闻报道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有一些批评，以及少数有关伯恩桑的隐喻——特别是《纽约论坛报》——但风头正劲的王尔德仍然得到了欣赏和尊重。现在毋庸置疑，王尔德可以演讲，他的旅程将继续进行。^④1月11日卡特到达纽约，兴高采烈地推进各项安排。他开心地发现，票房一直下降的纽约版《佩辛丝》，现在“获得了新生”，竟然止跌回升。这出歌剧可以持续上演到本季结束。他在给阿瑟·沙利文的信中写道：“美国公众的生活方式令人费解，虽然看起来很荒谬，但奥斯卡·王尔德在美国的出现引发了一股常规的‘热潮’，似乎刺激了商界的发展。”卡特向美国媒体宣布，鉴于王尔德在奇克林礼堂获得的成功，他打算带着这位唯美主义者“环游全国”——可能要花上“两三个月”。^⑤

接下来的日程在匆忙之间被一一敲定下来——他将前往费城、华盛顿、巴尔的摩、奥尔巴尼、波士顿和芝加哥——王尔德在纽约度过了愉快的一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正如《莱斯利画报》所写，他“得到了社交界的接纳和支持”；请帖、“信件、诗歌、鲜花和请愿书”一齐向他涌来。⑥68岁的山姆·沃德“大叔”一副势不可当的样子，是王尔德在社交界的领路人兼裁判员，他是个政治说客，偶尔写写诗，是孜孜不倦的美食家，还是个根深蒂固的亲英派。沃德让王尔德笃定放心，《纽约世界报》编辑威廉·亨利·赫尔伯特是他的朋友，将会为他提供宝贵的关注和支持；此外，他还在自己的克林顿广场公寓举办了一场以闪亮百合花为主题的晚宴，在宴会上，巨大的酒杯里漂浮着朵朵睡莲，客人们在扣眼上插着铃兰花。⑦

然而，为王尔德举办的最大规模派对要数玛丽昂·T.福蒂斯丘夫人（出嫁前是明妮·奥谢）主持的一场盛大的“狂欢”。玛丽昂出生于都柏林，是《自由人报》一名编辑的女儿，也是罗伯特·B.罗斯福的情妇。王尔德在那场宴会上经人介绍认识了头发浓密的“内华达山脉诗人”华金·米勒，他鼓励王尔德去寻找西部“大自然的壮观与美丽”。无论走到哪里，王尔德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⑧“像我这样喜欢保持隐姓埋名之美德的人，”他写信给刘易斯夫人开玩笑道，“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讨厌这种巴结。”⑨有人告诉他，自查尔斯·狄更斯访问纽约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盛况”。“我出门造访时，站在会客室最首要的位置上，”他解释道，“两个小时内，他们不停地为我作各种介绍。我优雅地鞠躬示意，时常用皇家言辞向他们致以敬意，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会刊登这些言论。”⑩在福蒂斯丘家的聚会上，他那句

普普通通的“我喜欢美国——也就是说我喜欢纽约”，受到了纽约媒体的热切关注。❶王尔德给诺曼·福布斯-罗伯逊描述了他充满乐趣的新生活：“盛大的接待会，美妙绝伦的午餐，人群等候着我乘坐的马车通过。我挥动着戴手套的手和象牙手杖，他们欢呼喝彩。姑娘们相当可爱，男人们非常朴实，很有知识。房间里专门为我到处悬挂起白百合。我偶尔喝点‘男孩’（一种香槟）……总的来说，像我一贯表现的那样——‘非常可怕’。”❷

事实上，王尔德的行为一点儿也不可怕。他可能会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但他的沉着冷静、“即兴表演”、自吹自擂，以及他的才智和谈吐，也令主人和客人们赞赏不已。他很快就被认为是“自霍顿勋爵时代以来最会讲闲话的人”。❸《笨拙》在其刊登的一篇恶搞文章《诗人的纽约对话》中，捕捉到了王尔德大获成功背后的一二：

他一直与格拉德斯通通过从甚密，认为对方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政治家，尽管他发现此人有关荷马的观点有问题。他闲聊时大谈他的朋友威廉·哈考特爵士，并且表示自己和欧洲各国领导人相处融洽……诗人对艺术、月亮、美酒和共和主义采取普遍认同，他曾经寻求让英国王室皈依共和主义，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❹

有几个见过他的人似乎被这种邂逅给震慑住了，至少有点不知所措；其他人则努力保持着一种谨慎的客观中立。当菲比·彭伯（可敬的美国护理界先锋人物）被介绍给这位年轻的唯美主义者时，她忍不住笑个不停。她的侄子坦承：“（他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笑。”❺约翰·毕格罗带王尔德去著名的世纪协会用餐时，人们对他产生了“极大

的兴趣”，尤其是那些“医学家”，他们好奇地观察了王尔德独特的“女性化特征”；^①而在另一次聚会上，著名眼科大夫霍尔库姆医生——威廉·王尔德爵士的学生，纽约族谱和传记协会创始人——宣称自己“对王尔德那双古怪的眼睛特别感兴趣”，非要让大家“用他的放大镜仔细看看它们”。^②

有些纽约人则置身事外。他们没有华金·米勒那样的慷慨，而是表现出些许怨恨、职业性的焦虑和高高在上的厌恶。傲慢的诗人兼文学评论家艾德蒙·克拉伦斯·斯特德曼拒绝与王尔德会面，尽管他收到了两封推荐信（令他大为恼火的是，有几家报纸错误地写道，他陪同妻子出席了在克罗利家为王尔德举行的招待会）。斯特德曼之所以反感王尔德及其《诗集》是因为他的朋友埃德蒙·戈斯写来一封信，信中称那本“可怕的书”，是“一种低级趣味的霉菌，一种散发着恶臭的寄生物”，依靠作者的“贵族朋友”的帮助，这本书已经发行到了第三版。他绝不会对王尔德心存慈悲。^③在他看来，王尔德是一个“骗子”——尽管还算聪明——只是纽约那些有钱的“非利士俗人”，他们“既势利又愚蠢”，要在他身上“愚弄自己”。他认为，“真正的”作家和诗人该对王尔德避之不及——他会尽最大的努力去鼓动他们。^④品性高洁的艾玛·拉撒路（自由女神像底座上镌刻着她作于1883年的十四行诗《新的巨像》）没有见到王尔德——尽管她钦佩王尔德“真正的想象力和才华”——因为她不喜欢他“无耻地追求低俗的恶名”。^⑤

王尔德当然一直谨记他的宣传责任。莫尔斯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支持。王尔德向诺曼·福布斯-罗伯逊解释说，他有“两个秘书，其中一个负责替我签名，回复上百封索要签名的来信。另一位长着一头棕色头发，他把自己的一绺绺头发寄给来信向我索要头发的年轻小姐们；他很快就成了秃顶。还有一个黑人仆役，他是我的奴隶——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没有奴隶是无法生存的——他有点像克里斯蒂吟游诗人^①的成员，只不过他不会猜谜语”。^②

沙勒尼拍摄的照片被印在小卡片上，它们广受欢迎，在美国各地传播王尔德的形象。王尔德夸口说，需求“远远超过了供应极限”。

^③莫尔斯还安排了一位年轻的纽约艺术家詹姆斯·爱德华·凯利为王尔德作了一幅蚀刻肖像画，这是一幅简单的线条画，比任何照片都更容易复制，也更便宜。当凯利上门为王尔德绘制肖像时，他发现王尔德和一个“有着金色卷发和蓝色眼睛的漂亮小男孩”在一起。王尔德建议让孩子站在他的椅子边，一起出现在图画中。这是一个迷人的场景，尽管当凯利蚀刻这幅画时，只绘制了王尔德的头部侧面。^④与王尔德的肖像同样受欢迎的，是他的书。虽然当他目睹自己的美国版《诗集》被以“商业化和普普通通的方式”发行推广时，他的美学理念受到了冲击，但他很高兴罗伯茨兄弟能够再版这本诗集，以满足自他来到美国后“被鼓噪起来”的巨大需求。^⑤

在纽约期间，王尔德了解到更多有关美国人接触美学思想的情况。他参加了凯特·菲尔德在服装合作社举办的一场精心准备的艺术午餐。这是一家致力于为女性生产更健康、设计更精良、价格更便宜的

礼服的龙头企业。①他还参观了“联合艺术家”的工作坊，这是另一个女权主义合作项目，旨在推广装饰艺术，尤其是针法和织物设计。该公司在前一年对白宫切斯特·阿瑟总统的卧室进行了重新装饰，美国媒体将其描述为“超美学、超诗意的……奥斯卡·王尔德流派”。②

王尔德还腾出时间推进了他在美国排演《维拉》的计划。他最大的希望是能够说服33岁的女演员克拉拉·莫里斯出演这个角色。他之前给她寄过一份剧本，现在想亲自上门跟进一下。莎拉·伯恩哈特激发了这个渴望，她曾经告诉他——他对一位记者说——“在美国有两件事情值得一看，一件是克拉拉·莫里斯的表演，另一件是芝加哥有一种可怕的杀猪方法。她建议我都去看看。”③在他眼里，猪可以等（也许无限期地等），但是他渴望尽快见到莫里斯小姐，并确保她对《维拉》感兴趣。

在王尔德的提醒下，克罗利夫人邀请这位女演员参加了她的招待会。她身穿镶着珍珠和水晶的白色锦缎，星光熠熠地走来。然而，她的心情却没有那么闪亮。尽管王尔德向她致以热忱的问候（伸出双手握着她的手，诉说见到她是多么喜悦，以及他从莎拉·伯恩哈特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她的事情），她却心绪不佳。一个在场的目击者甚至注意到，一提到莎拉·伯恩哈特，她的嘴唇似乎扬起了一丝“高傲的微笑”。④第二天下午，他们在凯特·菲尔德的服装合作社午宴上又见面了，王尔德的心情愉快了不少。即便她没有同意接受这个角色（如一些报纸所说），也在他的劝说下表示愿意考虑一下这个角色。为了让她进一步参与进来，王尔德请她“对当前的情况提一点建议”。次

日，他去观看她首演的《新马格达伦》，进一步乘胜追击。❶她无法不被他的热情打动：“莫里斯小姐是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女演员，”他对《纽约论坛报》说，“如果说我可以就她扮演的这个角色来做评价的话。我们英国没有感情这么强烈的女演员。按照我的标准，她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因为她所做的一切和所说的一切，以其所做所说的方式，不断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去补充她的表演。那就是我所谓的艺术……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❷

就在那一周的晚些时候，她让王尔德陪自己和丈夫去观看玛丽·安德森出演的W.S.吉尔伯特作品《皮格马利翁与加拉忒亚》。这是一个让人看到希望的开始。但是，尽管莫里斯怀有兴趣，却一直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这一切并不影响王尔德夸夸其谈；在戴尔莫尼科餐厅吃午饭时，他向埃德加·索尔特斯吹嘘说，有人给他开出5000美元的预支片酬——用他的话说，“这点薪水简直不够维持温饱”。他承认，剧院经理想让他对剧本做一些修改，然后又说：“可我是谁，有什么资格篡改一部杰作？”❸1月16日王尔德离开纽约起程前往费城，此时他非常乐观。❹

2 前进

一切都相当顺利。

——奥斯卡·王尔德

费城这座友爱之城似乎正在急切地欢迎他。王尔德此时已经积攒了一些有用的人脉：文学界的、艺术界的，还有爱尔兰裔的。他的老朋友查尔斯·利兰最近回到费城创办了一所工艺美术学校；著名外科医生塞缪尔·格罗斯以前是梅里恩广场的访客；诗人玛丽·丽贝卡·达利-史密斯曾经送给王尔德夫人一本诗集。还有他的一个（第二个）堂兄，英国国教牧师巴兹尔·马图林神父，他从都柏林来到这里，在当地一座教堂担任教区长。王尔德离开英国之前向他约稿两首诗的《我们的大陆》杂志，就是在费城出版的。杂志的共同所有人罗伯特·S.戴维斯答应为这位年轻的演讲者举办一场招待会。同样持此想法的还有《大众纪事报》老板乔治·W.蔡尔兹，以及当地另一位雄心勃勃、爱好文学的企业家J.M.斯托达特。❶

公众对他怀有极大的兴趣。他从纽约出发，在火车上接受了费城一家报纸的采访，入住奥尔丁酒店后不久又接受了另一家报纸的采访。名片和访客源源不断地拥入奥尔丁酒店，王尔德让他的贴身黑人男仆守在房间外，告诉来访者：“王尔德老爷今天太忙了，没空接待。”❷王尔德的演讲安排在1月17日于新近重开的费城园艺厅举行，人们纷纷翘首以盼：1500张门票销售一空。❸

然而到头来，整个事情却让人有点扫兴。尽管整场爆满——而且许多观众手里都拿着“有魄力的生意人”在门口分发给大家的向日葵状扇子（他们在每一朵花的背面放了一张小广告）——但演讲本身和观众都不如在纽约时那么活跃。王尔德啜了一口水，全场竟突然迸发出最热烈的一次掌声。他后来告诉一名记者：“我的听众非常冷淡，好几次我都想停下来对他们说，‘既然你们不喜欢，那我继续讲下去也没什么意义’。”^①

这次失败既让人震惊，又令人失望，但在朋友们的支持和《大众纪事报》一篇慷慨评论的帮助下，这种失望情绪得到了些许缓和。^②好在第二天下午，王尔德去拜访了他心目中伟大的文学英雄之一沃尔特·惠特曼，这一趟激动人心的短途旅行有效地缓解了失落的情绪。62岁的《草叶集》作者居住在费城河对岸的工人阶级小镇卡姆登。一连串的轻微中风让他过早出现了衰老的迹象，他拒绝了王尔德到达当晚参加戴维斯的豪华招待会的邀请，也拒绝了斯托达特在王尔德演讲后举办的小范围晚宴。但他捎信说，如果这位年轻诗人愿意在1月18日下午2点到3点半之间来访，他很乐意与他见面。^③

用过格罗斯医生招待的一顿愉悦的早餐，并且对费城女子设计学院进行短暂访问之后，斯托达特陪着王尔德穿过特拉华州，把他送到惠特曼居住的简朴砖房，惠特曼在那里由他的弟弟和弟媳照顾。这是一场“大老粗”（惠特曼这样称呼自己）和年轻有为的唯美主义者之间的一次愉快会面。惠特曼拿出一瓶自家酿制的接骨木酒，在楼下的客厅招待客人。斯托达特回忆，那酒“难喝至极”，但令他惊讶的

是，王尔德竟“满脸欢喜地”饮下好几杯。其后，王尔德因此受到了指责，但他解释说，“如果那是醋”，他照样会喝，那是他对惠特曼的钦佩。喝完酒之后，斯托达特巧妙地退了出去，留下两位诗人共度午后时光。两人来到楼上惠特曼位于顶楼的“窝”里，聊起了诗歌与人物。❶

王尔德被这个“毫无装饰的白色小房间”迷住了——屋里有一把大椅子（惠特曼坐的）和一个小凳子（给他坐的），一张“松木桌”上面放着一部莎士比亚的作品、一部但丁译本和一壶水。冬日的阳光洒满房间，“越过对面的屋顶可以看见河中船只的桅杆”。❷尽管简朴的风格让这个房间成了艺术创作的绝佳场所，但王尔德也注意到，屋里到处散落着一堆堆“剪报”。❸惠特曼虽然自诩天性淳朴，却善于迎合媒体。这是两位作家之间的另一条纽带。他们很快便相处得相当融洽。惠特曼大声说：“我要喊你奥斯卡。”王尔德回答：“我简直太高兴了。”❹

王尔德坐在老人的脚边（确实如此），夸赞着他。“我来拜访您，就像来见一个我在摇篮里就几乎已经认识的人”，他讲述母亲读惠特曼的作品给他听的情形，以及他如何携惠特曼的书在牛津“漫步”。他们谈到了丁尼生和美，以及诗歌的实用性。惠特曼给他讲解自己的“作诗”方法：“哦，你知道的，我曾经当过排字工人，每当一个工人排满一行字的时候，他会停一小会儿，然后开始排下一行。”（王尔德后来在他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诗人，应该去学着排字”。）❺王尔德谈到罗塞蒂和莫里斯，以及斯

温伯恩（惠特曼在英国的热烈拥护者），称对这三个人有一种莫名的亲近。❶为了让这些人脉关系相互促进，他主动提出要给斯温伯恩写信，将惠特曼的赞美之词连同照片一起邮寄给他。❷

惠特曼发现王尔德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伙伴，他后来对一名记者说：“在我看来，他是个大个子的漂亮棒小伙……如此坦率、直言不讳，很有男子气概。”此外，他还向一位朋友透露：“他很喜欢我，说明他有很好的判断力。”❸王尔德不仅喜欢惠特曼，而且对他那种毫不做作的高贵精神感到肃然起敬。他借用J.A.西蒙兹的评价，将其描述为“一个了不起的、高大的、完整的人，他可能生活在任何时代……强壮、真实、心智健全：迄今为止，他是我们现代生活中最接近希腊人的人”。❹然而，他惊讶并钦佩地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中还包括一份“镇静从容”。❺时间过得飞快。惠特曼为客人准备了一大杯牛奶潘趣解渴，王尔德“一饮而尽”，让他大为赞叹。斯托达特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两位诗人怀着浓浓的友情分手道别。惠特曼大声喊道：“再见，奥斯卡，愿上帝保佑你。”❻

虽说拜访惠特曼是此行的高潮，但这并非王尔德在费城逗留期间唯一令人关注的一次会面。斯托达特领着王尔德去圣克莱门特，在漂亮的新罗马式教堂拜访了马图林神父。两个爱尔兰亲戚非常享受这次见面，然而当王尔德瞥见牧师宿舍里“朴素而且有点简陋的陈设”之后，便拒绝了表兄让他们在那里“留宿”的提议。❼他们还拜访了弗洛伦丝·邓肯，她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文学和社交杂志《问答》(Quiz)的编辑。尽管她的出版物——在此之前——一直对王尔德的美国之行持

讽刺的态度，但刚一见面，邓肯夫人就立刻对这个男人有了好感，被他的彬彬有礼（根本不提杂志早些时候对他的攻击）和他谈话中的聪明才智所折服。“他谈论济慈的时候滔滔不绝，”她在下一期杂志的报道中撰文写道，“一个能像王尔德先生那样谈论《希腊古瓮颂》的人，当然不可能是傻瓜。”^⑨

王尔德之前曾向伦内尔·罗德许诺，要努力为他的诗集《南方之歌》(Songs of the South)寻找一家美国出版商，于是便向斯托达特提出了这件事情。该书只能以独家出版的方式发行。他们计划——稍作改动后——推出两种版本，一种是“豪华版”，另一种是“普通版”，但两种版本设计都很美观，并配有王尔德写的“序言”。除此之外，还有人希望王尔德能写点什么。罗伯特·戴维斯提出让王尔德为《我们的大陆》写三篇文章，谈一谈“将现代唯美主义应用于现实生活”的话题：一篇关于“家”，一篇关于“服装”，还有一篇关于“如何打造杰作”。尽管戴维斯出价每篇稿费100美元，但王尔德很谨慎：一篇文章只付一次稿费；一个讲座可以演说很多次。^⑩

由此，他更倾向于听从戴维斯的另一个建议，在同样的“实际”演讲基础上准备进行“第二轮演讲”。在领教了费城观众的“冷淡”，以及刚到纽约时遭遇的困难之后，王尔德已经意识到他需要对讲话做出修改。“英国的文艺复兴”也许太深奥，过于抽象。王尔德夫人在英国读到相关报道时当然也想到了这一点，“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她称，“不如做一些个性化的描述”，“比如一些现代名人……罗斯金、米尔、卡莱尔”。^⑪不仅如此，1月19日广受欢迎

的“海滨图书馆”小册子系列的出版商乔治·门罗推出了一本盗版的《王尔德诗集》，以及《有关英国文艺复兴的演讲》。其内容由速记记录和新闻报道拼凑而成，虽不完整却包罗一切，而且售价只有10美分。

为了留住听众，王尔德必然需要新的演讲内容，最好换一种观点。戴维斯解释说：

美国人都很务实，他们不关心抽象的、虚夸的、遥远的事物。但他们非常愿意接受和欣赏直接的、切实有用的东西。他们热切地需要指点，而且会欣然接受。观众受到的教育往往是肤浅的，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艺术文化。你必须将这一点考虑进去。美国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运用他们所学到的东西。无论给出何种艺术理论，都应该详细说明，该如何将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这样就能毫不费力地教会他们其中的意义。●注●

这是明智的建议。虽然王尔德当时仍坚持“英国文艺复兴”的话题，但他立刻着手修改并删减讲稿。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删除了很多理论论证和历史背景方面的内容，采用更多的口语化阐述以及实用的建议，并将演讲时长从近两个小时缩短到一个半小时。

修改讲稿期间，王尔德于1月19日从费城坐火车南下前往华盛顿。莫尔斯因为有事必须返回纽约，因此将行程安排交给了一名“办公室助理”。王尔德发现阿奇博尔德·福布斯也在同一节豪华车厢，福布斯即将结束他的美国之行，当晚要在巴尔的摩发表演讲。两人的行

程事务等都由卡特和乔治·刘易斯张罗安排，因此互相亲切地打了招呼。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能力出众的演讲者，福布斯对于围绕王尔德的大肆炒作颇为恼火。他曾经在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毫不客气地写道，王尔德的“演讲一文不值，但他很会勾引人，把他们耍得晕头转向——手段相当聪明”。他相信人们对王尔德感兴趣只是出于好奇，他说——试图用一种幽默的口吻——马戏团经理P.T.巴纳姆曾经请王尔德帮忙“招揽客人”……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头小象”、祖鲁人首领、查尔斯·吉托（因刺杀加菲尔德总统，不久将被处决）的尸体，但前提是他必须“一手拿着百合，另一只手拿着向日葵”。^{②②}福布斯还在自己的演讲中提到了王尔德的齐膝马裤和对向日葵的热爱。尽管措辞足够温和，主要是为了博人一笑，但其中确实带有轻蔑的意味。

在火车上，王尔德赢得了与福布斯同行的两个年轻女子当中一位的好感，这件事可能进一步加剧了对方的怨恨。刚从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毕业的约瑟夫·佩内尔也在那节车厢里，他告诉未婚妻说：“你真应该看看（王尔德）是怎样迷住了一个漂亮的巴尔的摩女孩——她在五分钟内就沦陷了。”佩内尔本人也被王尔德的谈话吸引住了。他说：

足足有半个多小时，我从没听到过有人像他这么说话。他的谈话无疑令人着迷，除非他把对我说过的话，说给每一个人听，要不然那简直太美妙了，尤其是他描述惠斯勒的画作时……他会靠近你，直视

你的眼睛，他的脸距离你约莫六英寸，他的嗓音宛如音乐，你很快就会发现，这就是他平常说话的方式。②

然而，到达巴尔的摩时，福布斯和王尔德像朋友一样作别了。曾经有个计划，可能是让王尔德——和莫尔斯或卡特一起——在巴尔的摩稍作停留，参加福布斯的演讲。但随着莫尔斯回到纽约，卡特出于健康原因去了佛罗里达，王尔德以为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因此他继续前往华盛顿。直到当天晚上抵达酒店，他才从一名记者那里得知，巴尔的摩人确实在等他，有谣言说他之所以缺席是因为和福布斯发生了争执。王尔德否认了这种说法，但随后却意外地收到莫尔斯的电报，催促他立即返回巴尔的摩。可是时间已经太晚了，而且他已经太累了。③

第二天，莫尔斯发电报的原因水落石出。王尔德惊讶地得知，有一位卡罗尔夫人他准备了一场盛大宴会，由于他没有到场，宴会被迫在最后一刻取消。对此，国外有一则恶意的报道称，王尔德曾经向巴尔的摩一个艺术俱乐部举办的招待会索取费用。据称，整个城市的人都很沮丧，他们感觉受到了冒犯。

媒体绞尽脑汁编造王尔德与福布斯之间“发生争执”的故事。他们把各种各样“冷嘲热讽的评论”强行安在两个人头上，用来佐证这个故事，进一步挑唆矛盾。尽管王尔德和福布斯都没有立即上钩，但还是埋下了分歧的种子。王尔德觉得有必要给福布斯写封信，询问他是否可以从演讲中删掉针对唯美主义的玩笑性影射内容（“我觉得有必要非常坦率地告诉您，我认为这些内容既不高雅，也不适合您的主

题”）。福布斯对此大为光火。他酝酿已久的愤怒和“愚蠢的”嫉妒心突然爆发出来。他在一种“忘我的愤怒”（如一位观察家所说）中，猛烈抨击王尔德，拒绝“修改”他的演讲，并公开诋毁王尔德来美国的动机。王尔德本来希望能从巡回演讲中赚点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福布斯将其歪曲成他在美国只是图谋“纯粹的金钱”。王尔德试图缓和情势，但为时已晚。他被粗鲁地回绝了。随后，福布斯努力引诱他的竞争对手卷入同一家报纸的争议中，但未能得逞，于是只好继续在媒体上发表针对王尔德的粗俗评论。他直到1月28日收到乔治·刘易斯的电报后才收手，电报中写道：“行行好，别攻击王尔德了。就算你帮我一个忙。”^②但即便如此，他仍在暗地里有所动作，向英国报纸提供有关王尔德的负面文章。^③

这件事情无疑使王尔德在华盛顿期间心烦意乱，颇为分心。幸亏有山姆·沃德的斡旋，美国首都已经做好准备要殷勤款待王尔德。王尔德被这座城市深深吸引，尤其是那些“漂亮的红砖新房子”，还有“迷人的木结构和阳台”。^④和在纽约与费城一样，一场场豪华宴会接踵而至：在乔治·彭德尔顿参议员夫妇家、布莱恩参议员夫妇家、爱德华·G.洛林家，以及在单身汉私人俱乐部（有报纸报道，王尔德拒绝加入跳舞的行列，“我吃过饭了，所以我不跳舞，跳舞的人不吃饭”）。王尔德还参加了一场热闹的当地文学俱乐部聚会，地点是在斯万·伯内特博士与妻子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优雅的波希米亚风格住所，里面装饰着向日葵。^⑤

日程安排得很紧。王尔德总是在“台上”等候表演，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需要节省精力。他喜欢晚上在主人的书房或“窝”里躲藏至少一小段时间。和大家在一起时，他开始有所收敛。“王尔德说他从不让自己感到无聊，”他的一名崇拜者向一位派对客人解释说，“他从不掩饰自己的烦恼，这能给他提供充足的保护。”^① 他需要这么做。眼下，每次聚会现场都会有一些人对王尔德显而易见的成功心怀不满。有美国媒体对他做出了最负面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骗子，而这些人紧随其后地想要表现出，至少他们没有被他“粗俗”的滑稽表演所蒙骗。

似乎是在华盛顿，有个女人直截了当地发问，他来美国是不是为了“逗他们开心”。他回答，自己是来“做指导”的。于是她说：“如果那是你的目的，我建议你头发剪短，把裤子弄长。”^② 王尔德在首都期间，理所当然地不得不面对一连串咄咄逼人的老处女和冒冒失失的年轻姑娘。阿比盖尔·道奇在谈到他对唯美主义的拥护时，直言不讳地问道：“这个玩笑能持续多久？”（王尔德虽然对如此直截了当的攻击感到“震惊”，但他回答“玩一笑？这是我的生活”。）^③ 有人介绍他认识卡罗琳·希利·达尔，可对方只是盯着他，拒绝伸出自己的手；年轻漂亮的诺德霍夫小姐（《纽约先驱报》记者的女儿）“怀着故意要让他出丑的心思”问道：“请告诉我，王尔德先生，你生来就很了不起吗？”王尔德回答：“小姑娘，你还是去买冰淇淋吧。”^④

还有一小部分华盛顿的人物则竭力避开王尔德。亨利·亚当斯的妻子克洛弗夸口说，自己“逃过了结识这个人”。她告诉同样从伦敦来到华盛顿的亨利·詹姆斯，“来（她的家）的时候，不要带上他的朋友奥斯卡·王尔德”——并补充道“我绝不会让小偷和笨蛋进门”。然而，在她眼里，王尔德到底是个小偷——因为他抄袭了罗斯金、莫里斯还有其他人的观点——还是个“笨蛋”——因为他穿着齐膝马裤四处招摇，这一点并不清楚。❷

39岁的亨利·詹姆斯几乎算不上王尔德的“朋友”，尽管伦敦文化生活中的种种场合让他们有机会结识对方。两人性格迥异，互不吸引：詹姆斯勤奋、谦虚、谨慎，而王尔德热情、柔弱、招摇。虽然王尔德赞赏詹姆斯的作品，让他倍感受用（王尔德告诉一位美国记者，作为小说家，“没有哪个在世的英国人”能与美国出生的詹姆斯相比），但他隐约感到，无论是当面接触还是从专业的角度，只要这个年轻人在场，就会令人不安。他对艺术收藏家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表达了一番见解，其中含着一种奇怪的怨恨，他提到，自己在洛林家见到了“令人厌恶、愚昧无知的奥斯卡·王尔德，让我高兴的是，根本没人在看他”。其他姑且不论，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洛林夫妇的女儿哈丽特生动地描述了王尔德是如何“突然出现在”聚会现场的——“紧身裤，黄色的手帕和所有的一切”；虽然他看起来很“可怕”，但一眼就能看出他同时也“非常有趣”：“充满爱尔兰人的敏锐和幽默，真的十分有趣”——而且“非常质朴”。她写道，她的父亲和其他客人也这么认为。相比之下，她觉得亨利·詹姆斯——当晚的

另一位“名流”——相当乏味，“充满善意，但思维非常迟钝”，丝毫没有“神圣的火花”。^①

詹姆斯非常敏锐，意识到了有人会做如此比较。他知道，无论是作为谈话对象，还是在吸引人方面，王尔德都无人可比。1月23日晚，大批观众聚集在林肯大厅聆听王尔德演讲；虽然有评论挑剔他的表达方式很差劲，但大家一致认为，他演讲的内容“很有趣”，其说话的方式“绝对有说服力”。他们喜欢他对时事做出的隐喻，尤其是他说，虽然雕塑是华盛顿的艺术品，但“我觉得你们有很多关于战争的雕塑。我敢说，你们不想要更多骑在马背上的青铜将军了”。^②

这些成功让詹姆斯感到困惑、不满，甚至有点嫉妒。他继续尖锐地贬低王尔德，称其为“一个愚蠢的傻瓜，最低劣的无赖”，甚至是“一头肮脏的畜生”。但他显然喜欢王尔德关于华盛顿的“青铜将军”的那些话：他后来将其据为己有。^③在王尔德演讲后的第二天，他不辞辛苦地去酒店登门拜访。他的动机至今尚不得知。也许他想探寻，一个只出版过一本薄薄的诗集的“作家”竟然可以做国际巡回演讲，这个新的文学世界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商业现实。^④王尔德没有意识到詹姆斯的敌意，兀自一副情绪高涨的样子。他谈起了“波士顿”，令他的客人大为不快。当詹姆斯说自己很怀念伦敦时，王尔德的回答让这位大旅行家兼侨民更加恼火：“真的吗？你在乎身居何处吗？世界就是我的家。”^⑤

世界似乎正在为王尔德打开大门。他从华盛顿——再一次由莫尔斯妥妥地驾驶护送——向巴尔的摩进发。他在那里真诚悔过，表达他

对埃德加·爱伦·坡的一片热忱，以此平息巴尔的摩人的怒气。他从马兰州直奔奥尔巴尼（纽约州首府），然后前往波士顿，再回到纽约，在纽黑文、哈特福德和布鲁克林继续演讲。

几乎从王尔德踏上美国的那一刻起，人们就一直告诉他，他会如何喜欢上波士顿，波士顿人又会多么爱他。❶他们也没有完全说错。王尔德刚刚抵达位于时髦的后湾地区被白雪覆盖的旺多姆酒店，就收到一封请柬，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邀请他当天与“星期六俱乐部”共进午餐——“星期六俱乐部”是波士顿最著名、最热闹的文学组织。❷霍桑是其中的一员；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朗费罗仍然健在——尽管两人现在都体弱多病，无法参加帕克庄园每月一次的午餐会。“73岁的年轻人”❸霍姆斯——王尔德学生时代最喜欢的作家——仍然是俱乐部的头等天才。王尔德一脚踏进这个“聪明男人的聚会”，度过了一个愉快而刺激的下午。❹

王尔德从那里（只休息了短暂的一小会儿，接受当天的第二次采访）由波士顿《舵手报》风度翩翩的编辑约翰·博伊尔·奥赖利——他此后刊发了王尔德早期的一些诗歌——带着赶往波士顿的另一个知识分子联谊会——纸莎草俱乐部吃饭。之后，他们在环球剧院观看了《俄狄浦斯王》——其中部分台词是希腊语。然后在回酒店休息的路上，他又拜访了圣博托尔夫俱乐部。❺王尔德的社交耐力堪称惊人。

王尔德在波士顿期间受到了“隆重接待”。一场场更加私密的聚会取代了纽约人举办的盛大招待会。伯恩-琼斯的好朋友、哈佛大学艺术史教授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当时不在城里（而且，正如他私下承认，

摆脱了王尔德那“做作而伤感的感觉主义”让他如释重负），但他的儿子艾略特“替他挽回了面子”。^①王尔德与废奴主义者、演说家温德尔·菲利普斯共进午餐。在“星期六俱乐部”尽兴之后，他拜访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家，称赞了他女儿的针线活，他讲的故事“异常生动”，令霍姆斯的儿子（当时即将成为高等法院法官）着实难忘。^②山姆·沃德寡居的姐姐朱莉娅·沃德·豪是个令人钦佩的人物——著名的《共和国战歌》作者——她在家里摆下了欢迎宴会。她邀请王尔德参加一场即兴的星期日午餐派对——只有家庭成员参加，以及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和女中音歌手布拉乔蒂夫人。她在日记中写道：“午饭后大概来了10到12个朋友。”“我们吃了一种我称为‘可爱抛抛’的食物，这是一道迅速把各种材料混合而成的社交菜肴，就像煎蛋卷一样快。”^③

山姆·沃德的影响力还为王尔德争取到一次与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见面的机会。朗费罗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弱，他是王尔德从小时候便开始的想象生活的一部分。^④王尔德非常欣赏诗人翻译的但丁作品《神曲》，即便朗费罗的其他作品并没有那么持久的魅力。（这成为王尔德的名言：“只有对那些从未读过诗歌的人来说，朗费罗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⑤尽管如此，他仍然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老人，而王尔德——总是渴望与伟人交往——决定与他会面。

虽然最初遇到一些阻力，但他还是收到了去哈佛广场附近朗费罗家用早餐的邀请，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⑥“我去的时候，”王尔德说，“正好赶上暴风雪，回来的时候遭遇了飓风，这正

是拜访诗人的适宜情境。” ① 会面让人如沐春风——非但没有风浪，而且还“相当愉快”。 ② 王尔德见到病弱的诗人大为感动（他在一个月后就去世了），他回忆道，“他本身就是一首美好的诗歌”——事实上，“比他撰写的一切都更美好”。 ③ 他很欣赏朗费罗对布朗宁的评价（“我很喜欢他——就我能够理解的部分来说”），非常珍视朗费罗向他描述访问温莎的经历，当时女王称赞了朗费罗的诗歌。朗费罗对于自己的诗歌在温莎如此出名感到很惊讶，于是女王答道：“哦，我向你保证，朗费罗先生，你的名气大极了。我所有的仆人都读过你的作品。”朗费罗承认，自己直到现在晚上醒来，还会思忖这是不是一种“故意的怠慢”。王尔德——他自己很爱虚荣——怀疑这是女王陛下在指责“诗人的虚荣”。 ④

尽管后来媒体上有些充满敌意的报道称，朗费罗一直在“被迫忍受”王尔德的到访，但他似乎很享受这次会面——尽管他对来访者的成就感到相当困惑，只知道王尔德写了“一些很不错的诗”。 ⑤ 他对一位朋友说起：

几天前，奥斯卡·王尔德来看过我，不管他在公开场合是什么样子，私下里他都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当我们回想起他曾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过数学一等荣誉时，我们或许可以原谅他的一些怪癖，否则是不可原谅的。想想吧，亚西比德为了让雅典人说话，把他的狗的尾巴割掉了，彼得拉克因为阿维尼翁的女仆弄乱了他的卷发而烦恼不已。 ⑥ ⑦

1月31日晚上，王尔德在波士顿音乐厅发表演讲，现场满座，听众超过1000人。几天以来大家都知道——媒体也都报道了——一群哈佛学生买下了前面的两排座位。他们的意图很明显，要在演讲即将开始，全场观众已经落座时，大摇大摆地走进礼堂——60个年轻人，“全部穿戴着精心设计的‘唯美主义’服饰”：

有金色的假发、黑色的假发，各种颜色、各种款式的宽领带……有齐膝马裤，有“旧时代”的黑色长筒袜，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优雅可爱”的百合花，或“狮子一般”的向日葵。这些年轻人一进门就摆出各种姿势，或高傲地抬头向上，或含情脉脉低头看着盘旋落下的花瓣。然后他们坐了下来，对自己的做法感到相当满意。①

然而，王尔德早已知道了这出玩笑。观众都在期待目睹他出洋相，他却从容地走上讲台，没有穿他那套特有的美学服装，而是身着传统的晚礼服：燕尾服、白色领带，黑色裤子。他走到讲台上，放下稿子，眼睛扫视了一遍那两排“古怪的冒充者”。然后他对他们笑了笑。其他的观众也笑了。然后观众们大笑起来。接着全场响起了掌声。

“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向你们致以问候，”王尔德温文尔雅地开口道，这让观众们更加兴奋起来。他紧接着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扯了几句题外话：“当我环顾四周，我第一次被迫热烈祈祷，‘把我从这些信徒的手中拯救出来吧’。”这句责备轻描淡写却格外有效。演讲本身相当成功，但引发最多评论的是王尔德教训哈佛恶作剧者的事情。②“王尔德先生取得了真正的胜利，”之前曾经对

他语出轻蔑的新闻界写道，“这是一种征服的正义，一种绅士的力量，是真正的名副其实……没有什么能比这位演讲者对（哈佛新生）的整个举止更高尚、更文雅、更悦耳，然而却又更有批评分量的了。”^⑨ 他的成功使得一些报纸开始声称，这整出戏肯定是莫尔斯上校为了展示王尔德的聪明才智而精心策划的。^⑩

这一事件标志着王尔德在学习成为公众人物的过程中，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总的来说，他很好地应对了因为声名鹊起而面临的各种需求。他忍受了公众的侵扰性关注。在他下榻的酒店里，客人们“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在晚餐时见到奥斯卡”。他要持续不断地应付索要签名的人。他迅速用完了“美丽的绿色”纸条，现在开始在黄色的大卡片上签名。不过，这活儿很累人。当他到达华盛顿酒店时，还有27封要求签名的信在等着他。为了阻止这股签名潮，他告诉一位记者，以后他“只给漂亮的女士”签名。^⑪

王尔德尽力满足贪得无厌的新闻界。他逐渐明白媒体想要什么，于是发明了一个颇为有效的套路，专门应付没完没了的连串采访——对有关美国的话题发表几句可以被拿去引用的评论，提一点个人建议，说点儿奉承话，提起几个严肃的人物，适当地扯点儿美学背景。他身边反复出现的道具包括，一本诗集（一般是他自己的）、一瓶花、一支点燃的香烟、镶毛边的大衣和几条彩色方巾。^⑫ 事无巨细都考虑到了。詹姆斯·凯利回忆称，曾经在下火车的时候见到王尔德。他当时看上去面色苍白、疲惫不堪，还“有点脏兮兮的”。然而没过多

久，当凯利带着一名记者来到王尔德的酒店房间时，发现他如同换了一个人。舞台已经布置妥当：

（王尔德）坐在桌边的扶手椅上，耀眼的阳光洒在玫瑰色的围巾上（王尔德在车站时戴的那条围巾），此时这条围巾被拿下来，换上了一块青铜绿色的围巾。这一切显然都是不经意的，但效果极好；手帕的光亮在他的脸上反射出微妙的光彩，给他带来一如往常相当不错的效果。

凯利顿时“肃然起敬”。^②

王尔德欣然接受了一些想象力极为丰富的评论作者强加给他的拙劣的妙语警句。据说，有一位华盛顿的女主人问他：“您的百合花在哪里？”王尔德回答道：“夫人，在家里，您把礼貌落在了那里。”当被问及此事时，他声称——当然不是真心话——这段对话“绝对真实”，只不过它“发生在伦敦，而且那位女士是一位公爵夫人”。不过，他纠正了另一篇有关他曾经抱怨“美国没有古迹和古董”的报道（据说此事招来了讽刺性的反驳，“时间会弥补这一切，至于古董，我们可以进口”）；他指出，第一个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是狄更斯，那是40年前狄更斯在美国的时候说的。^③

果然，来自报业的人身攻击让王尔德感到心烦意乱。《纽约论坛报》依然对他保持着无情的敌意，继续把他当作一个唯利是图的巡回表演家。而且其他报纸也接纳了这些谎言。尤其令人恼火的是，巴尔的摩“惨败”之后出现的各种恶意和虚假报道。一开始，王尔德在愤

怒之余颇有怨言，他对一名《纽约先驱报》记者说：“如果你们希望有英国绅士来你们的国家，那就必须提高你们的新闻品质。类似这种事情必须改变，否则我是不打算.....再来了。”^①他一到巴尔的摩，便找着了那个编造他参加私人招待会时索要钱财的记者。王尔德问他写这篇文章赚了多少钱。当得知那篇文章只值区区6美元时，据称他是这么回答的：“那就好，看来美国的说谎率不是很高。这就是我要求证的。再见。”^②然而，他很快意识到满腔怒火、义愤填膺只会适得其反。他其实可以背地里请乔治·刘易斯出面，对《纽约论坛报》编辑怀特洛·里德进行干涉，尽力阻止这些“坏报道”，但在公开场合，他可以努力对新闻界及其荒腔走板的行为摆出一种愉悦超然的态度。^③

当一名波士顿记者问及他对“新闻工作者”的看法时，王尔德答道：

是的，他们当中有些人相当乏味，而另一些则非常有趣。一天晚上我（在华盛顿）正穿衣服时，收到一个人的名片：上面印着他的名字，还写着他是许多家西方报纸的通讯员。“这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报人”，我说。我做梦也不想让他久等。于是我穿上便袍，准备接受采访。来了一位非常年轻的绅士，或者干脆说，是个孩子。他走进房间，当我看到他时，我估计他快16岁了。我问他是否上过学。他说，他不久前辍学了。他向我请教，问他在记者这一行中该怎么发展。我问他是否懂法语。他说不懂。我建议他去学法语，还提了些关于该读

什么书的建议。事实上，是我采访了他。最后我给了他一个橘子，然后把他送走……他自始至终看起来很温顺，很是招人喜欢。 ②

他对莫尔斯向《华盛顿邮报》提出抗议一事表示不满。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王尔德手持向日葵的画像，与之并列的是一个拿着热带水果的婆罗洲“野人”画像，上面的标题是“他俩之间有多远？”“所有漫画和讽刺作品都根本不值得关注，”王尔德堂而皇之地告诉他的经纪人，“我很遗憾你竟然会在意。”他把自己和伟大的浪漫主义者置于同一条战壕里，告诉《波士顿先驱报》记者，一个艺术家不会在意“嘲笑和辱骂……雪莱被辱骂了，但他没有理会”。 ③

不过，当有自己管理团队之外的人奋起维护他的时候，他还是很高兴的。朱莉娅·沃德·豪和华金·米勒因此令王尔德感激不已。他们谴责刻板、自负的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因为他在《女性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过激的文章，抨击王尔德“极为平庸的诗歌”既“不道德”又充满异教徒气质，而且还暗示社交界不适合接纳这样的人。沃德·豪刚刚在星期日的午宴上款待过王尔德，于是她给《波士顿环球报》写信回击道：“即便有人声称，古代经典在（王尔德）骨子里遗毒过深，也不该如此轻易地在公开出版物上对他进行粗俗、奚落和无休止的辱骂，而是应该进行亲切友善的沟通，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动听，最甜蜜，最纯洁的声音。” ④

王尔德在美国不断上升的知名度，也在英国获得了回应。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美国记者或通讯社撰写的有关他所作所为的报道。大多数评论都是正面的，然而——如王尔德夫人所说——许多报纸（特别

是《名利场》)“对齐膝马裤非常不满”。《帕尔摩报》一如往常地报以“嘲讽”，《每日新闻》——在福布斯的怂恿下——接二连三地刊登了一堆刻毒的故事。例如，他们煞有介事地称，一天晚上王尔德在纽约的世纪俱乐部用餐，一名酷爱双关语的会员一到那里就大声问：“她在哪儿？你看见她了吗？哦，何不用‘她’这个称呼呢？我知道她是一个夏洛特-安！”^②另一方面，拉布谢尔的《真相》杂志则热情洋溢地率先刊登了一批从美国媒体上搜集来的，有关王尔德初到美国获得的好评。^③

伦内尔·罗德给王尔德寄了一份，并写道：“你确实很幸运，有耶茨和L（拉布谢尔）站在你这边。”他满怀羡慕与妒忌（使用了惠斯勒最喜欢的形容词“amazing”）继续写道：

好吧，你似乎在那边过得很爽(amazing)。我们都有点嫉妒了。还有，你的声明当然也十分精彩(amazing)，但是你没必要说得那么肯定，你回来之后会发现没人反驳你！——这对你没什么好处！我们很吃惊地读到，王尔德先生听说楼上有女士（在一篇关于费城戴维斯招待会的文章里）就拒绝进餐。即便在以色列，这规矩也非并众所周知。^④

惠斯勒这个人总是嫉妒心胜过钦佩心，他给王尔德（和纽约的报纸）发了一封逗趣的信——据罗德说，他自己对此“非常满意”：“奥斯卡！我们这些泰特街和波福特花园的人为你的胜利而欢喜，我们很高兴你获得了成功，但是——我们觉得，除了你说的那些警句之外，你说起话来就像是西德尼·科尔文（牛津大学新任史莱德教

授)，除了你的齐膝马裤，你穿戴得像是艾里·奎尔特（遭人鄙视的《泰晤士报》艺术评论员）。签名者：麦克尼尔·惠斯勒、詹尼·坎贝尔、马特·埃尔登、伦内尔·罗德。”王尔德以同样的口吻私下回了一封信：“亲爱的吉米，你那可恶的文学企图得逞了：我根本不相信，我那可爱优雅的阿奇夫人（坎贝尔）会在那上面签名。我被激怒了，因此一定要跟记者聊一聊你的事情。我会把报道发给你。”为了出版考虑，他又发了一封电报：“我承认穿了齐膝马裤，也说了警句，但不接受奎尔特，拒绝科尔文。”^⑨

王尔德在美国期间，一直都在不断地赞美惠斯勒。据《纽约世界报》报道，他曾在一次招待会上对宾客们说，惠斯勒是“英国的第一大画家”，之后又补充道，“（但）英国要花三百年才能找出这么一个人”。^⑩王尔德虽然没有在“英国的文艺复兴”演讲中提到惠斯勒的名字，但他——在交谈中——渐渐将惠斯勒拉进了人们的视野。他对惠斯勒的支持赞扬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他对约瑟夫·佩内尔宣称，是自己“让惠斯勒名声大噪”，他有些夸大其词。^⑪

王尔德夫人为小儿子的成功而欢欣鼓舞。她为奥斯卡的“胜利”及其在英国引起的轰动感到高兴。“没有消息，”她几乎每周都给他写信，其中一封信中写道，“除了谈论你以外，什么都没有。”^⑫这些谈论中，不少都是王尔德夫人自己一手操办的。维奥莱特·亨特记录了一次造访王尔德夫人位于公园街的新家时两人的“谈话”，女主人事无巨细地讲述了“奥斯卡，他在美国获得的成功，他创造的‘奥斯卡服饰’（即齐膝马裤），那里所有时髦的年轻人都穿

它”。她还展示了沙勒尼拍摄的一张照片，亨特认为照片“看起来相当迷人”。^①王尔德的照片当下在伦敦随处可见。住在朗廷酒店的美国人正在纷纷购买。甚至连王尔德夫人的送奶工也买了一张。^②

王尔德回到纽约（2月3日），他的星运仍在上升。他的前六次演讲所引发的兴趣——以及他在社交界的受欢迎程度——始终维持不变。他一直是新闻界不断关注的焦点。他还获得了音乐界的致敬和商业开发的双重追捧。音乐销售商开始提供各种产品，诸如“奥斯卡·王尔德舞曲”、“奥斯卡·王尔德，勿忘我（华尔兹）”、“奥斯卡的苏格兰圆舞曲”、“王尔德·奥斯卡·王尔德”以及“奥斯卡亲爱的！”（其中活泼的副歌唱道，“亲爱的奥斯卡，亲爱的奥斯卡，/你是多么彻底，多么轻率；/奥斯卡亲爱的，奥斯卡亲爱的，/你太狂野了，哒哒”）——除此之外，更普遍的是打着“美学”名头的曲子，比如《向日葵华尔兹》和《一个十足的年轻人》。^③

“富人区高档服装商店的橱窗”里盛开着唯美的向日葵和百合花。^④事实上，“狮子一般的”向日葵变得无处不在，许多花商都在努力维持供货。^⑤王尔德的大衣创造了一种新时尚，报纸广告上写着“女士们为‘奥斯卡’的阿尔斯特大衣‘疯狂’^⑥了”^⑦。男士用品商店（既没有事实支撑，也没有获得支持的可能性）声称他们的“新款时尚产品”代表了“奥斯卡·王尔德的风格”。^⑧虽然有几家公司果真采用了讽刺的方式（一家专门为铁路工人提供工作服的公司推出一套“王尔德的豪斯车”套装，芝加哥的威洛比希尔公司打出了一件“有趣的”新款燕尾服广告，上面印着“王尔德·奥斯卡……一头

蠢驴”（Wilde Oscar...the Ass-thete），但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得到了认真的对待。 注 注

1882年，他的照片——通常都是由沙勒尼拍摄，且未经许可——被更广泛地运用在各种流行的、大批量生产的“商业名片”上，其热度超过了任何一个人。人们认为“奥斯卡·王尔德”这个名字能让一件产品显得更为卓越。从雪茄到厨房炉灶，他可以用来提升所有东西的品质。王尔德的肖像甚至还被用在“玛丽·芳丹夫人美胸仪”的商业名片上——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人们忠实地遵循这种产品的使用指导，无论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女士，只要胸部变得松弛，无论什么原因，这款产品将使它们恢复原状，使它们变得坚挺而硬实。 注

由于宣传浪潮不断高涨，多伊利·卡特的办公室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人们对王尔德的兴趣如此之大，以至于莫尔斯已经有能力安排一次大规模的中西部巡回演讲，目标固定在几个大的城市中心——芝加哥、辛辛那提、克利夫兰、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但也会包括许多稍小的城镇。计划一直持续到3月的第三个星期，要在短短六周内举办27场活动。在那之后，加拿大的几个城市也提出了需求，还有人要求他回访费城、波士顿和纽约。王尔德设想将这次巡回演讲持续到4月，然后及时赶回欧洲参加巴黎沙龙。 注

3 广阔而伟大的世界

啊，他说的有些话可真好听，但是大体上，我对它们大概也只是一知半解。不过我知道，那是有关艺术的。

——一位女观众

王尔德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感到兴奋。他开始憧憬财富。他在波士顿见到迪翁·鲍西考尔特时，对方曾敦促他“甩掉卡特”，自己安排行程，甚至主动表示愿意提供资金资助，因为这将带来更大的利润，并且可以把王尔德从卡特那种马戏团式的推广中解放出来。然而——正如鲍西考尔特向刘易斯夫人解释的那样——王尔德“不是一个务实的商人”，这个想法让他感到害怕。❶他宁愿继续执行现有的安排。尽管如此，他对前途依然乐观，希望能怀揣1000英镑回到英国。❷

这是个一厢情愿的预测，虽然是基于三个月的演讲计划，但王尔德对财务的把握并不可靠。他吹嘘说——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自己从波士顿的演讲中“拿到”了200英镑（约合1000美元）。莫尔斯的账目确实显示波士顿演讲的收入为1000❸美元。但还要从中扣除144.52美元的业务开支和89.15美元的个人开支，剩下利润846.33美元。这笔钱由卡特和王尔德平分。所以王尔德实际上“拿到”423.16美元（约合84英镑10先令）。这仍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但像波士顿这样规模的城镇相当少。❹

美国和英国的报纸都极其关注王尔德的收入。他自己当众高估了演讲收入，再加上报纸过分夸大的预测（暗示他可能净赚3500至15000英镑），二者共同催生了怨恨的情绪。人们纷纷予以嘲笑。“奥斯卡·王尔德，”他们说，“是发现向日葵可以变成钱的第一人。”^①他讥讽地回击道：“美国人全然漠视挣钱，这让我惊叹不已。”他对一位记者说，对方听闻此言惊讶地铅笔都掉了。“我想靠演讲赚几块钱，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奇怪而讨厌的事情。为什么呢，艺术需要赚钱。金钱可以用来建造城市，让人获得健康。金钱可以买到艺术品，使之成为一种激励。我想赚钱，这难道很奇怪吗？”^②

王尔德确实意识到巡回演讲的业务和个人开支两项相当“沉重”：火车头等车厢，他自己和仆人、经纪人的旅馆住宿，在餐馆吃饭。但是，他喜欢这一切奢侈：坐下来吃一顿清淡的牡蛎晚餐，旁边站三个“有色人种的侍者……帮他端酒，照顾他的其他需要”；在每个旅馆拥有一间套房；坐进火车的豪华卧铺车厢。这些都是新鲜而令人愉快的经历。^③“我获得了一种胜利性的进步，”他告诉刘易斯夫人，“过着纵情逸乐的青年般的生活，像年轻的神那样旅行。”^④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赚钱。他花钱一向大手大脚，而新的境遇只会促使他更加自由地挥霍金钱。每到一个地方——除了莫尔斯掌管的业务和个人开支，王尔德的私人开支也相当可观（如莫尔斯的账簿所示）：葡萄酒、香烟、马车、信使、“点心”、报纸、邮票、洗衣、书籍、手套和其他“杂费”——这些费用随后会从他的那份利润中扣除。

他不断地修改并完善他的衣着，一切都是朝着更加奢华的样式。他根本没有打算穿稍长一点的裤子（或是把头发剪短）：因为公众都希望他看起来像沙勒尼照片里的人一样。如果有人认为这是粗俗的广告，那么王尔德心知肚明，正是这种做法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他在2月底之前——不是从传统的裁缝店，而是从一个戏剧服装师那里——订购了两件华丽的新天鹅绒马甲，紧身合体，配有“宽大的花袖和麻纱白葛布小皱领”。他预言，它们会“引起巨大的轰动”。^①后来，他还引领了“一种晚装新潮流——黑色天鹅绒配蕾丝”。^②

鲍西考尔特自盼能让这位年轻的朋友“少一点奢华——少一点享乐”，并催促王尔德把钱存起来，投资“收益率6%的债券”。然而，正如他遗憾地向刘易斯夫人诉说：“他认为我秉持的是‘一种令人不快的人生观’。”^③事实上，王尔德确实表现出一些要担负起财务责任的迹象。他几乎用人生的第一笔收入偿还了在利维那里欠下的债务，还把收到的第一张支票寄给了他母亲。^④

王尔德于2月6日开始中西部探险之旅。他随身携带“两个萨拉托加式铁皮箱”，还有他的贴身男仆和一位尽职尽责的巡回演说经理，25岁的J.西德尼·维尔。^⑤^⑥尽管他的演讲广告上仍打着“英国的文艺复兴”，但他一直在规划新的演讲，按照罗伯特·戴维斯的建议朝着更具实用性的路线改进。演讲后来被命名为“装饰艺术”，并大量借鉴了罗斯金和莫里斯的思想和语言。^⑦虽然“英国的文艺复兴”的演讲触及了这个主题，但其主要内容大多抽象概括；这次的新演讲将会更加具体，并有针对性。这给王尔德的演讲增添了一种使命感。他现

在的使命不仅有告知，而且还要改变。他主张机器时代也需要艺术手工艺品，设计要借鉴自然形式，形式要服从功能。他强调，优秀的设计能给社会带来诸多好处，支持优秀的设计需要诸多社会条件。

他告诉尤蒂卡（位于纽约州——他的第一站）的听众：

伟大的运动必然源于工匠们……我们房子里的陈设应该给制造它们的人带来快乐。艺术的优点不在于我们能直接从中学到什么，而在于我们能通过艺术间接地成为什么。所有的艺术都是视觉艺术，所有的艺术都是装饰艺术。把工匠和艺术家一分为二，会同时毁灭二者。没有艺术的劳动只是野蛮行为。装饰是手工艺人在劳动中表达快乐的方式。设计是将习惯和观察累积起来之后，对其进行研究并得到的结果。我对较为贫困阶层的进步和教育怀有信心。我想看看那简陋而美丽的家园。 ⑨

这些观点是他在赶往芝加哥的路上，在罗切斯特和布法罗（两个城市都位于纽约州）演讲时形成并阐述的。然而在罗切斯特，听众中主要是挥舞着向日葵的当地大学生，他们吵吵嚷嚷，以至于他的大部分讲话都没有被听到。这件事引发了几乎全国性的强烈抗议。 ⑩

王尔德在布法罗演讲（一场成功的午后日场试讲）结束后，参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回顾他对大西洋的“失望”所引起的轰动，他对大瀑布也摆出了同样的姿态。“我第一眼望见尼亚加拉大瀑布时，”他对《布法罗快报》记者说，“我对它的轮廓深感失望。在我看来，它的样子不够雄伟，线条不够多变。”然而他确实认可了它的

色彩“不断变幻”，并且承认“直到站在桌岩瀑布下，我才强烈地意识到大自然的壮观和美丽……在我看来，这体现出一种泛神论。我想起了列奥纳多·达·芬奇曾经说过，‘世界上最美丽的两样东西是女人的微笑和水流的运动’。”^①唯一的缺点是，从桌岩瀑布的角度观赏时，必须穿上“像防水雨衣一样难看的黄色油布雨衣”。^②王尔德作为“一个失望之人”，其立场再次在各大媒体上招来强烈反响。^③^④

关于芝加哥——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芝加哥人——王尔德几乎毫无保留地热情。他在这个繁荣的商业城市，美国食品加工业之都受到一批大人物的欢迎。芝加哥几乎是在1871年大火灾之后全部重建起来的，王尔德对崭新、宽阔、洁净的街道大加赞赏，尽管他嘴上称，“想到上百万的金钱被悉数花费在建筑物上，而别具风格的建筑却如此之少，这有点令人难过”。^⑤

尽管当地媒体对他大加嘲讽，但公众还是成群结队地去听他的演讲——要去亲眼见一见他本人。大约有2500人挤进了中央音乐厅。王尔德有关“装饰艺术”的演讲正在不断改进中；他按照讲稿发言，加入一些流畅的即兴发挥，还经常引用当地的典故。其效果很吸引人。王尔德高兴地发现，观众们都怀着真正的兴趣和欣赏之情在聆听。但同时他也很诧异，毕竟在此之前“媒体的语气”是如此不友好。^⑥他的听众在得知“世界上最宏伟的艺术就是共和政体”时，心中激动不已，充满爱国自豪感。他们记下了这样的话，“你可以用美国火鸡做一个很棒的设计，就像日本人利用本土的鹤一样”，以及“机器制造的装饰品让人无法忍受。他们都是蹩脚的，毫无价值的，丑陋的”。

他们喜欢他评论说，“人们不应该误将文明的手段当作目的。蒸汽机和电话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们的用途”。^⑩ 他们被他的信念所鼓舞——意大利文艺复兴已经表明——商业精神可以和伟大的艺术结成盟友。^⑪

芝加哥人是他迄今遇到过的最棒的听众。王尔德向乔治·柯曾描述他们“令人愉快——是一群了不起，且富有同情心的热情的人，他们欢呼鼓掌，给了我一种平静的力量，即便是《星期六评论》的侮辱也无法带来这种效果”。^⑫ 然而，王尔德的演讲还是引发了一阵小小的不满。由于天生喜爱挑衅，他竟然对这座城市著名的高达154英尺的仿中世纪水塔（在大火灾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出言不逊。他称赞水塔巨大的水泵引擎“简洁、宏伟、毫不做作”，之后却语出惊人地对观众称，水塔从外表看是“一个挂满胡椒盒的、城堡似的怪物”——这是对“哥特式艺术”令人发指的“侮辱”。此话一出，当即引发一阵愤怒的窃窃私语，此后更招来众多媒体的质疑。^⑬ 这件事也确保了王尔德将永远被芝加哥人铭记。

有些批评是芝加哥人愿意接受的。王尔德责备他们忽视了芝加哥土生土长（并在巴黎学习过）的年轻雕塑家约翰·多诺霍身上罕见的“艺术价值”。眼下，多诺霍正在芝加哥艰难地谋生。多诺霍送给王尔德一座小型青铜浅浮雕，牢牢抓住了他的兴趣。那是根据王尔德的诗歌《安魂曲》制成的一个女孩坐像。王尔德收到礼物后参观了他的工作室，艺术家漂亮的“年轻的索福克勒斯”仿制雕像、他的凯尔特血统，以及他那波希米亚式的贫穷给王尔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

象。王尔德的宣传很有说服力，心怀愧疚的芝加哥人迅速向多诺霍发去了大量订单。

王尔德以芝加哥为基地，随后连续展开了三圈规模宏大的横跨中部各州的旅行。离开东海岸发达的大都市中心后，他开始对美洲大陆的规模和多样性有所了解。他对不止一位记者说过，“美国不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世界”。^①在第一次为期12天的行程中，他从韦恩堡出发，途经底特律、克利夫兰、路易斯维尔、印第安纳波利斯、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斯普林菲尔德，然后返回芝加哥。据他自己估计，演讲在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又获得了“巨大成功”。^②

辛辛那提本身谈不上可爱。王尔德甚至对一名记者说：“我怀疑，是不是有罪犯会以你们丑陋不堪的城市作为犯罪的借口。”然而，这里文化机构林立，艺术爱好者众多。设计学院让王尔德大为赞叹，除了那里的一块“禁止吸烟”标志——“天哪，”他惊呼道，“他们说起吸烟就好像它是一种犯罪。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该警告学生们，让他们不要在楼梯口自相残杀。”他拜访了一些艺术收藏家，游览了艺术博物馆。他还参观了两年前刚刚成立的鲁克伍德陶瓷厂。

关注艺术创作的观众渴望聆听王尔德的思想。虽然他在演讲中（在大歌剧院的一次满座日场）提到，他看到一个鲁克伍德花瓶上的图案，“我应该说，是一个急着要在5分钟内赶火车的人画上去的”，但他也有赞美之词。他用话语让辛辛那提人爱上了自己，“我

在你们的城市，看到你们如此喜爱美丽的装饰艺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⑨

他在圣路易斯演讲时，大厅的音响效果很糟糕，听众也有点“吵闹”。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与当地大量热爱艺术的人建立了一种真正的联系。^⑩他还特别称赞了当地的“艺术学院博物馆”，称其为“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他坦承，虽然博物馆的“藏品不是很多”，但其所有馆藏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所以）它们不会让年轻学生误入歧途”。^⑪

在肯塔基州北部的路易斯维尔，王尔德享受到了另一种成功。在共济会教堂做完一场座无虚席的演讲之后，一个和蔼、文雅的中年女人朝他走来，她叫爱玛·斯皮德。她解释说，自己是约翰·济慈的侄女（她的父亲是这位诗人的弟弟乔治，他已移民美国并取得了成功）。王尔德在演讲中提到济慈，她深受感动，于是邀请他到家去看看诗人留下的遗物。第二天，王尔德满怀“柔情和敬意”，全神贯注地花费好几个小时欣赏了这些文学宝藏：济慈写给他在美国的兄弟的信，“破旧发黄的”手稿，还有济慈在一部小版《神曲》上所做的有关弥尔顿的《失乐园》的笔记。这次拜访相当顺利：斯皮德夫人认为王尔德是一个“献身于美的精神”的人。不久之后，她把济慈的十四行诗手稿寄给他，诗的开头写道，“蓝色！这是天堂的生活……”，希望他——不要像济慈那样——可以“永远不知晓‘世界的不公和他的痛苦’”。^⑫

王尔德为自己与心目中的英雄之间的这条纽带激动不已——他“曾经醉心于那纸张”，那是诗人的手曾经触摸过的，还有“曾经唯他是听的墨，以及……他清秀甜美的字迹”。“您所赠予我的”，他在给斯皮德夫人的回信中写道，“比黄金还要灿烂辉煌，比这一伟大国度所能给予我的任何珍宝都要珍贵……这是一首我向来非常喜爱的十四行诗，实际上唯有超凡脱俗、完美无缺的艺术家才能从仅仅一种色彩中获得如此充满神奇之物的灵感。”^①

王尔德于2月28日回到芝加哥，但几乎即刻便又出发了。他的第二轮中西部行程——“在11个不同的城市连续不断地演讲11个晚上”——先把他带到迪比克（艾奥瓦州），然后经过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先后到达罗克福德、奥罗拉、拉辛、密尔沃基、乔利埃特、杰克逊维尔、迪凯特、皮奥里亚和布卢明顿，然后返回芝加哥。不过，这是一趟可悲的失败之旅：王尔德称之为“彻底的失败”。这些城镇都很小，观众也更少。在乔利埃特，“只来了区区52人……”；皮奥里亚的观众是78人。即使在名单上最大的城市密尔沃基，也只有大约200名听众，而且“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还没等结束就离场了”。^②他对此既不恼怒，也没兴趣。在迪比克，少得可怜的观众稀稀拉拉地“分散各处”听着他的演讲，“仿佛是在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③虽然温德尔·菲利普斯曾经告诉王尔德，“考验一名真正演说家”就要看他是否有能力“让全场仅有的20名听众产生兴趣”，然而他并不想用这种方式考验自己。^④与此同时，他也被日程表压得喘不过气来。在拉辛（3月4日）“演讲的过程中，他短暂地崩溃了，自称已经精疲力竭，无法继续念讲稿”。^⑤此外，莫尔斯也未

能从当地的承办人手里获得有保证的回报。在奥罗拉，他只收到了可怜巴巴的7.35美元。而在乔利埃特，他们甚至入不敷出。王尔德抱怨说，这是一项“令人沮丧，毫无用处的”工作，他为如此微薄的报酬“耗尽了嗓子和体力”。^⑨

再次回到芝加哥，他松了口气。3月11日，王尔德在中央音乐厅第二次露面。他为此起草了一篇新讲稿，比先前的“装饰艺术”讲稿更实用，更具规范性。这一次他论述了如何将美学思想应用于“房屋的装饰”。事先被问起演讲内容时，他解释说：“我要从门环开始讲，一直讲到阁楼。再过去就是天堂了，我会把它留给教堂。”^⑩他说到做到，提出了一些有用而实际的建议，比如：“门廊处不应该贴壁纸，因为频繁的开门和关门会使墙壁暴露在恶劣的天气之下；应该用漂亮的木材做护墙板……不要在地板上铺地毯：普通的红地砖可以使地面变得温暖而美观……不要（在客厅的天花板上）贴纸；这给人一种住在纸盒里的感觉，会令人不快。”他推荐了“安妮女王”式的家具、小小的圆形镜子（“用来集中室内的光线”）、黄铜炉具和阿尔巴尼亚(Albanian)的衣帽架——“的确，那倒不是说阿尔巴尼亚人在其他方面也展露出很高的艺术品味，只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衣帽架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要好。而且，我可以说，他们的衣帽架上有美丽的艺术曲线，这是我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当然，对于你们这样聪明的听众，我不需要提醒，这里的Albanian所指的并非美国纽约州的奥尔巴尼（这几乎是演讲中仅有的一个‘笑点’，这句题外话引发了掌声、笑声和尖叫声）”。^⑪

王尔德最后的中西部行程是从“双城”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出发，途经苏城，最后到达奥马哈。他到访圣保罗时正值圣帕特里克节（3月17日）。散居各处的爱尔兰移民使得王尔德在美国的许多地方都受到了特别的欢迎，与其说他是“唯美主义的使徒”，倒不如说他是“斯佩兰萨的天才儿子”。他很愿意接受这个标签，并彰显他作为一个自豪的爱尔兰人的地位。他在圣路易斯——那里拥有大量爱尔兰人口——接受了《环球民主报》的一个特别采访，阐述了他“对爱尔兰问题的一些既定观点”。他宣称自己“完全赞同爱尔兰土地同盟(Land League)的立场”，敦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一次再分配，使之有利于长期贫困的“农民”，“政府以合理的价格从地主手中购买爱尔兰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人民”。政治变革也势在必行，尽管如他所说，“政治是一门实用科学。一次失败的革命仅仅是谋反而已；一次成功的革命却能成就国家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代”。他借用母亲出版的一本关于《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小册子指出，活跃于爱尔兰政治中的现代“实用共和主义”精神，“完全反映了美国思想的影响”，它们是由移民带回爱尔兰的。然而，他对过于急剧的变化始终保持警惕。他认为，爱尔兰还没有准备好“宣布完全脱离”英国。他像他的父亲一样，宣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地方自治派，并建议“第一步……应该是建立一个地方议会”。^①

在圣保罗，演讲结束的那天晚上，他在歌剧院参加了一场民族主义色彩的圣帕特里克节活动。他虽然没打算发言，但还是在人劝说下发表了一次即兴演讲，部分原因是观众“对讲话中提到斯佩拉萨在爱尔兰事业中所做的努力”做出了“慷慨的回应”。他将政治与艺术联

系起来，描述了爱尔兰种族“曾几何时是欧洲最具艺术气息的民族”，但随着12世纪英国人的到来，丰富多彩的传统被终结了——“因为艺术无法在暴君的统治下获得生存和繁荣”。只有爱尔兰恢复独立后，该国的“艺术学校和其他教育分支才会获得新生，爱尔兰才会重拾曾经在欧洲众多国家中享有的骄傲地位”。这一番观点赢得了“热烈的掌声”。^①

王尔德在西行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另一个受压迫的种族。他一直想接触美国的“印第安人”——“看看那些一生都生活在户外的人……见识一下他们的举止”。^②他从一名旅伴处得知，有一个“曾经以向日葵为食”的部落，这番话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但遗憾的是他无法找到他们一起用餐。^③他真正见到的“印第安人”则远没有那么浪漫：他们只是意志消沉地在站台上兜售商品的人。他在给伯纳德·比尔夫人的信中写道：

让人好奇的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外表像乔·奈特（英国戏剧评论家），还有少数人长得像阿尔弗雷德·汤普森（剧作家），当他们行进打仗时，看起来就像一队萨拉^④：你听不懂他们的谈话，但觉得很有意思，不过一旦翻译过来就相当愚蠢可笑——就像亲爱的多特（鲍西考尔特）所说的话。他们当中也有像伯纳德和吉尔伯特一样的人——事实上，此时此刻裹着毯子，头戴猩红色羽毛的伯纳德正在窗外逼迫我买下一双珠子串成的拖鞋，他正朝着旁边凶神恶煞的吉尔伯特使眼色，如果我不买，他就要用印第安斧头砍我。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最奇怪的印第安人。他们真是太奇怪了。印第安女人拙劣地模仿

成克拉拉·杰克（一位曾在伦敦舞台上扮演过美国印第安人的女演员），孩子们则是多特的样子。他们管婴儿叫“Papoose”，但第二天这个词将意味着河流、枫树或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

王尔德认为，印第安人“对文学相当反感，以至于他们每天都要对同一件物品使用不同的词语来称呼”。^①

正巧就在王尔德穿越大草原的时候，他的计划发生了改变。有几个竞争对手找莫尔斯接洽，提议将王尔德带到更远的西部，越过落基山脉进入加利福尼亚。王尔德到达奥马哈时，细节已经敲定。王尔德和他的团队没有按照原计划返回东部，而是继续向旧金山进发。尽管有媒体报道称，加州的承办人查尔斯·E.洛克已签约要在三周内举办20场演讲，除去开支直接支付5000美元作为报酬，但最终的任务安排并没有那么艰巨——报酬也没有那么丰厚。王尔德将在三周内在加利福尼亚州、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举办15场讲座，酬金是3000美元。^②

4 好小伙

越往西走，越让人喜欢。

——奥斯卡·王尔德

坐火车从奥马哈到旧金山全程1867英里，耗时四天（四夜）。王尔德向诺曼·福布斯-罗伯逊描述不断变换的景色时写道：“起初是灰暗、荒凉凄楚的平原，像海边的荒地一样没有色彩，不时有成群的淡红色羚羊仓皇掠过，体型庞大的水牛蹒跚而行，从举止和外表上与乔·奈特非常相像，鹰鹫渺小得像飞虫一样，嘶叫着在高空盘旋；随后缘内华达山脊而上，白雪皑皑的大山在我们称为天空的蓝色火焰穹隆中像光亮的银色盾牌一样熠熠闪光，深不见底的峡谷中长着松树。”王尔德认为内华达山脉西麓的约塞米蒂峡谷是美国两大最奇异的风景之一——另一处是纽约的戴尔莫尼科餐厅。●注

虽然王尔德乘坐的是被称为“宫殿车厢”的豪华头等车厢，但这段漫长的旅程非常乏味——速度缓慢，频繁停车。由于没有餐车，用餐只能在沿途的车站旅馆或餐馆里解决。有几次停车时，成群的当地居民向这位著名的唯美主义者或致以欢呼，或呆呆地看着他发愣。在犹他州的科林市，“40名临时聚集起来的唯美主义者手持向日葵在叮当作响的铜管乐队伴奏下”甚至试图“闯入”王尔德的车厢，要为他唱小夜曲。这种经常性的、干扰性的关注很快就变得令人厌烦了。幸运的是，与他同行的另一位乘客是歌剧男高音约翰·豪森，他正前往旧金山准备在多伊利·卡特首肯的《佩辛丝》中扮演伯恩桑。两人相处得

很好，豪森偶尔会穿上伯恩桑的服装，戴上假发，假装诗人出现在车窗边，以此帮助王尔德解围。 注

经过四天旅行，火车从冬天般寒冷的山区驶出，进入永恒夏天的旧金山湾，那里有“挂着果实的橘子树林，花丛，绿色的田野和紫色的山丘”。王尔德称，这就是“一个意大利，没有其艺术而已”。到了旧金山，他被安顿在新近落成的奢华的皇宫酒店，这座“世界上最大的酒店”——也许是最丑的。 注

洛克已经规划出一张在海湾周边几个城市演讲的完整日程表：奥克兰、萨克拉门托、圣何塞、斯托克顿，以及旧金山本地——其中几个地点安排了多个场次和特别的日场。尽管安布罗斯·比尔斯对王尔德怀有敌意，在他的讽刺报纸《黄蜂》上不断攻击王尔德，但王尔德还是在加州受到普遍好评。据一份报纸称，他在旧金山装点着鲜花的普拉特大厅的首场演讲吸引了“热衷于娱乐活动的最时尚观众”。据《每日报道》估计：其中30%的人之所以选择前往，是因为他们坚决认为自己不会被奥斯卡·王尔德的“愚蠢行为”说服，想要身临其境体验一下他如何“落荒而逃”的。

13%的人之所以前往听演讲，是因为“妻子坚持要去”。

10%的人思想开明，他们想听一听奥斯卡·王尔德会说什么。

10%的人“各有各的理由”。

9%的人“总的来说就是想看一看，听一听这个该死的傻瓜”。

1%的人承认自己是“奥斯卡忠实的崇拜者”。

然而，王尔德却赢得了众多怀疑者的支持。如《观察家报》报道：“人们起初对演讲者外表的焦虑和惊奇感一旦过去，（听众）就被他对待话题的热情所感染，他们听得全神贯注，不停地鼓掌，爆发出赞赏的笑声，表现得兴致勃勃。” ① ②

尽管最初的计划是14天内在加州安排9场演讲，但期间仍留有加场的余地。4月5日，应一些旧金山“杰出市民”的特殊要求，王尔德在普拉特大厅发表第四次演讲，主题是“19世纪的爱尔兰诗人和诗歌”。他提炼（或者说反驳）了他在圣保罗发表的言论，认为英国对爱尔兰人的压迫事实上刺激了爱尔兰民族的诗歌冲动，而不是压制了它。“爱尔兰的诗歌和音乐不仅是富人的奢侈品，也是爱国主义的堡垒，是自由的种子和花朵，”他宣称，“撒克逊人夺走了我们的土地，留下的是荒芜。我们借鉴了他们的语言，为其增添了新的曼妙。”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朗读了托马斯·戴维斯、加文·达菲和他童年时期读过的其他诗人的作品，以及约翰·博伊尔·奥莱利，当然还包括斯佩兰萨的作品。演讲在广大民众和各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实际上《旧金山纪事报》认为，这是王尔德在当地的所有演讲中最受好评的一场。 ③

尽管几乎每天都有演讲，王尔德还是有充足的时间找乐子。的确，在西海岸度过的两周——在明亮的天空和波光粼粼的海洋之间，在桃花和绿树丛中——似乎是他的美国之旅中一段令人陶醉的插曲。他总是回忆起旧金山这个特别的地方，“一座真正美丽的城市”，人

们“热情、慷慨、有教养”，而且还有一种异国情调。王尔德此前曾经贬低中国艺术，认为它“没有美的元素，恐怖和怪诞似乎成了完美的标准”；旧金山让他改变了想法。他对城里熙熙攘攘、五彩缤纷的唐人街很着迷——“是我见过的最富有艺术韵味的街区”——那里的居民尽管并不富裕，但“他们身边不能有任何丑陋的东西”。即便是用墨汁写在宣纸上的账单，也像一件艺术品；而妓院可能蒙着一层诗意（王尔德经常提起他从旧金山“罪恶之屋”听来的一副“中国对联”：“夜光抚玲珑，莺花慕明月”）。尤其让他备受打击的是，最卑微的中国茶馆里使用的青花小瓷杯——“和玫瑰花瓣一样纤小”——相比之下，他在自己“俗丽”的酒店里使用的茶杯野蛮而丑陋，其边缘足有“一英寸厚”。^⑩

他参观了图书馆、美术画廊和艺术学校。他赶赴的宴会有午餐，有晚餐，甚至还与地产大亨阿道夫·苏特罗共进早餐。苏特罗特别渴望听一听王尔德对他的新城郊计划的意见，于是领着这位有点“懒散的思想者越过沙丘”，为他描绘了一番“苏特罗高地”的愿景。王尔德随时准备赶赴下一个宴会，他表示很乐意给出建议——但是“要在早餐之后”。王尔德曾经两次受到旧金山“波希米亚俱乐部”——这个名字起得不太恰当——的款待。虽然俱乐部是一个为“与艺术有专业联系的绅士”建立的聚会场所，但商界和法律界的要人一直以来纷纷加入其中。王尔德在那里用过午餐后说，他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多穿着考究、营养充足、会做生意的波希米亚人”。^⑪

愚人节当天的晚宴上，俱乐部会员——毫不客气地——打算让他们的客人难堪一次。“（大家推举）霍夫曼法官和巴恩斯将军在酒足饭饱之后，分别在古典文学和英国文学两个领域对王尔德发起‘攻击’。”然而，尽管事先毫无准备，而且还喝了很多酒，王尔德还是胜人一筹，让两个对手相形见绌。会员们大加赞叹，而且惊诧于王尔德竟然有这么好的酒量。当晚宴最终结束，王尔德站起身时，有几位客人显然已经在桌旁睡着，或倒在桌子下面了。对于那些原本将这个留长发、穿齐膝马裤的唯美主义者看作是“南希小姐”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反驳。这些“波希米亚人”，和之前的其他人一样，不得不承认王尔德“并不像他看起来那么愚蠢”。随后，马上有一拨人造访皇宫酒店，要求获准为王尔德画像，并将这幅肖像与其他著名访客一起陈列在俱乐部。●注

在一场由画家约瑟夫·德怀特·斯特朗和朱尔斯·塔韦尼耶主持的工作室午后派对上，王尔德发现了一个更真实的波希米亚圈子。画室布置得很艺术化，天窗上画着玫瑰，画室小工是个穿着锦缎长袍的中国人，负责为客人们上茶。“这里，”王尔德环顾四周大声道，“这才是我所属的地方！这才是我喜欢的氛围！”斯特朗的妻子贝尔记录了当天下午王尔德极富感染力的光彩时刻。“他很迷人。他的热情，他的坦率真诚，立刻消除了任何拘束……他的讲话，他的快乐、机敏，他那令人愉快的亲切，几乎深情的友好，让我们倍感兴奋。”画室角落里放着一尊身穿女装的模特坐像；王尔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欣赏画作和“印第安人的”手工艺品时碰到了这个假人，他一时间误以为撞到了另一位客人，于是赶紧道歉。旋即，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出了个

错，便“保持不变的语气”和坐着的人像“开始攀谈起来”。“他向她讲述了自己对旧金山的印象……或惊讶，或赞许地回答着想象中她的评价。”“那是一场极为精彩的表演，”斯特朗夫人回忆道，“是一部充满智慧和快乐的杰作……当他离开时，我们都觉得自己见到了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①

旧金山也是一个浪漫的城市。几乎从王尔德到达美国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开始猜测他的爱情生活——以及他带一个“美国女孩”回英国做他的妻子的可能性。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像伯恩桑一样——被“患相思病的少女们”包围着。其中有许多姑娘相当漂亮，有些姑娘很有意思，有一小部分姑娘态度坚决。海伦·勒诺瓦回忆，在一次招待会上，有个姑娘一边朝他走去，一边欣喜若狂地喊道：“哦，王尔德先生，这一刻我渴望已久。”^②他的母亲希望，他能从美国带个新娘回来。^③但是他紧张忙碌的旅行计划和媒体持续不断的密切关注，几乎完全隔绝了风流韵事。当一名记者问及他的“私人生活”时，他疲惫地回答说：“我倒是希望自己有。”^④他对另一名记者感叹道，任何未来的王尔德夫人都只是“一个梦，一个梦”。^⑤他承认，华盛顿之行后，他“见到了黛西·米勒的原型”（亨利·詹姆斯同名小说中迷人的年轻女主人公），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因为他希望再次见到她。^⑥

然而他对山姆·沃德说，他在洛杉矶感到灰心丧气。^⑦他始终没有透露倾慕的对象，但最有可能的人选是哈蒂·克罗克，南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查尔斯·克罗克的23岁女儿。她聪明、活泼、美丽、富有。她和

家人算得上旧金山的贵族，住在诺布山的一座大宅第里。全家人都对艺术很感兴趣：她的父亲出资赞助在邮政街建造了一座壮观的新建筑“作为音乐厅及其他艺术用途”；她的叔叔埃德温·B.克罗克在萨克拉门托成立了一家画廊，王尔德参观了那里。哈蒂的父母参加了王尔德在普拉特大厅的首场演讲，她很可能和他们在一起。哈蒂或许是参加蒙哥马利街茶会的“年轻的社交界女孩”之一。她的堂妹艾米·克罗克当时肯定在场。❶

另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情是，他离开旧金山不久，便给“亲爱的哈蒂”写了一封充满欢乐的信，信中感叹他们的分离，并且在结尾写道：“当我想到美国时，我只记得有一位佳人，她的嘴唇像夏日深红色的玫瑰花瓣，眼睛像两颗棕色的玛瑙，如美洲豹一般魅力十足，既有雌虎一样的胆识，又有小鸟依人似的优雅。亲爱的哈蒂，我现在意识到我彻底爱上了你，并永永远远是你充满深情、忠心耿耿的挚友，奥斯卡·王尔德。”❷哈蒂·克罗克本可以成为与王尔德十分般配的另一半，正如他母亲梦寐以求的那样，但紧迫的日程安排使得他根本没有机会去培养这种关系。

王尔德被带领着飞快地穿过犹他州平原。仍旧是在洛克的安排下，他在盐湖城歌剧院为崇尚一夫多妻，且朴实而又相当“无知的”摩门教徒发表了一场演讲，王尔德称之为“一桩巨大的事件”，“场地大约有考文特花园那么大”，“轻松容纳了14个家庭”。❸他在丹佛豪华的塔博尔大歌剧院讲了两场，在时尚的温泉小镇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讲了一场。在此期间，他还出人意料地绕了个

弯。科罗拉多州副州长霍勒斯·塔博尔倚仗落基山脉高处莱德维尔的一座银矿积累了财富；王尔德临时受邀去那里演讲。这是一个传奇小镇：宽阔的主干道周围杂乱无章地分布着一座座矿工营地，它被称为美国最富有，也最暴力的城市。王尔德自从来到美国，就“非常”想目睹这座城市：机会来了。❶

那次造访令人难忘。它有点危险：王尔德因为这趟行程而获得了一把左轮手枪——尽管他声称，自己用它射中了电报线上的麻雀，但这种说法似乎值得怀疑。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窄轨列车缓慢爬升了一万多英尺，抵达时“稀薄的空气”让人头晕目眩。进城的路上，“一群全副武装的暴徒无声而庄重地接待”了他。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是，能容纳800人的塔博尔大歌剧院里坐满了身穿红上衣、留着金色胡子、神情专注的矿工。王尔德认为这是他迄今在美国见过的穿着最得体的人。整个场面令人愉快，但很不协调。王尔德满怀新奇地描绘说：“我向他们描述波提切利的画，那些名字……在他们听来似乎是一款新的饮料……我讲到近现代艺术，几乎使他们对美的事物真正产生了崇敬之感，但当我不幸谈及吉米·惠斯勒那幅《蓝色和金色的夜曲》时，情况突变。他们一跃而起，以极为简单的口吻赌咒发誓说，事情不应该如此。”《莱德维尔每日先驱报》虽然描写得没有那么传神，但也证实了这个场面的真实性，该报在报道中提到，王尔德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比萨的建筑辉煌的专题演讲，被观众的喊叫声打断，“我们在这个国家住的是土坯房！”❷

演讲结束后，王尔德在向导的带领下逛了州街上吵闹的酒吧和妓院，他大为惊诧地发现，帕·怀曼酒吧里竟然悬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不要射杀钢琴师；他已经尽力了”。他说，这是“我所见过的唯一合理的艺术批评方法”——因为它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糟糕的艺术应该受到死刑的惩罚”。^{①②}王尔德从州街出发，步行几英里后出城，乘上一辆“牛车”，两侧都是手举火把的矿工，他要去塔博尔著名的银矿“无敌之矿”享用晚餐。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穿上橡胶防护服，然后被装进一个大金属“桶”里顺着竖井往下降。王尔德称，尽管媒体报道说他一直焦虑地抓着桶绳，但他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始至终保持着“优雅”。

在矿长的陪同下，王尔德发现一群矿工正等着迎接他，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瓶子。一场“盛宴”已经铺开，尽管王尔德后来说这场盛宴“第一道菜是威士忌，第二道菜是威士忌，第三道菜还是威士忌”。不出所料，矿工们对他的酒量大为赞叹。当他毫不畏缩地干掉第一杯“鸡尾酒”时，他们说他是“一个没戴玻璃假眼的好小伙”；他说，这是“质朴而自发的赞美，比文学评论家浮夸的赞美更让我感动”。王尔德的精力着实充沛。他在地底下度过的几个小时里，一直在“不停地聊天”。

他考虑到矿工们可能会以为艺术“与体面紧密相连，没有留给他们的空间”，于是便尽力表明“艺术和体面之间真的没有任何联系”。他把他们看作“与金属打交道的人”，给他们讲述了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金匠、“最有成就的粗人”本韦努托·切利尼，他既杀了

人，又创造了一件杰作。他们想知道王尔德为什么不把这位杰出人物一起带来，并且——当得知他已经死了“好一阵子了”后——问道，“谁射杀了他？”^①王尔德在“全场掌声中”挥舞起一把银钻头打开了一条新隧道（这条隧道被命名为“奥斯卡”），然而他除了那把银钻头以外，并没有得到这条隧道相关的矿脉股份，对他来说这^②不失为一桩憾事。

当王尔德探索落基山脉以西的世界时，莫尔斯上校正在策划他的东向路线，确认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艾奥瓦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安排另外15场演讲的具体日期。体验过加州的阳光和魅力之后，接下来可能是一段艰难的长途跋涉。然而，随着春天的到来，再加上王尔德对周围环境的开放心态，这段日子因为变化而变得活跃起来。“每一天，”他声称，“我都会见到新奇的事物。”^③他从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写信给诺曼·福布斯-罗伯逊：

在我的窗外，向西行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立着一座有绿色木栅栏的黄色的小房子，一大群人正在把它完全拆掉。这是出了名的火车大盗兼杀人犯杰西·詹姆斯的房子，他上周被他的同伙（罗伯特·福特）枪杀了，现在这些人都是来搜罗遗物的。昨天，他们通过公开拍卖，出售了他的垃圾桶和刮脚刀，今天下午要卖他的门环，拍卖底价大约相当于一个英国主教的年收入……他最喜欢的彩色石印画被卖到了相当于在欧洲一幅提香原作，或者一幅曼特尼亚真品的价格。

他特别提到，美国人“是伟大的英雄崇拜者，总是能从犯罪阶层中挑拣出自己的英雄”。^④

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他和当地大学的年轻英语教授乔治·E·伍德伯里度过了有趣的一天。他们一起参观了附近的州立监狱。“可怜而悲伤的”囚犯们让他感到沮丧，他们穿着“丑陋的”条纹制服，在烈日下制作砖头。不过，至少让他略感宽慰的是，他们看起来都“长相卑贱”。他告诉奈莉·西克特：“我不愿看到一个罪犯有着一张高贵的脸庞。”他在一间“干净得可悲”的白色小囚室发现了一本但丁诗集^①的译本。“在我看来，”他说，“一个佛罗伦萨人在流亡时抒发的悲伤之情，在数百年后，竟能够唤起现代牢房中一些普通囚犯同样的情感，这是既奇特又美好的事情。”而他不太喜欢的是，有个杀人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竟然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读小说；他认为，“无论面对上帝还是虚无，这都是一种糟糕的准备”。^②

王尔德在各种消遣以及旅行杂事的间隙，找时间继续推进罗德诗作新版的出版项目。他已经写好了序言，或是跋：这3500个精心推敲而成的华丽文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检验了“散文的韵律价值”^③（他最终接受了佩特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提出的写作散文的挑战）。这篇文章不仅关注佩特，而且还提到了惠斯勒和戈蒂耶——王尔德一直在旅途中阅读他们的作品。它宣告了一条“重要的”，与众不同的艺术信念——正如王尔德对斯托达特所说——它意味着“我对罗斯金先生和拉斐尔前派有了新的发展”。^④

事实上，这种信念所包含的元素已经在他关于英国文艺复兴的演讲中有所表达，但王尔德现在要以一种新的激情将他的各种思想凝聚在一起。也许是在惠斯勒的画室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使他变得更加

大胆，他宣称自己抛弃了罗斯金美学体系中的“伦理”基石，即人们“应该根据一幅画（或一首诗）所表达的崇高道德观念的量来对它进行评判”。取而代之的是，他主张“艺术中感官元素的首要性，为艺术而热爱艺术”。王尔德在文章中引用戈蒂耶的话，并大量转述佩特的观点，他反对来自艺术领域的“一切文学怀旧和一切形而上学的思想”，主张完美的形式和个性化的表达。王尔德（和罗德）等——寻求“完善英国文艺复兴的人”——“现代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被描述为“本质上是印象诗，就像最新的画派，惠斯勒画派……它表现在与主体相对的情境选择上；它们讲述的是一般情况以外的事物，而不是生活的各种类型；在其短暂的激情中，在我们所谓瑰丽的瞬间，它确实是诗歌和绘画当下试图向我们展现的生命的瞬间，自然界的瞬间”。

王尔德称，真正的艺术家在“美的原则”指导下，避开了“肤浅的正统观念”和“毫无价值的怀疑主义”，只为稍纵即逝的印象，不断变化的情绪——寻找“经验本身”，而不是“经验的果实”。^⑨这种在诗歌和绘画领域对罗斯金的否定并没有波及王尔德的“装饰艺术”观点；他有关这一主题的讲座中，在论及手工艺的优点和日常生活中美的提升作用时，处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罗斯金的观念。

王尔德同时还在忙于书籍出版的各种细节：选择字体、讨论设计、挑选纸张、提供装饰建议。^⑩他将书名改成《玫瑰叶和苹果叶》。这本书的英文原版是献给罗德的父亲，但王尔德将其换成了对

自己的夸张致敬：“给/奥斯卡·王尔德/‘心灵的兄弟’/这寥寥无几的诗歌，以及未来的很多诗歌。”^①

为出版一本书做准备，要比将剧本搬上舞台容易得多。有关《维拉》的计划已经陷入重重困境。与克拉拉·莫里斯会面后，王尔德成功说服多伊利·卡特，使他对这个项目感兴趣，这件事短暂地鼓舞了他最初的乐观情绪。卡特向王尔德保证，“这件事应该会有结果的”，因为这个作品看上去是“一出强烈的，充满情感的，彻彻底底的艺术戏剧”。他准备为之提供与巡回演讲相同的条件——利润的一半——一旦确定在纽约上演，就预付200英镑。^②和王尔德一样，他“意识到”克拉拉·莫里斯这个人很固执，“而且（一部作品）的失败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现实风险”，但他似乎认为值得去努力争取这位女演员，而不是去接触其他不太出名的演员。^③

卡特曾敦促王尔德再写一篇“序言”，为这部戏剧提供一个背景，而王尔德在穿越中西部的同时，也完成了一个新的开场场景，勾勒出沙皇专制和西伯利亚监狱集中营的场景画面，并提前透露了一些将在稍后的戏剧中上演的冲突。^④然而，新剧本到得太晚了。尽管莫里斯的丈夫已经告诉卡特，她无法接手《维拉》是出于“不稳定的健康原因”，但4月初有消息宣布，莫里斯将领衔主演改编版的《远离尘嚣》，该剧将在月底上演。此时，卡特已经不可能再另寻演员了，至少在今年春季是这样。莫里斯试图安慰王尔德，秋季更有利于上演“大部头作品”——比如《维拉》，但这也是一种失望，他要将戏剧搬上舞台的努力再次遭遇挫折。^⑤

5 不同的方面

我已经教化了美国——除了天空之外。

——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5月初回到纽约，比原计划结束巡回演讲的时间晚了几周。然而，他现在没有停下来的念头。他的名声因为横穿中西部以及更远地区这一壮举而获得提高，他准备抓住这个机会。纽约、费城、波士顿和辛辛那提都渴望再次聆听他的声音。加拿大方面期待他前去访问。最近他还收到一个去“南方”旅行的建议。王尔德准备在各个方面齐头并进——暂时把《维拉》带来的失望抛在脑后。

他于5月10日回到费城，参观了朋友利兰开办的手工艺学校，并得到几件可以配合他的演讲进行展示的作品。他身上那件在科罗拉多入手的“牛仔”服，令所有旁观者印象深刻，他还再一次拜访了惠特曼。①第二天，他在纽约拥挤的沃勒克剧院发表演讲。实力雄厚的演出筹办人兼自我宣传家P.T.巴纳姆就坐在前排。②

莫尔斯重新安排了最初定在3月的若干加拿大行程日期，将其调整为从5月14日开始，为期两周半的安大略和魁北克之旅。莫尔斯上校认为，这是王尔德整个跨洋之旅中“最令人享受的部分”——加拿大观众比他们的美国邻居“更容易对王尔德及其演讲话题产生认同感”。王尔德本人也轻松了许多，之前数月“不停歇的工作”给了他“表达的信心和技巧”，也让他得以完善自己的演讲。大城市里的

房子都很宽敞。新闻界——除了少数例外——宽宏大量，彬彬有礼。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娱乐活动、晚宴和各种招待会。他受到作家的褒奖，获得了艺术家的赞誉。多伦多雕塑家弗雷德里克·邓巴甚至劝王尔德坐下来，以便为他塑一座胸像。 ⑨

在多伦多，王尔德观看了一场“多伦多人队”和圣瑞吉斯印第安人队（来自附近的一个保留地）之间的曲棍球比赛，他非常享受这个盛大的场面。《多伦多环球报》写道：“当任何一名球员突然倒下时，他都会开怀大笑；场上打出好球时，他不停地鼓掌。”王尔德告诉记者，他认为这项运动——当时是加拿大的国民运动——“魅力十足”，“在培养人的体格方面远远领先于板球”，因为他认为“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其中——或努力表现”。从美学的角度看，他尤其欣赏“身材高大、体格精壮的防守球员”罗斯·麦肯齐的表现，而对“印第安人”没有在身上脸上涂颜料感到遗憾。 ⑩

6月12日他回到纽约，随后即刻动身前往南部各州——一如既往地由他的贴身男仆，以及一名新任巡回演讲经理人弗兰克·格雷陪同。王尔德发现，在一个名叫彼得·特雷西的孟菲斯承办人的指挥调度下，这次巡回演讲虽然没有提高强度，时间却拖得越来越长，让他颇为恼火。整个行程从原先预计的“三周”延长至近五周。而在此期间总共只安排了18次演讲，王尔德认为这一比例“相当荒谬”。 ⑪ 尽管如此，他几乎每隔一天就要进行远途跋涉，穿越田纳西州、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萨斯州、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途经孟菲斯、维克斯堡、新奥尔良、加尔维斯顿、圣安东尼奥、休斯敦、新奥

尔良（再一次）、莫比尔、蒙哥马利、哥伦布、梅肯、亚特兰大、萨凡纳、奥古斯塔、查尔斯顿、威尔明顿、诺福克和里士满。尽管“演讲让人兴奋不已”，尤其是“拥有了感兴趣的听众”，可是王尔德却越来越讨厌旅行。“我讨厌准时，我讨厌时间表，”他悲叹道，“铁路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要么简直令人难耐；要么简直无法忍受。”

⑩此外，黄热病的威胁使这次旅行倍感压力；然而，正如王尔德所说：“能在（美国）新闻业中幸存下来，就能从黄热病中活下来。”

⑪

尽管有各种烦心事，王尔德还是被“美丽、富于激情而荒芜的南方”那种凄美深深打动，他在给朱莉娅·沃德·豪的一封信中写道：“这是一片木兰盛开，音乐袅袅，玫瑰与浪漫相伴左右的土地：她虽然跟不上你们北方人敏锐的思维，但她同样美丽如画；她主要靠赊账过日子，生活在惨败的记忆中。”⑫对战前岁月的怀旧弥漫在一切事物中。王尔德说，一次他对一位南方绅士说：“今晚的月亮多美啊！”他得到的回答是：“是啊，可惜你没能在战前看见它。”⑬他对这个地方有一种亲近感，看到了南方邦联和爱尔兰之间的一种纽带：它们都曾武装起来想要实现“自治”，然而却都功亏一篑。⑭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家庭意义上的联系。王尔德的舅舅，法官约翰·K.埃尔吉（王尔德夫人的哥哥，年轻时移民美国）曾是路易斯安那州南方邦联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他于1864年去世，但人们回忆起他仍然十分尊敬。甚至有报道激动地称，王尔德可能会主张对亚当斯堡附近老宅的所有权。纵使王尔德坦承，拥有“木兰树林的所有权”是一

件令人开心的事，但他否认了这种想法。❶他离开南方时只带走了“上校”的荣誉头衔，他很满足——这是得克萨斯人喜欢的称呼。

❷

王尔德特意绕道前往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附近的种植园，拜访了南方邦联战败的总司令杰弗逊·戴维斯。王尔德在一次报纸采访中对其领导力所做的一番评论，让戴维斯深受触动，于是出人意料地向他发出邀请。王尔德对戴维斯大加赞赏，称其是“一个最敏锐的智者”。然而，74岁的戴维斯似乎发现王尔德“不可名状地令人反感”——这也许是一个令他不适的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先兆。他很早便离席了。❸

在南部的众多美景中——加尔维斯顿的“水晶海”、圣安东尼奥古老的西班牙遗址、路易斯安那的鳄鱼和佐治亚的森林——王尔德最喜欢的是随处可见的“年轻黑人”，他们或在阳光下嬉戏，或在树荫下舞蹈，“他们半裸的身体像青铜一样闪闪发光”。美国人的生活中充斥着单调乏味的物质主义，身在其中的黑人青年却似乎提供了一种罕见的“人类服饰与习性的生动画面”。令他吃惊的是，美国的画家和诗人并没有更多地将此作为艺术的主题。王尔德虽然可能对此有所夸大，但他似乎已经融入了黑人的方式中——在新奥尔良——他甚至参加了一场他们的巫毒仪式。❹

不过，他渐渐忧心忡忡地意识到，分裂南方的种族仇恨依然存在。据报道，当火车经过路易斯安那州邦福卡镇时，他无意间目睹了一起私刑事件，一个可怜的“黑人”正被吊死在铁路桥上。❺行至亚特兰大和萨凡纳之间，他和黑人贴身男仆一起登上头等卧铺车厢，一

名铁路官员告诉他，“向有色人种出售卧铺车票是违反公司规定的”（车票是巡回演讲经理人格雷提前购买的）。王尔德很生气，拒绝改变行程安排，并指出他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麻烦。但一名黑人搬运工开门见山地对贴身男仆解释说，如果在琼斯伯勒上车的乘客发现有一名黑人坐在白人专用车厢里，他们很可能会对他动用私刑。于是男仆同意离开这节车厢。 ⑨

南方巡回演讲结束后，王尔德回到纽约。那时正值7月中旬，整个城市都在放假。不过，莫尔斯仍然在百老汇的多伊利办公室。他对王尔德在过去六个半月中的收入和支出做了一番完整的说明。总收入为21946.56美元；旅游的相关费用（旅行、住宿、广告宣传、维尔和公司提供的各种服务）为9579.42美元。剩下的净收入为12367.14美元。王尔德获得其中的一半6183.57美元——约合1100英镑——略高于他原先期待带回英国的1000英镑。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王尔德在旅途中的私人开支（酒、香烟、电报、报纸等）为2217.68美元。另外，他还预支了1169.65美元：用来支付各种寄给利维、王尔德夫人、他的美国裁缝，以及其他商人的“汇票”。最后他拿到手的只有一笔相当微薄的3344.07美元（约合665英镑）。

这个数额不容小觑。这笔钱足够让人在巴黎或罗马享受几个月的休闲、旅行和文学创作。甚或还可以去亚洲。几个月来，王尔德一直在琢磨打听去日本——“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旅游的想法。他在采访中屡次提及这件事情。他原本有心劝说惠斯勒或者沃尔特·西克特陪他一同前往，这样他们就可以为他将要撰写的一本关于日本的书

绘制插图。他确实应《我们的大陆》约稿，写了一系列关于日本艺术的文章，他甚至开始收集推荐信，以便结识在日本可能有用的人物。尽管如此，他仍在犹豫要不要执行这个计划。⑩

他越来越意识到，还有其他事情需要他动用自己的资源。伦敦的报纸对他在美国取得的成功和获得的收入进行了夸大报道，这促使他的许多债主纷纷行动起来。王尔德夫人不时在信中提到一些要求结算的旧账单。她催促他在有能力的时候尽快还清。她还时常抱怨自己财务状况不稳定，以及威利的挥霍无度。王尔德觉得他需要继续挣钱。他询问莫尔斯，是否能安排一些新的演讲，跟进澳大利亚的行程，眼下福布斯正在那里演讲。⑪王尔德向媒体表示，他想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愿望，是在看了地图之后产生的：当他看到“澳大利亚是一个多么丑陋的国家”，他觉得必须亲自前往“看看是否能让它的形状变得漂亮些”。⑫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计划，经过数月的艰苦旅行和辛劳演讲，王尔德觉得实在有必要享受一段假期。他很想接受到手的一些邀请，去长岛或其他地方的海滨拜访朋友。莫尔斯想出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解决方案：去时尚的东海岸度假城镇和卡茨基尔山静养地，来一趟非正式的“夏日之旅”。两趟行程之间，他可以安排和朋友们一起度假。如此安排旅途距离很短，日程安排轻松（大约六周内安排20次演讲），气氛也放松了。此外，莫尔斯希望他能保证每次收入100美元。⑬暑期讲座是一个新鲜事物，王尔德仍有吸引力。

莫尔斯作为巡回演讲经理一路陪同，他回忆这次旅行是一段特别愉快的插曲。王尔德在这些暑期演讲中——往往在不太宽敞的酒店接待室举行——“状态极佳”：

他不再依赖他写的讲稿，而是根据当时的情况，经常根据听众的需求，改变自己的讲话。与讲坛上更加正式的场合相比，这些演讲中的一些内容要有意思得多。下午场的听众都是梳妆打扮十分迷人的女士，对演讲者而言，她们是灵感的源泉，而且还给予了热情而柔和的掌声回应。她们身上闪耀着智慧、警句和隐喻的光芒；他的演讲内容取材于他自己的观察所得和最近的亲身经历；听众的智商越高，就越懂得欣赏他的努力付出，激发他产生前所未有的幻想和雄辩。

然而可惜的是，正如莫尔斯感叹，这些讲话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或留存。❶

7月15日，王尔德在罗得岛州纽波特的赌场剧院演讲，他在论述一件精心设计的裙子所能产生的持久之美时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他说，“我现在要对那些不是百万富翁的人讲话，如果现在场内有百万富翁的话”，恰逢此时，范德比尔特夫人走进了大厅。❷从纽波特开始，莫尔斯带着王尔德一路蜿蜒到访了朗布兰奇、巴比伦、长滩、鲍尔斯顿温泉、萨拉托加以及更远的地方。❸

日程安排有休息和娱乐的时间。王尔德接受朱莉娅·沃德·豪的邀请，在她位于纽波特附近的农舍住了几天，不过他宣布自己不仅要随身携带一个装满书的“独眼巨人”皮箱（“我的旅途中离不开巴尔扎

克和戈蒂耶”）、一个帽盒和一个旅行皮箱，而且还要带上他的贴身男仆，这让全家人“着实大吃一惊”。⑩他在那里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把罗德岛称为“让无所事事成为美德的小岛”。⑪他当真用某些矫揉造作的手段试探了沃德·豪全家以及他们的客人：有一次，在森林茂密的山谷里，他身穿黑色天鹅绒外套，戴着一顶懒散的帽子和一条三文鱼色的围巾，手里拿着一朵玫瑰，一边聊天一边闻着花香。⑫不过，尽管噱头不断，他仍被认为是“一个难得的讨人喜欢的客人”：他的谈吐“惊人地出色……所有这些是他最好的一面”。一天下午，他在树下朗诵他的“高贵诗篇”《万福，女王》，“讲了无数关于斯温伯恩、惠斯勒，以及当代其他名人的故事”。⑬一次晚宴上，他口若悬河，风头盖过了“著名的波士顿智者”汤姆·阿普尔顿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这次访问不禁让媒体猜测，王尔德已经和沃德·豪最小的女儿莫德订婚了。这些谣言毫无根据。于是沃德·豪夫人立即出手，告诉媒体：“如果说，这世界上还有两个人彼此之间毫无共鸣，那就是沃德·豪小姐和奥斯卡·王尔德。”尽管如此，这件事情在英国报纸上被广泛报道；王尔德夫人很失望，不得不否认这一说法，并拒绝了她收到的诸多“热情的祝贺”。⑭

那年夏天，王尔德怀着度假的心情，留下了无数身影：身着泳衣在长滩的他光彩照人；⑮他的网球技巧和质朴的魅力令纽约剧院老板威廉·亨德森的家人惊奇不已；⑯与福蒂斯丘家族和“鲍勃叔叔”罗斯福坐着他们的新游艇“三色堇”号（他之前用一瓶香槟和“一小段简

洁的演讲”为游艇进行了命名)在“大南湾”一起巡游；^⑩与山姆·沃德一起参加纽波特马球赛季开幕式，并“对比赛产生了最深刻的兴趣”；^⑪与沃德和赫尔伯特一起，三人在长滩用餐，享受“月光下的海洋、夕阳、最可爱的海风”。^⑫王尔德曾经期待在假期里“对着鲜花和孩子们”胡说八道，现在两个机会都来了。在度假城市巴比伦，他在旅馆里为孩子们编童话故事，趁着舞厅里的音乐尚未响起时给孩子讲故事。^⑬他把5岁的娜塔莉·巴尼从一群粗陋的男孩子手里解救出来，并且在长滩的沙滩上打转转，还用“一个美妙的故事”给她带来了欢乐。^⑭

他被介绍给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期间的联邦军队指挥官尤利西斯·S.格兰特。^⑮他拜访了博物学家约翰·伯勒斯，发现这位作家粗犷的外表及其文学言论之间的差异“相当矛盾，但也非常亲切”。而伯勒斯则发现这位客人“出色”的口才与其“耽于享乐”的举止做派之间的差异不那么吸引人，他注意到他走路时“臀部和后背”有一种“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动作。^⑯王尔德还在周末隆重拜访了朱莉娅·沃德·豪的“老朋友”亨利·沃德·比彻，参观了他那座“位于哈德逊河畔的美丽别墅”。王尔德认为这位著名的传教士和废奴主义活动家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俩有着相似的外貌、雄辩的天赋，以及蔑视公众责难的勇气。^{⑰ ⑱}

王尔德的夏日演讲——尽管很有趣——却并非特别明确地有利可图，他决定继续工作到秋天。莫尔斯与一个承办人签订了合同，让王尔德去新英格兰东北部的工业城镇做一次简短的旅行，然后北上去加

拿大的“海滨”省份。❶王尔德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分别前往普罗维登斯（“工业的蜂巢”）、林恩（“罪恶之城”兼制鞋业之都）、波塔基特（一个繁荣的磨坊城镇）、北阿特尔伯勒（美国纽扣之都）和缅因州的班戈（新英格兰的木材中心）发表演讲。在其中几个城镇——当地人热衷于制作各种东西，也许对如何把东西做得漂亮很感兴趣——他吸引了“大约500名”观众。❷他从班戈越过边境进入加拿大，在弗雷德里克顿（新不伦瑞克省）演讲，然后继续赶赴新斯科舍省的各个城镇和爱德华王子岛。❸

他在加拿大广受欢迎，只是在蒙克顿（新斯科舍省）经历了一桩令人遗憾的混乱事件。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以为，已经确认将由他们赞助王尔德的演讲，然而结果却发现，王尔德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的推广事务交给了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感到怒不可遏，试图送达一份阻止他演讲的书面令状。幸运的是，当地的治安官——王尔德这样称呼他——是一位“有一点世故的绅士”，并且他“拒绝做任何不必要且无礼的事情”。讲座办得“非常成功”；后来基督教青年会要求王尔德支付100美元作为赔偿，但案子尚未开庭，事情就已经很清楚，他们放弃了这一要求，王尔德感叹：“这件事表明，最道德的机构也有不道德的地方。”❹

王尔德于10月13日下午在新不伦瑞克的圣约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回到纽约，此时他已经“精疲力竭”。❺他几乎已经马不停蹄地巡回演讲了9个月，在大约130个地方演讲140次左右。他行程超过1.5万英里，亲眼所见的北美大陆比大多数美国人历来见识的还要广。他

所接受的采访，以及被描绘的段落比国内任何其他人物都要多。他的名字成了一个传奇，他的容貌几乎人人知晓。即便他没有发大财，他也一定赚到了钱。

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他吹嘘“教化了美国”通常意义上是兴致所至的夸大其词，但他听起来是在对那个时代猖獗的物质主义进行反击。①他使“美”成为一个代名词，让“唯美主义”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术语。他顶住了部分新闻界的敌意。人们渐渐认识到，他时而做出的“荒诞和夸张”是有意义的：没有它们，他就不可能获得如此表达思想的机会。②无论他是在台上还是台下，成千上万听过、看过他演讲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他身上获取了知识、受到了激励或者鼓舞。一些人辞去工作去追求个人梦想，还有些人则转而开始从事具有实际意义的项目。弗雷德·霍兰德·戴（F.Holland Day，后来成为出版人、摄影师）认为，他年轻时在波士顿南站站台上与王尔德的那场相遇，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之一。多年来，“太阳神”王尔德给他的签名，以及当时写字用的铅笔，一直作为纪念物悬挂在他的图书室里。③王尔德在巡回演讲的旅途中，收到许多仰慕者发来的信件，其中一名崇拜者感谢他作了如此“富有成果的讲座”——它教会“我迄今为止从未在此地听到过的福音，我相信它的效果要比盖一座棉纺厂更好”。④纽约的陶艺家查尔斯·沃克玛认为，王尔德的演讲不仅令他的作品“受益颇多”，而且还在美国的“艺术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判断得到了其他人士的响应。⑤

6 诗人的梦想

做好任何事情，似乎都得花很长时间！

——奥斯卡·王尔德

旅行终于结束了，王尔德并不急于返回英国。还有些计划和有意思的事情需要他在美国多待一段时间。演讲的任务并没有妨碍他对文学方面的各种计划安排保持兴趣。罗德的《玫瑰叶和苹果叶》出版了，王尔德对成品非常满意（罗德喜欢这本书的奢华——初看便写信褒扬了斯托达特）。^①他现在希望能在美国出版一本他母亲的诗集，由约翰·博伊尔·奥赖利作序。但遗憾的是，这个计划后来不了了之。

^②有人向他建议，应该先创办一本自己的美国期刊，然后让他的母亲过来做宣传，但他没有采纳。^③

他真正热衷的事情另有其他。他仍然希望自己能够作为一名剧作家获得成功。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曾经在夏末的时候，请莫尔斯重新寻找一位有可能将《维拉》搬上舞台的女演员或制作人。首先，为了获得美国的版权，王尔德花钱购买了一个新修订版（带“序幕”），以莫尔斯的名义在国会图书馆印刷并登记。他随后将副本寄给女演员罗丝·科格伦，以及纽约和波士顿的剧院经理。然而一个月过去了，他没有得到非常积极的回应。^④

渴望成功的王尔德还着手了一个新的戏剧项目。他很想写一部以文艺复兴时期为背景的莎士比亚式诗剧。他勾勒出一个关于“阿维尼

翁红衣主教”的场景——一个神父对他年轻漂亮的被监护人怀着满腔爱意——甚至还创作了几页对白。但后来他又有了另一个想法。❶整个夏天，王尔德都在寻访倍受欢迎的22岁女演员玛丽·安德森，她在朗布兰奇有一栋度假屋。王尔德在纽约见过安德森，看过她的表演。他对她的才华大为赞赏，据说他描绘她“像一朵山间的雏菊一样纯洁和无畏；像河流一样变化多姿；既温柔，又清新、耀眼、灿烂、华美、平和”。❷他还曾在媒体上说，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这是和女演员交朋友的前奏。❸王尔德想写一个剧本来展示她的才华。这将是一出悲剧——有一位威严的女主角——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为背景。❹

这个故事——关于“弗洛伦丝公爵夫人”（她很快就被改名为“帕多瓦公爵夫人”）和她与一个年轻人不幸的爱情——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王尔德想把安德森拉进其中，坚持要她在“剧本”上共同投入。“所有好的剧本，”他告诉她，“都是诗人的梦想和演员的实践知识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实践知识让人致力于表演，它强化了情境，用描述所产生的诗的效果，代替了生活化的戏剧效果。”❺他们不断地见面讨论。王尔德想尽办法，用他独特的恭维和乐观的热情裹挟着她往前推进：“我希望你能跻身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演员之列，（而且）我丝毫不怀疑我能为你，而且将会为你撰写一个剧本，它为你而创作，从你身上获得了灵感，它将让你得到蕾切尔（19世纪初法国著名女演员）一般的荣耀，而我也许会因此收获（维克多·）雨果一样的名望。”❻王尔德希望通过一番精心设计，促使安德森立即买下剧本，并承诺出演这部剧。然而，尽管她明显对这个主意很着迷，她

的热情却遭到了她的继父兼经纪人汉密尔顿·格里芬劝阻。他绝不会仓促行事。

王尔德整个9月一直在全力对付安德森，给她寄去服装和布景的创意和草图。他还获得了一个新盟友的支持。王尔德在纽约期间结识了颇具远见卓识，且不知疲倦的斯蒂尔·麦凯（剧作家、制作人、教师、剧院经理、发明家兼设计师）。他们经常在弥漫着波希米亚风情的纽约羔羊俱乐部见面。麦凯虽然已经四十出头，但仍然充满青春活力，滔滔不绝的口才甚至可以和王尔德相媲美。他也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在巴黎学过绘画，对舞台设计非常着迷。他还是一个创新者：他的众多戏剧“发明”中包括安全幕布、可翻转座椅、间接照明、可移动舞台和“雾化器”——一种在舞台上造云的机器。由于他在时尚风格方面的判断力要强于经济头脑，因此他的各种商业冒险极少获得成功。1881年，他被恼怒的商业伙伴赶出了自己精心装修的麦迪逊广场剧院。王尔德遇见麦凯时，他正在努力为一座新的“梦想剧院”筹集资金——一个打算建在百老汇和第33街拐角处的巨大的酒店剧院综合体（筹资和建造剧院最终都没有实现）。

这两个人之间结成了一种热切的友谊。麦凯立刻意识到王尔德作为一个剧作家的天才——或潜力。他对创作一部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背景，由玛丽·安德森领衔主演的诗体悲剧的想法感到无比激动，自告奋勇担任设计总监。就安德森而言，她似乎对与麦凯合作的前景感到兴奋。在与“可爱的人儿”和她的监护人“狮鹫格里芬”会面时，王尔德向他们兜售了这个想法。“我告诉他们（王尔德在给麦凯的信中

写道)，你们可能会在别人的诱导之下接受制作过程中的监督和管理……我要解释的是，你们必须对每件事、每一个人都有绝对的控制权。他们同意了。”安德森表示希望在1月22日之前完成制作。她意识到需要华丽的布景和服装。麦凯估计制作成本为1万美元；令王尔德开心的是，安德森宣布她“投入多少资金都愿意”。^⑩

这次会面显然令人满意，但在与“狮鹫”达成明确的协议之前，还是遇到了不可避免的进一步拖延。他是“一个野蛮人”，王尔德抱怨说，与“简单、善良、温顺”的玛丽·安德森相比，他是“一个装腔作势的讨厌鬼，除了喜欢出风头，什么想法都没有”。^⑪王尔德试图通过声称——其中真相尚不清楚——对手演员劳伦斯·巴雷特已经“为这部剧开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报价”来促成此事。^⑫也许是这个策略助推了事情的进展。安德森及时确认了她对这部作品的承诺，但建议将制作时间推迟到下一年9月，以便留出空间使这出戏能够“上演很长一段时间”。^⑬

这是一个小小的挫折。“当然，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耐心的，”王尔德在写给她的信中写道，“但我已经准备好等待一年，以便让我们的这出戏获得应有的成功。”^⑭然而，王尔德和格里芬又花了将近八周时间才“达成协议”。最后双方同意以5000美元成交（授予安德森对这部剧“永久的”完全所有权），王尔德得到1000美元预付款，其余款项将在“安德森小姐”收到并接受这部作品后支付。交付日期也确定下来：格里芬的合同草案上写的是1883年3月1日；王尔德将其推迟到了3月底。王尔德雄心勃勃地想把自己的戏剧搬上专业

舞台，这份合同标志着他朝着实现这个伟大抱负迈出了一大步。他接下来只需要写一篇合同里所谓的“一流的五幕悲剧”。^①

王尔德与安德森的协议，以及他承诺的时间表，使得他搁置了去澳大利亚演讲的计划，至少当时是这样。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因为王尔德的另一份戏剧合同很快就接踵而至。麦凯不满足于为《帕多瓦公爵夫人》做计划，他对《维拉》也很感兴趣。王尔德给了他一份新印刷版的剧本，虽然麦凯认为这部作品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但他对其潜力感到兴奋。他为这出戏接洽了很多女演员。^②最鼓舞人心的回应来自争议不断的年轻女明星玛丽·普雷斯科特。

11月初，29岁的普雷斯科特和她的丈夫威廉·佩泽尔在戴尔莫尼科餐厅与王尔德和麦凯共进早餐，讨论这个项目。她对剧本大加赞赏——尽管和其他人一样，她认为有必要做一些改动。大家提出，准备于第二年在纽约上演这出戏。接下来还需要解决一些合同的细节问题，事实证明佩泽尔是一个比“狮鹫格里芬”更难对付的谈判者，但王尔德似乎得到了这位女演员的“口头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③

冬天临近，王尔德因为戏剧方面的各项计划继续留在美国。他的母亲不知道他是否还打算回家；美国媒体则怀疑他可能不想离开了。10月23日，莉莉·兰特里在美国首次登台，人们确信他还在纽约。他捧着百合花迎接她，并护送她在城里四处游览。开演前一天晚上，公园剧场被大火烧毁，他在旁安慰她。他从兰特里公寓的窗户眺望大火，为它的美丽感到惊艳。^④

随着兰特里的剧团匆忙进驻沃勒克剧院，王尔德受托为《纽约世界报》撰稿，他要写的并非对首映之夜的评论，而是对女主角做一番审美鉴赏。他写了十几段文字颂扬她那张完美的“纯正希腊式”面孔——“庄严的低额，高雅的拱眉；嘴巴呈现雕琢的高贵”等等。对于那些主张“不可能存在绝对完美”的“非利士人”，他反驳说：“现在只有不可能的事情才值得去做！”^⑨

两个朋友再次见面都很开心。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笑声不断。詹姆斯·爱德华·凯利回忆，兰特里取笑了王尔德的“卷发”。^⑩当得知王尔德从斯蒂尔·麦凯那里学习表演时——根据“德尔萨体系”（一种由法国演员弗朗索瓦·德尔萨开发的方法）学习《哈姆雷特》——媒体兴奋地猜测，他可能正在打算以王子的身份出现在兰特里的《奥菲莉亚》中，与她演对手戏。或者像《皆大欢喜》里的奥兰多对罗莎琳德那样。^⑪王尔德夫人为这个想法激动不已。“你会成为迷人的奥兰多，”她告诉他，“试一试。每晚100英镑……奥兰多和罗密欧——你和（兰特里夫人）会是绝佳的拍档。”然而，这个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没有证据表明，王尔德曾经有过任何真正当演员的抱负。^⑫

而且，兰特里很快就被那些在她身边打转的，包裹着权力、金钱和性的一波波男人吸引住了。她与王尔德的关系再次显现出不平衡。她被“不务正业”的追求者包围着，结识了年轻富有的经纪人兼骑手弗雷迪·格布哈特，引发媒体的议论，还和陪同她来美国的亨利埃特·拉布谢尔断绝了关系。在12月初前往波士顿继续她的戏剧巡演之前，她就已经脱离了王尔德的轨道。

不过，王尔德能够用自己不断推进的戏剧计划和纽约生活中的各种事情来让自己分心，获得安慰。亲密无间的波希米亚式聚会替代了他刚到美国时的那种豪华招待会：参观工作室，和诗人、艺术家、演员和作家们一起享用欢乐的俱乐部晚餐。❶山姆·沃德为他争取到了曼哈顿俱乐部的贵宾特权。还有几次文学远足：他和西奥多·蒂尔顿（亨利·沃德·比彻的潜在对手）一起参观了“俯瞰哈德逊河的老房间”，爱伦·坡就是在那里创作了《乌鸦》。❷

即便王尔德不再是以前那个新奇人物，他的外表仍然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随着气温下降，他披上了一件扎眼的“高锁扣大翻领外套”，就像18世纪“奇装异服的年轻人”一样。❸一天晚上，他在大歌剧院“几乎遭到围攻”（“下层青年们”在走廊上“以最可耻的方式对他起哄和喊叫”）；他访问证券交易所却招来“善意的嘲笑”，以至于他不得不从后门溜走。❹他在邦内尔博物馆亲眼见识了“选美比赛”，却没有为任何一名参赛佳丽投票——也许是因为她们都不够“希腊”。❺他和玛丽·詹森调情，这位漂亮的黑发女演员主演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戏剧《贵族与仙女》刚刚在标准剧院开演。❻他又一次访问了费城。❼11月27日，他甚至在纽约帕雷帕厅作了最后一次演讲。❽

最后的两份合同至少在理论上刺激了他的财务状况。约上千人参加了他在纽约的演讲。他在费城逗留期间，从阔绰而具艺术气质的布卢姆菲尔德·摩尔夫人手中获得了她心爱的项目之一“基利永动机公司”的若干股份（尽管王尔德一直希望它们能带来一笔财富，但基利

的发明被证明是一场骗局)。●注他需要钱。租住旅馆或者公寓，每天出去吃饭，晚上大多上剧院看戏，这种生活方式很昂贵。王尔德夏季和秋季的巡回演讲给他带来了超过1000美元的收入——玛丽·安德森也给了他同样多的钱——他的收入大幅增加。●注但他在钱的事情上总是很慷慨，他从《公爵夫人》的预付款中借给麦凯200美元。●注不过，情况可能还会更糟。

12月14日，王尔德被一个年轻人骗去玩了一场有猫腻的骰子游戏，那人假扮成托尼·德雷克塞尔（著名银行家和J.P.摩根的合伙人A.J.德雷克塞尔的儿子）。赢了最初的几轮之后，王尔德开始输钱——为了挽回损失，他输掉了更多。随着午后时光的流逝，他的现金很快就用完了，为了弥补损失，他不得不连续写下三张支票——60美元、100美元和1000美元。正当他在最后一张支票上签字时（终于！），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一边找借口，一边甩掉想和他一起离开的“德雷克塞尔先生”，跳上一辆出租车，飞快驶向麦迪逊广场银行，到那里叫停了那三张待付款的支票。然后他赶到第30街警察局，向同情他的警官坦白承认自己当了回“该死的傻瓜”。当王尔德被领着走过挂着出了名的罪犯照片的“无赖画廊”时，他立即指认出“德雷克塞尔先生”——警官马上就认出了那个臭名昭著的骗子，“饿死鬼乔”·塞利克。警察催促王尔德赶紧起诉，但他拒绝了。他声称自己已经“名气够大了，不想让美国公众知道他被人坑蒙拐骗了一把”。也许是王尔德的坦率和悔过换来了信任，这名警官一反常态地没有向媒体公布这件事情。●注

经历了这桩祸事之后，王尔德的健康也垮了。他患上了“疟疾”，很有可能是在南方旅行时感染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唯美主义的疾病”，但向一名记者承认这“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⑨回家的时间到了。他预定了一张12月27日开往利物浦的“波的尼亚”号船票。

王尔德离开美国之前，有关他与“骗子”发生冲突的传言就已经不胫而走。圣诞前夜，一名记者在戴尔莫尼科餐厅设法接近他，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被骗走了1000美元，王尔德神秘地回答（长时间的抽烟之后）：“我否认损失了1000美元，但如果我真的损失了这笔钱，我也不反对让人知道。”^⑩

在一次告别采访中，一向不友好的《纽约论坛报》声称，王尔德已经承认“他在我们这片野蛮的海滨之地的使命，大体上是失败的”——有一些媒体则欣然支持了这一观点。^⑪但即便王尔德没有真正地改变美国，他也已经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改变了他。他享受了不平凡的一年：经历了旅行，体验了独立，欣赏了全新的景观，获得了新的感知。他不仅实现了“成名”的雄心壮志。他让整个大陆知晓了他的想法。他赚了一大笔钱——花掉了其中的一大部分。他受到了盛情款待。他见到了惠特曼和朗费罗。他还使得两位当红女演员对他的两部戏剧作品产生了兴趣。

第五部分 忠实的朋友

1883～1888年

29～34岁





1884年，奥斯卡·王尔德在怀特岛

1 塞纳河上

我应该去写作——应该去写作。

——奥斯卡·王尔德

回程渡海的经历让人感觉相当难受。王尔德不得不承认，他先前对大西洋的批评“可能有些苛刻”，抵达英国时他很开心。上岸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旅行者的故事，一个个充满“创意，古怪逼真”。他自认为是个凯旋的英雄，他的母亲也这么认为，他在伦敦逗留期间和母亲住在一起。❶埃德温·利维就他的财务状况安排了一次商讨，他的财产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观。他在纽约的最后几个月挥霍无度，回到英国，旧债仍未还清。❷但这笔钱已经足够他按照计划在巴黎逗留一段时间，而且他一旦完成给玛丽·安德森的剧本，还会有更多钱进账。

在伦敦的那几天，他看了“很多吉米（惠斯勒）的作品”，他在美国时曾经支持这位艺术家，或许希望因此而得到认可。当然，他十分招摇醒目地回到了泰特街。尽管他表现出对惠斯勒在威尼斯新创作的蚀刻画（“连上帝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水面风景画”）十分赞赏的样子，但他新近摆出来的“奥林匹亚式的态度”——连同他那身崭新而“奇异的红色毛绒套装”还是激怒了聚在工作室的一些人。

伦内尔·罗德就是其中之一。他已经渐渐感觉到，王尔德一手操办《玫瑰叶和苹果叶》让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对于这本精美的书，

他最初的热情已经转而凝结为怨恨。在他看来，王尔德似乎绑架了这个项目——他过于“热情洋溢”地投身其中，他撰写的序言矫揉造作不切实际，“还有那些怪诞的小插曲”，所有这些都把这本书变成了一种“广告……臭名昭著”。罗德在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些反对意见，并警告王尔德说，他在美国各地的“奢华表演”对自己造成了“伤害”，毫无疑问引起了“极大的冒犯”。对王尔德来说，这看起来简直就是忘恩负义且傲慢无礼。两人都早已心怀不满，再见面只能是怒气冲冲地分手。他们的友谊走到了尽头。王尔德装出一副绝不后悔的样子。他称罗德的绝交信“就像一只可怜巴巴的小红雀在路边啼叫，而我那不可估量的雄心则阔步前进”。王尔德将独自完成“完善英国文艺复兴”的使命。他在那本平凡无奇的书中题写了这样一句格言：“唯一值得创立的流派就是没有信徒的流派。”从今以后，罗德在他眼里就是“真诗人兼假朋友”。^⑩

1月底，王尔德抵达巴黎。在崭新豪华的新大陆酒店小住了一阵后，他在左岸更舒适的伏尔泰旅馆安顿下来，就在卢浮宫对面；这也是1874年他与母亲和兄长一起住过的地方。^⑪他在这间“塞纳河上的小房间”里动笔完成了《帕多瓦公爵夫人》，然后着手修改《维拉》——“这两出戏，”他对母亲的一个朋友说，“（它）听起来野心勃勃，但我们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野心勃勃的时代，我认为世界应当理解我。”为了使这一时刻更加戏剧化，他工作的时候身上穿了件白色的“布尔努斯袍”，一种巴尔扎克曾经穿过的著名的带兜帽的晨衣。这件衣服似乎意在激励他达到巴尔扎克那样的专业和作品高度。事实证明这个方法非常有效。^⑫

《帕多瓦公爵夫人》进展飞快。王尔德通过五幕庄严的无韵诗详细叙述了“罪与爱”的故事，讲述了年轻的公爵夫人对英俊的圭多的淫欲之情；她谋杀了残忍的公爵，她的丈夫；当她因这可怕的行为遭到圭多拒绝时绝望和愤怒；当他允许她把罪责推给自己时，她感到既宽慰又羞愧；她迟到的决定把他从绞刑架上替换下来，让自己走向了死亡——这种自我牺牲的行为促使圭多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最终肯定了他们注定失败的爱情。不断展开的戏剧情节模仿了莎士比亚、弗莱彻，以及雪莱诗剧《钦契一家》(The Cenci)中再三反复的特点。

⑩

尽管背景设定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王尔德还是渴望在该剧中融入“现代生活”的主题（如他所述，“艺术的本质”是“在一种古老的形式下产生现代思想”）。他让公爵夫人成了一名未来的社会改革者，关心城市里的穷人和赤贫阶层。当时正值英国的社会困境日趋加重，公众的同情与日俱增，他认为台词中涉及“陋巷中垂死挣扎的孩子”或“睡在桥拱下的人”，不可能“不博得满堂喝彩”。⑪他还采用了一些“喜剧”元素来活跃这部戏剧。邪恶的公爵——另一个油头粉面的愤世嫉俗者，与《维拉》中的保罗亲王不相上下——滔滔不绝地说着辛辣尖刻的警句：“至于良心，那不过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歪歪斜斜刻在盾牌上的名字”；“她（公爵夫人）比丑陋还要糟糕，她有一副慈悲心肠”；“在别人身上，勤勤恳恳做家务的美德经常是很美的”；以及（也许是采用了作者自己有关大众媒体的经验）“在我们这个乏味而愚蠢的时代，一个人最古怪的事情就是有点头脑，那时候众人都会把他嘲笑”。王尔德迫不及待地想让安德森接受他的作

品，然后让格里芬支付第二笔报酬，他甚至还在台词中诡秘地提到了“格里芬在荒蛮的亚美尼亚看守的金子”。这部作品于3月15日完成，比计划提前两周，立即被寄往蛮荒的美国。

没过多久，王尔德与法国著名演员科克兰共进午餐，他在回答对方问题的时候说：“我的戏剧？它只谈了风格。雨果和莎士比亚两人加在一起，已经用尽了所有的题材；人们再没有创新的可能，哪怕连新的罪行都无法实现；因此，剩不下什么情感，只剩下异乎寻常的形容词。剧本的结局颇具有悲剧性；我的男主角在胜利之际想要说一句警句，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于是他像一个学者那样，被迫发表了不情愿的演讲。”^⑩他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极为重视。

他怀着紧张、兴奋和焦虑的心情，在手稿寄出后紧接着便给安德森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将这部剧描述为“我所有文学作品中的最佳，我青春的杰作”。然后他开始解释——也许过于详细——他的各种创作决定背后的“科学”思维——“喜剧”与“悲剧”的结合（“必须减轻观众的情感压力：如果你不让他们笑，他们就不会哭”）；将“强烈的情感（置于）智力思考的背景之下”；有意识地将“现代”思想引入“古老的形式”。在这封“冗长”书信的结尾处，已经分不清楚他是在努力说服这位女演员，还是他自己，相信这部戏剧的种种优点。最后，他要求安德森用电报把她的决定发到他母亲在伦敦的地址。^⑪

与此同时，他还在忙着《维拉》的事情。玛丽·普雷斯科特现在提议，夏末时在纽约上演这部戏。尽管王尔德在文本方面欣然采纳了她

的许多建议，但他不得不使用类似于他给安德森的理由，说服她不要删掉其中的“喜剧性台词”。他说，“生理学的事实之一”在于，任何“极其强烈的情绪”都需要通过一种与之相反的情绪获得缓和。“成功是一门科学，”他继续道，“如果你具备条件，你就能有所收获。艺术是对美进行感性追求的精确结果。如果不经深思熟虑，就会一无所有。”普雷斯科特急于把所有的“条件”都安排好，她不仅参与了文本的创作，而且还参与了演员挑选、服装和布景的构思。她还从丈夫手里接手了商业谈判，提议预付给王尔德1000美元，以获得该剧的独家代理权，另外每场演出再支付50美元（保证每周演出七场）。这是王尔德准备接受的条件。❶

事情似乎开始步入正轨。王尔德的工作状态很好：精力充沛，满脑子各种计划。他又写了几首“印象”系列诗歌（其中一首是关于孩子们在杜伊勒里花园里玩气球），以及一首《黄色交响曲》，将它们寄给《世界》杂志。然而，令他失望的是，耶茨——“再三考虑”——之后，反对发表这些作品。“考虑再三是非常危险的，”王尔德说，“因为这些想法通常都很不错。”❷王尔德又回到了夏天在美国编织的童话故事中，他还起草了一个“真实的儿童故事”并将它寄给多萝西·坦南特——希望她能提供插图。他认为，她的作品恰到好处地结合了“幻想”与“真实”、“精致”与“直白”，“那正是童话故事所要求的”。她被这个故事迷住了，但计划中的合作没有任何结果。❸

王尔德的法语本来就很好，现在又有了提高。他开始用法语撰写格言：“诗歌是理想化的语法”；“诗歌艺术家和诗人；两种非常不同的事物：参见戈蒂耶和雨果”。^⑩他写给母亲的信是用法语写的，至少她说，这些信“堪比巴尔扎克的作品”——“如此纯正而流利”。^⑪事实上，王尔德接触巴尔扎克的小说始于美国，而且仍在继续。这是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读过《人间喜剧》之后，”王尔德后来称，“人们开始相信，真正的人是那些从未存在过的人……巴尔扎克不断地把我们活着的朋友变成影子，把我们熟悉的人变成影子中的影子。”^⑫他特别崇拜吕西安·德·吕邦泼雷，这位外表俊秀的未来诗人初到巴黎，对文学事业充满希冀，却在黑社会的诱惑下，背叛他的朋友和家人，经历了短暂的成功之后，最后在监狱里自杀，终了一生。王尔德称吕西安的死是“我一生中遭遇的最大悲剧之一”——“一件我从未能解脱出来的伤心事。它在我快乐的时刻纠缠着我。当我欢笑时，我就想起它来。”^⑬

巴尔扎克式的晨衣并不是王尔德在当季唯一购置的服饰。他开始模仿吕西安的“优雅”着装，模仿19世纪30年代花花公子的装束和举止——他的裤子和衣袖收得那么紧，引得路人议论纷纷。他甚至像巴尔扎克一样，拄着一根顶上镶着绿松石的象牙手杖。他彻底改变了外形，他在巴黎期间实现了其中的一部分。受到卢浮宫尼禄半身像的启发，他剪了同款样式的发型并烫了卷。他让人以为，他曾经特地带理发师去仔细观察过那尊雕塑。他认为，结果堪称巨大成功：他的新形象的外在象征——奥林匹克演说家、成功的剧作家和印象派诗

人。“第一阶段的奥斯卡已经死了，”他宣布道，“我们如今关心的是第二阶段的奥斯卡。”^⑨

随着剧本交稿的压力解除，以及春天临近，王尔德更多地参与了社交活动。他到达巴黎时随身带着若干封推荐信——还有几本《诗集》——从现在开始他要物尽其用了。令人敬畏的美国社交名媛、女主人凯特·摩尔让他神魂颠倒。他受邀参加了各种文学沙龙、展览开幕式和晚宴。他收到一份令人欣喜的邀请，去拜访伟大的文学家，爱德蒙·德·龚古尔。惠斯勒的朋友、艺术批评家泰奥多尔·迪雷帮他铺就了这条道路，除此之外还有王尔德自己的礼物《诗集》，以及一同附上给“《拉福斯坦》作者”的一封充满溢美之词的信。龚古尔对八卦消息十分上瘾，他被王尔德讲述的伦敦文学圈故事逗得乐不可支——在日记中写道：“他描述了斯温伯恩……如何尽其所能地让他的同胞们相信他的鸡奸和兽性行为，却绝不是个鸡奸者或兽交者。”龚古尔对王尔德自己的性别身份很感兴趣，将其归类为“性取向不确定” (au sexe douteux)。^⑩

王尔德在画家和绘画作品上投入了大把时间。他可能甚至打算去学习绘画，尽管此事似乎最后不了了之。惠斯勒的鼎鼎大名使他得以进入巴黎艺术界的印象派圈子。他参加了一场朱塞佩·德·尼蒂斯（一位创作精致都市街景的画家）举办的招待会。宴会上，他倚着墙上的挂毯，站在华丽的大烛台下，与卡米尔·毕沙罗、让-夏尔·卡赞谈论绘画，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就连以言语尖刻而闻名的德加也愿意倾听他说话。尽管他认为打扮一新的王尔德看起来就像某个在乡村剧院里扮

演拜伦勋爵的人，但他对王尔德颇为赞赏，并邀请他去自己的画室。

⑨

王尔德经常和旅法美国艺术家约翰·辛格·萨金特见面。他们一起在左岸用餐，萨金特在餐厅的“相册”上为他和作家保罗·布尔热画了一幅素描。⑩他和雅克-埃米尔·布兰奇结伴参观画廊；这位人脉颇广的年轻画家是沃尔特·西克特的朋友，他满心讨好地展示了一幅画，画中的女人在读王尔德的《诗集》。⑪那年春天，西克特本人也来到巴黎，他此行是带着惠斯勒的画作《灰与黑的协奏曲》（《艺术家的母亲》）去沙龙送展。“记住，不再是以沃尔特·西克特的名字出游”，惠斯勒如此向王尔德解释道。西克特现在是一个使者：“当然，他令人惊叹——难道他不是神奇人物的代表吗？”两人同住在伏尔泰酒店。他们谈论艺术时，西克特引用了德加的一句评论：“还有比中产阶级更可怕的——就是那种模仿我们的人。”王尔德在他的摘记簿中记下了这句话。⑫

对王尔德颇有用处的各种人脉当中，还包括伯恩-琼斯当年的缪斯女神、美丽而富有的玛丽亚·卡萨维蒂·赞巴科。王尔德在1877年的格罗夫纳画廊评论中曾经这样描述她——她是伯恩-琼斯的作品《梅林的诱惑》中维维安的原型模特——“高大、轻盈……美丽，看起来头脑敏锐，像一条蛇”。她住在巴黎，和罗丹一起学习雕塑。年轻的艺术家和作家——包括萨金特和布尔热——都围拢在她身边。在一次宴会上，王尔德遇到一位22岁的英国人，名叫罗伯特·谢拉德。他长得引人注目，个子高高的，蓝眼睛，五官端正，宽眉毛，长长的金发。王

尔德起初以为他是乐队的一分子：“拉大提琴的赫尔·舒尔茨”但他很快就醒悟了。

王尔德兴致勃勃地讲述他如何在卢浮宫度过快乐时光，反复品味“米洛的维纳斯”的美丽，然而谢拉德却直率地回应称自己对艺术毫无兴趣：“我从未去过卢浮宫。”他声称，“人们提到这个名字时，我总是想到卢浮宫百货大楼，在那里我可以买到全巴黎最便宜的领带。”他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已经“科学地”琢磨出了一个可能使他感兴趣的姿态。 注 注

异国的城市生活充满各种令人兴奋的事情，王尔德身处其中很想有个同伴，而谢拉德似乎可以担当。他（像弗兰克·迈尔斯一样）是一个富有的圣公会牧师的儿子，放弃了牛津大学的学业来到巴黎写作。迄今为止，他在文学上的主要地位是作为威廉·华兹华斯的曾孙，不过他刚刚写完一部小说，正在忙着写一本诗集，偶尔还向出版社投稿。他因为得不到父亲的支持而被切断了经济来源，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但他渴望与文学界人士交往。他把阿尔封斯·都德当成朋友，他也可以说是维克多·雨果的熟人。初次见面后的第二天晚上，王尔德邀请谢拉德到图尔农大街富丽堂皇的富瓦约餐厅吃饭。王尔德每天都在期待着玛丽·安德森的4000美元，他宣称：“今晚我们在与公爵夫人共进晚餐。”从这个第一次之后，在接下来的六周里，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吃饭和见面。 注

谢拉德喜欢把自己表现为一个阴郁的加尔文主义者，由王尔德这个“快乐的凯尔特人”来照亮他，让他变得更快活。但是，虽然这幅

场景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它无法传达出年轻的谢拉德作为一个人，其气质和魅力是多么招人喜爱。有同时代的人说他“英俊得无与伦比”，另有人称他是“金发男子气概的卓越典范”。他的面容和他的故事为他增添了一种传奇色彩。如果有人认为他像在劫难逃的诗人查特顿，他鼓励这种想法。他还很有活力。他有时会显得笨拙和粗鲁，但他也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很棒的人……特别见多识广，能就任何可以想象到的话题进行滔滔不绝地交流……给他的亲密伙伴不断带来快乐和惊喜”。^①王尔德理所当然觉得他既“可爱”又趣味盎然；他的描写能力是罕见的（“带着色彩，带着喜悦”），他们都有“对美的渴望”。^②

但如果谢拉德想做王尔德的朋友，他就必须承认自己的身份是一个追随者。他们第二次见面时，谢拉德去王尔德下榻的旅馆，在他的房间里欣赏河对岸的景色。王尔德曾说过这样的话表明他的立场：“哦，那完全无关紧要，除了旅店老板，他要收账单。一个绅士是从不会眺望窗外的。”^③王尔德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后，便带着谢拉德去逐步享受巴黎的快乐——宴会、午餐、剧院、短途旅行、晚餐。总是王尔德付钱，谢拉德揣摩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常常心血来潮地赠送礼物。谢拉德十分欣赏王尔德书桌上一幅皮维·德·夏凡纳画作的复制品——一个形象古怪的年轻裸女，于一片苍翠碧绿的乡村图景中坐在“她解开的裹尸布”上——王尔德立刻就把这幅画送给谢拉德，并在画作的饰边上写下缪塞的箴言，“只有美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并且建议“用带有朱砂色窄边的灰色纸板为它做框”，这幅画也许会十分好看。^④

他们到歌舞剧院的化妆室看望正在那里演出的莎拉·伯恩哈特；见到伦敦的老朋友她很开心。后来他们去维里埃大街登门造访了伯恩哈特的家，令谢拉德颇为难忘的是当时有一位年长的剧作家竟然称呼他为“大师”。王尔德觉得这位老哥相当“乏味”——这是当季他表示不满时，最喜欢使用的形容词。他们又一起拜访了王尔德的理发师。新的“尼禄式发型”几乎每天都需要打理。谢拉德在他的说服之下卷起了“蜂蜜色”的头发，但只此一回。①作为对所有这些恩惠的回报，谢拉德把王尔德带到了维克多·雨果的家中。王尔德用他精心排练过的斯温伯恩的奇闻轶事，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耄耋老人雨果却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客人；他一直坐在炉边的椅子上打瞌睡。②

据谢拉德回忆，在那几个星期里，两个人脑子里“除了文学什么都没有”；它主导了他们所有的思想和讨论。王尔德送给他的新朋友一本《玫瑰叶和苹果叶》，希望他能欣赏这些诗以及其中的“跋”。他还为他找到了一本关于诗人热拉尔·德·内瓦尔的小书。他们都非常喜爱这位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他曾经带着一只系在蓝丝带上的龙虾在皇家花园穿行。③他们还谈到其他的诗人，先于他们的时代已经逝去的诗人；谈到了查特顿和坡的作品，尤其是写下《恶之花》的诗人波德莱尔。④

王尔德——通过研究斯温伯恩——已经注意到波德莱尔的魅力，但现在，回到巴黎，他重新埋头研究起这位诗人来：他的诗歌、他的生活和他的思想。他满怀欣赏地向谢拉德津津乐道地讲述《腐尸》和

《凶手的酒》中病态的恐怖，以及《音乐》中庄严的韵律。❶他再次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观点，即艺术家可以将从前因邪恶或丑陋而被排除在考虑之外的主题，通过艺术使其变美。

那年春天，他写下的格言警句中有这样一句话：“希腊人发现‘美丽的是美丽的’，我们却说‘丑的也很帅气’。”他还记录了一段与科克兰见面时交流的内容：

科克兰：文明是什么？王尔德先生。

王尔德：对美好事物的热爱。

科克兰：什么是美好的事物？

王尔德：中产阶级认为丑陋的东西。

科克兰：中产阶级认为什么算是美好的东西？

王尔德：那种东西并不存在。❷

这些都是谢拉德难以理解的观点。他们第一次共进晚餐后，谢拉德故意把雪茄烟头按在沾满咖啡的茶碟里，问这种行为中有没有“美”？他回忆说，王尔德无精打采的回答背后难得地“闪过一丝不愉快”：“哦，当然。它创造了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褐色。”丑陋之美是王尔德想要去探索，而不愿予以解释的一种悖论。❸

王尔德并不孤单。曾经同他在左岸的咖啡馆桌边对话的布尔热，刚刚出版了《当代心理学文集》，布尔热在其中认为，波德莱尔对巴

黎新兴一代诗人和作家产生了显著影响。他可以为王尔德展示这种新的艺术倾向的详细情况。在《恶之花》那种暗黑氛围和堕落形式，以及戈蒂耶为该书1868年版（当时唯一的印刷版）所作的著名序言的鼓动之下，一场运动渐渐显露出来。戈蒂耶曾在他的评论中将波德莱尔的诗歌措辞描述为“颓废的风格”——“一种巧妙的、复杂的、博学的、充满意义和研究色彩的风格，总是把语言的极限推向更高的境界”——一种完美地适用于表达现代精神中不断变化的情绪、过于微妙的感觉和“奇异幻觉”的风格。戈蒂耶将其比作“后罗马帝国的语言，已呈现出解体过程中的生涩现象……是民族生存和文明发展所必须的和历史注定的语言风格，因为这时人为的生活已经取代了自然的生活，并且在一个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的人那里发展了这种风格”。^②

对于那些聚集在黑猫夜总会，一边喝着苦艾酒，一边讨论作品，狂热迷恋波德莱尔的年轻诗人来说，这些思想极具吸引力。“颓废”成了他们的口号和理想。他们吸取采纳这部作品中显而易见的悲观主义和神经过敏、其风格的复杂性以及对堕落的迷恋。他们从龚古尔的小说中找到它，颂扬它，他们还在保罗·魏尔伦笔下的诗歌和人物中也发现了它。39岁的魏尔伦——秃顶，长着一张色狼脸，酗酒而且是同性恋——最近刚刚结束十多年的自我放逐回到巴黎。他发现，人们对他19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三本早期波德莱尔风格诗歌集的记忆，还不如对他与年轻的阿蒂尔·兰波之间激情澎湃、注定失败的风流往事的印象来得清晰。他被年轻的“颓废派”热切地吸引住了。他们鼓励他写作，并出版了他的诗歌。

一天晚上，王尔德和谢拉德在法兰西第一咖啡馆见到了魏尔伦，魏尔伦喜欢那里的苦艾酒。尽管王尔德对这位法国诗人怀着——努力保持着——巨大的敬意，但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却没有聊出什么名堂。王尔德对魏尔伦灰头土脸的落魄样子感到非常失望，而他自己才思泉涌的谈吐竟然浪费在这么一个天真烂漫的法国诗人身上。对魏尔伦来说，王尔德没有把他那看上去十分昂贵的香烟递过来，这让他很生气。 ①

新近出版了《神经官能症》(Les Névroses)的诗人莫里斯·罗利纳倒是没有那么令人沮丧，但更令人担忧。他是黑猫夜总会的常客，他——憔悴、苍白，披着一头拖把似的乱糟糟的黑发——坐在钢琴边为自己伴奏，同时朗诵着关于谋杀、强奸、盗窃、弑父、性、亵渎、疾病和活埋的诗歌。有些人认为他甚至比波德莱尔还要更胜一筹。他既是一个瘾君子，又是一个恶魔。王尔德饶有兴趣地带着钦佩之情读了他的诗，渐渐地被诗人“垮掉的个性”迷住了。 ②

见面之后，王尔德记录下若干罗利纳的话：“我不相信进步：但我相信人的反常会停滞”；“美好的事物只有一种形式，但是每个人对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表达；因此，诗人是无法被人理解的”；“我需要梦想和虚幻的事物；我欣赏日本的椅子，就因为它们不是用来给人坐的”。他还喜欢罗利纳的观念，即“音乐延续了诗歌之美，但放弃了诗歌的思想”。 ③

王尔德邀请罗利纳和谢拉德到伏尔泰旅馆的房间共进晚餐；饭后，他邀请罗利纳朗诵那首令人毛骨悚然的《特罗普曼的独白》

(Soliloque de Troppmann)——充满想象地再现了连环杀手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的种种想法。罗利纳狂野的手势和不断升级的紧张兴奋感，让这场表演显得格外恐怖。王尔德非常喜欢这种场合。而谢拉德认为，罗利纳的表现是一种故意为之的自我毁灭，他对此深感不安。他不明白，王尔德为什么不出面制止。第二天早晨，两人走过艺术桥时，他问：“如果你看到这里有人投河自沉，你会追过去吗？”“我觉得那么做是一种粗暴无礼的行为。”王尔德如此答道。②②

在波德莱尔和颓废者们的普遍影响下，王尔德再次提出想要写一首关于斯芬克斯（他将其拼写为“Sphynx”）的诗。他上次访问巴黎住在伏尔泰旅馆时就已经写了个开头，现在又回到那里，以一种自觉的颓废方式来重塑这首作品，诗歌中充满了宝石般的多音节词、可怕的形象、色情的暗示和隐晦的暗示。

布尔热曾经在他的《颓废理论》中说，“一种颓废的风格”会使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书页的统一性让位于句子的独立性，句子让位于词语的独立性”。王尔德欣然接受这种思想。他一向为文字本身的缘故而喜爱它们，津津乐道于它们的读音，从中获得感官上的乐趣。他和爱伦·坡一样，相信文字的“音乐价值”大于“智力价值”。

《斯芬克斯》——像爱伦·坡的《乌鸦》——也是一首由奇异铿锵的文字所主导的诗歌。

王 尔 德 把 这 些 词 罗 列 在 一 起 —— “ 安 米 纳 尔 克 ” (amenalk)、 “ 变 色 龙 ” (chameleon)、 “ 角 鹰 兽 ” (hippogryph)——接着再将它们——安插在合适的地方。他辛辛

苦苦地埋头干着这桩活儿，俨然是个文字工匠。然后，当他走在林荫大道上时，他还要在心里默诵并且重新安排那些响亮的词句。令谢拉德吃惊的是，他说韵脚词典“是一个对写作抒情诗很有用的附属工具”——尽管他希望他的朋友对这个游戏亦能有所贡献。“为什么，”他会在两人见面时提出要求，“你没有从帕西(Passy)给我带来韵脚？”让谢拉德感到开心自豪的是，他想出了一个王尔德想要的，以“ar”结尾的三个音节单词“nenuphar”（睡莲）。它被如愿以偿地摆放在对句的末尾：

庞大的神牛啊，可曾跳下车辇在你的脚边献上簇簇睡莲？

大大的花团啊，蜜一样的色彩，蜜一般的香甜。 ⑨

王尔德仍然沉溺于颓废模式，但是从幻境转向了现代都市的肮脏现实，他创作了《妓女的房子》——在其中，欲望的交易被演化为木偶表演的死亡之舞：

像奇怪的机械的滑稽画，

变幻着不定的舞姿，

黑影快速来往于窗帘之后。

巴黎是一座充满性和罪恶的城市，但王尔德似乎把他所有的情欲能量都倾注在了他的诗歌里。让谢拉德大为吃惊的是，在他们相处的六周时间里，王尔德似乎只发生过一次性行为——一天晚上在伊甸园音乐厅挑选了一名妓女。第二天，谢拉德来到伏尔泰旅馆时，王尔德

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罗伯特，我们都是怎样的兽类啊。”对王尔德来说，性——狮身人面像的秘密——似乎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你唤醒了我内心的种种兽欲，你让我成了我不愿成为的人。”

●注●注

因为手头拮据，王尔德没有去饭店款待罗利纳，而是在伏尔泰旅馆招待了他。到4月底，他已经花光了在美国期间挣到的钱。他持有的基利永动机公司股票也没有什么盼头。●注而且他仍没有收到玛丽·安德森关于“巴利-帕多瓦公爵夫人”（威利如此称呼）的回信。为了推进解决这个问题，他给女演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她作出决定。●注

当天晚些时候，他收到了回复，当时谢拉德也在伏尔泰旅馆。两人午饭后坐着抽烟时，收到一份小巧精致的海外电报。王尔德读电报的时候面无表情——只是从纸上撕下一小片，把它揉成一团，塞进嘴里，这是他阅读时经常做的一个无意识的动作。然后他把电报递给谢拉德，说道：“罗伯特，这太乏味了。”安德森拒绝了手稿。这是一个可怕的逆转。他在这出戏上寄托了如此之多的希望和期待——既有艺术上的，也有经济上的——是安德森和格里芬鼓舞了他；他在手稿上花了那么多心血。但是，如果自尊心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也能承受。他立刻转移话题，不再提起电报的事情。●注

不过，那天晚上他们不打算“与公爵夫人共进晚餐”了。王尔德提议去吃一顿实惠的“齐默餐馆的腌白菜马铃薯炖肉”。但谢拉德出于对朋友的同情，坚持认为王尔德必须——就这一次——作为他的客人去“河对岸的一个服务还是不错的餐馆”。随后，他领着王尔德

穿过曲曲折折的小路，进了巴黎咖啡馆的侧门。直到两人挤进金光闪闪的豪华大厅时，王尔德才意识到自己身在哪里。他说：“真是个很棒的小餐馆。”整个晚上，他们一直在讲这个笑话，把这家豪华餐馆当作一家不起眼的酒庄。接着他们去了女神游乐园，谢拉德在那里定了个包厢。但没过几分钟，王尔德就提议离开那里。他觉得有太多的眼睛在盯着他。“有些时候，”他说，“包厢就是枷锁。”这是他唯一一次表现出沮丧的迹象。❶

几天后，安德森的信件寄到，证实了她的决定。她把剧本寄还到王尔德在伦敦的住址。“在任何情况下，”她告诉他，“我都不能在合同中提到的时间出演你的剧本……我恐怕，照目前这个样子，这部戏剧无法像《威尼斯幸免于难》❷或《卢克雷齐娅·波吉亚》❸那样赢取今日的公众。我们两人如今都无法承受失败，如果我出演你的公爵夫人，它将不会获得成功，因为这个角色不适合我。我一如既往地钦佩你的非凡才干。希望你能理解我在这件事上的感受。”❹

他刻意用一种“古老的形式”来展现“现代思想”，然而令人恼火的是，他竟被告知其效果只不过类似复辟悲剧和维克多·雨果的早期作品，和它们一样守旧陈腐，无法搬上舞台。批评是严厉的。王尔德拒绝承认这一点。他对自己的剧本和才华太过自信了。他真的相信《帕多瓦公爵夫人》是他青春的杰作。❺安德森的拒绝也许打击了他的自尊心，但他会恢复过来。她在信中暗示了这出戏的前景，它在她手里不会成功——因为这个角色不适合她。王尔德必须找到其他更合适的人手来接受挑战。然而，这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而且与此

同时，他还要面对一笔预期中的4000美元（800英镑）突如其来的不可挽回的“损失”。王尔德在巴黎的文学生涯也将走到尽头。

虽然他还有希望在8月见到《维拉》上演，但他开始考虑其他可行的赚钱办法。他的面前始终摆放着各种支出计划：他以一贯的慷慨资助谢拉德回到英国处理家庭危机。王尔德再次提出了演讲的想法。这是他迄今为止取得最大成功的领域。今年晚些时候，《维拉》在纽约上演后，他有可能赴澳大利亚进行一次巡回演讲。但他也意识到，演讲或许也可以安排在英国。

至于演讲的主题，王尔德还在美国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可以他在美国的经历为基础发表讲话，后来这个主意随着他穿越大西洋回到了英国。在巴黎期间，他开始整理那些美国轶事。和龚古尔在德·尼蒂斯家再次见面时，他讲述了自己在美国西部见识的诸多“荒诞怪事”。

① 在一场由“钢笔和铅笔俱乐部”外籍记者和艺术家举办的晚宴上，王尔德发表了一篇关于大西洋彼岸生活的饭后演讲，令所有人“轰然大笑”。当晚最火的亮点是莱德维尔酒吧里发生的故事，以及里面那块劝诫人的告示牌“请不要射杀钢琴师；他已经尽力了”。② 各大报纸上很快就传开了，王尔德正在“为英国听众准备一场演讲”。③

2 第一出戏

没关系，奥斯卡，其他伟人也遭遇过重大失败。

——威利·王尔德

5月中旬回到伦敦，王尔德不顾自己经济状况不佳，仍然续租了他原先在查尔斯街住过的房子。为了尽快筹集到一些资金，他给斯蒂尔·麦凯写了封信，热情洋溢地叙述了《帕多瓦公爵夫人》——没有提到玛丽·安德森拒绝这部作品——并请他归还之前借走的200美元。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但他或许不太可能要回了这笔钱。作为一种更有效的权宜之计，他当掉了伯克利金牌，这可能并不是第一次。❷

王尔德准备投资创作自己的戏剧。他花钱印刷了20本《公爵夫人》；扉页上描述自己是“《维拉》等作品的作者”，这部戏是“16世纪的悲剧，写于19世纪的巴黎”。左上角有个“Op.II”标记。他寄出这些剧本，希望能收到对制作感兴趣的回复，却没有立即得到回应。即便劳伦斯·巴雷特确实在前一年表示对这部剧感兴趣，但他现在并没有继续跟进。目前唯一的回复来自画家米莱，他写道：“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您的剧本，我敢肯定，如果它被搬上舞台，一定会获得成功。情节和描述都令人钦佩，但其中许多部分的对话还有待改善。”❸

王尔德不愿意让这些挫折削弱他自信的姿态。他又一头扎进了伦敦生活的“华丽漩涡”。他离开首都快一年半了，决心迎头赶上。他

往来于各种“家宴”、茶话会、招待会和舞会。他与惠斯勒共进早餐，与乔治·刘易斯共进晚餐，参加为亨利·欧文举行的宴会。❶“我努力工作，却无所事事，”他告诉谢拉德，“深夜和饥饿的明天一个接着一个。”至于社交圈，他说：“必须让他们大吃一惊，我的尼禄式发型已经让他们大吃一惊了。”❷劳拉·特鲁布里奇强忍惊讶：“（王尔德）长得特别胖，”她在日记中写道，“一张巨大的脸，满头细密的卷发——一点儿也不像他过去看上去那么有审美品味的样子。”他对他的新做派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他非常有趣，说话很巧妙，但那只是独角戏，而不是谈话交流……我想，他很粗俗，我想象着，他用一种诗意的姿态懒洋洋地四处闲逛，身上穿着皱巴巴的衬衫，袖口翻在外套袖子外面！”❸有些人准备打断他的独角戏。一次招待会上，作家奥古斯都·黑尔饶有兴味地注意到，当王尔德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自己“打算让人大吃一惊”时，年迈的邓肯·斯图尔特夫人打断了他。她平心静气地说：“可怜的、亲爱的，愚蠢的孩子！你怎么能说这种胡话呢？”❹

王尔德在社交旋涡中发现了康斯坦斯·劳埃德。在他前往美国，以及后来暂住巴黎期间，王尔德夫人一直谨慎地保持着和劳埃德家人的联系。康斯坦斯和她的哥哥奥索曾经参加过几次王尔德夫人的“家宴”。奥索发现这种场合相当不合常规，但他确实注意到女主人喜欢上了他的妹妹，而且——“她尽管有那么多古怪之处”——却是“女孩子们的知心朋友……尤其是（像康斯坦斯那样）有头脑的女孩”。❶5月中旬，在王尔德夫人组织的一次沙龙上，奥斯卡再次见到了康斯坦斯。两人之间立刻恢复了过去那种融洽的关系。“奥斯卡·王尔德

与康斯坦斯进行了长谈，”奥索写道，“像往常一样，谈的都是些关于艺术和风景的话题。”王尔德提到“那个如此可怕的地方”时，把奥索逗乐了：“瑞士，其丑陋的群山让它显得那么粗俗，全部非黑即白，就像一张巨幅的照片。”^①

这样的见面很快就一次接着一次，有时在帕克街，有时在劳埃德家。他们甚至还一起参加了“渔业展览会”，王尔德表现得热情洋溢。那天晚上，康斯坦斯在和姑姑共进晚餐时说：“嘉莉姑姑，跟一个才子相处了三个半小时之后，见到你是多么令人高兴。”^②王尔德夫人全力支持这种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她给“亲爱的康斯坦斯”写信，确认她会参加随后的星期六沙龙（“我喜欢有人来装饰我的房间”）；不过她偶尔也会因为奥斯卡冷落其他客人，只盯着漂亮的劳埃德小姐说话而感到恼火。大家注意到，两人没在一起说话时，他的一双眼睛就会尾随着她在房间里四处转悠。^③

“如果这个男人不是奥斯卡·王尔德，”奥索说，“人们可能会认为，他爱上了她。”毫无疑问，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但奥索是个反应特别迟钝的哥哥，他没能读懂种种迹象。“我不相信他有什么目的；他对待所有自己感兴趣的姑娘都这样；康斯坦斯后来告诉我，他们俩在任何问题上都达不成共识。”^④

尽管王尔德喜欢说，促使他爱上康斯坦斯的原因之一是“她几乎从不说话，（所以）我总是想知道她的想法是什么”——事实上，她表达意见时虽然声音不大，嗓门不高，但态度直截了当。她并不赞赏王尔德当下从巴黎获得的灵感想法，她对他说：“恐怕你我对艺术的

看法不一致；因为我认为没有完美的道德就没有完美的艺术，而你说它们是不同的，是可以分离的东西。”^⑨但即便他们在艺术的目的上存在分歧，两人对艺术的重要性的看法是一致的。康斯坦斯和奥斯卡一样，对“艺术和美的事物”怀有强烈的“乐趣”。这种乐趣，以及她“对形式和色彩的敏锐感觉”，体现在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她的穿衣品味到她创作的漂亮刺绣品。^⑩

王尔德当时特别热衷于讨论艺术。他同意在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俱乐部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讲，诺曼·福布斯-罗伯逊的弟弟埃里克是俱乐部的秘书。这是一个面向大学本科生的非正式场合，王尔德重读了佩特的作品，聆听了惠斯勒建议，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⑪

6月30日晚，他向“年轻的画家听众”（一家报纸这么称呼他们）展示了他对“现代艺术培训”的一番振奋人心的愿景：“是什么造就了一个艺术家，艺术家又创造了什么，艺术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如何，艺术家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一件好的艺术作品该有怎样的品质？”他阐述的愿景是为了艺术而创造艺术。

他对年轻的听众们说：“作为画家，你所画的并不是事物真实的样子，而是它们看上去的样子；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是事物不存在的面目。”“非利士人时代的标志，”他告诉他们，“是反对艺术的不道德呼声。”文化民族主义从此爆发，“英国的艺术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表达。我们不如谈谈英国的数学”。专门化的主题纷纷遭到抨击（“所有这些分类，比如动物画家、风景画家、描画英格兰迷雾中苏格兰牛的画家、专门画苏格兰迷雾中英格蘭牛的画家、赛马画家、

斗牛犬画家”），同样受抨击的还有“让人惊叹‘多么奇妙’的考古画、让人感叹‘多么有趣’的感性画，以及所有那些无法当即给人带来艺术上的快乐，并大呼‘多么漂亮’的绘画作品”。而惠斯勒则被笼统地称为“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永远的大师”。

王尔德谈到“对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事物就其自身而言是美的或丑的”，这时候他开始即兴发挥，展开了罗斯金式的文字描绘，因为任何场景或物体都有可能被艺术家的视觉和光的效果所改变：

即便是高尔街，这条伦敦最单调乏味、苍白无趣的大街之一，也有些许非常美丽的时刻。我记得，我从一个聚会回家，穿过这条街，那时候天刚破晓，它的样貌十分迷人，我被那番景象深深打动了。柔和朦胧的晨雾呈现出一派金色和紫色的氛围，使它的轮廓变得柔和，使它的影子变幻多样，阳光将它穿透成一条条长长的金色光柱，屋顶像熔化的银子一样闪闪发光，朱红色的邮筒像宝石一样耀眼。这简直是一幅仙境般的美景。

他以帕特里安式的断言总结道：“一幅画除了美丽没有任何意义，除了欢愉没有传递出任何信息。这是你绝不能忽视的关于艺术的第一个真理。一幅绘画仅仅是一件装饰物。”^①

尽管媒体注意到王尔德“绝妙古怪的哲学”“从学术角度来看相当离经叛道”，但这场演讲将格言警句和幽默风趣结合在一起，深受

学生们的喜爱。❶它既为王尔德计划在下一周发表的公开演讲做了准备，也为它造了声势。

从巴黎回来后，王尔德欣喜地发现他的美国巡回演讲经理莫尔斯上校最近搬到了伦敦。两人在莫尔斯办公室见面，讨论了王尔德在英国巡回演讲的想法。他们决定，为了测试市场，应该先在伦敦办个一次性的讲座，不谈艺术，而是谈谈他“对美国的个人印象”。演讲定于7月10日（星期四）晚上8点半在皮卡迪利大街王子大厅举行。王尔德努力把一切成功的条件都准备好，一遍遍地背诵材料，排练表演。他曾经在美国因为嗓音问题而屡屡受到批评，于是他向赫尔曼·维津请教了发音吐字方面的问题。他告诉这位演员：“我想请你帮忙。我希望能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演讲，稍微带一点感情就行。”“哦，”维津答道，“奥斯卡，你还没有学会那一手吗？”❷

这次活动的门票很贵，价格是半畿尼。但即便如此，奥斯卡·王尔德首次在英国的讲坛上亮相还是吸引了一大群人，可容纳600人的大厅几乎满座。观众被视为“具有非常时尚和明确的审美，特别是其中的女性”。惠斯勒相当引人注目，“像一只蟋蟀一样”跳来跳去，“整个大厅里到处都是他的身影”。❸当王尔德大步走上讲台时——迟到了大约20分钟——人们并没有看见唯美主义的齐膝马裤、天鹅绒外套和一头长发，人群中有些人感到一丝失望。与之相反，他穿着传统的晚礼服，只是裤子很紧，袖口很长，纽扣很精致。人们认为他配上新的卷发发型，看上去“活脱脱就像摄政王”。❹

王尔德如今是个十分自信的表演者，既放松又自然；他时常看两眼笔记但不会照本宣科。事实上，他的讲话不太像演讲，而更像是“一种微妙的、有哲学意味的全方位交流，有时色彩夸张，有时异想天开，整体结构模糊，充满了强烈的个人兴趣和一种暗藏的爱尔兰式风趣”。^②他讲述了自己在新约、芝加哥、旧金山的华人社区，以及与盐湖城的摩门教徒之间的经历。他又讲了一遍莱德维尔矿工的故事和尼亚加拉瀑布令人失望的老笑话。他赞扬了美国的机械之美，还有美国妇女的智慧力量。他感叹美国的风景单调乏味（“它的范围是如此辽阔，仿佛大自然已经绝望到极点，放弃了装饰这片原野的任务”），以及这个民族对典礼仪式的冷漠（“在整个访问期间，我只看到两支游行队伍，一次是消防队前面走着警察，另一次是警察前面走着消防队”）。他形容美国女孩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暴君……是现实常识的广袤沙漠中的一些不合常理的小绿洲”——美国男人们完全只关心生意：“游手好闲在他们身上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是与我们同在的一门艺术。”

大厅里笑声不断：他形容普通的美国火车“其私密程度就像坐在皮卡迪利大街中心的一把扶手椅上”；一个小男孩想卖给他一袋花生，并且说：“你买一点儿……我还从来没有把花生卖给过一个诗人呢”；他拒绝在一个名叫格里格斯维尔的小镇上发表有关“美”的演讲，因为“这个名字太丑了”，而且“居民们拒绝改名”。^③人们饶有兴趣地听着他对美国民主的看法，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但即便一向支持他的《世界》杂志也认为，演讲“有点太长了”。差不多过了两个小时——临近11时——人们开始陆续离开。王尔德迅速掌握形势，

匆忙得出了激动人心的结论：美国是“一个能够教会我们‘自由’之美和‘解放’之价值的国家”。

尽管演讲结束得有点仓促，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受欢迎。一篇颇有特色的评论称赞它“相当的‘奥斯卡·王尔德’……它似是而非、大胆创新，像讽刺短诗一般，充满精彩的故事、生动的描述，时常没来由地幽默一下，（并且）含有大量的第一手信息”。^⑩然而，王尔德总有本事招来两极分化的意见。有些媒体坚持要对演讲进行负面报道。

^⑪然而，其中最具敌意的评论竟然来自一个或许出人意料的地方：拉布谢尔的《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充满怨恨的长篇评论《奥斯卡的退场》。文中先描述王尔德“在旺季的时候，向着空荡荡的长椅做演讲”是个“可悲的崩溃实例”，随后便开始不怀好意地说起了他的职业生涯：在牛津，他是一个“兼有两性特征的青年”和“女里女气的高谈阔论者”，他是“伦敦各家客厅里的临时笑柄，是美国讲堂里的嘲弄对象，是波希米亚巴黎的失败者”。这本杂志称，王子大厅的“惨败”必然标志着终点：“玩笑已经结束了；从陶管里吹出的五彩缤纷的肥皂泡破裂了。”^⑫

先前支持他的拉布谢尔发起如此攻击，究竟是反映了新兴的新闻行业想要欲擒故纵，还是体现了拉布谢尔夫人因莉莉·兰特里在美国的所作所为而与王尔德产生了裂痕，我们不得而知。这篇文章对王尔德来说无疑是一个烦恼，尽管他说，如果拉布谢尔需要用三栏文字来证明他已经被遗忘，“那么成名和无名之间也就没什么区别了”。^⑬

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王尔德的演讲是成功的。正如莫尔斯所预测的那样，它引发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需求。他向一家“机构”发出了一份“计划书”，最初收到的回应让这位上校倍感振奋，他告诉王尔德，可以“预见到接下来的活儿会相当不错，而且价钱合理”——每晚10到25畿尼不等。那个月的晚些时候，王尔德匆忙安排了几次讲话，与此同时，《维拉》即将在美国举行首演，等他助阵归来后，要为秋冬季节制定一份完整的时间表。①

8月初，王尔德北上利物浦。他在那里遇到了刚刚从美国胜利归来——获得了丰厚回报——的莉莉·兰特里。王尔德送她一束玫瑰。他原本肯定希望，她会将自己在戏剧上获得的成功多少归功一点儿于他。第二天，他登上了开往纽约的“大不列颠”号轮船。②

跨越大洋的旅程令人愉快。乘客中有一群牛津校友，包括古西·克雷威尔和圣约翰·布罗德里克。布罗德里克在给乔治·寇松的信中描述王尔德是“这趟航行中的活力和灵魂。他一路上给我讲的故事十分有趣，妙语连珠，悖论和警句层出不穷，而他始终表现得和蔼友善，因此也会被自己的荒谬理论和古怪想法逗得大笑不已……整个旅行过程中，和他在一起时，我笑个不停，包括对他的嘲笑，我想我从未笑得如此过瘾”。其间也有较为严肃的场合，王尔德在为利物浦孤儿院举办的船上音乐会中朗诵了他的诗歌《万福，女王》。③

王尔德于8月11日抵达纽约，入住布伦瑞克酒店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记者们的欢迎。他们被他崭新的、改进过的外表所吸引——有人称之为“像一个理性的人”。在这次航行途中，他的头发又经历了一

次修改：它不再卷曲，现在变得又短又直，稀疏了一些——美国媒体称之为——“砰”地贴在前额上。有人注意到，原来的天鹅绒马裤已经换成了“普通裤子”；即便“拜伦风格的领口、围巾和钻石别针”也无法完全掩盖其浑身上下给人的传统印象。❷

王尔德立即着手推进他的剧本，这出戏定于8月20日在联合广场剧院上演。人们以为他从英国带来了这出戏的布景——“‘玉米地’和其他所有场景等等”，但他打破了这些猜想。不过他承认，自己带来的是“一些布景和服装的设计图”，以及一些用来为普雷斯科特小姐制作服装的朱红色丝绸。他声称自己无法在英国上演这部剧，因为“它触及了政治题材”；但由于“美国人是不抱偏见的”，因而希望能够在美国收获不错的反响。展望未来，他提到自己最近完成了《帕多瓦公爵夫人》——并对其未来的制作怀有无比的期待。遗憾的是，因为要在英国演讲，他只能在美国待“几周时间”。但他希望能访问纽波特，并在皮克斯基尔再次见到亨利·沃德·比彻。❸

王尔德急于“监督”《维拉》的排练。他认识到，剧本仍有可能需要做出修改。“一部优秀的戏剧几乎永远不会结束，”他对《纽约世界报》说，“它必须适合在舞台上表演。仅仅做音乐是不够的；必须创作出乐器能演奏的音乐。”普雷斯科特搜罗到一批非常好用的“乐器”：威严的乔治·博尼法斯扮演沙皇；颇受欢迎的喜剧演员爱德华·兰姆饰演保罗亲王；出生于牙买加的帅哥刘易斯·莫里森饰演浪漫的沙皇长子。❹

佩泽尔（玛丽·普雷斯科特的丈夫）声称，已经在服装和布景上投入了近1万美元，其中最奢侈的是第二幕的黄色丝绸会议厅。❶这出戏在推广方面也没少下功夫。整个城市“从一头到另一头都被印上了”花里胡哨的“奥斯卡·王尔德形象”图案，还有普雷斯科特小姐坐在八匹马拉的雪橇上，一边挥舞着温彻斯特连发步枪，一边“飞来飞去”的画面。❷报纸上出现了昂贵的印刷广告；这出戏现在被命名为《虚无主义者维拉》。❸王尔德给普雷斯科特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表达了他对这部作品的高瞻远瞩，以及对她担任主角所感到的“骄傲和快乐”，这封信被刊登在《纽约世界报》上。一时间这出戏“一票难求”。❹一切似乎都很顺利。那一周对于8月中旬的纽约来说“非同寻常地凉爽”，非常适合去剧院看戏。王尔德的许多时髦朋友也都纷纷回到城里观看演出。❺

但是首演当天，天气变了。“室内温度”一下子飙升到“95华氏度”，并且一直居高不下。8月20日星期一晚上，“大量观众”挤进闷热的剧院。尽管天气热得令人窒息，但开场时一切顺利。戏一开场，维拉正在父亲简陋的客栈里干活，看到她的哥哥被锁链铐着押往西伯利亚的盐矿，于是决心成为一名民意党人。这段开场白以其幽默的语气和“激动人心的高潮”被认为“强而有力”。王尔德第一次在舞台上看到自己的作品，感到有些紧张。他所设想的人物与普雷斯科特等演员在表演中呈现出来的样子，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❶然而，观众似乎并不像他那么焦虑。在第一幕结尾（场景设定在民意党人的巢穴中），人们高呼“作者！”第二幕结束后（保罗亲王在黄色丝绸会议厅里喋喋不休地吟诵警句）欢呼声再次响起，王尔德走上

舞台鞠躬致谢。直到第四幕（也就是最后一幕），观众仍然保持着“挑剔，但赞许的态度”。然而，戏的激情高潮部分——维拉身穿“火焰一般的朱红色长袍”，向亚历克西斯表白后举刀刺向自己——却被认为“不仅不体面……而且引发了整个剧院里的窃窃私语”。台下响起一片嘘声。但即便如此，这个小插曲似乎只出现了一次。幕布落下时，王尔德再次上台“发表了一段颇受欢迎的演讲”。那天晚上离开剧院时，他觉得这部戏总体上是成功的。其他人也赞同这个观点。❶

他收获了众多赞美之词，其中就有莉莉·兰特里的旧情人弗雷迪·格布哈特，他从纽波特赶来观看了演出。“我亲爱的奥斯卡——祝贺你的戏剧取得巨大成功。我太喜欢它了，所以马上就给我们亲爱的莉莉拍了电报。”❷然而，与这份慷慨赞扬同时送来的还有各种晨报。新闻界就没那么友善了：“这出戏不真实，冗长而令人厌倦”（《纽约时报》）；“一个关于爱情、阴谋和政治，添油加醋的愚蠢故事……比失败强不了多少”（《纽约论坛报》）；“长篇大论，夸张的废话，一系列断断续续的台词和令人作呕的咆哮，带着一种粗俗而平庸的小聪明”（《纽约先驱报》）；“这出戏情节荒谬，服装和布景不协调，废话连篇，毫无意义”（《纽约太阳报》）。❸

这是一个可怕的、致命的打击。不管怎样，《纽约世界报》认为——尽管最后一幕有缺点——“这出戏开场不错……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明显的优点”；或者说，保罗亲王的角色得到了很多有保留的认可。❹媒体的大合唱中夹杂着明显的敌意，而且——在王尔德看来

——还有不公正。观众们喜欢这出戏。然而，纽约的评论家们以“没有中间立场”而闻名；他们要么把一出戏“捧到天上，要么把它贬到被人遗忘的无底深渊”。《维拉》坠入了这条分界线的深渊一边。有传言说，一些评论家收到老板的命令，要他们“无论如何”谴责这部戏。但《波士顿舵手报》认为，这是普雷斯科特小姐演技“低劣”铸成的错；弗兰克·莱斯利夫人谴责了那条朱红色裙子。⑩

艺术家詹姆斯·凯利8月21日上午到布伦瑞克酒店，发现王尔德正心烦意乱地读着一堆日报。“我试着尽可能说一些支持（这出戏）的话，”他回忆道，“但是没法让他高兴起来——他被伤得太深了。他指着那些攻击他的文章，哽咽着说：‘凯利，凯利，这是我的第一个剧本！’”⑪

尽管王尔德和普雷斯科特没有对这些说法进行反驳，但还是竭尽全力减轻损失。王尔德接受采访时说，“尽管有人批评《维拉》，但这出戏获得了成功”——但同时他也承认其时间过长，并宣布会“立即”做删减。⑫ 普雷斯科特在给《纽约时报》的信中引用了她收到的“几位社会贤达”和文学界人士的“若干信件”，这些人为纽约评论家如此对待王尔德而感到“愤慨”。他们寻求各种支持：劳伦斯·巴雷特称该剧“是个奇迹”；斯蒂尔·麦凯对它充满热情。⑬ 一名友善的记者被说服在《纽约镜报》上发表文章，谴责了报纸的嘲笑，并坚称这部戏是“多年来舞台对文学的最崇高贡献”。⑭

这些举动不但激怒了纽约的新闻界——他们持续不断地对这出戏及其困境进行贬损性的评论——而且并没有起到鼓舞公众的作用。观

众迅速减少。及至星期六晚上，票房收入已不到150美元，而首演当晚几乎达到900美元。普雷斯科特和佩泽尔损失惨重。他们已经向剧院预定了为期三周的演出，但眼下却搞不清楚这出戏能否继续上演。星期一，他们和王尔德商讨——等剧作家从科尼岛回来之后——建议如果王尔德愿意在其中担任某种角色，他们或许能够让这出戏起死回生——要么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要么在幕间做一次演讲。他明智地拒绝了这个提议。那天晚上戏没有上演。❷

第二天，纽约的媒体纷纷报道了撤演的事情，消息迅速传回伦敦。英国报纸已经摘要刊登了一些最糟糕的美国评论。当第一批记者前来打探他的反应时，王尔德设法回避。“啊哈，”他对他们说，“可我正在吃早餐呢，你们没看见吗？”但保持冷静并不容易。这出戏的失败是一种痛苦且十分公开的耻辱。❸他离开牛津大学以来为之奋斗的一切，走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写了一个剧本，却失败了——败得很壮观，很可怕。

王尔德在美国待了一个月。他访问了纽波特和萨拉托加。但与前一年夏天的兴奋乐观相比，这次的经历必然是痛苦的。他受邀和朋友去安大略省的荒野度假——他很有可能真的去了。❹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事情，能让他分散因《维拉》的失败而导致的痛苦，与托马斯·爱迪生的会面便是其中之一。王尔德前一年在美国时曾经告诉莫尔斯，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是他最想见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爱默生。爱默生已经去世。詹姆斯·凯利在爱迪生位于第五大道的办公室为王尔德安排了一次面谈。

这是一次舒适的会面，三个人以及爱迪生的助手塞缪尔·英萨尔随意地挤在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凯利回忆起爱迪生——他一向欣赏王尔德的诗歌作品——转身对诗人（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说，“我以前见过你”，然后便开始谈论起王尔德的戏剧：

聊了没多久，王尔德的情绪便好了许多，他说：“迪翁·鲍西考尔特告诉我，‘奥斯卡，从你写剧本的方式来看，需要埃德温·布斯、亨利·欧文、莎拉·伯恩哈特、埃伦·特丽和艾达·里恩来演绎它；你太依赖演员了。现在，我写剧本时，如果主角病了，或者在任何方面让我感到失望，我就叫一名引座员过来——如果他能重复我的台词，这出戏就成了。’”爱迪生听了开怀大笑，向我眨了眨眼睛，又向王尔德晃了晃脑袋，说道：“他在骗人，他在骗人，他在骗人！”接下来，王尔德兴致勃勃地说了许多，爱迪生开心地聊着，英萨尔认真地评论着，直至我们告别分手；我们走下门廊时，王尔德陷入了一种伤感的沉默，他或许在想，他与爱迪生的命运是何其不同。

他们默默地走着，在富兰克林广场车站分手。王尔德要去布鲁克林。凯利最后一眼看到他时，他正独自坐在地铁车厢里：“他在往前看。”可是，他在看什么呢？

3 风云人物

人生的浪漫在于，一个人可以爱那么多人，却只能娶一个人。

——奥斯卡·王尔德

《纽约太阳报》兴高采烈地宣布，王尔德的“厄运”在美国已成定局。一家讽刺报纸刊登了整版漫画，送别这位即将横渡大西洋打道回府的剧作家。画面的一边是这位来了不到二十个月，风度翩翩的年轻美学家，与之并列的是一个灰头土脸、正偷偷溜出这个国家的人，他腋下还夹着一份破旧的《维拉》。英国媒体也同样喜上眉梢。《笨拙》杂志宣称，他的剧本“糟糕透顶”；阿尔弗雷德·布赖恩曾于1881年为《世界》杂志画过一幅包括王尔德在内的“年度人物”，这次他为《幕间》(Entr'acte)杂志所作的漫画上，王尔德倒在威利的怀中，他的兄长正在安慰他：其他“伟人”也都遭遇过“重大失败”。^①只有一家报纸为此鸣不平，指出“这种欢欣鼓舞的态度”，就好像王尔德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终于被定罪了”。^②

王尔德于1883年9月下旬回到英国，他至少可以让自己埋头忙于排得满满的一整个演讲季。这次的行程不像在美国巡回演讲时那么充满魅力和新奇感，却让他有一种使命感。按照计划，他要在年底之前完成60次演讲。第一场安排在旺兹沃斯市政厅（9月24日），其余大部分时间都远离伦敦——从埃克塞特到阿伯丁，从黑斯廷斯到伯肯黑德。那年10月，奥索·劳埃德在王尔德难得回到首都的那几天里见到了他。奥索写道：“他还在演讲，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不过是以

有趣的方式，今天他在布莱顿，明天他在爱丁堡，后天他出现在康沃尔郡的彭赞斯，然后是都柏林；他对此大笑不已，说他已经把这些事情交给了经理去打点。” ⑩ 王尔德的描述中有一些习惯性的夸张——但他所走过的路程确是惊人的，这是对维多利亚时代辽阔的铁路网的一种致敬。 ⑪ 一路上，他靠一本袖珍小字典和一卷海涅的作品学习德语，以此打发乏味的旅行时间。 ⑫

除了“对美国的个人印象”，王尔德还可以讲“美丽的房子”——这是他在美国旅行期间酝酿而成的有关家居装饰和着装的实用指南，这次稍微做了些改动。《维拉》的失败——如果说它损害了他在伦敦的声誉的话——并没有破坏他在英国各个地方城市的吸引力：他在大多数地方得到了很好的接待，受到了正面的关注。人们也许是出于好奇“想看看那个备受热议的‘奥斯卡’究竟是什么样子”，然而大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他的“飞扬文采”、他的智慧、他的新发型和他的幽默大加赞赏。 ⑬ 演讲报酬取决于场地的大小，以及莫尔斯达成的协议：有时候是固定酬劳，有时是总收入的某个百分比。王尔德从他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的演讲中（尽管听众很难对付）拿走了一笔可观的24英镑3先令9便士；而他在韦茅斯仅赚得3英镑。尽管如此，到10月中旬，除去开支后，王尔德已经赚到了令人相当满意的91英镑9先令。 ⑭

回到伦敦领取这笔钱后，王尔德就可以去见康斯坦斯了。她参加了他母亲的星期六沙龙，第二天他拜访了她祖父家。尽管康斯坦斯即将起程去都柏林拜访阿特金森家和亨普希尔家的亲戚，要在那里待很

长一段时间，但任何分离都是短暂的。王尔德计划11月在爱尔兰首都演讲。他们可以在那里见面。 ⑨

他向她吐露了对《维拉》的失望之情，给她一本私印的剧本，请她谈谈自己对这出戏的意见。她从都柏林寄来了一封慷慨、慎重、非常诚挚的慰问信，赞扬了该剧“具有很好的戏剧性情境”，以及对自由“热情洋溢”的呼唤——而不是那些风趣的桥段。“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你是这么不幸，没能够让这部戏获得好评，除非是表演太拙劣了，要么就是观众不认同剧中表达的政治观点。”她把自己放在他的辩护立场上，她建议道：“无疑，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是令人痛苦的；我觉得我们要么放弃自己的观点，随波逐流，要么完全无视这个世界，不顾一切走自己的路。与现存的偏见作斗争毫无用处，因为我们只会在这场斗争中被击败。” ⑩

康斯坦斯对王尔德变得很重要。11月21日他刚到都柏林，便立刻被吸引到她的轨道上。他在旅馆看到一张便条，邀请他到伊利广场的阿特金森家，于是他马不停蹄地出发了。康斯坦斯告诉她的哥哥，他“明显相当做作，我猜想部分原因是出于紧张”——但是，他还是让自己表现得“非常愉快”。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继续向她的家人示好，来喝茶，并为全家人预订了一个剧院包厢。康斯坦斯和表兄妹们聆听了他的两次讲座（都是日场），相比话语机智的“对美国的个人印象”，他们更喜欢充满实用智慧的“美丽的房子”。 ⑪ 尽管康斯坦斯在写给奥索的信中狡黠地提到，她的表妹斯坦霍普·亨普希尔“用

奥斯卡·王尔德的事情来取笑我的生活，这是多么愚蠢的废话”，但每个人都清楚，王尔德的专注殷勤中表现出了追求者的姿态。❶

王尔德11月26日要在施鲁斯伯里演讲，所以时间有限。11月25日，星期日，他在伊利广场的客厅里求婚，康斯坦斯立刻接受了他。她写信告诉哥哥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说自己“开心极了”。都柏林的表亲们也分享了她的快乐。“玛丽妈妈”认为她“非常幸运”。康斯坦斯对自己“冷漠而实际”的家庭，尤其是艾米莉姑妈，有些担心。但她希望能得到奥索的支持，以及祖父的认可——“因为他见到奥斯卡的时候总是很开心”。❷

奥斯卡打算从施鲁斯伯里写信给霍雷肖·劳埃德以及奥索和康斯坦斯的母亲，然后趁着周末两次讲座的间歇到伦敦找各个家庭成员谈一谈。❸他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极为高兴”，对“这对恋人”的幸福满怀憧憬，并为康斯坦斯的资源可能带来的稳定生活感到兴奋：“你们的未来会是多么愉快。你这一生要做些什么？会生活在什么地方？.....我希望你在伦敦有一幢小房子，过着文人的生活，教康斯坦斯修订校样，最终入选国会。”❹威利也热情高涨。“亲爱的老小孩，”他写道，“这真是好消息，出色的消息，明智的消息，总之，从最高、最富有艺术感的层面上来说，这真是令人陶醉，棒极了.....她美丽可爱，讨人喜欢，一切都是甜蜜的，恰到好处。”❺康斯坦斯的母亲斯温伯恩-金夫人也同意这桩婚事，她给奥斯卡回信说，有他这么个女婿是多么令人高兴。❻

情意绵绵的书信在身居两地的恋人之间频繁往来。求婚刚过去两天，康斯坦斯写道：

我亲爱的奥斯卡，刚刚收到你的来信，你的信总是让我欣喜若狂，让我更加急切地想见到你。我再一次感觉到你是我的，你爱我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我该怎么给你回信呢？它们太美了，我无法用任何语言来形容，我只能整天梦见你，似乎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的秘密，他们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我是多么爱你，我的爱。

她把奥斯卡称作她的“英雄”，她的“上帝”。^①

两人沉浸在激情中，但还有一些困难需要克服。康斯坦斯给哥哥去信宣布了订婚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但对方在回信中对王尔德作为求婚者表示怀疑，并提到了一些他听说的对王尔德不利的事情。这确实令人遗憾，而且——如康斯坦斯所言——“相当不合时宜”：“我不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但即使他有什么罪证，现在来影响我也为时已晚。我不允许任何事情把我们分开……就算是为了我吧，因为我的幸福依赖于此，请你不要反对它。”^②他确实没有反对，而且还慷慨写信给王尔德，欢迎这个“新的兄弟”。^③

康斯坦斯的祖父霍雷肖·劳埃德确实很喜欢王尔德，他收到王尔德的信后，决心予以支持，但是有一定的条件。他病得无法亲自提笔写信，便吩咐艾米莉姑妈转达他的意见。她在回信中告诉王尔德，老人“自己并不反对你成为康斯坦斯的丈夫。他相信你和她很般配。他相信你会善待她……但作为她的监护人，他认为应该向你提出一两个

问题……他想知道你靠什么供养妻子……（还有）你是否负有债务”。在得知这些情况后，他会“经考虑后予以同意”。^⑩

12月1日和2日的周末，王尔德中断旅行（从纽卡斯尔）来到伦敦；康斯坦斯同时从都柏林赶了回来。星期六晚上，王尔德受邀去她祖父家，与奥索和艾米莉姑妈共进晚餐。第二天他回到兰开斯特街进一步讨论未来的计划和愿景。^⑪王尔德随后写信给霍雷肖·劳埃德，向他坦白告知了自己的财务状况，并承认欠有大约1500英镑（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债务。他的铺张浪费理所当然令人担忧，但这与他的勤奋和雄心是相匹配的。他说，目前已经还了300英镑，并指着当前的收入和满满当当排到第二年的演讲计划表示，自己有能力偿还债务。^⑫也许，他当时谈到了对《帕多瓦公爵夫人》的展望——甚至还有《维拉》在美国巡回演出的希望。霍雷肖·劳埃德多少有点放了心。^⑬

他想尽自己所能帮助这对年轻的恋人。康斯坦斯的幸福是他的第一考虑，他认为她和王尔德在一起会很幸福。当时，康斯坦斯每年可以从祖父那里得到250英镑的零用钱，一旦祖父去世，她可以继承一部分遗产。他建议提前实施这一安排，将5000英镑存入信托基金，这样康斯坦斯每年可立即获得约400英镑的收入。这是一个慷慨的举动。^⑭对债务缠身、收入不稳定的王尔德来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解脱。这似乎让他看到了一种没有眼前财务忧虑的生活前景。

然而，王尔德并不能抛开忧虑。婚礼的日期尚未确定，康斯坦斯的祖父建议至少要等到王尔德偿付了另外300英镑的债务之后再举

行。王尔德充满自信，认为在即将到来的4月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⑨

他周游全国，“教化各地”的同时，与康斯坦斯有关的各种幸福计划和幻想一直支配着他的思想。他全身心地做着“聪明的恋人们所做的一切愚蠢的事情”。他经常给她写信，每天给她发两次电报。他会在两次演讲的间歇迅速赶回伦敦去看她，有时甚至为了和爱人共度一个夜晚而放弃晚餐。他送给她一枚自己设计的订婚戒指：围成心形的钻石内镶嵌着两颗珍珠。相聚总是欢喜，离别难免伤感。“我亲爱的，”康斯坦斯在一次短暂的见面后写道，“我为自己的愚蠢感到抱歉。你让我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除了爱你以外，什么也做不了。我无法抗拒对你即将离开的恐惧……我知道你只离开三天时间。” ⑩

王尔德似乎向康斯坦斯坦白了他过去的几段恋情——弗洛伦丝·巴尔科姆、莉莉·兰特里，甚至可能还有维奥莱特·亨特和海蒂·克罗克。他得到了慷慨的宽恕。“我觉得我永远不会心怀嫉妒，当然，目前我不妒忌任何人：我现在是相信你的；我愿意让过去灰飞烟灭，它不属于我：我们的未来将充满信任和信心。当你成为我的丈夫，我会用爱和忠诚的锁链把你牢牢系住，这样，只要我还能爱你，还能抚慰你，你就永远不会离开我，或者爱上任何人。” ⑪

12月初，王尔德要结婚的消息首次出现在《世界》杂志上（毫无疑问，是威利透露的），并迅速在新闻界传播开来。⑫12月中旬，在月底正式公布消息之前，媒体上开始出现准新娘的名字。王尔德已经

习惯于被“连篇累牍地报道”，但对康斯坦斯来说，发现自己成为这么多庸俗报纸的猜测对象——关于她嫁妆的多少，她的艺术品味，以及她有多大的机会能获得幸福——一定感到极为震惊；一家报纸非常不看好他们，理由是“要取悦奥斯卡，仅仅是人间佳丽还不够”。^⑨

王尔德那年的最后一次演讲在水晶宫举行。康斯坦斯陪着姑妈玛丽·纳皮尔去了现场。之后是一段圣诞节假期，王尔德能够在伦敦小住几天，和康斯坦斯在一起。他们晚上多半一起去看戏。在圣詹姆斯剧院，演员们在幕间休息时从幕布后面瞥见了“伯恩桑”和他的准新娘。^⑩

惠斯勒对王尔德的幸福感同身受。他坚持要为康斯坦斯主持一次星期日早餐。不过，艾米莉姨妈认为这种放荡不羁的聚会不适合一个“未婚少女”，她是否能参加尚有些疑问。但在王尔德的请求下，艾米莉姨妈放弃了反对意见，条件是此事不能够成为“类似活动的一个先例”，并且奥索应作为她的伴护陪同前往。^⑪

康斯坦斯很快就接受了惠斯勒的重要地位，但王尔德在写给沃尔多·斯托里的信中开玩笑地称“她相当完美，只是她不认为吉米是古往今来唯一真正的画家：她想从后门把提香或某个人领进来”。他继续写道：“她知道我是最伟大的诗人，因此在文学领域，她是没有问题的：我已经向她解释过，你是最伟大的雕塑家：艺术方面的教导只能到此为止了。”^⑫所有见过王尔德的人都被他的快乐和兴奋所打动。与西克特夫妇共度节礼日那天，他无意间将两枚金币落在了椅子上。

西克特太太写信给他道：“我很想责备你这么粗心，但你是太幸福了，不会在意什么严厉的教训，所以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⑩

王尔德原本计划在新的一年里重新开始演讲，并进行为期两周半的爱尔兰之旅。他送给康斯坦斯一只宠物狢猴，可以在他离开期间陪伴她；为了进一步向惠斯勒致敬，它被起名为“吉米”。 ⑪然而这只狢猴不到一周就死了，“我感到孤独和痛苦，”1月4日康斯坦斯写信给王尔德，“你给我的一切东西都过早夭折了，这是我的错吗？我觉得它没受什么痛苦，因为它看上去很漂亮。” ⑫然而，王尔德仍然陶醉在爱人的美丽中。1884年1月末他写信给在美国的莉莉·兰特里，告诉她——先巧妙地恭维了她新近在戏剧上获得的成功——自己即将“娶一位庄重、小巧，长着一双紫罗兰色眼睛的小阿尔忒弥斯(Artemis)，她浓密的棕色卷发使得她那花一样的头颅像花朵一样低垂下来，她那美妙的象牙色双手，弹起钢琴来是如此美妙，就连小鸟也停止了歌唱来聆听她的琴声”。兰特里已经听说了这件婚事，但仍为他亲自证实这个消息感到高兴。 ⑬

从1月下半月到3月底，王尔德几乎马不停蹄地在不列颠群岛演讲，很少有机会见到紫罗兰色眼睛的阿尔忒弥斯。他只得借大自然的美来安慰自己。2月，他在英格兰湖区及其周边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在卡莱尔、沃金顿、科克茅斯、玛丽波特和阿尔弗斯顿举行演讲）。这是他从诗歌中读到过，也曾经听罗斯金描述过的风景，后者就住在科尼斯顿。王尔德趁着演讲间隙游览了凯西克，参观完当地的艺术学校之后，校长带他来到德文特湖边散步。

当地报纸报道了他的热情回应。“这景象，”他说，“很可爱。”他非常高兴能见到洛多尔瀑布，罗伯特·骚塞在那首令人愉快的拟声诗中所写的，正是这倾泻而下的水幕。他想，当时的气氛“正好适合欣赏这样的风景。这个湖大得刚好可以容得下美景。美国的湖泊就像大海，让人看不见陆地，还有残酷的暴风雨会击沉船只”。他宣称：“所有风景美丽的地方都应该有开放的步行道，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是，认为一旦允许公众进入私人领地，他们就会成为无情的财产破坏者。他仔细地询问铁路项目是否会破坏美丽的风景，虽然没有就此给出直截了当的意见，但他说，‘坐在一等车厢里，一路欣赏着车外的美景，一定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情’，他觉得人在完全自在安逸的状态下，会得到更好的享受。”^②

王尔德一刻不停的演讲确实让公众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至少在外地，他仍然是“唯美主义的使徒”。他的“使命”——他喜欢这样称呼它——并非毫无效果。唯美主义的设计思想逐渐开始产生影响并扩散开来。有人回忆，他在盖恩斯伯勒的演讲结束后，“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被人从后门扔了出去”。他激发一些居民迷上了“自由式”家具，并且开始替他们的家选购类似的家具。^③涂料制造商西奥多·曼德和妻子听了王尔德在伍尔弗汉普顿有关“美丽的房子”的演讲之后，便开始改造自己的怀特威克庄园，将其变成了一座莫里斯面料和工艺美术设计的美学展馆。

然而在伦敦，王尔德基本上被视为一个社交人物：一个有趣的“会说聪明话的人”。尽管人们承认他与众不同、很有意思而

且“本质上很时髦”，但他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和他焕然一新的打扮似乎表明，他已经放弃了年轻人的奢华铺张，“并且接受了现实生活”。至少当年5月，当他以优雅的漫画形象出现在署名“猿猴”（Ape）所作的《名利场》杂志著名的“风云人物”系列中时，人们是这么认为的。①文中除了提到他“有点令人吃惊”的1881年诗集——以及一笔带过地提及他“创作过一部戏剧”之外——这篇简短的配文几乎不会让人想到，王尔德实际上是一个作家。

的确，由于不间断地在各地演讲，要始终坚持文学抱负的确不是一桩易事。他挤出时间创作了一首爱情小诗，刊登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一场慈善活动的小册子里。②他还在继续寻找能够出演《帕多瓦公爵夫人》的人，甚至还从女演员艾达·卡文迪什那里得到了积极的、略带自谦的回应。③但是，她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健康状况又不稳定，这就意味着计划不能马上实施。一次，年轻的演员兼剧团总监考特尼·索普询问王尔德，问他能否为即将到来的夏季写一部“强有力的戏剧……穿着现代服饰——小型的演员阵容”。④写一部现代时装剧的想法显然很有吸引力。王尔德曾向一位纽约的朋友透露，他想“写一部喜剧”，但“想不出来哪个经理能够将它搬上舞台”。⑤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人可能对这样的作品感兴趣。但王尔德的日程安排太紧张了，几乎没有时间进行严肃的创作。

此外，王尔德仅有的少许闲暇时间也都被各种婚礼计划占据了。日子飞快地从4月一下子滑到了5月底。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要把它当成一次审美活动。王尔德在他关于“美丽的房子”的演讲中，提到

了女性服装的主题，呼吁大家采用“更多的色彩和亮度”、更简单的线条，反对穿着束身衣，装饰人造花，要避免“所有无用的、累赘的蝴蝶结、荷叶边、各种打结以及其他类似毫无意义的东西”。随后他列举了“古希腊服饰”，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卡罗尔时代和“盖恩斯伯勒时期”的服装作为例子。①他很期待这些想法能得到呈现，因此参与设计了康斯坦斯的婚纱和六位伴娘的礼服。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因为康斯坦斯对时装很感兴趣，她是裁缝阿德琳·内特尔希普身边能干的助手，后者是画家约翰·内特尔希普的妻子。②

还有一些未来婚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待解决。他们要住在哪里？王尔德想回到切尔西，3月底的时候康斯坦斯告诉朋友们：“我们一直在泰特街看一座房子，我想我们很可能把它租下来。”泰特街16号是新排屋项目的一部分，往南是惠斯勒的工作室（弗兰克·迈尔斯仍住在泰特街）。他们及时缴纳了一笔保证金，签下了为期21年的租约。③

王尔德请惠斯勒为新房子设计一个装饰方案，但惠斯勒说：“不成，奥斯卡，你一直在给我们讲美丽的房子；现在机会来了，展示一个给我们看看。”④王尔德当然有他自己的想法，但他还是争取到了戈德温的帮助，来改进这些想法并将其付诸实施。他们精心设计了内置家具、稀罕的织物和有趣的饰面。他们很快就明显觉察到，还需要更多的现金。婚礼前的几周，王尔德——非但没有减少债务——想办法从康斯坦斯的信托基金借出1000英镑，承诺到时候连同利息一起偿还。⑤可能就是在这笔交易的过程中，王尔德告诉劳埃德家的律师哈

格罗夫先生，他不确定什么时候能还上这笔钱，“但我可以给您写一首十四行诗，如果您认为它能管点儿用的话”。^②

婚礼于5月29日（星期四）下午在离兰开斯特街不远，苏塞克斯花园的圣詹姆斯教堂举行。^③为避免人群聚集，他们没有向媒体公布婚礼的时间和地点。受邀的客人纷纷收到了特别的入场券。霍雷肖·劳埃德因为病重无法出席。“关于婚礼，可以记录的只有这么多，”《世界》杂志故意轻描淡写地报道，“新娘在六位漂亮伴娘的陪伴下，看上去十分迷人，奥斯卡表现得镇定而威严；所有和这件事最密切相关的人看上去都非常开心。一小群至交在查令十字街目睹他们远去。”

这篇报道中没有提到——其他媒体也没有提到——惠斯勒发来的电报：“恐怕我不能及时赶到参加婚礼。别等我。”^④其中没有提及伯恩-琼斯及其家人、乔治·刘易斯夫妇，以及伯纳德·比尔夫人是否出现在宾客中，也没有提及约50名坚持要求参加婚礼的当地教区居民。

《世界》杂志没有透露婚礼上的着装细节：新娘身穿优雅简洁的缎面礼服——一抹浅浅的“樱草色”——高高的飞边领子配蓬松的“威尼斯风格”袖子；两位年纪最小的伴娘——“模仿约书亚·雷诺兹”——身着“令人惊讶但很有美感的熟醋栗色礼服，系着黄色腰带”；四位大一点的女孩在“淡蓝色花朵的雪纺外面，穿着浅红色的丝绸裙”。报道中没有描述康斯坦斯围着她的那条精致的银腰带——“新郎的礼物”，也没有描述她手指上新颖独特的结婚戒指。它们更没有提及其中暗示的各种古典元素：极为古典的“桃金娘花

冠”（一种比传统的橙色花朵“更具诗意”的装饰）上连接着番红色面纱（正如“希腊少女在婚礼上戴的”那种）。报道中也没有提到王尔德夫人身上那件光彩夺目的灰色礼服，以及奥斯卡“穿着当时普普通通的双排扣长礼服大衣”。媒体忽略了伴郎威利，也没有记录下王尔德对身旁的玛格丽特·伯恩-琼斯抱怨道：“玛格丽特小姐，那个牧师简直丑得可怕，导致我严重怀疑这段婚姻是否有效。”^⑨这些都是他打算克服的疑虑。

4 新的关系

要想对巴黎一览无余，这并不是件易事。

——奥斯卡·王尔德

他们的蜜月始于巴黎。各种社交和文化活动纷至沓来，午餐晚宴（有受邀参加的，也有请客做东的），游乐玩耍，参观展览，以及读书娱乐。王尔德很乐意把他的新娘介绍给去年在巴黎结识的同伴布尔热和萨金特；还有年轻的爱尔兰裔美国雕塑家约翰·多诺霍，王尔德曾在芝加哥赞扬过他的作品，那年夏天他正在沙龙办展（康斯坦斯对他的“爱尔兰蓝眼睛”大为赞赏）。^①所有目睹他们在一起的人都看得出来，王尔德“欣喜若狂地爱着”他的新娘。^②谢拉德到里沃利街的瓦格拉姆旅馆拜访他们，王尔德与他出门散步时，刚到一个市场摊位前便立刻停下脚步，买了一束鲜花，让人送回旅馆给康斯坦斯，还在其中附上一张“一往情深，充满激情”的纸条。他似乎急于谈论婚姻的乐趣，然而谢拉德（一反常态地）打断了他的开场白——“这简直是太棒了，当一个年轻的处女……”——并且把话题转到了不那么私密的事情上。谢拉德确实可笑地对王尔德自诩的无限幸福感到非常恼火——与这对快乐的新婚夫妇共度了一个晚上之后——他很想从内藏刀剑的手杖中拔剑出鞘，刺穿他的朋友。康斯坦斯笑着没收了他的手杖，避免了一场悲剧。^③

一名《晨间新闻报》记者来到瓦格拉姆酒店，王尔德声称自己“太幸福了，不想接受采访”——不过他接下来还是向记者阐述了

自己对小说阅读的看法（“我读书从来不由开头读起……这是唯一激发好奇心的办法，书本的开头千篇一律，总是激不起人们的兴趣”），关于抛弃朋友（“我会让它成为一种积极的乐事，而不是一种遗憾。我们不想再次见到某些人，为什么不能高高兴兴地承认这一点呢？这不是忘恩负义，也不是冷漠无情。他们只不过已经倾尽了他们的所有”），以及关于莎拉·伯恩哈特的《麦克白夫人》（“我们的舞台上没有这种表演，这是她最出色的创作。我故意把它说成是她的创作，因为在我看来，谈论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是十分无礼的……莎士比亚只是剧本的参与者之一。另一个参与者是揣摩这出戏的艺术家。这两个人联手，向我展现一个令人满意的英雄，我所要求的不过如此”）。●注

婚姻生活的奇妙之处超越了尼亚加拉瀑布和大西洋：王尔德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没有失望”。他的信——被媒体报道为“极具特色”——这样写道，他“自信能够承受婚姻生活的操劳和焦虑，并在新的关系中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去实现自己长久以来一直抱有的诗意构想。他说，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将一种新的演讲风格传授给英国人，而他打算树立一个榜样，说明艺术对婚姻生活的渗透和影响”。

●注

康斯坦斯已经准备开启这样的生活，当然如果这意味着穿漂亮衣服，那就更没有问题了。有些媒体可能会冷言冷语地说，她只是“一个傀儡模特，任凭奥斯卡在她身上展示其关于女性服装是否美丽或得体的怪诞想法”。但她很乐意告诉哥哥，自己最新的连衣裙在巴黎引

起了“轰动”。^①《女士画报》指出，尽管法国女士们的品味很传统，但她们对康斯坦斯“别致而得体”的着装大为赞赏。其别致之处在于：“奥斯卡·王尔德夫人，头戴白色羽毛装饰的大帽子，披一件镶满咖色蕾丝褶饰的米色羊驼长斗篷，身穿清新而又略显奇特的白色细棉布裙子，间或点缀着些许金色丝带或黄色丝线刺绣，她被认定为‘十分迷人’，穿着绝对有品味。”^②

在充满阳光欢乐的蜜月期间，王尔德继续埋头于前一年开始研究的法国颓废文学。眼下只有一本书可读：全巴黎都在谈论它。若利斯卡尔·于斯曼的《逆流》——刚刚出版两周时间——用作者的话来说，它“像一块陨石掉入文学游乐场，在出版界激起了愤怒和震惊”，也让文学界惊叹不已。它似乎是颓废时代的缩影：一位神经质的贵族让·德塞森特公爵的离奇故事，他逃离当今时代的物质主义，无视一切传统的规范和道德，投身于一种极端唯美的，佩特式的追求感官刺激的生活。

他厌倦了各种形式外露的享乐放纵，回到他的乡村庄园，投身于越来越精致的艺术与非自然、记忆与梦想的领域。^③在一系列华丽的章节中，于斯曼描绘了主人公收藏的有毒植物和致幻香水，他对后期拉丁语散文的迷恋，对古斯塔夫·莫罗的绘画和波德莱尔诗歌的喜爱，对瓦格纳音乐和叔本华哲学的热爱，同时也提到了他那只镶嵌宝石的乌龟（致敬孟德斯鸠传说中的宠物）。德塞森特以往的一系列出格行为中包括一次葬礼宴会，宴会上的食物和装饰都是黑色的，客人由穿着银色长袜的裸体“女黑人”侍候。他以往的恋人中，有一位魁梧健

壮的美国空中女飞人，一位女腹语术士（作为前戏的一部分，她会背诵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中斯芬克斯和奇美拉之间的对话），还有一位——他最终抛弃了女性——令人不安的年轻人，他走起路来扭捏作态，两人是在大街上邂逅认识的。

王尔德用色彩斑斓的笔触唤醒了这本书中“有毒的”力量：“对（读者）来说，在精致的衣裳下，在美妙的笛声中，世上的种种罪孽在他面前无声地演示开来。他朦胧中梦寐以求的东西突然变成了现实。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逐渐显现了出来。”他对《晨间新闻报》记者说——以更加通俗的口吻——《逆流》是他读过的“最好的书籍之一”。^②尽管德塞森特的计划注定最终要失败，但他尝试的细节被传达得如此生动逼真，几乎令人信服。王尔德理所当然很愿意相信。正当他准备接纳婚姻生活的幸福约定时，他发现自己竟迷上了一个叛逆形象——它违背习俗，违背自然，违背道德，违背常理。但是，这本书的毒性发作起来非常缓慢。他仍然要享受蜜月，紧接着去巴黎，又在迪耶普度过了“愉快的一周”。

王尔德和康斯坦斯于6月24日返回伦敦，却发现无处可以安身；泰特街房子的装修进度比计划落后了许多。王尔德与戈德温商量，他急于“向涣散的施工队施压”。^③一个人人熟知的装修大麻烦就此降临。已经完成的工程质量低劣，让王尔德非常恼火，他解雇了承包商（格林先生），后者随即扣下一部分家具，并起诉王尔德拒绝支付账单。经过数周的争执，直到出庭前一天，双方才达成和解。与此同时，戈德温聘请的新承包商夏普先生很快就超出了他的估算，因为他

发现很多“格林留下的烂活儿”需要推翻重做（到11月底，他的账单已达222英镑17先令，后续还会有更多）。❶王尔德夫妇无法搬进新家——在兰开斯特街小住了一阵之后——只好挤进奥斯卡位于查尔斯街的住所。此后，他们一直住在伦敦，奥斯卡直到秋天才继续演讲。

他们是一对名人夫妻，是唯美婚姻的化身。新闻界对他们新生活的诸多细节做了大量有趣的猜测。有一篇小品文提到，康斯坦斯在餐桌上问：“你喜欢哪一种，风干向日葵还是烤铃兰？”让她惊愕的是，奥斯卡坦白承认——此时正隐居在家——他想要“一些牛肉、土豆、面包和一瓶啤酒”。❷

米莱的夏季舞会上，人们发现王尔德变得“心宽体胖”。如果他的扣眼上没有百合花，“为弥补这一点，他的妻子会在胸前佩戴一枝大大的睡莲”。❸在南肯辛顿宫举办的“国际健康展览会”上，王尔德夫妇经营了一个时尚慈善活动的摊位。性情随和的王尔德答应售卖“鲜花礼品”，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向日葵和百合花”。❹在各种招待会和画廊开幕仪式上，王尔德夫妇成为“公众感兴趣”的对象，其程度甚至可以和莉莉·兰特里相媲美。❺他们吸引了大街上人们的注意力，却并非人人都喜爱的那种。一次，两人走在国王大道上，奥斯卡穿一件钉着无数小纽扣的套装“就像一件改进版的侍从制服”，康斯坦斯头戴一顶饰有白色羽毛的“花哨大女帽”，一群街头顽童冲着他们喊：“哈姆雷特和奥菲利亚出来散步了。”“你说得很对，”王尔德回答说，“我们就是。”❻

康斯坦斯夸张的服饰，加上她生性害羞，这意味着——在社交场合——有的时候在别人看来，她会被衣服和丈夫弄得不知所措。一次茶会上——用劳拉·特鲁布里奇的话说——她“特地”穿了一身“柔软的白棉布，没有一点儿裙撑，橘黄色的绸巾搭在肩上，头戴一顶巨大的盖恩斯伯勒花边阔沿帽，脚上穿着白色和明黄色的长袜和鞋子”。奥斯卡“理所当然地那么妙趣横生”，而她看起来“简直不可救药”。^①但鲜为人知的是，她其实很愿意参与这些事情，而且她对于结婚真地非常感兴趣。她经历了一个由母亲和姑姑主宰的少女时代，前者对她漠不关心，后者对她不以为然，而新生活的种种可能性让她感到兴奋不已。她发现，王尔德夫人可以成为她的盟友兼朋友。

7月18日，霍雷肖·劳埃德去世（短暂地）中断了这一轮蜜月后的愉悦。这件事情并非来得十分突然，它虽然夺走了康斯坦斯为数不多的几个支持者之一，但也的确让她获得了其应得的全部遗产。她的5000英镑信托基金和收入都翻了一倍多。现在她每年有800多英镑收入，可以用这些钱装修泰特街的房子和买衣服了。^②然而，财务规划对康斯坦斯和奥斯卡几乎一样陌生。他们是无忧无虑、不知节俭的一对。有亲戚赠送他们一张数目不小的支票作为结婚礼物，让他们采购些“有用的”东西。结果让这位亲戚颇为恼怒的是，两人竟然兴奋地宣布，他们用这笔钱买了两把使徒调羹。^③

那年夏天，王尔德确实赚了一些钱，威利外出度假期间，他替补了其《名利场》杂志戏剧评论员的职位。^④不过，令他最投入的还是自己的戏剧计划，他对《帕多瓦公爵夫人》寄予了各种希望。事实证

明，艾达·卡文迪什是个靠不住的人，不过——在讨论泰特街房屋装修期间——他向戈德温热情地讲述了创作这出戏的想法。戈德温是个狂热的戏剧爱好者，对逼真的历史服装和舞台设计特别感兴趣，他从王尔德的这出意大利悲剧中看到了丰富的可能性。戈德温以创作一台戏剧精品为目标，着手制订计划，建议将故事的背景从16世纪换成14世纪。他还与女演员安娜·康诺夫（以及她的业务经理菲利普·贝克）展开了谈判，后者最近刚刚接管了斯特兰德大街的奥林匹克剧院。双方起草了一份合同，决定这出戏将于1885年初在伦敦首演，然后在各地巡演。计划进展顺利，但到当年11月却止步不前。媒体上有传言称，可能是因为王尔德“坚决拒绝”修改其中的“一句台词”而导致了如此僵局。但考虑到他之前与几位女演员合作时的热情，似乎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无论如何，这项计划没有重启。王尔德对《公爵夫人》的期待再次落空。❶

有关这出戏的艰难谈判发生在秋季演讲即将开始之际。10月初，王尔德在年轻的新任巡回演讲经理乔治·阿普尔顿指导下重返讲坛。他为即将到来的巡回演讲准备了两篇新的演讲稿：一篇关于“服饰”（他的重要话题），另一篇是“艺术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❷ 1884年10月1日，王尔德在伊灵首次发表关于“服饰”——以及服饰改革必要性——的演讲；它和“美丽的房子”一样重于说教，王尔德立志将美带入日常生活，这是他“使命”的一部分。内容以他早期演讲中的美学思想为基础，但有一个新的重点，即漂亮得体的服饰有益健康。这是那年夏天“国际健康展览”倡导的一个热门观点。戈德温

在展览上发表讲话时提到“服装及其与健康 and 气候的关系”，王尔德坦率地借鉴了他的思想。⑨

王尔德试图通过演讲，把“服饰”从短暂而荒唐的“时尚”中拯救出来，使其重归于永恒的艺术法则和明智的判断。“毕竟，”他气势汹汹地问道，“时尚究竟是什么，（只不过）是丑陋得很特别而已，它让人无法忍受，迫使我们每隔六个月就必须换一次。”他的讲话令人精神一振，其中既有建议，也有禁忌，林林总总地提出了一连串流行时尚，他抨击高跟靴、花哨的法国帽、不必要的蝴蝶结、“带斑点的面纱”、紧身胸衣、“腰垫”（一种裙撑）、裤裙、亚麻内衣和（男式的）“丑得可怕”的高顶礼帽。他的演讲中不时夹杂着幽默，特别是谈到帽子时：“如果我告诉你们，人们每年在帽子上花费多少钱，我敢肯定，你们中间一半人会懊悔，另一半人会绝望”；“我最近看到一幅很大的图片（一顶帽子，旁边写着：）‘戴上这种帽子时，嘴要微微张开’”。王尔德最令人难忘的一句话是：“一个肩上围着披肩、脚上穿着木屐的兰开夏郡纺织女工，要比刚从巴黎回来的伦敦时尚女士更懂得穿衣，因为前者让人舒适，而后者使人尴尬。”⑩

至于规则，王尔德建议“将德国的科学原则和希腊的美学原则相结合”，创造出“健康、舒适、艺术”与“个性”相结合的服装。他提倡穿精纺羊毛服装——如“斯图加特的古斯塔夫·耶格博士”所建议的那样——应该从肩部垂落下来，而不是从腰部或臀部。不要去模仿古希腊式的“奇装异服”，只需要一种类似的简洁感和适合感，以及

对颜色和式样的类似理解。在谈到男人的服装时，他称赞农民、“渔民”、运动员和17世纪骑士的服装，并提出可以将这些服装稍加改进用于现代都市，让软帽、双排扣大衣、暖和的斗篷和高帮靴出现在人们的衣柜里。①

对许多人来说，着装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帕尔摩报》（一份此前倾向于贬低王尔德的报纸）刊登了一篇对王尔德的伊灵演讲大加赞赏的文章，立即引发一阵忙乱。这个机会不容错过。王尔德向朋友解释说，获得声誉最可靠的方式是通过自我宣传：“每次我看到报纸上提到我的名字，我就立刻写信承认我就是那个救世主。”②他请求获得“一个机会去回应各种批评，他要沉浸在这种最迷人的乐趣中”，他给报纸写了一封长信，承认他确实是服装改革的救世主，并重申了他的全部主要观点。③

王尔德通过他的牛津老朋友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在这份杂志上有了一席之地，这对他很有帮助。米尔纳是杂志副主编，还因此推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曾于5月邀请王尔德到《帕尔摩报》办公室，参加了一场“精英人物”的“读心术”展示；作为回报，王尔德向他提供了一些对办公室装潢的看法，还邀请米尔纳参加了自己的婚礼。④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⑤王尔德写给该报的信引发了进一步的争论，于是他在下一个月寄去了第二封——篇幅更长——王尔德式信件，内容是“关于服饰改革的更激进观点”。及至年底，即便“乏味的人”也都知道王尔德是“服饰改革家”的领军人物。他被一些人开玩笑地称为“腰垫”⑥。⑦

事实证明，王尔德的“着装”演讲——及其更具一般性的姊妹篇“艺术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在各个学院和社交界很受欢迎。经纪人阿普尔顿得以借此确认了1884年10月至1885年2月期间，总共60多场演讲预约。王尔德被迫在铁路候车室和地方旅馆里度过又一个冬天。他在旅行期间读了很多书。他在所到之处看望了老朋友——分别在布里斯托尔和爱丁堡见到了威廉·沃德和亨特-布莱尔。然而，他经常感到孤独。他从爱丁堡的巴尔莫勒尔酒店给康斯坦斯写信（这是他写给她的众多信件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封信）：

亲爱的，我爱的人，我在这儿，而你却在地球的另一端。唉，可恨的现实，让我们的双唇无法接吻。不过，我们的灵魂是一体的。

我能通过信件告诉你什么？唉！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神祇之间的信息不是通过笔墨传递的，事实上，即便你身处此地，也不会使你变得更真实：因为我觉得你的手指正在抚摸我的头发，你的脸颊蹭着我的脸颊。空气中充满了你的嗓音，我的灵魂和肉体似乎不再是我的，而是与你的灵魂和肉体在某种极度的狂喜中融为一体。没有你，我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

永远永远属于你的

奥斯卡

至于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王尔德准备采用夸张的方式来表达真实的感情。

离开了康斯坦斯和伦敦，他经常在各个地方任人摆布。几乎每到一处，他都要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当地的艺术学校、铸造厂或陶艺厂，还要应付各种与当地名流共进晚餐的邀请。不过，在有些市镇，支持他的人会找到他，给他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约克郡的艺术家威廉·豪盖特提出带他去游览“利兹为数不多的名胜”。在伯明翰，王尔德享受了一次“迷人的会面”，与年轻富有的艺术爱好者菲利普·格里菲思共同度过了一段“黄金时间”。^⑩布拉德福德演讲（1884年12月3日）之后，王尔德受邀到曼尼汉，在哥特式别墅里与富有的沙尔德斯一家人共度一晚，对此他心存感激——然而即便如此，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对丰盛的约克郡早餐不屑一顾，并且表示如果能吃到“一把覆盆子，淡黄色的覆盆子”，那就太“完美”了，令女主人尴尬不已。^⑪

这样的个人接触——与感兴趣的人在美学背景之下——必然鼓励了王尔德，给了他完成“使命”的希望。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听众数量也颇令人鼓舞。在格拉斯哥（12月19日），5000多人聆听了他的演讲；布里斯托尔（10月14日）的上座率“相当好”，哈勃恩与埃德巴斯顿学院（11月4日）的讲堂拥挤不堪。如果说利兹和谢菲尔德的上座率令人失望，那完全是糟糕的天气造成的。^⑫有些媒体继续吹毛求疵，但大多数报道是正面的。人们尤其支持王尔德发起反对“丑陋、昂贵、令人厌恶的英国高顶礼帽”。^⑬如果偶尔出现失望的声音，那就是王尔德自己在穿着方面没有“更广泛地实践他所宣扬的东西”，竟然穿着“紧身上衣”和黑森靴。然而来年，他确实凭借一件奇怪的打褶红铜色外套制造了一次小小的轰动，这件时髦外套是按照

他自己的设计制作的，让人联想起大提琴的样子。❶1884年冬天，他“似乎还没有想要超越斗篷和宽边帽的意思”。❷

无论一路上获得了多大的成功，也无法掩饰他心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他要频繁出行，泰特街的房子一拖再拖（直到1884年圣诞节仍没有完工），还有演讲本身那种昙花一现的特性。康斯坦斯也有同感，威利试图安慰她说：“当你在泰特街最美的小窝里安顿下来时，我知道（奥斯卡）不但能够，而且也一定会坐下来写出比演讲稿更具长远意义的作品，但是，对于不断逝去的‘当下’而言，他继续保持‘战斗’是明智的，也是正确的——即便他不得不暂时离开他的妻子一段时间。”他认为奥斯卡手上那份折磨人的时间表是在“提升他”，“向人们展示，他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多么认真”。❸事实上康斯坦斯当时已经怀孕，令她更加渴望平静的家庭生活。维奥莱特·费恩则相当不客气地暗示说，王尔德自己不断增长的腰围，可能是为了与妻子的状况保持一致。❹

这对新婚夫妇终于在年底搬进了他们的家，尽管王尔德几乎又得立刻动身巡回演讲，留下康斯坦斯独自完成布置家具等细节。虽然新年的安排不像前几个月那么让人困扰，但仍然需要耗费他的时间和精力。

王尔德趁着短暂的旅行间歇，开始在泰特街16号安顿下来，炫耀自己的生活。他与戈德温和康斯坦斯一起——康斯坦斯时常展现出两名男性合作者身上缺乏的实用思维——创造了一些极为新颖和独特的东西。道格拉斯·安斯利（他是劳埃德家族的一个年轻朋友，1882年

他就读于伊顿公学，当时正值暑假，他对康斯坦斯产生了极大的迷恋）是首批造访者之一，他完全被迷住了。康斯坦斯向她哥哥汇报说，他认为“我们家是他住过的最迷人的房子，简直舍不得离开”。

●注

这座传统的红砖色排屋被改造成了一座美学殿堂。室内占主导的是明亮和简单，伴随着丰富的异国情调和色彩。不过，这出大戏从前门就开始了。门被漆成亮白色，看起来很像上了一层珐琅。由于排屋其他房子的门或者呈棕色，或是棕色纹理，因此这扇白色大门显得格外鲜亮。某个“讨厌的邻居”给王尔德写了一张匿名便条，指出这扇大门是一块地位“广告牌”，其目的是让人知道，“奥斯卡·王尔德先生，这个泰特街的大佬，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不要将他和其他普普通通拥有花园的居民混为一谈”。对此，王尔德疲倦地叹口气道：“是象征而非广告……这栋房子的门之所以漆成白色是因为，任何人都不能把邪恶的思想带进这所房子，因为这里住着世界上最洁白、最纯洁的灵魂，我深爱着的、美丽的妻子。” ●注

这座房子里充满了类似别出心裁的想法。康斯坦斯布置优雅的卧室里——位于二楼正面——墙的下部漆成粉红色，上部漆成绿色，中间以一条窄窄的白色线条作为分界。这个想法是为了使其“象征一个贝壳”——暗指自然界和维纳斯的诞生。 ●注

色彩、形式、质地和装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客人们刚一进门就看见一道出乎意料“极其平常”的白色门廊，侧墙装饰着两幅镶嵌在白色框架中的巨大雕版画——一幅是《阿波罗和缪

斯》，另一幅是《戴安娜和她的仙女沐浴》——也许暗指房子的男主人和女主人。右边的一扇门通向书房，这个屋子在188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在装修。再往前是一段漆成白色、铺着金黄色地毯的楼梯，楼梯与门廊呈直角，通往一楼客厅。前客厅空间较大，而且光线充足、通风良好，两扇弓形窗户的边框上悬挂着米白色窗帘，可以看到街对面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花园。墙壁和线脚都是“全白”且不加装饰，其目的是“为了不破坏线条”，但天花板是用暗金色“日本皮革纸”做成的方格镶板——四个垂饰上悬挂着巨大的蓝白相间日本纸灯笼。壁炉的两侧是低矮的嵌入式“三角沙发”，属于“安妮女王”风格。壁炉台上方的白色造型中摆放着约翰·多诺霍送给王尔德的青铜浅浮雕，上面刻着《安魂曲》中的句子，而壁炉架上则立着一尊王尔德赢得纽迪盖特时获得的奥古斯都半身像。

房子里家具不多。一位较早时候前往拜访的客人——劳拉·特鲁布里奇的追求者阿德里安·霍普——认为，屋子看上去像是已经被“清理出来准备跳舞”，只是“地毯看起来不太合适”。屋里只有四把椅子——两把有扶手，两把没有扶手——全部由戈德温设计，刷上了“白漆”，椅面由藤条制成。在霍普看来，这些椅子“僵硬”，“不舒适”，“与奥斯卡的体重相比太过纤瘦”。对于那些寻求更为舒适的人，还有一张“金漆长沙发”（布卢姆菲尔德·摩尔夫人送的礼物）。沙发旁边放着一张路易十六式小边桌，上面点缀着几件精选的古董——据说包括玛丽·安托瓦内特用来打开特里亚农的金钥匙。另外还有两张桌子，都是戈德温设计的“日本风格”小件家具，一件为八角形配纺锤腿，另一件为竹制的椭圆形。房间里唯一明确的色彩元素是坐

垫（购于利伯蒂），上面覆盖着一块“图案很不显眼”、“非常宁静的绿色”织物。●注

相比之下，同一层楼的后客厅，就在帷帘隔开的平台对面，是一个色调低沉、陈设丰富的温馨小空间。阿德里安·霍普形容它具有“非常独特的土耳其风格”。屋里根本没有椅子——客厅两面是低矮的无靠背长沙发，旁边摆着“小巧而古怪的嵌入式东方桌子”。护墙板是某种说不上来的暗淡色调，天花板很“华丽”，地上铺着东方地毯。窗户被“仿照开罗图案”的木格子挡住了（窗外是泰特街后面所谓“天堂大道”的“贫民窟”小屋）。门口内侧有一根方形木柱，上面镶嵌着意大利彩色大理石牌匾，周围镌刻着用镀金和红、蓝颜色写就的王尔德诗作《爱神的花园》：“美的精神！再停留一会儿，你的古老崇拜者，他们并没有死；对他们的一些人来说，你的灿烂的微笑，要胜过一千次的胜利。”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房子里最可爱的屋子。阿德里安·霍普第一眼就爱上了它。

其他人则喜欢一楼走廊尽头的餐厅。这是一曲白色的交响乐：象牙白色的墙壁；明亮的白色木制品（包括环绕整个房间的、方便的足尺宽的架子）；乳白色“非洲细布”窗帘；一块白色图案的蓝绿相间威廉·莫里斯地毯；白色的齐本德尔式椅子；还有一张椭圆形餐桌，上面铺着一块未漂白的亚麻桌布。餐厅里的色彩来自“稀有的玻璃和瓷器”、餐巾以及精心挑选的花朵。在那个餐厅色调普遍深暗的时代，这种效果可谓惊人的原创。而且——与王尔德对服装改革的观点一样——它明显是将美学与卫生结合了起来。王尔德说，大量的白色可以

让屋子保持“干净清新”，同时也提供了“唯一一种能够让穿着晚礼服的男人看起来优雅如画的背景”。^①

王尔德在房子的顶层有一个自己的书房，两间小阁楼合而为一，还有一个俯瞰街道的小阳台。这是一个舒适的小阁楼，里面摆满了书，裸露的墙上覆盖着席子，木器上漆着他最喜欢的朱红色。一个据说曾经属于卡莱尔的红木写字台，以及一座赫尔墨斯的白色石膏半身像，散发着令人浮想联翩的魔力。^②

尽管王尔德——以及整个世界——可能认为这所房子很适合这位“唯美主义使徒”，但与他的地位和收入保障比较，房子确实过于精美，过于华丽了。事实上，这项工程的花销甚至已经耗尽了康斯坦斯的财力，他们不得不从她哥哥奥索那里又借了500英镑。^③王尔德希望，他的朱红色书房不仅能够激励他工作得更“持久”，而且能带来报酬更加丰富的工作。他似乎一搬到泰特街就开始动手写新剧本了。的确，1885年2月初，他设法见到了功成名就的喜剧作家B.C.斯蒂芬森“讨论一部戏剧”。^④然而，此事之后毫无结果。^⑤

居住在切尔西，为王尔德一家带来了新邻居和新朋友。一位富有的年轻博学家接受了他们，他名叫爱德华·赫伦-艾伦，他除了对科学、文学、纹章、小提琴制作和“芦笋培养”感兴趣之外，还是一位狂热的手相学家。他第一时间看了康斯坦斯和奥斯卡的手相。王尔德在赫伦-艾伦的手相簿中自己的那一页上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只有美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康斯坦斯在她的那一页上写的是，挂在起居室里，奥斯卡《爱神的花园》中的诗句。^⑥

5 黑白之间

对于批评家来说，艺术作品只是一种启示，启示他创造属于自己的新作品。

——奥斯卡·王尔德

搬进泰特街16号之后，王尔德原本可以和惠斯勒走得更近一些，但结果恰恰相反。惠斯勒一直嫉妒他的地位和声望，面对王尔德持续不衰的名气、他在品味问题上逐渐得到认可的仲裁者角色，以及他在巡回演讲中赚到的钱，惠斯勒感到越来越恼火。他让自己相信，王尔德的成功完全取自于其在“大师”工作室学到的点子。早在1884年3月，阿兰·科尔就在日记中指出，惠斯勒“强烈认同奥斯卡·王尔德的艺术观念，那是他从他（吉米）那里得来的”。^①惠斯勒的脑海中不断回想起，王尔德在准备对皇家艺术学院学生的演讲时，自己所给予的帮助。^②王尔德的新演讲“艺术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那次谈话的内容。尽管——也许是因为——他在演讲中对惠斯勒赞誉有加，但这却成了一件令人特别烦恼的事情。惠斯勒对此产生了近乎偏执的仇恨。^③

虽然没有针锋相对的冲突，但王尔德不可能意识不到，他的朋友正憋着一肚子怨恨。一次晚宴上，惠斯勒将话题转向王尔德的演讲。“现在，奥斯卡，”他问道，“告诉我们，你对他们说了些什么？”王尔德不得不一一条一条地重复他的所有要点；每说一句，惠斯勒就站起来庄严地鞠一躬，“一手放在胸前，假装是在接受客人们的

掌声”。^⑩对于性格慷慨奔放的王尔德来说，他生性喜欢说话，对思想史具有广泛的理解，如此微不足道地挣一点面子在他看来似乎完全无关紧要。他当然不会生气。他保留了对惠斯勒作为一个男人的喜爱，以及对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钦佩之情。

然而1885年初，惠斯勒为这份日益增长的敌意，找到了一条进一步发泄的途径。他急于维护自己的权威，重新确立自己的美学理论，于是决定亲自做一次演讲。在阿奇博尔德·福布斯的支持下，他甚至说服了多伊利·卡特为这次冒险活动做宣传：他要在2月20日晚上10点这一怪诞的时刻——这个钟点足以让时髦的观众提前进餐——在伦敦王子大厅露一次面。

惠斯勒在演讲稿上下了很大功夫。他要在这次演讲中闪亮登场，宣告自己的艺术信条，而且这一信条与王尔德最近在演讲中所支持拥护的几乎完全一致：艺术不受所有道德和社会义务的约束，它“只专注于自身的完美”，这种完美是可以实现的，不是通过直接模仿大自然，而只能通过灵感进行选择 and 安排。其中不少用语呼应了王尔德的名言。惠斯勒称：“大自然包含了所有图画的色彩和形式，就像键盘包含了所有音乐的音符一样。但是艺术家天生就会挑选，运用科学对这些元素进行组合，使其产生美丽的效果……对画家说，他应该照着自然的本来面目作画，这就等于对一个演奏家说，他可以坐在钢琴上。”王尔德在演讲中使用了同样的比喻——只不过没有结尾处的笑话。

在惠斯勒鄙视的几个对象中，最主要的可能是罗斯金和哈里·奎尔特——“大学圣人”和“艺术评论家”——但王尔德也没有被落下。当提到现代人热衷于对公众进行艺术教育（一个他们“说不出所以然”的问题）这个话题时，惠斯勒对自封式专家的兴起表示失望：“半吊子艺术家在国外到处跑！——业余选手都跑出来了——到处都是唯美主义者的声音——灾难降临了！”如果说所有的艺术专家都遭到了指责，那么服饰改革者们则遭到了格外的奚落：“演出服装并不属于日常服饰——即便把衣柜里的东西堆砌在身上，也没法成为‘品味’诊断者！——这些人凭什么成为扮靓大师！——好吧，他们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来！——他们毫无建树，只知道为了漂亮胡拼乱凑……肩膀上随随便便披挂着小贩的衣物——以各种杂乱的风格，把伶人衣柜里那些五花八门的东西套在一个人身上。”

当然，王尔德就在听众席里（非常显眼地坐在第六排）。^⑨然而，他并非只是来听演讲的，他还受了《帕尔摩报》的朋友之托，要评价这次演讲。他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任务，用自己的叙述巧妙地扭转了形势，似乎并没有钻进惠斯勒的圈套。惠斯勒的朋友们原本以为王尔德被演讲激怒了，现在他们才明白过来。^⑩

他以一种轻松平等的姿态，风度翩翩地夸赞了一番。他称赞演讲“的确妙不可言”——尽管他立即效仿惠斯勒做作的头韵表达方式，令人难忘地将这位艺术家形容为“一个嘲弄大多数人的迷你版梅菲斯特”。开场白是亲切的赞许，接着是一连串措辞轻松——而恰当——的警告。王尔德指出，演讲的讽刺之处在于，惠斯勒对一群热爱

艺术的观众说，他们对艺术一无所知，而且他们无法，也不应了解有关艺术的任何方面。至于他自己，他满不在乎地承认自己的确是个“服饰改革者”——（哦，我有罪！）——但强调这个角色很重要。“当然，”他说，“至于美丽的环境所具有的价值，我与惠斯勒先生的观点完全不同。”因为真正的艺术家能够“从丑陋中发现美，恐怖之美”，但也不能以此为由去迫使“有魅力的人”活在一堆可怕的“紫红色垫脚凳和阿尔伯特蓝窗帘”之间。惠斯勒“断言说，只有画家才能够评判绘画”，王尔德对此也提出了质疑——他坚持认为，“只有艺术家才能够评价艺术”——所有的艺术都是一体的——“诗歌、绘画、帕特农神庙、十四行诗和雕塑——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懂得一种就掌握了全部”。他继续道，“诗人”是“最高的艺术家，因为他精通色彩和形式，也是真正的音乐家，主宰着一切生活和一切艺术；只有诗人才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的那些秘密，只有埃德加·爱伦·坡和波德莱尔才知道，而不是本杰明·韦斯特和保罗·德拉罗什（两位19世纪中期已经不流行的历史画家）”。

不过他认为这篇演讲是“一份杰作”——令人难忘的不仅是其巧妙的措辞：

而且还有许多段落是如此纯净与完美——它们所传达的那份诚挚似乎让人感到惊讶。因为有些人只当他是一位讽刺大师，而不像我们一样知晓他同时也是一位绘画大师。我的观点是，他的确是最伟大的绘画大师之一。我或许还可以说，惠斯勒先生本人是完全赞同这一观点的。

演讲结束后的那个下午，王尔德的署名文章引人注目地出现在《帕尔摩报》头版。尽管它语气高调，却在媒体对这次演讲的普遍反应中，属于较为宽厚的回应之一。这篇“文笔优美的评论”很快就被其他报纸纷纷评论并引用。在这类文章中，评论者与被评论者受到了同样的关注；其中一篇的文章标题便是《王尔德先生和惠斯勒先生》。^⑨

“王尔德先生”很乐意受到关注——并且欣然接受了标题中两人名字的排列顺序——但“惠斯勒先生”就不一样了。他不出所料给《世界》杂志写了一封信回应王尔德的评论：“我已经读了你发表在《帕尔摩报》上的犀利文章。在‘诗人’对‘画家’的恭维中，最妙的莫过于‘诗人’在选择他所谓的画家时表现出来的天真——本杰明·韦斯特和保罗·德拉罗什！你指出‘画家’的使命是发现‘恐怖之美’，留给‘诗人’的则是从‘美丽’中发现‘恐怖’！”

王尔德巧妙地避开了这一招。“亲爱的蝴蝶，”他回答，“借助于一本传记词典，我发现曾经有两位画家，分别叫本杰明·韦斯特和保罗·德拉罗什，他们曾经轻率地讲授艺术。由于他们的作品已荡然无存，我断定他们此举已经将自己解释得一干二净。及时接受警告吧，詹姆斯，还是保持高深莫测比较好，就像我这样；想出名就要让人不理解。奥斯卡谨启。”这封信和惠斯勒的信一起发表在《世界》杂志上；这些信件往来也同样刊登在《帕尔摩报》上。^⑩在之前的交锋中，惠斯勒总是凭借自负使他获得某种胜利，当然是最后的胜利。但这一次，他被击败了。

为了让这场游戏继续下去，《帕尔摩报》委托王尔德撰写了第二篇署名文章：《服饰与艺术的关系：对惠斯勒先生演讲的书面注释》。王尔德在文中进一步称赞惠斯勒是一位演说家兼艺术家——惠斯勒冷静而“极为明智”地宣称“艺术只是为了其自身的完美而存在”，相比之下，他自己有关服饰改革的“高尚的愚蠢观点”却寻求让艺术成为“自然的与民族的遗产”。事实上，王尔德认为，服饰之美不仅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艺术：

绘画艺术不是在学院的高墙内学会的，它是一门视觉艺术，不是听觉艺术，以此造就了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学校应该在市井之中。例如，希腊人服饰的精美线条或匀称比例无不精确地反映在他们的建筑中。一个喜欢戴大礼帽的民族，他们的服饰改革家可能会开设一家泛泰泰尼康（家具商场），但绝不可能建造出巴特农神庙。

如果惠斯勒希望用他的“十点钟演讲”毁掉王尔德，或与他彻底决裂，那么他在这两方面都失败了。王尔德从这场对抗中脱颖而出，他作为美学改革家和一位才子名声大振。然而，尽管他在公开发表的评论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宽厚幽默的语气，并继续在社交场合与惠斯勒见面（切尔西——实际上还有伦敦——对他来说太小了，双方不可能不碰面），但很明显，之前几年的温暖友情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了。这种关系逐渐冷却的外在表现是，王尔德搬进新家后不久，惠斯勒搬出了泰特街，将工作室安顿在富勒姆路尽头，他的家则搬到了位于国王路街边风景如画的淡水河谷。

两人之间这些令人难堪的龃龉却促使王尔德的境遇发生了一种相当喜人的变化：新闻界向他敞开了大门——或者至少是评论界。他在《帕尔摩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颇受欢迎，促使米尔纳邀请他从3月份开始担任该报的常驻书评人。❶这个机会来得正是时候。一段时间以来，演讲的魅力一直在减弱。无休止的旅行，无休止的重复，偶尔的混乱带来的压力，变化不定的观众，不确定的回报，远离伦敦和康斯坦斯：所有这些都对王尔德的精神造成了损害。他向阿普尔顿承认：“我从头到尾烦透了这件事。”❷他虽然没有立即终止演讲，但大幅度删减了当年的其余委托。他作为四处奔波的唯美主义先知的角色逐渐走到了尽头。❸❹

为一家伦敦报纸做评论，即便算不上一个重大的职业进步，至少也是一种改变和慰藉。况且，《帕尔摩报》很适合他。该报作为一种新兴的“俱乐部”报纸之一（售价1便士，其价格是《旗帜晚报》《回声报》《星报》等“流行”报纸的两倍），在W.T.斯特德的编辑方针指引下，成为“伦敦迄今为止最好的晚报”：它令人愉快、畅所欲言，而且令人鼓舞。❺尽管报纸的书评没有署名，而且报酬也不高（报纸通常的稿酬是每千字2畿尼），但他在泰特街的“朱红色阁楼”里舒舒服服地就能完成，而且写得很快。王尔德快速阅读的天赋发挥了很大作用，他甚至还提出了一种理论，即书评家不需要去读完整本书，那样既有害，也没有必要：“要辨别酒类和酒质，无须喝干整桶酒。确定一本书是否有价值，只要在半钟头内就能轻而易举地做到。如果一个人对形式有直觉，十分钟就足够了。”❻毫无疑问，他希望这种新的状态能给予他追求自己文学事业的空间。

王尔德最初希望能够对有关艺术的书籍展开评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询问米尔纳，是否可以给他寄一本科明斯·卡尔最近出版的《艺术论文集》。然而，他收到的却是一本名为《正餐与菜肴》的烹饪书。书评的需求是个大杂烩，这是他一开始获得的经验。然而，王尔德似乎很享受这种多样性——甚至是匿名性。两者都是一种解脱。他在《帕尔摩报》上发表的大多数评论，都理所当然地带有一种愉快的假日气氛。①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他充满活力地对史诗、爱尔兰传奇、礼仪手册、诗歌选集、油画手册、历史传记、书信集、流行小说等进行了评论。这些作品通常语气宽厚，而且总是很幽默——穿插着有趣的想法，还有一些妙语连珠。他称赞《正餐与菜肴》这本书：“它简明扼要，不玩弄辞藻，这是读者最大的幸事了。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有谁受得了？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没有插图。一件艺术品的主题当然与它本身美不美毫无关系，但如果是一幅彩色版画的羊腿，那还是多少让人有点扫兴的。”不过，他表示，这部作品的真正奇妙之处在于，它“的确提到了一种制作可食甘蓝菜的烹饪法”。②

王尔德天性善良，而且自身遭受过居心叵测的关注，因此他会尽量对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给予特殊的宽容。他的文章里几乎总是有赞美的话，无论它是多么微弱。对于一本内容空洞，但装帧不错的书，他评价说：“就算它不太值得一读，至少（它）值得一看。”③不断涌现的流行小说（通常一次评论三到四本）使他确信，尽管“19世纪也许平淡无奇……但它不是一个散文的时代”。④他慷慨地承认，几乎所有“我们普通的英国小说家”都有“一些故事要讲”，而且大多数是以“有趣的方式”讲述的，但他认为，他们几乎总是败于“风格集

中”这一点。他们的角色全都“过于能言善辩，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而我们想要的是多一点现实，少一点花言巧语”。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人们不应该对英国小说过于苛刻”，因为它们是“失业的脑力劳动者唯一的放松方式”。^①他轻描淡写的恭维话常常是把双刃剑，然而他并不严厉：“这似乎是一本有着崇高目标和高尚意义的小说。但它不会让人觉得枯燥乏味”；“这本书读起来没有任何困难，也许写起来也没有任何困难。它的风格讨人喜欢，但又喋喋不休。”“《误入歧途：乡村小镇的故事》是一本非常严肃的书。它由四个人相互协助共同写成，甚至在阅读它的时候也需要有旁人提供协助。”然而，他拒绝恭维E.O.普雷德尔-布维里先生的《琐事》一书：“这本书唯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是如何被写出来的。”^②

他学会了如何小心谨慎地提出想要评论某一本书，因为编辑们“非常担心出现相互吹捧”的局面，哪怕他只是想给朋友简单地捧个场，也会遭到他们的极力阻止。^③也许是出于偶然的机会，他称赞了阿尔弗雷德·亨特夫人的三卷本小说，并向威廉·莫尼·哈丁的“迷人风格”表示了敬意。^④不过，他为《结婚后如何获得幸福》一书撰写书评的背后，肯定包含了算计的因素。这是一本略带幽默的书，作者是他表姐夫，署名为他的化名。王尔德称赞E.J.哈代牧师的作品是“一本通向人间天堂的完整手册”，称作者为“婚姻领域的默里、指导幸福生活的贝德克尔”。这句话——连同他的全面认可——让这本书一连发行了五版；王尔德一直认为他应该得到一份版税。^⑤^⑥

王尔德以匿名的方式批评J.A.西蒙兹的浮夸言辞和埃德蒙·高斯的一知半解；他轻描淡写地嘲笑他的泰特街邻居约翰·克利尔，称其理解艺术的方法不过是“常识”而已，并且毫不客气地贬低他在牛津的老对手罗达·布劳顿相当庸俗（“不管我们要对她的句子构造进行怎样严厉的批评，她至少拥有那种让所有世人亲如一家的粗俗风格”）。^①然而，面具有时候会滑落。王尔德写了一篇匿名文章，抨击乔治·塞恩茨伯里的自命不凡，欣然列举了这位作家的语法错误和不足之处。他的作者身份被人猜了出来，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②然而，王尔德似乎并不介意。他当然希望大家能够发现，是他谈笑风生假装无知，冒犯了哈里·奎尔特。^③然而，总是有让人困惑的地方：王尔德某些较为尖锐的书评，被那些倒霉的受害者记在了乔治·萧伯纳（他与王尔德同时开始为《帕尔摩报》撰稿）和威廉·阿彻的头上，而他们的文章则有时候被认为是出自王尔德之手。^④然而无论好坏，任何未署名的评论，只要是消息灵通的作家，通常都能发现其真正的作者。可能正是这样的内部消息促使W.G.威尔斯写信给王尔德，感谢对他的史诗作品《梅尔基奥》所给予的慷慨赞扬。^⑤

对乔治·桑信件的评论，让王尔德得以阐明他在艺术及其与生活的关系方面不断变化的想法：“也许（桑）过于看重艺术中的善意了，她简直不明白，为艺术而艺术（她曾对此表示过反对）并不是为了表达艺术的最终目的，而仅仅是一种创造的准则。”不过他认为，桑对福楼拜试图在作品中抹杀自己的个性提出质疑是正确的：“没有个性的艺术是不可能的。然而，艺术的目的不是揭示个性，而是取悦他人。”^⑥取悦他人的重要性现在成了一个问题。关于另一部作品，他

说：“严肃，像财产一样，有它的权利也有它的义务，小说的首要义务是取悦读者。” ⑩

然而，严肃和快乐同样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王尔德并不想进入粗俗而繁忙的报纸新闻界，那是威利的地盘，威利现在是《每日电讯报》的头条撰稿人（这个职业非常适合他的轻松机智、流畅的笔锋和懒散的性格）。⑪⑫不过，在每月的评论中，也有见多识广的评论和博学的讨论，这是“更高级的新闻”：马修·阿诺德和斯温伯恩（作为评论家）就是在这些论坛上一举成名的。王尔德意识到，这也许是一个有用的舞台。《双周评论》的编辑建议他写一篇文章——提出“文学中的印象主义”——“这是我近期一直在研究的一个主题”。但是，这个想法没有实现。⑬更成功的是一篇题为《莎士比亚与舞台服装》的文章，文中结合了他对文学和服装的兴趣，以他的名义发表在1885年5月著名的《19世纪》杂志上。这是他在这个高水平知识领域的首次不起眼的，但令人满意的亮相。

这篇文章是根据王尔德数周前在新创立的周刊《戏剧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较短的文章《莎士比亚论舞台布景》写成的。他用优雅的措辞称赞了戈德温的观点，即“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真正的舞台设计，这种做法具有诸多优点。这两篇文章所采用的思路与他通常的做法恰恰相反。他曾经对皇家艺术学院的学生说，“考古学”只是“为糟糕的艺术寻找借口的科学”，而对于一位正在创作“维京人图画”的年轻画家，他说，“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久远？要知道，考古

学出现之际，艺术就停止了发展”。❶这又一次证明了他具有一种天赋，能够接受、欣赏各种截然不同的立场。

虽然《19世纪》没有立即刊登王尔德的更多作品，但《戏剧评论》却这么做了。其创刊人，出生于爱尔兰的埃德温·帕尔默的编辑风格充满活力，该杂志一心鼓励在有关文化的话题上展开辩论。威廉·阿彻是其早期作者之一。萧伯纳为杂志撰写音乐评论。赫尔曼·维津有一个回顾老一代演员的定期专栏。1885年戈德温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舞台上的考古学”的文章。王尔德被拉进这个圈子并非出人意料。❷第一篇文章获得成功之后，他开始偶尔发表一些戏剧评论。写这些作品和为《帕尔摩报》撰稿一样，稿酬都不高，但能够让他与戏剧界保持密切联系——并让他的名字出现在公众面前。文章下面有作者的签名章。❸

1885年6月5日，康斯坦斯生下一个儿子。孩子的降生让王尔德万分激动。“这个孩子棒极了，”他在给诺曼·福布斯-罗伯森的信中写道，“康斯坦斯表现很好，精神状态也很好……你必须马上结婚！”❹在家庭圈子之外，人们纷纷猜测这个孩子会过得怎么样。劳拉·特鲁布里奇认为他“非常可怜”，怀疑他很快就会“被包裹在”“灰绿色”和“孔雀蓝”的“精美婴儿服当中”。❺各家报纸津津乐道于审美理想与为人父母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啊，奇妙的小天使！多么唯美！”他们想象王尔德正在给婴儿朗诵诗歌。“文艺复兴风格、希腊或多利克风格；我敢说，都是在嚎叫！/快把止痛剂给我拿来。”❻这个男孩取名西里尔。作为进一步考虑，他们请爱德华·赫伦-艾伦为

孩子根据星相算命（尽管父母都渴望了解孩子的“命运”，但当赫伦-艾伦最终得出结论时，“他们非常伤心”）。^①

王尔德满怀热情地当起了父亲：孩子出生几个小时后，他就夸口说“这个神奇的男孩……已经相当了解我了”。^②不过，他也意识到了新的责任和新的开支。钱是必要的。即便在西里尔到来之前，康斯坦斯的收入也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王尔德撰写评论的稿费不值一提，他剩下的几次演讲收入不断下降，两者都不够填补缺口。《帕多瓦公爵夫人》一直没有确定能否上演。经济成了一个大问题。康斯坦斯向她的哥哥哀叹，她和丈夫都“不知道如何过简朴的生活”。^③他们尝试另寻他法：让王尔德找一份工作。

西里尔出生几周后，他又重新提出为“女王陛下担任学校督察”的想法，并请求他的朋友乔治·寇松（现在是保守党内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提供支持。这一举动虽然没有马上取得成功，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努力，并再次找到寇松，还争取让马哈菲提供援手。^④但即便如此，也不足以确保他能够获得这个职位。在探索了其他途径之后，他申请成为博蒙特信托基金的秘书。博蒙特信托基金是一个慈善机构，从事在伦敦东区创建“人民宫殿”——一个致力于在城市贫民中推广艺术和科学的机构。王尔德在他的申请信中，引述了他长期从事“艺术知识”和“艺术欣赏”演讲的经历，称这座宫殿“实现了我长久以来的夙愿”。然而，他又一次被忽略了。^⑤

这些事情真的让他非常失望。它们不仅影响实际生活，而且还牵连到艺术方面。王尔德因为无法写出评论之外的任何东西而感到沮

丧，他开始相信，如果他要创作真正有价值的“纯文学作品”，就必须“远离卑鄙丑陋让人焦虑的事情，获得闲暇和自由”。他希望一份正规的工作可以提供这样的自由。他对一位年轻的记者解释说，只要他能“从事某种职业……为（他）提供生活的基础和支柱”，他就能“留住文学中最精彩、最珍贵的时刻”。^⑨他需要一份适当的工作。至少他是这么想的。在一篇接一篇的评论束缚下——以及他不断减少的讲座系列——美好的时光似乎真的很珍贵，“纯文学作品”成了一个梦想。

6 无望之爱

我们可以像斯巴达人那样生活，但让我们像雅典人那样说话。

——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到了而立之年，愈发地恋旧。青春，无论作为事实还是想法，都给他带来了一种魔力。他要找到它，并且充分利用它。他带着《戏剧评论》的工作任务回到牛津大学，撰写了两篇关于学生戏剧作品的报道：1885年5月的《亨利四世第一幕》（由他的朋友寇松撰写引子）和次年2月的《第十二夜》。虽然他非常喜欢这两场表演——在他的文章中有详细叙述——但他更喜欢和大学生们在一起。他离开大学已经六年了，在这段时间跨度的两头，成年之后伦敦生活步步紧逼的各种担忧与学生时代极富感染力的无忧无虑形成了鲜明对比。“牛津的年轻人非常愉悦，”他对维奥莱特·费恩说，“极其具有希腊人风格，优雅而没有教养。他们有形象，但没有哲学。”^①他竭力吸引他们。《亨利四世》演出结束之后的一次晚宴上，他发表了一篇“精彩演讲”。^②当他再次来到《第十二夜》演出现场时，演员们把他当成了贵宾。^③

1885年11月，王尔德还收到了去剑桥大学观看埃斯库罗斯作品《欧墨尼得斯》演出的邀请。写信的人名叫哈里·莫里利尔，是个“聪明、热情”穿着蓝色外套的男孩。王尔德早年在伦敦的索尔兹伯里街结识了他， he 现在是剑桥大学彼得豪斯学院的一名古典学者。王尔德很高兴能与这位喜爱艺术的年轻朋友再次取得联系。几天后，他们在

伦敦短暂地见了一次面，谈论了诗歌和绘画。“你仍在剑桥研究华兹华斯？”王尔德还想知道，“或者你喜欢济慈、爱伦·坡和波德莱尔吗？……哪种艺术情感和韵律对你的影响最大？”对王尔德来说，这次邂逅充满了“强烈的好奇、神奇和喜悦”——但由于他的日程安排的缘故，这次见面很快就结束了。

“哈里，”他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车站旅馆（他得去那里演讲）写道，“你为什么让我去赶火车？我本想和你一起去国家美术馆，看看委拉斯开兹笔下那个苍白而邪恶的国王、提香的酒神巴克斯，还有安杰利科画中的奇异天堂。”不过，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极其激动人心，极其精神化”——这一点很像勃朗宁。他期待着再次会面，进一步的交谈。“我一向是只有从更年轻的人那里才能学到东西，而你无比年轻。”^①

王尔德虽然没能出席《欧墨尼得斯》的演出，但他和康斯坦斯在演出前一周去了剑桥，与莫里利尔和他的朋友们——还有奥斯卡·勃朗宁，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②“哈里，这不像是一场梦吗？”王尔德后来写道，“对于我来说，它多少可以算是一种音乐的记忆。我记得那些生气盎然的年轻脸庞，雾蒙蒙的灰色方院，希腊人在哥特式的回廊中穿越，在废墟中戏耍的人生，还有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爱——诗歌与悖论共舞。”^③

王尔德善于给人找麻烦。在莫里利尔的朋友J.H.巴德利的宿舍早餐会上，王尔德对一碟鸡蛋赞赏不已，他说这道菜看起来就像“日本天皇的标准”。他试图将巴德利对于雪莱的那份尊敬（“仅仅是男孩

子的诗人”）转移到没那么受人爱戴的济慈（“他们中间最了不起的”）身上。巴德利不抽烟，他为此辩解时称，自己“毫无疑问，因此错过了什么，体验不到适量抽烟的好处”，王尔德机智地回应道：“哦，巴德利，适度的东西都不会是好的。只有用过分的方式蹂躏它，你才能了解到它的好处。”^②

一天晚上，莫里利尔邀请一群朋友到他的房间来见王尔德。这场聚会差点儿成了一场悲剧——客人们还没到，房间里空无一人，一盏中国灯笼起火引燃了壁炉台上方的木板。幸亏莫里利尔及时赶回来扑灭了火焰。“你玩火的时候真粗心，哈里。”王尔德带着一丝狡黠说道。那天晚上，王尔德的讲话“精彩绝伦”。当大家请求他讲一个故事时，他选择了当初在美国尝试过的童话，他后来在巴黎也用过这种形式。但如果之前他认为自己的故事是写给孩子们看的，那么现在，他把故事抛给了更有见识的成年听众。

他在悲情的故事中点缀了些许讽刺，勾勒出一只小鸟爱上装饰华丽的“快乐王子”雕像的动人故事。它们站在城镇高处的一根圆柱上，目睹穷人和受压迫者遭受磨难，寻求通过向穷人分发雕像身上的一片片黄金和珠宝，来减轻他们的痛苦。这样的施舍让雕像失去了光彩，也让鸟儿失去了生命，因为它错过了飞往南方过冬的机会。两者都被扔进了垃圾堆。但是，当天使被派遣到这里，来获取城市里最珍贵的两件东西时，他带着死鸟和雕像的铅心回到了天堂。与其说这个故事打动了听众，倒不如说它对王尔德的影响更大。聚会结束后，他

仍然感觉自己“充满灵感”，于是彻夜未眠，详详细细地把故事写在了纸上。❶

他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很好奇这篇故事能带来什么样的契机。毕竟，文学童话是维多利亚时代丰富的传统。罗斯金在1841年创作的小说《金河之王》为开创这一文学体裁做了大量工作。❷而其他许多人，从狄更斯、萨克雷到安德鲁·朗格和莫尔斯沃思夫人，都以他为榜样，编织着看似简单的故事，却触动并超出了孩子们的想象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颠覆，戏仿旧的传统。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也许是这种玩笑嬉闹最明显的例子，尽管王尔德对美国人弗兰克·斯托克顿的巧妙寓言特别钦佩。作为斯托克顿的“漂流王子”的对手，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快乐王子”。❸

第二天早上，六个兴奋的大学生陪着王尔德夫妇到火车站。大家聚集在车厢的窗口，奥斯卡滔滔不绝地抛出一串串警句，在火车开动时更是达到了高潮。然而，火车竟然在启动时发生了差错。它倒着驶回车站，将王尔德的车厢拉到了学生们仍然站立的地方。他知道最好不要重新来一遍。于是他关上窗户，埋头读文章，其中就有他的童话故事初稿。❹

王尔德发现，哈里·莫里利尔是一个异常活跃的人。两人又见了几次面。王尔德去汉普顿拜访了莫里利尔的家。他们在泰特街共进晚餐——这是一个迷人的时刻，康斯坦斯的年轻朋友道格拉斯·安斯利也在场：他们为了纪念济慈，用绿色玻璃杯喝“黄颜色的酒”，奥斯卡编了几个童话，是关于一群住在康斯坦斯美丽的月亮石中的人们的故

事。⑨他们继续通信，继续探讨诗歌的舞蹈与矛盾。王尔德从格拉斯哥——“大雪和信纸都令人不愉快的地方”——写信，在其中提炼出一种艺术生活的愿景：

你也热爱着不可能的事物——对不可能之爱。（人们把它称作什么？）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正如我所发现的那样，根本不存在什么浪漫体验；有浪漫的记忆，有对浪漫的渴望——只有这些。我们最炽烈的狂喜时刻只不过是我们在别处曾经感受到的，或是我们渴望在某一天感受到的东西的影子。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还有，说来也奇怪，所有这一切带来的是一种热情和冷漠的古怪混合体。我自己愿意为一种新体验牺牲一切，我知道其实根本不存在新体验这种东西。我觉得，我更愿意为自己不相信的事物欣然死去，而不是为自己信以为真的事物。我愿意为了一种感官体验承受火刑，做一个怀疑论者，直到最后一刻！对我来说，只有一件事情始终具有无穷的魅力，即情绪之谜。成为情绪的主宰的感觉是美妙的，而被这些情绪所主宰的感觉会更加美妙。有时候我觉得，艺术生活就是一种漫长而愉快的自杀，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遗憾的。

我想象，你自己已经感受到了其中的许多，还有很多有待你去感受。世上有一片开满奇异花朵，弥漫着微妙香气的未知之地，这片土地上有人们梦寐以求的各种欢乐中至高的欢乐，在这里万事万物都完美而有毒性。

然后，他用一种刻意的矫揉造作结束了这封信：“我上星期一直在读沃尔特·司各特的著作：你也应该读一读他的书，因为那里根本没

有这一切。” ⑨

这封信优雅地平衡着各种矛盾——现实和梦想、热情和冷漠、殉道和怀疑、生与死、完美和毒药——这是一种受疲惫的感官主义及于斯曼笔下德塞森特刻意的是非颠倒所影响的愿景。而信中那句法语引言（L' amour de l' impossible，意为“无望之爱”）则并非出自《逆流》。它是约翰·阿丁顿·西蒙兹1882年创作的系列十四行诗的标题，该诗讲述了一个饱受折磨的艺术灵魂的痛苦，在“生命的奥秘”和“人类的情感”中寻找一种永远难以捉摸的幸福。其中一首十四行诗中，这位“艺术家”——他婚姻幸福，“既强健又聪明”，晃动着“长子的摇篮”——突然被长着蝙蝠翅膀的火龙“奇美拉”带走：当他的思想和感官发生反叛时，他感到一阵狂喜，“渴望得到不可能的东西”。 ⑩

尽管西蒙兹公开宣称这些十四行诗并非自传，但他私下里透露，这些诗歌表达了他自己与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的欲望，而火龙“奇美拉”象征着这种被禁锢但又十分强烈的欲望——对“无望之事”的欲望。 ⑪ 王尔德很可能已经猜到或了解到这个事实：对他来说，“无望之爱”已经成为一个带有特定性意义的密码短语，而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渴望满足的表达。他把这句话翻译成希腊语，似乎是想把它和古希腊的恋童癖传统联系起来，他曾经在学生时代对此怀有好奇心。同性恋激情这个话题肯定又回到了他的脑海中。在他对《逆流》的思考中，最令他着迷的是那些有关德塞森特和一个奇怪的年轻人相互之间关系的段落。 ⑫

就像王尔德一生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一个方向的发展刺激了一种同时发生的、几乎完全相反的冲动。他婚姻幸福，“既强健又聪明”，足够担当起学校督察的职位，当他晃动着“长子的摇篮”，他的妻子即将生下第二个孩子时，王尔德却突然被那种同样的“无望之爱”迷住了，对年轻男性产生了感情和性的渴望。他后来将其描述为“就像一种疯狂”，“降临到许多自认为远离了伤害、可以安稳地过日子的人们的头上”，使他们“突然被那无穷尽的欲望所苦恼”，并导致他们“无休止地追逐不可能得到的事物”。^⑩

看来他无法得到哈里·莫里利尔。尽管这位“极其年轻”、极具同情心、极具吸引力的莫里利尔为这种种感觉提供了焦点和刺激，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对此予以承认或回应。他始终在两人的交往中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称奥斯卡为“王尔德先生”。1886年6月，王尔德在给他这位年轻朋友的信中试探性地表达了他的愿望：“生命中至少有这样一种美丽的奥秘，在人生感觉最圆满的那一刻，发现自己的神龛里有一个秘密的神圣的壁龛空着，正虚位以待。然后便是一个细腻的、充满期待的时刻。”^⑪如果这算是个邀请，那么莫里利尔没有接受。这封信是他们之间留下来的最后一封通信；两人后来没有再见面。对王尔德来说，“细腻的、充满期待的时刻”被拉长了；壁龛仍然空空如也。^⑫

尽管如此，王尔德还是会在各种社交活动和新闻工作的过程中，下功夫寻找其他喜欢艺术的年轻人做伴。他被“世纪行会”的理想世界所吸引，该组织位于菲茨罗伊街的一所房子里，由三位狂热的罗斯

金崇拜者发起成立：阿瑟·麦克默多、塞尔温·伊马热和22岁的赫伯特·霍恩。为了促进工艺美术品的社会参与，他们创办了一本小型季刊，王尔德为其撰写了一篇关于济慈的文章。⑩霍恩有志写诗，王尔德予以了鼓励。“你的诗很迷人，”他说，“你把简单和陌生完美地结合了起来。”⑪

霍恩也和王尔德一样，对注定要失败的浪漫主义诗人托马斯·查特顿充满热情。他们合作了一项计划，意在保护和纪念他的出生地——布里斯托尔的皮尔街上的一所小校舍。⑫为配合这项计划，王尔德计划给《木马》杂志写一篇关于查特顿的文章。这篇文章虽从未发表，但王尔德在伦敦的伯克贝克文学与科学学院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位诗人的演讲。尽管当晚的天气“相当可怕”，但王尔德惊奇地发现大厅里竟然坐了800人，“他们似乎真对这个神奇的男孩感兴趣”。⑬

王尔德将查特顿描述为“文学浪漫主义运动之父”，是布莱克、柯勒律治、济慈、丁尼生、莫里斯和罗塞蒂的先驱。⑭王尔德也许还希望称其为生身父母，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寻找他自己的艺术观念及其与道德和现实主义关系的种种暗示。查特顿短暂的人生无疑具有启发性。他曾是一位文学造假者。他的作品主体（在他17岁自杀前完成）据他声称，是由15世纪一位布里斯托尔僧侣所写的诗组成。这是一种欺骗，一旦被揭露，就增加了他的浪漫魅力，混淆了他的批评立场。王尔德在演讲结尾时问道：“他仅仅是一个具有文学才华的伪造犯呢，还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后者。查特顿也许不具有道德良知，从事实来看的确如此，但他有艺术良知，从美的角

度来看这也是真的。他具有艺术家的表现愿望，如果在他看来，完美的表现需要伪造，那么他就必须伪造。不过，这种伪造源于艺术上的自我隐没。他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也就是说，他的目标不是展示自己，而是给予快乐。”王尔德声称，查特顿看清了“想象的领域不同于事实的领域”，并且明白“表达自己年龄的是理想，而不是现实主义艺术家”。^⑨

然而，查特顿并不是唯一一个占据王尔德思想的“神奇男孩”。1886年，王尔德结识了17岁的罗伯特（罗比或博比）·罗斯。他小个子，聪明，塌鼻子，其长相和活泼的样子像个小精灵。伦敦生活的种种可能将两人拉拢到了一起，但他们究竟是如何认识的，至今仍不详。^⑩罗斯的父母是一对地位显赫的加拿大夫妇，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兼政治家，在他两岁时就去世了，这促使全家搬回欧洲。罗斯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长大——接受私立教育——对艺术和文学过早产生兴趣。他和母亲以及两个姐妹一起住在肯辛顿，在附近的一家补习班学习，为上剑桥做准备。王尔德发现他“很有魅力，也很聪明，具有优秀的品味和扎实的知识”。^⑪

然而，罗斯的早熟超越了品味和知识，延伸到了性的方面。他很早就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同性恋本性；17岁的他既经验丰富，又充满好奇心。两人的朋友关系建立不久，他便引诱了王尔德。^⑫王尔德后来提出了“总是年轻人引诱老年人”的理论。^⑬但他也表示，“没有人会对其他人产生任何真正的影响……影响几乎完全取决于当时所处的环境”。^⑭就他自身的情况而言，基础早已打好了。他头脑中对同性

恋的痴迷由来已久，与马哈菲共事，研究柏拉图，阅读西蒙兹和佩特的作品、伯顿的《天方夜谭》以及法国颓废派的作品等，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婚姻生活的传统束缚在他周围变得越来越紧，这个话题似乎呈现出一种新的刺激和一种更大的吸引力。

在性的方面，他对康斯坦斯的兴趣正在减弱，也许她对他的性兴趣也在减弱。1886年11月3日，她又生了一个儿子，起名维维安，这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处于怀孕的状态。⑩后来，王尔德承认自己对身怀六甲的妻子怀有些许身体上的厌恶。⑪即便说王尔德迟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和身体需求在于男性而不是女性，那么他已经逐渐意识到笼罩在他的性本能之上的“一种迫在眉睫的命运”。⑫他在与哈里·莫里利尔的友情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细腻的预期，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感。它在罗比·罗斯身上得到了满足。⑬

对王尔德来说，第一次特殊经历是一种启示——快乐、兴奋和解放。它打开了性行为和自我实现的新天地。王尔德过去总是选择“置身事外”——如今在性和激情的问题上，他表现得与众不同。他描述了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和“独立性”之后的“欢乐和狂喜”。⑭尽管对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性（无论如何描述）被认为是人们所做的事情——一种个人行为——而不是人们对“性”的表达，但毫无疑问，在王尔德看来，这种全新的经历使他提升并改变了身份。⑮它改变了他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也改变了他与自身的关系。从此以后，他的行动就必须保密，还要精心策划一种双重生活。他不仅背叛了康斯坦斯，还触犯了法律。罗斯实施诱惑的时机实在太重要

了。尽管自都铎王朝时代起，英国世俗法律就将男性之间的插入式性行为视为重罪，但直到1885年，男性之间的性接触才被确定为犯罪。

①那一年，议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将允许女性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从13岁提高到16岁，并提出制止最严重的女性卖淫行为，亨利·拉布谢尔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将男性之间的任何性行为称为“严重猥亵”，并将其定为非法。在几乎空无一人的议会，他的提案——稍作辩论之后——获得投票通过成为法律。王尔德一向抗拒各种社会习俗，他现在可以将自己视为罪犯和不法分子了。

他还将自己视为这一丰富多彩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的——传统的继承人，它从柏拉图和希腊人，一路传承到米开朗基罗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人物，他从书上读到过有关内容。他渴望接受其创造性和性的可能性。他向一位对此感兴趣的朋友解释道：

跟所有的希腊人一样，柏拉图承认有两种爱情，一种是肉欲之爱，在女人身上获得满足——这种爱情在智性上是贫瘠的，因为女人只有接受能力，她们什么都收下，但除了跟自然有关的东西，她们什么都不给予。希腊人的智性之爱或浪漫友谊让我们如今的人感到震撼，而他们认为这种爱在精神上是有意义的，是一种对思想和美德的刺激——我所指的美德是古人和文艺复兴时代人们理解的美德，不是英国意义上的美德，后者只不过是谨慎和伪善罢了。②

王尔德对年轻人的兴趣现在有了一种新的色彩，一种新的紧迫感。这些关系中既涉及知识关系，也包括性关系，两者之间的界限可能并不固定。他认识了22岁的马克-安德烈·拉夫洛维奇，一个来自巴

黎的俄国银行家的儿子，拉夫洛维奇经常在自己位于阿尔伯特厅大厦的优雅公寓里举办艺术和戏剧聚会。王尔德曾在《帕尔摩报》上热情赞扬拉夫洛维奇的《晚香玉和绣线菊》是“本非凡的小书”，里面收录了“奇特而美丽的诗歌”。^①虽然拉夫洛维奇本人一点也不美，但他很奇怪——也很有趣，“有一种精致的气质，纤细的腰身，纽扣孔上插着一朵梔子花”（他的一首诗中有一句引人注目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们的梔子花一样紧密相连”）。^②

王尔德和约翰·埃雷特·迪金森成了朋友。迪金森来自一个富裕的造纸业家族，热爱艺术，继承了赫特福德郡一座仿哥特式乡村别墅——阿伯特山庄。他还结识了W.格雷厄姆·罗伯逊，一位人脉颇广的年轻画家，与名媛母亲住在拉特兰门；还有演员亨利·欧文的长子H.B.欧文，他即将进入剑桥大学；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伯纳德·贝伦森是初出茅庐的唯美主义者，即将进入牛津大学；喋喋不休，打扮得油头粉面的哈里·梅尔维尔；另外还有阿瑟·克利夫顿，一个对自由主义政治感兴趣的年轻律师，而且还作诗；以及25岁的插图画家伯纳德·帕特里奇。

王尔德以一种傲慢姿态，与这些年轻的伙伴们调情。“你喜欢朋友们怎么称呼你？”他在信的结尾问罗伯逊。“‘W’？还是‘格雷厄姆’？我喜欢我的朋友们叫我——奥斯卡。”^③“我们在阿伯特山庄度过的时光实在是太迷人了，”他对亲爱的哈里·梅尔维尔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享受过了，希望我们以后能多见面，经常在一起。”^④他过分夸赞了他们的艺术成就。拉夫洛维奇的一些诗句被比作“法国大革命后的赫里克”。^⑤他评价克利夫顿对诗歌中的“音乐

有敏锐的鉴赏力”。^① 约翰·埃雷特·迪金森收到一篇充满溢美之题词，“赞美他无与伦比的艺术水准和无与伦比的个性”——尽管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创作了什么，他唯一留存下来的个性痕迹是他有一只名叫“Oodles”的腊肠犬，这条狗在他的遗嘱中占据了突出地位。^②

但即便所有这些友谊中都涌动着一股强烈的情欲暗流，我们也无法确定其中到底有多少人最后真正和王尔德发生了性关系。长相出众的伯纳德·贝伦森晚年吹嘘王尔德曾经向他发出挑逗；但他拒绝了，结果招来对方驳斥，称他这个人一定是“完全没有感情”，是“石头做的”。^③ 然而，这次回绝并没有破坏他与王尔德之间日益深厚的友谊。而哈里·梅尔维尔似乎更顺从一些。王尔德后来提到已经“拥有了”他。^④ W.格雷厄姆·罗伯逊则称，王尔德“从未透露”对他抱有任何性兴趣，并认为是他极为严谨苛刻的“纯洁”性格“保护了”自己。^⑤

相比之下，“亲爱的桑迪”拉夫洛维奇就没那么纯洁，也没有受到那样的保护。他对同性欲望这个话题很着迷。他的一部分诗歌触碰了这个话题；他甚至还为爱德华二世的情人“皮尔斯·加韦斯顿”发表了一篇颂歌。“你会带给我一种新的刺激，”王尔德对他说，“你能很好地把握浪漫和玩世不恭。”这种刺激更可能是智力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因为，虽然拉夫洛维奇的性本能是指向男性的，但他似乎已经将其升华为精神渴望和求知的欲望。^⑥ 他对知识的渴望可谓振奋人心。王尔德理所当然地很享受两人之间有关“更危险的爱情”的长谈。[有关同性欲望的命名——以及分类——当时仍然没有固定的说

法，一直处于争论状态：其信徒使用的是“性反转”(inversion)、“同性恋爱”(uranism)、“单性行为”(unisexualité)和“希腊式爱情”等术语。而其批评者青睐的是“鸡奸”这个词。J.A.西蒙兹在他1883年私人印刷的小册子《希腊伦理问题》中称其为“同性恋激情”。]没有什么话题是禁忌的。王尔德兴致勃勃地花了好几个小时描述《维纳斯先生》的奇异细节，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法国颓废派小说，讲述了一个无聊的贵妇（拉乌尔·德维尼兰）引诱并腐蚀了一个年轻男子；她计划在一场决斗中杀死他，对尸体进行防腐和部分机械加工处理，之后继续与其保持掠夺性的性关系。其中还触及乱伦的内容。但王尔德最经常提到的还是德塞森特与他在街上邂逅的神秘年轻人之间的关系。 ⑩

所有这些友情，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促使王尔德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同性恋欲望和同性恋性行为中。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超越他的家庭生活框架。他邀请这些年轻人到泰特街，把他们介绍给康斯坦斯；其中有些人还和她成了朋友。1887年罗比·罗斯与王尔德夫妇同住了两个月（其间他的母亲正在旅行），虽然这种安排几乎肯定会导致他和奥斯卡发生更多的性行为，但这也开启了他和康斯坦斯之间的一段快乐而持久的友谊。 ⑪

对王尔德来说，家庭生活仍然具有诸多吸引力。他和康斯坦斯的肉体关系当然发生了变化，也许已经终止了，但他暂时仍然继续与妻子分享着往日的兴趣、感情、抱负和焦虑。1887年夏天，康斯坦斯的哥哥奥索抛弃了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另一个女人私奔。

事实上，如此一来便凸显出王尔德夫妇婚姻的持久力和幸福感。❶孩子们在奥斯卡的心目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当维维安得了重病时，他心急如焚。❷

家庭圈子之外，在王尔德社交生活中占主导的仍然是更广泛的伦敦时尚潮流：各种非公开演出或者首演、招待会或晚宴，只要不是舞会。[王尔德对格雷厄姆·罗伯逊说，“不知是太过年轻还是太过年老，（我的妻子和我）现在从不跳舞。”]❸星期天他总是会出现在热恩太太那间拥挤的客厅里。他宣称：“有三件事是躲不开的：死亡、季度结算和热恩太太的聚会。”❹他和康斯坦斯开始张罗举办他们自己的招待会。第一次是在1886年7月1日下午，拥挤的派对上聚集了一批著名的“现代派”演员、作家和相关人士。❺从此，就有了每月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四（后来改为星期三）定期举行泰特街“家庭聚会”的传统。❻

这是王尔德喜爱的舞台。经过四年的演讲磨炼，他的口才变得更加自信。他的机智——以及他的娱乐精神——丝毫没有减弱；他的姿势一如既往地与众不同。当时有人如此生动地描绘了他的体态举止：

当他站立着说话时——（他）居高临下地将头部前倾，面对着他的听众（这是从他母亲处学来的一个技巧），这样他的声音就能穿透任何一间客厅里嗡嗡的谈话声，很容易被人听到，让他的存在感充斥溢满整个房间……当他坐着说话时——从腰部向前倾，面对听众；双眼注视着对方；右臂和手的动作很多，他的手臂自肩膀处尽情挥舞，丰满肥硕的手掌在手腕上自由地转动。他抛出一个观点……便靠回椅

子背上，盯着他的听众，就像在说：“对此，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①

总体效果是“他可能是从17世纪或者路易十五时代的贵族‘沙龙’里走出来的人物”。②

王尔德意识到了自己的天赋，总是愿意让位给其他人。他从不独占谈话。正如另一位朋友所说，他只是“碰巧随便在什么地方接个话茬儿，而且话说得那么幽默，大家很快都开心地笑起来……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话题是不恰当的；他从幽默的角度看待每一件事情，时而妙语连珠，时而抛出个笑话，令人眼花缭乱”。③他的笑声就是标点符号：“他会静观你是否领会了他的意思，然后突然发出一阵笑声，细细地享受自己的俏皮话或玩笑。”④

年轻的美国作家埃德加·萨尔图斯对王尔德“耍弄”小聪明时的那种“波澜不惊”感到相当不安。⑤但大多数人只是很享受这一点，也很佩服他“令人难忘的轻浮”，这也许正是王尔德作为一个健谈者的优秀素质。⑥他保持着一贯的社交技巧和积极的态度，喜欢赞扬别人而不是贬低旁人。他只通过暗示来表达不喜欢或不赞成的态度。⑦他经常采用自嘲的方式，遮盖自己的光彩。年轻女子玛丽·科斯特洛是伯纳德·贝伦森的意中人，她回忆自己曾经“连续五个晚上”见到王尔德。对此，王尔德对她说：“您已经耗尽了我的全部才思。我只准备了五个话题，现在已经用完了。我只能给您讲一个以前用过的。您喜欢哪个？（他们选择了‘进化’）。”⑧但这些都是私底下的表演，

越私密，越欢乐。朋友们注意到，王尔德在自己家里时，他的幽默感（与他的机智截然不同）会变得更加热情洋溢和富有感染力。①

在公众视野中，王尔德的才智就逊色多了。人们普遍注意到，“自从他剪短头发，成为‘已婚男人本尼迪克’之后，王尔德这颗星星就在地平线上”逐渐下沉。②他似乎已经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个志得意满的“世俗中产阶级”。他的服饰现在很传统——尽管总是有点过于时髦。他发胖了。他在性方面的新趣味仍然不为人知，也没有受到任何猜疑。媒体也许偶尔会提到他，但这些评论转瞬即逝。③如埃德加·萨尔图斯所言，“他曾经遭到丑化：现在这些丑陋的漫画形象已经消失了。人们都回转头：但不再看他了。”他“不仅获得了原谅——而且被遗忘了”。④从美国回来之后的五年里，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关注的东西——虽然细水长流地写了一些文章——他似乎已经沉浸在“优哉游哉”之中。⑤

尽管王尔德在豪华舒适的外表下保留着他的艺术抱负，但他的艺术抱负与社交野心产生了竞争。他至少在社交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他经常与老朋友卡洛斯·布莱克见面，并通过布莱克认识了年轻的纽卡斯尔公爵“林尼”，以及公爵挥霍无度的弟弟弗朗西斯·霍普勋爵。这层关系使得王尔德夫妇偶尔会被邀请到位于诺丁汉郡克伦伯的公爵家里做客。⑥对奥斯卡来说，这些拜访标志着他的社会地位攀上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新高峰。它们极大程度地满足了他那浪漫的优越感。事实上，“克伦伯”这个名字似乎对他有一种真正的魔力。他一有机会就要在信件和谈话中提到它，确认他的新地位。⑦

跻身于有爵位的人中间，激发了王尔德的创造力：他要努力在这样的人群中“超越自己”。一次，拜访克伦伯之后，他错过了火车，于是只好掉头回去等待下一趟车。在此之前，他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想给人留下个好印象，因而此刻他的记忆成了一座“死火山”：他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他已经“精疲力竭”，他的表演能力完结了。❶不过，他的闲谈有一种价值。正是通过这些聊天，王尔德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并且制订了计划。“聊到兴致所至，他便得到了一切，”当时有人回忆道，“警句，悖论和故事接踵而来。”❷讲故事在他的话语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自从前往剑桥拜访哈里·莫里利尔开始，他似乎就一直在编故事。每当一场社交活动即将结束，客人越来越少，人们开始攀谈起来的时候，他也许就要开口了。从他嘴里源源不断说出来的故事：有奇幻的、有历史的、有浪漫的、有恐怖的，还有关于圣经的——总是充满貌似自相矛盾的幽默，经常透出一股意想不到的深意。一名全神贯注的听客说，这些表演“如此自然”，王尔德看起来似乎是在说给自己听，但他表现得如此优雅，以至于他的听众会产生一种“感觉自己相当荣幸的错觉”，认为它们确实值得让人“花费想象力和精力”。❸他的故事从来不会一成不变。他无休无止地详细描述并提炼故事中的细节，再配以不同的结局、新鲜的笑话和不同的情绪状态。

自从一开始写了《快乐王子》之后，他就迟迟没有再把精力投入到写作上，也没有想过出版小说的可能性。一段时间以来，他母亲一直在鼓励他写小说。“假设你把故事情节……放在怀特岛，”她建议

道，“开始：第一句话就是一切。”^①渐渐地，他接受了她言语中的智慧。毕竟，一部短篇小说可以算作他想要创作的“更持久的作品”的一部分。而且，几乎所有期刊都会定期刊登短篇小说，在这样的市场中，小说比戏剧更容易卖出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打算谨慎行事。作为第一步，他试图通过某种关联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正如他发表的第一首诗是翻译的，他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也是译作——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由法语版翻译而来。他把它寄给老朋友乔治·麦克米伦。乔治起初对它的吸引力表示怀疑，但最终还是在1886年5月的《麦克米伦杂志》上为它找到了一席之地。这是一次非常低调的亮相，因为王尔德甚至还算不上译者。^②

尽管如此，它还是有意义的。他试图利用这一次的成功，于是便将《快乐王子》寄给了麦克米伦旗下的另一份期刊《英国画报》。编辑乔·科明斯·卡尔似乎对他的种种期望给与了鼓励，甚至还委托他写了另一篇文章——一篇以艺术家为原型的、幽默的非虚构文章。王尔德及时寄出了那篇文章，但随后出现了令人沮丧的静默，两份手稿都被搁置在编辑的抽屉里。^③然而，王尔德确信，他的童话故事应该有市场。于是他又写了一篇《自私的巨人》，并把它拿给劳拉·特鲁布里奇看，希望她能提供一些插图。但是，如果他认为图片会对杂志编辑产生一种额外的诱惑，那么这个策略并不成功。^④

王尔德最终以小说作家的身份取得了突破，作品既没有发表在麦克米伦的期刊上，也不是童话故事。《坎特维尔的幽灵》是一个关于超自然现象的幽默故事——附有插图——于1887年初分两部分连载

发表在《宫廷与社会评论》上。这是一份招人喜爱的高水平（但短命）的周刊，在编辑查尔斯·格雷·罗伯逊以及来自牛津贝利奥尔学院的助理阿尔萨格·维安的运作下，其内容涵盖了诸如法国“颓废派”、当代歌剧、戈德温的戏剧作品，以及“贵族女士们”等重磅话题。不仅是奥斯卡，而且连康斯坦斯和王尔德夫人也经常在其社交专栏中被提及。⑩罗伯逊很乐意将王尔德列入他的撰稿人名单。

王尔德的鬼故事滑稽地颠覆了这一流派的既定手法。一个喧闹庸俗、崇尚物质主义的美国家庭到古老的英国乡村租下一座宅第，吓坏了宅子里一个不幸的鬼魂——那是他从前的家。故事的结尾浪漫多情，鬼魂通过这个家庭里善良的少女获得了祝福和解脱。故事中的美国元素使得王尔德可以再次利用并提炼他的一些跨大西洋俏皮话，比如英国人“如今同美国简直什么都一样，当然，只有语言除外”。幽灵不喜欢美国，但当他听到美国人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废墟，也没有古董”时，王尔德让幽灵感叹着回应道：“没有废墟！没有古董！你们不是有自己的船队和自己的派头吗？”⑪虽然幽灵可能不喜欢美国，但王尔德揣摩美国人会喜欢幽灵。他把稿件寄给《纽约论坛报》编辑怀特洛·里德，报纸在星期日版上刊登了这篇“精彩的英美故事”。⑫

王尔德希望《宫廷与社会评论》能够继《坎特维尔的幽灵》获得成功之后再发表“一个短篇童话”（也许是《自私的巨人》）。⑬但对方似乎想要一些更成熟、更现代、更有趣，或许也更神秘的东西。于是王尔德准备另外再写一些数月以来他一直在构思的故事：一位手

相家告诉年轻和蔼的亚瑟·萨维尔勋爵，他不可避免地注定要杀人——于是他便开始尝试以尽可能不具攻击性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宿命。王尔德在一个简明版本中讲述了亚瑟“将毒药邮寄给一个久病不起的舅舅，杀死他是一种人道行为，而且他希望从他的遗嘱中获益。但是，一个人的毒药是另一个人的解药。两周后，他的舅舅举办宴会庆祝自己康复”。其他善意的尝试也同样遭到了挫败。然后：“一天晚上（亚瑟勋爵）绝望地沿着泰晤士河堤岸散步，他在心里思考着，自杀是否也算谋杀，就在此时他看到有个人正趴在栏杆上。周围看不见一个人，河水正在泛滥。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他的祈祷终于有了回报。他迅速俯下身，抓住那个陌生人的双腿；黑暗的漩涡中水花飞溅，和平降临在亚瑟勋爵身上。他完成了任务后，美美地睡了一觉。”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启事，标题是“知名手相家淹死——兰塞姆先生自杀”。亚瑟勋爵给葬礼送了一个花圈，上面写着“感谢”二字。

王尔德给这个故事编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用“精致的幽默和想象力”加以阐述。尽管他有时会试图说服听众，他不想发表这个故事——“写这些东西太无聊了”——但没有人会相信。⑨《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于1887年5月在《宫廷与社会评论》上适时地分成三部分发表（同样由年轻艺术家F.H.汤森绘制插图）。虽然听过这个故事的人可能会说，王尔德的即兴口头讲述要精彩得多，但印刷版本中优美的行文和巧妙的措辞仍有很多值得欣赏的地方。王尔德夫人热情地称这个故事是“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她认为故事情节的“神秘性”令人“激动”，并接着道：“你的警句式风格在这类作品中产生

了效果。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成为小说界的迪斯雷利。你所有的社交知识都很有用，尤其是你身边的女人们。” ⑨

她的判断非常公正。这个故事，相比之前几个，听起来很独特，很有个性——它体现在贵族家庭富有情调的魅力中（它从“温德米尔夫人在复活节前的最后一次招待会”开场），浪漫而不真实的情感中，荒诞不经的情节中，肆意挥洒的悖论中。警句中清晰地回响着王尔德自己的声音：“他一生最可贵的东西是实事求是”；“他不是个天才，因此没有仇敌”；“那种寻欢作乐的非凡的激情就是她保持青春常在的秘密”；以及“最最与天真烂漫相似的，莫过于放荡不羁了”。

王尔德继续与《宫廷与社会评论》保持着愉快的联系，直到第二年这份杂志停刊前不久，他偶尔在上面发表一些不署名的文章和评论——甚至还有一首十四行诗，只是为了提醒公众，他仍然是一位诗人。⑩但他接下来的两篇短篇小说都发表在《世界》杂志上，后者的知名度更高，读者群也更广。《艾尔罗伊夫人》和《模范百万富翁》保持了他早期作品中简洁的反转，世俗的喜剧基调和闪耀着光芒的警句，第二个故事（关于一位百万富翁打扮成一个乞丐给艺术家拍照的故事）则采纳了他自己在一篇有关模特儿的文章中的若干观点，那篇文章当时仍然沉睡在《英国画报》的草稿箱里。

看到自己的名字再次定期出现在报纸上，是件让人愉快的事情。他埋身于朱红色的书房里，感觉到了当作家的滋味。他想要拓展这个角色，于是开始构思“一个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有关的故事”，同时

继续推进他的童话写作。❶虽然没找到出版人，但他还是又写了几篇：《夜莺与玫瑰》（一个关于爱情和自我牺牲的诗意故事）；《忠实的朋友》（一个关于剥削的残酷喜剧故事）；还有《不同凡响的冲天炮》，标题中极其自负的烟火也许讽刺了惠斯勒的虚荣心。“你得想到别人，”冲天炮曾经提醒一个谦卑的爆竹，“事实上，你得想到我。我常常想到我自己，我希望每个别的人都想到我。这就是所谓的同情。这是一种美丽的德性，我倒是有许许多多。”

对一个故事来说，任何一种解读都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王尔德对一位未来的评论者解释，他喜欢“想象每一个故事可能包含有很多种意思”：“我并不是先有一个想法，然后再给它套上一种形式，而是先有一个形式框架，然后努力使它足够漂亮，拥有很多秘密和许多的答案。”❷王尔德把这些故事称为“行文中的探索，为了浪漫的缘故而将其变成了一种幻想的形式”。如果这些故事“在部分程度上是为儿童”写的，那么它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为那些保持着好奇和快乐的童心，并且能够于简单中发现微妙之处的人所写的”❸（他有时候把这些故事称为“为8岁至80岁的，孩子气的人写的”）。❹他把其中一些故事读给西奥多·沃茨听，沃茨很喜欢，但他建议用诗歌来写可能更好。然而，王尔德仍然忠于他对这些作品的想法，认为它们是“散文小品”。❺它们只需要一个出版商。

尽管王尔德很活跃，但他依靠写作仍然挣得很少。短篇小说即使出版了，也不会比书评挣得更多。经济上的忧虑继续困扰着他。结婚时从康斯坦斯的信托基金和奥索那里所借的钱都需要支付利息，不过

他没有钱。❶一天在弗朗西斯·霍普勋爵的房间里，话题转向了金融，据报道当时伦敦金融城“资金非常紧张”，王尔德插话道：“啊，是的；那种紧绷的气氛，连泰特街也感受到了。”王尔德说他整个上午都“在大英博物馆里盯着一枚装在盒子里的金币”。他对年轻的美国作家埃德加·萨尔图斯欣然吐露说，自己现在唯一能付出的就是赞美。

❷为了节省开支，他们甚至计划出租泰特街，也就是康斯坦斯和他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颇具审美品味的“美丽之家”。但由于找不到房客，他们只得在那里继续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用康斯坦斯的话来说，希望“明年以后我们还能继续住下去”。❸就这一点而言，倒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理由值得让人乐观。

7 《女性世界》

这是一场文法与神秘主义的较量，比赛仍在激烈进行。我恐怕不得不作出让步。

——奥斯卡·王尔德

奥斯卡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1887年4月，卡塞尔出版公司总经理威姆斯·里德找到他，想让他参与编辑，“并在一定程度上重组”公司最近创刊的高端月刊《淑女世界》。王尔德作为服饰改革家一直声名在外，而且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和妻子还是一对著名的具有审美情趣的夫妇，也许正是这些原因才促成了这桩事情。公司承诺给他一个正式的头衔和一份固定的收入，这个机会既讨人喜欢，又解了燃眉之急。王尔德同意接下这副担子。

他满脑子都是点子。他认为杂志目前的状态“过于娇柔，女人味不足”，建议“把面放得更宽一些”，“立足点站得更高一些”，减少“女帽和装饰品”，少一些昂贵的时尚图片，更多地关注女性在“想什么、感觉是什么”。他需要女性对艺术和现代生活的思考，有趣的文学评论（“如果一本书鼓噪乏味，那就不置一词”）和系列故事（“激动人心但不是悲剧性的”）。他想象着各方面人士都来投稿，包括来自皇室（也许是路易丝公主，或者克里斯蒂安公主）、来自美国（朱莉娅·沃德·豪）、来自巴黎（亚当夫人），来自大学（汉弗莱·沃德夫人）以及偶尔来自男性作者的稿件。

王尔德热衷于打破和利用传统的性别划分。至少在艺术领域，他已经准备宣布性别是无关紧要的：“艺术家有性别，但艺术没有。”他希望在自己担任编辑期间，这份杂志能成为“一份男人爱读而且乐于投稿的刊物”。^①他建议改变封面，并为它起个新名字。^②在他——以及他所有的女性朋友——看来，《淑女世界》显得“有点俗气”。一本旨在面向“有智慧、有教养、有地位的女性”的刊物，应该被称为《女性世界》。他声称，这个名字是著名的《绅士：约翰·哈利法克斯》的作者克雷克夫人推荐给他的。^③

条件达成了，王尔德从5月1日开始领取薪水。确切的金额不得而知，不过当时有人估计他的薪水约为每周6英镑（每年超过300英镑）；虽然算不上很多，但比起他一直以来的收入要高得多。^④虽然王尔德负责的第一期刊物还要过六个多月才出版，但他一刻也不耽搁地投入了准备工作：在不知疲倦的热恩夫人的帮助下，他起草了一份可能提供稿件的作者名单；安排了“与重要人物”的面谈；写了“无数的信件”去征求和建议各种稿件。

从王尔德抵达伦敦的那一刻起，女性就一直是他重要的盟友和支持者。正是她们将他迎进自己的家中，乐于与他为伴，倾听他对艺术的看法。现在机会来了，他要以他的热情，他的投入，以及“每页一畿尼”的稿费（与《十九世纪》和《双周评论》的出价相同）来回报她们。他给知名的“女作家”、文学女性、社会改革家、先锋专业人士、社交界的女主人们，以及奥斯卡·布朗宁写信。他向沃尔特·佩特的妹妹、马修·阿诺德的女儿、刚从剑桥大学格顿学院毕业的海伦娜·西克

特和几乎不会变老的维奥莱特·亨特征求稿件。他不但没漏掉他的朋友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夫人和多萝西·内维尔夫人，而且还接触到了——更加恭敬地——泽西伯爵夫人和索尔兹伯里侯爵夫人。他委托老朋友康斯坦斯·弗莱彻（“乔治·弗莱明”）创作系列小说，并说服维奥莱特·费恩（辛格尔顿夫人）寄来了诗歌。②

也许他最成功的一招是获得了流行小说家奥维达（或玛丽亚·路易莎·拉梅）的支持。当时她从意大利来到伦敦，住在朗廷酒店的一个套间里，款待客人的时候出手非常阔绰。王尔德赶去大献殷勤。他们俩之间有很多理由要聚一聚。48岁的奥维达代表了一种文学现象：她的社会生活小说色彩丰富，其中有思想独立的女主人公和贵族英雄，虽然“略微超出了家庭藏书可以稳妥接纳的底线”，却是当时的畅销书。这位拉梅小姐在圣埃德蒙兹伯里的一个普通家庭长大，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秘而有魅力的女人。正如热恩夫人所说，她“无比热爱坏名声”，渴望结识“每一个值得了解的人”。尽管她身材矮胖，穿着品味古怪，说起话来声音像“切肉刀”，但她是伦敦社交界的“名女人”，她既浪漫做作，又厚颜无耻地自以为是。“既然乔治·艾略特走了，”据说她曾经宣称，“那么（除了我）就没有人会写英语了。”

当大多数自命不凡的文人看不起她和她的作品时，王尔德从牛津上学的时候起就一直是奥维达作品的拥护者。尽管它们也许言语啰唆，微不足道，充斥着语法错误，但它们有自己的风格。他称，发现

其文字如同他所欣赏的罗斯金、佩特和西蒙兹的作品一样“生动可爱”（罗斯金也不太可能是奥维达的粉丝）。❶

王尔德凭借着满腔真诚的热情，很快成了奥维达在朗廷酒店套房的座上宾，他不仅参加时尚的招待会，还参加她的私下晚宴。他善于奉承她，并且能够逗引得她畅所欲言。在一次晚宴上，他对她说：“您的作品让我非常欣赏的一点是，您对风景和环境的描绘非常生动。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感觉自己身处在特定的环境中。”“啊，是的，”奥维达回答，“所有这些都的确如此，但这还不是我的书中最精彩的地方。我的作品中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我是按照公爵夫人说话的方式来写作的。”❷ 1887年6月，奥维达即将离开英国时宣称：“英国只有一个男人……值得一见或聊一聊，那就是奥斯卡·王尔德。”❸ 王尔德获得了她为杂志撰稿的承诺——尽管她一向性格乖张，不太喜欢杂志的新名字。❹

随着他接受任命的消息不胫而走，王尔德还收到了大量毛遂自荐的材料。一些昔日的老朋友因此找到了他，其中就有爱尔兰艺术家兼作家伊迪丝·萨默维尔。她向自己的表弟兼合作者维奥莱特·马丁讲述了王尔德的编辑工作：“我昨天去见了奥斯卡……他是个又肥又油腻的家伙……他假装对我很感兴趣……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懒洋洋地拿了几首十四行诗，准备把它们邮寄回去。他满嘴废话，说什么‘法国题材应该由法国艺术家来画’——我差点就要对他说，就像约翰逊博士说的那样：‘赶肥牛的人，他自己一定也很肥。’”❺

《女性世界》的创刊号于1887年11月初发行，装饰一新的漂亮封面上“奥斯卡·王尔德”作为编辑赫然醒目。其刊登的署名文章中有一篇是关于E.W.戈德温在库姆街的露天戏剧表演（“阿奇夫人”坎贝尔绘制了插图，并且还在其中的戏剧《如你所愿》中变装扮演了“奥兰多”），还有关于“牛津女子学院”、“阿尔卑斯山风景”、城市儿童贫困（热恩太太），以及关于塞维涅夫人的祖母的文章（由萨克雷的女儿撰写）。王尔德发掘的艾米·利维（“只是个女孩子，但是个天才女孩”），贡献了一篇非常短的故事。朴茨茅斯伯爵夫人就“女性的地位”发表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她巧妙地提出，女性更强的独立性和不断增长的权力也许可以“让男性变得更强大”。时尚也没有被落下，但八页插图精美的最新伦敦和巴黎时尚被放在了杂志的最后，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出现在最前面的位置。❶王尔德撰写了一篇《文学暨随笔》，其中汇集了从克里斯蒂安公主，到他在牛津的老朋友玛格丽特·布莱德利（现在是“玛格丽特·L.伍兹”）——他慷慨地将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的一系列女性作家的作品。文章中还有一段对克雷克夫人的赞美，她在给杂志寄出最后一篇小说后不久便去世了。

人们热切地期待着王尔德这份杂志的处女秀，它至少在伦敦引起了轩然大波。据报道，杂志出版的当晚，“伦敦西区一份难求”。❷杂志的反响很不错。这次重新登场获得了“成功”——在《淑女世界》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步”。它那“出色的插图”，以及一连串“尊贵的”“女性”作者阵容受到了普遍关注。人们称赞它的文章“视野更广阔”、“主题更多样”、讨论的格调“变得更高”。❸

王尔德的文学评论被以各种方式描述为“清新”“有趣”，并且“写得相当好”。《观察家报》赞赏地评论道，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个性或他众所周知的观点过多地强加给读者”。^①

人们预言，这份杂志未来会取得成功，并将这一切归功于王尔德的编辑才能——“毫无疑问，它将在女性中发挥最大的作用”。^②过去曾经有女性“追求过他”，有人预计她们还会这样做。^③这其中有一个反对的声音：王尔德夫人非常恼火，奥斯卡在最近有关女作家的评论随笔中，竟然没有提到她。她连忙写信向他告知了这一点。

亲爱的编辑先生，

为什么你在对夏普太太书籍的评论中没有提到我？我，这样一位在爱尔兰文学中具有历史地位的人？况且你提到了泰南小姐和马尔霍兰小姐！

《汉普郡评论》对我大为推崇——而你——哦，简直不可思议。我已经把奥斯卡·王尔德编辑的《女性世界》借给了费舍尔太太。阿奇夫人是女性散文家中最出色的一个。乔治·弗莱明起初很有趣——也很好——但总的来说，女人是一群不足道的人。

你读了威利写的关于苏打水的文章了吗——简直太棒了——（刘易斯）阿诺德（《每日电讯报》编辑）很高兴。

星期日晚上来谈谈。我现在几乎没有空暇——我肯定会在一两周内彻底完蛋的。生活中的麻烦实在太多了。

你的 痛苦的母亲 ①

他将王尔德夫人的长诗《历史女性》作为1888年1月号的开篇，才算是平息了母亲的怒火。这首259行的诗中包括一段有关维多利亚女王的激动人心的文字（“至高无上的女性……与她的王室威严融为一体/女人生活中柔和甜美的音乐”）。② 这期杂志被寄到温莎，一名侍女立即回复说女王“非常喜欢这首诗”。③ 王尔德鼓起勇气，询问女王陛下是否愿意亲自为杂志投稿——或许是“女王年轻时写过的一些诗”。但是，这个提议没有获得接受。④

王尔德这颗星星“再次上升起来”。⑤ 他很享受编辑这个角色。每周有三个上午，他从泰特街出发，从斯隆广场乘地铁到查林十字路（现在的河堤地铁站），沿着斯特兰德街和舰队街一路漫步，然后穿过一道拱门进入“拉贝勒索瓦吉酒店”，这里原本是个驿马旅店，现在是卡塞尔出版公司的办公地。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公司里（里面还有公司的印刷机），王尔德像一只奇异的鸟一样引人注目。他仪表考究，衣着优雅，一位同事说他，“无疑是这里穿着最光鲜的人”。他与一名助理编辑合用一间办公室。王尔德发现这位27岁的阿瑟·菲什不仅“可靠、聪明”，而且很招人喜欢；他开始把他当作一个“真正的朋友”。⑥

菲什后来回忆起那些早期的编辑工作：“他微笑着进门，机智活泼地答复一封封来信，这些工作完成后，他会愉快地聊一会儿天，在（王尔德）的强大人格影响下，沉闷的屋子变得明快起来。”⑦ 这本

杂志开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性：有文化，有思想，善于社交，而且还很时尚。

一直以来，杂志在报道当今的重大女性话题时似乎有一条刻意遵循的编辑原则：“男性优越论之荒谬”需与“女性平等论之荒谬”相搭配，“女性的选举权”要搭配“反对女性选举权之理由”。但菲什毫不怀疑，在王尔德的指导下，这本期刊的主旨是“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待遇的权利”。许多有关政治和社会话题的文章“远远超前于当时的思想”。王尔德对这一点予以了鼓励。每当威姆斯·里德拿着引起争议的文章过来谈谈时，王尔德“总是对作者的观点表示完全理解，并且在女性的政治抱负方面表现出一种毫无疑问十分真诚的自由思想”。^①

王尔德还得忍受来自管理层的困扰。里德批评前几期杂志“在倾向上过于文学化”；而且他对财务一直控制得非常紧。^②但是，这些检查并没有减少工作的乐趣。从事一份正式的工作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至少他的一位朋友认为，王尔德成为《女性世界》的编辑后，“社交界”开始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看待他了。^③

王尔德执掌着一份受人尊敬的月刊，这使他在文学界获得了新的地位。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专家，可以和同行们在大致平等的条件下见面。他与弗兰克·哈里斯成了朋友，后者是《双周评论》最近任命的编辑（由热恩夫人促成并介绍认识）。他们经常在一起吃午饭。哈里斯性格自以为是、说话肆无忌惮，13岁便离开了学校，他被王尔

德身上那种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博学和机智深深吸引。王尔德发现哈里斯的精力和好奇心时而振奋，时而疲惫。 ⑨

他的另一个新朋友，是同样具有好斗秉性的文学伙伴W.E.亨利，他一年前还是卡塞尔《艺术杂志》的编辑，现在成了它的竞争对手《艺术学报》的顾问。亨利比王尔德大五岁，身形十分出众，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和胡子。由于罹患骨头结核，他的左腿从膝盖以下被截肢了。众所周知，他走路时拄着拐杖，曾经为史蒂文森充当《金银岛》中高个子约翰·西尔弗的模特。他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暴跳如雷，既“聪明得惊人”，又极其固执己见。在政治上，他是狂热的统一派和帝国统治拥护者，而在艺术和文学上，他崇尚“现实主义”。据说他受到拉斐尔前派的影响，“就像是人受到屋子里猫影响一样”。 ⑩

考虑到这些偏见，他过去一直对王尔德抱有怀疑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现在，他渴望见一见王尔德，于是他说服卡塞尔公司的前同事安排了一顿晚餐。据传，亨利在整个用餐过程中一直试图用侮辱和矛盾的话语来激怒王尔德。王尔德起初对这些攻击指责不予理会，只是温和地回应“是”“不是”“是吗？”，但他最终醒悟过来，接着便是一场漫长而激烈的争论。直至主人在凌晨时分将他们赶出家门时，两人还在争论不休。第二天，当同事在办公室见到王尔德，并询问他事情如何收场时，王尔德回答说，“哦，一小时前我们刚刚为一片熏肉争吵完。” ⑪

这件事证明，两人确实有过一段突如其来——而且短暂——的友情。W.B.叶芝回忆第一次见到王尔德是在位于奇西克的亨利家中定期举办的“星期日晚会”上。王尔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言谈非常精彩——令叶芝惊讶的是——他说出来的句子都非常完美。就在那天晚上，他描述佩特的《文艺复兴史研究》是他的“黄金之书”，并称：“无论旅行到哪儿，我都要带上它；但它是真正的颓废之花；最后的号角就该在它写完的那一刻响起。”有乏味无趣的人问：“难道你不愿意留点儿阅读它的时间吗？”对此，他回答道：“哦，不——以后有的是时间——在另一个世界里。”王尔德称，他从不回复信件，并讲述了自己如何以此维护卡塞尔的运作管理，这番话令亨利大为赞赏：“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来到伦敦时前途一片光明，由于养成了回信的习惯，我看他们没过几个月就彻底完蛋了。”

之后，亨利赞赏地评价王尔德说：“不，他不是个审美家（在亨利的书中这是一个贬义词）；你很快就会发现，他是个学者和绅士。”王尔德要是听见这番评判，一定会很高兴。他想给亨利留下好印象。正如他后来向叶芝坦承：“为了能与他平起平坐，我必须绷紧每一根神经。”^⑨

这样的紧张气氛为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艺术记者C.刘易斯·欣德回忆起一天晚上在奇西克，亨利和王尔德正在谈论雪莱，这场“狂野而又固执”的谈话可谓“大刀对长剑”。

^⑨然而，这种紧张关系随时都有可能失去平衡。当时曾经有人记得，看见这两个人一边聊着离开剧院；王尔德说了些什么，亨利便把拐杖

朝他扔了过去。❶王尔德描述文人之间友谊的基础就在于“搅拌那个掺毒的碗”，这一说法用在亨利身上无疑是恰当的。然而，王尔德本人并不是投毒者。他本能地坚信人类的同情心和专业上的包容大度。当亨利年老的母亲生病时，他写信安慰道：“所有的诗人都爱他们的母亲，我崇拜我的母亲，因此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❷他为亨利的《诗集》写了一篇非常积极的评论——虽然有点夸张——赞扬了作品中展现的“强烈的人文个性”。❸

这些人际关系将王尔德越发地拉近文学界的核心。他成了罗比·罗斯的哥哥亚历克创办的作家协会的成员。他参加为美国作家举行的宴会，支持他们为获得国际版权而努力——尽管当晚多少有些尴尬，因为他发现自己旁边坐的是科林·坎贝尔夫人，他和她关系很不好，因为之前她曾经说他像“一条巨大的白色毛毛虫”。❹相比之下也有快乐的时光，他曾经作为主宾出席“藏书爱好者餐饮俱乐部”举办的藏书家晚宴，并在晚宴上发表了一篇“最精彩的演讲”，其中赞扬了“水牛比尔”（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后者最近将他的狂野西部表演带到了伦敦。❺亨利提出推荐他成为萨维尔俱乐部的会员，那是当时顶尖的文学俱乐部。王尔德认为，他即便只在那里吃顿午饭，也会像“一头可怜的狮子”鲁莽地闯入“凶猛的丹尼尔斯的洞穴之中”，而要成为会员简直遥不可及；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尽管有亨利·詹姆斯、埃德蒙·高斯、赖德·哈格德、亚历克·罗斯、乔治·麦克米伦和其他25人的支持，王尔德一直未能入选。❻

然而，尽管偶尔遭到阻挠，王尔德还是越发地愿意参与公共生活和公共问题。他成了各大会议上的人物，众多委员会的成员。在一次讨论拟议中的“英国艺术与工业发展协会”的聚会上，王尔德幽默地指责埃德蒙·高斯引用了英国贸易委员会的统计数据，他说：“我们根本不想听到这些东西。”^①让惠斯勒大为恼火的是，他还受邀加入了国家艺术展览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群居住在切尔西一带，反对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家的艺术家发起成立。惠斯勒立即在《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封信，谴责王尔德参与其中：“奥斯卡跟艺术有什么共同点？除了他跟我们一块儿吃饭，拿走我们碟中的李子，把它们做成布丁，然后又到各地去四处兜售。奥斯卡——这个和蔼可亲、不负责任、贪得无厌的奥斯卡——他对于绘画，就像对一件衣服一样毫无品味，竟然有胆量发表意见——而且还是对别人的作品！”^②一周后，王尔德写信回复道：“阿特拉斯，真悲哀！在我们的詹姆斯看来，‘粗俗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它应该一直保持下去。”^③

他开始超越文化问题，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尽管王尔德在名义上一直是自由党的选民，但他此前一直与各政党政治保持距离。他支持爱尔兰自治的坚定信念、一种诗意的共和主义，对“社会主义”理想抱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好感，除此之外，王尔德将他的政治信仰集中在一句话中，即他支持“文明”针对“野蛮”的斗争。^④

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绝妙的孤立状态变得越发难以维持。1885年，75岁的格莱斯顿重返政坛，“皈依”了爱尔兰地方自治和土地改革事业，他与自由党和极具感召力的领袖查尔斯·斯图尔特·帕

内尔麾下爱尔兰议会党的86名议员站在了一起。格莱斯顿希望与这些新盟友一起，推行一项地方自治法案。这项法案于1886年6月提交到议会，却因大部分自由党人的反对而被否决。这场溃败将自由党分裂为“格莱斯顿派”和“统一派”，加剧了英国政治生活的分歧。格莱斯顿要求立即举行选举——实际上是要求对地方自治问题进行全民公投。他被彻底击败了，保守党和“自由统一党”获得了绝大多数票。然而，通过英国议会制度实现爱尔兰政治权力下放的巨大希望已经被点燃。格莱斯顿和帕内尔都对胜利持乐观态度。许多人受到鼓舞，团结起来支持这项事业。王尔德就是其中之一。

1887年夏天，他成为八十俱乐部的一员。这意味着他公开宣告了自己的政治承诺。该俱乐部成立于1880年，旨在促进“自由事业”，并迅速发展成为格莱斯顿自由主义的核心阵地和爱尔兰地方自治政策的“智库”。1886年大选之后，俱乐部的“统一派”成员被迫集体辞职；替代他们的是在1887年6月29日的一次会议上当选的大约80名新成员。几乎可以肯定，王尔德就是其中一员。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之中。与他同时加入俱乐部的还有乔治·麦克米伦、贾斯汀·麦卡锡和霍顿勋爵；E.T.库克（他是《帕尔摩报》文学版的编辑）和查尔斯·迪尔克之前已是会员，很可能是他们提议吸纳了王尔德。

对当前政治局势的担忧和愤怒冲淡了八十俱乐部成员的乐观情绪。1887年8月，爱尔兰保守党首席秘书阿瑟·贝尔弗提出《强制法案》，面对农村地区的大范围动荡，他获得了广泛的权力来“恢复秩序”。他在王尔德当年在圣三一学院的同学，法官爱德华·卡尔森的坚

决协助下，通过简易程序对在爱尔兰活动的著名自治运动人士做了快速定罪。英国诗人威尔弗里德·斯考文·布朗特和爱尔兰政治家威廉·奥布莱恩也在被监禁之列。

王尔德对这些措施表示谴责，并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反击。除了参加八十俱乐部的活动之外，他还支持了贾斯汀·麦卡锡在南华克爱尔兰文学俱乐部所做的关于革命的“48年文学”演讲。他甚至在活动上发表即兴演讲，提到他的母亲（演讲中提到了她的作品）将出版一本《爱尔兰传说》，他将“向伦敦的每一个爱尔兰俱乐部赠送一本书”。^⑨他还在自己的文章，以及偶尔为《帕尔摩报》撰写的书评中加入了同情地方自治和反对保守党的言论。在辩论中支持另一方的老朋友们纷纷遭到他的指责。

王尔德用笔诙谐地驳斥了“马哈菲先生的新作”《希腊人的生活和思想》，从一个强硬的统一派的角度来看，该书内容与当前爱尔兰的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他称该书“失去了价值”，充满了“政治偏见”和“盲目轻率”，企图“将希腊人的世界作为‘显然大写了的提帕拉里’……在米切尔顿的大平原上粉饰喀罗尼亚之战（威廉·奥布莱恩就是在那里被定罪的）”。^⑩威尔弗里德·布朗特根据他在爱尔兰监狱的经历创作了一本诗集《在监禁之中》，王尔德热情地读了这本诗集，称监禁对他的诗歌产生了“极佳的影响”。他说：“贝尔福先生的诡辩书《哲学怀疑的辩护》，是我所知道的一本最沉闷的书，可能对文学没有什么益处，但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他把布朗特先生送进

了监狱，却把一个聪明的打油诗人改变成了一个积极的深思的诗人了。”^⑨

王尔德一直在《女性世界》上刊发介绍爱尔兰主题的文章，其中暗示了英国统治的压迫状况，突出强调了爱尔兰文化的独特性。王尔德夫人为1888年11月的杂志撰写了一篇《爱尔兰农民故事》概略，仅仅几个月后，王尔德在他自己的“文学暨随笔”栏目中讨论了叶芝的“迷人的小书《爱尔兰农民的童话和民间传说》”。他在回忆母亲早期遭受的苛评时，引用了叶芝书中的一长段话，赞扬了王尔德夫人围绕这个题材创作的作品。他还刊登了桑德赫斯特夫人对亲爱尔兰的自由事业的强有力号召，文章的标题为“一个女人的政治工作”。^⑩

对爱尔兰地方自治的特殊关注也把王尔德拉进了政治激进主义的潮流中，特别是社会主义。正如《女性世界》的一位撰稿人所言，由格莱斯顿自由派倡导的针对爱尔兰土地改革的“社会主义立法”意味着“爱尔兰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分支”。1887年11月，爱尔兰地方自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获得了进一步加强，当时爱尔兰全国联盟和社会民主联盟在特拉法加广场组织了一场大规模集会，抗议爱尔兰的高压政治和英国的失业状况，但这场集会遭到了警察和武装部队的残忍驱散。这一天很快就被称作“血腥星期日”，成为爱尔兰地方自治和英国社会主义叙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当时的被捕者中包括自由党议员罗伯特·坎宁安-格雷厄姆和激进的工会主义者约翰·伯恩斯。

“社会主义”这个词一直对王尔德具有吸引力。他曾经在威廉·莫里斯的著作中见过它。19世纪80年代初，他曾用这个词打动过维奥莱特·亨特。然而，在这十年的后五年中，他开始更加彻底地对它进行探索。1885年底，他订阅了威廉·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报纸《公益》。^①而且他还结识了几乎与他同时代的《帕尔摩报》评论员乔治·萧伯纳。萧伯纳是住在伦敦的都柏林人，靠写作勉强维持生计，他公开承认自己是激进分子。他和妹妹露西一起参加了几次王尔德夫人的招待会，他回忆起王尔德很慷慨，努力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善意，但不幸的是（“我们把对方弄得很不舒服”）。自学成才的下层阶层的萧伯纳坚持认为，受过大学教育的王尔德是“都柏林的势利鬼”。然而，尽管他们的脾气、观点、教育和背景不同，但两人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双方都承认对方是个“杰出的人物”，是一个普遍遭遇不公正评判的人。他们虽然没有成为朋友，却都心存一份尴尬而又真实的仰慕之情。

萧伯纳是社会主义的热心皈依者，也是费边社的成员，他总是急于提出自己的观点。有一次，王尔德参加了在爱尔兰小说家约瑟夫·菲茨杰拉德·莫洛伊家举办的一个小型聚会。其间，萧伯纳详细地阐述了他打算创办一份杂志，用来传播他的政治思想。王尔德饶有兴趣地听着；萧伯纳断然宣布，这份杂志要叫“萧杂志——萧！萧！萧！”——但他却轻描淡写地用一句问话颠覆了萧伯纳的想法，“你要怎么拼写它呢？”^{② ③}

尽管如此，王尔德“高度评价了”萧伯纳，认为他是一位具有独创性和挑战意识的政治思想家；事实上，他们俩的一位共同的朋友曾经不太友好地暗指，王尔德对社会主义的仰慕其实源于这样的事实：“它很奇特，况且萧伯纳是爱尔兰人。”虽然这种说法很夸张，但与萧伯纳的关系的确促使王尔德提升了对这一主题的兴趣。萧伯纳意识到了他的这份兴趣是真心实意的。尽管两人在文学方面有过不少接触，但1887年王尔德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要求宽恕6名在芝加哥集会上因炸弹爆炸而被判死刑的无政府主义者，此举给萧伯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❶

王尔德在作品和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不公的问题中，这既是思想的影响，也是情感的影响。虽然他希望在童话故事中“反映现代生活”，“处理现代问题”，但快乐王子和小燕子的做法可能更多的是基督徒自我牺牲的榜样，而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参与。❷尽管在思想上王尔德可能支持社会主义的观点，即慈善事业只会贬低和打击穷人，其提供的只是暂时的缓和，而不是永久的解决方案，但在他自己的个人实践中，他总是非常慷慨，几乎总是像堂吉诃德一样。埃德加·萨尔图斯回忆一个冬夜，他和王尔德一起回到泰特街，一个衣衫单薄、在刺骨的寒冷中瑟瑟发抖的可怜男人向他们走来。萨尔图斯给那人一先令。王尔德“极其果断地脱下他的大衣”，披在那人肩上。这一举动的异乎寻常之处在于，当天晚上的早些时候，王尔德——暂时放弃了他的社会主义立场——曾经宣称：“如果我是国王，我会坐在大厅里，在绿色象牙上作画，我的大臣们来告诉我，人们正在挨饿时，我会继续在绿色象牙上作画，并且说：‘让他们饿死。’”还有

一次，一个乞丐走过来，哀叹自己“没有工作”，“没有面包吃”，王尔德回答说，“工作！你为什么想要工作？还要面包！你为什么要吃面包？”他继续严肃地道：“现在，如果你到我这儿来，对我说你有工作要做，但你不工作，对我说你有面包吃，但不想吃面包——那么我会给你半个克朗。”停了一会儿，他又说：“照现在的情况，我给你两个先令。”^①

然而，王尔德通过许多直接的方式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承诺。尽管（与萧伯纳不同）他没有出现在“血腥星期日”骚乱中，但他参与了骚乱的后续。11月14日，当罗伯特·坎宁安-格雷厄姆和约翰·伯恩斯被控袭击警察时，他出现在弓街治安法院。^②他参加了从温和的“渐进主义”到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等提倡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会议。有人看见他——虽然身材不协调，但穿着漂亮，显然很胖——去圣詹姆斯附近的威利斯家，参加费边社和其他机构定期举办的讨论。他去哈默史密斯参加了“在威廉·莫里斯拥挤的马车屋举行的晚间会议”——他的扣孔里插着一朵“非常大，深红色，开得非常漂亮的大丽花”，据见到的人说，“一般男士外套上不会有这样的花”。^③

王尔德参与公共和政治生活时，得到了康斯坦斯的支持。她分享并鼓励他的兴趣。她给报纸写信讨论服装改革的问题，并（在1886年）成为理性服装协会的成员，甚至在1888年4月到1889年7月期间担任该协会的期刊编辑。她克服了羞怯，成为一名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者。她在《女性世界》上发表了两篇关于服装的文章。^④她支持地

方自治和自由事业，与妇女自由协会签约，在其活动中发表演讲，并赢得了“可爱的小激进分子”的名声。坎宁安-格雷厄姆受审时，站在旁听席上的是康斯坦斯而不是奥斯卡。 ⑨

政治将王尔德一家拉进了自由党精英的圈子。他们和格莱斯顿一道出席了在波特兰广场举行的桑德赫斯特夫人的晚会，以援助马里波恩自由协会。 ⑩ 他们参加了热情激进的《星报》编辑T.P.奥康纳举办的热闹的早餐招待会。正是在这样的场合中，王尔德以“相当聪明”的形式，用他特有的智慧火花迷住了女主人。当T.P.奥康纳和一位“金发美女”交谈甚欢时，王尔德问“T.P.夫人”，她是不是嫉妒了？她否认了这一点，并声称T.P.奥康纳就算见到了漂亮女人，他也看不出她的漂亮。此时，哈罗德·弗雷德里克（《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插话道，“请允许我插一句，那您是怎么一回事？”T.P.夫人回答说，“哦，我是个意外。”“更确切地说，”王尔德纠正道，“是一场灾难！” ⑪

8 偏爱绿色

我们必须做的，不管怎样我们都有责任去做的，就是去复兴撒谎这门古老的艺术。

——奥斯卡·王尔德

1888年，奥斯卡和康斯坦斯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写出了许多童话故事。“奥斯卡·王尔德太太”的《从前》是一本复述的故事集（收录了《小红帽》《灰姑娘》等），以散文和诗歌的形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并从头到尾配上了插图。奥斯卡的《快乐王子及其他》是他自1881年的《诗集》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书，汇集了他的五个原创童话故事。他经过长期努力才使得这些故事获得顺利出版；他曾经一次次地与各杂志编辑们接洽，但都没有成功。于是，他联系乔治·麦克米伦，想以书籍的形式推出这些故事，但麦克米伦的读者在看过之后认为，尽管它们“有意义，很巧妙”，但不太可能“迅速流行起来”。^②失望之下，王尔德转而求助于大卫·纳特公司，这是一家规模较小，但以印刷精美而著称的公司。他们同意制作这本书，但王尔德是否投入了制作成本，至今尚且不详。

康斯坦斯的书是直接面向育儿室的，而奥斯卡的作品则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意图。它和《诗集》一样——如奥斯卡所说——“相当优雅”，其中的插图出自著名插画师沃尔特·克兰之手，“书籍装帧”由年轻的印象派画家乔治·雅各布-胡德担当。为了吸引藏书家的兴趣，他们用手工纸印刷了75本特别版，每一本上都有作者的签名，定价高

达1畿尼。而“普通”版只是在形式上稍小一点，在精美程度上也只是略有不及而已。该书首次印刷的数量相对保守，只有1000本，定价仍为相当可观的5先令。这本书是献给卡洛斯·布莱克的。②③

《快乐王子及其他》于6月初出版，销量很好，受到广泛关注和良好评价。④也许是王尔德对体裁的选择改变了批判的视角——他可能已经料到了这一点。⑤或许，王尔德地位的改变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已经从十年前那个屡屡得罪批评家的傲慢、矫情的年轻唯美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得体的、负责任的公众人物。当然，媒体的回应中没有出现当年《诗集》曾经遭遇过的那种个人敌意：没有人指责他抄袭、不真诚，抑或做作。他经常——并非是坏事——被人拿来与汉斯·安徒生相比。《世界》杂志称，这本书是“自《爱丽丝梦游仙境》以来我们拥有的最漂亮的儿童故事书”。

人们普遍认为，其中尽管有很多孩子喜欢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可能更吸引成年人，因为它们很有料，具有“当代讽刺作品的辛辣风格”。王尔德在《忠实的朋友》中给出的友谊秘诀很受追捧：“一个真心朋友却总是说些不中听的话，并且不惜给人苦吃。的确，一个真正的真心朋友是高兴这样做的，因为他知道他是在做好事。”⑥唯一的疑问是这些故事中弥漫的情绪：《观察家报》认为，在这些故事的“微妙讽刺”之下，最典型的“调子”是“忧郁”；但罗比·罗斯的哥哥亚历克在《星期六评论》上评价这本书时表示，尽管这本书从情绪上看具有“辛辣的讽刺”，但始终不变的基调是“幽默的愉悦感”。⑦虽然书中有一个人物评论说，“讲一个有寓意的故事常常是

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人们赞许地指出，书中所有的故事似乎都有“寓意”，尽管它们并不“显眼”。一位评论者称其隐含的寓意是“无私是道德之美，而展现虚荣是道德之丑”。^①

这本书销路很好，王尔德立即开始宣传其“获得了成功”。^②他在朋友和熟人中散发赠阅本。格莱斯顿收到一本。罗斯金也收到一本。沃尔特·佩特写来一封令人欣慰的感谢信，自称他在痛风发作期间，一直在用这本“令人愉快的”书“安慰”自己。他称赞其中的一些描述是“散文中的小诗”，简直不知道“应该更多地欣赏《不同凡响的冲天炮》中的聪明机智，还是欣赏《自私的巨人》中的美丽和温柔”。埃伦·特丽则称，“我最喜欢《夜莺与玫瑰》”，并暗示她“有一天会将它读给某些好人听——甚至不是好人，但可以让他们变成好人”。王尔德很喜欢公开朗读的想法，但遗憾的是此事后来不了了之。^③汤恩比大厅图书馆馆长也收到了王尔德寄去的书，他最喜欢其中的《夜莺与玫瑰》。他认为“每一个认真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意指所有的孩子）”都应该对写出这样一个故事的作者“高高兴兴地发自内心地大声道一句感谢”：“对我来说，能感受到人类感情表面之下绚丽的潮起潮落，语言的精致细腻和朴实无华，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你似乎将人类之爱，当作了观察外部世界的眼睛。”^{④⑤}

不到六个月，该书的第一版就销售一空。不过新版的《快乐王子及其他》（价格稍稍便宜至3先令6便士）未能保持这种势头，但毫无疑问《快乐王子及其他》以其独特的方式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成为当季最引人注目的书籍之一。^⑥

这次成功激励王尔德继续创作童话故事，运用这种体裁去拓展他的散文、社会评论，以及他对性规范的颠覆。现在他找到了准备发表这些文章的期刊。他接下来要写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少年国王”——一个极端的唯美主义者，却在他即将加冕之际发现，自己钟爱无比的世俗奢华竟然要耗费巨大的社会和道德成本，于是他转而欣然接受了耶稣般的简朴，而令臣民和神职人员感到惊奇的是，此举给他带来了一个更伟大的，奇迹般的辉煌。尽管这个故事强调的是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内容，但卡洛斯·布莱克似乎不赞同其中的某些元素——也许是少年国王的唯美主义中明显的同性恋色彩。故事中描写他崇拜阿多尼斯的形象，还亲吻了安提诺乌斯的雕像。

确实，当年底这篇故事发表在《女士画报》上时，布莱克写信给热心的英国天主教徒纽卡斯尔公爵称：“对于我提出的批评，昨天我们的朋友奥斯卡表示无法理解，而且一笑置之。不过，现在我已安排好，今后他的所有手稿都要交我审阅，到时候，我要把他的幽默和脾气都好好地一笔一笔地抹杀掉。他找不出任何借口，也无法用他的百般欢闹来消解我的怒气，他还说什么他已经预料到了，并一直在期待我的指责。”^②然而，尽管有一家报纸称这个故事是一则“怪异而疯狂”的寓言，但大多数评论人士认为，除了“表达精妙”之外，它还具有“魅力”和“令人钦佩的寓意”。^③就连亨利也似乎对它的风格很感兴趣。王尔德称，福楼拜是自己的导师，并对亨利说：“为了探讨英语散文的写作，我曾经研究过法国散文。你对我的散文的肯定令我非常高兴，这说明我获得了成功。另外让我高兴的是，再无一人与您所见略同，这又证明了我的另一大成功。”^④

回归小说创作和书籍出版，让王尔德对自己的文学价值有了新的认识。这也开始把他从《女性世界》和编辑部的琐事中抽离出来。随着他在文学、新闻、政治、社会和家庭方面的工作越来越多，他渐渐感到自己“工作超负荷”了，必须要有所放弃。他原本每周去拉贝勒索瓦吉酒店工作三天，不久便减少到两天。他的助手阿瑟·菲什变得很擅长“根据（王尔德）在走廊上的脚步声来判断，这一天的工作是会得到欣然接受，还是会被推迟到一个更方便的时间”。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王尔德“就会叹口气，倒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瞟一眼他的信，敷衍地看一下校样或修改稿，问一句：‘这些事情有必要今天解决吗？’然后他戴上帽子，幽怨地说一声‘早上好’，便又离开了”。他的工作时间越缩越短，他越来越晚来早走，“直到有时候，他只是进来看看而已”。

他的“文学暨随笔”变得很草率，接着便停了七个月（1888年3月至11月），直到威姆斯·里德劝他重新动笔。王尔德最开始的时候工作非常勤奋，这意味着他手头存有太多的文章，他非但无法享受约稿的乐趣，反而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退稿，或者向投稿者解释为什么他们的作品迟迟没有刊发。①②虽然有这么一笔收入很不错，但他渐渐意识到这还远远不够：于是他开始在每个月的工资收据背面写一些关于收入的诗句和“粗话”。③

尽管如此，他还是很享受工作给予他的，与女性交往的特殊地位。他对优雅的社交界时髦女郎比比迪·莱纳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是一位流亡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女儿，从小在巴黎长大，之后搬到

伦敦，她身上保留着某种来自法国首都的危险诱惑力。她是有名的女帽设计师，也是时尚界的女主人。王尔德似乎是在母亲的招待会上认识她的，并请求她写一篇关于著名沙龙女主人“亚当夫人”的文章。

❷ 这篇文章虽然一直没有交稿，王尔德却成了在摄政公园附近莱纳德家的常客——被她精致老练的诱惑力，以及她对男人的控制力迷住了。在他看来，她是现代蛇蝎美人的典范。他声称，她教给他的东西比其他任何女人都多。“她毫无道德，”他向一个朋友解释道，“不道德的女人很少有吸引力。她之所以让人无法抗拒，在于她并不属于道德范围之内。” ❷

康斯坦斯——意识到王尔德的情感和性兴趣正在逐渐消失，但误读了其中的原因——嫉妒王尔德对莱纳德的迷恋。对于断绝关系，王尔德似乎并非十分反感，也许只是觉得这样的要求过于苛刻。他给这段关系断然地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过，为了给这一时刻适时地增添些许戏剧性，他写了“三段充满激情的”诗歌作为了断。然而，莱纳德并不买账。她怀疑王尔德是在重复利用一首早已写好的诗，她很可能是对的。 ❷

当时王尔德的女门徒中还包括年轻的美国女演员伊丽莎白·罗宾斯，1888年夏天她正好路过伦敦。她长着一双黑眼睛，美丽而热情，却是个悲剧人物：一年前，她的丈夫，一个波士顿剧团的小演员，自杀了（穿着全套戏服跳进了查尔斯河），让她26岁便成了寡妇。王尔德在西顿夫人举办的招待会上见到了她，并鼓励她考虑留在英国，在伦敦的舞台上干一番事业。“你应该演一次日场”，他一开始这样建

议。几周后，当得知她即将签约出演由“身无分文的冒险家”兰德尔·罗伯茨爵士创作的一部“有问题”的戏剧，他便力劝她不要走这一步。

他立即采取行动，让罗宾斯与一名代理人取得联系。他坚持让她聘请乔治·刘易斯担任律师，审查所有合同（他描述刘易斯“非常聪明，令人敬畏，是一个通晓世故的人……他对我们十分了解——对我们一点儿也不介意”）。他还为她争取到了去艾尔伯特·比尔博姆·特里那里面试的机会。比尔博姆·特里当时作为演员经理，刚刚取得了第一次巨大成功。罗宾斯始终对王尔德的活力和善良记忆犹新。她在一部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无法为他做任何事；他可以也确实为我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她当时的日记中写满了各种会议记录、信件、实用的建议和各种忠告。有一天，她在日记结尾写道：“奥斯卡·王尔德是一个有福的人。”最后，特里半推半就地答应给她一个角色，罗宾斯退掉回程票，留在了英国。①

整件事情使得王尔德又接触到他一直渴望踏入其中的戏剧界。不过，这也是一桩实实在在的善举和富有想象力的同情之举。他的生平记录中充斥着类似的慷慨事迹，但它们往往平淡无奇、默默无闻。例如，他认识的牧师有一位“非常穷的朋友”，他对她很感兴趣，于是帮助她卖掉了一条贵重的“印度项链”。②他很乐意为别人出主意，尽管他自己缺钱，但总是很爽快地借钱给别人。③虽然王尔德声称自己对疾病没有同情心，但有人告诉奥索·劳埃德，他竟然坐在一位“正

处于天花感染高峰期”的朋友床边。⑩伯纳德·贝伦森认为他是“所能想象到的最善良的人”。⑪

当西克特夫人的丈夫意外去世时，她几乎“悲痛欲绝”。但是，尽管她闭门不出，王尔德还是设法找到了她，并坚持要见她。奈莉·西克特回忆起他拉着母亲的双手——她还在哭——让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他自己也在旁边坐下：

我留下他们单独在一起。他待了很久，在他离去之前，我听到了母亲的笑声。等他离开之后，她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引诱她开口说话，他向她询问我父亲最后的病情，让她卸下心里那些折磨人的记忆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他渐渐谈起我的父亲，谈起他的音乐，谈起可以组织一次纪念画展，展出他的作品。然后，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开始跟她讲述各种事情，他想办法把它们讲得既有趣又逗乐。“于是我笑了，”她说，“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发笑了呢。”⑫

1888年秋，王尔德忙着给母亲帮忙。爱尔兰农村地区持续不断的动荡意味着，莫伊图拉的房产大部分收不到租金，她也失去了收入。尽管她的著作——《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漂流木》（1884年）和《爱尔兰的古代传说、神秘符咒与迷信》（1887年）——以及她偶尔发表的文章，能赚来一点钱，但还是不够。与此同时，威利仍然毫不负责。他在《每日电讯报》赚了不少钱，却悉数花在喝酒和熬夜上了。⑬为了减少开支，他们从公园街搬到了切尔西，在奥克利街146号租了一套房子，就在奥斯卡和康斯坦斯所住那条街的拐角处。然而，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

为了改善母亲的境况，王尔德再次为她争取王室专款养老金，同时还以她的名义向皇家文学基金会申请了一笔一次性奖金。他现在人脉颇广——既有政界的，也有职业圈子的——让他在与官员打交道时有了一层新的底气。两项申请都很成功：皇家文学基金会提供了100英镑；（最终在1890年5月）王尔德夫人获得了每年70英镑的王室专款养老金。她新近对维多利亚女王的一番热情或许助了她一臂之力，抹去了人们记忆中19世纪40年代那个呐喊的起义者形象。

与此同时，王尔德还在不断地充实他的年轻男性朋友小圈子。他很喜欢雅各布-胡德（《快乐王子》的装帧设计师）的陪伴，甚至和他以及他的一些艺术伙伴一起到多塞特郡白浪岛的一座小别墅里享受了几天斯巴达式的夏日乐趣。这段日子，他们是在普尔港附近的小船上度过的。王尔德满腔热情地投入其中，甚至“像一个小学生一样一大早”从城堡的台阶上“跳下来”，让主人感到无比惊讶。他只有一件事要抱怨，那就是起床之前想要一杯茶，“我亲爱的雅各布，”他解释道，“没有一杯茶，我简直睁不开眼睛”（雅各布-胡德每天都慷慨地早起，给他泡一杯）。然而，有一天晚上，他经历了在齐腰深的海水中用围网涉水之后却说：“大自然总是让人很不舒服。”^⑨

在伦敦，王尔德加深了与叶芝的联系，叶芝举止笨拙，却很聪明，他对叶芝的爱尔兰故事很感兴趣。这位出生于都柏林的诗人很容易就被吸引住了；他从小就知道显赫而古怪的王尔德家族，并于1883年在都柏林第一次目睹奥斯卡演讲。叶芝非常珍视这段友谊，他在即将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时回忆起王尔德对于“凡是他欣赏的人，他总

会对他们的睿智大加赞赏”：他鼓励叶芝讲述爱尔兰的长篇故事；暗示他拥有“天才”，并将他的讲述与荷马进行对比；他提醒叶芝不要为报纸撰写“文学杂谈”——因为那“不是绅士做的事情”。^⑩

另一位新近崭露头角的诗人名叫理查德·勒加利安，他从利物浦写来一封信，附上了一本私人印刷的诗集，不久之后，他便随着这本书南下了。和叶芝一样，他第一次见到王尔德也是在演讲台上。1883年，17岁的勒加利安在伯肯黑德聆听了王尔德演讲的《美国印象》，几乎从那一刻起，他就下定决心逃离他命中注定的会计职业，立志要成为一名诗人。他在拉斐尔前派的影响下开始写诗。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了不合语法的“Le”，使之更加令人难忘，也更有艺术感。他形成了一种坚定的审美眼光，他的长发“呈扇形散开”——如王尔德说——“形成了一个美妙的光环”。他眉眼精致深邃，五官轮廓分明，王尔德认为他看起来像罗塞蒂笔下的天使加百列；斯温伯恩说他是“长了下巴的雪莱”。^⑪1888年，他来到伦敦，一心想要结交王尔德。他参加了泰特街的“家庭招待会”，获邀一起吃晚饭。接着他们又见了几次面。王尔德送给他一本《诗集》，上面的题词是：“给诗人和爱人，理查德·勒加利安，奥斯卡·王尔德题，1888年6月的一个夏日。”勒加利安也想把握住这一时刻，他写了一首诗，题为《八八年六月的一个夏日，与奥斯卡·王尔德共度》，诗的开头两句颇有感染力，“与奥斯卡·王尔德共度，夏日的一天/像渴望的吻一样逝去”。他给王尔德寄了一份手稿“作为爱的信物，以隐秘的形式纪念88年6月的一个夏日”。^⑫作为回报，王尔德赠给他一篇童话手稿。^⑬然而，尽管两人交流地如此热烈，人们强烈怀疑双方只是摆出了一种诗

意的姿态而已。勒加利安很喜欢扮演激情诗人的角色，王尔德也是如此。尽管嘴上说的都是“真爱”，但直到几年之后，他们相互之间才真正地熟悉起来。王尔德认识到，尽管勒加利安也许很有魅力，但他是一个渴望在伦敦文学界立足的乡下野心家，把事业看得重于一切的人；于是他拿出一贯的慷慨，倾尽全力帮助他。

1888年底，他结识了20岁的弗雷德·奥尔索斯，两人的关系没那么具有诗意，但更注重性的方面。王尔德的秘密私通进展很快。按照J.A.西蒙兹的说法，希腊人认为同性恋的欲望是一种“狂热”，比对女人的爱“更令人兴奋”，“更能吸收整个自然”，当然王尔德也发现了这一点。❶ 奥尔索斯是伦敦大学学院一位著名德国教授的儿子。他写给王尔德的信件中有一小部分保存了下来，其中描绘了他们这段短暂的感情。❷ 王尔德似乎把这个敏感的年轻人迷住了，对他产生了兴趣，他送给奥尔索斯音乐会的门票，开始施展魅力。“我几乎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比和您在一起更快乐，”弗雷德告诉他，“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亲切关心。”❸ 他们在大学学院古怪而热爱艺术的动物学教授雷·兰凯斯特举办的招待会上见面，或者在考文垂街新开张的抒情俱乐部见面，他们都是那里的会员。奥尔索斯意识到自己长得帅，便给王尔德寄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和德国朋友穿着法兰绒衣服拍的，我把照片放大了——当然照片里没有他。”❹

虽然奥尔索斯在伦敦金融城有一份工作，但他的兴趣似乎一直是剧院，或者至少是装扮自己。在班克罗夫特夫人为慈善组织举办的“活人静画”表演中，他和哈里·梅尔维尔一起被描述为“看起来光

彩夺目”；然而，他参演了圣斯威辛业余戏剧俱乐部的《抄写员吉姆》，其表演得到的评价只是“还好”而已。❶他和王尔德很快就在城外安排约会和会面。奥尔索斯说：“我从巴恩斯（抒情俱乐部在那里有一个附属侧楼）听说，我可以在那里订一个房间，可以住两晚或更多。”他“非常希望”王尔德“找个时间出来”。假期的时候，他建议他们“也许可以一起出门”几天。❷如果说他既虚荣又难以满足，这似乎也正是他的部分魅力所在。他告诉王尔德，他希望他们能在海边度过一段夏日，“在天堂般的阳光下，我喜欢晒太阳，想着把自身的美丽借给其崇拜者，这也许足够慷慨”。❸

王尔德在其双重生活的各种不同元素之间摇摆不定，他的作品似乎对此做出了评判。1888年下半年，他所从事的两件事情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欺骗扯上了关系。其中之一是一篇非传统的传记文章，写的是19世纪早期的艺术家、评论家和花花公子托马斯·格里菲斯·温赖特（查尔斯·兰姆和威廉·布莱克的朋友），他伪造银行汇票，谋杀亲戚，以此来偿还债务并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王尔德的文章——一篇精彩诙谐的文字——将温赖特塑造成一个颓废派先锋作家：“他像波德莱尔一样，他特别宠爱猫”；又如同戈蒂耶（以及斯温伯恩）一样，迷恋“可爱的大理石怪兽”——卢浮宫里那座经典的雌雄同体雕像；他的作品——涉及《蒙娜丽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法国诗人以及丘比特和普赛克的古典浪漫——似乎比沃尔特·佩特的作品还要有先见之明。此外，他还“对绿色有一种奇特的偏爱；这种感情，就个人而言，是微妙的艺术家气质的象征，就

国家而言，则被解释为放纵——如果不是道德沦丧的话”。除了传说中波德莱尔曾经声称自己拥有绿色头发之外，这种将颜色与“颓废”联系起来的说法似乎是王尔德的发明。❶

他从一个坚定的美学角度来描述温赖特从事的各种职业——艺术的、社会的和犯罪相关的。当然，以前也有人玩过这种游戏，最著名的莫过于由托马斯·德·昆西写于1827年的文章《被视为艺术的谋杀》。但王尔德将自己的活泼性情带入了写作过程中，他毫不在乎地记录了当一位朋友谴责温赖特杀害了他的嫂子时（还包括其他暴行），“他耸耸肩膀说：‘是的，这么做是很可怕，不过她的脚踝很粗。’”王尔德接着又写道：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我们把他（温赖特）在毒素方面的成就搁置一边，实际上他留给我们的东西与他的名誉极不相称。但只有平庸之辈才会以成果的多寡这一庸俗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这位年轻的花花公子追求的是出人头地，而不是埋头苦干。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其方式并不比艺术家们用以表达的方式来得少。

王尔德似乎已经把温赖特当作一个主题，放弃了写作另一位艺术伪造者查特顿的计划。❷ 温赖特的故事已经成为王尔德口头表演的一部分；一位伦敦的八卦专栏作家写道，1888年底，在一次文学联谊会上，“奥斯卡·王尔德将这个劳改犯的故事讲得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有些人错过了最后一班火车”。那一次，有人“催促”王尔德“把故事写下来”——他当时很可能已经在动笔写他的那篇文章了，想用口头表演的方式来试一试他的想法，检验一下效果。这篇题

为《笔杆子、画笔和毒药》的文章（这句话是从斯温伯恩处借来的，他为此表达了致谢）年底就写完了，弗兰克·哈里斯打算将它刊登在《双周评论》上。①

为配合这篇文章，王尔德还创作了一篇关于19世纪艺术本质的精彩而有趣的“对话”。他把这篇文章叫作“谎言的衰朽”。王尔德后来回忆说，文章的“想法、标题、论述、风格、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与罗比·罗斯在苏豪区一家简朴的餐厅共进晚餐时“即兴想出来的”。

②王尔德一直想从美学的角度来写一篇有关当代文化的概述，但可能一直在努力寻找合适的形式。他和罗斯在晚餐时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霎时间将他的想法汇聚成一个新的焦点。③

这一场现代的苏格拉底式“对话”——效仿柏拉图——可以让他探索自己的思想，而不必得出任何具有局限性的结论，也不必保持任何单调乏味的一致性。思想可以在谈话中凌空飞翔，伴以悖论、警句、夸张、幽默和模棱两可。谈话——他自己较为喜欢的表达方式——可以经过磨炼和提炼，成为文学。而这一切将比他以前尝试过的任何东西更能反映出他自己的个性和声音。其结果是一篇杰作：他能够通过这个最大的成功，来实现他对于艺术的自我表达。④

王尔德创作了两个有教养的精致人物，给他们起名（和他的儿子们一样）“西里尔”和“维维安”；他将这两个人物放在“诺丁汉郡一座乡村住宅的藏书室”，再一次含蓄地暗示了他曾经去过克伦伯。

⑤维维安正在写一篇论文——题目为“谎言的衰朽：一则异议”——它即将发表在《回顾评论》上，那是他所在的“萎靡的享乐

主义者”俱乐部的一本杂志（“我们见面的时候，应该在纽扣洞里戴上凋谢的玫瑰花，我们还应该对图密善有几分崇拜”）。他把这篇文章的摘录念给西里尔听，后者有时持怀疑态度，有时表现得不屑一顾。维维安的文章关注了当时的两大文化辩论——“艺术与自然”的关系、“现实与浪漫”的关系。文章中尽可能地采纳了最极端的观点，将波德莱尔和戈蒂耶、佩特和惠斯勒，以及于斯曼的《逆流》中的思想延伸到极致。❶

维维安在他的“新美学”中，将艺术完全置于自然和生活之上：“一切坏的艺术都是返归生活和自然造成的，并且是将生活和自然上升为理想的结果。”他继而将想象和“浪漫”置于乏味的事实的“现实”之上，宣称“撒谎，讲述美而不真实的故事，乃是艺术的真正目的”。他坚持艺术的绝对自主性和无用性：“艺术只表达它自己。”它只关注其自身的完美。但他也承认艺术的力量，并称那指的是艺术家——通过他们个人的视野和风格——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能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他这么做了，那么他就不再是艺术家。”我们所认为的中世纪是中世纪艺术家的发明。整个日本都是葛饰北斋和他的同伴“当地画家”创作出来的。“与其说艺术模仿生活，不如说生活模仿艺术。”在之前的几个月里，王尔德一直在他的谈话、书评和笔记中重复这些想法。现在他用一种妙趣横生的活力将它们聚拢在一起。

他改进并且重新使用了他的许多批判性见解：“力图使故事过于真实而剥夺了它的真实性，这样的事屡见不鲜。而（罗伯特·路易斯·斯

蒂文森的)《黑箭》是如此缺乏艺术性,以至于没有包含任何一件与时代不相吻合的事可以用来夸口,而哲基尔博士的变形则读来令人甚感危险,就像《柳叶刀》中所描写的一种实验。”“亨利·詹姆斯先生写小说就好像这是一项痛苦的义务,在卑贱的主题和微妙的‘观点’上浪费了他简练的文学风格,他巧妙的措辞,以及他敏锐而刻薄的讽刺。”“左拉先生……决心表明,假如他没有天才,他至少可以是单调乏味的。他取得了多大成功呵!”“啊!梅瑞狄斯!谁能给他下定义?他的风格是一道道闪电照亮的一片混乱。作为一个作家,他什么都掌握,就是没有掌握语言。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什么都能做,就是不会讲故事;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什么都行,就是没有表达能力。”

文章中还暗指了惠斯勒,只不过没有提他的名字而已。“也许伦敦有了好几个世纪的雾。我敢说是有的。但没有人看见雾,因此我们不知道任何关于雾的事情。雾没有存在,直到艺术发明了雾。现在必须承认,雾搞得过分了。它们变成了纯粹是一个集团惯用的表现手法,其方法上夸张的现实主义给迟钝的人以支气管炎。有教养的人抓住了一种景观,无教养的人则着了凉。”

可以理解,王尔德似乎对这篇文章特别满意。圣诞晚餐后,他把校样大声地念给客人们听。那天晚上叶芝住在泰特街。尽管他后来借鉴了文章对话中的观点,即艺术具有在世界上创造意义的力量,但当他第一次听到这段内容时,立刻就被其中的语言和智慧所吸引: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模仿和记录”了王尔德“无与伦比的谈话”。^⑨

叶芝在泰特街见到的家庭场景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制的美学装饰；出乎意料的白色餐厅，桌子上装饰着一块“菱形红布”，上面立着一尊陶土雕像，其上方是一盏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红色遮光吊灯；“美丽的妻子”；两个孩子。还有一只小猫，是罗比·罗斯送的礼物。“它看起来不白，”王尔德在他的感谢信中写道，“实际上看起来有点像玳瑁色，或者是灰色上面点缀着柔和的暗褐色，但既然你说它是白色的，我也告诉大家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白色小猫’。孩子们被它迷住了，一边一个坐在篮子的两边，非常喜欢它。”^②

这是一幅迷人的景象。叶芝确实也在想，它是不是“太完美了”。他从晚上回去的时候想，他亲眼瞧见的“完美和谐的生活”“也许是件精心设计的艺术作品”。也许他还记得——根据王尔德的新美学理论——艺术创作的真正目的是“撒谎，讲述美而不真实的故事”。^③

奥斯卡·王尔德

一部传记



OSCAR

A Life

1889-1900

入围 2019 年沃尔夫森历史奖 (Wolfson History Prize)

[英] 马修·斯特吉斯 著

马娟娟 译

他用戏剧性的一生诠释那句名言：

“做你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人做了。”

Matthew Sturgis

THE TRUTH IS
RARELY PURE

真相很少
纯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版权信息

书名：奥斯卡·王尔德：一部传记（下册）

作者：[英]马修·斯特吉斯(Matthew Sturgis)

译者：马娟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品牌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微信读书进行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马修·斯特吉斯 (Matthew Sturgis)

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专注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文化界的研究。他所著的奥布里·比尔兹利和瓦尔特·西克特传记，以及作品《激情年代——19 世纪末颓废的英国人》(*Passionate Attitudes – The English Decadence of the 1890s*) 深受好评。他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写书评，是《时尚芭莎》杂志的艺术评论作者，还为《星期日独立报》撰写足球报道。他是奥斯卡·王尔德学会期刊《王尔德》(*The Wildean*) 的编委会成员。

马娟娟

浙江人，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曾长期从事国际新闻工作，译有《软实力》《战略：一部历史》《以色列总理私人史》。

[REDACTED]



21.1891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在牛津，大约此时他第一次见到奥斯卡。



22. 罗伯特·H.谢拉德，1883年奥斯卡在巴黎结识的朋友；他被认为是“英俊得无与伦比”，见多识广而且“可爱”。



23.卡洛斯·布莱克（左）与诺曼·福布斯·罗伯森，奥斯卡的两位老朋友。奥斯卡将《快乐王子》献给布莱克，后来两人在奥斯卡流落巴黎间分道扬镳。



24. 罗比·罗斯，奥斯卡的第一个男性爱人，也是他交往最久的朋友。



25.诗人约翰·格雷，奥斯卡因其诗作和形象，对其倍加推崇。



26.艾达·莱弗森，奥斯卡热爱的“斯芬克斯”，“伦敦最睿智的女人”。



27.初版《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场景，这部剧是奥斯卡第一个成功的戏剧作品；画面最右为乔治·亚历山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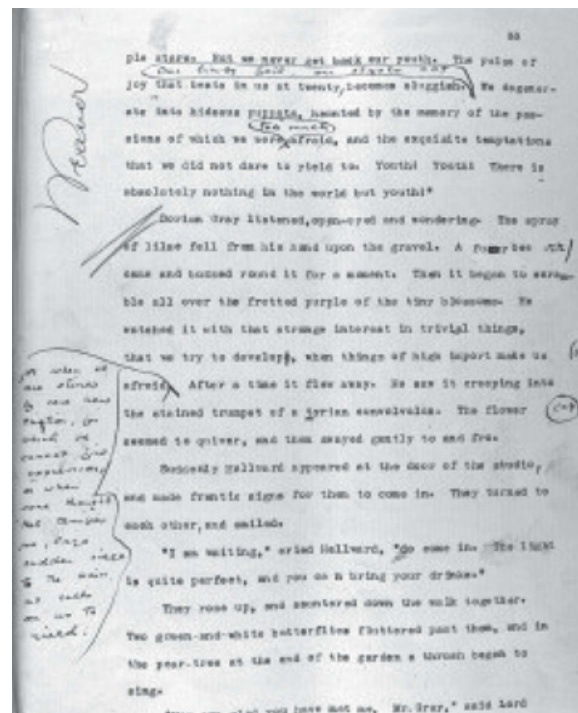
28.比埃尔·路易斯，奥斯卡将法语版《莎乐美》献给了他，但对于他的反应感到极度失望。



29.安德烈·纪德，他对奥斯卡的谈话技巧、讲故事的能力以及性自由充满敬佩。



30.1892年9月，沃尔特·帕尔默夫妇的家庭聚会。前排从左至右：戴维·比斯法姆、乔治·梅瑞迪斯，“月光”让·帕尔默、H.B.欧文。后排：乔普林夫人、奥斯卡·王尔德、不知名者、玛丽·梅瑞迪斯、约翰斯顿·福布斯-罗伯森、沃尔特·帕尔默。



31.奥斯卡·王尔德创作的《道林·格雷的画像》手稿。作品于1890年刊登在《利平科特月刊》上，引起了英国媒体的轰动。



32.约翰·舒尔托·道格拉斯，性格暴烈的第九代昆斯伯里侯爵，奥斯卡的宿敌。



33.罗比·罗斯与雷吉·特纳（右），后者是奥斯卡学法律的朋友，奥斯卡戏称他是“克莱门特旅馆的男孩绑架者”。



34.爱德华·卡森，大律师兼政客，斯派绘，1893年《名利场》刊登。他在针对奥斯卡的质证中“捎带上了一份老朋友的怨恨”。



35.1903年《名利场》刊登的爱德华·克拉克爵士漫画，王尔德三次审讯的辩护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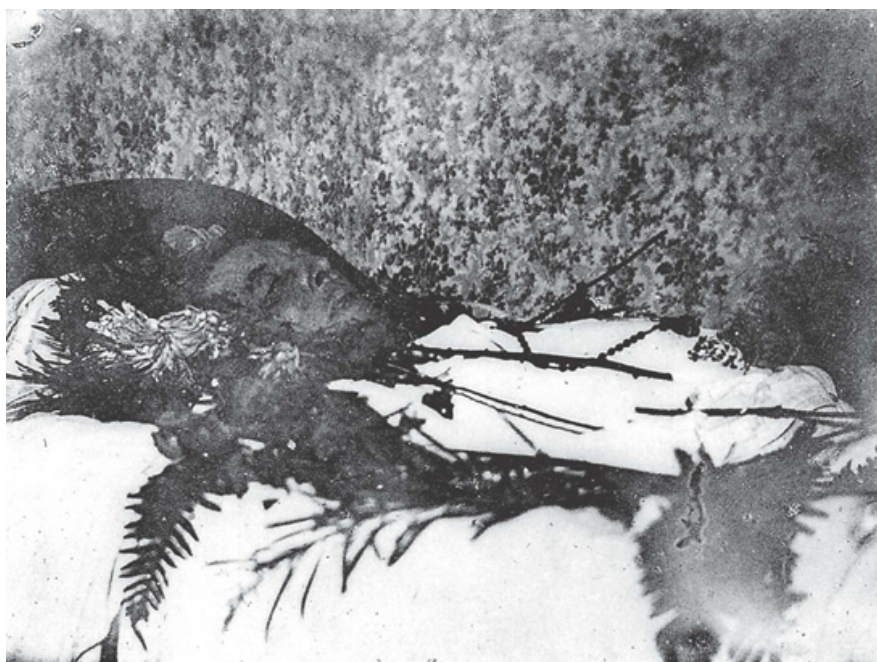
36.欧内斯特·道森，“永远那么奇妙”的诗人，在奥斯卡放逐初期，两人经常见面。



37.莱奥纳德·史密瑟斯，这位一向慷慨但手头拮据的出版商在奥斯卡出狱后试图重振他的事业。



38.左岸美术街廉价的尼斯旅馆，奥斯卡曾经住在这里，在此去世。



39.由莫里斯·吉尔伯特拍摄的奥斯卡去世时的照片；从中可以清晰地看见旁边的墙纸，奥斯卡曾自称“我和我的墙纸正在进行一场殊死决斗”。

第六部分 少年国王

1889～1892年

34～37岁





1892年，奥斯卡·王尔德在克罗默(Cromer)附近的费尔布里格村
(Felbrigg)

1 一个绝色的男人

要为艺术做出牺牲，你才能得到回报；但如果要艺术为你牺牲，你可能只会徒增苦恼和失望。

——奥斯卡·王尔德

1889年的头四周，我们很难找到一份没有刊登奥斯卡·王尔德文章的英国期刊。《笔杆子、画笔和毒药》在《双周评论》上占据了14页，《谎言的衰朽》成为《十九世纪》的重要特色，《伦敦的模特儿》（在王尔德威胁要收回稿子之后）最终刊登在《英国画报》上，还配上了哈珀·彭宁顿的图片，而《女性世界》则因编辑的“文学暨随笔”而增光添彩。这是一个显著的成就。

评论家认为《伦敦的模特儿》“非常有趣”。王尔德夫人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也很朴素”；而且她说威利也“非常欣赏这篇文章”。^①在《双周评论》“相当权威”的文学排名榜上，斯温伯恩、J.A.西蒙兹、埃德蒙·戈斯和亨利·柯曾的作品榜上有名，而《笔杆子、画笔和毒药》被评为“最有趣的”作品，是一篇“原创的”“当之无愧的成功作品”。^②即使在《女性世界》，人们也发现王尔德已经“超越了自己”，不过与其说这是因为他的“文学暨随笔”，还不如说是因为他成功地获得了罗马尼亚女王的一篇文章。^③

在一片赞美声中，《谎言的衰朽》得到了最大的褒奖。相比媒体对这篇文章半是迷糊，半是困惑的评论，王尔德更喜欢朋友们私下的

赞扬。“您对我文章的喜爱，令我非常高兴，”他在给《星期六评论》编辑沃尔特·波洛克的信中写道，“大众的审美水准正在下降，我决心坚持自己的艺术观点，特别是在艺术与历史的关系上。我将采用一种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却可被少数像您这样有着艺术天才的人所欣赏。” ⑩

这是那年的一个辉煌的开端。“我很高兴你在文学上找到了灵感，”王尔德夫人以她特有的热情宣布，“我知道，没有哪个作家能做到这样既权威又优美——除了罗斯金。” ⑪但王尔德知道，到了2月，报摊上所有的期刊都会换上新的一期，而且（除了《女性世界》）没有一本杂志上会出现他的名字；在新闻界——即便是《双周评论》和《十九世纪》这样比较高端的领域——成就转瞬即逝。叶芝回忆当时的王尔德称，“对于那些人们对他的成功或是能力的普遍看法”，他感到不自在，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他仍然认为他的成就是何其少。虽然他偶尔仍然写点诗，但他已经意识到，他不会去挑战上一代伟大诗人的作品。他眼中的大师——斯温伯恩、罗塞蒂、莫里斯、阿诺德、丁尼生、布朗宁——仍然是大师。也许是为了寻求一个解释或借口，他对叶芝说：“我们爱尔兰人过于理想化，所以不能当诗人；我们是一个拥有非凡的败绩的民族，却也是希腊人之后最能说会道的民族。” ⑫

但是，他在散文方面取得了进步；当时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活力和创造力，全新的性生活使他摆脱了约束，很难将此二者割裂开来。正如罗斯所说，当他成了“习惯性的同性恋爱好者”时，他的个性也得

到了“强化”。①他身上有一种明显的乐观情绪。事实上，叶芝认为那是王尔德在那个阶段最快乐的日子。②他的雄心壮志仍未减退。即使前方的道路并不明朗，他仍然对艺术的种种机会抱有信心，相信他有能力去探索这些可能性。

他继续编写着精心构思的、引人入胜的童话故事。《公主的生日》刊登在创新双语周刊《巴黎插画》上。他对一位朋友说：“就风格而言，这是我最好的作品。”不过，他很感兴趣的是，他在原著中描述的“黑色和银色”的西班牙宫廷生活，在随附的法语译本中竟然成了“粉红色和蓝色”。③他将自己多彩多姿的散文归功于福楼拜，想通过翻译《圣安东尼的诱惑》来表达感激之情。④但他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写作《谎言的衰朽》是个非常有趣的过程，他想回归到对话的形式。此外，他还有一篇酝酿已久的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文章——将大胆地展示事实与虚构、历史与创新。

王尔德想象着，要将莎士比亚与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的希腊传统的少年之爱联系起来。莎士比亚将“W.H.先生”称作他的十四行诗的“唯一促成者”，并为其写了一段“奇怪的赠言”，王尔德从中窥见了“纯粹的柏拉图主义”。他认为，莎士比亚一定是“觉得他的艺术是由这位神秘朋友的美而创造的”。⑤传统学者认为“W.H.先生”仅仅是一位贵族资助人：彭布罗克伯爵威廉·赫伯特，或者——换成另一个——同样高贵的南安普敦伯爵亨利·赖奥思利。然而，王尔德提出，首字母代表的是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人物“威利·休斯”(Willie Hughes)。这个观点最早由18世纪的评论家（也是查特顿派学者）托

马斯·蒂里特提出，他在几首十四行诗中发现了“Will”和“Hues”这两个词的双关语。然而，王尔德以典型的活力和风格将此概念发扬光大。虽然蒂里特曾经暗示休斯——多首十四行诗里面都出现过的“肤色白皙的少年”——可能是一个宫廷乐师，但王尔德认为，他是莎士比亚剧团里扮演女性角色的少年演员，这个年轻人的“肉体的美成了莎士比亚艺术的奠基石”。他认为，休斯不只是获赠诗歌的人，而且还是莎士比亚所有戏剧的灵感来源，“他的理想的化身”。

王尔德没有把他的观点写成一篇简单的文章，而是用一个故事将它们包装起来。他不想被乏味的事实或固定的立场所束缚。他对一位女性作家朋友解释，“虚构而非真实”是他偏好的模式；“我从来不跟真理打交道。假如真理来到我的房间，他会对我说，‘你太任性了。’而我会对他说，‘你太明显了。’我应该会把他扔出窗外。”当他的朋友问道：“真理难道不是个女人吗？”王尔德承认道：“那么我就不能把她扔出窗外了；我要鞠躬把她送出门口去。”

●注

他设计的小说是一个关于男性友谊、艺术伪造和痴迷的故事，叙述者从他的朋友厄斯金那里得知，他另一个朋友——“非常英俊”和“柔弱”的“西里尔·格雷厄姆”，是如何迷上了“威利·休斯”说，却无法找到确切的证据，于是他伪造了一幅伊丽莎白时代风格的年轻演员肖像，画中人物的手放在一本十四行诗上。虽然这幅赝品最终被人戳穿，西里尔·格雷厄姆自杀了，但首先是“厄斯金”，继

而是叙述者，他们都发现自己被这种说法迷住了，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

尽管小说这种形式让王尔德与这个话题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这个故事对于少年之爱激发艺术创造力做了一番大胆的描述。小说这种体裁也使得他不必就其个人是否认可这种观点作出任何声明——尽管在私下，他会开玩笑地说：“即便我，一直努力不去相信——因为艺术家总是带着对下一部作品的乐观期待，质疑他的最新作品——甚至也无法怀疑。”^①值得怀疑的是，王尔德是否将手稿提交给卡洛斯·布莱克并获得了认可，即便他曾经开玩笑地做出过承诺。^②其他方面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和《谎言的衰朽》一样，这篇作品的想法也是在和罗比·罗斯讨论的过程中产生的。事实上几乎可以认为，罗斯之于王尔德，简直就是威利·休斯之于莎士比亚。王尔德告诉他：“这个故事实际上有一半是你的，如果没有你，它就不会被写出来。”^③

王尔德最初想把这篇文章放在《双周评论》上，但弗兰克·哈里斯碰巧不在办公室，稿子被他的副手拒之门外。不过，它在声望颇高的《布莱克伍德杂志》找到了一席之地；王尔德之所以能够说服对方接受这篇稿件，是因为该杂志已经发表了好几篇关于“十四行诗”问题的有趣文章。^④

如果说《W.H.先生的画像》本身关注的是赝品的道德问题，那么当时这个话题还在其他方面吸引着王尔德。作为保守党诋毁帕内尔（以及他的“地方自治”议程）的手段之一，《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封据称来自爱尔兰领导人的信件摹本，宽恕了——如果不是煽动的话

——爱尔兰的暴力行为。帕内尔曾谴责这份文件是伪造的，并要求进行调查以证明他的清白。一个特别委员会就此成立——由三个毫无悔意、充满敌意的统一派人物领导。其调查的不仅是这一指控，还有许多其他针对地方自治领导层的指控。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争议的过程。2月，帕内尔本人面见委员会，他作证时王尔德也经常在场。帕内尔一定是觉得自己离诉讼程序已经很近了。乔治·刘易斯是帕内尔的代理人，他在揭露这封有争议的信确系伪造一事上发挥了极大作用，这封信是由一位名叫理查德·皮戈特的爱尔兰记者伪造的。威利也是委员会的常客，他在为《每日纪事报》撰写的细致入微的党派报道中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活力。②

1889年上半年，康斯坦斯有了自己的事业，她帮助桑德赫斯特夫人进行开拓性尝试，赢得了伦敦郡议会选举（桑德赫斯特夫人获得了多数选票，但一条法律却取消了她的议席资格）。紧接着这些努力之后，康斯坦斯的身体垮了。自3月的第一次布莱顿之旅后，她开始了一系列休息治疗和假期，目的是让日益脆弱的身体恢复健康。③

康斯坦斯的离去让王尔德有了更多的时间与他身边的各种年轻人去追逐友谊，包括性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弗雷德·奥尔索斯一直希望王尔德能在复活节和他一起“离开”。王尔德也许是去了。④理查德·勒加利安已经在伦敦定居，成了泰特街的常客。春夏之际，24岁的美国作家克莱德·菲奇也来到伦敦。去年，他和母亲在欧洲旅行时遇到了王尔德。现在，他孤身一人：“纤细、黝黑……非常有美感和浪漫的外貌……像孩子一样古怪，而且细心周到、惹人怜爱、快乐、机

智并且优雅”；他有一头光亮的黑发，热爱剪裁精致的服装，对王尔德十分钦佩。❶从他现存的信件中可以勾勒出一段激情四射，然而却十分短暂的恋情：“你是我的诗歌——我的绘画——我的音乐——你是我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你的爱是玫瑰的芬芳，是夏日的天空，是天使的翅膀，是小天使的钹……时间——你离开时它就停止了——将永远，在每一个天气里”，等等。❷尽管王尔德似乎觉得这种情感的强烈程度相当令人疲惫，但他确实写了一首简短的、含有性暗示的诗作为回应，其开头写道：“出自密林深处的曙光，进入牧场的黎明，象牙色的肌肤，棕色的眼睛，闪出了我的牧神！”❸

当王尔德正在拥抱身体的时候，康斯坦斯却对精神越来越感兴趣。能否接触“精神世界”是19世纪晚期最流行的话题之一。康斯坦斯和丈夫一样，总是紧跟潮流。婚后不久，她就接触了招魂论——可能是通过王尔德夫人的朋友安娜·金斯福德——渴望探索其更加神秘的种种表现，她是布拉瓦茨基夫人的神智学学会(Theosophists)的首个热心信徒，继而（1888年11月）成为更神秘、更奇妙的金色黎明会的创始成员。王尔德似乎鼓励了她在这方面的兴趣，乐于间接地了解一些相关活动及其奥秘，而又不必遵守其约束。❹

不过，他对布拉瓦茨基夫人本人颇有好感。在牛津街一家专为职业女性开设的慈善餐厅的开业典礼上，他们成了众人的焦点，两人一边聊天，一边抽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客人们将他们围在中间，窗外聚集着好奇的人群，他们俩旁若无人地坐在藤椅上，彼此交

换着“精彩的警句”。即便如此，王尔德也没有接受布拉瓦茨基夫人的邀请，加入神智学学会。❶

牛津街的午餐过去几天后，《W.H.先生的画像》刊登在7月号的《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在此之前他们挑选了几家报纸对文章进行了预热报道。总的来说，新闻界对此文的关注是非常正面的。还有一些热情洋溢的私下回应。“啊！奥斯卡！”克莱德·菲奇连夜读完了这篇文章，他写道，“这篇文章很棒——太好了！我相信威利·休斯：我不在乎这一切是不是出自你那神奇而美丽的大脑。我不在乎别人的嘲笑，我只知道我被说服了，而且我会，我会相信威利·休斯。”❷

然而，在评论家眼里，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莎士比亚学术研究的一项独创性贡献——虽然并非十分令人信服。王尔德虚构的叙事框架几乎完全受到了忽视。极少有人在评价中触及他理论中有关同性恋和少年之爱的因素。事实证明，《世界》杂志（长期以来一直是王尔德的重要支持者）是个明显的例外；文章的作者说，莎士比亚对“一个少年男演员”的所谓激情，这个“主题”“非常令人不愉快”，而且“以一种特别无礼的方式在文章中加以扩展”。这种迂腐的反对论调得到了W.E.亨利（当时在爱丁堡担任《苏格兰观察家》编辑）谨慎的响应。他称这篇文章“不适合《布莱克伍德杂志》——或者任何流行杂志”。王尔德觉得自己可以不去理会这些冷嘲热讽。他对亨利说：“流亡到苏格兰，在荒原上主编托利党的一份报纸本就糟糕透顶，而看不到我发现真正的W.H.先生的奇迹和美妙绝对可怕。我

对你深表同情……菲利士人用最卑贱无耻的形式抓住了你。我非常失望。” ⑩

弗兰克·哈里斯对这篇文章的记忆是，它“引起了每个人的讨论和争论”。神秘的“W.H.先生”成为当时文学圈的话题之一。王尔德享受着成功，还有这种颠覆感。他已经成功地在一份受人尊敬的杂志上，对“少年之爱”及其对艺术的种种好处进行了一番非常坦率的阐述，其手段是通过框定一个神秘的故事并将其与英国最伟大的诗人联系在一起。他的自信——无论是在写作方面还是在隐秘的性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⑪ ⑫

然而，在性方面，谣言开始传播开来。在他刚开始全新性生活的头几年里，他所提倡并实践的那种极端谨慎的态度开始动摇了。 ⑬ 王尔德与年轻男子的关系在伦敦艺术和戏剧界的某些领域成为一个共同的秘密。埃伦·特丽在新画廊的夏季私人展上天真地问王尔德，当他对她的朋友——现在已经长大了的艾梅·劳瑟——说出，“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我就可以爱你了”时，是不是真心实意的，这番话惹来旁人一阵惊愕。亨利·欧文当时在场，并试图在回去的路上向她说明她的无心失言，但是她太天真了，根本听不明白。 ⑭

如果说王尔德乐于轻率地调情，那么其他人则不然。一次，康斯坦斯（她的才智与埃伦·特丽不相上下）对挑剔的拉夫洛维奇说，“奥斯卡说他很喜欢你——你们在一起进行了那些令人愉快而不得体的交谈”，拉夫洛维奇听了很不高兴。自那之后，拉夫洛维奇声称他从未和王尔德说过话，除非在“目击者”面前。他不想被王尔德的不当行

为玷污。王尔德对这种自负做出了回应，他对拉夫洛维奇的社会地位和外貌发表了一系列越来越不客气的评论。“像拉夫洛维奇一样丑陋”成了他的惯用比喻。对拉夫洛维奇的盛情款待，他嘲讽说“亲爱的安德烈”来伦敦的“目的是开一家沙龙，而且他成功地开了一家沙龙”。不出所料，双方的裂痕很快便扩大为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即便他们见了面，那也只是“不情愿的偶然撞见”。^②

尽管布莱克伍德建议，在他们的年度文选《布莱克伍德故事集》中再次刊登《W.H.先生的画像》，但王尔德急于扩展这个故事，将它单独成书发表。继上一年《快乐王子》大获成功后，他渴望再推出一本自己的书。^③王尔德觉得自己的专业水平正在上升，这种感觉在那年夏天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在间隔了近五年之后，有两个美国制作人与他接洽，希望能将《帕多瓦公爵夫人》搬上舞台。女演员安娜·卡尔霍恩通过伊丽莎白·罗宾斯结识了王尔德，她表示自己对出演这个角色非常感兴趣。几乎与此同时，他收到了美国著名悲剧作家劳伦斯·巴雷特的来信。

巴雷特（王尔德在1882年告诉玛丽·安德森）早在剧本写成之前就对它很感兴趣。很可能是王尔德在第二年给他寄了一本私人印刷的剧本。当时或许是《维拉》的失败让巴雷特打了退堂鼓；然而，现在他又满腔热情地拾起了这个想法。王尔德很开心——“又自豪，又满意”，他的作品竟然没有被一个如此杰出并“艺术的”制作人“遗忘”。他赶忙向巴雷特保证，自己“非常乐意对剧本做任何你提出的修改”，因为“毫无疑问，剧本将获得巨大改进”。为了讨论这

些“修改意见”，王尔德——虽然一如既往地缺钱——到德国温泉小镇克罗伊茨纳赫拜访了这位演出经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忘掉语言的绝佳机会。”王尔德如此告诉罗比·罗斯。）他发现巴雷特身体不好，但在莱茵河边“愉快地驾车”时，他们讨论了如何最好地“浓缩”这出戏。自从《维拉》在纽约上演之后可能有一种反王尔德的情绪一直挥之不去，因此他们决定，为避免出现任何对王尔德不利的氛围，这出戏最好是以不公布作者名字的方式上演，并且换一个标题。即使附带了种种条件，对王尔德来说，年轻时的“杰作”还有可能登上专业舞台，这实在令人激动。虽然这出戏剧需要耗费一年多的制作时间才能结出硕果，但他依然对这个项目很有信心。 ⑨

王尔德从德国回来后不久，收到了来自另一位美国老熟人的邀请。J.M.斯托达特（费城出版商，两人曾经一起与沃尔特·惠特曼有过令人难忘的会面）以《利平科特月刊》编辑的新身份来到伦敦访问，他邀请王尔德于8月30日在朗廷酒店共进晚餐。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聚会：斯托达特、王尔德、性格开朗的爱尔兰议员亨利·吉尔，还有阿瑟·柯南·道尔。30岁的柯南·道尔总是称其为“一个黄金之夜”：

令我惊奇的是，王尔德竟然读过《迈卡·克拉克》（柯南·道尔当时刚刚写的一部关于蒙茅斯叛乱的历史小说），而且对它很感兴趣，所以我并没有感觉自己是个完完全全的局外人……他的个头比我们所有人都高出一大截，似乎对我们所说的所有内容都很感兴趣。他感情细腻，机智老练，这样一个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人，无论多么聪明，在本质上也绝不是一个绅士。他既索取又给予，但他所给予的是独一无

二的。他说话出奇地精准，夹杂着一丝微妙的幽默，还会用微笑和手势巧妙地说明他的意思，这些都是他独有的特点。这种效果是无法再现的，我记得在讨论未来战争时，他说：“双方的化学家会各自拿着一个瓶子向边境靠近”——他高举起的手和脸上到位的表情，组成了一幅生动而怪诞的画面。

然而，这顿晚餐不仅仅是一次社交应酬。《利平科特月刊》已经在大西洋两岸同时出版发行，斯托达特想要增强这种英美风格。正如一篇社论所说，该杂志最具特色的内容是每个月刊登一篇完整的短篇小说，但直到现在还是“仅限于美国本土作家”。斯托达特到伦敦是为了和一些英国作家签约。他邀请王尔德和柯南·道尔撰写故事，建议长度不少于3.5万个单词，“酬金”估计约200英镑。王尔德欣然表示同意。 注 注

对王尔德来说，这个提议不仅是恭维，而且颇为及时。尽管最近他的文学声誉有所提升，但他作为杂志编辑的职业生涯却即将结束。

《女性世界》可能获得了一些出色的口碑，但它在商业上并没有取得成功。卡塞尔出版公司宣布，王尔德的任期（以及杂志本身）将于10月结束。王尔德到时候即使不怀念这份工作，也会怀念这份收入。 注

《利平科特月刊》的邀约前景光明，再加上劳伦斯·巴雷特计划制作的《公爵夫人》，以及《W.H.先生的画像》成书出版的可能性，造就了一股逆流而上的乐观情绪。王尔德沉浸在这一刻的享受中，于夏末动身前往普罗旺斯度假——其同伴至今未知。他回来之后准备投入工作。他决定为斯托达特写一个关于渔夫和美人鱼的精致童话故事。

他写了个开头，但进展缓慢得令人沮丧。王尔德在法国时感染了一种使人衰弱的疾病（他称之为“疟疾”），耗尽了他的精力。病情绵延拖了好几个月。他对自己的诸多计划漫不经心，似乎无法将它们付诸实现。最后，他写信给斯托达特在伦敦的代理人，建议他们推迟渔夫故事的最后交稿期限。“我无法完成它，”他解释道，“就目前而言，我对它不满意。”^⑨

扩充版的《W.H.先生的画像》进展颇为顺利。这个主题游走在性越界的边缘，也许比神秘的《渔夫和他的灵魂》更容易让人兴奋。王尔德在扩充的内容里，通过“在灵魂深处，在理智热情与肉体激情的奇妙对比中，在梦想将美丽而有生命的（男性）形式当作理想化身的过程中，进行微妙的性暗示”，完全明确了莎士比亚对“威利·休斯”的爱与传统的“少年之爱”之间的联系，后者从柏拉图的《会饮篇》一直延续到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及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者。

那年秋天，他把修改后的故事读给朋友和熟人听，至少是复述了一遍，激起了人们对这本书的兴趣（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他声称，安德鲁·朗“并非完全怀有敌意”，而且“贝尔福认为自己被说服了”。王尔德还把扩充内容后的手稿交给了出版商，很可能是布莱克伍德的出版社，但该公司的读者对此感到震惊。王尔德写道：“他们建议我不要发表它，以免腐蚀我们英国的家庭。”^⑩这样的拒绝似乎只会增强他出版这本书的欲望。他认为，想出版这本书还需要一幅卷

首插图——年轻的“威利·休斯”的形象；王尔德开始考虑谁能提供这样的作品。

他最近收到了一本有趣的——完全关于美学的——出版物，名为《日晷》。它集散文、故事、艺术札记和图画于一体，是由年轻艺术家查尔斯·里基茨和查尔斯·香农私人出资制作的。他们住在离泰特街很近的一所摄政时期的破旧房子里（不久前惠斯勒曾经住在那里），房子坐落在国王路旁边的一条朴素的胡同里。王尔德上门拜访了他们。

他发现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家庭：23岁的里基茨性格活泼，小个子，红头发，一双明亮的眼睛，留着浓密的胡子，活力四射，求知欲很旺盛；相比之下，26岁的香农更安静，更俊美，毛发更稀疏。屋子里几乎没什么陈设，但能从中分辨出不少艺术细节。黄色的墙上钉着日本版画。虽然我们从来不清楚这两位艺术家之间是否存在性方面的关系，但两人之间的情分和互助是显而易见的。许多人猜想他们之间的确存在性关系；还有人怀疑这两个好朋友刻意将性冲动转移升华成了艺术。当时有人给他们起了个绰号“溪谷姐妹” (the Sisters of the Vale)。^⑨

里基茨后来回忆起王尔德来访时的兴奋情景时说：他盛情赞扬了《日晷》，并告诫说：“这真是太令人愉快了，但是别出版第二期，一切完美的事物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他查看了他们的工作状况；之后他出人意料地要求里基茨为他画一幅“伊丽莎白时代风格的小画像——有点像，克卢埃的风格”——用来装饰他打算出版的一本关于“W.H.先生”的书。几天后，王尔德在泰特街的书房里给里基茨读

了这个经过扩写的新故事。“不到两个星期”，里基茨就画出了这幅小肖像，并和香农一起将它镶了起来，香农形容画框就像“被虫子咬过一样”。^②

王尔德很激动：

“亲爱的里基茨，”他写道，“这根本不是伪造，而是具有最高价值的一幅克卢埃真品。你和香农想欺骗我实属荒谬！就像我不知晓大师的笔触，不是绘画鉴赏者似的！”

亲爱的伙计，认真说来，它棒极了，你把它送给我实在让人感激、兴奋，由于无以回报，失望之下我当即恳请上帝往溪谷撒下黄金和玫瑰，或者把这些东西撒在德·摩根们不居住的溪谷区。我真的极为感激（不！那个词可怕：我从不感恩），我受宠若惊，心醉神迷，同时我希望我们一直是朋友，彼此经常相见。”^③

王尔德的故事现在有了一幅完美的卷首插图，但他仍在努力为这本书找一个出版商。这项计划在那年秋天进行得如火如荼，到了年底却眼看就要夭折。目前尚不清楚出版商们不愿接手这个项目，到底是出于道德原因，还是商业方面的考虑。但就在当时，公众对男性之间的性关系存在一种高度焦虑——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从9月底开始，伦敦就充斥着关于警察在托特纳姆法院路附近的克利夫兰街发现一家男性妓院的“低级趣味流言”。在那里做生意的男妓大多是来自中央邮局的十来岁的电报员，据说他们的顾客中还包括几名贵族——甚至可能是王室成员。起初，当局竭力掩盖这件事，但到了年

底，丑闻还是在新闻界爆发了。当时，尤斯顿伯爵觉得有必要起诉伦敦北部一家报纸的编辑，因为后者暗示他是那个地方的常客。尽管没有迹象表明王尔德曾经造访过克利夫兰街19号，但他肯定会对此案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乔治·刘易斯担任了尤斯顿勋爵的律师。

这桩丑闻为英国人的伪善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媒体一方面声称对“贵族老爷”花钱与工人阶级的电报员发生性关系这一现象感到震惊，另一方面又兴致勃勃地报道了全部细节，他们确信这样的报道很有读者市场。很明显，当局一直不愿采取行动。唯一被起诉的两个人（都是妓院的打工者）都获得了轻判；关于他们的情况几乎没什么报道。与此同时，丑闻中最引人瞩目的社会人物亚瑟·萨默塞特勋爵则被允许在没有发布逮捕令的情况下逃往国外。❷

王尔德饶有兴趣地关注着这出好戏，但他也有自己的烦恼——或者是说小麻烦——要应付。他曾经结识过一位名叫赫伯特·维维安的年轻作家，并以开玩笑的口吻鼓励对方写点“回忆文章”。于是，维维安开始在《太阳报》上摘要地发表一些草率写就的《短暂生活的回忆》。他称王尔德是“童话教父”，在他转述的诸多轶事中，有几件与泰特街的家庭生活有关。维维安提到，王尔德曾经打趣地说，他在孩子房间的墙壁上装饰了“关于清晨早起、懒散倦怠之类的文字，我告诉孩子们，长大后要吸取他们父亲的教训，偶尔地在下午两点之前吃个早饭”。他还讲述了西里尔小时候，不愿意在祷告时说出“让他变得更好”这句话，“经过长时间的争吵”之后，作为“妥协”，他

表示“不介意向上帝祈祷让娃娃（维维安）变得更好”。^⑩王尔德为这些细节的粗俗和侵扰感到沮丧。“跟你在社交场合见面时，”他斥责那个傲慢的年轻作家，“在令我深感遗憾的一刻，我偶然向你谈起我孩子的事。你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将其在一份庸俗报纸上登了出来，而且采取的是庸俗、不准确和无礼的形式，这大大伤害了我的妻子，她自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展示出来取悦愚人。”他在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件中，坚称自己的名字不该被用来为这本书背书。^⑪

赫伯特·维维安这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胡言乱语还带来了其他方面的烦恼。他评价称，王尔德在学识上受到惠斯勒的恩惠，从而揭开了那个旧伤口，促使惠斯勒给《真相》杂志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而当时该杂志正在就剽窃的道德问题展开辩论。惠斯勒谴责王尔德是“最愚钝的犯人”，重新讲述了他所有的旧怨，并指出（就像维维安所做的那样）“有勇气接受别人的思想”——出现在《谎言的衰朽》中——这句话是从惠斯勒之前寄给王尔德的一封“记忆犹新的信”中“不加一个评语”借用来的。^⑫面对这种蓄意冒犯的攻击性语气，即便性情温和的王尔德也觉得有必要做出回应。他给《真相》杂志写信表示，很遗憾被迫去关注“惠斯勒先生这样一位缺乏教养而且无知的人的苦思冥想”——不过，他继续写道：“有关一个门徒是否有勇气接受导师的思想，这种说法真的是太老旧了，甚至就连（惠斯勒）也没有权利声称那是他的高见；至于借用惠斯勒先生关于艺术的思想，我听他说过的唯一彻底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乃是说他本人优于比他本人伟大的画家。”^⑬两人之间裂痕现在已经公开，无法挽回了。

这样的结局令人伤感。不过，又有许多新鲜开启的事物吸引了王尔德的注意力。他与里基茨和香农的友谊与日俱增。自从第一次拜访之后，王尔德经常光顾溪谷。没过多久，他一周要去那里“闲聊”三次。他们在这些愉快的夜晚谈论着里基茨所谓的“令人启发的‘腐朽’”。^①两人当中，最吸引王尔德的是活泼、博学、略显粗鲁的里基茨。他有一半法国血统，和高卢人一样喜欢玩弄思想，尝试各种理论，重提旧有的观点——常常让他那位缺乏想象力的同伴恼怒不已。“说这话有什么用？”香农有时会争辩道，“你知道你不是这么想的。”然而，王尔德却很喜欢这样的天马行空，并准备和他们一比高下。后来成为国家美术馆馆长的查尔斯·霍姆斯是溪谷的常客，他描绘了这样一幅典型场景：“里基茨坐在桌边，和王尔德进行一场冗长的舌战。那些机敏的回应和反驳是如此之迅速，以至于我迟钝的大脑只能听懂后面的几句，除了里基茨的那句‘哦！胡说，奥斯卡’之外，他们说过的话我一句也想不起来。这是我记忆中有幸听到的，最令人眼花缭乱的对话。”^②

他们争先恐后地炫耀并分享他们的文学兴趣和艺术热情。“王尔德在我眼里，”里基茨后来回忆道，“是一个认识斯温伯恩、伯恩-琼斯，也可能认识罗塞蒂的人。我想，他让我读佩特的书，我让他读维利耶（利勒·亚当）和魏尔伦的书；我们对波德莱尔和福楼拜有共同的想法。”里基茨对法国文学和艺术的了解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王尔德。他借给这位新朋友一本魏尔伦1870年出版的著作《华宴集》，还向他介绍了魏尔伦的一些追随者的作品。^③

那年2月，王尔德在牛津遇到了另一位有趣的法国青年。他在牛津拜访了佩特，并为学生们上演罗伯特·布朗宁的戏剧《斯特拉福德》提供了建议。也许是受到佩特的指引，他发现了一个名叫莱昂内尔·约翰逊的大学生诗人。“星期六中午，”约翰逊对一个朋友说，“我半睡半醒地躺在床上，读着格林的书，出其不意地被奥斯卡送来的一张伤感的字条惊醒：他哀怨地恳求我起来见他。我照做了：我发现他讨人喜欢的程度和格林不讨人喜欢的程度不相上下。他提到每一个人，言语尖刻到极点；他称赞了《日晷》；嘲笑了佩特；抽光了我的烟。我爱上他了。”王尔德也很享受这次邂逅，并希望在伦敦更多地见到约翰逊。 ② ②

2 一桩糟糕事

艺术的范畴和伦理的范畴是完全不同的，互相分离的。

——奥斯卡·王尔德

此时，王尔德为《利平科特月刊》写故事的计划开始出现变动。在《渔夫和他的灵魂》上煞费苦心了好几个月后，他放弃了将它交给杂志的想法。这篇故事只有1.5万单词，实在是太短了。除此之外，他又有了一个“更好”的新主意，那就是写个关于一幅神秘肖像的故事。❶ 故事的种子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埋下。1887年12月，他的朋友，加拿大艺术家弗朗西斯·理查兹为他画了一幅肖像。理查兹当时在伦敦肯辛顿，和罗斯一家住在一起。“摆完姿势站起身后，”王尔德回忆说，“我看着这幅画像，开玩笑地说，‘这是多么可悲啊。这幅肖像永远不会变老，而我会。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就好了！’就在说话的那一霎，我突然想到，这是一段何其重要的故事情节啊。”❷

随即顺势编排出一个爱伦·坡式的故事：有一位英俊的年轻人，整日沉溺于花天酒地的享乐生活，他身上始终没有丝毫年华老去，放浪形骸留下的痕迹。然而，这两种可怕的印记却都日积月累地显现在他的肖像上。他擅长即兴表演讲故事，这个故事也一样，在他的朋友们和饭局上的同伴之间流传开来。现在，他决定将它写下来——或者说是将它写完。❸ 为了达到篇幅3.5万个单词以上的要求，这个故事还需要更充实一些。王尔德告诉斯托达特，他可以在3月底完成这项工

作。他还询问，是否可以“提前拿到一半稿费（100英镑）”。抱病赋闲了几个月之后，他需要钱。❶

王尔德对这项工作满怀热情，他开始扩充情节，并往里注入了自己当前关注的几个问题——法国颓废派文学、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少年之爱带来的创造力，以及经历“双重生活”的种种挑战。他创造了道林·格雷的形象，这个虚荣的年轻人希望自己的肖像日渐老去，这样他自己就可以永葆青春；巴兹尔·霍尔沃德——迷恋道林的艺术家——创造了这幅神奇的画像；亨利·沃顿勋爵是“新享乐主义”的世俗倡导者，他带领道林走上了一条通过自我放纵实现自我的致命道路。“摆脱诱惑的唯一方法，”他告诉道林，“就是屈服于诱惑。”

道林·格雷的名字不仅与迪斯雷利的第一部小说《薇薇安·格雷》相呼应，而且还间接地指向了古代斯巴达的“多利安人”，人们认为是他们将少年之爱引入了希腊文化；而道林在与霍尔沃德的关系——被框定为一段热烈而浪漫的友谊——之中，也是属于“被爱者”，他的俊美激励同性“爱人”创作出一幅艺术杰作。王尔德借鉴佩特的《文艺复兴史研究》和自己的《W.H.先生的画像》所勾勒出的系谱图，将巴兹尔对道林的感情描述为一种“高贵而理智的”爱——“不仅仅是用身体欣赏美，此种欣赏源于感官，当感官疲倦时就会消亡。这是米开朗琪罗、蒙田、温克尔曼和莎士比亚所了解的那种爱。”❷

为了给道林·格雷的享乐生涯提供一份蓝图和指南，亨利勋爵借给他一本致命的书——一本“写作风格惊奇”的法国小说，它“……没有故事情节，里面只有一个人物，实际上，它只是在研究一名巴黎青

年的心理状态。这个青年穷极一生，只为将属于每个年代的欲望和想法在19世纪变成现实。当然，他自己的年代除外……他热爱那些其实不过是矫揉造作，却一直被愚笨的人们称为美德的自我克制。他同样也热爱那些被明智的人们称为罪恶，实则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叛逆不羁”。这些灵感明显源自——正如王尔德私下承认——于斯曼的《逆流》，然而他却称其为卡蒂勒·萨拉赞(Catulle Sarrazin)的《拉乌尔的秘密》(Le Secret de Raoul)（他以一种相当含蓄的方式暗示了拉柴尔德小说《维纳斯先生》中的男主角；颓废派作家卡蒂勒·孟戴斯；以及王尔德的朋友加布里埃尔·萨拉赞）。^②王尔德对道林的享乐和犯罪只做了粗略描述，虽然以当代法国人的标准来看，这种做法是恪守沉默的典范，但他很清楚，书中所暗示的吸毒、性掠夺和“不正常”恶习已经远远超出了当代英国小说所能接受的限度。他即将在当今小说界发出一种新的声音。

他设计了一段底层生活的次要情节，其间道林爱上了一位名叫茜比尔·文的伦敦东区年轻女演员，被她扮演的莎士比亚戏剧中浪漫的女主人公迷住了。可是，当她过于真实地爱上了他，且因此削弱了艺术能力，无法在剧中令人信服地展现爱情的时候，他拒绝了她。王尔德制造了一个高潮，道林在谋杀了巴兹尔·霍尔沃德并破坏了无数人的生活之后，竟然扼制住悔恨，最终试图通过摧毁现已容貌丑陋的肖像来抹杀过去，结果却毁灭了自己。

在书中人物亨利·沃顿勋爵的编排下，三个主角之间的妙语连珠抵消了情节中时而过于夸张的桥段。王尔德很享受写作这部分内容，有

时候甚至因此影响到小说的整体平衡。事实上，他向一位朋友坦承，这个故事“非常像我自己的生活——一直说话，没有行动。我无法描述行动：我笔下的人物就是坐在椅子上闲聊的”。^①这些闲聊内容帮他保留了自己心血来潮的机智风趣，延续了他在《谎言的衰朽》一书中成功开创的将悖论与观点融合在一起的手法。弗兰克·哈里斯认为这个故事的“前100页”是“奥斯卡几个月来喋喋不休的结果”，而亨利勋爵则“异乎寻常地成了奥斯卡的代言人”。^②

这篇近5.5万字的小说是他迄今为止写作得最持久的一篇文章。他一心扑在写作上，为了赶在最后交稿期限之前完成任务，他甚至还拒绝了午餐约会。^③他确实也走了一些捷径：对宝石和教堂礼服的描述几乎是一字不差地从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艺术手册”上抄来的。^④但之后，他在其他领域进行了更加细致缜密的探究。他不厌其烦地向一位年轻的科学家朋友讨教有关道林处理巴兹尔·霍尔沃德尸体的最佳方法。他的手稿从总体上显露出一丝不苟的痕迹。^⑤

王尔德在3月底之前准备好了一份完整的打字稿。尽管他对伯纳德·贝伦森佯称，自己完成了一桩杂志的苦差事，但毫无疑问，他对自己的创作感到既自豪又高兴。他兴奋地对另一个朋友说，这是“我最好的作品”。^⑥正如巴兹尔·霍尔沃德在道林的肖像中投入了大量精力，王尔德也在他的故事中倾注了许多。他后来曾说：“巴兹尔·霍尔沃德是我自己眼中的我；亨利勋爵是世人眼中的我；道林是我想成为的人——也许在其他时代。”^⑦

王尔德把稿件寄往费城，等了将近一个月后，他收到了斯托达特的来信。斯托达特在信中表示“对这个故事非常满意”——认为这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它将被刊登在7月号的杂志上。

⑨不过，这封信背后隐藏的信息，与其表面揭示的一样多。斯托达特第一次阅读手稿时，虽然被其力量所震撼，但同时也警觉地注意到“其中有一些内容会招来清白女人的抗议”。他告诉他的老板克雷奇·利平科特，这个故事出版之前，“无疑必须修改”那些“令人反感的段落”。他向几位文学界的同事（有男有女）咨询，如何才能尽可能完美地完成这一编辑任务，在此之后，他才写信告知王尔德，并接受了他的故事。然而关于这些，他在信中只字未提；毕竟，他没有时间与王尔德商讨如何修改。斯托达特和他的一位编辑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他们从打字稿中删去了500多字。一些被修改——并且淡化——的内容涉及巴兹尔·霍尔沃德对道林感情的同性恋本质；还有一些被删掉的内容是亨利·沃顿勋爵送给道林的那本致命法国小说中的颓废细节（小说奇异的书名和作者也被抹去了）；不过，被删掉最多的是道林与女性的混乱关系。所有提到情妇和卖淫的内容都被小心翼翼地抹掉了。⑩

身在伦敦的王尔德对这些动作毫不知情。他为这个故事感到兴奋不已。他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即将出版的杂志之外，考虑的是在9月收回版权后，如何扩充这个故事，并将其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他认为再多写两章就足够了；其结果将“轰动一时”。他至少联系了两家出版商，希望他们能够接手。麦克米伦公司就是其中之一。然而，“轰动”并不是对方想要的。莫里斯·麦克米伦（王尔德的朋友乔治的哥

哥)立刻回信,遗憾地表示,这个故事不适合他们——“我们几乎没有处理过情境如此强烈的作品;坦白地说,文章中道林·格雷胁迫年轻自然科学家(让他帮忙处理巴兹尔·霍尔沃德的尸体)的力量,以及其他的一两样事物,相当令人反感。”“我敢说,”他补充道,“你并非蓄意要写成这样。”而且,似乎其他出版商也很谨慎。最后,王尔德与沃德·洛克公司达成了协议,这家公司最近接手了《利平科特月刊》在英国的发行工作。❶

为道林·格雷制订计划的兴奋之情似乎也刺激了王尔德创作其他文学作品的速度。他在《谎言的衰朽》获得成功的基础上,为《19世纪》撰写了篇幅更长的第二篇“对话”:在超级有文化的“吉尔伯特”和相当认真的“厄内斯特”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批评的真正功能和价值”的讨论。这是对王尔德非道德且无用的美学思想的又一次颂扬,也是对既定等级制度的颠覆。

马修·阿诺德在他1864年的著名文章《批评在当前的作用》中表达了一个响亮的观点,即批评的目的是“看到事物真实的本身”。王尔德推翻了这个观点,文中的吉尔伯特主张“批评家的主要目的是看出对象本身以外的事物”。他认为,批评应该是对批评家印象的纯粹主观记录。“对于批评家来说,艺术作品只是一种启示,启示他创造属于自己的新作品,而他的新作并不需要与他所批评的事物保持明显的一致。”批评家并不寻求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而是要回应它的美丽——寻求“深化作品的奥秘,围绕着它和它的创作者散播一种能够让神祇及其膜拜者都感到亲切的神奇迷雾”。因此,“批评

家”的作品等同于“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的作品；事实上，还要更胜一筹，因为批评家接触的是精致的“艺术”，而非未经提炼的“自然”。这句话——和对话中的许多其他内容一样——是精心炮制而成，用来激怒惠斯勒的。

为了适应这项任务，评论家必须“强化”自身的“个人主义”——不是通过限制他的同情心，而是扩大它们。王尔德让吉尔伯特提出，“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式：“由于它的奇特，罪恶增加了人类的经验。它通过强化个人主义，使我们免于类型的单一化。”但是，评论家必须采取姿势来表达自己。“人们，”吉尔伯特断言，“在坦诚相见时最易伪装自己，给他戴上一副面具，他就会告诉你真相……人们称作不真诚的东西，仅仅是我们可以用来增长自己个性的方法而已。”这篇“对话”将分成两部分出版，分别刊登在7月刊和9月刊上。

对话和小说，再加上他最近撰写的几篇文章——从《笔杆子、画笔和毒药》到《道林·格雷的画像》——它们坚定了王尔德对自己未来的憧憬，即成为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之一。如他后来所说，他“把艺术变成了哲学，哲学变成了艺术”，“用一句话概括了所有的体系，用一行警句概括了所有的存在”。^⑨他的一系列出版物也证实了他对自己的另一番愿景，即成为一名纯文学人物。他终于觉得可以放弃仅仅作为“新闻”的评论了。1890年初，他为《演讲家》杂志——一份由他在卡塞尔公司的前同事威姆斯·雷德编辑的新周刊——撰写了四篇

书评，这将是他的收官之作。❶他已经在更广阔、更尊贵的舞台上获得了一席之地。

6月的第三个星期，《利平科特月刊》7月号出现在伦敦的报摊上，其封面上印着一行醒目的说明：“本期杂志刊载由奥斯卡·王尔德创作的足本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在这件事情上，光是王尔德这个名字，就足以“激起广泛的兴趣和好奇”。人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这个故事立即引起了轰动。❷它被褒奖为“本年度最成功，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充满强烈而持久的趣味性”，“写得很吸引人，对话简洁，人物性格非常精彩”。❸它的情节与《浮士德》相似，风格与迪斯雷利和维达相近。人们将这幅画的“神奇目的”与爱伦·坡和霍桑进行对比，把它的核心思想与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相比较。这部小说很快便“独占了伦敦读书人的注意力”。❹不可否认，这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文学作品。在王尔德的写作生涯中，他似乎第一次将自己的恶名与一项同样臭名昭著的成就匹配了起来。

王尔德夫人一如往常满怀热情，承认自己“读到最后一幕时差点晕了过去”。她认为，这部作品在“当今所有小说中最为出色”。❺罗比·罗斯称，“即便在萨维尔区”也只能听见“赞美道林·格雷的声音，当然人们传说它十分危险”（罗斯听见一位牧师在赞美这部小说之余，遗憾地表示，“亨利勋爵的某些观点容易让人误入歧途”）。一家名叫斯特兰德的书店一天就卖出了80本杂志：“往常的销量是每星期三本”❻。

有超过200篇文章对此做出了评论——对于一篇发表在英美期刊上的中篇小说而言，如此反响非同小可。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持赞成意见。事实证明，王尔德保留了他过去惹恼批评家的所有能力。有一篇评论批评他“不太会使用‘will’和‘shall’这两个词”，另一篇文章则批评“文章中的描写段落显得很专业，叙述得不够精确”。^⑨《帕尔摩报》刊登的长篇评论写道：“奥斯卡·王尔德先生的新中篇小说是由三个同等比例的元素组成的。一部分是史蒂文森，一部分是于斯曼，一部分是王尔德。”源源不断贯穿对话的“大量悖论”展现出独特的王尔德风格（“真正的奥斯卡——我们所认识的那个19世纪末的奥斯卡”）。为此，评论挑选出大量的例子——既“独特”又“陈腐”（不过要留给读者去判断，哪些是独特的，哪些是陈腐的）：

——“顺其自然只不过是一种姿态罢了，而且在我看来算得上最恼人的姿态了。”

——“哪怕最荒诞不经的事情，我都会相信。”

——“人在选择敌人时应该打起十二分精神。没有一个傻子有资格成为我的敌人。”

——“只有浅薄之士才不会以貌取人。”

——“朝三暮四和矢志不渝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前者反而会更持久一点。”

——“罪孽才是现代生活中唯一的色素。”

——“人们清楚各种物件的价格，却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

——“在伦敦，能交谈的只有五个女人，但其中两个还得不到上流社会的认可。”

——“抽烟才是最叫人舒服的享乐方式。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叫人永不满足。”

——“亨利勋爵经常姗姗来迟，因为他恪守这样的信条：准时是时间的窃贼。”

——“我现在什么事情都不表示赞成或不赞成。我不愿对生活采取这样荒唐的态度。”

至于史蒂文森式的那一部分，评论者认为，尽管王尔德的故事可以“和杰基尔博士一样被归为道德故事……但它只是肤浅的道德”——甚至在逻辑上也不连贯。所谓的道德只是“一件传统的外衣……为了确保王尔德先生的幻想故事能够进入体面的英美社会”。王尔德文学“灵感”中的“主导元素”——据说——更确切地说，大体上是“法国‘颓废派’的审美异教”，特别是《逆流》：

王尔德先生感兴趣的是美德和邪恶身上生动的一面，而不是伦理的一面。纯洁只有和它的对立面进行对比，才有它的艺术价值；而腐败是闪耀的，色彩斑斓的，充满了诱人的效果……从一开始（作者）就将我们置于一个病态的氛围中。开场时，亨利·沃顿勋爵和巴兹尔·霍

尔沃德谈论道林·格雷的方式让我们暂时以为，貌美的道林一定是个穿着男性服装的女人。我们错了；道林·格雷“鲜红的嘴唇轮廓雅致，湛蓝的眼睛目光坦然，还长着一头金色的卷发”，他和他的崇拜者属于同一性别；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对他的崇拜之情，以及这种崇拜的表达方式，显得少许地不那么令人作呕。随着故事的推进，气氛并没有变得洁净起来。从波德莱尔的观点来看，王尔德先生对他主人公的恶习的隐晦暗示非常有效。我们感觉到空气中有一种穿透力很强的毒药，却看不清它来自哪里。❶

尽管一些报纸称赞这篇小说“具有高度的精神意义”，但《帕尔摩报》和萨维尔俱乐部的成员们一致认为，王尔德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病态的”“不健康的”“危险的”，并带有“毒害”的色彩。《圣詹姆斯公报》《每日纪事报》和W.E.亨利的《苏格兰观察家报》（讽刺的是，罗比·罗斯在剑桥度过了不愉快的一年之后，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都着重强调了这一立场。三者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聚焦了故事中“不正常”的同性恋欲望的暗流。他们谴责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之间令人腻烦的关系，指责亨利·沃顿勋爵提出的享乐主义信条、对道林的种种堕落行为的描述——尽管它们可能是模糊的，以及王尔德在写作这些内容时毫不掩饰的愉悦感。

“为什么要去挖掘垃圾堆呢？”查尔斯·惠布利在《苏格兰观察家报》上发表的匿名文章中提出质问：

世界是美好的，思想健康的男人、诚实的女人相对于那些污浊、堕落或反常的人在世上所占的比例是巨大的。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又在

撰写不如不写的东西；《道林·格雷的画像》.....精巧、有趣、充满机智，是真正的文人之作，但另一方面它是糟糕的艺术，因为它的兴趣在于法医学；它的人性是不正确的——因为它的主角是个恶魔；它在道德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没有充分明确，比起干净、健康和理智的生活，作者自己是否更喜欢一种不正常的罪孽。①

《每日纪事报》称这部小说是个“有毒的”故事，“这是从法国颓废派麻风病文学滋生出来的.....气氛沉重，散发着道德和精神腐败的恶臭”；《圣詹姆斯公报》怀疑“财政部或国家警戒协会是否认为有必要起诉奥斯卡·王尔德先生”或他的出版商，因为他们竟然制作出如此“腐败”且令人反感的作品；而《苏格兰观察家报》则认为，这个故事“只适宜于刑事调查部或秘密听证”，只会吸引“非法的贵族和堕落的电报男孩”。②文中提及的“电报男孩”“非法的贵族”“法医学”的兴趣，以及“国家警戒协会”等都反映并刺激了克利夫兰街丑闻引发的关于性的“不正常罪孽”的焦虑。

在（即便没有）媒体的影射下，许多读过这本书的人发现了它的“危险”潜台词。维奥莱特·马丁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肆无忌惮的淫猥”；约翰·艾丁顿·西蒙兹收到了王尔德寄来的书，他认为“如果英国公众能容忍这本书，那么他们就能容忍任何事情”。王尔德对这些反应并不感到非常惊讶。毕竟，他曾拒绝让天真的格雷厄姆·罗伯逊读这个故事，并告诉他：“这本书不是为你写的。”③佩特拒绝评价这本书，理由是它“太危险”；他告诉王尔德，他担心笼罩在道林的“罪恶”周围的“神秘帷幕”在某处滑落，从而过于明显地暴露出

巴兹尔·霍尔沃德对其的性激情。他可能还一直担心，亨利勋爵提倡的“新享乐主义”，似乎呼应了他在《文艺复兴史研究》备受争议的“结论”中提出的思想，甚至是措辞，会将它们引向一个新的去向。在此期间，他自己已经花费了数年时间去淡化他号召的所谓一个以追求“经验”为目的的人生。他自己的小说《享乐主义者马利乌斯》（出版于1885年）中的主人公主张的是一种更为简朴的人生哲学，与“新享乐主义”截然不同——是一种认识到“道德感”对于“人的整个有机体的和谐发展”与完整之重要性的享乐主义。❷

在美国，人们普遍不理解这种愤怒。《纽约时报》6月底的一篇社论提到，这部小说在英国“激起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其在美国的影响，“原因很简单，自从去年被委婉地称为‘西区丑闻’（即克利夫兰街丑闻）的事件曝光以来，英国人一直对指向友谊的，最轻微的色情暗示异常敏感”。而“一万个美国读者中也不太可能有一人”的脑子里会闪现出如此“兽性的怀疑”。❸

王尔德声称对媒体的攻击感到高兴，因为英国公众“只有在得知一件艺术品是不道德的，才会对这件艺术品感兴趣”，这样的评论将“极大地增加杂志的销量”。他只是遗憾，稿酬已经全部付清，他无法从中受益。为了保持这个话题的活跃度，他和三家报纸展开了一场戏谑式的通信——采用了各不相同的辩护手法。他对《圣詹姆斯公报》说：“我十分不能理解，如何可以从道德的立场来评论一件艺术品。艺术领域和道德伦理领域是绝对不同和相隔离的；正是由于两者

的混淆，我们才有了格伦迪夫人，这位迷人的老夫人代表了本国中产阶级所能产生的唯一的幽默原型。” ①

他向《每日纪事报》编辑承认（使用了他最喜欢的头韵），这本书“是有毒的，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但你无法否认它也是完美的，而完美正是我们艺术家追求的目标”。 ②在另一封写给《圣詹姆斯公报》的信中，他哀伤地承认——“天啊！”——这的确是一本具有道德的书。“道德是这样的：所有的无节制和节制，都会给自身带来惩罚……这是一个艺术错误吗？我怕是的。这是这本书唯一的错误。” ③

他避开了惠布利“极不公正”的含沙射影，在信中写道，虽然“这一故事的戏剧发展”需要“把道林·格雷置身于道德腐败的气氛中”，但他已经设法把各种细节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每个人都从道林·格雷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罪过。” ④ ⑤

王尔德曾经乐观地断言，有关故事不道德的流言将会有利于销售，但这一判断没有完全得到证实。尽管开头还算顺利，7月10日沃德·洛克公司收到了一封“来自W.H.史密斯父子公司的告知信，‘据新闻报道，（王尔德的）小说讲述了一个猥琐的故事’，他们被迫从书摊上撤下了《利平科特月刊》”。出版商要求立即面见王尔德，并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⑥的确如此。在此之前的两年里，国家警戒协会（一个成立于1885年的机构，“旨在执行和改善法律，以镇压犯罪和公众的不道德行为”）已经两次成功起诉了英国

出版商亨利·维泽特利，原因是他发行了埃米尔·左拉的英文版小说。他共被罚款300英镑并监禁3个月。

或许正是沃德·洛克公司的焦虑促使王尔德到《圣詹姆斯公报》办公室，他要求面见塞缪尔·杰伊斯，这位记者最早撰写了一篇充满敌意的评论，并加剧了持续的争议。杰伊斯（他在牛津比王尔德低一个年级）毫不妥协。尽管王尔德用尽了“他所有的说服方式和丰富的智慧”，但杰伊斯拒绝让步。“如果你撰写并暗示的并不是你实际上想要的东西，这又有什么用处？”他问。“我向你保证，”奥斯卡恳切地回答，“我说的每一个词都是我想的，我暗示的所有东西也都是我想的。”“那么，我只能说，”杰伊斯冷冷地说，“如果你确实是那个意思，很可能，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弓街警察局了。”王尔德对此报以“淡淡的一笑”。^⑩

然而，杰伊斯的话中带有一丝警告。有很多人已经准备好读取有关道林“令人厌恶的罪恶和极其恶劣的罪行”所透露出来的种种暗示，认为这是王尔德自己的种种嗜好和行为的反映。如惠布利所指，这个故事让人不明白的是，“比起干净、健康和理智的生活，作者自己是否更喜欢一种不正常的罪孽”。当然，出生于美国的男中音大卫·比斯芬是王尔德圈子的边缘人物，在他看来，这个故事简直就是一篇鲁莽的“自白书”。^⑪这个故事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它们可能大大提升了王尔德的文学地位，但也加速了侵蚀他个人名誉的过程。康斯坦斯的评论固然相当夸张，“自从奥斯卡写了‘道林·格雷’，就没有人跟我们说话了”，但这个故事的出版无疑标志着王尔

德的声誉将进一步恶化。从那年夏天开始，伦敦的文化圈里开始大肆传播有关王尔德的“各种奇闻轶事”，让人越发难以忽视。❶

然而，表面上一切都进展顺利。7月21日，王尔德在路易丝·钱德勒·莫尔顿举办的派对上状态不错，与43岁的诗人凯瑟琳·布拉德利交谈起来。布拉德利和她的侄女兼终身伴侣伊迪丝·库珀二人合作以“迈克尔·菲尔德”的名义写作并出版。他们谈到了佩特的散文、法语的“颜色词汇”、英语的庸俗和简·奥斯汀的天才。王尔德说：“由于教育不完善，我们从女性那里得到的唯一作品是天才的作品。”谈到天上的事情，王尔德勾勒出他想象中天堂的样子。他说，他到了那里“会找到一些皮纸装订的书，有人会告诉他，那是他写的书”。❷这是一幅令人向往的场景。到目前为止，35岁的王尔德只出过两本书，《诗集》和《快乐王子》。它们很难成为不朽名著，他急于增强实力。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他会获得极大成功——不是通过写更多的文章，而是通过重新包装他已经写过的东西。

沃德·洛克公司已经在推进发行《道林·格雷的画像》图书版的计划，不过现在人们认为，为了“抵消”《利平科特月刊》版本所造成的广泛“损害”，可能还有必要补充另外两章内容。卡洛斯·布莱克对王尔德那个“该死的故事”将要“再次面世……而且还有补充内容，而非更正内容”的消息感到无比震惊。“您听说过如此可恶的‘作对’吗？”他对纽卡斯尔公爵说。然而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本书也许需要进一步强调道德信息，淡化其中的颓废细节。❸❹

虽然王尔德还在努力为《W.H.先生的画像》寻找出版商，而且希望一直落空，但他出版一卷散文集的计划却比较幸运。那年夏天，他在伦敦遇到了年轻的美国出版商克拉伦斯·麦基尔文，他正和两个从事文学的美国人乔纳森·斯特奇斯和斯图尔特·梅里尔一起旅行。这位24岁的波士顿人计划与著名的J.R.奥古德合作，创办一家新的英美出版社，正在英国寻找作家。王尔德开始争取他和他的两个同伴。梅里尔回忆说：“尽管他声名显赫，而我们默默无闻，但他向我们展示了魅力，丝毫没有摆架子或傲慢的样子。”^⑩这种魅力产生了效果：麦基尔文不仅同意接受王尔德的随笔合集（包括两篇对话），还同意出版他刊登在《宫廷与社会评论》和《世界》杂志上的四篇短篇小说的纲要，以及童话第二卷。这三本书将于第二年出版。

《道林·格雷的画像》引发了巨大的骚动，在它的刺激之下，王尔德陆续收到了其他各种邀约。诺曼·福布斯-罗伯逊年底签下了环球剧院的租约，他的目标是制作“演员阵容强大的优秀喜剧”。他找到王尔德，请他写一部戏。但不幸的是，他无法提供任何预付款。“我一直缺钱，”王尔德解释道，“只能做确定下来的事情。”^⑪乔治·亚历山大也来打探，他的开价更令人满意。这位32岁的演员也想进入管理层，想要一部王尔德的戏剧。他有理由尊重王尔德的品味，因为王尔德曾经在文章里褒奖过他的表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早就被征服了”，相信王尔德能写出一部好剧本。他读完《道林·格雷的画像》之后，对这位作家的“戏剧才能”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亚历山大还想获得一些他认为与王尔德名字相关的社会声望，以便为他的新剧院（圣詹姆斯剧院）带来“王尔德本人已经进入的上流社会圈子”。王

尔德立即作出回应，向他推荐了《帕多瓦公爵夫人》，计划于次年年初在纽约上演。但亚历山大的设想是一出现代装“社交剧”。与诺曼·福布斯-罗伯逊不同的是，他确实有能力预付100英镑：50英镑预付，50英镑在剧本交付时支付。王尔德欣然同意。 注

事必有三，那年夏天王尔德还收到了一封信，恳请对一个新成立的独立戏剧协会给予支持。该协会以巴黎艺术剧院为参照，旨在上演“英国最著名文学家”（梅瑞狄斯、哈代、史蒂文森、亨利·詹姆斯）的戏剧作品，以及“某些国外的非传统的杰作”（易卜生的《鬼》）——而无需将作品提交给宫务大臣办公室。该俱乐部的创始人是两名居住在伦敦的荷兰作家：亚历山大·特谢拉·德·马托斯和J.T.格莱恩，他们希望王尔德能创作出一部“非传统的戏剧”，并“借给他们……制作上演”。王尔德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过，这个提议让他觉得很开心，也许是这件事情让他第一次产生了想在“实验性”戏剧领域做点什么的念头。 注

有说法认为，《道林·格雷的画像》的出版导致王尔德一家遭到了社会的排斥，但任何类似的说法都在那年夏天不攻自破，因为这个假期他“处在紫色石南和银色薄雾之中”，是与众多苏格兰男爵一同度过的。王尔德承认道：“这使我，作为凯尔特人的我，从英格兰令人厌倦的绿色中获得解脱。我只喜欢艺术中的绿。此为我的众多异端之一。” 注

休假回到伦敦后，图书版《道林·格雷的画像》即将出版，作为准备工作的一部分，王尔德邀请里基茨为这本书的封面和扉页做一些设

计。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合作，并为日后的多次联手翻开了第一页。它将王尔德进一步拉拢到溪谷的世界。他成了星期五晚上小型聚会的常客，有时候还带一个朋友去他所谓的“伦敦唯一永远不会让人感到无聊的房子”。^⑨他逐渐认识了被里基茨和香农拉入这个圈子的艺术家、工匠和作家。他们当中有一个特别英俊、相当严肃的年轻人，名叫约翰·格雷。他是行政部门的一名小职员，出身不高，自学了法语，全身心地爱好文学。第一期《日晷》上有一篇他写的关于“龚古尔兄弟”的文章，还有一篇明显具有王尔德风格的童话《了不起的蠕虫》。他也写诗。王尔德对这首诗（这首诗学的是“巴黎颓废派”）大加赞赏，同样让他赞不绝口的还有这个男人，以及他那优雅的气质和迷人的举止。格雷和里基茨一样，能告诉他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⑨

王尔德兴奋地发现，竟然有这么多年轻人和他一样，对当代法国艺术和文学如此着迷——“这是现在欧洲值得讨论的艺术”，他对另一位新近结识的文学界朋友，自觉前卫的评论家兼诗人阿瑟·西蒙斯说。^⑩此外，约翰·格雷孩子气的英俊相貌也莫名地令人联想起王尔德小说的中心主题。事实上，王尔德认为格雷几乎就是“道林”的形象。“直到我在书中描述了他之后，我才找到或见到他。”他后来评论说：这绝妙地证实了，艺术激发和引导了自然。“如果我没有描写过道林的话，这个年轻人就永远不会存在。”^⑪这种联系成了他们之间的玩笑和纽带。王尔德会笑着暗指“约翰·格雷是他的男主角‘道林’”。格雷在写给王尔德的信中，甚至至少有一封署名为“道林”。^⑫

莱昂内尔·约翰逊和新成立的“诗人俱乐部”的其他成员也有同样的想法。“诗人俱乐部”是由叶芝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创立的年轻诗人的非正式组织。王尔德和格雷偶尔会参加在菲茨罗伊街世纪行会总部举行的俱乐部聚会。约翰逊和他的同伴欧内斯特·道森很快就把格雷称为“道林”·格雷，或“道林的原型”；约翰逊在描述格雷的时候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一个年轻人……有30岁，但长着一副15岁的脸庞。”格雷实际上的年龄是25岁；但这种夸张反而凸显了玩笑。⑨

⑨ 艺术和生活是交织在一起的。

3 暗示

一个思想若不危险，那么它就不值得被称作思想。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初的头几天，王尔德满怀旧情回到查尔斯街自己以前住过的房间，参加了从巴黎来访的罗伯特·谢拉德举办的一个小型文学聚会。这群人当中有谢拉德当年在牛津大学新学院的老同学，风度翩翩但脾气暴躁的约翰·巴拉斯。王尔德很想见他一面。

巴拉斯既是诗人又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曾是社会民主联盟成员，也是威廉·莫里斯的《公益》周刊的撰稿人，在1887年的“血腥星期日”骚乱事件中遭到警察毒打。在谢拉德的派对上，为了表明自己是个激进派，他带来了“一个古怪的年轻女性，介绍她是自己的灵魂姐妹兼缪斯”。她向大家透露，为了表明自己对革命事业的承诺，她“衣服里面”穿的是红色法兰绒。谢拉德认为她“几乎难以踏足‘体面’的房子”，但王尔德对她彬彬有礼。然而，对于动辄爱争吵的巴拉斯来说，即便这样也不够。

下午聚会结束时，王尔德、巴拉斯和“缪斯”，以及谢拉德及另外一位诗人（巴拉斯的朋友，苏格兰同乡约翰·戴维森）一起离开。路过格罗夫纳广场时，巴拉斯突然招呼了一辆双轮马车，把他的女性朋友塞进车里，然后转向其他人，大声责备起来——尤其是王尔德——因为他们“没有尊重他的灵魂姐妹”。看来他认为，王尔德应该在大

家离开之时，向这位女士伸出手臂挽起她。马车夫听说巴拉斯住在兰贝斯贫民窟，便犹豫着要不要收下车费接这趟活儿，这个戏剧性的场面一下子变得十分糟糕。王尔德走上前去，和和气气地劝说马车夫（“马车夫一眼就认出了他，称呼他为‘我的主人’”），一切都不会有事。❶

这件事让王尔德感到好笑，丝毫不觉得受到了冒犯：事后巴拉斯道了歉，两人之间建立了友谊。王尔德把他介绍给约翰·格雷以及他周围圈子里的其他人。❷ 尽管王尔德欣赏巴拉斯华丽的斯温伯恩式诗歌，但更吸引他的是巴拉斯的政治观点。近几个月来，王尔德一直在为政治立场问题大伤脑筋。1890年11月，帕内尔的私人生活细节被人幸灾乐祸地放到英国媒体上曝光并接受审视，凯蒂·奥谢长期以来一直是他的情妇，她的丈夫最终起诉妻子要求离婚。统一派的报纸抓住机会诋毁帕内尔的名声。面对公众的愤怒，自由党威胁要断绝与爱尔兰议会党的关系，而帕内尔拒绝辞去党魁一职，导致他的政党分裂为帕内尔派和反帕内尔派。媒体炒作的色情内容再加上政治内讧，在这一片混乱中，实现爱尔兰地方自治的希望似乎突然破灭了。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

然而，与此同时，王尔德对英国议会制度是否具有带来彻底变革的能力，变得越发地没有信心，他那更广泛的政治思想正呈现出新的色彩。1890年底，新近创立的《新评论》杂志编辑阿奇博尔德·格罗夫找到他，希望他能为即将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主义与文学”的文章写一篇“回应”。格罗夫想让他“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去写，大约

3500字”。^①王尔德没有接受约稿，而是决定自己写一篇有关该主题的文章，将它刊登在弗兰克·哈里斯的《双周评论》上。

据罗比·罗斯回忆，新年伊始王尔德在安斯洛广场85号罗斯家的图书室里，花了“连续三个早上”写下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②当然，王尔德对社会主义这个话题产生兴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自从结识了机智风趣、特立独行的萧伯纳之后，他拓宽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并受到鼓舞，认为这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个写作主题；^③而他的新朋友巴拉斯——后者沉浸在蒲鲁东的作品中，更倾向于他众多观点中的“无政府主义”——则提供了一个稍微不同的，甚至更诱人的视角。^④

王尔德在这篇文章中舍弃了他最喜欢的对话形式——然而保留了许多开放式的警句风格——描绘了一幅迷人的、高度个人化的社会主义愿景。他宣称有必要用“公共财富”取代“私有财产”，这样人类就可以从烦琐的所有权的烦恼中解脱出来，合作可以取代竞争，成为社会的驱动力。但他认为这只是个人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第一步。“人类真正的完美，”他断言，“不在于他有什么，而在于他是什么。”在这篇作品中，王尔德转向了社会主义各派别中无政府主义的一端。

为了支持自己的理论，他举了耶稣的例子——也许不是正统基督教中的神圣形象，而是一个非凡的人，个人主义的伟大倡导者，一部分出自王尔德的想象，一部分来自欧内斯特·勒南1861年出版的坚定的世俗化著作《耶稣传》（勒南的这本书被王尔德列为其藏书

的“黄金书籍”；他称之为“圣托马斯福音”）。^⑩王尔德笔下的耶稣所要传达的信息是“做你自己.....你有奇妙的个性。发展你的个性.....不要想象你的完美是仰仗积聚或拥有外在的东西。你的完美在你自身”。

为了帮助实现自我发展的目标，王尔德宣称所有形式的政府和所有传统道德都是冗余。所有的权威都是有辱人格的：“它降低施政者的人格，也降低受治者的人格。”按照他提出的原则构建的社会将是所有人的天堂，尤其是艺术家（以及奥斯卡·王尔德），因为“艺术是世界上迄今已知的最强烈的个人主义形式”。

文章针对其中概括的一些大的概念，提出了具体而切中时事的要点。帕内尔倒台事件刚刚过去不久，王尔德对英国报刊上的粗俗内容提出了严厉谴责，称其试图“把某位大政治家.....的私生活中的一个事件搬到大众眼前，邀请大众讨论这件事”。“古时候，”王尔德说，“人类有拉肢刑具，现在他们有了报纸。”情况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改善。他在文中将那些谴责《道林·格雷的画像》为“病态”的评论家们批评了一通。他说：“病态如果不是一种人们无法言说的情感或思想，那么病态是什么？大众都是病态的，因为大众不会表达东西。艺术家从不病态。他表达一切。他身居他的主题之外。”

这篇文章发表在2月号的《双周评论》上。如果像一位评论家所说，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是“引发震惊和激发评论”，那么它成功了。新闻界对它的评价可能存在分歧，但有相当多的人都十分喜爱这篇文章。年轻的罗杰·弗莱非常赞赏它。作家格兰特·艾伦感谢王尔德写

了这么一篇“高尚而美丽的文章”。巴拉斯在写给约翰·格雷的信中，称赞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完美的革命性文章，不但是一件艺术品，而且充满知识和洞察力”。^⑨他已经以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向王尔德——以及格雷——致敬：“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天生的”，他说。^⑩他很高兴自己的见解得到了证实。

为了让这篇文章在视觉上——以及文学上——显得更加不同凡响，王尔德坚持文中他的许多格言式陈述要用斜体字来体现：“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比富人更看重金钱，那就是穷人阶级”，“艺术从来就不应该去尝试迎合公众，而是公众应该努力去培养自身的艺术鉴赏力”，等等。这些自负的内容中所含的挑衅意味几乎与文中的政治观点不相上下。在一次时髦的午餐会上，自由党议员赫伯特·阿斯奎斯略带恶意地向王尔德建议说：“采用斜体字的人就像一个在谈话中提高嗓门，为了让别人听见而大声说话的人。”然而，王尔德没有钻进这个圈套。“阿斯奎斯先生，您注意到了这一点，真是令人愉快！”他带着愉快的微笑答道，“精彩的措辞，就像美酒，不需要隐藏。不过，演讲家在讲到精彩处的时候，会突然停下来，要么提高或降低声音，要么通过姿势来强调这一点。因此，作家也会用斜体字来强调他的警句，可以说，就像宝石匠点缀上小宝石——这是一种可以原谅的，对自己的艺术的热爱，并不仅仅是出于虚荣，我是这样想的。”

^⑩

这篇文章在伦敦引起的轰动，远远超过了大西洋彼岸传来的令人振奋的消息。王尔德收到一封来自劳伦斯·巴雷特的电报，告诉他《吉

多·费兰蒂》（《帕多瓦公爵夫人》的新名字）已经在纽约百老汇剧院首演，获得了好评，“常常都是满座”。虽然演出海报上没有王尔德的名字，但《纽约论坛报》已经在评论中猜出来了。巴雷特建议王尔德给美国媒体发一份电报，承认作者的确是他，并感谢公众欣赏他的剧本。❶

巴雷特对这部戏进行了大幅度删减；现在的演出时间只有三个小时。尽管他已经53岁，但他还是以一贯的活力来扮演年轻的奎多；公爵夫人的角色由他的御用女主角明娜·盖尔扮演——她虽然“声音粗哑”“姿态粗鲁”——但至少被一些人称赞达到了一个新的“悲剧力量高度”。王尔德的“无韵诗”被誉为“博学而富有诗意”，有时候“充满雄辩的火焰”。❷然而大多数评论家对这部剧的赞扬是有所保留的——他们注意到它在文学上存在缺陷，逻辑上不连贯，有点像“情节剧”，存在“病态的”细节，总体上“荒诞不经”——不过，总体的共识还是非常有利的。观众们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放弃观剧。

至少有一篇新闻报道称，王尔德对该剧的上演感到十分惊讶。当然，从来没有人建议他去美国参加首演。无论如何，他的到来都会泄露作者身份的秘密。尽管如此，他还是为这出戏的成功而感到高兴（他称之为“巨大的成功”）。他为《每日电讯报》写了一篇关于该剧的文章，并立即写信给亨利·欧文，敦促他再看看这个剧本（“你是英国唯一一个能演出无韵诗戏剧的艺术家”）。然而，欧文再次表示拒绝。王尔德还联系了演员经理查尔斯·卡特莱特，对方也没有排演这

出戏的打算。❷❸这出戏在纽约演出了三个星期（直到2月14日），巴雷特用另一件他想尝试上演的作品替换了它。不过，公司已经制订了一项计划，打算在夏季巡回演出时重新推出这部剧。❹

《帕多瓦公爵夫人》的上演让王尔德想起了他的另一个戏剧承诺。他曾犹豫是否要开始为乔治·亚历山大写剧本，后来发现这个任务很难完成。“我现在对这出戏还没有把握，”他承认，“事实是，我是在没有心情工作的情况下写这个剧本，我必须先把它忘掉，然后再重新来过。”❺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心情写这个剧本，于是他一反常态地提出，要偿还亚历山大的50英镑预付款，并终止他们的协议。令王尔德没想到的是，亚历山大接受了建议并解释说，实际上，他的“财务状况一团糟”，在《帕多瓦公爵夫人》巡回演出之前，他掏不出一点儿钱。❻

王尔德眼下在文学上最关心的还是对图书版《道林·格雷的画像》进行最后的润色，他为此增加了六章内容，丰富了情节的戏剧性，强化了社会讽刺，润色了文本，并修改了一些更具争议的同性恋段落。他删除了一段巴兹尔和道林“手挽着手”从俱乐部回来的文字，以及另一段亨利勋爵把手放在巴兹尔的肩膀上的内容。他还删掉了布兰登女士滔滔不绝地为宾客相互做介绍的内容：“亨普提·邓普提爵士——你知道——阿富汗边疆。俄国的阴谋；非常成功的人士——妻子被一头大象杀死了——简直痛不欲生——想要娶一位漂亮的美国孀妇——如今，每个人都这么做。”这也许很明显，描绘的是他母亲在招待会

上的样子。王尔德夫人肯定认为故事的这一处需要做“一些修改”。

⑨

新增的段落中加入了对“新享乐主义”更详尽的描述，即亨利爵士诱人的享乐理论（“唯一值得来一套理论的东西”）。根据他的估计，“享乐是天性对人的考验，是天性认同的标志。我们快乐时，心总是向善的，但我们与人为善时，并不总是快乐的……‘善’就是同自身和谐……不和谐即指被迫与他人维持和谐关系。个人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个人主义拥有更崇高的目的……没有哪个文明人会因为享乐而后悔，那些野蛮人连享乐是什么都不知道”。⑩这是王尔德准备赖以生存的理论。

沃德·洛克公司的编辑是一位名叫库尔森·克纳汉的年轻作家，他努力让王尔德的言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他批评“天空像是倒置的蓝色金属杯”一句写得像是“沃杜尔街(Wardour Street)的冒牌货”（因为天空是软的而不是硬的），王尔德打断了他：“不！不！……不是沃杜尔街——把那个‘W’去掉，如果你愿意的话，请用‘ardour’（热情）这个词来形容艺术家，我的眼睛一直都盯着这幅风景，我可能用错了几笔颜色，因为你提到了‘杯子’和‘金属’这两个词，是有点道理的。但至于‘沃杜尔街’，我总是把它和人们所见的四处游荡的妓女联系在一起，这使我不寒而栗。”⑪克纳汉以为他已经成功说服王尔德删掉了其中的“魔鬼原则”，即亨利勋爵鼓吹的将“罪恶”作为自我实现的要素。但王尔德后来改变了主意，坚持要恢复这段文字。“毕竟，”他声

称，“这只不过是通过对一个角色之口，戏剧性地说出路德的那句‘大胆的罪恶’ (Pecca Fortiter)罢了。” ②

这本书的外观，理所当然处理得非常精细。里基茨设计了一系列金色小“蝴蝶”图案点缀在封面上，以及手写体的扉页上。和王尔德之前出版的两本书一样，这本书也要以两个版本发行——一个是标准版（售价6先令），另一个是“豪华版”签名大开本版，限量50本，有编号和作者签名，售价1畿尼。

为了进一步完善这本书，王尔德创作了一系列关于艺术和道德的23条格言警句作为序言，以阻止明显的批评攻击。他的格言中包括：“书没有道德和不道德一说，只有写得好和写得差之分，仅此而已。”“艺术真正反映的是观众，而非生活。”“评论家大可持不同意见，艺术家却能初衷不改。”“一切艺术都是无用的。”弗兰克·哈里斯看了手稿中的这些警句之后，请求允许先将它们发表在《双周评论》上。王尔德同意了——他坚持所有内容都要用斜体字排版，这可能是一次欢乐的反击，针对的是那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采用斜体字印刷的人。

尽管这本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他还是能辟出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王尔德继续与和道林同姓的约翰·格雷见面。1月底，他们一起参加了在霍恩家中举行的诗人俱乐部聚会，一周后，两人去了溪谷。③他们俩经常成双结对在一起，导致有人猜测两人的关系中必然有性方面的因素。谣言开始形成。巴拉斯向他的朋友弗兰克·利比奇“相当模糊地暗示”两人之间存在“所谓的亲密关系”。但王尔德自己，尽管

他肯定被格雷吸引，并可能试图诱惑他，总是把他们的友谊描述为一种纯粹有关知识和艺术的关系；弗兰克·哈里斯支持这一说法。⑩

我们至今无从知晓，王尔德当时的性兴趣何在，不过他在一封写给年轻演员罗兰·阿特伍德的信中，透露出了他所追求并享受的那种女性化的调情味道：“现将你的领带寄去。我知道，戴上它，你会显得像希腊人一样优雅。我并不觉得它对于你来说颜色太暗……杰拉尔德·格尼原谅我那天下午只同你一个人说话了吗？我想没有吧。但那天我还能同谁说话呢？”⑪他的性接触频率似乎在增加。虽然他吸引和激励年轻人的能力丝毫没有减弱，但他开始以某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它。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他“无所顾忌地对待年轻的生命”。他会“狂热地”爱一个年轻人一段时间，然后便“感觉无聊”，甚至不再注意他。⑫

尽管哈里斯承认，格雷“理所当然地在奥斯卡的讲话中找到了特别的刺激”，但这种刺激是相互的。两人之间有一种强烈的“知识上的共鸣”，格雷掌握的当代法国文化最新知识使得王尔德对他特别感兴趣。在前一年访问巴黎时，格雷找到了前卫评论家费利克斯·费内翁，并与他展开了通信。他对许多年轻法国作家所拥护的颓废主义现下如何逐渐演变成一种最新特指的象征主义有了一种理解，这种象征主义不是通过直接描述事物，而是通过描述事物所产生的效果来实现其模糊和暗示的效果。在菲茨罗伊街的诗人俱乐部晚会上，格雷朗读了一篇被道森说成是“一些非常美丽而晦涩的法国象征主义最新潮的诗歌”；他还把年轻的法国象征主义风格艺术家吕西安·毕沙罗（印象派

画家卡米尔的儿子)带到了溪谷。❶这样的邂逅似乎点燃了王尔德的兴趣。他在《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格言警句式序言中引入了时髦的“象征”概念：“所有的艺术既有表层意义又有象征含义。”“若要解读象征含义，也请后果自负。”

书本的编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2月底的时候他去巴黎度了一个短暂的假期。自从七年前度蜜月以来，他还没有在法国首都待过。那时候，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除了魅力、自信、与斯温伯恩的亲密关系、一本薄薄的诗集和一次美国巡回演讲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可言。现在他又来了，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有地位的人物，并开始与法国文坛建立了真正的联系。他的一个童话故事已经出了法语版，他希望自己的两篇对话和《道林·格雷的画像》也能获得翻译出版。❷

王尔德在法国期间最想见到的作家是斯特凡·马拉梅，他是著名的新象征主义学派领军人物，《牧神午后》的作者，他已经——王尔德最近揣测——将法国的散文和诗歌合二为一了。❸每星期二晚上，马拉梅在他位于罗马街的公寓里为作家和艺术家举办定期聚会。王尔德参加了2月24日的聚会。

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真正令人难忘”的时刻。聚会结束时，马拉梅送给王尔德一部他翻译的爱伦·坡的长诗《乌鸦》，上面的题字是“赠奥斯卡·王尔德，纪念这个夜晚”。第二天，谢拉德邀请马拉梅与他、王尔德还有诗人让·莫雷亚斯星期四共进午餐（1886年莫雷亚斯在一篇文章中定义了象征主义运动）。他们不知道这位“尊敬的大

师”会不会如约现身，因为他给谢拉德的回复——就像他写的所有文字一样——措辞如此“复杂且晦涩”，让人无法确定是什么意思。但他还是来了，大家度过了一段“非常亲切的时光”。谢拉德回忆，王尔德成功地“惊艳”了两位法国诗人。❶

王尔德本来只打算在巴黎待一周，但是他突然生了一场病，再加上这个城市里的众多消遣娱乐，导致他一直住到3月中旬。他给五岁半的儿子西里尔写了封信，希望他“精心照料亲爱的妈妈”，并许诺带些巧克力回来。停留时间延长，使得他参加了马拉梅的另一次星期二聚会，结识了象征主义学派的更多成员。星期日在雅克-埃米尔·布兰奇家中吃午饭时，有人把他介绍给马拉梅的弟子亨利·德雷尼耶；26岁的德雷尼耶把王尔德称作他遇到的第一个聪明的英国人（王尔德对约翰·格雷说，德雷尼耶这人“很不错”）。❷ 卡洛斯·布莱克和他漂亮的情妇“美丽的凯特”也在巴黎。一天晚上，王尔德带着德雷尼耶与他们一起在金屋餐厅吃饭。❸

在布莱克和谢拉德的陪同下，王尔德拜访了埃米尔·左拉。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很有风度地接待了著名的唯美主义者，声称这次来访是他的荣幸。他谈到了自己目前的作品《崩溃》，讲述他搜罗了成堆的关于普法战争的文件，并参观了色当的战场。王尔德——尽管曾经贬低左拉的“缺乏想象力的现实主义”——假装赞同这种以研究为基础的小说写作方法，回忆自己写作《道林·格雷的画像》时，“研究了一长串的珠宝清单”，并仔细阅读了园艺公司的目录。“你没办法

法，”他对左拉说，“像蜘蛛从肚子里吐丝织网那样，凭空靠自己的脑子撰写一部小说。” ② ③

王尔德在巴黎仔细审阅《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校样时，身在伦敦的库尔森·克纳汉吃惊地收到了一封作者发来的电报：“书中出现了可怕的错误。我会专门赶回来。停止所有校对。”王尔德紧随其后很快就来了，他坐着一辆双轮马车，脸上带着夸张的恐慌表情。“现在还不晚吧？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现在还不算太晚？”他假装喘着粗气。这一切的起因是他注意到在他的小说里，制作画框的人名叫“阿什顿”：“阿什顿”，他用一种极度痛苦的声调说，“是个绅士的名字。我竟然把它——上帝原谅我——给了一个手艺人！必须改成哈伯德。哈伯德尤其具有手艺人的气息！”克纳汉说，王尔德“气喘吁吁地对我说了这番话”之后，又恢复了他的笑脸。 ④

这本书终于在4月出版了。一年前杂志出版时引发了铺天盖地的兴趣和争议，如今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250本定价1畿尼的漂亮大开本精装版在藏书迷中找到了市场，但1000本定价6先令的普通版却卖不出去。新增的六章内容还不足以让人们相信，这是一部全新的作品，值得他们花费比《利平科特月刊》多六倍的钱来购买它。王尔德声称，沃德·洛克公司付给他125英镑（含10%的版税），是利用了他的天真。但是——考虑到销量不佳——这对他来说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⑤

很少有评论提到这本书。直到11月才出现了一条最令人欣慰的消息：沃尔特·佩特对杂志版本中某些段落的删减感到欣慰，他觉得自己

可以在《书商》杂志上写一些慷慨而节制的赞美之词。佩特指出，“亨利·沃顿勋爵”和“道林·格雷”未能掌握真正的“享乐主义”中的“道德”元素（如他在小说《享乐主义者马利乌斯》中所写的那样），但他称赞了王尔德在讲述这个“优秀的故事”的同时展现出来的“技巧、艺术的真正微妙之处，以及轻松和流畅”。^⑩

王尔德的小说面世后，奥斯古德和麦基尔文很快就在5月初出版了他的文集。王尔德把他的两篇对话、《笔杆子、画笔和毒药》和一篇关于莎士比亚式服饰的文章合在一起，起名《意图集》。所有的作品都经过了修改，并在最初的文稿上略有扩充。不过，最后一篇文章的内容是呼吁戏剧表演在“考古上”的准确性，它“横卧”在其他几篇号召想象力的文章中间，着实有点不协调——王尔德觉得有必要在文尾加上一段漫不经心的评论：“我并不同意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一切，有许多内容我完全不同意。”

如果说王尔德的小说以全新的面貌上市之后波澜不惊，那么他的“散文”经过重新包装之后则受到了更热烈的欢迎。与时事新闻辩论的即时性不同，这些文章的独特性、原创性以及非凡的才华显得更加突出。弗兰克·哈里斯认为“柏拉图可能会自豪地在（其中几页）上签名”。^⑪在佩特看来，王尔德“也许比其他任何作家都更多地”继承了“马修·阿诺德杰出的评论作品”。^⑫它永远不会成为流行的成功作品，但它会受到“精英们”的赞赏和欢迎。那年夏末，《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及其他故事》问世，有助于王尔德这颗文学之星一直处于上升的状态。

4 社交达人

一个能控制伦敦宴会桌局面的人就能控制全世界。

——奥斯卡·王尔德

6月底的一个下午，莱昂内尔·约翰逊拜访泰特街，带来了一位朋友：20岁的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他是鼎鼎大名的昆斯伯里侯爵（以制定拳击规则而闻名）的第三个儿子。道格拉斯是约翰逊在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同窗兼亲密伙伴。他完全被《道林·格雷的画像》迷住了，把这本小说从头到尾读了十几遍，一直急切地想见到作者。王尔德在一楼的“图书室”招待了这两位大学生仰慕者，他的讲话令他们赞叹不已。不过，他自己也有点目眩神迷——那是因为阿尔弗雷德勋爵的一头金发、白皙的皮肤，还有年轻人的俊美。不光是外表，道格拉斯本人也相当有魅力：他想写诗，他欣赏王尔德的作品，他说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当他们上楼到客厅见到康斯坦斯时，他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且他还有一个头衔。也许，甚或在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暗示了自己“坦率的异教信仰”，以及与其他年轻男性发生性关系的热情。王尔德当然很感兴趣，也很兴奋。❶

一段友谊就这样迅速开始了。王尔德与其他许多年轻、聪明的文学崇拜者也建立了朋友关系，这一段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几天后，诗人俱乐部邀请道格拉斯共进午餐，并赠送给他一本豪华版《道林·格雷的画像》，上面的题字是“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来自他的朋友，本书作者奥斯卡。1891年7月”。那个夏天，他们可能还见过几

次面。根据道格拉斯后来的讲述，从他们第二次见面时，王尔德就开始“主动向我‘表示’”，但被拒绝了（道格拉斯自己在性方面的品味，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年轻的，温柔的）。然而，这样的拒绝并没有破坏萌芽中的友谊。❷

那年夏天，与一位勋爵共进午餐并不是王尔德社交生涯中最成功的时刻。事实上，1891年的这一段时间，他取得了一种胜利性的进展。文学上的成功为他打开了一扇扇新的大门。他和康斯坦斯受邀去塔普洛、威尔顿和威斯特参加了一系列盛大的乡村别墅聚会，还有卡尔顿花园的晚餐，或者成群结队地逛伦敦的剧院。

王尔德将这一切都归功于艾蒂·格伦费尔，他的牛津同辈威利·格伦费尔的妻子，塔普洛的女主人。这位24岁性格活泼的社交界女主人，吸引了一大群彼此联系密切的朋友和亲戚，他们自称并被别人称为“灵魂”（因为据说，他们从来不谈政治，而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讨论他们的“灵魂”）。这些人在传统的英国社交界是个特别的存在，不仅是富有的贵族，而且聪明有趣。其中的佼佼者包括乔治·温德姆、温德姆的妹妹埃尔科夫人、艾蒂以前的情人阿瑟·贝尔福、势头正盛的年轻人玛戈特·坦南特、哈里·卡斯特（以“随时随地的机智”而闻名）❸、诗人威尔弗里德·布朗特、圣约翰·布罗德里克（1883年王尔德横渡大西洋时觉得他非常幽默）、乔治·寇松。

王尔德很激动地发现自己被拉进了这个迷人而高尚的圈子里。他似乎已达到了一个新的社会境界，甚至超越了体弱多病的纽卡斯尔公爵和堕落的弗朗西斯·霍普勋爵所在的圈子。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很受

女人们的欢迎。男人们都有令人妒忌的社会地位，不完全值得信任。就在艾蒂·格伦费尔提议出门远足并发出邀请的同时，寇松——王尔德所谓的朋友——却埋怨她“结交声名狼藉的人物（尽管这些人还算聪明）”。他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奥斯奎斯’的加入，我们这个圈子正在走向衰落”——“奥斯奎斯”这个词是他把奥斯卡·王尔德和赫伯特·阿斯奎斯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他对“艾蒂”邀请这些“新成员”——还有（社会地位更低的）比尔博姆·特里——到塔普洛参加盛大的星期日聚会感到非常愤怒。寇松向美国外交官哈里·怀特抱怨称：“这意味着有史以来最公平、最强大的友谊联盟要解体了。”他怂恿怀特在白天乘船的时候把船弄翻，将这些闯入者掀进水里，淹死他们。❶

5月31日，王尔德所幸没有在塔普洛的派对上被淹死，艾蒂后来回忆，只见他“站在河中间”，“迈着沉重的步子，摇摇摆摆地”从一只平底船走到另一只船，比尔博姆·特里夫人用“开心地问候”“欢迎新人”。❷他讲着故事，炫耀自己，过了愉快的一天。另一位客人记得他和贝尔福、哈里·卡斯特等人一起坐在塔普洛的草坪上，谈论着他们每个人曾经目睹的“最引人注目、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王尔德说：“生活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看到一个法国寡妇披着一身沉重的缟纱丧服在运河边钓鱼！”❸

当王尔德在克拉布特园度单身周末时，这种潜在的敌意可能就更易察觉了——有人介绍他加入威尔弗里德·布朗特专为精英人士举办的非正式的“克拉布特俱乐部”。那些打网球、聊天的日子在晚上的餐

后演讲和诗歌创作比赛中达到了高潮。❶王尔德被“选拔”进入俱乐部的过程中，寇松扮演了“魔鬼代言人”的角色，提出了王尔德可能没有资格入会的原因。他曾经与王尔德同在牛津大学，他认为王尔德曾在莫德林学院穿着白色罩袍读书，如此对待“严肃的工作”是错误的行为。王尔德辩解道：“我总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来读课文，在敬拜仪式之后总要被沃顿斥责为‘在讲台上耍轻浮’。”❷

接下来，寇松开始“针对一些奇奇怪怪的罪恶，展开了一场含沙射影、冷嘲热讽的攻击”。尽管上一年媒体已经在有关《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报道中杜撰出所谓小说中“不健康的”细节可能与作者的赞成意见存在某种微妙的联系，但寇松和他的圈子似乎已经对王尔德的秘密性趣味及行为有了真实的了解。哈里·怀特赞成寇松净化灵魂圈的做法，他说：“我必须说，我倾向于和奥斯卡·王尔德划清界限，大家都认识他很多年了。”布朗特觉得寇松的攻击太过分，想要介入。但王尔德从椅子上站起来，发表了“一场有趣而精彩的演讲”。他采用为扩充版《W.H.先生的画像》所规划的论据，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年轻人之间可以存在的理想友谊——既有创意，又很浪漫——进行了慷慨激昂的辩护。这场辩论持续了很长时间，尽管大家认为“寇松与王尔德的决斗”精彩绝伦，但也注意到了它的“残酷性”。当王尔德指责寇松知识平庸，他极力追求二等的学位，然后是一份二等的职业时，在场的其他俱乐部成员感觉“既好笑又不安”。布朗特感到欣慰的是，两个对手都始终控制着情绪。但他意识到，对王尔德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场合（尽管布朗特一再催促，王尔德再也没有回到克拉布特俱乐部）。❸

在威尔顿的家庭聚会上，因为有布朗特的好友彭布罗克伯爵在场，因此现场没有那么多潜在的敌意，但大家希望王尔德扮演宫廷小丑的角色。同为客人的作曲家休伯特·帕里回忆，他从头至尾是“吸引人的焦点”。在这个充斥着“社会喧嚣”的一周里——他“不停地说话”，白天和各种各样的女士们“促膝谈心”，或者用他的故事和悖论来娱乐“着迷的听众”。到了晚上，晚餐结束后，吸烟室里会举行“某种座谈会”，乔治·温德姆（克拉布特俱乐部的一名成员）引导着讨论，让王尔德讲得更泛泛一些。帕里觉得王尔德有时“很有趣，有那么一两次，才华横溢，但常常犯傻……他在艺术和文学方面表现得最好，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则完全是个傻瓜”。

在他眼里，王尔德“有了不起的天赋——当他胡说八道的时候真的是无所顾忌。当他非常疲倦的时候，就会故意用慢吞吞的方式，讲些彻头彻尾的陈词滥调。一天晚上，他被接二连三的促膝谈心搞得精疲力竭，吸烟室的讨论照常进行，乔治·温德姆主持讨论。实际上乔治·温德姆一直在说话，而奥斯卡·王尔德所能做的就是，反反复复地在提到某个人时，拉长了声音问，‘他多大了？’在场的人都觉得非常有趣”。^①

王尔德似乎并没有努力去吸引帕里——到了周末，帕里“对他厌恶极了”。然而，这位作曲家却和康斯坦斯成了朋友。康斯坦斯似乎对她丈夫在文学和社交上取得的成功越来越感到不安，对他异常的性兴趣也越来越感到不安，越来越跟不上他的脚步。帕里发现她是“一

个非常奇怪的人，她放弃了正常的心智和自我控制，但同时又善良、自然，随时愿意为朋友付出”。^⑩

一周后，在贝德福德郡考珀勋爵夫妇家的韦斯特园，在另一群以“灵魂”为主导的客人中，再次出现这种情况，王尔德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位同行的客人回忆，他坐在草坪上给“周围的一大群女士”讲故事。在他那些匪夷所思的言辞中，必然有一套“男爵的祈祷方式”。^⑪也许是在威斯特喝茶的时候，他突然把女主人让大家传递观赏的一朵美丽的玫瑰花上的花瓣摘了下来，令在场的人大为震惊。当人们为这一亵渎行为“气得发抖”时，他让大家少安勿躁并解释说：“要是这么美丽的一朵玫瑰枯萎了，那真是太悲哀了”。^⑫王尔德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以及对自己成功的自信，在访客簿上签名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把自己的名字和其他人的名字写在同一页上，而是重新翻过一页，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尽情挥洒，这样别人就不会在下面再写上名字了。^⑬

他以各种方式来庆祝自己获得的社会声望。在准备出版他的第二部童话故事集《石榴之家》时，他选择将四个故事分别献给四位不同的杰出女性——“威廉·H.格伦费尔夫人”、“玛戈特·坦南特小姐”、“摩纳哥公主H.S.H.爱丽丝”（他在巴黎认识的），以及马来西亚沙撈越总督夫人、伦敦文学沙龙女主人“玛格丽特·布鲁克夫人”。这本书由里基茨设计，香农绘制插图，是献给“康斯坦斯·玛丽·王尔德”的。

更重要的是，夏天令人兴奋的社交活动似乎激发了他的灵感，他最终决定为乔治·亚历山大写个剧本。他告诉弗兰克·哈里斯，他想出了一个他“挺喜欢”的主意，“明天我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在那儿直到写完……我不知道能否在一个星期内写出来，或者三个星期？要不了多久就能打败那些皮内罗们和琼斯们”。^①这个想法是一部以受传统束缚的当代社会为背景的喜剧，而且似乎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②

这出戏被王尔德暂时起名《良家妇女》，讲述了年轻的温德米尔夫人怀疑丈夫与世故而神秘的厄林太太有外遇的故事。他曾经向厄林太太支付过几笔巨额的秘密款项。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温德米尔勋爵拒绝解释两人之间关系的真实性质，只是坚称他们是清白的。温德米尔夫人并不相信，情急之下，她决定离开自己的生日舞会，与聪明而不负责任的达林顿勋爵私奔，达林顿勋爵已经向她表白了他的爱。然而，厄林太太发现了她的计划，跟踪她到达林顿勋爵的家，并劝说她改变主意，以免为时过晚。就在这时，两个女人听到了达林顿勋爵、温德米尔勋爵和其他朋友的声音，他们马上就要走进两人正在谈话的房间。为了不被发现，两人躲了起来，但是温德米尔夫人把她那把特别的扇子——丈夫送给她的生日礼物——落在了桌子上。男人们进来了。扇子被发现了。温德米尔勋爵怀疑他的妻子就在这里。但在他开始搜查前，厄林太太从她的藏身之处走了出来，并因此损害了她自己的名誉；她称自己一定是在离开舞会时不小心错拿了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温德米尔夫人逃过一劫。观众最后得知——温德米尔夫人并不知情——厄林夫人实际上是温德米尔夫人的母亲，她20多年前抛

弃了婚姻家庭和她襁褓中的女儿。她如今正试图以化名重新获得社会地位（并通过勒索温德米尔勋爵获得资金）。无论如何，她通过自我牺牲，将女儿从类似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她有权被称为“良家妇女”。

剧中情节的外在细节相当传统，明显受到了大仲马作品的影响。王尔德的朋友，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剧作家哈登·钱伯斯一年前曾有一部戏剧大获成功，剧中已婚的女主人公为了让丈夫免遭敲诈，把她的扇子留在了敲诈者的房间，差点因此害了自己。❶王尔德的戏剧之所以与众不同，不仅在于其精彩的对话，还在于它轻松地剖析（并接受）了社会中随处可见的伪善和双重标准。

王尔德在自己的对话、文章以及《道林·格雷的画像》等作品中磨炼出来的那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智慧，现在有了戏剧性的表达。达林顿勋爵是迄今为止王尔德笔下最自信、最有造诣的满嘴精辟警句的花花公子；贝里克公爵夫人是他最出色的喜剧创作。王尔德兴致勃勃地从自己的早期作品中汲取精彩的诗句和警句。❷这种做法符合维维安在《谎言的衰朽》中所说的格言，即良好社会中人们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所戴的面具，而不是面具背后的现实。剧中没有明确针对任何传统道德。温德米尔勋爵一直不知道他的妻子差点私奔，温德米尔夫人也不知道她与厄林太太的真实关系。而厄林太太在短暂体验了为人母亲的可怕激情后，又逃回了快乐的世界。当年早些时候，王尔德曾经多次前往杂耍剧院观看伊丽莎白·罗宾斯首演的易卜生作品，颇具争议的

《海达·高布乐》；他的剧本挑战了中产阶级道德的既定价值观，表明了他拥护这位挪威剧作家开创的戏剧现实主义新精神。⑩

根据亚历山大后来的回忆，他从未忘记过聆听王尔德为他读剧本手稿时的那种喜悦。当王尔德问他是否喜欢时，他回答说：“‘喜欢’不是我想说的词。它简直太棒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惊叹之情，他出价1000英镑当场买下了这件作品。然而，王尔德说：“我对你卓越的判断力非常有信心，亲爱的亚历克，所以我不得不拒绝你这个慷慨的提议——我要抽版税。”⑪然而，当时有证据表明，亚历山大可能并没有被该剧的精彩之处所折服。尽管他很高兴得到这个剧本，并预付给了王尔德第二部分款项，但他不希望在创作时间上有任何束缚，他认识到这出戏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才能“排好”。⑫王尔德本人对这出戏的前景充满了希望、兴奋和焦虑。他立即寄了一份剧本给当时在伦敦的美国经理人奥古斯丁·戴利，希望他能买下其在美国的版权。但是，他们没有立即达成协议。⑬

此时，即将上演的唯一一出跨大西洋大制作是威利·王尔德与美国杂志老板兼编辑弗兰克·莱斯利夫人的精彩而不可思议的婚姻。她当时55岁，比威利大12岁。在此之前的七年里，令人敬畏而又充满活力的莱斯利夫人经常来英国，与王尔德一家关系很好，对王尔德夫人产生了一种特别“强烈的爱慕”和钦佩之情。威利似乎已经意识到她的财富可以给他提供一个避风港。至于她，觉得他的机智非常有趣，被他显而易见的热情说服了一半。她还认为，他流利的写作风格也许可以成为她的各种美国出版物的资产。但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很少

把时间花在工作上，他的大部分钱花在喝酒上了。她把他带去纽约，嫁给了他（于1891年10月4日）——理所当然在尼亚加拉度完蜜月之后——让他住进了位于西27街盖拉赫的豪华公寓。康斯坦斯（也许是为了附和奥斯卡）对她的朋友芒特·坦普尔夫人说：“这个消息在社交方面对我的影响与可怜的帕内尔先生（最近）去世对我的政治影响不相上下——也就是说，它是解决困难的最好办法，现在这两件事都将回到正轨。”^①事实即将证明，她在这两方面的乐观估计都是错误的。

王尔德因为奋力写作《良家妇女》而精疲力竭。而且，有一天晚上，泰特街的房子在他和孩子们睡觉的时候被盗了，导致他的神经更加紧张。康斯坦斯的大部分珠宝被盗，失窃的还有孩子们的洗礼杯和其他银器。如果说钱没有被偷走，那也是——正如恶意的流言所说——因为“没钱可偷”。^②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10月16日，年轻的出版商威廉·海涅曼（和法国作家杰拉德·哈里一起）来到泰特街，试图激发王尔德的兴趣，为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戏剧《玛莱娜公主》的英文版写一篇介绍。他们发现主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王尔德解释说：“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他的37岁生日），我在哀悼我的一年青春化为虚无，我的夏天渐渐枯萎。”^③鉴于这种种积虑，医生建议他休息六周。王尔德决定去巴黎，那是世界上最不安宁的城市。

5 七重纱之舞

在巴黎，我们展示一切，在这里我们隐藏一切：——甚至精神！
这就是英国和法国的区别。

——奥斯卡·王尔德

然而，法国首都犹如一剂补药。王尔德很高兴能回到这些林荫大道上。他向一个朋友解释道：“除非是在温文尔雅的人群中，在令人陶醉的大都市，在富人区的中心地带，或置身于华丽的皇宫酒店，周围摆满自己喜欢的物品，还有一队仆人，豪华地毯温暖地爱抚着双脚，否则的话，我就简直不是自己了。”所有这些话语中都带着一贯的夸张色彩；在还算豪华的诺曼底酒店短暂小住之后，他搬进了卡普辛大道上一间低矮的房间。❶

他重拾起年初时与几位法国作家建立的友谊和联系，并且使之得到了加强。事实上，王尔德已经对法国及其文学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正在考虑雇一个翻译将《良家妇女》译成法语并在法国首次公演，而不是在伦敦。他要以现代戏剧家的身份在巴黎首次亮相，而且是用法语，此举肯定会让英国评论家们手足无措。这部作品——就像当时的许多其他法国戏剧作品一样——可能会作为一个成功剧目被转而搬到伦敦。一天早餐时，他向同在巴黎的威尔弗里德·布朗特、乔治·寇松和威利·皮尔宣布了这个大胆的计划。大家沉浸在幻想中，答应出席首演，“寇松到那时恐怕就已经是英国首相了”。❷

王尔德和往常一样，旅行时带了一大堆礼物。他把一本有题字的《意图集》送给了英国大使、布朗特的表兄利顿勋爵（利顿勋爵既是诗人，也是印度前总督，王尔德是在奥维达的朗廷酒店招待会上认识他的，此后两人成了文学上的朋友）。利顿已经是这本书的忠实崇拜者，很高兴收到来自他“才华横溢的朋友”的礼物，但他道歉说，自己病得太重，不能见客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王尔德能光临大使馆与利顿家族的其他成员共进午餐。利顿17岁的女儿艾米莉描述当时的场景说：“我们都认为他（王尔德）很有趣，并不像预期的那么可憎，尽管他显然极为自负。他主要谈了自己的健康和几本书（以及他的法国戏剧计划），但他确实非常有意思。” ② ③

王尔德向马拉梅赠送了一本带有题字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作为参加11月3日诗人举办星期二聚会的前奏。当晚的气氛因为惠斯勒的一封电报——被放在餐具柜上——而显得略微有点尴尬，电报上用刺眼的大写字母写着：“序言主张——预先警告信徒们——提防——致命的亲密——藏好珍珠——祝夜晚愉快”。惠斯勒当时就住在巴黎，他是马拉梅的老朋友，当得知王尔德被允许进入诗人的圈子时，他几乎歇斯底里。他持续不断地写信谴责王尔德是个“滑稽演员”——这个人剽窃了惠斯勒的思想（其中就包括《道林·格雷的画像》的序言），只要一丁点儿机会，他就会从马拉梅和他的信徒们那里窃取“珍珠”。马拉梅很欣赏这两个艺术上的竞争对手，他安抚了焦虑的惠斯勒，同时欢迎王尔德加入。王尔德也尽力摆脱了惠斯勒的嘲讽。当马拉梅在讨论的时候提到惠斯勒的名字时，他欣然附和在场的其他人对其所表达的钦佩之情。 ④

马拉梅为《道林·格雷的画像》写了一封措辞隐晦的感谢信，称赞这本书在内心幻想和“灵魂的奇特芬芳”中激起了风暴，并称赞它是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是画像起了作用，”他总结道，“这幅令人不安的道林·格雷的全身肖像将会继续作祟，但是由于你的写作，它已经变成了一本书。”这是一种夸赞式的认可。然而，王尔德似乎没参加几次马拉梅的聚会。 注

他被别的事情所吸引，兴奋地投入了文学的洪流。他寻求进入亚当夫人著名的沙龙，给她寄了一本《道林·格雷的画像》，还写了一封充满恭维的信。他拜访了摩纳哥王妃，收到了一张她的照片，上面优雅地题写着“真正的艺术——奥斯卡·王尔德”。他经人介绍结识了罗伯特·德·孟德斯鸠伯爵，他被认为是于斯曼的《逆流》中德塞森特的原型。 注

谢拉德和斯图尔特·梅里尔随时可以带着他穿梭于拉丁区的咖啡馆之间。他在牛津的老朋友博德利也在巴黎，他于前一年在这里定居，从事新闻工作。他已经积攒了不少人脉，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将王尔德介绍给“一些法国作家”。也许正是在那里，王尔德认识了协助卡图勒·门德斯编辑《巴黎回声报》文学版的马塞尔·施沃布。24岁的施沃布已经写过一本象征主义风格的童话故事，他和王尔德一样热衷于中世纪的犯罪诗人弗朗索瓦·维永，以及城市下层阶级的俚语。这些共同爱好为他们的友谊打下了基础，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施沃布成为王尔德的另一个向导——他的“引路人”，或者如让·洛兰所说，是个驯象者。 注 注

白天和黑夜都充满了几乎无休止的谈话——在咖啡馆、在餐馆里，在林荫大道上散步时，在路上乘车时，在时髦的沙龙里，在亲密无间的晚宴上，在罗马街马拉梅的高级会所附近，或者是与堕落的流浪汉比比·拉皮雷一起，挤在圣米歇尔大道哈考特咖啡馆的餐桌上。王尔德成了这个季节的“大红人”。斯图尔特·梅里尔回忆说，王尔德是那几周的中心人物，他“面色光滑红润，就像赫利奥加巴卢斯时代的月亮大祭司”一样，说话、倾听、微笑。①德雷尼耶记得王尔德对所有听过他说话的人所施展的魅力：每个人都被“讲故事的人用他缓慢、均匀、悦耳的声音所创造的事物”所迷惑。他享有传奇般的地位。②有人说他是“百万富翁”，“出版商夺走了他的一点点文学成果，他们的手里便塞满了钞票”，还有人说他是英国贵族的宠儿。③他结交了新朋友，聚集了新的信徒。这其中首先是打扮花哨的皮埃尔·路易斯。他是个痴迷于希腊文化研究的学者兼诗人，为了向他的文学英雄们致敬，他将自己姓氏中的传统字母“i”替换为“y”——有时候是“i-grec”。

紧随路易斯之后的是安德烈·纪德。这位22岁的作家最近发表了一篇关于纳西索斯的论文，他发现自己几乎被王尔德那不可一世的个性，他滔滔不绝的谈话，他的寓言和故事，他对享乐主义的赞美，他对公认的道德准则的蔑视所征服。王尔德当时谈论的话题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基督的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中，他暗示基督传递的真正信息是关于个性的发展，他急于将这一观点做进一步推进。他对库尔森·克纳汉说，他最想写的是《基督教的伊利亚特》。然而，他对“基督所教导的基督教”的看法是新颖而独特的，既没有形

而上学，也没有道德。正如他向纪德解释的那样，基督说过的任何话“都可以立即被转换进入艺术的领域，并在那里获得充分的实现”。^①

纪德在日记中记录了许多他们的会面内容——与路易斯、梅里尔、施沃布、亨利·德雷尼耶等人共进了“三个小时”的晚餐。在这些场合，当王尔德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几乎无穷无尽的故事时，纪德——如梅里尔所述——会心不在焉地盯着自己的盘子。在有些人看来，他一定是爱上了这位年长的作家。他把王尔德的照片放在壁炉架上显著的位置。在密集地相处了几周之后，纪德宣称王尔德对他的影响几乎完全是“邪恶的”——“和他在一起，我忘记了如何思考。我的情绪越来越多样化，但我不知道如何让它们变得有条理；最重要的是，我再也不能遵循别人的推论了。”他从日记中删掉了很多页，也许是关于王尔德的内容。但是，这种魅力和吸引力依然存在。^②

王尔德总是在寻找年轻人。他接纳了年轻迷人，而且刚刚从祖国危地马拉获得文学奖学金来到巴黎的恩里克·戈麦斯·卡里略。他拜访了在朱利安学院学习的英国学生，与天才威尔·罗森斯坦和友善可亲的查尔斯·康德成了朋友。罗森斯坦被王尔德的谈话，以及他对人和书的非凡知识所震惊和着迷，但更被他的慷慨精神所吸引。“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他后来回忆道，“能让我如此意识到自己潜在的能力。”王尔德坚持把这位19岁的朋友视为“某种年轻的奇才”：他对罗森斯坦的淡彩画很感兴趣，并把他介绍给了巴黎的文学圈。一天晚上，他们与谢拉德和梅里尔一起到红城堡进行了一次难忘的朝圣之

旅，这是一家臭名昭著的小客栈兼小旅馆，是小偷和妓女经常光顾的地方。王尔德开心地说：“犯罪阶层对我一直有极大的吸引力。”不过，他还是劝谢拉德不要大声警告那些接近他们的下层人物。“罗伯特，”他宣称，“你这样保卫我们，会让我们送命的。” 注 注

也许是在第二天，施沃布去了王尔德的房间；当他们准备出发时，王尔德说找不到他的手杖了：“我的金手柄的手杖消失了。昨天晚上，我跟一些最可怕的家伙在一起，强盗、杀人犯、小偷——就像维永经常结交的那种人。他们偷走了我的金手柄手杖。有个长着漂亮而忧伤的眼睛的年轻人，那天早晨因其情人不忠而杀死了她。我敢肯定，一定是他偷走了我的金手柄手杖。”他一边讲着这个浪漫的故事，一边总结道：“我的金手柄手杖现在落入了一个杀死了柔弱姑娘的人的手里，这个姑娘优雅得像一丛雨中的玫瑰。”“可是，王尔德先生，”施沃布插嘴说，“你的金手柄手杖在那个角落里。”“啊，没错，”王尔德有点恼火道，“这么说，是它了。我的金手柄手杖在这儿。你真聪明，找到了它。” 注

巴黎底层生活的戏剧性场面和各种冲突与文学界简直称得上旗鼓相当。王尔德很快发现，这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在诗歌方面，马拉梅及象征主义者与埃雷迪亚严格的帕纳斯派是对立的——（王尔德拜访了埃雷迪亚，后者的小女儿后来嫁给了皮埃尔·路易斯）。梅里尔带着王尔德与让·莫雷亚斯及其追随者们共进晚餐，他们脱离象征主义，创立了罗马学派，再次强调经典的纯洁性，反对暗指的模糊性。根据梅里尔的描述，晚餐后（从雨果开始的所有法国文学都被置于不

屑一顾的地位)，面色白净、一脸黑胡子的莫雷亚斯命令追随者们朗诵他们的诗歌。先是一首“献给让·莫雷亚斯的十四行诗”，接着是“献给让·莫雷亚斯的颂歌”，当宣布即将朗诵“让·莫雷亚斯之墓”的时候，王尔德找了个借口离开了。❷

他觉得还是听刻薄的卡蒂勒·孟戴斯说话更有意思，后者在诋毁了波德莱尔、兰波和魏尔伦之后，开始攻击马拉梅和他的追随者们：“象征主义者让我们发笑，”他宣称，“他们什么也没有发明。那种象征就和世界一样古老。”马拉梅被贬为“一个支离破碎的波德莱尔，他的碎片从来没有组合在一起过”。亨利·德雷尼耶都不过是在重复庞维勒和雨果。保尔·福尔采用的是“比利时审美观”，至于维耶勒-格里芬则似乎什么也没有。❸阿道夫·雷泰也会对让·莫雷亚斯和他的学派提出类似的谴责。只有魏尔伦，和蔼可亲，一脸无辜，通常喝得醉醺醺，他似乎站在冲突之上——或之下。

《石榴之家》于11月中旬出版，当时王尔德还在巴黎。他将这本书献给康斯坦斯，而且要确保让她从出版社拿到第一册书。他还写信为这些故事中出现的各种名字做了解释。“这座大教堂是献给你的，”他告诉她，“单独的附属小教堂是献给其他圣人的。这符合最高的宗教习俗！所以，请收下这本你自己的书，它是为你量身定做的。祭坛旁燃烧的蜡烛不如神龛里的大灯那样明亮和美丽，神龛里的灯是金子做的，它有一颗奇妙的心灵和永不熄灭的火焰。”康斯坦斯很激动，很明显，她在王尔德的生活和情感里的中心地位继续得到了肯定。尽管人们可能会怀疑王尔德的真诚，但这句话很可能反映了他

情感的某些方面，而且，就像他的许多声明一样，仅仅是说出这句话的事实就让他相信了……几乎可以这么说。⑨

这本书的封面装饰华丽，看起来很豪华，而且定价也很贵——就像王尔德的其他收藏版作品一样——1畿尼。但香农的四整页插图却几乎看不到，这一事实严重削弱了书本丰富多彩的效果；用来复制这些插图的“改进过的”新流程出现了严重的错误。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打击。针对该书的为数不多的评论，大多数都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些插画的问题。其余的几篇则在乏味地争论这些故事是否真的为孩子们写的。王尔德写信给《演讲家》和《帕尔摩报》，解释“在建造石榴之屋”时，他“既有意讨好英国儿童，也存心取悦英国公众”。他写这些故事是为了取悦他自己。如果王尔德希望这本书能让他成为可以与福楼拜匹敌的人物，那么他失望了；1891年，在王尔德与奥古德和麦基尔文合作出版的三本书中，这本书是最不成功的。⑩它的主要用途是作为文学名片。他送了一本给路易斯，上面写着“致崇拜美的年轻人，致受美崇拜的年轻人，致我崇拜的年轻人，奥斯卡·王尔德”。⑪

王尔德通过赠送这类礼物，努力使他的作品在法国变得更加广为人知。《道林·格雷的画像》已经小有名气，但很少有人（像马拉梅这样获赠这本书的人除外）真正读过这本书。这本书没有推出法语版的迹象，王尔德的几篇对话亦是如此。然而那年夏天，无政府主义杂志《反叛者》上刊登了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节选。它提高了王尔德在年轻的象征主义者中的声誉，《帕尔摩报》驻巴黎记者夸

张地声称，这些作家现在已经将王尔德视为“某种弥赛亚”。^①作为一个小小的但令人满意的下一步，施沃布已经着手翻译《自私的巨人》，准备发表在《巴黎回声报》上。^②

然而，为了摆出一种姿态，王尔德回避了人们对他作品的种种询问——至少在他身处巴黎的早期。当莫雷亚斯的追随者之一欧内斯特·雷诺提及他的作品时，他说：“我写那些东西是为了消遣，也为了证明我并不比那些我看不上眼的同代人更逊色，你们的波德莱尔过去也曾经这么做过，只不过他比我更有天赋罢了。我的抱负何止是写诗呢。我想要让我的生活本身也成为一件艺术品。”一天下午，在哈考特咖啡馆——在座的有戈麦斯·卡里略、魏尔伦，以及名字很特别的伊万霍·朗博松——王尔德坦承：“我只把才华用在写作上，而把所有的天赋都挥霍在生活中了。”（这句话他以后还会再说。）魏尔伦突然变得认真起来，一边悄声赞许地对朗博松说：“这个人是个真正的异教徒。他过得无忧无虑，这样幸福就有一半到手了，因为他不懂得忏悔。”^③

年轻的法国作家几乎被王尔德的表演弄得眼花缭乱。纪德回忆，在乌鲁索夫公主举办的一次晚宴上，公主突然尖叫一声，宣称她看到王尔德头上有一圈光环。^④而王尔德，尽管可能有所掩饰，也对年轻的法国作家们颇有好感。他假装对文学作品漠不关心，但他却在他们的活力和承诺中得到了极大的激励，他们一致渴望实现“更丰富的浪漫主义，它将拥有微妙的新色彩、奇特的音乐和更宽泛的主题”。王尔德认为，“法语在各个新学派领袖手中发生的转变”是“最有趣、

最吸引人的，是值得观看并为之惊奇的事情之一”。^① 尽管莫雷亚斯的性格着实让人恼火，但王尔德看到了罗马学派的魅力，但最吸引他的还是马拉梅和德雷尼耶的象征主义。虽然他一开始似乎对自己的法语没有足够的信心，以为只能用来“观察事物，表达惊讶”，但在法语中浸淫了数周之后，在不断地用法语讲述和复述他的寓言故事的过程中，他受到鼓励开始重新考虑这件事情。

当然，他的许多新朋友都对他掌握语言的能力大为赞赏，他不仅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还能用一种被阿道夫·雷泰称为“不可抗拒的温柔”来说话。“他的法语讲得很好，”纪德回忆，“但他要假装寻找合适的词，他想让别人等着。”他几乎没有口音，或者说，“即便有一点点，那也只是因为他喜欢保留这种口音，有时候这会给他讲出来的话平添一分新奇”。^②

在王尔德口头讲述的所有故事中，有一个故事出现的频率比其他故事要高得多：那就是希罗底王后的女儿莎乐美的故事。她为她的继父希律王跳舞，并要求得到他的囚犯施洗者约翰的头颅作为回报。

《圣经》的叙述是如此简洁，以至于让人浮想联翩，王尔德最喜欢的三位法国作家都曾经添枝加叶地讲述过这个故事。福楼拜将它作为他的《三故事》之一；在《逆流》第五章中，德塞森特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对古斯塔夫·莫罗绘画中莎乐美在希律王面前跳舞的珠光宝气的梦幻形象的狂喜中；而在古斯塔夫·莫罗的另一幅更令人不安的作品《幽灵》中，圣人的被切下的头颅悬浮于一个光环中，出现在惊恐万分的舞者面前。王尔德把华丽的描写段落背得烂熟于心，而且喜欢当众朗

诵。❶ 马拉梅也参与了这一主题，在一部未完成的诗歌作品中，以希罗底的形象为起点探索语言和美的本质（马拉梅从22岁开始创作这部作品，但直到他去世时仍未完成）。王尔德并没有被这些显赫的前辈们所吓倒，反而受到了鼓舞。

毕竟，他在动身去巴黎之前，就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据埃德加·萨尔图斯回忆，几年前的一个下午，他和王尔德在弗朗西斯·霍普勋爵的房间里看到了一幅雕版画，画上莎乐美“双手翩跹起舞，脚后跟在空中舞动”，就像福楼拜在他的故事中描述的那样。王尔德面对这幅画惊呼道“La bella donna della mia mente”（我的梦中美人）。❷ 这个梦想一直伴随着他，到了巴黎之后便逐渐清晰起来。

他按照惯常的做法，对故事进行了多次改编，尝试各种变化，在听众身上测试其效果。他想象莎乐美既无耻又残忍（“她的欲望一定是深渊，她的堕落就像海洋”）。他想象她近乎纯洁，是一个“悲伤的公主”，跳舞“是出于神启，从而让冒牌者和耶和华的敌人受到惩罚”。❸ 在一个版本中，莎乐美被懊悔不已的希律王放逐到沙漠，过着隐居生活，直到有一天她看见耶稣经过，认出他就是弥赛亚。然后，她开始传播这一消息。几年后，她穿过一个冰湖时掉进了冰窟窿，她的头颅在身体下沉时被割了下来，她用最后一口气在嘴里念出了耶稣和约翰的名字。后来的旅行者在冰湖上见到了她的头颅，周围有金色的光环闪闪发光。她成了一个圣人。❹ 另一个不同版本中（一天晚上在让·洛兰家里讲述的）莎乐美只想要施洗者约翰的头颅，因为她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哲学家”，他表示渴望拥有这件东西。但当

她把这件战利品送给他时，他说：“亲爱的，我真正想要的是你的头颅。”她在绝望中离开，并将自己斩首了。当人们把她的头带到哲学家面前时，他问了一句：“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血淋淋的东西送给我？”然后便继续读柏拉图的书去了。●注 雷米·德·古尔蒙引用古代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话指出，王尔德在他所有的故事中混淆了两个不同的人物，他们都叫莎乐美——一个是希律王的女儿，另一个是致命的舞者，但王尔德对此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可怜的古尔蒙，”他对戈麦斯·卡里略说，“他告诉我们的是一位学院教授讲述的真相。我倾向于另一种我自己的真相，那就是梦的真相。在两种真相中，假的那种要更真一些。”●注 最后，在不断变化的梦幻般的真相中，王尔德选定了一段简洁而可怕的叙事线索，莎乐美沉浸在得不到回应的欲望之中，一心想要得到被监禁的施洗者约翰被砍下的头颅，以便——最终——她能够亲吻他的嘴唇。

王尔德起初曾想过，是否应该把他的故事写成短篇小说，或者写成一首诗。●注 但后来他有了灵感，要把它变成一部戏剧，一部法语的戏剧。他一直在“考虑”梅特林克的事情，准备给他的《玛莱娜公主》写一篇介绍（但他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写）。然而，事实证明准备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梅特林克的新象征主义戏剧于他而言是个福音——啰唆、不自然、写得像咒语一样，来回重复，装腔作势，行文生硬。事实上，王尔德认为“梅特林克创造了一种稀奇古怪的效果”，原因就在于法语不是他的母语。于是他开始揣摩，自己也许可以写点类似的东西。由于没有现实对话的束缚，他自己的法语完全胜任这项任务。奇怪的表达方式会给作品“添加某种调剂或色彩”。●注

据他自己说，这部作品是在他和一群年轻作家吃过午饭后的一个下午开始创作的。他像对别人讲过的一样，把莎乐美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但回到房间时，他注意到桌上有一个空白的笔记本，于是便决定把这个故事记下来。“如果桌子上没有那个空白本子，”王尔德说，“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么做。”他一刻不停地一直写到深夜。十点钟，他到附近的咖啡屋用晚餐。他告诉吉卜赛管弦乐队的领队，他正在“写一部戏剧，其中有一个女人，她赤着脚在自己渴望拥有并杀死的男人的血泊中跳舞。我希望你能演奏一些与我的思路相符的东西”。于是乐队演奏起“如此狂野而可怕的音乐”，以至于整个咖啡屋里的客人都停止了交谈，面面相觑。“然后，”王尔德说，“我回去写完了《莎乐美》。”虽然这些细节肯定经过了一番修饰，但确实有一个笔记本，是在卡普辛大道的一家文具店买的，里面有剧本的初稿，可以用来确定故事的梗概。❶

然而，第一波热热闹闹的动作只是前奏，接下来还需要更加发奋。王尔德努力修改和改进手稿。莎乐美占据了他的谈话和思想。他在巴黎的新朋友对这个话题感到很兴奋。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出象征主义戏剧：梅特林克的戏剧《入侵者》已经于当年5月在保尔·福尔的实验性艺术剧院成功首演。❷

王尔德受到这些事情的鼓舞，他的想法很快就转向了舞台和设计的细节。他不知道莎乐美是该穿衣服跳舞，还是该赤裸着身子跳舞，或者是全身珠光宝气地跳舞。他在和平街的精品店外徘徊，琢磨着哪种饰品或布料最适合他的女主人公。他沉浸在这个致命的舞者的形象

中。他希望能陪戈麦斯·卡里略去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看一看提香为她画的那幅画，上面有她“颤抖的肉体”。他痴迷于寻找这位舞蹈公主的完美代表，他宣称自己“疯了，就像德塞森特一样”。他像《逆流》中的主人公一样欲罢不能，满脑子都是古斯塔夫·莫罗创造的那个充满情欲、珠光宝气的形象。他说，这是“世界奇迹之一”。这幅画激起了他的热情，他在林荫大道上经过的女人身上寻找莎乐美的理想代表；他想象莎拉·伯恩哈特扮演这个角色的样子；当他在红磨坊看到一个罗马尼亚杂技演员用手跳舞时，他就寄去名片，希望能引起她对这个角色的兴趣。他去了一趟停尸房，看了一具刚刚被处决的罪犯的尸体，这样他就可以感受一下被砍下的头颅的重量。他对它的重量感到“震惊”。^⑩

通过皮埃尔·路易斯向保尔·福尔所做的介绍，王尔德在艺术剧院的赞助下举办了一场手稿朗读会。^⑪根据王尔德的说法，朗读会（于12月中旬举行）获得了巨大成功：由“年轻诗人”们组成的观众“非常”欣赏这部正在写作过程中的作品。一位朋友回忆，王尔德对“吟诵”剧中铿锵而又简单的词句感到极大的满足。他开始为下一年的剧本排演制订计划。^⑫王尔德现在可以自称是巴黎文坛上的一个人物了：他半带幽默地夸口道，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著名的法国作家！”^⑬

他的地位在新闻界得到了证实。《费加罗报》和《高卢报》上都刊登了关于他的长篇文章，《巴黎回声报》对他进行了采访（王尔德夫人赞许地指出，采访者似乎对她的儿子怀有“一种敬畏”）。《巴

黎回声报》还刊登了一封王尔德写给埃德蒙·德·龚古尔的措辞巧妙的公开信，对最近连载的龚古尔写于1883年4月21日的一段日记提出更正意见，其中提到王尔德曾把斯温伯恩描述为“一个夸耀自己恶行的人”。王尔德从一个巧妙的悖论开始，既然他的美学知识的基础是非现实的哲学，他应该被允许对一个错误陈述做一个小小的纠正，而这个错误陈述无疑是由他自己的法语说得不好而造成的。“法国人是有同情心的，”他（用法语）说，“我原本是爱尔兰人，英国人迫使我讲莎士比亚的语言。”龚古尔后来以书籍的形式出版日记时，删除了其中冒犯性的段落，以此表达他对王尔德的尊重；他还删掉了其中引用的有关这位爱尔兰作家“可疑的性行为”的文字，尽管王尔德并没有就此提出异议。⑩

6 迷人的舞会

我们大家都在阴沟里，只是我们中某些人在仰望天上的星星。

——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及时赶回英国过圣诞节。康斯坦斯和孩子们见他回家，都很开心。节日期间，他在托基修改并完成了《莎乐美》，然后去格林-加斯住了几天。格林-加斯是梅奈桥旁的一座“亲王宅邸”，属于萨利斯·施瓦贝夫人，她是一位富有的棉花大亨的遗孀。这是一段休息和娱乐的短暂插曲。❶

在伦敦，很多事情需要他操心。埃尔金·马修斯和约翰·莱恩成立了一家新的出版公司，名字叫博德利·黑德。这家公司追求的特色是，出版设计精美、价格公道的小版当代诗歌和美文。这个精心设计的策略旨在吸引日益增长的，有审美倾向的藏书者市场，事实证明，它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成功。为了将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加入他们的名单，他们提议买下博格手里剩余的220本《诗集》，将其重新包装，作为独家经营的收藏品。王尔德很喜欢这个想法（自从1882年8月博格破产后，这些未装订的书页就一直被存放在仓库里）。里基茨受委托为这本书设计一个新的装饰性的标题页和封面。王尔德建议在每一本书上签名，以进一步增强该版本的“特色”。❷

这时他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戏剧性事件中。1月31日，约翰·巴拉斯因在一场无政府主义抗议活动中向威斯敏斯特宫开

枪而被捕；用他的话来说，此举是为了显示他“对下议院的蔑视”。1月7日，王尔德与格雷、约翰·戴维森以及几名家庭成员一起出席了巴拉斯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的传讯。有些人担心当局会宣布巴拉斯精神错乱，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周后，王尔德和社会主义出版人H.H.钱皮恩回到地方法院，地方法官表示可以释放巴拉斯，条件是缴纳200英镑保释金，“承诺”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不再闹事。王尔德和钱皮恩同意担保。王尔德似乎很享受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成员的短暂亮相；在拥挤的法庭上，他受邀坐在地方法官旁边。在听证会结束时，“地方执法官”试图以法律式的幽默口吻对他说：“我认为，王尔德先生，这显然是一桩有关（镇静剂）溴化钾的案子。” ⑩ ⑪

钱皮恩带着巴拉斯即将出庭的消息来到泰特街时，他发现王尔德正要出门去见乔治·亚历山大，讨论他即将上演的戏剧的计划。一片混乱中，王尔德携带的一卷手稿掉落在地。他高兴地注意到，稿子并没有“平整地落在地上”。这似乎是个吉祥的预兆。 ⑫

亚历山大的计划不断变化。他新年的第一部作品（乔·科明斯·卡尔的《宽恕》）失败了。他本来希望能用R.C.卡顿的《自由大厅》代替它，但是剧本还没有完成，卡顿就病倒了。困难当前，他叫来王尔德，提议下个月将《良家妇女》投入制作。对王尔德来说，这是一个应该抓住的机会。他受邀前往圣詹姆斯剧院朗读剧本。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他到场时，丝绸帽子“皱皱巴巴”，登上舞台时差点绊了一跤。但随后，他的自信油然而生。“他把一大盒香烟放在面前的桌子上，问了句：‘我可以抽烟吗？’然后，他点上一根烟，开始读起

来。”大家本已不抱什么特别的期待，但“在听了第一句话之后，所有人都屏息静听，直到结束”。^①有人告诉里基茨，王尔德作为剧本的朗读者，“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在涉及对话的地方，措辞和表达都是一样的丰富多彩而生动”。^②

大家一致同意将本剧的名字改为“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王尔德夫人和其他一些人都不喜欢最初的标题：“它令人作呕，”她说，“没人在乎什么良家妇女。”排练始于2月初，圣詹姆斯剧院的舞台现在已经空出来了。王尔德经常来这里，操心布景设计、舞台事务、对话，甚至化装的种种细节。每次排演结束后，亚历山大几乎都要处理大量的意见：“我想让你把厄林夫人安排在舞台中央左侧的沙发上。”“霍普最好用自己的头发或者是一个不会移动的假发套。昨天晚上，他的脸太苍白了，他的模样也太可笑了。”“公爵夫人在第一次讲话中漏掉了一些重要的词。台词应该是，‘（澳大利亚。那里一定十分精彩，周围有那么多可爱的）小袋鼠飞来飞去。阿加莎在地图上找到了澳大利亚。它的形状太有意思了！不过，那是一片非常年轻的国土，不是吗？’我画了线的地方是漏掉的词。它们指出了评论这个年轻国家的重点。”“我认为（塞斯尔·）格雷厄姆不该带着他的姨妈去舞厅——年轻的花花公子不喜欢年迈的亲戚——至少不怎么注意他们。”“请认真注意所有这些要点。”^③

让王尔德更加担心的是，泰特街16号的下水管道出了问题，全家人不得不搬出去住。康斯坦斯和孩子们住到了乡下，他住在皮卡迪利大街附近的阿尔比马尔酒店。这里距离剧院只有几百码远，他可以更

为密切地关注整个排演过程。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神经紧张、很难对付的作家。两个人因为第二幕的结束语展开了一场拉锯战。亚历山大最终占了上风（他诅咒剧作家那“该死的爱尔兰式顽固”），而王尔德则“对自己感到很恼火”，不得不承认修改后的结尾更加轻松，相对原作明显的“戏剧性”，这是个巨大的改进。

然而，他拒绝接受亚历山大的主要观点：厄林夫人作为温德米尔夫人母亲的身份，要在剧中一开始就揭露出来，这是极其重要的，而不是拖到最后一幕。这个问题很容易修改，只需要在第二幕中加几句话。但王尔德“丝毫不为所动”，无视所有的争论和请求。恼羞成怒的亚历山大开始指责王尔德是个“自负、傲慢、忘恩负义的人”。这场争论给排练平添了不少压力。❶王尔德还因为在戏迷俱乐部活动中的——一番即兴讲话，而不得不接受演职员们的“一大堆理所应当的逗弄”。据报纸报道，他认为演员不过是“一群木偶”——而舞台仅仅是“配置木偶的架子”。这可不是演艺界愿意接受的观点。❷

王尔德给《每日电讯报》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说他的话被人做了错误的引用：“我真正说的是，我们称之为舞台的框架‘是由活生生的演员，抑或活动的木偶组成的’。”然而，他又继续写道，“演员的个性往往是完美呈现艺术作品的危险因素。”这段话只会进一步激起亚历山大和其他演职人员的愤怒。❸王尔德还在信中纠正了另一个问题。报纸之前曾经将约翰·格雷描述为王尔德的“被保护人”，格雷的演讲是活动当晚的主要内容。格雷似乎对这个称呼感到不安。于是，王尔德写信否认了这一点。“请允许我说明我与约翰·格雷先生的

相识，”他不太准确地宣称，“非常遗憾地说，这还是最近的事，我寻求与他相识的理由是，他在散文和诗歌两方面已经具备了完美的表达方式。”由于他“漠然的心境”及他对艺术的热爱，“他无须别的保护，事实上，他也不会接受”。《星报》上的另一篇文章（可能是出自列·高丽安之手），则将格雷描述为“与他同名的道林的原型”。在王尔德的支持下，格雷威胁要提起诉讼，并要求撤回这篇文章。格雷的焦虑到底是艺术上的原因，还是出于社会影响方面的考虑，目前尚不能确定。但他显然了解王尔德与其他年轻男子的危险性关系，很可能一直谨慎地与他们保持距离。❶

此时，王尔德将性兴趣锁定在了别处。阿尔比马尔酒店距离维戈街上的博德利·黑德公司很近，这样就能便于他仔细审阅新版《诗集》的制作细节。他在出版公司注意到有一个“相貌出众”的高个子销售助理，名叫爱德华·谢利，后者经常停下来和他聊上几分钟。这个18岁的年轻人，尽管家境贫寒（他的父亲是一名铁匠），却既有文学抱负又有社交渴望；他谈吐衣着都很得体，王尔德形容他有一张“知识分子”的脸庞。他渴望学习，对王尔德的作品极为钦佩，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他那惶恐和缺乏自信的性格。王尔德送他书籍作为礼物，其中包括一本题字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他的钦佩之情因此而愈发浓烈。根据谢利自己的描述，一天结束工作之后，王尔德邀请他去阿尔比马尔餐厅吃饭。他很激动地接受了邀请。即便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诱惑的前奏，那么他很快也就发现了。王尔德点了香槟。他们谈到了书，也谈到了谢利自己的文学抱负。晚餐后，两人坐在王尔德

的房间里，一边喝威士忌、苏打水、抽烟，一边继续聊天。那天晚上王尔德带他上了床。 ⑨

面对谢利变幻不定的焦虑和种种要求，王尔德以习惯性的鲁莽轻率继续维持着这段感情。那年，王尔德很可能带谢利参加了杰米恩街弗兰克·哈里斯的派对。晚饭后，哈里斯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在生奥斯卡的气，几乎对他不理不睬，而奥斯卡在向他献殷勤。我听到了奥斯卡只言片语的恳求——‘我求你……这不是真的……你没有理由……’——奥斯卡一直站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一只胳膊搭在年轻人的肩膀上；但他费尽口舌也没有奏效，那个年轻人阴沉着脸，任性地走开了”。哈里斯回忆说，这是一幅令人不安的“场景”。 ⑩

谢利也拿到了王尔德赠送的2月20日（星期六）首演门票。然而王尔德安排另一个年轻的朋友坐在他旁边的前排座位，陪伴在一旁。

⑪王尔德认为他手里的赠票太少，从他手里拿到票的还有弗朗西丝·福布斯-罗伯逊和库尔森·克纳汉。王尔德送给理查德·勒加利安两张票，让他“带着你的诗歌（即他的妻子）坐到你身边”。他委托阿瑟·克利夫顿照顾康斯坦斯和她的姨妈坐在D包厢：“（康斯坦斯）可能会非常紧张，有个老朋友陪着她就好了。” ⑫

在进行种种安排的过程中，王尔德突然产生了一个“新想法”。首演的前一天晚上，他遇见格雷厄姆·罗伯逊（他的另一位受邀者）。王尔德要他去一家时尚的花店，为第二天晚上订购一支可以别在纽扣孔上的“绿色康乃馨”。康乃馨的茎被浸泡在蓝绿色的苯胺染料溶液中，巧妙地着上了色。“我希望明天有很多人可以戴上它们，”王尔

德解释说，“这样就会惹恼公众。”“可是为什么要惹恼公众？”对于罗伯逊的质疑，他回答：“公众喜欢被人惹恼。”饰演年轻花花公子塞西尔·格雷厄姆的演员也会佩戴这朵色彩奇特的花：“人们会盯着它看，并且感到惊奇。然后他们环顾四周，就会发现到处都有越来越多的神秘的绿色小斑点。‘这一定是什么秘密符号，’他们会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罗伯逊问。“什么意思都没有，”王尔德说，“但那正是没有人能猜得到的。”王尔德为这个想法感到很开心。②③

在弗兰克·哈里斯的记忆中，公演第一天晚上剧院不仅富丽堂皇、光彩时髦，而且在知识层次上也相当出类拔萃。对于《帕尔摩报》的社会专栏作家来说，到场的显然都是与众不同的“奥斯卡·王尔德的观众”——剧作家的风格和情绪都反映在一众“画家、律师、演员、经理和漂亮女人身上”（没有人能比莉莉·兰特里更漂亮，她坐在包厢里特别抢眼），还有“二十来个完美无瑕的年轻纨绔子弟”分散在各排座位间，其中许多人玩弄着绿色康乃馨。观众从一开场就喜欢上了这出戏。乔普林夫人回忆，她从来没有如此享受过一次首演。④

然而，批评家们就没这么好对付了。文学界和戏剧界对王尔德仍存有很大的职业怨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哈里斯下楼来到门厅，他发现报纸评论员们对王尔德笔下那种令人愉快的“新鲜感”和“出人意料的幽默”一点也不感兴趣。“戏中的幽默既呆板，又不真实。”《雅典娜神殿》杂志的笨拙评论员乔·奈特如此说道（王尔德在撰写书评期间，一直将此人当作嘲笑的对象）。这一观点得到了其他

几位记者的支持。哈里斯听了这话大吃一惊，于是便说，戏还没演到一半时，他就认为它可能是“最好”“最出色的”英语喜剧；可以跟康格里夫的作品相提并论。剧中的对话——“一连串的异想天开、轻浮地难以捉摸”——也许和最沉闷的舞台语言相比要矫揉造作得多，但对许多观众来说，它似乎很“自然”，因为它很新奇。据格雷厄姆·罗伯逊回忆，“它既有趣又让人惊讶”。^⑩

王尔德非常高兴地目睹了这出戏带来的乐趣和惊奇。人们因为他的俏皮话而发笑。几乎每一个场景都得到了“热烈的掌声”——它们来自剧场的各个角落。亨利·詹姆斯发现，“正厅后排和楼座的观众”为自己“足够聪明”能“领会”至少一点点巧妙而大胆的格言而沾沾自喜；他们相信剧中的对话忠实地代表了“豪华上流社会的谈话”，这让他们感受到了“特权和时髦”。^⑪王尔德对易卜生主义进行了社会性颠覆，他与奥维达都具备一种特殊的天赋，能让中产阶级相信他写的是“公爵夫人的谈话”。

演出结束后，演员们谢幕了三次，观众们开始呼唤作者。王尔德出现在舞台上，他的扣眼上显眼地插着一朵大大的绿色康乃馨，他鞠躬，然后退场。当呼唤声再次响起时，他又出现了，这次还抽着一根烟。听到“说几句”的喊声，他似乎有些犹豫，但随后，他把右手插在裤兜里，开始说道：“我相信，作者有这样的特权，让别人重视他的作品，而他自己却保持沉默。不过，你们似乎希望听到我讲话。所以，我接受了你们满怀好意授予我的这种荣耀。”他停下来抽了一口烟（据乔普林夫人说，这是出于紧张），接着感谢乔治·亚历山大制作

的戏剧具有“令人钦佩的完整性”，称赞整个剧团“小心之至地”将他的“草稿”变成了一幅“完善的画面”。他干净利落地对观众总结道：“我认为你们和我一样喜欢这场演出，我很高兴地相信，你们几乎和我一样喜欢这出戏。”这一番大胆的断言得到了“热烈的笑声和掌声”，王尔德继续抽着烟，离开了舞台。

然而，谢幕几乎比戏剧本身更能激怒那些缺乏想象力的批评家。他们用“居高临下”、“粗鲁无礼”和“寻求关注”等修饰词来形容王尔德，以及他的演讲，他的香烟，还有他那“令人震惊的绿纽扣”。只有《星期日泰晤士报》认为他的结语“很聪明”，也只有《时代》报颇具风度地承认，他只是在大声说出所有“成功的戏剧作家对自己作品的看法”。^⑨

至于这部剧本身，尽管获得不少好评——人们普遍认为，即便它“大胆”而且“愤世嫉俗”，那也是“非常聪明”且有趣——但大多数评论家毫不客气地指出，王尔德借鉴了其他人（大仲马、萨杜、哈登·钱伯斯等）的戏剧作品。人们发现它在“建构”上有问题。有人对它的道德基调提出了质疑。有一些人认为温德米尔勋爵的行为不可思议；另一些人则认为他的妻子行为荒谬。^⑩

不过，王尔德有本钱对此不屑一顾。他认识到，观众的热情已经压倒了微不足道的批判性回应。即使最刻薄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部剧非常受欢迎。小说家兼杂志编辑奥斯瓦尔德·克劳福德自发地给《帕尔摩报》写了一封信，通过对该剧的赞扬来平衡他们的官方报道：“这是戏剧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标志着“沉闷”而“不真

实”的情节剧被推翻了，“自谢里登的《丑闻学校》以来”不曾有过这么多“深思熟虑的机智和完美的警句”。^①

人们的口口相传跑赢了报纸的报道。这出戏的成功是不可否认的——也是不可阻止的。《伦敦旗帜报》很快就表示，说王尔德将不得不放弃他独创和古怪的名声，并“屈从于作为一出成功戏剧的作者所要蒙受的耻辱。人们甚至还担心，这出戏会上演很长一段时间，带来一大笔庸俗的利润”。^②

王尔德本想在首演一结束就逃到法国南部去。但随着这出戏取得成功，他反而在兴奋的喜悦中放松了下来。库尔森·克纳汉回忆，首演结束的第二天早上，激动不已的剧作家拜访了他，当他们谈论昨晚发生的事情时，王尔德“开心地拥抱了自己”。^③王尔德的神经不再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在何时向观众透露厄林夫人真实身份这一重要问题上，他的态度缓和下来。亚历山大与克莱门特·斯科特打算请评论家在文章中指出这种改变的必要性。但事实证明，这样的盘算几乎没有必要，因为几乎所有的评论家和大多数观众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王尔德给亚历山大发去一封“措辞优雅的电报”，承认对方“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并在星期一晚上的第二场演出中及时修改了台词。然而，他在给新闻界的一封信中坚持说，他的决定并不是由任何“记者”的苛责而引发的；而是在演出结束后，同几个年轻朋友共进晚餐时，听取了大家的建议：“老年人对艺术的看法当然毫无价值。年轻人的艺术本能总是令人着迷。”^④

王尔德和他的母亲都为他的胜利而激动不已。两人都非常看重成功，现在他们可以尽情享受了。艾蒂·格伦费尔和威尔弗里德·布朗特都写来了贺信。寇松邀请王尔德共进晚餐。有人劝埃尔乔夫人不要在舞会场景中扮演跑龙套的角色。“全城的人”都在反复念叨“最精彩的台词”：“我能抵抗一切，除了诱惑。”“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个是得不到你想要的，另一种是得到了你想要的。”“丑闻就是被道学家搞臭的流言蜚语。”“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知道每一件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我们大家都在阴沟里，只是我们中某些人在仰望天上的星星。”当被问及演出进展如何时，王尔德夸口说：“非常好。我听说皇室每晚都被拒之门外。”当亚历山大发现便宜的座位似乎和前排及包厢座位一样拥挤时，王尔德得意地回答道：“亲爱的亚历山大，答案很简单。仆人们听到了客厅和餐厅里的谈话。他们听到人们在讨论我的戏剧，他们产生了好奇，于是挤满了你的剧院。从他们那完美的举止来看，我知道他们是仆人。”^②

绿色康乃馨在开幕之夜亮相之后，成为当时的时尚花卉。3月27日，约翰·格雷翻译的庞维勒的诗剧《吻》在独立剧院上演，“正厅前排座位上开满了”绿色康乃馨。^③对此，安德烈·拉夫洛维奇发表了一首十四行诗以示“反对”，在一些“周刊”上，这首诗被认为是他对整个奥斯卡·王尔德“一帮人”的“公开拒绝”。^④

从一开始，这出戏就吸引了“大批”观众。王尔德和亚历山大的约定是总收入的5%（直至他赚到600英镑），之后是7.5%，很快他每周的收入就超过了40英镑。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面临赚钱的美好

前景。更进一步的是，康斯坦斯在艾米莉姑妈去世后得到了3000英镑的遗产。尽管他们急于用这些钱偿还几年来积累的债务，但一直挥散不去的财务忧虑似乎正在逐渐解除。他们甚至还想搬家，住到泰特街上一所更大的房子里去。 ⑨

这部戏让王尔德结交了许多新朋友，艾达·莱弗森就是其中之一。也许就是她撰写了《笨拙》杂志上那篇温和的滑稽小品《一部贴有王尔德“标签”的温文尔雅的戏剧》。她是奥斯瓦尔德·克劳福德的杂志《黑与白》的撰稿人，王尔德就是在克劳福德家认识她的。莱弗森当时29岁，聪明、风趣、有文学头脑，但受制于一个传统的、比她年长许多的丈夫。她和王尔德建立了一段轻松而亲密的友谊，莱弗森的才智和幽默激发了王尔德的灵感。他很快就称她为“伦敦最聪明的女人”。 ⑩

这出戏的成功是一个基础，王尔德现在意识到写作现代社会喜剧是他的专长。“我一直都知道写剧本是我的兴趣范围所在。”他如此告诉弗兰克·哈里斯。他的错误在于写了好几出“诗体剧”，写了关于俄国政治的戏剧。“现在我明白多了，”他宣称，“我对于自己，对于成功都有信心。” ⑪但是，一旦他确信自己能够重复这一伎俩，他就不想限制自己。他的其他文学作品或许可以借《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热度而继续下去。他开始想象制作一系列戏剧作品的可能性。他热衷于追随创作《莎乐美》时的兴奋感：创作一部象征主义戏剧将给他带来文学声望。尽管他对“诗体剧”持保留态度——但他始终怀有希望，要为《帕多瓦公爵夫人》找一位英国制作人。

王尔德放弃了去法国南部疗养的想法，而是在3月底去巴黎待了几周。除了享受巴黎的春天，他似乎还想和那里的朋友商量一下在法国出版《莎乐美》的计划。他请梅里尔帮他检查手稿，去掉任何严重的语法错误。梅里尔设法让王尔德删掉了剧中主要人物长篇大论之前惯用的“Enfin”这个词，但他的其他建议都没有被采纳。王尔德傲慢地称，出生在美国（但他在巴黎长大，会说两种语言）的梅里尔是“一个外国人，不懂法语”。梅里尔对此感到很好笑，于是把王尔德的事情交给了雷泰——后者又挑出了一些英国式表达，并且砍掉了希律王背诵的一长串宝石清单——直到他也被旁人取代。皮埃尔·路易斯是介入其中的第三个权威人士，他提出了一些最终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并做了一些最终的修正，主要与虚拟语气的使用有关（这些建议大多数都被接受了）。然后，手稿被交给印刷商。 ②

回到英国后，王尔德发现他在戏剧上取得的成功，竟招来了滑稽模仿作品。演员查尔斯·布鲁克菲尔德——携手作曲家吉米·格洛弗（他在都柏林的老朋友）创作了一出关于王尔德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小喜剧。它的标题是《诗人与木偶》，暗指王尔德当下颇受非议的，关于“木偶”比演员更受欢迎的评论。19世纪80年代初，王尔德为了制造恶名而全盘接受了《笨拙》与《佩辛丝》的诸多讽刺，因此他开始怀疑这样的广告的好处。他知道抱怨是徒劳的，也是致命的。他也知道审查法规，在理论上，禁止在舞台上表现活着的人。演员可以模仿个人，但剧本本身不可以直接描绘个人。王尔德向负责发放戏剧许可证的E.F.S.皮戈特寻求保护。他还要求亲自审阅剧本。

朗读剧本被安排在泰特街。格洛弗回忆，王尔德“一边抽着雪茄”“一边听着剧本，对每一页内容都赞不绝口‘令人愉快！’‘有魅力，老朋友们！……它简直绝了！’等等”。王尔德显然就是剧中那个女里女气，在牛津受过教育的“诗人”。剧中对话借用了许多他的格言，其中包括“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被人误解”。但剧本中没有任何人身攻击，也没有偷偷摸摸地暗示他与年轻男子之间发生性关系。不过，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王尔德还是提出反对在开场歌曲中特别提到他的名字（布鲁克菲尔德因为不想激怒这个审查者，于是同意进行修改）。当王尔德把两个人送到门口时，他给了他们“临门一脚”：“不过，我觉得，我已经被，嗯，布鲁克菲尔德，怎么说来着？你用那种令人愉快的警句式的舞台英语是怎么说的？嗯？哦，对了！愉快的恶搞！” 注 注

王尔德傲慢地拒绝接受讽刺冒犯，这加剧了布鲁克菲尔德对他的敌意。这位毕业于伊顿公学的演员有点小聪明，长期以来一直嫉妒王尔德的卓越地位。还有人说，王尔德曾经纠正过他在着装上的一些失礼做法，他对此耿耿于怀。关于王尔德性取向的谣言越来越多，这让他得以采用一种道德上的愤怒来渲染自己的敌意。王尔德非常敏锐，察觉到了这种反感，但他对自己的能力非常有把握，根本不予理会。

注

布鲁克菲尔德的“滑稽剧”（于5月19日首演）在没有损害王尔德剧作以及王尔德名字的情况下取得了小小的成功。查尔斯·霍特里对王尔德的模仿堪称一幅“精美的漫画”——每一个动作做派和抑扬顿

挫都惟妙惟肖。为数不多的没有被打动的人之一是演员赫尔曼·维津；他认为王尔德应该写他自己的“滑稽作品”（“我相信它会大获成功”）。然而，王尔德只是在皇家戏剧基金总会的晚宴上，针对《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发表了评论。一位满怀好意的市政官称赞他的剧本“鞭答了恶行”，称他是一个“实话实说”的作家，对此王尔德表示反对。“我想要对此提出我的异议，我从不实话实说，”他说，“实话实说的人应该受到谴责。”至于“鞭答恶行”，他向在座的人保证，他根本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意图。“那些观看《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人将会了解，如果其中有一个独特的信条，那就是绝对的个人主义。谁也没有权利去责备别人所做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走自己的路，去自己选择的地方，完全遵照自己选择的方式。” ⑩

7 白与金

我想所有风度迷人的人们都是给宠坏了的，这是他们之所以迷人的秘密所在。

——奥斯卡·王尔德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获得巨大成功令王尔德满怀信心——以及资源——去遵循他自己的个人主义信条。他可以凭借一种新的力量，以崭新的重点，再次主张他从大学时代起就憧憬的自我实现。他宣称自己的人生是“一件艺术品”。在一位朋友看来，“他所渴望的至少是，从他的同胞眼中体现出一种建立在对美和快乐的崇拜之上的生活观念”。他甚至道出了生存的细枝末节。王尔德和他的门徒们“用诗歌遮盖一切”的方式，让皮埃尔·路易斯印象深刻。他们不会简单地把烟递给一个朋友，而是——以一种“精致”的优雅——先点上它，吸了第一口之后才递给别人。如果说这种新的“快乐”往往体现在奢华的生活中——昂贵的晚餐和更昂贵的香烟——那么他很乐意放纵自己，满足于实现他的愿景，“蔑视任何由他过分的享乐主义所引起的反对意见”。^①

成功影响到了王尔德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在众人的关注下，显得精神焕发。一次在维奥莱特·费恩（以及她未来的丈夫）举办的晚宴上，他的“状态非常好”，与威尔弗里德·布朗特等人一起熬夜直至凌晨。他还应赫伦-艾伦之邀，参加了英国藏书爱好者俱乐部(Sette of Odd Volumes)的晚宴，平添了一份欢乐的气氛。不过也有人发现，

他的做派中新近沾染了一丝势利。伊迪丝·库珀（她是“迈克尔·菲尔德”组合的另一半）最气恼的是他在一次招待会上对她不理不睬：“我们不属于时尚世界，所以奥斯卡只是冲着我们耸了耸肩膀。”与此同时，他的戏剧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尽管他似乎已经放弃了自己制作一出法语戏剧的计划，但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却有人对此感兴趣。王尔德把剧本的美国演出权卖给了从纽约来的查尔斯·弗罗曼，还请到了能力卓著的伊丽莎白·马布里担任他在美国的代理人。⑩

那年夏天，另一位横渡大西洋的访客是弗兰克·莱斯利太太，她是和倒霉的威利一起上路的。离开纽约之前，她告诉朋友们：“我要把威利送到英国去，但是我不带着威利回来。”事实证明，这段婚姻是一场灾难。威利不想工作。在他看来，美国已经有太多的活儿要干。“纽约需要的，”他称，“是一个休闲阶层，我决定引进一个。”他拒绝去办公室，白天不是在豪华的格拉赫酒店，就是在欢乐的莲花俱乐部。他把自己的时间——还有妻子的钱——都花在喝酒和游手好闲这两件事情上。他“极其滑稽地”模仿奥斯卡，用异乎寻常的审美态度、一种“肥嘟嘟的、被土豆噎住似的声音”夸张地即兴表演美学诗歌，以此取悦他的俱乐部同伴们。妻子替他支付酒吧账单，忍受着他的粗鲁，并时时催促他去工作，她很快便厌倦了这一切。据她估计，威利“在基督教世界里，比任何同他一样大小的人都更懒惰”。她懊丧地得出结论：无论白天黑夜，他对她都毫无用处，必须把他赶走。奥斯卡——和王尔德夫人——对于威利回到伦敦并没有感到兴奋，这与其说是一笔资产，不如说是一种负债。威利希望重回《每日电讯报》，却发现报社已经不再需要他了。他不断地在走下坡

路，“为无足轻重的报纸写点戏剧评论，写点常规性的文章，他会在文章里提到商人的名字，以便弄点额外收入”。^⑨

奥斯卡尽量置身事外；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花掉自己赚的钱。其中一个计划是向马修斯和莱恩支付出版约翰·格雷诗歌所需的费用。王尔德十分欣赏格雷笔下受法国影响的颓废派风格诗句，并乐于在里基茨的帮助下，用一本精美的书来推广这些诗歌。他还希望以书本的形式出版《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以此庆祝该剧获得的成功。然而，马修斯和莱恩在编辑出版王尔德的《诗集》大获成功后（该书在几天内就销售一空），真正想要的是另一部诗歌作品。于是王尔德安排他们推出他的《斯芬克斯》；这首诗共有174行，也许可以优雅地排列在足够多的页面上，凑成一本书，极富创意的里基茨会将它装帧得非常漂亮。^⑩

在执行这些各不相同的计划期间，王尔德意外地收到了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从牛津寄来的“一封十分令人怜惜且非常迷人的信件”。道格拉斯“受人敲诈陷入了巨大的麻烦”。有关这起“不幸的牛津事件”的细节目前尚不清楚：可能是道格拉斯有一封有失体面的信落入了他愤怒的父母或者其监护人手中。王尔德（据他自己判断，他当时“几乎不认识”道格拉斯，也有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了）被他的恳求深切打动，而且也颇为自得。他主动伸出援手，帮助道格拉斯与擅长规避丑闻的乔治·刘易斯取得联系。埃德温·利维也被拉了进来，和王尔德一起向勒索者支付了100英镑。利维感觉这场灾祸暗藏凶险，他发现道格拉斯拒绝为此承担任何责任（似乎是王尔德提供了这笔

钱)。于是他花费一个小时告诫王尔德不要继续这段友谊。然而，他的努力白费了。❶

对王尔德来说，这一充满危险、性、阴谋和犯罪的事件本身就令人兴奋。对于道格拉斯而言，这件事让他松了一口气，并且心怀感激；王尔德将他从灾难中解救了出来。各种各样的元素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魔力：王尔德与道格拉斯的友谊迅速发生转变，先是相互痴迷，然后是持久但总是动荡不安的爱恋。王尔德之前已经被道格拉斯的年轻可爱以及他古老的名字所吸引，现在又被他的性格特点所迷惑：他像贵族一般蔑视传统，他像“异教徒”一般毫无罪恶感地享受性爱，他极其漠视后果；他乐意依赖别人；虽然他自私、娇惯、虚荣、放纵、贫乏、苛刻，但这些只会令他更具魅力。欲望一如既往地与现实主义混杂在一起。道格拉斯身上有一种魅力，使得王尔德很容易将其视为理想的、可以启发灵感的柏拉图式“宠儿”——就像他心目中莎士比亚的“威利·休斯”，或者是“道林·格雷”，而他也许既是巴兹尔·霍尔沃德，又是亨利·沃顿勋爵。

道格拉斯也表现出同样的忠诚。“我被王尔德迷住了，”他后来告诉弗兰克·哈里斯，“崇拜他，为他‘疯狂’。”王尔德激发年轻人爱慕的所有天赋都发挥了作用。道格拉斯承认王尔德令他“变得活跃起来”，“用金子般的语言”将他“从这个乏味的世界，带入一个充满幻想、自负、矛盾和美的仙境”。他下意识地为自己博得王尔德的喜爱而感到喜悦，由此而更加极度热爱王尔德非凡的才华。❷

敲诈勒索事件之后，王尔德对道格拉斯大献殷勤，令后者应接不暇，其间他赠送了一本《诗集》（最新的博德利·黑德版），上面题写着“来自奥斯卡，给披挂着金甲的男孩。牛津，6月中旬”。除此之外，还有性爱。道格拉斯回忆（大约30年后，此时他已经完全改变了对同性恋的态度），两人在城里寻欢作乐一晚上之后，王尔德带他去空无一人的泰特街住所上了床：那里有个空闲的卧室，“他终于做成了自从他第一眼见到我，就想做的事情”。道格拉斯称，王尔德对待他“就像学校里的大孩子对待小男孩一样，而且还做了一些我从未见过的事……他‘吮吸’了我”。然而，这种不带感情的惊讶语气却并不可信。道格拉斯——自从在温彻斯特公学开始就放荡不羁，在牛津声名狼藉——理所应当是经验更为丰富的一方。❶他在给王尔德的信中签名写道：“你心爱的宝贝男孩，和你一起做你喜欢的事情。”这封信或许能够更好地表达他们之间性关系的真实基调。❷❷

崭新的激情带来了无比的兴奋，与之呼应的是另一种兴高采烈。莎拉·伯恩哈特来了。王尔德在亨利·欧文家里见到了她。据报道，莎拉·伯恩哈特问他（现在是伦敦西区一部热门作品的作者）是否愿意为她写一个剧本；他开玩笑地回答说——拿出了《莎乐美》——他已经写好了。这句俏皮话似乎足以激起她的兴趣。王尔德给她朗读了一段，他又惊又喜地发现，她“被迷住了”。她想扮演主角，并且不是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日子，而是马上，作为她目前伦敦表演季的一部分，这一季的表演已经被延长至7月。对王尔德来说，“神圣的莎拉”——（他认为）“毫无疑问是任何舞台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将在伦敦的剧院里首演他的作品，这简直是一个令人炫目的难得机

会。它将会带来一次“艺术的”胜利，足以媲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在商业上获得的成功。⑩

彩排立刻开始了。伯恩哈特意识到这不是一出关于“宗教”的戏剧，而是关于“爱、激情、自然、星星”（王尔德告诉她“主角是月亮的角色”）的作品。在她的概念中，这出戏“像纹章一样”——有一种“壁画”的庄严感。据里基茨回忆，她和王尔德花了好几天时间讨论表演所需的“音调”。伯恩哈特的想法是，每个词语都应该像“珍珠落在水晶盘上一样”说出来。动作速度不要快，要有风格化的姿态。⑪即便王尔德对这位47岁的女演员饰演年轻的公主有任何疑虑的话，它们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认为，“由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说出”他写的台词，这是他“所能体验到的最大的快乐”。他开始认识到伯恩哈特确实是“唯一”能扮演这个角色的人；年龄无关紧要。⑫王尔德自己对这出戏的估量似乎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化。里基茨怀疑，他最初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精神游戏”，用来“让法国人感兴趣，并且吸引他的朋友们”。然而现在，在伯恩哈特的光辉照耀下，他开始将它看作一件小小的杰作——一件可以扩大舞台“艺术视野”的作品。⑬

尽管王尔德自己一直在考虑各种想法，但他还是请来格雷厄姆·罗伯逊帮忙安排演出和服装事宜。据罗伯逊回忆，王尔德希望“舞台上的每个人都穿黄色衣服”。他还建议在管弦乐队所在的位置燃起“散发香气的火盆”。他激动地想象，“芳香的云朵一片片升起，让舞台若隐若现——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香味也会有所改变！”但罗伯逊

的反对打消了这个想法，“剧院不可能在变换情绪的时候通风散味，各种香味混杂在一起，闻起来会相当恶心”。此外，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或金钱）来实现这种奢侈的幻想。伯恩哈特认为，可以将她在《埃及艳后》中的布景和服装拿来根据场景需要略加修改。❷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这让王尔德感到“非常高兴”。他的排练脚本上点缀着各种修正和注释，其中包括那句针对莎乐美的醒目的舞台指导，“她跳着七重纱之舞”。但接下来，祸事临头了。剧本理所当然地提交给了审查官办公室，以便获得演出许可证。然而皮戈特裁定，不允许发放执照。审查法律（起草于17世纪）禁止人们在舞台上表现圣经人物，这似乎就是皮戈特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但即使没有这样的立法，这部剧中的性变态——乱伦和恋尸癖的主题——可能也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接受范围。排演当然不能继续进行了。❸

在王尔德看来，这桩事情既令人难以置信，又“荒谬至极”。在一系列的采访和信件中，以及在作家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他哀叹这个制度允许画家、雕塑家和诗人描绘或叙述圣经人物，但剧作家和演员却被剥夺了同样的权利，这是不公平的。“压制《莎乐美》是对舞台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侮辱，”他称，“而不是对我的侮辱。”虽然王尔德肯定料到了，这部剧要想获得许可证可能会遭遇问题（他这么晚才处理这件事可能是出于懈怠），但他也知道，这些规则其实从来都没有一以贯之地实施过。他最近经历的《诗人与木偶》事件表明，规则有可能受到忽视。此外，还有一种传统，那就是法语戏剧享有相当大的额外自由度。皮戈特这个不可撤销的裁决成了一个可怕的打

击。而另一个打击则是，在此期间很少有艺术家和评论家站出来支持他。只有威廉·阿彻和萧伯纳是罕见的例外。②

王尔德试图通过“邀请表演”来做些挽救——也许类似独立剧院一样——但伯恩哈特称这种做法不是她的“风格”。相反，她会让这部“令人钦佩的”戏剧在巴黎首演，它将在那里获得“巨大成功”。她只是不确定什么时间上演，但正如她对记者所说：“这个角色是我的。奥斯卡·王尔德先生把它给了我，没有别的人能表演它。不，不，不。”③

王尔德一怒之下宣布他也要搬去巴黎——“艺术家的安身之处，不……艺术家之城”——并将“入籍成为法国人”。官方的否定刺伤了他，同样令他感到刺痛的是，有人竟然拿他的窘迫尴尬寻开心。他不愿意自称为“一个在艺术批评方面如此狭隘的国家”的公民。于是庸俗的报刊立刻开始猜测，他可能要去法国服兵役了；《笨拙》杂志还画了一幅他身着制服的漫画。④

然而他没有在法国定居，而是去了德国。他需要从《莎乐美》彻底失败所带来的压力和失望中恢复过来，也许还需要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获得巨大成功所带来的过度兴奋中清醒过来。7月，他来到时尚的温泉小镇巴特洪堡，住在一座可以俯瞰美丽的“英国式”公园的漂亮房子里。康斯坦斯向她哥哥汇报，奥斯卡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7：30起床，晚上10：30上床，几乎不抽烟，有人为他按摩，当然也喝矿泉水：我真想亲临现场看一看”。王尔德希望卡洛斯·布莱克也能一起去，并自称“非常痛苦”。但事实上，他很快就找到

了志趣相投的朋友。他和皮埃尔度过了“迷人的一天”，后者在去拜罗伊特的路上正好经过那里。赖德·哈格德正在那里做矿泉疗养。年轻的道格拉斯·安斯利现在是一名无报酬的外交使馆随员，他住在临近的宾馆，并且迅速朝一向慷慨——现在似乎很富有——的王尔德借了一笔钱。亚历山大写来一封信，给王尔德的账户转了1000英镑，还讲述了《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持续火爆的消息，当时这出戏正准备到各省进行夏季巡回演出。禁烟的效果似乎有利有弊：“我身体很好，”他写信告诉路易斯，“但我非常忧郁。”赖德·哈格德虽然觉得王尔德是个“有趣”的伙伴，但他惊讶地发现，王尔德非常在意他本人及其作品最近遭受的“冷嘲热讽和攻击”；他认为“那是他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东西”。^①

经过一个月休养，王尔德回到伦敦。他只是稍事停留；康斯坦斯在诺福克郡克罗默附近的费尔布里格租了一间农舍，作为夏季度假的地方（乔治·亚历山大曾向王尔德推荐过那里）。康斯坦斯担心，乡村生活“会让奥斯卡无聊得要死”，但事实上她大可不必如此焦虑，那里“有大把的空间”，他们可以“请人到乡下来让他高兴起来”。一开始，王尔德对乡村的宁静和“甜蜜”的空气非常满意。他会趁下午和康斯坦斯一起去克罗默散步，在那里他们“通常会遇到一些朋友一起喝茶”；自由党政治家西里尔·弗劳尔和他的妻子康斯坦斯·德·罗斯柴尔德在欧弗斯特兰德附近有一座美丽的美学度假屋。王尔德每天早晚都在工作。

王尔德在巴特洪堡构思了一出新戏——一出以《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成功为基础的喜剧。现在他要动笔了。这出戏暂时被叫作《阿巴斯诺特太太》。这部作品是针对“堕落女性”主题的又一次优雅的颠覆性改编，刻画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关于男性和女性婚前（不当）行为的“双重标准”。^⑨

标题中的阿巴斯诺特太太年轻时被“邪恶的”伊林沃兹勋爵勾引，独自一人抚养两人的私生子杰拉德。她瞒着儿子，不让他知道自己可耻的身世，以及她不堪回首的过往。她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结果却发现他——碰巧——被伊林沃兹勋爵收养了，伊林沃兹勋爵想让他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经过一番不可避免的揭露、相互指责与随之而来的和解，杰拉德发现了自己身世的秘密，原谅了母亲，牵手富有而高尚的美国女继承人赫斯特·沃斯利，并加入了对完全不思悔改的伊林沃兹勋爵的谴责。

王尔德自负地认为——公众也很容易相信——“剧本创作是一门艺术……其中包括写一系列格言警句，然后找到适合它们的各种人物，再插入事件作为标签”。^⑩他的新作品理所当然地以24小时内的乡村别墅聚会为背景，将机智和矛盾混杂在一起：“打好领带是走向生活的重要第一步”；“《贵族人名录》……是迄今英国人所编的最好的一部小说”；“这年头总得要有点事儿干。我如果没有任何债务，就没有什么该想的事情了”；“我喜欢简单的乐趣，它们是复杂事物的最后避难所”；“英国乡绅骑马奔驰追捕一只狐狸——没法儿夸的人全力以赴地追捕没法儿吃的东西”。事实上，王尔德形容戏的

开场部分是对评论家的一种反驳，因为他们批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缺乏动作表演。在一大堆关于爱情、婚姻和社交的饶有趣味的谈话中，“绝对没有任何动作表演”；王尔德说，这才是“完美的表演”。^②

剧中有许多优秀的女性角色（世故的阿朗拜太太、令人敬畏但又愚蠢的亨斯坦顿夫人、热情的赫斯特·沃斯利、阿巴斯诺特太太本人），但大部分俏皮话都是从愤世嫉俗的伊林沃兹勋爵嘴里说出来的。他是继保罗王子、亨利·沃顿勋爵和达灵顿勋爵之后，王尔德笔下的又一个才华横溢、警句隽永的花花公子，尽管王尔德一如既往地喜欢夸大其词，声称其“和之前存在的任何人物都不一样”。事实上，他立刻反驳了这一论断，接着说：“他肯定是非自然的。他是个艺术中的人物。说实在的，如果你愿意听真话，他就是我自己。”^③毫无疑问，这个角色的大部分智慧都借鉴了王尔德自己的谈话。当然，它们来自他的众多作品：其中的许多诗句摘自《道林·格雷的画像》。王尔德还利用这部戏，狡黠地评价了自己在社会中过着岌岌可危的非法双重生活。对于那些知道——或者怀疑——他的秘密的人来说，这样的评论简直是一把尖锐的双刃剑，比如，“这年头，人们到处乱窜，在人家背后净说些坏话，真是十分可怕，不过说的倒全是彻头彻尾的大实话”。这是通过自我揭示来隐藏自我。

戏剧界渴望得到这出戏的消息。王尔德现在很抢手。在经历了《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紧张的制作过程后，王尔德准备把目光移向乔治·亚历山大之外的其他人身上。一段时间以来，比尔博姆·特里一直

在争取获得他的下一部作品的制作权。王尔德——认为特里最适合扮演历史角色——最初曾经试图让他对《帕多瓦公爵夫人》产生兴趣；但是这个提议后来发生了变化。特里想要做一些现代的、滑稽的东西。这位演员兼经纪人被地位显赫的艾蒂·格伦费尔带来之后，王尔德或许很重视他的愿望。当然，他同意让特里对他的新剧本享有“优先取舍权”。^⑨

不过，他仍然对这位演员是否有能力扮演贵族兼纨绔子弟伊林沃兹勋爵持怀疑态度（王尔德认为，他更适合在《莎乐美》中扮演希律王）。特里自称，他最近在A.H.琼斯的《舞女》中扮演的吉斯伯里公爵受到了高度赞扬，王尔德回答说：“啊！就是因为如此。在你成功地扮演我正在构思的角色之前，你必须忘掉你曾经扮演过哈姆雷特；你必须忘掉你曾经扮演过福斯塔夫；尤其是，你必须忘掉你曾经在阿瑟·亨利·琼斯的一出情节剧中扮演过公爵。”^⑩

在诺福克的头几个星期里，尽管有一些干扰，剧本写得相当顺利。“我担心奥斯卡迷上高尔夫了，”康斯坦斯对她的朋友蒙特·坦普尔夫人说，“他昨天在这里的高尔夫球场打了第一场比赛，已经玩了两周了。”^⑪他们将西里尔从剑桥郡的朋友家接来，而他的弟弟因患百日咳只能继续住在那里。王尔德邀请爱德华·谢利到乡下来，但他没有来。阿瑟·克利夫顿和他的新婚妻子来了，当时他们正在度蜜月（王尔德赠送了他们160英镑，帮助他们完婚）。^⑫然后，在8月的最后一天，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发来一封电报“请求在这里住一晚”。康斯坦斯很乐意招待他。然而，所谓的“一晚”似乎只不过是

一句套话；道格拉斯在这里安顿了下来。他每天都和王尔德一起去高尔夫球场（康斯坦斯笑着哀叹自己成了“高尔夫寡妇”）。康斯坦斯在9月10日聚会之前，安排拍摄了一些照片，其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按照计划，王尔德还要一个人在乡下再待一个星期，以便写完这部戏。然而，道格拉斯也设法留下了。有一种传说是，他生病了（康斯坦斯去了巴巴科姆，她在那里写信来，询问是否需要回来“照顾他”）。而在道格拉斯的记忆中，那段时间他在打高尔夫，以及由“奥斯卡自己驾着一辆小马车——冒着巨大的交通风险”去旅行。他们经常去欧弗斯特兰德的弗劳尔家。在一次午餐会上，王尔德称：“如果必须为自己的生活而劳作，那么他愿意成为一名牧羊人。”当弗劳尔太太提出，他很可能会“发现照看许多羊很不容易”时，他回答说：“哦，我只养一只，不想多养。”弗劳尔夫人在一片笑声中反驳道：“好吧，你已经有一只长着金羊毛的小羊羔了。”王尔德对于这个指向金发的道格拉斯的影射感到高兴；道格拉斯也很开心。这句话很直白：弗劳尔夫人认为“波西”只不过是孩子，后来甚至邀请他去伦敦的家中参加一个儿童聚会。②③

但她被道格拉斯那副孩子气的外表欺骗了。在费尔布里格的那一周，对道格拉斯和王尔德来说，无疑是一次做爱的机会，但也正是这一次，让王尔德了解到道格拉斯贪婪滥交的一面。我们无从知晓，波西透露了多少有关他与朋友、“漂亮男孩”莫里斯·施瓦贝之间的性关系。在现存的道格拉斯写给施瓦贝的信中，他提到了永恒的爱，并宣

称自己是“你可爱的男性妻子，或者你的‘小贱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明确了这种关系的强烈程度和活跃程度；一张拍摄于牛津的照片——波西坐在施瓦贝的膝盖上——也说明了这一点。道格拉斯所谈论的是，他和施瓦贝正忙着共同探索伦敦的男性卖淫亚文化。王尔德记得这是道格拉斯谈论的唯一话题。克利夫兰街的妓院可能已经关闭了，但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绅士们可以与工人阶级的年轻人见面，并付钱与他们做爱。骑士桥溜冰场和圣詹姆斯餐厅的酒吧都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阿尔弗雷德·泰勒把道格拉斯和施瓦贝带进了这个充满性的秘密世界。泰勒刚满30岁，虽然软弱却受过良好的教育，据说他挥霍掉4.5万英镑的遗产，充当了一个非正式的皮条客，挑选感兴趣的年轻人并把他们介绍给有钱的客户。道格拉斯和施瓦贝渴望这种充满激情的相遇，他们的力量、羞辱、堕落和危险交织在一起。正如波西已经发现，敲诈勒索是一种持续不断的风险。

这是一个王尔德无法理解的情色世界，而且——他总是在寻求新的体验——了解了这些事情后，他感到既着迷又兴奋，甚至还想有所体验。正如他的新剧中，阿朗拜太太所说的，“危险在现代生活中是如此罕见”。而王尔德对此的态度，则在她的另一番话中亦有所体现：“玩火的一个好处是，从来没人会被烧焦。只有那些不会玩火的人才会被烧得焦头烂额。”

第七部分 自私的巨人

1892～1894年

37～40岁



奥斯卡·王尔德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牛津，1893年

1 对美的永恒追求

关注行为对错的想法都是智力发展停滞的表现。

——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最初的玩火之举似乎发生在回到伦敦后不久，施瓦贝和道格拉斯在凯特纳餐厅的一个包间里安排了一场小型晚宴。阿尔弗雷德·泰勒带来一个“谦虚和善”的年轻人，他叫西德尼·马弗，20岁，是伦敦一家灯芯厂的职员，和他寡居的母亲住在一起。他是被特别选中来勾引王尔德的。“我很高兴你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漂亮，”他们到达餐厅之前，泰勒对马弗说，“王尔德先生喜欢干净整洁的男孩子。”王尔德确实很喜欢马弗。“我们的小家伙举止真讨人喜欢，”聚餐快结束时，他面带满足地说，“我们得多见见他。”据马弗说，那晚他和王尔德在阿尔比马尔酒店的房间里发生了性关系。不管这次交往中有什么交易元素，王尔德坚持要让这次邂逅显得有人情味一些——甚至是浪漫一些：几天后，马弗收到一个昂贵的银烟盒，里面刻着“奥斯卡·王尔德赠西德尼，1892年10月”。他说，这份礼物“真是个惊喜”。^①

这是众多类似约会——以及许多这样的烟盒（“我非常喜欢送人烟盒”，王尔德后来承认）——中的第一次。这也标志着王尔德与波西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他们的相互迷恋还在继续，诗歌、热情洋溢的信件和偶尔的性爱给这种迷恋增添了色彩，然而现在它被一种热情点燃了，他们都掠夺性地热衷于同他人发生性关系；道格拉斯称之

为“永恒追求美”。王尔德成了阿尔弗雷德·泰勒的茶会常客，茶会在威斯敏斯特小书院街一家闲置的面包房楼上，泰勒的公寓举行，参加者全部为男性。泰勒的房间被百叶窗和窗帘挡住了光线，用扇子和人造花做装饰，挂着东方织品和舞台服饰，是个廉价的唯美主义所在。一个“真正高贵的耶稣受难像”为屋子添加了一种独特的感觉。空气中弥漫着香味。那里还有一架钢琴，王尔德说泰勒弹得“非常迷人”。^②

在结识西德尼·马弗的那个月，王尔德和康斯坦斯受邀到布拉克内尔拜访道格拉斯的母亲昆斯伯里夫人——一个贫困而傲慢的女人。她于1887年同昆斯伯里侯爵离婚，于是便整日为儿子焦虑不已，宠坏了他。她很担心这个三儿子与王尔德日益深厚的友谊，她甚至写信给莫德林学院院长沃伦博士（王尔德的老熟人），询问这个人是否适合交往。沃伦告诉她，波西非常幸运，能获得这样一位能干而杰出的人物的关注。^③昆斯伯里夫人放下心来，现在想就她那误入歧途的孩子，以及他在牛津的种种坎坷，向王尔德寻求建议。当王尔德“坐在布拉克内尔的树林里”听着昆斯伯里夫人讲述她的担忧时，他一定感到了自己的处境是多么荒谬和尴尬，同时他也很享受侯爵夫人对他的一片信任。她说，“波西”爱慕虚荣，而且“对金钱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当王尔德询问，她为什么不在这些问题上责问儿子时，她说他的脾气很坏。然而到目前为止，王尔德并没有领教过这一点。

布拉克内尔之行让王尔德第一次进入了道格拉斯家族的关系网。他日后会发现，自己很难与他们逃脱干系。与昆斯伯里夫人会面后不

久，他见到了她的前夫。这位“疯子侯爵”是一个意见激烈、生性好斗的人。除了对拳击和赛车界所做的贡献，他还是一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和失意的政治家，拥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罕见能力（如一家报纸所描述的那样）。即使在一个以怪胎闻名的家庭里，他也非常引人注目。1882年，他声势浩大地打断了丁尼生作品《五月的承诺》的演出，抗议剧中对无神论者的处理。⑩

随着波西和王尔德关系的发展，人们开始经常看到这对朋友结伴在城里走动，侯爵变得不安起来。他对有关王尔德性趣味的谣言早已有所耳闻，因此很不赞成两人的这种关系。他以一种不寻常的父亲式的策略，故作“轻松地”建议儿子放弃这段友谊。然而，道格拉斯并不想听命于——他认为一直忽视自己的父亲——或接受他的建议。尽管他的回信很恭敬，但这封信还是一触即发地点燃了侯爵的怒火：他称波西是个“傻瓜”“婴儿”，并且威胁要断了他的零用钱。

但在事态进一步恶化之前，侯爵碰巧在皇家咖啡馆遇见王尔德和道格拉斯正共进午餐。道格拉斯坚持让父亲加入他们。王尔德则努力取悦侯爵，很快，侯爵不仅参与其中，而且还露出了笑脸。当他把话题转到基督教的不公正（昆斯伯里最喜欢的话题）时，波西感到“很无聊”，干脆抽身离开让他们俩自己聊。王尔德后来说，他们一直吃到下午四点。之后，昆斯伯里给波西写信，称赞王尔德是一个“有魅力的家伙”，“非常聪明”。经历了这次谈话之后，他已经非常明白为什么儿子会那么喜欢他。当他听说德格雷勋爵夫妇认为王尔德各方

面都“完全无恙”时，他也感到备受鼓舞。一场危机似乎就这样消解了。①

这些新的情感潮流贯穿了王尔德的生活，它们不得不与他的新剧计划并驾齐驱。从诺福克回来后不久，王尔德拜访了他在雷丁的朋友帕尔默一家，沃尔特·帕尔默是饼干制造公司亨特利与帕尔默的负责人。64岁的小说家乔治·梅瑞狄斯也是其中一员。这太令人兴奋了。梅瑞狄斯被誉为“当时最聪明的谈话者”，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据当年有人回忆——“从孩子气的‘嬉戏’顽皮动作到成熟老到、随机应变的讽刺攻击，充分体现了喜剧精神”。西奥多·沃茨认为梅瑞狄斯是一个可以和王尔德相提并论的健谈者，如果可以“选择自己的话题”，他会更加出色；而王尔德则在“快乐并恰当地运用随机的语言”方面更胜一筹。两个人同处一个屋檐下，实属难得。另一位嘉宾乔普林夫人写道：“两位作家非常享受他们的第一次见面。”遗憾的是，她没有注意到更多。“餐桌上的谈话非常有趣。我希望我能记住它，哪怕只是一两句话也好。”会面之后，先前对《道林·格雷的画像》持保留态度的梅瑞狄斯称，王尔德是一个“好伙伴”。②

王尔德急于测试他的新剧本，一天下午，他把最后一幕大声朗读给聚集的客人听。他高兴地注意到，当蒙冤的阿巴斯诺特太太将手套扔到骗子伊林沃兹勋爵脸上时，有些人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尽管——不出所料——王尔德当时称：“这个情节是我从《家庭来使》中借鉴来的。”③不久之后，王尔德在格拉斯哥同比尔博姆·特里及其团队见面——他们正在那里巡回演出——并把剧本读给他们听时，重复说了

这句话（略有变化）。面对演员经理对该剧情节的溢美之词，他回应道：

情节是乏味的。任何人都可以创作情节。生活中到处都是情节。事实上，一路上挤满情节，必须用手肘推开它们才能走自己的路。我从《家庭来使》中借鉴了这个情节，而该剧——很明智地，我感觉——从我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借鉴了情节。人们喜欢听这样的故事，一个邪恶的贵族勾引了有操守的少女，他们喜欢听到一个有操守的少女被邪恶的贵族勾引。我已经把他们喜欢的东西给了他们，所以他们也许能学会欣赏我想要给他们的东西。②

特里认定公众会喜欢这出戏。他们拟定了一份合同，安排来年春天在干草市场剧院上演。与此同时，《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仍然吸引着观众。它在10月的最后一天结束巡回演出，回到圣詹姆斯剧院，最终在11月底落幕。10个月的演出为王尔德赚了大约3000英镑。不久，布莱克见到王尔德，称他“脸上洋溢着成功的醉意”，并为他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创作出如此“出色”的新剧而感到高兴。③

王尔德从特里支付的酬劳中拿出一部分钱，租下了芒特·坦普尔太太在托基城外巴巴科姆悬崖的漂亮房子，租期三个月（从11月中旬到来年2月中旬）。康斯坦斯一直想买一幢乡间别墅；相比之下，这样的选择更容易操作。巴巴科姆将用作全家人的休养之地。王尔德告诉芒特·坦普尔太太，他很期待她那“安静而美丽”的家，他可以在那里做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工作——“听见耳朵听不到的东西，看到看不见的东西”。巴巴科姆对王尔德的健康也有好处。频繁的酗酒、吸烟、

外出就餐、熬夜、缺乏锻炼、工作压力和私人烦恼，给他的身体造成了损害。他的神经变得越来越脆弱，而且身体疲惫。但“健康”也的确是他的借口和逃避的手段。❶

即便在安排巴巴科姆的诸多事项期间，王尔德还是跑到伯恩茅斯的皇家巴斯酒店待了几天——表面上是因为他“身体不太好”。实际上，他是陪道格拉斯一起去的。道格拉斯已经被自己的医生送到那里，但他“讨厌一个人待着”。波西的要求和王尔德的顺从已经形成了模式。不过，这其中也有鼓动和迁就的因素。道格拉斯刚刚接受了牛津大学本科生杂志《灵灯》(the Spirit Lamp)的编辑工作，王尔德同意为下一期杂志贡献一首诗。这次旅行似乎也让王尔德第一次领教了波西的坏脾气。他对此感到不安，对其他事情的忧虑也让他焦虑。他与男妓们的交易似乎已经让他面临敲诈勒索的威胁。康斯坦斯的哥哥奥索回忆，他见到刚从伯恩茅斯回来的王尔德时，“有一封重要的信……他说，被酒店的行李员放错了地方，或是送错了地方，我觉得他很着急，好像有什么麻烦在纠缠着他似的”。❷在谈到道格拉斯（当时已经回到牛津）时，他半遮半掩地称其是伦敦生活中“走在涂脂抹粉的场面上的那些奇奇怪怪、令人烦恼的人物”。❸

然而，这样的焦虑并没有使他偏离自己的方向。他对地下性交易的迷恋与日俱增。这成了他强烈的爱好。如他后来回忆（并解释）：“在高峰顶上待腻了，便成心下到谷底，寻求新的刺激。对于我，思想范畴里的似是而非，在情感范畴中则成了任性乖张。”❹如果有危险，王尔德也愿意接受它们，将其当作游戏的一部分：“这就

像与豹子同桌饕餮，一半是危险，一半是兴奋。”^⑩施瓦贝给他介绍了一个不到20岁的图书公司职员，此人名叫弗雷迪·阿特金斯，一心想做音乐厅喜剧演员（也是一个娴熟的敲诈勒索者）。据阿特金斯说，他们在苏豪区一家餐厅包间里饮酒作乐，其间，王尔德亲吻了侍者。如果那天晚上他没有和阿特金斯上床，那么他似乎是后来才和他睡的。不久之后，王尔德不得不去巴黎待上几天，监督《莎乐美》的出版细节（马修斯和莱恩想把他们的名字加到标题页上，以便为英国市场创造一个同步版本）。阿特金斯和施瓦贝两人陪同王尔德一起走这趟短途旅行。他们在王尔德之前住过的卡普辛大街旅馆里，分别住进三个相邻的房间，这种方式很适合相互背叛：阿特金斯称，一天晚上他从红磨坊回来，发现王尔德和施瓦贝在一张床上。旅程结束时，阿特金斯收到了他的银烟盒。^⑪

康斯坦斯和孩子们从11月中旬就被安置在巴巴科姆，每天都期待着奥斯卡的到来。他终于在12月3日赶到，给孩子们带来了锡兵。^⑫他们见到他很兴奋。然而，没过几天，他的身体就垮了，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医生断言“他不能住在伦敦”。他可不会听从这样的建议。^⑬

巴巴科姆悬崖是拉斐尔前派的梦想之家，一位到访者形容它“到处都是充满惊喜和好奇的房间，每一个角落都有罗塞蒂的影子”。那里有一扇伯恩-琼斯设计的窗户。所有的卧室都有各自的名字：王尔德被安置在“仙境”——那是芒特·坦普尔太太的闺房，也是所有房间中“最具艺术性”的一间。康斯坦斯说，他正忙着给“厚脸皮”的鸽

子喂食，它们要么飞到他的窗前，要么可爱地“沿着冷杉树的树枝排成一行”坐在那里。他正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关于“超自然故事”的书，其中充满了阴间的启示。这种兴趣拉近了他和康斯坦斯的关系。她自己日益关注并投入精神和宗教问题。她还和罗比·罗斯分享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后者当时也来住了一段时间。作为一个有天主教倾向的但丁迷，他准备和她探讨宗教和《神曲》。他甚至送给她一串念珠，以及如何使用的指南。⑨

然而，伦敦、波西，以及淫乱的性交易对王尔德的吸引力仍然十分强烈，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年底之前他被拉到城里。他从波西那里得知了泰勒的最新发现：一个英俊、健壮、金发的17岁工人阶级青年，名叫阿尔弗雷德·伍德。道格拉斯已经和他发生过性关系，他渴望和王尔德分享这段经历。他们毫无例外地在一个包间里举行了一场香槟晚宴，晚餐结束时，王尔德把手伸进了伍德的裤子里。接下来，人们都走了，他们就可以回到泰特街做爱。

马塞尔·施沃布从头到尾一直在盯着图书版《莎乐美》的制作。而王尔德在不得已赶赴巴黎商榷最后的细节之前，又安排了几次和其他人的幽会。在法国首都，王尔德短暂地瞥见了康斯坦斯；她称之为“愉快的窥视”。她和她的姨妈玛丽·纳皮尔以及两个表兄弟正在前往直意大利的路上。她即将离开近两个月。⑩

王尔德回转巴巴科姆，到了孩子们身边，开始工作。他抱有很大的希望。《无足轻重的女人》——现在改了名字——完成之后，他就着手一项新计划。他似乎忽略了为亚历山大写点东西的口头协议，转

而签下合同要为约翰·黑尔制作一部社会喜剧。黑尔是新落成的加里克剧院雄心勃勃的演员兼老板。至于他自己，他还计划创作一个“无韵体”剧本——虽然此刻还没打定主意，到底是按照《莎乐美》的模式来写，还是写成《帕多瓦公爵夫人》的样子。①但是，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到来，几乎立刻打破了这种有益于创作的平静氛围。他带着他的猎狐犬，还有他的导师——坎贝尔·道奇森，一个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学者（莱昂内尔·约翰逊的朋友）。道格拉斯由于疏忽学业，被莫德林学院惩罚在春季学期休学，学校要求他在6月期末考试前通过一门阅读课程作为弥补。王尔德曾建议他可以随时来巴巴科姆，他很快就赶到了。②③

王尔德向芒特·坦普尔太太描述了一个好学奋进的场景：“巴巴科姆悬崖已经成为一种学院或学校，西里尔在育儿室里学习法语，我在仙境里写我的新剧本，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昆斯伯里太太的一个儿子——在客厅里和他的导师一起学习柏拉图，准备应付6月牛津大学的学位考试。他们俩要陪我一起住几天，所以晚上我就不孤单了。”但在一封写给道奇森——在他离开之后——的信中，或许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出王尔德所称的那种状态，它成功地“将公立学校与私立疯人院的各自优势结合在了一起”。王尔德制定了一份规章：

巴巴科姆学校

正校长：奥斯卡·王尔德先生

副校长：坎贝尔·道奇森先生

男学生：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

规章：

上午9：30： 校长们和男学生一起喝茶。

10：30： 吃早餐。

11：30~12：30： 工作。

12：30： 正校长和男学生一起喝雪利酒，吃饼干（副校长表示反对）。

12：40~下午1：30： 工作。

1：30： 午餐。

2：30~4：30： 例行的与校长进行捉迷藏游戏。

5：00： 正副校长喝茶时间，男学生喝白兰地和苏打水（不能超过七杯）。

6：00~7：00： 工作。

7：30： 晚餐，必备香槟酒。

8：30~12：00： 玩纸牌，限于五畿尼得分。

12: 00 ~ 1: 30: 必须在床上读书。任何违反这一规定的男学生都将被立刻叫醒。

学期结束时，男学生要赠送正校长一个银墨水台，副校长一个铅笔盒，以示尊敬之意。⑨

在道奇森的记忆中，这是一段“懒散而奢侈”的日子，其间更多的是与“鸽子和孩子们”玩，在海边驾车、聊天，而不是认真学习。他发现王尔德对语言的掌握“不同凡响”。“我们为柏拉图主义的不同解释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他在写给莱昂内尔·约翰逊的信中写道，“奥斯卡张开双臂，眼中含着泪水恳求我，让我的灵魂独处六个星期，好好锻炼我的身体……波西英俊而迷人，但相当邪恶。他被柏拉图描绘的民主党人迷住了，我的任何论点都不会使他相信任何绝对的道德标准或其他任何东西。”⑩

道格拉斯还在忙于《灵灯》的编辑工作，通过电报进行大量通信。这份杂志已经抛弃了所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在最近的几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日益强烈的同性恋——或“第三性”(Uranian)——的腔调。道格拉斯曾向约翰·艾丁顿·西蒙兹和亚瑟·萨默塞特勋爵约稿。该杂志自称致力于“新文化”——暗指促进男性之间的同性关系。⑪王尔德当然赞成这种冒险，也赞成波西参与其中。他为即将出版的杂志提供了一篇类似圣经的散文诗——《裁判所》，他还鼓励了道格拉斯在诗歌方面的抱负。道格拉斯在到达巴巴科姆之前给他寄了一首爱情十四行诗，对此，王尔德以惯常的热情洋溢的口气写道：“我的人儿，你的十四行诗非常动人，你那红玫瑰花瓣一样的嘴唇不独为疯狂

的热吻，也为歌声的音乐所造，这真是一个奇迹。你那纤弱诱人的灵魂在激情与诗歌之间行走。我知道阿波罗疯狂地爱着雅辛托斯，那就是古希腊时代的你。”^⑨

王尔德心情很好，他收到了从巴黎寄来的第一批图书《莎乐美》。他觉得，用“提尔紫”的封面与道格拉斯的“金色头发”正好相映成趣。他把书寄给斯温伯恩、佩特、萧伯纳、威廉·阿彻、埃德蒙·高斯、弗洛伦斯·斯托克和弗兰基·福布斯-罗伯逊。尽管道格拉斯保证《灵灯》杂志会大大称赞这部戏剧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一个完完全全的成功”，但公开出版物却没有这么慷慨。由于当局不允许在舞台上观看这出戏，于是人们便开始对这本书展开了“严厉而愤慨的谴责”。《泰晤士报》称其为“一种血腥、凶残、病态、怪异、令人厌恶的编排，相当无礼地改编了圣经用语，用在与神圣背道而驰的场景中”。王尔德已经逐渐习惯了批评家们“庸俗”的敌意；更令人沮丧的是，他把这本书献给了皮埃尔·路易斯，而对方却只发来一封语气轻浮的致谢电报。“一滴没有酒的泡沫而已。你多么令我失望，”王尔德在信中说，“我新近才意识到，友谊竟比爱情更加脆弱。”路易斯急忙写了一首优美的十四行诗来弥补这个错误。^⑩

2月底，道格拉斯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发脾气——甚至比在伯恩茅斯的时候更猛烈，巴巴科姆的规章制度崩溃了。一切究竟是因什么而起，目前尚不清楚，可能也无关紧要。但这让王尔德感到震惊和不安。看到他深爱的男孩——他喜欢将其视为“阳光”——“身心”突然改换、变形，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简直令人震惊。道奇森似乎

及时赶回目睹了一切，他解释说，他和“莫德林的大多数人”都认为道格拉斯“有的时候……对自己的言行相当不负责任”。第二天早上道格拉斯离开了，王尔德下定决心，以此为标志结束两人之间的关系。他再也不想（他后来说）见到道格拉斯，再也不想和他说话了。

⑨

房子里一下子平静下来，让人感觉非比寻常。王尔德得以将思绪转到康斯坦斯身上。她在意大利旅行期间，两人每天都保持联系。她发现了（随身带着一本罗斯金的著作）托斯卡纳的艺术之美和罗马的辉煌，他一度陶醉其中。他每天给她写信，鼓励她相信他们可以一起在佛罗伦萨度过即将到来的秋天。然而，这一愿景却难以达成。⑩道格拉斯刚走到布里斯托尔，就“又写信，又发电报”请求和解。日后这将成为一个熟悉的套路。怒气一旦过去，波西似乎就完全将之抛到了脑后。对于王尔德来说，他的世界是由文字构成的，那些愤怒的侮辱之词会永远留在记忆中。但即便如此，他的决心还是动摇了。如安德烈·纪德所指，波西一次次地发泄完之后，王尔德尽管对这种“可怕”的场景感到痛苦，却有一种“被情人征服的痴迷快感”。⑪于是，他立刻心软了。他们相遇了，在进城的路，道格拉斯请求带他去萨沃伊。⑫

这是伦敦最豪华的旅馆，坐落在斯特兰德街附近，距王尔德离开牛津后的第一个住所非常近。它于1889年对外开放，极尽舒适与现代，是理查德·多伊利·卡特建造的，其资金来源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剧，以及王尔德的美国巡回演讲所获的利润。卡特安装了电灯和电

动升降机。里面浴室众多，设备齐全。塞萨尔·里兹担任经理，艾斯可菲担任大厨。道格拉斯似乎已经是那里的常客，他和莫里斯·施瓦贝在那里睡过几次。他通过多伊利·卡特的儿子卢卡斯攀上了这个地方。卢卡斯也曾经在温彻斯特和牛津上学，是经常与他寻欢作乐的另一个枕边人。这样的生活很昂贵。但王尔德现在从美国上演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赚到了钱，他希望《无足轻重的女人》能很快进入彩排。 ①

他们住在相邻的房间里，开始了一场纵情享乐的狂欢。虽然王尔德在铺张浪费方面并不需要什么鼓励，但道格拉斯还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在餐馆欠下了巨额账单。王尔德回忆其中有“清澈的海龟汤——卷曲的西西里藤叶包裹着美味的蒿雀”，以及“浓重的琥珀色，几乎散发着琥珀香味的香槟”。他发现，和波西一起“平平常常”在伦敦过一天，光是“日常开支”就极有可能花掉20英镑——“午餐、晚餐、夜宵、娱乐、双座马车等等”。王尔德原本打算在这里住几个晚上，结果他住了一个月，住在一个带起居室，可以俯瞰河流的套间里。道格拉斯来了又走，一连串的男妓们也是如此。泰勒又把王尔德介绍给了另外两个小伙子，查理·帕克和威廉·帕克兄弟。王尔德称，查理“是适合我的男孩”。其他男孩子也是一样。道格拉斯时常过来，总是不顾一切地让这两个年轻人在他的房间里过夜，旅馆服务员很有可能在第二天一大早看见他们还躺在床上。然而，王尔德并不想阻止这种放纵的做法。旅馆的侍童给他送信时，他坚持要亲吻他们，这让他们大为惊慌；尽管有一名侍童说：“他总是给我2/6的小费。” ②

当王尔德发现自己受到阿尔弗雷德·伍德敲诈——或“烦扰”时，这场欢乐的盛会便中断了，但并没有终止。这是道格拉斯的错，不过他拒绝承担任何责任。他带伍德到牛津去住了几天，伍德从那里偷走了几封信——有些是王尔德写的，有些是卢卡斯·多伊利·卡特写的。伍德后来声称，他是在道格拉斯送给他的一件西装口袋里发现的。这是一个严重的警报。王尔德不确定伍德持有哪些信件。那一封称波西“玫瑰花瓣一样的嘴唇”是为“疯狂的热吻”所造的信件，肯定会败坏他的名声。他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乔治·刘易斯来。这是他第二次就这样的事情向刘易斯咨询——尽管他很可能试图将这件事伪装成是受一个陷入困境的“朋友”之托，但刘易斯应该猜到了事实的真相。不过，他还是答应“马上”“解决”伍德的问题——并给伍德的住处发去了一封律师函。事实上，阿尔弗雷德·泰勒因把伍德介绍给王尔德而感到心烦意乱，最终是他促成了和解。他在小书院街将这两个人重新撮合在一起。伍德解释说，他之所以要钱，是因为他想去美国，为了逃离“某一类人”——两个臭名昭著的勒索者——他们想把他拉进他们的阴谋。王尔德接受了这个故事，并给伍德大约30英镑，以换取三封被盗的信件。他发现，“疯狂的热吻”那封信并不在其中。他拿不准是该放心还是该不安。被“烦扰”这件事情是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经历。尽管他看上去“安然无恙”（用道格拉斯的话来说），但这一事件标志着他的又一次堕落。他意识到，他已经开始失去刘易斯的“尊重和友谊”——这种友谊可以追溯到近15年前，它支撑并指导了他在伦敦的大部分生活。 ⑨

除此之外，其他关系也发生了破裂。经过一段时间的感情动荡和痛苦，格雷与他决裂了。这位年轻的诗人——在他遇到王尔德前不久——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但随后，他立即开始了他所谓的一种蓄意的“罪恶历程”，将自己沉浸在这个世界及其欢乐之中。那就是他作为王尔德忠实的门徒的那段时间。多年后，格雷向“迈克尔·菲尔德”吐露了他过去的一些生活，他明白自己在“奇异陋习”中的放纵程度非常有限——“与其说是罪恶”，不如说是“与罪恶对话”。但即便如此，它还是激起了反应。父亲的离世也许加深了格雷的懊悔。当然，王尔德对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日益迷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92年底，格雷似乎遭遇了某种严重打击。他向谢拉德坦白了对“死亡、疯狂、癫痫和其他恐怖事物”的恐惧之情。王尔德当时没有在他身边提供支持或帮助。他的位置很快被安德烈·拉夫洛维奇取代；他成了格雷忠实的朋友和保护者。尽管拉夫洛维奇的做法真的很慷慨，但他可能也很喜欢挖走王尔德最引人瞩目的门生这一想法。旧的关系很快就破裂了。格雷重新起草了《银点》的合同，不再需要王尔德帮忙。书中有一首诗是献给“奥斯卡·王尔德”的，但这是一种告别的姿态。3月16日，格雷写信给皮埃尔·路易斯，证实他“与奥斯卡断交”是“千真万确的”。^②

爱德华·谢利是另一个受害者。他来到萨沃伊酒店，哀叹自己失去了在博德利·黑德公司的职位。关于他和王尔德关系的谣言，在员工当中引发了下流的玩笑话，他们开始叫他“奥斯卡小姐”或“王尔德夫人”，这让埃尔金·马修斯蒙羞，导致他被解雇。他现在也下定决心与过去决裂，但他的萨沃伊之行并不顺利。他和王尔德吵了一架——也

许是因为王尔德对他调情。但就在几天后，当他的父亲把他赶出家门时（还是因为他与王尔德的友谊），他写信请求王尔德给他钱，并提供帮助。在伦敦文坛这个小圈子里，王尔德的所作所为即便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也称得上人人皆知的传闻。勒加利安和莱恩——尽管与王尔德保持着明显的友好关系——都敦促谢利与他断绝关系。❷

另一个被拿掉的人是莫里斯·施瓦贝。3月初，绝望的父母把他送到澳大利亚，希望他能在那里重新开始。他想加入教会。道格拉斯失去了他的“亲爱的宝贝”，他心烦意乱，给他写了几封热情洋溢的信——还附上了一个手镯（“亲爱的，请你不要取下它”）。不过，他很快就得到了安慰，因为他与罗比·罗斯建立了一段新的亲密友谊。王尔德让他们走到一起，他们立刻建立起了一种联系——似乎是基于他们对公立学校英俊男孩的共同偏好。❸

王尔德现在很少掩饰自己的品味或癖好。他变得越来越鲁莽。有人发现他在帝国音乐厅时，波西以一种非常“不当”的方式“压着他”。一天晚上，弗兰克·哈里斯在皇家咖啡厅的角落里偶遇他，他坐在两个“很普通”的年轻人之间（“事实上他们看起来像新郎”），这幅景象让他感到震惊。王尔德正在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关于古代奥运会的事情。这是一场充满激情的雄辩，展示了他华丽的口才，阳光下的古希腊摔跤场闪耀着生命的光芒——至少直到一个年轻人发问：“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是裸体的？”

“当然，”奥斯卡回答说，“裸体：身上只穿着阳光和美丽。”小伙子咯咯地笑着：“哦，天哪！”哈里斯和他的同伴都跑开

了。难怪昆斯伯里侯爵改变了对王尔德的好感，并再次要求波西断绝这份友谊。但是，波西对其置若罔闻。 ⑨

王尔德一直待在萨沃伊酒店——酒店方面越来越担忧——直到3月29日。 ⑩ 3月21日康斯坦斯从意大利回来时，他并没有回到泰特街欢迎她。离开萨沃伊酒店之后，他没有回家，而是搬到了阿尔比马尔酒店，以便下个星期干草市场剧院开始排演他的剧本时，他能到场。道格拉斯跟他一起来了。 ⑪ 一天早上，康斯坦斯从泰特街带来王尔德的邮件，流着眼泪找到他的房间，当时住在伦敦的皮埃尔·路易斯目睹此情此景感到痛心不已。 ⑫ 路易斯建议他回家，然而他回答称，自己离家太久，已经忘了门牌号码。 ⑬

2 与豹子同桌饕餮

阿朗拜太太：“您曾经试过要个好名声吗？”

伊林沃兹勋爵：“这是一个我至今还没遭遇到的烦恼。”

——奥斯卡·王尔德《无足轻重的女人》

王尔德借排演准备《无足轻重的女人》，把自己的冷酷无情埋藏了起来。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他经常出现在剧院里。当特里被问及该剧是否已经在“王尔德的协助下”排演时，他回答说，“是在王尔德的干扰下”。排练过程中当然有气氛紧张的时刻，但也有很多有益的合作。王尔德接受建议，对剧本做了许多删减，并对文本进行了几次生动的补充。特里惊讶地发现，他会“躲到剧院的某一个角落里，然后很快就带着一个充满智慧和警句的全新场景现身”。他还增加了一些风趣的内容。一天早上，一声可怕的撞击声打断了排练，王尔德当场做出反应称，撞击声只是A.H.琼斯“失败了”的对话的一部分。

那是一段欢乐的时光。王尔德经常和慷慨大方的特里及其他演员在下摄政街的大陆酒店共进午餐。这出剧中有他的朋友“伯尼”·比尔，她在剧中扮演阿巴斯诺特太太。特里很享受扮演伊林沃兹勋爵的角色。比尔博姆·特里踏入戏剧生涯的第一部戏是《猫在哪里》，他在其中模仿王尔德。他现在可以更充分地描绘出王尔德作为一个机智而愤世嫉俗的同龄人的举止。他的表演已经超越了舞台。他会把王尔德即兴的俏皮话记在本子上，以便日后使用，他甚至开始根据这些俏皮

话创作自己的变体。“啊，”王尔德说，“亲爱的赫伯特一天比一天更像奥斯卡了；这是自然模仿艺术的出色事例。”

这种模仿也许需要更进一步。当演员兼经理斯夸尔·班克罗夫特询问特里是否适合出演这个角色时，王尔德言不由衷地回答：“适合？不。”“肯定不坏吧？”班克罗夫特反问道。“坏？不。”“那么就是一般了？”“不，不一般。”“那么他究竟怎么样呢？”“绝对保密……但是您不会再问一遍了吧？”“一个字也不会。”“那我就悄悄说给你听。特里将成为……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件事情……他还是特里。”^②

4月19日的首演之夜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魅力相当。因为是星期三，议会没有举行会议，所以很多政治“名人”都能到场。撇开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所有分歧，贝尔福和乔治·温德姆以及格罗夫纳伯爵夫人都坐在王尔德的包厢里。西里尔·弗劳尔——最近被封为巴特西勋爵——坐在对面。乔治·刘易斯、伯恩-琼斯、阿尔玛·塔德玛、乔普林太太、柯南·道尔、勒加利安，甚至斯温伯恩都出现在名流如云的现场。威利也出席了。

观众显然喜欢这出戏。演出结束时，有人呼唤作者——然而王尔德上台鞠躬致意时，欢呼声中夹杂着一些“嘘声”。没有人说明其中的缘由：有人认为，赫斯特·沃斯利的台词“英国社会”“就像一个身穿紫色衣服的麻风病人……一个涂上金色的死人”，这句话可能冒犯了正厅后排观众的爱国情感。“众神们”召唤王尔德回到台上发言。不过，考虑到外界对他“褒贬不一”，他拒绝了。最后，出场的是特

里，他宣布王尔德已经离开了现场，他为自己能与“这样一部艺术作品”结盟而感到骄傲。❶

王尔德到后台祝贺演员们，大家也向他表示祝贺。他热情地对特里说：“我一直认为，对于我的戏剧，你是最好的评论家。”“可是，”特里说，“我从未评论过你的戏剧。”奥斯卡得意地回答：“这就是原因。”媒体再次蓄意给出了缺乏善意的回应。他的一位朋友发现，“评论家们是如何攻击温和的奥斯卡的”。除了《世界》杂志的威廉·阿彻和《演讲家》杂志的A.B.沃克利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没怎么提起这出戏。他们只是在辱骂奥斯卡”。但即使是怀有敌意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部戏会大受欢迎。当威尔士亲王观看了第二晚的演出之后，这出戏的前景便更加明朗了。有报道称，他告诉王尔德“一行字”也不要修改，而王尔德的回答是：“陛下，谨遵您的命令。”——王尔德后来又评论道：“多么了不起的国家，连亲王都理解诗人。”❷很明显，王尔德重现了《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魔力。由于场场满座，再加上有利的版税安排，王尔德有望每周赚到200英镑——远远超过他第一次获得成功时的收入。❸

但那一刻的兴奋立刻被戳破了。首演的第二天，特里递给王尔德一张纸。这封信是有人在大街上交给他的，上面写着：“请将此信交给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并劳驾您（签名难以辨认）。”特里指出，信中表达的情绪可能会招来误解。这封信是王尔德“疯狂的热吻”信的副本。特里认为这封信可能带来“危险”，但王尔德假装漫不经心笑了笑称，这是一首“散文诗”，“如果写成诗歌的样子，也许可以收

录在《名诗金典》这样受人尊敬的集子里”。“是的，”特里回答道，“但是它不是诗。”王尔德回答：“这毫无疑问正好解释了它为什么没在《名诗金典》里。”然而，这种漫不经心是装出来的。王尔德知道，随之而来的便是索要钱财。不久，有个人在街上向他走来，想谈一谈他手里的一封信。王尔德声称自己忙于演出，无暇顾及这类事情。他需要时间。❶

他和道格拉斯两人按照特里的做法，制订了一个计划。这封信——其中提到了雅辛托斯和阿波罗——的热烈之情溢于言表，与其说是一次常规的交流，倒不如说是一部文学作品。它过剩的艺术气质可以转化成优势。他们请皮埃尔·路易斯将这些文字转换成一首十四行诗——王尔德的“散文诗”的法国诗歌版本。它可以拿来出版发表，不是在《名诗金典》，而是在《灵灯》杂志上。他们想要通过公开这封信，寻求摧毁它的破坏力。没有人会因为发表了一首诗而遭到敲诈。路易斯——尽管他越来越担心王尔德与道格拉斯的关系——同意承担这项任务。仅仅两周之后，他的译文就出现在5月号的《灵灯》上，标题是：“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写给朋友的散文诗信件，由一位无足轻重的诗人翻译成押韵诗”。

王尔德已经做好了准备，几天后，泰特街（他终于回到那里）来了一个访客。晚上8点45分左右，就在晚餐前不久，王尔德的仆人说有一位艾伦先生在门厅，“有点特殊的事情”想要见他。王尔德下楼去见来访的人。他后来告诉弗兰克·哈里斯，从这个人的举止可以看出，“真正的敌人”来了。艾伦先生说，自己手里有一封王尔德的

信，他可能想要回去。“我想，你指的是我写给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那封漂亮的信，”王尔德说，“如果你没有愚蠢地把一份抄件交给比尔博姆·特里先生，我很愿意为这封信付给你一大笔钱，因为它把它看成是一件艺术品。”他的虚张声势令人难忘；王尔德后来承认，整个过程中，“我的身体似乎因恐惧而变得虚空”。艾伦说：“人们可以对这封信做出一种非常稀奇的解释。”“当然，当然，”王尔德轻松地回答，“犯罪阶层是难以理解艺术的。”艾伦挑衅地反驳道：“有人为这封信开价60英镑。”王尔德说：“那你就答应他吧。60英镑是个不错的价钱。对于这种长度的散文，我自己从未拿到过这么高的稿酬。但我很高兴，在英国有人愿意为我的信出这么大一笔钱。”艾伦虚弱地回答说，那个人“不在伦敦”。王尔德强调了自己的优势所在，他说：“他肯定会回来的，而我一点也不关心这封信。”当王尔德想结束这次会面时，艾伦改变了态度，开始辩解说自己很穷，为了找到王尔德花掉了很多钱。王尔德给了艾伦半英镑，以减轻他的“痛苦”，同时向他保证他真的对这封信丝毫不感兴趣——事实上，这封信很快就将被发表在“一本令人愉快的杂志”上。他又说：“我会给你寄一份的。”

尽管双方分手时王尔德表现得很勇敢，但这次会面还是让他倍感恐慌，心里充满“说不清的忧虑”。五分钟以后，又响起敲门声，他的神经越发紧张了。来的是一个名叫克里伯恩的年轻人。他是为了“艾伦的一封信”而来的。“我不想再为那封信的事情操心了，”王尔德告诉他，“我才不在乎呢。”令王尔德大为吃惊的是，克里伯恩随即从口袋里掏出这封信说：“艾伦让我把它还给

你。”“他为什么要还给我呢？”王尔德漫不经心地问。“他说你待他很好，这样千方百计‘烦扰’你是没有用的。你只会嘲笑我们。”王尔德看了看那份皱巴巴、脏兮兮的信，说：“我觉得你们没有更好地保存我的手稿，这实在不可原谅。”他接受了克里伯恩的道歉，也给了他半英镑，然后道：“恐怕你过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邪恶生活吧。”克里伯恩说：“王尔德先生，我们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王尔德答道：“你是一个天生的哲学家。”^⑩

这件事令人担忧，但王尔德似乎化险为夷了。随着事件的消退，他从中获得了一种力量感，甚至是一种情欲的兴奋：他战胜了“胆大、诡计、令人着迷的”黑豹们。然而，有关这次会面的细节开始流传开来，为流言蜚语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关于王尔德性品味和性冒险的谣言传得越来越普遍。^⑪然而，有的人仍然对此持怀疑的态度。有很多人——包括“朋友和朋友的朋友”——都否认了这些传闻，认为它们只是他装腔作态的一部分：“那只是奥斯卡……他嘴上说一套，但不会做那一套。”对其他人来说——更世俗一些——他的性品味只是一个好玩的话题，仅此而已。他私下里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情。^⑫

如果真的有一些老朋友开始疏远，那么新的朋友很快就会取代他们。年轻演员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围在王尔德身边，对他赞不绝口，甚至是充满崇拜。但也有新兴一代的艺术家和作家，他们——除了钦佩之外——提出了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东西。威廉·罗森斯坦回到英国，到了伦敦。在《无足轻重的女人》的彩排过程中，王尔德结识了特里

身材矮小的同父异母弟弟马克斯·比尔博姆，当时他还是牛津大学的一名本科生。作为作家和漫画家，比尔博姆是一个非常早熟的天才，他对王尔德怀有一种崇拜，借鉴了他的风格、智慧和姿态。不过，这种崇拜总是带有一种颠覆性的意味。他问他的朋友雷吉·特纳：

我跟你说过餐厅里奥斯卡的事吗？他点了一份豆瓣菜三明治，食物及时地端上来了：不是他说的那种又薄又透明的绿色的东西，而是一种非常结实、令人满意的食物。他假装厌恶（但显然是津津有味）地吃完了，当他付钱给服务员时，他说：“请转达奥斯卡·王尔德对这家餐厅厨师的敬意，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三明治，我要的是豆瓣菜三明治，不是中间有一块田地的面包。”

王尔德放任享用的不仅仅是食物。“我很遗憾，奥斯卡喝得太多了，”比尔博姆说道，“说实在的，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在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遥不可及的仰慕和崇拜之后，他已经醉得不可救药了……我想他会在演出的第一天晚上死于中风。”比尔博姆为《英美时报》撰写的一篇恶搞文章——《一个美国人笔下的奥斯卡·王尔德》就是以这种讽刺好笑的评价口吻写成的。王尔德说它“无与伦比地辉煌”，即便这篇文章中的讽刺轻微地触痛了他。❶

21岁的艺术家奥布里·比尔兹利也同样早熟，喜欢做讽刺性的评价。他是罗比·罗斯最近的新“发现”。比尔兹利当时刚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就用钢笔和墨水创作了一幅非凡的作品，描绘了《莎乐美》情节中的高潮部分。王尔德对公主准备亲吻施洗者约翰被砍下的头颅，那幅高度“日本式”风格的画作印象十分深刻。他同时也被这位艺术

家棱角分明、消瘦而又泰然自若的形象所打动。为了答谢他们两个人，他送给比尔兹利一部法文版剧本，上面题写着“1893年3月。赠予奥布里：除了我之外，唯一知道七重纱之舞是什么，并能看到那无形之舞的艺术家。奥斯卡”。^⑨

王尔德立刻开始考虑是否可以请比尔兹利当自己作品的插图画家。当月，格雷的《银点》正式出版，里基茨为它设计了精美的封面，正文排版稀疏，页边空白处很宽。艾达·莱弗森建议王尔德更进一步，写一本“只有页边空白的书；里面充满了没有写下来的美妙思想”。王尔德欣然应允，对她说：“这本书应该献给你，那些没写出来的文字应由奥布里·比尔兹利绘制成插图。应该为特定的朋友印刷五百本签名本，再印刷六本给普通大众，一本给美国人。”不久之后，王尔德说服马修斯和莱恩推出了英文版《莎乐美》，由比尔兹利提供十幅钢笔画插图和封面设计。^⑩

这份委托并不意味着王尔德抛弃了里基茨和香农。他们当时仍然参与着他的其他出版项目。尽管王尔德对逾期付款和广告预算有些不满，但莱恩和马修斯对书籍的处理方式令他大为赞叹，于是他与博德利-黑德公司进行一番商议之后，决定由他们出版他的全部作品。除了英文版的《莎乐美》，还要推出一系列统一版本的王尔德戏剧作品——《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无足轻重的女人》《帕多瓦公爵夫人》（薇拉似乎已经被淡忘了）——封面全部由香农设计。《帕多瓦公爵夫人》尚未在英国演出，由王尔德的朋友、美国诗人埃德加·福西特为其作介绍。人们还设想，里基茨一旦完成了《斯芬克斯》的创

作，将为《W.H.先生无可比拟的历史》设计封面和首字母。这个计划——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似乎将成为王尔德的一份令人赞叹的，永恒的文学成就。❶

然而，道格拉斯抢先了一步。王尔德在牛津度过了连续几个周末，住在道格拉斯和他的朋友恩科姆勋爵合住的高街的房屋里。《灵灯》小团体的成员几乎每晚都为他举行宴会。王尔德很高兴回到母校，周围都是热情的年轻听众。他给他们讲了几个关于自我牺牲的讽刺故事：莉迪亚和梅特卢斯是一对贵族恋人，是早期教会的皈依者，他们作为基督徒被判死刑，尽管他们已经各自在监狱里对信仰失去了信心，但他们都认为即便放弃宗教也不可能拯救自己，而且这样做还会伤透对方的心。“于是，到了行刑的那一天，莉迪亚和梅特卢斯被丢给竞技场中的野兽——就这样，他们都为自己并不相信的信仰死掉了。”他还讲了一个关于教宗约翰二十二世的故事，他在前往和情妇幽会的路上，坐进了一个小教堂的忏悔室，听到一个企图暗杀他的人发出忏悔。教宗向杀手保证，上帝会原谅他犯下的这一重大罪行，然后继续前往幽会。当他拥抱情妇的时候，刺客从暗处跳出，高举匕首刺向了他。“他呻吟着倒在地上——即将死去。然后，他竭尽最后的力量，望着那个袭击他的人，说出了告解时的最后一句话：‘我给予你所求的赦免。’”

王尔德在牛津现身招来了本科生期刊《蜉蝣》的讽刺攻击，该杂志在划船竞赛周期间，连续几天出版。两位编辑中的一位（阿瑟·坎利夫）撰写了一篇名为《奥西恩野人的新剧》的恶搞文章。（“尽管还

没有情节，但它像往常一样进展得又快又顺利。奥西恩戏剧中的情节是经‘最后润色’才出现的”，等等。）这篇讽刺文章虽然语气温和，却将剧作家描述为“一个有着粗劣体格和更粗劣的思维习惯的人”，这种“恶意的”嘲弄激怒了道格拉斯，他对之后的几期杂志做出了“全面回应”。两位编辑道了歉，但坎利夫为自己使用“粗劣”这个形容词做了一番辩解，称它反映了王尔德在作品中显露出来的“精神倾向”。

尽管如此，汉密尔顿·格兰特（坎利夫的编辑同事）还是同意在道格拉斯的房间里共进晚餐，与王尔德见个面；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很快就被征服了。王尔德非常讨人喜欢地对他说：“我听别人说，你叫‘格拉格’。但这太糟糕了。不能再这样叫下去了。我们得给你起一个新名字，一个漂亮的、配得上你的苏格兰名字。”晚餐结束时，格兰特拿出一根雪茄（以区别于那些一直抽着金头香烟，“衣着光鲜的娘娘腔”），王尔德让大家安静，并说道：“你简直太可怕了！不过，我们应该管它叫栗色香烟——你抽吧。”在圣吉尔斯街的房间内另一次晚餐之后，二楼阳台上的王尔德吸引了一小群喧闹的市民，他们喊着：“霍斯卡——给我们来一次演讲吧，豪斯卡，豪斯卡，霍斯卡，霍斯卡！”格兰特和一个朋友驱散了人群。两人回来时，王尔德冲着他们欢呼道：“你们简直太棒了——你们是巨人——有思想的巨人。”^②

有思想的苏格兰巨人并不是牛津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在道格拉斯的寓所里，有一名17岁的男仆，名叫沃尔特·格兰杰。很难想象道格拉

斯没有和他发生过性关系；王尔德在他定期的周末拜访中当然会这么做。格兰杰后来讲述了在连续几天的时间里，当他端着一杯早茶去王尔德的卧室时，王尔德先是吻了他，然后便玩弄他的“私处”，最后引诱他躺在床上，“他把他的阴茎放在我的两腿之间来满足他自己”。在一次这样的会面之后，王尔德给了格兰杰10先令，向他强调了谨慎的必要性。然而，他自己的行为却一点也不谨慎。⑨

皮埃尔·路易斯对于在伦敦见到的一切感到不安。他根本不喜欢道格拉斯，也不赞成他和王尔德的关系。即便在王尔德吹嘘自己“一生结过三次婚，一次是女人，两次是男人”之前，阿尔比马尔酒店那几个公用的（或相邻的）卧室的性质就已经令人毫不怀疑了。然而，比这种无所顾忌、大肆招摇的做法更糟糕的是，路易斯目睹了王尔德对康斯坦斯的轻率残忍。他把这些担忧告诉了亨利·德雷尼耶，而亨利·德雷尼耶很快就告诉了别人。龚古尔在4月30日的日记中幸灾乐祸地写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当人们提到奥斯卡·王尔德的名字时，德雷尼耶说），‘好吧，他自己也没打算隐瞒。是的，他承认他是个男同性恋……他的戏剧在伦敦大获成功后，他离开了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一家酒店里，和一位年轻的英国勋爵同居’。”

在这座闲话盛行的城市里，王尔德的性取向从此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龚古尔怀疑他的鸡奸行为是对魏尔伦的一种致敬——如果算不上剽窃的话（王尔德经常称颂魏尔伦）；或者他这么做是对龚古尔自己的小说《浮士德》中堕落的英国贵族“安南代尔勋爵”的致敬。关于王尔德在与男性的性关系中是“主动”还是“被动”，存在很多争

论——大多数人认为是前者；尽管有评论说，他肯定是“被动的”，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男人“才会得到他和女人在一起时享受不到的乐趣”。^①

然而，对于路易斯来说，王尔德的行为才是真正痛苦的根源。5月底王尔德在法国时，路易斯去酒店拜访他，敦促他断绝与道格拉斯的联系。那是一次徒劳的面谈。王尔德被迫在路易斯和波西之间做出选择——如他后来所说——他“立刻选择了更卑鄙的本性和更卑劣的思想”。“再见，皮埃尔·路易斯，”王尔德在会面结束时悲伤地说，“我曾经希望自己能拥有朋友；但从现在起我就只剩下爱人了。”^②

3 短暂的夏日

为现在和未来而活。

——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很快回到英国，满足了苛刻的情人的各种要求。道格拉斯称病未能在那年6月取得学位。尽管王尔德祝贺他——像斯温伯恩一样——选择了终身做本科生，但他的父母和学校方面都很失望。他需要分散一下精力。在道格拉斯的催促下，王尔德租下了“别墅”，一座位于戈林、风景如画的泰晤士河边的房子。人们认为王尔德可以在那里工作：他为黑尔所作的剧本并不像《蜉蝣》杂志所写的那样有了进展。然而，王尔德最看重的似乎是确保舒适和奢华。他让道格拉斯监督订购各种用品，并且雇（八个）仆人；前者包括大量香槟，后者中既有昆斯伯里家族的老管家，还有来自牛津的年轻人沃尔特·格兰杰。^①

那年夏天酷热难耐，在河上游玩是件愉快的事。王尔德备齐了平底船、小艇和独木舟；他认为打网球太累人，于是还准备了槌球。康斯坦斯带来了西里尔，还有一个家庭女教师。从伦敦和牛津来的客人络绎不绝。阿瑟·克利夫顿和他的妻子来了。年轻的未来诗人西奥多·拉蒂斯瓦夫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周末。波西的大学同学接二连三地赶来，于是威利——和他的朋友，“迷人的丹”——被迫推迟了行程，因为房子里已经人满为患。奥斯卡以他一贯的慷慨，在听说威利抽上了美国烟时，假装惶恐地说：“我非常痛苦……你其实不该做这

么令人恐怖的事情。迷人的人儿应该抽金过滤嘴香烟，要么就去死，所以我在此附上一张小纸片，草率从事的银行家也许会付你钱，因为我不想让你死。”乔治·格罗史密斯和他的妻子在附近有一栋房子，他们经常参加槌球聚会和晚上的“戏剧演出”。7月初的皇家赛船会期间，河上放起了“超级美丽的烟火”。^①

但是，尽管如此，气氛仍然十分压抑——有时候简直令人窒息。天谴一般的雷暴会不时打断酷热。仆人们除了糟蹋香槟酒（这让王尔德很是开心）之外，无法在一起相处。类似的事情频频发生。在克罗默家度过一年舒适的家庭生活之后，康斯坦斯感到自己已经被排斥在道格拉斯掌控的氛围之外，周围全是他的欲望，他的朋友，他的要求。她抱怨奥斯卡“对别人那么好”，对自己却“那么冷漠”。她最终选择离开，留下了西里尔和他的家庭教师。^{②③}

她不在的时候，人们日夜纵酒狂欢。一天，牧师前去拜访，发现王尔德身裹一条浴巾坐着，而波西则一丝不挂地躺在草坪上。他们一直在用水管互相滋水降温。可怜的牧师目睹这幅“彻头彻尾的希腊式景象”，满脸通红地走了。王尔德经常和沃尔特·格兰杰睡在一起，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其他仆人知道了，成为楼下的流言蜚语。家庭教师格特鲁德·西蒙兹万分惊讶地发现，赛船会那天晚上，王尔德竟然把胳膊搭在船童的肩膀上。当地人也不认同“别墅”里人们的种种做法。村里弥漫着敌意：当地酒馆老板回忆，有人想揍王尔德一顿。回到伦敦，关于戈林生活的“各种怪异故事”开始流传开来。^④

王尔德试着工作，但并不是很投入。他什么也没有做成。他对里基茨坦承：“河神引诱我去划一艘加拿大独木舟，流连于水上。它像一朵花一样有优美的线条。”他对伦道夫·丘吉尔夫人说，他的进步受到了阻碍，因为他“还没有笔！”波西总是让人分心。他又开始大发脾气，王尔德已经见怪不怪。事后，他提醒道格拉斯——在经历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之后——“我们站在平坦的槌球场上，四周是一片漂亮的草坪，（我）向你指出，我们正在互相作践对方，你绝对是在把我往绝路上推，而我也明显地没让你真正幸福，一刀两断才是上策，午餐后你闷闷不乐地走了，给管家留了一封最恶语伤人的信，要他在你离开之后交给我。”但是，果然“不出三天”，波西就从伦敦发来电报请求原谅。当然，王尔德原谅了他。① 为了鼓励道格拉斯从事创作，以便在作品上共同署名，王尔德建议波西为计划中的英文版《莎乐美》做翻译。王尔德交给他一个任务，然而他迟迟没有动手。

据王尔德估计，戈林的奢华生活每月大约要花费445英镑——似乎可以靠《无足轻重的女人》持续获得成功来作为支撑。8月14日，王尔德前往伯明翰，参加该剧夏季巡回演出的首演，刘易斯·沃勒饰演伊林沃兹勋爵。两天后，王尔德和波西去伦敦观看干草剧院的最后一晚演出。随后，他们同罗斯、比尔博姆和比尔兹利共进晚餐。比尔博姆对特纳说，王尔德不仅喝得醉醺醺，而且“一副愚笨的样子”：“他说比尔太太‘就像是朱诺’，肯布尔就是‘奥林匹亚山神’，还在自己头上一圈又一圈地挥舞着香烟。当然，我愿意看到一个放肆而不冷静的奥斯卡，但是……但我还是觉得很反感。”②

如果比尔博姆认为王尔德状态糟糕，那么王尔德其实也这么认为。他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心。也许就在此时，他请教了伦敦著名耳科专家威廉·丹比爵士。尽管王尔德似乎患有中耳感染和一定程度的听力障碍，但丹比安慰他道：“只要照顾得当，他完全不可能失去听力。” ②

8月底，在医生的鼓励下，王尔德去布列塔尼海岸的迪纳尔住了两个星期。他独自旅行——用他后来的话说——需要从被道格拉斯陪伴的“可怕压力”中解脱出来。然而，他“隐居和休息”的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他被卷入了一场“狂欢”，而且很快就开始抱怨自己来得太晚了。他参加了他喜爱的艾梅·劳瑟的客厅表演。生活的变化和海边的空气给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可能性。他对一个在海滩上与他搭话的记者说：“我正在考虑出版一本名为《奥斯卡语录》的格言集，思想界可能会接受，也可能不会接受。我的想法是，每一天都应该以一个新思想、新想法开始，‘昨天’应该成为过去。忘掉过去的一切不愉快，为现在和未来而活。” ③

王尔德努力体现自己的哲学。年轻律师沙特尔·拜伦记录了那年夏天，他在迪纳尔一场简朴而传统的家宴上与王尔德邂逅的情景。“当时有很多关于王尔德的不愉快谣言，”拜伦回忆道，“我对他抱有强烈的偏见。他的外表并不讨人喜欢，沉重而富于肉感；可是他一开口，整个脸都亮了起来，人的面貌改变了，他的性格似乎变了。”眼前的一切抹去了过往。尽管王尔德让所有人“着迷”，但他并没有独自出尽风头：他的机智和“智慧”都来自“普普通通的交谈”。他对

勃朗宁的所谓“晦涩”做了一番评论，令人难忘。他解释说：“你必须记住，每一个伟大的真理都是难以理解的。如果大师为了取悦听众，把真理稀释成弟子的水平，那么它就会流行起来，最后便消失殆尽了。”拜伦觉得他的建议很有趣：与其从梯子的最底层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不如“从顶层开始，坐在上面”。^⑨

王尔德经由泽西岛回到英格兰，那里正在巡回上演《无足轻重的女人》。他离开期间，道格拉斯完成了《莎乐美》的翻译：然而不幸的是，王尔德对此无动于衷。译文中充满了“学生气的错误”（例如，“On ne doit regarder que dans les mirrors”被译成了“不能朝镜子里看”，而不是“应该只从镜子里看”）。道格拉斯一直为自己的努力感到“相当自豪”，无法认真地接受批评。接下来便是一如往常的愤怒和谩骂信件。道格拉斯在其中一封中称，他对王尔德“没有任何心智上的亏欠”。他拒绝接受王尔德的更正。他在写给约翰·莱恩的信中写道，自己不打算再参与这件事情了，“我不能允许自己的作品被篡改和编辑，从而变成一台只会干翻译粗活的机器……我的个人意见是，除非奥斯卡本人翻译，否则他是不会满意的”。然而，似乎是比较利己自告奋勇承担了翻译工作，王尔德同意让他试一试。^⑩

王尔德需要专注于自己的文学事业。他迄今还没有为黑尔写喜剧，尽管最初的截止日期已经过去了，媒体已经透露了关于这出戏的消息。为了促使自己投入工作，他在圣詹姆斯广场的一家私人酒店订了房间，作为他每天离家工作的地方。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富成效

的环境；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完成了《理想丈夫》的第一幕。但是，这个圣所很快就遭到了入侵。他最初因翻译《莎乐美》而燃起的怒火已经消退，波西每天中午都来，“抽烟聊天直到一点半”。然后——正如王尔德后来对他所说的那样——“我不得不带你去皇家咖啡馆或伯克利餐厅吃午饭。午餐加上甜酒，一顿饭通常吃到三点半。你到怀特俱乐部歇了一个钟头，等到了下午茶的时候又来了，一直要待到换衣服用正餐的时候。你同我用餐，要么在萨沃伊酒店，要么在泰特街。我们照例要到午夜以后才分开，因为在威利斯饭店吃过夜宵后，这销魂的一天不收也得收了。” ⑩

王尔德当然同意这样的消遣，而且也很享受。他一直觉得，轻而易举就能让自己疏于工作。在寻欢作乐的同时，他很快就将在迪纳尔下定的决心忘得一干二净。查尔斯·帕克定期来圣詹姆斯广场约会。同时他还结交了新朋友。王尔德——和道格拉斯一起——经常见到富有的未来小说家乔治·艾夫斯。艾夫斯是一个热爱板球的希腊人，也是男人们的忠实情人，他决心建立一个秘密团体，推广他理想中的同性恋“新文化”，或者他所谓的“事业”。该协会被命名为“喀罗尼亚会”，以纪念公元前338年的一场著名战役。在那场战役中，一支由男同性恋者组成的底比斯军队被马其顿人全部歼灭。作为第一步——“获得了母亲的许可之后”——艾夫斯剃掉了胡子，理由是它过于“反希腊”。尽管艾夫斯发现王尔德和道格拉斯都是一副让人捉摸不透的样子，他还是希望将这两个人纳入他的新协会。 ⑪

王尔德那种切切实实的不严肃令艾夫斯大为困惑。在萨沃伊酒店的一次小型晚餐会后，他在日记中烦躁地写道：“（奥斯卡·王尔德）对我来说是一个谜，他好像生来就是个老师，他要么不会，要么就会把他那套哲学的关键交付与人，我在掌握他的哲学之前是无法理解他的。他似乎没有目标，而我则目标明确。他表面上有着优雅的天性，才华横溢几乎无人能及，耀眼得像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然而他却传授了许多无法把握的东西，它们是如此虚幻，以至于毫无危险。”尽管如此，他认为王尔德“将带来巨大影响”。

道格拉斯肯定支持这个观点。他告诉艾夫斯的朋友查尔斯·凯恩斯·杰克逊“没有人能够像我一样了解”王尔德，他到底“为‘新文化’做了些什么，他把人们拉出火坑，‘看透’了世事，不仅用金钱，而且还在别人不理不睬的时候坚持自己的态度。他是世界上最侠义的朋友，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有勇气把手臂放在前科犯的肩膀上，和他一起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的人，再加上他的智慧和个性，他把一切都处理得那么好，没有人会介意”。艾夫斯觉得，道格拉斯非常招人喜欢。但他认为，道格拉斯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甚至警告他“正沉迷于同性恋，而且到了一种不管不顾和极度危险的程度”。他很可能“有朝一日遭到逮捕”。①

毫无疑问，道格拉斯最近的一桩“愚蠢行为”使他差点陷入灾难。涉及这起事件的是罗斯最近占有的一个17岁男孩，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男孩名叫克劳德·丹西，在布鲁日罗斯家一个朋友开设的一所“英语学院”上学。道格拉斯在男孩的上学路上将他从罗斯身

边“偷走”，安置在阿尔比马尔酒店，周末和他睡在一起。道格拉斯还出钱让男孩在星期一晚上同一个女人睡了一觉。丹西回到布鲁日时，已经晚了三天。他的迟到引起了校长的注意，经调查发现了丹西与道格拉斯和罗斯之间存在的“猥亵”关系——而且罗斯早些时候还勾引过校长的长子。丑闻迫在眉睫，一触即发。罗斯和道格拉斯前往布鲁日，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和解。丹西的父亲是皇家近卫队的一名上校，他想提起诉讼，但乔治·刘易斯（对罗斯来说，他似乎是在演戏）劝阻了他，律师指出，虽然肇事者“无疑会被判坐两年牢”，但他的儿子作为心甘情愿的共犯也要“被判六个月”。最后，在退回并销毁了各种涉案信件之后，这件事被按下了。但这是一件非常悬的事情。

● ●

这出好戏发生在那年10月，它使得王尔德和道格拉斯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王尔德前往加莱将波西从欧洲大陆“接回来”，为此被迫错过了劳埃德家族的婚礼。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并再次相互指责。然而，王尔德似乎从这起祸事中认识到，也许可以采取一种办法来打破两人之间情感上不断由疲惫到自我毁灭的循环：他说服道格拉斯，让他必须出国一段时间。罗斯被绝望的家人驱逐到瑞士的达沃斯，据说要在那里待两年，以避免比尔博姆所说的“社交旧病复发”。王尔德写信给道格拉斯的母亲，暗示波西从牛津回来后迷失了方向，并敦促她把他送出英国——到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勋爵那里住上几个月，“如果可以那么做的话”。 ●

昆斯伯里夫人欣然接受了这个想法。她对王尔德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把他视为一位善良的导师，而是一心只想要断绝他和她儿子之间的友谊。她意识到儿子一向很难相处，而且现在已经变得越发不可理喻，她将之归因于王尔德的影响。她也许听说过他们在伦敦生活在一起的谣言——她不知道波西早已立志献身于一种“异教”的不道德行为，因此她怀疑儿子扮演了“道林”的角色，而王尔德就是那个“亨利·沃顿勋爵”。她认为，王尔德是谋杀波西“灵魂”的“凶手”。事实上，她还告诉波西，她甚至想要因为王尔德的所作所为而谋杀他。不过，她写给王尔德的信还算比较温和，她只是想得到一个保证，如果道格拉斯出国，王尔德不会企图去那里看望他。王尔德被这一含蓄的指责激怒了，急忙向她透露了道格拉斯最近丑闻缠身的一些细节，指出这才是送走他的真正原因。王尔德坚定地表示，自己完全不想再见到她的儿子了。⑨

这是一个分手的时节。威利的离婚案在秋季有了结果，但美国媒体紧随其后地报道了他在纽约的所作所为：他在莲花俱乐部“简单粗暴地”模仿奥斯卡，并声称他计划“买一本二手的拉罗什富科《箴言集》”，然后“开办一家剧本工厂”来对抗他的兄弟。这些新的背叛让奥斯卡觉得无法原谅。兄弟俩断交了，这让王尔德夫人非常难过。

⑨

面对种种破裂，王尔德似乎倒是松了一口气。显然，一想到即将与波西分手，便让他精神为之一振。他重新融入了家庭生活，11月时单是一个星期便带康斯坦斯去了三次剧院（他们特别喜欢谢里登的

《丑闻学校》），与她在阿尔比马尔俱乐部共进晚餐，聆听了威廉·莫里斯关于印刷的讲座，还在泰特街举办了一场小型晚宴，这样的事情现在已经相当难得。当月，图书版《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面世，王尔德心情十分愉快。他收到一封阿德拉·舒斯特的信——在年轻女性朋友中，他特别喜欢她——感谢这出戏让她“度过了我人生中最喜爱的几个小时”。虽然迫在眉睫的新喜剧依旧被抛在一边，但他确实展开了一部“悬疑剧”的创作（几乎可以肯定是关于一个神圣的妓女，这部象征主义戏剧讲述了一个美丽的妓女在一名苦行隐士的影响下皈依宗教生活的故事——这名隐士则因她的美丽而被感官享受的世界所吸引）。康斯坦斯和朋友们对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转折感到既高兴又困惑。王尔德向妻子透露，这其中涉及了超自然力量：他在一次降神会上和父亲的灵魂进行了一番沟通——通过“叩击声”。^⑨

随着美国制作的《无足轻重的女人》即将在纽约上演，王尔德的美国经纪人伊丽莎白·马布里敦促他来参加首演之夜。她表示，这将极大地“促进”作品获得成功。王尔德可以在访问的同时，做一次短暂的巡回演讲，从而挣得“一大笔钱”。事实上，她摆出了如此多“令人信服、无法抗拒的”理由，以至于王尔德觉得自己根本不可能办到如此“合理”的事情。他拒绝启程。^⑩

他还要在伦敦监督出版遭遇麻烦的英文版《莎乐美》。出版商提议用“粗糙”、“平庸”和“目不忍睹”的布料装订该书的“普通”版，他必须加以制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问题。王尔德发现比尔兹利翻译的剧本甚至还不如波西的版本。据道格拉斯说，他称这份译

稿“一败涂地”，并决定“重新考虑一下，宁可接受我的翻译”。这是在罗斯的鼓励之下做出的一个决定，他一直敦促王尔德，不要在道格拉斯的文学事业刚刚起步之时，打击他的士气。这一逆转使得王尔德恢复了与波西的密切联系。所有的文字修改仍需协商，道格拉斯坚称，如果修改了他的作品，就不要将其名字放在标题页上。最后，王尔德想出了一个优雅的解决方案，在标题页上去掉道格拉斯，但将这本书献给了“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布鲁斯·道格拉斯勋爵，剧本的译者”。道格拉斯难得地让自己相信，此举具有“极高的艺术和文学价值”——这是“艺术家的赞誉与商人的赞誉的区别”。^⑨

比尔兹利的插图也同样引起了争议。由于一贯具有颠覆性，他悄无声息地在许多插图中加入了淫秽的细节，其中有生殖器形状的烛台，还有因明显勃起而扭曲了的衣服。王尔德抱怨道：“亲爱的奥布里的设计就像一个早熟的小学生在抄写本的页边空白处胡乱涂鸦。”有几幅插图中，由于男性角色的生殖器过于显眼，不得不用编辑手段去掉，以确保这本书可以在书店公开展示。莱恩断然拒绝采用其余三幅插图，导致比尔兹利只能用另外三幅画取而代之，为此他对罗斯说，这三幅画“太漂亮了，根本毫无问题”。这位插画家的讽刺行为已经超越了不雅，甚至还有夸张地模仿王尔德的意思：剧作家的样子被分别体现在希律王、预示希罗底到来的法师身上——更具争议的是，它甚至还显现在“月亮上的女人”身上（文中将其描述为“疯狂”、“醉酒”和“四处寻找情人”）。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围绕图片和翻译的紧张气氛引发了激烈的辩论。“我可以告诉你，我与莱恩和奥斯卡以及公司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时光，”比尔兹利向罗斯戏谑

地说，“在一周的时间里，上门的电报员和快递员的数量简直令人震惊。” ⑩

波西的虚荣心和坏脾气往往使压力重重的局面变得更加紧张。在经历了一件“令人相当反感”的事情之后——11月底——王尔德逃到巴黎，为了减轻折磨，他给康斯坦斯留下了一个“荒谬的”借口和一个假地址。在法国首都，他向卡洛斯·布莱克“倾吐了自己的灵魂”，布莱克对未婚妻说：“可怜的家伙……（奥斯卡）遭遇了很多让他不开心的事情，但我相信他伟大的乐观精神最终将战胜一切。” ⑪然而，王尔德的“伟大精神”必须与道格拉斯的固执己见相抗衡。虽然他觉得自己有能力不去理会那些“惯常的恳求和懊悔的电报”，但波西拿不去埃及当作威胁，并以此促成了和解。王尔德同意见面，而且“在巨大的情感影响下”同意原谅过去（但“对未来只字不提”）。这足以确保波西前往开罗。 ⑫

对王尔德来说，钉子终于拔掉了。因为无论是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他都下定决心再也不想见到道格拉斯了。昆斯伯里似乎因两人的分手而态度缓和了下来。 ⑬生活的节奏可以自我调整。他重新开始为约翰·黑尔写喜剧；尽管他“非常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说服那位演员经纪人这是一部“杰作”，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想要完成它。在戈林挥霍了整个夏天之后，他非常需要钱：“贪婪的债权人”在周围盘旋。令人尴尬的是有一次，屠夫拒绝在他结清账单之前，把一大块肉送到泰特街去。

道格拉斯离开后，他继续不时地和乔治·艾夫斯见面——显然，他至少在一个场合亲吻过他。那年11月，魏尔伦到英国举办一系列朗诵会，王尔德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艾夫斯“事业”的承诺，他自豪地带着这位诗人（魏尔伦是一名同性恋者，有犯罪史）四处游历。王尔德在格雷夫人举办的一个招待会上将他介绍给众人，并鼓励他背诵诗作《监狱》(D' un Prison)：这场表演形式简单，凄美而悲情，让老于世故的社交界观众流下了眼泪。❶过去的交情依然维系着。罗比·罗斯在12月偷偷溜回来，“一瘸一拐的，还长出了胡子！”，他当时正准备去凯特纳家吃饭。也许就在那个时候——为了协助王尔德完成《理想丈夫》——罗比·罗斯交给王尔德一沓警句，那是他1887年住在泰特街时，从两人的谈话中记录下来的。❷王尔德还尽力给卡洛斯·布莱克帮忙，后者与纽卡斯尔公爵发生了严重纠纷。公爵指责他玩牌作弊，布莱克觉得有必要起诉。王尔德与布莱克的律师商量办法（不幸的是，纽卡斯尔聘请了乔治·刘易斯），并寻求与纽卡斯尔面谈，以努力解决这个问题。❸

王尔德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回归了平静，以至于到12月底，他甚至觉得可以给波西写信了。波西一直从埃及连续不断地写来悔过信，恳求引起他的关注。“我最亲爱的孩子，”王尔德用一种淡淡的口吻写道，“当我知道我们又成了朋友的时候，我很快乐，我们的爱已经穿越阴影和疏远以及悲伤的黑夜，像从前一样镀上了玫瑰色的光晕。让我们永远无限地亲密吧，一如往昔。”道格拉斯远在两千多英里之外，如此说话似乎很安全。❹回到伦敦，王尔德沉浸在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的欢乐中。据格特鲁德·西蒙兹回忆，那年他在泰特街的餐

厅里，“开心得像个孩子”，一边分发圣诞布丁，一边玩着彩色拉炮。②

4 浪漫之敌

向全世界敞开自己的内心是不明智的做法。

——奥斯卡·王尔德

1894年初，王尔德收到反迷信组织十三俱乐部的请柬，邀请他参加1月13日在霍尔本餐厅13号房间举行的13道菜晚宴。他很快回信，表示遗憾不能参加，“我爱迷信，”他解释道，“它们是思想和想象的多彩元素。它们是常识的敌人。常识是浪漫之敌。你们社团的目标看起来很可怕。请给我们留点非现实吧。别让我们过分正常。”^①

对王尔德来说，工作即是当下的“非现实”选择。亨利六岁的女儿不幸去世后，他在吊唁信中写道：“工作吧，工作吧……那是我们这类人尚存的东西。工作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现实，而是一种消除现实的手段。”^②数月以来他第一次不再分心：能够集中精神，发挥他的想象力。《理想丈夫》继续朝前推进，他希望在1月底之前完成这部作品。^③

他认为这是一出告别的戏。当然，与他之前的作品比较，这部戏的情节更加丰富——展开了一个复杂且多方面的阴谋：英国内阁大臣罗伯特·奇尔顿爵士——标题中的所谓“理想丈夫”——受到诡计多端的女冒险家谢弗里太太威胁，除非他参与她邪恶的赚钱计划，否则就要将他年轻时做过的几笔可疑的金钱交易公之于众。虽然剧中的戈林勋爵——罗伯特爵士的好朋友（也是谢弗里太太的前未婚夫）——

也是个满嘴警句格言的花花公子，但王尔德遗憾的是，与他之前的戏剧不同，在这部作品中“没有哪个角色像我自己一样”。有时候，他指责所有的角色都是“一本正经的人炮制出来的，是可怕的客观存在”，并且担心评论家们会匆忙宣布，“哦，奥斯卡在这个剧本中变得不像他自己了！”但其他时候，他愿意承认自己一直在“全神贯注”地撰写这部作品，而且——在这部制作精良的情节剧的一切惯例之下——“它包含了很多真正属于奥斯卡的要素”。^⑩

这出戏中一些传统的方面也许会激发人们，想要去尝试一下其他不那么传统的形式和效果。虽然康斯坦斯在描述他的“神秘剧”时曾经说，它们“不是用来表演的，而是用来阅读的”，但王尔德似乎已经有了其他想法。他认为《圣妓》可以成为实验性的独幕“三联剧”的一部分。他向年轻的演员兼经纪人刘易斯·沃勒提出了这个想法，当时沃勒正在与乔治·亚历山大谈判《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在英国的巡回演出权，并且还在为巡演剧目寻找更多的作品。王尔德手里可能已经有了第二部作品——一部以文艺复兴为背景的无韵短剧，名叫《佛罗伦萨悲剧》。该剧和《圣妓》几乎已经完成，他有信心在3月底完成整个三联剧的剧本。^⑪

王尔德的脑海中流淌着各种计划，他还在考虑以《帕多瓦公爵夫人》在纽约获得“成功”为基础，另外写一个完整的历史诗体悲剧。他找到美国莎士比亚悲剧演员理查德·曼斯菲尔德，建议其接手《阿维尼翁的红衣主教》，那是他早在1882年就提出的想法。剧本尚未动笔，但王尔德重新起草了该剧的场景，描绘出一个爱情受挫、野心膨

胀、蓄意造假和激情自杀的故事。❶ 王尔德认为，曼斯菲尔德能够“出色地”完成这类作品。❷

在这一切略微的忙乱之中——除了创作的兴奋之外——他还迫切地需要钱。泰特街的用钱又一次紧张起来，好几份账单过期了：夏天在戈林还欠账13英镑。有人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伦敦非常危险，”王尔德抱怨道，“送传票的人夜里出来执行命令，债主们在拂晓时的吼声令人恐怖，掮客们得了狂犬病，到处咬人。”据报纸报道，《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上演两年，王尔德从版税中赚取了2000英镑。然而这无济于事，钱早就花完了。❸

英文版《莎乐美》于2月出版，表面上看，他似乎保持了文学创作力。在新闻界和公众看来，这本书浓缩了世纪末的颓废衰落。但王尔德不安地意识到，比尔兹利独树一帜的插图让这本书失去了平衡——如果算不上劫持的话。这是许多评论家提出的观点。王尔德也许曾经向里基茨承认“我很钦佩，（但）我不喜欢奥布里的插图。他们太日本式了，而我的戏剧是拜占庭式的”。而且私下里，他甚至可能承认厌恶它们。然而面对公众时，他表现出一种见多识广的热情。他带比尔兹利去观看《第二任坦克雷太太》，给扮演坦克雷太太的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写了一张纸条，询问能否把这位艺术家带到她的化妆室，在她的脚边放一份豪华版《莎乐美》。“他的画作，”王尔德称，“非常精彩。”❹

王尔德仍然时常和比尔兹利见面（比尔兹利给王尔德看了一幅他随后画的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画像），但两人的关系有些紧张。王尔

德愿意和这个少年老成的门徒为伍。“奥布里简直太像巴黎人了，”有一次他说，“他忘不了他曾经去过迪耶普——虽然只有一次。”他还说：“不要和奥布里坐同一把椅子。这样不会难堪。”他甚至将他比作“畸形的兰花”。然而，这些做法效果并不明显。比尔兹利也许会借鉴王尔德身上那些纨绔子弟的举止和机智（他称，手杖上的流苏不见之后，他便感冒了），但他的同化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他从来都不像是在附和“大师”。事实上，弗兰克·哈里斯经常看见比尔兹利和王尔德在一起，他认为，是王尔德更多地受到了比尔兹利的影响，而不是相反。他从年轻的艺术家里——经常被滥用——汲取了一种强化的“艺术气魄和自我主张”意识，以及对批评家和公众的“蔑视”。^①

比尔兹利的“轻蔑”有时候似乎甚至可以波及王尔德本人。王尔德当然意识到了这位艺术家狡猾的讽刺方式：将《莎乐美》搅得一团糟之后，他又炮制了一些类似的作品。一位评论家批评比尔兹利品味很差，他在为约翰·戴维森戏剧所作的封面插画中，其笔下的奇幻人物中竟然清晰可辨是王尔德的形象（被藤蔓树叶缠绕着）。对此，这位艺术家给报纸写了一封信，提出王尔德“肯定足够英俊美貌，即便是肖像画也经得起考验”。这样的花言巧语，虽然看上去很好玩，却意在激怒王尔德。一次吃午饭时，他宣布，从今以后只要比尔兹利在场，他就只喝苦艾酒：“苦艾酒之于其他饮料，就像奥布里的画之于其他画作一样。它是孤立存在的，与众不同；它像南方的暮色，闪着乳白色的微光；有一种奇怪的犯罪的诱惑……就像你的画一样，奥布里；让人心烦意乱，这很残忍。”^②

在王尔德与年轻的马克斯·比尔博姆的友谊中，也涌动着类似的暗流。事实上，在1894年的头几个月，比尔博姆正忙着写一篇关于王尔德的讽刺文章。这本书名为《窥视过去》，自称记录了对一位几乎已被遗忘的“老绅士奥斯卡·王尔德”的采访，这个人曾经“一度”逗乐了《笨拙》杂志的读者。书中充斥着广为人知的典故：“我被领进（他的）小书房时，我想我听到了迅速褪下的花呢裤子发出的窸窣声，但我看到主人正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虽然有些蓬乱，但精力充沛。”除了这些颇具威胁的闲话，事实上比尔博姆还在考虑将这篇文章刊登在约翰·莱恩计划于当年春天发行的一份名为《黄皮书》的新期刊上。比尔兹利担任期刊的美术编辑，美国小说家亨利·哈兰担任文字编辑。所有涉及这份期刊的人达成了一个共识，决定将王尔德排除在整件事情之外，这又是一道虽小但却伤人的裂口。

尽管伯纳德决不会在《笨拙》杂志中恢复对“伟大的唯美主义者”的“崇拜”，但艾达·莱弗森有时也会在作品中模仿王尔德。然而，她的语气更温和，她与王尔德的观点一致，即成功的戏仿“需要一种轻松的手法……而且，奇怪的是，还要热爱那位被讽刺的诗人。能够模仿一个人的是他的门徒，而不是别人”。王尔德当然也很欣赏莱弗森创作的“精彩”素描。尽管如此，这些作品还是以其微弱的方式让人们再次意识到，王尔德是一个可以被公众拿来嘲笑，甚至轻蔑的人物。❶

那年3月，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归来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地位。如果说双方的分离让王尔德感到如释重负，那么波西则充满了悔

恨和渴望。他开始写信请求完全和解。遭到王尔德拒绝后，道格拉斯说服母亲为他说情，努力让她相信，他与王尔德的关系不但不会有损于他的灵魂，而且对他的艺术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一招失败后，他又求助于康斯坦斯。尽管康斯坦斯个人不喜欢道格拉斯，也意识到他对王尔德性格产生了不良影响，但她还是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敦促丈夫回信。她沉浸在基督教的宽恕观念中，无法忍受看到他对一个“朋友”如此“不友善”。尽管如此，王尔德还是犹豫不决。直到道格拉斯匆忙赶到巴黎，从那里发了一封很长、很绝望的电报，似乎暗示着要自杀时，他才心软下来。他们在巴黎见了面，在混合着泪水和香槟的晚餐上，旧日的激情以其旧有的力量——及旧有的奢侈——重新燃起。王尔德计算过，他们在巴黎的八天共花费了近150英镑。等到康斯坦斯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一切都已经晚了。王尔德没有从巴黎写信给她，也没有向她告知自己的计划，这表明他的感情发生了决定性的重组。②

王尔德和道格拉斯回到伦敦，原本打算短暂地延续他们的欢乐和爱情。道格拉斯在开罗时，曾经收到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柯里勋爵提供的一个无薪外交职位，打算在6月接受这份工作。然而，在他们返回伦敦的第二天，昆斯伯里侯爵发现，王尔德和波西在皇家咖啡厅共进午餐。他看到儿子回到英国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感到非常震惊。尽管他当时没说什么——甚至还坐到了他们桌边——但他随后立即写信给波西，表达了不满，首先是对他懒散的生活方式，其次是对他“与王尔德这个人的亲密关系”。他要求立刻了结这段关系：

不然我就跟你断绝关系，不再给你供钱。我不打算花心思去揣摩这种亲密关系，我也不想做出指控；但在我看来，装出这副样子和确属事实的恶劣程度不相上下。通过你的态度和表情，我亲眼看到你们保持着最可憎和恶心的关系……难怪人们议论纷纷。我听说根据可靠消息，不过这也可能有假，他的妻子正在基于鸡奸和其他罪行申请离婚。这是真的吗？还是你不知道这回事？如果我觉得真有这么回事，而且已经为公众所知，我就算见面时一枪把他打死，也完全是正当的。这些信奉基督教的英国懦夫和男人，他们自称如此，该醒醒了。

你那讨厌的所谓父亲

昆斯伯里^②

道格拉斯不承认父亲有权对他发号施令。他没和王尔德商量就回了电报：“你是一个多么可笑的矮子。”他对这一回复非常满意：这句话是借用了当时的一首音乐厅歌曲——“哦，卡姆登镇的基克尔伯里·布朗，你是个多么可笑的矮子。”此举果然激起了预期的反应。昆斯伯里反击道：

你这个无礼的顽童，如果你再发来这种电报，或者还是无礼地对待我……我就要揍你一顿，那是你咎由自取……如果我再发现你跟那个男人在一起，我就要以一种你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制造一起公开丑闻了；这已经成为一桩私底下的丑闻。我倒宁愿将这丑闻公之于众，无论如何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责任不在我。除非你们断绝来往，否则我说到做到，停止所有对你的供养……你知道事情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②

王尔德发现自己深陷于一场冲突之中，敌对双方鲁莽而肆无忌惮，他对这两个人几乎无法施加影响，也无法予以控制。❶道格拉斯喜欢正面交锋。王尔德却不喜欢这样。幸好昆斯伯里太太让波西去佛罗伦萨，他得以舒了口气。当王尔德嫉妒他可以亲眼看见“乔托钟楼”，切利尼的“青铜和黄金的神像”时，道格拉斯却在向他的朋友凯恩斯·杰克逊打听臭名昭著的亚瑟·萨默塞特勋爵的地址——克利夫兰街丑闻发生后，他一直在流亡中——以及其他小建议，它们都事关“对美的永恒追求，这是我必须要做的！”❷

王尔德留在伦敦，心里想着他渴望的“金币”，迷失在“绝望的紫色山谷”中——然而，他通常对身无分文找上门来的爱德华·谢利很慷慨。“尽管他粗暴地背叛了我，我当然给了他钱，对他也很友好，”他向道格拉斯解释道，“我发现原谅一个人的敌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病态的乐趣；也许我应该克制一下这种举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让人恼火的事情。第一本《黄皮书》面世了，他不得不忍住火气，于是对道格拉斯说：“它很乏味，可厌，是个极大的失败。我很高兴。”这份杂志——其黄黑相间的封面由比尔兹利设计——确实引起了轰动，尽管有很多负面评论，但卖得相当好。上面没有刊登比尔博姆关于王尔德的随笔。倒是有他写的一篇自相矛盾的，为“化妆品辩护”的文章。王尔德认为它“很精彩……出了些令人愉快的错误，但很吸引人”。虽然王尔德既不是杂志的撰稿人，也不是其中的话题人物，但是在公众心目中，他与比尔兹利和颓废派的联系让许多人认为他也参与其中。事实上，有一篇评论甚至将《黄皮书》描述为“奥斯卡·王尔德的期刊”。❸

黑尔那里传来了关于《理想丈夫》的坏消息：虽然他看上去很喜欢这出戏，但剧本完成得太晚了，加里克剧院即将到来的演出季已经另有安排，无法确定什么时候能够上演这出戏。黑尔提出，如果双方不能就令人满意的未来安排达成一致，可以退还手稿。王尔德抓住机会，把剧本给了刘易斯·沃勒和他的搭档哈里·莫雷尔：不是作巡回演出用，而是要在伦敦上演。他们同意预付500英镑，并保证在1895年2月1日之前确定一家剧院上演。合作成功之后不久，好消息传来，马布里小姐也从丹尼尔·弗罗曼那里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预付款，出售了该剧在美国的上演权。❶

如此安排让王尔德在5月初得以赴意大利旅行。上一年，康斯坦斯曾希望同丈夫一起去佛罗伦萨；但王尔德却和道格拉斯在一起。不过，这次旅行是秘密的。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巴黎停留了几天。亨利·德雷尼耶在林荫大道上遇见他，见他身边有两个年轻人。但出于默契，两人彼此没打招呼。❷

在佛罗伦萨，王尔德经常和住在当地的伯纳德·贝伦森及其情妇（后来的妻子）玛丽·科斯特洛见面。玛丽带他去拜访老朋友维奥莱特·佩吉特（她现在用弗农·李的名字写作）和她的弟弟，残疾诗人尤金·李·汉密尔顿。“这次见面非常成功，”她告诉姐姐，“奥斯卡说起话来像个天使，大家都爱上了他——甚至包括弗农，李过去跟他是彼此反感的。就王尔德而言，他也被李迷住了。”他发现，她不像在伦敦初识时那么“坐立不安和倔强独断”。“奥斯卡，”科斯特洛解释说，“喜欢没有灵魂的人，或者是灵魂非常平静的人。”❸

事实证明，波西——一如既往——是一个制造分裂的人。玛丽·科斯特洛感觉到，在王尔德的魅力和才华之下，这个年轻人正在对他产生腐蚀性的影响；道格拉斯的贪吃和放纵“不知怎么地”把他变成了“一头可恶的野兽”。贝伦森在伦敦时就已经向王尔德表达了他对道格拉斯的厌恶（“那个可怕的人”），当他发现他们还在一起时，他感到很痛苦。他试图从中干预，告诉王尔德他正在寻求毁灭，但他的努力被“优雅的傲慢”拒绝了。王尔德结束了他们的会见——如果不是完全结束了他们的友谊的话——说道：“伯纳德，你忘了，我无论如何都想模仿我的造物主，我和他一样，除了赞美之外别无他求。” ⑨

王尔德要在5月底返回伦敦。他得到消息说，理查德·曼斯菲尔德认为《阿维尼翁的红衣主教》剧本“非常好”，可能有意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伦敦上演这出戏。他预定于6月1日抵达英国，急于和他见面。⑩道格拉斯即将愁云惨淡地陪同王尔德返回伦敦。柯里勋爵对道格拉斯迟迟不到君士坦丁堡大为恼火，已经撤回了那份工作。在佛罗伦萨的最后一天，他们遇到了安德烈·纪德，将他们租住的俯瞰阿诺河的公寓转让给了他。租期原本是一个月，但他们只住了两周就要离开了。虽然王尔德一开始对这次邂逅感到很吃惊——因为他想保守这次佛罗伦萨之行的秘密——但他很快就在咖啡馆的桌子旁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一连串“美味的故事”，而纪德则呷着苦艾酒，“傻乎乎地”沉默着。⑪

与曼斯菲尔德的会晤没有达成任何明确的承诺或进展。随即，更令人满意的是，王尔德的诗作《斯芬克斯》于6月11日出版。这是一部世纪末的杰作：它用精美的“牛皮纸和金色纸”装订而成，印刷成三种颜色（红、黑、绿），里基茨“从头到尾参与了装饰设计”，用来献给马塞尔·施沃布。这本薄薄的书，行距很宽，字体不大，排版优雅，大约有40页。王尔德喜欢说，自己最初的念头是“只印刷三本：一本给我自己，一本给大英博物馆，一本给上帝”——尽管他承认自己对“大英博物馆存有疑虑”。约翰·莱恩和美国出版商科普兰与戴出于商业考虑，印刷了250本略有扩充的版本，外加25本定价5畿尼的大开本“珍藏版”。人们普遍认为，作为一种聪明的营销手段，它必须“立即获得彻底的成功”。至于这首诗本身，评论家们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诗歌借鉴了爱伦·坡的作品，“玩世不恭地”采用了《悼念》中的韵律，而且其中还包含了“大胆而古怪”的情色意象。❶

为了获得无条件的认可，39岁的王尔德十分依仗波西和他的其他年轻朋友。他如今经常坐在皇家咖啡馆楼上的包间里，周围环绕着崇拜他的年轻门徒，“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人”，他们简直视他如“上帝一般”。圈子里新添了两名年轻的成员，是道格拉斯在埃及短暂逗留期间结识并一同旅行的伙伴：滑稽的小精灵般的雷吉·特纳（马克斯·比尔博姆在牛津的好友）和罗伯特·希琴斯，后者是一位热爱音乐、有文学抱负的记者。这群人当中有不少真正的天才和智者，尽管威利·王尔德认为他们不过是“一帮寄生虫”，为了回报奥斯卡的慷慨，他们不断地大唱赞美诗。❷❸

社交界仍然向王尔德敞开着大门。的确，在一些人看来，那时候的他似乎正处于“社会荣誉的巅峰时期”。维奥莱特·马克西和爱德华·塞西尔勋爵（索尔兹伯里侯爵的第三个儿子）在骑士桥举办时髦的婚礼时，他作为“六诗人”之一引人注目。他和康斯坦斯一起参加了斯宾塞伯爵夫人在海军部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威尔弗里德·布朗特记录了他出席玛戈特·坦南特和她的新婚丈夫、内政大臣赫伯特·阿斯奎斯举办的“精美午宴”的情景。当年早些时候，阿斯奎斯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与玛戈特结婚。所有的客人“都非常健谈，”布朗特回忆道，“简直就像法国的早餐会一样”。只有阿斯奎斯似乎“有点心不在焉”。当大家散去的时候，王尔德还在给玛戈特和布朗特“讲故事”，一直说到傍晚。 ⑩

但在这一切的背后，昆斯伯里却正在采取对他不利的行动。弗兰克·哈里斯回忆自己曾经听说，侯爵从他的一家俱乐部里走出来，夸口说要阻止王尔德带着他的儿子四处游荡。作为第一步，他切断了波西的资金来源，收到了一封接一封愤怒的电报。与此同时，昆斯伯里开始向王尔德的朋友和熟人们打听各种事情。上一年波西的弟弟舒尔托酗酒失踪时，他曾雇过一个名叫库克的私家侦探追查，这个人也许能够提供一些有趣的信息。 ⑪

5 罪孽深重的侯爵

这实在可怕，如今的人到处在背后说人坏话，但那些话绝对真实。

——奥斯卡·王尔德

1894年6月30日下午4点，王尔德返回家中，他一路上打算着和几个怀有诗歌抱负的“年轻图密善”共度周末，却被告知昆斯伯里侯爵和一位绅士正在楼下图书室里等着他。昆斯伯里侯爵站在窗边；那位“绅士”是其好友爱德华·佩普。王尔德并没有被吓倒，一场激烈的冲突由此打响。王尔德——至少在他对这起事件的描述中——掌握了主动权，要求知道昆斯伯里此行是否打算为他在给波西的信中提出的诽谤作出道歉——关于康斯坦斯正计划以鸡奸罪为由与他离婚。昆斯伯里反驳道，这封信是写给他儿子的，所以是保密的。王尔德直截了当地发出挑战：“你真认为你儿子和我在搞鸡奸吗？”对方反驳道：“我没说你鸡奸，但你看起来就是，你这副姿态也像是，这也一样糟糕。”然而，侯爵对王尔德劈头盖脸的一通指责显示，王尔德最近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担忧；他暗示王尔德和道格拉斯“因为他们的恶心行径而被逐出了萨沃伊酒店”，并得意地称王尔德因为写了一封“令人恶心的鸡奸信”而遭到了“彻头彻尾的敲诈勒索”。王尔德后来回忆，整个见面过程中，昆斯伯里的怒气让人惊恐，他在“癫痫一般的狂怒中”挥舞着小手，嘴里叫嚣着“他脑袋里所能想出来的一切污秽的词语”，接着他又大声尖叫“如果再让我抓到你和我儿子在

任何一家公共餐厅，我就揍扁你！”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场面，而且令人恐惧。据说王尔德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昆斯伯里的规矩是什么，但奥斯卡·王尔德的规矩是当场开枪。”然后他要求昆斯伯里离开他的房子，并指示仆人（他那位年轻的“管家”已经惊呆了），永远不让侯爵进这个门。不过，昆斯伯里估计，王尔德“显然已经露了怯”。^⑨

道格拉斯得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要继续与他父亲争斗下去。然而，他的家人们却不太愿意挑起这桩令人更加难堪的丑闻。昆斯伯里太太的父亲阿尔弗雷德·蒙哥马利试图平息侯爵的怒火，却遭到了粗暴拒绝：“是你的女儿在怂恿我的儿子反对我……我已经摆出了针对奥斯卡·王尔德的种种理由，我要当面指控他。如果我对这件事有了十分的把握，只要见到他就会一枪毙了他，但我现在只能指控他装腔作势。”^⑩事实上，昆斯伯里太太正在竭力缓和情势，但这还不够。她派出远方亲戚——“貌似可信的乔治·温德姆”（王尔德这样称呼他）去见王尔德，劝说他“逐渐放弃”波西。然而，打破这种关系并非王尔德的能力所及。波西很享受这种与日俱增的紧张气氛。昆斯伯里太太——知道她的前夫天生爱打官司——写信请求王尔德不要让律师卷入这场纠纷。^⑪

但王尔德已经别无他法。他写信给乔治·刘易斯征求他的意见。然而，刘易斯——这位躲避冲突，避免官司纠纷的大专家，几乎从一开始就指导王尔德职业生涯的朋友——却帮不了这个忙。昆斯伯里已经聘请他处理侯爵正在进行的离婚诉讼。他只能写来一封正式的回

函：“在这种情况下，您马上就会明白，对于您打算对他提起的任何诉讼，我是不可能提供任何意见的。虽然我不能做不利于他的事情，但我也不会做对你不利的事情。请相信我，你忠实的乔治·刘易斯。”

●注

王尔德听从罗比·罗斯的建议，去找了C.O.汉弗莱斯、索恩和克肖的律师事务所。查尔斯·汉弗莱斯先生给昆斯伯里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声称可以给他一个机会——以书面的方式——收回侯爵之前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所做的种种“断言和暗示”，那些话是针对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勋爵的“最卑鄙肮脏、寡廉鲜耻的诽谤”。他要求侯爵给王尔德和道格拉斯写一封书面道歉信，并暗示，如果没收到这封信，就要将那些冒犯人的信件公之于众，因为信中除了诽谤之外，还提到了某几位“尊贵人物”（几乎肯定，他们是自由党里让昆斯伯里感到棘手的人物，格莱斯顿和罗斯贝里），他们可能会因为披露信件而遭受伤害。●注

昆斯伯里的回信令人沮丧：“收到你的来信，我感到相当惊讶。我当然不会因为我给儿子写的信，而向奥斯卡·王尔德先生道歉。”侯爵否认自己提到过“上流人士”，并声称“王尔德先生名声不好，我敢于发表我写的任何私人信件”。他越发坚定地决意与王尔德挑起一场“公开争吵”。他开始在王尔德喜欢去的地方四处转悠——伯克利酒店、威利斯酒店和皇家咖啡馆——希望当场将一起进餐的王尔德和波西逮个正着。●注

与此同时，道格拉斯则火上浇油。昆斯伯里将他的信原封不动地退回之后，波西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并告诉父亲，他“根本不在乎那些荒谬的威胁”，并炫耀他和王尔德经常在餐馆共进晚餐的事实，而且表示还会继续去这些地方。“我已经成年了，是我自己的主人。”他将另外两人置于枪口之上，声称王尔德完全可以起诉昆斯伯里“无耻的诽谤”，把他送进监狱。对于暴力威胁，他夸口说自己现在有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如果我打死了你，或者他（王尔德）打死了你，我们也完全可以证明自己是正当的，因为这是针对一个凶暴而危险的莽汉所采取的自卫行动，我想如果你死了的话，没有多少人会怀念你的。”^⑨

事实证明，那把左轮手枪是个错误。它在伯克利酒店不小心走火了。幸好没有人受伤，但这件事情绝不能张扬出去。昆斯伯里认为，机会来了。他亲自拜访了王尔德的律师，通知他们，除非波西不再携带枪支，否则他将向警方报案。随后那天下午他又写了一封信，信称——尽管他现在“听说波西已经卸下了左轮手枪”——但如果王尔德和波西继续“在公共场所搞出丑闻”，他就要把枪支走火事件报告给警方。^⑩

对昆斯伯里来说，王尔德和他儿子在一起的想法本身就是一桩丑闻。这成了一件让他着魔的事情。他从一家餐厅到另一家餐厅“传播卑鄙的丑闻”，并且宣布，下次再看到王尔德和他的儿子在一起时，他“要用手杖打（他）的脸”。^⑪在他所属的体育俱乐部圈子里，他发现许多人都支持他的做法，并且一遍遍地重复传播他所说的“卑鄙

丑闻”。王尔德的夸张另类总是引起传统男性的反感。但是，随着他的名声和举止变得带有某种更险恶的色彩，这种敌意便增长起来。记者弗兰克·M·博伊德在皇家咖啡馆时，一名王尔德的“年轻仰慕者”走近表示，王尔德想见见他，博伊德当场回答：“请告诉你的朋友，想见我，还是让他见鬼去吧……请你再加上一句，我是‘Q’（昆斯伯里）的朋友。”记者约翰·布恩也是昆斯伯里的朋友，他警告两个朋友的儿子不要与王尔德交往。据弗兰克·哈里斯回忆，“为了与奥斯卡·王尔德见面，并听一个新故事”，他曾举办过一次午餐会（这一活动可能正值王尔德在哈里斯的7月号《双周评论》上发表了六首“散文诗”）。在发给男性客人的十几份请柬中，有七八个人拒绝了，其中三四个人明确告诉哈里斯，“他们不想见到奥斯卡·王尔德”。王尔德不可能完全忽略这种轻视。在几个俱乐部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他步入房间时，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了出去。①

昆斯伯里的所作所为引发了一种与日俱增的不安情绪。在王尔德眼里，伦敦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可以免受入侵之扰。“被一个疯子尾随纠缠”令人“无法忍受”。更有甚者，他愈发地意识到，自己虽然在眼前这出戏里处于中心地位，但只是个次要人物。他只是为老牌家庭的敌意和怨恨提供了一个焦点。②然而，他却将成为任何对抗的主要受害者。尽管昆斯伯里可能会怒斥他的忘恩负义的儿子——怀疑他的正当性，并且诅咒他——但家族意识毕竟仍在。他一心破坏波西和王尔德之间的友谊——这一动机从来不容易估量，或许从来也不会完全确定——下定决心要将王尔德“粉身碎骨”，而且针对的只是王尔德一个人。③④

王尔德找不到明显的逃脱之法。他后悔自己没有指示汉弗莱斯，迫使昆斯伯里确保不再闹事。当哈里斯也加入众人，建议他为了避免任何冲突，应该“放弃”波西时，王尔德质问道：“我为什么要对这个疯子低三下四？”“因为，”哈里斯回答道，“他是个疯子。”^①然而，这样的断绝关系是难以想象的。道格拉斯不会同意。王尔德也不赞成。“没有你我活不下去，”道格拉斯离开伦敦几天后，他说道，“你是那么亲切，那么美好。我整天想着你，想着你的优雅风度，想着你少年般的美貌，想念你明快如剑的巧言善辩，你那天才的细腻幻想，忽而像燕子一样飞向北，飞向南，飞向太阳或月亮，但首先是你本人。”^②

王尔德心存疑虑，但波西却将山雨欲来风满楼视为一桩乐事，他发现自己的情绪也被感染了。道格拉斯从来没有这么“兴高采烈”过，唯一令他失望的是，什么冲突也没有发生。他试图争取家人的支持，但是——如他对远在澳大利亚的哥哥珀西抱怨的那样——“当然，除了亲爱的妈妈”，他们全都“退出了：而且弗朗西斯（德拉姆兰里格）断然拒绝为我挺身而出，他不愿意在公共场合与我和王尔德共进晚餐，以此表明他不相信父亲的话，尽管我恳求他这么做”。^③

事实上，全家人都在努力让波西远离伦敦。正好夏天到了，人们纷纷离开伦敦。8月初，道格拉斯似乎在苏塞克斯参加了古德伍德节；威尔弗里德·布朗特（另一位“表亲”）带他去埃文河畔的斯特拉

特福德骑马度假，他在莎士比亚的墓旁朗读剧作家的十四行诗“作为祈祷”。昆斯伯里本人则去了苏格兰。⑨

与波西分开的几个星期里，王尔德仿佛失去了亲人，其间他拜访了手相师罗宾逊太太，从中得到了些许安慰。这位“莫蒂默街的女预言家”预见了他的未来，让他“非常开心”。“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你的生活会非常精彩，”她说，“然后我看到一堵墙。墙外我什么也看不见。”王尔德的乐观态度，使他更倾向于关注“墙”之前的辉煌生活。他也很乐意听到她预言称，明年1月初，他将和波西一起“远行”，未来两人的生活将“永远手牵手”在一起。⑩

当阴暗的思想涌入时，这是一个光明的前景。7月底，沃尔特·佩特去世，年仅54岁。王尔德告诉波西，一天晚上，他和现已衰老的母亲坐了坐：“在我的生活中，死亡和爱似乎携手并进：它们是我唯一思考的事情，它们的翅膀遮住了我。”⑪王尔德夫人现在很少出门。她觉得走路很困难，明亮的阳光灼得人疼痛。除了偶尔来访的客人和极其偶尔举办的“沙龙”之外，她真正喜欢的是一盆旺旺的炉火和一本好书。她会问：“有谁能像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那样对你讲话？”除了她的小儿子，没有别的人了。她的经济状况仍然不稳定。威利第一次婚姻破裂后，便失去了莱斯利夫人每年给他的100英镑零花钱，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损失。她经常向奥斯卡“提前支取”10英镑或20英镑。他总是乐意帮忙，即便有时候不得不依靠他妻子的钱来凑够数目。⑫他自己的钱仍然少得令人沮丧。《理想丈夫》挣来的一大笔钱似乎已经花光了。他在银行透支了41英镑，像往常一

样“手头拮据”。《阿维尼翁的红衣主教》和“三联剧”的计划显然已经搁浅。他需要另寻他法。

6 逗乐的能力

那就记住我的警句吧，亲爱的孩子，明天再念给我听。

——阿马兰斯先生对雷吉勋爵说的话，《绿色康乃馨》

夏天来了，王尔德想写一个新剧本。他知道，乔治·亚历山大对他的下一个作品很感兴趣。他正在考虑写点与众不同的东西：不是他以前写的那种滑稽“戏剧”，而是完完全全的喜剧，甚至闹剧。最近看《丑闻学校》这出戏之后，他考虑尝试一些“18世纪”的东西。但他很快就确定，要把谢里登的喜剧精神移植到一个现代环境中。 ②

他给亚历山大写了一份大概的情节设想：

第一幕。晚会，晚上10点。

阿尔弗雷德·拉福德勋爵位于梅菲尔区的住所。他的朋友伯特伦·阿什顿从乡下来。阿什顿25岁至30岁的年纪，是他的好朋友。拉福德打听阿什顿的生活状况，得知他有一个被监护人，非常年轻漂亮，等等。阿什顿在乡下必须表现得一本正经，于是便想到城里放松一下，他为此杜撰出一个名叫乔治的弟弟——身上背负着所有恶行。拉福德对阿什顿的被监护人深感兴趣。

客人来了：塞尔比公爵夫人和她的女儿莫德·拉福德小姐，她是阿什顿的心上人——众多客人，聊天——阿什顿来到莫德小姐面前单膝跪下——公爵夫人上场——莫德小姐：“妈妈，你在这里很多余。”

场景：公爵夫人寻找儿子阿尔弗雷德·拉福德勋爵；仆人拿着字条回答，阿尔弗雷德勋爵突然去乡下了。莫德小姐发誓永远忠实于乔治·阿什顿。[附：阿尔弗雷德勋爵偶然说起“上次你进城来的时候，落了一块手绢（或者一个烟盒）在这儿。”由此揭开了监护人伯特伦·阿什顿的双重生活。监护人拿走落下的东西——阿尔弗雷德勋爵问：“但是，亲爱的乔治，这上面为什么写着伯特伦——谁是伯特伦·阿什顿？”——监护人道出了个中情由。]

第二幕。监护人阿什顿家中——漂亮的乡村别墅。

被监护人梅布尔·哈福德和她的家庭女教师普丽斯姆小姐。家庭教师当然是个举止得体的严厉女人。她们提到了挥霍无度的乔治，女仆进来说“乔治·阿什顿先生”来了。家庭女教师拒绝让他进门。但梅布尔坚持请他进来。阿尔弗雷德勋爵登场。他一下子就爱上了被监护人梅布尔。他因糟糕的生活而受到责备，等等，于是作出深刻忏悔。人们去花园。

进入花园。梅布尔进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你的兄弟来了。”监护人当然予以否认。梅布尔说：“不管你弟弟做了什么事情，你都不能抛弃她。”——说着，领进阿尔弗雷德勋爵。场景：两个男人之间。最后，阿尔弗雷德勋爵因监护人欠下的债务被捕；监护人很开心；不过，梅布尔让他原谅他的兄弟，并付清欠款。监护人查看账单，斥责阿尔弗雷德勋爵挥霍无度。

普丽斯姆小姐支持监护人。监护人命令他的兄弟离开这所房子。梅布尔出面说情，弟弟留了下来。普丽斯姆小姐设计想和监护人结婚——她起码已经40岁了——她相信他是在向她求婚，并接受了他——他仓皇失措。

第三幕。梅布尔和假弟弟。

他向她求婚，她接受了。梅布尔独自一人时，莫德小姐独自抵达，她只知道乔治这个名字。她告诉梅布尔，自己已经和“乔治”订婚——相当自然的场景。梅布尔退场；乔治上场，他自然而然地吻了他的妹妹。梅布尔上场看到这一幕。接下来当然就是解释。梅布尔解除了婚约，理由是乔治没有什么可以改过自新的：她之所以同意嫁给他，是因为觉得他品行不端，需要有人指引。他许诺要做一个坏丈夫——以便使她有机会将他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她的心情缓和了一点。

监护人上场：莫德小姐指责他在乡下过着体面的生活；治安官、乡村议员、教会执事、慈善家，都是很好的榜样。他被伦敦的生活深深吸引：她恢复了平静，让他永远离开乡下：乡村让人失去了斗志；它让你变得体面。“你需要的是萨沃伊酒店的简单餐饮；皮卡迪利的宁静生活；梅菲尔区的孤独生活，等等。”

公爵夫人上场追赶女儿——反对两桩婚姻。普丽斯姆小姐过去曾经是公爵夫人的家庭教师，她无意之中解决了所有问题——结果皆大欢喜。

大结局

落幕

作者上场

递上香烟

经理上场

作者一年的版税

将创作剧本归功于经理。他会赚得盆满钵满。

精彩的演出。

这些“场景”当然只不过是第一稿；王尔德认为，“这个剧本的真正魅力”在于对话方面。然而，他希望这些想法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能让亚历山大预付150镑——如果亚历山大对完成的剧本不满意，可以要求归还这笔钱。他觉得——如果能够“离开去写作”——10月份就能完成。⑨

王尔德得以脱身，开始写作。继上一年在戈林的挥霍之后，康斯坦斯——将每周的预算定在10畿尼——在夏季的最后一个月租用了一处较小的房子。“避风港”是她一个朋友的联排房子，位于南海岸沃辛的滨海大道。她和两个孩子（现在一个9岁，一个7岁）——还有他们的家庭教师和两个泰特街的仆人——于8月的第二周初去了那里。王尔德在三天后抵达，将顶层带阳台的房间作为他的“写作室”。⑩

这是一段充满海滨乐趣和文学创作的日子，而且不仅仅是对王尔德而言。他将出版“奥斯卡语录”的想法告诉了康斯坦斯。她准备编写一部他的格言警句集，内容取自他的戏剧和其他作品；准备交给哈查德书店的年轻经理阿瑟·汉弗莱斯自费印刷。

康斯坦斯和29岁（已婚）的汉弗莱斯在合作期间，两人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融洽关系。康斯坦斯最近几个月一直受到奥斯卡冷落，对别人的友善和关注很敏感。她在写给汉弗莱斯的一封信中，坦承她认为他是“一个理想的丈夫，的确……你离一个理想的男人不远了！”汉弗莱斯为出书的事情到沃辛一天，她趁着他到外面抽烟的工夫，给“亲爱的阿瑟”（她现在这么叫他）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你我有多爱你，你今天来这里是多么值得珍视，令人愉快”。我们不知道，这种浪漫的友谊是否发展成了婚外情，也许不太可能，但它确实让王尔德明白了，他的妻子在别人眼里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她对别人也怀有渴望。 ⑩

王尔德全身心地投入他的剧本中，8月14日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到来只是部分地转移了他的注意力。尽管在来到沃辛之前，王尔德曾建议道格拉斯前去拜访，但接着他便试图用一些无聊的家庭生活故事来搪塞道格拉斯（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讨厌、丑陋……简直令人无法忍受”，而且是个瑞士人；“而且，孩子吃饭时真累人”）。不过，波西是不容拒绝的。他不顾王尔德的警告，缩减了和威尔弗里德·布朗特的旅行，便来海边享受乐趣了。虽然他似乎一直住在酒店，但他经常出现在避风港，这让康斯坦斯很沮丧。他很快就意

识到自己是“奥斯卡和奥斯卡太太争吵的焦点”，但以他特有的自私无视了他们的不适，开始享受生活。在他自己的记忆中，他对王尔德的戏剧创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坐在王尔德身旁，赞许地听着剧作家给他读笑话，并且提出了许多他自己的想法。❶

道格拉斯的到来并不能完全破坏全家人在海滨度假的气氛。事实上，王尔德的儿子维维安后来回忆说，那个夏天很迷人，奥斯卡“正处于他最好的状态”，“风不大的时候”他带着孩子们游泳、钓鱼和航海。他们搞了一个水族箱，用来存放当天在岩石池中发现的东西。王尔德热心建造沙堡，“那是他最擅长的艺术”，他设计了“长长的、漫游式的城堡……有护城河、隧道、塔楼和城垛”。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活动：沃辛年度赛舟会场面精彩（只是在王尔德看来，它被帆船上“一种专利药的巨大广告”破坏了）。在救生艇展览会上，王尔德一行人坐着一艘小游艇“疾驰来去”，引人注目。王尔德还带着西里尔去议会厅，聆听了至少一场完整的音乐会。❷那年夏天，王尔德和大儿子之间的特殊关系得到了加强。他将“俊美、深情、可爱”的西里尔称为“所有朋友中的朋友，所有伙伴中的伙伴”。❸

然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王尔德允许自己任由道格拉斯支配。他们一起出海，经常由三个在海滩上结识的当地小伙子作陪：16岁的阿方斯·康威和他的朋友斯蒂芬和珀西。男孩子们会光着身子从船上跳进水里，潜水捕捉对虾和龙虾。王尔德描述阿方斯——他称其为“阿方索”——是一个“聪明快乐的男孩”，没有任何明显的嗜好，而他的聪明也为这个假期增添了魅力。他和他的朋友们成了那个夏天的一

部分。一次外出后，王尔德和道格拉斯带着阿方斯和斯蒂芬去海洋酒店吃午饭。男孩们也会参加家庭活动，带着王尔德的儿子们上船“捕虾”。阿方斯甚至参加了在滨海广场为西里尔举办的儿童茶会。⑩

王尔德特别喜欢“阿方索”，后者与寡居的母亲住在离海边不远的地方。他鼓励阿方斯出海当水手，并以《金银岛》和《格罗夫纳号沉船》作为礼物激发他的想象力。王尔德给他买了一套蓝色的哗叽衣服和一顶饰有红蓝相间缎带的草帽，这样他在夏天的节日里就不用为自己的“破旧”衣服而感到羞愧了。尽管这一切中似乎包含着某种关爱，但其中也有明确的性因素。⑪据康威说，他们认识后不久，王尔德建议两人晚上9点左右在游行队伍上见面。他们一起走出小镇，沿着海滨小道，往兰斯的方向而去。走到僻静处，王尔德突然“抓住”“阿方索”，把手伸进他的裤子，为他手淫，直到他“精疲力竭”为止。他没有要求阿方斯“做任何事情”。这件事似乎并没有让男孩感到不安，几天后又发生了一次。道格拉斯是否也与阿方斯或他的任何一个朋友发生过性关系，尚不得而知，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⑩

那年夏天，人们的性危险意识增强了。从伦敦传来的消息说，警察突袭了菲茨罗伊街（离克利夫兰街不远）的一所房子，逮捕了18个人，其中两个人穿着“奇奇怪怪的女装”。被拘留的人员中包括王尔德的朋友查理·帕克和阿尔弗雷德·泰勒。尽管由于缺乏证据，最终没有人受到指控，但法庭报告显示，这所房子已经被监视了一段时间，许多被捕的人都是警察“认识的”。虽然没有迹象表明王尔德曾经去过

那所房子，但令人担忧的是，警方对这些地方非常感兴趣。当然，王尔德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他称之为“一桩可怕的厄运”，“可怜的阿尔弗雷德·泰勒”“真的遇到了麻烦”。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他的语气变得轻松了。“一定把阿尔弗雷德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他询问一个两人共同的朋友，“他是生气还是愉快？他要做什么？”（泰勒又干起了原先的勾当：没那么频繁了。而查理·帕克在受惊吓之后，加入了皇家炮兵部队。）^①

9月初，波西离开沃辛定期去度假泡温泉，王尔德得以重新投身于他的剧本中。他没有收到乔治·亚历山大关于该剧的回复，怀疑之前的剧本方案对于其品味和剧院来说是不是“过于荒唐了”。然而，事实证明，亚历山大在信中表达了对该剧的兴趣，只不过那封信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了。从亚历山大之后写来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急切地想要了解有关这部剧的消息，并且正思量他是否能够得到该剧在美国——以及英国——的上演权，因为他正计划明年到美国进行第一次巡演。^②

尽管王尔德自称手头拮据，无法赴伦敦讨论这个剧本，但亚历山大还是劝说他去了加里克餐厅吃午饭。这是一次令人满意的会面：王尔德从亚历山大那里得到一笔钱，作为交换，亚历山大对完稿的剧本享有“优先取舍权”。但他劝阻亚历山大不要把这部戏带到美国去，因为在美国，它不会有一个正式的首演，也不会各大城市上演，它只是亚历山大巡回演出中偶尔的一个剧目而已。王尔德盘算将这部戏

的美国版权单独出售给一个美国制作人，价格可能高达3000英镑。

⑨

回到沃辛后，王尔德匆忙写了另一出戏的情节设计，他认为这部戏剧可能更适合亚历山大去美国巡演：一部戏剧成分多于喜剧成分的“喜剧”。剧情巧妙地扭转了《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的剧情：一个不忠的丈夫被他“淳朴温柔”的妻子采用聪明的做法从一个有伤风化的场合中拯救出来。但后来她抛弃了他，和丈夫的朋友私奔了，她对后者充满了激情。“你让我爱上你了，”她对他说，“所有这些自我牺牲都是错误的，我们注定要生活下去。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与他滑稽可笑的闹剧相比，这是一部真正充满力量和激情的戏剧，而且——因此——更符合亚历山大的“浪漫”表演风格。“我看到了它的伟大之处，”王尔德对这位演员经纪人说，“如果你喜欢，写完之后，你可以把它带到美国去。” ⑩

不过，与此同时，他又继续写起了他的滑稽喜剧。他对这个剧本“非常满意”。其中充满了他那令人愉快的、颠覆性的哲学思想：“我们应该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琐事，用真诚和举重若轻的态度对待生活中一切严肃的事物。” ⑪最初的情节设计在这个夏天得到了充实：现在两个男性角色都过着“双重生活”。“监护人”（为纪念这个海滨度假胜地而被改名为杰克·沃辛）虚构出一个他想象中堕落的兄弟（现在改名为欧内斯特），为自己进城提供借口；他的朋友（从阿尔弗雷德·拉福德勋爵变成了普普通通的阿尔杰农·蒙克利夫，也许是为了减轻其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相似之

处)也一样,他虚构了一个名叫邦伯里的生病朋友,以此作为借口逃避乏味的社交活动。随着剧情的进一步发展,剧本模仿浪漫小说中流行的复杂巧合,杰克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他的保姆(年轻的普丽斯姆小姐)抛弃,由一位不知道其真实身份的善良老绅士抚养长大,成了阿尔杰农失散已久的兄弟(实际上叫欧内斯特)。

毫无疑问,王尔德很享受故事情节给他带来的共鸣,他作为受人尊敬的丈夫和年轻男子的秘密情人,正日益陷入“双重生活”之中。事实上,整部作品都充满了对王尔德的性趣味和性关系的颠覆性暗示。杰克虚构的弟弟被重新命名为“欧内斯特”,^⑨此举是对维多利亚时代传统观念中所谓“认真”美德的讽刺评论,该剧因此得名《不可儿戏》。该剧还暗自指向了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真挚的爱》(Love in Earnest)的“同性恋”诗集,其作者约翰·甘布里尔·尼科尔森之前明确表示他爱上了一个名叫欧内斯特的学生。此外,剧中描述“欧内斯特·沃辛”的住址是奥尔巴尼的E4——那是乔治·艾夫斯曾经住过的地方。^⑩

然而,王尔德在剧中的偷偷暗示并非都与他的秘密性生活有关。他把杰克年轻漂亮的被监护人重新取名为“塞西莉·卡杜”,以纪念他在牛津的一位老朋友的小侄女。^⑪为了纪念马克斯·比尔博姆,他在一份以“M”开头的英国将军名单中加入了一个不太可能的名字“马克斯博姆将军”。他给剧中两位管家取名为“莱恩”和“马修斯”,以发泄对出版商的不满(不过后来他发了善心,把“马修斯”改成了“梅里曼”)。想象中的病人“邦伯里”可能是对查尔斯·布鲁克菲

尔德的轻蔑暗指，后者在最近的喜剧《教父》中扮演了一个叫邦伯里的角色。❶

然而，作品中的一切都贯穿着王尔德的乐趣。他认为，剧中的对话——荒唐、轻松、矛盾——是他写过的最好的台词。尽管如此，这个剧本本身仍然需要修改。他告诉道格拉斯：“它就在房间里四处散落的‘西比尔的叶子’里。❷”他们从泰特街带来的年轻“管家”阿瑟“要‘收拾’屋子，却再次将之搞得乱七八糟”——不过，王尔德说，他在这种随机的重新排序中发现了巨大的可能性：“我倾向于认为，‘混沌’是万能的造物主比宇宙的存在更站得住脚的一个证据。”❸

康斯坦斯于9月12日离开沃辛，为孩子们上学做准备。西里尔即将被送往比达莱斯，那是哈里·莫里利尔在剑桥的朋友J.H.巴德利最近创办的一所新派寄宿学校，而维维安则准备去布罗德斯泰斯的一所预科学校（亚历山大寄来的钱正好让王尔德付了学费）。❹王尔德留在“避风港”工作。当然，也有一些让人分心的事情。王尔德居住的数周里，他已经成为当地的名人，受邀在小镇水上假期结束时的“威尼斯节”上颁奖。

他在演讲中详细叙述了沃辛的魅力，受到热烈欢迎。他赞扬了小镇的便利设施——美丽的环境和众多“可爱的长距离步道，他推荐给其他人，但自己没有去过”。不知道与他相处颇为融洽的阿方斯·康威当时是否在场听到了这些半真半假的话。王尔德最后总结道：“他很高兴在沃辛观察到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提供快乐的能力。”❺

康斯坦斯的离开似乎是波西再次出现的信号。王尔德甚至和他穿过英吉利海峡到迪耶普做过短暂的访问（夏天“非常有趣和明亮”）。^①然而，他们回来后发现，自己已经被置于一个令人憎恶的全新恶名之下。他们不在期间，有人匿名出版了一本名为《绿色康乃馨》的书。该书由海涅曼出版，几乎不加掩饰、非常滑稽地描绘了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引起了轰动——爱说警句的“阿马兰斯先生”和他的金发弟子“雷吉·黑斯廷斯勋爵”——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用他那不纯洁而微妙的青春中的全部激情，去崇拜不正常的人”。

那本书与其说是一幅漫画，不如说是一张照片。它显示出作者对王尔德和波西生活细节极为熟悉。雷吉勋爵收到满脸胡须的父亲寄来的一封怒气冲冲的信后，漫不经心地用电报回复道：“你是个多么可笑的矮子。”尽管书中的情节主要集中在雷吉勋爵追求“洛克夫人”失败这件事上，但其中大量暗示了两位男主角的真正性兴趣。两人都遵循阿马兰斯所阐述的“高等哲学”：“无所畏惧，敢于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是按照中产阶级的意愿生活；勇于面对自己的欲望，而不只是别人的懦弱。”而且，正如阿马兰斯所说，当中产阶级赞美“自然”的时候，他却偏爱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非自然”。王尔德对这一切与其说是惊慌，倒不如说是感到好笑。他认为这本书“非常聪明”，甚至在很多地方显得“才华横溢”。^②

人们都在热烈讨论——在媒体上，以及在沃辛——这本书到底是谁写的。王尔德怀疑是艾达·莱弗森，她曾经在《笨拙》杂志上如此巧

妙地恶搞过他，但艾达向他保证绝不是她写的。❶此时他们已经发现，制造麻烦的人是罗伯特·希金斯。他吸收了道格拉斯在他们沿尼罗河而下的旅途中告诉他的一切，并补充了他回到英国后见到王尔德，以及听比尔博姆聊天时获取的内容。王尔德称他是“心存怀疑的信徒，写出了虚假的福音”；道格拉斯不满的是“书里所有最好的笑话都是真的（他的）”，而且“未经认可”就被窃取盗用了。他们都发去了诙谐的电报，王尔德告诉希金斯，秘密已经被发现了，波西建议他要避开未来的复仇。❷

王尔德还给《帕尔摩报》发去一封语气幽默的信，驳斥了该报的暗示，即他本人就是《绿色康乃馨》的作者。“我发明了那朵美丽绝伦的花，”他称，稍微夸大了一点事实，“但是由于中产阶级和庸俗的书刊夺取了我拥有的美丽异常的名字，简直毋庸置疑，我还有什么事情可做。这朵花是艺术创作。那本书却不是。”他在剧本手稿中添加了一句话，其中布兰克斯特夫人提到曾收到过这本书，然后将其斥为“一桩病态的中产阶级事件”，似乎与“异族文化”有关。❸

王尔德的轻率处置是不恰当的。这本书在当年年底前惹人注目地发行了三版，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他与道格拉斯的友谊的关注和偏见。“《绿色康乃馨》毁掉了奥斯卡·王尔德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弗兰克·哈里斯回忆说，“它从各方面证实了最糟糕的怀疑。”它理所当然地“激怒了”昆斯伯里侯爵。❹

道格拉斯于9月22日回到伦敦，让王尔德在避风港不受干扰地工作了一周。或者说几乎不受打扰：他曾经两次，或许是三次邀请阿方

斯·康威到家里吃饭。之后，据阿方斯回忆，王尔德“把我带到他的卧室，我们都脱了衣服，上了床”。^⑨王尔德还兑现承诺，带阿方斯出去旅行了一晚，“回报他在夏天愉快地陪伴”了自己和孩子们。他们去了布赖顿，住在阿尔比恩旅馆。王尔德确保他们有相通的房间，那天晚上——在酒店餐厅吃完晚饭后——他带阿方斯上床睡觉。“他和以前一样”，阿方斯说，尽管这次他还“用了嘴”。也许就在第二天，王尔德送给阿方斯一张签名照片，一根别致的手杖和一个烟盒，上面写着：“送给阿方斯，来自他的朋友奥斯卡·王尔德。”^⑩

9月还没过完，道格拉斯又回到沃辛，又一次短暂的逗留。他带了一个非常不合适的“同伴”，王尔德拒绝让他们住下来，而是让他们住进了酒店。直到第二天，当他的同伴（大概是伦敦的一个“租客”）“重返老本行”后，道格拉斯才搬到了“避风港”。然而，假期已经过去，小镇上的人越来越少。道格拉斯很快就厌倦了这种有限的家庭生活。他坚持两人搬到阳光更明媚的布赖顿去。^⑪

这并不是一段愉快的插曲。他们住进都市酒店不久，道格拉斯就患了流行性感冒。王尔德悉心照料他，在房间里摆满鲜花，还派人从伦敦买来新奇的水果，因为波西不喜欢酒店里的葡萄。“我守在他身边，给他读了几段取自他本人生活的片段，”他写信对艾达·莱弗森说，“这些片段令他惊讶。”在昂贵的酒店度过四天之后，随着波西的康复，他们搬进了公寓。王尔德希望能在这个环境中完成他的剧本。但是，他自己却染上了流感。道格拉斯不想照顾他，去伦敦待了几天，留下王尔德“孤零零地一个人，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照顾，什

么也没有”（王尔德痛苦地回忆道）。道格拉斯一回来，就在镇上寻欢作乐，一直玩到凌晨。在王尔德温和的规劝下，他勃然大怒，指责王尔德“自私”地难以置信，竟然要他放弃享乐坐在病人的房间里。第二天早上，他出现在王尔德的卧室里，不是为了道歉，而是为了变本加厉地吵闹。王尔德被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狂怒吓坏了，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危险，急忙从床上爬起来，逃到楼下的公共客厅。随后波西离开了，不过在此之前他“一声不响地”回到王尔德的卧室，把能找着的钱都拿走了。

即便在两人的相处关系中，王尔德时常被道格拉斯的脾气惹恼，这次的情况也属罕见。王尔德被深深地震撼到了。也许“最后了结的时候”真的到来了。王尔德回忆说，这个想法是“一种巨大的解脱……我知道，从今往后，我的艺术和生活不管在哪方面都将更加自由、更美、更好……虽然我病体虚弱，但内心舒畅。这次分手是义无反顾了，这使我觉得安宁平静”。当然，他以前也下过这样的决心。但这一次，他的决心在几天后变得更加坚定了。在他40岁生日那天，他收到了许许多多祝福信件，其中有一封道格拉斯的信，信中再一次淋漓尽致地重复了他的怒火：用“粗俗的嘲弄”取笑王尔德，吹嘘自己把都市酒店的账单算到了王尔德账上，恭喜他张皇失措地“逃离了”病榻，最后总结道：“你像尊偶像，没了底座就没意思了。下次你要是病了，我马上就走。”面对这种“令人作呕的……粗鲁和鄙俗”，王尔德决定在那个星期五（10月19日）回到伦敦后立即与乔治·刘易斯见面；他要让他写信给昆斯伯里侯爵，声明他将断绝与道格拉斯的一切联系。●●

然而星期五早上，他打开晨报，发现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波西的大哥德拉姆兰里格勋爵（“真正的一家之主，爵位的继承人，家里的顶梁柱”）在萨默塞特郡匡托克的一场射击中死于“意外”。同行的其他人发现他躺在沟里，旁边放着枪，半张脸都被炸飞了。王尔德的决心瞬间化为乌有。他给波西发去电报，对他痛失亲人深表同情。几天后，他们在泰特街见面了。他们没有提到波西在布赖顿的可怕行为，也没有提到他那封更可怕的信。一切都被德拉姆兰里格之死的悲剧洗刷得干干净净。“你那真切的悲哀，”王尔德后来提醒波西道，“似乎带着你前所未有的靠近我。你从我这儿带去供在你哥哥坟上的鲜花，不只要成为他（德拉姆兰里格）生命之美的象征，也要成为蕴藏于所有生命中并可能绽放的美的象征。”在这种新的亲密关系面前，所有想要一刀两断的想法都被抛在了一边。❷

虽然10月20日在萨默塞特举行的调查中，这起事件已经被判定为意外死亡，但许多与此相关的人都怀疑是自杀。只有自杀动机仍然是个谜。德拉姆兰里格马上就要宣布订婚。也许是出了什么问题？昆斯伯里在写给阿尔弗雷德·蒙哥马利的信中，以他典型的毫无节制的风格，针对此事指责他和他的女儿，以及“自以为了不起的同性恋者罗斯伯里，还有基督教伪君子格拉德斯通”，导致他和长子在贵族身份问题上“不和”。否则事情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在所有这一切（德拉姆兰里格之死）的背后嗅出了悲剧的气息，而且已经听到风声，说还会有一个更惊人的悲剧。我根据某些事情，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如果事情的确如此，我是所有人中原本有能

力，并且也会帮助他的那个人，倘若他怀着信任来找我，但那一切都被你们这些人阻止了——我们已经有一年半多没有见面或坦率地交谈了。我正在采取正确的方式调查所发生的一切。寻找那个女性目击者。我已经耳闻了某件事，它完全可以解释整个事情。 ②

遗憾的是，昆斯伯里的怀疑和发现没有留下更多的记录。悲剧背后的“女人”难道是德拉姆兰里格的未婚妻艾利克斯·艾丽丝吗？或许另有他人？她扮演了什么角色？昆斯伯里断定他是“所有人中”原本能够帮助他的儿子的人，这很有意思，但很难理解。难道这件事可能与他自己最近不幸的婚姻有关吗？那段婚姻已经在10月24日秘密举行的听证会上宣告终结——“因上述答辩人的性冷淡、阳痿和畸形”而宣告作废？ ③ 这已经无从知晓。当时（和现在一样），德拉姆兰里格死亡的神秘事件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当时一直有传言称，46岁的罗斯伯里（1890年妻子去世后成为鳏夫）对年轻男子有性兴趣。人们发现他喜欢雇佣长相俊美的私人秘书，导致有些人倾向于“相信最坏的结果”。他习惯于自己拆信，到那不勒斯度假，这些也对他很不利。昆斯伯里当然很喜爱这样的流言蜚语：他使用了大量词语侮辱罗斯伯里，从“该死的混蛋”一直骂到“自以为了不起的同性恋”。尽管昆斯伯里的最初反应并没有表明他将罗斯伯里的所谓癖好与德拉姆兰里格之死的“灾难”联系起来，但其他人肯定会把两者联系起来。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会渐渐相信别人的怀疑。 ④ ⑤

当然，这场悲剧并没有改变侯爵对王尔德的纠缠。他把这件事——以及这件事给他带来的痛苦——告诉了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儿子珀

西。珀西建议把这件“悲惨的事情.....推向尖锐化”。时间似乎很紧迫。对于任何像昆斯伯里一样怀疑英国社会上层正被一个秘密的鸡奸网络所腐化的人来说，最近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新文化”貌似正越发张狂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当时新闻界正在辩论维多利亚时代婚姻的社会习俗，其间出现了几篇回应文章，提出完全的个人自由应该扩展到同性关系。4月，《艺术家》杂志编辑查尔斯·凯恩·杰克逊在一篇他称之为“新骑士精神”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这一点，随后便遭到解雇。10月，乔治·艾夫斯在《慈善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他的文章被《评论述评》杂志猛烈抨击后，王尔德祝贺他：“当好色之徒和无能之辈攻击你时，你肯定是正确的。”）^①

在牛津，尽管《灵灯》杂志在道格拉斯离去之后便停刊了，但学生们正计划创建一份新的期刊，继续在大学里宣传“新文化”。在艾夫斯位于奥尔巴尼的房间里，王尔德遇到了年轻的编辑，“一个异常俊美的本科生”约翰·布洛克萨姆。他们讨论了杂志的名称，最终确定叫《变色龙》。为了支持创刊号，王尔德拿出了一篇“格言”。道格拉斯写了两首充满性爱色彩的十四行诗，其中一首是《两种爱》，最后一句令人难忘：“我是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爱。”王尔德的投稿——《供年轻人使用的至理名言》——没有招来明显争议。其中的许多格言出自《理想丈夫》，它们勾勒出的是知识分子的视野，而不是性幻想，但其中的极少数确实捎带了一些危险的暗示。王尔德断言：“邪恶是善良的人们编造的荒诞说法，用来解释别人的奇特魅力。”^②

王尔德可能想把这些格言连同其他曾经发表在《星期六评论》上的话，汇集成一篇《教育过度者的几条准则》，收录在《奥斯卡语录》中。他对康斯坦斯最初整理的文本感到失望：“这本书太糟了，”他对汉弗莱斯抱怨说，“在本应该摘录一句格言的地方，却引用了长长的段落。”他现在正忙着自己做修改和补充。他试图让汉弗莱斯重视这项工作，这本书必须是“一件真正的杰作”。^⑨

然而，对王尔德来说，眼下最紧迫的是《不可儿戏》。10月底，他把完成的打字稿寄给乔治·亚历山大——假借了一个标题《兰辛夫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有所保留。“当然，这出戏并不完全适合你，”王尔德告诉他，“你是个浪漫的演员。”这是一部闹剧色彩的喜剧，完全超出了圣詹姆斯剧院一贯遵循的“明确的艺术界限”。王尔德认为这部作品真正需要的是像查尔斯·温德姆或查尔斯·霍特里这样的喜剧演员。很有可能王尔德已经就这出戏试探过这两个人。因此，当亚历山大无法立刻排演这部作品时，王尔德立马将剧本给了温德姆，确保他承诺将在新年之际将该剧搬上标准剧院的舞台。有了这份协议，他似乎还预支了300英镑——他可能还用这笔钱偿还了从亚历山大那里预支的钱。^⑩

最终结果是不错的。在一年多没有新作品的情况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王尔德将有两个剧本要上演。《理想丈夫》于12月的第二周开始排演，定于来年1月3日在干草市场剧院首演。王尔德经常出现在剧院里。扮演奇尔顿太太的朱莉娅·尼尔森回忆，当时他总和三个年轻男子一起，他们站在他旁边，身高从高到低“就像三只熊”（她没有提

到身高5英尺9英寸的波西是否身在其中)。王尔德对这出戏的前景仍持怀疑态度。康斯坦斯说他“对此非常沮丧”。^①经过了前一年与比尔博姆·特里公司的欢宴之后，他发现演员们没那么讨人喜欢了。他与沃勒的妻子弗洛伦丝发生了不幸的争执，她不顾王尔德的意见，坚持要求扮演谢弗里太太的角色。查尔斯·霍特里（曾在《诗人与木偶》中讽刺过他）扮演戈林勋爵；虽然王尔德钦佩霍特里的喜剧才华，但这位演员一直对他怀有一种无声的怨恨。当采访者——希望得到一个笼统的回答——问王尔德，“演员和剧作家之间的确切关系是什么？”王尔德笑着回答说：“通常有一点紧张。”之后的问题是，“但你肯定认为，这位演员是一位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是吗？”王尔德用一种略带伤感的语气回答：“是的，非常有创造力——太有创造力了！”^②

查尔斯·布鲁克菲尔德加剧了演员和剧作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位《诗人与木偶》的作者扮演了戈林勋爵的贴身男仆的次要角色——因为，正如他极不礼貌地解释的那样，他不想知道太多王尔德的台词。王尔德没有接受这样的挑衅，这当然进一步激怒了这位演员。他很会耍这种花招。布鲁克菲尔德对必须在圣诞节期间排练感到非常愤怒，问道：“奥斯卡，你不过圣诞节吗？”王尔德回答：“不过，布鲁克菲尔德，我唯一遵守的宗教节日是七旬斋。布鲁克菲尔德，你过七旬斋吗？”“长大之后就再也没过了，”布鲁克菲尔德回答。“啊，”王尔德说，“那就再当一次孩子吧。”^③

第八部分 裁判所

1895年

41岁

"HOMOCEA"
INSTANTLY TOUCHES THE SPOT.

As a Pain-Relieving, Soothing, and Cooling Salve, "Homocea" has no equal in the world of medicine.

It acts like magic, instantly touching the spot affected with Pain, Swelling, Bruises, Burns, Chafes, Itch, Scalds, Ulcers, Blisters, and all kinds of skin eruptions.

All wholesale houses stock "Homocea," and it is sent by post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For particulars, apply to the Proprietors, Messrs. J. & W. G. & Co., 11, King William Street, London Bridge, E.C. 4.

THE ILLUSTRATED

POLICE NEWS

LAW COURTS AND WEEKLY RECORD
ESTABLISHED 18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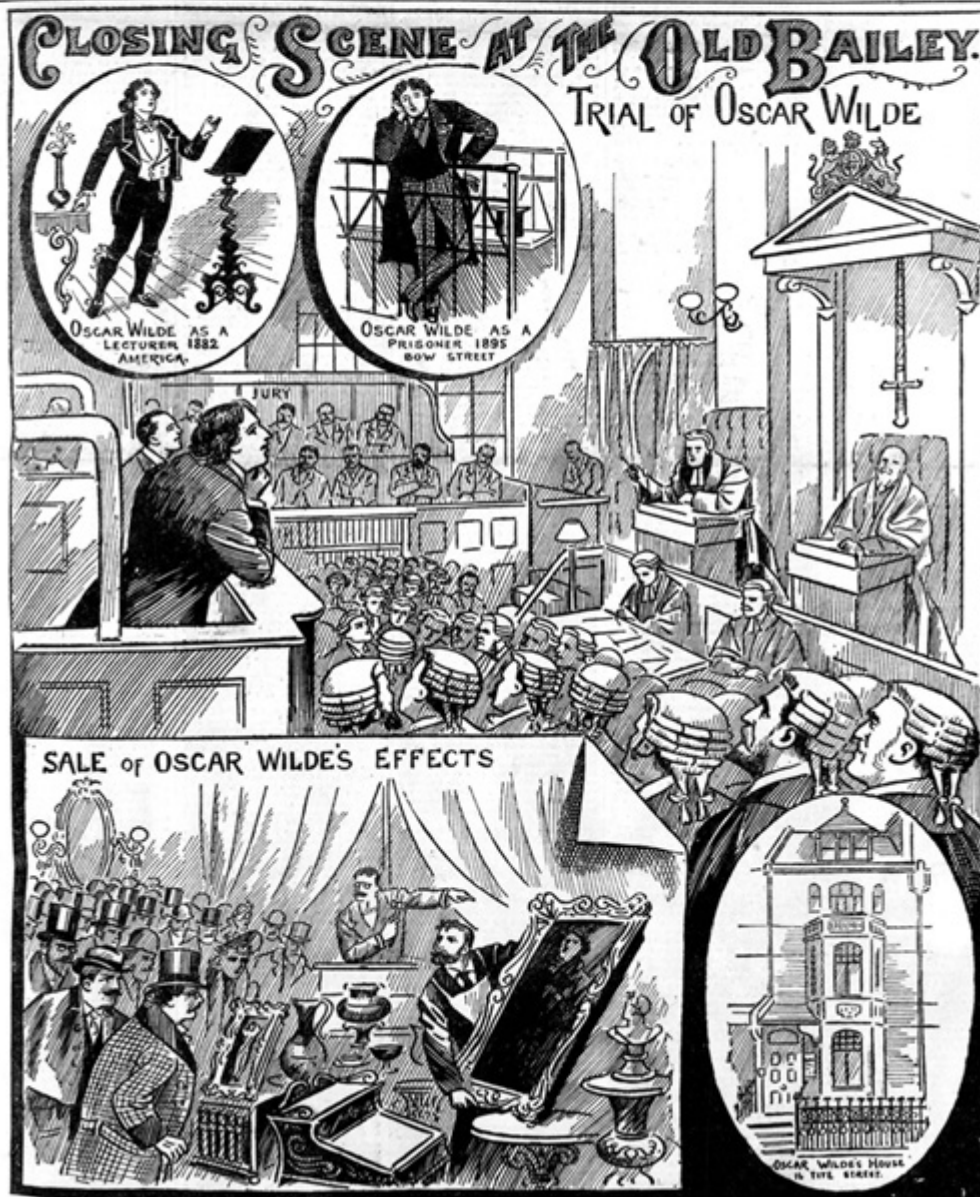
THE EARL OF GARRICK
Has successfully tried "Homocea."

Writing from Bristol, 18th, to Messrs. J. & W. G. & Co., London: "I wish to thank you for the good kind of ointment you have sent me, and for the kind notice you have taken of my letter. I have used it, and it has done me good. It is a most useful and powerful remedy, and I have no hesitation in recommending it to all who are afflicted with any of the ailments mentioned in your advertisement. I have used it on my face, and it has done me good. It is a most useful and powerful remedy, and I have no hesitation in recommending it to all who are afflicted with any of the ailments mentioned in your advertisement."

No. 1628. [REGISTERED FOR CIRCUL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BROAD.]

SATURDAY, MAY 4, 1895.

Price One Penny.



IMPROVED AND ENLARGED.

1895年5月，奥斯卡·王尔德在被告席上

1 最后的狂欢夜

真相很少纯粹，也从不简单。

——奥斯卡·王尔德

危险人物谢弗里太太在《理想丈夫》第一幕中说道：

请记住你们英国的清教徒主义把你带到了什么地步了，在过去的岁月里，谁都不想装得比自己的邻居富裕。事实上，生活得比邻居富裕会被认为是极为庸俗的，是中产阶级。当今之日呢，我们有现代道德的狂热，大家都不得不争做廉洁奉公的完人，拒绝腐蚀的完人，七条美德的完人——可结果怎么样呢？你们都哗啦啦倒下了——一个接着一个。一年过不到头，英国总是有某个人销声匿迹了。丑闻过去常常让人具有吸引力，或者至少让人产生兴趣——现在却把他碾碎了。

剧本中充满了熠熠生辉的睿智独白，这段台词只是首演之夜熠熠发光的宝石之一。事实证明，王尔德对这出戏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除了“剧院正厅后排观众”发出的几声咆哮之外，该剧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对拥挤在剧院里的大多数观众而言，它似乎展示了“戏剧力量的显著进步”。现场充满笑声，人们得到了真正的享受和实实在在的参与。王尔德“打扮得无可挑剔”，穿着“最新的时尚”坐在包厢里非常引人瞩目，他的周围坐满了“最尊贵的人物”，他们的赞美之词让他获得了一种“半皇室的优雅”。他来到台前，果然作了一番漫不

经心的自我肯定（或“刻意傲慢”），并宣称：“我玩得很开心。”

●注

评论家们可能仍在吹毛求疵地挑剔所谓王尔德公式化的俏皮话和二手情节，但他们不怀好意的评论却在《星期六评论》上遭到萧伯纳一针见血的抨击：“就我所知，”他写道，“在伦敦，我是唯一没法坐下来，随意写一部奥斯卡·王尔德戏剧的人。他的剧本虽然明显可以赚大钱，但它仍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们那些抄写者的自我克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看来王尔德先生是我们唯一的彻头彻尾的剧作家。他玩弄一切：玩弄机智，玩弄哲学，玩弄戏剧，玩弄演员和观众，玩弄整个剧院。”●注

王尔德取得了一项几乎前无古人的成就：他的前三部戏剧“都获得了成功”。●注如果这是一个难得的成就，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安慰。他又能赚大钱了。然而，成功并没有使他谦卑；那样会让他难以忍受。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理想丈夫》是他最好的戏剧时，他回答说：“只有平庸才会让人进步。”他认为，他的三部喜剧“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在这个微妙的领域中既成就了生活，也成就了艺术”。他向这位采访者解释道：“只有伪君子才会谦卑有礼，只有无能者才会虚心节制。自我肯定不但是艺术家的责任，也是他的特权。”●注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种态度。阿瑟·柯南·道尔认为，王尔德一定是“疯了”，他在催促自己去看他的新戏时，竟然神色庄重地说：“啊，你必须去。它棒极了，是天才的作品！”●注

王尔德在针对新闻界的一系列声明中，重申了他目前对剧作家、公众和评论家相对地位的看法。“我写作是为了取悦自己。”他如此解释道。评论家们“总是认为剧作家的职责是取悦公众，这是一种有辱人格的信条”，但“艺术家的目的既不是给人以快乐，也不是给人以痛苦。艺术的目的就是成为艺术。”这种“艺术”应该是艺术家个性的表达。“在英国，我们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戏剧，除非人们认识到戏剧是一种个人的、个性化的自我表达形式，就像一首诗或一幅画一样。”“当公众意识到一部戏剧是件艺术品时，他们就获得了成功。”结果，是这位艺术家“慷慨地成就了公众”，而不是相反。“我非常热爱公众，”王尔德宣称，“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愿意帮助他们。” ⑩

他指出，批评人士忽略了这出戏的“整体心理”：“男人爱女人的方式与女人爱男人的方式是有区别的。”他认为，奇尔顿夫人在塑造自己的“理想”丈夫时表现出了女性的“弱点”，而罗伯特爵士则表现出了男性的缺点，他不敢“在自己热爱的事物面前展示自己的不完美”。当被问及当代道德准则中所谓的“双重标准”时，王尔德坚称：“应该有一部针对男性的法律，另一部针对女性的法律，这实在是个奇耻大辱。”然后，他又补充说：“我认为，不应该有针对任何人的法律。” ⑪

首演当晚，康斯坦斯没有到场。她在圣诞节期间病了一场，可能因为有一次从楼梯上摔下来病情恶化了。她的病情一直是个谜，走路出现了困难。为了帮助自己康复，她去巴巴科姆和坦普尔太太住在一

起。奥斯卡留在伦敦——住在阿尔比马尔酒店——和道格拉斯以及他的其他朋友一起享受成功。❶ 事情不再那么令人焦虑，昆斯伯里侯爵不在伦敦，正张罗出售他在苏格兰的房产。

那一刻的愉悦中，还夹杂着一股新鲜饱满的专业激情。亨利·詹姆斯的戏剧《盖伊·多姆维尔》在圣詹姆斯剧院惨败，陷入困境的乔治·亚历山大出人意料地急需一出戏作为替补。由于手头没有任何现成的东西，他找到王尔德，询问有没有可能将《不可儿戏》搬上舞台。该剧（亚历山大最初拒绝了这个剧本）原计划由查尔斯·霍特里于当年晚些时候在标准剧院上演。不过，王尔德有心帮一把他的第一个制作人，而且也可能是期待看到作品尽早制作完成，于是便询问霍特里，是否可以考虑把版权让给亚历山大。霍特里（王尔德答应给他下一部作品的“优先取舍权”，让他备受鼓舞）慷慨地同意了这一安排——既不要求亚历山大支付额外费用，也不要求王尔德返还预付款。❷

这出戏必须立刻投入排演。但就像《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样，亚历山大并不认同王尔德的戏剧结构。它似乎太长，太散漫；几乎从来没有人演过四幕滑稽剧。亚历山大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合并第二幕和第三幕，并且完全删掉其中格里格斯比律师因为“欧内斯特·沃辛”在萨沃伊欠下的债务，而前往逮捕他的片段。❸ 王尔德对此予以了默许。根据一种说法，当亚历山大告诉他，格里格斯比那场戏使这部戏足足超长了20分钟时，他回答说：“你可能是对的，我亲爱的亚历克。我只能告诉你，它只用了5分钟就写完了。”

❶

由于该剧的上演时间缩短，王尔德提议将《佛罗伦萨悲剧》作为开场小戏。亚历山大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但王尔德——远离泰特街和他的书房——却没能写出手稿。❶他参加了几次《不可儿戏》的排演，然而他的出现有时会造成紧张气氛。据说亚历山大有一次甚至强令他退出排练，但他仍然渴望提供协助。❷他会根据要求写一些额外的台词，例如当发现演员没有足够的时间“穿过舞台”或有人“想要更从容地退场”时。❸

然而，道格拉斯一如既往地急于寻欢作乐。看手相的罗宾逊夫人曾预言他和王尔德将在1月时一起旅行，王尔德急于实现这个预言。道格拉斯坚持要去阿尔及利亚，两人于15日出发。❹从英国的冬天逃离到北非的阳光、懒散和性享受中是一件惬意的事情。“这里太美了，”王尔德对罗斯说，“卡拜尔人的男孩子们非常可爱。”他注意到，即便是乞丐“也有个人资料，所以贫困问题很容易解决”。王尔德和道格拉斯开始抽起了大麻：“它非常精致：三口烟，然后就是和平和爱。”❺

第二周，在阿尔及尔以南30英里之外，城墙环绕的美丽城市卜利达，他们再次遇到了安德烈·纪德。当纪德问他在这个远离伦敦的地方做什么时，王尔德回答说：“我在逃离艺术。我只想膜拜太阳。你注意到了吗？太阳鄙视一切思想，它逼迫思想退缩，躲进阴影中。一旦思想迁居埃及；太阳便征服了埃及。它长期生活在希腊；太阳就征服了希腊。然后是意大利，接着是法国。今天，所有的思想都被赶回到挪威和俄国，太阳永远不会去到那里。太阳妒忌艺术。”这次短暂的

出游十分顺利，只是因为天气变坏而稍有逊色，天气预报说会下雨——如果不是下雪的话。

对于王尔德的友善，在纪德看来，他的举止中似乎平添了一种新的粗俗——“他的外表不再温柔……他的笑声有些沙哑，他的喜悦中有一种疯狂。与此同时，他似乎更确信自己会讨人喜欢，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雄心勃勃地想要做到这一点。”他变得鲁莽、冷酷和自负了。不久，当他们在阿尔及尔再次相遇时，王尔德宣称：“我对自己的责任就是，要以极端的方式娱乐自己。”但那不是他寻求的快乐：“最重要的不是快乐。是愉悦！你必须总是以最具悲剧性的事物为目标。”王尔德说的是自己。他又和波西大吵了一架，后者兴冲冲地跑去追求一个“满嘴甜言蜜语”的14岁孩子，还打算和他“私奔”去比斯科拉。

纪德发现自己被王尔德所吸引，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几天快乐的日子。纪德回忆，走在街上时，王尔德被一群年轻的“乞丐”尾随上了，他和其中的每一个人聊天，愉快地观察着他们，随意地把钱扔给他们。“我希望，”他说，“我已经让这座城市彻底堕落了。”^②

毫无疑问，他成功地让纪德“堕落”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解放了他。王尔德发现他的年轻朋友处于一种饱受折磨的性困惑状态，无法承认或接受自己的同性恋渴望。一天晚上在老城区，王尔德安排这个烦躁而紧张的法国年轻人与一个俊美的黑眼睛长笛手共度了一个激情之夜，此人正是纪德在咖啡馆心仪已久的对象。它标志着纪德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纪德回忆起第二天清晨，他跑在阿尔及尔空荡荡的

街道上，感到身心愉悦。然而，尽管发生了如此重要的事情，纪德仍然对王尔德感到不安；因为他对待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太鲁莽了。“王尔德！”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还有什么比他的生活更悲惨的呢！如果他再谨慎一点——如果他能够做到谨慎的话——他就会是一个天才，一个伟大的天才。”纪德从未读过王尔德的任何剧本，他准备接受作者对它们的自嘲：“哦，但（它们）一点都不好；我对它们不抱任何希望……不过你只要知道它们能带来乐子就好了！”^⑩王尔德重申了他喜欢的一句台词，然后吐露了他生命中的“巨大悲剧”：“我把我的天赋挥霍在生活中，只把才华用在写作上。”^⑪

然而，王尔德的生活似乎正在接近悬崖。他炫耀自己的同性恋暧昧关系，使他成为一个越来越容易妥协的伴侣。纪德承认，即使他们在伦敦或巴黎见面，自己也没法跟他打招呼。“如果不是王尔德的戏剧在伦敦上演三百场，”纪德表示，“如果不是威尔士亲王去参加他的首演之夜，他就被关进牢里了，道格拉斯勋爵也一样。”^⑫

尽管王尔德摆出“明目张胆的喜悦”姿态，但正如纪德所指，这背后隐藏着一股“暗暗的焦虑”。事实上，王尔德承认，的确对昆斯伯里与他作对的所作所为感到有些担忧。当被问及回伦敦的风险时，他回答说：“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的朋友们都劝我要谨慎些。谨慎！我怎么可能谨慎？那将意味着后退。我必须尽可能地前进……我没法更进一步了。肯定会有事情发生……别的什么事。”^⑬

王尔德于1月31日离开阿尔及尔，独自回到伦敦。由于康斯坦斯还在巴巴科姆，他在皮卡迪利大街上豪华但“令人讨厌”的埃文代尔

酒店订了房间。他无法回到他喜爱的阿尔比马尔酒店去，因为他的账还没有付清。《不可儿戏》将于2月14日上演。

如果说公众都在兴奋地期待这部戏，那么昆斯伯里侯爵也是如此。他已经回到伦敦，下了空前的决心要把事情闹大。王尔德的新剧似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幸运的是，昆斯伯里太太得知了他打算在首演当晚捣乱的计划，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尔德。道格拉斯全家一致谴责侯爵的骚扰行为；并非出于对王尔德的关切，而是因他们认为这么做会伤害到波西。就连珀西·道格拉斯也同意这个想法，他已经被弟弟说服了，认为侯爵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⑨

在王尔德的敦促之下，乔治·亚历山大写信给侯爵，取消了他获得的首演门票。⑩即便如此，王尔德仍然感到焦虑。他向警方报告了出事的可能性。首演当晚，剧院外面人越来越多。剧院里，时髦的人群挤满门厅，大家都在庆幸自己躲过了外面纷飞的暴风雪，王尔德一直无法确定侯爵到底想干什么，以及他能否得逞。他竭力将自己的焦虑隐藏在这光彩夺目的场合之下。波西还在阿尔及利亚，但康斯坦斯（尽管健康状况仍不佳）已经从巴巴科姆回来参加首演。⑪

戏一开始就很吸引人。“什么风把你吹到城里来了？”“噢，找乐子，找乐子。一个人出门还能有别的原因吗？”据扮演格温德琳的年轻女演员艾琳·范布勒回忆，表演“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一阵阵愉快的笑声”。⑫艾达·莱弗森（和奥布里、梅布尔·比尔兹利同坐在一个包厢里）认为，随着“荒谬”的戏剧情节渐渐展开，观众席上弥漫着一种“奇怪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喜悦”。亚历山大巧妙的改编确保了这

部戏在演出过程中始终不会冷场。一位朋友曾建议，闹剧应该像拼花图案一样，王尔德反驳说：“不，它必须像手枪射击。”毫无疑问，王尔德这出“为严肃人士创作的轻喜剧”已经正中目标。当剧作家被叫到幕布前鞠躬致意时，他受到了“热烈的欢呼”。不过，他拒绝发表讲话。❶

媒体虽然尚未发出近乎一致的赞美之词，但很显然，在他获得戏剧成功的过程中，这标志着一个新的高度。❷人们认为，这出戏既“现代地”令人愉悦，又体现了典型的王尔德风格。他也许自嘲（就像他后来所做的）采用了“戏剧这一艺术中最客观的形式，使之成为一种个人的表达方式，就像抒情诗或十四行诗一样”。❸不过，在首演成功欣喜若狂的时候，他确实拐弯抹角地承认了亚历山大对这出戏的贡献，他说：“我亲爱的亚力克，这出戏很迷人，非常迷人。你知道吗，我时常想起我自己写的一个剧本，名叫《不可儿戏》。”

❹

成功让人喜悦，王尔德却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参加艾达·莱弗森在威利斯餐厅举办的晚宴。昆斯伯里做出了古怪的举动，这个消息让他心烦意乱。他发现，“罪孽深重的侯爵”和一位手持“一束奇形怪状的蔬菜”的职业拳击手一起来了。由于进不了剧院，他“逡巡了三个小时”，然后将送给王尔德的“花束”留在了售票处，“像一只可怕的猿猴一样喋喋不休地”离开了。❺

如果说王尔德觉得昆斯伯里在纠缠他，那么他同时也感觉到侯爵最近的这出哑剧可能有点过火了。圣詹姆斯剧院的许多工作人员都目

睹了他的威胁行为。那捆蔬菜仍在售票处。人们还记得13年前侯爵为显示自己的能力，而打断了丁尼生的戏。王尔德已经开始后悔，之前没有诉诸法律来约束昆斯伯里的行为。而现在，似乎有了可以采取行动的把柄。第二天，他与珀西·道格拉斯商量之后，让汉弗莱斯研究一下，是否有可能起诉侯爵的“威胁和侮辱行为”。

很快，波西从阿尔及尔回来了，得知这个计划后很高兴。他（反反复复地）说，很想看到他的父亲“坐在被告席上”。^①他和王尔德住在埃文代尔的酒店里，开开心心地大肆享受那里的奢侈。当王尔德因为他带了一个小男妓住进房间而提出反对时，他勃然大怒，和那个男孩子一起搬到了另一家旅馆；像往常一样，王尔德被迫为此买单。

①

现在，王尔德有两部赚钱的戏在伦敦西区上演（《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刚刚在坎伯韦尔的大都会剧院成功复演），王尔德想要好好享受一下生活。然而，伦敦似乎充满了让人放不下的事情。昆斯伯里一直是一个威胁。波西的所作所为令人厌烦。债主们听闻他最近发了财，纷纷叫嚷着要他还钱；《不可儿戏》上演不到几天，他就收到了400英镑的传票。^②他计划逃到巴黎，莎拉·伯恩哈特在那里干劲十足地重新捡起了排演《莎乐美》的计划。^③但即便如此，王尔德还是遭到了挫败。他在埃文代尔的账单有148英镑；他手头还没有足够的钱付账，而且账目不结清，酒店就不让他拿走行李。^④

烦恼接踵而至。2月28日，汉弗莱斯写信说，律师事务所无法因为昆斯伯里在圣詹姆斯剧院的威胁行为而起诉他，因为乔治·亚历山大

和剧院工作人员都不准备提供证词。他们都急于置身于这场冲突之外。汉弗莱斯能够提供的“唯一安慰”是，“像昆斯伯里勋爵这样顽固的迫害者，可能迟早会给你另一个寻求法律保护的机会”——届时，律师事务所将乐于提供协助将他绳之以法。❶这似乎是一种相当惨淡的安慰。

2 骇人听闻的话

我的整个人生似乎都被此人毁了。

——奥斯卡·王尔德

1895年2月28日，那个冬天的傍晚，王尔德造访了里基茨和香农位于切尔西博福特街的新家。他发现里基茨独自一人在摆弄一个木块。他们谈论了有关“W.H.先生”的计划，以及王尔德的象征主义戏剧。①王尔德离开时，遇到了香农。两人站在街上聊了一会儿。王尔德望着面包店里陈列着香肠卷的橱窗透出的光，说道：“人们吃的东西真奇怪，我想他们一定是饿了。”然后他挥手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朝着阿尔比马尔俱乐部而去。②

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去那里了。进门时，看门人拦住他，递过来一个信封，说那是十天前留给他的。信封里是昆斯伯里侯爵的名片。上面潦草地写着五六个字；前三个词很好认，是“给奥斯卡·王尔德”，最后一个词也很明显是“somedomite（原文如此）”③。中间歪歪斜斜的可能是“男妓和”。尽管最后一个词拼错了，但意图是明白无误的：昆斯伯里指控王尔德是一个鸡奸者。这似乎就是昆斯伯里长期以来威胁要制造的公开丑闻。这张卡片被公开地留在俱乐部，任何人（俱乐部有男会员，也有女会员）都有可能读到它。只是由于看门人赖特先生的谨慎，它才一直被放在一个信封里。

但如果这是一个公开丑闻，那它也是一起公开诽谤。昆斯伯里可能急于“将事情闹大”，不过现在王尔德也要表达自己的想法。侯爵的做法所造成的压力已变得让人无法忍受。它破坏了这个本应属于他的收获季节。这似乎就是汉弗莱斯那天早上在信中提到的“机会”，王尔德急于抓住它。他回到埃文代尔，立即给罗比·罗斯写信，让信差捎给他：“自从我上次见到你以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波西的父亲在俱乐部留了张卡片，上面写着骇人听闻的话。现在除了刑事起诉，我已无计可施。我的整个人生似乎都被此人毁了。象牙塔受到污秽之物攻击。我的人生如一盘散沙。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如果你能在11点半来这里的话，请今晚就来吧。”^①

他似乎也给泰特街的康斯坦斯写了信，声称一定要见到她。无论他决定采取什么措施，他都需要她的支持——如果不是理解的话。^②据她哥哥说，尽管他们婚姻关系中的鸿沟不断扩大，她仍然对奥斯卡的各种同性恋关系浑然不知，无论是与波西还是与其他人。她或许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丝焦虑的迹象；1893年，她在拜访一位灵媒之后宣布要“为我的儿子们祈祷，等他们长大了，教他们去祈祷和奋斗”。但是，她的这些疑虑似乎并没有让她真正认清自己的处境。她准备接受奥斯卡告诉她的一切。^③

那天深夜，当罗斯赶到埃文代尔酒店时，他发现道格拉斯已经在那里了。王尔德原本希望先和罗斯单独商量一下，但道格拉斯碰巧来了，他急于参与商议。^④三个人都热衷于采取法律行动。这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在他们看来，昆斯伯里的指控似乎是在对王尔德与

波西的友谊怀有敌意的背景下提出的。因此，他们想到了采取行动。事情看上去大有成功的希望。昆斯伯里如果想为自己的诽谤罪辩护，就需证明这一冒犯性的陈述（王尔德是“鸡奸者”）是真实的，还要证明此举是为了“吸引公众的主意”。昆斯伯里怎么可能做到呢？王尔德和道格拉斯非常乐意为他们的关系辩护，这是一种崇高的、柏拉图式的关系。当涉及他们之间的性关系时，他们可以直接否认。如果昆斯伯里打算指责王尔德腐化了他的儿子，可能还腐化了其他人，那么波西本人肯定可以驳斥这一指控。道格拉斯开始盼望他的父亲被关进监狱，或被送进疯人院。❶

第二天，王尔德和罗斯、道格拉斯一道去拜访汉弗莱斯。他们觉得老律师的话很鼓舞人心。当他被问及昆斯伯里的指控是否属实时，场面有些尴尬。王尔德断然否认。“如果你是无辜的，”律师回答说，“你会成功。”❷钱的问题仍然存在。不管结果如何，提起诉讼代价高昂。王尔德犹豫了。他期望从他的戏剧中赚到的钱还没有到账。然而，道格拉斯坚持说，无论“需要”什么，他的家人都会支付，因为他们急于让侯爵承担责任。在这一承诺的支持下，王尔德示意，无情的法律程序开始了。❸

事情发展得很迅速。当天下午发出了搜查令，第二天早上，昆斯伯里在卡特酒店（距离阿尔比马尔俱乐部只有几家店面）的房间里被逮捕了。他被带到马尔伯勒街治安法庭，被控犯有刑事诽谤罪。乔治·刘易斯在接到简短通知后被传唤代表昆斯伯里出庭，他立即要求将此案延期7天审理，并将他的当事人保释出来。地方法官同意了，但首

先要让俱乐部看门人提供证据，证明昆斯伯里写了那张冒犯人的卡片。当赖特先生断定，卡片上的那句话写的是“给男妓和鸡奸者(ponce and somdomite)奥斯卡·王尔德”时，侯爵夫人插话说，那句话实际上写的是“摆出鸡奸者的样子”(posing as sodomite)。❷这一纠正虽小，但很能说明问题：作为一项指控，它更加模糊，没那么严重，或许更容易辩护。昆斯伯里并没有被诉讼吓倒，他坚称自己很高兴“成功地”将事情“闹大了”。❸

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王尔德阵营的情绪。那个星期，王尔德欢欣鼓舞地得知乔治·刘易斯以他与王尔德和康斯坦斯的友谊为由退出了这个案子，将他的业务转给了32岁的查尔斯·罗素。让他略感受挫的是，罗素——在他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父亲建议下——聘请了王尔德在圣三一学院的校友爱德华·卡森担任首席律师。汉弗莱斯在雷吉·特纳的建议下，一直希望邀请卡森加入王尔德这方的律师团队。然而，王尔德并没有为此过分担心，他忽视了卡森日益增长的声誉，反而回忆起此人在圣三一学院时是个单调乏味的二流学生。❹这次冒险行动成本巨大，这一点正在变得日益明显。汉弗莱斯要求预付150英镑才能提起诉讼。眼下昆斯伯里夫人和珀西都指不上。王尔德虽然从乔治·亚历山大和其他人那里预支了大约800英镑，但大部分钱都被那些不耐烦的债权人“吞掉”了。道格拉斯——根据他自己不太可靠的证词——也掏空了自己的银行账户，来支付眼前的法律费用。❺

王尔德出席了3月9日星期六举行的听证会，场面十分壮观。他在波西和珀西·道格拉斯的陪同下，三人分别乘坐一辆普通马车和一辆双

人马车到达。尽管早到了10分钟，他们还是发现狭窄的马尔伯勒街法庭里已经挤满了人。那里大约有30名记者。王尔德身着华丽的深蓝色天鹅绒镶边外套，纽扣上插着一朵白花，在他的律师席旁坐下。然而，当法官进入法庭时，波西和他的哥哥被命令离开了法庭。卡森代表侯爵到场。

听证会是确定是否有足够的证据对被告进行刑事审判的初步程序。尽管整个过程主要涉及法律细节，但期间仍有诸多意味深长的时刻。汉弗莱斯对王尔德作了简短的盘问，王尔德立刻显示出，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证人。“您是剧作家，还是作家？”他高傲地回答：“我相信我是著名剧作家兼作家。”治安官——“将这出奥斯卡主义戏剧扼杀在萌芽状态”（《帕尔摩报》的说法）——严厉地告诉他，只需回答问题本身。汉弗莱斯还提到了几封昆斯伯里写给波西和其他家庭成员的信件，被告似乎在这些信件中诽谤了王尔德。但他拒绝在法庭上宣读这些信，理由是其中提到了一些“上流人士”，这引发了媒体的兴趣。卡森在表示昆斯伯里将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也证实了侯爵攻击王尔德完全是出于“拯救”他的儿子。地方法官将在4月初的下次开庭审理中，如期把昆斯伯里交付中央刑事法院。王尔德被要求支付40英镑出席并提起诉讼。①

事情似乎在按计划进行。汉弗莱斯非常有把握。为加重昆斯伯里的罪行，提高案件的严重性，他将起诉书分成两个部分，声称侮辱王尔德“摆出鸡奸者的样子”，可能意味着王尔德不仅“摆了样子”，而且他还确实“犯下了，并且习惯于犯下令人憎恶的鸡奸罪”。②星

期一的听证会结束后，波西曾经见过律师，他告诉哥哥“一切都很好，我们会闯过去”。^①其他人也持乐观态度。阿瑟·汉弗莱斯（刚刚修改完成《奥斯卡语录》）在同一天给王尔德的信中热情地写道：“我相信你会成功，每个人都这么认为。”^②

虽然这似乎应该是一个听取建议、制订计划的时刻，但王尔德还是被道格拉斯——以及整体的乐观氛围——说服了，他又可以去度假了。他们典当了一些珠宝凑了点钱，去蒙特卡洛待了一个星期。当波西在赌场大把输钱的时候，王尔德正在努力地逃避即将开庭的案子所带来的焦虑。^③

回到伦敦，王尔德发现等待他的是大量新到的法律账单（以及一些旧的家庭账单）。他不得不筹集500英镑，确保让爱德华·克拉克爵士担任他的首席律师，威利·马修斯和特拉弗斯·汉弗莱斯担任副律师。昆斯伯里太太还在佛罗伦萨，珀西也不在伦敦，他不得不向朋友们寻求帮助。在接到通知后很短的时间内，艾达·莱弗森的丈夫欧内斯特提供了所需的钱数，据说是将其作为一笔贷款，直到能够在“一周或最多十天之内”由道格拉斯家偿还。^④王尔德一如既往地由波西陪同（后者现在称其为“我们的案子”），在爱德华爵士的房间里同他见了面。这位前副检察长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和汉弗莱斯一样，询问昆斯伯里的指控是否属实，并得到了郑重的保证，即那些指控纯属子虚乌有。见面之后，道格拉斯认为，克拉克爵士可能会要求他和哥哥珀西作为证人来指证他们父亲的品行。他对前景感到乐观。^⑤

昆斯伯里的申诉似乎主要基于王尔德出版的作品中所谓的“不道德”和“鸡奸”特征，其中最主要的是《道林·格雷的画像》。申诉材料有薄薄的一沓。王尔德作品刚一问世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因此这些论点听起来耳熟能详，他觉得自己有充分的准备来反驳它们。听说昆斯伯里计划拿出一本《变色龙》作为证据，相信它会“证实我对这个奥斯卡·王尔德的评价”，王尔德认为这就更没什么值得担心的了。侯爵最初错误地认为，王尔德是一个匿名“鸡奸故事”的作者，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的牧师与他迷恋的少年助手签订了自杀协议。尽管后来他发现这个故事实际上出自该杂志编辑J.F.布洛克萨姆之手，但他觉得这“无关紧要”，因为王尔德的“名字就在这份杂志上，其中有他署名的许多肮脏的原则”。他指出，这份出版物中还包括他儿子写的两首“肮脏的”“所谓诗歌”，《赞美羞耻》和《两种爱》——后者的“结尾是这样的：‘我是不敢呼吸的爱（原文如此）’——意思是鸡奸”。^⑩

除了文学，我们不清楚侯爵还能拿出些什么证据。他曾向珀西的妻子吹嘘说，库克侦探掌握了有关王尔德的确凿信息，但这种威胁含糊其词。^⑪王尔德从昆斯伯里拜访泰特街的记忆中（以及昆斯伯里写给波西的各种信件中），了解到侯爵的一些怀疑。他似乎知道王尔德曾经因为那封“疯狂之吻”的信而遭到敲诈，也听说过关于他在萨沃伊庄园的一些传言。然而，这还不够。王尔德先发制人地向汉弗莱斯和克拉克讲述了敲诈事件的来龙去脉，他称这封信充满了艺术气息，几乎是一首“散文诗”，而且确实被翻译成了法语诗，并发表在一本

杂志上。此外，他还指出，原来的那封信已经退回给他，没有支付任何勒索的费用。

然而，当王尔德找到弗兰克·哈里斯，问他是否可以提供证据证明《道林·格雷的画像》并非是一本不道德的书时，他的乐观情绪受到了打击。哈里斯欣然同意提供帮助，但他规劝王尔德，打官司是绝对愚蠢的做法——（不管他的律师们怎么说）其结果是不确定的，没有哪个英国陪审团会宣告一个“试图保护儿子”的父亲有罪。周末，哈里斯咨询了法律界的熟人，发现所有“重要人物”都认同王尔德会输掉这场官司，这不仅是因为昆斯伯里摆出了一副关心孩子的父母模样；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王尔德确实有罪。哈里斯敦促王尔德停止这种行为，和妻子一起出国，让昆斯伯里和道格拉斯自己去解决他们的恩怨。这是第一个令人不安的危险信号。

第二天下午（3月25日星期一），王尔德在皇家咖啡馆再次与哈里斯会面，进一步讨论此事。与哈里斯共进午餐的萧伯纳也建议王尔德放弃诉讼并离开英国。哈里斯建议王尔德可以给《泰晤士报》写一封貌似有理的信，解释他的决定。这个计划确实很有吸引力，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王尔德似乎一度打算予以采纳。但这样做会带来经济上的后果：王尔德除了要为放弃起诉支付40英镑的保证金外，还要承担昆斯伯里迄今为止的法律费用。然而，不切实际的王尔德不太可能计算得出方程式的这一边。他还没来得及表态，道格拉斯便加入了进来。他立刻否定了这个计划。“提出这种建议，说明你不是奥斯卡的朋友。”他生气地对哈里斯说，然后便气冲冲地走了。王尔德顺从地

跟在哈里斯后面，对哈里斯说：“弗兰克，你这么做不够友好。真不够友好。”显然，他要走的路已经定了，而且道格拉斯一定会让他继续走下去。❶王尔德用其他的声音盖过了哈里斯和肖的建议。他对艾达·莱弗森说，“了不起的”罗宾逊夫人预言，他们将“大获全胜”。

❷

办案没有丝毫松懈。双方律师都急切地希望能“迅速处理”这个案子。尽管昆斯伯里的律师声称要到3月30日才能提交答辩理由，但王尔德一方决定不“采取要求休庭的惯常做法”以便调查其主张，审判日期定在4月3日星期三。❸与此同时，他还需要更多的钱。王尔德向沃尔特·帕尔默借了400英镑，尽管他是否收到这笔钱似乎令人怀疑。❹康斯坦斯从表姐伊丽莎·纳皮尔那里筹了50英镑，从伊丽莎的母亲那里筹了100英镑，还从自己的钱里拿出了50英镑。❺

星期六上午，王尔德收到答辩理由时，他恢复的信心一下子荡然无存。虽然该文件称《道林·格雷的画像》和《变色龙》都是“蓄意颠覆道德，鼓励不自然的恶行”的作品，但在这些意料之中的文学指控之前，罗列了一长串令人意想不到的人名。文中连篇累牍地断定，王尔德曾教唆并煽动年轻男子“进行鸡奸和其他严重的猥亵行为”，尽管其中声称他只是实施了“上述严重猥亵行为”，而不是鸡奸本身。这一措辞巧妙地将辩方从证明“鸡奸”确实发生的困难中解脱出来，而且（爱德华·克拉克爵士注意到）他们的证人也不必承认“自己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与此同时，它还有力地表明，王尔德所做的远远不止是“摆出一副”鸡奸者的样子。文件中给出了名字、日期和地

点：阿尔比马尔酒店的爱德华·谢利和西德尼·马弗；巴黎的弗雷迪·阿特金斯和莫里斯·施瓦贝；泰特街的阿尔弗雷德·伍德；萨沃伊酒店的查尔斯·帕克；牛津和戈林的沃尔特·格兰杰；沃辛和布赖顿的阿方斯·康威。这份名单一直追溯到了三年前。雷吉·特纳回忆，那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让人很难理解这些资料是如何搜集起来的。

尽管王尔德一直对事实一无所知，但对他的指控是一桩奇怪的偶然事件。在诉讼开始阶段，昆斯伯里除了传闻、王尔德出版作品的大概和他手中一封措辞夸张的写给波西的信外，几乎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可以用来支持他的辩护。事实上，卡森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受这个案子，部分原因是他不喜欢与他的老同学作对，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案子证据实在不足。然而，昆斯伯里的律师罗素告诉他，他的调查人员（前伦敦警察厅警探利特柴尔德和基利）根据昆斯伯里的指示展开调查，正在追查几条有价值的线索。他的导师哈尔斯伯里勋爵，也进一步说服他接下了这个案子。

即便如此，卡森直到马尔伯勒街的听证会即将召开时，显然还是倾向于建议昆斯伯里认罪。就在那时，他得知，根据从萨沃伊酒店得到的线索，罗素的调查人员追踪查尔斯·帕克到了皇家炮兵兵营，并对他施加压力，要求他就自己与王尔德的性关系发表声明。这件事很棘手，因为罗素并非王室政府代理人，所以不能为帕克提供免于起诉的豁免权，因为证据必然会自证其罪。法律威胁和金钱诱惑都起了作用。

有了第一个发现之后，其他事件陆续曝光。查尔斯·布鲁克菲尔德痴迷于对王尔德的敌意，开始自己调查王尔德的性习惯和秘密接触。他从伦敦一家剧院的一个毫无戒心的看门人那里打听到，阿尔弗雷德·泰勒是王尔德的同伙，于是便把这个名字给了利特柴尔德和基利。基利在泰勒以前住过的一个地方——教堂街3号——发现了泰勒留下的一个“装满文件的帽盒”。里面装着许多罪证。罗素从泰勒的信件和笔记中识别、追踪并得到了西德尼·马弗、阿尔弗雷德·伍德、弗雷迪·阿特金斯、罗伯特·克莱本和威廉·艾伦的陈述。他们追踪到王尔德过去的活动：在牛津、戈林和沃辛；在萨沃伊酒店和阿尔比马尔酒店。他们还面谈并收买了王尔德之前的仆人。沃尔特·格兰杰、阿方斯·康威和爱德华·谢利发现自己落入了罗素的圈套。 ⑩

王尔德在审视答辩理由的时候可能已经注意到，其中一些确切的细节是错误的。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指控都不易在法律上得到证明，但他看出了它们的本质，在公开法庭上展开这样的讨论只能意味着彻底的社会性毁灭。如果这些证据能够得到证实，那么结果不但昆斯伯里会得到无罪释放，而且——很有可能——他自己也会被逮捕。他的脚下出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裂口。从那一刻起，正如特纳所说，他“心里想到了死亡”。 ⑪

现在看来，撤诉肯定更有利，但为时已晚。事实上，即便哈里斯和萧伯纳在这周开始时就提出这个建议，可能也已经太迟了。如果王尔德撤诉，昆斯伯里也不可能让这件事平息下去。他有权对王尔德诬告他诽谤提起诉讼。或者，就像现在看来的那样， he 可以把一大堆关

于王尔德性关系的有害信息递交给刑事检察长。如果王尔德去了国外（哈里斯敦促他这样做），就会被视为承认有罪。王尔德开始意识到他已经误入了一个“诱捕陷阱”。^①除了继续推进，没有别的选择。王尔德——一如既往地，在道格拉斯的陪伴下——回到了汉弗莱斯阴冷的办公室，在“可怕的怒目而视”之下，一字一句地仔细检查答辩理由，“一脸严肃地对一个秃顶男人说着可怕的谎言”，否认其真实性。^②

星期一晚上，王尔德与康斯坦斯和波西一起观看了《不可儿戏》，以示公开反抗。虽然他假装很享受这个夜晚，但可以理解的是，康斯坦斯自始至终“非常激动”。道格拉斯发现，晚上分手时，她“热泪盈眶”。亚历山大也很激动。当王尔德在幕间休息来回踱步时，这位演员兼经纪人也敦促他离开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想让我出国，”王尔德回答，“我刚从国外回来。现在我又回到了家。一个人是不能老是出国的，除非他是个传教士，或者和这个差不多，是个商业推销员。”^③

王尔德还有一丝微弱的希望，那就是昆斯伯里的律师实际上并没有证人或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们大胆的辩护主张（辩方没有义务披露此类事情）。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王尔德写信给阿尔弗雷德·泰勒。他还试图联系认罪书中最“受人尊敬”的年轻人西德尼·马弗。在审判开始的前一天，泰勒到泰特街去见他。他似乎和王尔德一样，对大量的爆料感到迷惑不解，并着手进行调查。他的发现令人不寒而栗。不久，他写信给王尔德，说有一个私家侦探（一个名叫“利特柴尔

德”的前警探)正在监视他,这个人或者其他什么人闯入了教堂街他以前住过的房间——那里可能有许多罪证。❶这是个不祥的消息。

3 公诉人

我们去了女算命师罗宾逊那里。她预言将大获全胜，真是妙不可言。

——奥斯卡·王尔德

“女王（王尔德）诉昆斯伯里侯爵”案于1895年4月3日星期三上午10点半在老贝利中央刑事法院开庭。这是人们热切期待的。昆斯伯里的辩护细节虽然没有公布，但已经部分地为人所知。王尔德到达时，发现狭小的法庭里挤满了戴着假发的律师，他们急于见证这出好戏。人们坐在座位上、长凳上，还有“一大群喋喋不休、戴着灰色假发、身穿黑色长袍的人，站在法庭的过道和走廊上”。为数不多的几处尚未被占领的地方聚集着媒体；而在上方，狭窄的公众旁听席上挤满了旁听的观众，这些人全部是男性。王尔德挤过人群去找他的律师团队，其间不得不与站立着的昆斯伯里侯爵——瘦弱而憔悴，但仍然十分好斗——擦身而过。侯爵扎着一条剑桥蓝色的硬领巾，而不是衣领配领带。他的红胡子竖立着。王尔德本人刻意保持着严肃，甚至是庄重，上身一件黑色晨礼服，黑色领带上别着一枚钻石和蓝宝石的领带夹，人们注意到，他的纽扣孔是空的。❷法官亨·柯林斯在法庭上就座。昆斯伯里走上被告席，他双臂交叉地站在那里，拒绝坐到椅子上。陪审团（由十几名伦敦北部的店主组成）宣誓。案件开始审理。

❷

爱德华·克拉克爵士简短地提到了昆斯伯里辩护词中提出的“猥亵”指控，但他意在对这些指控做淡化处理：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辩方需要提供“可信的证人”和实际证据来支持如此严重的指控。接着他概述了王尔德的事业、家庭生活和文学成就；他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友谊，以及他与日益放纵的昆斯伯里打交道的情况。爱德华爵士提到了《道林·格雷的画像》和《变色龙》。为了抢先筑起一道可能的防线，他提到了王尔德写给道格拉斯的那封“天花乱坠”疯狂亲吻的信，讲述了这封信如何落入阿尔弗雷德·伍德手中，王尔德如何拒绝了艾伦和克莱本的勒索，以及这封信是如何从一篇“散文诗”变成了一首法语十四行诗。然后，他将王尔德带入了同样的立场……

王尔德在证人席上摆出轻松的姿势，双臂倚在栏杆上，表现得十分自信。他对发生在泰特街的历次冲突——先是与艾伦和克莱本，然后是与昆斯伯里——做了精心的描述，大部分内容清晰而简洁，引发了阵阵笑声。听众们尤其喜欢其中那句“我不知道昆斯伯里规则是什么，但奥斯卡·王尔德的规则是当场射击”。昆斯伯里站在几英尺开外的被告席上，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看着，他的下嘴唇不停地翕动着。

⑩

对证人的讯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接着，卡森站起来开始质证。王尔德预见到了这场对峙，他曾对他的法律顾问说：“毫无疑问，他在执行任务时会捎带上一份老朋友的怨恨。”^⑪ 他说的没错。王尔德微笑着面对他的对手。《每日纪事报》评论说：“一个男人到了这种时候，倒不如向着刑架微笑。”卡森可能患了重感冒，但他仍以一贯

坚持不懈的热情投入工作。他的第一步就是证明，王尔德并不如他向爱德华·克拉克爵士宣称的那样是39岁，而是“40多岁”。这一论点够小（只不过相差6个月而已），但它揭示了王尔德对待真相漫不经心的态度，也凸显了他与24岁的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之间的年龄差距。然而，卡森并没有立即强调这一点。相反，王尔德发现自己被引向了更有把握的文学领域：他为道格拉斯发表在《变色龙》杂志上的两首诗进行了辩护，称其“写得极美”，拒绝对方将话题引向《牧师和助手》的故事。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这个故事“不道德”时，他回答说：“更糟糕的是，它写得很烂。”在谈到自己对杂志的贡献时，他开玩笑地说：

卡森：听着，先生。这是你的文章《供年轻人使用的至理名言》中的一句话：“邪恶是善良的人们编造的荒诞说法，用来解释别人的奇特魅力。”（笑声）……你认为这样说对吗？

王尔德：我很少认为自己写的任何东西都是对的。（笑声）……根据事实来说，它是不对的；它们只表达任意的矛盾情绪、快乐的情绪，无意义——但就生活中的实际事实来说，它们是不对的；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遗憾。

至于“宗教在被证明是正确的时候就消亡了”或“说真话的人迟早会被揭穿”这样的话是否适合“年轻人”，王尔德向他的大学老同学建议：“任何东西，只要能激发任何年龄的人们的思想，就都是好的。”

当卡森把他拉进有关《道林·格雷的画像》和于斯曼的《逆流》的讨论时，他继续坚持自己对艺术和道德绝对分离的信念。他不得不承认，在将原来的杂志故事修改成书籍版本时，他修改了其中一段，以免无意中传达出“道林·格雷犯下了鸡奸罪的印象”。但他声称，如此做法不是为了平息大众媒体的道德呼声，而是听从了伟大的文学评论家沃尔特·佩特的建议。这是一种艺术判断。

卡森多次试图将《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故事与王尔德自己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友谊联系起来，但王尔德都避开了。卡森——从他所谓“净化过”的段落中——引用了巴兹尔·霍尔沃德描述他如何“疯狂地、夸张地、荒谬地崇拜（道林）”的描述，并质问道：“你是否曾经疯狂地喜欢过一个年纪比你小很多的年轻人？”“除了我自己，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这句话又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同样招来笑声的还有他断定，有关这种迷恋的整个想法是从莎士比亚那里“借来”的。王尔德自豪地宣告了他对道格拉斯的“爱”，但将他描述为自己伟大的“朋友”。他辩护称，自己那些措辞夸张的信件是“美丽的”艺术作品。②②

卡森依然固执己见。在法庭上许多在场的人看来，他们是在见证一场“巨人的较量”。王尔德保持着镇静，赢得了笑声，但卡森拒绝转移话题。他那“苍白、瘦削、聪明”的脸在假发之下显得格外突出。他施展出自己在言谈举止方面的武器——意味深长的停顿、好奇的表情、冷酷的微笑。据《每日纪事报》报道，他“非常沉着冷

静”，“不管对方的论据多么充分，在质证的过程中，证人对于他就像板条对生铁一样”。^①

整个漫长的下午，随着一个接一个问题，他们从文学转向了生活，也转向了王尔德与一连串年轻人的友谊。阿尔弗雷德·伍德是谁？他的职业是什么？他多大了？怎么认识的？王尔德是不是带他去吃晚饭并给了他钱？他是怎么认识爱德华·谢利的？他在何时何地遇见阿方斯·康威？王尔德是不是给他买了一套新衣服，还是给了他一个烟盒？康威是不是管他叫奥斯卡？每到这个时候，卡森就会指出“奥斯卡”和这些“男孩子们”在年龄、阶级、智力水平上的差异：伍德是“24岁”的无业“职员”；谢利是“18岁”的博德利·黑德公司“办公室杂工”；和他们差不多年纪的康威是沃辛海滨的“游手好闲者”。^②

不过，卡森的问题还触及了更阴暗的地方：“你是不是邀请伍德去了你在泰特街的家？”“那时候你妻子是不是在托基？”“你和伍德之间发生过不道德的行为吗？”“有没有把手放在他身上？”“（谢利）是不是（在阿尔比马尔酒店）住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8点钟离开的？”“你是不是在（兰辛）路上吻了（康威）？”对于这一连串的问题，王尔德只能给出一连串坚决否认，但这些问题已经足够具有破坏性。它们第一次向王尔德透露了辩方设法获得的信息范围。很明显，他们从不同的证人那里得到了详细的第一手证词。^③当法庭在5点差一刻休庭时，王尔德肯定已经精疲力竭。这是令人痛苦的一天，下午的爆料毁掉了上午的成果。

淫荡的媒体有很多猛料可以报道，淫荡的公众有许多话题可以议论。这个案子简直成了“伦敦西区野蛮男人享受了好几天的极致‘美味’”。它集不正当的性关系和王尔德式智慧于一身，对于购买报纸的公众来说简直不可抗拒。❷甚至当王尔德离开法庭的时候，报童们还在兜售晚报，上面报道的是上午的庭审过程。“丑闻”“轰动”“非同寻常的爆料”成了头条新闻。许多报纸刊登了逐字记录的报告，记录了大部分质证内容——只是用“不知名”的罪行模糊地提到了“鸡奸”，或者采用了一排省略号。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中，《圣詹姆斯公报》鹤立鸡群，该报完全拒绝提及此案——这个举动为它赢得了更多的关注，而非销量。

第二天早上，冷酷的庭审又开始了。王尔德相当克制，在卡森的要求之下被迫描述了他与阿尔弗雷德·泰勒的“亲密关系”，并讲述了他位于利特尔学院街的“香味很浓”点着蜡烛的房间里举行的男性茶会。❸卡森随后开始念一份名册，这些年轻人都是工人阶级，通常处于失业状态，他们都是王尔德——卡森认为——通过泰勒认识并款待过的，包括：弗雷德·阿特金斯、查尔斯·帕克和他的兄弟威廉、西德尼·马弗、欧内斯特·斯卡夫（“大约20岁时”，曾经当过贴身男仆）。王尔德和他们有过“亲密关系”吗？他否认了。他是不是送过他们烟盒？他承认，自己喜欢送别人烟盒。当被问及他和这些人有什么共同之处时，他答道：“好吧，我来告诉你，卡森先生。我喜欢和比我年轻得多的人交往。我喜欢那些被人称作闲散和无所事事的人。在我眼里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之分，对我来说，年轻，只是年轻，就是

极其奇妙的，我宁愿和一个年轻人谈上半个小时，也不愿在法庭上被人讯问。”

其间王尔德说过几次俏皮话。当被问及“加冰香槟”是否是他最喜欢的饮料时，王尔德回答说：“是的，严重违背了我的医嘱。”“不必在意医嘱”，卡森插话道，并允许王尔德回击说：“我不这么想。如果你放弃医生的忠告，你会尝到更多的滋味。”这样的玩笑也许可以博得一笑，但卡森知道，它们无法动摇陪审团的意见。他毫不客气地把话题转到沃尔特·格兰杰身上，他是道格拉斯在牛津寓所里的一个十几岁的仆人。“你和他一起吃过饭吗？”“从来没有过。”“你亲吻过他吗？”“哦，没有，从来没有。他是一个相貌极其普通的男孩子。”王尔德轻描淡写地透露了自己的条件，但卡森一下子抓住这一点，抛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卡森：他怎么了？

王尔德：我说了，我认为不幸的是——他的外貌很不幸——很丑——我的意思是——我因此而同情他。

卡森：极丑？

王尔德：是的。

卡森：这就是你没亲吻他的原因？

王尔德：不，不是，你这就如同问我为什么不亲吻门柱一样，太好笑了。

卡森：难道你告诉我他很丑，不就是为了解释你为什么没有亲吻他？

王尔德：不是，我没那么说。

卡森：那你为什么提到他的丑？

王尔德：不，因为你的问题在我看来好像是故意侮辱我，你整个上午的问题好像都是这样。先问是否与他一起吃过饭，再问是否亲吻过他，很无聊。

卡森：因为他丑，所以你没有亲他？

王尔德：不是。

卡森：那你为什么提到他的丑？我必须问这些问题。

王尔德：我认为，想象一下，在任何情况下发生这些事都是很可笑的。

卡森：为什么提到他的丑？

王尔德：就为这个。如果你问我是否亲吻过一根门柱，我会说：“不！太可笑了！我不想亲吻门柱！”这个问题太荒唐了。

卡森：你为什么要提到那个男孩子的丑？

王尔德：或许是因为你用侮辱性的问题侮辱了我。

卡森：因为我用侮辱性的问题侮辱了你？

王尔德：是的，你用侮辱性的问题侮辱了我；你让我生气。

卡森：你说是因为我用无礼的问题纠缠你，所以你说那个男孩子丑？

（说到这里，王尔德的几次回答都不清楚，也都没说完。他努力集中思想，但卡森先生只是厉声重复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提起这个？”最后王尔德回答道……）

王尔德：对不起，你纠缠我，侮辱我，想方设法激怒我。人一生气说话就会变得轻率，我承认这一点，我承认这一点——我克制不住。这就是你对我做的。

卡森：你说那是轻率？你轻率地说他丑；这就是你现在希望表达的意思？

王尔德：别说什么我希望表达什么意思。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卡森：是不是说，那是个轻率的回答。

王尔德：哦，是个轻率的回答，是的；我要说，那当然是个轻率的回答。

卡森：你们之间发生过猥亵之事吗？

王尔德：不，先生，没有，从来没有。 ⑩

对于法庭上的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高潮时刻，王尔德惊慌失措地步步后退，因为他无意中间接承认，他会考虑亲吻一个没那么“不幸”的男孩。 ⑪

没过多久，卡森的质证结束了，爱德华·克拉克爵士试图通过重新审视王尔德来夺回主动权，让他在更好的状态之下来描述自己的各种关系：强调阿尔弗雷德·泰勒（一个有教养，会弹钢琴的马尔博罗学校毕业生）和刻意不具名的莫里斯·施瓦贝（“一位地位高、出身好、名声好的绅士”）都是有地位的体面人；他在与谢利和康威的交往中表现出真正的关切和慷慨。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把昆斯伯里写给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和阿尔弗雷德·蒙哥马利的几封言辞激烈的信件拿出来作为证据。果然，当念到信中将王尔德称为“该死的坏蛋和罗斯伯里式的懦夫”时，法庭上短暂地骚动了一阵，但是信的其余部分清楚地表明，昆斯伯里对罗斯伯里的愤怒是因为罗斯伯里、格莱斯顿和女王在提拔德拉姆兰里格子爵为贵族时施加了政治上的轻视。也有人对侯爵表示同情，在无休无止的读信期间，侯爵一直站在被告席上，“交替凝视着”证人席上的王尔德，以及坐在法庭对面的儿子。

《太阳报》写道：“他不时地转向证人席上的那个人，咬紧牙关，向证人猛烈地摇头。然后，当读到信中的悲惨片段时（关于德拉姆兰里格之死），可怜的老贵族竭力抑制住泪水，他不得不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流出来。” ⑫ 这封信作为证据，它对王尔德的案子毫无帮助。然

而，它确实提及了罗斯伯里的这位政敌兼私敌——或者还暗示了更多。⑩

新证据的出现为卡森提供了重新质证的机会。王尔德可不喜欢这样的前景。午餐休息时，他询问律师顾问，对方是否可以“选择任何方面”对他进行盘问。当他被追问到底为什么焦虑时，他坦白说：“不久前，我在午夜时被赶出了阿尔比马尔酒店，当时有一个男孩和我在一起。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件事，可能会很尴尬。”爱德华·克拉克爵士得知此事后，必然很沮丧。⑪午餐后，王尔德没有继续出现在证人席上，法庭上有人低声说，他一定是逃走了，不愿意再次面对卡森。但事实证明谣言是假的。他在2点15分时出现了，为他吃午饭的那家餐馆的钟走得太慢而感到抱歉。

结果，卡森并没有针对新证据进行质证。克拉克爵士也没有像一些人预料的那样，在这个阶段传唤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作为证人。他宁愿“暂时”了结案子。王尔德抓住这个机会离开了证人席和法庭。他错过了卡森那自信而令人震惊的结案陈词的开场部分，但他肯定及时赶回来了，而且听到阿尔弗雷德·伍德回来了——王尔德以为他在美国，但他却回到了伦敦——并将出庭作证：“（他）将向你们描述——我不打算向你们预测——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几乎从他们认识之初就开始，如何一次又一次地与他采取肮脏和不道德的行为。”听到这里，整个法庭都惊呼了一声，但这只是众多证人中的一个。卡森已经表示，查尔斯·帕克也会到场，萨沃伊酒店的目击者会证明关于王尔

德在酒店的“不道德行为”的指控是“完全正确的”。休庭时，卡森的发言尚未进行到一半。⑨

出于方便考虑，王尔德住到附近的霍尔本高架桥酒店。他和波西一起给艾达·莱弗森发了封电报，取消了当晚的晚餐约会。“我们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解释道，“事事都很令人满意。”⑩然而，它并不“令人满意”。虽然他们可能会说服自己，卡森威胁要提供的大多数证人都是共犯和自认的罪犯，他们的证词可能会受到怀疑，但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较量是极其危险和不确定的。

第二天早上，爱德华·克拉克爵士要求与王尔德会面。他整夜都在考虑这件事，并认为，根据他们已经得知的情况，陪审团一定会宣判昆斯伯里无罪，唯一明智的做法是王尔德撤回诉讼，并允许克拉克爵士以他的文学作品为由，同意对较轻的“摆出鸡奸者的样子”的指控作出“无罪”判决。否则，就会有这样的风险，如果案子到了最后，所有的证据都提供了，陪审团也做出了有利于被告的裁决，法官就会在公开法庭上下令逮捕王尔德。律师顾问威利·马修斯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昆斯伯里的证人的可信度可能会受到质疑，案件仍有可能胜诉。不过，王尔德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⑪显然，他被克拉克的意见所打动，他认为这个案子可能还会持续三四天；这笔费用将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似乎克拉克也认为他已经和卡森达成了一项私下协议，即如果现在放弃这个案子，“就不会再听到关于这件事的任何消息了”。⑫无论如何，王尔德接受了克拉克的建议。

得知自己无须继续出庭时，他松了一口气。当他的律师进入法庭时，卡森已经继续开始了他无情的结案陈词，王尔德从侧门离开，坐车去了不远的霍尔本高架桥酒店。很快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和他的兄弟珀西，还有罗比·罗斯和（最有可能的）雷吉·特纳也来了。②

他的案子失败了。巨大的震惊接踵而来。王尔德得知，克拉克无法将昆斯伯里的胜诉仅仅局限于针对“摆出鸡奸者的样子”的指控上，侯爵被判支付了诉讼费，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事情”现在会得到了结。《太阳报》的一名记者前来采访时，珀西出来回答问题，他声称波西很想去证人席，但王尔德不让他这样做。然而，他强调，他——“和我们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除了我的父亲”——拒绝相信辩方对王尔德的指控，并声称：“以王尔德先生的全权授权，他可以声明，王尔德先生没有立即离开伦敦的想法，将继续面对诉讼的任何结果。”王尔德给《伦敦晚报》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

4 女王诉王尔德

人所受之审都是永世之审。

——奥斯卡·王尔德

那天下午，王尔德写了不止这一封信。他似乎给康斯坦斯写了一张便条，敦促她不要让任何人进入他的“卧室或起居室”。与此同时，昆斯伯里的律师查尔斯·罗素当即写信给政府检察官汉密尔顿·卡夫，随审判记录一起附上了“我们所有证人的证词副本”，以确保“正义”得以伸张。^①卡夫除了要求立即面见罗素之外，还把详细情况送到下议院，提请内政大臣阿斯奎斯，以及司法官员罗伯特·里德爵士（首席检察官）和弗兰克·洛克伍德爵士（副检察长）予以关注。

这次高级别磋商无疑具有启发性：此案已经涉及政治层面。克拉克宣读昆斯伯里信件的决定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法庭上提及了罗斯伯里和格莱斯顿的名字（尽管是间接的），这使自由党处于尴尬的境地。在与王尔德打交道时，他们要表现得毫无畏惧或偏袒，以免有人声称他们参与了某种掩盖行为。王尔德在八十俱乐部的三位前同事——阿斯奎斯、里德和洛克伍德——很快同意申请搜捕令，阿斯奎斯指示逮捕王尔德，“无论他身在何处”。^②

至于侯爵，他已经走出老贝利法院，欢呼的旁观者和支持者把他当成了胜利的英雄。据报道，他曾给王尔德送去一封信，信上称：“如果这个国家允许你离开，那么对国家反而更好，但如果你带

走我的儿子，我将跟随你到任何地方，并开枪打死你。”^①然而，当天下午他对聚集在卡特酒店的记者们说，不能允许王尔德逃跑，他“应该被安置在一个再也无法糟蹋年轻人的地方”。^②

尽管阿斯奎斯和昆斯伯里声明希望王尔德被捕，但如果他决定当天下午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大陆，他很可能会被允许离开。^③但是，正如珀西的声明和王尔德自己的信所表明的那样，他决定留下来。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其中的原因。罗斯劝他去法国。他的拒绝中或许含有几分反抗的意味，但其中多半是出于惰性。王尔德对自己的转变感到震惊：“这个跟头跌得多么惨！”他后来向艾达·莱弗森哀叹道。“为什么那个女算命师（罗宾逊夫人）只会说好听的？”^④他对算命师失望至极，似乎已经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几乎成了自己这场灾难的旁观者。^⑤

为了应对危机，他做了最后一个小小的努力，到访伊利广场附近乔治·刘易斯的办公室。然而，他的老朋友乔治爵士无能为力。“现在来找我又有有什么用，”律师喊道，“我什么也做不了。如果你一开始就明智地把昆斯伯里勋爵的卡片交给我，我会把它撕成碎片扔进火里，并告诉你不要出洋相。”^⑥王尔德不仅仅是出了洋相。

他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于是便坐着马车去圣詹姆斯的银行，然后又去了卡多根旅馆，波西自上周起一直住在那里。一群记者和昆斯伯里雇的侦探一路追着他在伦敦的行踪。当王尔德乘坐的车经过圣詹姆斯剧院时，他可能注意到自己的名字已经从干草市场剧院和圣詹

姆斯剧院外的节目单上删除了。在庭审的三天里，两家剧院的上座率都出现了“下降”。❶❷

午后，王尔德和他的三个朋友待在酒店里波西的房间内。他毅然喝下了白兰地苏打水。晚报已经在预言他会被捕。罗斯被派去将昆斯伯里胜诉的消息带给康斯坦斯，当时她和姑妈一起住在下西摩街。她带着维维安；西里尔已经离开比德尔斯，被送到了爱尔兰的亲戚那里。她流着眼泪恳求罗比劝说王尔德“出国”。❸然而，王尔德却丝毫不为所动，而且态度坚决。他断定“火车已经开走了……已经太迟了”——事实并非如此——并以此回避了所有关于逃跑的建议。事实上，定期从维多利亚出发的港口联运列车一直要营运到晚上10点差一刻。波西无法忍受等待的压力，就去下议院咨询他的亲戚乔治·温德姆，打听政府是否有意起诉。他离开之后，《星报》的一名记者来了，他告诉罗斯自己在新闻“记录”上看到了对王尔德的逮捕令。当局以几乎前所未有的速度采取了行动。当罗斯转达这个消息时，王尔德的脸变得“非常阴郁”。❹

大约6点半的时候有人敲门。两个便衣警察走进来。“我想，是王尔德先生吧？”王尔德站起身。他是不会惹麻烦的。他停顿了一下，穿上大衣，戴上手套，拿起一本皮埃尔·路易斯的最新小说，被带到楼下等候着的“四轮出租马车”那里。他先被送往苏格兰场，有人在那里宣读了逮捕令，根据1885年《刑法修正案》第11条指控他“对其他男性犯下严重猥亵行为”。他接着又被带到弓街警察局，在那里做了登记后被带进一个牢房过夜。道格拉斯和罗斯都不可以见他。

第二天10点，交付诉讼程序开始，法官约翰·布里奇爵士在弓街警察局狭小而拥挤的“上层”审判室进行了聆讯。王尔德发现阿尔弗雷德·泰勒也在被告席上，他是当天早上在皮姆利科的寓所被捕的。他们互相鞠躬致意。查尔斯·吉尔——昆斯伯里案中卡森的律师顾问——担任王室检察官。他开始慢条斯理地陈述对王尔德和泰勒的指控。卡森提到的证人开始一个个出庭：帕克兄弟、阿尔弗雷德·伍德、弗雷德·阿特金斯、西德尼·马弗，以及——适时出现的——爱德华·谢利。王尔德面临的危险和困难瞬时令人惊恐地近在眼前。这些证人已经准备好表明自己有罪，他们显然已经同意用证词换取免于起诉的豁免权。同样清楚的是，他们已经获得或正在接受昆斯伯里律师的经济支持。据说，爱德华·谢利在诽谤案审判期间出庭两天，得到了20畿尼，而他在博德利·黑德公司时的周薪只有15镑。查尔斯·帕克穿着由控方资助的新西装，看上去光彩照人。❷

王尔德不得不听取他们详细描述各自与他的种种邂逅：在科特那饭店的晚餐，在萨沃伊酒店的夜晚，在泰勒房间里聚会，在租来的寓所里约会，在泰特街和圣詹姆斯广场的秘密约会——以及性行为。威廉·帕克声称，泰勒曾告诉他和他的兄弟，王尔德希望他们表现得“像女人一样”。查尔斯·帕克描述了他和王尔德在萨沃伊酒店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的情景。（之后吉尔插话说，“我不打算听到更多任何细节了”。）阿尔弗雷德·伍德对于他和王尔德在泰特街发生的事情描述得极为生动，以至于内容“无法报道”，即便低档小报《雷诺兹报》也无法将其诉诸文字。❸在他们之后，是一批酒店员工、旅馆老板、侍者和仆人，他们或多或少见过王尔德有失体面的情形。萨

沃伊旅馆的按摩师和客房女仆曾经发现，王尔德的床上躺着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子；这个女仆还被王尔德的床单和睡衣上的“特别脏的”污渍震惊到了，那显然是被凡士林、精液和“粪便”弄脏的。❷

替王尔德辩护的是之前帮他起诉昆斯伯里遭到失败的那个法律团队。爱德华·克拉克爵士——似乎很后悔自己之前曾经建议王尔德撤诉——坚持他和他的助手们将免费提供服务。❸ 汉弗莱斯也不再给他寄账单（泰勒的律师是他自己请的专门律师J.P.格兰）。他们在弓街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上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西德尼·马弗被传唤作证时，详细讲述了去阿尔比马尔酒店拜访王尔德的情形，但随后——令控方惊讶的是（控方掌握着完全相反的证词）——他断然否认期间发生了任何不当行为。这一意想不到的倒戈要归功于道格拉斯；他在法庭的走廊上遇见了马弗，对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记住你是一个绅士，一个公学学生。不要和伍德和帕克那些人渣为伍。当律师问你问题的时候，否认整件事，你就说，你之前说的那些话，是因为你被警察吓坏了。他们不能拿你怎么样。”❹ 马弗的大变脸使得控方失去了表面上最“受人尊敬”的证人，而他也是将王尔德和泰勒联系得最紧密的证人。

辩方仍面临许多障碍。控方认为，王尔德和泰勒应该一起受审，这种安排可能对王尔德很不利。由于一天的时间不足以召集所有证人；因此还需要在4月11日和19日再举行两次听证。与此同时，王尔德的保释申请遭到驳回，据说是出于“案件的严重性”。约翰·布里奇爵士大大超越了他的司法裁量权，认为“没有比这种罪行更恶劣的罪

行了”——尽管事实是，“严重猥亵”从技术上来说根本算不上犯罪，只是行为不端而已。

这是典型的偏见。昆斯伯里的胜利和王尔德的被捕引发了来自媒体和公众的一场不同寻常的、自以为是的谩骂。昆斯伯里获胜后收到一大堆电报，其中有一封写道：“伦敦城的每一个人都和你在一起。杀了这个家伙！”^① 乔治·温德姆注意到，这样的敌意普遍存在于“所有阶层中”。^② 弗兰克·哈里斯认为，情绪最为激烈的是“清教徒中产阶级，这些人一直不相信王尔德是艺术家、知识分子，‘就是一个贵族寄生虫’”。^③ 许多老朋友都弃他而去。^④ 人们普遍认为，王尔德的罪恶涉及各个方面。《回声报》果然名副其实地宣称“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受到了‘诅咒，这个人完蛋了’”。人们预计——也希望——会有更多的人被捕。喧闹的人群聚集在弓街警察局外，想亲眼看到王尔德出席接下来举行的听证会。证人们揭露出来的那些更淫乱的细节内容被迅速制作成小册子分发传播开来。^⑤ 与此案有关的街头歌曲《即便不恶亦存疑》，“响彻大街小巷，尤其是在伦敦南部”。^⑥

然而，谴责不仅针对个人，而且还牵连了艺术。吕西安·毕沙罗在给他父亲的信中描述了针对王尔德的仇恨，与其说它攻击的对象是“鸡奸”，不如说它打击的是艺术家和人类精神。王尔德的陨落将标志着英国美学运动走向末路，而此时欧洲其他地方正刚刚开始向它投去欣赏的目光。毕沙罗说：“英国人讨厌艺术。”^⑦ “英国”媒体现在确实厌恶王尔德的艺术眼光。《全国观察家》——不再由亨利编辑——宣布：“在英语世界里，没有一个人不对昆斯伯里侯爵怀有深

深的感激之情，因为他摧毁了颓废派的大祭司。”杂志自称期待着昆斯伯里获胜后的“法律和社会后续”：“老贝利肯定会迎来另一场审讯，或者验尸官的讯问——后者是一个选项；颓废派对艺术意义的看法是丑恶的，他们对艺术的看法比古希腊的厄琉西斯秘仪还要糟糕，这一切必须彻底结束。”^①

如果说王尔德摧毁了艺术的殿堂并且使自己埋于其下，那么显然还有其他人也会在这场倒塌中受伤。所有现代艺术表现形式都受到谴责，被“混为一谈”地认为是“奥斯卡·王尔德”倾向的一部分。^②六名颇具声望的博德利·黑德公司作者给远在美国的约翰·莱恩发电报，他们声明称，除非他立即将王尔德的名字从博德利·黑德的目录中删除，并禁止比尔兹利的作品出现在即将出版的《黄皮书》中，否则他们将撤回自己的作品。莱恩急忙照办。^{③ ④}

王尔德申请保释遭拒后，从弓街的警察局牢房被转移到霍洛韦，等待接受接下来的羁押聆讯。虽然身处监狱，但作为候审犯人，他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他支付了一小笔额外费用，住进了一间面积宽敞、设备齐全的“特殊”牢房。他可以让当地餐馆送食物过来，可以读书、写信、接见访客。尽管有这些便利条件，但监禁毕竟是有代价的。那里不允许吸烟。在随后的听证会上，媒体显然得意地发现，王尔德的健康每况愈下。据报道，两周后他的脸色变得“灰白”，两颊“凹陷”，头发“凌乱”，他的神态“一直很忧郁，突然老了许多”。^⑤

他身边几乎没有盟友。罗斯和雷吉·特纳都认为离开这个国家到法国去是明智之举。罗斯之所以逃跑，似乎并不是因为害怕被捕，而是因为政府传唤他提供不利于王尔德的证据。❶ 莱弗森一家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忠诚和关注。谢拉德从巴黎写了一封鼓舞人心的信，说王尔德得到了伯恩哈特、龚古尔、皮埃尔·路易斯、斯图尔特·梅里尔和其他“艺术家”的同情和支持。而威利的一封信则没有那么受欢迎，信中说他在“整个伦敦四处”为他“辩护”。“我可怜兄弟，”王尔德说，“他可以为此放弃一台蒸汽机。”❷

除了他的律师之外，王尔德在霍洛韦的唯一经常性访客就是波西。他一直待在伦敦。他每天都来，但两人的谈话——夹杂在其他监狱访客的嘈杂声中，中间还隔着巡逻的狱吏——令人痛苦。王尔德自从耳朵感染后，越来越难以听清别人讲话。尽管如此，光是见到波西就能带来安慰。王尔德在给莱弗森夫妇的信中写道：“一个小东西，金黄色的头发，像天使一样，经常在我身边。”“他的出现令我黯然失色。他像一朵在幽暗中摇曳的白花。”❸ 王尔德戏剧化地将自己的困境描述为一场注定失败的浪漫激情戏的高潮部分。他宣称，自己之所以采取法律行动，完全是为了保护波西，不让他受到父亲的伤害。❹ 而现在，他在痛苦中，是他和道格拉斯共同拥有的“美丽而崇高的爱”在支持着他：❺

你对于我，就像智慧之于哲人，上帝之于他的信徒。把你留在我的灵魂深处，这就是这种痛苦的目的，而这种痛苦就是人们所说的生活。哦，我的爱人，我珍爱你胜过其他一切，你是未曾收割过的田野

里白色的水仙。想想落到你身上的重负，唯有爱能让它变轻一点。不过，不要为此而伤悲，应当高兴才是，因为是你用不朽的爱浇灌了一个人的灵魂，这个人此刻正在地狱里哭泣，可他心中却有个天堂。我爱你，我爱你，我的心是一朵玫瑰，是你的爱让这朵玫瑰怒放。我的生命是沙漠，却吹拂着你迷人的芬芳，你的双眼就是那清凉的春天。你纤小的足印为我打造幽谷，你发上的芬芳就像没药香脂，你所到之处都散发出桂树的芳香。永远爱我，永远爱我吧。你是我生命中至上完美的爱，不可能再有其他。 ⑨

道格拉斯欣然赞同这个观点。他声称，如果王尔德被判有罪，他要在监狱旁边买一所房子，一直住到他获释为止。许多人都在期待道格拉斯本人也被捕，并与王尔德和泰勒一起受到指控。但波西的亲戚很早就知道，不会有任何针对他的“案件” ⑩；当局已经相信，不但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确保定罪，而且道格拉斯在这件事情上的“道德罪”（“假设他有罪”）“较轻”，因为他是“在牛津上学时”被王尔德施加了“巨大影响”，从而堕落并误入歧途的。 ⑪

康斯坦斯从泰特街取走她的私人物品，带着维维安又回到了巴巴科姆。现在，乔治·刘易斯和伯恩-琼斯的儿子菲利普都在为她提供建议和帮助。两人都建议她必须抛下丈夫，让他去处理自己的麻烦、债务和命运。泰特街也应该处理掉。“如果房东想要查封房子再出租，那就随他去吧，”刘易斯劝道，“别管了——如果房东愿意的话，他可以进去将它查封了。” ⑫

王尔德被困在霍洛韦，费劲地挣扎着去照料他支离破碎的生活中的种种琐事。他因为不能亲自帮母亲支付日常的“生活费”而心烦意乱。❶他几乎没有时间准备辩护词。尽管他的律师努力将案件审理往后拖延，但该案仍定于4月26日开庭。与此同时，他的许多债权人正急于收回他们的债务（昆斯伯里案件开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然而，王尔德手头没有钱；他的剧本可能还会继续上演，但观众越来越少。❷寄希望于美国也是不可能的了。《理想丈夫》于3月12日在纽约首演，好评如潮，但现在已被撤下；4月22日推出的《不可儿戏》仅仅上演了一周。❸莎拉·伯恩哈特已经放弃了法语版《莎乐美》。王尔德原本希望她买下剧本演出权（400英镑），现在落空了。伯恩哈特写信表示同情，并保证为他提供帮助。但事实上，眼下不是时候。她什么忙也帮不上。❹

三名商人成功地赢得了对王尔德未付账单的判决——总计“大约400英镑”——“主要用于购买香烟和烟盒”。法警被派遣到泰特街。在4月24日乱作一团的“治安官拍卖会”上，有一场王尔德物品的大拍卖——他的书，他的画，他的文件，他的家具，他的衣服，甚至孩子们育儿室的玩具。❶王尔德的一些朋友参加了拍卖会，试图从废墟中抢出一些东西。随时准备出手相助的莱弗森夫妇买下的物品中包括哈珀·彭宁顿的全身肖像（他们花了14英镑买下它，和“卡莱尔的写字台”一样价钱）。尽管有几件物品拍出了“天价”——尤其是王尔德自己的题字书——但很多物品，尤其是在拍卖快结束时，拍出了低得离谱的价格。威尔·罗森斯坦花8英镑买到了一幅蒙蒂切利的作

品；约瑟夫·佩内尔以1先令的价格买了一幅惠斯勒的蚀刻画。拍卖总额差一点点不到300英镑。 注

就在拍卖当天，道格拉斯在家人和王尔德律师团的恳求下，最终离开伦敦前往法国，与罗斯和特纳在加莱会合。前一天下午，他在纽盖特见到了王尔德，在大陪审团裁决审判可以进行后，囚犯就被带到了那里。王尔德隔着铁栅栏亲吻道格拉斯的手指，并请求他们对他们的爱情保持忠贞。 注 他们至少还可以继续保持联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王尔德在写给艾达·莱弗森的信中说，他经常收到“长寿花”或“鸢尾花”的信，并讲述了这些信件给他带来的快乐。他在给波西的信中写道：“你的爱有着宽阔而有力的羽翼，穿过牢笼给我带来安慰，你的爱是我生命中所有时光的光芒……我向你伸出双手。哦！愿我活着能触摸到你的头发和双手。我想你的爱会守护我的一生。” 注

在《理想丈夫》中，罗伯特·奇尔顿爵士说：“诸神要是打算惩罚我们，他们就会回应我们的祈祷。”学生时代的王尔德曾经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桩轰动一时的大案的当事人——在“女王诉王尔德”这样的案子里充当被告。现在，这一刻终于来了。1895年4月26日星期五一早，他和阿尔弗雷德·泰勒一起站在老贝利法庭的被告席上。讯问由阿瑟·查尔斯法官主持。两个人因一项指控而遭到起诉。共有25条罪状指控两人有严重猥亵行为，以及共谋促成此类行为。泰勒还被指控为王尔德拉皮条。针对王尔德的指控涉及他与查尔斯·帕克、弗雷德·阿特金

斯、西德尼·马弗、阿尔弗雷德·伍德、萨沃伊的不知名“男性”，以及爱德华·谢利的“不当行为”。

在押候审三周之后，王尔德看上去“憔悴而疲惫”，他的长发不再是一副精心梳理过的样子。在宣读一长串指控并听取法庭辩论时，泰勒在他身边显得衣冠楚楚。克拉克试图撤销对共谋罪的指控，但没有成功，因为它与严重猥亵罪是两码事。查尔斯·吉尔随后开始接受起诉，概述了——相当详细地——案件的情况，以及他提出的程序计划。这是一场乏味的照本宣科，听众们在拥挤的法庭里变得焦躁不安起来。王尔德似乎很无聊。不过，当开始传证人时，他的无聊很快便不复存在了。

第一个证人是查尔斯·帕克。治安法庭变得热闹起来。吉尔鼓励证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与王尔德的历次约会。然而，让他自己的律师感到惊讶的是，帕克——超出了起诉书中的指控——竟然称，他们在萨沃伊酒店的第一个晚上，王尔德便“与我发生了鸡奸行为”。他继续描述王尔德要求“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女人，他是我的情人。我不得不维持这种幻想。我过去常坐在他的膝盖上，他常玩弄我的私处，就像一个男人拿一个女人取乐一样”。尽管帕克欣然承认“甩掉了（王尔德）”，而且他自己也被王尔德抛弃了，但他声称自己曾多次拒绝王尔德“把‘那个东西’塞进我嘴里”。

这样的折磨整整持续了五天（星期日休息）：威廉·帕克叙述了在凯特纳餐厅吃晚饭时，他的兄弟如何反反复复地吃王尔德嘴里吐出来的樱桃；阿尔弗雷德·伍德讲述了在佛罗伦萨餐厅的一个包间里吃饭

时，王尔德如何把手伸进他的裤子里，并说服伍德对他做同样的事；弗雷德·阿特金斯描述了他从红磨坊回来时，发现王尔德和莫里斯·施瓦贝躺在床上；爱德华·谢利不情愿地承认，王尔德晚餐后在阿尔比马尔酒店“亲吻”并“拥抱”了他；大多数人都讲述了他们曾经与泰勒一起在他那铺着地毯、散发着香气的房子里，睡在矮脚双人床上。在此期间，一连串的女房东、酒店仆人和其他人都在证词中将王尔德与泰勒以及几个关键证人联系在了一起。和萨沃伊酒店的女服务员一样，阿特金斯在奥斯纳堡街的房东玛丽·阿普尔盖特作证说，王尔德几次拜访她的房客之后，她都发现了脏得可怕的床单。

第三天，吉尔宣读了王尔德在昆斯伯里案审讯中的质证完整文本，并在记录中添加了其中披露的内容和论据。第四天刚开始，吉尔便宣布决定撤销对王尔德的合谋犯罪指控。克拉克指出，控方应该一开始就撤销这一指控，这样就可以请求对两人分别听证。但现在为时已晚。正如吉尔评价王尔德的胜诉机会道：“只有奇迹才能拯救他。”^⑨

克拉克尽其所能地诋毁了那些主要证人，他指出这些年轻人（除了马弗和谢利）都自认是敲诈者、小偷和骗子。事实上，阿特金斯一度被法官下令离开证人席，因为他被证明做了伪证，否认自己曾经因为试图勒索在阿尔罕布拉音乐厅遇到的一名绅士而被带到罗切斯特街警察局。克拉克能够证明，谢利除了精神状态不稳定之外，在所谓令人痛苦的阿尔比马尔酒店事件发生后的好几个月里，他一直以朋友的身份与王尔德见面并写信给他。至于王尔德在萨沃伊酒店和奥斯纳堡

街那些“令人作呕的”床单，他表示，它们可能只是腹泻造成的结果。●注●注

克拉克在为王尔德辩护时表示，没有哪个自己有罪的人会去起诉昆斯伯里；更不可能的是，这个有罪的人在看到昆斯伯里的辩护后，还会留在英国，面对那些指控。“如果王尔德真的（在法庭陈述提到的事情中）被证明有罪，而他又坚持面对调查，这样的人岂止是神智混乱一词能够概括得了的。”●注

随后，王尔德从被告席步入证人席。虽然他承认自己与各个证人有“联系”，并送出了各种各样的礼物，以及请客吃饭，但他否认和他们发生过任何“所谓的不当行为”。他作证时显得从容不迫。尽管克拉克试图驳回所有关于王尔德作品的讨论——卡森曾经在诽谤案审讯期间涉及的问题——但吉尔坚持要说一说“案件中涉及的文学因素”。他虽然略过了《道林·格雷的画像》，但是把注意力转向了《变色龙》——而且他关注的并非王尔德的作品，而是道格拉斯的两首十四行诗《赞美羞耻》和《两种爱》。他将两首诗都念了一遍。第二首快要结束时，吉尔问道：“什么是‘不敢说出名字的爱’？”——这是“非自然的爱情”吗？

王尔德回答：

“不敢说出名字的爱”在本世纪是一种伟大的爱，就是一位年长者对一位年幼者的那种伟大的爱，就是大卫和乔纳森之间的那种爱，就是柏拉图作为自己哲学基础的那种爱，就是你们能在米开朗琪罗和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发现的那种爱。这是那种深沉、热情的爱，它的纯洁与其完美一样。它弥漫于米开朗琪罗和莎士比亚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中，以及我的那两封信中，它们就是表达这种爱的作品。在这个世纪，这种爱被误解了，误解之深，它甚至被描述为“不敢说出名字的爱”，为了描述这种爱，我站在了现在的位置。它是美的，是精致的，它是最高贵的一种感情，它没有丝毫违反自然之处。它是思想上的，它不断出现于年长者与年幼者之间，当年长者拥有才智时，年幼者的面前就会拥有所有的生活快乐，所有希望和生活的魅力。这个世界不理解这一点，而只是嘲讽它，有时还因为它而给人戴上镣铐。

王尔德的一席话在法庭上引起了轰动，公众旁听席爆发出掌声——夹杂着一些嘘声。他多年来一直在反复表达这些想法、说法：它们影响了《W.H.先生的画像》；它们呼应了他在克拉布特俱乐部为自己的行为所做的辩护。但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站在法庭上将这些内容表述得如此流利和自信，着实非同凡响。作家罗伯特·布坎南认为那简直是“不可思议”。有人说，这是“自圣保罗在亚基帕面前发言以来，被告发表的最好的演说”。^①

马克斯·比尔博姆（已经从美国回来，当天也在法庭上）写信告诉雷吉·特纳：

奥斯卡表现得相当出色。他那番关于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爱（原文如此）的演讲简直太精彩了，立刻赢得了全场掌声。就是这个人，已经在监狱里待了一个月，背负着侮辱、碾压和殴打，却完全镇定自若，用他的翩翩风度和音乐般的嗓音征服了老贝利法庭。我敢肯定，

他从来没有获得过如此巨大的胜利，当整个法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时——我敢肯定，他打动了整个法庭。②

然而，陪审团受到多大影响则另当别论了。虽然这番话可能反映了王尔德对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理想化的爱，但若论他与帕克、伍德等人的短暂邂逅，则几乎与之没什么关系。吉尔在质证中理所当然地提到了其中社会地位和知识水平的失衡：

吉尔：你为什么要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

王尔德：我喜欢年轻人！

吉尔：你赞美年轻人是神？

王尔德：我喜欢研究一切年轻的事物。青春本身有种让人着迷的东西。

吉尔：这么说，你喜欢狗崽胜于大狗，小猫胜于大猫了？

王尔德：我想是的。譬如，我会喜欢跟一个嘴上没毛，生意冷清的出庭律师交朋友，觉得他不亚于最出色的QC③。

法庭上响起笑声，吉尔补充了一句：“我希望后者，我用大写字母表示的那个人，能够欣赏你的赞美之词。”在场的人又笑起来，他继续道：“这些年轻人的地位都比你低得多？”

“我从不问，也不在乎他们是什么地位。我发现他们大多数情况下是聪明而可爱的。我发现他们的谈话出现了变化，这就像一种精神

的滋养。” 注 注

第四天庭审接近尾声，在王尔德和泰勒作证后，律师发表了结语。爱德华·克拉克爵士认为，王尔德的坦率——表现在他与各种证人、萨沃伊酒店工作人员的互动中，他出庭站在证人席上，他发起对昆斯伯里的诽谤诉讼中——是“他无罪的最好证明”。他的行为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丝毫“怯懦的负罪感”。“王尔德先生，”他承认，“并非普通人。”他的作品看来似乎“轻浮、夸张、荒谬”——但不应该为此谴责他。在他与年轻的阿特金斯、伍德和帕克的慷慨交往中，他悲哀地发现自己被一群肆无忌惮的敲诈勒索者“骗了”。“我不是在为王尔德先生辩护这一点，”他说道，“毫无疑问，他表现得很轻率，然而不能用一般人的标准来评判一个像他这样性情的人。”如果这些“污点证人”现在站出来“密谋毁掉”他的当事人，他们的证据就不应被采信。他敦促陪审团抛开所有因偏见性报道和讨论而引起的“偏见”，他相信“你们认真思考的结果将满足那些寄托于你们的决定之上的成千上万的希望，将会还我们如今这个时代一位最著名、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以清白，裁定他无罪，我们的社会也就不会沾染上这个污点”。他最后的这几句话强劲有力，赢得了掌声。王尔德显然被这篇演说感动了，他草草写了一张纸条表示欣赏与感激。克拉克收到纸条，冲着被告席上的犯人点了下头表示感谢。 注

格兰（代表泰勒）在讲话中重申了他的观点，即不能接受关于帕克兄弟等勒索者的未经证实的证据。然而，吉尔在当天的最后发言中问道：“这些证人为什么要寻求提供伪证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

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些内容几乎纯属私人性质，永远不可能得到确凿的证明。但王尔德赠送给“小伙子们”的许多礼物——总是出现在他与他们“在某些房间或其他地方”单独相处之后——自有其来龙去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烟盒也能证明这一点。”虽然克拉克也许“反对将任何邪恶的解释”指向王尔德给这些“庸俗，没有教养的”的年轻人赠送礼物，请客吃饭，但“以常识论，除此之外还能怎么解释呢？”

尽管克拉克的发言让王尔德大受感动，但他对审判结果几乎不抱希望。那天晚上，他在霍洛韦的牢房里给波西写了一封长信，开头写道：“我最亲爱的孩子。写这封信给你，是向你保证我对你的爱是永恒的，永远不会变。明天一切就会结束。如果坐牢和受辱是我命中注定的，只要想到我对你的爱，以及更为圣洁的信仰，即你也爱我，我想我能在不幸中支撑下去，希望它能让我以最大限度的耐心忍受我的痛苦。”^⑩

第二天上午（5月1日星期三）审判开始，法官作总结。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法庭格外拥挤，他仔细回顾了证据，大家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聆听着。^⑪这是一场颇有分寸的表演，但凡存疑，法官都会倾向于被告。他同意从起诉书中删除共谋指控；他发现，涉及西德尼·马弗的罪状并没有什么需要回答的，因为马弗坚称没有任何不当行为发生；因而这些指控也被剔除了。至于案件所牵涉的文学方面，他认为，让王尔德为《变色龙》杂志上并非出自他手的内容负责是“荒谬的”。对于王尔德真正发表的文章《供年轻人使用的至理名言》，

他评价道：“有些有趣，有些愤世嫉俗，还有一些——如果允许我批评的话——愚蠢；然而说到邪恶，它不是。”他质疑将王尔德写给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那些措辞华丽的信件视为“可怕和下流”是否正确，尤其是因为王尔德本人似乎对这些信件颇为自豪。他提到谢利在证人席上的“状态非常兴奋”，以及他反复无常的行为。他提请人们注意，阿特金斯的伪证不同寻常——“这个谎言如此恶劣，如果你认为合适的话，你完全有理由拒绝以他提供的证据为由采取行动”。他承认，如果萨沃伊酒店的仆人们所说的都是真的，即他们看见一个男孩在王尔德的床上，那么（被告）“似乎根本就没想隐瞒”，这在他看来似乎有点“离奇”。他还提到，王尔德“有权要求你记住，他是一个有很高智力天赋的人，人们料想他不会做出此种行为”——泰勒也是如此，“尽管人们对他的能力只字未提”，但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陪审团一点半刚过就出去了。一般预期，他们的审议将是简短的，囚犯的罪行将得到确认。但那些在法庭上目睹查尔斯大法官总结的人却没那么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他们的怀疑似乎得到了证实。3点钟过后，人们开始吃午饭。谣言开始流传开来，可能产生了意见分歧。直到5点1刻，陪审团成员才一个接一个回到法庭。●注

王尔德和泰勒被重新押回被告席；比尔博姆写道，“奥斯卡站得笔直”，看起来“像狮子，又像狮身人面像”。与他相比，旁边的泰勒显得无足轻重。●注法庭上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陪审团一直无法达成

一致，只是在与阿特金斯有关的“小问题”上，他们都认为被告“无罪”。合谋指控以及与马弗有关的指控也得到了正式的“无罪”判决。王尔德听到这个消息时，脸上“毫无表情”。^⑨

吉尔当即宣布，此案“肯定会再次开庭审理”，很可能会“在下一次开庭期间”（三周后）。王尔德的保释申请再次遭到拒绝，他又回到了单调沉闷的霍洛韦。^⑩

5 偏见的洪流

打起精神来，我最亲爱的人。

——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写给奥斯卡·王尔德的信

尽管吉尔如此断言，但随着所有“令人厌恶的细节”被“又一次提起”，人们对再审案子的前景感到了些许不安。一些人希望，第二次审判——如果必须进行——“可以进行闭门听证”。但此举落实起来受到了巨大压力。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议员T.M.希利请求洛克伍德不要再让王尔德受审，不要让“他的国家蒙羞”——以免他“受人尊敬的”母亲遭受“更多痛苦”，检察总长回答说：“啊，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是那些不利的（针对罗斯伯里）讨厌谣言，让人不得不这么做。”^注卡森似乎提出了类似的请求，也得到了类似的答复。罗斯伯里本人（乔治·艾夫斯听说）曾考虑做些什么来帮助王尔德，但被他的内政大臣阿斯奎斯告知：“如果你这么做，将会输掉选举。”^注

这个案子成了阴谋论的众矢之的。有一种“普遍的印象”是，法官受到了“欺骗，其目的是保护其他生活中地位更高的人”。一些人怀疑政府出于同样的原因“正在试图掩盖这件事情”。报纸上充斥着要求进一步起诉的信件，并暗示“警察在针对不道德行为的行动中被上级的命令所麻痹，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据称，有“数百名议员、法官、艺术家、演员和其他人犯下了这种罪行”。另外，道格拉斯认为政府在昆斯伯里和“私人团体”的压力下正在无情地推动案件的进

展，这些人威胁说，除非保证给王尔德定罪，否则他们将拿出针对“重要和高级人物”的证据。❷

还有很多报道——以及众多争议——是关于陪审团内部分歧的。有些人将其归结到某一个“爱找碴的陪审员”身上；《巴黎回声报》认为，赞成定罪的票数是10:2；比尔博姆认为“12名陪审员中有9人支持（奥斯卡）”。一家报纸刊登了一份被认为是针对各种指控的投票明细，显示出意见分歧从10:2（支持指控王尔德与爱德华·谢利发生性关系）到2:10（支持指控泰勒与帕克兄弟发生性关系）不等。但总的来说，“强烈怀疑”仍然存在，“毫无希望的分歧……并没有完全摆脱腐败的污点”。昆斯伯里坚信“有人”收受了贿赂。他甚至怀疑是他的儿子珀西——“伟大的狗屎霍伊克勋爵”——提供了这笔钱。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起诉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❸

王尔德最终于5月3日获准保释，但保释金高达5000英镑。他还需要几天时间来筹措这笔钱。王尔德可以自我担保其中的2500英镑；珀西·道格拉斯拿出1250英镑满足了弟弟的要求，同时也惹恼了他们的父亲。最后的1250英镑——经过一番疯狂的寻找——由斯图尔特·黑德勒姆牧师提供，他是一位自立富有、思想独立、支持社会主义的英国国教会牧师。尽管他几乎不认识王尔德，但他是罗斯的好朋友莫尔·阿迪的室友兼偶尔的文学合作者。有些人对他的做法表示惊讶——或者恐惧，黑德勒姆解释说，他之所以挺身而出是基于“公共的立场”，相信媒体对这个案件的报道是怀有偏见的。他指出，他并不是为王尔德的“品格”提供“保证”；而是为王尔德在法庭上的表现

——在这一点上，他对作家的“荣誉和男子气概”很有信心。⑤5月7日，弓街警察局举行了正式的保释听证会，王尔德最终被释放。他已经在霍洛韦待了一个多月。

然而，自由也带来了问题。王尔德在珀西和黑德勒姆的陪同下来到圣潘克拉斯的米德兰旅馆。正当他和自己法律团队的几名成员商议事情的时候，昆斯伯里侯爵来了，一起来的还有他的朋友克劳德·德·克雷皮尼爵士。昆斯伯里确信波西回到了伦敦，他决心阻止波西和王尔德在一起。眼见侯爵来了，王尔德迅速穿过马路，来到国王十字路口的北方大饭店。但昆斯伯里一行人尾随到了那里。而且，整个晚上，这样的事情似乎反反复复发生在伦敦的其他几家旅馆里。“如果那个可怜人（波西）没有和他在一起，（王尔德）就没有理由像他那样逃跑，”昆斯伯里给珀西的律师写信道，“既然亮出了白羽毛，那么周围必定有美味。”⑥

最后，接近午夜的时候，王尔德——饱受折磨和绝望——来到他母亲在奥克利街的房子寻求庇护。威利和他的新婚妻子莉莉也住在那里。据威利叙述，奥斯卡“像一头受伤的牡鹿”瘫倒在门槛上。“威利，让我住下来吧，”他恳求道，“不然我就要死在大街上了。”奥斯卡被安置在一间空荡荡的空余房间里，睡在一张行军床上。他立刻陷入了神经——和身体上的——“衰弱”。没有任何关于母亲接待他的记述。奥斯卡的困境让她“非常难受，非常痛苦”。⑦根据一些说法，她当时已经躺在床上，正在自斟自饮杜松子酒。⑧

在奥克利街，酒当然都是现成的。威利是个酒鬼。当谢拉德从法国过来想帮点忙时，他发现奥斯卡脸色潮红，疲惫不堪地躺在一张狭窄的床上，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酒味，但神志不清的状态已经过去。“噢，你怎么没从巴黎带点毒药来？”王尔德嘶哑着问道。人们普遍期待，甚至希望，王尔德自杀。乔治·艾夫斯认为那是最好的结果。罗伯特·坎宁安·格雷厄姆称，有一次他在海德公园邂逅王尔德，王尔德——在讲述了“他的悲惨故事”后——问道：“我该怎么办？”坎宁安·格雷厄姆不假思索地举起手臂，用食指指着自己的太阳穴，“用中指轻弹拇指，发出一种类似于手枪射击的声音”。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心里很难受。王尔德显然崩溃了，抽泣着说：“我知道这是唯一的出路，但我没有勇气。”亨利在写给查尔斯·惠布利的一封极其乏味的信中再次提到了王尔德在回避这个选择：“他们说，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勇气，所有的姿态，所有的一切；他现在简直像个普普通通的酒鬼，甚至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

注

奥克利街的气氛很沉闷。与威利的勉强和解并没有带来多少安慰。“威利给我住处真是太好了，”奥斯卡抱怨道，“我想他是好意，但这太可怕了。”在他的诸多评价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感谢上帝，我犯的罪还算是体面的。”然而，谢拉德指出，王尔德并没有把“任何犯罪的想法”与自己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那些不喜欢给予男孩子“性爱抚”的男人是“不正常的”。作家亚历山大·特谢拉·德马托斯造访奥克利街时，王尔德曾经认真地问他，是否“可以真心实意地说，他从来没有喜欢过年轻男人，从来没有想过抚摸和爱抚

他们”，当德马托斯“断然否定有这种想法时，他似乎怀疑起对方的诚意”。^①

有一小部分人上门拜访表示支持。王尔德与诗人欧内斯特·道森愉快地交谈了一小时，从沮丧中振作了起来。一天晚上，一位戴着面纱的高个子女士（可能是埃伦·特丽）来到门口，送来一束紫罗兰U型花环，上面写着“祝你好运”。而莱弗森一家曾经请他去吃过饭。^②

谢拉德来了，决心说服王尔德逃往国外。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弗兰克·哈里斯带王尔德去吃午饭，也敦促他出国。他甚至声称有一艘蒸汽游艇正在泰晤士河上等着，准备载着他们横渡英吉利海峡。与此同时，道格拉斯每天都在法国等他。然而，王尔德决定留下来。正如威利不断向访客们重申的那样，“奥斯卡是一位爱尔兰绅士，他将面对现实”。他除了答应担保人以外，还答应过他的母亲。“如果你留下来，”她说，“即使你进了监狱，你也永远是我的儿子。我对你的爱不会有差别。但如果你就这么走了，那么我就再也不跟你说话了。”^③

尽管哈里斯认为王尔德拒绝逃跑的做法是“软弱”的表现——或者“极其柔弱的本性”——再加上“某种宽宏大量”（不让他的担保人失望），但在他自己看来，王尔德认为这么做其实是大胆的挑战。他宁愿做烈士，也不愿做逃犯。他愿意为了波西的爱而受苦。“一个假名，”他在写给道格拉斯的信中说，“乔装改扮，被追捕的生活，这一切都不适合我，你在那座高山上向我显现，美的事物在那里变得容光焕发。”^④在他的决心中，除了爱情之外，还有一种戏剧性。哈

里斯理所当然地认为，王尔德对耶稣的迷恋（和认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模糊地感到，如果没有最后的悲剧，天才的人生旅程将是不完整的，荒唐的：为了最高境界而活着的人必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①

莱弗森一家把王尔德从奥克利街的不安和烦恼中解救出来，邀请他到考特菲尔德花园与他们同住。王尔德到达之前，他们询问了仆人们，如果有人想离开，完全可以。所有人都选择留下来，要帮助“可怜的王尔德先生”。他被安置在莱弗森的小女儿维奥莱特经常住的育儿室的两间相邻的房间里。这是一个舒适平静的避难所。他每天晚上6点下楼，穿着精致，与“斯芬克斯”和其他朋友们畅谈一晚上。尽管他刚来的时候可能沉默寡言，情绪低落，但机智和友爱的气氛——以及上好的香烟——很快就让他振作起来。他讲述了苦艾酒的乐趣和鸦片的作用。他讲故事，谈书籍。在谈到《老古玩店》时，他对艾达说：“在读到小耐尔死的时候，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会笑得出来。”他只字未提审判的事情。

白天，王尔德就待在育儿室，他还在那里——“在一匹摇摇马、几个小怪物，以及画着兔子和其他动物的蓝白相间护墙板之间”——就即将到来的审判咨询他的律师。根据特别安排，他和泰勒的案件将在审讯期开始那天审理。而且，非同寻常的是，此案的审理将由副检察长弗兰克·洛克伍德牵头，查尔斯·吉尔和霍勒斯·埃弗里作为助手。政府要定罪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

康斯坦斯也来看望王尔德。她从巴巴科姆赶来，“带着律师（可能是乔治·刘易斯）的一封急件，恳求他离开”。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她哭着走了。她的悲痛促使艾达给育儿室送去一张纸条，请求王尔德按照妻子的请求去做。她没有得到回答。但那天晚上，王尔德下楼时，他把纸条还给了她并说：“这可不像你，斯芬克斯。”^⑩

在他下决心的时候，支持和同情的信件令他备受鼓舞。他离开之后，叶芝带着一捆从“都柏林文人”那里收集来的信件，来到奥克利街。^⑪ 弗雷德里克·约克·鲍威尔甚至转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惠斯勒被他的困境所感动，并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友好而温和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⑫

王尔德一直住在考特菲尔德花园，直到5月20日（星期一），他不得不在这一天交保期满后去老贝利法院出庭。此案将由66岁的威尔斯法官审理，他是一位著名的登山家，碰巧也是王尔德一家在泰特街的邻居。^⑬ 然而，诉讼推迟了，因为爱德华·克拉克爵士成功地申请将王尔德和泰勒的案件分开审理。然而，令他沮丧的是，尽管他表示抗议，控方还是决定先接泰勒的案子。这是另一个反转：如果泰勒被判有罪，王尔德本已渺茫的机会将进一步变小。

泰勒的案子很快就开庭了。从5月20日星期一中午开始，第二天下午陪审团宣布他对帕克两兄弟犯有严重猥亵罪。他们无法决定泰勒是否为帕克兄弟拉皮条结识了王尔德，但法官认为对主要指控作出裁决就足够了。他们决定推迟对该案的判决，直到王尔德的案件审理之后。

5月21日，王尔德来到老贝利法院，为传唤做准备。前巡警基利在大楼里找到他，递给他一份昆斯伯里侯爵的正式索款书，要求他支付677英镑3先令8便士的诉讼费。如果7天内未能付款，将构成法定的“破产行为”。^①这无疑是在新一层的雪上加霜，他需要支付自己的法律费用，还有未支付的经济债务、向朋友和亲戚的借款，以及戏剧制作人的预付款需要支付。

然而，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他收到了朋友阿德拉·舒斯特的来信。她希望提供1000英镑供他支配使用。在这份礼物的附信中，她写道：“我希望按照您的意愿，将这笔钱用于您自己和您孩子的私用。”王尔德把这笔钱称为“信托基金”或“存款基金”。他打算根据案件的判决结果，用这笔钱支付紧急开支和各种必需品，而不是用来偿还眼前的债务。他把这笔钱交给欧内斯特·莱弗森管理：120英镑立即兑换成钞票，交由王尔德支配；150英镑付给了汉弗莱斯。^②

遇到基利的第二天早上，王尔德的审判开始了——换了一个新的陪审团。审讯持续了四天，其间他又住到奥克利街他母亲的家里，每天由黑德勒姆接他回家，有时和珀西·道格拉斯在一起。王尔德现在只面临八项严重猥亵指控：涉及查尔斯·帕克、阿尔弗雷德·伍德、爱德华·谢利和萨沃伊的无名男孩。但这就足够了。

前几次审讯及法庭聆讯陈述过的证据和论点又被重提了一遍。但公众——甚至报界——的胃口似乎已经得到了满足。他们对这个案件的报道开始松懈下来。王尔德似乎看起来明显衰弱而疲惫。即使作证时，他也得到允许可以坐着。他称，自己觉得很难听清楚。^③“大多

数时候，他似乎在发呆，有时候，当他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时，他就前后摇晃着，仿佛精神上受到了过度的折磨。他似乎对法庭提供的证据不为所动。”许多时候，他在被告席边缘的一张大大页纸上涂鸦，慢慢地用墨水把它涂黑。①

只有两位主要的法律顾问和昆斯伯里侯爵表现得精力十足。从诉讼一开始，昆斯伯里就引人瞩目地出现在拥挤的法庭上。在得知泰勒被定罪的消息后，他给珀西的妻子发去一封洋洋得意的电报，结尾是“明天就轮到王尔德了”。那天晚上，他在皮卡迪利大街和珀西大打出手，打青了儿子的一只眼睛（厮打被制止了，两个人双双被捕，被迫于第二天言和）。②

法庭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控辩双方的“固执态度”，洛克伍德和克拉克之间的“私人过招”——据说——将长期“作为法庭上最激烈的场景而被人铭记”。③克拉克（作为一个长期任职的前副检察总长）提醒洛克伍德，他是一人知人知的“司法大臣”，“无论如何都不是来这里争取有罪判决的”。④他把王尔德描绘成“伦敦所有勒索者”的阴谋受害者，他的名声被某些人玷污了，这些人在“代表政府作证时……已经为过去的欺诈和猥亵行为获得了豁免权”。⑤

威尔斯法官当然对许多不利于王尔德的证据的可采性持怀疑态度。令洛克伍德愤怒的是，他同意克拉克的意见，认为爱德华·谢利（唯一没有背负勒索指控的证人）必须被裁定为同谋者，而他的证据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是不能被采纳的。由于没有这样的确证，他下令从陪审团的考虑范围中剔除这一罪名，并记录下正式的“无罪”裁

定。星期四会议结束时的这项裁决引发了极大的骚动。那天晚上，洛克伍德在伦敦各俱乐部对法官大发雷霆，称威尔斯是“一个无能的老傻瓜”。^① 克拉克则找到了另一条论据，他指出，萨沃伊酒店的女服务员简·科特声称曾在王尔德的床上看到过一个男孩，而此人严重近视，但在工作时从未戴过“眼镜”。^②

尽管，在公众的心目中，王尔德的罪行（显然）“不存在丝毫疑问”，“然而不知何故，人们普遍感觉，考虑到所有的情况”，陪审团几乎“肯定会拿出另一种不同意见”，甚至可能是无罪释放。^③ 不过，王尔德也许不敢抱有如此大的希望。

5月24日星期五下午，他离开法院，由欧内斯特·莱弗森陪同坐着马车回到奥克利街。他们还有些财务问题需要讨论。莱弗森保证，如果王尔德被判有罪，可以用阿德拉·舒斯特的“信托基金”赡养他的母亲。不过，莱弗森问道，他是否也可以用这笔钱偿还从自己手里借走的500英镑紧急借款，这笔钱目前还剩下的250英镑没有还清。王尔德似乎欣然同意了。^④

那天晚上，王尔德告别了他的朋友。明天一切就都结束了。洛克伍德将发表他的结案陈词，法官将向陪审团提出他的指控。王尔德从“剩下的一点可怜的东西”中，给聚集在奥克利街的每一个人“准备了一件小礼物”——万一他第二天回不来了，那就是他留下的纪念品。在经历了一阵阵的沮丧和冷漠之后，他似乎获得了极大的宁静。临走时，他“庄严而有礼貌地”吻了威利妻子的手。他被她的善良和

同情所感动。❶然后他和他深爱的母亲度过了“很长的一小时”。❷毫无疑问，他又给波西写了一封信。

“凡伟大的爱都有其悲剧发生，”王尔德写道，“现在我们的爱也是这样。但是如此忠诚地了解你，如此深沉地爱着你，把你当作生命的一部分，我现在认为唯一美好的一部分，对我来说，这已经足矣……我们的灵魂为彼此而生，由爱而知你的灵魂，我的灵魂就超越了许多邪恶，理解了完美的真谛，谙通了事物的圣洁本质。”❸

第二天早上在法庭上，洛克伍德继续发表他的结案陈词。他似乎下定决心要用激烈的言辞来弥补证据中的任何不足。王尔德后来回忆起坐在被告席上听着这些“骇人听闻的谴责”时那种怪异的感觉，耳中所听让他感到恶心。然后他突然想到，“如果说出这番评价我的话语的那个人是我，那该有多好啊！”他发现，“人们对一个人的评价无关紧要。关键在于，话是谁说的”。而眼下，不幸的是，这话是由副检察总长说的。❹

威尔斯法官的结语，虽然比较温和，但——与查尔斯法官的结语相比——明显没那么倾向于被告。他只字未提报纸上的偏见性报道。他也不打算接受对王尔德写给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充满激情的信件所做的艺术性解读。他提到，“有格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交往的圈子去判断这个人”——他又说：“先生们，你们已经看到了帕克兄弟，就如你们已经看到伍德一样……他们是不是你们不介意与其坐下一起吃饭的年轻人？”

陪审团3点半休息，王尔德被带到牢房等他们回来。尽管洛克伍德表现强势，威尔斯法官也发表了结语，但法庭上仍然存在一种怀疑，即陪审团可能会再次出现悬而未决的情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政府方面很有可能会放弃起诉，王尔德将获得释放——毫无疑问那是希望他自我放逐。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样的结果出现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明天你就会有在巴黎和你的当事人吃饭”，据说洛克伍德曾经对克拉克这样说。然而，王尔德的律师团却没有那么乐观。5点半过后不久，陪审团又出现了。不过，他们只是想要打听一件证据，听取法官的解释之后，他们又退了回去。几分钟后，陪审团回来了。很明显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

王尔德被带回被告席。他面色苍白地站着听取判决。第一条罪状的审判结果是：有罪。人们看到王尔德向前一扑，紧紧抓住栏杆。有罪。有罪、有罪、有罪、有罪、有罪。只有在与谢利有关的指控上，他才被正式认定无罪。

泰勒被带到被告席上听宣判。威尔斯法官对他的评论措辞严厉。他“毫不怀疑”陪审团已经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他对囚犯们说：

我与你们说什么都是没用的，做出这些事情的人可以说完全没有羞耻之心，人们也别指望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这是我审判过的最坏的案子。你，泰勒，开着一家男妓院，这是无可置疑的。而你，王尔德，则是由最邪恶的年轻人构成的腐化团体的中心，这同样无可置疑。

他通过了法律允许的最严厉的判决：两年监禁，外加苦役。“在我看来”，他补充道，“对这样一个案子来说，这种判决还是远远不够的。” ⑨

严厉的判决在法庭上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有人喊出了“哦！哦！”和“羞耻！”。泰勒听到判决显得满不在乎的样子。王尔德似乎惊呆了。他做了个动作，好像想对法官说点什么。他挣扎着说出几个词（也许是，“那我呢？我什么也不能说了吗，法官大人？”）可是，后面的话已经说不出来了。狱卒急急忙忙把他带了出去。 ⑩

第九部分 狱中戴锁书

1895～1897年

41～42岁



《狱中的奥斯卡·王尔德》，美国《旗帜周刊》刊登的插图，1895年

1 美杜莎的头颅

请别让我说这件事情。

——奥斯卡·王尔德

噩梦随即便真地开始了。王尔德现在成了政府的犯人，未经改革的维多利亚时代刑罚制度像一副重担压在他身上，简直要把人压垮。他一下子就失去了活动和行为的所有选择权。核定羁押令状时，他被短暂地带到毗邻老贝利法院的纽盖特监狱的一间牢房里，然后被送上一辆封闭的警车（也被称为“黑玛丽亚”）——与阿尔弗雷德·泰勒和两名狱卒一起——穿过伦敦北部转移到本顿维尔监狱。①

他在简陋的接待室里登记了年龄、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随后接受了体检。他的体重记录为190磅；他在霍洛韦还押候审期间瘦了半英石多②，身体没有在第二次审判期间得到恢复。虽然他被判劳役，但本顿维尔监狱的医官认为这名40岁的囚犯身体已经脱形，无法承受严酷的劳作。王尔德被认为只适合做“轻省活儿”——缝制邮袋和捡麻絮。③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好运气。

接着，他被要求在监狱工作人员面前脱去衣服，将自己浸泡在一盆“脏水”中。他用一块潮湿的棕色破布擦干身子，然后穿上囚服：土褐色的粗布裤子，宽松的夹克衫和背心，蓝色的精纺长袜，笨重的靴子，灰红相间的苏格兰帽，上面都印着臭名昭著的“鱼尾纹”箭头。他的头发剪短了。他服下了第一剂每日一顿的溴化钾——也

叫“监狱药”，这是一种抑制性欲的镇静剂。他被分配到一间牢房，牢房号成了他的新“名字”。^⑨

他听到铁门哐啷一声，他的新家被关上了——这是一个13英尺×7英尺的盒子，四面光秃秃的白墙，装着栅栏的不透明玻璃窗透进暗淡的光。他摸了摸，发现狭窄的木板床很硬，毛毯很薄。第一顿牢饭送来了（外观和气味都让他反胃；他吃不下去）。时间过得很慢，简直就像蜗牛在爬。

本顿维尔监狱建于19世纪40年代，容纳着数千名囚犯，但王尔德感觉十分孤独。监狱采用了“独立系统”，目的是让囚犯们相互之间完全隔离，每天除了区区几个小时，其他所有时间犯人都被关在牢房里。虽然他们可以聚集在运动场和礼拜堂，但不允许交谈，甚至不能彼此看一眼。直到19世纪60年代，囚犯离开牢房时才不再需要戴头套——或“尖顶”帽。^⑩有一些囚犯可能会得到允许与其他囚犯“协作”劳动，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保持沉默。与狱友交谈会受到严厉惩罚，比如失去食物，丢掉工作，剥夺特权，甚至被单独监禁。当局最关心的是防止顽固不化的罪犯污染初犯，防止监狱成为“罪恶学校”。监狱是一片“寂静无边”的荒原，只有间或传来金属门框的撞击声、铁链的叮当声、脚步的回响声、命令和训斥的喊叫声，以及隐隐传来的痛苦、悲伤和绝望的哭喊声。王尔德活着是为了交谈，为了社交，为了智力刺激，为了美丽，为了舒适，为了美食和安逸，但他一下子失去了所有这些东西。这令他毛骨悚然。

第一天的新生活很糟糕，但更糟糕的是每隔一天——每一夜——的千篇一律。王尔德发现自己被“英国监狱法律授权的三种永久性惩罚：饥饿、失眠、疾病”折磨着。食物遭到了蓄意克扣。伴随着频繁的腹泻，王尔德的体重掉得越来越快。这是监狱生活的苦痛之一，而完全不当的卫生设施使情况变得更为糟糕。从下午5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囚犯们被关在通风不良的牢房里，只能靠一个极小的罐子解决“自然之需”，简直臭气熏天。①

王尔德的精神状态和他的身体一样每况愈下。每日服用的溴化物容易使新囚犯产生神经衰弱和忧郁的感觉，②但最让他感到压抑的是“无边的寂静”和“永恒的孤独”。③一连几个小时独自在牢房里，他的思想都转向了内心：悔恨啃噬着他的灵魂；他不断地经受着“自责”的折磨。④每天分配给他的捡麻絮工作是在他的牢房里独自进行的。这项工作虽然被称为“轻省活儿”，但要解开缠绕在一起的焦油绳子，无论对人的手指还是精神都是有挑战的。⑤

单调乏味的背后，对惩罚的恐惧挥之不去。王尔德一直认为自己生而例外，不为规则所生，如今却在努力搞懂他的新规则世界，去理解它的不人道之处。在操场上，走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低声对他说，自己多么为他感到难过，多么希望他能“振作起来”。王尔德听到这番话——忘记了禁止交谈的法令——竟然伸出双手喊道：“哦，谢谢你，谢谢你。”他当然为此受到了惩罚。王尔德一直处于劣势：根据一名狱吏的记载，他身高6英尺——“比大多数人要高很多”，一直是操场上引人注目的身影。事实上，他常常被狱警们当作“标尺”来

计算跑圈的囚犯人数。此外，他的“步伐非常大”，总是紧跟在前面犯人的脚后跟，从而招来“保持距离”喊声。他对每天例行的牢房检查产生出一种恐惧。他的那一点点物品中，每一件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一旦稍有疏忽，就要受到惩罚。“这种惩罚太可怕了，”他回忆道，“我经常在睡梦中惊醒，要去摸一摸每一样东西是否都放在规定的地方，左右不偏一寸。” ⑩

没有得救的希望。王尔德拒绝与监狱牧师接触。他无法从《圣经》中寻求慰藉，更无法在唯一可以接触的非礼拜式文本《天路历程》中找到安慰。 ⑪ 与外界联系是不可能的。根据规定，只有在三个月后，他才能够被允许收发各一封信，并接待两名来访者。自那之后，在他余下的刑期中，每季度都可以同样的频率保持交流。但与此同时，他独自一人，饥肠辘辘，辗转难眠，痛苦不堪。

他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至少让他躲过了一些事情。新闻界——在王尔德三次漫长的审判过程中，为了满足好色之徒，抒发义愤填膺，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精神抖擞地展开了最后一轮冷嘲热讽，之后他们便将王尔德置于卑微可耻的默默无闻之中，人们希望这种无名一直持续下去，远远超过他“应得的”却可惜“不充分”的两年刑期。“奥斯卡·王尔德再也不会成为什么人物，他只是一个回忆，”《西部邮报》的首席作家称，“这盏明灯是为了警告年轻人，安逸享乐的生活中潜藏着危险。他的魅力个性已经从人们的魂牵梦绕中消失了，他的名字已经成了笑柄和耻辱。” ⑫

私下里，人们可能有一丝同情之意：王尔德的堕落如此令人惊骇，他受到的判决如此严厉。作家霍尔·凯恩告诉库尔森·克纳汉，他认为这是“整个文学史上最可怕的悲剧”。但这类言论很少见报。《雷诺兹报》刊登了一封未署名的信，信的作者是王尔德作品书目编制者C.S.米勒德，信中质疑法律是否有权对个人情感问题做出宣告表态。荷兰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科恩在一本名为《火炬》的小型杂志上应和了这种观点。该杂志由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的两个侄女制作。然而，公众的不满无处不在：波托拉学校删除了“荣誉评审委员会”中王尔德的名字；牛津大学丘吉尔共济会的“金册”将他除名；W.P.弗里斯甚至提出要从他的1881年皇家艺术院预展画作中抹掉王尔德的形象。⑩

然而，一道光亮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王尔德所处的黑暗之中。6月12日，他被宣判入狱仅两周后，开明的自由党议员罗伯特·霍尔丹突然造访了他。霍尔丹（比王尔德小两岁）是八十俱乐部的成员之一。他的这次访问之所以能够成行，是因为他刚刚到负责调查监狱系统缺陷的部门委员会任职。这次会面在一间专门的会客室举行。起初，王尔德拒绝开口。“我把手放在他穿着囚服的肩膀上，”霍尔丹回忆，“说我以前认识他，我来是为了谈一谈关于他的事情。”霍尔丹——才智相当出众，将叔本华的作品翻译成英文——认为王尔德还没有充分利用自己伟大的文学天赋，原因是他过着一种享乐的生活，自己没有创作出任何伟大的作品。然而，他眼下的不幸也许会提供给他一个伟大的题材，将他的作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虽然根据规定，囚犯服刑不满三个月不可以看书——除了祈祷文——之后也只能一星期

一次，但霍尔丹提出，他会立刻设法争取弄到一些书籍、钢笔和墨水等。然后，当他的刑期结束时，王尔德就可能拿出真正伟大的作品了。王尔德听到这里，突然泪流满面。无论如何，他答应试一试。

他当然渴望读书。他开始谈及可能获得的书籍。霍尔丹不得不拒绝可能包括福楼拜的小说在内的一些书籍，他指出，福楼拜这样的作家曾经因猥亵而遭到起诉，其作品是不太可能得到监狱当局许可的。王尔德认识到这一事实后笑了起来，几乎变得开心起来。他们开始讨论文学，最后选定了15本非小说类书籍，包括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蒙森的五卷本《罗马史》、红衣主教纽曼的《自我辩护》和沃尔特·佩特的《文艺复兴》。尽管本顿维尔的典狱长提出反对，但这些书——而不是写作材料——还是得到了内政大臣的批准，并在适当的时候被送到了监狱图书馆。❶

霍尔丹的造访中含有个人关怀和共同人性的因素。但他的介入也表明，当局对王尔德的案子很感兴趣。6月初，一些异想天开的媒体报道称王尔德“疯了”，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尽管典狱长迅速采取行动否认了类似说法，但阿斯奎斯（内政大臣，王尔德11个月前曾与他同桌用餐）还是要求监狱管理人员调查这些说法的真相。❷

本顿维尔监狱的医务官向监狱管理人员（以及政府）保证，尽管王尔德的身体有点小问题，但他既没有疯，也没有奄奄一息：事实上，除了“有一丁点咽炎”，他“没有让监狱里的任何官员感到焦虑”。霍尔丹的访问紧随其后，他的调查结果似乎交到了罗斯伯里勋爵手里。随后，霍尔丹密切关注着王尔德的情况。在他的关注之下，

新任命的监狱委员会主席伊夫林·拉格尔斯-布赖斯也加入了他的行列。拉格尔斯-布赖斯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心肠慈悲的人，他既钦佩王尔德，也理解他的监狱经历“比普通罪犯要严酷得多”。虽然他和霍尔丹优先考虑的事情并不相同，但他们是王尔德事业的两个强有力的盟友。不过，他们必须谨慎行事。正如霍尔丹向王尔德的一个朋友解释的那样，“他们不能被人认为，给予了（王尔德）超出他本身状况所需的更多的差别待遇”。^①

王尔德本人似乎已经被新环境压垮了，甚至没有流露出一丝担忧。他感觉自己被抛弃在地狱般的监狱生活中。7月2日，前警官基利来访，带来了一份昆斯伯里申请破产接管令的副本，这进一步加深了王尔德的痛苦。诉讼程序已于6月21日启动，侯爵要求归还他的法律费用，现在将继续通过破产法庭沿着既定路径执行。如今，除了对监狱制度的极度恐惧之外，他又平添了一份对财务状况的焦虑——一种让他束手无策的焦虑。由于罗斯、特纳和道格拉斯都在国外，王尔德的事务就交给了罗斯的朋友莫尔·阿迪来打理。尽管他从来都不是王尔德的密友，但此时他发现自己已被卷入事情的核心；必须有人去联系汉弗莱斯，而这个人就是他。^②

基利到访两天后，王尔德被从本顿维尔监狱转移到伦敦另一头的旺兹沃斯。尽管霍尔丹可能参与了选择拘押地的事情，但更换监狱本身是因为“怀疑本顿维尔监狱的警官们受到了王尔德朋友的干扰”。本顿维尔监狱的典狱长曼宁乐于见到王尔德离开。公众对这名囚犯的

强烈兴趣，以及泄露他的健康状况，都是令人讨厌和尴尬的事情。 ⑨

⑩

旺兹沃斯监狱的设计和运作方式与本顿维尔相同，但王尔德似乎对这一安排感到不安。监狱牧师W.D.莫里森注意到，他来的时候“情绪激动而慌乱”。然而，这场风波很快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毫不畏惧地面对惩罚”的决心。王尔德的“坚韧”在监狱的管理制度下退缩了。本顿维尔的食物让人难以下咽，旺兹沃斯的更难吃。有些狱卒简直如同“禽兽”。他的书，理应和他一起转移，却直到8月17日才送达。饥饿和睡眠不足折磨着他；他开始产生“疯狂的妄想”，认为自己可能疯了。他想要自杀。霍尔丹去新监狱探望时，王尔德那种“绝望的”状态“痛苦地打击”着他。莫里森认为这名囚犯“完全被压垮了”。医生担心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自从进入本顿维尔监狱以来，他已经掉了22磅——超过他体重的10%。对于他是否“能够熬过两年”，一些比较有经验的狱警公开表示怀疑。 ⑪

监狱外传来了新的烦恼。7月29日，破产法庭的一名官员来面见王尔德。经昆斯伯里和其他债权人开会决定，威尔迪先生被指定为王尔德个人财产的官方接管人。一次在旺兹沃斯见面时，他带领王尔德“一步一步地……回顾他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列举他的资产，详细说明他的挥霍用度，并确认了他的债务。王尔德回忆说：“这太可怕了。”尽管从1893年年中开始的两年时间里，王尔德已经赚了4000英镑，但他欠下了3591英镑9先令9便士的债务。除了昆斯伯里应得的677英镑3先令8便士之外，他的欠款还包括：欠康斯坦斯·王尔

德婚姻财产协议受托人1557英镑16先令1便士（他们结婚前夕从信托基金借了1000英镑，既没有偿还本金也没有偿还任何利息）；因1885年的一笔贷款，欠奥索·劳埃德500英镑；欠乔治·亚历山大的《不可儿戏》预付版税414英镑19先令11便士；从1893年到1894年3月，欠萨沃伊酒店的膳宿费用为70英镑16先令11便士；还有价值超过230英镑的“烟酒、珠宝和鲜花”。^⑨

王尔德的资产很少。莫尔·阿迪列了一张财产清单。在泰特街不光彩的治安官拍卖会上，他的财产已经被贱卖殆尽。他保留了各种各样的版权，以及他未发表（实际上是未完成）的手稿《佛罗伦萨悲剧》《圣妓》和《阿维尼翁的红衣主教》。至于那篇加长版的《W.H.先生的画像》，则一直下落不明。莱恩声称他已经把手稿归还到泰特街，然而王尔德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正如阿迪指出，“他的作品现在很难出版，我不指望从中得到什么”。他的另一项资产是他和康斯坦斯婚姻协议中的“终身权益”——然而考虑到康斯坦斯比他年轻，而且作为女性，预期寿命更长，这笔财产的实际价值非常小。^{⑩ ⑪}

当他将思绪深深地拉回到那些使他走向毁灭、监禁、耻辱和羞辱的桩桩件件事件时，王尔德开始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源于道格拉斯。是他一心要和昆斯伯里作对；是他推动了这场致命的法律诉讼；是他（和他的家人）承诺支付王尔德的法律费用，却没有兑现。在不断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几个月来支撑着他的大爱凝结成了恨。这种变化既突然又彻底。在王尔德看来，从现在起，道格拉斯所做的（和已经做过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证实了他的浅薄且毫无价值。他忘

记了最近几封情书中那些充满激情的词句。一名律师助手来取他的破产证词时，从桌子对面俯下身来，低声说：“百合王子托我转达对你的问候。”王尔德茫然地盯着这个人。直到对方重复了这句话，又补充说“这位绅士目前身处国外”，王尔德才意识到消息一定是道格拉斯传来的。“百合花”这个名字是从道格拉斯的一首歌谣中借用来的，仅仅在几周前，它还是两人之间的一个神圣的称呼。如今，在可怕的旺兹沃斯监狱，这个名字让他感到恐惧。他苦笑了一声。他后来回忆道：“全世界的鄙夷都在那一声笑中。”^②

在否定道格拉斯的同时，他渐渐体会到了康斯坦斯对他深深的爱，以及他自己对她和孩子们的爱——对道格拉斯的“疯狂”迷恋，导致他滥用并破坏了这些爱。正在此时，8月26日星期一王尔德迎来了他的第一次规定探视，访客是罗伯特·谢拉德。王尔德的许多亲密伙伴都在欧洲大陆，谢拉德却反其道而行之，想到朋友在英国受苦，他觉得自己无法继续待在巴黎。

探视地点是一间用两排铁栏杆隔开的空荡荡的拱形房间，20分钟的时间里，墙上的钟一直在大声地滴答走着。狱吏在两排铁栏杆之间的过道里巡逻，一旦谈话涉及禁忌的话题，他会随时干预。他们面对面地站着——每个人都紧靠在栏杆上“支撑着”——谢拉德震惊地看到了朋友的惨状：他的手变得非常丑陋，指甲在捡麻絮时弄断了，还在流血。他的脸上因为有胡茬而显得“不太整洁”。即便王尔德热泪盈眶，也能看出来他一开始显然非常沮丧。谢拉德竭力装出一种无中

生有的愉悦，他为在20分钟会面结束前博得王尔德一笑而兴奋不已。

⑨

他也许能告诉王尔德一些法国人对他入狱的反应。一连串的作家纷纷愤然而起，以不同的方式谴责英国“司法”对待王尔德的野蛮、愚蠢和虚伪。他们纷纷发表充满激情，表达支持的文章，亨利·鲍尔发表在《巴黎回声报》上，奥克塔夫·米尔博发表在巴黎的《日报》上，保罗·亚当发表在《白色评论》上，路易·洛梅尔、洛朗·德·塔哈德和亨利·德雷尼耶也发表了文章。事实上，有些人断言，如果王尔德到巴黎，“他会在大街上受到欢呼”。⑩

得知王尔德对道格拉斯和康斯坦斯态度的转变之后，谢拉德深受鼓舞。他决心尽其所能促成这对夫妻之间的和解。他相信，这是拯救王尔德的最大希望。康斯坦斯为了隐姓埋名，已经离开伦敦，带着孩子们去了瑞士，和她的哥哥一样，用了“霍兰德”这个姓。在她的家庭律师哈格罗夫先生和乔治·刘易斯的建议下，她打算和她“误入歧途的可怜丈夫”离婚。这倒不是说她不再关心他了——事实上，他的堕落似乎增加了她对他的爱和关心——而是一种实际的需要。如果她去世了，拥有婚姻财产中终身权益的奥斯卡将得到这笔基金的所有收入，严格来说，孩子们将身无分文。虽然他也许很想供养他的儿子们，但他的债务，尤其是“他在金钱事务上的行为方式”使得所有相关的人都相信，这是不可能的。而为了保护孩子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离婚。⑪

谢拉德写信给她，劝她重新考虑；他可能也鼓励王尔德这样做。因此，当8月底，王尔德获准写信给康斯坦斯时，他的信中充满了谦卑和悔悟。她的律师——出于她的利益考虑，已经读过这封信——认为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感人、最悲哀的信件之一”。^⑨

可以肯定，他的这封信起到了作用，因为信件发出几天后，王尔德收到了第一封信。信是身在瑞士的奥索·霍兰德寄来的。虽然这封信明显与他的意见相左，但其中表示康斯坦斯准备重新考虑离婚的决定。然后，仅仅过了一周，9月21日王尔德得到特别许可，康斯坦斯来探视了。她收到信之后，从瑞士赶来，说出了“愿意原谅他”并且希望未来共同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用假名，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她说，西里尔“从未忘记他”。从她的说法来看，她似乎是隔着一道屏障和丈夫交谈的。她告诉谢拉德，整个经历比她想象的还要可怕：“我看不见他，也碰不到他，我几乎没怎么说话。”不过，对王尔德来说，康斯坦斯的到访给他提供了一丝解脱。他告诉她“过去三年他简直是疯了”，如果见到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他会杀了他”。康斯坦斯真心希望他再也不要见到道格拉斯。^⑩

两天后，谢拉德获得特许探望了王尔德，发现他“开心了许多”。谢拉德称，他即将动身前往马达加斯加，并有紧急事务要与囚犯讨论。而且，由于这是一次名义上的商业性采访，因此会面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也不在围着栅栏的探视室里，而是在监狱办公室进行的。会面结束时，谢拉德抓住机会拥抱了他的老朋友。谢拉德在康斯

坦斯探视后不久见过她，他向王尔德保证，他妻子的“心仍然和他在一起”，“一旦他的刑罚结束”，确实有可能一起生活。⑨

他还带来了巴黎的消息。他通过那里的熟人了解到，道格拉斯——一心要为朋友而战——为《法兰西信使》写了一篇长文，详细叙述了王尔德几次受审的背景，宣告“希腊之爱”的美德，其中大量引用了王尔德从霍洛韦写给他的几封充满激情的信件。王尔德改换了心境之后，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发表如此“愚蠢”的言论，“向一个本性冷酷无情、贪婪粗俗、贪得无厌的人表达不得其所、不得善报的感情”，只会令他进一步蒙羞。“如今，令我名垂千古的绞刑架已经架得够高了，”他称，“人们（道格拉斯）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虚荣心而让事情变得更可怕。”他敦促谢拉德阻止这篇文章发表。而谢拉德——从来就不喜欢道格拉斯——很乐意帮忙。⑩⑪

这一周的激动兴奋还没有结束。第二天，王尔德被带出监狱，来到破产法庭。他穿着自己的旧衣服，显得拖拖拉拉的。人们预计当天他将在法庭上接受“公开讯问”，但他没有被传唤。他的律师成功地请求了休庭。哈格罗夫先生考虑到康斯坦斯不愿意离婚，于是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划，那样或许可以撤销破产，因此也就根本不需要审查王尔德，同时也解决了他在婚姻协议中的“终身权益”问题。根据该方案，康斯坦斯的婚姻财产受托人将收回557英镑的16先令1便士利息和1000英镑的贷款，作为交换，王尔德以象征性的5英镑放弃他的“终身权益”，并允许从他所有现有的文学和戏剧版权中提成。他余下的2033英镑13先令11便士债务可能会通过他的朋友和同情者的

捐款来偿还。阿迪已经得到了1500英镑的承诺，他相信剩下的金额可以在11月12日法庭重新开庭之前筹齐。 注

法庭上进行上述陈述时，王尔德和两个狱吏等候在隔壁的一间办公室里。阿瑟·克利夫顿作为婚姻财产的受托人之一，出人意料地获得许可在那里见他。克利夫顿见到朋友的样子以及他痛苦的状态“非常震惊”。“(他)哭泣了许久，”克利夫顿写道，“他似乎伤心欲绝，一直在讲述对他的惩罚是野蛮行径。”克利夫顿试图用朋友的消息和读书的话题让王尔德高兴起来：王尔德获准以每星期一本的速度读书，他一直在看佩特和纽曼的书。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王尔德仍然“极度沮丧，好几次提到，他觉得自己撑不到刑期结束”。当克利夫顿试图解释哈格罗夫提出的方案时，王尔德并没有表达什么特别的意见，只是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在方案之外留下一些东西给他”。作为一名合格的律师，克利夫顿理应向他解释清楚，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作为一项资产，他的终身权益需要全部出售。然而，他却随口接受了这个想法，并告诉王尔德，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他应该保留大约三分之一的终身权益”。过了没多久，他向康斯坦斯提起了这件事，康斯坦斯因对法律一无所知，也觉得这很有道理。然而，这个想法会导致无尽的麻烦和冲突。 注

与克利夫顿、谢拉德和康斯坦斯的会面给王尔德带来了些许安慰，却不足以提起王尔德的精神，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依然不稳定。监狱牧师（刑法改革的热情支持者）确信——由于犯人“性格变态”——王尔德已经有“反常性行为”，发生了强迫性手淫。“这在

他这种阶层的囚犯中是很常见的，”莫里森牧师在给霍尔丹的信中写道，“当然，持续的单独关押更助长了这种情况。现在（王尔德）牢房的气味太难闻了，负责看押他的警官不得不每天在牢房里使用石炭酸。”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权威人士认为，自慰即便不是精神错乱的原因，也是其一种症状。经常有囚犯因沉溺于“手淫”而被认定为精神失常。王尔德幸运地躲过了这种命运。⑨

拉格尔斯-布赖斯发起了调查；结论是，没有证据可以支持牧师过于激烈的怀疑。监狱医务视察员R.M.戈弗医生将莫里森“异乎寻常的指控”斥为“卑鄙和恶意的歪曲”。甚至连拉格尔斯-布赖斯（写信给内政部）也遗憾地表示，这名牧师可能是“一个危险人物，他试图让王尔德成为一条证据，用来说明监狱系统的残暴”。至于王尔德牢房里的怪味，则是因为他在清洗餐具时使用了“杰耶斯”洗涤液。⑩

戈弗医生（与牧师完全相反）报告说，王尔德实际上非常好——“胃口极佳”，“身心都很健康”。他确实承认——为了减少囚犯明显的孤立感——也许可以让他开始参与“协作”劳动，比如霍尔丹曾经提出过，可以从事重新装订监狱赞美诗。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做一些“特殊的安排”，以防囚犯与“伦敦的小偷和其他低级罪犯为伍，他们是旺兹沃斯监狱里的大多数”。为了防止王尔德与“伦敦盗贼”交往，相应的计划应运而生“建议国务大臣将王尔德转移到乡村监狱去”。⑪

就在这些讨论的过程中——尽管戈弗医生做出了乐观的评估——王尔德的身体健康彻底崩溃了。危机发生在接近10月中旬的时候。星

期日做礼拜时，他因患痢疾而虚弱不堪，倒在监狱礼拜堂的地上，随后被送往监狱医务室。他后来告诉弗兰克·哈里斯，他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在“天堂”获得了重生。“我的手搁在一块干净的白床单上……它是那么光滑、凉爽、干净。”护士给了他几块薄薄的白面包和黄油——“太好吃了”，他突然大哭起来。❶谢拉德和威利的妻子莉莉获得准许去医务室看望他。然而，两人中无论是谁，都没有即刻感觉到他的重生。他们发现病人虚弱得可怜，而且仍然“很不快乐”。谢拉德说他已经“成了十足的废人”。❷

谢拉德为了让他高兴起来，提出建议说，《每日纪事报》致力于监狱改革，不妨在这张报纸上下点功夫想办法改善他的生活安排。然而，谢拉德的这句话却被狱吏以“破坏监狱制度”为由汇报给上级（前几次探监之后，谢拉德已经向《每日纪事报》透露了王尔德在狱中的日常生活细节）。和本顿维尔监狱的典狱长一样，旺兹沃斯的典狱长渐渐发现，王尔德是个相当沉重的负担，因为他的朋友和支持者们实在过于活跃了。他连忙建议将王尔德转移到“一个乡村监狱去，在那里他不太容易受到这样的影响”。❸

这个想法获得普遍支持，霍尔丹认为这对王尔德的精神健康是有必要的。虽然他认为莫里森牧师的说法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他对戈弗医生乐观的报告并不信服。他的诸多存疑促使内政部批准对王尔德的精神状况进行一次更全面的评估。❹无论大众对王尔德的敌意如何持续，在官方圈子里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那就是，如果监狱系统完全摧毁了他，那将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甚至是“英国文学的一大损

失”）。莫里森写道：“如果王尔德在监狱的管制之下发疯，几乎肯定会在公众心中引起极大愤慨，当局无疑会因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而受到指责。”^⑨

10月22日，两名精神病犯罪专家（其中一名是布罗德莫精神病院院长）在旺兹沃斯的医务室给王尔德做了检查。当他们发现他“以一种愉快的方式”和其他同狱囚犯“微笑着交谈”时，很受鼓舞。这种积极的印象（以及他的精神状态）在他们随后的会见中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证实：

他畅所欲言地谈了他过去的情况，特别是他强烈地意识到那些都与他现在的处境相关，说到此他情绪激动，抑制了一下情绪，不时流下眼泪。毫无疑问，正如他自己告诉我们的，这种情感的流露表明，想到过去可憎的行为毁掉了他的未来，他感到悔恨和痛苦，我们认为这是自然的，不能据此说明他神经错乱。^⑩

在了解到王尔德的转移计划后，他们认为“在谨慎的处置下，在短时间内将王尔德转移到乡下的监狱，通过不同的劳动和更广泛的阅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监狱会对他产生有害影响”。他们还认识到，如果允许他更多地“与其他囚犯交往”，将是有益的——尽管他们对负面影响的担忧与此相反。考虑到王尔德的“癖好”和“对男性社会的公开热爱”，他们明确要求，这种交往只能在“狱吏的持续监督下”展开。^⑪尼科尔森医生和布赖恩医生的报告完成不久，事情就定下来了，要将王尔德尽快转移到伯克郡的雷丁监狱。^⑫

然而此事还得短暂地耽搁一下，因为王尔德需要留在伦敦，直到破产法庭走完程序。9月的第一次法庭听证会带来的乐观情绪并没有得到维持。珀西·道格拉斯——曾经承诺向阿迪的基金支付500英镑——没有兑现承诺，并且未必可靠地声称，自己不打算拿出这笔钱来支付他讨厌的父亲的诉讼费，宁可将这笔钱留给王尔德，待他出狱后再给他。第二次听证会前夜，阿迪筹集的基金还差大约400英镑。②哈格罗夫的计划被迫放弃，破产不得不继续执行下去。

11月12日早上，王尔德从医务室被带到了位于林肯客栈广场的破产法庭。他裹着一件“蓝色长大衣”，看上去“身体很不舒服，简直要垮了”。他头上的那顶丝质帽子曾在老贝利出庭时戴过，但已经失去了光泽。令王尔德苦恼的是，一群“游手好闲看热闹的人”已经聚集在那里，希望能一睹他的模样。当他在两名身穿制服的狱警护送下，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向法庭时，看到了站在一边的罗比·罗斯（现在已经回到英国），这让他感到很振奋。王尔德经过时，罗斯“严肃地”挥帽致意。王尔德认为这是圣人的行为，他永远不会忘记。讯问本身很简短（不到半个小时），王尔德把身体靠在证人席上，只回答了“是”或“不是”。③

讯问结束后，克利夫顿和罗斯都被允许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各自和他单独待半个小时。自从王尔德被捕之后，罗斯就再没见过他，他感到很震惊。“事实上，我真的根本就不该认识他，”他给奥斯卡·布朗宁写信说，“我知道这是一种常用的比喻，但它确切地描述了我的体验。他的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他的双手像骷髅一样。他的脸

色彻底变了，但这并不完全是由于他那一点点胡髭。后者只是掩盖了他那让人感到可怖的凹陷的双颊。”罗斯认为王尔德的精神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但也承认他的大脑“严重受损”。王尔德仍在医务室，但他告诉罗斯他想离开，“因为他希望赶快死掉。事实上，他只有在谈论死亡时才能够保持平静，其他任何话题都会使他崩溃”。^⑨

接下来的一周，王尔德被带回到林肯客栈广场签署了他的声明稿。手续已经办妥。第二天，11月20日，他被转移到雷丁。这一举动本应标志着他的境况得到了改善，但它是以一种痛苦的方式开始的。他并非乘坐囚车，而是要在中午时分，戴着手铐，穿着囚服乘火车前往。他被带到克拉珀姆枢纽车站，被迫夹在看守之间，在中央站台上站了半个小时（从两点到两点半），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蔑视。一群人笑着聚拢过来。有人认出了他，一个男人向他吐口水。王尔德后来写道：“在那次遭遇后的一年里，每天到了那个钟点，我都要哭，哭上同样长的一段时间。”^⑩

2 秩序

对那些监狱中人，眼泪是每天必备的经历。

——奥斯卡·王尔德

雷丁监狱是拉格尔斯-布赖斯特意挑选的。典狱长H.B.艾萨克森中校（前海军）感到很荣幸，他对监狱工作人员说，“某个囚犯”即将被移送过来，“监狱委员会选择了雷丁监狱，认为这里是最适合这个人服完剩余刑期的地方，你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他虽然没有提及囚犯的名字，但王尔德一到，人们就猜到了他的身份。在负责理发的狱吏看来，为了剪头发而焦虑不安，就是王尔德的典型特征。“‘一定要剪掉吗？’他可怜巴巴地对我喊道，‘你不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泪水从他的脸颊滚落下来。”对王尔德来说，“监狱生活的恐怖之处”，其部分在于“一个人外表的怪诞和他灵魂的不幸之间的对比”。^①

王尔德要在雷丁服完剩余的18个月刑期。虽然这个监狱比本顿维尔和旺兹沃斯要小得多（大约有150名流动的在押囚犯），但它同样是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设计建造的，由一块中央核心区域和放射状的四翼组成。王尔德——作为囚犯C.3.3——被分配在三层C通道的3号牢房。他是这个新世界里的特殊人物：在几十个年轻的劳工和新兵当中，他是唯一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罪犯，其他人大多数都是因为酗酒或小偷小摸而进来短期服刑的。^②

他生活的某些方面立刻得到了改善。空气更清新了。他的饮食得到了改善。他被指派在牢房里缝煤袋，而不是捡麻絮。但这都是些微小的改进。这里的制度和旺兹沃斯一样严格。王尔德经常违反些小小的规定。他悲叹道：“最糟糕的是，我永远无缘无故地受到惩罚。”他称，艾萨克森中校“热爱惩罚”。当然，这位具有军事背景的典狱长是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人。王尔德叫他“桑葚脸的独裁者”——一个拥有“雪貂的眼睛、猿猴的身体和老鼠的灵魂”的人；但他也意识到艾萨克森之所以如此严厉，是因为“他完全缺乏想象力”。艾萨克森自吹自擂地说，他正在“打掉王尔德的胡言乱语”。在他施加的所有惩罚中，王尔德最害怕的是不让他看书（他的私人图书室从旺兹沃斯搬到了这里）；只要有书，生活就还能忍受。没有书，心灵就只能“无休止地在遗憾和懊悔的上下磨石之间磨灭自己”。^①

王尔德没有从监狱医生身上得到一丝安慰。作为一个阶级，他认为这些官员都是“禽兽，过于残忍”。但奥利弗·莫里斯医生似乎超越了常规。罗斯说他长着“油腻的白胡子”，很像“恃强凌弱的公司主管”，他一直对王尔德“很刻薄”，并且对他漠不关心。^②

然而，在11月底访问雷丁时，莫尔·阿迪欣喜地发现，在经历了旺兹沃斯的恐怖之后，王尔德的精神状况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善。“我想他意识到，他必须努力防止自己的思想更加痛苦，”阿迪写道，“因为他非常渴望得到一些相当枯燥的脑力劳动，以便占据并在某种程度

上约束自己的思想。”到了新年，王尔德准备重新装订监狱赞美诗，同时还在监狱花园里干活。❷

阿迪一直在为王尔德忙碌着，但收效甚微。他曾试图向内政大臣提出请愿，要求早日释放王尔德，但除了萧伯纳和斯图尔特·黑德勒姆这两个自封的“怪人”之外，他几乎找不到人在请愿书上签名。牛津大学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约克·鲍威尔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例外。文学和艺术机构则对他们置之不理。❸然而，阿迪为王尔德收集了更多的书，并且——通过霍尔丹和拉格尔斯-布赖斯的干预——将它们直接送到了雷丁监狱藏书不足的图书室，其中有但丁以及希腊和拉丁诗人的作品。❹

在起草那份注定失败的请愿书时，阿迪列出了王尔德精神状态每况愈下的几个迹象，其中之一的的事实是，他过去“总是对母亲表现出最温柔的关怀，自己承担了她的大部分抚养费，并且在他经历两次审讯的那些最痛苦的日子里，还特别将她托付给朋友照料，然而他现在似乎对她很冷漠”。事实上，他经常想起她。2月3日晚上，她出现在他的幻觉中，穿着外出的衣服。当他让她脱下帽子和斗篷坐下时，她悲伤地摇摇头，消失了。这似乎是死亡的预兆。❺

大约两个星期后，他接到通知，来了一位特别的访客。是康斯坦斯来了。尽管她身体虚弱（圣诞节前刚做了手术），但她还是从意大利的居住地赶来，把他母亲于2月3日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一直以来，康斯坦斯一想到要以“粗暴的方式”将“如此可怕的消息”告诉他，就觉得如坐针毡。这个消息——即便证实了他的预感——仍然使

他感到极度震惊。“她的去世，对我来说是个如此可怕的噩耗，”他后来写道，“即便我曾经出口成章，也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内心的哀伤和愧怍。”她——和威廉爵士一起——给他留下了“一个崇高和荣耀的姓氏，不仅在文学、艺术、考古和科学领域，而且在我们祖国的历史中，在我们民族演进的历史中留名”。而他却“让这个姓氏永远地蒙羞……使它成为下贱人流传的下流笑柄……将它拖进了泥潭”。^⑨

康斯坦斯安慰了他一阵子。鉴于情况特殊，他们在“一个不同于普通探访室的房间”会面。她待他“温和又友善”。即使他身处痛苦中，也能意识到她对他的痛苦是感同身受的。“我的灵魂和我妻子的灵魂在死亡的阴影之谷相遇，”他后来告诉罗斯，“她亲吻了我，安慰了我：她的所作所为也许是除了我自己的母亲之外，史上绝无仅有的。”他们谈到了未来，私下里“安排好了一切”。康斯坦斯希望他“不要在公共法庭上做任何事情”。她的计划（经哈格罗夫认可）是，王尔德获释后，每年能从她那里得到200英镑的津贴——如果她在他之前去世的话——将婚姻财产协议中的三分之一作为他的终身权益。王尔德被释放后立即达成完全和解的想法似乎被搁置了；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与此同时，康斯坦斯将承担孩子们的监护权。王尔德默许了，同时恳求她不要宠坏西里尔。他建议，如果她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感到负担沉重，她应该“指定一个监护人帮忙”。^⑩

康斯坦斯还提到了莫尔·阿迪在终身权益问题上制造的麻烦。他坚持认为，他和王尔德的“朋友”应该以王尔德的名义购买三分之一婚姻财产协议股份，而非在这件事上依赖康斯坦斯的善意。然而，王尔

德“完全信任”妻子，并立即承诺在下一封写给罗斯的信中告诉他，让康斯坦斯顺利承担终身权益。❶

除了母亲去世的消息，有一个让人稍感快慰的消息是，他的戏剧《莎乐美》已在巴黎首演。将它搬上舞台的不是莎拉·伯恩哈特，而是年轻的演员兼经理人奥雷利安·吕涅波，他的浮雕剧院继承了艺术剧院的象征主义火炬。这是一个梦想的实现；王尔德只是希望他能从中获得更多的乐趣。但他觉得“除了痛苦和绝望之外，他对所有的情感都麻木了”。眼下就连文学，似乎也对他失去了吸引力。他尝试阅读希腊和罗马诗人作品，却只觉得头疼。❷

康斯坦斯对王尔德的状况深感忧虑。“他们说 he 很好，”她告诉奥索，“但和以前相比，他已经完全崩溃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进一步摧毁了他。罗斯每个季度都来探监，5月底，他和谢拉德前往探视，证实了康斯坦斯对王尔德健康状况的悲观评估。他给阿迪写了一封生动的长信，其中列举了王尔德每况愈下的种种迹象：他不仅更瘦了，而且“掉了很多头发（当他转过身站在光亮处的时候）。他一直头发浓密，然而现在头顶后部却秃了一块。而且其中还夹杂着白色和灰色”。❸

然而，更令人痛苦的是他眼中的茫然。他几乎不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在哭。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新闻无法引起他的兴趣。他抱怨无法集中精力阅读，而且仍然不可以写作。他眼下最迫切的恐惧是，自己可能正在失去理智。罗斯也有同样的焦虑。他给阿迪写信说，监禁似乎让王尔德“暂时变得愚蠢”。他说，如果王尔德在未来几个月内死

去，自己不会感到惊讶，他不是死于任何特定的疾病，而是因为“他日渐消瘦、憔悴……怀着一颗破碎的心不断下坠”。谢拉德的判断也同样可怕。“我认为奥斯卡的情况确实很糟糕，”他告诉阿迪，“他似乎失去了一切灵活性和抵抗力，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处境确实令人担忧。这太可怕了。” ⑨

王尔德情况的恶化是在雷丁监狱所谓“获得改善”的条件下发生的，这或许更令人震惊。1896年5月是王尔德入狱一周年。他的刑期才过了一半。如果一年的监禁对他的健康和福祉带来了如此可怕的变化，那么再想想第二年会发生什么事就令人胆战心惊了。罗斯对王尔德生命的担忧似乎并不夸张。5月的那次访问促使王尔德的朋友们下定决心，必须采取措施，要么进一步改善他的处境，要么确保他早日获释。

但是如何操作呢？罗斯和阿迪向《星期六评论》编辑弗兰克·哈里斯寻求帮助，他们认为哈里斯能够对当局施加影响。哈里斯（最近刚从南非回来）立即采取了行动。他获得拉格尔斯-布赖斯的许可，“对囚犯奥斯卡·王尔德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特别采访，采访在狱吏的视线范围内进行，但他听不到谈话内容”。 ⑩

在6月16日举行的会议上，哈里斯证实了王尔德外貌和举止方面令人忧虑的变化。虽然体重减轻让他看起来更修长了，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疲惫和沮丧的状态。哈里斯面对的是王尔德的悲伤：他没有写作的工具；当局是那么残酷无情；特别是，他的右耳持续疼痛，偶尔还

会出血。王尔德认为这是因他在旺兹沃斯小教堂摔倒引起的，但那似乎更有可能是他的慢性中耳疾病复发，即由鼓膜穿孔引起的出血。⑨

尽管如此，哈里斯的出现让他确信，监狱委员会成员们对他的案子很感兴趣。由于狱吏听不见他们的谈话内容，哈里斯提出了如何利用这种兴趣的计划。他向王尔德解释，囚犯提前获释的唯一理由是出于医疗原因——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毫无疑问，哈里斯离开后不久，在王尔德写给内政部的长篇“请愿书”中，自我戏剧化的行文基调和细节背后处处体现了对这种兴趣的认识。

他在信的开头坦率地承认了“可怕的罪行”，他是“罪有应得”——他将这些罪行描述为“性癫狂”。事实上，他认为，在许多欧洲国家，人们认为他身陷的这种“可怕的”和“令人恶心的”“情色癖”应该是由内科医生治疗的疾病，而不是由法官来惩罚的罪行。他认为，继续监禁只会进一步加剧他在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长期饱受孤独，没有书本，使他成为病态感情和猥亵幻想的受害者，并不时“担心这种精神错乱……现在已经在他的本性中全面发作”。与此同时，他的“身体健康”正在不断崩溃：“因为化脓引起耳鼓穿孔，右耳几乎完全失聪”，他的视力——对“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如此重要——因为“被强制生活在石灰粉刷的单人牢房中，晚上点的是煤气灯”已经变得模糊不清。⑩

虽然艾萨克森在提交请愿书的时候，附上了一份莫里斯医生出具的简短报告，后者指出，事实上，“囚犯Wylde”（原文如此）自从到达雷丁监狱之后，已经长了“肉”。然而，王尔德信中恳切的语

气“清楚表明，他目前神智尚属正常”，内政部决定做进一步调查。拉格尔斯-布赖斯在听取了弗兰克·哈里斯的汇报后，安排监狱的五人“查访委员会”面见王尔德。谢拉德和罗斯在探监时（为了避免被警卫发现，他们用法语交谈）曾试图告诉王尔德，如果他被当局约见，必须尽量表现出生病的样子。他们和王尔德所有的朋友一样，料到王尔德天生的“虚荣心”可能会导致他“向医生隐瞒任何虚弱的迹象，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事情似乎果然如此。委员会的成员们没有发现这个囚犯有什么明显的问题。

然而，他们并不十分相信自己的判断，建议对王尔德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进行“专家医学调查”。作为一项次要措施，王尔德这份“不同寻常的请愿书”被寄给了尼科尔森医生，他是曾经在旺兹沃斯为王尔德做检查的两名布罗德莫精神病院医生之一。尼克尔森现在是内政部下属的“精神错乱督导员”，他虽然没有在文件中看到“精神错乱或接近精神错乱的迹象”，但他认为“在书籍和写作材料方面，最好给（王尔德）提供更多及特殊的条件”。7月底，拉格尔斯-布赖斯发布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指示。⑩

就在取得这些进展的同时，雷丁监狱发生了两桩重大事件。7月7日，王尔德的一个狱友——年轻的士兵查尔斯·托马斯·伍尔德里奇——在竖立于监狱操场棚子里的绞刑架上被吊死。这件事非同寻常，是18年来雷丁监狱第二次执行死刑。根据当地报纸描述，骑兵伍尔德里奇被判有罪，因“以一种非常果决的方式割断了妻子的喉咙，起因是她引起了他的嫉妒（就目前的证据来看），令他非常恼火”。现在

这个年轻人已经感到懊悔，他在行刑前的日子里经常锻炼的样子，以及那段时间里笼罩着整个监狱的可怕不祥气氛，对王尔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天早上，当监狱的钟声响起，宣布伍尔德里奇即将死亡的消息时，王尔德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因为他的想象力“召唤”出了这可怕的一幕。王尔德断言，在他入狱两年中发生的所有令人憎恶的事件中，这件事情对他的冲击最大：“太可怕了，太可怕了！”^①

监督行刑似乎是艾萨克森中校在雷丁监狱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此后不久，他被提升到苏塞克斯的刘易斯监狱的新岗位工作。他的位置由37岁的詹姆斯·O.纳尔逊少校取代。这对王尔德来说是一桩好运：很可能救了他的命，当然也使他的精神得到了恢复。^②

3 来自深渊

自我谴责也是一种享受。当我们谴责自己的时候，就觉得别人没有权利再谴责我们。

——奥斯卡·王尔德

纳尔逊少校与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他富有想象力，待人温和，颇有人情味儿，王尔德说他是“我见过的最像基督的人”。尽管他无法更改监狱系统的规则，但他可以改变执行这些规则的氛围。在纳尔逊的带领下，整个监狱生活的“基调”完全变了，一切都得到了改善。他与狱吏和囚犯都相处得很融洽。他意识到狱中存在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于是便特意帮助王尔德，怀着同情之心执行关于囚犯待遇的新指示。他给王尔德配了一副眼镜，让他的耳朵每天都能得到治疗（莫里斯医生或许是出于无能，或许是因为冷漠，之前曾经宣称王尔德的耳部感染无法治愈，如今被迫改口）。王尔德的日常饮食有所增加并获得了改善。他获准享受“奢侈”的白面包，有了更多的锻炼时间，有时候一天可以离开牢房四次。尽管他还在从事园艺工作，但除了保持牢房清洁之外，他不需要再从事其他任何“体力劳动”。^①

如今，他有更多的机会读书。纳尔逊鼓励他开列出一张清单，他有可能将其中的书添加进监狱图书室。这二十多本书中包括一本《希腊圣经》、济慈的诗歌、乔叟的作品和勒南的《耶稣传》，牧师对此并不反对，只要是法文原版就行。更重要的是，纳尔逊为王尔德提出申请，不仅每天给他一张大页纸，而且还提供了一本“结实、装订粗

糙的草稿本供他使用”。王尔德很激动能定期得到写作工具：“仅仅是用笔用墨就能帮到我，”他告诉阿迪，“我紧紧握住我的笔记本。”他感觉头脑和精神正在恢复活力。能再次被当成一个人来对待真是太好了。监狱规定，囚犯可以每天和典狱长进行简短的交谈，纳尔逊确保王尔德每天都能利用这个权利，给他提供一个交流谈话，获得欣赏的机会。纳尔逊后来回忆道：“我很期待那些早上的谈话。我总是让王尔德待上整整一刻钟，这是一个囚犯可以得到的谈话时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让他用足这段时间。因为对我而言，这是一桩乐事。王尔德无疑是我见过的最有趣、最聪明的演说家。” ② ②

王尔德的健康状况几乎立刻开始好转。莫尔·阿迪继7月底探监之后，于9月4日再次见到了王尔德，说他似乎“在外表和精神上都好了许多”。这种改善得到了持续。他在第三次探监（1897年1月28日）之后对阿德拉·舒斯特说，王尔德不仅“精神很好”，而且实际上“很幽默”。即便要求提前释放的申请遭到了正式拒绝（年底前），王尔德也能继续保持向上的面貌。他借助读但丁的书来安慰自己。他提出要着手学习德语，并且告诉罗斯：“这真是适合于学习它的好地方。”他从其他工作中解脱出来，可以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和写作上。他被允许在牢房里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图书室”，而不是按规定每周只能借两本书。 ③

纳尔逊用良性制度鼓励狱卒们发挥更大的人性对待他们的囚犯。王尔德开始交朋友。一名狱吏发现，“我想，任何人只要每天与奥斯卡·王尔德交往，都会渐渐喜欢上他。他在许多事情上像孩子一样天

真，但他总是彬彬有礼”。虽然监狱禁止狱吏与囚犯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但日常生活中还是可以抓住机会聊两句。让狱吏们时常犯难的是，如何控制王尔德的热情。一名看守他的狱卒回忆道：“我常常费好大劲才能阻止他提高嗓门。他有时候会忘记自己身在牢房……而且会……开始对一些话题大谈特谈，如果我有胆量的话，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听。但这太冒险了，所以我不得不举手警告。”这名狱卒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总是渴望向王尔德请教在研究中遇到的“棘手问题”。他对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王尔德非常珍惜他们之间的交流。

⑨

“打扰一下，先生，但是查尔斯·狄更斯，先生，”这名狱卒有一次问道，“他现在还被人看作伟大的作家吗，先生？”

“是，是的，的确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你看，他已经死了。”

“哦，我明白了，先生。他因为死了，所以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先生。”

还有一次，他们提到了专门描写军队生活的畅销小说作家约翰·斯特兰奇·温特。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先生？”

“是个迷人的家伙，”王尔德回答，“但他是个女人，你要知道。他不是个男人。他也许不是一个伟大的追求文体风格的作家，却是一个相当好的，简简单单讲故事的人。”

“谢谢你，先生。我不知道他是个女人，先生。”

狱卒后来又谈起了玛丽·科雷利。

“打扰一下，先生，可是玛丽·科雷利会被看成是伟大的作家吗，先生？”

王尔德后来回忆，这个问题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他把手搭在狱卒的肩膀上，严肃地回答道：“我对她的品德不存在什么非议，但根据她的写作风格，她应该待在这里。” ⑩

当两人无法交谈时，王尔德会每天早上将详细的手写答案从他的牢房门底下递给他的学生。 ⑪

其他狱卒则喜欢在玩报纸有奖竞猜的时候同王尔德商量，请他帮忙想出个机智或巧妙的答案。王尔德告诉罗斯，他在雷丁监狱期间，“赢得了一套银质茶具和一架三角钢琴”，以及几个畿尼的奖金。 ⑫ 这套茶具是为一名新婚狱卒准备的，上面列有一系列双关语“理由”，说明这名男子和他的新婚妻子为什么需要这样一套茶具 (tea-service)：“(1)因为一对调羹显然是必需的，我和我的妻子，我们是两个人。(2)因为它对于我们再合适不过了。(3)因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 (grounds)想要一个咖啡壶。(4)因为婚姻是一场游戏，应该从一份爱情套装开始。(5)因为没有正规的婚礼仪式(service)，就不能合法结婚。” ⑬

在这种新的氛围中，王尔德渐渐扭转了对监禁的整体态度。他对监狱“及监狱里每一名狱卒”的极度“憎恨”开始减退。痛苦和仇恨不再主宰——也不再毒害——他的灵魂。⑩他意识到，监禁实际上可能有一种变革性的力量。他一直认为监禁会“将一个人的心变成石头”，如今他渐渐发现，事实上，监禁能教人产生怜悯——“世界上最伟大、最美丽的东西”。他称，判刑之前，他只想到自己；现在他开始同情他人的痛苦。在运动场上，有个人小声对他说：“我同情你，因为你比我受了更多的苦。”对此，他只回答道：“不对，我的朋友，我们都受着同样的苦。”⑪

一旦醒来，王尔德的怜悯之心肯定占据了绝大部分。他把自己微薄的资源用于行善。有一次，他请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狱卒把“他的一半面包”分给隔壁牢房的囚犯，因为他“非常饿，他得到的食物没有我多”。正如狱卒所说：“在监狱里给人半个面包，比在外面给别人半个金镑，需要更大的勇气。”王尔德通过这样的行为，以他的人格魅力，在其他囚犯中赢得了真正的人气。他在雷丁监狱的最后那段日子里，大家常常为了“谁该在操场上、监狱礼拜堂里挨着他的位置”而“争抢一番”。⑫

王尔德喜欢跨越社会阶层交朋友，他在写给雷吉·特纳的信中提到监狱里“有许多不错的小伙子”，其中还有几个特别的“朋友”。虽然受到隔离制度的限制，但他称自己有“七八个朋友”：“他们是极好的小伙子：当然除了活动时的只言片语，我们不能相互说话，但我们是很有要好的朋友。”虽然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其中的哈

里·埃尔文被称赞为“非常英俊”——王尔德对这些年轻人的兴趣似乎与性无关。他甚至还没得到释放，就已经开始谋划如何用少量的钱来帮助他们。❶

对王尔德来说，在监狱生活众多显而易见的不公正中，最令人痛苦的是对儿童的例行监禁和对“智力有缺陷者”的残酷对待。后者经常因为无意中违反了一些小规则，而被斥为“装模作样”或者装病，不断受到惩罚。有个不幸的年轻“疯子”——他的“一脸憨笑和愚蠢的笑声”，以及他突如其来的沉默、眼泪和他那些“怪异的手势”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他的状况——“因查访的法官根据医生报告而下达的命令”遭到了残酷的鞭打。这件“恐怖”的事情发生后，王尔德哭了整整一夜，无法从脑海中抹去那个男人的尖叫声：“起初我以为是公牛或母牛之类的动物被人笨拙地宰杀了。”❷他决心在获释后尝试改变这些恐怖的事情。

他也受到了来自监狱外的关怀。当罗斯（在5月探监时）告诉他，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打算在巴黎出版一本诗集献给他时，他感到很沮丧。王尔德随后写信给罗斯，敦促他阻止这件事：“这种提议令人恶心，也很可笑。”他请罗斯找回王尔德写给道格拉斯的所有信件，将它们销毁。他甚至想要回他送的所有礼物——书和珠宝。“一想到他戴着或拥有我给他的任何东西，我就特别不舒服。当然，我无法从记忆中抹去这让人恶心的两年，让他和我在一起，我真是倒霉透了。我也无法忘记，他为了发泄对他父亲的仇恨和满足其他

邪恶的感情，把我推入毁灭和耻辱的深渊。但我不会让我的信或者礼物落到他手里。” ⑩

道格拉斯仍然流亡在外——被王尔德“可怕的”背叛搞得心烦意乱，十分困惑——他打消了出书的想法，但拒绝交出那些信件。他告诉罗斯：“拥有这些信件和它们留给我的回忆，即便不能给我希望，也会避免我结束如今已经丧失目标的生命。如果奥斯卡要我自杀，我会遵从嘱咐的，他可以在我死后拿回那些信件。” ⑪对于未来，道格拉斯决定把王尔德在监狱里说的任何话都视为“不存在”。 ⑫与此同时，作为记录他的“永恒之爱”，他在《白色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杂乱无章、内容轻率的文章，为他与王尔德的关系进行辩护。他估摸，王尔德之所以在监狱里遭受“折磨”只因为他是“同性恋”，然而有四分之一的男性持有同样的品味。这篇文章——在法国作家中引发了相当多批评——进一步加剧了王尔德对这个旧爱的敌意。 ⑬罗斯、阿迪和雷吉·特纳都极力为道格拉斯辩护，但王尔德内心“深深的痛苦”并没有得到缓解。 ⑭

11月初，王尔德收到哈格罗夫“一封粗暴和侮辱的信”，信中称康斯坦斯被王尔德的朋友们不断试图购买婚姻协议中的终身权益所激怒，现在想要得到孩子们的完全监护权。她还威胁要停止提供任何之前提到过的津贴。 ⑮这个消息对他犹如晴天霹雳。在他的印象中，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康斯坦斯可以获得终身权益，令他震惊的是，事实并非如此，阿迪和罗斯无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明确指示，继续从官方的破产接管人手里购买这份终身权益。 ⑯他们的想法是，一旦康斯

坦斯先他而去，这笔终身权益可以保护王尔德，使他不必依赖于康斯坦斯不太友好的“顾问”及其家人的善意，但这个计划被误导了。它打破了王尔德和妻子之间日益增长的默契：她无法相信王尔德没有参与这个计划，因此也写了一封“粗暴”而尖刻的信。然而，这么做完全是徒劳。❶

两人一旦离婚，现有的婚姻财产协议以及随附的终身权益将完全失效。面对阿迪的坚决态度，康斯坦斯和她的律师决定打官司。这将使王尔德陷入新的险境。他会面临一场新的审判。虽然法律允许丈夫单独因为通奸而与妻子离婚，但妻子只有在丈夫同时犯有乱伦、重婚罪、兽奸罪、强奸罪、虐待罪、遗弃罪（两年）或鸡奸罪时才可以与丈夫离婚。康斯坦斯的律师——王尔德惊讶地得知——似乎从道格拉斯年轻的牛津仆人沃尔特·格兰杰那里得到了一份声明，承认在各种亲密关系中，王尔德曾经鸡奸过他。如果在离婚法庭上提及此事，王尔德可能——极有可能——再次被捕，并在刑事法庭上再次受到指控。鸡奸罪的刑期可能比仅仅因为“严重猥亵”行为而被判处的两年刑期要长得多。这是一种全新的恐怖，需要好好斟酌。❷

王尔德一旦意识到自己处境岌岌可危，便努力绝境逃生。他放弃了无能的汉弗莱斯先生，聘请了一位新律师，即阿瑟·D·汉塞尔，试图在不离婚的情况下解决这场灾难。作为第一步（怀着巨大的悲伤），他同意将孩子们的监护权交给康斯坦斯和她的亲戚阿德里安·霍普。❸

王尔德正试图将生活的碎片重新拼凑起来。1897年的头三个月里，他每天都在写一封给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长信。他用大约

5万个单词向他的旧情人——也向他自己——解释到底是什么将他置于目前的处境，并从中吸取一些精神上的教训。④④他毫无保留地详细记录了他与波西的过往关系，涉及了所有最糟糕的阶段：“不计后果”的奢侈；粗豪放荡；“讨厌”而琐碎的争吵。所有一切都被记到了道格拉斯的账上。王尔德断言，他们恋情的基调是由他“浅薄”的性格决定的；这是一种被虚荣和“粗俗”的性迷恋所支配的性格。这些东西本不该使他成为像王尔德那样有声望、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的伴侣，“一个艺术家，也就是说，其作品的质量取决于个性强度……思想的默契……安静、平和与孤独”。当然，王尔德对朋友的放纵导致了他的艺术遭到了“完全毁灭”。他设法创造的一切都是不顾他们的友谊得来的，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友谊。

信中几乎丝毫看不出王尔德对波西的爱有多深。尽管王尔德承认道格拉斯，在某种程度上爱过他，但他认为，这种爱，已经被道格拉斯对其父亲的仇恨“完全超越了”。道格拉斯坚持要把王尔德卷入他自己充满仇恨的家庭冲突中，导致他被关进了狭窄逼仄的C.3.3牢房。王尔德宣称：“我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我曾经想把你父亲送进监狱。”王尔德坚持认为（带着一些真相），要不是因为那桩倒霉的诽谤案，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都不会对他的性过失产生任何兴趣。

尽管如此，王尔德还是以惊人的宽宏大量“原谅”了道格拉斯。他承认，他的堕落责任在己，哪怕这是因他——出于和蔼可亲的天性——屈从于道格拉斯的下流欲望和卑鄙计划而造成的。“这是小的胜

过大的，”他宣称，“弱者的暴政压过了强者”。王尔德为此自责不已。不过，他刚进监狱时所感到的那种彻底的绝望现在已经过去了，他解释说，他已经开始认识到困境的积极方面。他夸耀自己新近发现了一种叫“谦卑”的东西。“否认自己的经历，”他说，“就是遏制自己的发展。”监狱生活唤醒了，他进入了一个充满怜悯和悲怆的“新世界”，他想去探索它。“我现在明白了，悲怆，这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情感，既是一切伟大艺术的典型，也是一切伟大艺术的考验。艺术家一直在寻找的，就是这种灵肉合一而不可分的存在方式：外在为内在的表达。”虽然这种存在的方式为数不少——“青春和专注于青春的艺术”“现代的风景画艺术”“音乐”“一朵花或一个孩子”——“悲怆是生活与艺术的终极类型”。虽然快乐可能产生“美丽的躯体”，但“痛苦”才能造就“美丽的灵魂”。王尔德怀着这样的认识，与基督结盟了。

王尔德对监狱生活的新看法——加上他每天阅读希腊福音书——把他拉回到对耶稣的沉思。他对正规宗教仍然不感兴趣。每天例行礼拜时，他“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手肘搁在椅背上，跷着二郎腿”，带着一种夸张的厌倦神情“梦幻般地”审视着自己。⑩尽管如此，他认为M.T.弗兰德牧师是个十足的“好人”。⑪不幸的是有一次，王尔德抱怨牢房窗户看不到天空，牧师虔诚地说：“让你的思想（不要）再惦记那些云彩，还是想想云彩之上的主吧。”王尔德听了勃然大怒，把他推向门口，大声喊道：“滚出去，你这个该死的傻瓜。”⑫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相处得还不错。王尔德性格中的“精神方面”令弗兰德印象深刻，他回忆，在两人定期见面时，王尔德说着说

着便会双眼发亮，“他挺直身体，振作起来，看起来像是……几乎在努力将自己的身体投射回他过去的精神生活”。^②

王尔德似乎在与弗兰德的讨论中阐述了他有关耶稣的观点，他认为耶稣是“至高无上的艺术家”。他承认，自己“当然”不相信“普遍意义上为人所接受的基督的神性”，但他“完全相信（耶稣）远在他周围的人之上，就像一个坐在云端上的天使”。在王尔德的个人信条中，基督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塑造的：“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者”，“一个文字艺术家”；“他通过声音找到了表达方式——这就是声音的作用，但很少有人会通过这种媒介表达，更没有人能以基督的方式来表达。”他讲述动听的故事，是一个悖论大师，一个能与莎士比亚相媲美的、富于想象力和同情心的天才，一个把自己的生活写成最美妙诗歌的诗人。^③

一开始，王尔德不太愿意改变他“独特的信条”——坚持“一旦我发现其他人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就会逃离它”。不过，他已经想到，也许在他获释以后，可以写写这个话题。^④给道格拉斯写信这件事情给了他一个更直接的机会，他中断了历数道格拉斯的种种弱点，用了几页的篇幅，极富想象力地赞颂基督通过“个性与完美的结合”，成为“生活中浪漫运动的先驱”。

这封信是一种情绪的宣泄，给王尔德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用以表达对道格拉斯的不满，以及对自己的失望。这封信为他提供了一条途径，去理解自己遭到监禁的缘由，并找到一条摆脱它的出路。此举也让他再次感受到文学创作的乐趣。信中流畅的语言和思想可以证

实，他虽然在木板床上待了两年，但他的精神和心智都没有受到损害。其行文的修辞效果，明显挥洒的“声音和音节”，似乎压倒了他渴望的真诚情感，但王尔德向来是戴着面具表达真理的。

这封信（写给“亲爱的波西”，署名“你的挚友奥斯卡·王尔德”）开头充满了苦涩，但它既期待着在王尔德获释之后得到回复，也假定了某种和解。“在月底，当6月的玫瑰如痴如狂绽放时，要是我觉得可以，会通过罗比的安排，在国外找个宁静的小城同你见面，比如像布鲁日这样的地方，那里青灰色的房子和碧绿的运河，以及凉爽寂静的小街，都令我心动，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如果说这封信的基调在写作过程中发生了变化，那么王尔德的创作愿景也是如此。他把这封信看作一篇文学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根据他自己的想法，这篇文章该被称为“监狱书简”(Epistola: in Carcere e Vinculis)，但后人称其为“自深深处”(De Profundis)。] ②

他没有将手稿直接寄给道格拉斯，而是打算寄给他的“遗稿保管人”罗斯，以便制作两份副本，一份给罗斯，一份给他自己，以便最终出版——“不一定在我的有生之年，也不一定在道格拉斯的有生之年”。他还希望能够多抄上一些涉及他灵魂轨迹的相关段落，将它们寄给“温布尔登夫人”（阿德拉·舒斯特）和弗兰基·福布斯-罗伯逊等特殊的朋友。但这些计划被迫搁置了，4月初，监狱管理委员会成员们拒绝了纳尔逊少校的请求，不允许发出这封信。根据规定，这封信会在下个月王尔德获释时交还给他。 ③

王尔德结尾的这句话似乎不再遥不可及。从这一年开始，监狱方面就不再给他剪头发，为释放他做准备；令他高兴的是，他感觉到头发又长回到耳朵上方的位置。❶（他坚持说自己的头发——有点灰白——现在已经“彻底白了”，让狱卒觉得很逗趣。）❷此时，让他的心情感到更为轻松的是，新来了一个极富同情心的狱卒，名叫托马斯·马丁。马丁出生于贝尔法斯特，非常崇拜王尔德，冒着极大的风险大大地改善了他的处境，为他偷偷带来报纸和额外的食物。王尔德尝到了“苏格兰司康饼、肉馅饼和香肠卷”——这些他只是两年前在国王路见过的不可思议的美味。❸“我亲爱的朋友，”王尔德偷偷写了一张便条给他，“我写这个短笺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一年前你就在雷丁监狱工作的话，我的生活可能会愉快很多。每个人都告诉我，说我看起来好多了——也更快乐了。那是因为我有了一个好朋友，他会给我送来《每日纪事报》，还答应带给我姜汁饼干。”狱卒马丁在上面回复了一句：“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我做的事情比许诺的还多。”

王尔德的心思越来越多地转向获释后他可以做什么。这种前景使他既兴奋又忧虑。他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开一个监狱，进入另一个监狱，“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访客，回到那个不需要我的世界……死人从坟墓中复活固然可怕，但从坟墓中走出来的活人更可怕”。❹英格兰和社交界都没有他的位置。他打算用一个假名悄悄出国。他披上“马图林叔叔”的小说中，那个被诅咒的流浪英雄的外衣，决定自称“梅尔莫斯先生”。❺接着他又在这个名字之前，加上了教名“塞巴斯蒂安”，多年前他在热那亚时，曾因圭多·雷尼而崇拜过这位美丽的殉道者。他打算在布鲁塞尔租一间小公寓。❻或者他可能会去偏远

的布列塔尼海岸，在那里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摆脱英国人的自由”的双重好处。①他开玩笑地向阿迪保证，自己无意接受里基茨的“好意邀请”，和他一起前往特拉比斯特派修道院。②

他认为，如果能有“至少18个月的自由生活来恢复自己”，他或许还能重新工作。③他知道，牢狱之灾并没有完全抹杀他在艺术上的名声，这使他很受鼓舞。在英国，和法国一样，人们仍在阅读他的书，演出他的戏剧。④他愿意相信，其境遇的改善应始自巴黎上演《莎乐美》，它使得“政府”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久负盛名、享誉国际的艺术家。⑤这是之后一切的基础。弗兰克·哈里斯向他保证，他可以在《星期六评论》上开辟一个固定的栏目刊登他的散文。⑥他想尝试一些项目。他也许不得不放弃喜剧了。“我已经庄重地发过誓，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悲剧，”他告诉狱吏马丁，“如果我写出更多的书，它们将汇聚成一个悲哀的文库。”⑦他希望回到“基督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这个主题，并以魏尔伦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王子为榜样，探讨“与行为相关的艺术生活”。⑧他从《莎乐美》的圣经象征主义方式中看到了创作更多“美丽而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的可能性。⑨尽管他认为监狱“太可怕、太丑陋，不可能成为一件艺术作品”，但他还是想把它写下来，“试图为了他人而改变它”。⑩

但首先，他必须恢复，为此他需要争取时间。虽然他还不确定妻子会给他多少零花钱，但罗斯和阿迪向他保证，他们已经从他的朋友们和支持者手里筹集了足够的钱，让他有“十八个月或两年的喘息时

间”。❶ 具体的细节还不清楚，但王尔德知道这笔钱数目“并不小”，他希望能够偿还朋友和亲戚的一些“信用债务”。❷ 还有1000英镑，那是阿德拉·舒斯特在他受审期间给他的，一直由欧内斯特·勒莱弗森保管。即使有一些支出，如他母亲的租金，她的葬礼费用，莉莉·王尔德分娩的费用，王尔德料想剩余的钱应该还相当多。❸ 除此之外，珀西·道格拉斯还许诺给王尔德500或600英镑——这笔钱原本打算用来支付王尔德的诉讼费，据说在王尔德破产时被“搁置”起来，要等他获释之后再给他。❹

4月7日，王尔德又一次接到了弗兰克·哈里斯的“特别来访”，他的财务预期变得更加明朗。哈里斯在南非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投机活动（他声称自己赚了2.3万英镑），坚持要用一张500英镑的支票让王尔德从所有的“金钱焦虑”中解脱出来。他还提出，王尔德一旦获释就带他去比利牛斯山开车度假一个月。王尔德激动地接受了这两个提议。❺

当他思考自己在“外面”生活的各种实际情形时，朋友们的关怀深深地打动了。他让罗斯为他收集一些书籍：向他的文学同僚们索取礼物，他们自己的近期作品或者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你知道我都想要什么样的书：福楼拜、斯蒂文森、波德莱尔、梅特林克、大仲马、济慈、马洛、查特顿、柯勒律治、法朗士、戈蒂耶和但丁的全部文学著作，还有歌德的全部文学作品，诸如此类。”❻ 他高兴地得知有几样东西——照片、手稿和小饰品——都是朋友们在泰特街拍卖时抢救出来的，准备还给他。❼ 他还想到了一个新的衣柜。罗比曾经替

他从多雷买过一套藏青哗叽服装，但这还不够。王尔德喜欢事无巨细地说明手帕花边、领带设计和衣领形状的细节。他要了“两三套”珍珠母饰钮，宣称“我想把‘nacred’（珍珠母饰钮）作英文单词用”。^①

阿迪收到了一长串需要购买的化妆品清单：“一些不错的法国香皂”（“波·德帕涅”牌或者“茛苕”牌都可以）；“坎特伯雷·伍德紫罗兰”香水和洗手间用的“鲁宾液”（要一大瓶）；普里查德商店卖的牙粉；还有一种为他的灰白头发准备的滋补剂，叫“科克·马里科帕斯的好东西，在摄政王大街233号可以买到……光是那个名字似乎就值这个钱”。王尔德解释说，这些东西“尽管听起来琐碎”，但“对我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出于心理上的原因”，他需要“完全洗净狱中生活的污垢和尘土”。^②他很高兴地得知，雷吉·特纳送给他一个漂亮的“手包”，里面装着他的东西（袋子上有他的新名字首字母缩写“S.M.”）。^③在所有这些准备工作中，唯一令人烦恼的是他那件精美的毛皮大衣不见了，他将那件衣服留在奥克利街，被贫穷的威利夫妇当掉了。^④除此之外，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而在他获释的前一周，事情开始起了变化。在5月11日星期二与罗斯和阿迪会面之前，王尔德就一直追问自己财务状况的确切细节：他们最终承认，并不存在什么一大笔基金。1895年，阿迪从他的支持者那里筹集到150英镑，接着便将这笔钱用在确保终身权益上，现在只剩下50英镑了。王尔德惊呆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阿迪和罗斯到雷丁探监时，转达了弗兰克·哈里斯的口信，说他“非常抱歉”，目前无法拿出任何资金。珀西·道格拉斯也帮不上忙。^⑤

除了这些打击，最糟糕的是，王尔德得知阿德拉·舒斯特给他的钱已经只剩下不到100英镑。300多英镑用来支付给他以前的律师汉弗莱斯。但真正让王尔德震惊的是，他“发现”欧内斯特·莱弗森早在1895年就从基金中取出250英镑，用来支付他的还未偿债务。当然，这曾经是王尔德坚持要他做的事情。但他自己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眼下，在脆弱和焦虑的状态下，他认为这是一种背叛。他坚持认为莱弗森的做法是一种“令人发指的”金融欺骗，类似于“欺诈”。^①

王尔德突然意识到自己出狱后可能一文不名，甚至连逃到欧洲大陆的钱都不够。一想到这里，他觉得很可怕。于是他简明扼要地给莱弗森写了一封信，要求提供一份完整的账目，并立即移交所有款项，^②他给罗斯和阿迪接连发了几封毫无节制的信，指责他们在一切商业事务上的严重无能和愚蠢。可怜的阿迪被斥为“一头严肃的驴子”，“花一个下午都处理不了树篱里一只山雀的家务事”。^③不管犯了什么“错误”，做了这么多无私的工作后，得到的却是一份如此差劲的回报。雷吉·特纳觉得有必要写信告诉王尔德，他这么做对两个“亲爱的、忠诚的朋友”是不公平的；至于罗斯，“我担心，亲爱的奥斯卡，你已接近令他心碎的地步了”。不过，雷吉很有信心，“做得不妥当的事情将会在一两天内得到纠正”。^④

在所有这些令人沮丧的事态发展中，有一件事让人大大松了一口气：困扰他的婚姻问题终于解决了。^⑤汉塞尔告诉他，如果双方同意自愿“分居”，就可以避免离婚以及随之而来的法庭诉讼丑闻。这种安排虽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其额外的好处是，它可以撤销。双方存

在未来和解的可能性。不管康斯坦斯提出什么条件，王尔德都欣然默许了这个计划。哈格罗夫和汉塞尔在征得阿迪的律师霍尔曼先生同意之后，正式起草了一份“分居协议”。根据协议条款，阿迪和罗斯必须将“终身权益”转让给康斯坦斯（那是他们花费75英镑购买得到的）；作为回报，王尔德将从妻子那里得到每年150英镑的津贴。双方都保证，如果她先他而去，将继续维持这样的安排。然而，按季度支付的津贴取决于王尔德是否能保持良好的行为：他不可以没有得到康斯坦斯允许的情况下，接近她或孩子们，不能“犯任何道德不端的罪，也不能臭名昭著地与邪恶或声名狼藉的同伴交往”。

面对这样的条件，王尔德有些畏缩。他说，既然“那些奇怪的所谓好人不会认识我，而我也不能允许自己去认识恶人，因而现在我就预见到，将来我会极为孤独地了却余生”。^①至于什么样的行为构成“违反协议”，则将由汉塞尔先生自行判断决定——阿迪认为这是一种极为不可取的安排，但，它获得允许保留了下来。5月17日律师带着“分居协议”到雷丁监狱让王尔德签字，他解释说其中的“道德不端”当然包括王尔德与“声名狼藉”的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恢复关系。王尔德认为这不是个问题。^②

王尔德并不知道，康斯坦斯陪同汉塞尔一起到了雷丁监狱。当他“坐在桌旁，双手抱着头”和律师一起仔细研究协议的条款细节时，她就在“咨询室”外面。她询问门口的看守，能否“看一眼”她的丈夫。狱卒默默地走到一边，这样她就能久久地——而且不被发现地——看一看这悲伤的场面。然后，“显然是在深深的情感下苦苦挣

扎了一番之后”，她抽身回来不再看了。这名狱卒觉得，这可能是王尔德监狱生活中“最悲惨的”事件。④康斯坦斯考虑得很周到，她要确保王尔德的第一笔季度津贴——37英镑10先令——会在他出狱时到他手里。⑤在所有其他经济希望都破灭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真正的安慰，尽管他确实有些惊讶地说，现在将不得不“用我过去一周花的钱生活一年”。⑥

事情并没有糟糕到如此地步。第二天，他从欧内斯特·莱弗森那里得到消息，莱弗森——在维护自己收回250英镑借款权利的同时——很愿意再借给他一笔相同数目的“新贷款”，但不是一次全部付清。作为第一笔“分期付款”，他给了阿迪80英镑现钞，以及一张111英镑11先令6便士的支票（这是阿德拉·舒斯特基金的剩余金额）。⑦舒斯特小姐也再一次给阿迪寄了一张25英镑的支票，急切地希望王尔德“出狱时，口袋里能实实在在”有点东西。⑧

即便预期到手的钱如此微薄，王尔德还是立刻想到了别人。就在签署分居协议的当天下午，他看到三个很小的孩子因为偷兔子而被关进了监狱，令他非常难过。第二天，王尔德设法给狱卒马丁递了一张纸条，托他打听孩子们的案情细节。他想替他们交罚款，“把他们弄出去”。“亲爱的朋友，请帮我这个忙。我必须帮他们出去。想想看，能帮助三个小孩子对我来说是件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它带给我的快乐无以言表。如果我可以通过交罚款帮他们出去，请告诉这些孩子们，明天一个朋友会放他们出去，让他们幸福地生活，并且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王尔德确实让他们及时被释放。）⑨

随着王尔德在狱中的日子接近尾声，他的朋友们越发担心新闻界或公众会对此给予不必要的关注。尽管他们数次请求缩短刑期，哪怕只缩短几天，这样王尔德就可以悄悄出国，但当局坚决要求他必须服满两年刑期。不过，他们也承认，如果5月19日他能够在不引起公众注意的情况下获释，那将是一件好事。众所周知，雷丁监狱挤满了记者。纳尔逊少校已经收到了至少一封来自一位美国记者的信，信中表示，“愿意出任何价钱”换取在王尔德获释当天早餐时采访他的机会。^⑩因此，几乎就在最后一刻（5月17日），王尔德被告知，第二天他将从雷丁被带到本顿维尔，并在后一天早上被释放。这次他不会再经历先前转移时遭受的屈辱，将在“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条件下，着装整齐，不戴手铐”上路。^⑪他本来想避开伦敦，然而这样一来，却只能被送到市中心。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阿迪或特纳能将他秘密带往法国。在弗兰克·哈里斯许诺的500英镑落空之后，他再也不愿意提起和哈里斯一起旅行的念头，甚至不想看见他。

就在得知自己重获自由的具体安排那天，他见到了来访的詹姆斯·阿德利牧师。詹姆斯·阿德利是一位高级教会牧师，也是一位舞台剧爱好者。他是王尔德的熟人，也是斯图尔特·黑德勒姆的亲密伙伴，他可能一直在做安排，让王尔德获释后立即暂住到黑德勒姆在伦敦的家中。王尔德在动身前往欧洲大陆之前需要一个洗漱、换衣服和吃早餐的地方。阿德利回忆，当他承认自己以前从未见过囚犯时——尽管耶稣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训诫——王尔德说：“那么，尽管我很坏，我还是做了一件好事。我让你服从了你的主。”阿德利被逗乐了。王尔德

说，他在狱中学会了“一种叫作‘谦卑’的奇妙东西”，随后便将自己的散文描述为“英语中最好的散文——除了佩特的”。^⑨

5月18日晚，王尔德避开等候在监狱门口的记者们，在副典狱长和狱吏哈里森的陪同下，乘坐一辆封闭的马车离开了雷丁监狱。^⑩尽管最后的几天压力重重，纳尔逊少校回忆说，但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出去”，甚至“对自己收到的可怕惩罚心怀感激”。^⑪他随身带着给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长信。王尔德在纳尔逊的照顾下度过了10个月，他的身体状况和脑力似乎都有所改善，健壮的体态有所恢复。一位朋友甚至称他，明显“容光焕发，身体健康”。^⑫

王尔德和同行者一起前往特怀福德车站，一辆特快列车将特地在那里停下来接上他们。在站台上候车时，他看到了一棵正在发芽的树，差点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他向那棵树张开双臂惊叹道：“哦，美丽的世界！哦，美丽的世界。”“哎，王尔德先生，”哈里森狱卒连忙插话，“你可不能这样暴露自己。你是全英格兰唯一一个会在火车站这么说话的人。”^⑬在去伦敦的旅途中，王尔德虽然还没有得到官方允许可以读报纸，但获准眯着眼睛看一份颠倒的《晨报》。（“我从来没这么享受过，”他说，“这真的是阅读报纸的唯一方式。”）^⑭他们避开终点站帕丁顿，在韦斯特伯恩公园站下车，乘出租马车去了本顿维尔——王尔德曾经在这里度过了最初几周不愉快的监禁生活。

第十部分 渔人和他的灵魂

1897～1898年

42～44岁



奥斯卡·王尔德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那不勒斯，1897年

1 避难所

“我觉得（奥斯卡）的命运和矮胖子极其相似，十分可悲，而且无法纠正。”

——康斯坦斯·王尔德写给奥索·劳埃德的信

新闻界已被成功地拖住了。第二天早上六点一刻，王尔德获释，他在春寒料峭中步入明媚的阳光里。莫尔·阿迪和斯图尔特·黑德勒姆赶来迎接他，他们特别获准可以驾驶垂着窗帘的四轮马车进入监狱的院子。两人将王尔德带回黑德勒姆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家中。走在尤斯顿路上时，他们看见一张报纸上赫然印着“释放奥斯卡·王尔德”的字样。王尔德来到上贝德福德广场，在装饰着雅致的拉斐尔前派画作和莫里斯壁纸的房间里，洗了澡，换了新衣服。在监狱里待了两年之后，他品尝到第一杯咖啡。①

艾达和欧内斯特·莱弗森，以及包括阿瑟·克利夫顿夫妇在内其他几个朋友也来了。艾达回忆，王尔德瞬间打消了当时的尴尬气氛。“他高贵的姿态就像是一位刚刚流放归来的国王。他走进来，说说笑笑，叼着一支雪茄，一头的卷发，扣眼上插着一枝鲜花。”她觉得，他看上去不仅比入狱前“好得多，瘦得多，年轻得多”，而且还“变了，更精神了”。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斯芬克斯，你真是妙不可言，居然知道早晨七点跟一位坐过牢的朋友见面时该戴什么帽子！你不可能是从床上爬起来的，你肯定坐了一夜，通宵未眠。”②每个人都放心了。王尔德对莫尔·阿迪的恼怒以及之前撒在欧内斯特·莱弗森身

上的怒气已经被抛到了脑后。他渴望谈论书籍和思想。他谈论但丁，坚持要为黑德勒姆列出有关这位诗人的最佳权威读物。 ⑩

大家讨论了一些迫在眉睫的安排。虽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他可以去迪耶普，罗斯和特纳都在那里等着他，但他似乎受到了质疑（他在迪耶普太出名；他的钱太少了）。根据艾达·莱弗森的说法，他的想法继而转向了是否有可能参加宗教静修——如果不是真正进入特拉普斯特派修道院。他不停地谈论宗教，告诉黑德勒姆说，他把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宗教都看作“一所宏伟的大学里的各个学院”，而罗马天主教是其中“最伟大，也是最浪漫的”。也许是受了这个想法的启发，他突然停下来，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委托信使送到农场街或布朗普顿礼拜堂的牧师手中，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给他提供一个避难所。 ⑪

等待答复的同时，王尔德继续兴高采烈地说着，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他的奇想之一是雷丁的“那个亲爱的总监”——“一个如此讨人喜欢的人，他的妻子也很迷人”——注意到他在花园里干活，就以为他是园丁，于是邀请他一起过夏天。“不同寻常吗，我的感受？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他说，“我想要换换环境。”信使回来了，打断了他滔滔不绝的幽默谈话。王尔德读着他捎来的信，脸上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他开始痛哭，悲伤地啜泣着。牧师们的答复是，他们不能因为他的一时冲动而接受他参与静修的要求；对于此事，至少需要考虑一年。这是他在新生活中遭遇的第一次拒绝。 ⑫

他们打算让阿迪和王尔德去纽黑文，搭早船去法国迪耶普。但王尔德突然对天主教静修大感兴趣，以及再次见到这么多老朋友，他的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导致错过了火车。他们不得不修改安排，王尔德和阿迪只好改乘夜船渡海。❶王尔德提前发电报给罗斯，请他“一定不要介意所有愚蠢的、不友好的信件”。❷

第二天早上四点半轮船靠岸时，罗斯和特纳已经在码头上了。王尔德一见到他们立刻容光焕发。“他的脸，”罗斯回忆，“已经不再那么粗糙，他看上去肯定就像他早年在牛津时的样子。”在一如既往“恼人的拖拖拉拉”之后，王尔德大步走下了船，他那“奇怪的大象一样的步态”以及伟岸的身高，令他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手里拿着一个密封的大信封，里面装着他写给道格拉斯的长信。“亲爱的博比，这就是你知道的那份重要的手稿，”他继续道，“莫尔对我的行李很不客气，他急于从我手里抢走雷吉送给我的这个宝贵的手包。”说到这里，他发出一阵“拉伯雷式”粗俗幽默的大笑。这句话为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更多兴高采烈的戏谑定下了基调。接着，罗斯和特纳领着他完成海关手续，回到哈利街上不起眼的桑威奇酒店，他们在那里准备了三明治，以及一瓶红葡萄酒和一瓶白葡萄酒。也许正是这种适度而精心的安排中弥漫着一种感伤，导致王尔德极度愉快的心情开始褪去：他掩面流泪“哭了起来”。❸

然而，眼泪是短暂的。王尔德的灵魂随着每一个新的自由时刻而不断挥洒展现出来。他享受着美丽的春天、海风、诺曼底果园里的苹果花，以及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同伴们的关心让他深受感动。他发现旅馆的小房间里摆满鲜花。壁炉架上排列着罗斯和特纳搜集来的所有书籍；靠近中心位置“吸引他眼球”的是马克斯·比尔博姆的两卷作

品：他的散文集和《快乐的伪君子》。⑩还有“伯尼” 比尔和其他朋友的来信。他还发现了弗兰克·哈里斯寄来的两套西装，以及一张50英镑的支票。虽然不是之前承诺的500英镑，但这仍然是一个慷慨的姿态，王尔德立即写信向他表示感谢。他急切地要在“获得真正自由的第二天”写信给艾达·莱弗森，感谢她的美好与善良，因为她是“第一个迎接他的人”。接下来的几天里，王尔德又写了好几封信，迫不及待地感谢朋友们的善意和支持。⑪

阿迪立刻回到了伦敦，罗斯和特纳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大家已经竭尽全力：他们都面临着家人的反对，如果被人知道他们和王尔德交往，还有可能失去津贴。然而，三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组成了一个快乐的三人组。他们围绕着雷吉的礼物——绣有字母的手包，以及罗斯始终如一的善意（王尔德坚持要以他母亲在肯辛顿的新住址命名，封他为“菲利莫尔的圣罗伯特”），开了无数的玩笑。王尔德恢复了对罗斯全部的热爱与钦佩之情：“在如今这个美丽的世界上，我再也没有其他的朋友，”他说，“我不需要其他的。”⑫回到谈话的世界里，真是令人陶醉。罗斯回忆道，在刚刚获得自由的那些日子里，雷丁是王尔德永恒的主题。在他更富于幻想的心境中，监狱变成了“某种被施了魔法的城堡，纳尔逊少校是主宰这个城堡的仙女。那些丑陋的、修筑了堞口的炮塔已经变成了尖塔，甚至连狱吏也变成了仁慈的马穆鲁克”。⑬

然而，监狱的现实并没有被遗忘。王尔德从《每日纪事报》的一篇文章中得知，狱吏马丁因为给了一个被带进监狱的小孩几块饼干而

被开除了，于是他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长信给报纸，为马丁的行为辩护，论述把孩子和“低能者”都关起来，无视他们的需求是一种不公正待遇。王尔德写道：

现在的人们并不懂得残暴意味着什么，它整个是缺乏想象力。它是我们这个时代里一成不变的僵化规则体系，以及愚蠢共同造成的结果。在现代生活中，反人道的就是官僚作风。权威无论对于加害者，还是被加害者，都具有破坏作用。监狱委员会及它所执行的制度，正是残暴的主要来源.....支撑这个体系的人抱有良好的目的。执行它的人也是怀着人道的意图。责任被转化为纪律规章。之所以做这样的推测，是因为一件事情总有它的道理。

他敦促改变规则，去了解幼童和智障人士的具体需求和状况。 ⑩

罗斯和特纳曾经试图劝阻他不要就此事发表公开声明，担心他不该将公众的注意力招惹到自己身上。但王尔德坚持己见，令他大为高兴的是，这封信（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得到了广泛评论，并在议会引发了质疑。 ⑪ 它作为一篇有说服力、有人情味、事实充足、语言丰富的作品，也让公众注意到，他的文学力量仍然完好无损。王尔德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重返文坛的准备。他与路过迪耶普的奥雷里昂·吕涅波一起享受了一顿令人兴奋的午餐。“我被他深深地吸引了，”王尔德告诉阿迪，“我从未想到他是这么年轻，这么英俊。” ⑫ 这位演员兼导演促成了《莎乐美》的首演，非常渴望再制作一出王尔德创作的新剧，王尔德欣然接受了这个想法。他热切地盼望自己出狱后的“艺术回归再现”应该在巴黎，而不是在伦敦。他觉得自己对这座“伟大

的艺术之城”怀有“一种敬意和亏欠”，即便在他入狱的黑暗日子里，这座城市依然保留着他的声望。②

然而，工作需要平和与安静。迪耶普有许多让人分心的事物，并非合适之地。他在这个游客众多的小镇上过于显眼，无法逃脱人们的关注。除此之外，还有经济方面的问题。罗斯对王尔德的消费能力越来越警觉。他一贯慷慨大方，坚持要给他在雷丁的众多“朋友”以及狱吏马丁和格罗夫寄去1英镑到3英镑10先令不等的小钱。迪耶普的市场也是一个诱惑。王尔德对特纳开玩笑说，“罗比”找到他时，他正在“香料销售市场上花光所有的钱去买菖蒲根、水仙花露和红玫瑰花粉”，把它们装进那个传说中的手包，“他态度十分强硬，并带我离开了那里。我已经花光了两年来的全部收入”。③

一周后，王尔德沿着海岸行进了5英里，来到小镇贝尔讷瓦尔。那里没有认识他的英国游客，连法国游客也几乎没有。罗斯把他安顿在一家朴素而又舒适的海滩旅馆之后便离开了，他感到了一阵短暂的痛苦，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孤独的可怖处境”，但这种情绪很快就过去了。这个地方独具魅力，光是自由这一点就足够让人心旷神怡。④搬来几天之后，他写信给远在伦敦的罗斯：

明天我要去朝圣。我一直想做一个朝圣者，我已经决定明天一早出发去拜访喜悦圣母的神殿。你知道Liesse是什么意思吗？它的意思是“喜悦”，是个古老的词……我只是刚刚听说这座神殿，或者说教堂，那是今天晚上“偶尔得来”，就如你常说的，是这个旅店里一个甜美可亲的女人告诉我的。她真是可爱至极，她想让我永远住在贝尔

讷瓦尔！她说，喜悦圣母的神殿很奇妙，能帮助每一个人了解快乐的真谛。我不知道去这个教堂需要多少时间，因为我得步行过去。但是，她告诉我说，至少需要六七分钟才能到那里，而从那里回来也需要相同的时间。事实上，喜悦圣母的神殿离这个旅店只有50码！这是否有点离奇？我打算喝一杯咖啡就出发，然后再游泳。还需要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奇迹吗？我想去朝圣，结果发现这个“喜悦圣母”灰色石砌小教堂已经近在眼前。

信中字里行间明显透露出他昔日的那种愉悦、欢乐和创造力。弗兰克·哈里斯从罗斯手里看到这封信时，他认为这是王尔德写过的“最有特色的东西”：“比《不可儿戏》还要有特色。”如果王尔德想念罗斯和特纳，他会继续和他们——以及其他的英国老朋友——“聊天”——不停地发送几乎同样不乏特色的信件。他的身边并不缺少真正的伙伴。贝尔讷瓦尔有朴素而迷人的居民，他将大仲马的小说借给了当地的海关官员，与本地天主教牧师讨论宗教和彩色玻璃。他还在迪耶普找到了朋友。当然，许多在国外度假的人对于他的出现感到尴尬，对他唯恐避之不及，但也不乏大胆之人。镇定自若的挪威画家弗里茨·索罗（Frits Thaulow，“一个具有柯洛气质的巨人”）和他迷人的妻子向王尔德敞开了大门，甚至在他们幸福的家中为他举办了一场招待会，还乐观地邀请了迪耶普的市长和商会会长。❶斯坦纳德夫人（王尔德曾经和雷丁监狱的狱吏谈论过这个“约翰·斯特兰奇·温特”）也同样慷慨大方；她和丈夫定期邀请王尔德去他们的公寓吃饭。❷大家为他提供的这些丝丝缕缕的善意，以及家庭生活小情趣，令他深受感动。来到这里之后，他特别看重女性的陪伴，这既是为了

陪伴本身，也是为了此举给他带来的“体面”。他也很开心自己又回到了孩子们中间，会用一连串的即兴故事和笑话逗乐斯坦纳德家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❶

小镇周围还有更多不受世俗陈规束缚的人。欧内斯特·道森当时正在附近的阿尔克拉巴塔耶避暑，他和查尔斯·康德以及一位名叫达尔豪西·扬的年轻作曲家一起来到贝尔讷瓦尔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拜访。尽管扬和王尔德从前并不认识，但他不仅出版了一本辩论小册子为王尔德辩解，而且还向阿迪为王尔德设立的基金捐助了50英镑。❷大家一直聊到凌晨3点，继这个迷人的夜晚之后，其他人也陆续光顾。当王尔德获悉，“达尔”扬和他极富同情心的妻子提出要为他在贝尔讷瓦尔建造一座小别墅时，尽管他无法接受如此慷慨的盛情，但心里无比感动。❸他很高兴再次见到康德，品味着他那微妙含糊的艺术与他微妙含糊的个性是如何相得益彰的。他觉得康德缺乏商业头脑这一点也很有趣：“亲爱的康德，”他说，“他以优雅的精明态度劝人花100法郎买一把他（彩绘的）扇子，而那人本来已经准备出300法郎。”❹

他与酷爱喝酒、患有结核病的道森建立了最紧密的联系。王尔德钦佩道森的工作，在他的陪伴下深受鼓舞。正如他所说，“有一个诗人可以彼此谈心”是很有必要的。他喜欢道森“那风信子一样的深色头发”，以及他的绿色西装和蓝色领带。“你为什么永远那么奇妙？”在一次见面喝了苦艾酒之后，他问道，“你我在一起会带来灾祸，那会令人惊骇——毋宁说，很可能如此。”❺

还有一个去贝尔纳瓦尔“朝圣罪犯”的人是威廉·罗森斯坦。爱德华·斯特兰曼与他同行，让王尔德颇为开心的是，这个“可爱的家伙”已经准备将《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翻译成法语。安德烈·纪德是王尔德入狱前最后一个见到他的法国朋友，他特意从巴黎赶来，为的是在王尔德获释后第一个迎接他。他们聊着监狱生活和文学直至深夜。“俄国作家是非凡的，”王尔德称，“他们的书之所以如此伟大，是因为他们在书中投入了怜悯之情。你知道我以前是多么喜欢《包法利夫人》，但是福楼拜是不会在他的作品中倾注同情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有一种小气和拘谨的特点。”王尔德还邀请了刚从雷丁监狱获释的“狱友”阿瑟·克鲁特登前去做客。克鲁特登曾经当过兵，后来因为喝醉酒在团队的马厩里“睡着了”而被关进监狱。王尔德说：“这种事情，在牛津就是‘禁足’而已。”^⑨

尽管王尔德声称他既不梦想，也不想要“恢复社会地位”，但他新生活中朴素的线条清清楚楚地表明他到底失去了多少东西。那个由时髦的晚宴和贵族招待会，由首夜演出和非公开展览组成的，那个既让他享受其中，又任他点缀其间的盛大的社交世界，已经永远地离他而去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现实。作为出狱后个人形象的一部分，王尔德戴了两枚引人注目的戒指：他声称一个带来好运，另一个带来厄运，他坚持称自己目前正处于“邪恶戒指”的影响之下；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最幸福的人，现在却（理所当然地）成了最不幸的人。^⑩

然而，他的朋友们普遍认为他身体非常好，精神甚至更好。纪德觉得他就像19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个“甜蜜的王尔德”，而不是近几年那个傲慢的感官主义者。❶道森写信给亨利·达夫雷说，王尔德与“过去”的自我之间最显著的变化是“他（现在）从乡村和简单的事物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❷在写给罗森斯坦的信中，王尔德把“美丽世界的阳光和大海”列为他拥有的几大幸事之一。❸他很享受每天早上的游泳，在贝尔讷瓦尔海滨租了一间浴场小屋。❹他甚至开始引用华兹华斯的话。❺正如他谨慎地向一名记者承认的那样，“我想我又高兴起来了。我希望如此”。❻

他以自己特有的夸张方式进行忏悔。“我畅饮了蜜汁，又畅饮了苦水，”他说，“我发现甜中有苦，苦中有甜。”❶他声称，监狱教会了他“怜悯”和“感激”。他一直定期去村里的教堂做礼拜。“我竟坐在唱诗班里！”他对罗斯说，“我想罪人应该在耶稣的祭坛前有高位。”❷老牧师对他的转变满怀希望，王尔德尽管受到了吸引，但他说自己仍然不配。❸不过，他还是选择了将圣方济各作为自己新的人生榜样。❹这成了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无论他的堕落是多么可怕的悲剧，他心中“没有怨恨”任何人：“我接受一切，”他对朋友说，“我实际上并不以蹲过监狱为耻。我最引以为耻的，是自己过着一种完全不配当艺术家的生活……肉欲的享乐会破坏灵魂。而我所有的放荡、奢侈、时髦且无聊安逸的世俗生活，都不适合做一个艺术家。如果我身体健康，有好朋友，并能重新唤醒我的创作灵感，我或许还能在艺术上有更大的作为。”❺

但是，在新生活表面的平静与满足之下，紧张的气氛依然存在。王尔德一到法国就给康斯坦斯写信，希望能迅速和解。他在一封“非常漂亮”的信中，“满心忏悔”并带着一种“几乎深入灵魂的热情”，提议见个面。心地善良的康斯坦斯——在丈夫获释前几天还说她“不可能”再回到奥斯卡身边了——倾向于让步。然而，哥哥奥索提醒她谨慎行事。他认为王尔德信中表达的情绪“有点过头了，调门扯得太高反而难以持久”。^①当然，这件事还得搁置起来经受些考验。康斯坦斯继续敷衍着。她回复了奥斯卡的信，附上了孩子们的照片（在王尔德看来，他们“身着硬领的伊顿公学校服，是多么可爱的小家伙啊”），并承诺至少会在适当的时候和他见面。随后她又写了几封信（以每星期一封的频率），但没有提及马上来看他。王尔德很失望：“她说她会每年来看我两次，”他告诉罗斯，“但没有承诺让我见到（孩子们）。”这对他是一个打击。“我想要我的孩子们，”他悲叹道，“这真是一种残酷的惩罚，亲爱的罗比，并且哦！这是我罪有应得。”^②

与此同时，其他人则非常渴望见到他。就在王尔德收到康斯坦斯来信的同时，他也收到了道格拉斯（当时在巴黎）的一封信。他听说了王尔德对他心怀怨恨，但仍然表达了自己坚定不移的爱，并希望与他见一面。这封信让王尔德颇感不安。他尚未腾出时间把狱中写的那封长信抄送给道格拉斯，因此还有很多观点立场没有表达出来。王尔德写了一封措辞慎重的回信，他向道格拉斯保证自己并不“恨”他，但列举了对他过去行为的一些批评，并坚持任何会面都必须无限期推迟。这绝不是道格拉斯想听到的话。他对自己的忠诚把握十足，并对

王尔德信中“如果不是吹毛求疵的话，也有点自命不凡”的语气感到厌烦，他在回信中“有力地”指出，王尔德对他的态度是“不公平的，而且忘恩负义”，似乎只是“以某种方式反映了监禁造成的心理后果，当他重新充分利用自己的大脑和智力时，他可能很快就会走出这种状态”。王尔德收到这封信后，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向罗斯解释道：“波西那封令人作呕的信就在我的房间里，我愚蠢地又读了一遍，并把它放在了床边。”

接着，与之类似的“无耻”信件接踵而至，其中还有一首在王尔德看来十分“荒谬的”“爱情诗”。王尔德写信规劝他，但这些信未经拆阅就被退了回来。❶很明显，道格拉斯不甘心就这样被轻易地抛在一边。王尔德开始感到他“至为可怕”。实际上，就像他对阿迪承认的那样，“波西”“几乎毁掉”他。❷王尔德要想从康斯坦斯那里获得收入，就不能与“声名狼藉”的道格拉斯有任何公开接触。更有甚者，阿迪的律师发来消息称，昆斯伯里侯爵“已经做好安排，如果他的儿子和王尔德在一起，他会立刻得知，并打算射杀其中一人或两人”。如霍尔曼先生所言：“大多数人发出的这种威胁可能或多或少会被忽视，但毫无疑问，昆斯伯里勋爵，正如他以前所展示的那样，将尽其所能实施任何威胁。”❸

但是，王尔德对道格拉斯的恐惧也许掩盖了他对自己的恐惧。自私而冷漠的波西或许是一种“邪恶的影响”，然而他还是一个危险且有魅力的人。他那毫不掩饰的崇拜宣言有一种力量，王尔德很快就发现自己被这团火焰吸引住了。当道格拉斯在信中——“精细地为

他”——写到自己和王尔德的艺术计划时，他深受鼓舞。“在帕纳塞斯的双峰上见面”似乎更安全些。❶他“怀着极大的喜悦和兴趣”读了道格拉斯1896年出版的诗集，里面并没有给王尔德的献辞。❷他们很快就几乎每天都有联系，王尔德写道：“我亲爱的孩子……不要觉得我不爱你。我爱你胜过爱任何人……我无日不在想念你，我知道你是诗人，这让你加倍可爱且美妙。”❸

就连他们不能会面的承诺也很快动摇了。王尔德试图争取昆斯伯里夫人对和解想法的支持——尽管她拒绝卷入此事。❹尽管如此，6月中旬，他还是安排了让道格拉斯到贝尔讷瓦尔来，使用的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化名“琼奎尔·都瓦伦”❺。但是，就在道格拉斯到来前夕，王尔德收到了他的律师的一封信，信中警告他，这个计划已经被人知道了（可能是通过昆斯伯里的线人），一旦实施，将会对王尔德的收入，甚至他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后果。虽然道格拉斯很乐意（再一次）向他的父亲发起反抗，但王尔德更谨慎，更容易动摇。他禁止道格拉斯到来，至少目前如此。❻

道格拉斯对这一耽搁非常不满，毫无理由地指责罗斯，竟然会同意那些有关王尔德和他见面的法律限制。尽管王尔德在道格拉斯肆无忌惮的攻击下为罗斯辩护，但两位年轻朋友之间的裂痕给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紧张感。他将忠诚和爱意分裂的感觉编成一副优雅的对句：“我拥有两份爱：一个是安慰；另一个是绝望。一个是黑色的；另一个满头金发。”❼

2 艺术作品

我希望能找回意志力集中的状态，它为艺术创造条件并统治着它，以便再次创作出一些好的东西。

——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能够从工作中找到一些安慰。他有满脑子的计划，在雷丁监狱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努力维持自己的创作势头。写给《每日纪事报》的信获得成功后，他曾考虑从“心理学和内省”的角度，为该报写关于他“监狱生活”的三篇文章。他可以将写给道格拉斯的长信中提到的，“基督是浪漫主义运动先驱”这一“可爱的主题”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当然，王尔德觉得有必要用文学的形式来写一部分他的监狱经历。但是——也许回想起霍尔丹子爵和狱吏马丁在这方面的希望——他开始怀疑，他的这种做法到底是艺术，还是仅仅想挑起论战。这篇文章还没有动笔，他就转到一个新的方向。6月1日，他告诉罗斯：“就像你一样，岁月的诗篇已经飘散，（我）被迫写诗。我已经开始动笔写一些自以为会很好的东西。” ②

这是一首“叙事民谣”，以一种高度强化但几乎毫不虚构的形式，讲述了骑兵伍尔德里奇因谋杀妻子而被处决的故事。王尔德的写作手法，在诗的开头，很个人化。他用含蓄的自画像——每天与死刑犯一同在运动场上走步，渴望地看着“被囚犯们称之为天的那一小片蔚蓝”。这个人“杀死了他心爱的人/所以他难逃一死”。但是，正如叙述者所指出的那样，真正不同寻常的是惩罚，而不是犯罪。他自己

——以及所有其他囚犯——都和骑兵一样犯有同样的罪行：“人人都杀死心爱的人”，要么用刀剑，要么用亲吻。

有人干这事泪眼汪汪，

或连气也不叹一声：

因为人人都杀心爱的人，

但并不都为此丧生。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王尔德喜欢这种叙事歌谣的形式。他把它推荐给道格拉斯。它集戏剧性、浪漫色彩和通俗性于一身。王尔德夫人曾经用这种形式创作了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而且这种形式在英国文学中有丰富的传统：王尔德同时采用了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和托马斯·胡德的《尤金·阿拉姆的梦想》作为范例，而且它还在节奏和韵律上与A.E.豪斯曼最近出版的《什罗普郡的少年》相呼应，王尔德当时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这本书。豪斯曼在诗歌的第九部分甚至提到了一个人在施鲁斯伯里监狱被处决的事情。 注 注

事情进展得不错，事实上6月底，王尔德从日益拥挤嘈杂的海滩旅店搬到了附近的布尔雅别墅。然而，他着实为这种明显的个人化题材感到不安。他告诉劳伦斯·豪斯曼（A.E.豪斯曼的弟弟），这首诗“对我来说非常现实，取材于实实在在的经历，在很多方面否定了我自己的艺术哲学。我希望它是件好事，但我每天晚上都听到贝尔讷瓦尔的公鸡叫，我担心也许背叛了自己，会痛苦地哭泣，如果我还没

有哭尽所有眼泪的话”。^①然而，现实主义也许自有其长处。王尔德认为，这首诗的话题性将确保其畅销市场。他自称，一家美国报纸付了1000英镑，请他写一篇监狱经历。虽然他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追逐轰动效应的新闻界的建议，但他认为，对同一主题进行艺术处理之后，应该也不会削弱人们对它的兴趣。他设想把诗歌发表在《每日纪事报》和纽约的一家报纸上，稿费在100到300英镑之间都可以接受。

①

在创作“民谣”的同时，王尔德也一直在关注剧本创作的可能性。他心里盘算着好几个计划。虽然他对奥雷里昂·吕涅波无法为新剧本预付任何费用感到失望，但仍然渴望继《莎乐美》取得成功之后，在巴黎再次举行首演，哪怕是换一个制作人进行合作。关于接下来的圣经象征主义作品，他有两个想法，（显然）要用法语写：第一个是关于法老和摩西的故事，第二个是关于亚哈和耶洗别的故事的奇幻变体，他想象伯恩哈特可能会担任女主角。这两部作品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助他重返巴黎文坛。^②为了帮助他开展研究，王尔德请罗斯给他找一本阿道夫·埃尔曼的权威著作《古埃及生活》，这样他就可以知道“法老是如何对他的总管说，‘把黄瓜递过来’的”。^③此时有媒体报道称，如果新成立的龚古尔学院（于埃德蒙·德·龚古尔去世后不久）要吸纳外国作家，备选的名单中很可能包括托尔斯泰、易卜生和“奥斯卡·王尔德先生”。王尔德得知后，投身法国以及法国文化的想法变得更加强烈。^④

虽然英国方面没有提供这样的荣誉，但他并没有被遗忘。王尔德很清楚自己在经济上和道德上都对乔治·亚历山大和查尔斯·温德姆有所亏欠，他急于尽快为这两人撰写剧本作为偿还。❶ 伦敦舞台上的任何作品都必须匿名出现——至少在最初的情况下是这样。王尔德怀疑英国公众还没有准备好欢迎他回归，❷ 但匿名不一定会妨碍成功。一部受欢迎的英语戏剧会给王尔德带来赚钱的机会。他需要开始赚钱，而且要快。他算了一下，目前手头的钱只够维持到夏天。除非珀西·道格拉斯兑现承诺已久的500英镑“信用借款”，否则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❸

作为第一步，他计划完成《佛罗伦萨悲剧》。尽管王尔德幻想这部独幕无韵历史剧可能换来500英镑的预付款，但他似乎已经意识到，该剧可能还需要一些更具明显商业吸引力的东西。❹ 他的想法似乎转向了1894年夏天他为乔治·亚历山大描绘的不忠的丈夫和加倍不忠的妻子的剧情（当时作为《不可儿戏》备选）。虽然他很犹豫要不要动笔——暂时命名为《爱即法律》——但他的确已经开始搜集可能会给对话添彩的格言警句。除了他自己那句现在每个人都“嫉妒别人，当然除了丈夫和妻子”之外，他还打算借用雷吉·特纳对“含着银汤匙出生”这句话的反驳：“是的！但是上面有别人的徽章。”❺

然而，查尔斯·温德姆却有自己的想法。7月23日，这位经纪人来到贝尔纳瓦尔，他建议王尔德改编斯克里布的戏剧《一杯水》(Le Verre d' eau)，这是发生在安妮女王宫廷的喜剧阴谋。这个计划对王尔德很有吸引力，他不仅可以省去杜撰剧情的麻烦，而且还可以请

罗斯帮忙完成这个任务。他催促罗比赶紧过来，给他带上一把安妮女王式的椅子，“就是那种样式”。“你努力的话，”他开玩笑说，“我会取得很大的成功。”^⑨

温德姆虽然来去匆匆，但王尔德的摩拳擦掌、想入非非必然令他深受鼓舞。显然，喜剧意识并没有弃他而去。事实上，它渗透到了他整个夏天的大部分信件和许多行动中。王尔德一直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崇拜者，准备满怀热情地迎接女王登基60周年。他把威廉·尼科尔森一幅“极棒的”女王木刻版画复制品挂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说：“每个诗人都应该整天盯着他的女王肖像。”）他自豪地告诉来访者，他最崇拜的三个女人是维多利亚女王、莎拉·伯恩哈特和莉莉·兰特里，并补充道：“我很乐意娶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个。”^{⑩⑪}女王登基60周年当天（6月22日），他在自己别墅的花园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茶会，邀请邻里的十几个小男孩和他们的学级主任参加，这让贝尔讷瓦尔的居民们大为惊讶。宾客们享用了草莓、奶油、杏子、巧克力、石榴汁和一个巨大的冰冻蛋糕，上面用粉红色的糖汁写着“维多利亚女王纪念日”，再用绿色糖汁围成玫瑰花形，外面还有一圈红玫瑰做的大花环。每个孩子都收到一件乐器（通过抽签选择）作为礼物。“他们唱《马赛曲》和其他一些歌曲，”王尔德对道格拉斯说，“还跳了回旋舞，演奏了《天佑女王》。他们说这首歌是《天佑女王》。我不想和他们唱反调。他们每个人都拿到了我给的小旗。每个人都是那么欢快、可爱。我祝女王身体健康，他们就高呼：‘英国女王万岁！！！！’然后，我又说，‘法国，所有艺术家的诞生地！’最

后，我又向‘共和国总统’祝福，我想我最好还是这么做。他们异口同声地高呼：‘共和国总统和梅尔莫斯先生万岁！！！！’”^①

王尔德虽然可以凭借机智风趣让一封信变得生龙活虎，但他发现，光是凭借这一点很难支撑起任何更多，需要竭尽全力去完成的文学任务。他一次只能工作一小时。^②但如果说这种状态给写剧本带来了困难，那么创作《雷丁监狱之歌》（罗斯给这首诗起了个标题）倒正合适。整个夏天，王尔德都在以一种近乎零敲碎打的方式不断为这首作品添加诗节。他还承担了其他短期任务。他为罗森斯坦的精妙肖像画新书撰写了一段关于W.E.亨利的既讽刺又精彩的文字，他在结尾写道：“他打了一场漂亮的仗，但除了人气之外，他不得不面对一切困难。”^③唉，这段话太尖刻了——或者说太精彩了——年轻谨慎的出版商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不予采用。^④

随着夏季临近，迪耶普挤满了游客，让人分心的事情更多了。一群吵吵嚷嚷的法国青年作家聚集在迪耶普的法庭咖啡馆，王尔德也身在其中，此举引起了地方行政次官的注意。^⑤道森把他介绍给桀骜不驯的出版商、书商时而兼色情作家的伦纳德·史密瑟斯，王尔德被囚禁的那些年里，他已经成为伦敦文坛边缘的重要人物。^⑥当约翰·莱恩参与反对任何与颓废、艺术实验和“奥斯卡·王尔德倾向”有丝毫联系的大潮流时，史密瑟斯却走了相反的方向。他为更大胆的年轻一代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避风港。他夸口称，要“出版任何别人害怕的东西”。王尔德被捕后不久，奥布里·比尔兹利遭解雇，《黄皮书》“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史密瑟斯迅速创刊竞争刊物《萨沃伊》，任命比

尔兹利为艺术编辑。他还着手出版欧内斯特·道森、阿瑟·西蒙兹和西奥多·弗拉蒂斯劳的自觉颓废诗作，以及由比尔兹利精心绘制插图的波普作品《夺锁记》。

史密瑟斯很高兴见到王尔德。早在1888年，他就给《快乐王子》的作者写过一封“充满魅力”的感谢信，并收到了一封亲切的回复。

❶ 王尔德则被这个35岁的约克郡人大大地逗乐了，很快就和他在迪耶普的咖啡馆里度过了许多时光。他问特纳：

我不知道你是否认识史密瑟斯，他经常戴着一顶大草帽，一条蓝色的领带很精致地夹在一个纯净的水钻——也许是酒钻领带夹中，因为他从不碰水：那会马上让他上头。他的脸，刮得很干净，很适合做一个文学之神的祭坛祈祷者，显得有些颓废而苍白——不是因为诗，而是因为诗人，他说，这些人总缠着他出书，破坏了他的生活。他热爱一切初版，特别是女人：小姑娘是他最喜欢的。他是欧洲好色之徒中的佼佼者。同时，他也是一个令人快乐的同伴，一个亲切的家伙，对我非常好。❷

欧内斯特·道森并不是那年夏天史密瑟斯手中唯一一位身在迪耶普的作者。王尔德还结识并（最终）喜欢上了年轻的美国短篇小说作家文森特·奥沙利文。❸ 比尔兹利也来到镇上，想为他的肺病寻找一种有益于健康的气候。王尔德与他和史密瑟斯共进了一顿愉快的午餐，发现他“精神很好”，看上去出奇的健康。❹ 他们并排坐在赌场的露台上，谈论着迪耶普“不可思议的历史”——比尔兹利形容这段历史是“从布伦努斯到奥斯卡·王尔德”。❺ 还有一次，王尔德让“奥布里

买了一顶比银色还银色的帽子”，他告诉特纳“他戴着这顶帽子非常棒”。^⑨然而，对于比尔兹利而言，这样的会面很难处理，因为他现在正受到王尔德的冤家对头安德烈·拉夫洛维奇的资助。他与王尔德来往，便要冒着触怒赞助人并失去津贴的风险。

虽然王尔德一直想让罗斯或特纳回到贝尔讷瓦尔，但在漫长的7月和8月初，他们都没法成行。往往是做好了安排，然后又推迟了。不过，他们的年轻朋友约翰·福瑟吉尔倒是来拜访了他。这位21岁的业余艺术爱好者（他在伦敦建筑学院学习了一门课程，被称为“月亮的建筑师”）随身带了一本埃尔曼的《古埃及生活》。在聊天、喝酒之间，“太阳六重奏”结成。王尔德坚持说，在离开一家法国乡村旅馆的时候亲吻招待员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此举让福瑟吉尔有点吃惊。^⑩福瑟吉尔感觉到，王尔德滔滔不绝的谈话背后有一种悲伤和孤独，但他同时也被王尔德的仁慈大为感动。一天晚上，他们去村里的学校观看了一场“三便士演出”。当“可怜的小演员”大声喊着、尖叫着、挥汗如雨地表演时，福瑟吉尔注意到，王尔德“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地沉浸其中，脸上充满了“怜悯、悲伤、关切、耐心和理解”，“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流淌下来”。^⑪

福瑟吉尔到访期间，史密瑟斯是王尔德的常客。一贫如洗的道森被安置在布尔雅小屋，他在“阿尔克斯的一家客栈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王尔德将他“拯救”了出来。^⑫这两个人的出现促使王尔德喝起了苦艾酒；福瑟吉尔描述史密瑟斯几杯烈酒下肚，整个人变成了“绿色”。一次，在索罗家的晚宴上，王尔德为缺席的道森辩护说

——有其他客人提出疑问——那是因为道森喝多了。王尔德回答说：“如果他不喝酒，那就不是他自己了。Il faut accepter la personnalité comme elle est. Il ne faut jamais regretter qu’ un poète est soûl, il faut regretter que les soûls ne soient pas toujours poètes.” ①王尔德接着（开玩笑地）说，他正在写一篇题为《为醉酒辩护》的文章，声称“灵魂永远不会得到解放，除非以某种酗酒的方式”。在迪耶普，在海边，人们可以陶醉于大自然：灵魂可以“倾听文字和悦耳的音调，观赏‘伟大寂静’的色彩”。但在其他地方，你可能需要借助苦艾酒：“端着盘子的侍者总能为你找到它（伟大寂静）。敲门，门就总会敞开，那是人造乐园的大门。”

在饮酒作乐和夏日狂欢的同时，他也并非没有遭受过怠慢。在迪耶普的一家餐厅，王尔德曾经不止一次因为其他顾客的反对而被谨慎地要求当场离开。②还有一天下午，斯坦纳德太太出手救了他。当时她看见，王尔德正受到一群英国游客的刻意刁难，于是便英勇地穿过马路，挽起他的胳膊，大声道：“奥斯卡，带我去喝茶吧。”③即便在贝尔讷瓦尔，当镇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梅尔莫斯先生”的真实身份后，人们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即便没有表现出公开的敌意，也新蒙上了一层警惕的怀疑。④在迪耶普，他意识到像雅克-埃米尔·布兰奇和沃尔特·西克特这样的老朋友都在回避他。⑤一次，比尔兹利没去参加事先约定的晚餐时，令他很受伤。“奥布里是个胆小鬼，”他事后说，“如果是我自己的阶级这么做，我也许还可以理解……开始一个那样的孩子，我一手培养起来的！不，奥布里太胆小了。”⑥嘲笑比尔兹利的“阶级”就如同声称“培养”了这位艺术家

一样不恰当。然而，这两种说法都揭示了类似的拒绝对王尔德造成的真正伤害。每一次社会交往都带有一丝不确定性：王尔德无法确定他的出现会受到怎样的欢迎，或者是否会受到欢迎。虽然“断交”会让人不舒服，但任何居高临下的同情暗示同样令人厌烦。罗斯表示，让王尔德感到颇为“受辱”的是，他必须“对那些自己从前（在智力上或社交上都）不认可的人，表现出心怀感激的样子”。^⑨

他一直希望能说服康斯坦斯和孩子们到迪耶普来。要是他们在场，他在镇上的地位肯定会有所改善。然而，7月底，他收到了卡洛斯·布莱克的来信，并且“非常痛苦地”获悉，康斯坦斯的健康状况又出现了问题。脊椎麻痹使她几乎不能行走。这个消息令人心碎。^⑩王尔德宣称：“报应似乎没完没了。”他提出要前往瑞士看望妻子。^⑪然而，布莱克请他推迟这个计划，建议他等到康斯坦斯回到热那亚的内尔维安顿下来再说。^⑫这又是一次令人沮丧的拖延。随着8月的临近，王尔德的决心逐渐消退，他的焦虑却与日俱增。

从监狱出来之后，他决心逃离过去的性“疯狂”。据道森说，有一天晚上两人见面之后，为了让王尔德在性方面获得“更健康的品味”，他们去了迪耶普的一家妓院。据说王尔德事后表示，“这是十年以来的第一次，也应该是最后一次。就像在咀嚼冷羊肉！”，接着他又补充道，“但是把这件事在英国讲出去，我的名誉会得到彻底平反”。^⑬然而，这次越轨行为（如果真的发生了的话）似乎是在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王尔德得出的结论是，他需要摒弃的并不是“同性之爱”本身，而是与伦敦男妓的恣意滥交。他宣称，喜欢男人，而非女

人，仅仅是“一种性格气质问题”。在这方面，他的性情并没有改变。❶

尽管他觉得有必要向特纳确认，他的监狱“朋友”阿瑟·克鲁特登不是个“漂亮的孩子”，而是个相当不起眼的家伙，他29岁，过早地白了头发，蓄着“少许，却是实实在在的胡子”，但这样的断言正好暴露了他的想法。❷8月中旬，罗比·罗斯终于来到贝尔纳瓦尔，他和王尔德睡在了一起。谢拉德当时也在镇上，他称，据他的“绝对了解”，这一次是罗斯“把奥斯卡拉回了同性恋的欢乐之中”。❸这一事件标志着王尔德狱后生活的可能性和种种预期再一次发生了改变。当然，他对方济会的禁欲承诺也发生了动摇。

王尔德希望能够再次创作艺术作品的愿望得到了些许鼓励。民谣诗歌还在继续往下写。它采用了一种辩论语气，由此与个人的语气相匹配，王尔德不仅试图指出监狱生活的残酷，而且还试图指出社会强加于监狱生活的罪恶。

人们盖起的每一座监狱

用耻辱的砖瓦建造，

还围上铁栅，免得让基督

把兄弟相残全看到。

随着诗歌写作不断取得进展，王尔德对它抱有的希望也越来越大。他开始想，这首诗也许内容足够充实，可以成书出版。出版商显

然首选史密瑟斯。两人第一次见面后，王尔德就写信给他，表示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够有一些在你看来足够好，以便出版的东西”。^①这一天来得比预期的早。他们在法院咖啡馆共进晚餐时讨论了这件事。史密瑟斯不切实际地建议，王尔德应该拥有这本书的全部利润。然而，王尔德对此表示异议，他提出，更商业化的安排应该是对半分享利润。^②作为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他把自己的初稿交给出版商打印出来。“它还没有完成，”他解释说，“但是我想见到它的打印件。我对自己的手稿很头疼。”史密瑟斯把这首诗拿给比尔兹利看，后者“似乎被它深深打动了”。虽然比尔兹利“立刻答应为这本书画一幅卷首插图”，但史密瑟斯发现，这位艺术家最近频频出现计划改变，许诺落空的情况，因此不相信他会完成这幅画。^③不过，出版的准备工作还是在向前推进。

然而，除了这首民谣诗歌，王尔德的文学计划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他的各种戏剧始终没有动笔。用他的话来说，“失去自由的震撼”仍然作用在他的身上。^④他希望在适当的时候，他能“找回意志力集中的状态，它为艺术创造条件并统治着它”。^⑤他搞来一条红领带，相信可能会给他带来灵感——但没有效果。^⑥他渐渐承认，自己无法为温德姆改编《一杯水》。即便有罗斯的帮助，还有康格里夫榜样，他还是做不到。正如他对卡洛斯·布莱克哀叹的那样，“我根本没心思写一部诙谐的喜剧”。^⑦他仍然希望能在《佛罗伦萨悲剧》或其他戏剧作品上有所作为。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迟迟不愿下笔。

天气的变化令他沮丧，而他真正想念的是日常交往的刺激和来自家庭的支持。道森和史密瑟斯已经回到了英国，王尔德此时意识到，罗斯和特纳也只能偶尔来做个短暂的停留。到迪耶普度夏的人潮开始退去。里基茨和香农原本计划到访，但未能实现。❶福瑟吉尔写来一封一本正经的信说，觉得继续和他保持友谊是“不明智的”。❷康斯坦斯和孩子们似乎还是那么疏远。夏日逝去之际，秋雨潇潇的孤寂远景开始浮现。

在这种日渐倦怠的情绪中，王尔德想到了波西。后者一直待在近在咫尺的马恩河畔诺让，在悲伤和持续的流放中忍受着煎熬。夏季的时候，两人一直在磕磕绊绊地推进着秘密会面的计划，但双方的承诺都很有限。7月底，道格拉斯写信建议王尔德到巴黎与他同住。然而，王尔德觉得他“还不能面对巴黎”。道格拉斯曾经提议在鲁昂见面，但他自己又回信称，他掏不出旅行所需的40法郎。自那之后，见面的事情就搁置下来。直到现在。秋冬季节近在眼前，他们决定采取行动。❸

用道格拉斯的话来说，两人在鲁昂的那次见面（几乎可以肯定是在8月28日），“简直棒极了”。他们在一起待了一天一夜。在车站见面时，王尔德哭了。自从他们最后一次透过纽盖特监狱的铁栅栏见面以来，已经过去了两年零四个月。记忆中的爱、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需求抹去了他们的痛苦和争执。谁也没有指责对方。❹如果说他们是两个被社会抛弃的人，金钱上捉襟见肘，遭到社会的排斥，成为朋友的负担，那么他们还有彼此。王尔德写道，波西“举止得体，非常

可爱”。^①他们整整走了一天，“肩并肩，手挽手，高兴极了”。^②往事似乎还能重获新生，他们旧情的灰烬中还有什么东西会显现。波西送给王尔德一个银烟盒，上面刻着多恩的诗句：

我们使凤凰之谜更增奇妙，

我俩合一，就是它的写照，

两性结合，构成这中性的鸟。

我们死而复生，又照旧起来，

神秘之力全来自爱。^③

两人在共度良辰的那一天，制订了一个逃往那不勒斯过冬的计划。他们可以在那里——沐浴在南部的“阳光和生活乐趣”中——团聚和工作。道格拉斯希望能从家人那里筹集到钱用于这次冒险行动。

^④他说，想给王尔德一个“家”——一个远离忧虑的避难所，一个让他“别无他求”的地方，一个让他能够再次写作的地方。^⑤王尔德愿意相信，这一切是有可能实现的。“假如在意大利都无法写作，”他反问道，“我又能在哪里写呢？”^⑥分手后不久，他对波西说：“我亲爱的人儿……我觉得再次创作美丽的艺术作品的唯一希望在你身上。过去并不是这样，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你真的可以在我身上重新创造出艺术所倚赖的那种能量和快乐的力量感。”^⑦

在鲁昂的会面本应是秘密的，尽管令王尔德大为失望的是，由于道格拉斯在他们下榻的酒店很出名，所以他根本没有机会使用那个浪

漫的假名。❶然而，罗斯从特纳嘴里得知了这次邂逅，身在鲁昂的特纳偶然遇到了“塞巴斯蒂安和因方特·塞缪尔”。❷他和特纳都没有对这次和解感到乐观，而是意识到了此举随即可能带来的实际麻烦。然而，王尔德却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他对罗斯说：“是的，我见到了波西，当然我一如既往地爱着他，带有一种悲剧和毁灭的感觉。”❸他刻意回避了两人计划逃往那不勒斯的事情。

王尔德回到贝尔讷瓦尔便开始一门心思筹集旅行所需的资金。“去那不勒斯要花10英镑，”他悲叹道，“太骇人了。”❶历经三个月的挥霍，再加上接二连三的慷慨之后，他已经“身无分文”，账单缠身。康德和道森离开的时候欠着他的钱。他写信对史密瑟斯说，自己“刚刚借给一位法国诗人40法郎，让他回转巴黎去”，而且，“他非常感激，说三天之内会给我寄来一首十四行诗！”❷王尔德希望这位出版商能“立刻”为民谣诗歌预付他20英镑，但这一愿望没有实现，但他在其他方面找到了慰藉：9月初，康斯坦斯给他的第二笔零用钱到了（迟了几天）；他还收到了罗森斯坦寄来的一张15英镑的支票。罗森斯坦成功卖掉了他从泰特街拍卖会上买到的蒙蒂切利画作；达尔豪西·扬慷慨地提出，要委托他为歌剧《达芙妮和克罗埃》创作一个脚本（“预付100英镑，50英镑用于创作”）。❸尽管如此，王尔德还是向他在贝尔讷瓦尔的一个邻居“借”了100法郎用于前往巴黎。在那里，他还向文森特·奥沙利文要了一张去那不勒斯的票。❹王尔德临行前拜访了一个巴黎的算命师。“我很困惑，”她对他说，“根据你的出身，你两年前就死了。我无法解释这一事实，除非假定从那时起你就一直生活在你的想象中。”❺

王尔德还极其不真诚地写信给卡洛斯·布莱克，声称前往南部的决定对他的工作和理智健全很有必要，只是补充说，他“失望至极”，因为康斯坦斯仍然没有让他“去看看孩子们”。^⑩他理所当然地没有提到将与道格拉斯同行。事实上，到了最后一刻，人们的确对波西的计划有些怀疑。他在鲁昂急急忙忙地制订了计划之后，便与母亲、妹妹一起去温泉小镇艾克斯莱班度假，似乎并不急于离开。他甚至在考虑从那里前往威尼斯。王尔德知道，最好不要责怪他，“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写道，“但你越早来那不勒斯，我就会越高兴”。^⑪装出来的若无其事果然起了作用。当火车经过艾克斯时，道格拉斯见到了他，两人一起前往那不勒斯。王尔德希望，到了那里，在波西的帮助下，他可以“重塑”自己“被毁掉的生活”。^⑫

3 被遗弃的人

我的存在就是一桩丑闻。

——奥斯卡·王尔德

9月中旬的那不勒斯依然宁静。时尚的冬季尚未开始，一家家大酒店才刚刚开始恢复生机。王尔德和道格拉斯把自己安置在当地最大的皇家外宾饭店，它坐落在海滨，靠近蛋堡，远眺海湾对面，左边是维苏威火山，右边是卡普里岛。❶对王尔德来说，逃离孤独而阴郁的北方，与波西在一起来到那不勒斯——一个“充满爱奥尼亚人和多利安人气息”的地方，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❷王尔德觉得“快乐无处不在”❸，在这个新环境中他又可以写作了。他们可能会一起住在一栋小别墅或一套公寓里过冬，甚至可能住更久。❹

最初的几天里，他们怀着度假的心情，开始了一场铺张浪费的运动。道格拉斯从家里筹钱的计划没有实现，甚至根本就没有付诸实施。然而，他的头衔在赊账的时候很好使。对于19世纪末的意大利旅馆老板来说，任何英国“老爷”都必须是百万富翁。刚刚过一周，道格拉斯和王尔德就已经欠账68英镑。❺即使在一家价格“离谱”的酒店，如此挥霍也令人咂舌，他们也许是在重演萨沃伊酒店的奢华往日。❻

然而，一时的欢欣鼓舞并不能隔断外界的担忧。在从巴黎转寄给王尔德的信件中，有一封来自康斯坦斯，向他提供了一次梦寐以求的

会面，敦促他去埃尔维拉别墅见她。她承认孩子们马上要上学了，还附上了他们的照片和问候。但是，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王尔德后来告诉史密瑟斯，他已经“徒劳地等了四个月”，只等来了这样一封信。现在，当他把希望和自己本人托付给道格拉斯和那不勒斯之后，这封信却姗姗来迟地到了：“对感情及其浪漫本性来说，不守时是致命的。” ⑩

康斯坦斯似乎是故意等到孩子们回学校后，才来请他的，由此他也为自己态度的转变找到了更多的理由。他所想要得到的是孩子们的爱，至少他是这么说的。而现在他担心这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⑪他告诉布莱克（他的来信也被转到了那不勒斯），“假如以前康斯坦斯允许我探视孩子们”，事情就“完全会是另一番样子”——随后他又不太真诚地添加了一句：“我丝毫没有指责她的所作所为的意思，但是，凡因必有其果。” ⑫

尽管如此，他还是给康斯坦斯写了回信，提议要去看她，不过要等到下个月。之前整个夏天一直充斥在他信中的那种急迫和渴望的语气已经消失殆尽。康斯坦斯以为王尔德马上会来，满心欢喜地为之做着准备，但这封简短而含糊的回复却让她“辗转反侧”。 ⑬维维安总是回忆起，在他回学校的前一天晚上，当康斯坦斯得知奥斯卡“有其他事情要做”时，她原本期待的快乐瞬间变成了痛苦。 ⑭她立即写信给布莱克发泄自己的不满。尽管王尔德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有哪些人在那不勒斯和他在一起，尤其是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但她还是产生了怀疑。“让他回答：他是否在卡普里见过那个可怕的人（道格

拉斯)？没有人会在这个季节去那不勒斯，所以我看不出他去那里会有什么别的原因，我很不高兴。” ⑨

她立刻给王尔德回信（她后来这样解释）：“我问他是否去过卡普里岛，要他立即回答是否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可怕的人。我还告诉他，由于他对无论是我寄给他的照片，还是孩子们送上的问候从来不言不谢，他显然不在乎孩子们。” ⑩ 打击还不止于此：罗斯和特纳确实已经知道王尔德和道格拉斯在一起，两人都写信表达了他们对重逢的担忧，认为此举一定会损害到王尔德的身心康复——而且很可能影响他获得收入的权利。

王尔德用一种既冠冕堂皇又自怨自艾的口吻予以反驳：“我回到波西身边，”他对罗斯说，“在心理上是绝对必需的：且不说为自我实现，人要过充满激情的内心生活，整个世界逼迫我这样做。我无法在没有爱的氛围下生活，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必须爱和被爱……当然，我仍时常抑郁不乐，但我仍然爱他，他毁了我的生活，仅此事实便令我爱他。” ⑪ 而他对特纳则说，回到波西身边——他“本人就是一位诗人”——会给他工作带来好处，“毕竟，不管我过去的生活在道德规范上表现如何，它一直都是浪漫的，波西就是我的浪漫。我的浪漫当然是一出悲剧，但它仍然是一段浪漫的故事，他珍爱我甚于任何人，他给予我的爱多于他可能施爱的每一个人，没有他，我的生活将沉郁不堪”。 ⑫

他敦促特纳“站在我们一边”。 ⑬ 他会一直忙个不停。王尔德私奔的消息在他的朋友圈子里传开后，引起了一阵恐慌：W.R.佩顿（他

的牛津同学)得知这件事后,“甚至真的生起病来”; ⑩ 布莱克觉得王尔德现在“无可救药”了。 ⑪ 某天下午,在作家俱乐部“喝酒”的谢拉德浮躁地宣称,这是一个“不幸的错误”,王尔德的“行为到处被人误解;全世界都认为他的诽谤者和敌人是正当的,许多人将不再同情他”。 ⑫ 还有人写了“冗长乏味的信件”告诉王尔德,他“又一次毁了自己的生活”。 ⑬ 甚至连罗斯也在不断用告诫性的书信“轰炸”他——“这不公平,”王尔德抱怨道,“在文明战争中,未设防的地方通常会受到尊重。” ⑭

他默默忍受着罗斯的谴责。 ⑮ 但是,当谢拉德冒冒失失突发指责的话语传到那不勒斯时,王尔德当即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谴责信,指责这位老朋友扮演了道德说教的伪君子“答尔丢夫”——这是他个人词汇中最强烈的轻蔑用语之一。 ⑯ 这标志着他们亲密关系就这样悲哀地结束了,然而两人的友谊还没有完全走到尽头。道格拉斯的家人和王尔德的朋友一样,也对这种安排很不满意。昆斯伯里夫人曾希望儿子对王尔德的依恋能在历经多年的被迫分离之后逐渐消失。但此时,她忍住了,没有向他提出质疑——也许是考虑到,他一旦被触怒,会变得多么顽固。 ⑰

康斯坦斯当然很快就从布莱克那里得知王尔德和道格拉斯在一起。她立刻发出一封王尔德称之为“可怕至极”的信,里面充满各种禁忌:“我禁止你见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我禁止你回到你那污秽、疯狂的生活里去。我禁止你在那那不勒斯生活。我不会允许你到热那亚来。” ⑱ 王尔德则将这种种要求视为“愚蠢”。 ⑲ 他拒绝道歉、

拒绝解释，也拒绝对她的要求做出让步。“我曾写信告诉她，”他对莫尔·阿迪说，“我从来也没有梦想过违背她的意愿去看望她，导致我去看望她的唯一原因，是期盼在我遭遇不幸时能得到同情的问候，以及对她的喜爱和怜悯。至于其他，我只求平和，尽量过好我自己的日子。我不能住在伦敦，或者，到目前为止也无法在巴黎生活，而且我当然希望在那不勒斯过冬。”^①他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拒绝承认别人的感受。^②

对康斯坦斯来说，他的回信可谓最后一击。“如果我一年前收到这封信，”她对布莱克说，“我会介意的，但现在我认为这封信是个疯子写的，他无法想象琐事会对孩子们产生何种影响，也没有足够的无私去关爱妻子的幸福。它唤醒了我所有最痛苦的感觉，当我的感觉被唤醒时，我会持续不断地感到痛苦。我想这封信最好还是不要回复了，我们各自独立生活吧。最近（上帝原谅我）我对他有一种绝对的反感。”^③她的痛苦很快就会找到一种实实在在的表达方式。

王尔德意识到她的沉默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她的律师可能会给他一个“晴天霹雳”。他在给罗斯的信中尖刻地写道：“我猜她现在正试图剥夺我每周可怜的3英镑。女人如此小肚鸡肠，康斯坦斯没有一点想象力。”^④钱当然是他的心事。这是为了完成自我实现的梦想，眼下更紧迫的是为了让他和道格拉斯能够逃离昂贵的旅馆，住进租来的别墅里。道格拉斯每周从他母亲那里得到“大约8英镑”，但王尔德说，“当然……一如既往地身无分文”。^⑤重担落到了王尔德的肩上。达尔豪西·扬承诺为《达芙妮和克罗埃》的脚本支付100英镑，王

尔德现在认为 he 可以和道格拉斯合作完成这部作品。在各种恼人的小耽搁之后，钱终于到了。❶ 王尔德有几笔借给朋友的钱——主要是借给欧内斯特·道森的18或20英镑——但愿他还记得这笔钱。❷ 王尔德坚持认为伦纳德·史密瑟斯应该为《雷丁监狱之歌》向他预支20英镑，而且他还努力让史密瑟斯接受这一事实。❸ 除此之外，王尔德还梦想着他的诗能在美国用连载版权换来一大笔钱：“我确实认为应该开价500英镑，并能到手300英镑。”❹

他和道格拉斯凭着这些实际的和有希望得到的钱，在小镇北部边缘的波西利波的一座迷人的别墅里租了一个“优雅的公寓”，并在10月初预付了四个月的租金。❶ 房子周围是绿树成荫的小巷和精心照料的花坛，从这里可以看到海湾，还有露台和通向大海的大理石台阶。❷ 房间里甚至还有一架钢琴（道格拉斯会弹琴）。❸ 这里似乎是一个避风港，可以躲开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反对声浪。有些房间里装饰着不祥的孔雀羽毛，但是这些东西可以（或被）移走。❹ 家里有四个仆人，其开销稍高于两人的生活费：一个厨子卡米、一个女仆，还有两个男孩——庇皮诺和米歇尔。道格拉斯估计，每天的直接支出应该不到10先令。❺

然而刚刚搬进去的时候，田园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他们发现别墅里老鼠成灾。道格拉斯在床上坐了两个晚上，“吓呆了”❶，坚持要搬到附近的旅馆睡觉。❷ 别墅的主人自告奋勇要给老鼠下毒，但是——正如道格拉斯所说——“显然它们是靠毒药为生的。它们越吃越有精神。它们似乎把它当作了一种壮阳药。”❸ 王尔德觉得一个更可

靠的办法是，请一个当地的女巫——她只需“用两支笛子”就能把老鼠赶走。❶米歇尔领来了一个外表极其丑陋的老女巫，弯着腰，留着明显的胡子，据说她“绝对可靠”。当然，王尔德情愿相信，最终赶走老鼠的是她身上那股“烧焦的气味”和喃喃的咒语，而不是传统的砒霜。❷女巫还预测了他们的命运，但她的预言没有被记录下来。❸

朱迪切别墅的生活是在和谐的气氛中开始的。道格拉斯对阿迪说：“奥斯卡和我相处得很好。”❹王尔德竭力相信，如今他在南方生活得很幸福，“他过去的力量”又回来了。他感觉自己灵魂里“那片伤痕累累的叶子”开始在那不勒斯温暖的阳光里和道格拉斯的爱意中慢慢展开。“我想，我仍然会和过去写得一样好。”他告诉史密瑟斯，“能写得有过去一半好，我就心满意足了。”❺他各种各样的戏剧计划都在竞相引人注目。他在读《特里斯坦》的剧本，为创作《达芙妮和克罗埃》做准备。❻与此同时，道格拉斯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为歌剧创作了一首“可爱的”歌词，❼还有三首王尔德认为“相当精彩”的十四行诗：他称之为“月亮三唱”。它们被寄到了《新评论》杂志的亨利那里——很难知道此举用意，究竟是为了挑衅、玩笑还是作为严肃的提议。它们没有获得发表。道格拉斯又写了一首关于莫扎特的十四行诗，寄给《音乐家》的编辑罗宾·格雷，但同样没有成功。

❽

对王尔德来说，最紧迫的任务是完成《雷丁监狱之歌》，并安排诸多出版细节。他一直在史密瑟斯寄回来的打印稿上修改，10月初他写出一个大幅修改过的版本寄了出去。然而没过几天，他又另外寄去

一叠诗句“又寄给你四节……充满力量和浪漫现实色彩”。^①那个月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诗句陆续寄出。他要把这首诗扩展到一本书的长度，同时也要平衡它的各种艺术目的。^②他努力创作。^③这项任务很不容易：“我发现很难，”他承认，“找回（这首诗）初创时的心境和状态。现在它对我来说似乎是陌生的——真正的激情迅即变得虚幻了——人生的真相显出种种形态，并被重铸得奇形怪状。”^④他后来自称，那几周里增加的材料反映的是他在那不勒斯的生活，而不是他在雷丁的生活。^⑤

和以前一样，他在文字上向罗斯寻求文学和批评方面的建议，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建议”，并接受了“其中的一半”。然而，对于监狱生活中常见的事件和对象，他仍然保留使用备受指责的“可怖的”“可怕的”等形容词，认为其在“心理上”是恰当的：它们描述的不是这件事情本身，而是“它对灵魂的影响”。^⑥而道格拉斯——他的诗歌深受王尔德的赞赏，也一直在以民谣的形式进行创作——就在他身边，既可以当参谋，又可以充当与罗斯的编辑思想略有竞争的一种平衡。王尔德甚至借用了他的一副对句用在诗句中，以此表达诗人的敬意：“那天夜里，空荡荡的走廊里/充满了可怕的形象，/在镣铐区里/我们听不到来回的脚步声轻响。”^⑦

总的来说，王尔德对自己的努力感到欣慰：^⑧他已经在好几处——如他所谓——“比亨利更具有吉卜林的风格”。^⑨当然也有保留意见，他对特纳说：“我觉得，我喜欢刺耳的乐音更胜于舒缓的长笛。”^⑩但他承认，这也许难以避免：“这首诗苦于互异风格整合之

难。有些部分是现实主义的，有些部分是浪漫主义的：有些是诗，有些是口号。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但总体上我觉得这是一部有趣的作品：与艺术上的些许瑕疵相比，它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十分有趣。”

⑨

尽管王尔德化名为塞巴斯蒂安·梅尔莫斯，但有关他和道格拉斯在那不勒斯出现的谣言很快就开始流传起来。然而，首家宣布这一事实的意大利报纸却把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和年轻作家诺曼·道格拉斯搞混了。诺曼·道格拉斯30岁时结束了短暂的外交生涯，最近也搬到了波西利波的一栋别墅里。和诺曼·道格拉斯住在一起的是一位年老体弱的西班牙伯爵（人们误以为他是王尔德），因此报道称王尔德在那不勒斯身体非常虚弱。英国驻那不勒斯领事尤斯塔斯·内维尔-罗尔夫（他知道王尔德就在当地）写信给《那不勒斯邮报》，指出他们的说法有误，并及时作出了简短的更正。⑩然而，关于王尔德身体虚弱的虚假报道已经被许多英国和外国报纸采用，并且被反复引用——不过其中既没有“诺曼”，也没有“阿尔弗雷德勋爵”，一丁点儿没有提及与他同行的道格拉斯。⑪

随后，那不勒斯的报纸上又刊登了其他文章。⑫一些报纸轻蔑地提到了这位“英国颓废派”以及对他的审判。⑬其他报纸感觉这其中有故事。于是记者们开始“紧紧跟着他”。⑭当地一家晚报的记者混进别墅，希望采访他。王尔德被这种闯入行为激怒，把他打发走了。这次短暂的未遇也及时地出现在报纸上。⑮王尔德曾经很喜欢在媒体面前卖弄，但现在已经对此毫无兴趣。他为那些不必要的关注和某些

文章的苛刻评价感到恼火。《晨报》称他为“当代令耐心的公众最难以忍受的讨厌人”。^①“我不想被人写成报道，”他抱怨说“我只想安安静静——仅此而已。”^②当他听说卡普里没有报纸时，半开玩笑地提议说不妨搬到那个岛上去。^③

随着秋天的临近，时尚的外籍游客越来越多，他们完全不在意他。“真奇怪，”他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对罗斯说，“这里的英国侨民还没有一个来拜访过我们。”^④然而，危险就在于，这种冷漠可能逐渐蜕变成敌意。10月中旬，王尔德和道格拉斯（用史密瑟斯给的10英镑）穿过海湾到卡普里岛短途旅行时，两人不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计划逗留三天：“我想，”奥斯卡解释说，“在提比略的墓前献一束简朴的花。由于坟墓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什么人的，因此我将更为深情地去做这件事情。”^⑤这次旅行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但他们似乎打算住在基西萨纳酒店，刚刚安顿下来要吃晚饭，酒店老板出现了，他“极其客气地”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离开。一些英国客人认出了王尔德，他们不愿意见到他。他们又去了另一家店，但同样可怕的事情又重复上演了一遍。他们不愿冒第三次被拒绝的风险，于是打算不吃晚饭通宵坐一夜，等待天一亮坐轮船回那不勒斯。^⑥

似乎是岛上的瑞典人医生阿克塞尔·芒特把他们从这悲摧的守夜中解救了出来。芒特在广场上偶然遇见这两个“迷失的灵魂”，便向道格拉斯打招呼。道格拉斯是他去年结识的。他并不介意被介绍给王尔德，却惊诧于道格拉斯竟然认为他会“如此无知、如此残忍，会对任何遭受如此多痛苦或如此可耻对待的人表现出不友善的态度”。他向

来认为，对王尔德的定罪“荒谬至极”。^①他坚持让这两个人和他一起回家吃饭休息。^②王尔德很喜欢阿纳卡普里这座充满艺术气息的别墅，也很喜欢芒特本人，觉得他“是个极好的人”，是“希腊文化的大行家”。^③第二天，道格拉斯继续留在卡普里，与美国社交名媛斯诺夫人共进晚餐，至于王尔德，也许是从基西萨纳酒店的经历中接受了教训，立即回到更宜隐姓埋名的那不勒斯。他不愿意向罗斯提起这件伤心事。^④

不过，也有少数几个英国朋友和熟人在经过那不勒斯时没有避开他们。道格拉斯的牛津同学约翰·纳普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⑤当战地记者哈里·德·温特（他曾赞赏地写过关于俄国战俘集中营的文章）在甘布瑞纳斯咖啡馆外遇到王尔德时，便向他打起了招呼，当时王尔德正“孤零零地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块砖头”；紧接着一天晚上，他同道格拉斯共进了晚餐。^⑥然而，两位来访者都注意到，在与更广泛的社会场景的隔绝之下，这两个流亡者都略微有点幽闭恐惧。纳普回忆，道格拉斯“非常迷恋奥斯卡”，而王尔德“长篇大论地”对德·温特讲述了道格拉斯，称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和他在一起，是他最好、最忠实的朋友”。^⑦

即便难得有英国人做伴，但好在身边还有别的人。让王尔德大为开心的是，一群年轻的那不勒斯作家接纳了他。其中最热情的要数25岁的诗人兼杂志编辑朱塞佩·加里波第·罗科，王尔德刚到没几天，他就找上门来。他英语说得很好，自告奋勇教王尔德意大利语，每周来上三次“意大利语会话”课。^⑧

尽管意大利媒体广泛报道了王尔德的审判，但人们对他的实际工作仍然了解得非常有限。1890年，米兰的戴安娜剧院上演了《薇拉》，但演出三场后就结束了；此外就是1892年一本西西里无政府主义杂志的副刊上刊登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中的几段译文。

① 罗科建议他把《莎乐美》翻译成意大利语。王尔德很高兴。他希望自己在那不勒斯不仅是声名狼藉的名人，而且还能被“当作艺术家”看待。② 然而他身边没有剧本，只好写信到伦敦，希望借一本。艾达·莱弗森以她一贯的慷慨，把自己那本借给了他。③

罗科也相信，剧本一旦翻译完成，将有可能在那不勒斯上演。④ 这是个令人兴奋的主意。王尔德写信告诉特纳：“把这件事做成，对我在这里会有极大的帮助。”⑤ 他唯一关心的是一些实际问题；要找“一位惊人美貌，曼妙歌喉的女演员”担任主角，（他向斯坦利·马克欧尔解释说）“可惜除了杜塞之外，意大利的绝大多数演悲剧的女演员都是富态的夫人，而我想我无法容忍一个肥壮的莎乐美”。⑥ 宗教方面的反对意见曾经阻碍了该剧在伦敦的演出，意大利没有这样的宗教势力。事实上，罗科与那不勒斯的作家兼议员乔瓦尼·博维奥关系很好。博维奥的宗教剧《耶稣基督》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成功。

⑦ 当罗科在王尔德的指导下完成初稿翻译时，他在博维奥家中组织了一场朗读会。这出戏受到了在场的作家、诗人、学生和记者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博维奥夫人，据罗科说，她对这出戏赞不绝口。⑧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另一位客人路易吉·孔福尔蒂被王尔德的写作生命力深深打动，建议在那不勒斯的语言学界举行一场更公开的二次阅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⑨

孔福尔蒂是一位诗人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是那不勒斯国家博物馆的秘书，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博物馆藏品的指南。王尔德是博物馆的常客，十分喜欢那里来自庞贝、赫库兰尼姆、斯塔比亚、库迈和罗马的无与伦比的文物藏品。尤其吸引他的是“可爱的希腊青铜器”。^①在那里，他可以在皇帝、舞者和哲学家中间沉思玩味浑身赤裸的摔跤手、所谓的那喀索斯，还有那休憩的墨丘利（《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将其描述为“一幅充满弹性的青春美丽画卷”）。^②这些事情都很美好。“唯一恼人的事情是，”王尔德狡黠地对道森说，“他们在夜间满城游荡。”但他也补充说：“人很快就会奇妙地习惯这一切，并且会得到补偿。”^③

如果说在贝尔纳瓦尔那个孤寂的夜晚，罗斯让王尔德重新感受到了“同性恋的乐趣”，那么那不勒斯给他提供了更多。虽然那不勒斯以时尚的度假胜地而闻名，但它还有一个更黑暗的名声——一片充满性机会的土地。希腊人古老的异教道德似乎一直坚守在阴凉的小巷和阳光普照的街道上。年轻的男人很容易与人发生性关系。正如一位外国游客所记录的那样，只要“对一个尚未成熟的年轻人表示出兴趣，评论一下他的卷发或杏仁眼，这个年轻人就会开始调情……而且意图明确”。^④只要不冒犯社会风化，法律就不会干涉这类事情。道格拉斯已经在前一年到访时证实了这一切的真实性，现在他急于向王尔德介绍这座城市的地下性交易。王尔德在获释后的几周曾经言之凿凿地表示，他以前在伦敦的男妓当中过着乱糟糟的生活，“不配做一个艺术家”，但这些话很快就改口了，接着便被抛诸脑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用罗斯的话说——他“又回到了同性恋泛滥的状态”。

①唾手可以买到的性行为给人带来的愉悦一如既往地令人兴奋。如果说王尔德注意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在感官上“越来越难以获得愉悦”，那么同时他也发现“这种愉悦的刺激感比年轻时更强烈，也更自我”。②

罗科似乎也参与了王尔德和道格拉斯的这些性冒险，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新结交的英国朋友I.D.W.阿什顿（“约翰爵士”）——王尔德形容他是“一个非常迷人而乐观的人”，他有惊人的“享乐能力，酒量很大，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③与那不勒斯的年轻人做爱，促进了王尔德的语言技能：他跟他们谈论魅力的美学，他们教他街头巷尾的俗语。“我对我的意大利语会话很吃惊，”他对阿迪吹嘘道，“我相信，我说的是一种但丁式意大利语与最糟糕的当代俚语的混合语。”④

媒体开始注意到王尔德的一次次约会。有人提到他“为了寻求刺激……而在夜间游荡”。⑤在一份低级庸俗的报刊上，一篇报道离奇地描述了王尔德与来自不同兵团的五名年轻士兵在一家酒店过夜的故事（酒店门房担心，王尔德引诱了这么多军人，可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⑥

这类故事和“各种不愉快的八卦”出现之后，道格拉斯的“亲朋好友”——他的母亲和弟弟——更加竭尽全力地想要打破两人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敦促下，使馆随员丹尼斯·布朗从罗马赶来，他是道格拉斯在牛津时的朋友。在别墅吃了一顿显然很愉快的午餐后，他把道格拉斯拉到一边，劝他放弃王尔德，离开那不勒斯。道格拉斯一贯讨

厌这种干涉。布朗称他是“堂吉诃德式的傻瓜”，两人“怒气冲冲地作别”。^⑩

事实上，波西利波的生活已经开始出现紧张的迹象。良好的开端无法得到维持。缺钱是持续不断的压力和分裂的根源。他们生活在一种令人厌倦的“日常财务危机”之中。^⑪王尔德不止一次地说过，道格拉斯的零花钱“连他自己都不够用”，更别说养活他们两个人了。

^⑫“勉强糊口的挣扎”只能“依靠给（道格拉斯）那些不情愿的亲戚发去绝望的电报，还有典当一些别针和饰针之类的小玩意儿来维持”。^⑬当他们身无分文的时候，便只能回到皇家外宾饭店吃饭，在那里他们至少可以赊账。^⑭

道森归还了欠王尔德的10英镑；^⑮罗斯出人意料地寄来9英镑（“一个非常美妙的奇迹”）；^⑯还有特纳，即便他没有寄钱，也会以王尔德的名义，支付一张2英镑10先令的邮政汇票给刚刚从雷丁监狱获释的英俊小伙子哈利·埃尔文。^⑰但一直囊中羞涩的史密瑟斯夫妇只能零零碎碎地向他预付20英镑，而且还是在无数次（昂贵的）电报和多次毫无结果去库克的办公室催问之后才收到的。“我计算为等待这笔钱所花的费用到现在为止已经达到34英镑，”11月初，史密瑟斯还欠着王尔德一半的钱，于是他写信对出版商说，“精神上的焦虑是无法计算的。我猜想，你认为精神上的煎熬对诗人有好处。但涉及对金钱的担忧时，情况并非如此。”绝望之中，王尔德甚至写信给欧内斯特·莱弗森，要求得到他认为应该得到的那笔钱。他没有得到回音。

^⑱

《雷丁监狱之歌》在美国的版权销售一直没有取得进展，这更加剧了他的焦虑和沮丧情绪。王尔德告诉道森：“我仍然继续建造着美妙的空中楼阁，我们凯尔特人一直这样做。”^①但就像通常的情况一样，空中楼阁造起来很慢。他没有收到报价，而且所有的反馈都令人沮丧。这既令人震惊，又让人惊讶。“我不知道，我与美国出版界之间竟然有如此隔阂，”王尔德对罗斯感叹道，“我原以为，我会轻松地获得成功并保证能得到一大笔钱。自负帮助成功者，而毁灭失败者，这很奇怪。往日我的一半力量来自我的自负。”^②作为最后的策略，他建议联系他办事极其高效的美国经纪人伊丽莎白·马布里，希望她能帮上忙。^③

大西洋彼岸的沉默——以及对金钱的持续迫切需求——促使王尔德重新考虑他在英国的连载版权。他之前已经向史密瑟斯保证，会让出版商“把我的绝对纯洁新鲜的诗作展示给英国公众使其癫狂”，^④现在他建议同时在报纸上发表。他声称《音乐家》杂志的罗宾·格雷准备出价50英镑，他告诉罗斯，自己的确准备“同意任何一家英国报纸”——《星期日太阳报》《星期六评论》甚或《雷诺兹报》——“它在犯罪阶层中流传广泛，现在我正置身这个阶层，所以我的诗将由与我同病相怜的人来阅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体验。”^⑤

史密瑟斯被这个想法吓坏了，他在罗斯的支持下发出了最后通牒，威胁说一旦做出任何这样的安排，他就放弃出版这本书。^⑥王尔德让步了：“我敢说你会认为我的想法非常不切实际，”他对史密瑟斯说，“但我坦白承认，假如我不得不在《雷诺兹报》和史密瑟斯之

间做出取舍，我会选择史密瑟斯。”^① 尽管他试图向罗斯解释，声称史密瑟斯曾“多次”写信给他说“他不介意这首诗出现在别处”，但他还是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我很清楚，那样做会毁了这本书。”^②

王尔德的确想要出一本书。他与史密瑟斯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讨论这本书的外表样式。难点在于要让它与众不同，高贵尊严：“公众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书籍外观的影响。”王尔德认为，“这是关于公众的唯一艺术问题”。^③ 他最初的想法是制作一部“非常艺术”的作品——有精美的封面（当然是质纸的）、卷首、首字母、附属页等。但是，他希望有一幅卷首画——类似保罗·赫尔曼创作的那种“忧郁、混乱和可怕”的作品，他是王尔德在巴黎认识的一个“有趣的天才”——但一直没有收到画作，希望逐渐破灭了。他只能接受至少第一版是没有插图的。^④

材料的选择和排版方式可以制造出与众不同的感觉。为了增加这本书的“厚度和坚固性”，避免让它看起来太像“六便士的小册子”，他们决定采用单面印刷。^⑤ 如此这般，再加上史密瑟斯选择的厚厚的荷兰手工纸，其主体就足够保证进行布面装订。在王尔德的建议之下，设计师选择了一种“肉桂色”，书脊用白布（和金字）装饰。书本的外表比标准书籍更长更薄，这也让作者“颇为高兴”。^⑥

收到第一份清样后，王尔德赞同史密瑟斯选择的字形，不过他认为问号“缺乏新意，而停顿号尤其是句号，毫无个性”。^⑦ 不过，在标题页的措辞和布局上还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大家一致认为王尔德

的名字不应该出现，而是应该只用他的监狱编号C.3.3作为作者名。王尔德说，公众“喜欢公开的秘密”。^①

书中有一段纪念骑兵伍尔德里奇的题词作为诗歌的主题，但王尔德还想加一段赠给罗斯个人的献辞：“当我出狱的时候，有些人给我带来了衣服和香料，还有人带来了明智的忠告，你给我带来了爱。”

^②然而，罗斯表示反对，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措辞“不合适”且不真实——他与王尔德会面时没有带着服装和香料，更不用说什么明智的建议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正如他对史密瑟斯所说，既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甚至连名字的首字母也没有提到），“无论对错，每个人都会认为这个人指的是波西·道格拉斯。这将损害这首诗的声誉，并且让反对的人一打开书就产生偏见”。事实上，罗斯在一定程度上怀疑，王尔德这样写献辞是为了“故意告诉我、道格拉斯和其他两三个人，这段话对每个人都有所指”。^③

这本书的市场形势一直不甚明朗。作者和出版商之间就第一版的数量和定价存在很多争论，前者倾向于乐观，后者建议谨慎行事。王尔德反对史密瑟斯早期提出的“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发行600册”，“如果事情进展顺利，肯定会按那个价格售出1500册。如果与此相反，可能卖出500册，那么每本的价格应该是5先令”。^④王尔德满脑子都是钱。

随着秋天的临近，日复一日对于“生计”的焦虑正在慢慢地影响着朱迪切别墅里的气氛。道格拉斯确信王尔德能像过去一样，靠写剧本赚到一大笔钱，但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进展如此缓慢。他对王尔德未

能创作出一部商业化的戏剧感到闷闷不乐和愤愤然。他不习惯过穷日子。当本地的商人开始登门要求偿还小额债务时，道格拉斯“崩溃了”。^①他们期望中田园诗一般的家庭幸福和创作力日渐消退。王尔德和道格拉斯对自己的困境越来越不满，但两人都不准备向对方坦白心事。他们为了重聚，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要是承认这种生活不够理想就会过于痛苦，让人想都不愿意去想。然而，一个巨大的情感事实是不可忽视的，即使它一直没有被说出来：他们的旧爱无法重新点燃。

道格拉斯至少自己承认道：“我已经失去了过去那种想要跟他（王尔德）相处的强烈愿望，过去当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会留下一
种痛苦的空虚。”^②但这种想法只会让他觉得更加无法放弃王尔德。这样做是不名誉的：他需要一个借口。他企图挑起一场危机。用他的话说就是，“吵了好几次架”。^③他开始摔东西。^④王尔德回忆在一场可怕的争吵中，当时道格拉斯因为没付洗衣费账单而被人“讨债”，心里很不好受，于是使用尖酸刻薄的语气对王尔德进行怒斥和“鞭挞”：“这太可怕了。”^⑤但王尔德——别无选择，精神疲惫，天生不愿意和人对抗——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意愿上当生气。“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变成恨，”他后来告诉弗兰克·哈里斯，“爱情之酒的力量使苦味变得更具毒性。”他似乎只爆发过一次。波西质问他，“人人都杀心爱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毫无感情地回答说：“你应该知道。”^⑥

王尔德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减少，11月16日，长久以来令人恐惧的“晴天霹雳”终于来了：汉塞尔来信通知他，因为他和道格拉斯住在一起，康斯坦斯将不再向他提供津贴。他谴责这一决定：“说我因和他在一起造成了‘社会丑闻’，这是不公正的……我的存在就是一桩丑闻。但是，我不认为我应当为继续活着引起丑闻而受到指责，虽然我明白，我确实在这样做。”他指责汉塞尔——毕竟汉塞尔是他自己的律师，而不是康斯坦斯的律师——认为道格拉斯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毕竟，他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他指责罗斯和阿迪没有反对汉塞尔的观点：“我不否认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是一个声名狼藉的纨绔子弟，但我的确反对在法律文书中将他不恰当地描述成一个不名誉的人。”^⑩他怒斥全世界：“我希望你能创办一个保护被压迫者协会，”他告诉史密瑟斯，“眼下一个以残暴的人和律师为首的欧洲世俗联盟正在迫害我们。”^⑪

然而，他几乎无能为力。各种力量正集结起来对付他们。道格拉斯收到了哥哥的一封信，敦促他与王尔德分手（“你已经有了你的观点，证明了你们不会受人干涉”）。^⑫接下来是昆斯伯里夫人的来信，她称，如果道格拉斯继续和王尔德住在一起，将停止向他提供津贴。^⑬王尔德怀疑，如果道格拉斯搬出朱迪切别墅，他们不再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这样也许可以满足各方势力，让他们恢复各自的津贴：“说我永远不会再见到（波西）或跟他说话，那当然是幼稚的——是不可能的。”^⑭但没有人支持这个观点。很明显，他们将“被迫在这个问题上妥协……至少目前要分开”。^⑮对于王尔德和道格拉

斯来说，这或许让他们各自松了一口气：他们谁都不必为这次结束承担责任。

当然，道格拉斯声称他最终“感觉到并看到”王尔德并不是真的希望他留下，“而且如果我离开，他真的会松一口气”。即便如此，他也觉得不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抛弃眼下没有经济来源的王尔德。他说服母亲，道格拉斯家族因为王尔德与昆斯伯里的官司至少欠下了500英镑的“信用债务”，除非她想办法支付其中的一部分，否则他不会离开那不勒斯。昆斯伯里夫人承诺，在收到王尔德和波西今后永不在一起生活的书面保证后，将会支付200英镑——保证书很快就完成了。⑩她还立即向皇家外宾酒店支付了68英镑的账单。这笔账结清后，波西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动身前往罗马，用他自己的话说“问心无愧”。

他坚持对母亲说，他仍然爱着王尔德并钦佩他：“我把他看成是进步的殉道者。我每件事都和他联系在一起。我渴望听到他获得成功，在艺术上获得康复……登上英国文学的巅峰。”他表示打算偶尔给他写信，“在巴黎或其他地方”见见他。但他承认，那不勒斯的经历是一种磨炼，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我没有回到他身边，和他一起生活两个月，我永远也摆脱不了对他的渴望。它毁了我的生活，毁了我的艺术，毁了我的一切。现在我自由了。”⑪

王尔德也自由了，独自留在波西利波“试图从事文学创作”。⑫至少，在《雷丁监狱之歌》即将出版之际，最后一刻出现的一堆编辑问题占据了他的注意力。印刷者（“愚蠢的”奇斯威克出版社）开始

担心，对监狱医生、牧师和典狱长的描述——在诗中被描述为满嘴脏话、不停颤抖和脸色蜡黄——也许会被当作诽谤。他们需要得到保证，这些描绘是一般性的，并非具体有所指。❶而王尔德自己也突然对开头高调描述骑兵伍尔德里奇的文字产生了怀疑：“他没穿他那件猩红上衣，/因为血和酒都是红色的。”伍尔德里奇所在的皇家近卫骑兵旅——以“蓝调”而闻名。王尔德想知道，他们真的穿蓝色制服吗？“如果他们确实穿蓝色军服的话，我也无法改动我的诗，”他告诉史密瑟斯，“对我来说，他的制服就是红色的。”❷他同时也承认，最好是等到新年再推出这本书。他说：“我可算不上是一份圣诞礼物。”❸

在这些讨论和决定的过程中，王尔德再也没有得到罗比·罗斯的理解支持。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不幸的争吵（由道格拉斯挑起），起因是罗斯不支持出售这首诗的连载权。❹罗斯曾经写信给史密瑟斯，声称他觉得王尔德在“商业事务上不再信任”自己，所以不想再沾惹他的事情。王尔德立刻悔过了，乞求罗斯原谅，并告诉史密瑟斯，如果罗斯“能惠寄一双他最旧的靴子，我也会乐于把它们上油擦亮，并附一首十四行诗将它们回奉给他”。❺然而，罗斯并没有立刻回心转意。

4 痛苦的经历

我有一个重大发现.....酒精，如果摄入足够的量，就会产生各种陶醉的效果。

——奥斯卡·王尔德

悔悟的十四行诗一直没有写出来，可悲的是，王尔德的其他文学计划也一样。他独自一人待在波西利波的别墅里，努力集中精力。原本希望诗歌创作完成后就“转向戏剧”，事实证明这个设想其实是徒劳。早在道格拉斯离开之前，两人合作共写《达芙妮和克罗埃》脚本就已经失败了；他一走，这个项目随即烟消云散。他曾经多次尝试动笔创作“现代社会喜剧”。也许是希望促使自己行动起来，他甚至要求史密瑟斯重新接触奥古斯丁·戴利，以确保美国人的权利。①

但王尔德意识到，这其中存在着某种一意孤行，自相矛盾的东西。两年的牢狱经历和六个月的流亡生活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幽默感。“我猜想它全部都在我心中的某个地方，”他告诉特纳，“但我似乎无法感觉到它。我的幽默感现在只集中在风格奇异的悲剧上。”

②他没有让自己去接受这个考验。我们不知道戴利是否收到过他的提议；当然他从来也没有回复过。而王尔德坚持要写悲剧，反而尝试着创作《法老》和《佛罗伦萨悲剧》。然而，这些稍显温和的主题也同样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承认道：“我现在发现，构建艺术是件困难的事情。”③就连他最近发明的刺激文学创作的秘方——“读十多

页”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吃“两三颗哈希什^①”——也没能发挥魔力。^②

在不那么正式的约束下，他确实保留了旧日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创造天赋。他的信件和谈话充满了荒诞的幻想。他想象着为史密瑟斯写一本关于赫利奥加巴卢斯生平的书，他在国家博物馆参观过这位风流皇帝的半身像——“就像一个年轻的牛津人，非常迷人，表情既傲慢，又倦怠”。他认为，《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提到的皇帝“与月亮结婚”这件事，可以构成一篇珠光宝气的文字。但是，至少就目前而言，他无法坚持不懈地把这些想法写下来。^③

在没有新作品的情况下，王尔德注意到了他现有的全部作品。他继续策划在意大利扩大自己的名声。当罗科圈子里的一位年轻诗人，不到20岁的比亚吉奥·基亚拉表示想翻译《道林·格雷的画像》时，王尔德迅速想办法给他寄了一本。^④他努力重新燃起人们对《莎乐美》的兴趣，把该剧的意大利语译本寄给了演员兼经纪人切萨雷·罗西，后者包下了佛罗伦萨剧院的秋季演出。罗西对剧本感到“震惊”，但遗憾的是，他的剧团里“没有能够演这个角色的女演员”。^⑤只有埃莱奥诺拉·杜塞能够演这个角色。她于12月初来到那不勒斯，王尔德观看了她短短的演出季中所有的晚场演出。^⑥他认为她“是一位迷人的艺术家”，虽然“她根本没法同莎拉（伯恩哈特）相比”。^⑦他通过朋友寄给她一份剧本，恳求她考虑一下。^⑧她当然对这个角色很感兴趣，在她看来，若非“作者的坏名声”导致此举不可行的话，她可能真的会扮演这个角色。周围的演员也支持她这种可悲的传统观念。^⑨

杜塞12月14日离开那不勒斯，短期内上演意大利语版《莎乐美》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❶

艺术上取得进步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王尔德只能从自怜中寻求更直接的安慰。“我的生活无法修补，”他告诉史密瑟斯，“这是命中注定的。我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不再有快乐可言。我现在只是一个非常低等的普通贫民，在德国科学家眼里我还是一个病理学问题，但这只有德国科学家才感兴趣，甚至在他们的工作报告中，我也只是被列入表格中，归类于平均率！Quantum Mutates！❷”❸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对道格拉斯的不满情绪——并不是因为他扬长而去（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因为他在那不勒斯的所作所为——开始滋长起来，痛苦的往事从记忆中冒出来，翻来覆去挥之不去。一切似乎都在和他作对。

他渴望将这一时刻戏剧化，用他的话说，就是把痛苦之酒倒入渣土。一天晚上，他甚至去了那不勒斯人自杀时最喜欢去的公园。然而，当他独自坐在黑暗中，突然听到四周有“云雾般的东西”伴随着沙沙声和叹息声向他袭来。他断定，那些自杀者的灵魂非但没有得到安息，反而遭到诅咒要永远滞留在这个地方。这足以让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且不说别的，一想到死后要在那不勒斯度过一生，他就受不了：如他所说，那里的饭菜实在太糟糕了。❹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让他选择活下去。“虚荣，那种巨大的冲动”仍然驱使着他“去思考一个可能的自信的未来”：他想看到《雷丁监狱之歌》顺利出版。惰性，也阻碍了他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步骤。

昆斯伯里夫人可能会给他寄来200英镑。12月中旬，文森特·奥沙利文途经那不勒斯时，发现王尔德每天都生活在对金钱的期盼中。奥沙利文怀疑，他这位朋友的一连串抱怨中有强烈的戏剧性成分。⑩让他感到发笑而非惊诧的是，两人在餐馆共进晚餐时，一个当地的“女巫”（很可能就是灭老鼠的那个人）突然停下来从窗户往里瞧，王尔德顿时不安起来：“你看见了吗？”他问，“我们将遭遇重大的不幸。”⑪

尽管如此，奥沙利文还是很遗憾地意识到，王尔德已经丧失了他精神上的某种至关重要的灵活性。尤其让奥沙利文看清这一点的是，一天晚上，他们在一家餐厅坐到很晚，一群看剧散场的人认出了王尔德，把他弄得异常不安。尽管他们的做法似乎更多是出于好奇而不是恶意，但王尔德还是痛苦地逃离了餐厅。“我们默默地走了一小段路，”奥沙利文回忆，“一个一直蹲在门口的可怜的那不勒斯乞丐，站起身子伸出手。王尔德给了他一些钱，我听见他用英语喃喃地说：‘你这个可怜的人，怜悯已死，为什么还要乞讨？’”⑫

昆斯伯里夫人的第一笔100英镑（通过莫尔·阿迪）寄到了，它也许无法改变王尔德沮丧的情绪，但它可能带来新的排解方式——更疯狂的音乐和更浓烈的酒。罗比·罗斯肯定地说，正是在那不勒斯，也许就是在此时，王尔德怀着一种新的、坚定的决心开始喝酒。⑬他可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醉酒迹象，但不快乐的感觉已经迟钝了。性也是一种现成的消遣，而且价格很便宜。

那年12月，一位名叫威尔弗里德·布莱兹（贝伦森夫妇的朋友）的年轻朋友发现，王尔德的处境很糟糕：“目前，他觉得每个人都在反对他，他的意志彻底消沉，尽其所能地直奔魔鬼而去。眼下他手头有足够的钱（他主要用来自暴自弃）。”^① 布莱兹也许并不知道这些钱来自昆斯伯里夫人，而且他被王尔德的赫利奥加巴卢斯的故事所吸引，因此布莱兹怀疑——似乎没有根据——王尔德是在“为史密瑟斯写淫秽小说赚钱”。^② 尽管王尔德表达了想“振作起来”的愿望，但布莱兹担心他“和流氓混在一起”，要振作起来会“觉得很困难”。^③ 王尔德需要精神上的支持。于是布莱兹敦促贝伦森一家给王尔德写信，并且让其他以前的朋友也这样做，因为——布莱兹相信——王尔德“非常容易受人影响”。^④ 目前尚不清楚贝伦森或其他朋友是否写过这些信。而且更难确定的是，他们的信是否送到了王尔德手里。

王尔德没有独自在那不勒斯过一个悲伤的圣诞节，而是起程前往西西里，布莱兹形容那是一次“愚蠢的陶尔米纳之旅”。^⑤ 他此行是去拜访一位“非常有教养”的俄罗斯长者，此人很可能是他的一个“无赖”新伙伴。^⑥ 在陶尔米纳，王尔德住在翁贝托大道上的维多利亚酒店，他参观了弗洛伦斯·特里威廉建造的花园。小镇上住着几个与英国伪道学决裂的流亡者，她是其中之一。（她原是一名侍女，因据传与威尔士亲王有染，被迫离开英国。）^⑦ 王尔德还结识了年轻的亲俄分子阿尔伯特·斯托福德，后者于1894年逃离伦敦，以逃避因严重猥亵罪被逮捕。^⑧ 但这里最吸引人的似乎是威廉·冯·格鲁登伯爵的画室。这位41岁的德国人长期定居在陶尔米纳，他因为替西西里青年拍一些模仿西方古典作品的照片而小有名气，照相者会摆出（通常是

裸体) 农牧之神和牧童的姿势。王尔德至少获得了其中两张引人注目的同性恋照片,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他甚至帮这些 “了不起的男孩子” 摆了姿势。❶

尽管王尔德在西西里有意气相投的伙伴——以及性机会——但新年刚过, 他便回到了那不勒斯。他回来发现, 所有的衣服和一些财物都被留下来照看别墅的仆人偷走了。他的不幸遭遇随后因一场流行性感冒而越发加重。这是1898年一个悲伤的开始。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孤独, 再加上 “对生活悲喜剧的总体厌倦”, 他决定离开朱迪切别墅 (虽然租金付到了月底) 搬回城里。他在圣卢西亚路31号租了个住处, 那里离时尚中心很近。

美国传来了《雷丁监狱之歌》令人失望的消息, 马布里小姐称 “这里似乎没有人对这首诗感兴趣”。不过, 她还是设法从《纽约杂志》拿到了区区100美元 (约合20英镑)。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❷除了这一挫折, 真正令人兴奋的是, 史密瑟斯寄来了第一本样书。王尔德被它优雅的外表 “完全陶醉了”。他说, 这本书的扉页是 “一个杰作——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之一”。❸史密瑟斯也很兴奋。最初他只订购了400本, 也许是在罗斯的鼓励下, 他把印刷量增加了一倍。除了这800本外 (定价为2先令6便士), 他还制作了30本日本皮纸的特别版, 定价为1畿尼。王尔德开始起草一份赠书名单: 除了他的各种文学和艺术朋友 (道森、比尔博姆、文森特·奥沙利文、艾达·莱弗森等), 还包括纳尔逊少校和狱吏格罗夫斯。❹

赠书虽然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也肯定让他倍感孤独——他已经远离了自己如此珍爱的知识圈和社交圈子。虽然他有了一个新的“美丽情人”，但他不得不自认（以及向伦纳德·史密瑟斯坦承）已经渐渐“厌倦了希腊的青铜雕像”。^①他渴望的是陪伴和交谈。在那不勒斯，他必须去合适的地方寻找它们。他从众多毫无怀疑的游客中亲切地邀请到两位英国教师（其中一位是格雷厄姆·格林的父亲）：王尔德和他们一起坐在咖啡桌旁，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令他们相当愉快，然后他离开，留下他们为他的饮料埋单。正如老格林晚年所说，这表明王尔德一定很孤独，因此他才愿意在两个度假的学校教师身上花费那么多时间和智慧。^②

显然，王尔德无法独自一人在那不勒斯工作。“我在这儿的生活已经彻底毁了，”他告诉史密瑟斯，“我现在既无思想，也无力量。”^③2月初，他已决定前往巴黎。就像布莱兹建议的那样，对他来说，巴黎是一个“更好”的地方。他会离英国朋友们更近，会得到智力上的刺激和友谊，还有工作的机会。“我希望，”王尔德在离开之前称，“能在巴黎振作起来。”^④

第十一部分 智慧的教师

1898～1900年

44～46岁



奥斯卡·王尔德在罗马，1900年

1 巴黎的快乐圣殿

只有在那里，人类的一切缺点才能获得绝对的宽容，人类的一切美德和能力才能受到激情的艳羡。

——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于1898年2月中旬抵达巴黎，住在左岸美术街廉价的尼斯旅馆。这个时机似乎正当其时，时逢《雷丁监狱之歌》在伦敦出版。该书立即大获成功。史密瑟斯事先在《雅典娜神庙》杂志的热门版面上为其出版刊登了广告。①2月13日——正式出版当天——《雷诺兹报》为庆贺该书出版，刊登了一篇表达赞赏的长文，文中大段引用了书中的内容。他们利用从连载版权谈判中收集到的内幕消息，一开始就破解了所谓匿名“C.3.3”的底细。文章标题为“奥斯卡·王尔德的新诗”，作者认为，“人们将会怀着巨大的兴趣去阅读”这首高度“戏剧性”的诗歌，“不仅为它的艺术价值，还因为它能让人感受到一位非凡人物的自我袒露；无论他犯了什么罪，他都以尊严和自我克制承担了惩罚”。②另一份报纸《星期日特别报》宣称：“自从《古舟子咏》首次出版以来，英国公众还从未听到过如此离奇、迷人、娴熟的叙事。”③

星期一早上，这本书卖得红红火火。据报道，有家书店一下子就卖出了50本。全部印本几天之内就卖光了，第二版的1000本正在筹备中，“下周就能准备妥当”。这首诗通过“对监狱生活极其生动而现实的描述”，展现了摄人心魄、新颖独特的内容。它引发了争议：小

说家林恩·林顿夫人认为王尔德对这个主题的处理“一如既往地扭曲……为犯罪找借口，同情罪犯，但不同情受害者”；^⑩而“迈克尔·菲尔德”却在他们的日记中向诗歌里“不朽而荒谬”的核心内容——“我们必须杀死我们所爱的东西”——致以敬意；他们认为“奥斯卡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创造这个令人兴奋的怪物”。^⑪

这本书即便没有受到普遍关注，但《每日纪事报》《每日电讯报》以及《回声报》《呐喊》等小有名气的出版物上都有评论见报。罗斯与王尔德重归于好，寄去了一沓剪报。^⑫《帕尔摩报》称赞这本书是“今年以来面世的最杰出的诗歌”——尽管必须承认，当时才2月。阿瑟·西蒙兹在《星期六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敏锐而慷慨的评论，而W.E.亨利（也许是因为西蒙兹将这首诗歌与亨利自己最近出版的自由体诗歌《在医院》相比较，亨利心有不快）则在《视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既不慷慨，也不敏锐的评价文章。^⑬对王尔德来说，《雷丁监狱之歌》标志着艺术的胜利回归。尽管《每日纪事报》似乎只是把这首诗当作“关于监狱改革的小册子”，这让他有一点点失望，但西蒙兹的评论让人难忘，也让他“深受感动”。^⑭他刻意忽略了亨利的评价，并告诉史密瑟斯：“他只是嫉妒罢了。他把自己的淋巴结核病写成了诗集，却因为我‘薄麦片粥’写成十四行诗而大发雷霆。”

⑩

他也很喜欢朋友们的热情赞扬，比如罗森斯坦和劳伦斯·豪斯曼。^⑮他收到了坎宁汉·格雷厄姆寄来的“一封充满魅力的信”，还有一封来自伯纳德·贝伦森的信（他说，“自这首诗问世以来，没有任何东西

能像你的信那样给予我更多的愉悦和骄傲”)。❶他从罗斯那里确凿得知，埃德蒙·高斯很欣赏这首诗，纳尔逊少校也认为这首诗的某些段落的确“非常好”。也许，他还听说康斯坦斯觉得它“精美绝伦”，伯恩·琼斯也“认为它很棒”。❷有报道称，爱德华·克拉克爵士买了“十几本”。❸王尔德沉浸在兴奋之中，几乎每天都要列出一堆获得赠书者的名单——“那些一直关怀我的人”。❹

这本书势头正猛，必须让它保持下去。尽管王尔德开玩笑说，史密瑟斯太习惯于销售“禁书”，以至于抑制了自己的书，但事实上，出版商应对得相当好。在王尔德的催促下，他在3月初发行了一个特别的“作者版”，封面由里基茨设计；这99本书每本都有编号和签名，售价半畿尼。之后，普通版又加印了三次，到5月底，总印数达到了5000本。对于一本诗集来说，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❺这部诗歌无疑是王尔德最成功的作品。

为了加强这首诗的话题性，王尔德（署名为“《雷丁监狱之歌》的作者”）给《每日纪事报》写了一封长信，充满激情地讨论了刑事改革的必要性。它于政府的监狱法案进行二读前夕见报。而且，令人满意的是，在辩论过程中，至少有两名议员引用了《雷丁监狱之歌》中的内容。❻开局成功之后，王尔德和史密瑟斯开始兴奋地筹划让W.H.史密斯推出廉价的“6便士”版本，王尔德表示，他希望“这首诗进入贫困阶层”，或者还可以随书赠送一块“五朔节花柱肥皂”：“我听说它可以染出各种可爱的颜色，并且能用来洗净。”然

而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没有成功。❶王尔德试图在美国推出这首诗的袖珍本，但这个希望也落空了。❷

不过，这本书在巴黎很受欢迎。王尔德沾沾自喜地称，诗歌“能给人公民权(droit de cité)”。他赠书给那些曾经在自己入狱期间给予支持的人：亨利·鲍尔、奥克塔夫·米尔博，等等。❸但在王尔德被囚禁的这些年里，巴黎文学界的格局发生了改变。龚古尔和魏尔伦都已经去世。马拉梅境况不佳；他已经放弃了他的《星期二》，并于当年9月去世。那些曾经在19世纪90年代初热切地聚集在王尔德身边的年轻作家，如今并不热衷于再续前缘。尽管保罗·瓦莱里或许在写给皮埃尔·路易斯的信中满腔热情地提到过《雷丁监狱之歌》（称监狱显然“对诗人极好”），但丝毫没有表露出想要与昔日朋友重归于好的迹象。❹施沃布和雷泰也是一副漠然的样子。亨利·德雷尼耶拒绝和他扯上任何关系，尽管当两人在街上擦肩而过时，是王尔德转过身去。德雷尼耶不以为然地注意到，王尔德身上穿着过于显眼的黄色格子西装，还有他的“漆皮鞋”。❺

相比之下别的人则要更热情一些。斯图尔特·梅里尔找到了他。进步杂志纷纷对这首诗歌表示热烈欢迎。《白色评论》上刊登了一篇“绝好的评论”，还寄来一封编辑费利克斯·费内翁的邀请信，请他去报社和大家见面。王尔德还与“颇有艺术气息的评论刊物”《隐居生活》的编辑共进了晚餐；❻年轻诗人亨利·达夫雷曾经在王尔德获释时给他寄去书籍和慰问信，他自告奋勇要将《雷丁监狱之歌》译成法文。王尔德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向他提供了帮助，因为他指出，达

夫雷从没有进过监狱，可能对其中的用词感到困惑。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两人共同合作致力于这件事情。最初，王尔德希望史密瑟斯能在伦敦出版这本书的双语版，最终译文于当年5月刊登在《法国信使报》上。❶它的出版进一步稳固了王尔德在巴黎的地位。罗斯认为它“很出色”，而法语版则是“如此不同于原作，以至于让人有读到一首新诗的感觉”。❷同年早些时候，该译本以图书的形式重新发行——以《法国信使报》的名义发行——与英文版同时发行。

王尔德获得的尊重还不止这些：奥德翁戏院举办了一次文学日场，朗诵了一些王尔德的“散文诗作品”（法文版）。❸人们回想起当年《莎乐美》大获成功的情形，对王尔德的未来戏剧项目产生了兴趣。他作为导演的客人，至少在实验性的免费剧场观看了一次演出，并受到梅特林克和他的情妇、歌剧演唱家若尔热特·勒布朗的邀请，与他们共进晚餐。❹

尽管受到追捧和关注，王尔德还是意识到，在法国首都，人们真正感兴趣的事物已经不再是艺术和文学。1898年初，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都随着德雷福斯事件的不断发酵被弄得四分五裂。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是一名为法国军事情报部门服务的犹太军官，1894年12月，他因受指控为德国人从事间谍活动，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关押在法属圭亚那的流放地魔鬼岛。但人们一直怀疑他是否有罪。一名军方调查人员仔细审阅了关键证据上的笔迹——一份截获的、传递敏感军事信息的清单——（相当正确地）确信这封信根本不是德雷福斯所写，而是出自另一名心怀不满的法国军官费迪南·埃斯特

哈齐少校之手。尽管军方不愿意接受（或分享）这些发现，但这些信息于1897年底被公开，引发了争议和抗议的风暴。德雷福斯的有罪或无罪可能只是表面上的争议，事实上这起事件为长期存在的政治和宗教仇恨提供了一个焦点。反德雷福斯派，除了对现有体制的尊重之外，还受到了反犹太主义的推动。他们的对手，支持德雷福斯派则往往是反教权、反军国主义的知识分子。埃米尔·左拉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之一。1898年1月，一个闭门军事法庭宣告埃斯特哈齐无罪，小说家发文愤怒地谴责这种对正义的嘲弄。左拉的文章——标题为《我控诉》——不但提高了该事件的热度，也将他送上了法庭，被控诽谤政府当局。

王尔德到巴黎时虽然对这一事件并无特别的兴趣，却意外地发现自己被这一事件所吸引。记者罗兰·斯特朗是他在巴黎的侨民朋友，也是《观察家报》《晨报》和《纽约时报》的通讯员。斯特朗是个名声不佳的红发酒鬼，自称是夏多布里昂的后代，是一个激烈的反德雷福斯派（和反犹太主义者），并且利用记者身份宣扬这两种偏见。他最近结识了埃斯特哈齐，并把自己当作其朋友和捍卫者。他在圣奥诺雷街一个酒吧聚会上，将王尔德介绍给“指挥官”认识。斯特朗的秘书，年轻的爱尔兰“诗人”克里斯·希利当时也在场，他回忆，王尔德用完美的法语“滔滔不绝地讲着他最欢快的俏皮话”，让那个苦涩、狡黠、留着黑胡子的埃斯特哈齐感到既困惑，又钦佩。❶

阵线的另一边是卡洛斯·布莱克，他和妻子凯莉稍早于王尔德来到巴黎。得知王尔德与道格拉斯决裂后，布莱克如释重负，并在康斯坦

斯的怂恿之下，找到了他的老伙伴。3月13日下午4点，他们在王尔德简朴的旅馆房间里会面，令人激动不已，重新点燃了友谊。在一下午兴奋的谈话中，布莱克透露，他自从抵达巴黎之后，就深切关注着德雷福斯事件，并深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他碰巧是意大利军方驻巴黎武官亚历山德罗·帕尼扎尔迪的亲密老友，从中独一无二地接触到了案件的全部秘密细节。其中有两点引人瞩目：埃斯特哈齐确实是个叛徒，曾经向德国武官冯·施瓦茨科彭上校出售敏感材料（约200份文件）；为掩盖这个行为，一名法国情报官员（亨利中校）伪造了一封据称是帕尼扎尔迪写给施瓦茨科彭的信，内容牵连到德雷福斯。布莱克忘乎所以地向王尔德透露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还透露了一个事实：帕尼扎尔迪拥有埃斯特哈齐写给施瓦茨科彭的一些信件的摹本，他打算匿名寄给英国媒体。

王尔德很喜欢这个故事。几天后，当他发现自己和埃斯特哈齐在一起吃饭时，更平添了一种兴奋感。王尔德告诉布莱克：“这位指挥官令人惊讶。我以后会告诉你，他所说的话。当然他翻来覆去谈的只是德雷福斯案件。”^②然而，一向行事鲁莽的王尔德却忍不住把从布莱克那里得到的内幕消息告诉了他的酒友斯特朗和希利。两人被这个消息震撼了，并立即将之物尽其用——尽管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希利私下里对德雷福斯持同情的态度，他直接找到埃米尔·左拉。他和他的同事以这些信息为基础，在4月4日的《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文章，重申了埃斯特哈齐的背叛行为，并声称军方为佐证德雷福斯的罪行伪造了文件。与此同时，斯特朗则试图提前削弱布莱克揭露

真相的力量，他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提到埃斯特哈齐谴责任何败坏他人名誉的所谓复制品都是伪造的。❷

在令人焦虑的德雷福斯事件时期，没有任何主张是无可辩驳的，没有任何胜利是万无一失的，也没有任何事情是一蹴而就的，然而王尔德轻轻松松地（通过希利）传递给左拉的信息，却被视为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它给德雷福斯派们提供了主动权，让他们走上了最终胜利的道路。❸然而短时间内，这导致了反德雷福斯者们纷纷将怒气发泄在可怜的卡洛斯·布莱克身上。斯特朗在他的文章中称，布莱克是这些信息的源头；许多人猜测他就是《世纪》杂志上那篇文章的作者。布莱克记录道：“然后我的麻烦开始了。”他在有倾向性的媒体上受到攻击，在大街上受到侮辱。他甚至还遭到了警察的监视。❹他理所当然地对王尔德感到相当愤怒，是王尔德将他置于这种为难的境地——而且还破坏了他和帕尼扎尔迪的计划，他们原本打算以一种更有控制的方式揭露这桩事情。❺

然而，王尔德对布莱克的痛苦并不在意。他还拒绝了左拉的邀请，不愿意一起讨论这起事件——他将其视为“三流的福楼拜”，“毫无艺术性可言，经常令人恶心”（他可能发现了，在他遭到监禁期间，左拉曾经拒绝在法国作家们的请愿书上签字）。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王尔德确实继续与日益焦虑、偏执的埃斯特哈齐见面。他有点喜欢和倒霉蛋在一起。一次吃晚饭时，埃斯特哈齐说：“我们是人类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烈士。”然后停顿了一下，又说：“但我遭受的苦难更多。”❼王尔德毫不犹豫地反驳道：“不，

遭受苦难更多的是我。” ① 当亨利·达夫雷规劝王尔德不要与这样的人为伍时，他回答道，自从出狱后，他就不得不与“小偷和刺客”为伍。此外，有罪的人往往比无罪的人更有趣：无罪只需被人冤枉；成为一名罪犯需要想象力和勇气。王尔德声称，如果埃斯特哈齐是无辜的，“我就不会和他有任何关系”。 ②

尽管王尔德（根据谢拉德的说法）本质上同情德雷福斯，但由于这起事件的核心问题是巨大的不公正，他只是拒绝参与其中。当被问及对事件的想法时，他变得油嘴滑舌起来，称：“左拉根据德雷福斯的口述写了备忘录，埃斯特哈齐把它拿到德国使馆，卖了15法郎。”

③ 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在不涉及文学的时候，他的思想更多指向的是性、爱情、金钱和死亡这些永恒的问题。

失意的时候，“爱情，或者带着爱情面具的激情”成为他“唯一的安慰”。王尔德作为一名“同性之爱”的传播者和倡导者回到法国首都。人们原本以为他的“疯病”可能会在狱中获得“治愈”，但在那不勒斯的时候，这种想法就已经被摈弃，如今再也没人提起。他现在公然宣称——并且纵容——他的同性恋品味。他的格言是：“一个因为爱国被关进监狱的人还是爱国，一个因为喜爱男孩而被关进监狱的诗人也依然喜爱男孩。”他对罗斯说，改变自己的生活，“就等于承认同性之间的爱情是可耻的。我认为它是崇高的——比其他形式的爱更崇高”。他赞同乔治·艾夫斯对“事业”的看法：“我毫不怀疑我们将获得胜利，”他让艾夫斯确信，“但道路还很长，而且它被无数殉道者的鲜血染红。” ④

然而，王尔德的性取向与艾夫斯和“喀罗尼亚会”所推崇的知识分子同性恋新文化理想截然不同。他想要的那种“同性之爱”是与年轻的工人阶级男性之间随心所欲的、可以买卖的性爱。“花钱去购买爱是多么堕落，”他感叹，“出卖爱又是多么邪恶！然而，从那种我们称之为‘时间’的缓慢移动的阴郁事物中，你又能攫住怎样的绚烂时光！”^①对王尔德来说，“激情的本质”是“交换”。^②在巴黎，他摆脱了《刑法修正案》的袭扰，交换的机会数不胜数。在王尔德与罗斯和特纳的通信中，时常有年轻“搭讪者”的名字点缀其中：利昂是他“沐浴着月光在小街上漫步时”邂逅的；马里于斯（他易患感冒）抑或乔治是在茹弗鲁瓦餐厅打工的“一个极富激情的农牧之神”。^③

然而，王尔德对年轻的海军步兵莫里斯·吉尔伯特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爱慕之情。他在大街上被莫里斯·吉尔伯特的眼睛及其优美的外表打动（“他看起来像初次执政的拿破仑，只是没那么专横，更漂亮一些”）。一辆作为礼物的自行车奠定了他们的友谊。王尔德告诉弗兰克·哈里斯，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渴望的”；“他提到了镀镍的把手和链条”。^④他花费大量的时间用来玩纸牌，在牌桌上冲昏了头脑。“莫里斯赢了25盘牌戏……我赢了24盘，”他告诉史密瑟斯，“不过，他拥有青春，而我只有天才，所以他击败我是再自然不过。”虽然最初是激情使然，但这段关系也有理智的一面。王尔德很快就借书给莫里斯，欣慰地看到他的思想“像花朵一样一周又一周渐次绽放”。^⑤

王尔德需要更多的钱，用来追求莫里斯·吉尔伯特。虽然很难相信他已经花光了昆斯伯里夫人给他的200英镑，但他似乎就是因为缺钱才来到巴黎的。尽管《雷丁监狱之歌》比较成功，但他并没有立即收到版税。毕竟，根据他自己的估计，“每一本只有3便士”，而且他已经拿到30英镑的预付款。①他转而向朋友们求助。他刚刚重新联系上卡洛斯·布莱克，就开始小笔借钱，以应付迫在眉睫的需求。②

然而，布莱克很快发现，王尔德并非像他自称的那样一穷二白。康斯坦斯一听说他和道格拉斯分居，就把零用钱还给了他。她通过罗斯把钱寄给他，这样他就可以细水长流地每月给王尔德10英镑。“如果（奥斯卡）手里有很多钱，”她对布莱克夫妇解释说，“他会无所事事，喝得烂醉如泥。”③王尔德痛苦地抱怨，非但每月的津贴数额减少了，而且康斯坦斯还不打算支付之前三个月的“欠款”。为了节省开支，他从尼斯旅馆搬到了邻近的阿尔萨斯旅馆——“条件好得多，而且价格减半。”④他对罗斯哀叹道：“我必须设法制订某种贫穷计划，去找一家每月只需花费80法郎的餐馆，那儿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一天两顿——所以我也要在那里接受救济。”⑤然而，康斯坦斯对这样的示威并不以为然。她警告布莱克，不要再和王尔德的财务问题扯上任何关系，并尖刻地说：“奥斯卡是如此可悲，简直就是个天生的演员。”⑥她说，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和他一起生活，照顾他”。⑦

这是她关于丈夫的最后评论之一。4月7日，康斯坦斯在热那亚的一家诊所去世，五天前她又一次接受了旨在解决匍行性麻痹的手术。

医学上对死亡的确切原因意见不一；她的儿子维维安一直认为她死于过度悲伤绝望。❶王尔德听闻这个消息悲痛欲绝。尽管他自称，在康斯坦斯去世的那天晚上，他曾做过一些关于她的令人不安的梦，但这个消息还是让他倍感震惊。❷他接连发电报给罗斯和布莱克，表示他“非常悲痛”，并请求和他们见一面。布莱克立刻来了。罗斯从英国匆匆赶来，不过等他赶到的时候，王尔德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他心情很好，没有吃太多。”罗斯如此告诉史密瑟斯。尽管王尔德可能会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甚至在思绪中反复重温它），但他仍然无法理解自己一直以来对妻子是多么的“残忍”。他眼下忧虑的似乎在于，他的津贴可能会随着康斯坦斯的离去而终止。但在这一点上，他很快就打消了顾虑。❸

她的离世结束了他生命中的一个篇章。它也消除了他在可预见的将来，再次见到孩子们的一切可能性。他们现在由康斯坦斯的表亲阿德里安·霍普监护。王尔德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种剥夺，至少在某些情绪和某些时刻是这样的。一个法国小男孩和母亲在王尔德吃饭的那家简朴的餐馆用餐，当他们问起，他是否有自己的儿子时，他的眼里溢满泪水。“我有两个，”他用法语回答，“但他们没跟着我来这儿，因为他们离这儿太远了。”他把孩子拉过来，吻了吻他的双颊，低声说（用英语）：“哦，我可怜的孩子。”❹

康斯坦斯的离去并不是那个春天唯一的死亡暗示。三周前，比尔兹利在芒通去世，年仅25岁。尽管他们性格迥异，王尔德一直对这位年轻的艺术家的赞叹有加。他在给史密瑟斯的信中写道：“他灵魂的洞

穴中总是藏有巨大的潜力，而他的夭折令人扼腕，具有可怕的悲剧性色彩。” ① 王尔德自己的健康状况一直令他担忧。5月初，他因扁桃腺炎（扁桃体周围脓肿）做了一个喉部小手术：手术本身“还可以”，因为他“被注射了大量的可卡因”，但后来他的喉咙“痛楚难忍”。 ②

然而，春天的巴黎也有其可供消遣的所在。无数英国游客蜂拥而至。王尔德经常和哈兰夫妇一起吃饭，弗兰克·哈里斯也会大方地款待他。 ③ 他根本不想隐藏自己。无论是出于“虚张声势还是真心诚意”，只要有机会，他就会选择去“奢侈昂贵并且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找乐子。他将别人眼光抛在脑后，完全无视他们的漠然。 ④ 他始终保持着“仪表堂堂的”形象，在任何场合都很引人瞩目；虽然他衣柜里的存货少得可怜，但他总是“穿着得体”，“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⑤

他参加了新沙龙画展的预展（“罗丹的巴尔扎克塑像好极了——它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了一个小说家所具有的，或者应具有的气质”）。 ⑥ 他和诗人罗伯特·谢弗一起去游乐园玩，和斯图尔特·梅里尔一起去看了一场“奇迹剧”。之后他们和学生演员们共进晚餐，“整个拉丁区到处是光明、美女和美酒”。 ⑦ 另一个晚上，他和索罗夫妇一起外出吃饭时，和惠斯勒碰了个照面。他们彼此没有说话。“他看上去又苍老又古怪！”王尔德兴高采烈地告诉罗斯，“就像是梅格·梅里利斯 ⑧。” ⑨ 比较令人痛苦的是与谢拉德的遭遇。他回巴黎报道德雷福斯事件，但他的反德雷福斯偏执和酗酒习性使他成

了一个乏味无趣的伴儿。王尔德仍然对他那番有关那不勒斯和波西的评论耿耿于怀。他们确实偶尔见面，但如谢拉德后来回忆，王尔德“变得越来越疏远”；他们在林荫大道上相遇时，常常“默默擦肩而过，只轻轻地挥了挥手”。^⑨

波西也回到了巴黎，住在克勒贝尔大街上一间小巧而“漂亮的公寓”里。虽然那不勒斯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两人头上，但他和王尔德还是像朋友一样见面了，伴随着春日脚步，他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王尔德帮道格拉斯挑选公寓里的家具，经常在那里用餐。^⑩但两人并没有恢复往日的亲密关系。没有了爱的滤镜，波西的自私变得十分明显。罗斯到访巴黎后写信告诉史密瑟斯，道格拉斯“对其他人根本不感兴趣，其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尤其是对奥斯卡，所以我真地认为他们的联盟会自然死亡”。^⑪他把大部分时间和所有的钱都花在赛马上。“他具有识别失败者的能力，”王尔德称，“考虑到他对赛马一窍不通，这简直太令人吃惊了。”^⑫真正把他们吸引到一起的是他们共同而持久的兴趣，那就是和当地的街头“男妓”发生性关系。波西痴迷于一个“14岁的可怕小鬼”，他被称为“花王”，王尔德解释说，因为“他可以在从事罪恶勾当的闲暇之余，到和平咖啡馆门前兜售紫罗兰花束”。“花王”经常使出各种招数勒索波西，然而那似乎只会令他徒增魅力。^⑬

道格拉斯——还有罗斯和雷吉·特纳——都对王尔德的朋友莫里斯·吉尔伯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的确，这个年轻貌美的男子迅速成了众人的宠儿。罗斯承认，那年5月在巴黎，他“和莫里斯鬼混了一段

时间”，一周内花掉了整整一个季度的零花钱（罗斯对史密瑟斯说，“对那些爱慕他的人来说，他就是个昂贵的交际花”）。①“极有才干的莫里斯”还适时地为罗兰·斯特朗充当过一阵子不太称职的“秘书”。②

整个夏天，他经常和王尔德、道格拉斯、斯特朗以及斯特朗的狗“强盗”一起，定期去巴黎郊外马恩河畔诺让的一家名叫“创见”的古色古香的乡村旅馆。那是个迷人的地方。“哦，河畔小凉亭，或者叫它小屋，”斯特朗兴高采烈地说，“它的大花园里种满了鲜花、蔬菜和果树，枝繁叶茂，亲密无间。叫辆出租马车就能到那里了！不需要坐火车。整天都可以划船、钓鱼和洗澡”③也许更重要的是，房东可以提供赊账。王尔德在周围的环境中找到了一种怀旧的慰藉。他带着一名游客沿河散步：“这难道不是有点儿像泰晤士河的样子吗？”接着，他从河岸边一幢大别墅的铁门往里张望说：“我就喜欢站在这儿，从栅栏里往里瞧。像现在这样站着，只瞧一眼，就想进去，这比在天堂里要好。现实肯定会令人失望。”④

6月初，卡洛斯·布莱克从巴黎前来看望王尔德。虽然临分别时，两人表示要“相互忠贞不渝”，但这次见面并不圆满。这段友谊已经勉强维持了好几个月。布莱克受到妻子的压力，要他断绝与王尔德的一切联系。他也得知王尔德又和波西见面了，他很不赞成。然而比这更糟糕的是，法国报纸上出现了有关他与纽卡斯尔公爵起争执的尴尬消息，他怀疑这是王尔德向外透露的，令他非常苦恼。从诺让回去后，布莱克写了“一封不落俗套，发自良心的信”重申这些观点，王

尔德认为他冒犯了自己。于是他写了一封“措辞极为强烈的”回信，声称自己是无辜的，指责布莱克虚伪，结束了他们长久而珍贵的友谊。“所以，”王尔德对罗斯说，“伪君子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注

尽管王尔德装出（甚至让人感觉）一副冷漠无情的样子，但与布莱克的决裂对他在巴黎的地位产生了影响。布莱克的众多亲德雷福斯派朋友都认为这是一种卑鄙的背叛。评论家亨利·鲍尔——王尔德曾经给他寄过一本《雷丁监狱之歌》——写道，他现在对王尔德满心“蔑视”，而先前自己一直在为他“竭力辩护”，“他背叛了那些和他站在一起支持他的朋友。我要避开这股恶臭。对我来说，他已经不存在了”。●注其他人也持同样的观点。但如果王尔德与布莱克决裂，他会继续与四面楚歌的埃斯特哈齐会面并共进晚餐。随着亨利上校的伪造行为被揭露出来，笼罩在叛徒头上的那张网越收越紧；9月2日，在斯特朗的鼓动下，他逃离巴黎，前往英国。至少在英国媒体上，人们认为王尔德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起耸人听闻的事件。●注

王尔德自己也想逃离巴黎。这个城市受到可怕的热浪侵袭。“我走在黄铜色的街道上”，他向弗兰克·哈里斯抱怨道，“除了汗流浹背的英国家庭外”，四周围空无一人。虽然这里的晚上也许很迷人，但白天它是“老虎的血盆大口”。●注查尔斯·康德邀请他前往巴黎以西塞纳河畔拉罗什吉永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尚特梅斯勒小住一阵，将他从这种种的不舒适中解救了出来。王尔德参加了一个快乐的派对，其中有威尔·罗森斯坦和他的未婚妻爱丽丝。康德写信告诉达尔豪西·扬夫

人：“我觉得有些人不乐意我把他（奥斯卡）招来——但他将尚特梅斯勒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小国度，他化身为国王，还给自己搞到了（阿瑟）布伦特的船——成了他的游艇——让小男孩们每天划船把他从尚特梅斯勒送到拉罗什，他在那里喝了开胃酒，回来时满载着鸭肉火腿和葡萄酒，通常这些东西就成了晚餐桌上的额外美食。” ⑩

尽管如此欢乐，康德称王尔德比去年夏天在迪耶普时“严肃得多”——甚至“有时非常沮丧，可怜的家伙”。 ⑪ 巴黎生活的种种限制似乎已经令他感到烦恼。康德问他为什么不租一套公寓：“每个人都愿意来看你。你会认识所有文学家和艺术家。”听了这番话，王尔德落寞地答道：“我亲爱的朋友，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不在乎什么文学家。我只喜欢伟人。我想要的是公爵夫人们。” ⑫ 然而，他渐渐意识到——“非常遗憾地”——公爵夫人们现在是可望而不可即了。他“再也不能进入社交圈了”。相反，他必须努力接受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罗斯称）“与他的天才和气质完全不相符”。他向康德承认，自己开始觉得“对于‘本地’那些轻浮诗人来说，他显得有点老了”。 ⑬

2 前往南方

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比富人更看重金钱，那就是穷人阶级。

——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自己的诗歌灵感一直处于搁置状态。他曾经认为，巴黎“令人振奋的”学术氛围也许能令他恢复创造力，但事实证明，这与他之前希望阳光和那不勒斯会带来改变一样，一切都是徒劳。他早先保证，很快就要动笔写“一部新剧”，但并没有付诸实施。❶相反，他开始将《雷丁监狱之歌》当作他的“天鹅之歌”——垂死天鹅的最后挽歌。❷然而，他拒绝放弃一切希望。他提醒罗斯，自从出狱以来，他已经“在一年中完成了不少工作”，“现在我想要再为明年而创作”，但是“要从生活的逆境中重新获得超脱的艺术心态并不容易”。❸

与此同时，一种表面上的文学努力还是可以保持下去的。继《雷丁监狱之歌》大获成功之后，史密瑟斯正计划出版《理想丈夫》和《不可儿戏》，打算采用同约翰·莱恩早先为王尔德的两部社会喜剧所使用的一样的优雅样式。首先推出的是《不可儿戏》——因为罗斯说——它不仅是王尔德剧作中“最好的”，也是在评论界最受好评的，而且还是最不为人所知的：“它上演的时间太短，很多没有观看过这部剧的人都会买它。”❹

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王尔德都在改稿。对于喜剧，他一如既往具备自信的鉴赏能力。他对文本进行了几十处小改动，改进了形容性词，精炼了台词。对于布拉克内尔夫人的那段台词——“幸运的是，在英国，无论如何，教育是毫无效果的。如果它有效的话，就会给上流社会带来巨大的危险，也许会导致暴力行为。”——他在结尾增添了“在格罗夫纳广场”这几个词。他要把这本书献给罗斯。王尔德曾拿罗斯对这部戏的巨大热情开玩笑说（显然不是真的）：“不喜欢我的戏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不喜欢它们，另一种是特别喜欢《不可儿戏》。”^①王尔德自己的名字不会出现在标题页上。他认为，这一切还是来得太快了。相反，他建议采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方式。^②

回想过去的成功，痛苦和快乐交织在一起。然而，对于未来，他拒绝细想。他或许曾经对前往诺让拜访他的英国年轻小说家威尔弗里德·切森说过，“我毫不怀疑，我的未来会像我的过去一样美好”；但这样的说法只是为了鼓励他自己。^③当希利问起他的计划时，他回答：“我不能说我这辈子要做什么；我在想，我的生活将会怎样。我想隐居到某个修道院，住在一个灰色的石头小屋里，在那里我可以看看书，写写诗，虔诚地抽着烟。”^④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活在当下。在那转瞬即逝的一刻，他所想要的仅仅是捡到一个法郎去换一罐啤酒。“你担心得太多了，”他告诫切森，“不必担心。”^⑤

他努力听从自己的忠告，而且大部分都成功了。喝酒很管用。他继续维持着从那不勒斯开始的消费水平，而且还有所提高。他灌下大

量的啤酒、葡萄酒、香槟、白兰地、威士忌、苏打水和荷兰产蛋酒。但他现在首选的是苦艾酒。❶在贝尔纳瓦尔，他曾经对约翰·福瑟吉尔讲过喝苦艾酒醉倒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被他称为“和普通饮酒一样”；在“第二阶段”，你开始看到“可怕和残酷的东西”；但如果你能坚持下去，进入第三阶段，你会“见到你想看的東西，奇妙而好奇的东西”。他描述了一个漫漫长夜，他独自喝完苦艾酒之后，是如何达到这个第三阶段的。此时，穿着绿围裙的侍者进来，把椅子堆放到桌子上，咖啡馆要打烊了。他拿来一个喷壶，开始往地上洒水，“最奇妙的花——郁金香、百合和玫瑰，纷纷冒了出来”。但侍者始终看不见它们，王尔德回忆说，但“当我站起来走到街上时，我感到沉重的郁金香花头擦过我的小腿”。❷

然而，现实并非总是可控的。文森特·奥沙利文发现，有时候，在谈话过程中，王尔德的“脸上会闪过极度的痛苦和遗憾”，或者“对未来的忧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用颤抖的大手捂住脸，然后伸出胳膊”，好像要挡开这种想法。❸

然而，他拒绝为明天做任何准备。他每月的零用钱更多是用来找男妓，而不是租房子。他依赖小小地挥霍一把来安慰自己。他与诗人们一起喝酒，让众人惊讶的是，他给侍者20法郎，要他去买一包金色烟头的香烟。然而他点燃第一根烟后却发现，这个香烟牌子令人失望。但是，当男孩把找回来的零钱——大约15法郎——递还给他时，王尔德说：“不用了，你留着吧。这样能让我产生错觉，以为烟还不

错。”^① 他到斯克里布街的朱尔斯和罗杰商店去几次，买点古龙香水和其他洗漱用品，账单就超过27法郎。^②

他手头宽裕时总是很慷慨，没有钱的时候就等着朋友们接济。他没有预算能力，这意味着几乎每个月都生活拮据。罗斯经常收到请求提前支付津贴的信件。一次，王尔德特别急迫地需要钱——他描述自己身无分文，“连充饥的食物都没有了”——罗斯以5英镑的价格卖掉了比尔兹利的一幅画，让史密瑟斯将钱匿名寄给王尔德。^③ 不过，罗斯很快就认清了王尔德夸大其词的习惯，事实上，那属于欺骗。王尔德被迫做出道歉，因为他谎称自己急需一笔钱，以便从诺让的旅店老板那里取回被扣押的行李。“我对我的托词感到遗憾，”他写道，“我忘了以前用过诺让这个借口。它显示出我的想象力已经完全崩溃，这使我感到非常苦恼。” 弗兰克·哈里斯回忆，杜兰德餐厅曾经上演过一出晚餐悲喜剧，当晚一开始，他慷慨地送给王尔德一张支票，用来偿还眼下的债务。凌晨3点他们分手时，王尔德忘记了先前收到的礼物，自称“手头很紧”，询问能不能给他“几个英镑”。^④ 不过，王尔德在金钱问题上已经摆脱了尴尬和羞耻。贫穷也许“很可怕”，但它主要是一种周期性的不便。^⑤

他一直希望有个更加光明的经济前景，即便图书版《不可儿戏》做不到，那也还有他的现代戏剧本《爱即法律》。如果利用得当，它有可能带来上千块钱的进账。尽管史密瑟斯与奥古斯丁·戴利的接触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王尔德还是在10月时将这部尚未动笔的剧本的英国演出权卖给了一个名叫霍勒斯·塞杰的伦敦戏剧制作人，后者当时正在

成功上演改编版《爱丽丝梦游仙境》。❶但如果王尔德希望通过签署合同激发工作能力，那么他要失望了。这一进展只能让他越发地放纵自己。

那年秋天，巴黎似乎空无一人。不过，他倒是见了一些老朋友，罗斯和特纳——他们正在意大利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旅行——在前往南方的途中经过巴黎。艾达·莱弗森来了一次。她的诙谐机智丝毫未失：当王尔德给她讲述一个年轻的阿帕契人，忠心耿耿地陪着自己，手里无时无刻不攥着一把刀子时，她说：“我敢肯定，他另一只手里拿着叉子。”❷但王尔德的老伙伴们都不在。斯特朗身在伦敦，正在想办法把埃斯特哈齐的故事卖给英国媒体。波西在流亡了三年半之后回到英国，他的母亲从检察官那里获得保证，他不会面临逮捕。于是他在伦敦待了几个月，整理出版了两本薄薄的诗集，一本是他的诗集（没有包括《赞美羞耻》和《两种爱》），另一本是写给孩子们胡闹诗。两本书的扉页上都没有他的名字。在英国期间，他曾经试图与父亲和解。两人在贝利酒店的吸烟室见面，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昆斯伯里拥抱了他，称他为“亲爱的孩子”，并承诺恢复他的零花钱。但当侯爵随后写信要求了解他与“野兽王尔德”到底是什么关系时，波西回复了一封尖刻而放肆的信，终结了一切和解的可能性。❸

既然身边没有英国密友，王尔德便把时间倾注在和艺术圈里，或者有同性恋倾向的年轻人调情这件事上，他们纷纷从英国写来热情洋溢的信：其中有17岁的拉德利公学学生路易斯·威尔金森，他自称正在计划将《道林·格雷的画像》搬上舞台；还有阔气的异装癖美学家杰尔

姆·波利特，他的每封信里都附有照片。❶不过，王尔德讨厌独自待在他那间不招人喜欢，而且“颜色太黄”的房间里。他可能会在阿尔萨斯旅馆小小的后院里读一会儿书，但很快就会去街上寻找社交机会。他在拉丁区闲逛。他了解当地所有古董商的货品。人们经常在卢森堡公园里见到他。在认识他的人看来，如果他走得很慢，步子迈得很小，那是为了更好地享受回忆“他曾经的样子”。❷

尽管王尔德仍然游离于日常社会生活之外，但有时候那是他情愿为之。一次他受邀拜访牛津大学老校友J.E.C.博德利的家，当他得知博德利的家人也在时，刚到门口便逃走了。❸他转而接受了法国文学界。他告诉特纳，位于意大利大道（靠近歌剧院）的美国人开的卡利萨雅酒吧成了他主要的“文学胜地”；下午5点，他会和他的“朋友”莫雷亚斯、埃内斯特·拉热内斯，“以及所有其他的年轻诗人”聚在那里。❹按照惯例，他们在5点钟喝开胃酒，做好当天的安排，夜晚就此开始。这家酒吧远近闻名的香槟鸡尾酒可谓引人入胜，谈话聊天也同样令人兴奋不已。❺文学上的争论并不少见，但也有很多乐趣。科幻小说作家古斯塔夫·勒·鲁日初次见到王尔德就是在卡利萨雅酒吧，他回忆王尔德的样子令人难忘，“他诚恳善良，笑起来很真诚，露出一口几乎镶满黄金的牙齿，这让他看起来有点像一尊神像”。❻

卡利萨雅酒吧的众人成为王尔德的听众，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连串的寓言和故事。❼虽然他很享受口若悬河地说话，但拉热内斯疑心此举也是在“为他自己”即兴创作，以确信“他仍然有能力，仍然会去做，仍然有名气”。❽王尔德故事中的主人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

国王或者神——尽管有一个故事是关于国王和乞丐的。到了故事结尾，王尔德说：“我一直是国王；现在我将成为一个乞丐。”这种自我戏剧化和夸张是很典型的。无论王尔德在经济上如何窘迫，他始终（如拉热内斯所见）是一个完美的、打扮得体的英国人——“而且（他）从不乞讨”。^①

在另一次自我神话的操练中，王尔德详细叙述了一个故事，说起他在前世，如何获得了成功和幸福，以至于“一种秘密的恐惧感”突然袭来，“（他）在现实中太幸福了，这种不太可能的幸福只会是他邪恶的天才设下的陷阱”。他回忆起暴君波利克拉特斯的例子，他决定向众神献祭，以平息他们的嫉妒，于是便像那位希腊国王一样，“把一枚贵重的戒指扔进了大海”。但是，和波利克拉特斯的遭遇一样，这枚戒指被一名渔夫发现并还给了他，渔夫是在一条鱼的肚子里找到这枚戒指的：“不幸的是”，王尔德面带着“奇怪的微笑”补充道，归还戒指的“小渔夫”，“那个家伙太帅了……”^②

王尔德在故事中暗示渔夫英俊帅气，透露出一种新的自传性个人性息，表现出他如今在性的方面已经出现了反叛大胆的迹象。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癖好。事实上，他似乎还把搭讪来的几个人带去了卡利萨雅酒吧。他曾对特纳提到过一个“品性恶劣的英俊小伙子”也去那儿，他解释说：“他长相酷似安提诺斯，而且很聪明，所以被允许跟诗人们一起交谈。”^③然而，这些可疑的伙伴却让自命不凡的巴黎青年作家感到不安。文森特·奥沙利文回忆说，斯图尔特·梅里尔和其他人“不断地请求我去找王尔德的英国朋友，让他意识到自己正在毁掉

旧友们对他残存的一点同情”，因为他“和遭人摒弃的鸡奸者一起光顾卡利萨雅酒吧，而那些人有时在其他方面（也）很危险”。^①

出于这种态度的缘故，王尔德发现不可能建立，甚至维持，因出版《雷丁监狱之歌》而建立的人际关系，以及因此带来的诸多善意。他仍然继续与梅里尔一起吃饭，但并不频繁。^②他又见到了纪德，但只有两次：都是在林荫道上颇为尴尬的偶遇，王尔德竭力重温昔日的欢乐，而纪德却感到一种隐藏在努力背后的巨大悲伤。^③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和他在一起。他结识了一位名叫查尔斯·西布莱的年轻美国作家，后者正致力于将《鲁拜集》(The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从英语译成法语。^④他不时见到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这位身材矮小的艺术家觉得他是一个“最富有同情心的伙伴，因为他不会总是盯着自己看，好像看见了一个怪物或奇迹似的”。^⑤但成为王尔德“好朋友”的却是24岁的评论家兼小说家埃内斯特·拉热内斯。他的形象十分怪异，头发浓密，穿着古怪，脸上长满湿疹，手里拿着“帝国手杖”，当他和王尔德一起在林荫大道上散步时，两人十分引人注目。^⑥王尔德觉得拉热内斯那副尖利的假嗓和恶毒的诙谐十分逗乐。^⑦他的精力也令人叹为观止。拉热内斯一直在做短命的文学评论刊物。王尔德答应要为其中一份刊物写“一首散文诗”。但是，即使把一篇很短的故事写在纸上，也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件事似乎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⑧

除了相对时尚雅致的卡利萨雅酒吧，王尔德——投身于他的新波希米亚主义——还光顾了拉丁区的低等酒吧：学生咖啡馆、“酒

窖”、“臭名昭著的洞穴”。这些探险过程中理所当然包含有性元素。但他也获得了艺术方面的回报。王尔德慷慨地为他一路上遇到的各种不知名的词曲作者、未来的艺术家，以及“从未发表过作品的诗人”买酒，并称赞他们，这让他获得了令人愉悦的地位和知名度。他在来来往往的美国侨民艺术学生、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画家和大众诗人中找到了朋友和听众。一次他在蒙马特咖啡馆参加诗歌朗诵会时，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甚至连侍者，一个“特别漂亮的小伙子”也向他要签名。⑨

在伦敦，王尔德也没有被完全遗忘。虽然文学界普遍对他“回到巴黎吃狗屎”的消息感到沮丧，继续对他避之唯恐不及。⑩但一些老朋友依然真诚相待。这其中要数弗兰克·哈里斯最关心他的健康。他卖掉了《星期六评论》，正雄心勃勃地计划在摩纳哥收购一家酒店，手里资金充裕。他提出带王尔德一起去法国南部度假——希望场景的变化，免去了物质上的担忧，也许能够在写作上助他一臂之力。这是一项非常慷慨的提议，王尔德接受了，尽管和哈里斯相伴整整三个月着实让人心力交瘁，想到这一点他就感到有些惧怕。

结果证明，王尔德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哈里斯将他安置在戛纳郊外风景如画的拉纳普勒渔村德班酒店，之后便沿着海岸前往摩纳哥，继续他的商业计划。他们只是偶尔见面，在凉爽的夜晚聊聊文学，讨论哲学，在有关性别吸引力的问题上辩论一番。⑪在这些遭遇之后，王尔德告诉特纳：“我跌跌撞撞地回到房间，浑身大汗淋漓；我相信（哈里斯）谈的是橄榄球比赛。”当哈里斯拽着王尔德走了一

段不太长的路去参观附近一座修道院时，他又汗流浹背了。老修道院院长对王尔德的举止做派印象深刻，他问哈里斯这是不是一个“伟人”。“是的，”哈里斯回答，“是个伟人——隐姓埋名的那种。”

●注

大多数时间里，王尔德都是自己做主。他仍然什么也不写，只是偶尔写几封信。日子就这样在快乐悠闲中度过，享受着空气中松林的芳香，“蓝宝石墙壁一般的海浪”和“金沙般的太阳”。他读了不少书。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认为那是“一个极其奇妙、耸人听闻、令人厌恶的小故事，像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注他用晚上的时间勾搭年轻人。在戛纳或尼斯，“浪漫”是“月光下的职业”。●注他发现，拉纳普勒的渔夫“和那不勒斯人一样不受道德伦理约束”。●注新年伊始，他向罗斯吹嘘，自己“实际上已经跟一位18岁的渔民美男子订了婚”。●注当哈里斯催促他写作时，他表示自己可能会写一首《渔家少年之歌》，作为《雷丁监狱之歌》的欢乐姊妹篇。它将“歌唱自由而不是监狱，歌唱欢乐而不是悲伤，歌唱亲吻而不是处决”。然而，这首诗只写了几句，甚至连这几句也没有落实在稿纸上。●注

里维埃拉有许多英国游客，王尔德会不时经历意外的偶遇。一天乔治·亚历山大骑着自行车经过他身边，但他没有停下来，只是“扭曲着脸，苦笑了一下”。王尔德认为此举“相当荒谬而卑鄙”。●注威尔士亲王的表现则更好一些：他坐着马车从王尔德身边驶过，转过身来，举起了帽子。●注王尔德和一个定居瑞士，年轻富有的英国人哈罗

德·梅勒成了朋友，他带着年轻英俊的意大利仆人一起住在戛纳。梅勒虽然忧郁，而且常常令人沮丧，但他的陪伴令人愉快，偶尔还提供香槟晚餐。梅勒带着王尔德去尼斯观看了伯恩哈特在《托斯卡纳女人》中的表演。“我去后台看了莎拉，”王尔德告诉罗斯，“她拥抱了我，并抽泣起来，我也哭了，整个晚上过得好极了。”^⑨

然而，随着新年的临近，王尔德变得焦躁不安起来。他变本加厉地滥用哈里斯的慷慨，从拉纳普勒搬到尼斯，又搬到蒙特卡洛，再搬回来。每次换地方，他都会被要求立即结清旅馆的账单。要不是王尔德写作失败，哈里斯也许并不会介意。当哈里斯最后指出“每个人都厌倦了手里举着空袋子”时，王尔德很不高兴。作为一种逃避，他接受了梅勒的邀请，3月时一起去日内瓦湖岸边的格兰德别墅。至少梅勒并不指望他去工作。^⑩

前往瑞士之前，王尔德过境意大利，前往热那亚。天蒙蒙亮时他去城外的陵园，给康斯坦斯上坟。“它很漂亮，”他告诉罗斯，“一个大理石的十字架，上面镶嵌着深色常青藤叶的悦目图案……我看到墓碑上所铭刻的名字时十分伤感——当然是因为上面没有她的姓氏，即我的名字——只有‘康斯坦斯·玛丽，霍勒斯·劳埃德(QC)的女儿’等字样，以及《启示录》中的一段话。我买了一些花。我感到深切的震撼，觉得所有的悔恨都无济于事。一切都不可改变，生活就是这么残酷。”^⑪

不久，王尔德在格兰德别墅收到了另一个坏消息：他的哥哥威利去世，年仅46岁。他留下了一个寡妇和一个襁褓中的女婴。曾经存在

于兄弟之间的“巨大鸿沟”现在可以弥合了。威利死后，王尔德继承了位于莫伊图拉的那笔“荒谬”而极度贫困的家族财产；但这一微薄的资产几乎立刻就被“法律这条章鱼”——官方的涉讼财产管理人——没收了。❶

如果这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多无法预料的事情需要处理。《不可儿戏》于2月出版，新闻界一片沉默，公众兴趣寥寥。对作者来说，它的失败并不意外。王尔德曾经对哈里斯表示，这出戏是“如此琐碎而又不可靠的喜剧：而公众却喜欢听我诉说自己的痛苦——好奇心和自传体是引发人们感兴趣的元素——我不敢肯定人们会再度喜欢我轻松的一面，讥讽伦理道德，藐视社会法则”。事实印证了他的观点，《雷丁监狱之歌》仍然卖得很好，史密瑟斯正在安排大量印刷（2000册）新版本，扉页上用括号标注了王尔德的名字。❷ 尽管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承认自己是这首监狱诗的作者是一种精明的做法，但王尔德认为自己最好在其他方面保持匿名。❸ 霍勒斯·塞杰在媒体上宣布，他将要在伦敦的舞台上制作“奥斯卡·王尔德的一部新喜剧”，这让他感到非常愤怒。他对罗斯解释说：“我唯一的机会就是匿名上演一部戏剧。否则首演之夜将会令人毛骨悚然，人们会从每一句话里发现特殊的意义。”❹

尽管《不可儿戏》的销量很少，史密瑟斯还是雄心勃勃地计划继续出版《理想丈夫》。王尔德在格兰德花了些时间用来修改、校正剧本的打字稿，还在出版细节上操心了一番。他打算把这本书献给弗兰克·哈里斯——并写道“谨以此纪念他作为艺术家的能力和威名，及作

为朋友的侠义和崇高”。事实证明，编辑工作可以为单调的瑞士生活提供消遣。在梅勒家待一个月实在太长了。第三周刚开始，王尔德就很不客气地抱怨：“梅勒枯燥无味，沉默寡言。他让我喝瑞士酒，这太可怕了。他只顾着精打细算，以及琐碎的家事。所以我觉得很受罪。”瑞士的风景之美是“显而易见”，“老派守旧的”，瑞士人“看上去丑陋无比”，以至于能将“忧郁传达”入灵魂，将可怕的“贞洁”传达入身体。❶

4月初，王尔德逃回意大利的里维埃拉，寻找阳光、美丽、廉价的住所和随心所欲的性生活。“我打算试着在热那亚附近找个地方住，”他告诉史密瑟斯，“在那里我可以用10法郎维持一天的生活（包括男仆）。”❷王尔德在距离热那亚仅1英里，“相当宜人”的港口小村圣玛格丽塔实现了这一理想。但是，不管这个地方有什么迷人之处，它无法让人兴奋。无聊和孤独很快袭来。甚至连王尔德钟爱的“小伙儿”也令人失望。❸那个年轻人只是因为没钱坐火车回巴黎，才被迫困在那里。

伦纳德·史密瑟斯的到来提供了转移注意力和逃离的机会。关于王尔德的新剧本，事情有了一些进展。王尔德未能交出剧本，让塞杰等待不及，再加上他自己也陷入了经济困难，于是便把他在这个项目中的权利转让给了一位名叫罗伯茨的制作人。他们讨论了新的条款。罗伯茨同意，除了支付王尔德的费用外，每完成交付一幕剧本支付100英镑。❹这是一笔极好的交易，而且似乎罗伯茨和史密瑟斯一起到意大利敲定了这个计划。他们在热那亚的康科迪亚咖啡馆吃了一顿晚

饭，但似乎并不十分令人满意。罗伯茨“满心厌恶地”回到家，提出要以一个让出版商“心动”的价格，把他的合同“转让”给史密瑟斯。

史密瑟斯最终屈服于诱惑。他写信给王尔德，提出接管这个项目。他会“支付”王尔德在圣玛格丽塔的酒店账单和他返回巴黎的车费，并提供每周的津贴，让王尔德可以在没有日常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工作——除非“我发现你并没有认真地遵照许诺进行写作”。^①王尔德欣然接受，但随后几乎马上就病倒了。罗斯——在一连串哀怨的电报的召唤下——再一次赶来救场。他设法让王尔德相信，他的诸多健康问题都与不断增加的酒精摄入量有关。他严厉警告王尔德不要喝酒——至少目前如此。^②然后，他将病人带回了巴黎。^③

王尔德解决了与史密瑟斯在业务安排上的短暂误会之后，很快便开始动笔写剧本。到6月初，他声称已经完成了第四幕的一多半。^④由于他发现很难像过去那样“笑对生活”，于是便先写了“严肃”和“悲剧性”的结尾，“第一幕和第二幕的喜剧性”让他“有点”惧怕。^⑤不过，当他在巴黎的一家餐厅偶遇美国制片人奥古斯丁·戴利夫妇，以及他的明星女演员艾达·雷汉时，他的心情很是乐观。这是一次愉快的邂逅。王尔德和他们坐到一起，“聊得如此尽兴”——雷汉后来回忆道——“就像过去一样”。^⑥他们讨论了戏剧计划。戴利准备“出一大笔钱购买”王尔德正在创作的《爱即法律》的美国版权，但他和雷汉也希望王尔德能为他们“写点新鲜的东西”。^⑦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做任何安排，第二天戴利就去世了。王尔德以其典

型的慷慨为戴利夫人和艾达·雷汉打点一切，帮助他们与法国当局打交道。他“非常善良，乐于助人，简直溢于言表”，雷汉说，“就像一位仁慈的兄长”。^①

尽管戴利的死让王尔德感到震惊和失望，然而他实际上还在考虑其他的计划。他返回巴黎时，收到了伦敦老朋友演员克尔·贝柳的来信，信中邀请他参与合作一部关于博·布鲁梅尔的戏，该剧很可能由富有的上流社会女演员布朗-波特夫人主演。^②多项工作同时推进，向来能让王尔德热情高涨，他很支持这个想法。7月初他收到一份打字草稿，接受了贝柳的建议，同意两人在布洛涅或其他诺曼底避暑胜地会面，讨论这项任务。^③

这次见面使得整个夏天的计划略微发生了改变。王尔德——夏季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黎郊外马恩河畔的谢纳维耶尔——逐渐对史密瑟斯制作他的任何剧本的能力感到失望。出版商毕竟没有运作伦敦剧院的经验。于是王尔德转而游说贝柳，与其继续推进博·布鲁梅尔项目，不如买下史密瑟斯对《爱即法律》的股权，他——还有布朗-波特夫人——应该制作这部作品。史密瑟斯显然在一次巴黎之行后同意了这个计划。王尔德主动提出归还他迄今为止收到的160英镑，但不是立即归还；而是取自“这部戏的收益”。与此同时，王尔德已经从贝柳那里得到了每周5英镑的报酬，以便继续创作这部剧，但五周以后，这种方式就被取代了，布朗-波特夫人为这出戏预付100英镑，其余更多的钱将在剧本完成之后到账。^④

虽然这一切都可以被视为某种进步，但毫无疑问，王尔德自由自在的第二年过得并不像第一年那样富有成效。他在马恩河畔谢纳维耶尔创作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写给朋友和熟人的信，讲述他在巴黎的生活安排并且乞求施舍。他急切地想搬回左岸，但是他在马索里尔旅馆——他被安置的地方——的账单还没有支付，他的行李也被扣下了。

⑩ 不过，他确实有一本新书值得庆祝。《理想丈夫》（《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的作者创作）于当年7月出版。虽然这本书没有获得什么评论，但王尔德还是向英国和巴黎的朋友赠阅了该书。纳尔逊少校和图卢兹-洛特雷克也获得了赠书。⑪

夏末，王尔德回到巴黎，设法从马索里尔旅馆逃出来，又搬到了河对岸令他适意的阿尔萨斯旅馆。旅馆的主人迪普瓦里耶先生很同情他，为他提供早餐，并延长了结账的时间。⑫ ⑬ 他又恢复了他在巴黎的日常生活：晚起看闲书，5点钟喝开胃酒，聊天、喝酒到深夜。他常常感到孤独，有时也感到悲伤。虽然他从不喝醉，但也并非总是清醒。⑭ 他的样子让人看了难过。据一位法国作家回忆，一天晚上看见他独自坐在咖啡馆外面，当时正下着瓢泼大雨，侍者们在他周围收拾东西。⑮

当然，他也有抑郁，甚至绝望的时候。但这是“他对自己悲惨处境的一种放纵”。他的信件和谈话中充满修辞华丽的哀号：“我要完了，”他对弗兰克·哈里斯说，“停尸房正张着大嘴在等我”。⑯ 道格拉斯经常见到王尔德，他认为王尔德在巴黎的那段时间“总体上颇为快乐”。他活泼的性情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害；他的幽默感和“无与伦

比的享受当下的能力”在持续支撑着他。❶年轻的奥古斯都·约翰回忆那年秋天，他在巴黎待了两个星期（与康德和罗森斯坦夫妇一起）经常见到王尔德。令他难忘的是，尽管王尔德遭遇了那么多不幸，但他丝毫没有表现出“辛酸、怨恨或悔恨”。❷他周围都是专心致志的听众，“没有任何忧郁或者邪恶之处。他幻想自己是‘快乐王子’，或者承认自己有点粗俗，是一个和蔼可亲，但永远透支的百万富翁”。尽管他一直保持着一种随和——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源源不断的实用智慧”，但他一点儿也不像个中年人。相反，他有一张年轻人的“坦率、开放、友好、幽默的面孔”；因为——约翰发现——“他很有见识，不会变老”❸。

劳伦斯·豪斯曼——同年秋天也在巴黎——生动地记录了王尔德在咖啡馆给围在桌边的年轻追随者们讲话的情形。他的种种奇思妙想（他选择了一家特别的酒吧，因为它的装饰与他的肤色相得益彰）逗得他们很开心，他的故事令他们着迷：“有一个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结果却发现——令他大失所望——他再也无法犯罪了；抑或有一个身在地狱的诗人，通过诗歌的力量，设法让他的前缪斯女神相信自己身在天堂。”❹

他的幽默机智和创造力尚在；只是丧失了将它们落于笔端的能力。他完成《雷丁监狱之歌》已经快两年了，至今没有创作出任何作品——既没有写成象征主义戏剧或社会喜剧，也没有完成一首诗，或是一则寓言。他还拒绝了，或者没有兑现几篇稿费颇为丰厚的媒体约稿，理由不是它们太庸俗，就是太乏味。❺事实上，他还遭遇了一些

挫折。那个写有《圣妓》草稿的笔记本——一直由艾达·莱弗森保管，也许可以当作现成的材料写成一部象征主义短剧——带到巴黎后不久，便被遗失在出租马车上（王尔德对罗斯戏称道，他认为“出租车是一个非常合适它的地方”）。^⑨但真正的失败在于意志。他的核心动力似乎已经丧失。当豪斯曼问起王尔德的文学计划时，他答道：“我告诉过你，我打算写点东西：我对每个人都这么说。这是一件每天都可以重复的事情，打算第二天就动笔。不过在我心里——那回荡着沉闷的回音的房间里——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写。这些故事是虚构出来的，它们确实存在，只要我能在自己头脑中让它们获得所需的形式，这就够了。”^⑩

他把自己一直无法写作的原因归结于，每当他一提起笔，过去的的生活就会生动地浮现在眼前，“使他痛苦不安”。然而，道格拉斯怀疑他“文学贫乏”的真正原因是，他的伟大天赋是作为“生活的阐释者”，而他在巴黎放荡不羁的生活“过于狭隘，过于受限，以至于无法激发他的创作热情”。这些都不值得映入他天才的“魔镜”。他需要靠“伦敦的花天酒地”寻求刺激。事实上，王尔德经常告诉道格拉斯，他在巴黎流亡期间最想念的是过去那些坐在他脚边，听他说话的“聪明漂亮的女人”。^⑪

面对无法创作新作品的窘境，王尔德开始阐述自己的失败哲学。他声称艺术家的成功可能是“偶然的”，而“绝非有意的”：

如果它们确实如此，那就仍是不完整的。艺术家的使命是活出完整的人生：成功，就像一段插曲（仅此而已）；失败，如同现实，是

最后的终点。死亡，分析它生成的元素——只不过是失败的一种辩护：永远摆脱那些困扰了人一生的权力、欲望和胃口？诗人最高贵的诗句，剧作家最伟大的场景总是与死亡有关；因为艺术家的更崇高的使命是让人们感知失败之美。●注

这番理论也许会在餐桌上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在漫长而孤独的日复一日中，它是无法用来聊以慰藉的。随着冬天的来临，访客日益稀少，王尔德的情绪低落下来。他被诊断为患有“神经衰弱症”，这是当时一个笼统的医学术语，指的是神经衰弱和抑郁。他发觉自己“直到下午才能起床，除了偶尔给路易斯·威尔金森写封轻浮的信外，什么信也写不出来”。甚至连他写给史密瑟斯的乞求信也“沦落为明信片了”。●注喝酒似乎能让人获得释放，但却只会加剧病情。●注

创作《爱即法律》完全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当他发现美国制片人路易斯·内瑟索尔——女演员奥尔加·内瑟索尔的弟弟——买下了“剧本提纲”，并急切地想要看到剧本时，便惊慌起来。●注内瑟索尔手里的这份剧本提纲是一个名叫阿瑟·艾略特的“无赖”“偷窃”得来的，他是塞杰从前的搭档。●注这又是一个让人不想看到的新困难。压力无助于改善王尔德的健康状况。1900年初，随着他的神经衰弱出现了一种令人难受的、神秘的皮疹，它奇痒难忍，让他看起来“像一头豹子”。王尔德认为这是蛤贝中毒导致的。●注今年2月，他再次遭到打击，患上了一种严重的感染，袭击了“咽喉和灵魂”。而且它似乎还伴随着“某种血液中毒”（目前的医学研究表明，王尔德患上

了“链球菌性咽喉炎引起的败血症”）。^⑨为了从这种郁郁不振中恢复过来，他不得不花掉一大笔钱，在一家私立医院度过了10天。^⑩

伦敦传来年仅32岁的欧内斯特·道森去世的消息（2月23日），这件事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病情。这位诗人那年夏天才到过巴黎。王尔德请史密瑟斯在这个“可怜的和受伤的好人”墓上放一些鲜花。^⑪道森在凯特福德的最后几天是由谢拉德照顾的。谢拉德到巴黎时，特意拜访王尔德，给他讲了一些诗人去世的细节。王尔德还没来得及换下睡衣，便接待了他的老朋友。道森的去世让他很悲痛，但他相信“他写的很多东西将会保留下来”。当谢拉德问起他自己的“作品”——当时就堆放在桌上的杂物中间——进展如何时，他回答说：“人总得做点什么。我现在对它毫无兴趣。对我来说，这是一桩苦差事，但是，就像我们所谓的折磨一样，总能借此打发掉一两个小时。”谢拉德一听，立刻下了断言（呼应了他自己对道森的判断）：即便他从此不再动笔写一句话，他的成就也已经足够“流芳百世”了，这句话令他开心不已。^⑫

昆斯伯里侯爵也在新年辞世，他于1月31日在伦敦去世，享年55岁。临终时，他从他的兄弟、天主教牧师阿奇博尔德处获得了“有条件的赦免”，不可思议地重新皈依了童年时信仰的基督教。不过，无论波西，还是珀西，都没有与他达成和解。事实上，当爵位继承人珀西来到床边时，侯爵竟然从枕头上强打精神起身，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然而，没有一个儿子被排除在遗嘱之外。甚至连小儿子波西也继

承了大约1.5万英镑（8000英镑马上就到了他的名下，其余的随后到账）；珀西得到的则要多得多。❶

对王尔德来说，这是个极好的消息。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机会，可以从道格拉斯家得到欠他的余款，用来支付他在那次不幸的官司中所开支的法律费用。2月底，波西和珀西短暂地到访巴黎。“他们戴着重孝，而又兴致勃勃，”王尔德说，“英国人就是这样。”❷波西立即向王尔德支付了他自己的那份“信用债务”125英镑（还额外加了20镑），而珀西却一再拖延着付钱。❸

与此同时，王尔德也在通过其他方式积累自己的资源。2月初，他与艾达·雷汉达成了创作“一部三到四幕新原创喜剧”的协议——这似乎是一部不同于《爱即法律》的戏剧。他得到100英镑的预付款，另外200英镑将在7月1日或之前交稿时到账。❹他希望剧作家莫里斯·多奈能够改编他的几部作品，使之在法国上演。❺他还与赫伯特·比尔博姆·特里取得了联系，希望能从最近《无足轻重的女人》的巡回演出中收取一些版税。特里遗憾地说，这出戏只演了一次，而且所有的钱都必须送交“破产受托人”。不过，他提到乔治·亚历山大手里倒是有一些“费用”，他很乐意“结算”。❻

亚历山大从官方的破产管理人手里购买了《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和《认真的重要性》的演出权，并酌情向王尔德支付了少许费用。这两出戏虽然很少在伦敦演出，但已成为巡回演出的固定剧目。❷这是一种慷慨的姿态，王尔德对此十分感激。大家都忘记了在纳普尔骑车相遇的不愉快经历。亚历山大还计划继续推进，为这两部戏剧

制作廉价演出版本，以鼓励业余戏剧制作。❶这些并不是王尔德与伦敦戏剧界的仅有的联系。查尔斯·温德姆仍在向他索要作品。王尔德对他的坚持感到受宠若惊，尽管他拒绝改编大仲马的《蒙梭罗夫人》，但他的确承诺要尝试并考虑另一种选择。❷然而，对患病的王尔德来说，思考简直几乎和认真敷药一样困难。

或许是为了刺激康复，王尔德接受了哈罗德·梅勒的邀请，前往意大利的西西里岛、那不勒斯和罗马旅行。虽然梅勒的陪伴谈不上令人兴奋，王尔德却丝毫没有失去享受的能力，他能够从春天的阳光、年轻人的黑眼睛和艺术的奇迹中获得极大的快乐。“西西里风景极佳”，他告诉莫尔·阿迪；巴勒莫的金色教堂以及所有拜占庭镶嵌画都是“奇迹中的奇迹。置身于其中，人们感觉就像是踏进了圣殿，在神龛里献祭”。那不勒斯是“罪恶而奢侈的”。❸尤其是，王尔德“爱上了一位海神，后者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身处意大利皇家海军学校，而不是和海王在一起”。❹

而罗马则是“一座灵魂之城”。❺他们于复活节前抵达，王尔德回忆起学生时代的那次到访。当梅勒回瑞士时，王尔德沉浸在天主教会各种仪式和壮观的场面中。他得到了教宗的祝福，不是一次，而是七次。❻教宗赐福的一大好处是“彻底治愈了”他的“蛤贝中毒症”。他觉得这是个奇迹，应该回报以一张“还愿”图：“唯一的困难是，”他自嘲，“是如何处置蛤贝，除了贝壳之外，它们毫无装饰性可言，而我不吃贝壳类食物。”❼约翰·格雷当时正在罗马学习成为

神职人员，王尔德觉得他看起来很好笑：当这位神学院新生一言不发地走过时，空气中弥漫着“嘲弄”。①

罗斯也和母亲同来这座不朽之城过冬，给罗马假日增添了不少乐趣。他和王尔德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他们结交年轻人，参观古典雕像。尽管王尔德身上的皮疹已经奇迹般获得了治愈，但让罗斯大为震惊的是，这位老朋友的总体健康状况竟然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他发现王尔德“精神状态非常好”。欢声笑语中，王尔德请罗斯给他介绍一位牧师，以期“被教会接纳”。罗斯表示了异议。他仍然不相信王尔德是认真的——尽管他承认，王尔德自己也拿不准他什么时候是认真的。他的这番拒绝令王尔德开玩笑说，“每当他想成为天主教徒时（罗斯）就拿着燃烧的剑站在门口”挡住去路。②③

罗斯离开后，王尔德在罗马闲逛了几周，以他最新的爱好作为消遣。他拥有了一台相机，“以小孩子一般的热情”拍了无数张照片。他特别喜欢在波各赛公园拍摄的一张奶牛的照片，并告诉罗斯：“奶牛非常喜欢被人拍照，而且它们跟建筑物不同，它们是静止的。”④

3 落幕

杰克·沃辛：他好像表示过要葬在巴黎。

普丽斯姆小姐：只怕临终时，他的头脑不是十分清楚了。

——奥斯卡·王尔德

王尔德于5月底回到巴黎，北上途中，他在梅勒的格兰德别墅逗留了十天。梅勒刚买了一辆“汽车”，这令王尔德的短暂停留很值得纪念。王尔德认为这个新装置“很不错”——尽管他向罗斯解释说：“当然，它抛锚了：所有的机器都一样，它们比动物更加任性——是神经质、易怒和陌生的东西。我要写一篇文章，题为《无机世界中的神经》。”^①

如果身在巴黎，这篇文章就不缺好素材。令人紧张不安的新机器比比皆是：柴油发动机、电影放映机、自动扶梯、巨大的摩天轮、留声电话机。为庆祝上个世纪取得的成就，并展望下一个世纪的未来，这座城市正在轰轰烈烈地举办一场大型世界博览会。一切都令人兴奋——国家馆、熙熙攘攘的人群、大皇宫和小皇宫的新艺术风格的曲线轮廓——但它也提醒人们，王尔德本人在过去一年取得的成就是多么微不足道。6月已至，他却只字未写。

那种让他认为也许“明天”就可以开工的习惯性乐观主义，似乎产生了动摇。7月1日，他写信给艾达·雷汉的业务经理，对自己未能写

出她要的喜剧而感到遗憾，并承认无法在近期内完成这部作品。他承诺会偿还预付的100英镑，只是要求给他“少许时间”筹钱。①

罗斯希望新近富起来的波西可以帮助王尔德改善经济状况——或许可以为他提供稳定的收入，或者偿还他的债权人，让他有机会从现有的版权中再次获得赚钱的机会；然而，道格拉斯拒绝了。②他愿意对王尔德慷慨解囊，但要按他自己的条件和标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有钱，他迫切地想要大把花钱——大部分都花在赛马、“男孩子、白兰地酒和赌博上”。③王尔德盼着可以偶尔得到几张支票，时不常拿到些现金钞票。但是，一天晚餐后，当他提出可能需要一些更正式的关照时，波西便“大发雷霆，接着又是一阵挖苦性的大笑，说这是他听过的最荒谬的主意”。④当王尔德强调他的观点时，道格拉斯告诉他，他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又老又胖的娼妓”。⑤

道格拉斯的狭隘吝啬在乔治·亚历山大的慷慨大方面前显得尤为刺眼。那年夏天，这位演员经理携妻子来到巴黎。他们与王尔德进行了一次愉快的会面。谈到亚历山大想要自行支付费用时，王尔德表示，如果能——通过罗斯——“在每月1号支付20英镑”，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恩惠”。有了这笔固定收入的保证，王尔德甚至还希望，也许有一天，他可以“做一些（亚历山大）会喜欢的事情”。⑥徒劳无功的写作努力仍在继续。为了让布朗-波特夫人最终拿到《爱即法律》（可以理解，她逐渐变得不耐烦起来），王尔德同意与弗兰克·哈里斯合作写这个剧本。这样安排至少还有可能取得进展。王尔德只需要写第一幕。但即便如此，他也没能动笔。⑦

自从回到巴黎之后，他就一直沉浸在博览会的各种消遣娱乐中。回想起1867年的那次访问，他感觉自己回到了孩提时代。他顾不上自己的病痛。因为大自然“为他集合了她所有的荣耀”，他决定好好欣赏这场表演。埃内斯特·拉热内斯描述他表达喜爱的方式是，“大口地、贪婪地喝着它，就像在战场上喝血一样。他要在每一座宫殿里重建自己的名声、财富和不朽”。^①他在西班牙馆观看放荡不羁的弗拉门戈舞者，在埃及咖啡馆喝酒，侍者是一位“身材苗条的棕色皮肤埃及人，看起来很像一根漂亮的竹手杖”。^②他对一切都很感兴趣。^③他在众多的舶来品、新发明和旧艺术品中“自得其乐”——如斯图尔特·梅里尔所见——“像个小孩子”。^④

王尔德对位于阿尔玛门外罗丹的专属展台大为赞叹。出于位置的原因，那是一个很少有人光顾的展台，正如罗丹向让·洛兰夸耀的那样，“我吸引的不是参观者的数量，而是质量”——他列举最近的来访者中就有波托卡伯爵夫人和“诗人奥斯卡·王尔德”。^①罗丹向王尔德展示了他的“所有用大理石来表现的梦想”——包括“地狱之门”。王尔德称赞雕塑家“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②

这是一个社交的季节。王尔德和依然被人爱慕、风流依旧的莫里斯·吉尔伯特一起参观展览（他当时正在和一个玫瑰花一般的女孩，以及她留着小胡子的情人一起搞“三人姘居”）。他还经常和保尔·福尔见面：他们一起观看摔跤比赛，关注一个名叫“拉乌尔·勒布歇”的赛手的命运。^③展览会将成千上万的英国参观者吸引到巴黎。对于王尔德来说，其间难免遭遇一些令人不快的邂逅，以及诸多不以为然的目

光。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爱德华·卡森，但两人只是目光相交了一下而已。❶遇到罗森斯坦夫妇的时候，情形颇为尴尬。他们没有提到自己住在巴黎，当王尔德推断他们可能正打算回避他时，两人注意到王尔德眼中闪过痛苦的表情。这种猜测是正确的：威尔仍然很生气，因为上一次来巴黎时，王尔德带他们去了一家餐厅，声称他喜欢那里的音乐，但在晚餐时，事情明摆着，“他更感兴趣的不是音乐，而是其中的一个乐手”。威尔认为王尔德看起来面带病容，而且有点“邋遢”，共进晚餐时，他怀疑王尔德现在要靠喝酒来“勉强维持自己的智慧”。❷其他几次会客则要更愉快一些。史密瑟斯和文森特·奥沙利文来了。哈罗德·梅勒也来拜访过一次。❸艾梅·劳瑟和埃伦·特丽发现王尔德凝视着一家糕点店的橱窗；两人邀请他共进晚餐，他“一如既往地神采奕奕”。❹他还在一艘驶往圣克劳德的游船上遇见了老朋友安娜（布雷蒙伯爵夫人）聊起了往事。❺

王尔德喜欢用这样的短途旅行来缓解城市里夏日的暑热。他有时候会去枫丹白露。彼得斯·查尔默斯·米切尔就是在那里的一家咖啡馆外面发现了他。彼得斯·查尔默斯·米切尔是一位年轻的动物学家，几年前他曾经为道林·格雷“处理尸体”的最佳方法提供过建议。两人就犯罪与惩罚、诗歌与科学，兴奋地聊了好几个小时。米切尔对王尔德渊博的知识和机敏老练大为赞赏。王尔德拒绝了当天共进晚餐的邀请，因为他怀疑米切尔的两个旅伴是相当传统的人，他们不会赞成。❻

8月，道格拉斯和珀西去苏格兰高地的斯特拉斯佩弗狩猎。临行前，他在格兰德咖啡馆请王尔德吃了一顿大餐。所有的怨恨都被置于

一边。王尔德当时“兴高采烈”，为波西急于赶到苏格兰参加“松鸡狩猎季”而感到十分逗趣。但酒足饭饱之后，他突然沮丧起来。他对道格拉斯说，自己恐怕活不过这一年了。他有种“预感”。“如果新世纪开始，”他神色肃穆道，“而我还活着，那英国人可真的受不了了。”道格拉斯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他特有的夸张。他答应从苏格兰给他寄一张15英镑的支票，并且照做了。①

王尔德拿到这笔钱后再次去拜访了梅勒。他已经抗争了一年，希望能摆脱病痛和忧郁症的持续困扰，他开心地说，“梅勒疗法”虽然“沉闷无趣”，却很有效。②回到巴黎后，他的情绪一度短暂地高涨起来。一天晚上，他在卡利萨雅酒吧为埃内斯特·拉热内斯朗诵了几乎所有的寓言。③他甚至告诉艾梅·劳瑟，他创作的《诗人》终于即将发表在一本法国杂志上，尽管没有迹象表明确有其事。④

他将《爱即法律》的写作计划一推再推，等到9月中旬，哈里斯终于带着完整的剧本（重新命名为《达文特夫妇》）来到巴黎。他实在等不及王尔德的第一幕，于是便自己动笔完成了剧本。王尔德表示很生气，但很快就接受了既成事实。他提出的条件是，哈里斯以“预付200英镑”买下“情节和剧本提纲”，他持有哈里斯酒店价值500英镑的股份，以及得到哈里斯从该剧中获得利润的四分之一。⑤哈里斯急于将这部戏投入制作，便接受了这些条件。

这本该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但王尔德从中获得的快乐却因为慢性耳疾复发而大打折扣。整个夏天，他全身不适，萎靡不振，头痛愈演愈烈。⑥现在，这个问题尤其突出。9月24日，一位名叫莫里斯·

埃科特·塔克的新医生给王尔德做了检查，越来越多的英国侨民正在成为这位32岁医生的病患。❶塔克虽然是个“善良、优秀的人”，而且真心实意地欣赏王尔德的文学天赋，但在罗比·罗斯看来，他相当“愚蠢”。❷他最初的诊断似乎并没有认识到王尔德病情的真正本质。❸因此，无论他开出什么样的治疗方案，都毫无改善效果。王尔德的耳朵持续化脓。10月的第二周，塔克觉得有必要请一位“知名”耳科大夫征求一下专家意见。❹

专家对诊断结果感到震惊。王尔德的中耳感染似乎已经蔓延到周围的乳突（耳朵周围坚硬的蜂窝状结构），而且有进一步发展的危险。正如王尔德所述：“外科医生觉得有责任告诉我，除非马上动手术，否则我的病就没治了，拖延的结果可能会致命。”这看起来很可能是一种根治性乳突切除术，根除病变组织，并防止疾病蔓延到大脑及包裹的脑膜。❺

10月10日，王尔德经全身麻醉后，在旅馆房间里接受了手术。他形容这次严酷的折磨——几乎肯定涉及中耳和乳突腔的外置——“极其可怕”。❻而让人感到可怕的一部分原因则是费用。外科医生最初开出了1500法郎（60英镑）的账单，不过在塔克医生的努力下，账单数目最终得以减半。无论如何，手术似乎取得了成功。王尔德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白天由“一名医院男护士”和塔克医生，夜间则由另一名医生负责他的术后大量敷药以及止疼等护理。王尔德的医药费很快就达到了“大约20英镑”。❼为寻求支持和陪伴，他发电报给罗斯，请求他“尽快”前来。❽他突然感到忧心忡忡。

雪上加霜的是，路易斯·内瑟索尔来到巴黎。也许是听说了哈里斯计划演出新剧的消息，王尔德手术的前几天，他“几乎每天”都“擅闯”阿尔萨斯旅馆，坚持声称拥有《爱即法律》的剧本版权。^⑩王尔德尽管身体虚弱，还是设法让内瑟索尔“搞明白了，他没有权利使用或上演我的剧本提纲”。然而，胜利是有限的。内瑟索尔随后联系了弗兰克·哈里斯，声称他有权在纽约使用该剧本。^⑪这并不是哈里斯要面对的唯一问题。从两人“合作”伊始，王尔德就指出布朗-波特夫人（和克尔·贝柳）拥有这个剧本的版权，哈里斯必须和他们达成某种协议。哈里斯咨询法律顾问之后，认为他无须做这些事情，因为“其中并不涉及版权”。^⑫但他似乎发现很难坚持这种立场，于是随后向贝柳和布朗-波特支付了125英镑。^⑬但即便如此，事情也没有尘埃落定。

10月初该剧投入制作，新近破产的伦纳德·史密瑟斯也找到哈里斯，因为王尔德之前曾承诺要偿还160英镑，而他至今分文未得。哈里斯不顾王尔德的强烈反对，觉得有必要再花100英镑搞定史密瑟斯。^⑭这是一笔巨大的、意想不到的开支。而且，付完这笔钱之后，哈里斯只能——或者说只愿意——给王尔德25英镑，而不是两人协议中商定的175英镑。王尔德已经被医药费折腾地虚弱而焦躁不安，这下彻底被激怒了。他躺在病床上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做了通篇的自我辩白，反复要求归还他失去的这笔钱。

正当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10月17日，也就是王尔德46岁生日的第二天，罗斯匆匆赶到巴黎。罗斯对哈里斯深表同情，他指出王

尔德现在的处境比过去“要好得多”，因为哈里斯制作了这部剧之后，不仅会还清所有人预付给王尔德的钱，还能够让王尔德分享版税。对此，王尔德以他特有的方式回答说，哈里斯剥夺了他“唯一的收入来源，他拿走了一个能为我筹到100英镑的剧本”。^⑩这样的幽默令人欣慰。事实上，罗斯发现王尔德“精神矍铄”，这让他很受鼓舞。他给莫尔·阿迪写信说：“尽管他告诉我病势沉重，但他同时有说有笑，讲了很多嘲弄医生和他自己的故事。”他招待着一个接一个的朋友。^⑪

虽然每天负责护理的护士担心，塔克医生没有充分意识到王尔德病情的严重性，但病情马上就出现了好转的迹象。^⑫雷吉·特纳的到来让王尔德很开心；他和罗斯每天都来，有时候一天两次。他们经常和王尔德一起在他的房间里共进午餐或晚餐。食物是从附近的餐馆端来的，大家无一例外地喝下了“太多的香槟”。王尔德尽管看起来病恹恹的，却“始终非常健谈”和十分逗乐。当王尔德身上恼人的皮疹复发，而被罗斯发现正在抓挠时，他说：“说真的，我比以前更像一只大猩猩了，但我希望你给我的是午餐，博比，而不是坚果。”^⑬

10月25日，罗斯的弟弟亚力克、威利的遗孀和她的新婚丈夫亚历山大·特谢拉·德马托斯也来了，这是一场特别欢乐的聚会。^⑭王尔德神采奕奕地重复了他的那句话：英国人不会容忍他活到下一个世纪。他还说，法国人也绝不会再容忍他了，他们认为“博览会的失败应由他个人负责”，因为英国人“看到他衣冠楚楚、仍然那么快活时”便

都赶紧逃走了。此外，他还提到了自己不断增加的医药费，以及对香槟的喜爱，他说自己会“入不敷出地死去”。^①

这些俏皮话掩盖了王尔德对债务的真正焦虑，他欠了一大笔钱——他的医生、艾达·雷汉、达尔·扬，尤其是阿尔萨斯旅馆老板迪普瓦里耶（他一直那么耐心和慷慨）。据王尔德计算，欠款总共“大概在400英镑以上”，其中近四分之一是他的旅馆账单。在这个问题上，他时常表现得漫不经心，现在却“对一些债主怀有自责的悔恨之心”。^②事实上，塔克医生认为，为酒店账单而焦虑可能正在妨碍王尔德康复。罗斯和特纳由于自身财力有限，无法提供帮助。不过，罗斯写信给道格拉斯，提醒他关注王尔德的状况，并且强调了王尔德对债务的担忧。^③^④哈里斯未能寄出那笔未付的150英镑，这件事情让王尔德愤愤不平。它成了一种执念。王尔德虽然没写其他东西，但他每周都会写一封冗长的指责信，信的结尾总是恳请哈里斯把“你欠的”钱寄来。^⑤^⑥

尽管塔克医生不断提醒，但王尔德自从手术后就一直不愿意起床。不过，10月29日那天，他不但起了床，而且还提议出去走走。晚上，罗斯陪着他散步到附近的咖啡馆。王尔德虽然走路“有些费劲”，但他看上去“状态不错”。医生嘱咐他不要喝烈性酒，他却听不进去，“坚持喝苦艾酒”。^⑦第二天，他便毫无悬念地起不了床了。但又过一天，为了享受秋日的阳光，他觉得可以坐车去布洛涅森林兜风。^⑧罗斯与他一起短途旅行，他们中途在几家咖啡馆稍事停

留，其间王尔德又点了一杯苦艾酒。当罗斯向他提出异议时，他严肃地答道：“我为什么而活呢，罗比？”^①

“死亡”连同“弗兰克·哈里斯”一起成为王尔德反复提及的话题。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与死人一起吃晚饭”。听到这个说法，特纳——让王尔德非常高兴——说了一句：“我亲爱的奥斯卡，你也许是这场聚会中的生命和灵魂。”^②一天罗斯从拉雪兹神父公墓回来，王尔德问起有没有替他挑选一块墓地，接着便开始讨论——“以一种非常轻松愉快的方式”——他的墓志铭。^③他希望罗斯也能葬在附近：“当最后的号角声响起，我们躺在自己的斑岩墓穴里时，我会转身说，‘罗比，罗比，咱们就假装什么也没听见！’”^④

他的脑海中也会掠过一些较为传统的想法。一名《每日纪事报》记者跟踪他到病房，王尔德（吐露了弗兰克·哈里斯的背叛行为之后）向他讲述了宗教带来的安慰。“我在道德上的偏颇，”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父亲不允许我皈依天主教。教会也有艺术的一面，它那芬芳的教义本会治愈我的堕落。我打算不久之后就皈依它。”^⑤罗斯仍然不相信，但他承诺，如果王尔德真的快死了，他会去请一位牧师来。^⑥然而，这个时刻似乎还没有到来。

虽然王尔德自称正在迅速走向末日，但和以往一样，这种姿态中有很多自我戏剧化的成分。有时候，他很可能真的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了”。^⑦但转过头来，他就开始为将来制订计划。^⑧塔克医生仍然很乐观。他相信，即便王尔德没有“振作起来”——并且彻底戒酒——他也至少还能再活“5年”。^⑨

罗斯听了这番预测后很受鼓舞，继续他自己的计划，去尼斯和母亲过冬。王尔德同样受到鼓舞，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追随他们去南方。但11月的第二周，也就是罗斯即将离开的前几天，王尔德的耳朵疼痛加剧了。感染复发了。罗斯在临行前夜登门告别，发现王尔德说话含糊不清，他无法确定这是因疾病引起，还是由于注射了吗啡，或者是喝了香槟。①他们进行了一次令人痛心的面谈。王尔德请特纳和看护护士出去一下，他恳求罗斯留在巴黎；“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坚持说，自己感觉病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大哭起来，说他害怕再也见不到罗斯了。然而，罗斯认为这一切不过是有点歇斯底里。他不为所动。事实上，王尔德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他们谈了些别的事情。临别时，他对罗斯说“在尼斯附近山上给我找一小块地”，等他“好点了”，就可以去那里——并且“你也能经常来看我”。②

罗斯不在的时候，特纳在几名护士和迪普瓦里耶的帮忙之下，承担起看护的责任，莫里斯·吉尔伯特偶尔也来帮忙。塔克医生每天都来。王尔德从院子边一楼的房间搬到了二楼的13号房间。③他不甘心当病人——常常“很难护理而且态度粗鲁”。他拒绝让护士在他腿上涂芥末膏。④但时常注射吗啡——常常由迪普瓦里耶注射——缓解了疼痛，他偶尔能够起床。特纳还带他出去坐了几次车。⑤

朋友们不间断地来看望他；有来自贫民区和卡利萨雅咖啡馆的诗人。一阵阵谈笑声此起彼伏。王尔德对作家克莱尔·德·普拉茨说：“我和我的墙纸正在进行一场殊死决斗。我们两个中，有一个必须离开。”⑥大家经常谈论起去法国南部旅行的计划。但王尔德现在很容

易疲倦，他睡得越来越多。❶罗马尼亚流亡诗人海琳·瓦卡雷斯库来看望他时，发现他正躺在床上，脸对着墙。她在桌上留下一瓶香槟和一些“安慰品”，便悄然离开了。“谢谢你，陌生人。”王尔德没有转身，低声嘟囔了一句。❷

脆弱的平衡维持了一个多星期。11月24日晚，王尔德的病情恶化。他“突然觉得头晕”，神志不清。第二天他起不来了。塔克对事态的转变感到震惊，他向“脑专家”保罗·克莱斯医生征求意见。很明显，正在化脓的中耳感染已经影响到王尔德的大脑。这样的发展十分可怕。现在，恢复的希望非常渺茫。特纳立刻写信给罗斯，告诉他王尔德情况不妙。❸

11月27日，塔克和克莱斯注意到症状不断恶化，便出具了一份会诊报告。无疑，经诊断肯定是“脑膜炎”。由于他的大脑和周围的脑膜都发炎了，进行外科介入性治疗是不可能的。病人的病情只能通过药物和其他保守疗法予以缓解。❹

王尔德在睡梦中辗转反侧。他头上敷着冰袋以减轻压力。❶他经常神志不清，似乎“一直用英语和法语说着胡话”，但有时候会突然清醒。他说，特纳应该去当一名医生，因为他“总是希望别人做那些他们不想做的事”（这是在特纳恳求他不要吸烟之后）。❷还有一次，特纳手持冰袋在他头上敷了45分钟之后，王尔德对他说：“你这个可爱的小犹太人，你不觉得这已经够了吗？”❸他之前曾说：“犹太人没有优美的人生哲学，但他们是令人愉快的。”❹他有时候口齿不清。当他想要一份《祖国报》(Patrie)的时候，他要的却是火油

(paraffin)。❶ 他问特纳，是否能请一位“芒斯特来给他做饭？”——又补充说“两艘汽船非常相似”。王尔德可能想象自己回到了年轻时代的爱尔兰：“芒斯特”是定期往返于霍利黑德和金斯顿之间的船只之一。❷

11月29日星期四上午，罗斯回到巴黎。收到特纳的信后，他立即连夜搭乘火车出发。他极其难过地发现，王尔德形容枯槁地躺在那里，皮肤呈青灰色，呼吸沉重。他的头发被剃了一部分，以便到时候可能会用到水蛭。王尔德虽然似乎意识到罗斯的存在，但他说不出话来。塔克和克莱斯也在场。他们证实王尔德活不过两天。罗斯回想起自己的承诺，问他要不要找个牧师来。王尔德举起手表示默许。❸

罗斯下午4点左右和卡斯伯特·邓恩神父一起回来了。卡斯伯特·邓恩是一名年轻的牧师，隶属于奥什街（靠近凯旋门）的圣约瑟夫教堂。他们到达时，王尔德渐渐恢复了意识，他试图说话，却一个字也说不出。然而，当邓恩神父解释说，他是来接纳王尔德加入天主教会并主持病人圣礼时，王尔德的“手势”和“尝试说话的努力”足以让神父确信，已经获得了他的同意。邓恩神父不顾附着在病人额头上的两条水蛭，及时给他施了圣礼。牧师凑近王尔德，对着他的耳朵念诵“信仰、希望、慈善和忏悔的做法”，以及“谦卑地顺从上帝意志”等教义。王尔德似乎在试图重复这些话。❹

协助神父进行完这些仪式后，罗斯给道格拉斯和弗兰克·哈里斯发了电报，告诉他们王尔德即将离世。他还给律师霍尔曼发了电报，以

便通知王尔德孩子的监护人阿德里安·霍普。晚上塔克医生又来了。他认为病人也许还能苟延“几天”。

那天晚上有人一直在床边守夜。由于护士已经精疲力竭，他们不得已又找了个专职看护。罗斯和特纳睡在酒店楼上的一个房间里。罗斯写信告诉莫尔·阿迪：

我们两次被看护叫醒，他以为奥斯卡真的要死了，大约凌晨5：30，奥斯卡的模样完全变了，脸上的线条都变样了，我相信所谓的垂死挣扎开始了，但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任何像这样的声音。它听起来就像是转动曲柄时发出的可怕嘈杂声，而且它从头到尾一直没停过。他的眼睛不再对灯光测试做出反应。泡沫和血从他的嘴里冒出来，必须由站在他旁边的人不停地将它们抹去。①

早上，邓恩神父接到电报，回来主持临终圣礼。②中午，罗斯和特纳轮流出去了一小会儿用午餐。下午1点的时候，两人都回到了床边。王尔德喉咙里发出的奇怪声音越来越大。迪普瓦里耶也来接替值班的两个护士。差一刻2点时，王尔德的呼吸变了。罗斯走到床边，握住他的手。王尔德深深地叹了口气，他的四肢似乎不由自主地伸展开来。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微弱。他在下午2点差10分的时候去世了。③

经过几天的“可怕的挣扎”，罗斯和特纳看到他们的朋友终于“安静下来”，感到如释重负。④但除了肉体上的痛苦，还有一种棘手的问题获得解决的感觉。在过去的三年里，人们发现，要想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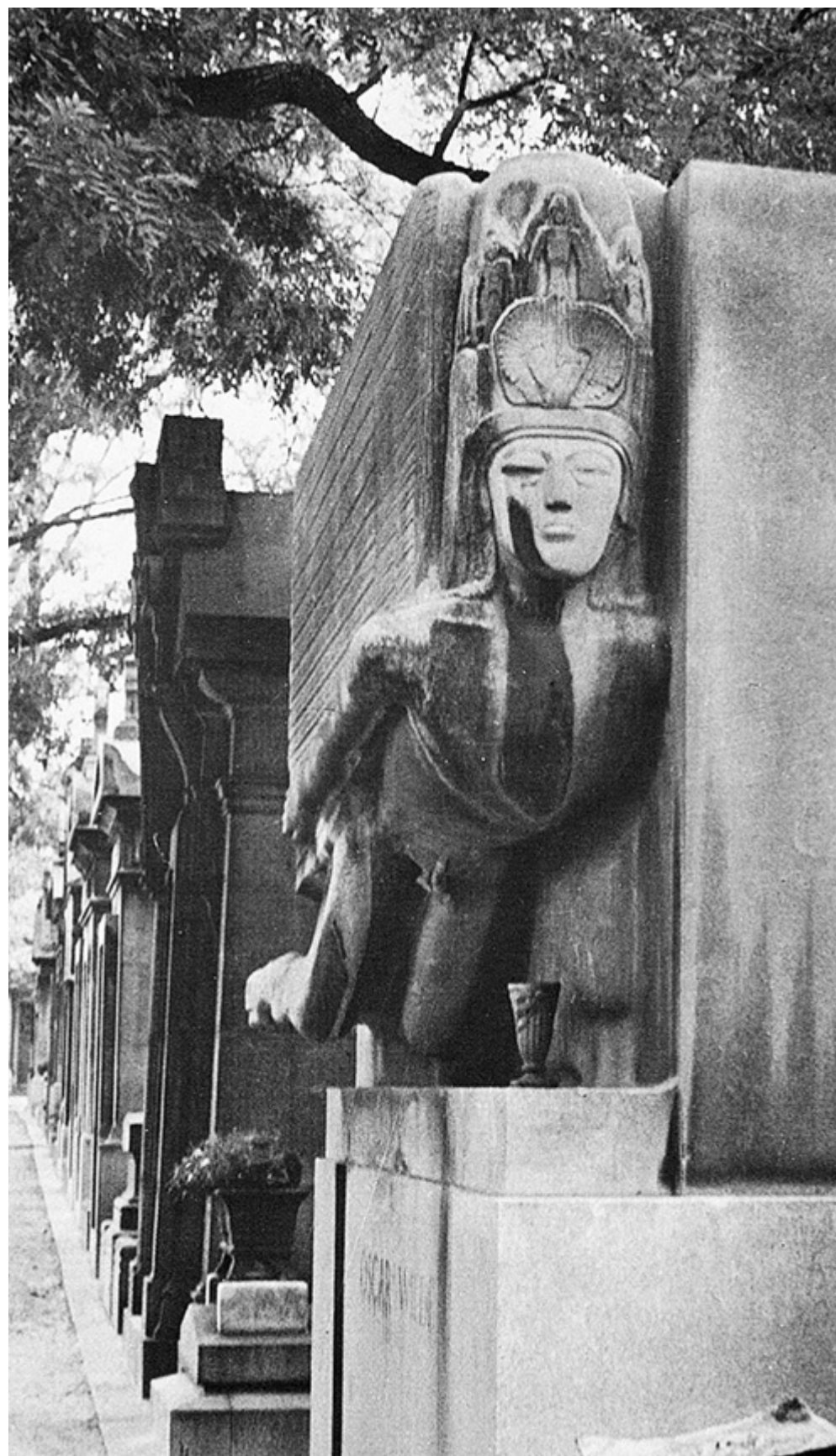
王尔德的生活向幸福而富有成效的方向发展，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当然，虽然失去这样一位伟大而又难得的人物令人相当遗憾，但“那句最落俗套的话”：“这是最好的结局”，用在他身上却是千真万确的。❶

王尔德的去世并没有引起公众或媒体的极大兴趣和关注。12月3日上午举行了简朴的葬礼。❷ 大约有50人聚集在圣日耳曼教堂高高的祭坛后举行了简单的仪式：一些法国小作家、阿尔萨斯旅馆的员工、几名记者，还有一些老朋友。罗斯、特纳和莫里斯·吉尔伯特跟在灵柩后面。道格拉斯前一天从英国赶来，作为“主要哀悼者”出席了葬礼，但弗兰克·哈里斯因为卧病在床，无法前往。

法国和英国报纸都敷衍了事地刊登了讣告。罗斯认为，总的来说，保持沉默总比廉价的说教要好。❸ 事实的确如此。流行一时的“诗歌正义”观决定了王尔德的最后几年必然是不快乐的。❹ 《泰晤士报》的讣告在简要概述王尔德的生涯之后，在结尾处写道，死亡终结了王尔德“一段注定充满不幸和遗憾的生活”。❺ 《星期日泰晤士报》称，王尔德获释时留给他的“少量同情”“被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和恶劣环境挥霍殆尽”。讣告的结尾写道：“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悲惨的，遭受蓄意摧残的人生记录了……这个不幸的人唯一的墓志铭是：‘哦，真可惜！’”❻

罗斯相信，人们“以后”会认识到王尔德真正的成就，他的作品会一直流传下去，但他去世时人们对他的文学作品（而不是他本人）所作的少数直接评价则表明，这种等待可能会很漫长。《帕尔摩报》

称，尽管他有“惊人的聪明才智”，但他“缺乏实质性”：他的戏剧虽然充满了机智的“亮点”，但缺乏戏剧的“建设性能力”。甚至连《雷丁监狱之歌》也被认为不过是“一篇熟练的仿作”。在他的美学“荒诞”时期，他或许对“纠正英国人的迟钝”稍有用处，“他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持久力”。根据他们经深思熟虑作出的估计，王尔德对文化记录最持久的贡献仍将是他对大西洋的“失望”。^⑨





后记

昨夜我梦见了他，看见了他的脸，
容光焕发，没有痛苦的阴影，
像在过去那样，在无量的乐声中，
我听见了他那金子般的声音，画出他的轨迹，
那是隐藏在尘凡之下的美，
空虚中变幻而出的奇妙。

——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逝去的诗人》

罗伯特·罗斯希望王尔德的文学声誉能及时获得恢复，这在1900年的冬天似乎是一种幻想。但实际上，某种程度的救赎确实是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

人们普遍认为，在长达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王尔德的戏剧都没有在英国上演，这一观点并没有事实予以佐证。如迈克尔·西尼在他的戏剧史中所示，在王尔德倒下后的十年里，从弓街到丽兹酒店一直在成功上演王尔德的喜剧——尽管是地方巡回演出。它们带来的愉悦是无法否认的。

罗斯作为公认的王尔德文学遗嘱执行人，勤勤恳恳地维护着仍然属于王尔德遗产的少数版权，其中最能获得直接盈利的是《莎乐美》。尽管这部剧在英国仍然被禁，但它在欧洲寻到了知音，尤其是在德国。1902年，理查德·施特劳斯亲眼见证了马克斯·莱因哈特在柏林的著名演出，该剧启发他要以歌剧的方式来演绎这个故事。国外的认可促进了国内地位的提升。施特劳斯的歌剧《莎乐美》于1905年在德累斯顿成功首演，这成为促使英国审查官重新考虑对该剧执行禁令（该禁令于1907年被取消）的因素之一。

作为王尔德各种作品最终版本计划的一部分，罗斯经过大量编辑，在1905年出版了王尔德篇幅极长的监狱信件。它被命名为《自深深处》。书中拿掉了所有苦涩的个人指责（事实上还删去了所有指向道格拉斯的内容），展示的是对惩罚和忏悔的哲学思考。事实证明，该书极其受欢迎，这或许有点出人意料。这本书通过展现一幅饱受磨难的画面，拯救了公众眼中的王尔德。他已经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了代价。

及至1906年初，罗斯终于使得王尔德免于破产。1909年，王尔德的遗体从郊区默默无闻的巴涅墓地移至拉雪兹神父公墓——在那里，一座由雅各布·爱泼斯坦设计的宏伟的葬礼纪念碑已经适时地竖立其上。

随着王尔德的作品日益获得欣赏，人们对他的生活也越来越感兴趣。王尔德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写道：“如今，每个大人物都有自己的信徒，而写传记的总是犹大。”在王尔德的众多门徒中，

将善意的谢拉德塑造成犹大或许有些苛刻；不过，他的确是第一个匆忙印刷出版的人，推出了《奥斯卡·王尔德：一段不愉快的友谊故事》(1902)和《奥斯卡·王尔德的一生》(1906)；1907，《奥斯卡·王尔德》出版了，它由伦纳德·史密瑟斯的前密友、机会主义者兰杰·格尔(Ranger Gull)剪剪贴贴拼凑而成，该书作者署名为“伦纳德·克雷斯韦尔·英格比”(Leonard Creswell Ingleby)。尽管这些书名不副实，但它们都开始聚焦于王尔德那些或令人兴奋，或令人扼腕，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他们也开始将王尔德的形象定位成一个典型的同性恋男人——华丽、机智、挑衅，略带柔弱。这是一种颇吸引人眼球的组合。

1912年，克里斯托弗·米勒德（化名“斯图亚特·梅森”）出版了王尔德著作的权威参考书目，罗斯得以在序言中写道，该书目的出现证实了其预言的真实性，即王尔德的著作将“比几乎任何同代人的作品更能激起广泛的兴趣”。“事实上，除了狄更斯和拜伦之外，”他补充道，“我怀疑19世纪的英国作家中，还有谁比他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更加享有盛名。”

然而，同一年，在罗斯的指导下，年轻的阿瑟·兰塞姆出版了《奥斯卡·王尔德：批判性研究》，这一势头变得复杂起来。虽然这本书主要关注王尔德的作品，但其传记部分（由罗斯收集的资料和《自深深处》未出版的部分组成）隐晦地提到了王尔德对道格拉斯的敌意，原因是道格拉斯在王尔德的没落及其后续结果中所扮演的角色。道格拉斯当时已经结婚，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并对自己的同性恋经历产生了

厌恶。他对兰塞姆及其出版商发起了诽谤诉讼。1897年，他连看都没看，就销毁了寄给他的《自深深处》原信副本，因此他根本不知道兰塞姆的评论出自何处。当法庭朗声宣读王尔德的信（由罗斯保存并出示），并谴责他的卑鄙和无能时，他不得不忍辱听完整封信。这段经历令人肝肠寸断。

为了替自己辩护，他（在斗志旺盛的助手T.W.H.克罗斯兰的协助下）匆匆写出了《我与奥斯卡·王尔德》一书，用尖刻而片面的笔调，将王尔德描述成一个无能、腐朽的江湖骗子。由此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反对纪念王尔德的运动。在另一次出庭中，道格拉斯将王尔德描述为“过去350年里，出现在欧洲的最强大的邪恶力量”。虽然道格拉斯最终妥协了，并对他与王尔德的关系有了一种更平衡的看法，但正是由于他威胁要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阻止了弗兰克·哈里斯的《奥斯卡·王尔德传》1916年在英国出版。该书尽管有许多虚构的片段，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肖像。这本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那里的人对王尔德的兴趣增长极快，其速度几乎超越了欧洲。尽管哈里斯的书直到1938年才在英国出版，但对它的压制并没有削弱王尔德日益增长的声望。

1927年，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赖写信给他的朋友海伦·安雷普说，重读王尔德的文章时，他“相当震惊并羞愧地”“发现我对他的评价如此之少”。尽管弗赖认为王尔德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但他仍然设法成为“比当时所有高尚的雄辩家，如卡莱尔、罗斯金等，更接

近某种真理的人。他拥有一种保持正确的方式，这在当时是令人吃惊的，甚至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吃惊的”。

自那以后的几年里，这一判断以不同的形式和节奏得到了回应。它适应了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侧重点。王尔德闪耀的智慧创造了一种鼓励所有的异端邪说的开放式话语。而且，他在去世之后戴上了与之生前一样多的面具，而且其活力不减当年。他以反文化的叛逆者、同性恋殉道者、英国殖民压迫的受害者、原始现代派、原始后现代派、“酷”的先驱者等形象出现。这个列表还会继续下去。王尔德保留了他所有传说中的沟通能力。他仍然拥有“一种保持正确的方式”，既“令人惊骇”又令人愉悦。

注释中使用的简称与缩写

人名

CMW——康斯坦斯·玛丽·王尔德，娘家姓劳埃德，后改为霍兰德

ES——爱德华·沙利文

JFW——简·弗朗西斯卡·王尔德，娘家姓埃尔吉，笔名“斯佩兰萨”

JMW——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

LAD——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

LVK——洛滕·冯·克雷默

MQ——昆斯伯里侯爵

OW——奥斯卡·王尔德

RR——罗伯特·罗斯

WCKW——威利·王尔德

WRWW——威廉·罗伯特·威尔斯·王尔德爵士

奥斯卡·王尔德作品

AIH——《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and)

BRG——《雷丁监狱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LWF——《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 s Fan)

IBE——《不可儿戏》(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PDG——《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WNI——《无足轻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

《牛津英语读本》系列，包括奥斯卡·王尔德的所有作品

OET I ——《牛津英语读本 I》，《诗集》，编者Bobby Fong
和Karl Beckson(2001)

OET II ——《牛津英语读本 II》，《自深深处》，编者Ian
Small(2005)

OET III ——《牛津英语读本 III》，《道林·格雷的画像》，编者
Joseph Bristow(2005)

OET IV ——《牛津英语读本 IV》，《评论》，编者Josephine
M.Guy(2007)

OET V ——《牛津英语读本 V》，《剧本 I》，编者Joseph
Donohue(2013)

OET VI——《牛津英语读本VI》，《新闻报道 I》，编者John Stokes、Mark Turner(2013)

OET VII——《牛津英语读本VII》，《新闻报道 II》，编者John Stokes、Mark Turner(2013)

图书馆与研究机构

Austin——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哈利·兰塞姆中心

Berg——纽约公共图书馆伯格藏书

BL——大英图书馆

Clark——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安德鲁斯·克拉克图书馆

GUL——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

Fales——纽约大学法尔斯图书馆

Houghton——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

TCD——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Yale Beinecke Library——耶鲁大学贝内克图书馆

其他作品

Blackwood' s——[George A.Macmillan] , "A Ride Across the Peloponnese" , Blackwood' s Magazine , 123 , no.751 , May 1878

Beckson——Karl Beckson , ed. , 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1970)

CL——Hart-Davis , Rupert and Merlin Holland , eds , Complete Letters of Oscar Wilde(2000)

Coakley——Coakley Davis , Oscar Wilde: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rish(1994)

Croft-Cooke——Croft-Cooke , Rupert , The Unrecorded Life of Oscar Wilde(1972)

Dibb——Dibb , Geoff , Oscar Wilde: A Vagabond with a Mission(2013)

DNB——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2004)

Dulau——A.Dulau & Co. , A Collection of Original Manuscripts, Letters and Books of Oscar Wilde(1929)

Ellmann——Ellmann, Richard, Oscar Wilde(1987)

Friedman——Friedman , David M. , Wilde in America(2014)

Guy & Small——Guy, Josephine M. and Ian Small, *Oscar Wilde's Profession: Writing and the Culture Industr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2000)

Harris——Harris, Frank, *Oscar Wilde, His Life and Confessions*(1916)

Hofer & Scharnhorst——Hofer, Matthew and Gary Scharnhorst, eds, *Oscar Wilde in America: The Interviews*(2010)

Holland——Holland, Merlin, *Irish Peacock, Scarlet Marquess*(2003)

Hunter-Blair——Hunter-Blair, Sir David, "Oscar Wilde As I Knew Him", In *Victorian Days and Other Papers*(1939), 115-43

Hyde, Aftermath——Hyde, H.Montgomery, *Oscar Wilde: The Aftermath*(1963)

Hyde, LAD——Hyde, H.Montgomery, *Lord Alfred Douglas: A Biography*(1984)

Hyde, Oscar——Hyde, H.Montgomery, *Oscar Wilde: A Biography*(1974)

Hyde , Trials——Hyde , H.Montgomery , The Trials of Oscar Wilde(1948)

Lewis & Smith——Lewis , Lloyd and Henry J.Smith , Oscar Wilde Discovers America(1936)

Maguire——Maguire , J.Robert , Ceremonies of Bravery : Oscar Wilde, Carlos Blacker, and the Dreyfus Affair(2013)

Mason——Mason , Stuart , Bibliography of Oscar Wilde(1914)

McKenna——McKenna , Neil , The Secret Life of Oscar Wilde(2003)

Melville——Melville , Joy , Mother of Oscar : The Life of Jane Francesca Wilde(1994)

Mikhail——Mikhail , E.H. , ed. , Oscar Wilde : 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1979)

Morse——Morse , W.F. , “American Lectures” , in The Works of Oscar Wilde(1907)

Moyle——Moyle , Franny , Constance : The Tragic and Scandalous Life of Mrs Oscar Wilde(2011)

NYT——《纽约时报》

O' Sullivan——O' sullivan , Vincent , Aspects of Wilde(1936)

OWIA——Oscar Wilde in America website ,
www.oscarwildeinamerica.org

Pearson——Pearson , Hesketh , The Life of Oscar Wilde(1946)

PMB——Pall Mall Budget (《帕尔摩文摘报》)

PMG——Pall Mall Gazette (《帕尔摩报》)

Raffalovich/Michaelson——Alexander Michaelson [André Raffalovich] , “Oscar Wilde” , Blackfriars VII, no.92 (1927),
reprinted in Sewell, Brocard, Footnote to the Nineties(1968)

Ransome——Ransom , Arthur , Oscar Wilde : A Critical Study(1912)

Ricketts——Raymond , Paul and Charles Ricketts ,
Recollections of Oscar Wilde(1932)

Robins——Robins , Ashley H. , Oscar Wilde : The Great Drama of His Life(2011)

Schroder——Schroeder, Horst, Additions and Corrections to Richard Ellmann' s Oscar Wilde(2002)

Sherard , Life——Sherard , Robert H. , The Life of Oscar Wilde(1907)

Sherard , Real——Sherard , Robert H. , The Real Oscar Wilde(1916)

Sherard , SUF——Sherard , Robert H. , The Story of an Unhappy Friendship(1902)

Smith & Helfand——Smith , Philip E. and Michael S.Helfand, eds, Oscar Wilde' s Oxford Notebooks(1989)

Tipper , Hilson——Tipper , Karen Sasha Anthony , ed. , Lady Jane Wilde' s Letters to Mr John Hilson , 1847-1876(2010)

Tipper , Kraemer——Tipper , Karen Sasha Anthony , ed. , Lady Jane Wilde' s Letters to Froken Lotten von Kraemer , 1857-1885(2014)

Tipper , Oscar——Tipper , Karen Sasha Anthony , ed. , Lady Jane Wildes Letters to Oscar Wilde(2011)

White——White , Heather , Forgotten Schooldays : Oscar Wilde at Portora(2002)

Wright——Wright, Thomas, Oscar' s Books(2008)

WW——《女性世界》(Woman' s World magazine)

ts——Typescript (手稿)

图片来源

封面

封面、封底TPG Images

篇章页图片

第2、615页The William Andrews Clark Memorial Library

第92、216、334、446、744、842、984、1058、1128页TPG Images

第924页The Standard, Vol.XIII, September 1895

彩插

1、2、3、7、11、14、15、16、21、22、23、25、27、30、33、34、35、37、38、39默林·霍兰(Merlin Holland)私人收藏

4、5、6、8、9、12、13、17、18、19、20、24、26、28、29、32、36 Wikimedia Commons

10 TPG Images

31 The William Andrews Clark Memorial Library

索引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the Academy, review of OW' s Poems 186-7

Acland, Sir Henry 53, 114

Adam, Madam 429

Adam, Paul 595

Adams, Clover 221-2

Adams, Henry 221

Adderley, Rev.James 623-4

Adey, More 576, 702, 709, 714

and OW' s exile 635, 652, 662, 668

and OW' s finances 593-4, 605, 621, 622-3

and OW' s imprisonment 592, 603-4, 606, 610, 613,
618, 621

and OW' s release from prison 627, 628, 629

Aeschylus 91, 114

Agamemnon 35, 42, 164

Eumenides 332-3

and OW' s lecture tour of Britain 304

Aestheticism

at Oxford 187-8

Grosvenor Gallery exhibition 109-10, 110, 113-15, 121, 143, 177

and interior decoration 97-100, 121, 145

and OW at Oxford 121-3

and OW in London 136, 140, 143, 157-9

and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193, 199-200, 201, 202, 208, 220, 221-2, 225-6, 230-1

and OW' s trial 564

and Rome' s art treasures 107-8

satire of 170-4, 193

see also Pre-Raphaelites

Afghan War 165

Ainslie, Douglas 316-17, 335, 456

Albany,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209, 223

Alcott, Louisa M.204

Alexander, George 405, 412-13, 446, 458, 469, 538,
542, 548, 571

and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513, 515, 518, 533-
4, 536, 593

and *Lady Windermere' s Fan* 325, 423, 439-41, 444,
456, 498

and OW' s exile in France 639, 693, 701-2, 705

Alexander the Great 104, 107

Alexander II, Czar of Russia 168, 192, 195

Algeria 534-6, 537, 538

Alice, Princess of Monaco 423, 429

Allen, Grant 411

Allen, Mr(Oxford tutor) 100, 101, 109

Allen, W.D.64

Allen, William 547, 550

Allis, Alix 524

Alma-Tadema, Laurence 181

Althaus, Fred 371, 383

Anderson, Mary 213, 263, 264-5, 271, 273-4, 277, 283-4, 286, 386

Angelico, Fra 65, 73, 74

Anrep, Helen 719

Applegate, Mary 568-9

Appleton, George 313, 315, 325

Appleton, Tom 258

Archer, William 328, 330, 455, 478

Aristophanes, Clouds 70, 76

Aristotle 91

Ethics 64

Arnold, Matthew 42, 64, 65, 117, 141, 143, 329, 380, 418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in the Present Time’ 397

and OW’ s Poems 185, 186

Art Journal 356

Arthur, Chester 212

The Artist 525

Ashton, I.D.W(‘Sir John’) 658

Asquith, Herbert 411, 421, 505, 559-60, 575, 591

the Athenaeum 131, 165, 673

Athens 105-6, 144, 152

Atkins, Fred 468, 546, 547, 553

and OW’ s trial 562-3, 572, 573, 574

Atkinson, G.T.63, 86

Atwood, Roland 415

Augustine, St, Confessions 591

Austen, Jane 29, 404

Australia 257, 265, 440, 475, 511, 525

Avory, Horace 579

Badley, J.H.333-4, 520

Balcombe, Florence(later Stoker) 93, 94, 115, 131, 147-8, 156

Balfour, Arthur 420, 421

Defence of Philosophic Doubt 359-60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Wilde) 637-9, 641, 645-6, 652-3, 654-5, 659-61, 663-4, 665, 667, 684, 686, 693, 699, 715

in America 669

'Author' s Edition' 675

earnings from 680

publication of in London 673-5, 676, 691

success of 694-5

Trooper Wooldridge in 661, 664

Baltimore,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209, 219-20, 223

Balzac, Honoré de 9, 258, 272

Comédie Humaine 275

Bancroft, Minnie 196, 371

Bancroft, Squire 140, 196, 478

Banville, Théodore, Le Baiser 446

Barlas, John 408-9, 410, 411, 414, 439

Barnes, General 245

Barney, Natalie 259

Barnum, P.T. 219, 254

Barrès, Maurice 604

Barrett Browning, Elizabeth 9, 30, 186

Barrett, Lawrence 264, 286, 295, 386, 387, 411-12

Barrow, Jack 116

Barton 68, 101

Bastien-Lepage, Jules 159

Baudelaire, Charles 281, 310, 323, 372, 374, 392, 432, 433

Les Fleurs du Mal 55, 279, 280

Bauer, Henri 595, 604, 675, 684

Beardsley, Aubrey 537, 642, 644

and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645-6

death 681-2

illustrations 482, 494, 499-500, 503

translation of Salomé 493

and the Yellow Book 500, 503, 564, 641-2

Beardsley, Mabel 537

beauty

celebration of male beauty 99

OW on 120-1

Ruskin' s theory of 65-6, 123

see also Aestheticism

Beck, Philip 312

Beecher, Henry Ward 259, 266, 293

Beerbohm, Max 481-2, 492, 505, 520, 521, 523, 669

'Defence of Cosmetics' 503

The Happy Hypocrite 629

'Oscar Wilde by An American' 482, 503

and OW' s trial 570-1, 573-4, 576

'A Peep into the Past' 500

Beerbohm Tree, Herbert 171, 368, 421, 458, 466, 527

and OW' s 'madness of kisses' letter 479, 480

in A Woman of No Importance 477-8, 701

Beerbohm Tree, Mrs 421

Beere, 'Bernie' 477, 629

Beere, Mrs Bernard 195, 240-1

Belgium 150-1

Bellew, Kyrle 697, 709

Bellini, Giovanni 73

Bennett, Rev.W.J.E.31-2

Benson, Eugene 108, 143

Benson, F.R.164

Beranger, Gabriel 92, 93

Berenson, Bernard 341, 343, 368, 396, 503, 504, 668, 674

Berkeley, Bishop George 54

Berneval-sur-Mer, OW' s exile in 631-48, 687

Bernhardt, Sarah 146-7, 156, 159, 200, 203, 212, 278, 309, 639, 640

and OW' s trial 565

and Salomé 437, 453-4, 538, 539, 566

in Tosca 694

Bierce, Ambrose 243-4

Bigelow, John 210

Bigelow, Mrs John 204

Bingham Rectory 91-2

Biograph and Review, profile of OW in 165-6, 167

Biron, Chartres 489

‘The Birthday of the Princess’ 380-1

Bishop, W.Irving 182

Bispham, David 403

Black and White magazine 446

Blacker, Carlos 344, 364, 366, 382, 416, 456, 466-7,
494, 495

and the Dreyfus affair 677-8

and OW' s exile

in France 644, 646, 648, 680, 681, 683-4

in Naples 650, 651, 652

Blacker, Carrie 677

Blackwood' s Magazine 143, 382, 384, 385, 388

Blaine, Senator and Mrs 221

Blake, William 337, 372

Blanche, Jacque-Emile 644

Blanche, Jacques-Emile 276, 416, 431

Blavatsky, Madame 383, 384

Blaydes, Wilfrid 668, 670

Bloxam, J.F.544

Bloxam, John 526

Blunt, Wilfrid 420, 422, 428, 445, 451, 505, 511, 516

In Vinculis 359

The Bodley Head 438-9, 475, 564

uniform edition of OW plays 482

Bodley, J.E.C.63, 67-8, 69, 71, 84, 91, 119, 125

and Freemasonry 69, 70

in Paris 429, 690

and Ruskin 65

Bogue, David 183, 438-9

Boniface, George C.293

Boon, John 510

Boston

OW' s lectures in 209, 223-6, 232-3

Roberts Brothers 184, 212, 364

Boston Globe 228

Boston Pilot 84, 184, 223, 294

Botticelli, Sandro 65

Boucicault, Dion

and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192, 232, 234

and OW' s Vera 169-70, 195, 296

Boucicault, Dot 195, 241

Bourget, Paul 276, 280, 282, 308, 604

Bovio, Giovanni 657

Bowden, Fr Sebastian 124-5

Boyd, Frank M.510

Bradley, Katharine 404

Bradley , Margaret(later Margaret L.Woods) 121 123 ,
124, 353

Braggiotti, Madam 224

Bramley, Mr, dean of Magdalen 103

Bridge, Sir John 561, 563

Brighton

OW and Alphonse Conway in 522

OW and Douglas in 522-3

Britain

OW' s lecture tour of 289-92, 299, 301-2, 303-4, 313-16, 325

'Dress' 313-15, 316

'The House Beautiful' 298, 299, 304, 305, 313

'Personal Impressions of America' 289-92, 297-8, 299, 370

'The Value of Art in Modern Life' 314-15, 321

British Association 131, 136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4

Brodrick, St John 292, 420

Bromley, Mrs Valentine 143

Brooke, Margaret, Lady 423

Brookfield, Charles

Godpapa 520

and OW' s case against Queensberry 547

The Poet and the Puppets 447-8, 455, 527

Broughton, Rhoda 124, 328

Brown, Ford Madox 180

Brown-Potter, Mrs 697, 705, 709

Browne, Denis 659

Browning, Oscar 119, 145, 185, 186-7, 333, 351, 601

Browning, Robert 156, 185, 224, 380

Strafford 392

Bryan, Alfred 297

Buchanan, Robert 45, 570

Buffalo Bill 357

Buffalo(New York state), OW' s lecture

('Decorative Arts') 235

Bulley, Dr 67, 100

Bulley, Rev.Frederic 54

Burges, William 179

Burnand, F.C.500

The Colonel 173, 181-2

Burne-Jones, Edward 45, 53, 97, 110, 114, 122, 143,
161, 674

Beguiling of Merlin 276-7

and OW in London 159, 179-80, 181

Whistler on 178

Burne-Jones, Margaret 185, 307

Burne-Jones, Philip 179, 566, 577

Burnett, Dr Swann 221

Burnett, Frances Hodgson 221

Burns, John 360, 362

Burroughs, John 259

Butt, Isaac 8, 10, 23

Byron, George Gordon, Lord 72, 718

Caine, Hall 590

Calhoun, Anna 386

California, OW lectures in 241, 243-7

Cambridge

OW and Constance' s visit to 332-5

University 145, 332-3

Campbell, Lady Archibald 177, 182, 353

Campbell, Lady Colin 357

Campbell, Mrs Patrick 499

Canada, OW lectures in 253, 254, 259, 260

Cane, Hall 185

'The Canterville Ghost' (Wilde) 346-7

Capri 655-6

The Cardinal of Avignon(Wilde) 263, 498, 504, 512, 593

Carlyle, Thomas 55, 319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55

Carroll, Lewis 334

Carson, Edward 49, 359, 542, 543, 546, 550-5, 556-7, 561, 570, 706

Carte, Lucas D' Oylly 473

Carte, Richard D' Oylly 322, 473

and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192-4, 202, 219, 232, 233, 256

and OW' s Vera 251-2

Carton, R.C., Liberty Hall 439

Cartwright, Charles 412

Cassell' s Publishing Company 350, 356, 387

Catholicism

and OW in Rome 106, 107, 702-3

and OW' s death 713, 714

and OW' s exile in France 634

and OW' s final illness 711

OW' s interest in 52-3, 79-80, 84, 90, 92, 100, 101, 102, 115, 116, 124-5

and OW' s release from prison 628

OW' s religious poetry 84-5

OW' s second baptism at Enniskerry 15-16, 52-3

Cavendish, Ada 305, 312

Cazin, Jean-Charles 276

Cecil, Lord Edward 505

Cellini, Benvenuto 249

Century Guild 337

Chambers, Haddon 424

The Chameleon 526, 544, 545-6, 551, 570, 573

Champion, H.H.439

Chantemesle 684-5

Charles, Justice Arthur 567, 583

Chatterton, Thomas 278, 279, 337-8, 372

Chennevières-sur-Marne 697

Chesson, Wilfrid 687

Chiara, Biagio 666

Chicago, OW lectures in 209, 235-6, 237, 238, 239

Childers 69

Childs, George W.214

Chinese art, and OW in San Francisco 244-5

Chiswick Press 664

Christian, Princess 350, 353

Christianity

intellectual challenges to at Oxford 64-5

OW and Jesus 410, 430, 616-17

see also Catholicism

Churchill, Lady Randolph 488

Churchill, Winston 89

Cimabue, Giovanni 65

Claisse, Dr Paul 712-13

Clarke, Sir Edward 674

and OW' s trial 562, 569, 570, 572, 580, 582, 583

and Queensberry' s libel trial 543-4 , 550 , 555 , 556 ,
557, 572

classical scholarship

at Oxford 64

Meineke' s Fragments of the Greek Comic Poets 53-4, 55

OW and 34-5, 36, 53-4

Symonds' Studies of the Greek Poets 46-7

Trinity College Dublin 40, 41, 42, 46-7, 48, 54

Mahaffy' s Social Life in Ancient Greece 55-7

Cliburn, Robert 547, 550

Clifton, Arthur 341, 442, 487, 597-8, 601, 627

Clouet, François 90

Coghlan, Rose 262-3

Cohen, Alexander 590

Cole, Alan 321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337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638

Collier, John 328

Collins, Justice Henn 549

The Colonel(Burnand) 173, 181-2

Colorado, OW lectures in 241, 247-9

Colvin, Sidney 229

Comyns Carr, Alice 160

Comyns Carr, Joe 345-6

Forgiveness 439

Papers on Art 326

Conan Doyle, Arthur 386-7, 532

Conder, Charles 431, 632-3, 648, 684-5, 698

Conforti, Luigi 657-8

Conover, Anna 312

Conway, Alphonse 422, 517, 520, 546, 547, 552, 555, 561

Cook, E.T. 359

Cook(private detective) 506, 544

Cooper, Edith 404, 451

Cooperative Dress Association 212, 213

Copeland & Day 504-5

Coppée, François 604

Coquelin the elder 273, 279

Correggio, 'Danae' 108, 115

Costelloe, Mary 343-4, 503-4

Cotter, Jane 582

Court and Society Review 346-8, 405

Cowper, Lord and Lady 423

Crabbet Club 421, 570

Craik, Mrs, John Halifax, Gentleman 351

Crane, Walter 110, 140, 364

Crawfurd, Oswald 444-5, 446

Crespigny, Sir Claude de 577

Creswell, 'Gussy' 98, 99, 292

'The Critic as Artist' (Wilde) 718

Crocker, Amy 245

Crocker, Charles 246

Crocker, Edwin B.246

Crocker, Hattie 246-7

Croly, Mrs D.G.204

Cromer, Lord 492

Cruttenden, Arthur 633, 645

Cuffe, Hamilton 559

Cunliffe, Arthur 483

Cunninghame-Graham, Robert 360, 362, 577-8, 674

Currie, Lord 504

Curzon, George 236, 292, 331, 420, 421-2, 428, 445

Curzon, Henry 379

Cust, Harry 420, 421

Daily Chronicle 382, 400, 401, 402, 599, 618, 674

OW' s article to on prison life 630, 637

OW' s letter on prison reform 675

Daily News 192

Daily Report 243

Daily Telegraph 328, 412, 441, 674

Dalby, William 488

Dall, Caroline Healy 221

Daly, Augustin 425, 665, 689, 696-7

Danann Celts 16, 24-5

Dansey, Claude 491

Dante Alighieri 9, 72, 249

Divine Comedy 224

Daphnis and Chloe libretto 648, 652, 653, 665

Darly-Smith, Mary Rebecca 214

Daudet, Alphonse 277, 604

Davidson, John 409, 439

Plays 500

Davis, Jefferson 255

Davis, Robert 217, 234

Davis, Robert S.214

Davis, Thomas 9, 14, 244

Davray, Henry 634, 676, 679

Day, F.Holland 260-1

De Profundis(OW' s prison letter) 615-18 , 624 , 629 ,
718, 719

De Quincey, Thomas, 'On Murder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Fine Arts' 372

De Vere, Aubrey 85

'The Decay of Lying' (Wilde) 373-5 , 379 , 380 , 381 ,
382, 391, 395, 397, 425

Degas, Edgar 178, 276

Delaroche, Paul 323, 324

Delsarte, François 266

Desart, Lady 90

Descaves, Lucien 604

'The Devoted Friend' (Wilde) 348, 364-5

The Dial 388-9, 392, 406

‘Dialogue’ (Wilde) 397-8

Dickens, Charles 15, 29, 210, 227, 334, 718

The Old Curiosity Shop 579

Dickinson, John Ehret 340, 341

Dieppe

OW and Douglas in 520

OW in exile in 628-31, 632, 641-2, 643-4

Dilke, Charles 359

Dinard, OW in 488-9

Disraeli, Benjamin 29, 88

Vivian Grey 394

Dodge, Abigail 221

Dodgson, Campbell 469-70, 471, 472

Donnay, Maurice 604, 701

Donne, John 188

Donoghue, John 236-7, 308, 317-18

Dorset, OW holidays in 369-70

Douglas, Lord Alfred 'Bosie' 462

in Algeria 534-6, 537, 538

at Babbacombe Cliff with OW 469-71

at Goring with OW 486-8

at Worthing with OW 516-17, 518

and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661

blackmail of(Oxford incident) 452-3, 510

in Brighton with OW 522-3

character 452, 472

death of father 701

in Egypt 492, 494-5, 495-6, 505

return from 500-1

fails to take degree 486

family relations 465

feelings for OW 452-3

in Felbrigg with the Wildes 458-9

and friends of OW 504

and George Ives 490, 491

and Hitchens' *The Green Carnation* 520-1

letters to Schwabe 453, 459-60

Oscar Wilde and Myself 719

and OW at the Savoy Hotel 473-6

and OW' s death 714, 715

and OW' s deed of separation from

Constance 622

and OW' s exile 699

failure to help financially 705

letters from 635-6

meeting at Rouen 646-8

in Naples 647, 648, 649-64, 667

in Paris 682-4

return to England 689

OW' s first meeting with 419-20

and OW' s imprisonment 592, 594, 595, 596-7, 613

letter to(De Profundis) 615-18, 624, 629, 719

OW' s 'madness of kisses' letter to 473-4 , 479-81 ,
550, 552

OW' s relations with 453 , 464-5 , 467 , 472-3 , 475-7 ,
484-5, 492, 500-1

and OW' s trial 561 , 563 , 565-6 , 567 , 569 , 571 , 572-
3, 573, 577, 579, 582-3

poems 544, 570, 636, 653-4, 689

and Queensberry(his father)

feud with 501-2, 507-11

libel trial 540, 542, 543-4, 545, 547-8, 550-2, 557, 558

in Scotland 707

sexual activities with OW and others 464, 469

and The Spirit Lamp 467, 471, 472, 479, 483, 525

translation of Salomé 488, 489-90

‘The Two Loves’ (sonnet) 526

in Worthing with OW 516-17, 520, 522

Douglas, Norman 655

Douglas, Percy 511, 525, 536, 538, 542, 543, 544, 557, 558, 560, 576, 581, 600, 701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OW from 620, 639

Dowson, Ernest 407, 415, 578, 642, 669

death 700-1

and OW’s exile

in France 632, 633, 634, 641, 643, 644, 648

in Naples 652, 658, 659

Dramatic Review 330, 332

dress reform 212

Drexel, A.J.267

Dreyfus affair 676-9, 684

Drumlanrig, Lord 495, 511, 555

death of 523-5, 556

Du Maurier, Gerald, cartoons in Punch 160-2, 171, 173

Dublin

Catholic University Literary Society 112

National Gallery of Ireland 45

newspapers/magazines

Dublin Medical Press 22

Dublin University Magazine 76, 84, 87-8, 113-15

Illustrated Monitor 112

Irish Daily News 143

Irish Monthly 127

see also Merrion Square, Dublin; Trinity College Dublin

The Duchess of Padua(Wilde) 263-5, 267, 272-4, 283-4, 286, 292, 301, 305, 311, 312-13, 386, 387, 405, 447, 458, 482

US production of 411-13, 498

Duff Gordon, Lady 30

Duffy, Gavan 9, 10

Duffy, Gavin 244

Dumas, Alexandre 11, 424

La Dame de Monsoreau 702

Dunbar, Frederick 254

Duncan, Florence 217

Dunne, Fr Cuthbert 713, 714

Dunton, Watts 181

Duret, Théodore 276

Duse, Eleonora 666

Earl, J.R.365

The Echo de Paris 563, 576, 595

Edison, Thomas 295-6

Edward, Prince of Wales 141, 142, 149, 159, 181-2, 196, 200, 205, 479, 495, 536, 668, 693

Eighty Club 358-9, 559-60, 575, 590

Elcho, Lady 420, 445

Elden, Matthew 177

Elgee, Jane Francesca see Wilde, Jane

Francesca(formerly Elgee, OW' s mother)

Elgee, Judge John K.255

Eliot, Arthur 700

Eliot, George 141, 352, 431

Elton, Oliver 188

Elvin, Harry 612, 659

Emerson, Ralph Waldo 223, 296, 512

Encombe, Lord 453

English Illustrated Magazine 345-6, 348, 379

Enniskerry, O.W' s second baptism at 15-16

Ephemeral periodical 483-4, 486

Epstein, Jacob 718

Era(theatrical paper) 168, 171, 444

Erman, Adolf, Life in Ancient Egypt 639

Esterhazy , Major Ferdinand 676-7 , 677-8 , 679 , 684 ,
689

Euripides 104, 144

Hecuba 85

Euston, Earl of 389-90

the Examiner 243

Fabian Society 351, 362

Fact 166

Fane, Lady Augusta 159

Fane, Violet(Mrs Singleton) 141, 144, 185, 316, 332, 351, 451

Faucit, Helena 8

Fawcett, Edgar 482

Fénéon, Félix 415, 676

Ficino, Marsilio 388

Field, Kate 212, 213

'Field, Michael' 404, 451, 474, 674

Firbolg Celts 16, 24

Fish, Arthur 355, 366

'The Fisherman and his Soul' 387-8, 393

Fitch, Clyde 383, 384

FitzGerald(Oxford friend) 70, 77

Fitzpatrick, W.J.50

Flaubert, Gustave 328, 366, 381, 392, 433

Madame Bovary 633

Temptation of St Antony 310, 666

Trois Contes 119, 434

Fletcher, John 273

Fletcher, Julia Constance 114, 127-8, 143, 157, 351

Mirage 108-9

Florence 72, 73-4, 502, 503-4, 666

The Florentine Tragedy(Wilde) 534, 567, 593, 640, 646

Flower, Cyril 456, 459

Flower, Mrs 459

flowers, OW' s love of 122, 161-2

Forbes, Archibald 192, 218-20, 322

Forbes-Robinson, Eric 288

Forbes-Robinson, Frances 442

Forbes-Robinson, Francesca(Frankie) 157, 617

Forbes-Robinson, Johnston 138, 142, 143, 146

Forbes-Robinson, Norman 138, 165, 288, 330, 403

and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210, 211, 242, 249

and OW' s Vera 169

Ford, Ford Madox 45, 180

Ford, Robert 249

Forman, Buxton 113

Fort, Paul 432

Fort, Paul 436, 437

Fortescue, Mrs Marion T.209-10

Fortnightly Review 143, 329, 351, 355, 373, 379, 380,
382, 409, 411, 414, 510

Fothergill, John 642-3, 646, 687

Fox, Fr Lawrence Prideaux 15, 16, 52

Fox, Selina 'Teenie' 117

France

Chantemesle 684-5

École Romane 432, 434

OW in Dinard 488-9

OW in exile in

Dieppe and Berneval-sur-Mer 628-48, 687-8

the French Riviera 692-4

Nogent-sur-Marne 646, 683, 687

OW' s holidays in 170

reaction to OW' s imprisonment 595, 604

see also Paris

Francis of Assisi, St 634

Frank, Harris, and An Ideal Husband 695

Frederic, Harold 362

Freeman' s Journal 209

Freemasonry 69-70, 78, 79, 84, 95

Friend, Rev.M.T.616

Frith, W.P.174, 590

Frohman, Charles 451

Frohman, Daniel 503

Fry, Roger 411, 719

Gainsborough, Thomas 304, 305

Galbraith, E.35, 36

Gale, Minna 412

Gardner, Isabella Stewart 222, 224

Gautier, Théophile 81, 178, 250, 258, 280, 372, 374

Gebhard, Freddie 266, 294

Genoa 101-2, 695-6

Germany, OW in 386, 456-7

Gide, André 430, 433-4, 472, 504

in Algeria 534-6

and OW' s exile in France 633-4, 691

Gilbert, John 54

Gilbert, Maurice 680, 683, 706, 712, 715

Gilbert, W.S.189

Pygmalion and Galatea 213

and Sullivan, Arthur 192

Iolanthe 267

Patience 167, 171-3, 179, 193, 194, 208, 209, 243

Gill, Charles 561-2, 568-9, 570, 572, 579

Gill, Henry 386

Giotto 65, 72-3

Gladstone , William 110 , 113 , 141 , 185 , 362 , 365 ,
495, 509, 559, 571

and Irish Home Rule 358, 360

Glasgow, OW lectures in 315-16

Gloeden, Count Wilhelm von 668

Glyn-y-Garth 438

Godwin, E.W.140, 161, 164, 179, 306, 311, 313, 318, 330, 346, 353

Goethe, Johann von 9, 55, 206, 207

Gómez Carrillo, Enrique 431, 433, 435, 437

Goncourt, Edmond de 276, 280, 284, 437, 484-5, 565, 639, 675

A Good Woman see Lady Windermere's Fan(formerly A Good Woman)

Goring, OW and Douglas at The Cottage 486-8, 495, 515

Gosse, Edmund 141, 181, 211, 327, 357-8, 379, 674

Goulding, William 72, 101, 102, 104-5

Gourmont, Rémy de 435

Gover, Dr R.M.598, 599

Gower, Lord Ronald 90, 94, 95, 96, 100, 109, 110, 111, 113, 150

in London 136

Graham, William 159

Grain, Corny 159

Grain, J.P.562

Grainger, Walter 484, 486, 487, 546, 547, 554, 614

Grant, Hamilton 483-4

Grant, Ulysses S.259

Graves, Dr 6

Gray, Frank 254, 256

Gray, John 406-7, 409, 411, 414, 415, 416, 439, 441, 446

break with Wilde 474-5

poems 451-2

Silverpoints 482

Greece

ancient Greeks and Irish Celts 6-7, 24-5

Athens 105-6, 144, 152

OW' s tour of with Professor Mahaffy 102-6

pederasty in ancient Greece 56-7, 82-3, 336

see also classical scholarship

Green, T.H.64, 65, 153

Greene, Graham 669

Grein, J.T.405-6

Grenfell, Ettie 420-3, 445, 458, 563

Grenfell, William 69, 420, 563

Greswell, Gussie 156

Grey, Lady de 465, 495

Grey, Robin 654, 660

Griffiths, Philip 315

Gross, Dr Samuel 214, 215

Grossmith, George 172, 179, 487

Grove, Archibald 409

Guinness, Arthur Edward 130

Guinness, Lady Olive 130, 137

Guiteau, Charles 219

Gull, Ranger 718

Gurney, Gerald 415

Haggard, H.Rider 357, 456

Haldane, Robert 590-2, 593, 598, 604, 637

Halsbury, Lord 546

Hamilton, Eugene Lee 503

Hamilton, Sir William Rowan 3, 4-5

Hansell, Arthur D. 614, 622, 662

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Wilde) 363-5 , 369 ,
385, 404

'The Happy Prince' (Wilde) 334, 345-6, 361

Harding, Amy 89

Harding, James 'Puss' 79

Harding, Reginald 'Kitten' 79, 89, 93, 95, 98, 100, 115, 122, 145, 153

Hardinge, William Money 83, 327

Hardy, Rev.E.J., How To Be Happy Though Married 327

Hardy, Thomas 405

Hare, Augustus 287

Hare, John 469, 486, 490, 495, 503

Hargrove, Mr 597, 614, 622

Harland, Henry 500

Harper, May 121-2, 125, 161

Harris, Frank 355, 373, 384, 395, 409, 414, 418, 423, 442, 443, 446, 453, 475-6

on Beardsley 499

biography of OW 719

on Hitchins' The Green Carnation 522

and 'Love is Law' 705, 707, 708-9

and OW in exile 632, 662, 680, 682, 684, 688, 698,
710

final illness 711

holiday in the French Riviera 692-4

and OW' s death 714, 715

and OW' s imprisonment 599, 606-7, 619, 620, 621

and OW' s release from prison 623, 629

and OW' s trial 563, 578, 579

and Queenberry' s libel trial 544-5, 547

and Queensberry' s campaign against OW 510, 511

Harry, Gérard 426

Hatchard' s bookshop 516

Hawthorne, Julian 138-40

Hawtrey, Charles 448, 526, 527, 533-4

Hayes, Mrs Augustus 204

Headlam, Rev.Stuart 576, 577, 581, 603, 623, 628

Healy, Chris 677, 678, 687

Healy, T.M.575

Heinemann, William 426

Hemphill, Stanhope 299

Henderson, William 259

Henley, W.E.355-7, 366, 384, 400, 497, 564, 641, 654

Book of Verse 357

In Hospital 674

and OW' s trial 578

Henry, Lieutenant-Colonel 677-8, 684

Heraclitus 114-15

Heredia, José-Maria de 431-2

Herodotus 144

Heron-Alien, Edward 319-20, 330, 451

Herrmann, Paul 660

Hichens, Robert 505

The Green Carnation 520-2

Hick-Beaches 154

Higginson, Thomas Wentworth 228

Higgs, Sally 164-5, 190-1

Hind, C.Lewis 357

Hirschfeld, Dr Gustav 104

Hoffman, Judge 245

Holcombe, Dr 211

Holland, Merlin 644

Holland, Otho(formerly Lloyd) 596, 605, 634

Holloway Prison, OW on remand in 564-6, 574-7

Holmes, Charles 391

Holmes, Oliver Wendell 223, 224

Homer 55-6, 93, 103, 104

Odyssey 91

homosexuality, criminalization of 339-40

Hood, Thomas, Dream of Eugene Aram 638

Hope, Adrian 318, 614, 681, 714

Hope, Lord Francis 420, 435

Horne, Herbert 337

Houghton, Lord 110, 113, 141, 180, 194, 210, 359

The House of Pomegranates 423, 432-3

houses

interior decoration

Aesthetic ideas on 97-100, 121, 145

‘The Decoration of Houses’ (lecture by OW) 239

Housman, A.E., A Shropshire Lad 638

Housman, Laurence 638, 674, 698-9

Howgate, William 315

Howson, John 243

Hughes, Agnes 159

Hughes, Arthur 158

Hugo, Victor 48, 277, 278, 284, 432

The Humanitarian 525

Humphreys, Arthur 516, 526, 543

Humphreys, Charles 508-9, 511, 538, 592, 614

and OW' s trial 562, 580

and Queenberry' s libel trial 540, 541, 543, 544

Humphreys, C.O., Son and Kershaw 508-9

Humphreys, Travers 543

Hunt, Alfred 158

Hunt, Henry Holman 110

Hunt, Mrs Alfred 327

Hunt, Violet 158, 175, 180, 230

Hunter-Blair, David 'Dunskie' 79-80, 95, 101, 115, 118, 125, 127, 315

in Rome 106, 108

Hurlbert, William Henry 209, 259

Hutchinson, Charles Edward 99

Huxley, T.H.130

Huysmans, J.-K., À Rebours 310-11, 336, 374, 395, 399-400, 429, 434, 437, 551

Ibsen, Henrik

Ghosts 405

Hedda Gabler 425

An Ideal Husband(Wilde) 490, 497-8, 503, 512, 526-7, 566, 619, 686, 695

American performing rights 503

first night 531-3

publication of 697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73

Image, Selwyn 337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Wilde) 513-15 , 518 ,
519-20, 526, 533-4, 566, 632, 640, 701-2

American rights 518

book edition of 686-7, 689, 694, 695

British performing rights 689

opening night 536-7

and the Queensberry libel trial 547-8

Insull, Samuel 296

Ireland

1848 uprising 10

ancient Celts 7, 16, 24-5

Anglo-Irish Protestants 5, 53

Bray properties 1, 15, 87, 88, 92, 94, 118, 124, 128-9, 135

Catholics 5, 52-3

Church of 6, 52

Clonfeacle 87, 135

Clonfin 84, 94, 117

Famine 8-9

Illlaunroe 87, 92-3, 130

OW lecturing in 303

OW' s visits/holidays while at Oxford 74-5, 84, 92-4, 116-18, 129-31

Wilde family holidays in 14-16

Young Ireland movement 9-10

see also Dublin; Moytura; Portora Royal School

Irish Home Rule 358-9, 360, 382

'Bloody Sunday' 360, 362, 408

Irish language 24

Irish nationalism 136-7

and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239-40, 244

Irving, H.B.340-1

Irving, Henry 71, 96, 131, 137, 141, 159, 162, 177,
182, 287, 385, 412, 453

and OW' s Vera 169

and Ruskin 153

Isaacson, Lieutenant-Colonel H.B.602, 603, 608

Italian Renaissance, Ruskin' s Oxford lectures on the 65-
6, 72

Italy 72-4, 101-3

Capri 655-6

Florence 72, 73-4, 502, 503-4, 666

Genoa 101-2, 103, 695-6

Ravenna 114, 117

Rome 106-9, 702-3

Sicily 668-9

see also Naples

Ives, George 490-1, 495, 519, 526

Jackson, Charles Kains 491, 525

Jackson, Kains 502

Jacob, Arthur 22

Jacomb-Hood, George 364, 369-70

James, Henry 141, 221-3, 246, 357, 374, 405, 443-4

The Turn of the Screw 693

James I, King 19

Guy Domville 532, 533

James, Jesse 249

Jansen, Marie 267

Japan 256-7

Jarry, Alfred 682

Jecks, Clara 241

Jeune, Mrs 342, 351-2, 353, 355

John, Augustus 698

Johnson, Lionel 392, 407, 419, 469, 470, 471

Jones, A.H.477

The Dancing Girl 458

Jones, Arthur 149

Jones, Arthur Henry 423

Jones, Cholmley 76

Jopling, Mrs 444, 445, 466

Josephus 435

Jowett, Benjamin 64, 65, 83

Julian, Philippe, Oscar Wilde 431

Julius II, Pope 107

Kearley, ex-police inspector 546, 547, 580, 581, 592

Keats, John 45, 46, 47-8, 56, 110, 142, 150, 333, 335, 610

and Chatterton 337

grave 107

and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207, 217

OW' s sonnet on 113

relics of in America 238

Kelly, James Edward 211-12, 226, 294, 296

Kernahan, Coulson 413, 417, 430, 442, 445, 590

Kingsford, Anna 383

Kipling, Alice 179

Kitchener, Herbert 496

Knapp, John 656

Knight, Joe 242

Kottabos(college literary magazine) 48, 76, 84

Kraemer, Lotten von 13-14, 17, 25, 49, 76

Kropotkin, Prince 619

La Jeunesse, Ernest 690, 691-2, 705-6, 707

la Purée, Bibi 429

La Révolté 433

La Sainte Courtisane(Wilde) 493, 498, 567, 593, 699

La Terrière, Bulmer de Sales 61, 89

Labouchère, Henriette 266, 291

Labouchère, Henry 189, 196, 229, 291, 340, 597

‘Lady Alroy’ (Wilde) 348

Lady Windermere’ s Fan(formerly A Good Woman) 423-5, 426, 439-41, 450, 452, 453, 456, 457, 458, 478, 479, 518, 534, 633, 701-2

American rights to 425, 451

in book form 482, 493

British touring rights to 498

and Brookfield' s The Poet and the Puppets 447-8

earnings from 466-7, 473, 499

first night 443-4

and green carnations 442-3, 446

plans for French debut 427-8, 451

revival of 538

Lady' s Pictorial 309, 366

Lady' s World see Woman' s World magazine

Lake District 304

Lamartine, Alphonse 11

Lamb, Charles 372

Lamb, Edward 293

Lane, John 438, 451, 468, 475, 482, 489, 500, 504,
564, 594, 686

Lang, Andrew 334, 388

Langtry, Lillie 110-11, 136, 141-2, 145-6, 147, 148-50, 152, 153, 154, 159, 163, 181, 182, 191, 235, 292, 311, 443, 640

and OW's Poems 185

and OW's 'The New Helen' 146, 149

theatrical debut 195-6

in the United States 265-6, 291, 303

and Whistler 177, 179

Lankester, Ray 371, 571

Lawrence, George 164

Lawrence, Henry Buxton 74

Lazarus, Emma, 'The New Colossus' 211

Le Figaro 437

Le Gallienne, Richard 370-1, 383, 441, 442, 475

Le Gaulois 437

Le Rouge, Gustave 690

Leadville, Colorado, OW lectures in 247-9, 285

Leadville Daily Herald 248

Leblanc, Georgette 676

L' Echo de Paris 433, 437

Leland, Charles G. 141, 164, 214

Lenoir, Helen 193, 194, 199, 246

Leonard, Bibidie 367

Leonardo da Vinci 82, 235

Leopold, Prince 65, 69, 100, 136

Leslie, Mrs Frank 202, 294, 512

marriage to Willie Wilde 425-6, 451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 209

Levenson, Ada 446, 482, 500, 521, 522, 537, 543,
545, 557, 560

and OW in exile 657, 669, 689, 699

and OW's release from prison 627, 628, 629

and OW' s trial 565, 567, 579

Leverson, Ernest 543, 579, 580, 582, 619, 621, 622,
659

and OW' s release from prison 627, 628

Leverson, Violet 579

Levy, Amy 353

Levy, Edwin 151, 234, 256, 271, 452

Lewis, George 159, 170, 180, 189, 191, 287, 368,
382, 390, 443, 452, 491, 495

and the blackmail of OW 474

and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192-3, 194, 218, 220

and OW' s case against Queensberry 541, 542, 560

and OW' s imprisonment 595

and OW' s trial 566, 579

and Queensberry' s campaign against OW 508, 510, 523

Lewis, Mrs 205, 232, 233

Liberals

and Irish Home Rule 358-9, 360, 409

and OW' s trial 559-60

Liddell, Mrs 100

Liebich, Frank 414

Life(society paper) 171

Lincoln, Nebraska, OW visits 249-50

Lindsay, Sir Coutts 110

Linton, Mrs Lynn 674

Lippincott, Craige 396

Lippincott' s Monthly Magazine 386-8, 417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in 398-403, 417

Littlechild, private investigator 546, 547, 548

Lloyd, Constance see Wilde, Constance(formerly Lloyd)

Lloyd, Horatio 176, 300-1, 306, 312

Lloyd, Otho 130, 175, 287, 288, 299, 300, 368, 467, 593

Lock, George 404

Locke, Charles E. 241, 243, 247

Lockwood, Sir Frank 559-60, 575, 579, 581-2, 583

London

Albemarle Club 539-40

Beaumont Trust Fund 331

Birkbeck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 337-8

Charles Street lodgings 191, 286-7, 311

Cleveland Street scandal 389-90, 459-60, 502

Grosvenor Gallery review 109-10, 113-15, 121, 143, 177, 277

Hotel Albemarle 440, 442, 476, 491, 533, 562

Hotel Avondale 536, 540

Lyceum Theatre 131, 137-8, 141, 153

OW in St James' s Place 490

OW' s election to St Stephen' s Club 101

OW' s visits to

in childhood 54-5

while at Oxford 91, 96, 109-11

police raid on Fitzroy Street house 518

Royal Academy Schools 288-9

Salisbury Street lodgings 136, 164

Savile Club 357, 400

Savoy Hotel, OW and Douglas at the 473-6

Thirteen Club 497

Tite Street(Keat' s House) 140, 164-5, 182

banishment from 190-1

Tite Street(OW' s marital home) 305-6 , 311 , 316-20 ,
321, 375, 440, 496, 566

burglary 426

sale of effects from 567

Wilde family move to 130-1, 135-7

The London Cuckoo 173

‘London Models’ (Wilde) 379

London Standard 445

Longfellow, Henry Wadsworth 223, 224-5, 268

Hiawatha 14

Lonsdale, Lady 171, 196

Lord Arthur Savile’ s Crime and Other Stories(Wilde) 418

‘Lord Arthur Savile’ s Crime’ (Wilde) 347-8

Loring, Edward G.221

Loring, Harriet 222

Lormel, Louis 595

Lorrain, Jean 429, 435, 706

Louis of Battenberg, Prince 149

Louise, Princess 136, 350

Louisville, Kentucky; OW lectures in 237

Louÿs, Pierre 430, 432, 433, 437, 447, 450, 456, 475, 476, 561, 675

and OW' s relationship with Douglas 484, 485

and OW' s trial 565

'Love is Law' (Wilde) 640, 689, 696-7, 700, 701, 705, 707, 708-9

Lowell, James Russell 194

Lowther, Aimée 385, 489, 706, 707

Lugné-Poe, Aurélien 605, 630-1, 639

Luini, Bernadino 73

Lysippus 107

Lytton, Emily 428

Lytton, Lord 428

Macaulay, Lord, History of England 8

MacCarthy, Denis Florence 14, 638

New Year Song 638

McCarthy, Justin 137, 359

McDowell, J.35, 36

McDowell, Robert 35, 37

McIlvaine, Clarence 404-5, 418, 433

Mack, Mrs John 209

Mackaye, Steele 248, 263-4, 265, 266, 267, 286, 295

Mackenzie, Ross 254

Mackmurdo, Arthur 337

Macmillan, George 101, 102, 104, 105, 106, 144, 345, 357, 359, 363

Macmillan, Maurice 397

MacPherson, James 4

Maeterlinck, Count Maurice 676

L' Intruse(The Intruder) 436

Princess Maleine 426, 436

Magazine of Art 356

Mahaffy, Professor John Pentland 39-40, 41, 42-3, 46-7, 48, 49, 50, 53, 54, 64, 85, 88, 110, 128, 331, 359

in Italy 72

OW accompanies on tour of Greece 102-6

and OW' s rustication 112

Rambles and Studies in Greece 92

Social Life in Ancient Greece 55-7, 82

Major, Lilian 175

Mallarmé, Stéphane 178, 416, 428-9, 431-2, 433, 434, 675

Mander, Theodore 304

Manning, Cardinal Henry 80, 91, 92

Manning, Pentonville Prison governor 592

Mansfield, Richard 498, 504

Marbury, Elisabeth 451, 493, 503, 660, 669

Mariller, Harry 152, 332-3, 334, 335-7, 339, 345, 520

Markower, Stanley 657

Martin, Thomas 618, 619, 630, 631, 637

Martin, Violet 352-3, 401

Mathews, Elkin 438, 451, 468, 475, 482

Mathews, Willie 543, 557

Maturin, Charles 13, 618

Melmoth the Wanderer 9, 30, 498

Maturin, Father Basil 214, 217

Maurice, Dr Oliver 603, 607, 609

Mavor, Sydney 462, 463

and OW' s trial 562-3, 568, 569, 573

and Queensberry' s libel trial 546, 547, 548, 553

Maxse, Mrs Cissie 156

Maxse, Violet 156, 505

Maxwell, Willie 394

May, Arthur 96

Meineke, Auguste, Fragments of the Greek Comic Poets
53-4, 55

Meinhold, Wilhelm, Sidonia the Sorceress 11, 29-30

Mellor, Harold 693-4, 695, 702, 704, 706, 707

Melvill, Harry 341, 371

Mendès, Catulle 395, 429, 432

Mercure de France 596, 676

Meredith, George 405, 465-6

Merrill, Stuart 404-5, 429, 430, 431, 432, 447, 565,
604, 682, 691, 706

Merrion Square, Dublin 53, 84, 115-16

and OW at Trinity College Dublin 36, 38, 41, 49-50, 51-

OW' s childhood home at 12-14, 17-18

sale of 131, 137

and Sir William Wilde' s death 86-7, 88

Miles, Canon 92, 189

Miles , Frank 71-2 , 74 , 75 , 90 , 94 , 95 , 100 , 109 ,
110, 129, 277

holidays in Ireland with OW 92-3

and Lillie Langtry 149, 192

sketch of 111

London house 306

'An Ocean Wave' 146

and OW in London 136, 140, 141, 157, 177, 179, 181

banishment from Keats House 190-1

move to Tite Street 164-5

OW visits family home of 91-2

Miles, John C.248

Millais, Sir John Everett 90, 110, 111, 113, 153, 286

Millard, Christopher 718

Miller, Joaquin 209-10, 211, 228

Mills, Townsend 51, 54

Milner, Alfred 71, 83, 124, 314, 326

Milton, John, Paradise Lost 238

Milwaukee, OW lectures in 238

Mirabeau, Octave 675

Mirbeau, Octave 595

Mitchell, Peters Chalmers 707

Modjeska, Helena 157, 169

Moffett, Rev.Benjamin 35

Molesworth, Mrs 334

Molloy, Joseph Fitzgerald 361

Mommsen, Theodore, History of Rome 591

Montefiore, Charlotte 157

Montefiore, Leonard 71, 83, 151, 157

Montesquiou, Count Robert de 279, 310, 429

Montgomery, Alfred 508, 524, 555

Month journal 84

Moore, Augustus M.127

Moore Hall 24

Moore, Kate 275-6

Moore, Tom 14

Moréas, Jean 416, 432, 433, 434, 690

Moreau, Gustave 310

Morrell, Harry 503

Morrell, Mr and Mrs Herbert 125

Morris, Clara 195, 212-13, 251-2

Morris, Jane 185

Morris, William 53, 73, 75, 122, 142, 161, 337, 380, 493

Coach House 362

Commonweal 360, 408

The Earthly Paradise 45

interior decoration 97-8

meeting with OW 180

and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234

and OW' s Poems 185, 186, 188

Red House 97

Morrison, Lewis 293

Morrison, Rev.W.D., prison chaplain 593, 598, 599

Morse, Colonel W.F.

and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193, 199-200, 201-6, 207, 208, 211, 219-20, 226, 228, 233, 239, 241, 249, 256, 257-8, 259

and OW' s British lecture tour 289, 291-2

Moulton, Louise Chandler 404

Mount Temple, Lady 426, 458, 467, 468, 470, 533

Moytura 53, 84, 369, 694

childhood holidays at 16, 24-5, 35, 43

OW' s holidays while at Oxford 74-5, 92

and Sir William Wilde' s death 87

Mrs Arbuthnot see A Woman of No Importance (formerly
Mrs Arbuthnot (Wilde)

Muir, Joseph 118

Müller, Friedrich Max 64-5

Müller, K.O.56

Munro, George 218

Munthe, Axel 656

Murray, George Gilbert 106

The Musician 654, 660

Musset, Alfred de 278

Mycenae 104

Napier, Eliza 545

Napier, Mary 469

Naples

Museo Nazionale 657-8, 666

OW' s exile in 665-70, 686

with Douglas 647, 648, 649-64

OW' s sexual adventures in 658-9

Posillipo villa 653-64

The Nation newspaper 9-10, 11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358

National Association 17

National Observer 564

National Review 28

National Vigilance Society 403

Nelson, Major James O. 608, 609-10, 623, 624, 630, 669, 674, 697

Nethersole, Louis 700, 708-9

Nethersole, Olga 700

Nettleship, Adeline 305

Neville-Rolfe, Eustace 655

New Review 409, 654

New York

Lambs Club 264

and OW' s lecture tour 199-213, 230-1, 253, 254, 256, 267

theatrical schemes 262-8

premiere of Vera in 292-6

theatres 264

New York Herald 412

on OW' s American lectures 209, 213, 227

on Vera 294

New York Journal 669

New York Mirror 295

New York Times 187, 295, 678

review of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401-2

New York Tribune 412

on OW' s American lectures 204, 205, 209, 227, 235, 268

on Vera 294

New York World 293

Newbolt, Henry 188

Newcastle, Duke of 344, 366, 404, 420, 495, 684

Newdigate Prize for poetry 116-17, 127-8, 129, 155, 170, 318

Newman, Cardinal Henry 15, 85, 92

Apologia 591, 597

Newport, Rhode Island, OW lectures at 258, 259

Nicholson, John Gambriel, Love in Earnest 519

Nicholson, William 640

Nicolson, Dr 608

Nielson, Julia 527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Wilde) 348, 365

Niles, Thomas 364

Nilsson, Christina 163

Nineteenth Century 113, 143, 351, 373, 379, 380, 397

Nittis, Giuseppe de 276, 284

OW’ s essay on ‘Shakespeare and Stage Costume’ 329-

30

Noble, Rev.William 25

Nogent-sur-Marne 683, 687-8

Norfolk, OW and Constance Wilde in Felbrigg 456, 458-9

Norton, Charles Eliot 223

Norton, Eliot 223-4

Nutt, David 363

O' Brien, Kevin, Oscar Wilde in Canada 234

O' Brien, Smith 17

O' Brien, William 359

O' Connell, Daniel 75

O' Connor, T.P.362

Olivecrona, Rosalie 22

Olympia 104

Orde, Charlie 145

O' Reilly, John Boyle 223, 244, 262

Ormond, G.H.118

Osborne, Bernal 181-2

Osgood, J.R.405, 418, 433

O' Shea, Kitty 409

the 'Osquiths' 420-1

Ossian 4, 5, 14, 130

O' sullivan, Vincent 642, 648, 667, 669, 688, 691, 706

Ouida(Maria Louisa Ramé) 351-2, 428, 444

Our Continent(American journal) 196, 202, 214, 217, 257

Ouroussof, Princess 433-4

Oxford

North Oxford and the Aesthetics 97

St Aloysius Catholic church 79-80

Victorian Theatre 68

Oxford and Cambridge Undergraduates' Journal 128

Oxford University 53-4, 57

the Ephemeral periodical 483-4

Magdalen College 54, 61-4, 69

and the 'new culture' 525-6

OW at 61-132

academic efforts 85-6

appearance and clothes 62, 67, 68, 79

chancellor' s essay prize 132

commemoration week 88-9

degree awarded 129, 132

entertaining 75-6, 79, 89

examinations 66, 88, 91, 95, 100, 126-7, 128, 129

fellowship attempt 129, 132, 151-2

financial worries 94-5

fourth year 118-28

Freemasonry 69-70, 78, 79, 84, 95

friendships 65, 71-2, 78-9, 90

fun-loving diversions 67-9, 77

Hinksey Road 'diggings' 66, 70, 71

money troubles 67

and Pater 81-4

poetic achievements 84-5

rooms 62, 75-6, 98, 121, 132

rowing 63

and Ruskin 65-6, 70-1

rustication 109, 112

scholarship 54-5

subverting authority 100-1

and OW in London 144-5

OW reviews student production 332

and OW' s Poems 187-9

The Spirit Lamp magazine 467 , 471 , 472 , 479 , 483 ,
525-6

sports and games 68

tutorials 64

Union 53, 188-9

wider intellectual life of 64-6

‘Young Oxford’ set 67

Oxford University Gazette 54, 116-17

Paget, Violet(‘Vernon Lee’) 503-4

Pall Mall Gazette 229, 259, 314, 360, 433, 445, 521,
542

on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674

on OW’ s death 715

OW’ s reviews and articles 323-8, 330, 340, 359-60

on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399-400

Palmer, Edwin 330

Palmer family 465

Palmer, Walter 402, 545

PAN(satirical weekly) 165

Panizzardi, Alessandro 677-8

Pape, Edward 507

Paris

Calisaya American Bar 690, 691

Exposition Universelle 704, 705-6, 710

the Louvre 277

OW' s exile in 670, 673-85, 686-92, 698-702, 703-15

OW' s honeymoon in 308-11

OW' s visits to 170, 415-17, 426, 427-37, 447

literary life 272-85, 427-37

with mother and brother 26-7, 55

Père Lachaise cemetery 711, 718

production of Salomé 605, 619

Symbolist movement 415-16, 431-2, 433, 434, 436

Parker, Charlie 473, 490, 518, 546, 553, 557, 580

and OW' s trial 562, 568, 571, 572, 581, 583

Parker, William 473, 553, 580

and OW' s trial 562, 568

Parnell, Charles Stewart 358, 382, 409, 410-11, 426

Parratt, Walter 76, 164

Parry, Hubert 422-3

Partridge, Bernard 341

Pater, Walter 81-4, 109, 114-15, 118-19, 128, 143,
144-5, 175, 178, 250, 392, 624

death 511-12

Marius 417

and Ouida 352

and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208

and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417, 418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81-2, 119, 356,
394, 401, 591, 597

Paton, W.R.651

Pattison, Mark 119

Peck, Jacques 150, 151

Peel, Willy 428

Pember, Phoebe 210

‘Pen, Pencil and Poison’ (Wilde) 372-3, 379, 398, 418

Pendleton, Senator and Mrs George 221

Pennell, Joseph 219, 567

Pennington, Harper 177, 318, 379

Pentonville Prison 587-92, 624, 625

books in 590, 591

conditions in 588-90

OW’ s reception at 588-9

punishments 588

visit from Robert Haldane 590-2

Perrin, Louis 54

Perzel, William 265, 295

Pharaoh 665

Philadelphia, OW lectures in 209, 213, 214-18, 253-4, 267

Phillips, Wendell 224, 238-9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Wilde) 393-6, 405, 406-7, 424, 442, 458, 466, 666, 690

book version 404, 406, 413-14, 416-18

and Douglas 419, 420

and John Gray 406-7

in Lippincott' s Monthly Magazine 398-403

and Mallarmé 428, 429, 433

and OW' s trial 570

press coverage of 399-402, 401, 421

and the Queensberry libel trial 544, 545-6, 551

Pigott, E.F.S. 169, 447, 454-5

Pigott, Richard 382, 575

Pinero, Arthur Wing 423

Pissarro, Lucien 415, 564

Pissarro, Camille 276

Plato 64, 65, 83, 103, 104, 120, 338, 340, 435

Republic 66

and Socratic dialogue 373

Symposium 56, 388

Plunkett, David 101

Poe, Edgar Allan 30, 55, 223, 279, 323, 505

‘The Raven’ 266, 282

poetry 84-5, 380

influences on OW at Trinity College Dublin 43-5, 46-8

OW' s love of 30

OW' s poems 33-4, 98, 131-2

'Ave Imperatrix' 165, 187, 258, 292

'The Burden of Itys' 142, 186

'Charmides' 142, 186, 189, 193

'Conqueror of Time' 144

'The Dole of the King' s Daughter' 75

'The Garden of Eros' 142, 318, 320

in Greece 103, 104

'The Harlot' s House' 282

'Hélas' 184

'Humanidad' 147-8

'Impression de Matin' 178

'Impressions' 274

in Italy 74

'Les Silhouettes' 185

'Libertatis Sacra Fames' 165

and the literary world 112-13

'Love Song' 93

'The New Helen' 146, 149

'On the Grave of Keats' 113

'Poem on England' 165

Poems 183-90, 192, 199, 211, 212, 216, 218, 275, 276, 363-4, 370, 404, 438-9, 452, 453

publication of 127

'Ravenna' (Newdigate Prize poem) 117, 127-8, 151, 155

'Recent Massacre of Christians in Bulgaria' 113

'Requiescat' 237, 317

'Rome Unvisited' 85

'The Rose of Love and With a Rose' s Thorns' 84, 85

'Roses and Rue' 149

'San Miniato' 73, 80, 84-5

'Sonnet written in Holy Week at Genoa' 102

'The Sphinx' 55, 282, 283, 453, 504-5

'Spring Days to Winter' 85

'Symphonie en jaune' 274

translation of 'Chorus of Cloud Maidens' 70, 76

'Tristitiae' 85

'The True Knowledge' 85

'Urbs Sacra Aeterna' 115

'Ye Shall be Gods' 47

see also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Rodd' s Rose Leaf and Apple Tree 250-1, 262

Swinburne 43-4

Symonds' Studies of the Greek Poets 46-7

see also Swinburne, Algernon

Pollitt, Jerome 690

Pollock, Walter 380

Polycrates 691

Ponsonby, Spencer 455

Portora Royal School 19-22, 23, 27-36, 37

and OW at Trinity College Dublin 38, 42

and OW' s imprisonment 590

sports and games at 21, 28, 30

'The Portrait of Mr.H.W.' (Wilde) 381-2 , 384-5 , 387 ,
394, 404, 422, 593-4

and OW' s trial 570

see also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Wilde)

Powell, Frederick York 580

Powell, York 603

Poynter, Edward 610

Pratz, Claire de 712

Pre-Raphaelites 45-6, 65, 75, 80, 84, 110

and interior decoration 96-8

and OW in London 158-9, 179-81

and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207

and Whistler 177-8

see also Aestheticism

Prescott, Marie 265, 274, 293, 294, 295

Proust, Marcel 431

Public Ledger 214, 215

Punch 136, 188, 456

OW parodied in 160-2, 164, 173-4, 500

on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210

on OW' s Poems 185-6

on OW' s Vera 297

Purser, Louis Claude 32-3, 35-6, 37, 49, 50

Quain, John 118, 128-9

Queensberry, Lady 464, 492, 502, 542, 543

and Lord Queensberry' s campaign against OW 508

and OW' s exile 636, 651, 659, 663, 667-8, 680

Queensberry , Marquess of(The 'Scarlet Marquess')
419, 464-5, 476, 494-5

attempted reconciliation with son 689

campaign against OW 505-6, 507-11, 522, 523, 533,
536, 536-8

card at the Albemarle Club 539-40

death 701

divorce 502

and Drumlanrig' s death 524-5

letters about OW 501-2, 507, 542-3, 555-6, 559-60

libel trial 540-8, 549-58, 560, 569, 572

and OW' s exile in France 635, 636

and OW' s imprisonment 592, 593, 594

and OW' s trial 563, 564, 566, 576, 577, 580, 581

Quilter, Harry 322, 328

Racine, Jean

OW lectures in 238, 239

Phédre 146

Raffalovich, Marc-André 340, 341-2, 385, 475

Rambosson, Yvanhoe 433

Ransome , Arthur , Oscar Wilde : A Critical Study 201 ,
718-19

Rational Dress Society 362

Raynaud, Ernest 433

Reade, Charles 155, 158

It' s Never Too Late to Change 195-6

Reading Prison 602-24

children in 623

conditions 602-3

execution of Wooldridge 608, 637-8

governor 602, 603

OW' s health in 606-8, 609-10

OW' s release from 623-4

OW' s transfer to 600, 601

warders 610-12, 618

see also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Régnier, Henri de 416, 430, 432, 434, 484, 503, 595,
675

Rehan, Ada 696, 697, 701, 705, 710

Reid, Sir Robert 559-60

Reid, Wemyss 350, 355, 366

Reid, Whitelaw 227, 346

Reinhardt, Max 717

religion

Oxford University 64-5, 79-80, 126, 132

see also Catholicism

‘The Remarkable Rocket’ (Wilde) 348, 365

Renaissance art

Pater on 81-2

Ruskin’ s Oxford lectures on 65-6, 72

Renan, Ernest, *La Vie de Jésus* 410, 610

Renaud, Jean-Joseph 640

Reni, Guido ‘Sebastian’ 102, 103, 107, 618

Retté, Adolphe 432, 434, 675

Reul, Paul de 150-1

Reul, Xavier de 150-1

Review of Reviews 525

Revue Blanche 595, 613, 676

Reynolds, Joshua 80, 306

Reynold' s Newspaper, on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673

Rhymers Club 407, 414, 415

RIA(Royal Irish Academy) 4, 7, 8, 13, 54

Richards, Frances 393

Richmond, William Blake 143, 181

'Electra at the Tomb of Agamemnon' 114

and OW' s Poems 185

Ricketts , Charles 388-9, 391-2, 406, 414, 423, 439,
440, 452, 454, 482-3, 504, 539, 618, 646

Ridgeway, William 50

Rimbaud, Arthur 280, 432

Roberts, Arthur 448

Roberts, Sir Randall 368

Robertson, Charles Gray 346

Robertson, Graham 401, 442-3, 454

Robertson, W.Graham 340, 341, 342

Robins, Elizabeth 367-8, 386, 425

Robinson , Mrs(the 'Sybil of Mortimer Street') 511 ,
534, 545, 560

Rocco, G.G.657, 666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Duc de, Maxims 492

Rochester, Earl of 90

Rochester(New York state) , OW' s lecture('Decorative
Arts') 235

Rodd, Rennell 145, 150, 153, 164, 177, 191, 196, 229

and OW' s Poems 187

Rose Leaf and Apple Tree 250-1, 262, 272, 279

Songs of the South 217

Rodin, Auguste 682, 706

Rollinat, Maurice 281

Rome 106-9, 702-3

Roosevelt, Robert B. 209, 259

Rosebery, Lord 495, 509, 524-5, 555, 556, 559, 575, 592

Ross, Alec 357, 364-5, 710

Ross, Robert (Robbie) 201, 338-40, 342, 357, 373, 375, 380, 382, 410, 475, 491, 495

and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659, 660, 661

and Beardsley 482

and Constance Wilde 469

and De Profundis 617-18

on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686-7

and OW in Rome 702-3

and OW's death 713, 714, 715

and OW's exile

final illness 709-10, 710-11, 711-12

in France 631-2, 634, 635, 636, 642, 645, 64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5, 686, 689, 693, 696

in Naples 650-1, 654, 655, 656, 658, 659, 662, 664, 668

and OW' s financial settlement from

Constance 622

and OW' s imprisonment 592, 601, 605-6, 607, 613, 620, 621

and OW' s literary reputation 717-18

and OW' s release from prison 628-31

and OW' s trial 561, 565, 567

and Queensberry

campaign against OW 508-9

libel trial 540-1, 557

on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398-9

Rossetti, Dante Gabriel 45-6, 47, 53, 55, 73, 97, 122, 142, 158, 161, 188, 337, 380, 590

and OW in London 181

and OW' s Poems 185, 186

Whistler on 178

Rossetti, William Michael 113, 141

Rossi, Cesare 666

Rothenstein, William 431, 481, 567

and OW' s exile in France 633, 634, 641, 648, 674,
684, 698, 706

Rothschild, Constance de 456

Routledge' s Christmas Annual 157

Rubinstein, Anton 109

Ruggles-Brise, Evelyn 592, 598, 604, 607, 608

Ruskin, John 70-1, 81, 113-14, 117, 123, 322, 365,
431

The King of the Golden River 334

and Ouida 352

and OW in London 143, 153

and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234, 250, 251

Oxford lectures 65-6, 72, 80, 119-20

The Stones of Venice 82

Russell, Charles 542, 546, 547, 559

St James Gazette 400, 401, 402, 403, 553

St Louis, OW lectures in 237-8, 239-40

Saintsbury, George 328

Sala, George Augustus 241

Salomé(Wilde) 434-7 , 438 , 447 , 453-4 , 458 , 468 ,
469, 471-2, 482, 538, 566

Beardsley' s illustrations 482, 494, 499-500

Beardsley' s translation of 493

Douglas' s translation of 488, 489-90, 493-4

Italian text 657, 666

Paris production of 605, 619, 630, 639, 676

set designs for 539

Strauss' s opera of 717-18

Saltus, Edgar 213, 349, 361, 435

Sambourne, Linley 173-4

San Francisco, OW lectures in 241, 242, 243-7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44

Sand, George 328

Sandhurst, Lady 362

'A Woman' s Work in Politics' 360

Sargent, John Singer 276, 277, 308

Sargent, John Young 64

Sarony , Napoleon , photographs of OW 202-3 , 211 ,
230, 231, 233

Sarrazin, Gabriel 395

Saturday Review 236, 364-5, 526, 532, 537, 619, 674,
692

the Savoy 641-2

Sayce, A.H.54, 144, 152

Scarfe, Ernest 553

Scheffer, Robert 682

Schliemann, Heinrich 106

Schopenhauer, A.310

Schuster, Adela 580, 582, 610, 617, 619, 621, 622-3,
703

Schwabe, Maurice 453, 459-60, 462, 468, 473, 475,
546, 555, 568, 575

Schwabe, Mrs Salis 438

Schwartzkoppen, Colonel von 677-8

Schwob, Marcel 429, 430, 431, 433, 469, 504, 675

Scots Observer 384, 400-1

Scott, Clement 445

Scott, Walter 29, 335

Scott, William Bell 158

Sebright, Lady 110, 111

Sedger, Horace 689, 695, 696

Seeney, Michael 717

‘The Selfish Giant’ (Wilde) 365, 433

Sellick, ‘Hungry Joe’ 268

Seton, Lady 368

Shadwell, Lancelot 77

Shairp, John Campbell 127

Shakespeare, William 30, 188, 273, 437, 693

As You Like It 266, 353

Henry IV, Part 1 332

Macbeth 309

The Merchant of Venice 147, 153

sonnets 348, 381

Twelfth Night 332

Shannon, Charles 388-9, 391-2, 406, 423, 432-3, 482-3, 539

Shaw, George Bernard 260-1, 328, 455, 532, 537

and OW' s imprisonment 603

and Queensberry accused of criminal libel 545, 547

Shelley, Edward 441-2, 475, 502-3

and OW' s trial 562, 568, 569, 573, 576, 581-2, 583

and Queenberry' s libel trial 546, 547, 552, 555

Shelley, Percy Bysshe 56, 107, 113, 150, 333, 357

The Cenci 273

Sherard, Robert 3, 277-80, 281, 282-4, 308-9, 408-9, 416, 429, 431

and Gray' s break with OW 474-5

The Life of Oscar Wilde 718

Oscar Wilde: The Story of an Unhappy Friendship 718

and OW' s exile 645, 651, 679, 682, 700-1

and OW' s imprisonment 576, 594-5, 596, 597, 599,
606, 607

and OW' s trial 565, 577, 578

Sheridan, Richard, School for Scandal 445, 493, 513

Shrewsbury, Lord 149

Shrimpton' s booksellers 127

Shuster, Adela 493

Sibleigh, Charles 691

Sicily, OW visits Taormina 668-9

Sickert family 140-1, 151, 159, 303, 368-9

Sickert, Helena(Nellie) 151, 249, 368-9

Sickert, Oswald 140

Sickert, Walter 140-1, 256-7, 276, 644

Sidney, Philip 188

Simmonds, Gertrude 487, 496

Slee, Miss 151

Smith, William, Smaller History of Greece 34

Smithers, Leonard 641-2, 643, 645, 648, 650, 652, 654, 659, 660, 661, 662, 664, 665, 668, 669, 673, 675, 680, 681-2, 682, 686-7, 689, 696, 697, 706, 709

Smyth, Ethel 94

Snow, Mrs 656

Society of Authors 357

Socrates 56

Solomon, Simeon 45, 115

Somerset, Lord Arthur 390, 471, 502

Somerville, Edith 352-3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Wilde) 410-11, 414, 430, 433, 657

the Souls 420-1

Southey, Robert 304

the Speaker 433, 478-9

The Spectator 113, 353, 364

Speed, Mrs Emma 238

Spencer, Countess 505

The Spirit Lamp magazine 467, 471, 472, 479, 483

Spottiswood, Mrs 154

Spottiswood, Professor 136

Stannard, Mrs 632, 643-4

Stead, W.T.326, 597

Stedman, Edmund Clarence 211

Steele, Frederick 25, 35

Steele, Rev.William(Dr Steele) 19, 20-1, 26, 35, 36

Stephenson, B.C.319

Stevens, Mrs Paran 204

Stevenson, Robert Louis 29, 405

The Black Arrow 374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398

Treasure Island 356, 517

Stewart, Mrs Duncan 287

Stockton, Frank 334

Stoddart, J.M. 214, 215, 217, 250, 386-8, 394

Stoker, Bram 47, 131, 137

Stokes, Dr William 18, 53

Stoner, Monsignor Edmund 106

Stopes, Charlotte 367

Stopford, Albert 668

Story, Waldo 177

Strangman, Edward 633

Strauss, Richard, Salome 717-18

Strong, Belle 245-6

Strong, Joseph Dwight 245, 683

Strong, Rowland 677, 678, 684, 689

Stuart-Wortley, Charles 71

Stuart-Wortley, Mary 143

Sturges, Jonathan 404-5

Sullivan, Arthur see Gilbert, W.S.

Sullivan, Edward 32, 35, 49, 50, 72, 96

Sunday Special 673-4

Sunday Times 444

and OW' s death 715

Sussalich, Vera 168

Sutro, Adolph 245

Swedenborg, Emanuel 11

Swift, Jonathan 8

Swinburne, Algernon 43-4, 46, 47, 53, 55, 75, 82, 91, 113, 142, 143, 158, 161, 172, 188, 380

Atalanta in Calydon 43-4, 47

as a critic 329

Essays and Studies 120

meeting with OW 180-1

and OW' s 'Pen, Pencil and Poison' 372, 373

and OW' s Poems 185, 186

Poems and Ballads 43, 44, 47

Poems before Sunrise 44

Rosamund 47

and Whitman 216

Swinburne-King, Mrs 300

Switzerland 694, 695, 704

Sykes, Christopher 181

Symonds , John Addington 54 , 88 , 109 , 216 , 253 ,
327, 371, 379, 471

'Chimaera' 336

Marius the Epicurean 401

and Ouida 352

and OW' s Poems 185

on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401

A Problem of Greek Ethics 342

Studies of the Greek Poets 46-7, 82-3, 99

Studies in the Greek Poets(Second Series) 92, 93

Symons, Arthur 406, 642, 674

Tabor, Horace 247

Tailhade, Laurent de 595

Taplow Court house party 420-1

Tavernier, Jules 245

Taylor, Alfred 460, 462, 464, 473, 518, 547, 548,
553, 555, 588

trial of 561-2, 563, 566, 567-74, 576, 579, 580, 581

sentencing 583-4

Taylor, Tom 136, 158-9, 196

Teixeira de Mattos, Alexander 405-6, 578, 710

Tennant, Dolly 153

Tennant, Dorothy 274

Tennant, Margot(later Asquith) 420, 423, 505

Tennant, Mrs 136, 153

Tennyson, Alfred, Lord 9, 30, 48, 55, 337, 380

In Memorium 505

The Promise of May 465, 538

‘The Lady Clare’ 14

Terry, Ellen 137, 140, 147, 148, 158, 200, 365, 385,
578, 706

and OW’ s Poems 185, 187

and OW’ s Vera 169

and Whistler 177

Thackeray, William 29, 334

Thaulow, Frits 632

The Theatre magazine 137, 153

Theocritus 46

Theosophists 383-4

Thirteen Club 497

Thomas, Mathilde 150, 151

Thomas, Maud 94

Thorpe, Courtenay 305

Thursfield, J.R.77

Tilton, Theodore 266

Time literary magazine 143, 146

Trinity College Dublin, Willie Wilde at 31, 36, 37, 38

Tisdall, Dr 50

Titian 437

‘Assumption of the Virgin’ 73

Todd, Charles 99

Todhunter, John 48

The Torch 590

Toronto, OW in 254

Toulouse-Lautrec, Henri de 691, 697

Townsend, F.H.347

Toynbee, Arnold 71, 83

Tracy, Peter 254

Travers, Mary 21-3

Trench, Richard 84, 116

Trevelyan, Florence 668

Trinity College Dublin 31, 32, 36, 37-53

and the Mary Travers case 22-3

OW at

academic achievements 50, 53-4

entrance examination 37, 38

foundation scholarship 50

relations with other students 48-9, 51-2

rooms in college 50-1, 52

tutors/mentors 39-43

 'sport at 42-3

 'the Phil' (Philosophical Debating Society) 42, 47, 49

Willie Wilde at 31, 36, 37, 38, 41, 47, 51

Troubridge, Laura 156, 287, 318, 330

Troubridge, Violet 99

 'The True Knowledge' 78

Truth(journal) 165, 189, 196, 229, 291, 391, 597

Tucker, Dr Maurice a' Court 707-8, 710, 711, 712-13

Turner, Joseph 65, 177

Turner, Reggie 481, 505, 523, 546, 547, 557

and OW' s death 713, 714, 715

and OW' s exile

final illness 710, 712, 713

in France 640, 642, 645, 646, 647, 647-8, 680, 683,
689, 693

in Naples 650-1, 654, 665

and OW' s imprisonment 592, 612, 613, 620, 621

and OW' s release from prison 628-31

and OW' s trial 567, 570-1

Tyrrell, Professor Robert Yelverton 39, 40-1, 42, 43,
48, 53, 54, 64, 88

Tyrwitt, Thomas 381

United States

OW' s lecture tour 192-4, 196, 199-261

African-Americans and racial animosities 255-6

and American 'Indians' 240-1

anecdotes about 284-5

Baltimore 209, 219-20, 223

‘The Beautiful’ 193

Boston 209, 223-6

California 241, 243-7

Chicago 209, 235-6, 237, 238, 239

Colorado 247-9

‘The Decoration of Houses’ 239

‘Decorative Arts’ 234-5, 236, 239, 251

earnings and expenses 233-4, 241, 256, 267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205-9, 217-18, 230, 234,
250

informal summer lectures 257-60

interviews by journalists 200-1

‘Irish Poets and Poet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44

Minneapolis and St Paul 239-40

New York 199-213, 230-1, 254, 256

Niagara Falls visit 255

OW' s black valet 214, 234

OW' s dress 194, 203, 206, 222, 225-6, 233-4, 258

Philadelphia 209, 213, 214-18, 253-4, 267

press coverage of 204, 205, 209, 227-9

props 226-7

reading of a 'Lyric Poem' 193

St Louis 237-8, 239-40

and sales promotions 231

San Francisco 241, 242, 243-7

Sarony photographs 202-3, 211, 230, 231, 233

on Shakespeare' s poetical methods 193

the southern states 254-6

train journeys 218, 242-3

Washington 218-23

and OW' s Poems 184, 185, 187, 212

and OW' s theatrical projects 262-8

production of Guido Ferranti(The Duchess of Padua) 411-
13

props 226

reviews of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401-2

and Vera

premiere 292-6, 297

production plans 212-13, 251-2, 262-3, 265, 274

Utah, OW lectures in 241, 242-3

Utica(New York state), OW' s lecture('Decorative Arts')
234-5

Vacaresco, Hélène 712

Vale, J.Sydney 234

Valéry, Paul 675

Vanbrugh, Irene 537

Vanity Fair 143, 229, 304-5, 312

Vera; or The Nihilists(Wilde) 167-70, 174, 191-2, 194-5, 272, 273, 284, 301, 386

Constance Lloyd(Wilde)' s verdict on 298-9

Milan production 657

plans for American production of 212-13, 251-2, 262-3, 265, 274

premiere in America 292-6, 297, 298

Verlaine, Paul 280, 392, 432, 433, 485, 495, 619, 675

Vezin, Hermann 143, 169, 290, 330, 448

Vian, Alsager 346

Victoria, Queen 171, 182, 224, 354, 369, 495, 555, 597

Diamond Jubilee 640-1

Villon, François 429

Vivian, Herbert, Reminiscences of a Short Life 390-1

Vizetelly, Henry 403

Volkmar, Charles 261

Wagner, Richard 109, 310

Waifs and Strays poetry magazine 145

Wainwright, Thomas Griffiths 69, 372-3

Wainwright, Henry 69

Walkley, A.B.478-9

Waller, Florence 527

Waller, Lewis 498, 503

Wandsworth Prison 592-600

conditions in 593, 603

OW' s health in 593, 598-600

transfer to Reading Prison 600, 601

visitors for OW 594-5, 596, 598, 599

Ward, Florence 89

Ward, Genevieve 169-70

Ward, Gertrude 89

Ward Howe, Julia 228, 255, 258, 259, 350

‘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224

Ward Howe, Maud 258

Ward, Lock & Co. 397, 403, 404, 413, 417

Ward, Mrs Humphrey 350

Ward, Sam 209, 220-1, 224, 259, 266

Ward, William ‘Bouncer’ 78-9, 89, 90, 95, 98, 101, 115, 118, 135, 185, 315

in Rome 106-7, 108

Warren, Emily Thomasine 28

Warren, Herbert 129

Washington, OW’ s lecture in 218-23

Washington Post 228

the Wasp(US satirical paper) 243-4

Watson & Pim 118, 128-9

Watts, G.F.143, 165

Watts, Theodore 349, 466

Weeden, Ethel 502

Wendell Holmes, Oliver 258

West, Benjamin 323, 324

Westminster, Constance, Duchess of 100, 152-3

Where' s the Cat? (farce), caricature of OW in 171, 173

Whibley, Charles 400-1, 402, 403, 578

Whistler, James McNeil 46, 52, 101, 110, 143, 144,
250, 256

and Aestheticism 161, 162

Arrangement in the Grey and Black(The Artist' s Mother)
276

'Nocturne in Black and Gold' 114

OW meets in Paris 682

and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196, 248

in OW' s 'The Decay of Living' 374

and OW' s marriage 303, 305-6

OW' s relations with 177-9, 229-30, 321-5, 397

and OW' s trial 580

public criticisms of OW 358, 428-9

'Symphony in White' 177

'Ten O' clock' Lecture 322-5

Tite Street house 140, 147, 164, 305, 388

Venice etchings 271

White, Harry 421-2

Whitehall Review 165

Whitman, Walt 30, 46, 91, 215-17, 253, 268

Wilde, Constance(formerly Lloyd) 175-6, 287-8, 298-303

adopts family name of 'Holland' 595

artistic interests 288

at Babbacombe 467, 468-71, 533, 536, 537, 566, 579

at Goring 486-7

birth of sons 330, 338-9

death 681

decoration of Tite Street house 316-19

and dress reform 362

dresses 306-7, 309-10, 311-12

engagement to OW 299-303

family and social life 342-3

friendships with OW' s young men 342

honeymoon 308-11, 385

and Hubert Parry 422-3

ill-health 383, 644

in Italy 472-3

jealousy 367

and La Sainte Courtisane 498

legacy 446

letters to OW 300, 302

and Mariller 335

marriage settlement 301, 312, 349, 593, 594, 597

OW' s allowance from 605, 614, 621-2, 648, 662, 680-

1

and Oscariana 516, 526

and OW at the Hotel Albermarle 476

and OW at Worthing 515-17, 520

and OW in Felbrigg, Norfolk 258-9, 456

and OW in Germany 456

and OW' s exile

in France 634-5, 644, 646, 648, 677, 680-1

in Naples 650-1, 651-2

and OW' s homosexual relations 540

and OW' s imprisonment 593, 594, 594-6, 597, 598,
604, 605, 614

and OW' s relationship with Douglas 501, 651-2

and OW' s The House of Pomegranates 432

and OW' s trial 561, 566, 577, 579

palm reading 320

and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304

political interests 362, 383

pregnancies 316, 338-9

and Queensberry accused of criminal libel 542, 545, 547-

8

and relationship with Douglas 492-3

and spiritualism 383-4

There Was Once 363

wedding 303-5

on Willie Wilde' s marriage 426

Wilde, Cyril 330-1, 390, 416, 458, 470, 486-7, 487,
517, 520, 561, 596, 605

Wilde, Dorothy Irene 582

Wilde, Isola Francesca Emily(OW' s sister) 13, 14

death 25-6, 49

Wilde, Jane Francesca(formerly Elgee, OW' s mother) 3,
4-5, 8-12, 93

appearance 5

'The Brothers' 9-10, 14, 638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15-16

and Constance Lloyd 287-8

death 604-5

death of husband 86, 87-8

financial difficulties 94-5, 257, 512

and Isola' s death 25, 49

known as 'Speranza' 4, 9

as 'Lady Wilde' 18

and Lady Windermere' s Fan 440, 445

letters from OW to 27-8

in London 137, 151, 369

'at homes' /receptions 153, 360

awarded civil list pension 369

books and articles written by 359, 369

Oakley Street house 505, 577-9, 581

visits with OW and brother 54-5

marriage 11

and the Mary Travers case 22, 23

and Merrion Square, Dublin 115

and motherhood 12, 13, 14

and OW at Oxford 112

and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216, 218, 229, 230, 239, 240, 244, 256, 258, 262

on OW' s articles and short stories 347, 379, 380

and OW' s marriage 299-300, 307, 312

and OW' s trial 566, 577, 581, 582

and OW' s works 84-5, 187, 398, 413

in Paris with OW and brother 26-7

Poems by Speranza 24

political writings 8-10

reading to her children 14

reviews and translations 11, 15

and Ruskin 68

'To Ireland' 28

and Willie Wilde 76, 426

and Woman' s World 353-4, 360

Wilde, Lily(formerly Lily Lees) 505, 577, 582, 599, 619,
710

Wilde, Oscar

on absinthe intoxication 687-8

appearance 29, 32, 287, 311-12

on American lecture tour 200 , 203 , 209-10 , 211-12 ,
266-7

at Oxford 62, 67, 79, 120, 121, 125-6

in Belgium 150

during trial 564-5, 568, 581

hairstyles 275, 278, 290, 292

and imprisonment 601, 606, 618

in London 138-9, 146, 164, 174

on release from prison 629

sketches of 74

as art critic 113-15

articles and essays 372-5 , 379-80 , 381-2 , 397-8 , 409-11, 418

at country house parties 420-3

in Belgium 150-1

birth and baptismal names 3-4, 12

blackmail over 'madness of kisses' letter 473-4, 479-81, 544

character 21, 30, 62-3, 79, 139-40, 151

conversation 343-4

physical manner 343

questionnaire on 'tastes, habits and convictions' 117-18

childhood 13-18

death of sister 25-6

family holidays 14-16, 17, 24-5

letters to his mother 27-8

shooting and fishing 24, 43

visit to Paris 26-7

death 712-15

dress 29

at Oxford 62, 67, 68, 72

on British lecture tour 290, 316

in exile 675, 682

lectures on 313-15, 316

lectures on women' s dress 305

in London 138, 139, 344

in Paris 275

on release from prison 620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 203, 206, 222, 225-6, 266-7,
292

and dress reform 212, 213, 350

Eighty Club membership 358-9

in exile

assumes name of Sebastian Melmoth 618

in Dieppe and Berneval-sur-Mer 628-48

in Naples 648, 649-70, 657

in Paris 670, 673-85, 686-92, 698-702

philosophy of failure 699-700

fairy tales 259, 274, 334, 335, 345-6, 347, 348-9, 363-6, 380-1, 405, 423, 502-3

financial troubles 151, 271, 286, 349, 495, 499, 512, 538

and American lecture tour 232-4

at Oxford 94-5, 118

in exile 652-3, 659, 663, 680, 688-9, 709, 710

and imprisonment 592, 593-4, 597

and marriage to Constance 301, 331

and the Queensberry libel trial 542, 592, 593, 594

and release from prison 619-20, 621-3

and trial 566-7

and the French language 274-5, 434, 437

funeral 714-15

in Greece 102-6

health 268, 387, 416, 467, 468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696

ear infection 488, 565, 607, 707-8, 709-13

in exile 682, 700

in prison 591-2, 593, 598-9, 605-7, 608-9

imprisonment 588-624

access to books 590, 591, 597, 603, 604, 610

appears at the bankruptcy court 600-1

and children in prison 623, 630

French reaction to 595

Pentonville Prison 587-92

pity for other inmates 612-13

post-release plans 618-19

press interest in 590

public interest in 589

Reading Prison 600, 601, 602-24

release from prison 623-4, 627

Wandsworth Prison 592-600

and Irish nationalism 136-7, 168, 239-40

lectures

on Chatterton 337-8

Dublin' s Alexandra College 112, 116

lecture tour of Britain 289-92, 299, 301-2, 303-4, 313-

16

Royal Academy Schools 288-9

tour of Britain 289-92, 297-8, 299, 301-2, 303-4, 313-

16, 325

US lecture tour 192-4, 199-261

literary reputation 717-20

in London

fundraising activities 152-3

hansom cab habit 409

parodies, satires and caricatures of 160-4, 170-3

resentful attitudes towards 174-5

and the Marquis of Queensberry

accused of criminal libel 540-8, 549-58

campaign against OW 505-6, 507-11, 522, 523, 533,
536, 536-8

marriage to Constance Lloyd

birth of sons 330-1

decoration of Tite Street house 316-19

engagement 299-303

financial settlements 301, 312, 349

honeymoon 308-11

job applications 331

letter to 315

wedding 305-7

nicknames 32, 79

parents' background 4-12

parodies of 160-2, 164, 173-4, 499-500

poems see poetry

political interests 358-62, 409-11

Irish Home Rule 358-9, 360, 362

socialism 360-2, 410-11

 'Postlethwaite' persona 160-4, 172, 184

relations with brother 16-17, 29

reviews 325-30, 332

on Greek art 165

Grosvenor Gallery 113-15, 143, 177, 277

on Whistler's lecture 323-4

romantic interests in women 93, 115, 131, 246-7

schooldays 19-23, 27-36, 38

gatherings in the Stone Hall 31-2

intelligence and academic abilities 21, 23, 26, 27, 29,
32-3

reading 29-30, 34

sexuality 30, 38, 191, 282-3, 336-7, 338-42, 371, 484-
5, 644-5, 679-80

short stories 346-9, 405

suicidal thoughts 577-8, 667

theatrical projects 262-8, 272, 283-4

and toys 468

trial of 567-84

arrest 559-60, 563

bail granted 576-7

closing speeches 571-2

committal hearings 561-6

financial troubles 566-7

hostility and condemnation 563-4

imprisoned on remand 564-6, 574

jury unable to reach verdict 573-4

OW urged to flee abroad 578-9

OW' s evidence 569-71

and plays at London theatres 560, 566

retrial 575, 580-4

verdict and sentencing 583-4

witnesses for the prosecution 562-3, 567-9

university education see Oxford University;

Trinity College Dublin

voice 139

'way of being right' 719-20

Woman' s World editorship 251-5 , 360 , 362 , 366-7 ,
379, 380, 387

Wilde, Ralph(OW' s great-uncle) 54

Wilde, Rev.John 90

Wilde, Rev.Ralph 8

Wilde, Vyvyan 338-9, 516, 520, 561, 566, 650, 681

Wilde, William(OW' s father), later Sir

William 4-8, 211

antiquarian interests 6-7, 8, 24-5

appearance 5

The Beauties of the Boyne and the Blackwater 8, 11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52-3

character 11-12

death 86-8

declining health 84

as a father 13, 14, 16

house-building 14-15

illegitimate daughters 8, 49

Irish Popular Superstitions 11

and Isola' s death 25

knighthood 18

The Last Years of Dean Swift' s Life 8

Madeira 6, 8

marriage 11

and the Mary Travers case 22-3

medical career 6, 7-8, 11, 12, 13, 18

and Moytura 16, 18, 24-5

and OW at Trinity College Dublin 54

will 87

Wilde, William('Willie' , OW' s brother) 76-7, 369, 487

appearance 28-9, 76

at Moytura 74-5

at Trinity College Dublin 31, 36, 37, 38, 41, 47, 51

birth and naming of 4, 12

career 76, 116

journalism 130-1, 143, 328-9

childhood 13-14, 16-17

death 694

and death of father 86, 87

leaves for England 93-4

marriages

Lily Lees 505

Mrs Frank Leslie 425-6, 451

and Merrion Square 116

and OW at Oxford 112, 128

and OW in London 137, 143-4, 146-7, 173, 175

and OW in Paris 285

and OW' s marriage 300, 302, 307

and OW' s trial 578

poetry 76

reputation 76-7

schooldays 21-2, 23, 26, 28-9, 31

Wildy, Mr 593

Wilkinson, Louis 690, 700

Willeys, Marian 121

Wills, Justice 580, 581-2, 583-4

Wills, W.G.142, 143, 147

Melchior 328

Wilson, Henry 8, 14, 87, 115-16, 124

Wilton house party 420, 422-3

Winckelmann, Johann 82

Windt, Harry de 656

A Woman of No Importance (formerly Mrs Arbuthnot (Wilde) 456-7, 466, 473, 476, 477-9, 481, 489, 701

press response to 478-9

Woman' s World magazine 251-5, 360, 362, 366-7, 379, 380, 387

women

and OW in London 145-50, 156-7

OW' s attractiveness to 175

and OW' s 'Beauty Parties' 121, 145-6

OW' s friendships with 367-9

Wood, Alfred 469, 473-4, 546, 547, 550, 552, 556

and OW' s trial 562, 568, 571, 572, 581, 583

Woodberry, George E.249

Wooldridge, Charles Thomas 608, 637-8, 661, 664

Wordsworth, William 3, 9, 277, 634

the World 131, 143-4, 160, 165, 175, 178, 182, 274,
297, 358, 478-9

on OW' s American lecture tour 195, 196

on OW' s articles 384

on OW' s British lecture tour 291

on OW' s fairy tales 364

on OW' s Poems 184-5, 186, 241

OW' s short stories 348

Worthing(South Coast town) 122, 515-17, 561

Wratislaw, Theodore 487, 642

Wrest Park house party 420, 423

Wyndham, Charles 526, 639, 640, 646, 702

Wyndham, George 420, 422, 508, 561, 563

Yates, Edmund 131, 143-4, 175, 182, 229

Yeats, John Butler 10

Yeats, W.B. 356-7, 370, 375, 380, 580

Fairy and Folk Tales of the Irish Peasantry 360

The Yellow Book 500, 503, 564, 641-2

Yonge, Charlotte M., *The Heir of Redclyffe* 250

Young, Dalhousie 632, 648, 652, 710

Young Ireland movement 9-10, 17

 ‘The Young King’ 365-6

Young, Mrs Dalhousie 684

Zambaco, Maria Cassavetti 276-7

Zola, Émile 374, 403, 416-17

and the Dreyfus affair 677, 678-9

and OW’ s imprisonment 604